抗日战争

www.superfection.com
www.superfection.com
www.superfection.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抗日战争

www.superfection.com
www.superfection.com
www.superfection.com



抗日战争

王树增

简介

序 章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一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

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日本，太平洋北部一个由四个大岛和无数散碎小岛组成的岛国。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岛国上衣衫褴褛的农夫、饥肠辘辘的武士、阴鸷贪婪的庄园主在狭窄的火山缝隙里构成了一幅贫穷混乱的社会场景。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岛国上的海盗、浪人以及官员们，年复一年地乘船向西——无论是为了抢劫、偷盗还是朝贡——当他们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陆时，总是战战兢兢的。他们长久地把这个国土面积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饶国度称为“天朝上国”。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块未开发的“新大陆”。当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库克船长还没有在澳洲登陆的时候，中国已经殿宇金碧辉煌，城郭密如繁星，江河舟楫穿梭，沃野稻黍摇曳。数千年来，中国的哲人们捧读经典洞察玄机，诗人们浅唱低吟华章如锦，农人们参悟天象耕云播雨，武人们琴心剑胆横刀立马。中土广袤，边塞飘雪南岭飞花；中国人口众多，挽手为岳哈气成云；中国人杰地灵，豪杰辈出圣贤代代。

这样的中国，屹立在日本人可望不可即的大海的另一边。

然而，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长达数年的中日战争，却使中国大半国土沦丧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近两千万中国军民在战火中丧生。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旧认为，日军对中国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大和民族骄傲的壮举。

而中国人是否知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四百多年前，中国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在向荣立战功的将领们分发领地时，明确意识到日本本土狭小与贫瘠的局面必须改变。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指挥二十万日军跨海冲进东亚大陆。为计算并领受战功，日军将领和士兵用盐和醋保存了无数朝鲜人的耳朵和鼻子——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战死的朝鲜官兵的，另一部分是割下来的朝鲜老弱妇孺的——它们被当成战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广寺的西侧，被称为“鼻冢”。

毫无疑问，中国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耳朵和鼻子，还有足够分赏的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丰臣秀吉发誓，终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去中国当皇帝，把中国分割成无数碎块，成为日本将领和大臣的私属领地：“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都，呈献都城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

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这一发声于四百年前的狂言，不仅表明地处弹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从那时起就不认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们把野蛮入侵别国国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后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装侵略中国叫作“进入”。这个星球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入侵别族或别国的行为，但是从认知逻辑上丧失“侵略”与“被侵略”这一常识判定的国家，前所未有。

十七世纪初，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丰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并河天民在其《开疆录》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将“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国”的扩张理念，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大大日本国也。”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仍旧是“小日本”。与近代中国一样，长达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使得日本经济凋零，吏治腐败，武备废弛。一八五三年，一支美国舰队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率领下，“直入”日本江户（东京）海岸的浦贺，美国人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商品贸易，日本近代史称之为“黑船事件”。无力抗衡美国军舰的日本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的黑船事件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大致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但从别国“直入”的角度讲，黑船事件无论性质和后果都无法

与鸦片战争相比。西方列强既没有在日本划分势力范围的企图，更没有占领那个大海中的岛国的打算，美国人不过是想跟日本人做做生意。但是，当西方列强的舰炮在中国海岸轰鸣时，当中国人还在懵懵懂懂地观望洋鬼子如何爬上中国的海滩时，数千公里之外的日本却举国人心惶惶了。

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与生俱来。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狭窄的耕地面积使得粮食产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浆堆积的新生陆地几乎没有可供开采的矿产，而日本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限土地出产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国民之增加无限，国民终多于国产，国产少于所增之国民，终难遂之所欲。”——无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机意识的地缘因素。

因此，当看到“天朝上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后，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种极度焦灼的情绪，这种混杂着不解与震惊的情绪，其核心还是生存危机意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和谋臣们不同，岛国上的人从来没有试图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船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下级武士和豪商志士开始激烈地反对封建幕府，呼吁改革，畅想由“小日本”变为“大大日本国”的宏伟蓝图，其主张与丰臣秀吉等人的扩张思想混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极为日本式的开国方略和逻辑准则。

至今影响着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维逻辑，产生于中国大清咸丰年间，名为“补偿论”。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阴，是这一论述的鼻祖。据说他十五岁就已经饱学中国儒术，十七岁提出日本必须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主张。近代中国的政客谋臣们，一旦国家面临危机，他们给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议守”或“议和”。而吉田松阴给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国方略却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他建议从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登陆，然后横扫整个中国。以四百多年后依然是危机导火线的竹岛（韩国称独岛）作为“直入”中国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阴最早提出的：“一旦君临满洲朝鲜，竹岛是最好的落脚点”，它是“日本将来进军大陆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进军”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劫掠。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守信义，趁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

“补偿论”的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唇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

这种逻辑违背了常理。

常理应该是：受到劫掠，弱者顺从屈服，强者奋起反抗，两者必选其一。而日本两者都没有选，不去劫掠者那里讨回损失，却去劫掠别人以挽回损失。这是弱，还是强？通常的逻辑是：凡极度狂妄和偏执者，多内心极度自卑；凡对强者奴颜婢膝者，多对弱者残忍凶狠——自卑和凶狠需要相互补偿，这才是“补偿论”的真谛。

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是封建国家，而日本在封建社会跨越式地产生出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殖民扩张思想，这在历史发展规律上也不合乎逻辑。

日本的近代史是世界史中的特例。

为了实现“大大日本国”的宏伟目标，依照“补偿法”的基本原理，在确定劫掠目标时，日本人认为最易得手的莫过于中国：“凡经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处开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由皇国易取之土，莫过于中国之满洲。何也？满洲之地，于我日本之山阴，与北陆、奥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对，总八百余里。固知其势易扰。骚扰也当以不备处始，西备乱妨东，东备骚扰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间，以知其虚实强弱，而后避实就虚侵它……如此黑龙江之地方悉为我有。”

日本人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举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

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

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这一计划现在读来仍会令中国人心惊。

佐藤信渊，生于一七六九年，卒于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学者。他的上述言论，大约产生于一八三二年，即中国大清道光年间。一百年后，日军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顽固持守令人难以置信。

一般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历史转折点，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始。曾在侵华战争中出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对此阐释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打破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下的世外桃源迷梦，从封建国家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它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瞠目而视，同时又对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东亚的锋利势头感到惊愕……日本的朝野人士便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海外，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日本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在明治维新和以后日本所处的客观形势中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和"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近代中国与日本一样"瞠目而视"并"感到惊愕"，但是，"瞠目"和"惊愕"之后，两个国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中国致力于固守疆土，购买军舰横陈港口，修建炮台把守海岸，千方百计地要把列强阻挡在国门之外。而日本却把富国强兵作为国策，把疆土防线从本土推向海外。这种向内消极防御和向外积极出击的文化差异，是造成中国近代以来悲剧历史的根源之一。

一八六八年初，中国大清同治七年，日本以中下层武士为首的倒幕府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了封建幕府持续了六百八十二年的统治。九月，睦仁天皇改元"明治"，并开始了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强国的维新改革。日本模仿西方订立民法、刑法和商法；废除身份制度；结束藩主割据，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于中央；统一货币；依照德国和英国的模式重编陆军和海军，规定全国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一律须服兵役……在迅速完成向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过渡后，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施政纲领，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

基于这一对外扩张的国策，第一要务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在设立

兵部省、外务省和发展军工的工部省后，日本又设置了由天皇直辖的军部。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直接对天皇负责，从此确立了军阀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统领下的军队，要求皇军为扩张战争奉献生命乃至一切。一八八二年，天皇又颁布《军人敕谕》，要求日本皇军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确立，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要标志。

“神道”的基本含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国”。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潜存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国是神国，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亿的世界；一神的附属，永传万乘之王道。”由“神国”引申，便是“神国中心论”，即：日本在东方，“东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开辟，由东方开始……”

日本人的“神国”论衍生出两个重要概念：

其一是绝对尊皇。中国也是帝制形成很早的国家，但同时又是世界上少有的泛神论国家。中国流行过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成为国民的信仰主流。自古以来，中国人可以什么都信，也可以什么都不信，信与不信的确立大都出于功利目的。中国人会向神灵索取自己需要的一切，从发家致富到消灾避祸，再到家里生下一个男婴。对于普通中国百姓来讲，虽然国家有一个皇帝，但是皇帝与他们既没有精神上的融合也没有利益上的关联。因此，中国人除了惧怕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府恶吏、乡间恶霸以及突然闯入家门的兵丁和散匪之外，谈不上由衷地敬畏什么。而日本国民对“天皇是神的后裔”之说确信不疑。率先指挥日军入侵远东的丰臣秀吉就曾向国人宣布：“夫日本神国，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无差别。”尊皇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人对“神”即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已经超出宗教的范畴，成为延续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其二是从“神国中心论”到“神国所有论”的延伸。中国也曾长久地视天下别的国家为“夷”。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一八五八年，西方列强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天津条约》。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制定一条外交条款，这在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往来中一律将“夷”改用为“洋人”。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世界属于中国的想法。而日本宣称自己位于开天辟地的起始之地，是为了证明整个世界本该属于日本。对

此，佐藤信渊的表述是："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系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臣仆。""以此神州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

从尊皇到"神国"，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即"武士道"。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庄园制的产物。为了保护庄园不受外侵，庄园主武装了部分庄民，这些庄民逐渐脱离生产成为专职武士。在日本国内长期的战乱中，各个政治集团都拥有效忠于自己的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成为日本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自一一九二年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建立，至一八六七年最后一个武士政权德川幕府被推翻，上层武士集团统治日本长达六百七十五年，武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漫长的浸染中逐渐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精神内涵复杂，主要由两个层面组成。

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从对祖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行，直到对神即天皇刻骨铭心的忠诚。这是一种绝对的盲从。倒不是日本民族没有善与恶的概念，而是判定善与恶的最高标准就是"忠"与"不忠"。——"不为舆论所迷惑，不问政治，而专念于守本分之'忠'节，牢记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

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静地面对死亡，甚至要求厌恶生而亲近死："昼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时之死生，只是寻常事"，"死生荣枯只是一气之消息盈虚"而已。被称为日本武士道经典的《叶隐论语》一书，对此说得最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

武士道由一种职业操守，上升为一种人生境界，不但被普及为日本国民的集体信念，更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

日本军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发挥到极致，使得持续多年的中日战争遍布令人惊悚的血腥气息，令"大日本皇军"一词至今仍是中国人记忆里凶残野蛮的代名词。

但是，日本的右翼政客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由是：日本人是真正的文明人，皇军屠杀的中国人乃至除日本民族之外的所有亚洲人，统统

都是野蛮人。——既然是文明人面对野蛮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有什么逻辑可循。

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东亚盟主论”，也是“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的“脱亚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是文明人的举动，呼吁同属亚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边，“共狩共食野蛮国家”。——“共狩共食”一词用得极为阴险——中国人是愚昧野蛮的猎物，是“文明人”猎杀的对象，日本人不但要脱离亚洲成为文明的欧洲人，还要和欧洲人一起猎杀中国并分享之。

福泽谕吉“共狩共食”的理论依据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国际公法以及和平条约，都不如一门大炮和一筐弹药来得实在——“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之道，或使他国灭亡，或为他国灭亡”。福泽谕吉所说的“他国”即指中国：“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无论如何，若把这个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后另行改组，则人心也许会为之一变。”——福泽谕吉替代“侵略”的词语是“改组”。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不断染指中国，这使得在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强大的日本“改组”中国的欲望愈加强烈。一八七九年，日本参谋本部首任长官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上奏中呼吁，当前日本第一位的是“强兵”，因为“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可守”。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想强国富民，但以强大的武力掠夺他国，达到强国富民目的，这是日本独有的逻辑。

这一年，日本占领冲绳，将属于中国的琉球改为冲绳县，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岛屿强行纳入日本版图。

大清王朝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出面调解，无效。

一八八七年，中国大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的中国看上去似乎并无动荡：五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孙家鼐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中国再度降低边界贸易的进出口税率，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两处通商口岸，给予法国在中国南境、西南境享有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十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葡萄牙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允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允葡萄牙派驻北京公使；允葡萄

牙在中国通商口岸设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各种条约被蝇头小楷写成奏折送往颐和园。在颐和园休养的慈禧太后很喜欢昆明湖上那个被荷花簇拥的小岛，她并不认为大臣们不断向她提起的远在东海深处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以及南面的那个澳门半岛，与她的大清国和她当下怡然的心境有什么要紧的关系。这一年中国的民间看上去似乎也无大事。北方，黄河于九月在郑州附近再次决口，灾民们照例开始四处移动。南方，一个男孩儿出生于浙江溪口镇的一户富商家里，没人会料到这个名叫蒋介石的中国人日后会成为日本人的死敌。

但是，一八八七年，在日本却出现了一件与中国相关的大事：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个最为嚣张的侵略中国的蓝图出笼了。

小川又次，福冈县人，职业军人，日本陆军对外实施扩张战争的倡导者。这个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军官，被认为是影响了日本陆军数十年的战略家。他在一八八七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当时他的军衔是大佐，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这一作战计划被日本军方视为全面侵华的重大军事机密，名为《清国征讨方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抱有一个荒诞的逻辑，即“日中连带论”。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是日本一国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关，中国的归属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如果中国被西方强国抢先占领，那么日本的前途不可预料；而日本抢先占领中国的种种障碍，除了西方列强的窥视外，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坐等中国强大起来。——“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自尊傲慢成风，自称中国”。“清国自尊傲慢，若实力达此程度，即便对无关邻国，亦欲玩弄实力”。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还没有强大时灭亡它：“趁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鉴于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国的详尽作战计划：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动六个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于渤海湾登陆，直接攻击北京，占领中国都城并俘获中国皇帝。同时，在中国的南方实施助攻，动用两个师团和海军一起自吴淞口冲进长江，水陆并进，占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安庆、荆州等城市，以牵制长江以南的中国兵力使之无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乃至五十年后的中日战争中，这一作战计划被按部就班地执行了。

武力占领中国后如何处置这片偌大的国土？

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属于日本版图；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于中国本部割扬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王国，并使之成为我国之保护国，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使之属于我国；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

也许由于上述计划过于露骨，为说明占领并分割中国“并非暴举”，小川又次费尽心思地做了一番离奇的辩解。首先说，当年清朝夺取的是属于明朝的中国，既然清政府没能把中国引向文明，就应该让清人退回到满洲老家去，将拯救中国的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但让中国的明朝复兴，又无异于制造出一个新的大清王朝，这样中国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不如把中国分割成块以便利于日本统辖。然后说，日本人的这种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国人的意愿，日本可以让中国人建立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不但能恢复明朝汉人的统治，而且日本还将负责地为中国寻找一个“关羽后裔”来当国王——中国人喜欢财，关羽是国人的财神，中国人自然会拥戴这个决定。——当然，即使是“关羽的后裔”也应该在日本的庇护之下。至于西藏、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状，由日本册封几个酋长，只要听从日本的管辖，将保证其社稷安宁人民幸福。——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谁能一味视我国为土地掠夺者”？

与丰臣秀吉一样，虽然出笼的是侵略计划，小川又次仍回避着“侵略”二字。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词语是“进取”。

一八九〇年，日本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种必然。农民失去土地，农村更加凋敝，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落后形成社会冲突的爆发点，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与国内市场的狭窄以及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日本是后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很难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此必须扩张资本并寻求海外市场。这个时候的日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动战争。

四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二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不但狂热地吹捧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开国五十年来所淤积之磅礴活力的发泄”；而且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狭窄的国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时至今日，就像住一间房子里的两个人一样。在贫穷的国土上，每年增加四十万人口，照此计算，这样不断积累的话，人就只能住在人上面了……我国向世界各地扩展人口之时，成为阻碍之大敌的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据我所想，我国将来的历史，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国建设新故乡的扩张史。如果我们日本能够战胜土地是我们十五倍、人口是我们的十倍的大清国，不仅可以扬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孙，面向世界，永远立步，还可以增强我们站稳世界的自信心。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建设扩张性的日本而战，还是为了建设扩张性日本的自信心而战。

《大日本扩张论》也对侵略进行了辩解，只是这个辩解更加耸人听闻：

三百年来紧缩的日本一跃而为扩张膨胀的日本的大好时机，不在此刻又在何时呢？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为了日本国的开放解脱；对周边国家来说，给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以一大打击，把文明之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宣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要确保永久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惩罚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与清政府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保有我们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国民的向外扩张。

这位内阁参事官秉持的无赖逻辑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处，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是严重侵害“我们的正当权利”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惩罚的方式是“发生战争”。

尽管大清王朝在一八八五年就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并于《清国征讨方略》出笼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八年，成军了具有二十五艘战舰、总吨位堪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是，仅仅六年后，大清王朝的

北洋舰队即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一八九五年，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予日本，同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尽管后来在列强利益关系的制衡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中国需要再多赔偿日本白银三千万两，此项赔偿被称之为“赎辽费”。——自己的国土竟要从劫掠者那里赎买回来，这样的逻辑在国际关系史中绝无仅有。

在未获得这项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从未读到数万万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元。因此两亿三千万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

在日本为巨额赔款举国狂喜的同时，中国北洋舰队残剩的战舰被拖到日本，停靠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被用于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厚颜无耻的大清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族。

近代以来，日本给与中国人的精神侮辱，远比物质抢劫更为深重。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占据并保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他们几乎同时提出了“保护中国”的建议——这显然是坐地分赃的伎俩。看到独霸中国已不可能实现，一八九八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声称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过于强大，而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倾轧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引导中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义务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

一九〇〇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列强们果然一起来“保全”中国了。他们联合入侵并占领京城，大清皇室仓皇出逃，列强们的军队在紫禁城阅兵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在对中国入侵和抢劫的八国联军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阵营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白银赔款。有了这笔赔款，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支付了巨额的扩军军费。——两年后，日本陆军总兵力已是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四年后，日本购买并建造了大量战舰，其海军军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令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腹地的驻兵权，其驻军被称为“清国驻屯军”。这就是三十多年后的中日战

争为什么爆发于北京卢沟桥的历史原因。

列强们在庚子事变中所获甚多，但他们侵占的只是中国的一隅，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占并统治巨大无比的中国，他们也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独自享用如此广袤的疆土和丰饶的物产。日本虽对西方列强成为其全面占领中国的障碍万分恼怒，但也不得不与列强们妥协："维持中国独立，保全领土，各国在华之商业，持机会均等主义。"——只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欲望和境况，如何甘心与西方列强"机会均等"？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但无暇顾及中国，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日本人认为，他们独霸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八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从中国山东半岛登陆——此前那里是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济南、青岛和整个胶州湾，使得中国的东海几乎成为日本的内海。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的经营管理期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开矿、购地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中国军械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等。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理所当然："按中国之现状，并无自保之力，外国则除日本外无此资格。盖中国之保全与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离之事实，则只有日本负此责任。"

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胀论》一书中，将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孙树"——公孙树，稀少名贵的木种——具有伟大的品性却生长在花盆里，因而不能伸展枝干。所以，应该"把日本民族从这狭小天地拯救出来，移植于世界的沃野中"，让这棵名木"于广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论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新平为"侵略"二字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替代词："移植"。

那么，日本应该向哪里"移植"呢？

日本人的结论是：我们知道对岸有合适的地方。

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强入侵的行动中，中国从未赢得过胜利。一九一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名义上主权独立的中国已成为国土最为破碎的国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占领台湾后，又占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割据广东、广西、四川以及云南；英国占领香港后，染指长江流域的大半个中国，并武装入侵西藏；德国的势力占据山东；葡萄牙进占澳门。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遍布着列强们掠取的租界；不平等贸易使中国的经济几近瘫痪，巨额的战争赔款又让列强们以借款的名义控制了中国的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一切国之命脉。中国的当权者——无论是皇上还是大总统——一直奉行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苟且政策。结果是国家一贫如洗、国民苦难深重。

但是，给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并在中国的苦难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却认为他们也处在无边的苦难中。一战结束后，美英为遏制日本崛起后的扩张势头，规范东亚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于一九二一年末至一九二二年初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产生的公约和条约促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不但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进行了种种限定，比如确认满蒙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容别国占领，而且还给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为一流帝国，日本为二流帝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为扶助角色。——觊觎着整个亚洲的日本，被列强们列入了二流，这让日本人感到愤懑和难堪。

更让日本严重不安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

近代中国对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对日本人。确切地说，中国人从没把日本人当洋人看待过。这不仅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相貌和体征与中国人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岛国视为一块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自唐开始，中国的国土上就能看见从那个岛国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中国人将他们统称为“倭”，将那个岛国称为倭奴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十四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之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持续不断，中国人的排日情绪逐渐高涨，民间不断地发起抵制日货的行动，官方更是把日本视为最阴险的外交对手。出于自身境况的考虑，中国一直采取依赖美英、牵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一战结束后，中国北洋政府依靠美英迫使日本交还山东主权，并表示拥护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希图以此遏止日本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均势从而攫取更多利益的图谋。

面对中国，日本的苦闷源于这样的逻辑：中国很贫穷，日本很强盛；中国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很野蛮，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国家，与其让西方列强们瓜分，不如成为同属亚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国为什么宁可接受西方列强而坚决地抵制日本？

这种苦闷催生了日本军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一九二一年，几名被派往欧洲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订立盟约，约定回国后在军界“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全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改造，史称“巴登巴登密约”。参加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的军官们，均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有时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德国武官东条英机、日本驻俄罗斯武官小畑敏四郎，还有专程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先后归国，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团体随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逐渐控制了陆军省、航空部、资源局等要害部门。而那些带头发起组织法西斯团体的青年军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及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将领：石原莞尔、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

也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在企图扶持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同时，明确表示：“满蒙地区与我国领土相接，对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关系极为密切。以此两个利益为主，在满蒙地区扶植我之势力，此乃我对满蒙政策之根本。”

还是一九二一年，在中国的上海，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这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成为抱有最不妥协态度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怀拯救衰弱中国的梦想。尽管两党在政治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拼死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上不存在分歧——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可是，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已深陷军阀混战中。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后，各路军阀为争当统治者接连开战，整个中国在你来我往的厮杀中四分五裂。一九二〇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通过大战取得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胜利，北洋政府权落直系与奉系手中。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的结果导致张作霖退守山海关。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一次奉系军队战胜直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推戴段祺瑞再掌北京政权。此时，在中国的南

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四年成立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开始北伐战争，孙中山希图通过北伐结束军阀混战，将中国引向统一和强盛。一九二六年初，为防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入侵，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并随之开始全力扩充军队。

无论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从战场距离上看与中国的东北地区相距多么遥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与张作霖一样，依旧认为北伐将对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构成威胁。一九二三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不但造成二十四万人伤亡，还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重创。经济危机使得执政内阁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战争中出任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的田中义一。这位军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强坚持的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的强硬立场立即得到因在中国辽东半岛南部设置“关东州”而得名的关东军的支持。以至于日本军部把能够动员的三十二个师团中的十六个师团，直接针对着中国的东北、京津、山东、华北、上海和福建方向，甚至还策划了对中国心脏地区汉口的作战蓝本。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仍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以国民党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准备出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无论国民党内部矛盾纷争如何激烈，但双方很快在一个政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必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共产党。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分道扬镳，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机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对其在东北地区权益的承认。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宣称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后，田中义一起草奏折，于七月二十五日呈送天皇，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这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藉日支共存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

诚我国同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

《田中奏折》首先说明，自明治维新以来，凭借与中国“共存共荣”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会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着，《田中奏折》阐述了日本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基本策略，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厚的资源进军亚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地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洲；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中国国土也……。

当然，日本仍需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寻找理由。《田中奏折》认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误，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强的压力下承认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这一失误必须纠正，日本要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只有在这样的借口下日本才能“得寸进尺”：

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国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支那为主权。因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满蒙领土之真相予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田中奏折》，这份通篇都在宣扬武装侵略占领别国的军国主义文件，最终成为日本入侵中国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三

《田中奏折》呈送天皇两个月后，为迎娶宋美龄，蒋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期间，他密会了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日

本军政首脑，以谋求日本对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义一表示，北伐军不应急于北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共产党，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中国南方，共产党就会重新崛起，日本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一任共产党在中国蔓延，不但有碍日本的在华利益，还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从而危及日本的国体。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国共产党，竟可能危及日本的“国体”，这显然是夸张之辞。田中义一的真实意图是：倘若北伐军顺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他希望蒋介石“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而蒋介石则表示，“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因为“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放弃支持军阀张作霖——“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发布《告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言历史赋予的使命是：“誓竭全力，策励军心，会师前线，重申北伐，拥护中央，以固根本，震慑纷乱，以苏民生。”

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济南，结束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然而，蒋介石进入山东督办公署还不到三个小时，日军就在派遣军司令官、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的率领下开进了济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护“居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没人相信日军是来“保护侨民”的，因为北伐军的作战目的与日本侨民没有任何关系，且当时济南城里的日本侨民不及两千，而从青岛和天津陆续抵达的日军多达三千五百人。面对中日两军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决定隐忍。蒋介石派人与日方秘密联络，表示愿意承担日军军费，条件是日军撤回青岛。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军的北进将成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严重威胁。

五月三日，日军开始炮击济南城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被迫还击。深夜，日军包围了山东省交涉公署。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方交涉，因拒绝向日军下跪并破口大骂，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后，连同其下属十七人被枪杀。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再次前去与日军交涉，日军军官胁迫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在所谓中国军队枪杀了一个日本军曹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上一个“阅”字后才将他放回。蒋介石认为日军正逼他趋于“无可忍”，以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军“全数撤离”设防地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

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然而，北伐军撤离后，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日济南全城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济南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称“济南惨案”。

此时，在日本国内，田中义一内阁决定驻扎在名古屋的陆军第三师团迅速开往中国山东，同时对外宣称：日军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日军的回击性行动是为“显示皇军的威武”，是对中国人进行的“断然惩处”，是为“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把入侵中国和屠杀中国人称为对中国的“惩罚”和“惩处”，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成为日本官方和军方惯用语。

早在“济南惨案”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就已形成共识：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中国北方后，如果张作霖的奉系军队顶不住，势必会退守他们的大本营东三省，那将极大地“威胁”日本百万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不要说北伐节节胜利的蒋介石从没认可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统辖权。

果然，不出日本人所料，“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指挥北伐军绕道济南直逼京津，张作霖的北洋政权岌岌可危。日军紧急将山东的一部分兵力派往天津，同时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发出了武力威胁：奉军如不主动撤军将被解除武装；奉军撤退，如北伐军追击至山海关外也将被解除武装，因为维持满洲的治安秩序是日本的责任。蒋介石的态度是：如果张作霖的部队撤出京津，北伐军在天津方向将“进至静海止”，在北京方向将“进至长辛店止”。于是，日本人转而逼迫张作霖放弃北洋政权，不给北伐军进攻东北地区以借口。

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决定奉军退回东三省。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已经布置完毕。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五时许，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从北京行进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时，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专列被炸翻，冲天的大火将列车焚毁，身受重伤的张作霖于四个小时后死亡。

“皇姑屯事件”为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目的是“杀死中国东北的巨头，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具体实施者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曾表示：“贯彻执行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的夙愿。”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日本人劝说张学良在东北独立。面对国耻家仇，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全国，宣布奉军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

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令关东军极为恼怒。

但关东军并没有即刻动武，原因是日本陷入了新的危机。

“济南惨案”发生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仅一九二八年的七、八两个月，日本对华贸易损失高达一千七百万日元。皇姑屯事件发生，导致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更加剧烈。因对华贸易额大幅度萎缩，田中义一内阁遭到了日本财界的猛烈抨击。同时，美、德、意、英、法等国相继与中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致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一九二八年七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后，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强硬起来，宣布业已期满的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一九〇四年的续约失效。随着北伐军自南向北的推进，国家统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风靡中国，且矛头直指日本，中国人喊出了“收复旅顺和南满铁路”的口号。接着，一九二九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日本。这场经济危机以纽约华尔街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出口美国的主要生丝商品价格暴跌，对外贸易和工业产值全面急剧下降。经济危机引发了各国的关税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建立起森严的贸易壁垒，实施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日本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需要从海外进口更多的物资，并开辟更多的海外商品市场，但是在列强们的一系列保护措施面前，日本的结局只能是从世界市场中逐渐地被排挤出去。人口过剩、资源匮乏、资金不足、银行倒闭、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和贸易衰微相互交错，日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一九二九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

上任伊始，出于挽救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采取了修复日中关系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气氛”的共识。但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刚刚上任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述职期间遭到暗杀。滨口内阁再派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但因国民政府认为他是“二十一条”的参与者而拒绝。一九三〇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一战期间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书记官，极其厌恶军国主义，在他的努力下中日关

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

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

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

尽管用“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这样的隐晦言词替代了“武装侵略”，但关东军还是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入侵者。唯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

一九三〇年九月，日军陆军省的一批年轻军官，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其纲领是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全面推行对外武力扩张政策。一个月后，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订《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惹起事端”这一措词证明，

日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源源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猛跌，中小企业的倒闭如大坝决口，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将近四百万。一般的规律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猛烈扩充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军事工业。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强力扶持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财阀，致使三菱、中岛、川崎等著名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火制造。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

四

一九三一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一年，中华民国进入了第二十个年头。新年到来的时候，国民政府要员拜谒了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此时的中山陵刚建成两年，陵墓四周栽下的树木还没有成荫。之后，在南京机场举行定都南京后的第一次阅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邀请各国使节前来观看的用意很明显：赢得上一年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中国南北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南京市区的街道上立起了五彩牌坊，普通人家的大门上也贴上了春联。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苏区的红军战士用上了新的识字课本，上面写着："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地不怕。"刚刚识字的红军士兵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在写《兴国调查》时显然心情不错，他认为苏区的百姓已在享受革命的成果：分了田，分了山，分了地主的谷子，大家都吃上了价格便宜的米，年轻人不用非得有钱才能讨老婆了，因为苏区主张婚姻自由且严格禁止买卖婚姻。这一年的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三百万，成为继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之后世界第五大城市，全球最时髦的商品都可以在这座扼守着长江入海口的大都市里找到。只是，入夏以来，全国性的洪灾给这个国家的欢乐蒙上了阴影，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四十多万人死亡，超过五千万人无家可归，连被外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也在洪水里浸泡了一百多天。这一年，在中国的北方，城市规模位列全国第四的沈阳人口约为七十万，其中日本人多达二十万，他们不叫"侨民"而叫"移民"。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移民"俨然把沈阳视为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商埠区的地名一律以"町"命名，日本兵、俄国人、朝鲜人、从关内来的内地人以及

这些日本“移民”使这座城市混乱而热闹。关内的时髦之风已经吹了过来，满城都可以听见南方味道的《毛毛雨》：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

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

哎哟哟你的心

一九三一年，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已经大难临头。

这一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主张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叫嚣已经完全公开化。来自关东军的声音是：“要建设大日本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在主张武力扩张的日本军人中，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最为激烈而强硬，他们提出了以“占领满蒙”来“转变日本国运”的侵华建议。

石原莞尔认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洋文明”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开战，而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为了备战，同时也为解决日本国内危机，必须入侵中国——“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已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等幕僚的坚定信念。”因此，关东军的首要任务是占领满蒙地区。板垣征四郎强调：“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石原莞尔的建议本不新鲜，但在日本深陷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时刻，这一建议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热烈追捧。——日本军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扩张摆脱国内危机的策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四月，日本将由北方士兵组成的第二师团，与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

的第十六师团调防，以适应中国东北地区的严寒作战。七月，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再调一个陆军师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密令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之后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的兵力，准备于必要时渡江参战。八月，日军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之所以“异常”，是因为这两人都是有名的“中国通”：本庄繁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土肥原贤二则是长期在中国活动的特务头子。八月三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满洲作战计划。天皇分别接见了各位司令官。将领们都明白，这就意味着天皇知道并批准了“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而在皇宫外面的大街上，日本右翼分子在演讲结束时高喊：“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什么事？

“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中国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三十公里处，一九三一年时，那里既不是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管辖地，也不属于一九〇九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划属的区域，那里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七月，租种土地的朝鲜人与中国农民发生了纠纷，正在寻找挑衅借口的日本关东军立即介入，大肆煽动，导致朝鲜国内发生了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派出的特务中村震太郎，在中国东北进行秘密军事侦察时被中国军队俘获，审讯后即被处死。日本方面立即表示，这是中国蔑视日本权益的表现，陆军省声言必须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保护性占领”。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兴奋地认为，这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强烈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日本国内的军人们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升空向日本各大城市撒下传单，传单上画着插有日本国旗的中国东三省的地图，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至今仍有一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惯用的伎俩面前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侵犯了中国的权益，怎么日本人总是叫喊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人那里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经过二十多年的大量移民和殖民统治，日本举国都已经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是日本的国土。但是，即使是无赖，强占别人财产时，也需表白这份财产为何归他所有，因为无赖知道这本不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自近代以来，日本的政客和军人总是在“适当”时机蓄意制造一个事件，然后歇斯底里地声称野蛮的中国人侮辱了日本，忍无可忍的日本除了对中国进行“惩罚”之外别无选择。话音未落，日本军队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便开始了。——而在这个时刻，中国人往往仍被日本人制造的那个“事件”或“事变”弄得一头雾水。如同面对一个狂呼乱喊的神经错乱者一样，正常的人如果并不熟谙这类境况往往会不知所措。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中国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高粱红到了天边。十八日那天晚上，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八百米处的柳条湖，他们将四十二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二十二时三十分，这些炸药被引爆，一段一米多长的铁轨在炸裂的巨响中被炸弯。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居然安然无事地通过爆炸点驶向了沈阳——爆炸似乎没有达到效果，但对于关东军来讲，这样的效果已经足够了——爆炸过后不久，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二十三点四十六分，驻扎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驻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北大营附近的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半个多小时后，花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已经陷入激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向沈阳集结，先“惩罚”中国军队，然后占领东三省。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

日本关东军偷袭北大营的时候，中国东北的军政大员们正安闲自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驻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他将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回了锦州，军政大权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代理。——沈阳城内的东北地区以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就连东北军重要的北大营军营驻军、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

关东军开始攻击后，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同时用电话向王旅长和荣参谋长报告。荣臻给赵镇藩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种军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凌晨时分，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开进。四时，驻扎铁岭的部队抵达，配合独立守备大队占领北大营；五时三十分，赵镇藩带领退出北大营的第七旅到达沈阳东山嘴子；六时三十分，驻扎海城和辽阳等地日军赶到，占领沈阳内城后，联合向东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官兵不战而退；八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机场以及所有的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均被日军占领，军警全部被日军缴械。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仅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和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张学良多年购买的三百余架飞机也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事件中的两个史实甚为重要：一是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自一九三一年事变时起，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二是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双方的兵力异常悬殊：关东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各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约三千人，总计约两万三千四百人；而中国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三十万人，除因军阀之战十一万人被调入关内，留在东北地区的部队尚有二十万人。特别是，事变爆发时，攻击北大营的日军仅有六百五十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有一万两千多人，但是这座坚固的军营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都言是国民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关于这一点，一九九〇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那时候日本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走在街上看见东北军官兵的刺刀，上来就在刺刀上划火柴，如果碰上脾气大的东北军很可能一刀捅过去，因此张学良曾下令“绝对不许抵抗”，他的初衷是“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事实上，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选择：如果说拥有飞机大炮的数十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东北地区的目的不是对付日本人，那么，用百姓的血汗供养的中国军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之说，将那一段的中国历史弄得荒诞不经。

张学良后来以主张抗战而闻名史册。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给东北边防军下达的第一个命令确实是“不抵抗”。

东三省“易帜”后，张作霖家族不再是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地方军阀，东三省已经有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因此，关于“不抵抗”问题，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难脱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日后逐渐成为著名的抗日统帅和将领。只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他们的抉择是忍让。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消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三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

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再者，那时的国民政府始终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九一八”事变的第五天，张学良派他的副司令长官万福麟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国际联合会）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历史，还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绝不能将捍卫主权与领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道义”。最后，对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来讲，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与抵抗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两者权衡，前者更为重要。“九一八”事变前的七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作战命令，率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张学良随即致电蒋介石，愿率东北军“唯钧座之命是从”。之后，蒋介石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首次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国策：“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蒋介石担心全国的排日情绪被共产党利用，要求无论官民要“抑制”排日情绪：“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无论后人如何评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的政治博弈和武装斗争，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政客和军人始终把“反共”作为入侵中国的一个重要借口，而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给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一种有利的局面。这一点，连中国的普通民众都看得清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事变发生十天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学生们冲入部长室，打伤了王正廷部长。接着，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总数达到七万之多。无奈之下，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绕来绕去，令请愿代表无从捕捉到任何确切答案：

关于抗日情事，假如本人想要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国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的前途打算，要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能

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是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办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作为一国政府的首脑，这番话表达了一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人都难以解读的逻辑：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不是不抵抗，而是为了国家前途着想不能抵抗，因为抵抗就会亡国。为什么抵抗了反而亡国，难道不抵抗就不会亡国吗？——蒋介石没有解释。

之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学生书》发布：

……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伍者；有热血奔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托，秉唯一之权能，以定唯一之大计耳……

在中国举国民情激愤之时，日本也同样举国民情鼎沸。“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中国的行为不但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而且日本国民就此沉浸在了军国主义的集体狂热中。土肥原贤二在致东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电报中说，事件的起因，是“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了日军守备部队。由此，日本官民共同认为，这无异于给了日本以“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最良机会”，声称必须“以此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性狂热尚武的国家，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致使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军人冲入首相官邸，乱枪打死了首相犬养毅。十天之后，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内阁成立。——日本政党内阁终结的结果是：军国主义者开始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运行。

五

日本关东军在一九三二年策划的两件事出乎中国人的预料。在中国

东北，日本人突然将前清末代皇帝溥仪请了出来，就任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溥仪正儿八经地在东北“登基复国”，并把这个“国家”叫作“满洲帝国”，年号“康德”。这一古怪事情，从策划到实施，是日本关东军用特务手段制造的：当溥仪从天津抵达长春时，“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溥仪看见那些夹杂在日本太阳旗中的大清黄龙旗时，不禁热泪涌流，顿觉大清朝的复辟“是有希望的”。——无法得知这个已被中国人抛弃的皇帝是如何产生了所谓的“希望”，他应该记得，就在不久前，他几乎是被日本人用绑架的方式从天津弄到东北来的，而日本人命令他穿的竟然是日军军装——这个被王朝的訇然倾覆弄得十分脆弱的昔日中国皇帝，穿上日本军装的时候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参谋部就已决定：必须使中国东北地区“脱离中国本土”。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独立国，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然后把东三省并入日本版图。

为了配合这场闹剧，在中国上海，日本人又开始制造“事变”了。由于关东军距离上海很远，所以这次出面的不是日本军人，而是几个日本和尚与打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和水上秀雄等在上海街头受到袭击，不久后日方宣布水上秀雄因伤重死亡——这显然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战后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的供词是：

问：……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样的经过呢？

田中：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末，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

接下来的事情没有悬念：日本国内大肆渲染中国人的野蛮和无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国

正式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和抗日团体。所不同的是，这次声称要动用武力“惩罚”中国的，不是关东军，而是日本海军。日本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已经急不可待了：“陆军在大陆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

国民政府担心战火蔓延至整个长江流域，示意吴铁城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上海市政府表示将“逮捕及严惩纵火杀人之罪犯”，同时希望事件能够“从速解决，以息纠纷，而睦邦交”。但是，二十八日晚九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上海附近的海岸登陆了。午夜时分，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率领日本海军作战的，是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他曾扬言，只要战斗开始，他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就会落荒而逃，用不了四个小时，日本海军就能占领整个上海。然而，战斗真的打响后，盐泽幸一才明白，“九一八”事变没有在上海重演，坚决抵抗的中国军队令日军举步维艰。

守备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一军。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十九路军调防京沪地区，全军官兵三万三千多人。一月十二日，村井仓松以保护日侨为名，要求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第十九路军后撤三十公里。第十九路军得知消息后，于二十三日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分别发表了讲话，其核心内容是：“死力抵抗”！“一决死战”！“决心去死”！第十九路军同仇敌忾的态度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十分不安。二十七日深夜，何应钦连续致电蔡廷锴，要求第十九路军不可妄动。二十八日，日方发出最后通牒，限第十九路军即日撤出闸北，防区由日军进驻，遭到蔡廷锴的拒绝。战事随即爆发。

“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第十九路军和增援而来的第五军拼死抵抗，日军先败于吴淞，再败

于庙行。惨重的伤亡令日军不断增兵，最终使攻击上海的总兵力达十万以上。但是，战场局面依然与日军事先设计的军事目的相距甚远。——“中国军队的抵抗异常顽强，终于未能突破阵地。在连日的战斗中，人员损耗甚大，弹药缺乏，殊堪忧虑。”

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因指挥不利被撤职。

这一刻，中国人对日本积压甚久的仇恨火山一般爆发了。

全中国都注视着上海，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表达对第十九路军的声援：全世界华侨寄来的慰问品在上海码头堆积如山，华侨富商们的捐款瞬间达到千万元以上，自愿参军的青年两天之内就有千人之多。各界民众组织起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运输队。城市妇女和纺织厂女工在战火中救助伤员；上海郊区的农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蔬菜送往前线；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前线战壕里组成了一道防线，仅复旦大学义勇军就有两百多人在战斗中牺牲。第十九路军官兵在前线看见了两位著名的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身穿白色护士服为伤员服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五天之内组织上海妇女为前线赶制出三万套御寒棉衣并亲自送上前线。

近代以来，对于日本，中国已经忍了太久。

中国人已经不能再忍了。

日本人发现，中国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因对日立场软弱受到内外夹攻，再次被迫下野。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中山之子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一九三二年初，严重的财政危机令南京政府几乎无法运转，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孙科被迫辞职。孙科恳请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重回南京。蒋介石表示，无论于国、于公、于私、于总理（孙中山）、于旧部，都不能不“往救”。于是说服汪精卫同赴南京。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复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调动军队，指挥对日战事。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首都迁至中原的洛阳——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迁都是非常之事，如果没有大灾大难，除非准备长期作战，难以解释何以迁都。二月一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

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决定将中国划分为四个防卫区：

黄河以北为第一防卫区，司令长官张学良；

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为第二防卫区，司令长官蒋介石；

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为第三防卫区，司令长官何应钦；

两广地区为第四防卫区，司令长官陈济棠。

十四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令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兼）、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以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合编成第五军，张治中为军长，紧急增援上海。二十一日，蒋介石令陆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紧急开赴浙江。二十二日，蒋介石令驻扎河南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于二十七日前抵达浦镇；二十三日，蒋介石令陆军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集结于杭州；二十九日蒋介石令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由镇江赶赴昆山。

三月初，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枢铭、李烈钧、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长期抗战之决心”，表明“中国抵抗之决心，则随时随地将历久而无间”。但也特别阐述道：“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厉害而决策，不宜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

那时候，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对日立场上基本一致，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汪精卫有“最低限度”之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蒋介石则表示，一旦超出“忍受之防线”，就要与日本拼个鱼死网破：“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这是蒋介石首次在对日关系上使用“决战”二字。

日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际干涉。

策划“一·二八”事变的初衷，是各列强对日本的制约或制衡很碍事，需要“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将其注意力引开，以“使满洲容易独立”。现在，事变搞出来了，“满洲国”成立了，但列强们的强硬干涉却让日本招架不住了。中国的上海不是位于东北地区的沈阳，列强们各自在上海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八十、法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九十、美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六十都在上海。由此，日军对上海的攻击立即引起列强们的严重不安，英国和美国的军舰迅速向上海开进，同时两国的领事也立即出面调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当列强们因侵占中国发生内讧时，由列强们自己出面“调停”的事层出不穷。这种在中国的土地上俨然主人的情景，比在与列强作战中血流成河的创伤更令中国人剧痛。——英美调停没有效果，国际联合会站出来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国际联合会各会员国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的第十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这是国际联合会第一次单独针对日本而不是同时针对中日双方发出的呼吁。国际联合会的明确倾向，让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双方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内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这是一个带有侵辱中国主权内容的协定。《协定》规定了中日在上海地区的驻军范围；规定了由列强国“共管”地区的范围；要求中国政府在浦东、苏州河南以及龙华对岸的若干地区不驻扎军队；要求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日本军队可以驻留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于上海周边布防。《协定》还规定，如果停战措施在施行中发生问题，中国方面无权调查和参与处理，需要交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宣读协定时，两次发布声明，其一表示这一协定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调动“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其二表示日军暂驻区域内的行政权、警察权由中国政府行使。

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已然达到：军队进驻掌控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长江流域；在成功地转移国际视线后，中国的东三省已在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

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在国民党内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认为，《协定》没有送立法院审议，要求弹劾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号召全国民众

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海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协定》，谴责汪精卫“敢冒不韪”“誓死媚日”。上海各民间团体纷纷组织示威游行，数十名民间团体的代表冲进郭泰祺的住宅并痛打了他。就在《协定》签订的前几天，日本军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了一枚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都被炸成重伤，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白川义则后因伤势过重于五月二十六日死于医院。

汪精卫和蒋介石竭力为《协定》的签订辩护，宣称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谈判仅仅是军事问题，绝对没有任何政治性质，《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外交上的胜利”。

“绝对没有政治性质”，这句辩解令人疑窦丛生。

《上海停战协定》墨迹未干，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准备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人此时才明白，国民政府已拥有两百多万人的军队。但是，在第十九路军与增援部队于上海对日作战时，日军增兵达到十万人之多，而驻扎上海的中国军队自始至终不过六万。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说得明白：“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蒋介石自己则在“剿匪”会议上宣称：“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

日军在“一·二八”事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死亡六百二十人，负伤一千六百二十二人；海军死亡一百四十九人，负伤七百人。中国方面的损失是：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牺牲四千二百七十人，负伤九千八百三十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六千零八十人，负伤两千人，失踪一万零四百人，财产损失高达十六亿元。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全部被毁，而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十多万册珍贵的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劫。

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要从摧毁中国文化开始。

日本人以为焚毁中国的古籍，就可以摧毁中国的文化，这个逻辑过于简陋。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心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不然这个国度古老的悠长历史便无法绵延。宋庆龄认为："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六

上海战事激烈进行之时，中国的北方正值严冬。被酷寒包裹着的"满洲国"皇宫，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弥漫着僵尸一般的气息。从挂满冰锥的窗户向外望去，风雪迷蒙的山峦和原野上升腾着令日本人内心惶恐的杀气——这是不屈的中国人的杀气。

自关东军试图将中国的东三省彻底"日本化"以来，他们一贯以为的"懦弱的中国人"这一概念便逐渐瓦解了。尽管不少中国的地方官吏在刺刀下对他们表示效忠，但这片黑土地上的中国百姓能够逃离的都已跑到了关内，没有机会和能力逃离的如同冰寒的雪原一般沉默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雪原深处的茫茫老林中，抗日的枪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东军在对东三省的中国百姓采取殖民统治的同时，动用军事力量连续不断地对东三省的抗日武装进行清剿。想把他们杀死的对手来路复杂：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不堪残酷统治的东北农民、发誓斩尽杀绝日本人的绿林好汉、散落到民间决心雪耻的东北军官兵，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成建制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各自为战，呼啸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留下他们奔袭的脚印。关东军以酷刑著称，血淋淋地让中国人看见了世上竟然还有如此残酷的折磨人的方式。抗日志士的头颅被挂在城市的电线杆上，但是很快日本兵的尸体就横陈在了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散落在尸体周围的传单上写着大大的汉字"还我河山"！中国东三省的抗日志士是一群决死的中国人，他们在拿起大刀或长枪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东三省的土地。他们没有给养供应，没有弹药支援，没有衣被御寒，没有药品疗伤，有的只是满腔的仇恨。他们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赶走侵略者，可他们坚信：只要继续战斗，中华民族就有赶走侵略者的那一天。在漫长的日子里，倒下的抗日志士多数没有留下名字，尸骨至今散落于那片黑土之下；而得以留下姓名的志士，至今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铭记。——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被关东军包围，正是乌斯浑河即将封冻的季节，她们砸碎了枪支后，手挽手向着冰冷的河水走去，直至被河水淹没。她们的名字是：冷云、胡秀

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者二十三岁，最小者年仅十三岁。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孤身一人被关东军讨伐队包围后战至牺牲。他死后，关东军解剖了他的尸体，他们不知一个人何以在多天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们在杨靖宇胃里发现的是棉絮、树皮以及一种连牛都不吃的积雪下的草根。赵一曼，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这位女共产党人在与日军作战时因负伤被捕，在赴刑场的路上，她撑着受尽酷刑的身躯，给自己年仅六岁的儿子写下了遗书，这篇文字时隔七十多年读来依旧令人潸然泪下：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二年，日本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确认了日本的既存权益，承认了日满共同防卫及日本驻兵权。至此，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目的已经完成。

日本军方将下一个作战目标指向了中国的热河省。

热河省，省会承德，东接辽宁省，西接察哈尔省，南接河北省，全省辖境面积十七余万平方公里，万里长城的东端蜿蜒其中。

日本计划入侵热河省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满洲国”的边界线，“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巩固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将来入侵华北乃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

“中国侵略了日本”——凡是开始新一轮武装侵略的时候，日本的政客和军人便会策划又一个“事件”。刚上台的日本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一致对外宣称“热河为满洲国的一部分”，“热河问题纯粹是满洲国的内部问题”。荒谬的言论说到极致的时候，就产生了“中国的抗日武装是侵略者”这样的逻辑：“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

面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阴谋，中国军队将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纷纷发表通电，指出日本对热河和长城一线的野心关乎民族存亡，要求国民政府全力以赴派出军队阻止日军的侵略。宋庆龄甚至提出，中国军队的百分之八十应该派往抗日前线去。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在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和停止进攻苏维埃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愿意和国内任何武装力量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来电，指出如果中国不以自己的行动来捍卫领土，则国联就没有依据为中国说话。

“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意识到北方迫近的军事危机，同时承受着国内的巨大舆论压力，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他命令张学良派三至五个旅的兵力前往热河加强防守，特别要求在山海关驻扎“相当兵力”以免“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蒋介石措辞之强硬前所未有：

……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一九三三年元旦午夜，山海关突然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紧接着，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说中国守军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守军撤退。中国方面表示，待天亮调查后再开始交涉。日方的回答是：本事件无须调查。“限即时答复，否则开始攻击。”

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扼守辽、冀咽喉，为平津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如此战略要地，之所以有日军驻扎，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有“英、美、日、法等十一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的条款。

天亮了。

上午八时许，日军开始攀登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十时，三千日军在炮火、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冲击南门，未果。第二天上午十时，日军再次发动攻击，中国守军伤亡过半。下午三时，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守卫山海关的东北军第九旅，兵力不足两千，而陆海空相互配合的日军兵力在三千人以上。

张学良自北平电告蒋介石：

……敌于本日上午十时许以飞机向榆关（山海关）内作大规模之轰击，并联络装甲车山野重炮联合之炮兵及海面炮舰向我城内猛烈射击，点为南门附近，致城内外起火破坏甚巨。同时，敌之坦克车又在其炮火掩护之下向我南门猛攻，我军官兵奋不顾身竭力抵抗。下午三时许，将我南门冲破。我军卒因武器悬殊，我方工事均已被破坏，城墙亦多处被毁，并于地形上受制于人及兵力薄弱种种关系，至伤亡奇重，守南门之安营长（安德馨）以下几全部殉职，全团官兵伤亡半数以上，不得已暂行退集安民寨附近，从事收容。是役彼我两军战斗之激烈为历次战役以来所未有……

山海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请蒋介石北上指挥作战。北方的中国军队将领也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蒋介石的答复是："弟近日须赴籍，约半月布置妥当后方得北来。"他命令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率部保卫热河，并派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赴北平代他指挥。

蒋介石派出的大员到了北平。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表示："热河为整个中国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宋子文对热河守军的将领们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热血沸腾的张学良也发出通电，表明自己已是"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以"救亡图存"。——全国的舆论不禁为之亢奋，举国上下均认为热河一战中国军队必胜。由此，中国有望。

二月底，关东军分三路全面入侵热河省。

张学良急电蒋介石：

……迭据各方探报，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现已调沈克部赶速前往，俾资援助，但其防线均在凌源凌南一带，大都偏于南部。至于东部开鲁赤峰一带，则全由吉（吉林）江（黑龙江）退回之杂军义勇军热军一部防守，而各军杂处，意见分歧，统率无人，所有一切布置亦未能臻于巩固，日军倘由各处乘虚进攻，则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现正调孙魁元（孙殿英）部开往热北，并拟派张委员作相即日前往统属冯占海所部作为中心势力，并联络其他各部一体防

御。惟该处情形极为复杂，仓促整理，亦难期其于事有济。良（张学良）为未雨绸缪，力图周密计，拟请速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

然而，热河守军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增援。

日军第六师团在伪军刘桂堂部的配合下向开鲁、赤峰方向发起攻击，中国军队第五军团汤玉麟部（由东北军第五十五军组建）驻守开鲁的骑兵七旅接敌便溃，之后便投敌了。中国军队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抵近赤峰，以阻击战与日军相持七天七夜后撤退，开鲁、赤峰相继沦陷。日军第八师团向朝阳、承德方向发起攻击，中国军队汤玉麟部一〇七旅因一个团长投敌而稍战即撤，日军顺利占领朝阳。日军只在承德方向遭到中国军队的节节阻击，但由于中国军队第四军团（由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组建）万福麟部的动摇，阻击线一处坍塌全线即溃。汤玉麟不但率部逃离了承德，还征集大批汽车转运自己的财宝，致使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攻击绥中、凌源方向，虽受到中国守军的一路阻击，但还是步步推进到冷口附近，并开始向喜峰口发起攻击。

喜峰口，长城上的一个关口。

日军从发起攻击到占领承德，仅用了十余天的时间。

热河省沦陷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

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联名要求对失职者进行弹劾。

蒋介石约见张学良劝其辞职，明知蒋介石是在为丢失国土寻找替罪者，张学良也只得答应，于三月十一日宣布下野。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当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归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指挥。由此，蒋介石既转嫁了丢失热河的责任，同时又取得了对东北军的控制。

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面前。

自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前后持续八十多天，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告终。

从双方投入的部队来看，作战力量相当悬殊。在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七个军团十三个军三十六个师十五个旅，总计约二十五万官兵，其中东北军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的晋军、西北军和新组建的中央军，甚至还有那个以盗窃清陵闻名全国的土匪军孙殿英部。而日本军队则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上将亲自指挥，所辖第六、第八师团，第三十三、第十四混成旅以及关东军的飞行队，总计约为八万人，但从官到兵均是久经沙场。

在喜峰口，中国第二十九军主力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竟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让日军胆寒的是，中国官兵手持大刀猛杀猛砍，令日军士兵血肉横飞。战斗胶着之时，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率部夜袭日军阵地，日军正在熟睡，中国的大刀突然出现，在漆黑的夜色中寒光闪闪，数百名日军顿时身首异处。中国官兵的血性振奋了全国，中国的舆论充满了对大刀的赞颂。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知晓，手持大刀的第二十九军官兵付出的代价。第二十九军一万五千多人中，携带的武器三分之一是汉阳造，三分之一是毛瑟枪，剩下的便是土枪了。这些古老的枪支没有配备刺刀，所以他们只有背上沉重的大刀，利用近战夜战的机会把敌人的脑袋砍下来。日本人的脑袋在长城两侧的陡坡上滚落的时刻，也是第二十九军官兵遭受日军现代化武器杀戮的时刻。对于久违了的“忠勇”精神的强烈渴望，令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混淆了时空概念，仿佛回到了久远的冷兵器时代。只有置身前线战火中的军人明白：只要日军与中国的大刀保持在砍杀半径之外，战局就会急转直下。果然，日军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侧背的战术，逐步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三河、密云等县城，逼近通县、顺义乃至北平城下。

日本人认为时机已到，提出双方举行谈判。

长城抗战持续三个月，中国守军伤亡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日军伤亡两千四百人。停战始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双方军队对峙于平津之间。

中日双方拉锯式的谈判结果是——《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一个严重出卖国家主权的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以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规定了中国军队永远不能越过该线去收复热河省以及东三省的失地，也等于中方承认了日本占领热河省的事实以及长城线是“满洲国”的边界线。它还特

别规定日本军队可以不受长城线的限制，这就等于为日本入侵中国华北颁发了一张特许证。

《塘沽协定》的签订，受到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决不承认其任何一项条款；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国民政府在《塘沽协定》上签字；不少国民党将领发表通电，表示“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于圈牢待宰，等一死耳”。就连列强们看到《塘沽协定》也十分惊骇，感到日本人得到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因为中国的热河省不但被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南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是一个极其混乱恍惚的国度。

这一年，上海的《东方杂志》征集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梦想。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的梦想是：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在这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想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饭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而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夏丐尊说：“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桌；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这一年，上海评出的电影皇后胡蝶唱出的一首歌充满了悲壮气氛：

亲爱的先生，感谢你的殷勤，

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的最后一声。

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鸣？

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今宵红楼梦未惊！

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

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

再会吧，我的先生，

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

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这一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接受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的请求，为其麾下第五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纪念碑撰写碑文。这是胡适第一次用白话文撰写碑文：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镌刻在纪念碑上，傅作义就接到北平政务委员会何应钦的命令，要他抹掉一切抗日的标志。傅作义被迫把纪念碑上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成了“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这一年，深受日军空袭侵害的国人，以高涨的热忱用民间的方式捐献了二十多架飞机。国民政府也意识到空军的重要，于一九二九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一九三三年一年就购买了二十架菲亚特B.R4.轰炸机。

这一年，中国南方旱情严重，而北方却暴雨不停，黄河下游决口多达五十六处，洪水茫茫中满目人间惨景。以洪水泛滥为题材的电影《狂流》成为上座率最好的电影。电影表现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对立：官员和地主挪用了救灾款，走投无路的农民们揭竿而起。

这一年，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最耀眼的人是短跑飞人刘长春。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告别书》：“诸位有家回去，我们随地漂流。热烈希望下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恢复东北河山颜色。”满场的国人声泪俱下：“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这一年，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也举行了运动会，红军学校足球队和中央联合足球队分别取得冠亚军。操场边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谁做衣，谁造米，谁铸金钱，谁架房子？这都是工人和农民。哪个

有衣，哪个有米，哪个有房屋，哪个有金钱？这都是土豪劣绅。

这一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愤然辞职。他也给《东方杂志》投稿表达了他的梦想：“内争的勇敢毅力，专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

这一年，庐山的山路上十分拥挤，被蒋介石召集而来的将领一个接个乘轿上山。蒋介石决定动用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告诫他的将领们：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良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

尽管蒋介石强调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但是这一年还是出了两件与共产党有关的大事。一是第十九路军官兵不满国民政府一再对日妥协，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就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驻军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与江西瑞金的共产党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和红军联合对日作战。由此，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向福建进攻，并用重金和官职收买了第十九路军的部分将领，最终导致第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逃亡香港。二是冯玉祥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收复多伦一战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作战。但是，蒋介石认为冯玉祥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抗日同盟军有逐渐被“赤化”的嫌疑，调集大军准备对冯玉祥部实施围剿。而日军也同时集结了重兵准备反扑多伦。在多重军事压力下，冯玉祥被迫出走，隐居泰山，抗日同盟军内部随即分裂。

亡国迫在眉睫之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无法解释的是，此时的蒋介石却突然关注起中国人的道德问题。“我

们中国何以始终不能获得平等，而且还要一天天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新生活须知》。身在“围剿”共产党苏区前线的蒋介石，亲自对这个《须知》作了详细修订，除要求中国百姓在“礼义廉耻”方面要遵守规矩之外，还要求中国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必须遵守《须知》中的条款——之所以按照有关档案原文引用，是因为以下“要则”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读来都令人恍如隔世。

关于“食”：一饮食用国产，二饮食有定时，三饮食有节制，四碗筷要齐正，五食具要干净，六坐席要端正（不要占邻席），七喝嚼不出声，八饭屑要收拾，九羹汤莫漏泄，十骨刺莫抛地，十一物不洁不食，十二水不沸不饮。关于“衣”：一服装用国货，二衣冠要整齐，三材料要坚实，四服色要朴素，五破烂速修补，六衬衣要常洗，七被褥要常晒，八钮扣要扣齐，九鞋子要穿正（不可拖鞋跟）。关于“住”：一住居要整齐，二厨房要清洁，三厕所要干净，四家具要简单，五沟渠要疏通，六窗户要多开，七门前街道要常扫，八什物堆积要排齐，九用具发锈要擦净，十尘土立刻要除净，十一墙壁莫涂污，十二垃圾莫堆积，十三要爱护公物，十四要利用废物……关于“清洁”：一要漱口，二要刷牙，三要洗澡，四要剪头发（头发不可留到二寸长），五要剪指甲（指甲不可长过二分），六要多晒太阳，七要呼吸清气，八要扑杀老鼠，九要扑灭蚊蝇，十要种痘防疫。关于“戒条”：一勿要嫖赌，二勿要酗酒，三勿要吸鸦片，四勿要乱吐痰，五勿要乱小便，六勿要流鼻涕，七勿纳贿，八勿贪污，九勿客气，十勿隐瞒，十一勿吵闹，十二勿冷笑，十三勿要开口骂人（勿傲慢），十四勿要动手打人（勿蛮暴），十五勿要站马路，十六勿要泼香水，十七勿要诬害别人，十八勿要错过一生（勿懒惰），十九勿要讨便宜，二十勿要靠别人。

连年的自然灾害、军阀混战以及日本入侵引发的战乱，令这片国土上难民和流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贫富差别的巨大以及社会不公的加重，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常年衣不蔽身食不果腹，苦难深重中的百姓怎么可能做到食具要干净，物品要排齐，走路胸部要挺出，衬衣要常洗，头发不超过二寸？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冲进了共产党中央苏区腹地，中国工农红军突围而出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史称“长征”。

七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开始认真地考虑日本问题。

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历史证明他在持续八年之久的对日战争中从未有过苟且行为。但是，至少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他面对中日问题时充满困惑和矛盾。由陈布雷笔录的名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公开发表了，蒋介石很想让自己的这篇口述实录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蒋介石首先对中日关系中的隐晦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为打开中日两国彷徨的局面，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也为确奠东亚和平、消弭世界战机起见，对于中日问题，实在有作一番忠实的检讨、无避忌无隐讳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的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但至今为止，不但没有打开僵局，以更新两国关系的征象，而且也找不到一点曙光，只是苟且迁延，得过且过，任令自然变化。人类已进步到了二十世纪，还不能直认事实，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气与真诚，真令人大惑不解……

蒋介石认为，日本从发动攻击到致使中国的许多城市沦陷，最多不过十天；假若国民政府迅即与日本绝交，也许日本在十天之内便可使整个中国沦陷。由此，他解释说，国民政府目前与日本的对立完全是因为“实在没办法”：

……本来从世界大势来看，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着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而没有交恶到底的理由。现在虽然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的气概，但中国国民党的当局，既然自任以全国安危之重，便应该从大处着想，堂堂正正的有忠于国家利害的打算。我们固然知道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当日本无意缓和时，中国无法单独缓和，但依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

接着，蒋介石就中日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中国方面的错误是：没有早些与日方商榷，态度过于激愤强硬，但又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缺乏自知之明，对国际社会过分依赖等等。日本方面的错误是：日本误判了国民政府，蒋介石不是李鸿章，而更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民心。日本言“不取得满蒙，无以解除日本国防安全”，这其实只是

日本实现“独霸太平洋”野心的一种欺骗。不要认为占领满洲就能经略中国，日本对中国国情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中国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日本绝不可能彻底控制甚至灭亡中国。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又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

最后，蒋介石表示，中日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打破中日僵局完全取决于日本是否有“直认事实”的勇气：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此文与其说是给中国人看的，不如说是给日本的一份外交文件——作为一国首脑，蒋介石仍旧没有把日本人的侵略逻辑搞清楚。

日本人倒是在此文中看出了蒋介石“善意的真诚”。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演说中提出了“不威胁、不侵略”的对外关系原则。或许此举被看作是对中国方面“善意的真诚”的反应，蒋介石立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蒋介石表示：“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接着，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为改善中日关系大造舆论：“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

为进一步表明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国民政府专门派大员去东京会见日本军政要人，反复表达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向。同时，蒋介石、

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通令严禁排日运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通告各媒体禁止刊载排日消息。

日本方面很满意，主动提出把驻华公使升格为驻华大使。

接着，中日发表了双方使节同步升格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中日关系似乎“亲善”了起来。

无法解释，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何以会在日本是敌是友这个问题上如此混淆。这一问题已是无需探究的事实：中国的东北三省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热河一线的沦陷表明日本的野心是进占华北之后侵占整个中国，他们决不会停止在长城边上与中国“友好亲善”。一九三四年，日本陆军省颁发《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明确表述：“战争是建设之母，文化之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建设和文化的发展确立在战争之上。而以往的历史应该让中国人知道，日本人所说的战争，其目标首先是中国。——无论中国人如何送出笑脸，日本自有日本的逻辑，这是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到的历史教训。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当权者依旧混沌？历史证明，国民政府并没有与日本沆瀣一气出卖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企图，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应该作何解释才合情合理？

就在中日双方的政府大员为中日“亲善”开始欣慰的时候，日本军部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下一步的入侵计划，目标是中国的华北。

一九三五年三月，关东军谋划了他们的“对华政策”：一、依据《塘沽协定》以及附带条款，扩张日本已经取得的权益，在中国华北确立亲日地带，以为“满洲国”的地缘保障；二、为造成华北与“满洲国”紧密的经济关系，需尽快提升两地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四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策动“华北自治”。所谓“华北自治”，日本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在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和驻华武官的一份文件中作了具体阐释：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于华北五省建立与日本“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得更清楚：“华北自治运动，始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其目的之一是“建立蒙古地区以外的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以解除对满洲国的威胁”。同时还可以“削弱以抗日为外交政策中心的南京政权的势力，以减

少对满洲国及日本的影响”。

日本军人开始在华北制造各种“事件”，其手段还是老一套：或者派遣特务深入华北地区侦察军事情报，如果被中国方面捉住就大喊“中国非法监禁日本公民”，然后要求“惩罚凶手”“赔偿损失”；或者直接向中国军队挑衅，如果发生了冲突，就立即扩大战事，并要求中国军队让出防区；或者雇用流氓地痞，制造一个具有政治背景的案件，然后要求国民政府给日本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就武力解决。——一九三五年五月，天津的两个亲日的记者相继被刺杀；接着热河南部的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追击下被迫进入长城以南地区。日军先是指责国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动，继而指责中方违反了《塘沽协定》，结果导致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签订了《何梅协定》。在《协定》谈判的过程中，日本对中方的蔑视登峰造极：先是把装甲车、火炮和机关枪在河北省政府办公楼前排开，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两市上空持续盘旋，然后驻天津的日军开始举行全城巷战演习。当何应钦表示已惩办了相关人员后，酒井隆当即提出：将中国驻平津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党部，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谈判进行的时候，关东军向长城一线调集兵力，以向北平施加军事压力。何应钦最终答应了酒井隆的所有要求。但是，酒井隆又提出了四点要求：河北省内的国民党党部一律取消；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军撤至河北以外，并将全部撤离日期告知日方；中国军队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也必须撤至河北以外；排日行为必须禁止。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何应钦再次答应了日方的所有要求。

日本方面心情舒畅，说起话来更加狂妄。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本天津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一本名为《日本对华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小册子里的声明令不久前还沉浸在“亲善”幻觉中的国民政府颇感惊骇。

多田骏首先说，中国是一个可怜的国家，近代以来饱受列强的侵略——日本军人终于说出了“侵略”二字——但“侵略”中国的都是西方列强，只有日本一直在“保全”中国：

自西力东渐以来，各国之对华态度，或主分割，或图共管，或谋扩张势力范围，或思争夺权利市场，大有惟日本不足之况。此等侵略手段，虽与时推移，屡经变迁，盖不外牺牲中国，以图繁荣其本国而已。独我帝国，依据国是，始终一贯，力图保全中国领土，并以日华共存共

荣尤应亲善提携根本主义……

近代以来，侵占中国领土的列强，以日本为最。可能是因为明知事实无从抹杀，所以多田骏反复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解放救济”中国这一“无愧于天地”的“信念”：

帝国之对华态度，必当遵循我之国是与使命。我帝国大陆政策之根本方针，在谋自身之发展，同时解放救济东洋之被压迫民族，使之安居乐业，保持各民族之面目，尊重其独立，与帝国相亲协同，在政治经济上、军事上，树立密切不可分之关系，此道实证之天地之公道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乃皆吾人俯仰无愧于天地之信念也。

血腥的殖民主义，无一不把掠夺标榜为“解放”。但把侵略和掠夺视为国家“信念”的，只有日本。

中国何以需要日本“解放”？多田骏对“中国之病源”的“诊断”是：

中国民众，六千年以来，均为政府、地主、财阀榨取之对象物……即统治者除榨取以外，无增进民众福祉之热忱。观乎民众之不信赖官吏，以不干预自己为善政，明矣。今中国民众，自民国以来，受各军阀贪婪无厌之榨取，近因党阀加以向未曾有过之苛敛诛求，呻吟于此种状况之下，生活艰难每况愈下，加以天灾、兵灾、匪灾，循环而起，农村趋于崩溃，将为匪化乎？为流民乎？抑为共匪乎？仿徨歧路，无所适从。

基于此，多田骏表示，“鱼肉民众，以饱私腹”的中国政府是日本“及中国民众共同之敌”，也是“天地之道义”与世界之“公明正大”之敌，为“可怜四万万民众”，消除“东亚和平之祸根”，日本不得不对中国“使用正当威力”。

十月七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约见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抗议多田骏的言论令中国方面“感到惊诧”。

然而，更令中国人“惊诧”的事随即发生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方突然对中国提出了十三条要求：

一、停止现在英国经济顾问罗斯进行一切谈判。

二、华北区之鲁、晋、绥、察、河北五省财政独立。

三、中国脱离国联。

四、承认“满洲国”。

五、中、日、“满”三国合作创远东经济集团。

六、须将粤、闽、浙、苏、鲁五省武装解除。

七、设立满洲各地与扬子江流域各地间之客货运输便利机关，华北所有铁道皆由满铁经营。

八、军事委员会取消军权集中于何应钦领导之军政部，但实权仍须集中于行政院。

九、停止中国反日运动。

十、免张学良职，并将其军队撤退于陕西及西北各地。

十一、对于剿共匪事宜，尤以西北各省，中、日两国坦白合作。

十二、日本观察家日后得参加国民党大会，以窥中国是否诚意。

十三、中国对于政治、经济、财政上，应完全放弃英、美之援助。

还未等国民政府对这些等同于“最后通牒”的蛮横要求作出回应，两天之后，在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一个名叫“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伪政权机构在北平以东的通县宣布成立了，领头的中国人叫殷汝耕。殷汝耕，浙江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个“任何时候都是甘心情愿地投靠日本”的人。——很快，这个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政权官员去“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然后“满洲国”的官员煞有介事地对“自治政府”进行了“回访”。日本人的狂妄放肆令国民政府既难堪又愤怒。尽管国民政府对殷汝耕发出了通缉令，但蒋介石还是认为，国民政府一旦惩罚这个日本人庇护下的汉奸，就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这一年的年底，为防止“自治”事件被不断复制，国民政府解散了北平军分会，成立了一个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性质为半地方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面对接连的屈辱，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行刺了汪精卫。孙凤鸣出生于贫寒农家，曾在第十九路军担任排

长、代理连长参加上海抗战。《塘沽协定》签订后，第十九路军调防江西，孙凤鸣因不愿“剿匪”脱下军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六中全会后在南京会议厅合影，以记者身份进入会议厅的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行刺行政院院长时，他的回答是：“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被卫兵击伤的孙凤鸣于次日凌晨离世。

接着，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北平学生冲出了校门，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猝然爆发。毛泽东说：“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北平六千多名爱国学生涌上街头，向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请愿，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拦，百名学生被捕，数百学生受伤，但大规模的游行仍旧持续数天之久。北平学生的行动迅速得到全国的热烈响应，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冀东的十一个县县长也发表声明：“绝不附逆”。冀东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籍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中国已经忍无可忍。

八

一九三六年元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由平津两地五百多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学生们将深入到河北各地宣传抗日。几乎同时，上海的电影人刚刚拍摄完成电影《狼山喋血记》，其主题歌《打狼歌》唱道：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开始改变对日态度。

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以及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汪精卫被刺，提出辞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取代，这标志着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的地位大幅下降。同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扩张，已严重危及英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至一九三五年，日本在华北和山东等地的投资额超过了英美，这无疑加深了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势力的渐强，连同英美对日态度的渐强，助推了国民党高层开始改变对日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开始对日进行战争准备。这些准备包括：聘请德国顾问团设计兴建军事设施，各要地国防军事工程被要求“星夜赶筑”。为了彻底摆脱日本的干扰控制，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底进行币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废除银本位货币制，这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制约，同时又遏制了国家白银的大量外流。而在外交上，国民政府不仅靠拢英美，也开始改善中苏关系，试图借助苏联的力量牵制日本关东军。

意识到对日作战已无可避免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首次表达出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之目的……

就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战争危险临近的时刻，日本国内突然发生了一起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暴动。

长期以来，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形成了以陆相荒木贞夫为核心的“皇道派”和以陆军将校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统制派”。两派在尊崇

天皇和对外扩张上没有分歧，而是在如何进行“国家改造”的问题上各执一词。“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组建军人内阁，实行军事独裁；“统制派”则坚持天皇制下的军国主义体制，主张军队的一切行动均由军部中央统制。随着日本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能解脱，两派在如何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屡屡产生分歧，“皇道派”主张对苏战争，而“统制派”主张先向中国内地进行武力扩张。一九三五年七月，两派因人事安排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皇道派”少壮军官冲进陆军省砍死了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遏制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陆军部决定将“皇道派”桀骜不驯的军官们的主要据点——驻扎在东京的陆军最精锐部队第一师团——调往中国的东北地区。调动命令尚未下达，“皇道派”军官们便决心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天皇身边的那些妨碍实现军国主义政治理想的谋臣们杀掉，以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东京下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凌晨，“皇道派”的九名军官率领一千四百名士兵冲出军营，迅速攻占陆军省和警视厅，占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并袭击了日本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住宅，砍杀了内政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企图砍杀冈田启介首相时，仅杀害了首相秘书，首相本人侥幸逃脱。他们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向被他们称为“卖国贼”的新闻记者们开枪扫射。这些陆军军官的暴动计划并不严密，他们没能控制通往皇宫的道路，也没有应对始终与陆军对立的海军的准备，结果天皇下命令对叛乱实施镇压，海军在东京湾集结了军舰，准备随时听候天皇的调遣。尽管日本军中不少人同情这场叛乱，但在天皇明确表态后叛乱的部队开始瓦解。四天后，大多数叛乱官兵返回军营，一部分叛乱军官自杀，其余全部投降。

无论如何，不管是“皇道派”还是“统制派”，日本军人企图通过非常手段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标是一致的。天皇对这次陆军的叛乱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答应军部的要求”，因“皇道派”的失势而乘机控制了军部的“统制派”自此成为日本法西斯独裁体制的主角。

日本陆军叛乱后，幸免于难的冈田首相辞职，原外相广田弘毅出面组阁。控制了日本军部的“统制派”将领寺内寿一、梅津美治郎和杉山元等人立即向新内阁发难，不但强行插手内阁阁员的安排，还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军部控制内阁的措施。广田弘毅对军部唯命是从，全面接受了军部的主张，恢复了一九三一年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首脑

改为现役军人担任。——日本陆军的暴动虽未成功，但军人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即日本军部事实上控制了中央政府。

控制了内阁的“统制派”军人和广田弘毅的阁员们修改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其核心策略是：在遏制苏联并尽量避免与之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集中所能动员的全部财力、物力和军力扩大中国占领区，最终目标是“南方”——日本军人所谓的“南方”，指的是全中国和处于南太平洋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这一“南进”策略始终是日本军部的既定军事方针，依此可以解释日本军人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所有疯狂举动的由来。

军人夺取政权，使得法西斯势力在推动战争上得到了制度保证。

日本军人摆脱了羁绊，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向全面战争了。

此时，在焦灼情绪的笼罩下，中国犹如一只随时要爆炸的火药桶。城市里，街头的抗日演讲吸引着成千上万忐忑不安的民众；流浪的东北难民和学生在悲惨境地中的苦闷歌声在广袤田野上回荡；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甚至来到监狱里要求与抗日爱国人士一起坐牢；国民党广东实力人物陈济棠和广西实力人物李宗仁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电，痛指“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接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第一、第四集团军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粤桂两军在湖南境内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两广事变”的爆发震动全国。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决意国难当头之际联合中国可以联合的所有力量进行抗日作战，为此可以放弃多年来用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顽强坚持的政治主张。——自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毛泽东频繁地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九封之多。他对华北将领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挡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他致信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还致信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表示：“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联合抗

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实现国共重新合作，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如若国民党人能够做到，共产党人将“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呼吁下，国共双方开始了政治接触，牵制中国军力甚大的内战有了停止的希望。

突然，中国的西北部传来捷报：绥远省政府主席、中国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不但与日军打了一仗，而且打赢了！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去绥远，企图劝说傅作义归顺日本。傅作义严厉地回复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隔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征四郎见劝降不成，决定攻击绥远。十一月十五日，日伪军五千余人在大炮、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猛烈攻击，傅作义亲往前线指挥反击，在中国军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的反攻下，日伪军的指挥所被摧毁。傅作义得知日伪军准备再次进犯之时，集中了三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分队各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担任前敌指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中踏着深过膝盖的积雪向日伪军奔袭而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英勇异常的中国官兵痛歼了日伪军大部，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军事据点百灵庙。

百灵庙的收复，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坚决的对日作战，第一次通过作战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消息传遍全国，引发万众欢腾。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民众团体代表，携带着慰问品和捐款到绥远前线慰问，学生们奔赴绥远前线为伤员服务，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前往绥远为部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音乐家吕骥为第三十五军写出了《三十五军军歌》。不足一个月，傅作义收到的捐款达到二十多万元，他用这些钱买了两百多辆汽车发给部队，准备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和朱德派人前往慰问并向傅作义发出贺电：“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

在祭奠英灵宣读祭文的时候，傅作义潸然泪下：

这次绥远抗战，敌炮摧残你们的肢体，毒气瓦斯遏止你们的呼吸，还加风雪严威刺裂你们的肌肤，但是凭你们热血的沸腾，终于战胜一切，完成下列使命……要知道人生的短促，谁能不死，可是死的代价就有“轻如鸿毛、重于泰山”的悬殊。我们后死的人，纵然抱着必死决心，能不能得到这样死的机会，又未必都像你们的这样光荣……现在中华民族已走上复兴之路，相信你们的鲜血灌溉了四万万人的心灵，而充实了自力更生的信念。只要后死者一息尚存，应当继续着你们的伟大精神，共同奋斗！

傅作义表示，军人为了国家上前线是本分，而全国民众的同仇敌忾令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是军人敢于牺牲，而是全国人心不死！”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多少人知晓绥远在何方？多少人知晓百灵庙为何处？但是，只要知道那里是中国的领土，那里的一群血性十足的中国军人不但打败了日本人，而且把失去的国土夺了回来，这就足以让屈辱苦难中的中国人奔走相告，而傅作义将军的那句“人心不死”令全中国人泪如泉涌。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自信。距绥远战场并不远的东北军官兵情绪激荡，这些由于丢失了东三省而饱受国人指责的官兵大多数是东北人，个个思乡心切满怀内疚，而他们之所以驻扎在陕西，也正是国民政府按照日本人意愿调防的结果。东北军的将士在张学良面前痛陈，即使中央政府不同意，他们也要组织队伍与傅作义一起打日本。而张学良自东三省丢失后，一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傅作义绥远一战便成为全国英雄，这深深地刺痛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此时，蒋介石身在西安，他的目的是指挥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军队的最后一击，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人的红军，不出一个月就能解决问题。因此，当张学良向他表示要率部支援绥远抗日时，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张学良不得不如此向蒋介石表达他的心情：“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但是，认为“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的蒋介石，只给张学良两条路供其选择：一是前往剿共，攻入陕北苏区，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二是把东北军的阵地让出来，让中央军剿共，东北军将被调往福建。前者张学良表示不愿意，后者意味着东北军将被调到距离家乡东三省更远的地方任由自生自灭。张学良无从选择，与蒋介石争辩也没有结果。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的将士们扣押了蒋介石，震惊中

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无论是起因、过程还是结局，西安事变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评议最为激烈的历史事件之一。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在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返回南京。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从中国对日关系的角度讲，西安事变与其说是一次兵变，不如说是中国东北军官兵压抑甚久甚深的情绪总爆发。虽然扣押了蒋介石，但东北军官兵没有任何伤害蒋介石的意图，更没有从国民政府夺权的目的，他们只想上战场与侵略自己故乡的日本人拼命，用热血和生命给国人，特别是东北的父老乡亲一个男人样的交代。

就在历史的这个重要时刻，一首歌传遍了全中国——这是青年作曲家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曲，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九

一九三七年到来了。

中国人保卫国家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渴求达到了顶点。

对入侵中国急不可耐的日本军人的焦躁也达到了顶点。

无论如何，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巨大国家，他们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可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一九三六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关东军长春特务会议上作了秘密报告。报告对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其内容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一读。

“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获胜利。及后华军昧于知己知彼之认识，受帝国皇军威胁，而竟疑神疑鬼，转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国相煎愈烈，中国之惶惑亦愈甚，则一般当局的恐日愈益趋加重。

在松室孝良看来，中国人只关心自我不关心国家，只想获得利益不愿承担责任，为了满足一己之权欲或物欲甚至能够“甘心祸国”，而中国军队“变兵为匪”扰乱甚深，作为军人“正式作战反多败”。此种种劣质，足以让日本军队“不战而胜”：

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采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此等各个独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当然难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中国实力派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状况，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都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

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吗？

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表示出担忧：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察哈尔）绥（绥远）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

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上反极度旺盛……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

最终，日本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

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辖，均无切实之把握……

基于此，松室孝良强烈主张，趁着中国人的“恐日病”正在流行，日本军队要赶紧行动，“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这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认识。

这就是日本对中国所持逻辑的根基。

这样的逻辑操纵着日本的战争机器全面启动了。

政客的狂躁、军人的狂热以及对丰饶生活的全民性蛊惑——中国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和顺从的百姓，能使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民在那里过上贵族的生活——所有引发战争的条件，在历史的这一时刻似乎都具备了。日本政客和军人从来没有彻底解读中国和中国人的意愿，看待中国，他们只有“文明人”对“野蛮人”的狂妄、傲慢以及残忍，他们所秉持的逻辑令其自我膨胀异常疯狂又极度顽强。

秉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哲学的中国人，近代以来百战百败。那么，将再次面对战争的中国人是否读懂了日本人的逻辑？

两个近在咫尺而心隔万里的国家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便无人知晓：战争将持续多久？战争将索取何等代价？战争的结局到底会怎样？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必须对日作战了！

第一章

最后关头

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

距北平三十里的宛平县城，是一座被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孤零零的小城。城门外的大道上泥泞湿滑，深深的车辙里淌着浑浊的雨水。城墙上架设着机枪，中国士兵在城门口持枪荷弹。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一队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泞中。

日本士兵要通过城门，中国士兵不允通过。

从凌晨开始，双方已经这样对视了十多个小时。

入夏以来，中国北方阴雨连绵。暑气和水汽纠缠蒸腾，四野弥漫着青草、树木和庄稼的青涩气息。湿透了的城郭和村庄疲惫地卧在泥泞里，大块的雨云在铅灰色的天空中飘来荡去。

在这个连人心都被雨水泡软的季节里，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中国这片偌大的国土上，一座小城的城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除了雨声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声响，除了这种对视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历史的普通的一天。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

此刻，中国平津地区的统辖模式已经支离破碎。

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胁迫下签订《何梅协定》后，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以及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在平津地区的管辖权岌岌可危。这块地域至少有三股势力同时存在：属于西北军系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进入平津地区，成立了冀察政府，总部设在北平城，军长是西北军系将领宋哲元。西北军是一支不曾占据过中国要地的军队，入驻北平令宋哲元格外重视，为了保住这一显要地盘，他既要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重返平津，还要警惕共产党人力量的渗透，更要防止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反客为主。宋哲元的日子过得可谓耗尽心力。因此，当日本人强迫宋哲元签订一个允许日方在华北地区修建铁路的协

定而南京中央政府坚决不准时，谁也惹不起的宋军长跑回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在北平的东面，还存在一个“政府”，即以殷汝耕为首脑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地点在通县。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傀儡政权，几名“政府要员”除了为日本人唱赞歌和组织保安队为日本人维持治安外，无公可办。因此，这个汉奸组织谈不上是个“政权”，更何况此时的殷汝耕必须躲来躲去，因为抗日志士们正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准备要他的脑袋呢。通过数年的努力，日军在中国华北的渗透已经取得成效。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驻屯军，除了军事上处心积虑地策划如何扩大占领范围外，还涉及了经济、贸易、政治、外交、财政等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所有职能，俨然一副中国华北地区的真正统治者的姿态。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日本驻屯军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因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里抢救。

但是，从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在大雨中对视的眼神上已能够窥见，这里将是中国历史上隐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的区域。

日军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东部地区，关东军把部队的前锋推进到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四万人，驻扎在北平西北部的张北、尚义和宝昌等地——对于中国华北的平津地区来讲，日军实际上已经兵临城下。

当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军事力量，是以“中国驻屯军”的名义存在的。之所以有这一名称，是根据一九一一年大清王朝与各列强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了各列强可以在中国驻军的条款。除日本军队外，在中国华北驻屯军队的国家还有英、美、法、意等国。其中英国驻屯军在天津有七百二十二人、北平有二百三十六人，归驻香港的英军司令官管辖；美国驻屯军在天津有六百五十八人、北平有五百零八人，归美军驻菲律宾司令官统辖；法国驻屯军在天津有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北平有二百二十九人，归法军驻天津司令官统辖；意大利驻屯军在天津有二百二十九人，北平有九十九人，归意军驻上海远东舰队司令官统辖。——国力衰败的中国可谓浑身千疮百孔。在中国平津地区驻屯的列强军队中，以日本军队人数最多，达到五千六百多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平津地区中日两军对峙的军事态势是：

天津到北平之间的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部署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统辖的五个伪保安队总队，约一万五千多人。此外，日本在中国的

驻屯军由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组成，主要部署在山海关至北平丰台的铁路沿线上，其分布是：军司令部、步兵第二联队、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和直属分队驻扎在天津及附近地区；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分布在唐山、滦县和山海关地区；驻扎在北平地区的是步兵旅团旅部和第一联队（欠第二大队），其中第一联队的第三大队驻扎在丰台。

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辖四个步兵师（每师四个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其军力部署是：北面，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一、第二旅，独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骑兵第十三旅，驻扎在张家口和宣化地区；东面，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驻扎在天津以及北宁路平津沿线；南面，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辖第一、第二旅和独立第十七、第二十八旅，驻扎在河北任丘和河间一带。驻扎在北平的，是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和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其中第三十七师所辖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旅和独立第二十五旅驻扎在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九师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三十九旅以及冀北保安队分别驻扎在北平的南苑、北苑与黄寺。

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收编的冯玉祥西北军残留部队编成。西北军素以勇猛善战闻名，在长城抗战中，西北军部队与日军苦战一个多月，战后在调防北平、冀中和察哈尔的过程中大力扩编部队，成为西北军留存部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支。

新加入第二十九军的年轻官兵，大多是乐观的速胜论者，认为中国国土太大，日军也就几十万人，要把中国全占领了，一个县也摆不进几个兵，且中国军队有两百多万，又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同时，第二十九军官兵又多是必战论者，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是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强。不知是否是宋哲元的有意安排，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这让日本人感到了隐隐的不安。在日本人看来，第三十七师从师长冯治安到每一个官兵都是抗日的死硬分子。在长城抗战中，这支部队的官兵半夜举着大刀摸进日军军营专砍人头的事，至今仍是日本兵的噩梦。

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后，中日两军驻地和活动区域最为接近的地点，是控制北平进出的丰台车站以及宛平城这两个交通要道。为了防范日军挑衅，宋哲元在这两个敏感地区派出了他最得力的部队：由旅长何基沣指挥的第一一〇旅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把张华亭营长的二营部署

在丰台车站驻防，张营长随即命令以车站为中心构筑工事，这一工事距离东面的日军军营只有四百米。同时，第一一〇旅的二一九团驻扎在宛平与长辛店地区，团长吉星文命令该团一营、二营以及团部集结于长辛店，战斗力最强的三营则被派往最敏感的宛平城与卢沟桥一带。三营是一个由营长金振中指挥的名副其实的加强营，拥有四个步兵连，轻重迫击炮和重机枪各一个连，全营一千四百人。金营长把战斗力最强的十一连部署在铁路桥的东侧，十二连部署在宛平城的西南角，九连驻防宛平城内，十连为营预备队。

两军近在咫尺，往往目光相对，中国官兵流露出的除了警觉即是仇恨。日军驻守丰台的官兵常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在车站站台上乱逛，与警戒的中国士兵常因彼此多看了对方一眼就扭打起来。张华亭营长多次向日军联队长交涉，要求他们停止挑衅行为，但日军变本加厉，反而在中国士兵的眼皮底下开始演习，夸张地做出向中国驻军冲锋的姿态，甚至一度冲到中国士兵的警戒线内，结果又是一场拳打脚踢扭成一团。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一天，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匹军马跑到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内，要求送回，不然就武力解决。中国官兵回答，要马没有，要打就打一仗。结果两军真的交火了。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向营防区发起进攻，三营官兵坚守不退，战事越演越烈，直到冯治安师长命令第二二〇团的两个营前往增援，日军这才撤退。

为了缓和局面，宋哲元军长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日本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官河边正三以及所有中队以上军官，由宋哲元出面率领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中日两军的军官们，相互交叉地整整坐满了十张大桌。但是，酒还没喝两盅，一个日本军官就跳上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也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国歌曲，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干脆跳上桌子上吼出一段怒气冲冲的京剧黑头腔。日本军官又开始跳舞，在冯治安师长的示意下，两名中国军官舞起了充满杀气的中国拳术。日本人又要比写中国字，日本军官中确有汉字写得精彩之人，但那天宋哲元还请来了老军阀吴佩孚作陪，吴佩孚的书法是出了名的，一幅“醉笔”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军官们又把宋哲元军长和秦德纯副军长举了起来，边喊号子便往上扔，中国的旅长团长们立即把日军河边正三旅团司令官也举了起来，而且扔得更高。最后，两军军官竟然拔刀相向，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招呼他的传令兵取来“用最好的钢打造而成的柳叶刀”，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进入一九三七年以来，为实现攫取中国华北的企图，日军在平津地

区开始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从日本本土和关东军抽调作战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中国驻屯军的实力；日本的军界要人也频繁地出现在北平地区视察军情。此刻，日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北平城的对外交通，惟有西面的宛平城一带仍由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掌控，而宛平城与卢沟桥是平汉铁路通往内地的交通要地，不控制这两个要地日军就不能说扼住了北平的咽喉。因此，日军开始加强对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军事准备。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

平时在卢沟桥附近的城内驻有营部和一个连，长辛店约驻一个骑兵连。到五月中下旬之间，城内兵力似无变化。宛平县城外增加步兵约一个连，卢沟桥下河道的岛上分别配置约两个步兵连。六月，长辛店新增步兵第一二九团约两个营。在长辛店北面高地，原在地脚一侧设有永久性机枪阵地两处，高地上设有野炮阵地。而六月以来，又构筑了新的散兵壕。在卢沟桥附近，自龙王庙以至铁路线间堤防上以及东面高地，修改和加固了固有的散兵壕。而且夜间施工掘出了过去用沙土掩没隐蔽的碉堡（以卢沟桥为中心，原在永定河左岸构筑的十几个桥头堡，用以沿湖向北平进攻或退却）。

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出于高度的警觉，中国军队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

卢沟桥附近一带是采掘北宁线路用的砂石地区。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只能种些花生等农作物。当夏季农作物如高粱等茂盛时期，丰台驻屯部队将此作为唯一的演习场。然而，最近，当我演习时，中国军队却说我侵入农田，或要求我夜间演习须事前通报，或对我夜间实弹演习提出抗议等，对我屡施警戒。过去龙王庙堤防及该处南面铁桥地区，我方可自由行动。但最近，特别是自六月下旬，禁止行动了……

中国军队虽无法禁止日本驻屯队演习，但不让他们通过宛平城门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日本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

不让你过去，你可以退回或者绕道，但是日本人不走，他们在城门外站着，一站就是一天，天黑了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再来，依旧站在城门外。这样一次又一次，让中国士兵感到古怪又诡异。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宛平城门外的大雨里与中国士兵对视了整天后，日军撤了回去。

第二天，日军又来了。

这一天，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军下午才出现，他们绕过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了卢沟桥以北。这支日军是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这位日军大尉的日记，后来成了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档案。日记里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记述，支离破碎且前后矛盾：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下午（昭和十二年即一九三七年），第八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构筑工事……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到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样子……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而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墙（即宛平城城墙），以及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一个静悄悄的黑夜……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训练完毕。为了休息到次日黎明时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演习终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了晚上尽量不用军号。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终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但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

日记的大意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听到了不明来路的枪声，然后就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赶快向上级报告，可不一会儿那个士兵自己回来了。其余的叙述，诸如“突然从

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以及“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等等，后来都被认定为子虚乌有。

与中国方面的相关记载对照，只有一点与这篇日记记述一致，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二十二时三十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也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机枪发射的声音，并为此加强了警戒。——后经查实，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当晚官兵的子弹一发未少，清水节郎所说的子弹飞来的方向，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存在。而那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当晚因为闹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跑了回来。对此，清水节郎明确无误地再次向驻军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队长报告：“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

于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

八日凌晨二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与冀察政府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一起，开始与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王冷斋县长反复解释说，经过调查，中国军队七日夜晚没有开枪，军中“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况且，“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坚持日军必须进城，强调王冷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企图胁迫王冷斋当即速订一个有利于日方的协议，从而使日军不战而得宛平城。王冷斋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原则。双方正僵持中，有人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五六百人，携带六门火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向卢沟桥方向开进。中国

方面的谈判代表与樱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秘书斋藤栗屋一起前往现场。车行至距宛平城约两里地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已被日军占领，机枪大炮架设着，日军士兵都横着刺刀。寺平忠辅认为已达到了威吓中国县长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宛平城的要求："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再次予以拒绝。寺平忠辅凶狠地说，之前日军经常穿城而过，今天不能进去，这显然是中国方面别有用心。

王冷斋县长认为自己守土有责：

我再驳斥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忠辅接任不及三个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这时，日本指挥官森田（森田彻）联队副，胁迫我行至战线，欲以武力恫吓。他们两人这种举动大似绑票。我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前后不应该如此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双方相持十余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进城调查。

就在中国县长与日本辅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里争吵不休的时候，凌晨三时，远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主任参谋大本民枝只用了两小时，便把一份旨在扩大卢沟桥事端的军事计划拟了出来。日方把这份军事计划定名为"宣传计划"——把一份典型的侵略计划称之为"宣传计划"，这完全符合日本人阴暗诡秘的心理——这份"宣传计划"显示出日军好战军官的毒辣：

首先，"必要时不顾敌我双方的损害，果断地攻击"，"占领卢沟桥"，"至迟于九日正午前占领宛平城"。其次，"立即将秦德纯、冯治安绑架至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这一任务由北平特务机关实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援助。至于如何对付尚在山东老家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境公署主任宋哲元，"宣传计划"拟订了五种方案：一、催促宋哲元乘火车迅速返回北平；二、或者让其乘坐飞机去天津；三、如果宋哲元不回，就严密监视；四、让宋哲元去青岛退避；五、以上若均不行，济南的特务机关"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中国驻屯军负责实施。——谁都明白，日本特务机关的"最后手段"是什么。

此份"宣传计划"还附加了特别"说明"，强调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事件

发生非我方有计划之行动”。只是这种宣传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多强调，将陷于自我辩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发生在卢沟桥的事件，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上述“宣传计划”已经显出些许端倪。

宛平城的谈判依旧在僵持中，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的爆炸声，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等不及了，于凌晨四时二十分向宛平城内开炮了。

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五百日军向宛平城中国守军发起了攻击。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报告。冯治安师长的命令十分严厉：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中国守军扼守宛平城东门，任日军如何冲击，城门坚固如铁。日军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瞬间就将宛平专员公署炸塌了。此时的王冷斋在炮声中想起一个细节：指挥攻击的那个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曾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的时候前来表示祝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好几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现在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

伴随着炮声，谈判双方的情绪都异常冲动。中国军队宛平城守军三营营长金振中，这个态度强硬的中国军人，坚决不允许日军踏入宛平城，过去不允许，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日方威胁说，如不允许，就要动用武力强行占领。怒火万丈的金振中营长踢翻了桌子，几乎与日本军官扭打起来。

此时，日军正面攻击宛平城未能得手，随即改变攻击方向，集中兵力猛扑卢沟桥铁桥和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防区。两军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只有两个排约七十多人，而日军有两个中队五百多人。在日军的轮番攻击面前，中国士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用大刀进行白刃战，日军伤亡百人以上，两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从兵力对比上看，这近似一场蓄意屠杀。

天亮了，雨云密布。

七十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此刻，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东京。

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第一封电报的时间是凌晨五时五十四分：

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二十二时四十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八日十时二十分，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的第二封电报：

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时，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击。我军于五时三十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说："鉴于六年前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时使用的"诡计"，东京的军政要员们一致认为，中日两国这次是"又干起来了"。

在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上，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内部形成了"不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不同意见。无论是"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在侵华问题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分歧仅仅在于选择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上。"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为代表，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并格外担心苏联会从远东方向出兵夹击日本。——"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不扩大派"认为，在没有动员十五个师团，"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筹备五十五亿日元军费、作战期限限时于半年的条件下，全面出兵中国将是一种失策。相比"不扩大派"，日本军政高层中"扩大派"的人数众多，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需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军力，就可以征服中国。永津佐比重甚至扬言，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将会投降"。至于对苏联出兵的担忧，"扩大派"更是不屑一顾，认为苏联正在经历政治大清洗，很多红军的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处决了，严重的军心涣散将导致苏联无力介入。而英国在欧洲受到纳粹德国的牵制，美国因奉行孤立主义也不会介入远东战争。这样的国际环境于日本非常有利，应该利用卢沟桥事变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动对华全面

战争。为此，杉山元大将上奏天皇，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增派大量的部队，“事变大约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日本关东军军官几乎都是“扩大派”，得知卢沟桥“又干起来了”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为此，他们报告参谋本部：“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及空军一部作好立即出动准备。”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那个上海事变中的点火人——此时已经跑到了天津，建议关东军和驻屯军联合起来，对中国华北地区发动全面作战；而关东军参谋辻政信甚至跑到了卢沟桥，直接对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七十三岁的皇族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未理部务，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因此，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主持。作为“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八日晚六时四十二分，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临命第四〇〇号”指示，向中国驻屯军发出了命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遭到“陆军部内的强烈反对。陆军部的军官们已拟出向中国增兵的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共赴中国华北地区作战。海军部也下达了命令：“一、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原防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任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八日深夜，陆军大臣杉山元下达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七月十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这样，日军等于又“增加了四万兵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刚一下达，中国卢沟桥再次爆发战事。

黎明即将来临之时，大雨又至。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二营由长辛店驰援永定河，于河西岸向日军发动了反击，双方在铁路桥和龙王庙阵地的争夺中反复拉锯。为夺回并巩固阵地，何基沣旅长亲自率领西苑驻军前来助战。二一九团组成突击队，乘着夜色用绳梯悄然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了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日军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之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新的一天到来时，夺回了阵地的中国士兵站在永定河铁路桥上，背着的大砍刀在薄明天色的

映照下寒光凛冽。

卢沟桥事变犹如一道大堤出现的一条裂缝，裂缝迅速扩大，以致洪水汹涌而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何等的贫弱，自己的国民曾经何等的隐忍，但是，因贫弱一直隐忍的国民不等于没有国家与民族尊严的最后的底线——骤然间，底线的堤坝轰然垮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一位名叫麦新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这首名为《大刀进行曲》、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歌曲，墨迹未干便怒吼于整个中国。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八日上午，他收到了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

日军驻丰台部队炮四门，机枪八挺，步兵五百余人，自阳夜十二时起，借口夜间演习，向我方射击。企图占领我卢沟桥城（即宛平县城），向该城包围攻击，轰炸甚烈。我驻卢沟桥之一营，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不能不与之周旋，现仍在对峙中。除以在事态不能扩大可能范围内沉着应付外，如何之处，请示机宜。

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是：全面战争可能真的来了。

蒋介石复电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无法确切地知道，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军政首脑的蒋介石，于庐山上那个云雾缭绕的早晨思考了什么。这个生于中国浙江的南方人，对北方的卢沟桥并不特别熟悉，然而他一旦面对军用地图，就可以立即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要占领那座桥，是因为那座桥扼守着平汉铁路。一旦日军控制了这个由北平向南一直延伸到华北大平原的交通要点，不仅可以把整个北平收入囊中，还可以打开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中国的大门。这么多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让蒋介石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历尽惶恐、迷茫、屈辱和愤怒，往事堆积叠加起来逐渐确立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用中国式的宽容和忍让求得与日本邦交的正常化，不但可望不可即，而且根本就是中国的一厢情愿。由此，蒋介石制定了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

对于全中国的抗日怒吼来讲，“必抗战”三个字已经足够了。

蒋介石接连发出的电报，都是基于应战的准备——他命令开封以西部队派出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以备随时出动；命令位于平汉铁路附近的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命令第四十军及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命令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们全部下山归队，准备打仗。最后，蒋介石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除前令各部开动外，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各师，亦令动员候调为要。

毫无疑问，庐山上的蒋介石听到了全国对日的怒吼之声，并且他知道这一次的怒吼不同往常。在作出重大抉择之后，蒋介石希望知道各方民意究竟如何。于是，他给各路军阀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召集他们与各界名流一起上庐山，共商国家对日战争将要涉及的所有问题。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与他争权夺利，乃至与他开战厮杀的各路军阀们，这一次竟对他的号召报以了从未有过的热烈响应。

在国民党林立的派系中，蒋介石最强硬的政治对手，是广西的桂系军阀。桂系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收到蒋介石共商大计的邀请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桂系决定派白崇禧启程赴庐山面见蒋介石。四川省政府主席、川系军阀首领刘湘，云南省政府主席、滇系军阀首领龙云得知后，致电劝阻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籍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给这两位老兄的回电可谓言辞恳切：

……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们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随即，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更是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决定“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

蒋介石更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人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并为此决心与国民党人“亲密合作”：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

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一天，蒋介石接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和徐向前的联名电报，表示共产党军队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

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

庚亥

或许日方感受到了中国人对卢沟桥事变的激烈反应，或许日军在兵力投入与部署上尚未做好全面准备，日方突然提出“和平解决”。

九日凌晨三时，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协议：一、双方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人数约二三百人，于当日上午接防。

但是，当中国保安队根据协议前往宛平城接防，行至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时，突然受到日军的阻击。王冷斋县长反复与日方交涉都没有结果。中午，日方又提出，中国保安队的人数限定为五十人，只能携带步枪和三十发子弹，并由日军旅团长在宛平城内监视中国军队的撤退。除了第三项，中国方面答应了日方的要求。可当保安队准备进城时，又遭到日军的阻击，日军旅团长已命令第二大队向宛平城前进了。

十日上午，双方再次开始谈判，地点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日方出席的仅仅是第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但这几名日军下级军官却气焰嚣张。刚坐下来，他们就要求中国方面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军道歉赔礼。在场的何基沣旅长勃然大怒，拔出手枪拍在桌子上厉声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方蓄意挑起，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挑衅侵略，否则中国军队就将消灭你们！中国旅长的气势让日方代表一时无言可对。日方要求在卢沟桥保持相当兵力，要求寻找在永定河西岸阵亡的日兵尸体。双方轮番舌战，激烈辩论。突然，日方代表们找借口出去了，而且竟然一去不复返。

很快，中国方面接到了日方提出的新的停战条件："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做出彻底取缔办法。以上要求须向日方提出书面承认。"只有中国承认了上述条件，日军才会回到原驻地，但"卢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

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派出代表与日方交涉，由于他坚决不同意"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条件，谈判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

中日两方正在谈判的时候，牟田口廉也指挥日军一部再次占领龙王庙地区，并向卢沟桥前线的中国守军发动了夜袭。在施加了一系列军事压力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冒着大雨来到张自忠家进行交涉，张自忠仍是坚决不答应撤兵和惩处"肇事者"，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此时，在日本东京，陆军部的"扩大派"已经制订了向中国派兵的作战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石原莞尔"极为苦恼"。因为派兵

就“含有事态扩大的因素”，作为作战部部长，他希望卢沟桥事件可以“不动员国内师团而就地解决”；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中国驻屯军的现有兵力，确实不足以面对“扩大派”的军官们一直叫嚣的岌岌可危的局面。于是，石原莞尔最终同意向中国派兵。

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日本政府内阁举行由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外相（外务大臣）、陆相（陆军大臣）、海相（海军大臣）、藏相（财务大臣）参加的五相会议，陆相杉山元在会上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五个师团，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对此，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保留条件”：“一、虽说是必要时实行派兵，应只限于为保护侨民和中国驻屯军的自卫安全所必需时，才实行动员；二、关于动员国内部队，按陆相说明，只能理解为当前的准备性打算。”会议两点结束，接着又召开了内阁会议，陆军部的派兵提议得到全体阁员的支持：“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派兵”。

内阁会议结束后，首相与参谋总长觐见天皇，天皇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方案。

十一日十八时三十五分，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下达了“临参命第五十六号”，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侦察机、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各两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包括装甲列车在内的铁道第三联队之主力，电信第三联队一部、汽车队一部和防疫队一部，隶属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急速派遣至华”。三个小时后，“临参命第五十七号”下达，驻守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团被命令：“务须迅速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参谋本部制订的行动计划是：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少将，十三日从公主岭出发，十七日集结于顺义；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中将，十二日从古北口出发，十九日集结于高丽营；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十七日从龙山出发，由铁路输运，十八日在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

这一天黄昏时分，日本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七月七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

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方针，努力做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七月十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

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夙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当予充分考虑。

这份政府声明，可视为日本政客和军人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的一份对华发动战争的宣言。

日本战史承认，上述派兵声明对中国刺激甚大。”

日本驻屯军闻讯后，更是摩拳擦掌，决定“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予以彻底的打击和扫荡”，从而“以此次事变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只是，增援的兵力尚未抵达。

十一日晚八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与中国冀察方面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就地协定》。这份包括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周围及龙王庙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取缔共产党抗日团体等内容的协定，基本上是按照日方的意愿制订的。即使如此，当协定的内容传至东京后，“扩大派”的军官们立即草拟了一篇广播，并于午夜时分从东京播出：“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而因为派兵令业已下达、政府声明业已宣布，“不扩大派”此时也对这份协定怀有了诸多不

安：

一、在现地签订的协定，虽可认为现在事态大致缓和，但从全面解决目前时局中存在的问题看，还不能安心。

二、对海军来说，当然不希望事态扩大，但面对席卷全中国的抗日气氛，要充分戒备，在未看出事情的结果之前，执行现在配备，不能放松，须继续进行。

三、帝国应以严肃态度监视中国方面履行协定，国内师团的派兵可以暂停。

此时此刻，对于中国来讲，无论东京持有何种立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大量日军将要踏上中国领土这一严重的事实了。

十日，蒋介石给仍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打电报："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日，再电："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蒋介石催促宋哲元回到北平主持大局，或者赶赴保定以备指挥一触即发的战事。

十一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会上详细讨论了中国军队在军事上的应变措施，除指示各部队待命和配备作战武器外，还命令后勤部门向黄河以北运输储存可供二十个师三个月消耗的弹药、粮食及两百架飞机使用的汽油。

同一天，重病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已处于弥留之际，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于凌晨四时接到了继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香月清司立即拜会了参谋总长、次长以及陆军大臣，得到的指示相互矛盾，一会儿说"根据不扩大方针行事"，接着又说继续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甚至说要动员国内两个师团去中国的山东——"原定登陆地点是青岛，但海军希望在海州附近登陆，意见还没有一致。"直到登上飞机飞往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时，这位新任司令官依旧心绪紊乱："陆军省一片黑云弥漫、忧愁沉郁的状态，反之参谋本部却使人感到形势紧迫已极。那种即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准备动员国内的数个师团、山东作战的意向等等，简直觉得对华全面作战就要开始了。"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动身离开了山东老家。这位五十二岁的职业军人此刻更是心如乱麻。

宋哲元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贫苦饥寒养成了他倔强暴烈的性格。自一九〇七年进入武备学堂开始军人生涯后，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当哨长开始，由于作战勇猛而逐步提升，至一九二六年他已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指挥他的部队，剿灭了陕西省内由于军阀混战形成的各路小军阀，从而巩固了北伐军的后方。在攻克陕西关中西路重镇凤翔后，宋哲元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举动：将五千俘虏全部砍头。行刑时，他坐在刑场的一边，面对如此规模的屠杀场面，声容丝毫不为所动。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血迹未干，陕西的大小军阀纷纷前来跪倒在地恳求开恩。一九二九年，日本与国民政府签订协议退出济南，协议规定济南将由负责山东防务的西北军接收，但是蒋介石通知日方济南必须由中央军接收。这一事件导致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冯玉祥宣布反蒋，蒋介石欲解决冯部，始终追随冯玉祥的宋哲元受到蒋介石的通缉。随即爆发的蒋冯大战，以冯玉祥部败退告终。接着，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再度反蒋，蒋冯大战持续五个月，冯玉祥部再度败退。宋哲元一战再战，实力尽失，西北军残剩部队被张学良收拢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宋哲元被委任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军部设于山西阳泉。一九三三年初，第二十九军奉张学良之命开往北平附近，接着就被调往长城战场。在长城坚守喜峰口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名声大噪，宋哲元也获得了“抗日英雄”的美誉。他赞赏他的大刀突击队杀鬼子就像砍瓜一样痛快，他大情大义地收养了长城抗战烈士的遗孤。当国民政府向日方妥协，撤出在华北的势力后，华北地区便失控于南京中央，宋哲元借机迅速扩充部队，并将北平的各种税收纳入他的管理之中，他的地盘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与北平、天津两市，可谓大权在握。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要对付日本人。作为平津地区的掌权人物，他自然成为日本人拉拢的对象。虽然他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将士打心眼里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和平相处”，他不想在他的地盘上发生战争，他深知一旦战争爆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而自己瞬间就会连立身之地都没有了。宋哲元还必须与南京国民政府周旋，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很深，历史上曾经几次兵刃相见，他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而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绝不能不提防蒋介石的暗算。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下令免去他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此事至今还令他备感难堪和怨忿。宋哲元曾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决不会投降日本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眼下他确实存在着利用日本人在华北的存在遏制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的想法。另外，受到冯玉祥的影响，宋哲元还要

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赞同反共但不赞成“剿共”，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主张采取血腥镇压的方式。

由于处在特殊而敏感的位置，宋哲元最大的心结是怕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他是有血性要脸面的人，承受不了这种指责。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向他建议与蒋介石、张作霖一样，制作一批“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他一听就火了，认为这是在暗示他独立，表示除了服从中央之外，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并说以后谁再出这种主意以汉奸罪论处。

至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中，宋哲元的名字似乎与妥协派甚至是投降派连在一起。他的副军长秦德纯曾为他辩解说，国内外人士之所以责难颇多，是因为不明就里。宋哲元军长身处特殊时期和特殊位置，除了委曲求全之外别无他路。秦德纯对宋哲元的理解，也源于蒋介石曾托他转告宋军长的这样一番话：

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怎样理解并落实蒋介石的这句话呢？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的“维持”，又该是什么分寸？如何才能做到让日本人老老实实，不挑衅？让共产党不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煽动抗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借口重返平津而把自己的第二十九军再挤到贫瘠的西北去？怎么才能即使不在全国舆论中有个好口碑，但至少不能落一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宋哲元，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终是不知如何是好。

作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没有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要求返回北平或到保定开设作战指挥部，而是直接去了天津，这让南京的中央政府颇感意外。

十一日夜，抵达天津的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在第二十九军内部，将领们在如何处理与日军的关系上分歧很大。

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主张坚决抗击，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则主张与日方交涉和平解决。至于张自忠等将领为何主张和平解决，不是他们对日方抱有希望或是对日军怀有畏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对日作战中的中坚力量，与宋哲元一样，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西北军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盘。卢沟桥事变时，当张自忠得知与日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后，曾在电话里训斥过何基沣旅长："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在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上，张自忠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宋哲元决定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并让张自忠转达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会后，宋哲元发表了公开谈话，恳切地谈到"东亚和平"和"人类责任"："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接着，宋哲元向第二十九军下达命令：

一、从十四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

二、解除北平戒严；

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

四、严禁与日军摩擦。

宋哲元的态度令南京方面异常惊骇。此刻，国民政府已经启动了应对战争的准备：蒋介石向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路北线的防卫任务，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所有的轮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鉴于此，军政部长何应钦以特急电报再次催促宋哲元速去保定准备作战："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而宋哲元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请求暂缓派中央军北上；一面向日方表示，"对日决不抵抗，对南京抗争"。

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飞抵天津。他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群的汇报，然后召集参谋会议，并于十三日晨草拟出一份《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紧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东京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判断》的主要内容是他所指挥部队集结的位置以及集结的目的："军将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为了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香月清司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上述要求，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香月清司击中了宋哲元的要害。

如果不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方将以武力将第二十九军驱逐出平津地区。

宋哲元感到了心力交瘁，他对日方表示：原则上没有异议，只希望延缓实施。

面对宋哲元滞留天津，且有向日方妥协的倾向，焦灼的蒋介石于十三日给宋哲元发去一封立场鲜明却又言辞恳切的电报，表示中央已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作战决心，要求宋哲元务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共同生死，义无反顾"。蒋介石向宋哲元强调，这是"国家与个人之人格"问题：

宋主任勋鉴：卢（卢沟桥）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请速详告，中正手启。

十三日这天——七七事变爆发近一周后——中国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的战时体制，任命陈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同时命令作战部门开始编制战争爆发后各战区所属集团军、军团、军、师及独立旅的战斗序列。

十四日，宋哲元给何应钦回电，拒绝了让他赴保定指挥部队做抗战准备的命令："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要冲，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辱蒙关切，至为感谢。"宋哲元依旧对香月清司抱有幻想，他很想与这位新任司令官面谈，但香月清司对他反应冷淡，只派了一名少佐参谋见了他一面。宋哲元只能再派张自忠去找桥本群谈判。张自忠因兼任天津市长，与司令部位于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比起宋哲元要熟稔些。张自忠开列的妥协条件是：处罚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国营长；由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出面向日方道歉；将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调出，由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接替北平城防；立即取消一切抗日活动等。但是，日方的态度依旧蛮横，说这些条件仍未能满足日方的要求。

同一天，宋哲元再次向南京发电，言他会本着"中央之意旨"处理相关事宜，但因他的部队均处驻防状态，散落于平津各地，集结需待时日。且天津"大沽小站一带"已非常危险，请示南京是否应该放弃驻防。蒋介石立即回电，告知宋哲元"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同时切望第二十九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为促使宋哲元尽快行动，蒋介石专门抽调了六个高射炮连开赴保定，命其归宋哲元指挥，并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速运子弹三百万颗"给第二十九军。

但是，宋哲元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

七月十四日下午，国民政府军政部召开"卢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会。会议对卢沟桥事件本身没多议论，话题反而都集中在宋哲元身上。何应钦说，委座要求外交部发表一份对日声明，但是外交部非常为难，因为据说宋哲元已经认可了日方所提的苛刻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何应钦还通报说，日方在北平"对宋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而宋哲元之所以与日方签约，似乎不是惧怕日军，而是为了给足日方面子："宋发表谈话，谓代表所签字承认之条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兴师动众，非得一点

凭据，面子不好看。现在日本全国仅二十个师，用于平津者不过五六万人。现中央交四个师归我指挥，决不怕日军之压迫。”

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中央派系与地方军阀派系间的猜忌与倾轧，始终是近代中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死结。

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就在宋哲元想方设法与香月清司商谈妥协条件时，日军紧张地准备着进攻北平和歼灭第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于十五日报给日军陆军部：“以突然行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同时，“以现有兵力进出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作战计划拟动用的兵力除以河边正三为旅团长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骑兵之外，还有增兵中国的第二十师团，独立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以及以德川好敏中将为兵团长的航空兵团。以上部队均配属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特种部队，航空兵团拥有侦察机七十二架、战斗机八十四架、轻型轰炸机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三十架，作战飞机总计二百二十二架。

中国方面得到相关情报后，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企图包围北平并歼灭第二十九军全部。始终对南京怀有戒心的宋哲元不但将信将疑，而且为了不刺激日军，竟在这天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了抗日热情高涨的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宋哲元对蒋介石中央军的警惕，比日军还甚，这让中央军派系的大员们感到既恼怒又无奈：“宋哲元犹疑不决，并向中央表示：要抗战，没有钱，没有军火。中央拟派第二、第十、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八十七等师协同作战，他拒绝了，并说第二、第十、第二十五各师是失败过的军队，他不欢迎；还表示：河北人民很苦，中央军如来，最好不要住民房。”

十六日，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抵达平津地区，朝鲜驻军的一个师团正在向平津疾进，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已集结于长城附近待命出击。

此时，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和各界名流已陆续上了庐山。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七七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了讲话。在这个著名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中，中国政府表明的抵御外侮

的决心前所未有：

各位先生：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事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政府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以想见这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热河）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

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地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国家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即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卢沟桥）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到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赞扬道：“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

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强硬立场，至少基于三个理由：

其一，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各地军阀统辖的地盘控制能力薄弱。华北的宋哲元始终担忧与日军进入战争状态后会损兵折将削弱实力，惧怕由此导致中央军以增援为名进入冀察而丧失地盘，因此一再期望与日方取得和解以求自身的生存。而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等等军阀，何尝不是这样的心境？军阀们都对中央抱有如此戒心，那么，如果不在抗战立场上表示出没有余地的强硬，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将会造成战局的不可收拾。

其二，不强调“收复失地”而强调“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强调在不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仍望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但同时又强调“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这是国民政府惯用的一种外交策略，因为在自身国力贫弱的国际关系中，态度越强硬，冲突和平解决的希望就越大。

其三，与日本的国力和军力相比，中国处于劣势。中国如果决心应对战争，必须拖延开战的时间以求进行战争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动求战不符合军事战略的常规。外交上的强硬不但不损害民族尊严，还可以使双方的谈判得以持续，由此尽可能多地赢得战争准备时间。

此刻，在日本军政高层内部，矛盾的激化仿佛他们也到了“最后关头”。战争狂热情绪的日益膨胀，令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十分焦虑，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日本国内能够动员的兵力总数为三十个师团，除去在“满洲国”和朝鲜的驻军之外，在中国方面最多只能投入十一个师团。因此，如果这时候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其结果只有和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深渊”。因此，他甚至主张应果断地将华北军队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北，然后由“首相亲自飞南京和蒋介石解决中日根本问题”。可是，“扩大派”的将领坚决反对石原莞尔，他们认为这样会导致日本丧失在中国的全部权益，甚至会导致日军不得不从“满洲国”撤退，这样一来将是日本“国策”最悲惨的失败。——现在到了要不全部放弃权益，实行彻底的不扩大；要不就放弃不扩大，而保护权益，二者必择其一的关头了。”

从后来的战争结局上看，此刻的石原莞尔，可能是日本军界唯一预测到了未来的清醒之人。只是，他的主张并不是基于反对对中国的侵略，而是出于苏联有可能对日开战的高度警惕。他认为现在日本的战争能力，在维持“满洲国”统治和戒备苏联南下两方面勉强够用，如果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再贸然对中国全面开战，很可能由于兵力捉襟见肘而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还有可能因为战场巨大战线众多而陷入持久战争。——但是，在日本政客和军人眼里，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物产已在手边，怎么可能放弃？

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几乎是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的同时——东京日军参谋本部正式通报了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的具体说明是：“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限制在华北。然由于情况变化，可能转为对华全面作战”；决定在二十日之前，动员国内三个师团的兵力向华北集中；增援兵力集中完毕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参谋本部对战争的预定是：两个内消灭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三至四个月内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的国家政权。

日本政客和军人的极度狂妄由来已久。

何应钦将日本扩大战争的情报通报给宋哲元。然而，就在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本驻屯军提出了妥协方案，内容包括：宋哲元道歉，处分当事者营长，取缔排日言论、组织和活动，北平由宋哲元卫队驻扎等。第二天，宋哲元和张自忠一起面见香月清司并当面道歉。十九日，宋哲元留下张自忠在天津，他与冀察军政首脑们乘坐日本人准备的专列离开天津前往北平。就在列车行进于半途中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当晚十时，日方发表了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声明，声称二十日午夜后日本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得到消息的张自忠立即派出代表会晤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一个小时后，即与日方签订了包括“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冀察方面主动”罢免“不适宜职员”、第三十七师主动撤出北平等条款在内的秘密协定。

宋哲元认为，既然已经全部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日军就不会把第二十九军赶出平津地区了。因此，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中共党员张克侠拟定的集中兵力歼灭日军分散据点，然后迅速向长城一线推进阻击日军的作战方案，不但没有得到采纳，将领们反而接到了宋哲元拆除北平城内巷战堡垒以及第三十七师移防涿州的命令。宋哲元甚至向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保证，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

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

就在宋哲元与日方签订秘密协定的九个小时前，十九日十四时四十分，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董道宁针对平津地区的中日问题特别声明：此次事件“因有地方性质，故希望在地方谋求解决，但任何现地协定，须经中央政府承认”。日方立即表示无法接受，言“冀察政务委员会乃有别于其他地方政权的大规模特殊政治形态。多少次重要的地方交涉向来由其进行，南京政府并未过问。而今竟突然主张我方和冀察政权的对话，必须经过承认，完全是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障碍”。——难道日本人真的不懂，冀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冀察政权组织都是中国政府职能的地方代行者，难道东京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签署协定而日本政府不能过问也无需认可吗？

日军参谋本部在部长会议上确定：“立即中止天津军对冀察的交涉，转为作战行动。”

这一天，日军增兵部队两万五千人抵达，连同中国驻屯军在内，日军在中国平津地区的兵力已达三万以上。

蒋介石关于“最后关头”的措辞强硬的讲话，于十九日正式公开发表。二十二日，蒋介石致电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转告宋哲元：

昨电至今尚未见复，甚念！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也已撤收，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将其部队与兵员乔装入城，充分布置，或待我城内警戒松懈时，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北平城，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与倭所商办法，究为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而慰愁虑。

蒋介石一再追问，宋哲元还是没有告知与日方签订的秘密协定的内容。第二天，蒋介石再次致电已从保定赶赴北平的参谋次长雄斌，请他转告宋哲元：目前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正秘密向北平大量运送，大连方向也有大量日军部队正在登陆，“预料一星期之内，必有大规模之行动”。切望第二十九军“时刻防备并积极布置”。

得知日军正向北平大规模集结后，宋哲元终于明白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出于一位中国军队将领的良知，他开始考虑并部署备战问题。他命令第三十七师停止移防涿州，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独立第二

十七旅进入北平担负城防。但同时，宋哲元还是对自己的地盘留有最后的不死之心，他致电蒋介石，要求已经北上备战的部队暂时稍微后退，以便使目前剑拔弩张的局势得到一时和缓。宋哲元给蒋介石提出的理由是：让他有时间妥善完成应战准备。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为彻底占领并控制中国平津地区，日本驻屯军决定，首先肃清北宁铁路天津至北平间主要车站上的中国守军，以便打通华北这两座大城市之间的交通。

廊坊车站，天津至北京间的一个大站，由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旅部率二六六团（欠二营和三营十二连）驻守。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半，日军的一个中队乘火车到达这里，并开始在车站内构筑作战工事，声称他们要修护日军军用电线。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和二二六团团长崔振伦随即与日军交涉，言这里是中国军队的守备区，不允日军随意进出并有所动作。但日军竟然要求中国守军退出车站，两军随即发生冲突。日本驻屯军立即命令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和驻屯军步兵旅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前往增援。二十六日拂晓，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廊坊中国驻军的兵营，陆续到达的地面部队同时向廊坊车站的中国守军发动了猛攻。因作战实力悬殊，中国守军于中午十二时向通州方向撤退，廊坊车站遂被日军占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被日军切断。

廊坊冲突发生后，香月清司向东京参谋本部请求他可以“随时行使兵力”，参谋本部即刻通知中国驻屯军：“要坚决予以讨伐，上奏等一切责任，由参谋本部承担。”当晚，参谋本部下达“临命第四八〇号”，特别指示：废除石原莞尔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下达的“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的“临命第四〇〇号”，以便香月清司“得以行使武力”。这一命令的下达，令驻屯军的军官们欣喜异常：

卢沟桥事件到今天已十八天，在军司令部里对中国方面有无诚意或程度如何的判断，以及对不扩大方针可行不可行的争论，各持己见相互对立不知所措。参谋长、军司令官同样也无法把这些意见统一起来。东京也拿不出果断的态度。这些天就是在浑沌中度过来的。终于到了下定决心对待事态的时候了。

香月清司随即向第二十九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

于二十八日中午前全部撤出北平城区，否则日军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最后通牒发出的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从廊坊乘火车向北平开进，抵达丰台车站后，分乘二十六辆卡车扑向北平城，于黄昏时分抵达广安门，谎称是刚从城外演习回来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卫队，要求进城。广安门的中国守军，是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刘汝珍团的一个连，眼见日军要强行冲关，中国守军立即向日军开火，两军在广安门城门前发生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小时，最终一部分日军冲进城内，一部分被阻挡在城外。

到了此时，宋哲元才彻底明白，他对日本人抱有的所有幻想已经化为泡影，他对中央军取而代之的担忧已经为日本人所利用，而日军以全歼他的第二十九军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三天前还在要求北上部队稍事后退的宋哲元不得不致电南京，报告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由平浦线星夜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介石回电，命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并请宋哲元不要在北平停留片刻，迅速赴保定指挥即将到来的大战，并承诺中央政府一定全力增援。

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一样，都是日军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事件发生后，日军陆军大臣杉山元上奏天皇批准，下令全国动员，拟向中国派出规模约二十一万人的作战部队。其中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增援华北——“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第十一师团开赴上海，第三师团开赴青岛——以便“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上海附近作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被派往中国华北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后来都成为罪大恶极的战犯。

几乎同时，增援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也开始向北推进。

仓促应战的宋哲元于二十八日向第二十九军各部队下达了平津地区防御作战命令。只是，命令刚刚下达，部队尚未展开，日军便开始了对北平的进攻。

二十八日上午八时，香月清司指挥增援日军第二十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以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在空军的支持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北苑、西苑和南苑的中国守军发起全面攻击。

南苑地处北平南郊，自此处可长驱直入永定门。第二十九军军部原本设在这里。二十七日，宋哲元已将军部临时移驻到了北平城内。现在

这里防守的，除副军长佟麟阁率领的军事训练团外，还有第二十九军特务旅的两个团、第三十八师师部特务团、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的两个团以及骑兵第九师的三个团、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总计约七千人，由临时从城内赶来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担任总指挥。赵登禹因情况危急而来，到达后才发现这里部队众多，管理混乱，防御工事薄弱，遂立即命令第一师第一、第二旅连夜驰援。但是，援军尚未抵达，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日军第二十师团主力在四十架作战飞机的配合下，自东、南两面实施主攻，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从北面实施助攻，集结于丰台的日本驻屯军旅团主力切断了南苑通往北平城的退路。日军对南苑中国守军阵地猛烈轰炸，没有任何防空武器的中国守军的通讯设施很快就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中国守军很快就被日军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

这是中日双方在平津地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作战。尽管副军长佟麟阁和总指挥赵登禹身先士卒，中国守军官兵不怕牺牲拼死抵抗，但由于事先没有战争准备和作战预案，且各部混杂在一起于横飞的炮弹中难以协同，致使战事初起中国守军便伤亡惨重。日军随即投入了装甲部队，很快攻占了大红门一带，从而完成了对南苑中国守军的全面包围。中国守军开始撤退。撤退时因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掩护部队，秩序十分混乱。副军长佟麟阁在大红门附近收容部队向北平城撤退时，腿部中弹负伤，在坚持指挥作战中被敌机炸弹击中，当场阵亡。总指挥赵登禹手持大刀督战，遭到日军伏击后，于冲杀突围时胸部中弹阵亡沙场。

五个多小时后，南苑被日军攻占。

中国守军伤亡两千人以上。

残余官兵在暮色中向北平城方向退去。

佟麟阁，河北高阳人，早年追随冯玉祥，从士兵升至师长。中原大战冯玉祥讨蒋失败后，佟解甲归田，“九一八”事变后受宋哲元邀请重新任职。一九三三年任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撤销后，他再次隐居，后又受宋哲元邀请复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他是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表示国难当头，战死者荣，偷生者耻。他本可在城内指挥，但他决心一死，阵亡时年四十五岁。

赵登禹，山东菏泽人，从军后担任冯玉祥的随身卫兵，跟随其参加

北伐战争。他武艺出众，胆大机智，屡获战功。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部队败北被张学良整编，他被任命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长城抗战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他的杰作，为此他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升任第一三二师师长，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南苑一战阵亡时，手中依旧紧握大刀，刀刃上沾满倭寇之血，时年仅三十九岁。

两位将军阵亡，举国震惊，同声哀悼。

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两位抗日的中国军人的名字，被北平、天津、武汉等城市命名为街道名称，以传后世。

南苑失守后，日军随即占领丰台、清河、沙河等地。

北平已经门户洞开。

二十八日那天，北平市民心境复杂。当听见南边响起枪炮声，得知自己的军队终于与日军真枪实弹地干起来时，全城雀跃。市民们组织起支前队和慰问队，甚至还请来了几十名磨刀人，以专为第二十九军官兵磨快杀倭寇的大刀。

磨刀霍霍中，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在铁狮子胡同官邸商讨战事。时近黄昏，骑兵第九师师长郑大章闯进来报告：南苑丢失了。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平津防务和政务交由张自忠负责，宋哲元当晚与冯治安、秦德纯等人一起撤往保定。

从南苑方向撤退的第二十九军官兵，夜幕降临后到了永定门城门下。守城的中国士兵不敢打开城门，他们用绳索把城外的兄弟吊上城墙。看见这一幕的北平市民不由得有些惊惶，但更多的市民沉默着，他们在沉默中于路两旁摆上食品，并且向自己的士兵脱帽致敬：

市区已不见岗警，但行人不少。马路两侧还摆放着西瓜、酸梅汤、馒头等食品，叫士兵们食用；有些学生给我们带路；有的市民见到我们队列行进，脱帽致敬。此情此景，使我们这些溃兵辛酸而惭愧。

据说，北平警察局一夜之间把冀察绥靖公署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第二十九军军官和家眷们的户口全都改了，为的是万一日本人进城后不让他

们惹上麻烦。

第二十九军残存的官兵到中南海怀仁堂集合。中南海里凌乱不堪，到处是遗弃的军装、枪支和破坏了的汽车。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命令部队凌晨两点出发，军官发路费五元、士兵二元，行军路线是：出西直门，经大灰厂、门头沟，至良乡、琉璃河、高碑店，到保定集中。

十九日凌晨，第二十九军残部大部分撤出北平。其中第三十七师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投敌。滞留城内的第一三二师独立第二十七旅被日军解除武装。张自忠躲入了德国人开办的医院。第二天，由日方组织的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为委员长的北平维持会成立。那一天，北平大雨。

北平陷落的消息传到了天津。驻守天津的中国官兵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

驻守天津的中国军队，尚有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指挥的约五千多人，这些部队是第三十八师手枪团、独立第二十六旅的两个团、天津保安队三个中队和一千多人的武装警察。二十八日黄昏，李文田副师长召开军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保安队队长宁殿武、警备司令部司令刘家鸾、第二旅旅长黄维纲以及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他们计算了一下，日军在天津尚有步兵三个大队以及临时航空兵团等部队，兵力约五千人左右。双方虽都是五千多人，但无论武器还是备战中国守军都不如日军，可军官们最后还是决定以流血牺牲来宣示他们与日军的不共戴天——日军痛恨砍他们脑袋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他们严重忽视了第三十八师也是一支抗日情绪高涨的部队——在平时训练中，除了常规军事课目外，这个师还有一个训练内容叫作“精神讲话”：

……每逢国耻日，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让官兵都躺在铺上凝视天棚，不吃饭，想一想，以示不忘国耻。有伙食节余的团营就买几头活猪，拉到操场上用黄纸糊在猪身上，写上“日本帝国主义”，然后让各连队向猪做冲锋动作。哪个连队刺死了猪，哪个连队就抬走吃了。吃饭时唱吃饭歌：“这些伙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

这群明白伙食是人民供给的中国军人对日军发动袭击的具体部署是：独立第二十六旅配属保安队一个中队，攻击天津火车总站和日军的

机场；另一个保安队中队攻击火车东站；武装警察负责交通与通讯联络。

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天津的中国守军出击了。

由于对天津火车总站和火车东站采取的是偷袭战术，战斗进展顺利：由独立第二十六旅的朱春芳团长率领的二营和一个保安中队，在炮轰天津火车总站后发起攻击，将那里的日军压迫至车站仓库的口上，总站随即被中国官兵占领。火车东站的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那里的日军基本上被消灭。飞机场距离较远，为达到突袭的目的，营长和两名排长跑在最前面，其余的官兵每人携带一壶汽油和一盒火柴跟进。待营长和两名排长跑到机场时，后续部队还没有到达。他们在机场大门口用大刀把站岗的日本兵砍死，正好有一辆汽车开出来，他们开枪把汽车打坏了。这时后续部队赶到，官兵们一起往机场里面冲，日军飞行员都睡在飞机的机翼下，听见枪声迅速上了飞机准备起飞。中国官兵扑上去，把汽油倒在飞机上，然而携带的火柴因为跑步时出汗而弄湿了，竟然一根一根地划不着。日军飞机发动起来横冲直撞，有的强行起飞了。这是一个混乱的场面：

……驻在机场的日军，疯狂向我士兵射击，我士兵一部分设法烧飞机，一部分抵抗。这时约有二十多架飞机即将起飞，有些士兵急了，不管管事不管事，用刀乱砍飞机；有的抓住飞机不放，飞机起飞，只好放手掉下来，跌伤了三四个士兵。起飞不了的飞机，士兵们用大刀砍，用刺刀刺，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起了火的飞机，士兵们不管火烫用手撕下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再到别的飞机上引火，霎时机场上烟火冲天。我军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将守卫机场的日军压迫到机场办公楼和营房工事里。起飞了的飞机黑夜里看不清地面，在机场上空乱飞。

在枪炮声中慌恐地过了一夜的天津市民这才知道，是中国军队与日军干上了。市民们夹道为上前线的官兵鼓掌欢呼，送上茶水、西瓜和饭菜。天津的公私车辆全部主动为中国军队运送兵员和弹药，在日军轰炸和反击时，市民们帮助自己的军队修筑街垒，商店的店员把铁门卸下来，喊着号子向前线送。一些市民在四处横飞的枪弹中倒下了，军民的鲜血混合着，在大街上流淌。

天津的战局从二十九日下午开始恶化。

日军飞机开始对天津全城狂轰滥炸，中国官兵和天津市民的伤亡急

剧增加。要求增援的电话一再打到第三十八师总指挥部，而总指挥部所在地被日军发觉，遭到了飞机的猛烈轰炸，加上汉奸的大肆破坏，总指挥部与各部队的联络中断。由于各处战斗伤亡很大，预备队也所剩无几，天津的中国守军残部只能撤退。

二十九日黄昏，天津沦陷。

就在天津的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袭击时，驻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突然暴动了。伪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之前曾与第二十九军秘密联系，商定一旦与日本开战，保安队就起义反正。二十九日凌晨，起义的伪保安队突袭了驻通县的日军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击毙了通县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以及日军官兵数十人，消灭了日军守备队、汽车大队，还抓获了伪政府主席、大汉奸殷汝耕。当日军增援部队抵达时，起义官兵已经押着殷汝耕前去投奔第二十九军了。但是，他们走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他们只好向保定方向追赶，谁知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起义部队伤亡巨大，殷汝耕在混乱中脱逃。

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二天后，北平和天津相继失守。

尽管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北平地区仅战斗第一天即遭重创，高级将领阵亡两名，全军官兵伤亡达五千余人。日方的伤亡统计是："战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三百四十八人，合计四百七十五人。"

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异常凶猛的地空协同火力是造成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高层领导的政治和军事失误责任不可推卸。始终出于地盘利益考量一切问题，既没有认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又没有理解中央政府强硬的抗战决心，置全中国军民的抗战意愿于不顾，置国家和民族危急关头的命运于不顾，一味地委曲求和，致使负有守卫平津之责的第二十九军严重贻误了备战和战机。军长宋哲元作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在明知中央已经派出部队北上增援的情况下，仍旧滞留天津，不断试图与日本人进行求和接触，导致战事爆发时，第二十九军的高层将领连日军究竟有多少兵力、日军的作战计划和突击方向一概不清。宋哲元离开北平后，没有留下明确的作战计划，负责留守的张自忠直到南苑失守才得知大规模作战已经开始，而这时候，第二十九军位于南口至张家口铁路沿线的第一四三师竟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一切足以显现第二十九军作战指挥上的混乱。天津的中国守军的反击以及冀东伪保安队的起义，都是自发的行

动，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与增援。

抵达保定的宋哲元心境灰暗：好不容易到手的冀察地盘就这样丢了。如果说今后只有抗战一途，可平津一战部队损失惨重，再拿什么置身于军中战场？更重要的是，当年第二十九军于长城抗战时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赞扬，现在则是纷至沓来的责难。宋哲元给蒋介石打电报，认为自己应该受到国家的严重处分——在以后漫长的对日战争中，因失职被处决的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不在少数——但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为他承担了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兼负行政，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以挽救今后之危局。"蒋介石同时勉励已经撤到保定的第二十九军军师将领："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宋哲元还是通电全国，辞去了第二十九军军长职务。

在中日双方都认为的"最后关头"，局部战争已经爆发。

那么，历史将如何演变下去？

在日本军政高层内部，就对华战争的问题，立场从来没有统一过。平津一战，日军以五个旅团以上的兵力，经过几十个小时的作战，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大城市。之后，怎样切实可行地处理对华问题，成为日本军政高层必须立即面对的问题。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认为，若再派遣国内的师团，"就等于全面战争"了，而现在日本与中国南京政府之间，"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根本转变局势的可能性"。当然，一旦谈判不成，"只能是全面战争了"，那将是"非常长久的持久战"。目前，日本对中国能够使用的兵力，出于防范苏联因素的考虑，最多只能动用十一个师团，用这样少的兵力"解决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持久地打下去，"就不是单纯军方可以处理的问题"了。虽然日本军界强硬派，特别是关东军的军官们，主张一鼓作气地干下去，但最终日本内阁，乃至日本天皇，还是认同了石原莞尔的顾虑，希望战争只要能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就可以将战事暂时停下来。

出于这一目的，日方开始寻找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七月二十九日，当有记者询问"平津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对应方针"时，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已身临"最后关头"，因为"日军既蓄意侵略

中国，不惜用尽种种之手段”，“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战事之结局”。而中国对待日本问题的底线是“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所以，国民政府“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最后，蒋介石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是：“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唯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

什么叫“发动整个之计划”？

是否可以理解为“全面抗战”？

蒋介石“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的表态，令日本人试图以协定的方式让平津乃至华北像此时的东三省一样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再以傀儡“自治”的形式实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从而达成石原莞尔所认为的“通过外交谈判根本转变局势”的目的，成为泡影。

中国政府之强硬令日本内阁感到震惊。

此时，距卢沟桥事变爆发，不足一个月。

整整七年后，制造卢沟桥事变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已经升任日本侵缅部队第十五军司令官。在他自己提升上任的时候，日本战败的结局已经显露。心情黯淡的牟田口廉也这样回忆了往事：“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即一一八九年。

这座中国北方著名的古代石桥，横亘在永定河上已经数百年之久。这是一座工艺精美且建造坚固的古老石桥。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座石桥的最大价值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它激发了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血性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从中国传出了振聋发聩的战争动员令——蒋介石《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

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着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后必胜的把握。我常常说，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在此即刻就要与倭寇拼命抗战的时候，特意提出下面最重要五点，希望大家注意。

蒋介石提出的第一点："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他表示"战争的胜负，全在于精神"，我们不怕日本人，他们就会怕我们，而"怕人的一定失败，不怕人的一定胜利"。虽然中国军队的枪炮不如日本，但"只要我们抱定牺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去战斗冲杀，"倭寇必败无疑"。

蒋介石提出的第二点："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表示倭寇进入中国，到处"地形生疏"，到处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必会寸步难行，只能仗着飞机大炮想将中国吓退，以避免战争作战。所以，我们只要誓死拼命，顽强抵抗，"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以"持久死守"来消耗日军实力，就一定能"争得最后五分钟的胜利"。

蒋介石提出的第三点："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他表示一旦战争全面爆发，最高统帅部承担着国家战略战术的制订与颁布，但位于各地的部队将领也须"自动地详细研究"战局，以"助总部之所不及"。特别是命令未达时，面对突发情况应"临机应变"，"自动地运用智能"谋取战场的胜利。"这是上自军长、师长、旅长、团长，下至连长、排长都应该有的责任和本领"。

蒋介石提出的第四点："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他表示"任何战争得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来与强大的敌人拼命。特别是对于战区及附近的民众，"更须告以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如果军民能够"甘苦相共"，"敌人未有不打败仗的"。

蒋介石提出的第五点："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他表示"革命军的精神，就在于有进无退"。过去作战如此，现在对于倭寇作战更要如此，"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想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在日后的战争中，"倘使未得到统帅部的命令，擅自退却"，"无论任何官兵，一律以卖国罪处死毋赦"。虽然人都有一天要死的，但"总要

死得值得，死得光荣”。

最后，蒋介石告知全国的将士们：

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以后，民众受了苦痛，国家失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炎黄子孙，应该怎样的拼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及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来遗给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报答我们父母师长所给我们的深厚的教诲与养育，而不至于对不起我们后代子孙。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最后关头，到来了。

第二章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驻上海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决定去距上海不远的舟山群岛度过一个凉爽的周末。但是，当他搭乘名为“三北”号的中国小火轮，顺着黄浦江缓慢地驶向宽阔混浊的长江入海口时，立刻感到情况有点不大对头：这艘属于中国轮船公司的小火轮，除了中国船长和中国水手在忙来忙去外，还有一位据说也是船长的德国人穿着崭新的制服神气十足地站在甲板上。并且，这艘中国轮船竟然升起了一面德国纳粹卐字旗。

我们看到日军的驱逐舰三三两两地停在黄浦江中，而吴淞口防波堤外，也泊着六七艘军舰。当我们的小船从军舰旁驶过时，舰上的日本军官就用望远镜仔细地打量着我们。在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中，日本海军军官的举动，自然引起我们一次次的恐慌。

那位职责似乎仅仅是面向日本军舰微笑的德国船长告诉鲍威尔：这家中国轮船公司与一家德国公司签订了协议，把中国轮船全部转到德国公司的名下，理由是“中国人已经料到战火早晚会烧到扬子江流域”，“一旦交战，日本人不至于没收悬挂纳粹旗帜的船只”。

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国际化的都市。精明的上海人关于可能要打仗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刚刚传来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的消息，紧接着，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上海便发生了日军军官被打死的事件：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被中国士兵击毙于虹桥机场大门口。

所谓“虹桥事件”，流传着五花八门的版本。上海市民听闻的最普遍的说法是：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驾驶着一辆汽车至虹桥，要强行通过中国卫兵的警戒线进入机场，他们不但对中国卫兵的警告置之不理，还向中国卫兵开枪射击，导致一位名叫时景哲的中国军队二等兵中弹身亡。之后，中国卫兵开枪自卫，将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当场击毙。

是否有一名中国卫兵被打死，史料的记载存在着分歧。

史说，时任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他这样解释了

机场大门口为什么会有一具中国卫兵的尸体："这些（中国）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撞，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淞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让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把他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了，以便与日本人交涉。"事件发生的当日，上海市长俞鸿钧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去一封密电，电报对事件经过是这样叙述的：

今日下午五时左右，虹桥飞机场附近，有日军官二人，乘小汽车越入我警戒线，向飞机场方向直驶，不服制止命令，反向我守兵开枪。守兵初未还击，后该车转入牌坊路，该处保安队士兵闻枪声仰视，该日军官复开枪向之射击，保安队遂还击，一时枪声四起，该车前轮乃跌入沟内。车内一日军官下车向田内奔走，在附近因伤倒毙。另一军官伤毙车外。检查身内有明片两张，印有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字样。我士兵亦倒毙一名。

无论事件经过到底怎样，有一个前提是必须强调的：两个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冲直撞，企图冲击中国重要的机场设施，且无视中国卫兵的警告时被打死——且不说当前中日两军在中国北方已经进入交战状态，就是在和平时期，中国方面的处置也是正当的。

然而，中国人的正当处置，又一次成为日本人的"事端"。

日本人对在中国上海发动战争蓄谋已久。

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中国华东地区的门户。一旦占领上海，不但能控制华东，还可以进逼南京，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日本人十分清楚。因此，"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利用《上海停战协定》中对中国军队驻军上海加以限制的条款，一直在做着战争准备。一九三六年八月，日军参谋本部在拟定一九三七年《对华作战计划》时，已针对中国华东地区制订出详细的作战计划，这一最终目标指向中国首都南京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三个师团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以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形成"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只是，出于对苏联介入远东权益的高度警惕，日本担心一旦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其主力部队如果已置于中国南方便无法迅速向北集结，因此仅在淞沪地区投入了少量的海军。

"一·二八"淞沪停战后，在上海，日军建立了以北面虹口军营为基地

的核心设施，以东面杨树浦、西面沪西为支撑的外围据点。经过多年的经营，上海市区内的日本租界，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坚固的军事堡垒，里面的机关、学校、商店和住宅内部，都构筑了各式的军事掩体，并隐藏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至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在上海地区拥有百余处军事设施，部署了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兵力，计有步兵一个大队、海军特别陆战队以及拥有三十多艘军舰的第三舰队，海军的航空队也有百余架飞机可随时准备支援作战。

在上海方向，日本海军已是作战心切。

日本海军与日本陆军在对华战略上存在着分歧。陆军方面出于对苏联的戒备，于战争初期向中国南方用兵时十分保守；海军方面则坚持认为，日苏之间暂时不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日本军力的投入方向完全可以向南，从南中国一直延伸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由此，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海军立即准备出动以支援陆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同时还迅速提出了向中国南方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在求战心切的日军海军将领中，以驻扎上海地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最为踊跃。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正率队在台湾与陆军进行联合演习，事变的次日，第三舰队便停止演习返回了吴淞口外，长谷川清向东京日本海军军令部（司令部）提出："华中作战，应以必要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占南京"，所以，需再向中国华中地区增派五个陆军师团。

按照日军的一贯伎俩，发动战争要事先制造"事件"，所以近两年来中日两军在上海摩擦不断。一九三六年九月，日本海军以"出云"号战舰三名水兵在租界内遭到狙击为借口，出动海军陆战队在全上海市布设岗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海军在上海地区连续举行军事演习，派遣舰队频繁出入上海附近的各港口，并登陆进行军事勘察。根据一九三二年中日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方面不能在上海驻有正规部队，于是成立了"保安部队"，名为"保安"，实际上仍由正规部队的官兵组成。中国官兵对日军的愤恨积压甚久，只要遇有机会就会立即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的"保安部队"立即做好了战争准备，军官们把家眷全部送回原籍，部队开始加紧军事训练，并大量准备构筑街垒的原材料。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来到中国"保安部队"的驻防地，说是需要"查门牌"，中国士兵发现来人可疑，将其扣押询问，并让来人把鞋脱下来——依照中国士兵的经验，日本人的大脚趾是叉开的——来人这才承认，他们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小队长和一名士兵曹长。从这两人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军事据点以及武器和兵力情况。中国士兵把这两名日军痛打了一顿。经过日方的反复交涉，这两名日军

才被释放。但是，没过两天，上海香山路上又发生了类似事情，这次愤怒的中国士兵把捉到的日本军官捆在电线杆上打了个半死，其结果导致中日双方连续数日的激烈交涉。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训令侨居扬子江沿岸二万九千二百三十名日侨撤离（指示在上海的侨民于八月六日撤到日租界）。在海军第十一陆战队掩护下，到八月九日完全撤到了上海”——应该特别注意日本政府所规定的撤侨完毕的日期：八月九日。就是这一天，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

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发生的事都不是绝对偶然的。

至少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日军在浙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早与晚的问题。于是，自一九三三年起，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派人勘察地形，部署在宁、沪、杭地区修建国防工事，并组织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实施战术演习用以研究和拟定设防计划。为防止日军从杭州湾和吴淞口南北两面登陆继而向南京推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秘密机构，专职负责宁、沪、杭三地国防工事的设计和构筑，并划分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作战防御区，在四条主要防御线上修筑以钢筋水泥为主体的防御工事：京沪防御区以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为主阵地；沪杭防御区以乍嘉线（乍浦经嘉兴至苏州）和海嘉线（海盐经嘉兴至吴江）为主阵地。为了便于部队机动，还特别修筑了苏州至嘉兴的铁路。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政府在苏州成立了一个秘密作战指挥机构，对外称“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后又改称为“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军事长官为张治中，其任务是：负责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主持防御线上国防工事的修筑，一旦淞沪发生战争迅速转变为前线指挥所。最后这点甚为重要。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一八九〇年十月生于一个世代耕田的贫苦家庭。先后毕业于武昌陆军军官第二期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四年进入黄埔军校担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既是蒋介石重用的将领，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的挚友，这决定了他的政治生涯复杂而曲折。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中，他主动请缨，以左翼军指挥官的身份，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多日，战局失利后退守常熟，大有壮志未酬的遗憾。被任命为京沪防御区的军事长官后，因为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亟待操办之防御准备又千头万绪，张治中心情始终沉重而焦急。包括日本军方在内，没有人知道以他为首的“中央军官学校野营

办事处”是什么机构，而他已派出一批批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这批人回来之后，完成了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和锡澄线一带的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令张治中十分不安的是，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各地的军政要员们“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随着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在淞沪地区的挑衅日益频繁，张治中开始秘密地扩充上海“保安团”的力量，同时命令他所能指挥的第三十六师由无锡推进到苏州附近，第八十七师由江阴推进到常熟福山一带，第八十八师由南京附近推进到无锡和江阴一线。张治中不断地向南京陈请必须增兵，因为此时上海只有一个“保安团”，淞沪地区只有三个作战师，而按照他所制订的攻防计划，至少还需增加三至四个作战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为给蒋介石“救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他部署在上海周边的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都抽调走了。那是张治中最为担忧的一段时日：万一日军趁西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上海方面的日军，却反而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西安事变完全出乎日方意料的缘故。卢沟桥事变后，张治中接任京沪警备司令官。为了预防万一，他命令补充第二旅的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入驻松江；另一个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和龙华两个机场——打死日军上尉大山勇夫的中国“保安”，实际上正是张治中部署在机场的正规军士兵。

张治中强烈主张对于日本应该“先发制敌”：

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取第三种。

张治中向南京郑重建议，基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而上海又是“系国际视听”的要地，因此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即“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

“先发制敌”，意味着主动发起作战行为——在与日本侵略者对抗的往事中，中国方面什么时候“先发制敌”过？除了“他打我，我不还手”以及“他打我，我才还手”之外，中国什么时候曾有过“判断他要打我”之时，抢先出手，把对方打得晕头转向的先例？

在南京军政高层内部，还有一些与张治中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包括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姚琮等。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绝不能让日军把上海作为侵入华中的军事基地，必须主动歼灭上海的日军及其长江内河里的日军舰艇，开辟华东战场。他们的理由是：日军装备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战车、航空母舰等先进武器，军队训练有素，崇尚武士道精神，百年以来几乎每战必胜，如今仍处于战斗力旺盛时期。如果中国军队把主力投入华北大平原与之决战，势必会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因为在大平原上日军可以充分利用其机械化优势，又有京汉、津浦铁路可以利用，从南到北长驱直入，一旦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东南沿海，战争就基本上结局已定了，日军很可能就此实现三四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而如果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节节抵抗的同时，在华东地区开辟对日作战的“第二战场”，就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目前，淞沪是开辟“第二战场”的理想之地。因为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日军肯定要发动作战。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淞沪爆发战事，各国列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列强们不可能坐视日本独霸中国权益，于是很有可能介入战争，列强的介入是有利于中国方面的。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群与日军进行巷战，牵制住敌人，随后把日军逐渐引向江南的水网地带，使其机械化武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会把日军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最终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这是最后战胜日本的正确途径。当然，还有一种战场地理上的解释：从中国的地势特征上看，自东面沿海向西，地势逐渐抬升，是逆河流流向而上的，这对进攻一方不利；而中国的抗战后方基地在西南，即使边打边撤，也是背对着后方作战，且越退地势越高，这种态势对作战的防御一方有利。

以上见解，确是远见卓识。

首先，这不是妥协论调，更不是投降论，是出于坚决抗战的立场。仅就这一立场而言，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弥足珍贵。其次，就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和两国国情上讲，试图拉长战线并准备长期作战，无疑是一种冷静清醒的抉择。

但是，在淞沪主动开辟“第二战场”，需要冒的巨大风险也是显而易见：这里是中国柔软的腹部，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爆发战争，经济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损失。而且，这里距离首都南京太近，在国家都城附近发生战争，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谁能知道列强在中日开战后是否会出面干涉？如果干涉是否能干涉到令日

本停止对华侵略的程度？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从来没有依靠列强摆脱任何苦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就是赌博。

明知战争不可避免却又求战心切的张治中，对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布了一篇文告，在历数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国耻后，他号召将士们在即将到来的抗战中为国捐躯：

……时至今日，敌我间之诸般问题，已非和平所能解决，在我尤非抗战无以图国家民族之生存。全面应战之烽火高燃，舍身报国之良机已至！凡我袍泽，当必奋兴，雪恨歼仇，此其时日！……虽然，我袍泽当知此伟大的神圣民族抗战之必然胜利，实由无量惨痛、无量牺牲所换来，盖惟有牺牲到底之决心，方能博取最后之胜利。故吾人之生命在此日实无其他生命意义之可言，仅属民族解放之祭礼而已，仅属无量牺牲无量热血牺牲中之一粟而已。唯具献身为国之决心，方能成就千秋盛业；亦唯具“我死国生”之至勇，方能所向无前！血幕展开而后，我中国每一块土地，均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人人将成英雄烈士，人人可成志士仁人！吾人分属前驱，岂期后死？……

日本方面显然察觉了淞沪局势的不妙。他们从上海租界英国巡捕房军事探长潘连璧和于一星那里，获悉了中国方面正在加紧构筑市中心军事据点和扩充上海“保安团”兵力的情报。日本驻华海军武官冲野亦男以中方违反“停战协定”为由，向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提出抗议，并要求现场查看，被中方拒绝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的答复是：不但所谓“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中没有限制中国方面建筑防御工事的字眼儿，而且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建造任何工事别国根本无权过问。日方据此说中国的做法是“敌对行为”没有道理。相反，倒是日方没有按照“停战协定”所约定的条款从规定地区撤出军事力量，这才是敌对行为的明确表现。

令日方感到更加不妙的是，“虹桥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的态度十分强硬。八月十一日下午四时，俞鸿钧市长会见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冈本季正首先表示：“虹桥机场案”发，日方“着海军制服之军官及水兵为华人惨杀”，这是“对皇军的重大侮辱”，已经导致日本“全国激愤”。因此，日方要求中国方面立即拆除军事工事，撤退保安队。俞鸿钧当即表态：“该处系我国国土，无所谓撤退。”冈本季正又主张召开由

中、英、法、德、意、日各国委员组成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紧急会议，请求各国制裁中国。俞鸿钧更是寸土不让：“（一）停战协定早为日方破坏。因日方军队时常侵入八字桥一带区域，该处地段按照协定日方军队应悉数撤退。（二）日方既破坏停战协定，则根本无依据该协定作任何提议之权。（三）日方每利用共同委员会为实施该国侵略政策之工具，于己有利时提及之，于己不利时漠视之，应请各国注意。（四）日方对于虹桥事件，一方同意以外交方式解决，一方军舰云集、军队增加、军用品大量补充，此种举动影响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且已对我国构成威胁与危害。”——俞鸿钧很清楚：谈判是日方一贯的拖延时间等待增兵的手段，一旦日方准备好了，不仅是对所谓“共同委员会”漠视的问题，而是要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以一名中尉和一名上等兵的性命换来的机会，“失不再来”。焦灼万分的日本海军表示，决不能“让死者为无意义之牺牲。”

“虹桥事件”发生的当晚，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便命令在国内待命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一、第二特别陆战队做好出动准备。十一日上午，第三舰队所辖十九艘军舰抵达吴淞口，载来海军陆战队队员两千名。十二日，日军在淞沪地区的军舰猛增到三十一艘，同时还有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在内的九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激增到九千人以上。

日本海军知道，一旦战争打响，必须得到陆军的协同。十日，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动员派遣陆军部队”的要求。陆军大臣杉山元即刻表示同意。第二天，日军参谋本部制订了派兵方案：“（一）上海方面派遣部队是以第十一师团（缺一部）和第三师团为基干编成一个军，八月十五日为动员第一日；（二）青岛方面派遣部队，预定是第十一师团的一部和第十四师团，其派遣时间伺机而定；（三）运送：继续挪用现在担任运送第二次动员部队的船只（预定十六日完成）；（四）动员规模：兵员约三十万，马匹约八万七千。”

国民政府也启动了全面的抗战准备：将一切国防事宜由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将全国军队编为抗战序列，第一线约一百个师，预备部队约八十个师；将国家多年存储的弹药进行分配，黄河以北及长江地区囤三分之二，江南囤三分之一，可供所有部队六个月作战之需，同时确定海外输入路线以保证枪支弹药“源源接济”；购办一百万作战人员、十万马匹六个月所需粮秣；建立三十个兵员补充营；因平津沦陷，河北境内再无飞行场及航空油料储备地，决定参加华北作战的空军部队以太原机

场为根据地。等等。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策略。这是一次绝密的会议，参加者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及各位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工作人员只有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担任会议记录）。会议决定对日军实行“先机下手”的策略，趁日军陆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际，率先歼灭日本海军在上海地区的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以阻止日军军舰溯江而上攻击南京，截获停留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据此，军事委员会当晚发出命令：张治中司令官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于今夜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实施围攻作战；位于蚌埠的第五十六师、位于嘉兴的炮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和装备有新式榴弹炮的十团的一个营立即开赴苏州，一并归张治中指挥。

接到命令的张治中下令：第八十七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则向上海市中心前进；第八十八师进至北站与江湾（吴淞以南）之间；炮兵十团营和炮兵八团进至真茹、大场（江湾西南）；独立第二十旅进至南翔（大场西南）。同时命令炮兵三团二营和第五十六师星夜兼程向上海前进。

十一日夜半，张治中离开苏州，率部向上海全速推进，于天亮前占领了上海市区的预定阵地。

十二日，天亮了，上海市民清早从梦中醒来，看见窗外遍地都是中国军人，惊讶地问从哪里来？怎么来得这么快？自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上海市民就没有见过中国正规的陆军部队，这支军队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十分惊喜：

头戴德式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短裤，脚穿草鞋，官兵都系皮腰带，士兵手持带刺刀的新式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胸前八颗手榴弹，军官腰挎盒子枪，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眼神中向同胞们流露出杀敌的决心。

中国海军也奉命开始了军事行动。

十一日，三艘测量船在两艘炮艇的掩护下，对江阴下游长江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先后把西周、浒浦口、铁黄沙、西港道、狼山下、姚

港嘴、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刘海沙、长福沙、海北港沙、龙潭港、福姜山等地的各种航标一律拆除了。行动中，两艘测量船遭到日舰攻击和日机轰炸，沉没。十二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主力舰队前往江阴，将中国海军“通济”号、“大同”号、“自强”号、“德胜”号、“威胜”号、“武胜”号、“辰字”号、“宿字”号八艘舰艇，连同从民间征集的各种货轮商船，共计二十八艘，全部凿沉于江阴江面，用以堵塞长江航道。——中国海军老旧的军舰如果用于作战，不是日本海军现代化战舰的对手，大战来临前，或许这是这些军舰最实用的用途。但百姓衣食所寄的民船何辜？——在此开列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淞沪大战前夕，为了民族图存而自毁的商船之名号：“嘉禾”“新铭”“同华”“遇顺”“广利”“泰顺”“回安”“通利”“宁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醒狮”“母佑”“华富”“大赉”“通和”“瑞康”“华新”。

但是，此次行动没有实现截获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的目标——蒋介石的命令尚未传达到部队，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已纷纷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迅速通过了江阴要塞。后经查明，参加最高国防绝密会议的唯一工作人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是一个日本间谍。

被黄浚出卖的中国国防会议绝密内容不仅是封锁江阴水道，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准备在淞沪“先机下手”的战略意图以及作战计划。此时的日方对中国军队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

十二日，中国在淞沪地区的作战部队奉命进入攻击出发位置。——此时，为了适应战时体制，京沪警备司令部已撤销，所属部队被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司令长官张治中。张治中打电报给蒋介石求战：“本军各部队在本日黄昏前可输送展开完毕，可否于明日（即十三日）拂晓前开始攻击？我空军明晨能否同时行动？”

中国军队即将面对的是由司令官长谷川清指挥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其所属部队为：第十战队，司令官下村正助少将，作战舰是“天龙”号等两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少将，作战舰是“八重山”号等一艘驱逐舰、一艘敷设舰和七艘炮艇，多为适于中国长江作战的浅水舰艇；第五水雷战队，司令官大熊正吉少将，作战舰是“夕张”号等一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第八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少将，作战舰是“比良”号等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第一水雷战队，司令官吉田庸光少将，作战舰是“川内”号等一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辖五个大队，每个大队

约五百四十人，编有步兵中队和工兵、通信、机枪小队，配备小型坦克、轻型装甲车、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重武器。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指挥的海军航空兵所属部队为：第一联合航空队，辖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有式陆基攻击机二十架，鹿屋航空队有式陆基攻击机十八架和式舰载战斗机十四架；第一航空战队，共有战斗机二十一架、轰炸机十二架和攻击机九架；第二航空战队，共有战斗机十二架、轰炸机十二架和攻击机十八架。

中国方面参战的是张治中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其主要组成部队是：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辖第二五九旅，旅长沈发藻，第二六一旅，旅长刘安祺；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辖第二六二旅，旅长彭巩英，第旅，旅长黄梅兴；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兼第三十九军军长）；独立第二旅，旅长钟松；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旅；上海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简；上海警察总队，警察局长蔡劲军；炮兵三团、八团、十团。

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是一九三六年由德国顾问训练的教导第一、第二师改编而成。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直属分队有骑兵连、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卫生队和特务连等。全师共一万零九百二十三人，步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火炮和迫击炮四十六门、掷弹筒二百四十三具。其中第八十八师还配属有一个战车防御炮兵连。第五十六师，系北伐战争时由皖军马祥斌部和闽军吴新田部改编，卢沟桥事变后自福建开至上海，全师下辖三个旅，共计八千一百七十人，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

以上位于淞沪地区的中国陆军总兵力约五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后下令，将苏浙边区公署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张发奎，下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五十五、第五十七师和独立第四十五旅、炮兵第二旅（欠三团）。划定的作战区域为：以自西向东流入黄浦江的苏州河一线为界，北为第九集团军，南为第八集团军。

一九三七年的中国海军装备老旧，与日本海军的实力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制胜的可能。在淞沪地区参战的，基本属于海军部指挥的第一、第二舰队以及练习舰队和测量船队，这两支舰队中的一些老船，还是清朝水师遗留下来的，已经被沉入长江航道当障碍物使用了，真正能够与日本海军交战的舰艇，只有“平海”号、“宁海”号、“应瑞”号和“逸仙”号四

艘巡洋舰，而这四艘主力舰的总吨位不足一万吨，还不如日本海军“出云”号一艘装甲巡洋舰的吨位量。

一九三七年的中国空军正属于发轫时期，飞机数量和质量与日本空军相距很大。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二十五个主力中队奉命北上华北，迟滞日军南下。待淞沪战事将起时，以南京、广德为基地，以曹娥、杭州、嘉兴、扬州、苏州、长兴为主要机场，淞沪地区可以参战的空军只有四个大队，战机百余架。

大战即将爆发时，从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的军力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上远落后于日军——海军基本上没有对抗的可能，空军只能说是略占优势，因为日军暂时能够投入的战机有限，且中国空军由于距离基地较近补给便捷。在中国军队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只有地面部队的兵力总数。

“一举把日本海军陆战队扫荡出上海。”这是淞沪地区中国军队官兵们的决心。

蒋介石致电第九集团军司令长官张治中：

张司令官文白兄：对倭寇兵营与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物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成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生（十五厘米）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中正手启。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午，日军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突然越界强占了八字桥，袭击了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的步哨，两军随即发生了小规模的步哨战。八字桥枪炮声一起，日方立即说：“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突然向陆战队阵地进行射击”；而中方说：“日陆战队今晨违背诺言，轻启衅端，向我北区守军攻击。”

这一天张治中心绪烦乱，因为他昨夜收到蒋介石的密电：“希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攻击发动前夕，蒋介石突然命令避免冲突，原因是列强们组成的“上海外交团”建议中国政府把上海设为“不设防城市”。这一

建议，让“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突然命令”张治中先不要进攻。十三日上午日军向八字桥发动的袭击，令张治中心情更加恶劣：先下手的反而是日军了。

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以抗议书的形式向日方提出了严重抗议：“贵方陆战队于本晨九时十五分，在北区地带急向本市区内警戒线内冲入，攻击我守军，当经我守军沉着抵抗后，因我方不欲事态扩大，除将贵方挑衅部队驱回外，并未追击，纠纷旋即停止。本市长认为贵方陆战队此举足以危害和平，妨碍治安，相应提出抗议，请烦查照，转之贵国海军当局尊重承诺，严切制止为荷。”

史称淞沪抗战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八月十三日并未开战，只是中日两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无论如何，这是中日两军在淞沪地区正规部队的正式接战。史称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自此爆发。

只是，中日双方都没有料到，两军在中国淞沪地区的正式作战，竟然从空战开始。

按照日方拟定的作战方案，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任务，是在开战第一天对中国空军进行大规模急袭，力争取得先发制人的效果。十三日午夜，长谷川清对他指挥的海军航空兵下达了十四日清晨倾巢而出的作战命令：第二航空队空袭南京、广德、杭州机场；第一联合航空队的鹿屋航空队空袭南昌机场；第八、第十战队和第一水雷战队空袭上海虹桥机场；第一航空队以及木更津航空队作为预备队待命。

十四日黎明时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面上移动着一股巨大的低压气流，天空风雨交加，风速达到每秒二十二米。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凌晨五时三十分，长谷川清下令：等待天气好转后升空作战。

尽管日方已经得知，中国空军将大部分作战飞机紧急调向了东南沿海地区，至少在淞沪这一局部空域里，中日两军的空军力量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但日军还是没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空军机型老旧，数量有限，舍不得拿出来血拼；且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作战经验不足，没有胆量与日军真枪实弹地作战，只要用急袭的手段把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击毁在东南沿海几个机场的停机库里或者跑道上，中国空军就基本上等于被消灭了。

但是，这一次日本人错了。

十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小规模的冲突发，下午二时，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下达了第一号空军作战命令，要求部队在十四日黄昏前做好出动的一切准备。其出发机场的分配是：第九大队在曹娥机场；第四大队在笕桥机场；第二大队在广德和长兴机场；暂编大队在嘉兴机场；第五大队在扬州机场；第六大队的五队在苏州机场，四队在淮阴机场；第七大队、第十六大队在滁县机场；第八大队和第三大队八队在南京机场；第三大队十七队在句容机场。由于得知日军军舰大量麇集吴淞口，并且已经开始炮击上海市区，加之十四日中国军队的地面部队将有大动作，十四日凌晨二时，周至柔又发布了第二号作战命令：

（一）毁灭公大纱厂敌之飞机及破坏其机场。

（二）轰炸向我射击及游弋海面之敌舰。

（三）第二大队由航校霍机（霍克战斗机）掩护，以一队轰炸公大纱厂附近敌构筑之机场及飞机，以两队轰炸吴淞口向我市府射击之敌舰；吴淞口若未发现敌舰，应向集结崇明附近之敌舰轰炸之。

（四）航校霍机六架，应掩护第二大队之轰炸。

（五）第二大队及霍克队，以九时四十分到达目标为准。

（六）第五大队（欠二十八队）先集中扬州，携带五百磅炸弹于本日（十四日）午前七时准备完毕，向长江口外敌舰轰炸之，以午前九时到达目标为准。

（七）第三大队自本日（十四日）晨起，采紧急警戒姿态，担任首都之防空。

（八）第六大队仍不断侦查海面，特须侦查敌航空母舰之行踪……如发现敌航空母舰时，则加马力飞回，迅速报告。

（九）本日（十四日）出动之空军，以达成轰炸任务为第一目的，切忌与敌在空中作战……

（十）各驱逐机在离地之前，遇敌机来袭时，应在地面拉脱炸弹，立即起飞应战，以掩护友机之起飞。

（十一）十四日开始轰炸后，应迅速准备连续轰炸，至敌舰毁灭为止……

十四日晨七时，杭州笕桥机场，中国空军第三十五独立队的五架寇蒂斯BT-32型轰炸机起飞了——风急雨猛，云高三百米，在恶劣气象条件下，日军在等待天气好转，中国空军却果决地升空了——五架轰炸机成楔形队形，以一千五百米的高度，冒着日军密集的地面高射炮火，直扑公大纱厂的日军阵地和军械库，命中目标后全部安全返航，部分飞机机身上弹孔密布。

八时四十分，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二十一架诺斯罗普-E轻型轰炸机，携带十四枚二百五十公斤炸弹、七十枚五十公斤炸弹自广德机场起飞，兵分两路轰炸日军的公大机场、汇山码头以及吴淞口海面上的日军军舰。轰炸机场和码头的飞机在八百米投弹，全部命中目标。轰炸吴淞口日军军舰的轰炸机，由于能见度很差，投弹后效果不详，但是被轰炸的日舰已经开始向长江入海口逃窜。返航时，二十一架轰炸机有六架因天气恶劣迫降其他机场，两个小时后全部归队。

九时二十分，第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驾驶霍克式驱逐机，携带五百磅炸弹一枚，自扬州机场起飞，沿着长江寻找日舰，在南通附近江面发现日军驱逐舰一艘，俯冲投弹后，日舰舰尾中弹，随即沉没。

长谷川清没有想到中国空军能够不顾恶劣气象条件抢先下手了。当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受到攻击时，他决定不顾天气是否转好命令航空兵立即出击。

午后，在新一轮的轰炸中，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大队以及三十五队的飞机，先后轰炸了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日军基地公大机场、汇山码头等地。日军显然加强了防空火力，第五大队被击落一架驱逐机，击伤两架；第二大队的轰炸机被击伤两架。

中国空军在黄浦江上空冒着日军高射炮的弹幕，毫不畏缩奋勇轰炸日军地面目标和军舰的作战，让上海市民进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中，他们纷纷跑向外滩，登上各个大厦的楼顶观战，欢呼雀跃之声响彻整个城市。

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大规模轰炸中伤亡惨重，因此不断呼叫空军请求援助。但是，第三舰队的空战飞机多是舰载飞机，由于风浪太大，舰载

飞机无法在军舰上安全起降。长谷川清只好命令驻守台北的鹿屋航空队升空，拦截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摧毁上海周边中国空军的主要机场。

笕桥机场是中国航空学校所在地，也是中国空军在淞沪作战的主要基地，于是成为日军鹿屋航空队发动袭击的首选目标。

杭州上空，狂风暴雨。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原定用于华北作战，已于八月四日飞抵周家口机场，但十三日那天接到命令：全队向杭州笕桥机场转场。十四日，大雨滂沱中，全队三十二架飞机有的无法起飞，有的因为跑道过于泥泞而发生事故，仅有二十七架战机安全飞抵笕桥。刚刚着陆，敌机靠近机场的战斗警报就响了。大队长高志航命令全队紧急加油。没等全部飞机加油完毕，鹿屋航空队的九架飞机已经进入杭州空域。这些日式双翼轰炸机在风雨中努力保持着队形，摇摇晃晃地终于从雨云的缝隙中发现了笕桥机场。突然，他们看见中国空军的飞机迎面而来。首先紧急起飞的是大队长高志航和二十一队分队长谭文，两人当即将一架日军飞机击落。日机发觉中国空军在此有备，迅速拉升进入云层躲避，但第四大队升空的飞机已经追击而来。二十二队队长郑少愚在曹娥江上空追上了一架日机并将其击落，二十一队队长李桂丹和队员柳哲生、王文弹也合力击落一架日机。

空军初战的结果，令日本人大感意外。

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义因羞愧难当剖腹自杀。

激烈的空战发生在一座人口稠密的繁华城市上空，对于这座城市的市民而言无疑是一场悲剧。大量的航空炸弹直接落在了上海城区内——有的是日军飞机投掷的以及军舰上的舰炮发射的，有的是中国轰炸机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时投掷误差造成的。被驻上海的外国通讯社称之为“黑色星期六”的这一天，两颗重磅炸弹落在了距外滩不远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相邻的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相交的大街上，那里有一个由上海著名的娱乐公司大世界设立的救济站，五千多难民每日到那里领取救济粥。炸弹爆炸的那一刻死伤无数：“第一枚炸弹在马路的沥青路面上爆炸；而第二枚炸弹，显然是在离地面数英尺的空中爆炸的。由于弹片的散落，人员死伤特别多。数十辆汽车挤成一团，车内的人们不是被碎弹片击伤，就是因车子油箱爆炸燃烧而活活烧死。至于街上的数百名行人，则被炸得尸肉横飞，四分五裂。最惨不忍睹的

场面是在大世界游乐场前面的广场上，数千难民当时正簇拥在施粥站前。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大部分人的衣服都被烧光。后来，尸体都被堆在这幢建筑物的旁边，其高度惊人有五英尺。”接着，又有五颗航空炸弹落在了繁华的南京路上，在两家上海最著名的饭店——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的大门口爆炸，当时的南京路上挤满了欲去租界里避难的难民，即刻又有数百人死伤。那一天，驻上海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记述是：“生平第一次看见人血汩汩流入下水道的惨象。”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正在上海访问，她目睹了“毫无防卫能力的平民百姓，惨遭杀戮和毁灭”的惨状，立即给中日双方的领导人发出电报，呼吁停止轰炸公共租界。在发给日本内阁首相的电报中罗斯福夫人说：

我今天致电蒋介石夫人，希望在上海租界的无辜平民的生命得到保障前，暂停轰炸上海。由于数量过多的日本陆海军部队出现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边界内外，使得中国方面认为他们必须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加以防卫。我请求阁下设法使上海中立化，并使非战斗人员获得安全。鉴于贵国皇室过去对我的友谊，故致电向你请求。

罗斯福夫人的电报，令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驶离了它之前的停泊地点，即避开了“上海市区的正面”。只是，“出云”号的驶离，令中国空军的轰炸“从上海市区的边缘向外延伸”，日本海军也用舰载重炮“越过上海市区”轰击中国军队，这就使得上海郊区的百姓又死伤无数。

作为淞沪战场最高指挥官，张治中目睹了上海市民的遭遇，他特别发表声明告诉百姓：“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必以“当年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卫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同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示抵抗侵略的决心不可动摇，因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遭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

十四日下午，张治中下达了总攻命令。

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中国军队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向日本海军陆战队阵地发起了攻击。——与空战相反，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当地面进攻开始后，即刻遭遇了重大伤亡。

第八十八师是最早进入淞沪地区的部队。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后，这个师就已派出部分官兵化装成保安队分批潜入上海市区，并对市区内的战场进行了详细侦查。师主力于十一日夜乘火车急运上海后，师长孙元良命令部队抢占火车北站、宝山路、八字桥和江湾路一线，沿着上海至吴淞口的铁路线，建立起自南向北延伸的轴心阵地。第八十八师官兵面对的日军阵地，是以汇山码头为起点、以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终点，沿着吴淞路、北四川路直至虹口公园的一条背靠黄浦江的线形防御阵地。按照预定作战计划，第八十八师需集中兵力在第一时间击毁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攻击开始后，原来据守前沿的第二六二旅以火车北站为中心在右翼牵制日军，黄梅兴旅长指挥的第旅为主攻部队从左翼突进直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自知兵力不足的日军节节抵制，尽量拖延时间以待援军。两军面对面相搏，作战技能和武器装备的差距立即显现。日军作战意志顽固，单兵武器精良，加上“一·二八”事变后的多年经营，各个据点都有高大的围墙以及密集的明碉暗堡。这些明碉暗堡多为钢筋水泥建筑，十分坚固，经得起五百磅以上炸弹的轰击。特别是在虹桥与吴淞之间的江湾路一线，日军建筑以厚钢板为主体的防御工事，火力配备十分密集。攻击开始的时候，第八十八师德国军事顾问决定，按照德军的作战样式，在突击正面组织一支五百人的突击队，对日军阵地实施“闪电战”。突击队的行动被取名为“铁拳计划”。这个旨在先行捣毁日军指挥部的突击计划，策划得近乎完美：选择日军阵地的薄弱点，五百精壮士兵配备轻便的自动武器，由一个炮兵营专门为其炮火开路支援，以便形成一个拳头猛插狠攻进去。但是，尽管带队营长刘宏深身先士卒，士兵们勇猛冲击，却还是几乎每前进一米的距离都要用战死士兵的尸体铺路，日军凶猛的火力令中国军队在正面攻击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最终，“铁拳计划”没有成功。营长刘宏深，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阵亡时年仅二十八岁，新婚不足百天。中国左右两翼的攻击部队，在炮兵支援不利的情况下拼死向前。随着中国官兵的决死推进，其攻击前锋已至距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远的地方，日军终于在抵抗线上显出了退却的迹象，一些日军士兵开始向租界方向逃跑。但是，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击中了第旅的前敌指挥所，旅长黄梅兴、旅参谋主任邓洸以及通讯排三十多名官兵当场全部阵亡。黄梅兴，广东平远人，出

身贫苦，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时，身为第旅五二八团团长的他，奉命率部增援与日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在著名的庙行战役中，五二八团不但扼制了日军深入的企图，且以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火力逐步迫使日军后退。因战功卓著，战后他升任第旅旅长，晋级为陆军少将。黄梅兴旅长的阵亡和前敌指挥所的被毁，令中国军队最前沿的攻击部队失去了指挥，攻击不得不停止。

此战没有达成攻占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目的。

攻击停止后，经过清查，在数小时的攻击中，担任主攻的第旅，包括旅长在内伤亡千人，其中五二七团就有七名连长阵亡。

十四日晚上，张治中突然接到蒋介石电令：“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

无法得知蒋介石为什么命令停止攻击。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一天的战斗让中国军事统帅部意识到，之前对中日两军在综合战力上的衡量与预计存在着严重失误。——至少在淞沪会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兵力是日军的十倍，这个“十比一”的战场兵力对比比例，在今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战争中，对中国方面的战役决策与部署影响甚深。

十四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会上讨论了一系列急需明确的问题：局势发展到今日是否已不再是不扩大但也还不是全面战争？战争的目的何在？是否应该把“华北事变”改称为“日华事变”？继而有必要对中国宣战？最后的结论是：“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对策”；向第三、第十一、第十四师团等下达紧急动员令。

十五日，中国军队没有发动全线攻击。为了迫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了给再次开始的总攻击做准备，中国军队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组织了突击队向日军阵地实施渗透，并多次突破日军的防线，占领了五洲公墓、爱国女校以及粤东中学等日军据点。第八十七师突击队甚至一度攻入日军海军俱乐部，将陆战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贵志金吾击毙。同时，中国海军电雷学校的两艘鱼雷快艇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实施了一次鱼雷攻击，但是没有成功。

鉴于十四日海军航空兵在作战中的惨败，十五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作战飞机几乎倾巢而出对中国空军实施报复性攻击。早晨七时三十

分，鹿屋航空队的十四架攻击机从台北机场起飞，前往攻击南昌机场；九时十分，木更津航空队的二十架攻击机从大村机场起飞，袭击南京机场；与此同时，十六架式舰载轰炸机、十三架式舰载攻击机和十六架式舰载攻击机，从吴淞口外的日军“加贺”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前往攻击绍兴、笕桥、嘉兴等机场。也是从早晨七时起，中国空军的第五、第二、第六和第七大队相继带弹升空，对日军军舰、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以及日军虹口军营进行轰炸和袭击。驻扎杭州笕桥机场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警报声中登机起飞，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迎击从“加贺”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机机群。中国空军飞行员凭借胆量和仇恨，冲入敌机机群展开如同陆地上拼刺刀般的格斗，先后有五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和击伤。木更津航空队在南京上空也遭遇中国空军的拦截和追击，飞机被击落四架，击伤六架。十五日中日空战的最后统计是：日军损失飞机二十架，中国空军仅损失九架。如果说这一天中国空军有损失的话，主要不是来自空战，而是自己造成的混乱：第九大队从河南许昌机场向浙江曹娥机场转场时，有九架飞机因找不到目标试图在杭州机场降落，因被中国的地面部队误认为是日本飞机而遭到炮火射击，降落时又与机场上停着的飞机相撞，结果这些飞机尚未参战便损失惨重，而它们都是国民政府刚从美国购置的崭新的雪腊克超低空攻击机。

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批准了参谋本部下达的“临参命第七十三号”，即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的命令：

命令

一、上海派遣军派到上海。

二、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力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保护帝国臣民。

三、动员管理官应各使其动员部队到达国内乘船港口。

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应将临时航空兵团中之独立飞行第六中队派往上海附近，编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隶下。

五、上海派遣军编制内之部队，自国内港湾出发时开始，即解除各该动员管理官之指挥，编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隶下。但独立飞行第六中队，自到达上海附近时起，编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隶下。

十五日，蒋介石急电张治中：“第三十六师或钟松旅，加入第八十七

师方面，预定明天拂晓全线总攻击，一举歼灭敌军，占领虹口为要。”为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十六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轰炸日军据点，在江苏句容机场上空，两架日军战机被击落。十七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的八架霍克式驱逐机轮番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俯冲扫射并投掷炸弹。空战中，中国空军年轻的飞行员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畏。隶属于第五大队二十五队的飞行员阎海文驾驶的第号战机在俯冲时被地面炮火击中，阎海文被迫跳伞，落在了日军阵地附近。十几名日军端着枪向他跑来，边跑边喊着“支那飞行士投降”，阎海文拔出手枪还击，当场击毙数名日军，然后从容地举枪自杀。阎海文，辽宁北镇人，“九一八”事变后毅然从军，毕业于中央航校第六期，卢沟桥事变后由南昌驻防淮阴，牺牲时年仅二十岁。目睹了中国空军军官的英勇，战斗结束后日军就地厚葬了阎海文，为他竖立的墓碑上题有“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的字样。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为此发表通讯，说中国青年飞行员的勇猛证明：“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

中国军队的轰击不断，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终于感到了处境的危险。十六日一天之内，他接连向东京海军部发去三封求援电报，说他的陆战队损失惨重，必须得到增援，一天都不能等了；又说预料日后还有激战，如国内紧急派兵困难，请求先将驻扎旅顺的特别陆战队调来增援。晚上，长谷川清紧急命令第一、第二特别陆战队的两个大队共计约一千四百余人，搭乘第四水雷战队的舰只自旅顺港起航火速赶往上海。

中国军队预定的攻击部署，是不求攻坚而求寻找日军阵地的缝隙猛烈穿插。但是，自十六日起，在每一条攻击路线上，中国军队的攻击都被日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装甲车支援的防御火力所阻止，预计的穿插行动在总攻发起不久后就变成了攻坚战。中国炮兵的火力凶猛，弹着点也准确，但由于缺乏燃烧弹，一般的爆破弹对日军坚固工事的破坏效果不明显。第八十八师奉命向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一线攻击，部队伤亡巨大，仅在法学院一处的阵亡官兵就有近一个营。第八十七师奉命攻击日军海军俱乐部、海军操场、沪江大学以及公大纱厂等处，尽管师长王敬久报告已经占领了海军俱乐部和海军操场，但实际上中国军队仅仅将日军逼到了四层楼的油漆公司据点里，并由于日军的死守双方形成对峙。

中国军队的全线攻击开始不久后，蒋介石突然下令再次停止攻击——这是上海战事爆发以来的第三次——这一次的原因是，蒋介石获悉，英、美、法三国政府已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

中日两军同时撤出上海。

然而，中国军队停止攻击的时候，从旅顺增援来的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抵达了上海。同时，从日本国内出发的陆军第三、第十一师团正向中国淞沪地区集结。

十九日，日本政府明确拒绝了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建议。

蒋介石再次命令第九集团军全线出击。

这或许是在日军陆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日军海军陆战队赶下海去的最后时机了。接近黄昏时分，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给张治中打来电话，说他的左翼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和岳州路附近。张治中决定立刻扩大战果，全力突破日军汇山码头阵地，将日军沿黄浦江布设的防线切成两截，然后从南北两面实施压迫，以期一举将日军歼灭。此时，增援的中国军队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第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已经到达战场，张治中率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也抵达了位于江湾的第八十七师司令部。张治中的部署是：第三十六师向汇山码头发动攻击，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旅归第三十六师指挥；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归第六十七师（师长黄维）指挥，加入该师的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发起攻击；刚刚从南京抵达的装甲战车两个连和战防炮一个营也被配备给了第八十七师。

中日两军在上海繁华市区的街垒战又一次开始了

中国空军再次大规模升空，为支援地面部队轰炸日军军舰和日军阵地。但是，空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飞行员们便感到了异样：只要中国空军的飞机升空，无论是从哪个机场起飞，立即就会遭遇日军战机的拦截，日军战机到来的速度之快，仿佛早已得知中国空军的作战时间表。同时，日军轰炸机相当精确地轰炸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目标，其中有的目标极其保密，如南京兵工厂、南京中央陆军小学以及中国军队的参谋本部。尽管在轰炸地面防空火力极其密集的南京兵工厂时，日军海军航空兵大尉飞行员梅林孝次被击落，但日军轰炸的精准程度令中国方面立即意识到，很可能是空军使用的电报密码泄露了。于是，即刻更换空军的密码，同时在重要地区对日本间谍展开大规模的搜捕。

尽管如此，中国空军的英勇无畏再一次震撼了日本人。十九日上

午，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奉命起飞轰炸日舰，当飞临吴淞口外的日军海军第三舰队上空时，十一队队长沈崇诲和队员陈锡纯驾驶的第号双座轰炸机突然发生机械故障。沈崇诲立即决定飞离机群处置情况。沈崇诲，清华大学毕业后投考空军，入航校后学习驾驶轰炸机，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因早已抱有以此身雪国耻的愿望，遂决心用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日舰与敌人同归于尽。飞到中国军队阵地上空时，他指示陈锡纯立即跳伞逃生，明白队长决心的陈锡纯用手一次次地指点下面的日舰，用点头的方式坚决表示愿和队长一起赴死。沈崇诲大吼一声，开足马力，推下机头，挂有一枚八百磅炸弹的中国空军飞机笔直地俯冲而下直接撞向了日军战舰"出云"号的甲板。

"出云"号顿时火焰冲天，两名中国青年军人粉身碎骨。

仰天观看空战的上海民众在那个瞬间不禁泪飞如雨。

中国地面部队的攻击依旧艰难缓慢。在攻击杨树浦时，尽管有装甲车助战，第八十七师付出巨大代价后，收效甚微。以杜聿明为团长的南京装甲团，是当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坦克部队，奉命开到前线的是配备自重七吨的装甲战车的两个连，两位年轻的连长都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当张治中命令他们协助突破杨树浦时，两个连长表示，状况好的战车都调往北方了，开到这里的是刚从修理厂拉出来的战车，还带着故障，不怎么好使。张治中的命令是："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中国军队平时没有步坦协同的训练，步兵只知躲在战车后面，不知战车需要火力掩护，当战车冲进杨树浦街市后，因前进的速度与武器的操作都不能尽如人意，几辆战车先后被日军击毁，两名战车连长当即阵亡。事后张治中懊悔不已，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觉得难过"。

原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三十六师，与正在淞沪地区血战的第八十八师是"姐妹师"，都是由原国民政府警卫部队改编而成。第三十六师曾因西安事变而移驻西安，八月十三日，师长宋希濂才接到率部紧急开赴上海的命令。路上，民用列车一律为这辆军列让路，军列不但畅通无阻，而且因是去上海前线打日本，沿途受到各地百姓的热情款待，在南京、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车站，欢送第三十六师的百姓人山人海，饼干、罐头、糖果、香烟等慰问品被密集地扔进车窗，将第三十六师的官兵们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抵达淞沪战场后，第三十六师的攻击位置在第八十七师与第八十八师之间的天宝路一线。令宋希濂师长没有想到的是，攻击刚刚开始，部

队就出现了巨大伤亡。二一五团二营一度攻入华德路十字路口，并在街巷内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日军用坦克阻塞住路口，集中火力猛烈射击，二营三百多名官兵全部阵亡。担任攻击汇山码头任务的是二一二团和二一六团。自二十日开始，二一二团和二一六团逐屋争夺，顽强推进，致攻守双方伤亡都很大。二一六团团长胡家骥是员身先士卒的猛将，攻击过程中，他的两名卫士一名阵亡一名重伤，他自己身上也有五处中弹。当中国军队终于逼近汇山码头时，日军支撑不住了，争相向外白渡桥方向逃跑，然后纷纷向桥南的英军投降。抵近码头的中国官兵无法摧毁坚固的铁栅栏门，胡家骥团长冒着弹雨率先往铁门上爬，士兵们在他的身后跟进，但日军侧射火力猛烈，第三十六师部队终因伤亡太大，还因预定协同作战的第九十八师迟迟未到，最终被迫退回。——“仅汇山码头一战，我师伤亡五百七十余人。敌军除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四百余人。”战后，师长宋希濂认为，第三十六师对汇山码头的攻击，是“最精彩、最激烈、功绩卓著”的一仗。

淞沪战事至此，已容不得任何犹豫不决。但是，在中国的军政高层内部，对于是否应该开辟淞沪战场，是否应该在淞沪战场继续打下去，各方的意见竟然未能完全统一。而这种意见不一，于中国当时的历史命运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急电令正在庐山负责军官训练团事务的陈诚火速回京（南京）。陈诚于十六日凌晨二时抵达后，蒋介石布置给他三件事：一、华北和晋陕将领要求派陈诚到华北指挥作战；二、陈诚必须立即去上海了解张治中的作战情况并协助之；三、迅速编定中国军队抗战的作战序列。

陈诚初入军中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连长，黄埔军校成立后在蒋介石麾下参加讨伐军阀的征战，到北伐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指挥五个警卫团、两个炮兵团的中将司令。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值他从太原到达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与阎锡山接洽晋军出兵增援绥远抗日事宜，结果与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押。陈诚告诉张学良，如果蒋介石遇害，就先一步将他枪毙。可谓是国民党内追随蒋介石最久、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十六日当天，陈诚即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一起赶赴上海。十八日两人返回南京后，熊式辉问是否需要统一意见再汇报，陈诚答可以各自报告视察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便最高统帅部能够多一份参考。事后陈诚得知，熊式辉的建议是中国与日本“不能打”。而他向蒋介石提出的是：中国与日本，“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

……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所预定之战略。

陈诚认为：日军已经占领平津，如果淞沪战场始终僵持，华北的日军就可以腾出兵力沿着平汉铁路南下攻击中国的华中重镇武汉。一旦日军得手，集中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部地区，将被日军于平汉铁路东西两边“纵断”为两个战场，即淞沪与武汉，而在这两个战场的中间就是首都南京。因此，目前必须扩大上海的战事以分散日军的兵力。而所谓达成一九三六年“预定之战略”，即指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初步拟定的对日战争基本策略：“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非常认同陈诚的判断与策略，当即表示中日战争“一定打”。陈诚马上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立即赶赴淞沪战场指挥作战。同时下达了增调部队赴沪参战的命令：位于长沙的第十五师（师长汪之斌），由汉口乘船，限九月五日抵达南京；位于江西的第十六师（师长彭松龄），即刻开赴苏州，限九月二日在嘉兴集结“候命”；位于温州的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除一个团留守外，其余部队限九月六日到达杭州；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前推至松江或平湖一线，限八月十九日必须到防；第一军（军长胡宗南）“除留一旅在徐州外”，其余部队速通过京沪路运送，限九月一日集结完毕。

几乎是同一时间，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也制订了增援上海的作战计划：

（一）与海军协同，以一有力兵团在川沙镇方面、以主力在吴淞附近登陆，击败当面之敌，尔后占领上海及其北面的重要地带，保护帝国臣民；

（二）二十三日黎明起开始登陆，尔后以在川沙镇附近登陆的十一师团迅速进入罗店镇，对嘉定进行攻击，并准备尔后向南翔及顾家宅附近前进。在吴淞附近登陆的第三师团要确保吴淞附近，并准备向大场镇附近前进。

日军的作战目标是：从登陆地南下，控制沪宁铁路，切断上海与南京的交通，对上海市区内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之势，然后从侧背发起攻击歼灭中国军队。松井石根要求海军主力在距上海西北四十五公里的杭州湾以及扬子江上游发动佯攻，以掩护陆军登陆；还特别要求在第三师团登陆时，海军特别陆战队为掩护部队。

二十二日，中国军队集结的战线位置是：南起上海北站，沿横浜路、五卅公墓、爱国女校、狄家浜南，沿沙泾港、欧家路、唐山路、华德路，至沪江大学北端。中国军队淞沪战场上的主力部队与日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对峙于从苏州河北岸一直向北延伸至黄浦江沿岸的川沙口、狮子林、宝山、吴淞一线的地域。与此同时，仅有少量战斗力极弱的杂牌军和保安队被部署在海岸地区。这导致了当日军陆军主力师团登陆的时候，来自中国海岸的抗击微弱得令日军难以置信。

二十三日，日军第十一师团从上海东南方向的海面上换乘小型舰艇沿黄浦江北上，于凌晨时分集结于川沙口的停泊处，五时从川沙镇的北面开始强行登陆。负责川沙镇附近守备的仅有中国军队第五十六师的一个连。一个连的中国官兵根本无法抵挡日军潮水般地涌入。成功登陆后的日军很快占领川沙镇，并派出一部兵力直逼重镇罗店。——罗店位于川沙镇以南，吴淞以北，宝山以西，以这里为支撑再向南，便是嘉定（陈诚部指挥部）、南翔（张治中部指挥部），还有沪宁铁路，越过沪宁铁路便可直达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在上海的虹桥军营。

登陆日军遭到了中国空军的攻击。

这些从日本本土出发的陆军官兵，想到了登陆时可能遭遇中国守军的手榴弹、枪弹、火炮，甚至是传闻中血淋淋的大刀片，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驱逐机和攻击机会飞到他们的头顶上实施攻击。中国战机飞得很低，引擎声轰鸣作响，日军都能看见中国飞行员的护目镜一闪一闪地反射着东方海岸薄明天色的微光。突然，这片微光炸裂开来——中国战机扔下炸弹并开始猛烈扫射。

日军海军第三舰队的舰载机很快升空拦截中国战机，中国战机除了少量的轰炸机外，大部分是载弹量很小的驱逐机和侦察机，最终没能对日军的大规模登陆形成根本的威胁。

日军第三师团的登陆先遣部队在驱逐舰舰炮火力的掩护下，于凌晨三时在吴淞镇南约三华里的铁路轮渡码头以及吴淞镇正南方向的张华浜

强行登陆。守备该处的中国保安团和警察总队虽然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势单力薄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登陆后的日军先遣队很快突破至军功路一线，试图为后续部队建立起巩固的滩头阵地。中国军队教导总队二团在日军猛烈的舰炮轰击中，在日军登陆先遣队的轻重机枪构成的火网中，强行连续发起反击，双方都出现了严重伤亡。冲在前面的日军是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仓永辰治大佐。这是一个心事重重的军官，自日本上船后就一直面色阴郁。十天前，部队刚刚进行参战动员，他接到了妻子病重的消息，那时候第六联队的军营已经封闭，任何人都不许外出不许与家人联系。乘船向中国来的海路一路颠簸，他捧着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照片不思寝食。二十三日凌晨，作为登陆先遣队的指挥官，他收藏起妻子和儿子的照片，率领他的士兵冲上了中国的海岸。但是，就是在那一时刻，他的师团长藤田进中将接到了国内留守部队发来的电报：仓永辰治夫人已去世五天四夜，留守部队获知消息后，派人前往处理时，尸体已经腐烂，现已将尸体火化并保存了骨灰。仓永辰治大佐的两个儿子，十三岁的太郎和十岁的次郎，因无人监护已被送进少年军校。考虑到第六联队正在投入战斗，藤田进没有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仓永辰治。不久，前方传来消息：仓永辰治大佐在向中国阵地冲锋时，心脏部位被重机枪子弹击中，带着对妻子和儿子的牵挂阵亡。仓永辰治至死都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离他而去；仓永辰治更无法想到，在他阵亡四年后，他的长子仓永太郎已经十七岁，作为一名日军士兵，在跟随部队赴南洋吕宋岛强行登陆时，被美军的机枪子弹射中，射中的部位也是心脏。——日本佐贺县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在战争中毁灭了。

日军顺利登陆后不顾一切地迅速扩展，中国军队数次反击，但罗店和宝山还是在短时间内相继失守。宝山位于黄浦江江口，如上海之门的钥匙；而罗店在淞沪的侧背，日军占领罗店后就可沿浏沪公路向南直接攻击大场和嘉定，中国军队重要的后方联络线沪宁铁路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此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彭善）、第十四师（师长陈烈）、第六十七师（师长黄维）都已抵达战场，第十师（师长王耀武）和第六师（师长周碞）也在增援上海的路上。张治中建议对上海市区内的日军采取防御态势，集中兵力阻截歼灭登陆的日军。陈诚表示同意，二十三日，他向蒋介石报告了作战部署：

为击灭狮子林、川沙登陆并继续围攻淞沪之敌，拟定新部署如左：（一）淞沪围攻军由张总司令（张治中）指挥，仍继续进行攻击。同时并在原攻击阵地作固守准备。（二）第十八军之第十一、第十四、第五十六师诸部由职指挥，任沿江已登陆之敌之歼灭（三）第十一师、第六

十七师、第九十八师、炮兵第十六团为右翼军归罗军长卓英指挥，对狮子林、川沙未登陆之敌行歼灭战。（四）第五十六师、第十四师为左翼军，归刘军长和鼎指挥，协同左翼队攻击，并任浏河口以西沿江要点守备，阻击敌之登陆。（五）第六师、第五十一师位置于南京、苏州间铁道两侧地区为总预备队。（六）职现在苏州部署中。

此时，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两个作战集团，即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和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其基本分工是：张治中所部继续与上海市区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对峙，陈诚所部全力抗击日军增援而来的登陆部队。

如果不把登陆日军遏制住，稳定前线的局势，中国军队的战线就会有崩溃的危险。为防日军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张治中决定亲自去前线设法挽救危局：

从南翔到江湾只十几里路，本不算远，但我们一出门就碰上了敌机，三架至九架，不断地在上空来往轰炸扫射。我本来坐的小汽车，敌机临头，我就下车隐蔽，敌机转头，又马上前进；但走不多远，敌机来往太多，小汽车不能再坐了，我穿着一双马靴徒步走去。中途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下车向我敬礼："怎么，总司令走路？"我也来不及对他说别的了，骑上他的脚踏车就走。一路上，我一会停止掩伏，一会又乘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八十七师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住。我到了江湾，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十一师、九十八师迎击登陆敌人。那时由正面抽出这些部队真不容易，且因敌机狂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行动。十一师师长彭善在初接到调动命令时对我说："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我说："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局势下，抽调两个师迎敌。由于这样一个迅速的部署，才把已经失去的罗店收复。

第十一师第三十三旅的官兵杀进罗店时，在死亡的日军士兵身上搜查，方得知在这个方向登陆的日军是第四十三、第四十四联队和工兵第十一联队。

尽管有所准备，但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登陆部队的作战中出现的巨大伤亡，还是出乎预料——"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了。"二十五日，蒋介石在南翔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时特

别指出："纵观近日之战况，我军伤亡奇重。战争固不能免于伤亡，然指挥失当致增伤亡，牺牲殊无价值。我军缺点在于攻击实施之先，未能充分考虑，率尔从事，牺牲遂大。今后应悉心研究，当攻则攻，当避则避。"

登陆的日军也同样伤亡很大。由于中国军队主力部队陆续到达，阻击作战勇猛顽强，日军后续部队的登陆作业很难展开。随着作战双方伤亡人数的增加，战局看上去很难转变。已经登陆的日军请求海军支援，海军航空兵立即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二十五日中午，日军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的第五旅团才全部登陆完毕。

由于罗店是双方都必须保持的战场支撑点，登陆后的日军立即对罗店实施了反攻，争夺与反争夺的战斗演变成惨烈的拉锯战。

二十五日夜，坚守罗店的第六十七师第二一〇旅联络中断，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后，越过陈诚，直接致电归属第十五集团军的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一）今晚必须恢复罗店。占领罗店后，即在罗店附近构野战工事，一面在淑里桥、南长沟、封家村构筑据点工事。（二）第十一师、第九十八师今晚仍照预定目标攻击前进。（三）第十四师留一团在太仓，一团在福山口构筑工事，主力今夜应向嘉定、罗店前进。（四）第六十一师在大场、杨家行一带赶筑工事。"

二十六日，陈诚接到报告："罗店未失，仍在固守。"

二十七日，日军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航空队都参加了对罗店的轰炸。至二十八日，罗店被日军第十一师团攻占。

罗卓英于二十八日傍晚发出的作战命令是：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旅，向罗店东北地区"猛攻敌之侧背"；"第十一师除以一部守备阵地、抑制当面之敌外"，主力沿浏河至罗店公路向敌人阵地正面猛攻；第六十七师第四〇一团，"于小堂子附近原阵地待机出击"；第十四师的两个团及第六十七师之一部，重于西北方面，由西向东猛攻罗店。然而，各部队奉命再次向罗店发起攻击时，大雨如注，道路泥泞，连日的苦战令部队伤亡严重，官兵体力严重透支，各部队之间又没有很好地协同动作，致使中国军队对罗店的攻击失败。

根据罗卓英的命令，第十八军第十四师的七十九、八十三两个团，由师长霍揆彰、参谋长郭汝瑰率领，于二十九日自常熟赶到了罗店前

线。日军尚不知道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已到达，霍揆彰和郭汝瑰决定趁此时机出其不意地杀进去：八十三团由团长高魁元率领自西向东正面进攻，七十九团由团长阙汉骞率领迂回到敌人的侧背实施包围，第六十七师负责佯攻和掩护。八十三团奉命向罗店发动了进攻。攻击线路上有一条小河，小河上的桥被日军的轻重机枪严密封锁。八十三团数次向这座桥发动冲击，但支援作战的炮兵尚未跟上来，没有炮火支援的官兵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不断地倒下去，小桥的桥头阵亡了上百名中国官兵后进攻没有获得进展。迂回的七十九团在指挥决断上也出了问题。团长阙汉骞率领部队迂回到日军侧后时，日军并没有发现他们，如果此时发动突然袭击，不但能减轻正面进攻的八十三团的压力，甚至或许能够利用日军分兵顾及前后的时机突过桥去，起到两个团前后夹击敌人的效果。但是，阙汉骞团长没有及时下达突击命令，他只是命令三营向前移动。三营的前面也有一条小河，官兵们找来些桌子、板凳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顺利地过去了。此时日军依旧没有发觉。过了河的三营偷袭了日军的一个后勤支援点，缴获颇丰：除大量的军装、背包和食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味精和日本酒。接下来，三营的行为令人不解：他们没有继续向前突击，而是在附近找了一片竹林藏了起来。

三十日天亮后，第十四师的两个团对罗店的进攻结果是：八十三团撤了下来，伤亡两百多人；七十九团的两个营也撤了下来，但不见三营的影子。后来才知道，藏在竹林里的三营被日军发现，受到了机枪、火炮和飞机的猛烈攻击，官兵们撤退时又到了那条小河边，临时搭建的浮桥已经被河水冲走，部队在日军的追击下发生了混乱，一些士兵掉到河里被淹死，营长李伯钧在横飞的枪弹中阵亡。到三十日下午，归队的三营官兵的人数不足全营的一半。

第十四师是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的主力师，装备好战斗力也以强劲自称。然而，该部在兵力优势下对罗店发起进攻，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自身伤亡巨大。与对手相比，第十四师至少暴露出两个弱点：官兵实战经验欠缺，特别是指挥员战场决断能力不足；步炮协同、友邻协同以及上下协同在实战中严重脱节。

日军巩固罗店阵地后，吴淞镇的中国守军不断以火力袭击出入黄浦江的日本军舰，同时也期望以此对日军第三师团的侧背形成威胁。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命令第三师团对罗店以南的吴淞镇实施攻击，第十一师团一部由罗店北面的川沙口沿黄浦江岸向南实施扫荡，于吴淞镇与第三师团会合，从而打通两个师团在陆上的联络。三十一日，在炮舰的支援下，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十三联队开始攻击吴淞镇。

中国第三战区前敌指挥部立即部署第九十八师沿黄浦江岸防御宝山、狮子林、月浦阵地，调第六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七师防守外围据点。而驻防吴淞镇的中国守军是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一师原属第十九路军，素以勇敢善战闻名，但是在“福建事变”后，师的主要将领都已换人，战斗力明显下降，加上部队刚刚从福建抵达，各种情况均不熟悉，导致刚一接战便溃不成军，吴淞镇轻易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即刻下令：撤职查办第六十一师师长杨步飞，将该师残部和独立第二旅合并，任命旅长钟松为第六十一师师长。

日军上海派遣军自登陆以来，在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的顽强阻击下，不仅人员伤亡很大，战场推进艰难，而且已经处在各部队被分割的不利处境中。因此，松井石根致电东京紧急求援，声称他当面都是中国最精锐的陆军，如果日本要在上海战事中取得胜利，至少还要投入五个陆军师团以上的兵力才行。他要求立即派遣第十四师团以及本属于第十一师团而现在青岛的天谷支队火速增援。

九月一日，日军第十一师团派出浅间支队企图打通与第三师团的联络。浅间支队向狮子林炮台发起猛攻。在该处防御的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师的一个营孤军奋战，最后时刻与日军白刃格斗长达四小时，到全营官兵全部阵亡后狮子林炮台阵地丢失。

第二天，为策应狮子林与宝山的中国军队，罗卓英军长指挥第十八军部队向罗店的日军发动了反攻，经过昼夜的持续激战将日军压缩于罗店镇内。

九月三日，日军海军增援部队抵达战场。

五日，日军海军宣布：彻底封锁中国的东南海岸，切断中国上海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蒋介石两次急电罗卓英：“罗店关系重要，必须限期攻下……要求将士有进无退，有我无敌，不成功便成仁……此次抗敌作战，为我民族死中求生唯一出路……凡贪生怕死、临阵畏怯不能发扬战术与武器威力者，同侪将士，应共弃之。凡信仰动摇、精神松懈，不能尽其责任而贻误战机者，同侪将士，应共除之……”“按照军律，衡情论罪，不稍宽假。”

六日夜，罗卓英再次下达了攻击罗店的命令。中国军队四个师联合

顽强攻击，扫清了罗店外围日军的据点。可是，正准备发起总攻的时候，得到了日军已经打通吴淞与狮子林之间的交通，日军陆海军增援部队已经抵达并攻占宝山的消息。这样的战场态势于中国军队十分不利，对罗店的攻击随即停止。

此时的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师，全师伤亡人数已近五千，其中各级军官伤亡两百人以上。当日军在舰炮和飞机的支援下猛攻罗店与宝山之间的月浦时，伤亡惨重的第九十八师依旧拼死作战。在与日军的反复拉锯中，阵地三次易手，团长路景荣、团附李馨远相继阵亡，日军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缓慢推进。十一日，月浦进入巷战状态，血战后中国守军由于伤亡过大撤离阵地。日军由此推进到了宝山、狮子林、川沙口一线，两军于黄浦江岸的几处要地形成对峙。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尽管登陆的日军已经突入，尽管武器装备、战略战术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中国守军已经血流成河，但是中国官兵至死也不愿意背离这句誓言。就在罗店争夺战进入肉搏状态的时刻，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防御宝山的中国守军为此振臂呐喊，誓不弃守。自五日凌晨开始，日军在舰炮和飞机的助攻下，调集大量坦克猛攻宝山城门。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第五八三团三营，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死守不退。久攻不下的日军向这座孤城发射了大量燃烧弹，宝山全城顿时大火冲天，房屋接连班塌，满城砖石瓦砾。姚子青营长一面向师长夏楚中求援，一面和全营官兵作出一个约定：人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死的，但好汉死要死出个样子。今天，三营谁也不许后退一步，谁也不许苟且偷生，让日本人看看咱中国人的骨气！援军迟迟不见踪影，废墟之中进行着惨烈的巷战，每一条街巷里每一道断墙边都发生着肉搏战，中国守军在数量为自己数倍的日军面前使用刺刀、匕首、木棒、石块乃至自己的牙齿，咒骂着，厮打着，直到血肉模糊地倒下去。残酷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六日上午十时，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师第五八三团三营，除了一名奉命出城报告战况的士兵外，全营五百余人全部殉国。

肉搏战停止了，宝山城内一片沉寂，呆站在血泊里的日军官兵沉默无语。这是一座中国最为普通的小县城，城墙之内方圆不过几里，城楼因为年代久远已残破不堪，城门启闭时还会吱呀作响。日军士兵听他们的长官异口同声地说过，中国军队是一支一触即溃的军队，于是眼前出现的情景令他们不寒而栗：如何解释在根本没有任何救援希望的情况下，这支中国军队会如此怒不可遏，如此不顾一切，如此想要拼烂最后

一副身躯、流干最后一滴鲜血？！

姚子青营全体殉国的壮举，被写入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也写入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抵御外侮的心灵史。

中国军队失守宝山城的那一天，日军参谋本部派往上海视察的第三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向东京报告了上海前线的危机：

（一）敌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

（二）估计敌人第一线兵力约十九万，第二线停战区内有二十七至二十万；

（三）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

（四）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

毫无疑问，自淞沪地区作战开始至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不屈精神大大出乎日本人的预料。日军作战原则上的表述是要“惩罚一下中国人”，可至少目前看来，受到惩罚的是那些爬上中国东南海岸的日军官兵。而对于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来讲，伤亡之大出乎预料，这让刚刚开始的战争蒙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中国将能坚持多久？

战争的不屈精神不是靠某个人、某支部队，甚至是正在作战的某个战区来支撑的。

赢得战争的最可靠的力量，将是中华民族的意志！

一九三七年的八月，日本人突然得到一个更令他们震惊的消息：中国两个敌对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不但宣布已经真诚地联合在一起，而且联合的目的十分明确：打日本，保中华！

第三章

寇深矣！祸急矣！

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国共两党不共戴天。

成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稍晚些时候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的两个政党。两党曾集合于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同怀拯救中国于贫弱衰败的宏阔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内，两党成员曾于二十世纪初叶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中生死与共。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深入，两党在各自秉承的信仰理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攸关利益以及在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上，出现了无法弥补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与断裂。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极其迅速。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集团也是五花八门，但几乎所有的政治集团都声称自己代表着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沿袭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农民的赤贫。中国革命乃至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拯救并解放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赤贫的农民。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并使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其初期进行的革命就叫“土地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待“泥腿子”的态度，成为国共两党的根本政治分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权力归农会”，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立场。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不是中国的无产者，因此，他们认为争取尊严和社会权力的无产者的暴力反抗，与土匪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历史上的某个瞬间，中国的无产者与有产者以及各自代表他们阶级诉求的政治集团，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势必不共戴天。

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不可避免地决裂了。

决裂的后果，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极其残酷。

首先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政治杀戮。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人以及接受共产党政治理想的青年被处决的场景处处可见。接着，就是对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

军事“围剿”。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既然已经把敌对的共产党定性为“匪”，那么对于“匪”的格杀勿论显得理直气壮和毫不留情。

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的数次军事“围剿”，共产党人没有可以利用的任何国家资源与政权资源，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这个巨大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者的人心——贫苦的农民们，他们手里只有大刀、长矛这类最原始的武器，也情愿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付出他们的身家、骨肉乃至性命。当共产党人立足的狭小根据地被攻破后，国民党的将领们在那里看见的是苏维埃政府简陋的礼堂、军民两用的打谷场和操场，到处写着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能够跟着共产党走的青壮年都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扫荡的原则是：“树要过火，石要过刀”。于是，贫苦百姓的理想之国荡然无存。

当共产党人失去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令那条后来举世闻名的万里路途上的每一公里都由红军的生命铺就。最终，共产党人进入了中国贫瘠偏僻的黄土高原。由此，一个困惑开始缠绕着国民党人：总说再有几个月就可以把共产党“剿灭”，但是共产党人经历了千难万险的苦战，为何就是没有丝毫意志的屈服与溃灭的迹象？当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后，又一个现实问题开始困扰着国民党人：无论围追堵截得多么凶狠，共产党却坚定地要与国民党联合抗击日本的侵略。尽管国民党不断“揭露”共产党的这种联合背后是有“阴谋”的，或者对共产党的联合呼吁置之不理继续实施军事打击，可中国共产党联合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锲而不舍。这令在“安内还是攘外”中纠结不堪的国民党人不知所措。

一九三一年，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各国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现在他更公开更强暴地占领中国领土，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他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地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同时帝国主义强盗也非常明白，现在世界革命积极发展，中国工农革命日益高涨……这一革命浪潮的高涨，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替他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全中国工农

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表示国民党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工具”，因为他们在“逆来顺受”，在“无抵抗”，在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民众进攻”。所以，全中国的民众必须“武装起来”，“在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为了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只能倚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企图挑起世界大战，以便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解决瓜分中国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帝国主义作战……

接着，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要求“在红军与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要求“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能了解：积极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的部队，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正是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要求在还没有“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红军的作战任务，首先是要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而当“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

共产党人的宣言，鼓荡着中国不断高涨的抗日舆论。

然而，鉴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现实，鉴于国民政府开始部署对日作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反蒋抗日”的狭隘性，于一九三

五年首次提出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一份《八一宣言》。指出：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因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仍把蒋介石排除在外，还是于中国历史的危急时刻，第一次提出了无论党派团体各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便是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蓝本——曾经与国民党不共戴天的共产党是这样表述的：“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联合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如果国民党“坚决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共产党将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年的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以所有红军将领和二十万红军官兵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言辞之恳切无以复加：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

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城、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急，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万人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联蒋抗日”。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不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起来。历经了国民党残酷屠杀与疯狂“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抉择中，经过了“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心路历程，这一历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有能够承载民族大义、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胆识与历史胸怀。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甚至提出了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前提下中国工农红军如何开展对日作战的问题：“红军在彼方忠实地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必须是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第二天，西安事变爆发。

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关于西安事变的诸方面问题。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南京，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经过多方的斡旋、磋商、谈判，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致全会电，首次提出：在“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可以“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

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炎黄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月十日

毛泽东认为，国内各方对此电报“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能在政治上说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

史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自此开始。

为了谋求第二次国共合作，谋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派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频繁地与国民党军政高层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了数次谈判。国民党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正职官长等要求，目的是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继而逐步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尽管共产党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如同意蒋介石提出的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等，但谈判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在这时，卢沟桥事变猝然爆发。

民族危难近在眼前，国共联合迫在眉睫。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正在去庐山的路上。七月十三日，平津处于极度紧张之时，国共两党在庐山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除蒋介石外，还有邵力子、张冲、宋美龄等人参加。共产党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就公布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展开磋商。之前，共产党方面已致电蒋介石，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须先确定双方认可的纲领，然后由双方干部组成最高会议，蒋介石担任主席；关于红军改编，共产党方面不再坚持必须设立指挥，让步为设立政治机关但应具指挥机关的权能；对于边区政府，共产党方面同意由南京指派一名正职官员；同时，同意由红军担任由蒋介石划定的平绥线的国防防御任务。但是，由于卢沟桥事变已经引发战端，蒋介石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国共之间的沟通陷入了僵持。这一次，双方代表于庐山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时，蒋介石将共产党方面的所有让步全部搁置，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能设立指挥机关，红军三个师直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管辖，三个师的参谋长均由南京派遣，共产党人负责的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依旧不愿给共产党以合法与平等的地位，企图通过改编红军根除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握，他甚至劝毛泽东和朱德“出洋”。军阀混战时，凡是战败的军阀都以出国作为其政事与军务的结束。此一建议的提出，足见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

共产党方面坚决拒绝由国民党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与人事权。

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九天后，北平失守。

紧接着，天津沦陷。

面对万分紧张的军事形势，蒋介石托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转告共产党方面：十天内改编红军，南京给三个师的番号，红军出动抗日。对此，毛泽东提出的改编原则是：“一、八月十五日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朱德）正彭（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八月一日，蒋介石密电邀共产党方面去南京“面商大计”。周恩来、朱德即刻从延安启程赴西安，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自十二日开始，国共双方代表在孔祥熙公馆举行谈判，内容集中在发表合作宣言与红军改编的问题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双方甚至要为一个词的使用反复争辩。蒋介石主张在合作宣言里不提“民主”，以“民用”二字代替，并且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同时把“国民党”三个字一律改称“政府”——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共产党是向政府输诚的。周恩来表示，两党合作绝非以强凌弱，也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投降。关于红军的改编，共产党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提出的由国民党派遣政治部主任的要求。

双方争论难以调和时，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

中日战争已呈全面爆发之势，国共谈而不决的状况随即转变。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国民党方面只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遣联络员。一个月后，正式公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命令时，依照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整体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前景充满自信。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二十三位高层领导聚集在渭北洛川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抗日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

争》。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以及持久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说，“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

洛川会议结束的这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正式发布：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一二〇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毛译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对于蒋介石来说，不能把共产党人称为“匪”了，但他又不情愿称为“友”，于是使用了一个古怪的称呼：“第三者”——“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在以往的日子里，国民党没能用军事手段将共产党武装“剿灭”，也许是出于“斩草除根”的心理延续，蒋介石亲自给共产党的将领们换了名字：朱德叫朱蹭陂，彭德怀叫彭特立，林彪叫林育荣，贺龙叫贺云青，肖克叫肖格，徐向前叫徐象谦。——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共产党将领们的这些名字从来没有使用过，甚至几乎无人知晓。而国民党方面给予工农红军的三个师的番号，虽然原是属于东北军旧部的，但自重新发布的那一刻起，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带有特殊意义的称谓。

还是这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全国发出了就职通电，通电的抬头极为壮观：

南京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各部院长、太原阎副委员长钧鉴：

西安顾主任、蒋代主任、何副主任、孙主席、开封刘主任、商主席、成都刘主席、南宁李总司令、白副司令、黄主席、广州余总司令、吴主席、昆明龙主席、长沙何主席、南昌熊主席、汉口何主任、黄主席、福州陈主席、济南韩主席、保定冯主席、太原赵主席、绥远傅主席、万全刘主席、兰州贺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迪化盛督办、各总司令、总指挥、军长、师长勋鉴：

各报馆、各民众团体公鉴：

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月养日（八月二十二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开，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肃电奉闻，敬候明教。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叩有

蒋介石复电："忠诚谋国，至为嘉慰。仍希一致团结，共赴国难，为盼。"

阎锡山复电："两兄遂令改编所部，追随委座，前驱杀敌，复兴民族，我武维扬，引企旌麾，良深佩慰。特电复贺。"

李宗仁、白崇禧复电："两兄新膺特命，总绾军符，望东指之旌旗，赋同仇而御侮，歼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伫听捷音，祗申贺悃。"

蒋鼎文复电："率部抗敌，壁垒增新。行见马肥苜蓿，壮秋塞之军容；酒熟葡萄，励沙场之斗志。扬我国威，挫彼寇焰，河山还我，指顾可期。特电复贺，并颂戎祉。"

傅作义复电："台麾荣膺特命，东进杀敌，扬我军威，同深忭贺。刻下寇氛日炽，国难益急，尚冀军骝早发，俾利戎机，翘望节旌，无任驰企。"

九月，上海抗日战事酷烈。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国人不但看到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坚定决心，还看到了共产党人为达成全民抗战不惜放弃了以往他们坚持的主张：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日益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决心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但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忍不拔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乘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共同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首选须保障人民之自由，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民主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的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意在这个共同纲领的目标下，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同胞手携手的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的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

消敌人阴谋之籍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的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更一次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国宣告：

（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仁至义尽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早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的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急矣！同胞们！起来！让国共两党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让我们更加和睦地为着保卫华北实现抗战而更加努力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统一战线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

第二天，蒋介石针对共产党的宣言发表谈话，表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曾说‘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战’。”今日，全国能够一致“深切”认识

到“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认识到“整个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总之，“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理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

实事求是讲，在国民党一方，对于国共两党的再次联合，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忧虑。其心绪之复杂，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日寇凶残，已经深入国土，面对战争压力，从民族大义上讲，集聚全国力量实行对日战争是必须的；另一方面，除了长期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军事上的严重对抗外，国民党最大的不安是，共产党会在这个历史时机生存下来且很有可能发展壮大。国民党的这种复杂心绪，贯穿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战争，并由此引发了两党两军的摩擦与冲突。

国民党人的不安与忧虑，来自对共产党认识上的固执与偏差。

首先，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已到了被彻底“剿灭”的最后时刻。而事实上，这只是国民党方面一厢情愿的判断。自一九二七年起，执政的国民党动用国家所有的政权和军力资源，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也没有把共产党“剿灭”。共产党人的长征在国民党看来无异于穷途末路，共产党人也确实在长征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比如令工农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的惨烈的湘江之战。但是，蒋介石永远也没有明白一点，那就是他要“剿灭”的并不是他所谓的一群“匪”，而是伫立在人世间的一种信仰、一种主义，是这个国家中大多数的人情愿为之舍身的一种社会理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世界历史上至今尚没有用杀戮手段把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乃至一种社会理想彻底剿灭的先例。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其次，国民党方面固执地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壮大。这一判断也属于一厢情愿。且不说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生存意志与生存智慧，仅就为了生存而言，也尚有比向国民党方面作出政治与军事让步更为有效的方法。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也没能深入到西北的腹地，共产党人落脚的地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域之一。而为了应对对日作战，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暇顾及陕甘宁边区，只要置抗战于不顾而只图偏安一隅，共产党人的生存与壮大会有更大的可能。但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人宣布搁置或放弃已经为之奋斗多时的革命目标，而这些革命目标

是无数共产党人在困苦、磨难、酷刑，甚至面对死亡时都不曾放弃的。据此，如果将共产党方面把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送往前线去与侵略者作战，说成是为了生存，逻辑上都是荒谬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中曾这样说：

……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边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须之自卫手段……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

至于后来共产党方面的不断壮大，应是国共双方当初都不曾预料的。基于中国历史的现实角度，应该这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民族的存亡盛衰，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民族大义永远高于一切，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例外。民族灭亡了，国共两党都不会存在，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因此，即便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十年的屠杀与“围剿”，此时此刻的共产党人依然坚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必是对中华民族战斗精神的推动，必是对中华民族战斗意志的提升，这种推动和提升将是赢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毋庸讳言，红军的改编，至少在中国对日作战初期，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从军事意义上讲，三个师兵力的加入，对即将在这片辽阔国土上展开的规模巨大的战争影响有限。况且红军改编的三个师武器装备简陋，红军官兵对现代集团式的地面作战经验也欠缺。对此，毛泽东曾十分清醒而明确地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红军的决定作用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大敌当前的危难时期，民族之心的凝聚和振奋生死攸关。共产党方面有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说的是指望天上掉馅饼的人肯定要饿死；二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说的是指望别人的恩赐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屡屡面临危机，而危机的拯救永远不能依靠外来势力，每一次指望列强随之而来必是更大的一场噩梦。就像一九〇一年，大清王朝在被迫逃亡的遭遇中与列强签下了《辛丑条约》，导致不但为巨额

赔款需要向列强借款，同时还要允许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于是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救中国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同心协力——从对世界乃至中国历史的洞察而言，中国共产党人远比国民党人清醒得多。

“万一中日交战，英国应该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早在卢沟桥事变前，英国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就曾对中国明确表态。英国在东南亚有巨大的殖民利益，最惧怕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卢沟桥事变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虽然英国人将日本与德、意列为一个阵营，但在中日战争初起时，德国的表现却令日本人强烈不满。那时候，日本已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彼此成为政治上的同盟，但德国自近代以来就与中国关系密切，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是德国人，武器装备也大多采购于德国。所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丧失德国盟友的意义反而给德国增添累赘，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会独占中国使德国失去在华利益。因此，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人的行动。德国外交部随即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立场。日本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停止为中国输送军火，并且扬言要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军事顾问不准到前线参战之外，德国与中国的军火和工业贸易并没有停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军逼近中国首都南京之时。意大利与日本在一点上极为相近，即对中国的极度蔑视。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声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坚决支持日本，并由此成为中国抗日军民的死敌。

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复杂微妙。很早的时候，德国就曾警告过日本：“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出于日俄战争时俄国战败从而失去对中国东北地区控制的旧恨，更重要的是出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关东军已经兵临苏联边境的担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开始试图改善与军阀混战的中国的关系。一九三七年四月，苏联得知中国已经启动对日作战的军事准备，便主动向国民政府建议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订购急迫所需的军火。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了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一个多月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根据这个条约，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向中国提供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援的国家。但是，国民政府在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也十分苦恼。国民党人始终认为，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台，共产党企图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暴力革命是受苏联共产党主持的共产国际的指挥。只是，在日本亡华企图越来越明显的时刻，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苏联雪中送炭般的援助。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对日作战急需国际支持，否则难以获胜——共产主义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两者在蒋介石都是不能容忍的，如今他只有两害之中取其轻，即接受苏联的援助用以抗击日本。一九三七年九月，苏联援助中国的第一批军事物资——轰炸机六十多架、驱逐机一百余架、坦克八十余辆、反坦克炮三百余门以及一批重型轰炸机和高射炮，连同苏联教官和技师一起陆续到达中国。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苏联援助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无关，共产党方面没有得到过苏联援助的一枪一弹；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与“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无关。苏联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自近代以来，苏联与日本就是势不两立的死敌，同时苏联又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与中国接壤、与日本相邻的国家。因此，全力支持中国，使中国有力量在本土拖住日军的主力，就可以避免与法西斯德国开战时苏联出现东西两面都需作战的被动局面。

美国本土距离中国很远，但美国在太平洋有特殊利益，这一特殊利益与日本有着天然的、不可回避的冲突，冲突决定着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日军登陆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六。可是，对日贸易也是美国主要的国际贸易。权衡之下，为避免日美矛盾激化，美国对日本的战争行为采取了绥靖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表示，美国站在中间立场，将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要求中日双方在战端面前都要保持克制。为了显示美国是有正义感的国家，总统罗斯福甚至下令禁止美国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事物资。直至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扩大，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罗斯福总统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当一种流行症开始蔓延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罗斯福把日本比喻为流行病毒的携带者，但无法得知美国所说的“隔离”，在外交、经济、军事乃至政治上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是，总统和国务院的话音未落，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抨击，他们认为总统和国务院的言辞对美国来讲是危险的，因为美国“在

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日本）来一次'道义上的雷击'也是徒然的”。罗斯福总统只好解释说，美国不会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对日本实施制裁。然而，这番话却又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义，而在亚洲却要实行门户开放？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美国武装干涉占领加勒比海沿岸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而日本不行？靠烈酒和屠杀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了整片土地的美国，有什么理由对日本占领满洲如此愤怒？

曾经担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反驳罗斯福的言辞直率得令人吃惊，他说日本通过战争寻求扩张，如同“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

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且问问美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当年的美国是何等令人恼怒吧！日本的扩张如同美国的扩张，就像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长大——死亡。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愤怒与松冈洋右如出一辙：

当今世界存在“占有国”与“非占有国”的斗争，严重地表明原料、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如果不予纠正，在既得权利方面，“占有国”对“非占有国”拒绝让步，那末，解决的办法就只有诉诸战争。

日本人观点的核心是：这个世界几乎已被列强瓜分完毕。殖民主义者在全球抢占地盘的时候，没有遭到过国际社会的任何谴责，怎么轮到日本时就出现了声讨、警告、制裁？而日本人提出的“占有国”与“非占有国”的概念，即指美国、英国、俄国、法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它们都属于“占有国”，它们都已将殖民地占领完毕；只有日本属于“非占有国”，还没有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捞到什么好处。在如此情形下，如果“占有国”再不给“非占有国”一点方便，那么就只有通过战争成为“占有国”了。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占有国”和“非占有国”之外，还有中国这样的“被占有国”——谁为“被占有国”的命运着想了，“被占有国”又该如何解决侵略者的“占有”问题？

在国与国之间，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利益。

因此，中国在一九三七年面临的严酷现实是：全民族团结起来，独立对日作战。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共识的根本基础。

全面战争在即，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迎面而来：中国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战争是物质的抗衡，是交战双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对决，即交战双方国力和军力的对决。

战争也是精神的较量，是交战双方作战决心、作战意志、作战毅力与战争智慧的抗衡。

就一九三七年的中国而言，面对将会蔓延至整个国土的战争，全民的坚强意志以及胜敌决心是必须的，但显然还是不够的。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比日本多数倍，国土面积也比日本大数十倍，可仅从综合国力上比较，当时的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

一九三七年，日本工业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九点九，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全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一九三七年的中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把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算在内，中国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除了沿海部分城市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少数的轻工业外，中国所谓的“工业”绝大多数仍处于手工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至少已经延续了上千年。而战争，其实是在打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战争开始的一九三七年，中日两国的主要经济指标是：

工业总产值：日本六十亿美元，中国十三亿六千万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五百八十万吨，中国四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五千零七十万吨，中国两千八百万吨；

铜产量：日本八万七千吨，中国七百吨；

石油产量：日本一百六十九万吨，中国一万三千一百吨。

唯一能够掣肘日本工业能力的因素，是岛国本土资源的匮乏，特别是棉花、橡胶、羊毛，铅、锡、锌等有色金属以及石油和煤炭。日本本土年产铁矿仅为四十五万吨，加上从朝鲜掠夺来的六十万吨，也仅能满足其所需的六分之一。中国的东北地区，煤、铁蕴藏量极其丰富。当时，抚顺年产煤七百万吨，本溪年产煤六十万吨，产量合计居全国第一。东北的铁矿藏量和钢铁产量也居全国第一，辽宁一地的铁矿储量就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九，鞍山和本溪两处的钢铁产量合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还有石油，东北地区的储量占全国探明储量的百分之五十二。但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无异于丧失了经济命脉”。“日本本土资源实甚贫乏”的现状，自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情势为之一变”。

依靠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一九三七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高达二十二亿三千万日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两倍以上，占到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七。日本已具备年产各种作战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的产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年需要量。一九三七年，如果说中国尚有军事工业的话，其水平与清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经办洋务的时代区别不大。整个国家没有生产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能力，飞机和舰船虽然能够少量生产，但主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远达不到支持一场全面战争的批量生产规模。中国能够生产的只有步兵的轻武器以及小口径火炮，其生产能力同样无法支撑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量。

一个是强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生产能力的统计数字上。当时的中国与日本，还是两个呈现出完全不同面貌的国度。处于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日本，国民怀有一种狂热追求未来的集体意识，宪政制度带来的社会运转程序的相对合理，不但促使经济不断繁盛，并由此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仅就教育而言，清末以来，中国派遣或自行留学日本的风潮盛极一时，国民党内军政高层——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而遍及全国的各种爱国团体、准军事组织等，使日本积蓄起巨大的驱异求同的潜在能量，使得全民族全社会形同一个坚固的精神整体。

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中国最为混乱的历史时期。尽管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创建之初颁布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

是个连一部国家正式宪法都没有的国度。列强的野蛮掠夺和对民族工业的压制，使得中国薄弱的国民经济日益衰败，连年的军阀混战更是在民不聊生的境况下令整个国家于不断的战火中奄奄一息。这个国家曾以文明发祥绝早而自豪，但数千年的文明积累仍是无法挽救国民麻木萎靡的现状。没有多少中国人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渴望，如同农民无法预测天象收成只能听天由命一样，即便是志士的流血与精英的呐喊，也唤不醒无边无际的死气沉沉的原野。到处是水车在缓慢地转动，牛车在深深的车辙中挪移，还有低矮的草屋和饥饿的孩子。因为有着惊人的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中国人能“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时间”，无论街巷与乡村，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无所事事的沉默，而沉默者脸上“麻木的、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与绝望”。这个古老的国度，已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徘徊在永远的日出日落之中。

一个衰败落后的国家是无法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队的。

根据日本陆军史记载，中日战争开端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总兵员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人，其中战斗兵员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除国内常驻的十一个师团外，其余为朝鲜军、关东军、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其兵力配备是：

中国驻屯军：一个混成旅以及关东军所属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师团。

关东军：除了第一、第二、第四、第十二师团外，还有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独立守备队，骑兵第一、第三、第四旅团，独立山炮兵第四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九联队，高射炮兵第十二联队，飞行集团司令部，飞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联队，铁道线区司令部，铁道第三联队，电信第三联队，汽车第一、第二联队，测量队，防疫队，军马防疫厂，野战兵器厂，野战航空厂，临时军事法庭，下级军官候补队，旅顺要塞司令部，宪兵队，陆军医院以及陆军仓库等。另外，关东军各师团在国内还有留守部队，包括两个步兵旅团和骑兵、野炮兵、工兵联队，通讯队以及辎重部队，共计一万零五百多人。

朝鲜军：第十九、第二十师团，此外还有要塞司令部、医院、仓库等部队。

台湾军：台湾守备司令部，步兵第一、第二联队，山炮兵联队，重炮兵联队，高射炮队，基隆、澎湖要塞司令部以及陆军医院等部队。

日本陆军航空兵司令部设在东京，辖第一、第二、第三飞行团和直属部队，分别驻扎在日本本土、中国台湾和朝鲜等地。

日本陆军在本土的部队是：近卫师团、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共计十一个师团。

日本陆军的“师团”建制，世界上绝无仅有，实际上是一个各兵种联合的作战单位。自明治以来，日本陆军一直沿用的“师团”编制为：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以及少量的后勤单位。其中一个步兵旅团辖两个步兵联队，一个步兵联队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因此，一个日本陆军师团，常设四十八个步兵中队。而每一个师团的兵力数，各个时期不相同，平时与战时也不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师团平时兵力为一万三千，战时为一万八千；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时，日本陆军师团兵力平时一万五千，战时为两万多。

日本是第一个实行现代征兵制度的亚洲国家，法律规定全国凡年满十七岁至四十岁的男子都须服兵役。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除了现役的三十八万官兵外，尚有预备役兵七十三万八千人，后备役兵八十七万九千人，第一补充兵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人，第二补充兵九十万零五千人。日本总人口约为一亿零五百万，其兵役制的规定意味着日本陆军在战争需要时，可动员兵力能够达到一千万人。

而中国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年才开始整编陆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计划是：一九三八年完成六十个调整师的编制。调整后的陆军师被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师，每师辖两个旅四个团，辖三个团的师不设旅部。师部直属骑兵连一个，炮兵、工兵、通信、辎重营各一个，卫生队、特务连各一个。甲种师是陆军主力部队。

乙种师，每师辖两个旅四个团。师部直辖一个骑兵连、一个炮兵营和一个通信连、一个无线电排、一个特务连、一所医院。乙种师是陆军预备部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陆军编制为四十九个军，一百八十二个步兵

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又六个独立旅，四个炮兵旅又二十个独立团以及少量的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七十余万人。但是，这仅仅是编制数量，作战初期预计真正可以投入使用的陆军兵力为：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和十六个独立团，兵力总数尚不足百万。

因为在漫长历史中实行的募兵制根深蒂固，中国一九三三年颁布《兵役法》后始终没有得到施行。募兵制在中国自唐五代一直延续至清，即使清末袁世凯组建陆军新军时，兵员依旧来源于募兵制。与征兵制不问的是，募兵为招募与应募，应募者的多少好坏是招募者无法掌控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国民政府强制实施《兵役法》，即依照国家法令合乎标准的国民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可实际上落实下去仍旧变成了招募与应募。因此，中国军队没有预备役，后备兵源仅有一九三六年底才训练出来的五十万壮丁。——在日后漫长的对日战争中，中国在兵力动员上常常处在难以为继的窘境里，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讲真乃拙咄怪事。

在武器装备方面，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也相差甚远。

日本陆军一个师团与中国陆军一个师对照：各种枪支，日军师团九千四百七十六支，中国师三千八百三十一支；掷弹筒，日军师团五百七十六具，中国师二百四十三具；轻机枪，日军师团五百四十一挺，中国师二百七十四挺；重机枪，日军师团一百零四挺，中国师五十四挺；野山炮，日军师团六十四门，中国师十二门；步兵炮，日军师团四十四门，中国师三十门。——以上仅为常规武器，尚不包括日军师团拥有的上千辆特种战车以及数十辆坦克。就战斗实况而言，日本陆军不但配备有大量的特种兵，还能得到空军和海军的全力支援。

一九三七年，日本海军仅次于英、美，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中日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经服役的作战和辅助舰艇有：航空母舰四艘，主力战列舰九艘，重巡洋舰十二艘，轻巡洋舰二十一艘，驱逐舰一百零二艘，潜水艇五十九艘，练习战舰一艘，水上机母舰两艘，潜水母舰五艘，布雷舰六艘，海防舰七艘，炮舰十艘，水雷舰八艘，扫雷舰十二艘，以及修理舰、运输舰、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舰、猎潜舰等，总计二百八十五艘，总排水量达一百一十五万三千吨。另外，尚有两艘主力舰、两艘航空母舰、四艘轻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三艘水上机母舰、四艘水雷舰等正在建造中，即将全部投入作战序列。

中国海军至中日开战前夕，共有各种舰艇一百二十余艘，且都是小型舰艇，总排水量仅为十一万吨。即便如此，实际可以投入作战的舰艇仅有六十余艘，总排水量约六万吨，不足日本海军的二十分之一。中国海军的舰艇，不但小而且老，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北洋水师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的巡洋舰是仅次于“海圻”号的“海琛”号，同样是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一八九八年从德国购买的，排水量仅为两千九百五十吨，航速每小时十九节，装备有十五厘米舰炮三门、十点五厘米舰炮八门、四点七厘米舰炮四门以及三十七厘米四连发鱼雷发射管一具。而此时日本海军所拥有的常规巡洋舰，排水量都在一万三千吨以上，航速每小时六十一公里以上，普遍装备有二十厘米舰炮十门、十二点七厘米舰炮十六门、六十一厘米四连发鱼雷发射管四具。如此，可以想见，中国海军的主力舰一旦遭遇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战局将会是怎样的。

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隶属于陆军和海军。陆军航空兵拥有五十四个飞行中队，其中战斗机中队二十二个，每个中队有常用战斗机十二架，备用战斗机八架；轻型轰炸机中队六个，每个中队有常用轰炸机九架，备用轰炸机六架；重轰炸机中队八个，每个中队有常用轰炸机六架，备用轰炸机四架。另外还有侦察机中队十五个，轰炸、侦察混合中队三个，每个中队拥有的飞机数量与战斗机中队相同。总计，日本陆军航空兵有各种作战飞机约九百六十架。此外还有运输机、训练机和研究机等数百架。

中国空军名义上拥有各种飞机六百多架，但能够参战的飞机仅有三百零五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多个国家，由于机种复杂，维修困难，十分不利于作战。少量的国产飞机也由于零部件依赖进口而长期不能使用。

除了武器装备，中日两军最重要和最明显的差距，是整体素质之别。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依托现代资本主义和天皇一统的混合政治体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现代军事指挥系统。大本营的军事指挥统一而高效，对陆海空三军拥有绝对的权威。日本内阁里陆相和海相的设置，近似于美国的三军参谋长联席制，指挥权的高度集中使之对军队的调度和作战的指导迅速便捷。日本军队已经完全摒弃了幕府时代割据的弊病，成为一支宣誓效忠天皇并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的强大的武装力量。日军官兵对内的绝对服从，对外的凶狠顽强，对自身的舍生殉道等

基本素质，使“其能征惯战之精神为世界各国军队首屈一指”，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军力强悍的武装集团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陆军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并不统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部队约七十个师，习惯上被称为“中央军”，其中约四十个师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黄埔军校学生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后来一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进行训练，装备相对较好，官兵素质较高。其余的三十个师，均来自北伐时期跟随蒋介石或者被蒋介石收编的旁系部队，虽然仍被叫作“中央军”，但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素质都比较差。中国的地方军阀部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畸形存在。这些部队基本上是地方军阀的私属军队，他们各有各的招募制度、编制制度和军需制度，武器也是自己筹款购置或是自己土法生产的。财力丰厚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好一些，财力薄弱的军阀军队武器装备就相当原始。特别是，在这些军阀部队的内部，吃空额、喝兵血的弊端习以为常，一些官兵沾染上吸毒、狎妓、纳妾等恶习。因此，国难当头之时，尽管地方军阀部队愿意抗日救国，但这终究是两国之战而不是两省厮杀。——面对作战意志极其统一坚定的日本军队，中国军队“无论就编组、训练、装备、补给任何一方面言，都是杂乱无章的”。而对于一支军队来讲，如果官兵素质、作战能力、武器装备、整体协同乃至统一指挥均陈旧落后，那么在战争来临时就会“不堪一战”或是足以致命。

国民政府在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间的巨大差距。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称：“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应速具勇往果断之决心，采取最进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做适当之准备，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活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该案在计划条款中特别提出：“国民经济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设，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国民政府提出：“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主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

国民政府制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一九三六年计划拨款一千万元，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的这一年——拨款猛增到两千万元。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先后投资建立了二十多家重工业企业，主要包括铁矿、炼钢、有色金属矿和冶炼、煤矿、电机制造、机器制造等，并且从应对战争角度考虑，将这些企业大多分散在了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甚至是在青海。中国对日作战全面开始后，这些企业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有些甚至已经投入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没有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国内仅有的几家兵工厂分散在各地军阀手里。特别是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后，国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兵工厂只有上海、金陵、汉阳、巩县等少数几家。一九三五年，巩县兵工厂仿制出德式毛瑟枪，被定名为“中正式”，并投入了批量生产。金陵兵工厂能够仿造出马克沁重机枪。汉阳兵工厂可以制造出七十五毫米的野炮、一百毫米榴弹炮和二十毫米高射炮。但是，直至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几家兵工厂产品品种之少和产量之低，对于一个面临全面战争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数量庞大的军队来讲，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金陵兵工厂：月产八十二毫米迫击炮一千八百门，手提机枪三百五十八挺，马克沁重机枪三十三挺；

上海兵工厂：月产七十五毫米山炮六门，七九式机枪子弹、六五式步枪子弹各二百四十万发；

汉阳兵工厂：月产七十五毫米山炮两门，八八式步枪四千七百支，三十节式重机枪三十五挺；

巩县兵工厂：年产“中正式”步枪五万支，月产元年式步枪三千一百二十支，捷克式轻机枪二十五挺；

汉阳火药厂：月产枪药三十吨。

自己制造不了，只有在有限财力支撑下进口武器。由于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是德国人，于是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武器最多。中日战争爆发前，从德国购买的坦克、重炮、高射炮、机枪、探照灯、鱼雷和舰艇等，大约装备了三十万人的中国军队。

德国军事顾问提醒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蒋介石立

即派出军事交通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并主持制定出国防交通建设计划。截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先后建设的铁路项目有：一九三五年九月，同蒲铁路通车，打通了平绥、陇海两大干线；一九三六年四月，株洲至韶关段通车，全线贯通了粤汉铁路；同年，浙赣铁路通车至南昌；一九二七年七月，广九铁路和苏嘉线投入运行；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陇海铁路宝鸡以东至连云港线路通车；一九三七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中国铁路的通车里程已达一万三千公里。国民政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新建铁路总里程是中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八年间铁路建设里程的六倍多。国民政府还动用大量储备资金购买机车设备，至中日战争爆发前，中国铁路共有机车一千二百七十二辆，货车一万六千三百四十二辆，客车两千四百一十六辆。全国各条重要铁路线上增设了军用站台、军用岔道二百多公里；各铁路干线还储备了可供使用一年以上的铁路器材和燃料，修建了防空壕和地下室。但是，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铁路干线都是单行线，而且铁轨规格不统一，其中同蒲路、正太路、浙赣路的杭江段竟然还是无法与全国其他铁路网有效连接的窄轨。中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公路已有十万九千五百公里，其中铺设路面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一公里，土路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九公里，全国连接各省之间的公路网基本形成。但是，中国的公路即使是铺设了路面，也多是沙石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土路更是会令所有的交通工具寸步难行。汽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奇的东西，偌大的国土之上，载人汽车加起来不足一万辆，载货汽车也只有一万三千辆。现代交通工具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调动的速度，竟然比不上从异国侵入的日军。

或许认识到中国军队很难快速调防，快速突击，于是按照中国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思维惯性，国民政府耗费巨资在沿海和沿江诸要点修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国防工事按坚固程度分为三种：钢筋水泥构筑的永久式、铁轨和枕木构筑的半永久式、简易材料构筑的临时式。国民政府在预计未来将与日军作战的主要地点构筑的军事阵地的分布是：

一、山东区：潍河、鲁西、鲁南；

二、冀察区：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

三、河南区：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

四、徐海区：海州、运河、徐州、蚌埠、淮阴；

五、山西区：晋东、晋北；

六、绥远区：绥东、绥北；

七、浙江区：沪杭线、宁波、温州、台州、京杭；

八、江苏区：京沪线、南通、南京；

九、福建区：龙岩、延平、福州、厦门；

十、广东区：潮州、汕头、雷州、琼州、广州、惠州。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江苏、浙江、山东、河南、陕西、绥远、冀察各区的第一期国防工事已基本修筑完成。可是，日后的战争进程证明，这些花费大量资金修筑的国防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它们或是被撤退中的中国军队遗弃，或是当敌人来临时工事还没有完工，或是完工了但却是根本不能使用的“豆腐渣”工程。

国民政府只有一种战争准备下手很早，且在日后的战争中真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大后方的选择和建设。全面作战尚未开始，国民政府就意识到，只要仗一打响，中国军队连同政府一起很可能要往内地跑，而跑到哪里合适要提早筹划。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入川，督导对贵州、四川和云南的经营建设。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控制中国西南的目的：“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建设，解决了中国对日战争时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国应对战争的准备有着无法逆转的重要欠缺。

但是，战争已在眼前。

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制订了极其详尽的甲乙两套作战计划，涉及敌情判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作战指导要领、战斗序列及战场区分、各兵团之任务及行动、航空与防空、海军、交通和通信、兵站、警备等，均为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下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对中国将要面对的战争局势的判断：

（一）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

（二）敌军之攻击方向，对黄河以北，由古北口山海关经北平——天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向郑州——济南——徐州前进，期将我主力歼灭。或将我国军向西北贫瘠之区压迫，期以封锁之。其副作战，由多伦经张家口——绥远——河套——大同，及由北平经保定、石家庄，向太原前进，取包围山西之势。

此外更将利用其有绝对制海权，由胶州湾——海州等处登陆，以威胁我在黄河北岸作战军之侧背。

（三）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敌今在上海已构成相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意志。

（四）在二三两项之作战，敌为贯彻其根本国策，具有极重大之意义。然敌国惯以武力恫吓之手段，以遂其要求。今我国既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则将来战争爆发之初期，或不即实现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而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

（五）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对俄军，海军主力应对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

（六）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为掠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对我国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七）杭州湾以南沿海岸各要地，预料只有局部之攻击，以达其扰乱之目的；唯福州——厦门——广东之汕头等地可与台湾琉球亘日本三岛，构成一中国海之防御线，敌将有占领之企图。

（八）敌国为对俄形成包围有力之势，或将以一部协助伪匪由多伦经张北——化德——归绥——包头——河套前进，以为向蒙古及陕甘新攫取根据。

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判断是准确的。

即使对于日本来讲，虽然已经发动了对中国平津以及淞沪的战争，但是在必须确保的“满洲国”的东北西三面，苏联远东军的存在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忧患，忧患令日本在向中国全面开战时不得不想到这也许是“一种冒险”：“苏联远东军（包括西伯利亚军区）有二十八个阻击师，四五个骑兵师，六个装甲旅，一千五百架飞机，另外还有十个师的蒙古骑兵，战时远东兵力达三十一至五十个师。”因此，即使在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还是想到过速战速决的问题，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向军方提出了一个即使在日后长期的战争中日本人也始终没能解决的困惑：“究竟进攻到什么地方蒋介石才能屈服？”正在进行的淞沪战事，远没有日本人设想的那样“取得进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动员起全国所有的力量进行战争准备。因此，日本人认为，必须“依靠行使必要的实力来收拾事态”，“务必给予”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使其丧失战斗意志”。——已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升任参谋次长的多田骏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预感到：“这次事变战争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八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战时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这个机构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组成中国大本营，由蒋介石任海陆空大元帅，程潜任参谋总长，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中国大本营是国家战时体制，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以实行国家总体战。

中国大本营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辖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预备军，总司令阎锡山兼任。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辖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辖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

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

由大元帅和参谋总长直辖的部队是：

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

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

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

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浚；

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兼），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

接着，国民政府以大元帅蒋介石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大本营第一、第二、第三号训令，在年初制订的甲乙两套作战计划的基础上，连续颁布了一系列的作战指导训令，要求所有部队“仰即遵照实施之”：

第一战区：“近迫该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得从容展布。但如敌军企图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以防制之。”

第二战区：“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不敢放胆施行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

第三战区：“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对。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第四战区：“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

第五战区：“本战区作战之特性，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故以立于

主动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籍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

海军：“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空军：“空军应集中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以敌舰及炮兵为主要目标），尔后任务另指定。”

第一至第四预备军：“除别命所示者外，各依指定之地区，迅速集中完毕后，根据各战区前方会战之经验，各自实施（必要时可与中央各军事学校连络）适当之战时教育，并保有随时应战之机动性。”

直属部队与预备军同。

后方勤务部：“适应各战区作战之要求，完成通讯、交通诸设备，充实弹药器材诸项补充。对集积运输之要领，即务必分散配置，顾虑对空遮蔽，以避免敌空军及炮兵之轰炸，且能不失时机补充前方，并考虑第二期作战之物资充足法为要。”

几乎是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晋谒天皇，呈奏扩大对华战争方案。在奉答天皇的垂询时，两总长就如何能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进行了凶狠的表述：

一、为早日达到目的，当前最值得期待的手段是以海军航空兵力消灭敌国军队最为出色的航空兵力，并且反复攻击其重要军事设施、军需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等，以使敌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为此，需要迅速夺取在上海附近的陆上航空基地。

二、仅以上项措施不能保证达到目的，因此须做好战局将相当拖长的思想准备，从而继续或重新实施以下各项措施：

（一）在华北方面，必须确保平津地区及其周围的主要占据地区的安定，同时对企图向我采取攻势的中国中央军给以打击，使其丧失抗日的自信心。

（二）确保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

（三）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

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以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的形式，代替天皇正式的宣战诏书——无论使用什么形式，日本天皇的这份诏书，等同于日本已经向中国宣战：

依靠帝国和中华民国的提携合作，确保亚洲安定，以求得共荣，乃日夜不能忘怀之事。中华民国不理解帝国之真意，肆意制造事端，以至有今日之事变。朕对此深为遗憾。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挥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切望帝国臣民配合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同心协力，达所期待之目的。

什么是“所期待之目的”？

九月三日，日本召开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除正式发表开幕式诏书外，决定“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施政报告，明确回答了日本“所期待之目的”是什么：“今日日本所应采取的手段是，尽可能迅速给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使其丧失战斗意志。然而，这个方面如仍不觉醒，继续顽固抵抗，则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

一九三七年九月，无论早有预谋的日本，还是尚在准备的中国，都已表示出强硬的立场。

日本人说，须迅速彻底地让中国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须用中国的不屈意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中国人同时也知道，面对这场战争，这片国土将承受难以预料的灾难与苦痛。

“寇深矣！祸急矣！”

中国人是信奉祖先神灵的民族。每当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时，中国人都会期望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并祈求在祖先那里获得勇气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因此而撰文，祭祀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琢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祭祀之地在黄河岸边的黄土高原上。

黄河以北，青纱帐一望无际。

一九三七年初秋，谷穗满了，高粱红了，鬼子来了。

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兼），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

接着，国民政府以大元帅蒋介石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大本营第一、第二、第三号训令，在年初制订的甲乙两套作战计划的基础上，连续颁布了一系列的作战指导训令，要求所有部队“仰即遵照实施之”：

第一战区：“近迫该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得从容展布。但如敌军企图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以防制之。”

第二战区：“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不敢放胆施行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

第三战区：“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对。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

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第四战区：“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

第五战区：“本战区作战之特性，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故以立于主动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籍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

海军：“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空军：“空军应集中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以敌舰及炮兵为主要目标），尔后任务另指定。”

第一至第四预备军：“除别命所示者外，各依指定之地区，迅速集中完毕后，根据各战区前方会战之经验，各自实施（必要时可与中央各军事学校连络）适当之战时教育，并保有随时应战之机动性。”

直属部队与预备军同。

后方勤务部：“适应各战区作战之要求，完成通讯、交通诸设备，充实弹药器材诸项补充。对集积运输之要领，即务必分散配置，顾虑对空遮蔽，以避免敌空军及炮兵之轰炸，且能不失时机补充前方，并考虑第二期作战之物资充足法为要。”

几乎是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載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晋谒天皇，呈奏扩大对华战争方案。在奉答天皇的垂询时，两总长就如何能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进行了凶狠的表述：

一、为早日达到目的，当前最值得期待的手段是以海军航空兵力消灭敌国军队最为出色的航空兵力，并且反复攻击其重要军事设施、军需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等，以使敌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为此，需要迅速夺取在上海附近的陆上航空基地。

二、仅以上项措施不能保证达到目的，因此须做好战局将相当拖长的思想准备，从而继续或重新实施以下各项措施：

（一）在华北方面，必须确保平津地区及其周围的主要占据地区的安定，同时对企图向我采取攻势的中国中央军给以打击，使其丧失抗日的自信心。

（二）确保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

（三）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

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以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的形式，代替天皇正式的宣战诏书——无论使用什么形式，日本天皇的这份诏书，等同于日本已经向中国宣战：

依靠帝国和中华民国的提携合作，确保亚洲安定，以求得共荣，乃日夜不能忘怀之事。中华民国不理解帝国之真意，肆意制造事端，以至有今日之事变。朕对此深为遗憾。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挥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切望帝国臣民配合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同心协力，达所期待之目的。

什么是“所期待之目的”？

九月三日，日本召开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除正式发表开幕式诏书外，决定“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施政报告，明确回答了日本“所期待之目的”是什么：“今日日本所应采取的手段是，尽可能迅速给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使其丧失战斗意志。然而，这个方面如仍不觉醒，继续顽固抵抗，则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

一九三七年九月，无论早有预谋的日本，还是尚在准备的中国，都已表示出强硬的立场。

日本人说，须迅速彻底地让中国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须用中国的不屈意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中国人同时也知道，面对这场战争，这片国土将承受难以预料的灾

难与苦痛。

“寇深矣！祸急矣！”

中国人是信奉祖先神灵的民族。每当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时，中国人都会期望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并祈求在祖先那里获得勇气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因此而撰文，祭祀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祭祀之地在黄河岸边的黄土高原上。

黄河以北，青纱帐一望无际。

一九三七年初秋，谷穗满了，高粱红了，鬼子来了。

第四章

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

八月，沿着津浦路南下的日军，突然遇到一群红脸的中国人。

在天津南面的津浦铁路线上，有一个小站名叫静海。小站边有一条减河。天津被日军占领后，北方的大雨仍旧断断续续，减河水因此涨起来，河面足有二十米宽。在长满茂密芦苇和杂草的两岸堤坝之间，横着一座木制拱桥。

日军陆军中将矶谷廉介指挥的第十师团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后，沿着津浦铁路向南推进。当其前锋第三十三旅团第十联队在泥泞之中推进到减河边那座木桥时，突然愣住了。

一群中国军人，不但脸红得耀眼，而且每人举着一把刀柄很长的大刀——日本人大多熟知中国古代人物关羽，在他们的记忆里画像中的关羽便是这般模样。

这群中国军人，就是从天津撤退下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的官兵。天津失守后，部队向南撤退，退到了静海车站，官兵们停下来准备死守。旅长李致远认为，兵力和武器都不如日军，要吸取在天津城区与日军拼阵地战的教训，除留一个营守车站、一个营守县城外，专门用一个营在津浦路两侧打游击——鬼子来的人少就往死里打，人多就与他们转圈子，不能让日军直接攻击我们的主阵地。日军的装甲火车曾试图冲进静海车站，但官兵们在铁轨上铺上麦秸并埋设了地雷，日军的装甲火车没敢再往前开。车上的日军下车后想攻击车站，被打游击的那个营抄了后路，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跑回去了。

这次，师部下达的命令是：一个大队的日军正沿着津浦路急速南下，他们要通过那座木桥抢渡减河，担任津浦路沿减河至海岸边防御任务的独立第二十六旅要阻止日军南下。他们在减河边苦守了二十多天。

李致远旅长召集团长和营长们训话：如果不把日军顶回去，让他们顺利过了河，师的防线就会垮。所以，这一次，独立第二十六旅要在减河边与鬼子玩命。

……我大声而肯定地说：“我们要死守这条河，每团选出敢死队，每

人带着长把大刀和四颗手榴弹，用洋红抹成大红脸，冲过桥去，用大刀砍！”我问谁愿领敢死队？当时朱团长把胸脯一拍激昂地说：“我带着去！”说着把上衣一脱，跑到他选出来的敢死队前说：“脱了光背，将红抹上，跟我来！”这一百多人全跟去了，马团选出来的一百多人也去了。我看人数太多，想拦住，他们还是都跑过去了。用长柄大刀，是根据过去的战斗经验，因为我们的刺枪术不敌日军，将大刀把接长三尺，在白刃战时有利。每人一包洋红抹脸，据说日本人怕红脸，也是表示我们流血死拼的决心。

敢死队呼喊着冲过桥去。日军面对突然出现的一片红光和长柄大刀没有任何准备，愣了片刻后掉头就往回跑。军靴上沾满了泥，跑起来很笨拙，二百多把长柄大刀不由分说地乱劈下来，瞬间就砍倒了不少鬼子。后面赶来的日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败兵冲乱了，也跟着往回跑。一个日军军官被劈下马来，混乱中没有人能顾及他。中国官兵杀红了眼，连旅长调他们回来的号音都没听见。李致远之所以命令他们回来，是敢死队队员都没带枪，怕他们杀出去远了吃亏。号声不管用就派副官骑马去追，快马终于追上了朱团长，敢死队这才罢手返回。

但是，仍有一些弟兄没能活着回到减河边。

官兵们把所有的船都凿沉了，然后在木桥上泼上汽油放了一把火。

日军仅用少数兵力就占领了中国北方政治和军事中心平津地区，这使得日本大多数军政要人更加轻视中国的抵抗能力与决心。日军开始制订在整个华北的作战计划，其最终目的是：迅速对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和参战的中国空军以毁灭性打击，从而“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在华北作战结束之前，不与中国方面作外交上的任何交涉，也不允许第三国干涉——要“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驻屯军在结束平津地区的“第一期作战”后，迅速制订出“第二期作战”计划。该计划不但把驻扎在河北的中国军队称为“侵入者”，而且以横扫一切的狂妄声称“所到之处将敌消灭”：

一、为消灭侵入河北省的敌野战军，计划待大致集中完后进行决战。首先向保定、沧州一线前进。主决战方面定位于沿平汉线地区。决战时间预定在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

二、军使逐步集中的第五师团及铃木兵团，从平绥沿线地区开始作战，席卷察哈尔省，进入山西北部和绥远地区。为此，须与关东军紧密

协作。

这一作战至少应在主力决战之前占领张家口附近。情况允许时，还将调第五师团主力迅速到河北作战地。

三、在保定、沧州附近的会战，向石家庄、德州之线追击。

四、根据情况决定以后作战指导。预料军在第二期以后，或将策应可能在山东方面和扬子江下游方面进行作战的作战军。

五、军在八月十二日左右，由铃木兵团消灭南口之敌，一举夺取八达岭，并掩护第五师团挺进。

六、使逐次集中的第五师团沿平绥线，首先向张家口方向作战，消灭侵入察哈尔省的中国军队。在八达岭以西的作战，由第五师团长指挥，使与关东军密切配合。

七、军以两个师团（第六、第二十）由平汉线方面，以一个师团（第十）由津浦线方面采取攻势，向保定、沧州一线前进。

九月中旬开始前进，下旬进入保定、沧州附近敌之阵地前沿。决战日期，计划在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

八、敌若开始进攻，则我军不要等待全部兵力集中，即开始攻击前进，所到之处将敌消灭。

但是，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大本营又暂时修改了进攻方向。

这也是减河边的中国军人能够坚守二十天的重要原因。

日军位于平津地区的部队，被命令将主攻方向首先转到沿平绥铁路向西的张家口。其原因是：关东军急切地希望解决“蒙疆问题”，即占领中国的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地区，以确保“满洲国”侧后的安全。同时，在华北地区的平汉线、津浦线作战开始前，必须扫除后方的威胁。

担任平绥线攻击任务的日军主力第五师团尚在集结中。

中国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奉命率先向南口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目的是夺取八达岭等长城一线的要地为后续开来的第五师团开路。

中国方面对日军作战企图的判断是："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而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之所以判断日军会首先攻击平绥线，是因为南口一线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中国军队的"旋回之轴"："平绥线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联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为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江、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

据此，中国方面决定："固守南口、万全之线"。

中国的平绥铁路，自北平起，经张家口、大同，直到包头，是联系华北北部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平绥路东段的重镇南口，是北平通向西北地区的门户。南口附近高山峻岭，关隘重重，内外长城蜿蜒于铁路两侧，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天险。日军企图进犯张家口，占领察哈尔省，然后分兵晋、绥，中国军队要保卫察哈尔、山西、绥远三省，对于南口的控制都是必须的。

早在七月底至八月初，蒋介石针对南口防御就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位于绥东地区的汤恩伯的第十三军紧急备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负责炸毁青龙桥八达岭一带的铁路；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做好迎战准备；调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迅即集中张家口"，协助刘汝明"固守张垣"；令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和第八十四师合并为第十七军，高桂滋任军长，归刘汝明指挥。

蒋介石要求南口阵地应"深沟宽壕，使敌骑与坦克不能侵入"，让日军的机械化长处"无所用"；同时，特别要求汤恩伯、刘汝明以及傅作义"切实联系"，"死守勿失"。

但是，任何事情，只要在中国，都有可能变得万分复杂。

首先，要与日军在南口地区打仗了，而这一地区跨越第一、第二两个战区以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参战的部队有西北军、晋军、中央军和其他杂牌军。由于部队组成复杂，各有各的指挥，那么让谁当战场总指挥才能让各路部队都听从军令？从一般常识上看，与西北军、晋军都有渊源的傅作义担任总指挥比较合适，蒋介石也这样认为，但在任命第七

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任命了中央军系的汤恩伯。由于汤恩伯指挥不动除中央军以外的任何部队，于是，军情紧急必须制订全面防御计划的时候，只能由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以及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三个人“协商制定”。为了给地方军阀留有面子，汤恩伯特请刘汝明担任第七集团军前敌副总指挥。可是两天后，当蒋介石命令阎锡山抽调晋军两个师援助平绥线作战时，因担心阎锡山会不买顾祝同的账，其手令中又称以“傅作义为集团军总司令”。——平绥线作战的指挥问题，仗还没打已成一笔糊涂账。至于平绥线的作战计划，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伯负责南口地区的作战，刘汝明负责张家口地区的作战，傅作义负责指挥预备部队。

于是，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刘汝明拒绝汤恩伯的部队通过他管辖下的张家口。中国陆军第十三军属于中央军嫡系部队，下辖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和第四师（师长王万龄），是汤恩伯的基本部队，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九三五年，该军被蒋介石从江西调往陕西潼关；第二年奉命再度北调，集结在绥远以东长城北面的丰镇一带整训。一九三七年七月，军长汤恩伯被蒋介石召见，得到的指令是：全军迅速向东，沿平绥线开赴南口。无法得知当南口已处于危险状态时，蒋介石为什么不用原在那里的刘汝明部而专门指令汤恩伯的部队担负作战任务。或许蒋介石认为，南口对于华北局势过于重要，地方军阀的部队有些靠不住？南口本是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的势力范围，可是，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却将它划在了汤恩伯防守的地段内。这样一来，第十三军就要将刘汝明的部队换防下来，同时接管刘汝明部队的阵地。无论是换防还是接管阵地，第十三军都必须通过刘汝明所管辖的张家口。于是，怪事出现了：满载第十三军官兵的火车停在半路不走了，接着就传来了刘汝明的命令：第十三军去南口可以，但不能从张家口通过——要去南口，无论铁路、公路，都必须经过张家口——这道命令等于让汤恩伯的部队根本无法到达南口！

第十三军参谋长吴绍周带着参谋彭静秋赶到张家口与刘汝明接洽。刘汝明说，南口目前问题不大，日军没有大的动向。刘汝明的参谋长杨然接着表示，欢迎第十三军接防，但接防部队不能过张家口，因为“客军过境，会引起军民误会”。第十三军副参谋长苟吉堂再去接洽时，刘汝明的回答是：“恐大军过境，日方借以启衅。”

此时，中日华北大战迫在眉睫，可吴绍周在张家口没有看到任何战争准备的迹象。这座城市既没有修建街垒工事，也没有修建任何防空设施，日本人设立的特务机构仍在天主教堂内堂而皇之地办公，各色日本

人仍在大街上自由自在地活动。蒋介石曾在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的四天内，七次直接或间接致电刘汝明，每一次都问及部队是否集结到指定位置，铁路线是否已经炸毁，国防工事构筑到何种程度：

……今平津失陷，冀察交通断绝，兄孤军在张，无任忧虑。兹将应注意各点速办如下：一、青龙桥及八达岭一带铁路务速尽量炸毁，勿使为敌利用。二、已构成之国防工事，应尽量加强，星夜赶成。三、决派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先到张家口，协助兄固守张垣，并赶筑附近工事，勿使敌战车侵入我阵地。四、张垣应死守勿失，务尽守土之责。五、倭寇既占我平津，正式战争已经开始，对在张之日人，一律驱逐，切勿再与之敷衍，应即先行断绝其往来。六、兄部给养，以后可由中央供给勿念。七、对青龙桥一带铁路易毁否？八、已构筑国防工事阵地构筑程度与地点？九、张垣如何布防？皆请详复。十、以后兄部后方，应以绥远为基础，请与阎主任、傅主席切实联系。十一、汤军长恩伯在绥东，亦可切实联络，如有必要，可约其到张垣面商一切也……

无论蒋介石如何心急如焚，刘汝明的张家口仍是一切照旧。

眼下，他急于把吴绍周打发走，办法是派他的交际科长不断地询问吴绍周的动身时间，说是刘主席准备送给吴参谋长一张火车票。——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地方军阀的心里，日本人的威胁很远，蒋介石中央军的威胁近在眼前。刘汝明拒绝第十三军去南口的真实意图人人心知肚明：他担心蒋介石趁机把他这个杂牌军灭了，然后把属于西北军的地盘抢占了。

汤恩伯大为光火，将刘汝明的阻拦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把汤恩伯的告状电报转发给了冯玉祥。蒋介石的用意是：冯玉祥不是声称主张抗日吗？不是曾经出言不逊地抨击他回避作战消极抗日吗？现在破坏抗日的是冯玉祥一手提拔的将领刘汝明，这下他倒要看看冯玉祥如何处理。冯玉祥在蒋介石转来的电报上批示：如所报属实，请委员长依法拿办。——冯玉祥的意思是：如果我的部下破坏抗日，你枪毙他就是了。蒋介石不可能枪毙刘汝明，他只好把西北军的老前辈、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鹿钟麟请了出来。鹿钟麟前往张家口的路途十分惊险：日军已经开始轰炸大同至南口的铁路，鹿钟麟乘坐的列车刚一出大同，大同车站就遭到了轰炸；列车经过下花园时，铁轨又被日军炸毁，抢修至深夜才继续前行。鹿钟麟好不容易抵达了张家口，刘汝明不能不给老上司面子，只好答应汤恩伯的第十三军从张家口经过，但条件是运兵列车不准在张家口停车。

由于刘汝明的阻碍，第十三军的行动被整整耽误了四天，结果自军列出动起便遭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顶着轰炸的第十三军，每天只能完成一次运兵，每次只能运送一团兵力，至八月三日运赴南口的部队仅三个团。当第十三军官兵抵达南口时，发现刘汝明的部队已经撤走了，没有任何人向他们交代防御阵地的情况，而那些号称国防工事的“阵地”，实际上就是一堆堆的石头和残破的旧碉堡，按照参谋长吴绍周的说法：“那只是秦始皇遗下的一段万里长城。”

第十三军两万多名官兵的决心很大。由营长以上的军官带头，官兵们普遍写了抗日决心书，还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扔了——“除了在战场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带，以示决心。”与飞扬的血性不符的是，尽管是中国陆军的主力部队，第十三军的装备还是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炮兵，仅第八十九师有日本大正式的山炮九门，且为使用过时的陈货，射程最多四千公尺或五千公尺；其他炮兵情况不明，但还比不上第八十九师。当时据我所知第四师只有几门小炮，另有用绳子拉上山的战防炮两门，是苏联试制品，直到使用时，才发现所领到的炮弹是一些试射弹。在南口战役中，敌人恃优势炮兵，每天同时用山炮轰击我第一线，野炮轰击我第二线，重炮和铁道重炮轰击我第三线。我军不仅山炮小炮无法抬头，以后连迫击炮、重机枪也时常停顿，以免暴露目标，不敢轻易使用。

蒋介石的预期是：第十三军在友军的策应和支援下，尽量延长固守南口一线的时间，迟滞日军攻击张家口和自山西北部攻入华北侧翼的企图。八月六日，蒋介石致电汤恩伯：

……最近敌必向我南口猛攻，此时兄部只有一心对当面之敌作战，不可再顾虑多伦、张北之敌。预计该方面敌军须于删日（十五日）能集中承德，如期到达察北必在下月之初。故于本月内，兄可专对当面之敌也。但目下兵力重点，应注意平绥路以西地区，而后方联络线应在怀来、桑园堡向蔚县、广灵、浑源为主要线，而不必以张口为基地，则察北敌情可以无虑矣。如南口能固守半月之久，则各方应援，皆可兵发矣……

汤恩伯牢牢记住了蒋介石要求的“固守半月”。

也就是说，只要他的第十三军在十五天之内不把南口阵地丢了，哪

怕南口一线仅剩下一个山头，也算是完成了任务。然而，当第十三军与日军真正开战后，汤恩伯才知道半月实在是太长了。

第十三军的防御部署是：

一、沿八达岭、居庸关、南口的平绥线的正面，为第八十九师作战地区；南口车站及其东南方向的龙虎台（又名关公岭）为该师罗芳珪的五二九团阵地，即正面第一线。

二、南口东北方向的得胜口、苏林口，为第八十九师谭乃大的五三〇团阵地，即右翼第一线。

三、居庸关以北的凤凰台、青龙桥，为第八十九师舒荣的五三四团预备队位置，即正面第二线。

四、八达岭或三堡车站附近的岔道、莉涧子，为第八十九师李守正的五三三团集结的预备队位置，该团位于五三四团的正后，为正面第三线。

五、居庸关西边的横岭城、镇边城、十八家（长城分段路门）一带，为第四师作战地区，即南口之左翼。其第一线在横岭城以西一带山地，预备队位于十八家。

六、居庸关以西至横岭城的东边，即第八十九师与第四师的中间地区，为吴绍周支队作战地区，其第一线在吊明湖南边的山地，预备队位于榛子岭。吴绍周支队由第四师刘汉兴的二十二团以及临时增援而来的河北民军朱怀冰师所属的两个团编成。

七、第八十九师炮兵阵地位于居庸关以南山地；第四师炮兵阵地在横岭城附近。

八、第八十九师师部驻康庄车站，其前方指挥所位于居庸关。第四师师部驻横岭城，前方指挥所在该城以南约七华里的地方。吴绍周支队司令部驻榛子岭。第十三军军部及所属补充团驻怀来。增援的朱怀冰师部驻怀来。

从作战部署上看，中国军队第十三军将主要兵力放在了南口的正面防御上，其中以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各团压力最大。

攻击南口的中国驻屯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以单独执行任务的强悍以及攻击意志的凶狠而著称，旅团长铃木重康的军衔比其他旅团长高一级，为中将。旅团下辖步兵第十一、第十二联队，骑兵第十一联队，野炮兵第十一联队，山炮兵第十二联队，工兵第十一中队以及辎重兵第十一中队，兵力四千零九十五人。

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后续部队还在向南口开进，日军已经开始大规模地轰炸南口车站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八月四日上午，日军向南口阵地正面的制高点龙虎台发起攻击。中国守军猛烈还击，日军人马出现伤亡。下午，南口的东西两面山地都发生了战斗，而龙虎台依旧是日军的主攻方向。由于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和炮火的猛烈轰击，第十三军官兵出现严重伤亡。五日以后，日军的攻击阵容中增加了坦克，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日军步兵开始强攻南口一线中国守军阵地。右翼对得胜口阵地的攻击，被谭乃大团长指挥的五三〇团击退。但在龙虎台阵地出现了反复争夺的拉锯战。七日，日军采取空军集中掩护，步兵分散成小组向龙虎台顽强推进的战术。因为久攻未下，这一天的黄昏时分，日军使用了毒气弹，龙虎台上的中国守军一个加强排全部中毒阵亡，日军在付出包括一名联队长在内的伤亡后爬上了龙虎台。

师长王仲廉严令第二六五旅旅长李铣把阵地夺回来，但这位旅长“自战斗开始即蹲伏掩蔽部，惊恐万状，几次向王仲廉哭闹”。师长王仲廉只好亲率军部补充团的一个营增援南口车站，并命令罗芳珪的五九团二营营长李瑾带领两个连连夜反击龙虎台。李营长和他的夜袭队果真神勇，打死了二十多名日军，还捉了两个活的，以伤亡五十余人的代价把龙虎台夺了回来。八日晨，日军的炮火对龙虎台阵地实施了报复性轰击，五二九团指挥部被完全炸塌，指挥部的人被埋在了里面。王仲廉师长向汤恩伯报告了这一情况，消息竟然迅速出现在南京和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题目是血淋淋的《罗芳珪全团殉国》——罗团长负伤后经救治已然脱险，而报纸显示出的焦灼足见全中国对于南口作战的极度关注。八日晚，汤恩伯决定放弃南口车站，把防御重点放在龙虎台。部队刚刚调整完毕，九日拂晓炮声再起。还是在坦克的掩护下，日军再次向南口正面阵地发起攻势。双方激烈攻守已经持续了四天之久，日军开始加强步炮协同，使用小兵力多路渗透的战术令伤亡逐渐减少，而中国守军的伤亡却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中国守军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已成一片焦土，当日军的炮弹蝗虫一样落下来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藏身之处。第十三军有限的炮兵无法对日军炮火形成压制，反而是只要开炮就会招致日军对中国炮兵阵地的猛烈攻击。因不停地躲避炮击而

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中国守军的情绪开始焦躁，官兵们认为与其被炸死不如一命拼一命来得痛快，于是纷纷要求实施主动的短促突击以肉搏为快。师长王仲廉认为士气可用，即组织了一些小型机动部队，无论白天还是夜间，不断地出击对日军进行猛烈袭扰，

日军面对突然再次增加的伤亡，攻击开始放缓。十日，汤恩伯亲临居庸关视察战况。在与王仲廉师长磋商后，决定在前沿阵地埋设地雷以阻断日军坦克的突击，同时破坏青龙桥至南口车站之间的铁路桥梁和涵洞，把南口机车车辆厂里的火车机车藏起来以免资敌。汤恩伯还没离开居庸关，前方的报告来了：龙虎台阵地再次丢失。

十一日，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主力继续对南口实施攻击，另派一部向南口西侧的长城线实施助攻。中国守军的每一个阵地上都发生了近距离的肉搏战，到天色昏暗时中国守军已经伤亡数百人。第二天，日军的增援部队抵达战场。日军立即集中起五千多步兵、三十多辆坦克和大量的火炮，向南口、虎峪、苏林口、得胜口等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在龙虎台与南口之间，一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阵地被日军从中撕开。当日军的坦克冲上来时，中国守军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打坦克的实战经验，只能拼命。五二九团七连连长隆桂铨带领两个排的士兵迎着日军疯狂射击的坦克冲过去，只要不被打死便跳上坦克掀开盖子往里塞手榴弹，两个排最后以阵亡过半的代价击毁了日军六辆坦克。此时，位于南口正面第一线阵地的五二九团已经苦战八天，全团仅剩下四百余人。舒荣的五三四团和王仲廉师长带来的军部补充团的两个营，全都被补充到了第一线阵地。在残酷的拉锯战中，目睹着尸横遍野的景象，前沿上的中国官兵打红了眼，连长、排长和班长开始进行收复山头争胜的较量，明知不可为就是要拼死舍身为之，这种残酷的血战令中国守军几近疯狂，而日军因此遭遇了他们不曾预料到的顽强抗击。最终，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日军对南口的攻击仍未取得进展。

战至十三日，汤恩伯命令放弃南口一线阵地，一线所剩部队向北后退，移至八达岭和居庸关的主阵地上。

“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了。”始终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写道，“两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我们惊异他消耗得如此厉害，几乎有几分认不清楚。原来猛攻南口的日军，在优势兵力兵器条件下，汤恩伯实遭受空前的劲敌，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个月未曾得一安眠的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寸一尺的移动，我们一次一次的战斗经过。而其入

察抗日以来，所遭受常人意料以外之打击，尤觉痛心。间有人提及此等伤心事，汤辄不言，但见其眼泪往往盈眶欲坠，默对客人出神。人不畏外在之强敌，而忌内在之困难，汤氏之处境，惟身临其境者，始能知其有难言之痛也。”

令汤恩伯军长热泪盈眶的“难言之痛”是什么？

汤恩伯，时年三十八岁，一八九九年九月出生于浙江武义县岭下村，祖上历代为普通农家。十九岁从杭州专科学校毕业，投奔浙军师长陈仪当了一名排长。浙军很快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打败，汤恩伯短暂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不久，同乡的一位富商去日本留学需要陪同，汤恩伯自告奋勇跟着富商去了日本。他希望能进日本士官学校，因没军政要人的推荐而不能，进入明治大学法科学习政治经济学。不久富商回国，为了维持读书，他在东京开了一家饮食店，小店维持两年后倒闭，汤恩伯被迫退学回国。幸运的是，他再次见到他的师长陈仪并得到鼎力资助，不但再渡日本进入梦寐以求的士官学校专习炮兵，并且与在日本留学的陈仪师长的外甥女相识并结婚。再度回国后，恩师陈仪已依附于蒋介石，汤恩伯追随陈仪先任陆军第一师学兵连连长，又任中央陆军学校军事教官和学员大队长。一九三〇年，中央陆军学校成立教导师，三十一岁的汤恩伯升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随即参加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的中原大战，战后升任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八旅旅长。汤恩伯行事的准则是：“我只听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他的人一概不理。”果然，他的忠心耿耿令他一路升迁，先后任第二师师长、第八十九师师长，直至一九三五年擢升为第十三军军长。

陷于南口苦战中的汤恩伯极其焦虑。

作为中央军将领，蒋介石耳提面命，作战不敢有半点马虎。可是，照这样打下去，自己起家的老底子第十三军肯定就要打光了，这等于是中国人说的把家底挥霍光了；但如果南口丢失，脑袋可能就要被自己挥霍了，那时候家底同样不存在了。这实在是进退两难之事。况且，作为中央军，在此作战多有不便。上司傅作义曾是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下，而他当年作为蒋介石的部下，曾在中原大战中与冯玉祥和阎锡山血战，旧仇可不是喊一声“抗日”就能一笔勾销的。因此，在南口这块战场上，第十三军总有些孤军的味道，这个味道令他十分忐忑不安。此外，还有更令人不安的汉奸问题——“汉奸之多，骇人听闻”。怀来县县长公然声称，汉奸是此地的“不可救治之症”。“敌人利用汉奸为谍报，为飞机指示，破坏通讯机关，破坏交通，扰乱军队，使我们无一日安宁。而我对

敌方，反不能发动民众，以做上述同样之工作，皆因冀、察政治弄成之恶果。”中国军队在本土作战，竟然“无一日安宁”，“中国人有些良心甚差”可能是一个理由；同时，又该如何理解“冀、察政治弄成之恶果”这句话呢？

眼下，汤恩伯除了指挥作战之外，最重要的是不断地催促增援部队。为了得到苦苦等待的增援，他不惜电话电报一日数次，即使明显感到蒋介石对他的叫苦有些恼怒时，依旧坚持不懈地请求立即增援。十八日，半个月的时间已到，汤恩伯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

即使长城线突破时，我军仍应照预订计划固守各据点，待援反攻，切勿全线退却。卫（卫立煌）部已催饬星夜急进矣。

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已经从保定出动，正在急速北上以期增援南口战场。由于平津失陷，卫立煌的部队无法由铁路或公路直接运送，只有绕道北平以西的山地。蒋介石命令孙连仲的第一军团派一部分兵力抢先占领房山西北面的高地，以掩护第十四集团军北上；接着蒋介石又致电傅作义，要求他从绥远出动增援汤恩伯的第十三军：“以全公私，勿使其孤军受危、南口失陷，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在平绥前线的汤恩伯，接到死守南口的命令的同时获悉张治中在上海战场也与日军血拼上了。接着，他终于等来了一部分援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和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

但是，从日本本土开来的日军第五师团也抵达了战场。

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下辖国崎登少将指挥的步兵第九旅团和十一旅团，还有师团直属的骑兵、野炮兵、辎重兵、工兵各一个联队，附属通讯队、卫生队以及野战医院。

第五师团加入战斗序列后，中国守军的防线危在旦夕。

十六日，日军新一轮的攻击开始。

居庸关的正面是第八十九师五三四团，右翼是五三三团，师长王仲廉的指挥部就设在关上。居庸关山谷幽深，山岭险峻，日军一度冲入前沿，中国守军连长牛桂卿等阵亡，幸存官兵在弹药用尽后抱起山上的石头迎敌。但是，当日军再次集中兵力和火力发起强攻时，中国守军的主要阵地相继丢失，从而导致防御线全线动摇。中国守军的勤杂人员、炊

事兵和马夫等都参加了搏斗，直到李仙洲的增援部队抵达后，阵地才被暂时稳定。这个时候，日军突然放缓了对居庸关的攻击——日军改变了主攻方向和战术：第五师团出动直扑长城关口，其第二十一旅团的第四十二联队快速攻占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一三九〇高地，随即居高临下开始攻击从一三九〇高地至镇边城间的各个要隘。日军企图以侧翼迂回的战术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夺取怀来，切断居庸关方向中国守军的退路，瓦解中国军队的整个防线。

至此，第十三军第四师的防线也开始承受巨大压力。

汤恩伯还在不断地求援。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傅作义增援第十三军。此前，阎锡山曾命令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和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向张北、商都一带的伪蒙军实施攻击，以策应南口方向的作战，减轻第十三军的压力。傅作义执行了这一决定，向商都发起了猛攻。商都是察南重镇，对其实施攻击，一能巩固绥远的战略防御，二可维护张家口侧背的安全。傅作义的部队突袭不成改为强攻，最终以伤亡官兵两百余人、毙伤敌伪三百余人的战果收复商都。但是，刘汝明却没有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他的第六十八军主力第一四三师“仍分驻张垣、宣化、逐鹿一带”。刘汝明的自保，使得张家口的侧背处在日军的威胁之下。因此，当阎锡山命令傅作义再次增援时，傅作义认为张家口的暴露令他无法确保部队迅速抵达南口方向，但他可以再次出击张北，以加强张家口侧背的安全。傅作义的建议遭到阎锡山的斥责。不得已，傅作义率第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及第二〇〇旅、第二一一旅和独立第七旅驰援南口方向。

这时候，卫立煌的增援部队已经接近周口店一线。

十九日，第十三军的全线防御阵地都遭到日军空前猛烈的攻击，双方在黄楼院、禾子涧、沙锅铺、八五〇高地一带反复争夺，几乎每一个阵地上都出现了近距离的肉搏战，以致一天之内拼死抵抗的中国守军伤亡达一千二百人以上。

二十日，傅作义赶到了怀来。

这是居庸关与张家口之间的一个小城，汤恩伯的前敌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傅作义和汤恩伯紧急商讨战场局势，特别是增援部队抵达后的作战方向和任务。就在这时候，卫立煌的电报到了，说他指挥的第十师、

第八十三师和第八十五师已分别从涿县、周口店和涞水兼程北上，预计二十一日抵达战场。傅作义和汤恩伯立即商定当援军到达后如何对当面日军实施反击以期把日军赶出整个长城线。

汤恩伯终于松了一口气，第十三军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战场形势竟然瞬间急转直下。

傅作义一直担心的张家口方向突然出现了巨大危机：由强悍的关东军组成的察哈尔兵团，在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的率领下，已从察北方向直扑张家口。

无论是张家口，还是察哈尔全省，始终是关东军觊觎的目标。

南口战役尚未爆发，日军中国驻屯军已针对张家口制订出作战计划："逐步集中的第五师团及铃木兵团，从平绥沿线地区开始作战，席卷察哈尔省，进入陕西北部及绥远地区。为此，须与关东军紧密协作。这一战，至少应在主力决战之前占领张家口附近。"尽管作战计划只要求关东军"紧密协作"，但无论是东京的参谋本部，还是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谁都知道关东军对此次作战有着"异常的热情"，而关东军自己对于这种"异常"的解释是：为了"满洲国"的"国防"安全。

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一个步兵支队十三日到达沽源，一个步兵大队十四日到达张北，一个步兵联队十九日到达张北，一个混成旅团十八日从承德出发目的地是张北，另一个混成旅团十八日从通州出发目的地是万全。——关东军已经从张家口的东北和西北方向全线压来，一旦占领张家口，就能与从居庸关向北进攻的第五师团会合，彻底打通平绥线。

张家口的中国守军，主力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根据张家口三面环山的地形，刘汝明把保安第二旅布防于张北与长城之间，独立第四十旅布防于长城内的膳房堡以北，军主力第一四三师以及傅作义的增援部队第二〇〇旅布防于万全附近，保安第七旅布防于崇礼以南。

二十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以第二混成旅团为前锋，在飞机和坦克的协助下向张北地区实施突击。刘汝明部的保安第二旅抵挡不住，旅长马玉田阵亡，官兵死伤数百，退守至距张家口八十里的神威台阵地。二十三日，日军攻击神威台，同时迂回万全。神威台的中国守军在三名营长相继阵亡后丢失了阵地。二十四日，防守万全县城的中国守军拼死血战，当城门被日军猛烈的炮火轰塌后，营长舒效孔在巷战中阵亡，他指

挥的一个加强营官兵伤亡殆尽，万全县城失守。关东军沿着公路开始向张家口急进，张家口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了。

为了保住张家口，准备增援南口方向的傅作义的部队半路返回，而汤恩伯日夜盼望的卫立煌的部队也没能如期抵达。卫立煌的部队刚一动身就遭到日军的顽强阻击。日军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编成的牛岛支队，获悉卫立煌部增援南口的情报后，立即进入门头沟以西地区实施阻击。卫立煌的第八十三师一直苦战到二十四日才得以摆脱日军。可部队没走出多远又被永定河挡住了脚步：连日大雨，永定河河水泛滥，没有渡河装备的部队过不去。

几近绝望的汤恩伯紧急缩短战线，他将防区分成了几个固守的据点：居庸关据点由第八十九师和第二十一师固守，横岭城据点由第七十二师和第四师固守，延庆据点由第九十四师固守，怀来据点由独立第七旅固守。

汤恩伯的命令是：没有命令不得退却。

蒋介石的命令是：死守勿退。

但是，横岭城方向，镇边城方向，中国守军皆因伤亡殆尽终致阵地失守。

二十五日下午，日军坦克冲过了居庸关。

二十五日夜，汤恩伯急电蒋介石报告战况。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回复是：反正是一死，逃跑而死，不如固守而死。

急。怀来。汤总指挥勋鉴：有（二十五日）酉（下午五时至七时）电悉。我军必须死守现地，切勿再退；否则，到处皆是死地。与其退而死，不如固守而死，况固守以待卫（卫立煌）军之联络，即是生路。此时唯一生机，惟力图与卫联络之一途而已。中正手启。寝（二十六日）午。

汤恩伯根本联络不上卫立煌。

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仍停留在河水暴涨的永定河的上游。

汤恩伯不想死。

二十六日十三时三十分，他下达了南口守军全军突围的命令。

当日，日军第五师团占领怀来。

接着，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占领延庆。

汤恩伯的部队刚刚突围而出，卫立煌的前锋部队第十师抵达镇边城。发现汤恩伯已经撤离后，第十师立即回撤至房山，然后越过拒马河，直抵保定以西的满城，再沿平汉路西侧越过大沙河，一直回撤到了石家庄。

南口一线全部丢失后，日军于南北两面向张家口压来，刘汝明不得不下达撤退令。二十六日，张家口陷落。日军占领张家口后，沿平绥线继续推进，致使张家口以东以北地区全部被日军占领。

南口之战，双方伤亡数字，各类档案史料统计差别甚大。如取平均数值，中国军队伤亡约两万六千余人，日军伤亡约两千六百余人，比例仍是十比一。

因为《大公报》记者始终在南口前线即时报道，汤恩伯得以名传全中国。汤恩伯自己也认为，除了“固守而死”他没有做到外，他和他的第十三军没有别的过失：防守时间超出了蒋介石的规定；南口最终全线失守在于侧背突然受敌，而侧背张家口的失守责在刘汝明。

南口之战，由于战场指挥不统一，各部队难以协同作战，官兵武器装备以及作战素质有严重欠缺等因素，面对强大的日军，中国军队没有长期固守的任何可能。因此，以一场血战显示中国人的不屈与无畏，称之为一场胜利并不言过其实，尽管中国军队的防守仅仅坚持了十几天。对此，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我们不否认南口的失守，对整个抗战战局是增加了一个困难，也不否认察绥咽喉的放弃，是增加了黄河下游各省的危险。然而，南口抗战的英勇，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给了我们证明，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

可是，南口战役之后，面对日军自北向南的全面进攻，驻防华北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却如同洪水决堤般地退败了。

日军没有料到南口方向的作战推进如此之快，战场态势的改变令日军认为：可以在平汉路的保定与津浦路的沧州一线与中国军队决战了。只是，日军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才能确保决战的胜利。

八月中旬，南口方向作战还在进行时，日军参谋本部提出应再动员四个师团加入中国战场。参谋本部的用意是：尽快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动用大兵力迅速把中国军队彻底击垮。——“通过华北会战获得一个大的胜利，以迅速结束战局而不至陷于持久战争……通过平定华北重要地区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在二个月以至半年以内，大概就能取得政治上的解决。”日本人之所以仍旧希图“迅速”解决，还是因为“满洲国”北面苏联军队的军事存在是其心腹之患。二十四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动员四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陆军大臣杉山元对于阁员们的询问是这样回答的：不是问进攻到什么地方蒋介石才能屈服吗？“将要到来的华北会战正是这样的一战”！

三十一日，日军参谋本部发布命令，修改中国驻屯军编制，编成华北方面军以及临时航空兵团、铁道部队和通讯部队。

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如下：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

第一军：第一军司令部（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战车第一、第二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一、第三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一、第三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第一军通信队。

第二军：第二军司令部（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第一〇八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中将）、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第二军通信队。

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

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山冈重厚中将）。

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少将）。

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中将）。

华北方面军直属防空部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一、第二大队。

华北方面军通信队、铁道队、直属兵站部队。

中国驻屯军宪兵队。

以上部队，加之特种部队以及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兵力共计约三十七万。

此时，担任华北地区防御任务的中国军队，为隶属第一、第二战区的部队，其战斗序列是：

第一战区：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辖第五十九军（西北军，军长宋哲元兼）、第七十七军（西北军，军长冯治安）、第五十三军（东北军，军长万福麟）、第六十七军（东北军，军长吴克仁）、第二军团（军团长庞炳勋）、第四十军（西北军，军长庞炳勋兼）、第四十九军（东北军，军长刘多荃）、骑兵第三军（军长郑大章）。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辖第一军团（军团长孙连仲）、第五十二军（中央军，军长关麟征）、第三十二军（晋军，军长商震）、第三军（滇军，军长曾万钟）、集团军直属部队、骑兵第四军（东北军，军长檀自新）。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辖第十四军（西北军，军长李默庵）。

挺进军（司令马占山）、特种兵部队。

第二战区：

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辖第三十三军（晋军，军长孙楚）、第三十四军（晋军，军长杨澄源）。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辖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兼）、第六十一军（晋军，军长李服膺）、第六十八军（西北军，军长刘汝明）、第十七军（西北军，军长高桂滋）、第十三军（中央军，军长汤恩伯）、集团军直属部队。

预备军（总司令阎锡山），辖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第十九军（晋军，军长王靖国）、骑兵第一军（晋军，军长赵承绶）。

以上部队共二十四个军、五十三个师、二十一个旅，加上其他部队，兵力约六十万人。

九月四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抵达天津，当日即制订了华北会战指导方案，总方针是："在保定—沧州一线的附近努力围歼进入该线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为此，以平汉线地区为主决战方面，预定决战时间大概为十月上旬。"具体作战方案是：

第一军在北平集结完毕后，第二十师团于平汉线西侧，"以急袭突破敌阵地，以机动部队神速占据敌阵地后面的交通要点"，阻断敌之退路；第六师团和第十四师团于平汉线东侧发起攻击，与第二军相配合，"在正定（平汉路）—沧州（津浦路）大道以北地区围歼敌主力"。第一军进行上述作战的同时，华北方面军主力部队于九月中旬前后推进至保定以北，从西面的易县至东面的霸县一线，对保定至沧州一线发起攻击。"若敌人很快退却，一举向顺德—德县一线追击，在该线以北地区围歼所在之敌"。航空兵团初期协同第一军"消灭敌先头兵团"，之后"要尽力阻止敌人撤退，切断来援的增援兵团，为此，要伺机轰炸黄河桥梁"。

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从北平一直撤退到保定。不久，接到命令开赴津浦线上的唐官屯、马厂一线阻击南下的日军。到达预定地域后，第二十九军主力沿着减河将第三十八师放在了铁路以东，第三十七师放在了铁路以西，第三十七师的六五七团是全军的前沿。

在津浦线上的减河边抗击日军的那群红脸汉子，终于等来了主力。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华北的大雨就没有中断过。沿着津浦铁路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在向中国守军六五七团前沿阵地发起攻击时，大雨倾盆，四野汪洋。泥里水里，六五七团坚守不退，几天下来全团两千四百多人只剩下七百多人，连排长伤亡过半，两名营长身负重伤。团长王维贤不断地向军部请求增援，但却总是没有回音。此时，第二十九军正奉

命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原来的各师都扩编为军，第三十七师和第十八师扩编为第五十九军，第一四三师、独立第四十旅扩编为第六十八军，河北保安第一、第二旅改编为第一八师。部队扩编等于原地升官，又是国民政府的委任，将领们自然忙成团。而在前沿苦战的王团长用电话找遍了旅部、师部和军部，都没找到自己的长官。眼见部队要打光了，日军随时可能突破前沿阵地，王团长只好直接找到了集团军总部。可是，军扩编成了“集团军”，师长们都当上了军长，高官多管事的人反而少了。新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正在山东养病，职务由新任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代理，第七十七军军长职务由新任第三十七师师长刘自珍代理，王维贤团长找了半天，只找到个参谋处长李剑飞，得到的回答是立即增援。直到第二天下午，也未见增援部队抵达。天黑时分，好容易上来两个营，可是阵地已经垮了。往后撤退的时候，传来代总司令冯治安的命令：谁丢了阵地砍谁的头！王维贤又冤枉又害怕，经过哭诉和申诉，虽然没被砍头，但被命立即收复阵地。没等王维贤返回去拼命，全线撤退的命令又到了。王维贤团长后来才得知，从渤海湾登陆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已经推进到了唐官屯、马厂以东，于是，“不仅停止了收复静海的行动，唐官屯、马厂之线也未经激战即全部后撤。第二十九军在津浦路上对日作战的实际情况，基本上只是敌人追我们跑而已”。

津浦路上的作战，一开始就败局已定。

为了在津浦路阻击住日军，防止平汉路正面的防御线侧背受敌，蒋介石把在淞沪战场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调到了津浦路，并于津浦路的北段地区划出一个新的战区，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长官部设在德州以北的桑园，统辖第一、第三集团军的部队。蒋介石之所以让冯玉祥来津浦路，并专门为他划分出第六战区，是出于白崇禧的建议。白崇禧的理由是，此时在津浦路作战的中国军队大多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可是，令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没有想到的是，冯玉祥的旧部多数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冯玉祥一上任，就命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派兵北上增援，可韩复榘拒绝调动自己的部队。为了商讨作战问题，冯玉祥专程到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会见宋哲元，宋哲元仅在专车上与冯玉祥见了个面，就推说身体不好请假回山东休养去了。冯玉祥又召见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冯治安借口说前线战事紧张就是不肯来见。

没人买战区司令长官的账，仗该如何打？

九月十八日，沿着津浦路，日军第十师团从马厂、青县开始南下，

首先向中国守军第一八一师阵地发起攻击。第一八一师刚从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而成，官兵极低的作战素质致使阻击阵地很快丢失。二十一日，日军开始攻击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的主阵地，第五十九军只抵挡了两个昼夜，阵地也丢了。十三日，日军的攻击线已推进到第四十、第四十九军的正面。日军知道这里接近沧州了，攻击十分凶狠，先是航空兵群对中国守军的阵地、阵地后方以及两冀进行连续轰炸和扫射，接着炮兵集中火力对中国守军的主阵地实施压制和破坏性射击，然后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攻击推进。中国守军阵地在第一时间就遭到严重击毁，官兵尚未作战就出现的大量伤亡导致姚官屯阵地出现危机。第一〇九师奉命增援前沿，黄昏时分才将突入前沿的日军反击回去。二十四日，天还未亮，日军航空兵和炮兵的轰击便又开始了，步兵随后沿着铁路两侧向前突击。为了加强阻击阵地，冯玉祥命令第五十九军部和集团军总预备队一部策应一线作战。中国守军虽然奋力苦战，姚官屯等阵地还是相继被日军突破。到了这天下午，除了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九师一部仍在固守沧州外，其余部队在夜间撤退时因遭到日军猛烈追击而发生混乱。二十五日凌晨，日军追击至沧州城郊，第一〇九师阵地受到更为猛烈的轰炸，在战场前沿，双方很快进入了残酷的白刃战。第三二五旅团八连连长穆春茂，一个强壮高大的北方汉子，在子弹打光后与日军拼上了刺刀，连续刺倒数个鬼子后血流殆尽阵亡。在这天的战斗中，仅团就有三百多官兵在白刃战中伤亡，其中与八连连长穆春茂一样拼尽最后一滴血的军官还有一营营长王肖孔、连连长吴荫华和六连连长宋连基。

沧州失守后，日军紧追不舍。

为了争取喘息的时间，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下令扒开运河。

滔滔运河水造成了沧南的泛滥，中国军队位于沧南的预设阵地全部淹没，南撤的部队根本无法在沧河南岸停住脚步进行防御，本已陷入混乱的部队只有沿着津浦路继续向南皮、冯家口一线撤退。

此时，一个更令人忧心的消息传来了：平汉路上的重镇保定已经失守。

负责平汉路防御的中国守军是刘峙指挥的第二集团军。

八月初，依据国民政府于卢沟桥事变后制订的第一集团军反攻天津、第二集团军反攻北平的预想，刘峙曾充满自信地制订出一个反攻北

平的作战计划。但是，到了九月初，从张家口南撤至蔚县的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又开始南撤，致使平汉路以西的涞源告急，不但刘峙部的侧翼已经不安全，且蒋介石还命令他抽出三个团去防守涞源时，刘峙反攻北平的雄心壮志顿时烟消云散。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日军准备沿平汉路大举向南攻击的情报，只有匆忙沿平汉路两侧和纵深部署第二集团军的防御：

孙连仲的第一军团防守房山、周口店、黑龙关一带；

裴昌会的第四十七师防守涿县、马官屯和长沟镇一带；

万钟的第三军除增援涞源的三个团外，其余部队防守高碑店以南的定兴一带；

檀自新的骑兵第十师防守长安城、马头镇一带；

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防守满城、漕河头、保定一带。

这个从北向南的阶梯式展开的部署，既没有防御重点，也没有各部队间的协同关系。

沿平汉路南下，是日军的主攻方向，由香月清司中将指挥第一军担负作战任务。第一军自北平南部的出发地，从西向东并排投入了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以及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三个师团在五个炮兵联队和两个坦克大队的支援下，于九月十四日分三路齐头推进，其投入兵力之大攻击来势之凶，完全出乎了刘峙的预料。

首先发起攻击的是东侧的第十四师团。原计划发起攻击的时间是日落时分，但该师团整整提前了八个小时，原因是提前一天潜入中国守军阵地的侦察员发现，中国军队阵地上兵力很少，且已有撤退的迹象。土肥原贤二即刻决定不等日落马上攻击。上午九时，攻击刚一开始，当面中国守军的阵地就出现了动摇。两个小时后，日军第十四师团突破当面抵抗，强渡了永定河。受到土肥原贤二的带动，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也于下午二时开始渡河，向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与刘峙的第二集团军的结合部，即津浦路与平汉路之间的固安一线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冯占海的第九十一师和周福成的第一一六师阵地，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顷刻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刘峙下达了迎击日军的命令：动用涿县、定兴的二线部队，速赴固安方向迎击日军，力争将日军压缩在永定河畔实施围歼。为此，命令孙连仲的第一军团除了巩固原有阵地外，以

第三十一师主力会合第四十七师，除防守平汉路以西紫荆关、涞源以及高碑店原有阵地外，其余部队由定兴、高碑店一直向东攻击日军的左侧背。刘峙命令各部队要勇猛出击，不得已时至少要固守大清河的西岸。

但是，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十五日拂晓已经进至拒马河，当晚全部渡河完毕，这就意味着日军已经通过了紫荆关，急速推进到了位于琢州、高碑店一线的中国守军的背后。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也通过了难以通行的低洼湿地，与向固安赶来的中国军队迎面撞击。曾万钟的第三军在苦战中伤亡两千五百余人，残部侥幸冲出重围。而檀自新的骑兵第十师本应当面阻击越过拒马河的日军，但是部队尚未见到日军步兵，就在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下渡过大清河逃回了涿县。刘峙命令第四十七师师长裴昌会协同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的一个团迅速将日军击退，并投入预备队四个营在涿县、松林店之间占领阵地；命令檀自新的骑兵师在琢县东北山地实施搜索，协助池峰城部固守涿县县城和附近阵地；命令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立即派出部队阻击迎面日军。但是，刘峙的部队尚未调整好，日军第二十师团的攻击开始了。

日军第二十师团的攻击目标，是北平西南房山以北的孙连仲部。孙连仲的第一军团属西北军系，辖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一师和独立第四十四旅，卢沟桥事变后，该部奉命从湖北孝感和应山北上，集结于保定地区待命。日军向平津发动攻击时，该部向北平前进迎敌，曾与日军在良乡、琉璃河、窦店附近激战多日，官兵继承西北军使用大刀的传统，坚守阵地，给日军极大的杀伤。南口战役时，为策应汤恩伯的战场，该部曾向良乡的日军实施反击，给日军造成了局部混乱。这一次，面对当面强悍的日军师团，孙连仲亲率第三十师防守房山西南的高地，同时命令第三十一师防守明顶山，第二十七师防守琉璃河。日军的攻击刚一开始，孙连仲就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明顶山阵地的中国守军死拼不退，直到一个连的守军全部阵亡；窦店阵地始终处于炮火的攻击下，守军营长因部队的巨大伤亡而不知所措，最终擅自撤退。窦店丢失后，日军第二十师团强渡永定河向高碑店迂回。由于琉璃河阵地过于前突，第二十七师放弃阵地向涿州转移，试图与第三十、第三十一师共同组成新的阻击线。但是，中国守军的阻击线尚未形成，日军第二十师团跟着杀了过来。受到凶猛冲击的中国守军一片混乱，各部队在雷雨之夜仓皇撤退。——孙连仲部在房山与琉璃河一带，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坚守了一个多月，因部队伤亡惨重多次请求刘峙增援，而刘峙始终没有增援一兵一卒，最终部队撤退时也没有得到任何掩护，这导致了孙连仲与刘峙之间裂痕纵深，平汉路防御战的前景由此更加令人不安。

十八日，土肥原贤二的部队占领松林店。

至此，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各部，大多都因官兵伤亡过多丧失了作战能力。刘峙曾试图收拾残部建立起新的阻击线，然而本来就薄弱的通讯网早已被日军彻底破坏，不但刘峙已经无法控制部队，各部队将领也无法控制士兵，惊恐的退却无论什么命令都无法制止，溃败的洪水直接涌向了平汉路上的保定。

保定，中国华北大平原的重镇，四野平坦开阔，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展开作战。

十八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的作战命令是：

一、第二十师团应突破石板山附近，进入方顺桥附近，切断敌之退路。

二、第十四师团应突破满城附近，进入保定西面地区消灭敌人。

三、第六师团应沿平汉铁路前进，消灭保定附近之敌后，不失时机以步兵旅团长指挥的军追击队向石家庄追击敌人。

四、步兵第一一八旅团应集结在涿州。

保定危急，刘峙向南京求援。

此时中国军队主力大部分在上海激战，无法北调，蒋介石只能命令刘峙使用现有兵力与日军在保定地区死战。而刘峙只是简单计算了一下就明白，以他目前掌握的部队守住保定是不可能的：右起白洋淀，沿着漕河向西，依托满城西北高地的保定，其正面防线长约七十公里，至少需要十个师才能谈得上全线防御。眼下，刘峙能够掌握的只有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该军是八月才由第二十五师为底子组建起来的中央军系部队，辖郑洞国任师长的第二师和张耀明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另外，还有刚刚增援而来的陕军赵寿山的第十七师。

二十一日，日军第十四、第二十师团猛攻保定外围，至天黑时分，郑洞国和张耀明两师的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战斗接近保定城垣。

第二天一大早，在飞机火炮的支援下，日军继续向保定城垣外围的满城、漕河一线阵地发动攻击。毕竟是中央军系的部队，在保定左翼漕

河一线防御的第二十五师顽强阻击。第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指挥一四五团在阻击日军强渡漕河时，团附霍锦堂、一营营长陈仪章身负重伤，连排长和士兵伤亡两百余人，但阵地依旧在。渡河的日军转而攻击邻近的第七十五旅一四九团阵地，激战中，该团三营阵地被日军撕开——营营长徐克让是军长关麟征的陕西老乡，很傲慢，不听团长覃异之的指挥擅自后撤；覃团长命令二营上去恢复阵地，二营营长李正谊也是军长关麟征的陕西老乡，也不听指挥，跟着三营一起往后撤，结果一四九团的阵地丢失，仍在坚守的一四五团三营的侧翼暴露。日军突破保定以西满城高地的防御阵地后，开始向保定中国守军的侧后迂回，支持不住的第二十五师向保定南面退去。

与此同时，处于战场正面的郑洞国的第二师也在激战中。前沿工事几乎全被日军炮火摧毁，第二师守军在倒塌的工事里拼死抵抗，双方官兵的尸体交杂布满了阵地前沿。日军的坦克冲上来时，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官兵把炸药和手榴弹绑在身上，拼死往坦克上爬，然后拉响导火索。处于前沿的第六旅伤亡太大，旅长邓士富要求增援，师长郑洞国从保定城内抽出一部兵力上了前沿，但很快便伤亡殆尽。天黑了，双方的激战没有停歇的迹象，夜空被战火映得如同白昼。

十三日上午，日军集中所能调集的飞机、火炮和坦克，全力支援步兵，向保定城门发起猛攻。保定城墙外虽有一条护城河，但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日军很快就突入了城门。中国守军第二师直属部队从两翼实施反冲击，激战数小时后才把日军反击出去。晚上，战况显出了恶化的趋势，日军骑兵部队趁第二十五师南撤的机会，袭击了第二师的后方机关，将该师的辎重部队、医务队和电台等全部冲散，最终不但对保定城完成了四面包围，而且致使第二师与外界的联络完全中断。——“保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师长郑洞国派人去寻找友军和军部，以求得增援并得到作战指示，但派出去的人全都失望而归：第十七师找不到，据说已经后撤了；军部和第二十五师更是不知去向。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对军长关麟征很有看法。“我们都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共事日久，彼此总该有些关照，但作战时他将我这个师摆在最危险的地方，撤退时竟连个招呼都不打，任凭我们去牺牲，不仅全无一点情义，而且也太不负责任。”

二十四日天刚亮，日军第六师团对保定城的总攻开始了。

日军飞机呼啸着向城垣密集俯冲，城内在连续的爆炸声中大火冲天。日军的重炮整整轰击了一个小时后，保定城墙坍塌，日军蜂拥而

入。中国守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官兵与日军展开了残酷的巷战，到处是拼杀声和伤员的呻吟声。万分危急时刻，第四十七师师长裴昌会突然出现在郑洞国面前，这令郑洞国既意外又感动。作为第五十二军的预备部队，裴昌会师长坚决执行了刘峙让他增援保定的命令，现在他的第四十七师已经抵达保定城外，他仅带着几名随员从南门钻进了战火中的保定城，找到了郑洞国的指挥所。——“裴氏北伐前原系孙传芳部下一员战将，久历戎行，作战经验丰富，所部也颇有战斗力。这时各路友军已不受命令约束，都在竞相向后方逃命，惟裴将军不避艰险，依令而来，此举使我对他十分敬重。”

尽管蒋介石下令“不准撤退”，但裴昌会和郑洞国两位师长见解一致：“死守保定城已无希望”。保定城内的文武机关和商民都在外逃，特别是保安队和警察早已提前跑光；日军已经完成对保定的包围，守军不但孤军作战且伤亡惨重。目前巷战虽仍在持续，但日军已占据大半个城区，第二师第四旅被迫突围而出，城内的部队仅剩师直属部队。在这种境况下，即使把第四十七师填进来，也无法支持下去，必须速作决断，否则就一切都来不及了。

二十四日中午，郑洞国师长下达了弃城突围的命令。

平汉路上的保定与津浦路上的沧州的丢失，使得整个华北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守军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作战能力丧失殆尽，所有的部队都已处在沿着铁路线惊慌向南溃退的混乱状态中。

在津浦路方向，日军发现中国军队正无序退却后，长驱直下不停顿地向南猛烈追击，并决定趁势向德州发起攻击。

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要求他在德州以北集结兵力建立起有效的防御阵地。冯玉祥随即命令各部队侧击日军，以减轻津浦路正面中国守军的压力。二十六日，日军第十师团先遣部队的骑兵和装甲兵抵达大运河岸边，师团主力分三路向南攻击占领了沧州以南的冯家口。二十九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督率第五十九军、第四十九军、第四十军由南皮北上，企图侧击冯家口的日军，但始终未能与在津浦路正面阻击日军的部队联系上，南北夹击没有起到预计的效果，部队纷纷回撤。迅速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如入无人之境，顺着铁路连克中国守军的四道防御线，占领了南皮、东光和连镇。此时日军已经推进到河北与山东的交界处了，其快速装甲部队甚至已经进入山东境内，装甲车停在了津浦路位于河北最南端、山东最北端

的一个小车站——桑园站内。

山东，韩复榘的地盘。

韩复榘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的地盘，包括日本人。

韩复榘的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正在为防日军从烟台登陆紧急修筑潍烟公路上的阻击工事，得知日军逼近山东后，该部被韩复榘紧急调到了津浦路方向。师长展书堂和第二四三旅旅长运其昌商量后，决定组织敢死队夜袭桑园车站的日军装甲部队，把日本人赶出山东地界。敢死队以四八六团为主，各连选出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士兵共五百人，由团长赵廷璧亲自率领，趁着夜色直扑桑园车站。日军毫无防备，又不是擅长面对面交战的步兵，因此被杀得一片溃乱。天亮时，四八六团敢死队抢了日军的一列装甲车，沿着铁路向德州开去。但是，为了集合部队回撤，赵廷璧团长下令吹响了集合号，可没想到号声含义被日军破译，得知当面中国军队顶多只是一个团后，日军迅速整理部队向敢死队发动猛烈反击。敢死队员在日军的突然反击中伤亡惨重。

日军后续部队抵达后，继续沿着铁路向南攻击德州。

位于前线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准备后撤德州城。长官部的警卫排长刘海蓬带人前往德州打前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韩复榘不让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进入山东，理由是冯玉祥指挥的部队都是河北的，河北的部队到山东来干什么？——“守卫德州的岗哨是韩复榘所属的宪兵。他们拦住我们说，上级有令不准进城。虽然再三交涉仍不同意。我们强调说：‘冯长官（冯玉祥）、冯军长（冯治安）要来德州，不准我们进，完不成任务如何交待？’他们说，上级命令不叫进。我们要他们给德州政府打电话请示，回答仍像前一样，而且还说：‘这里是山东，你们是河北的队伍，到河北地盘去！’”

十月三日，日军开始攻击德州——既然连战场最高司令长官都不能进山东，那么，沿着津浦路边打边撤的其他部队自然更不能进去。因此，退到这一线的中国守军离开铁路线向西转向了河北南部——守德州的自然是韩复榘自己的队伍。

还是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旅，只不过由于四八六团夜袭桑园出现伤亡，德州守军以四八五团为主力。面对强大的日军师团，仅一个团如何守住一座德州城？飞机提前轰炸后，坦克开始撞击城门。德州城门上的

三连连长古大长是个脾气暴烈的人，当日军坦克把城门撞得震天响的时候，他疯狂地从城门上往下扔迫击炮弹，城门下的那辆坦克被炸瘫的同时，古连长身中数弹从城墙上掉了下来。四八五团只在日军进攻的第一时间抵抗了一下，就因势单力薄不得不突围而出。

位于中国河北与山东的交界处的德州沦陷。

沿着津浦路向南攻击的日军，暂时停止在了这座飘散着烧鸡香气的小城里。

消息传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为津浦路北段作战而专门成立的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即刻撤销——这是漫长的抗日战争中唯一一个寿命如此短促的“战区”。

平汉路上的保定失守后，为了协同指挥各军作战，蒋介石派参谋总长程潜抵达石家庄，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九月二十五日，程潜召集前方各部队将领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战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死守石家庄！石家庄西依太行，北依滹沱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整座城市处在平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枢纽位置，自此向西入娘子关便是山西了。娘子关是山西的门户，一旦失守，太原不保，日军就能控制太行山一线。对于中国华北而言，太行山是支撑全局的军事要地，一旦日军依据太行山居高临下，黄河以北也就无险可守了。会议随后制订了死守石家庄的军事部署：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第十四军，第三军以及第二十七、第八十五、第八十九、第一七七师等部，负责防御平汉路上的正定、石家庄以及石家庄以西至滹沱河以南一线；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指挥第三十二军，第十七、第四十七师，独立第四十六旅等部，负责防御平汉路以东、滹沱河南岸阵地。以孙连仲的第一军团、黄光华的第一三九师和刘家麒的第五十四师为预备队，于平汉路西面的平山县以南集结待命。

中国守军军事会议召开的时候，日军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先头部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沿着平汉路继续向南推进。指挥部在保定的刘峙，自第二集团军部队全面退却后，一直试图收拾部队重新整理出防御战线，曾派出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的定县附近阻击日军，可这支陕军部队装备极差，与日军第六师团刚一接触，就主动退却进了

太行山区，第六师团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推进到了定县与石家庄之间的新乐。刘峙万般无奈，督促部队赶紧破坏铁轨和桥梁，自己则匆忙逃回石家庄。

于平汉路东侧、津浦路西侧推进的日军第二军，在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第十六、第一〇九两个师团沿着向西倾斜的攻击路线直指石家庄。这条防线正面的中国守军，是军长吴克仁指挥的第六十七军。第六十七军部队先是奉命在马厂以西的留各庄一带阻击日军南下，接着又奉命从留各庄向南后撤，配合左翼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和右翼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共同固守滹沱河与子牙河交汇地带的献县。第七十七军虽系西北军部队，但军长冯治安一直采取拒绝冯玉祥、架空宋哲元的策略，此刻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始终没有落实防御部署，致使献县附近蒋介石一再要求的沧石国防线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而出身东北军的战区将领万福麟，当部队在永定河边被日军击溃后，非但没有重新组织防线阻击，还派人到留各庄找吴克仁部，劝其一起进太行山以保存实力。万福麟部的溃败使日军第二军对石家庄的攻击解除了来自侧翼的所有压力，日军战史对此的表述是：“此次作战谋略工作很成功，以万福麟十月六日退却为转折，中国军队的前线开始崩溃。”——无法考证日军所说的“谋略工作”指的是什么，但万福麟部守土失责确是事实——吴克仁的第六十七军装备简陋，武器陈旧，在日军第十六师团两个昼夜的围攻下，伤亡惨重，献县很快就失守了。

献县的丢失，使得沿平汉路直接南下的日军与从津浦路方向斜插过来的日军得以并驾齐驱，锋头直逼石家庄。

十月六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敌军主力现在正定附近苟延残喘，第二军的一部昨五日午后进入武强、衡水及新河中间附近的滏阳河左岸地区，估计其当面之敌正在向西面退却中。

二、方面军准备在河北平原一击覆灭敌战斗力。

三、第五师团应向太原前进，攻占太原。

四、第一军应在适当时机开始进攻，特别期待不出所料地捕捉退避的敌人。攻击的重点指向石家庄附近，一突破敌人战线即向顺德（邢台）附近急追敌人。不失时机地再以一部进入井陉以西要地，切断敌在

山西方面的交通，而后策应第五师团。

五、第二军应从滏阳河左岸攻击敌主力的背后，策应第一军的攻击和追击。

六、临时航空兵团随着第一军开始攻击，以主力协同第一军、以一部协同第二军及第五师团的行动，特别在适当时机应努力阻止敌主力的退避，要迅速消灭当面之敌航空兵力。

命令下达当日，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谷寿夫、土肥原贤二、川岸文三郎和下元熊弥的四个师团，在一个炮兵旅团以及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配合下，沿着曲阳、定县一线向南突破当面中国守军的阻击，于七日推进到正定城下。

正定，石家庄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

防守正定城垣的，是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和鲍刚的独立第四十六旅。日军集中重炮猛烈轰击城防工事，之后惨烈的搏斗在城墙和城门附近展开，双方士兵伤亡都极大，而中国守军始终处于弱势，直到守城部队伤亡过半后，中国守军弃城撤往滹沱河南岸，正定失守。

日军紧追不舍，强渡滹沱河，从三面包围了石家庄。

此时，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已经从察哈尔和绥远分兵两路协同攻入山西北部，山西濒危的局势令第一战区部队相继前往增援。

石家庄已无力可守，中国军队遂决定放弃。

由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先于部队撤退，而且没有在滹沱河上建立可供后续部队通过的任何设施，“以致退却军队的辎重多被抛弃在河的北岸，遍地都是，令人痛惜。有些骡马陷入淤泥中，不能动弹。南逃的老百姓，散在沿河岸，无人拯救，这是平汉线上战局最黯淡的一刻”。滹沱河虽然水“可徒涉，但河底地质系油沙淤泥，越踩越活，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依旧是出于对苏联可能对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心，同时由于上海、山西的两面作战都处在激战中致使日军发生兵力调配上的困难。因此，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暂时不得越过石家庄和德州一线。

华北战事暂时停歇。

中国军队的数十万守军，一个月内狂退数百里，致使华北大片国土沦落敌手。除了武器装备差等因素外，中国军队指挥能力之低，战略战术水平之劣，各部队协同作战意识之乏，令人悚然！为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愤怒无比：“自琢州撤退至保定总退却止，官不知兵，兵不见官，只知奉命石家庄集合，不知其他。所以一退数百里，将民财骡马拉抢一空。”

负责防御日军主攻方向平汉路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难逃其咎。十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对刘峙提出弹劾案：“豫皖绥靖主任刘峙，恇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一退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晋两省交受其祸。今又退至彰德矣。夫自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石家庄至彰德计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至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

刘峙没有受到军法的任何处分，反被蒋介石提升为第一战区副总司令，负责督练后方部队，致使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正当国人心情晦暗之时，突然，山西方向传来了捷报：在一个名叫平型关的地方，中国军队赢得了一场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而作战的主角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于是举国北望：平型关是个什么地方？

第五章

八路军上来了

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处决的时候，喊出这样一句话："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

车到小东门大校场，李下车距预铺红毡还有两三丈远，就被一枪打倒。据执行人、阎锡山的警卫营连长康增谈，因为前几年枪毙十旅旅长蔡荣寿时，一枪打倒抬回家去，还活了多半天才气绝，所以这次阎锡山特别指示，当场击毙后，执行人须守尸一小时，才许家人收尸。

李服膺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第一个因丢失防区而被处决的军长。

李军长丢失的防区是山西北部的天镇。

平绥路上的南口、张家口相继失陷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集结于宣化，继续向南攻击山西的企图显而易见。只是，中国方面暂时还无法判断其作战方向和计划。

日军进逼山西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冀西北部与晋东北部交界处的蔚县、广灵发动佯攻，主力沿平绥路西进攻取大同，切断中国军队山西与绥远间的联络；二是在晋东北的天镇方向实施佯攻，主力攻取广灵，切断中国军队山西与河北间的联络。然后，两路兵力即可协同向南直插山西的腹地。

中国军队第二战区制订了兼顾两种可能的作战计划："本军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无论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哪一边，都以局部的死守待援、东或西面的紧急增援，形成夹击日军的战场态势。

为此，司令长官阎锡山将第二战区部队部署如下：

杨爱源部第六集团军第三十三军独立第三旅和第七十三师布防晋东北的广灵；第三十四军第二〇三旅布防广灵以西的浑源，第一九六旅布防浑源西南方向的应县，第七十一师在应县西南方向的岱岳（山阴），新编第二师在平型关以西的砂河。

卫立煌部第十四集团军第八十五师控制平型关以西的大营。

傅作义部第七集团军第六十一军第一〇一师固守晋东北的天镇，第二〇〇旅布防天镇西南面的阳高，独立第七旅布防大同以东地区；第三十五军新编第六旅固守兴和，新编第五旅布防隆盛庄，第二一八旅固守集宁，第二——旅布防归绥，第二旅和第二〇五旅布防大同至丰镇间。

从北向南，第二〇九旅控制在大同与怀仁间，预备第七十二师控制在应县，第二一五旅控制在雁门一带，独立第一旅控制在平型关，第六十六师控制在太原。此外，在山西、绥远与察哈尔的交界处，骑兵军主力布防在商都、尚义、化德一线。

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在蔚县一带防御。

第十七军高桂滋部布防广灵。

司令长官部行营进驻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村。

但是，令中国军队没有想到的是，东条英机指挥的察哈尔兵团和板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团，从攻击一开始就两路齐头并进，令第二战区无法判断出到底哪个方向是主攻。

九月三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在旅团长筱原诚一郎的指挥下自张家口以南的宣化方向出动，向驻守天镇的中国守军第六十一军发动猛烈进攻。李服膺军长指挥的第六十一军刚刚从柴沟堡方向南撤至天镇，各部队仓促间进行了部署，也是一线式的防御阵形：第二〇〇旅的四〇〇团据守天镇附近的盘山制高点；第一〇—师占领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以及沿平绥路两侧一直到北山瓦窑口一线的阵地；第二〇〇旅三九九团驻守天镇城防；第六十一军司令部以及四一四团驻守天镇西南方向的阳高县城。

日军显然把攻击重点放在了天镇外围唯一的制高点盘山。武器简陋的中国守军在察哈尔兵团凶悍的攻击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日军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持续不停，第六十一军简单的野战工事被反复摧毁，四〇〇团的高保庸营藏身的掩体被炸塌，一个营的官兵全部被压死在石洞里。日军步兵轮番冲锋，日夜猛扑，中国守军只能依靠弹坑掩护自己，用手榴弹和刺刀抵抗。后方的补给线和联络线被切断，弹药上不来，伤员下不去，支撑整整三天后，阎锡山下令再守三天。四〇〇团团长李润

生请求增援，但李服膺军长手里没有预备队，四〇〇团伤亡了五百多人，其他各团也都伤亡在千人以上。最后时刻，李润生团长已无法控制部队，还活着的士兵纷纷后退。盘山失守。

盘山失守的这一天，日军第五师团于天镇以南的蔚县方向开始了突进，其第九旅团攻击广灵，第二十一旅团从广灵西面迂回。在这个方向防御的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该军竟然连日军的影子还没见到就擅自撤退，致使防线如无人之境。汤恩伯急忙命令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前往填补。高桂滋派出的一个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蔚县，距蔚县还有五里的时候得到消息：蔚县已被日军占领。

战事已起，阎锡山的判断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是大同。于是他策划了一个“大同会战”的方案，即把日军主力引进大同以东的聚乐堡，那里有晋军已经建好的国防阵地，然后调动强大兵力从南北两面对日军实施夹击。为此，他给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下达了在天镇阻击日军的命令：只要能把日军迟滞在这一带，为调动部队争取到必要时间，“大同会战”计划就可以得到实施。只是，不知阎锡山是否清醒，能够迟滞日本关东军攻击的中国军队，至少在他的第二战区内不存在。

天镇外围制高点盘山失守后，日军直冲而下。除了天镇城中的九九团外，城外第六十一军布防的部队均被冲垮。接着，日军兵分两路直插聚乐堡。为了增加追击力度，日军甚至动用了预备队。天镇尚在被包围中，身后的阳高城竟然也被日军攻陷了，李服膺军长只好带着司令部再向南撤退。防守阳高城的第六十一军四一四团在守城战斗中伤亡很大，团长白汝庸认为如果巷战持续下去，即使全团战至殆尽城池最后还是守不住，于是召集残部向城外突围，一千多人的团，跟着白团长突出来的仅有三百多人。

阳高陷落，天镇成了一座四面被围的孤城，孤城里的孤军是三九九团。

中国陆军第六十一军第二〇〇旅三九九团，团长张敬俊，全团十二个步兵连，加上机枪连和迫击炮连，总计一千四百余人，从军官和士兵也多是河北、山东和河南人。——中国的北方人有股子拼命的蛮劲。攻击天镇的日军认为，这座孤城里的中国守军不会再守下去了，没有人会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找死。因此，日军高举着日本旗，列队向天镇城东门走来，仿佛不是在攻击而是准备接管。日军刚一走到城门下，突然遭到来自城墙上方的猛烈射击，队伍瞬间混乱起来。很快，日军的重

炮开始轰击城防，坦克也抵近射击，天镇城墙被摧毁，日军的飞机把小城炸成一片火海，接着便是步兵的轮番冲锋。三九九团守军格外顽强，就是找死一般死也不退。战斗持续了三天，三九九团伤亡惨重。天镇县县长劝张敬俊团长不要再守了，因为拼死打下去最终也打不赢，小城里的老百姓在战火中太遭罪了。痛苦万分的张敬俊让团附把残存的部队带走，他要一个人留下来尽军人的职责。官兵们不愿意，表示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于是，“九月十一夜间，二九九团有秩序地撤出天镇城”。

天镇陷落，“大同会战”瞬间成为泡影。

阎锡山命令各部队向大同以南、桑干河南岸的山地转移。

九月十三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未经战斗进入了晋北重镇大同。

大同，平绥、同蒲两条铁路衔接处，“为晋、察、绥之交通要冲”。恼羞成怒的阎锡山将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扣押了。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少校副官庞小侠目睹了阎锡山审问李服膺军长的过程，这是一次典型的家族式的审判：

十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左右，阎锡山在省府大堂审讯李服膺。他坐在中间，谢濂（保安司令）、张建（宪兵司令）、李德懋（原绥署副官长）坐在两边。我那天是值日官。宪兵用汽车把李服膺押来后，阎锡山对李说：“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说：“你胡说！”接着又说：“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李服膺这时掉下了眼泪，没有再说什么。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就走了。阎锡山走后，警卫营就带着绳子去捆李。谢濂说：“那只是个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脖子上。记不清是张建还是李德懋问李服膺：“有对家里说的话没有？”李服膺摇了摇头，没说话。之后，就把李押上汽车。李走得很刚骨。

执行枪毙任务的康连长回来跟庞副官这样说的：“我就用山西造的大眼盒子，一枪收拾了他。”

几乎所有熟悉李军长的人都为他喊冤，尤其是第六十一军官兵。他

们认为，天镇、阳高一线战斗惨烈，面对日军重型武器的官兵手里的枪械都是山西造的，导致伤亡十分严重。战斗中，部队既得不到明确指示，又得不到任何支援，就这样把李军长不明不白地枪毙了实在不公平。还有官兵揭露，国民政府出钱修筑国防工事，可第六十一军从太原领到的钢筋、洋灰等材料不足计划的百分之一，据说官员们把修筑国防工事的拨款都贪污了。

天镇失陷后，日军迅猛南下，晋北战场呈现出混乱局面。

局面的恶化，绝不是处决一个军长就能挽救的。

九月十一日，侧翼的日军第五师团从蔚县出动，向广灵方向推进，并以一部向火烧岭一带迂回。汤恩伯命令高桂滋的第十七军第二十一师主力防御广灵城正面，第八十四师在火烧岭一线阻击。十二日，日军向火烧岭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同时向广灵方向的中国守军阵地压迫。十三日，布防火烧岭以西刘家沟的第八十四师四九九团陷于苦战；广灵城正面防御阵地上的第二十一师也处在激战中，四二四团在与日军的肉搏战中伤亡甚重，阵地最终被日军突破；四二三团团长吕超然率部实施反击时中弹阵亡。

日军第五师团于侧翼向南发起的猛攻，令阎锡山从北向南部署的防线出现了倾斜。十三日，阎锡山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重点是调集部队堵住日军第五师团的南下势头，以图稳住整个战场的侧翼。

十四日，日军第五师团的攻击力度丝毫未减，布防广灵方向的第七十三师在以弱对强的阻击中伤亡惨重。阎锡山命令汤恩伯，如果实在守不住防线，可以撤退到广灵以南建立新的阵地。汤恩伯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第七十三师、第八十四师和第二十一师全部撤退。广灵遂被日军占领。

这一天，为了避免战场混乱以及无法遏制的互相推倭，阎锡山划分了各军作战地域以便各负其责。这些地域自大同向南基本呈现出左右两部分：左侧的部队是第六十一军、第三十四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右侧的部队是第三十三军、第十七军、第十五军，以杨爱源为总司令。第十八集团军、第七十一师和第七十二师为预备队。

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占领广灵后，向广灵以南的灵丘和广灵

以西的浑源方向继续追击。十五日，阎锡山严令第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在广灵南面的山地坚守，如果再退就军法论处。刘师长率部在广灵以南一个叫直峪口的险要山口挡住了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全师官兵拼死作战，陡峭山崖上的阵地五次失守又五次发起反击而复得，直到刘奉滨师长负伤后，第七十三师才向后转移阵地。

虽然部队节节推进，但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恼怒了：华北方面军命令他率主力折向东，去支援平汉路上的作战。——眼看第五师团推进顺利，如果没有干扰的话，他可以向南直插五台山然后打进太原城，在关东军面前把这个头功抢到手。心有不甘的板垣征四郎下达命令：第九旅团继续占领浑源，第二十一旅团继续攻击灵丘。

二十日，从广灵南撤的第七十三师，因顶不住日军强攻再次南撤，灵丘城被日军占领。

至此，在中国军队晋北防线的右翼，日军已经迫近内长城。

从灵丘再向南，是内长城的一座关口，名叫平型关。

平型关为山西境内内长城南翼之要隘，扼守冀、察入晋之要冲。

此时，阎锡山正在制订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把日军放进平型关内加以围歼。即诱使日军通过平型关，深入平型关以西的砂河盆地，然后中国军队从恒山、五台山两面发动夹击，截断平型关要隘，把日军歼灭在滹沱河上游的盆地里。

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看上去气魄非凡：

在平型关的正面，第六集团军指挥第三十三军、第十七军，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到团城口，依次排列着独立第二旅、第七十三师、独立第八旅，团城口并列着第十七军和第二十一师。以上部队先顽强阻击，然后主动后退，进入五台山隐蔽起来，组成南机动兵团待命出击。

平型关北面，以雁门山、恒山为屏障，除第十五军在恒山外，以第三十四军在北娄口、大小石口、茹越口之间布防，重点是内长城关口茹越口。以第十九军和第三十四军扼守五斗山、马兰口、虎略口、水峪口直至雁门关、阳方口之间的阵地，重点置于雁门关及其西南方向的代县。第三十五军控制在阳明堡，负责对雁门关实施策应。

在砂河至繁峙之间的决战地带，以第二〇〇旅一部在砂河镇以东占领阵地，对从平型关通过的日军逐次抵抗，诱敌向西南方向的繁峙深入，预备队位于繁峙城的南北线上，以五台山的北台顶、繁峙城垣、恒山为支撑点，将日军吸引到主阵地前。

第三十五军作为机动兵团向代县东进，与第十五军同为北机动兵团，由傅作义指挥，在繁峙的北翼展开，等第二〇〇旅将日军吸引到繁峙主阵地时，南北两个兵团立即发动夹击以全歼日军。

第三十三军第七十三师和第八十五师负责包抄平型关的后路，将日军的后方联络线截断。

阎锡山认为，自己布好了一个口袋阵，保准日军进得来出不去。

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赶赴太原或大同，会晤阎锡山，协商八路军“入晋后各事”，包括“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九月七日凌晨，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赶到了位于雁门关附近太和岭口的阎锡山指挥部。此刻，山西战场的对日作战已经没有退路，但与日本人打仗阎锡山还没有把握。周恩来劝导阎锡山：“日本军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但打下去，必然使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阎锡山向共产党方面告知他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建议阎锡山“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明确表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可以“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砂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砂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

后来的晋北战局的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和判断是正确的。

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最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凭什么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只能是平型关？如果日军的主攻方向不是平型关，全盘依此部署的作战阵势将如何紧急应对？另外，平型关是著名的关隘和天险，是阻击日

军的有利地形。从山西最北部的天镇、广灵一路退下来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不断地命令部队重建阻击线，以阻止日军继续向南推进的势头，现在已经退到了阻击最有利的天险关隘，为何反而放弃不守要退到关内的砂河盆地里决战？最后，如果把日军放进平型关，一旦预计的围歼无法达成，部队如何迅即部署才能确保太原的安全？

尽管共产党方面对阎锡山诱敌深入的作战设想不敢苟同，但与其协同作战保卫晋北要地的决心是坚定的。

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说：

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彭德怀与阎锡山商定，位于日军第五师团攻击方向的平型关以及位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攻击方向的茹越口和雁门关，都要派出强有力的部队防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可以在日军攻击平型关时于日军的侧后出击，第一二〇师可以在日军攻击雁门关时于侧翼出击。

八路军决心在晋北与日军面对面地打上一仗。

但是，在平型关前线指挥作战的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反对阎锡山的作战部署。他认为，日军的主攻方向依旧是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直指的雁门关，而不是平型关，当前向灵丘进攻的日军第五师团不过是起牵制作用的助攻。据此，孙楚不同意将日军第五师团放进平型关内来，而主张以第十七军和第三十三军以及进入平型关附近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扼守平型关和团城口，相机出击，配合雁门关方向的主战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同意孙楚的见解。

听了杨爱源的当面陈述后，阎锡山批准了孙楚的计划，决定固守平型关和团城口一线，将第十七军第二十一师向北延，与布防恒山的第十五军阵地连接，掩护恒山的东翼。——此时，恒山已成为日军占领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

孙楚按照新的作战计划向各部队发出指令，但是第十七军军长高桂

滋却对孙楚的部署极为抵触，他是唯一赞同阎锡山把日军放进平型关的前线将领，理由很明显：他的第十七军处在与平型关并行的团城口，面对日军的进攻首当其冲，如果按照阎锡山的作战计划，他的任务是不必死守，只要打一下跑进恒山里就行了。高桂滋的抵触对于后来的战局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二十一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三浦敏事，率领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配属的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从位于晋东北的灵丘出发，沿着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追击仍在后撤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师。

这一天，中国空军在山西参战了。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电告阎锡山，空军编组了支援山西作战的四个飞行中队，指挥所设在太原，以洛阳、西安、南阳机场为基地，以太原、临汾、长治为前进机场。就在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发起攻势的时候，关东军飞行第十六联队的十五架战斗机，掩护第十二联队的八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太原城。中国空军第二十八中队队长陈其光率领七架驱逐机迎击，将日本陆军视为“军宝”的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队长三轮宽少佐所驾驶的九五式战斗机击伤。该机在太原附近的农田中迫降，爬出机舱的三轮宽被当地农民打死。

除了这个令阎锡山兴奋的好消息外，还是这一天，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在向前攻击的时候，首先遭遇奉命破坏公路的中国守军一个营，日军苦战了大半天才得以摆脱。接着又遭遇了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的一个营，又苦战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推进到平型关面前时，被中国守军第三十三军独立第八旅六二三团所阻。

二十三日，攻击平型关不成的日军，开始转攻旁边的团城口。第十七军五〇二团团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日军迂回东、西跑池南北高地的时候，独立第八旅防守高地的两个连全部阵亡，高地遂被日军占领。孙楚命令第十七军再投入两个团、第七十三师一部和独立第八旅的一个团同时向日军实施反击。下午，中国守军反击成功，东西跑池及其附近高地阵地失而复得。

尽管日军对平型关的攻击规模并不强大，但终究是敌人已经攻到天险隘口前了。阎锡山十分紧张，他动用了预备队，命令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共八个团向东西跑池、小寨方向迂回，以形成对日军的侧击；第七十二师和第三十五军的两个旅作为出击预备队，由傅作义担任出击总指挥。

这一天，南京大本营收到的来自山西前线的战况报告是：

敌人一旅团，坦克车、（装）甲车各二十辆，昨夜十时起向平型关、团城口攻击。我独八旅、八十四师出击应战。敌向蔡家峪（团城口以东）溃退。我七十一师本晚已抵大营（平型关以西）。第八路军定明拂晓由上寨村、冉庄村（灵丘南山中）向敌出击。二十一师、十五路（为）接续部队。本午有敌八百余向小窝单、讲堂村攻击。应县、浑源大道有敌千余向东移动。战事决在平型关外决战。

阎锡山从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个团兵力，明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

“林师”，即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第一次以正规部队的名义，加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的战斗序列里，奔赴抗日战场参战了。

根据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改编命令，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红军改编命令，第八路军之第一一五、第一二〇和第一一九师的编制序列是：

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陕南第七十四师改编，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辖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六八六团），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第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六八八团），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一万五千五百人。

第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改编，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辖第三五八旅（七一五、七一六团），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第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七一八团），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一万四千人。

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辖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七七〇团），旅长王宏坤，副

旅长王维舟；第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七七二团），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一万三千人。

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肖劲光。

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约三千人。

全军总计约四万六千人。

为了加强党对抗战时期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恢复了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为第一一五、第一二〇和第一二九师政委，肖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为第三四三、第三四四、第三五八、第三五九、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政委。撤销了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两级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还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广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长沙等地成立了八路军通讯处。

改编不是问题，问题是改编后以何种方式参战，以何种策略作战。

八路军所辖的三个主力师，加上直属与后方部队，总计不过四万多人，从军事上讲，即使全部投入战场，对于偌大国土上的全面对日作战而言，影响只能是局部的。而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如果没有正确的作战方略就盲目参战，等同于自我蹈火。为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改编后的八路军要扬己之长，避己之短，长处在于有游击战的丰富经验，短处在于兵力有限武器简陋。因此，八路军能够采取的作战方略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同时保存自己，才能对抗日战争做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

八月一日，毛泽东就八路军的作战原则进行了如下阐述：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以下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八月五日，当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受蒋介石密邀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毛泽东请他们将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告知南京方面，以使国共双方对于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具有共识性的准确定位：一、“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反攻，收复失地”；二、“正规战要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和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三、“担任游击战的部队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四、“依现实情况，红军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依冀、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人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五、“要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这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八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就八路军作战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释：

……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依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划属中国军队第二战区，由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统辖。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发了。

日本人、蒋介石和阎锡山，三方的心绪都很复杂。

日本是一个反共国家，其军国主义者在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借口，也是诱使国民党妥协的筹码，就是彻底铲灭中国共产党。抛开政治因素，日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不屈有深刻的了

解，深知日本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必有太多顾虑，但如果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作战，那就另当别论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一九三六年秋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曾经特别警告日本当局，在中国，日本军队的真正“大敌”，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因为这支军队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惊人，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不能用常规逻辑解释的群体：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大部分青年，鉴于国内政治腐化，军事经济之乏更生希望，政府之无抗日决心，退让无止境之主义，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产军之前锋，潜伏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将来之扩大充实，亦为帝国之大敌。

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需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此等军队，适应穷乏之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适其于将来不能速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之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

可以想见，当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即将联合抗日的时候，日本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尽管接纳共产党是蒋介石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做出的明智选择，但无论如何这一选择于他是迫不得已的。有一点他很清楚，如果八路军直接与日军作战，那么，他用了十年时间都没有达到的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目的，强大的日本军队或许能够帮他达到。只要八路军被推到战场的最前沿，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的红军即使不被彻底消灭也会遭到重创。因此，自红军接受改编之日起，蒋介石就不断地催促八路军赶赴平绥路

前线。而八路军从其驻扎的陕北进入华北，必须通过阎锡山的地盘。为此，蒋介石专门致电阎锡山，口气如同一个下级在请示上级：

急。阎副委员长勋鉴：共军要求在韩城附近渡河，在同蒲线以西地区行进，至绥远集中，以便给养与行动迅速。可否照办？请速示复。中正叩。

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他的势力外谁也别想染指山西的政策。但是，现在有三股力量同时进入了他的地盘：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在阎锡山看来，这三股力量都是他的敌人，可他无力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如何在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人拼杀，拥蒋又能始终保持山西的独立，联共又不真的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分寸中取得平衡呢？

阎锡山说："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在中国的地方军阀中，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自一九〇九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他一直与日本保持着极为友好的联系。一九一七年，他从日本购买了一个炮兵营的装备；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他两次邀请中国驻屯军高级军官访问山西；一九二八年，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到访山西时，受到他极为热情周到的接待；一九三〇年，在与蒋介石进行的中原大战中败北后，躲避在大连的他受到日本人的精心庇护；一九三一年，在日本飞机的护送下他重回山西。阎锡山在山西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他对自己是全国皆知的亲日派颇为自得："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中日关系紧张起来之后，现在率第五师团攻击平型关的板垣征四郎曾对阎锡山的部下说过："只要阎锡山不作一切抗日准备，永远与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对他仍然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阎锡山自己也认为："华北纵然被日本打进来，山西境内也不会发生什么战事。"

然而，日本人的企图是，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日方多次派代表来山西，企图利用与阎锡山的亲密关系，利用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拉拢阎锡山出面充当日本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头面人物。但是，日本人意外地在阎锡山那里碰了钉子。阎锡山不是个糊涂人。除了作为中国人在民族大义上所秉持的基本底线外，他认为日本人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利益。阎锡山将山西盛产的煤炭和铁矿运往日本，交换来大型工厂和其他机械设备，在山西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巨大的市场来维系。可是自日军占领平津后，山西销往华北的煤炭已被日本人截断，支撑山西经济

的棉花销售也受到了日货的冲击。日军占领热河后，把山西商人全部赶走，彻底损害了山西钱庄和商人在热河的经济利益。更严重的是，日军相继侵占绥远和察哈尔一带，南下进入山西的企图十分明显。所以，摆在阎锡山面前的要害问题是，他必须要保住自辛亥年间成为山西大都督后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山西地盘："你们看看九一八的东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下，要不想叫人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过这一块土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

阎锡山与日本人翻脸了。

阎锡山是个喜欢自己创造名词、思想和理论的人。自决心抗日后，

他提出的最著名的口号是"守土抗战"。阎锡山对这一口号的解释是："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阎锡山不下决心便罢，下了决心就表现得十分强硬，声称："我已抱定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救山西。但同时我也要擒住山西人，与我一块牺牲。"他训练山西的官员、民众和学生，组建起一支一万多人的"预备军官团"，同时大量吸引华北各省的爱国学生进入山西的军官学校，以至于太原大街上的人"至少有一半穿着军装"。阎锡山认为，他的晋军向来以"守"闻名，于是他提出的又一个口号是："能守住就能存在"。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八十七万元遗产以他母亲的名义捐给了绥远前线。在阎锡山的带动下，晋军军官们纷纷捐款，山西的民众和学生也发起了节衣缩食运动支援抗战。

城府极深的阎锡山看待任何事，都如同面对一本需要分析的商业账目。他说他无论干什么都必须顾到"利"："以我们守土抗战说，是地方长官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尽力而为之，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容返顾。当汉奸，国人共弃，是义所不当为者，失败是失败，成功也是失败，不容尝试。收复失地，是以成败定是非。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必须审慎，到能成功的时候，才可为之。要是不估计我们的力量，和守土抗战认为同样的路线，孤注一掷，那就不但不能收复东四省，恐怕连华北华南也要失掉！要知道当敌人进攻东四省的时候，我们和他拼命，是个义；现在想得收复失地，必须顾到利。"

谁能真正读懂这个说话擅长绕来绕去的阎锡山？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阎锡山顾不了别处，但要为自己的地盘尽"义不

容辞的责任”。

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貌合神离人所共知。一九三六年二月，在中央红军发动东征战役，从陕北大举进入山西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一心想吃掉阎锡山的蒋介石，以阎锡山请求军事支援为借口，立即任命陈诚为“剿匪”总指挥，同时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星夜疾驰进入山西。红军回师之后，蒋介石的部队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蒋介石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晋军将领，使他们与阎锡山离心离德。对此，阎锡山不惜动用了非常手段，靠收买卫士将投靠蒋介石的晋军将领暗杀了——“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阎锡山对蒋介石最大的不满，是当日军威胁山西的企图已趋明显时，蒋介石在援助绥远的问题上态度消极。一九三六年夏，阎锡山认定“绥远、晋北是日之在所必取”，如不守，这里会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守则需要“强大之兵力与坚固之工事”，因此希望南京政府给予支持。为此，他甚至同意“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可蒋介石只是一再命令他出兵陕北“围剿”共产党武装。显然，阎锡山已经算计出，此刻对于他的山西来讲，日本人的威胁为当务之急。他回复蒋介石：钧座可以另派部队，晋军决不出兵陕北。阎锡山知道他的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而依靠蒋介石解山西之危几近幻想。所以，他“决心自己牺牲一切，能救几分救几分”。

毫无疑问，阎锡山对共产党不但充满惧怕，也充满仇恨，特别是共产党武装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与他的山西一河之隔，令他更加万分警觉。他在山西组织了一个庞大严密的“防共”网，制订了各种各样的“防共”措施，命令“所有各县境内暗通共党及扶助共党危害地方之人民，应即严拿立予枪毙”。阎锡山的悬赏令是：“一、凡在省会拿获确有证据之共产党者，每名赏大洋一百元；二、拿获共探者每名赏大洋二百元；三、通风报信因而拿获者，每名赏大洋五十元；四、赏洋立时向绥署领取。”悬赏令一下，山西全省草木皆兵，为了领赏，乞丐、行旅和小贩都成了共产党，甚至身上发现了红线、红布条者也会被当即逮捕。由于“嫌疑犯”杀得太多，连阎锡山自己都承认“各县办理此种案件，不免有草菅人命之情事”。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阎锡山既是确信不疑的又是己所急需的：“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希望保住地盘的阎锡山开始考虑联共问题，他认为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或许是保存自己的一条出路。信奉“存在就是一切”的阎锡山不再提“防共”了，转而提出山西的第一政策是清除汉奸。一九三六年九月，尽管明知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他还是宣布

以动员山西民众抗日为宗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并亲任会长。阎锡山表示：“和平的确到了绝望的时候，牺牲确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看到了阎锡山的转变，共产党人托晋军第六十六旅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劝解阎锡山：“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共产党方面表示愿意与阎锡山达成谅解，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出于内心的不踏实，阎锡山召集将领和幕僚们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题目是：如果日本进攻绥远，是中立好，还是帮助日本人打共产党好？还是联合红军抗日好？阎锡山要求当即不答，给出审慎思考的时间。——“数日后开会表决，到会三十八人，以三十一对七票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历史在某一时刻会突然变得令人惊愕：昨天还在血拼的不共戴天的两军，今天成为需要协同作战的盟者。坐在阎锡山客厅里的共产党人，周恩来自不必说，彭德怀和徐向前都是与国民党军队血拼的悍将。此时此刻，阎锡山绝不会想到，仅仅十年后，正是面前的这两个共产党将领共同指挥了攻击他老巢的太原战役，将他和他指挥的国民党军赶出了他至死也没能再见一面的山西。

平津相继失陷后，阎锡山到南京接受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在南京期间，他聆听了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防会议上发表的对抗日战争战略意见。回到寓所后，阎锡山对随员说了这样一句话：“非打不行了！不打，共产党不答应！”

共产党武装已经进入他的地盘，因此阎锡山对共产党方面格外在意。

晋北战局的恶化速度大大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就从绥远一直打到了内长城脚下，已经逼近太原。

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够发挥作用，凭他以往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的经验，他知道八路军能够起到作用。

“八路军上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

尽管换上国民党军的帽徽的时候，红军官兵的思想出现了波动，但经过耐心的讲解工作以及给每个官兵发了一枚“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红军官兵打鬼子的热情不断高涨起来。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作为先遣部队从陕西三原出发，该师第三四四旅和直属部队相继跟进，于韩城东渡黄河；第一二〇师于九月三日从陕西富平出发，紧随第一一五师于韩城东渡黄河；第一二九师作为第二批出动部队移驻富平，并准备于九月三十日出发。八路军集结于晋北，一是因为这里是其从陕北开赴抗日战场最便捷的地方；二是因为晋北复杂的地形不利于日军坦克大炮等重武器作战，却有利于八路军发挥其山地游击战的优势。九月二十一日，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

八路军出发前，在陕西泾阳县的云阳镇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会场上挂着“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标语，老百姓把会场外围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很多人趴在树枝和屋顶上。在朱德的带领下，八路军官兵把《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复诵得震天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诚。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八路军出发了。

正是收秋的日子，沿途的大道两边，老百姓摆着茶壶茶水和干粮鸡蛋。前方不断传来日军仍在向南推进的消息。过黄河的时候，八路军官兵默不作声，想起了去年红军东渡黄河时牺牲在这里的战友，船工的号子在沉寂的天地间此起彼伏。

八路军行军到达同蒲路，阎锡山派出的火车已在侯马车站等候。官兵们转乘火车一路向北，铁路两边开始出现躲避战火的难民了，官兵们知道离作战前线越来越近了。

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率领部队乘火车抵达太原车站时，已是午夜。杨得志奉命去城里的一个晋军招待所找到他的师长林彪并接受任务。太原城门紧闭，杨团长通过城门后，不认识城里的路，只好雇了辆黄包车。拉车的是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杨团长不忍心

坐。可老人听说是八路军，不但愿意拉，而且怎么也不收钱。杨团长说，这不是车钱，是我们请您老人家吃顿饭，老人掉了眼泪。

见到师长林彪，林彪表情严肃：原定的作战计划有变。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议，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战区域是：冀、察、晋、绥四省的交界地带。当时毛泽东的设想是：把八路军的三个师集中使用，放在恒山山脉之中以开辟根据地。但是，现在敌情发生了变化：平汉路和津浦路上的日军推进到了石家庄和德州一线，平绥路上的日军占领大同后正沿着同蒲路南下，其第五师团更是南下到了平型关附近，中国军队第二战区部队已全面退守至平型关、雁门关内长城一线。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采取的是大迂回战术，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的侧背，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的目标。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八路军集中配置恒山地域的原定部署，改成配置于山西的四角：第一二〇师转至晋西北地区；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太行山和太岳山方向；第一二九师进至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这样的变更，能够对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形成包围态势，可以保持八路军在战略上的主动，有利于山地游击战的开展，也有利于配合友军机动作战。但是，阎锡山集中兵力于平型关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已定，并要求八路军出击日军的侧背。为了完成第二战区交代的作战任务，除命令第一二〇师进至雁门关以西地区，侧击由大同南下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以策应平型关外，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还必须立即向平型关前进，迅速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敌情和地形，准备投入作战——毛泽东曾明确说过，八路军“不打硬仗”，但是，即将发动的平型关一战，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作战，都已超出了“山地游击战”的范畴，都将是一场与日军面对面的硬仗。

第一一五师转向平型关方向急速前进。

从太原乘火车继续往北，没走多远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待列车开到原平车站时，铁路被炸毁了，而这里距平型关尚有一百多公里。心急如焚的阎锡山立即派出一个汽车团前往接应。这个汽车团是阎锡山的宝贝，全团清一色的美式卡车——阎锡山不惜一切也要把八路军运送上去。杨得志团长坐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司机是个在国民党军中服役多年的中年汉子，他的过分客气让杨得志感到很不自在，后来杨团长才明白了这个国民党老兵客气的原因：

最后一次“围剿”你们，我就开车到了江西。后来，你们长征——我们长官说叫“西窜”——我又开车跟过你们，不久前才调到山西来的。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过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呀？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气不喘气哩！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说好听的，要真的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还能让个小东洋欺负着？

第一一五师赶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在那里撞上了从前线下来的溃兵，一问是从灵丘方向一路退下来的。第一一五师的战士拦住了他们，溃兵们指手画脚地向八路军形容日军的火力如何猛烈。

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正向平型关直扑而来。

平型关，位于晋北繁峙县的东北方向，自古为交通要冲。其西面是恒山，东面是太行山，两山之间纵贯一条大道，即蔚代（蔚县至代县）公路。沿着这条公路，从蔚县以南的灵丘至平型关约三十公里。公路的两端地势较为平缓，只有小寨村至老爷庙一段地势险峻：两山夹着一条沟，沟深十至三十米，宽十至二十米，两侧陡壁如削——只要进入沟内，兵力和火力都难以展开，是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

此时，日军第五师团由浑源、灵丘和涞源分三路由东向西攻击，三路日军相距较远，攻击平型关的日军约为一个旅团的兵力。板垣征四郎深知平型关地势险要，因此在这个方向采取的是正面逼迫、侧翼强攻的战术，即用小部队抄小路插入平型关的侧后，以威胁正面阻击的中国军队。具体部署是：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三浦敏事率三个大队实施正面攻击，第二十一联队队长粟饭原秀率两个大队偷袭平型关侧后。

中国军队平型关地区作战方案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以及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联络参谋一起商定，并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布：正面主攻部队为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第七十一师一个团自团城口至.高地间沿着山麓向东再向南迂回，以团城口北面的蔡家峪、小寨为攻击目标；两个团由.高地至西河口之间向东攻击，掩护团城口正面攻击部队的左侧，截断日军向北撤浑源之路，以平型关以北的王庄堡为攻击目标；一个团为预备队，由团城口附近前进。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固守平型关正面原阵地。独立第八旅以一部协

助第七十一师攻击，以辛庄为攻击目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担任敌后各地之攻击，以团城口以东的东河南至团城口以北的蔡家峪为攻击目标。

二十四日，傅作义进驻平型关以南的大营指挥部。

应该说，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是一个很不错的局部围歼计划，即正面高桂滋的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死守不退，同时确保平型关侧翼在我手中，等日军进入平型关后，由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和郭宗汾的第七十一师两面夹击，将进入险要地段内的日军全歼。其要点是：正面要守住，出击要迅猛，配合要默契，歼敌要果断。

十三日，第一一五师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晚上，师部率主力推进到平型关东南十五公里处的冉庄地区。二十四日，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根据地形勘察结果，确定在平型关东北方向的关沟至东河南村之间长约十三公里的公路两侧设伏。其部署是：以第三四三旅的两团担任主攻，其六八五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住敌人的先头部队；六八六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着公路开进的日军，尔后协助六八五团向平型关以西东跑池方向发展。以第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的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以六八八团为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附近。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浑源之间地区，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敌。

午夜，第一一五师在黑暗中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开进，拂晓前全部进入阵地。

但是，就在第一一五师官兵向阵地前行之时，担任平型关正面阻击任务的第八十四师擅自放弃了阵地。

防守平型关正面阵地团城口的第八十四师，始终承受着日军的强大攻势，残酷的阻击战几乎一直未停，以致军长兼师长高桂滋不断地求援。第八十四师由原属西北军的陕军一部演变而来，在历史渊源上与阎锡山的晋绥军没有太多的关系。此次编成战斗序列时，在阎锡山和他的晋绥军将领们看来，第八十四师是“半嫡系的准中央军”，即他们通常所称的“客军”，既然是客就不是自家人——中国地方军阀间相互排斥和彼此掣肘的恶习，在战场上影响胜负的关键时刻再次显露出只管自己不顾其余的顽劣。高桂滋担负着最严酷的正面阻击任务，心里本已感受到晋绥军是在“欺客”；而面对高桂滋一再请求增援的电报，阎锡山的将领们本着“客军都是打一板子叫十声的”的观念，增援一事就是只说不做。最

后时刻，高桂滋甚至在求援电报里用了“最后哀鸣，伏维矜鉴”的字样，声称“再无援军，只有出于冒犯军令进行撤退之一途”。但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坚持说，所有部队都“同样受到猛攻”，没有多余的兵力派出。

新任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的分析是：

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高桂滋）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郭宗汾的第七十一师）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孙楚）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认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可立解纠纷。十四日晚，敌对高部阵地右翼西跑池和团城口两处发动夜攻，高已觉形势严重，要求开到齐城的郭军一部就近增加于西跑池，郭又未允。当夜孙楚适得八路军高参通报：林师已阻截平型关、东河南敌后的公路，即对敌发动抄击，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岭挺进，接应团城口、平型关大军进击。形势大好，敌已陷我掌握之中。孙楚认为高部纵感紧急也是暂时的，可以坚持；郭军须集结全力做大规模出击，不可分割应付，以免陷于肢着。

但是，高桂滋部的说法却是阎锡山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为了堵住日军第五师团的攻击，第八十四师自二十二日起一直处于苦战中。战斗的第一天第二五一旅五〇二团团长腹部中弹，营长李荣光阵亡。尽管部队伤亡巨大却依然坚持着，就是因为每每听说阎锡山的援军就要抵达。可是打到第四天，援军依旧不见踪影。日军的攻击已经不分白天黑夜，大雨中，第八十四师官兵不得不下半身浸在泥水里作战。第二五一旅旅长高建白火了：增援的时间一拖再拖，这是你们晋绥军的地盘，我们是来替你们打仗的，你们怎么能眼看着我们就这样死光？为了国家，军人理应抱牺牲之决心挽救危亡，可是晋绥军也是身穿军服手持武器，却作壁上观！至于“擅自放弃战地”的指责，高建白旅长更是牢骚满腹：

我全线官兵，义愤痛恨，达于极点，眼看英勇杀敌的爱国弟兄们一批一批死于炮火与肉搏之中，而十六个团近在咫尺，旁若无事。大家都气愤地说：“这是何道理！这是何道理！”十时，敌趁雨猛烈反攻，千呼万唤晋绥军的两个连才姗姗而来……我们再三请求他们开入阵地，参加战斗，他们趑趄不前……我旅官兵自二十一日入关，浴血奋战已有一周，官兵有三日没有吃饭、六日未曾休息者。加以风雨侵袭，枪口内塞满了雨泥，最后只得凭手榴弹来拼命防御。我官兵在敌炮火猛烈扫射下，多数壮烈牺牲。下午，吕晓韬团长也陷敌重围之中，我派奋勇队冲

入敌围，将吕团长接出。这时官兵伤亡惨重，全线数处被敌突破，弹尽援绝，被迫后撤。

无论真相如何，事实已经造成：当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出击的时候，平型关的侧后阵地已经丢失，原计划与他们配合夹击日军的第七十一师出击道路被日军堵塞。二十五日拂晓，第七十一师按原计划出击，遭到日军猛烈炮火的拦截，日军居高临下地俯冲下来，将第七十一师压迫在了迷回、涧头的一侧——所谓“夹击围歼”的作战计划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出击之时已经成为泡影。

但是，第一一五师还是准时出击了。

共产党武装此时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有不顾一切地向当面之敌勇猛地杀去！

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一线，大约两公里的正面要点均被日军占领。日军认为一头控制了平型关入口，一头控制了灵丘城，这就等于控制了灵丘至平型关三十公里的通道。从军事常识上讲，这应该是一条安全的通道了。

因此，对于八路军的伏击，日军完全没有防备。

二十五日上午，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携带着大量辎重由灵丘向平型关开进。这是一支由八十多辆汽车、一百多辆马车和几百名官兵组成的队伍。大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几乎所有的日军官兵都坐在车上，山谷狭窄，车马拥挤，行进缓慢。由于自认为道路安全，加之进入中国后所向披靡，因此日军竟然没有派出尖兵开路，也没有派出搜索队对道路两侧进行侦察，而是堂而皇之开过来了。上午十时左右，日军前锋出了南面老爷庙沟口，后卫也过了北面的小寨，蔡家峪以东看不见日军了——日军已全部进入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伏击圈。

负责迎头截击的是杨得志的六八五团。

这个团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老底子部队之一，三个营都有着光荣的历史，三位营长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一营是朱德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部队，营长刘正；二营是毛泽东从秋收起义部队中带出来的，营长曾国华；三营是赣西南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的底子，营长梁兴初。全团许多战士都是经历过万里长征的了不起的士兵。

包括杨团长在内，六八五团全团没有一块手表，官兵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直到听见了日军的汽车马达声传来。大雨停了，地还是湿的，官兵们伏在地上，军装都湿透了，远远地看到了第一辆汽车上的太阳旗，然后看见了坐在车上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大衣、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抱在胸前的步兵。这是八路军官兵第一次见到日军。

他们的印象是："真有些不可一世的味道。"

第一辆汽车到了六八五团阵地前，杨得志团长发出了开火的命令。八路军的子弹和手榴弹从天而降，日军的汽车和马车相互撞击着，步兵们惊慌失措地滚下车来四处散开。火焰在公路上冲天而起，日军官兵的身上鲜血直流，到处是惊叫声。短暂的惊慌之后，日军军官们举起了指挥刀，士兵们从汽车底下爬出来，开始形成战斗小组，向公路边的高地冲去。

六八五团一营冲到公路边，一连和三连抢先一步冲上高地，把正在攀爬的日军打了下去。然后转身一个反冲锋，把眼前的这股日军消灭了。四连在抢占高地时晚了一步，冲击时连长负伤，一排长替代指挥位置，全连分成两路猛攻，最终把爬上高地的日军逼回了公路。这时候，日军的飞机来了，低空盘旋着，但无法射击和投弹，因为双方已经完全混战在了一起。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二、三营的阵地上展开。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励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囵了。"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二十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二十多辆汽车。在白刃战中，他一个人刺死十多个日本兵，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在向他逼近……曾贤生同志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壮烈行为鼓舞着我们，更鼓舞着他身边的战友。这个连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赴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三十多位同志，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拼杀！三营的九连和十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拣起石块将日本兵的脑壳砸碎。战斗到最后，两个连队眼睛都打红了，尽管伤亡都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却依然旺盛得很。这是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六八六团出击前，每人只发了一百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由于向阵地运动时突遇山洪暴发，官兵们个个满身泥水，嘴唇发紫，趴在地上冷得发抖。这个团位于伏击圈的中部，只等前面的六八五团一打响，他们就冲下去。但是，还没听见六八五团枪声的时候，面前的日军却停了下来，而且还向两侧开枪射击。无法判断这是盲目射击，还是敌人发现了什么，于是出击的命令下达了。

公路上短暂的混乱之后，日军纠集起战斗序列开始向老爷庙高地冲锋。此时六八六团三营奉命抢占老爷庙高地，当官兵们呐喊着冲上去时，瞬间就与日军面对面撞在了一起。团长李天佑在电话里得到报告说，三营营长负伤，九连的干部全打光了。李天佑严令三营不要怕伤亡，坚决地冲上去！命令下达后，三营再也没有关于伤亡的报告。老爷庙高地前的四十多米的斜坡上，双方肉搏战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到处是双方官兵的尸体，最终日军支持不住退了下去。六八六团占领老爷庙高地后不久，日军重新集结向老爷庙高地展开集团冲锋，六八六团死顶不退，一直坚持到六八七团攻了上来。

六八七团负责的是攻击日军行列的尾部，然后向前压缩。当日军在老爷庙打开突围缺口的企图绝望后，又转向团城口方向冲锋，第一一五师投入了预备队六八八团，得以形成将日军包围的态势。之后，残酷的近战持续到傍晚，直到“马路上、山沟里，半山上所有望得见的地方，再没有活着的敌人”。

就八路军官兵而言，无论多么身经百战，还是被眼前残酷的战斗情景震惊了。在他们的战斗经历中，之前没有遇到过如此顽凶的敌人。完全可以把躲在汽车下已被包围的日军士兵击毙，但八路军官兵没有开枪，而是像往日里一样俯下身子喊：出来吧！但是，出来的不是人而是子弹。直到这时候，八路军官兵才明白这是日本人。遇到负了重伤的日军士兵，八路军官兵本能地要为其裹伤，却被伸过来的刺刀猛地戳进了胸口——即使战场上的战斗已经结束，双方的伤员依旧扭打在一起，直到其中的一方死亡为止。

日军士兵听不懂“缴枪不杀”的喊话。

在日军士兵所受到的军事教育中没有“缴枪”一词。

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参加平型关作战的战斗详报概要》显现出他们对所遭遇的对手极为困惑，因为这个对手不但拥有不可比的勇敢，而

且其战斗员“均为二十岁以下的少年兵”：

……车队以矢岛中队在前、中西中队在后的顺序前进，队长的位置在接近矢岛中队前列的地方。矢岛中队的全部、中西中队的一半进入凹道时（九时三十分），忽听前方的喊声，我方同时受到来自两侧悬崖约一个旅敌人的攻击，战斗即刻开始。敌人向我射击、扔手榴弹。由于先头的自卫队受敌压迫，中队长即命第一小队长一并指挥自卫队向敌发起进攻，同时向队长报告了进攻决心。随即遭到右侧高地上的重机枪、迫击炮的射击……此时，汽车队本部陷入敌重重包围之中，队长派出传令兵向旅团告急……后续的中西中队已在远方左侧高地上开始散开射击。另外，前面的自卫队不断出现战死者，敌向第二小队背后逼来，中队完全陷入敌之重围。上午十时三十分，旅团派来援兵一个步兵小队，乃命其在中西、矢岛两中队之间投入战斗……十一时三十分，传令兵带来队长战死的消息，大家愤慨万分（此系误传，从第一小队长处获悉，队长被手榴弹炸伤）。但其后接到队长遭左侧高地重机枪扫射而战死的可靠消息后，中队长命令边烧掉汽车边后撤，时间为十二时四十分……当面之敌几乎均为二十岁以下少年兵，作战勇敢，远非以前所遇之敌可比，或为以学生等组成的军队。再者，其战术类似苏军之战术，显系在其指导之下。

报告中所说的“队长”名叫新庄淳。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三版报道：“陆军辎重兵中佐新庄淳于二十六（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在山西省光荣战死。该中佐为山口县人，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五期毕业生，曾任陆军整备局委员。”

二十五日深夜十二时半，日军第五师团获悉其补给部队被伏击围歼的消息。位于蔚县指挥作战的板垣征四郎立即命令第二十四联队第三大队从灵丘出发前去救援。二十六日，第三大队到达那条遍布着日军尸体的公路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已经撤出。

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的记述是：

……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一百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二十米，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淳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用了长达三个小时，才把一辆辆烧焦的汽车拖到公路的一边，处理好阵亡者的尸体……遇险的中尾贞义所介绍的经过综合如下：粟饭原秀部队（第二十一联队）的大行李队和山口、中岛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编成了约有

七十辆辎重车辆、十五名辎重兵、七十名特务兵的车队，车上满载着部队军官的行李、士兵的冬服和粮食、弹药等。九月二十五日，行李队认为若走三浦（三浦敏事）支队经过后的路，大概是安全的，于是从灵丘出发上路……正当行李队全部进入长约三百米的沟道时，队伍前后两方，突然从头顶上方投下了手榴弹。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袭击，因为是三浦支队走过的路线，完全放心前进，以致在吃惊的同时队伍完全混乱。最初前端的车马受到打击，而使夹在中间的车辆无法动转。加以特务兵既无枪支又无手榴弹。恰有师团的桥本参谋因去三浦支队进行联络搭车同行，他命令高桥小队分成两部，攀登两侧悬崖，桥本参谋、高桥少尉各指挥一侧，努力实行防御战。但敌人依仗人多势众，投掷手榴弹，接连不断地向我发起进攻，无奈寡不敌众，无能为力，小队完全覆灭，最后一点枪声也听不到了。峡谷前后均被敌人包围，人马几乎全都死亡。下午三时，已无一人对敌反抗，敌人在凯歌声中，夺取峡谷中的军官行李、服装、粮食等。

桥本参谋战死的消息由《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刊刊出："步兵中佐桥本顺正于二十五日在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附近的战斗中光荣战死。该中佐为京都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步兵科，成绩优秀，后在陆军大学毕业，前途颇受瞩望，曾任中国驻屯军参谋，对其战死不胜痛惜。"

就在这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代表八路军全体官兵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中间也谈到了故乡、父母和妻儿，谈到了死亡：

日本的士兵们：

你们大概早就听说过红军这个名字吧。我们现在的第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也就是日本报纸上常说的"共产军"……日本士兵们！想想吧，你们在中国战场上被牺牲，被打死，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日本胜利了，牺牲是日本的士兵，日本的工农，而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则坐享幸福。如果日本胜利了，那么日本的统治者更加可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增强他们对于日本工农的剥削，延长他们对于日本工农的剥削，同时也更增强日本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奴役……日本士兵们！你们的牺牲是一钱不值的，你们的尸首也落在中国没有收殓，你们国内的工农也不愿意你们打中国人民，全世界的工农也都不愿意你们打中国人民！你们就是牺牲了，全世界的工农都在埋怨你们！你们想想吧，觉悟吧！……日本士兵们！不要为日本军阀而牺牲你们的生命！回

日本去吧，你们的父母妻子在望你们！回日本去吧，与你们国内的工农一齐起来革命！日本士兵与中国士兵联合起来！停止战争进行联欢！……

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伤亡六百多人。

尽管伤亡很大，但这无疑是一次惊人的胜利，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赢歼灭战，且因缴获了大批步枪、机枪、子弹而斩获甚丰。

但是，从平型关战场的全局看，从中国军队最初的战役设想看，整个战役存在着巨大的遗憾，以至于阎锡山对此咬牙切齿："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仅就当时中日双方的兵力对比和战场态势而言，如果中国军队各部坚决贯彻作战计划，彼此之间紧密协同配合，完全有可能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并一举改变晋北战事的被动局面，为日后作战奠定更为有利的基础。

但是，一切都已再无可能。日军第二十四联队第三大队抵达战场后随即投入作战。同时，由大同南下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二旅团也从浑源出动以增援团城口地区的作战。二十六日，日军与中国守军第七十一师和独立第八旅展开激战，第七十一师陷入包围，苦战待援。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十五旅团当日攻击茹越口，受到中国守军第三十四军的阻击。战场僵持时刻，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胜利的鼓舞，阎锡山认为可以把日军挡在平型关外，于是彻底放弃了原定作战计划，重新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平型关正面之敌连日与我激战，已被我击退，本敌由浑源、灵丘增援甚众，其一部约两千余人，炮二十门，向茹越口一带进攻，似有进入关内之企图。

二、第六集团军应联合第十八集团军及总预备军，迅速击破进攻平型关之敌，第七集团军第三十四军应竭力抗击茹越口一带之敌。其余各军固守阵地，以待我主力调整反攻。

为了达成以上作战目的，阎锡山动用了他的嫡系部队：陈长捷率新组建的第六十一军支援平型关方向。

现在的第六十一军，是枪毙李服膺军长后重新组建的。可能与前任军长受到军法处置有关，该军作战积极，上了平型关就把被包围的第七

十一师解救了出来。但在日军的猛烈反攻下，经过残酷的肉搏战，中国守军伤亡巨大，已缓解不了围绕着平型关附近诸个要点的混战。第六十一军苦战两天，阵地反复失守和夺回，战局依旧没有明显转变。

二十八日，为了打破僵局，阎锡山和杨爱源、孙楚、傅作义等人共同商定了一个决战方案，除了要求第七十三师和第七十一师坚守阵地外，命令第六十一、第三十五、第三十三军相互配合，向平型关外全面出击，对日军实施围歼。计划刚刚制订完毕，傅作义急调第三十五军参战，部队尚未部署展开，战场恶化的消息已至：进攻茹越口的日军第十五旅团冲破了中国守军防线。二十九日，越过茹越口的日军向南面的铁甲岭攻击，中国守军阵地再失，导致第三十四军向繁峙撤退。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命令独立第二旅侧击茹越口之敌，试图从背后威胁进攻繁峙的日军，但该旅尚未立稳就被日军冲垮了。当晚，繁峙城被日军占领。第三十四军再退时各部都受到日军的凶猛追击而无法立足。

茹越口与繁峙的失守，令两路日军从南北两面逼近了雁门关。

此时，在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前敌指挥部里，阎锡山坐卧不安。最后，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劝阎锡山不要犹豫了赶紧走。“阎于是准备起身，他带了个修路队，前往繁峙县砂河镇，阎在砂河镇附近的一个村内召开军事会议。”——砂河镇，阎锡山在大战前计划把日军放进来彻底围歼的地点，现在他在此开会研究的已不是围歼日军，而是下一步如何是好。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的深夜，在砂河南山山麓的一个小村庄里，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以及将领们陷入苦思。

多数将领——特别是傅作义——的意见是：目前的战局并没有恶劣到不能打下去的程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一部日军重创，从灵丘方向来犯的日军第五师团前方受阻，后方断绝，接济已成问题。而从大同方向来犯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虽闯入茹越口占据了繁峙城，但究竟距离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还有上百公里，仅能起到声援的作用。中国军队第二战区的主力还有大部布防于雁门关和恒山，兵力尚算得上雄厚，如果动用主力首先围歼闯入茹越口的日军，不但能打破危局，还很有可能创造平型关前的另一个胜利。

无奈，此时的阎锡山，作为战场的主帅，已经“心怯胆寒”，他虽然明白“强国以武力为后盾，弱国以决心为后盾”的道理，但一旦临战，他

的决心很快就发生了动摇。由于繁峙城被日军占领，阎锡山现在等于置身前敌，一旦日军扑过来，危险的不仅是全局，还有他本人。这个意思被阎锡山的五台山老乡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说了出来。杨爱源说，东条英机的兵团里有不少伪蒙军，这些伪蒙军都是热察地区的蒙古人，这些蒙古人有年年朝拜五台山的习俗，因此他们熟悉从繁峙城经过碳口上五台山的每一条大小路径。一旦他们冲击碳口直上五台山，阎长官回家的路不就断了吗？

这番话让阎锡山如梦初醒：

被隔在繁峙以东的阎锡山，视其所辟的从峨口上五台山的土公路，为他当前唯一可以坐车逃生的道路。（阎锡山向来不敢乘马，只能勉强骑驴，还得有人前后扶持缓行，加以照料。）经杨爱源一提示，认为他想逃走的路，明早可能即为敌骑所截。于是意识一震，击案起立，喊道："我看如此战局，无法补救了，迟退且陷全灭！星如（杨爱源，字星如）、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就下令全线撤退吧！"

当晚阎锡山乘坐汽车上了五台山。

晋北战场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按照阎锡山的命令，杨爱源、傅作义、孙楚等人决定各军向五台山、云中山、芦芽山一线撤退，主力集结布防于忻口与忻县之间以拱卫太原。

将领们的失望情绪溢于言表，认为阎锡山辜负了前线的形势。此时，在平型关、团城口方向，孙楚的第三十三军、郭宗汾的第七十一师、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已经先后投入战场，对日军第五师团主力苦战半月，各部队兵员死伤近万。特别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已经抄到灵丘敌之后方，完全可以大军出关以围歼日军第五师团。仅仅因为一部分敌人侵入茹越口，袭占繁峙城，就"疑惧丛生"地决定全线撤退，致使中国军队主动放弃了适时进击重创日军的机会，此乃"辜负多矣"。

但是，无论如何，在晋北战场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的战果令全中国人民"曷胜喜慰"。

蒋介石贺电：

阳曲。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

寝寅（二十六日寅时）电悉。

有（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为至盼。

中。俭（二十八日）。侍参。京。

从军事规模上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一战，只是一场规模有限的伏击战。然此战之所以能引起“举国同欣”，是因为八路军以有限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在对日战争初期给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军队士气注入了令人振奋的鼓动。此战至少带来了这样的社会效果：为了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真心诚意地与国民党人携手联合，真刀实枪地也开赴抗日战场对敌作战。过去国民政府总在说，共产党武装是一群穷途末路的乌合之众，现在八路军不但能打敢拼，而且面对强悍的日军打了一场胜仗。这足以证明一个真理，那就是只要中国人挺起腰杆拿起武器，抗战的胜利就有希望！

在那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希望比金子都宝贵。

尽管抗战的艰辛之路漫长得看不见尽头。

第六章

从滑稽故事的迷雾中脱颖而出

中国军队在晋北苦战之时，淞沪这边的战事越打越大。

如何迅速结束针对中国的战争，始终是日军大本营焦灼的问题。除了受制于战争资源、外交上的被动以及陆海军之间在“大东亚战略”上的分歧外，日军大本营中的多数将领还有近乎一致的忧虑，那就是担心苏联与日本之间很可能爆发战争。——“包括天皇的宫中方面也忧虑于苏联是否会联合中国攻击日本。”还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时，天皇问询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万一苏联发动（进攻）怎么办？”载仁亲王的回答是“没办法”，天皇“非常不满”。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从日军大本营直至日本天皇，都将日苏战争爆发的时间预想在一九三七年“晚秋或初冬时期”，即十一或十二月间。

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据支持日本人的这一臆想。如果非要探究来由，只能是日本人的阴郁心理所致：二十世纪初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最终战胜俄国，夺取了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从此日俄两国势不两立，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不可化解的世仇。在日本人看来，远东乃至整个亚洲，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对日本“生存问题”的威胁都不可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要向日本复仇的只有苏联。当前的日苏关系可谓处于“最危险的时期”，而日军在中国“出现战线胶着状态”，“将给予苏联对日攻势的好时机”。日军大本营希望在苏联尚未对日动手之前“迅速结束上海战局”。

苏联人确实会对日本下手。

但令日本人预想不到的是：不但中日战争的结束将在遥远的八年之后，且苏联对日下手的时间根本不是在中日之战初期的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在中国北方的攻势，呈现出数路并进且所向披靡的态势。而在位于中国南方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日军攻势的前景却是一片扑朔迷离，持续的残酷的局部战仍集中在上海北部的罗店地区。

等待援军的日军不断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动攻击，每一天攻击的程序大致相同：天蒙蒙亮时，先是飞机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之

后，为海军和陆军地面炮兵指示目标的侦察气球升了起来，高高地悬浮在中国守军阵地的上空。地面炮兵轰击后，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冲击。这种极具日军特点的冲击一波接一波，每一次冲击都会引发近距离的肉搏战。夜晚到来，中国守军在日军第二天将要经过的公路上埋设地雷、集束手榴弹和障碍物，加强阵地纵深配备，并派出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天亮后，日军的冲击又开始了，中国守军从侧翼出击，先打坦克，后与步兵拼刺刀。正是棉花成熟的季节，中国守军隐蔽在棉花地里，不易被日军的侦察气球发现。但是日军的地面炮火密集猛烈，中国守军无法预测其弹着点，守军官兵因此会整连整排地伤亡。

位于罗店战场前沿的中国军队第十四师，成为久攻不下的日军持续进攻的目标，连续数天的作战令官兵们极度紧张。“每当下级团长营长叫顶不住时，或一部溃退下来”，师参谋长郭汝瑰都会急得“汗水顺着钢盔边沿流下来，如同下雨一般”。中国守军采取的是一个团在正面顶，一个团为预备队，如果日军冲上阵地，就派一个营实施反击的战术。如此反复，部队“伤亡很大”，往往是“一个团三次就冲光了”，反击也不是每次都能得手。八十四团一营营长宋一中在日军冲上阵地时率部反击，没有成功，一营仅剩的官兵退下来后，依照军法要被绑起来枪毙。宋营长苦苦哀求说，反击不成功是死，与日军拼命也是死，与日军拼死总比被枪毙好，要求带领这些官兵再冲一次，结果这一次把日军冲下去了。

第十四师实在顶不住的时候，郭汝瑰在掩蔽部里给他的师长霍揆彰写了一份遗嘱：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人各一支，手表一只留给妻子方学兰作纪念。

前敌总指挥陈诚这样告诫前沿士兵：

敌人使用轻重机枪，都用“啪啪啪”，“啪啪啪”三发的点放来考验我们，意思是问你“怕不怕”。我应还以两发的点放，表示“不怕”“不怕”，敌人听到后就不敢进攻。如果我连续不断地“啪啪啪啪”乱放，就等于说“怕怕怕怕”，敌人知道我们是新兵，无作战经验，待我子弹放光后，就猛烈进攻。

持续的胶着战，令训练有素的中央军嫡系胡宗南部也伤亡惨重。胡宗南的第一军，辖李铁军的第一师和李文的第七十八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第一军接到开赴淞沪战场的作战命令，是火速增援宝山方向的周甾的第六师。可是，当胡宗南的部队赶到时，宝山已经失守，第六师的残兵正在溃退。第一军即刻补上去占领阵地，第二天日军就反扑上来了。拂晓，侦察气球升空后，火炮瞄准猛烈轰击，然后是步兵蜂拥而至。第一军的阵地狭窄，没有既设工事可以利用，在日军猛烈火炮的打击下，在不断发生的阵地肉搏战中，第一军的两个师伤亡十分惊人。第一旅旅长刘超寰与一团团长王应尊负伤，二团团长杨杰和四团团长李友梅阵亡。第一师营长以下官兵伤亡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师的连长除通讯连连长外全部都因伤亡而换人。而第七十八师全师的营长仅剩下一人。第一军开赴前线时，临时加强了一个团，是从徐源泉的第十军调来的，这个团也很快伤亡了多半官兵。宝山地区前线的战壕里，满是阵亡者的尸体，运不下去，官兵们只能重新挖战壕，他们说："如果我们牺牲了，这就是自己的坟墓。"第一军军长胡宗南表现出惊人的坚定，即使部队的伤亡数字不断报来，他依旧对必须坚守和必须反击毫不动摇，大有将第一军全都打光也不退却半步的架势。胡宗南的决心和意志令第一军官兵"士气旺盛，作战顽强，对敌人寸土必争，每屋苦战"，始终没有丢失一块阵地。而且，与所有部队不一样的是，胡宗南从来不叫苦也不要求增援。第一军苦战七天后，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知道了，在电话里表示当晚换防，胡才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第一军因伤亡太大被撤换下来到后方整补。

九月，上海方向的战事依旧没有发生转变的端倪。

东京日军大本营的焦灼日趋严重，将领们还是担心苏联可能趁中国战事陷入僵持之机，突然从北面打下来，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乃至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日军大本营不但制订了对苏作战计划，并且还这样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现在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华北八个师团，上海五个师团，还有中央控制的一个师团以及国内控制的预备作战三个师团，如想应对苏联陈兵于西伯利亚地区的兵力，足足少了十个师团。一旦苏联真动手了，日本在中国就只能采取守势，因为至少要从中国战场抽出去七个师团才能与苏联作战，否则局面不堪设想。对苏作战计划呈给天皇并获得批准。于是，对于日军大本营来说，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必须迅速让中国屈服，尽早结束对中国的作战，时间最好是在本年十月底前。

日军《作战计划大纲》：

一、制定计划的基础

本计划制定的基础是，在对华作战期间要能够随时根据对俄年度作战计划进行作战，特别是进行第一期作战。

二、对华作战方针

（一）大致以十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势，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

（二）以上作战不能达到目的时，即使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也要停止陆上兵力的积极作战，以各种其他办法挫伤敌人的持久作战的意志，同时节约直接对华作战的兵力，将必要的部队调到满洲及华北待机，整顿对俄作战的准备，以备战争长期化。

上述积极作战与持久作战，预定以十月底为界限。

三、兵力的区分、使用及任务

（一）对华决战的时机

华北方面

以华北方面军（以八个师团为基干）击败河北省中部之敌，依据情况方面军的兵力可为九个师团。

上海方面

以上海派遣军（以五个师团为基干）击败上海周围之敌。

（二）对华持久作战时机

华北方面

以一个军（大概以四个师团为基干）确保平津地方及察哈尔省东部，并谋求其安定。

上海方面

以一个军（大概以三个师团为基干）确保上海周围重要阵地，切断上海、南京间的联系，并谋求占领地区的安定。

四、对华持久作战时期

拨充对俄作战的兵力，预定为十九个师团。日俄开战时，预定初期兵力区分为：关东军司令官属下四个军（以十五个师团为基干）及直辖四个师团，另外大本营直辖的四个师团。

从以上作战计划看，日军大本营急切地希求中国能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迅速屈服。然而，中国军队的抵抗出乎预料地顽强，眼见到了一九三七年九月，战争丝毫没有将要结束的迹象。九月十一日，日军参谋本部向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〇—师团以及第三飞行团司令部等部队下达了向上海增兵的命令。

日军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是：

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参谋长饭沼守少将。

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参谋长田尻利雄大佐。辖步兵第五旅团（辖步兵第六、第六十八联队），步兵第二十九旅团（辖步兵第十八、第三十四联队），骑兵第三联队，野炮兵第三联队，工兵第三联队，稱重兵第三联队，师团通信队和卫生队等。

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山室宗武中将，参谋长片村四八大佐。辖步兵第十旅团（辖步兵第十二、第二十二联队），步兵第二十二旅团（辖步兵第四十三、第四十四联队），骑兵第十一联队，山炮兵第十一联队，工兵第十一联队，辎重兵第十一联队，师团通信队和卫生队等。

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参谋长中川广大佐。辖步兵第六旅团（辖步兵第七、第三十五联队），步兵第十八旅团（辖步兵第十九、第三十六联队），骑兵第九联队，山炮兵第九联队，工兵第九联队，辎重兵第九联队，师团通信队和卫生队等。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参谋长田勇三郎大佐。辖步兵第一〇三旅团（辖步兵第一〇四、第六十五联队），步兵第二十六旅团（辖步兵一一六、第五十八联队），骑兵第十七大队，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工兵第十三联队，辎重兵第十三联队，师团通信队和卫生队等。

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参谋长西山福太郎大佐。辖

步兵第一〇一旅团（辖步兵第一〇一、第一四九联队），步兵第一〇二旅团（辖步兵第一〇三、第一五七联队），骑兵第一〇—大队，野炮兵第一〇一联队，工兵第一〇一联队，辎重兵第一〇—联队，师团通信队和卫生队等。

至此，日军投入淞沪战场的兵力已达五个师团，二十万人以上。

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中国方面的兵力投入持续不断，至一九三七年十月，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是（调至后方整补和尚未参加战斗部队未列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

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下辖：

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辖第六十二师，师长陶柳；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松山；独立第四十五旅，旅长张銮基；炮兵第二旅，旅长蔡忠笏。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下辖：

第四十五师，师长戴明权；第五十二师，师长卢兴荣；第一二六师，师长顾家齐；暂编第十一旅，旅长周燮卿；暂编第十二旅，旅长李国钧；暂编第十三旅，旅长杨永清；独立第三十七旅，旅长陈德法。

宁波防守司令部，司令王南。

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下辖：

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辖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兼）；上海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简。

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辖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兼）。

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辖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兼）。

第八军，军长黄杰。辖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第三十一师，师长李玉堂；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税警总团，团长黄杰（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下辖：

第一军，军长胡宗南。辖第一师，师长李铁军；第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

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第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兼）。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下辖：

第六十九军，军长阮肇昌。辖第五十七师，师长阮肇昌（兼）。

第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兼）。辖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兼）。

第二军，军长李延年。辖第九师，师长李延年（兼）。

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师长谭邃；第一六〇师，师长叶肇（兼）；教导旅一个团。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辖第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域；第一三四师，师长杨汉忠。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下辖：

第四十四师，师长陈永；第六十师，师长陈沛；第十六师，师长彭松龄。

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兼）。辖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

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兼）；独立第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

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辖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尚志。

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兼）。辖第十一师，师长彭善；第六十七师，师长黄维；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

江苏保安第四团、炮兵第十六团及高射炮两个连。

江防，总司令刘兴。辖第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第一〇三师，师长何知重；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江阴要塞，司令邵百昌等。

第十一军团，军团长上官云相。辖第三十三师，师长冯兴贤；第四十师，师长刘培绪；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太湖警备指挥部。

炮兵，指挥官刘翰东。辖炮兵四团、炮兵三团一个营、炮兵十团一个营以及炮校练习营。

以上中国军队，除了蒋介石中央军系部队陈诚、胡宗南等部外，夹杂了薛岳、余汉谋的粤军，何键的湘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杨森的川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豫军、浙军、闽军、黔军、鄂军，还有收编的北洋军等部。中国各路军事力量的聚集，使得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总兵力达七十余万人。

狭窄的战场上，双方合计总兵力已达百万之多。

而如果不计兵力，仅从战斗力对比看，双方在这一地区基本上处于平衡态势。因此，日军增援部队尚未抵达之时，战场上呈现出令人焦灼的僵持态势。

九月二十二日前后，增援的日军陆续抵达战场。

交战双方在上海地区的新一轮惨烈厮杀开始了。

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先遣队抵达后立即投入战斗。此刻，中国军队也于战场一线增加了九个师的兵力。战斗依旧纠缠于上海北部的罗店、宝山和月浦一线。这个方向的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和第十四师，兵员伤亡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第九十八师全师伤亡近五千人，团长伤一人亡一人，阵亡的营以下军官达两百多人。由于伤亡过大，部队原地补

充了三次，补上来的都是从后方部队临时抽调的官兵，但也基本上是刚上去就负伤了，以至于被送到野战医院后，伤员都说不清自己部队的番号。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八千多人，激战六天后，只剩下了两千多人，且多数是伤员和后勤人员。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位于战场前沿的一个旅，需要以平均每天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战斗。

九月，日军在上海战事中伤亡也达一万二千三百三十四人。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计划是：以新增援的台湾步兵旅团协助第十一师团，先把防守罗店的中国军队赶到罗店西南侧；第三师团在增援而来的第一〇一师团先头部队的协助下，对刘家行、顾家宅一线的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

尽管中国守军顽强死守，但因为相比日军武器甚为简陋，在兵力越来越多的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守军的一线阵地不断被突破。三十日，日军一部突进中国军队第六十七师阵地，该师一个连的官兵与日军血拼一昼夜，最后仅有两人生还。第七十七师的万桥阵地也被突破，第五十七师实施反击曾一度夺回，但阵地还没巩固便被日军再次攻占。坚守阵地的一个排的官兵全部阵亡，排长王心齐在与日军肉搏中腹部受伤，最后用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这天傍晚，日军第十一师团由罗店向西、向南推进了三公里，第三师团从吴淞向西、向南推进到顾家宅附近。

十月一日，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召开的四相会议在东京举行，会议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出于这样一种设想："华北及华中的战局要扩大，而且因为眼看战局要旷日持久，所以设想通过十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日本政府出于对苏联出兵的严重戒备，还是想"迅速结束"对中国耗费重兵的作战。至于如何"结束"，内阁的一致意见是：军事上以扩大战争规模的手段"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位于上海前线的日军将领们认为，东京大本营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与他们遭遇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上海作战关于中国军之抗战意志，与步兵之战斗力，一反三宅板

（日本陆军省和军部都位于东京三宅板）以往之判断，其主要原因，为抗战意志坚定。中国军之步兵，遂在日军无情之炮击下，决不由阵地后退。中国步兵战术之要求为近接日军步兵战线，一旦接近日军步兵战线后，则可避免日军之陆、海、空综合火力，舍身进入死地，死里求生，可谓彼等之步兵战术。中国军之狙击，尤为彼等之特技，日军军官常为此等狙击之好目标。

置身于中国战场的日军将领，并不认为中国会“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因此，他们主张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加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于在华北及上海方面的十月攻势，南京的国民政府大概会有深刻的战败感，但是，这种战败感是否达到了挫伤抗战意志的程度，还有相当大的疑问”。因此，必须在“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彻底感到战败了。这样还不足以使其放弃抗战的话，即在华北建立独立政权，加强此独立政权，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另一方面空军攻击、海上封锁相辅进行，切断南京政权的粮道和财源，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迫使其求和”。——在华作战的日军将领与东京日军大本营在对侵华战争认识上的分歧，几乎贯穿于整个中日战争期间，对战争进程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十月一日，日军第一〇一师团、第九师团和第十三师团主力先后抵达上海战场。松井石根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实施中间突破的战法，以罗店、大场公路为轴线，“主力从左边回旋到南面”，另一路主力从右面向南，“对大场镇附近进行攻击”，以突破大场阵地“进入苏州河一线”，完成对中国守军的迂回包围。

日军每一天都有增援部队抵达战场，中国守军位于大场前沿的刘家行、万桥等阵地相继失守。十月一日这天，顾祝同下令第一线部队撤退。敌前撤退是万分危险的，各部队在日军猛烈攻击下互相掩护，伤亡还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前沿已经全线撤退的情况下，第十师六十二团一连据守东林寺据点，在仅剩排长胡玉政和五名士兵的情况下，誓死不退，与不断突入据点的日军展开肉搏战，用铁锹和刺刀杀死日军中队长宿田信义后，全体殉国。

从白茆河口登陆的日军，沿着沪太公路（北起江苏太仓南至上海闸北）南下，开始攻击蕴藻浜。在日军强大火力的袭击下，中国守军的线阵地被完全摧毁，不断有部队因伤亡殆尽而需要新的部队顶替。在日军主攻的黑大黄宅方向，布防的是中国军队第八师。该师是由北伐战争初期的湘军部队改编而来。奉命从陕西凤翔开赴上海前线后，被编在胡宗

南的第一军作战序列里，但该部并不属于中央军嫡系部队。师长陶峙岳对此满腹牢骚："虽然长期受着蒋介石指挥，却老是遭到排斥和歧视，除发给仅够维持官兵生活的薪饷外，从来不补充武器装备，任其自生自灭一般。这支部队开到上海战场时，使用的还是二十年代的汉阳枪以及各色杂牌枪支，根本没有重武器。这样一支劣势装备的部队，要与拥有海军优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敌军交锋，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杂牌部队"第八师，在陶师长"死守"的命令下，在前沿顶了二十天，让日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直到该师伤亡殆尽，黑大黄宅阵地才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第八师从战场上全部撤下来时，几千人的部队仅剩下七百多人。

由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推进得十分困难，只能采取挖掘战壕的方式一米一米地向前，而近距离的短兵相接使得战场情势更加残酷。日军第九师团先头部队突破黑大黄宅后，强渡蕴藻浜，在南岸建立起长约一公里的滩头阵地，不但使中国守军侧背受到威胁，而且日军的攻击目标已经直指大场。

大场在上海的正北，一旦失守，日军便可以截断闸北、江湾、庙行一线中国守军的后路，锋尖直抵苏州河。因此，大场阵地的稳固，关系到上海和数十万中国军队的命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将刚刚抵达的第十一集团军投入了战场。前敌总指挥陈诚在重新调整各部队的作战区域和战场划分后，下达了扑灭蕴藻浜南岸之敌并巩固整体防御线的命令。该命令准确地把兵力集中在了日军攻击的左翼。

十一日，日军主力开始在南岸桥头堡的掩护下，强渡蕴藻浜。为了堵住黑大黄宅的阵地缺口，阻止日军渡过蕴藻浜，缓和整个战线出现的危局，陈诚把在昆山增补的第一军和黄杰的税警总团这两支强硬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再次投入了战场。刚刚补充完毕的第一军上来之后，没坚持几天，全军再次伤亡达百分之八十。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团以上指挥官阵亡人数减少，但营长以下的军官所剩无几。只是，中国军队也让当面的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付出了惨重代价。十一日那天，第一〇一联队联队长加纳治雄大佐刚举起指挥刀站起来，就被中国守军打倒了——他在阵地前的大喊大叫引起了中国官兵的注意，那个瞬间射向他的步枪子弹雨点般密集。加纳治雄，东京人，武士家族出身，曾任关东军第一师团特务机关长，一个多月前才被抽调到上海战场任现职。

由于日军顽强猛烈的攻击，陈诚又从中央作战军那里调来李觉的第十九师、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以及左翼军川军杨森部。中国陆军第十九

师，是湖南军阀何键的基本部队，曾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是当年首先攻占汉阳的北伐军部队之一。与所有的地方军阀部队一样，他们备受中央军的歧视：武器装备落后，每连只有轻机枪六挺，重机枪还是汉阳兵工厂造的老式三十节式，步枪除了口径七点九毫米的外，汉阳造、湖南民生工厂自产的步枪等等混杂在一起，常常是打几枪就发生故障，所有样式的枪支都缺少零件。部队开往上海的途中也是备受艰辛，火车白天怕轰炸不敢开，晚上因为铁路被补给列车、伤员列车占满，他们的列车只能走走停停，官兵们挤在车厢里疲惫不堪。接近上海以北阵地的时候，第十九师开始步行。湖南人到了这里不熟悉路，常常走错，加上道路泥泞，官兵们叫苦不迭。满腹牢骚中，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司机热情地请他们上车。这位司机竟然是个年仅十八九岁的少女，一问才知是上海童子军的志愿者上前线来接伤员的。一个小姑娘竟然冒死上前线，这些湖南人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纷纷表示既然上来了就要奋勇杀敌。——“官兵们伏卧在棉田里，遭受敌机轰炸不能还击，又受中央军轻视”，“内心忿忿不平，大都怀着‘及锋而试’的思想，让战功来改变友军的轻视态度”！十九师一上来就伏击了一股日军，居然把敌人追到了蕴藻浜，迫使日军乘坐橡皮艇逃了回去。可是接下来的战斗中，仅凭手榴弹无法有效地杀伤日军，第十九师自身的伤亡开始加大。该师一一三团在防守郭家牌楼阵地时，连同团长秦庆武在内，全团几乎全部伤亡。湘军不服气，增补上来的是何键的看家部队湖南保安团，这群倔强的湖南人在前沿阵地上苦撑了十几天。

中国陆军第二十军是川军。川军上战场前，军长杨森曾向部队训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为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川军士气旺盛，进入战场后纷纷给家里写遗嘱。第一三二师七九七团团长陈亲民也写了，并且收到了妻子的回信：“接到你的信，悲感交集，大家以为你已经为国牺牲，当即为你化帛默唁。努力杀敌吧！”第二十军初到战场，蒋介石对这支川军很不放心，于是分散使用，让其接受原阵地军官的指挥。当时，第三十二师快顶不住了，师长王修身命令刚上来的川军第四〇二旅旅长杨干才反击，杨旅长把任务交给了八〇四团团长向文彬。向文彬的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另一个营是手枪营，专门负责军部警卫不能直接参战。向团长是条汉子，利用夜色的掩护率部猛打猛冲。川人斗狠，日军溃散，白天丢失的阵地被夺了回来。而向团长的团一仗打下来，营长只剩下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排长剩下四名，士兵剩下一百二十多人。仅剩下的那名营长，把没有负伤的官兵编成了一个连，依旧坚守着夺回的阵地。蒋介

石获悉川军的表现后，电话一直打到前线，命令向文彬团长晋升为少将，并给奖金六千元。不久后，蕴藻浜阵地再次危急，川军又一次猛烈反击，把当面日军打了回去。但坚守阵地的部队伤亡太大，团长李介立接到了撤下去的命令，由广西的桂军奉命上来接替他们。日军趁机反击，李团长决定先把日军打下去再移交阵地。反击中，这个团又出现巨大伤亡，士兵仅剩下四十多人，李团长本人也负伤，交接阵地后被送往苏州的后方医院治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授予李介立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升为少将。”

日军将二线部队第十三师团投入了一线作战。

阴雨连绵，这是考验双方战斗意志的时刻。

蜷缩在战壕里的中国守军没有空军的支援。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伤亡殆尽，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而日军的飞机在没有任何空中对手的情况下极其疯狂。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和上海派遣军制订了协助陆军作战的协定。原来用于华北战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也转场到了上海方向，不但直接支援陆军的地面作战，而且还开始大规模地轰炸南京。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空军勇敢地升空与日机搏斗，但损失之后难以补充，导致飞机的数量锐减。而中国海军在日机的轰炸下完全陷于被动，仅剩的几艘军舰皆因负伤而丧失战斗力。——“毋庸讳言，国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后勤各方面都距现代化甚远。”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回忆道，“记得有一支队伍从老远开到江湾火线后面，他们挤住在几个乡村里，点火做饭，炊烟四起，空场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敌机飞得差不多触着房顶，机枪乱射，炸弹乱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另一支在内战中素以精悍善战著名的友军，在敌军几个钟头的火力攻击下，被轰得七零八落。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也被调下火线了。”

坚守蕴藻浜前沿的中国军队第八军，由原财政部税警团改编而来，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的，武器从美国购置，排以上军官大多是留美学生，因此战斗力远比当时普通的中国陆军师强。只是，由于中国军队严重缺乏炮兵，官兵们在充满积水的战壕里忍受着日军的炮火，身下泥水齐腰，头上弹片横飞，整个前沿阵地犹如人间地狱。中国陆军由于武器简陋，战斗到最后往往只能靠肉搏。但即便是肉搏，中正式步枪的刺刀也比日军三八式步枪的刺刀短了足足十厘米。日军远离本土，尚未发生难以维持作战的供给困难；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一线部队却会发生吃不上饭的困难。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甚至说，前线的

中国官兵有饿死的，“因为饭送不上去，士兵身上又没有带干粮。几天几夜没有饭吃，不饿死还等什么”？不间断的白刃战，极度紧绷的神经，无法克制的饥饿，负伤后难以及时后送，大量浸泡在泥水中的尸体开始腐烂。——残酷的上海战场，被中国军方称为“一寸山河一寸血”，被日本军方称为“血肉磨坊”。历史的事实是：在上海战事中，中国军队有丢失阵地的，有贻误战机的，有由于种种原因抗命的，甚至有个别贪生怕死的，但就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言，没有妥协和屈服的，从官到兵都没有！

上海周边的战斗异常残酷，但市区内外国人居住的租界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陆军第十六师的一名司务长，带着几名炊事兵从前线进入上海市区想弄点食品：

走进租界边上，见到街头巷尾都有沙包和铁丝网构筑的工事，外国水兵持枪守卫，外竖一木牌，写着“华军禁止入内”，我们见到很气愤。又见附近空地上铺着一丈多宽的英、法国旗，为的是让日机不要轰炸租界区。市区商店照常营业，茶楼酒馆，生意兴隆，娱乐场所，锣鼓喧天，与市外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杀声震天的情况，形成两个天地。

日军缓慢但顽强地向前推进，前锋已进至蕴藻浜以南五公里处。如果战线再次崩溃，日军便可直抵大场，中国守军将面临退路断绝的危局。中国军队所能承受的极限，也是日军必须同时承受的，在这种胶着状态下，谁能够拼尽最后的气力，谁就可能占据主动。中国第三战区决定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反击作战。这一计划得到了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支持，并决定反击作战主力由新近投入战场的桂军第四十八军担任。白崇禧“力主反攻”，认为“桂军英勇善战”，所以“亲来前方指挥，适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蒋介石也想打一胜仗，显示中国军队力量”。此时中央军嫡系部队“均已残破不堪”，因此反攻之战只有“借重桂军”。

十月十八日晚九时，中国军队反击作战命令下达：

一、敌军主力仍继续向我蕴藻浜南岸阵地攻击。

二、本战区以击破蕴藻浜南岸敌军之目的，决由蕴藻浜两侧地区转移攻势。

三、中央作战军应以八个团编成攻击军，由谈家头、陈家行之线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左翼。第一攻击目标桥亭宅、顿悟寺之线；第二攻击目标赵家角、西六房之线。

左翼作战军应以四个团编成攻击军，由广福、新陆宅之线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右翼。第一攻击目标彭宅，第二攻击目标陆桥。

四、其他正面各师，除守备阵地外，应编成四个突击队，向敌阵地要点出击，策应攻击军之战斗，并调整阵线，加强工事。

五、炮兵队火力运用，以火力支援攻击军之战斗。

六、各攻击军应迅速侦察敌阵地状态、地形及前进道路，并搜集通过小河川之架桥材料，于二十一日薄暮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各集团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部署：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以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四师为第一攻击军的一线师，第一七三师为二线师，均归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指挥；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以第六十六军第一六〇、第一五九师各一部组成第二攻击军，由旅长邓志才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以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旅为第三攻击军，由该旅旅长指挥。第一线其他各师各自编成突击队。

此次大规模反击作战的主力突击部队，是位于一线的桂军。

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军，是中国各路地方部队中最具战斗力的。桂军的兵员来自广西特有的征兵制，实行的是“寓兵于团”的政策，广西受过训练的壮丁达一百多万人。桂军除了火炮弱些之外，每年都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一万支，甚至还有先进的自动步枪；每团约一千五百人，都是久经训练并打过仗的老兵。桂军北上抗日的部队，先后编成了三个集团军，即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抵达淞沪战场的，首先是第二十一集团军韦云淞的第四十八军，下辖第一七三、第一七四、第一七六师；十月上旬，周祖晃的第七军抵达上海，下辖第一七〇、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师。广西人性格剽悍，桂军以死拼闻名，其擅长山地作战的特点人人皆知。

但是，上海战场遍布稻田、港汊和小河，没有山，连丘陵都没有。

二十一日晚七时，中国守军的火炮按照反攻计划全面轰击，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开始了。之前，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曾对这些广西兵说：“你们生在这个范围里，死也在这个范围里，若无命令，有敢擅自脱离阵地的，无论任何官兵，只有拿头来见我！”在第四十八军的突击方

向，陈家行、顿悟寺、桃园浜一线是日军第十三、第九师团的主攻地段。因此，反击作战一开始，中国军队的进攻就遭到了日军猛烈的炮火拦截。第四十八军火炮数量有限，且多数是射程不远的山炮，自进入上海战场以来，桂军才知这些山炮在密布河汊的地形里根本用不上，随着部队的调动在战场上拖来拖去反而成了累赘，只好把这些没用的东西运回广西去。日军炮火之猛超乎了桂军的想象，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与几名旅长刚刚从指挥部出来，炮弹就呼啸着飞过来了，一名旅长当场阵亡，另一名旅长跑向自己的炮兵阵地，试图指挥压制日军火力，结果也被日军的炮弹炸死。桂军官兵多出身于广西民团，剽悍有余，打仗凶猛，但却毫无现代作战的经验。官兵们在日军的火力拦截下伤亡惨重，他们把原因归结在自己的军装上："在上海战场上的我军，皆戴布帽和着灰色军装，唯桂军戴钢盔，着黄色军装，目标特别显著。"掩护第四十八军反击的炮兵释放了烟雾弹，可是对风向的判断出了错，烟雾迎面向中国军队飘来，出击的部队什么也看不见，日军却把中国军队的出击意图看明白了。

桂军第七军虽然没有参加反击，但负责防御时也伤亡惨重。日军出动坦克向第一七〇师阵地实施冲击，第五〇八旅一〇一六团二营营长王有清阵亡，全营动摇，三营奉命增援时被日军火力拦截。二营阵地的丢失令团长谢志恒很恼怒："罗旅长对今天战斗很不满，他说我们第七军在国内外素有钢军声誉，守个阵地不到两天就失了，成什么样子！今晚如不把第二营阵地夺回来，从炊事兵到团长都要杀光！"此时，一〇一六团三个营中的十二个连长已经伤亡九人。三营长负责收复阵地，命令任何人"不准畏缩不前，违者军法从事"。两个营仅剩的一百六十多名官兵只能决死战斗了，冲在最前面的是二连连长蓝中民：

天差不多快亮了，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即发出冲锋的口令，撼天动地冲上敌阵，投掷手榴弹，用刺刀与敌人搏斗。冲到战壕时，碰上一个敌队长，他用左轮手枪向我射击，子弹由我左耳朵边飞过，我的手枪同时发射，子弹从他小腹穿过，他倒地了。我的士兵在他身旁拾得左轮手枪一支，战刀一把，又从他身上搜到未婚妻及他妹妹相片、手表等东西。敌人经过我军这样猛攻冲杀，天亮时，狼狈逃窜。我们即用火力追击，夺回第二营阵地……在战壕外，见敌我阵亡官兵尸首混在一起，血流遍地。我王营长（有清）尸体，胸部受刺多处，惨烈之状，目不忍睹，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但是，局部的血拼不足以挽救反击全局。

与第二十一集团军同时发起反击的其他各路部队，都因缺乏足够的兵力以及必要的火力支援未能达到作战命令所规定的攻击线。第二天凌晨，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显现出败势。

日军立即发动了反击。

中国军队参加反击作战的各部在日军的攻击下开始后撤。

为堵塞战线裂开的缺口，陈诚调动预备部队补缺，但依旧不能持续支撑。二十四日，中国军队逐次撤退至大场一线。第二天，追击而来的日军猛烈围攻大场。大场及外围阵地由湘军朱耀华的第十八师和旧西北军冯兴贤的第三十三师防守。这两个师刚刚抵达战场，开赴前沿后连简易的野战工事都没来得及构筑，日军便分两路突入，第三十三师不战而溃，第十八师鏖战竟日，身陷重围，援军不至，大场最终陷落，朱师长羞愤自杀。——朱耀华，湖南长沙人，早年入湘军，参加过辛亥武昌起义，历任排、连、团、旅长等职，时年四十九岁。这是上海战事爆发以来第一位在战场殉国的中国师长。

大场失守，上海战局急转直下。

由于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为防止中国军队被日军围歼，第三战区决定放弃现有阵地全面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大场失守的那天，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给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打电话，命令他率第八十八师留下来死守上海市区，当即遭到孙师长的拒绝：

十六日早晨，上海战区国军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先生打电话给我：“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我略加思索，答：“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现在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部队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后来，这一部署改成留下一个团，孙元良师长还是不同意，最后勉

强留下了一个营，指挥官是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和该团一营营长杨瑞符。史称“八百壮士”，实则四百五十二人。——从军事角度上看，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日军攻占的地域里留下少量部队。可能的解释只能出于政治意义：蒋介石仍没有放弃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在国际联盟即将开会之际，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军队仍在坚守上海市区，哪怕只有几百名中国官兵。

苏州河，一条横穿上海市区的小河，尽管河面只有百余尺宽，浑浊的河水很浅，枯水时几近露出泥浆河道，但在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它却成为中国军队固守上海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留下的壮士们坚守的阵地，是一栋六层楼房，由于是大陆、金城、盐业和中南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因此上海人把这栋楼叫作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孤零零地立在已被日军占领的苏州河北岸，大楼里事先储存了足够的饮水、粮食和弹药，四百五十二名中国官兵就在这栋被日军围困的大楼里坚守不退。

二十七日天亮后，日军发现中国守军已全部退至苏州河南岸，唯独河边这栋楼里的中国守军不但没撤，而且所有的窗口都布置了持枪士兵，这令日军整整一上午都处在困惑之中没能有任何动作。下午，日军试探性地向这座孤楼发动了攻势，当中国守军的步枪子弹出膛后，日军的试探转瞬间变成了猛烈进攻。在机枪的掩护下，日军一波接一波地冲锋，都被中国守军打了下去。——四行仓库三面被日军包围，但南面却是公共租界，日军攻击时既不敢出动飞机轰炸，也不敢动用火炮支援步兵，更无法通过租界地区实施进攻，中国守军背后是安全的，这令日军感到十分棘手。

四行仓库的作战，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关注——原以为苏州河北岸的中国军队全都退到了南岸，现在竟然还有一支部队在与日军死拼。上海市民奔走相告。从二十七日下午开始，四行仓库这边枪声一响，隔着狭窄的苏州河，上海市民“观者如堵，靡不赞叹”。

在观战的市民中，有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看见苏州河对面围绕四行仓库的四个方向上，三个方向飘着日本太阳旗，一个方向飘着租界里的英国米字旗，决心一定要让一面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升起来。

上海市商会和抗日救亡团体筹集了一批物资，准备秘密地通过租界

送进四行仓库，女孩儿搭乘着送物资的卡车潜入了公共租界，然后开始了她的惊人之举：

到了晚上，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紧紧地缠在身上，我再罩上制服。夜是黝黑的，有英国兵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的四行仓库像一个巨人，俯视着我。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若是溜过马路，势必要被左右的英国警戒兵发现，把我当作枪靶子。过了马路，四行仓库有重重铁丝网围着，只有沿着铁丝网工事爬到缺口处，再从窗子爬进去。终归是要冒险的，我卧倒在地上，爬过马路。我急跳的心刚稳定下来，突然枪炮声大作。我以为我被敌人或是英国警戒兵发现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原来是敌人又向四行仓库进攻哩。不过敌人似乎不敢过分乱放枪炮，因为隔着苏州河对岸英租界里立着一排大汽油坦克，一颗子弹飞错方向，全上海市民连日本人也不例外，都要遭受祸殃！不久，枪炮声沉寂下去，我又开始慢慢爬，终于到了东侧的楼下。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早有消息，知道我要来献旗，他们都在等候我。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他立刻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袋黄豆或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我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是把我送出门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是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是白天了。我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救了我，我深潜入水中，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招手欢呼！

这位勇敢的中国小女孩儿，名叫杨慧敏。

四行仓库楼顶的中国国旗升起来后，团附谢晋元给师长孙元良写了一封信：晋元“誓不轻易撤退，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前，全营官兵必向寇取偿相当代价”。“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

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一营，坚守四行仓库四个

昼夜，击毁日军两辆坦克，让日军横尸二百余具，守军仅伤亡三十七人，一营营长杨瑞符弹穿左胸身负重伤。

十一月一日，一营奉命“退去戎服”，退入公共租界。

为什么突然放弃坚守而退入租界，原因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各国使节向中国政府提出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置于日军虎口下的孤军撤离；也有认为是四行仓库距离租界太近，战事已直接威胁到租界安全，各国不希望战火烧到自己的身边。——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外国人对苏州河北岸租界区存在一支中国军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异议。

撤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下达了嘉奖令：

第八十八师留守闸北之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以下各官兵：

服从命令，达成目的，殊堪嘉慰，该团各官兵准各升一级；并呈准政府各给予荣誉勋章。至其死亡人员，自该团长韩宪元以下各官兵，待查明下落与其生死后，准予另案呈报，特别抚恤，以奖有功，而志荣哀。

谢晋元部退入公共租界时，租界里的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站在机枪阵地前，护送着中国守军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

只是，自那以后，谁也没想到，谢晋元和他的官兵竟然在租界里驻扎了整整四年。他们的处境很尴尬：日军虽不能进入租界，但在租界的严密看管下，谢晋元的官兵们也不能出去。他们不能称为作战部队，也不能归类于难民，更不是战俘，而因为不是战俘，租界当局不肯按照国际公约供应伙食。幸好公共租界上海的市民可以出入，于是官兵们全靠上海市民接济。谢晋元的孤军在租界里照常出操和训练，往租界里运送生活物资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每天络绎不绝，见到五二四团一营的官兵神情犹如朝拜。

一营退入租界一年后，为纪念自己的部队第八十八师出征抗日一周年，官兵举行了升旗仪式。仪式先是受到租界当局的阻挠，被迫把旗杆截短以免让日军看见；仪式进行中，数百英、意和白俄军人突然冲过来，不由分说地开枪射击，四名中国士兵当场死于国旗下，十一人负伤，此事件引发了谢晋元官兵的绝食抗议。

又过了一年，前途未卜的谢晋元给双亲写下遗书，因为预感到不测之日早晚会来，他恳求年迈的双亲在他牺牲后把他葬在抗日将士公墓里。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一营照例出操时，谢晋元受到叛徒的袭击，中弹身亡，时年三十六岁。这位誓言至死“不负国家”的中国军人，再也没能见到他的父母双亲，他远在广东老家的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儿女。

谢晋元遗书：

双亲大人尊鉴：

上海情势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此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故此日险恶之环境，男从未顾及。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唯今日对家庭不能无一言，万一不讳，大人切勿悲伤，且应闻此讯以自慰。大人年高，家庭原非富有，可将产业变卖，以养余年。男之子女渐长，必使其入学，平时应严格教养，使成良好习惯。幼民姊弟均富天资，除教育费得请政府补助外，大人以下应宜刻苦自励，不轻受人分毫。男尸如觅获，应归葬抗战阵亡将士公墓。此函俟男殉国后，即可发表。亦即男预立之遗嘱也。

男晋元谨上

二十八年九一八于上海孤军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与英美全面开战，日军突入租界将中国孤军全部拘禁，然后将其分遣押解至各地做苦工。其中，被日军押往遥远的新几内亚做苦工的中国军官和士兵的名字是：唐棪、陈日升、冷光前、王长林、吴萃其、童字标、邹莫、汤聘莘、刘一陵、严占标、陶杏春、伍杰、杨德余、刘辉坤、许贵卿、赵庆全、李自飞、赵春山、傅梅山、傅冠芷、石洪华、谢学梅、徐毓芳、周正明、郎斌、陈翰钦、杨柏章、赵显良、张永善、徐玉开、魏成、何英书、杨振兴、任全福、雷鑫海、钱水生。

中国人将永远铭记这些不屈的名字。

中国人也须记住，在日军入侵上海的作战序列中，有两支由中国人组成的伪军部队，其首领名叫李寿山和于芷山。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

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地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当时中国登记注册的工厂两千四百三十五家，沿海地区占两千两百四十一家，集中在上海的就有一千一百六十八家。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九百零五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损失尤为严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地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一百四十六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在上海的带动下，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也纷纷内迁：江苏迁出了庆丰纱厂、苏纶纱厂、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大成纱厂等；南京迁出了永利公司机器厂和京华印书馆；青岛迁出了冀鲁制针厂和华新纱厂；济南迁出了大陆铁厂；河南迁出了豫丰纱厂和农工器械厂；浙江迁出了中元造纸厂和嘉兴民丰纸厂；山西迁出了西北制造总厂；江西迁出了九江裕生纱厂和光大瓷业公司；芜湖迁出了中国植物油料厂等等。同时，中国仅有的几家与军工有关的企业，如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电信机修厂、交通机械厂、株洲炮兵工厂、广东兵工厂、

武昌被服厂等也都迁往了内地。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在通往中国内地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只是，就上海地区的战事而言，双方都到了重新抉择的时候。

战场形势推进缓慢，且已付出了死亡万名、负伤两万以上的巨大代价，日本方面在极度的焦虑中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是将华北的战争扩大，将战事引向山东，还是停止华北的战事，将兵力集中到上海？最后的结论是：继续向上海增兵。

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上奏天皇：

山东省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价值。现在华北方面战况进展顺利，因此现在如果允许以追击的余势进行山东作战，另一精锐的兵团在海州附近登陆进行陇海线方面的作战，摆出挟击山东并攻击南京的态势，将是目前极为恰当的作战。但是，反观上海方面的战况，预料在最后完成任务之前，还不能不花费相当的时间和付出损失，而且这已成为国内外瞩目之地。如果在上海完全被我控制之前北方有变，将发生令人极为忧虑之结果。

十月三十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金山卫登陆，这使日军在上海地区投入的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以上。

大场失守后，日军抵达苏州河北岸，战场态势也令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处在焦灼之中。

早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对华东防御作出了相关部署：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而后直接沿海岸阻击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拱卫首都。

目前，中国军队在上海的作战，基本上是照此预案实施的。

问题是：现在是否到了“不得已时”？

多数中国军队将领认为：“不得已时”已经到了。

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认为，现在上海战事已陷于死打硬拼的状态，中国军队只能用一轮接一轮的数量弥补，来抵消与对手在武器装备、战术运用乃至军事素质上的质量差距。如若中国军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即使死顶着坚持下去，结果只能是部队越打越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认为，目前这种拼消耗的战法不符合战略原则。最高统帅部为确保上海，拱卫南京，把大量兵力集中于淞沪方向，京沪、京杭两条铁路上的运兵列车日夜穿梭，把一个又一个师补充上来填补火线，但日军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协同配合等各方面均占据优势，空军、海军以及火炮在战场上具有压倒性威力，我们只有临时构筑的简陋工事，所有的武器装备更是简陋。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这种纯粹的防御，试图依靠不断补充兵员遏制或歼灭日军，十分困难。因此，要与日军拼长久的消耗战而不是局部的消耗战，最好是把中国军队的主力撤至预先设置的苏嘉（苏州至嘉兴）一吴福（吴江至福山）国防阵地上。如果有序撤退，就能确保在预设阵地上与日军抗衡三个月以上。

所谓“吴福线”“苏嘉线”预设阵地，指的是国民政府自一九三三年始在上海与南京间修筑的一道道防御工事。这些国防阵地充分考虑了中国南方的地形地貌，利用长江、太湖等河流湖泊的天然屏障和散落在水网中的天然高地，修筑起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用碉堡和战壕相互连接的军事防线。为了防线的巩固，国民政府甚至还修建了专线铁路。

从战略上讲，与武器装备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死拼于沿海的一座城市，显然不是消耗敌人而是在消耗自己。最为理想的，也是中国统帅部开战之初的设想是：把日军越来越深地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潭，用持续长久的消耗战去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上海战事已无法继续有效地守下去，那就应该有计划地撤往二线，以将日军引向国土的纵深。

李宗仁为此向蒋介石当面陈述。

白崇禧陪我去拜访蒋委员长。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血战两余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作为最高统帅，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就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略谓，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

蒋介石为什么要死守上海？

重要原因之一，还是出于他对国际社会制裁、遏制乃至武装干涉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误判。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就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回答了《巴黎晚报》记者的提问：

目前之中日战争，乃日人蓄意侵略中国之结果，中国为排除侵略与自卫生存，自不得已全力抵抗。日本军队大规模侵略之用意，无非欲图消灭中国整个民族生存，吾人应付方针，亦当以整个民族生存为目的。上海或华北皆为中国领土，必视为整个问题，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为止。为维护世界和平、人类文明、条约尊严与国际公法之效力计，本人热烈期望国联此次能切实执行其在国联会章下应有之义务，对日本做有效之制裁。一九三一年以来，六年中日本之暴行，证明日本征服中国，进为东亚盟主之野心。若列国仍又不采取及时措施，遏制日本之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减，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故对日制裁，非所以独助中国，亦所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光之政治家，必当有见及此，遵照会章制裁日本，以尽其义务矣。

事实是，蒋介石一直寄予希望的这一国际组织，不但对国际事务反应迟缓，无力阻止任何侵略事件，且对于已在欧洲和亚洲不断膨胀的法

西斯主义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这一年的十二月，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退出了简称“国联”的国际联盟。

日军抵达苏州河北岸后，为继续攻击南岸的中国军队，松井石根作出了新的作战部署：“第三、第九师团于十一月二日前渡河”；第一〇一师团集结在上海西北侧，跟进第三师团渡河；第十一师团攻击南翔，“掩护军主力的右侧”；第十三师团“担任扬子江上游方面的作战”。

十月三十一日晨，日军航空兵和炮兵开始向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展开猛烈轰击。至午后，第三师团的左翼部队开始强渡苏州河。当面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税警总团等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在孙立人指挥的税警总团第四团当面，日军用橡皮舟连接成浮桥，在大部队攻击发动前已经偷渡过来五十多人，藏在了南岸高高堤岸下的洞子里。孙立人亲到一线，带着两名班长，在岸边竖起四块厚钢板当作护墙，然后连续投掷了一百多颗手榴弹，将日军搭建的浮桥炸毁；又把十几捆浸透汽油的棉花包点燃后，推到堤岸下的洞子里，将藏在里面的日军全部烧死。第二天，日军第九师团的右翼部队一度强渡成功，并占领了姚家渡。当面中国军队第一七一、第八十七师和第六师等部队顽强阻击，在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增援后，强渡成功的日军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

日军大规模地强渡，显示出与中国守军拼死作战的态势，有计划地撤退到二线的建议，被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再次提出。

鉴于日军的凶猛攻势，蒋介石终于同意后撤。

但是，后撤的命令刚刚传至各部队，蒋介石的又一命令到达：停止后撤，原地坚持十天以上。——后撤的命令已经下达，有的部队已开始行动。——军事上的基本常识是，一旦撤退，突然中止，将导致整个战线的瓦解，引发士气的严重混乱。

命令下达于日军大规模攻击苏州河南岸的十一月一日。

这一天，蒋介石在南翔附近召集了一次将领会议，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是与会者之一：

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接着蒋介石讲话，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而尤侧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

括“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概况和国际间的一般反映，并对前线官兵的英勇斗争，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后一部分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蒋说这些话，语气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

接着，蒋介石又作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解的决定：撤销第三战区的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调往西北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将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划分为左、右两个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和张发奎指挥。

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临阵换将意在何为？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接到命令后，“陷入了无限的焦虑”，并“生发了悲观的心情”：

朱绍良将军这时忽奉命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遣中央兵团的任务，最高统帅部即命令我去接任，并将右翼方面的指挥责任交给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将军接替。这时刘集团军的部队方从杭州向前推进，我一面担忧沿海地带的侧面和刘集团军能否确实接防，一面又感于上海方面的紧张状况，将如何去挽救这危殆的局面。我此时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以沉重的决心，担当着残破而没有把握挽救的局面，这在我生命史中是最痛苦的记忆。十一月二日，我的指挥部由南桥移至龙华西侧的北干山，这是极接近火线的位置。当我到达那里时，情况已经变化了，第一线的部队已陷于紊乱状态；同时，渡河的敌人予我们侧面的威胁也正在日益扩大中。但第一线已经没有可以抽调的部队，后援的兵团又迟迟未能到达。我除了竭尽一切努力来调整这个紊乱的形势外，开始生发了悲观的心情。

面对战局，指挥官都如此悲观，血战的官兵又将如何？

为了突破中国守军的苏州河防线，彻底切断北新泾镇地区的中国军队与南翔地区中国军队之间的联系，松井石根命令原本负责掩护侧翼安全的第十一师团投入到攻击江桥镇的作战中。在苏州河一线，日军孤注一掷的作战致使战局恶化得十分迅速。蒋介石“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

的军法从事”。位于前线的中国军队指挥官们“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突然，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日军已从杭州湾登陆。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是以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等部队组建的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同时，日军大本营又将位于华北战场的第六师团调出，命其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加入到第十军的作战序列。日本海军也把原来的第三舰队，分编成第三、第四两个舰队，增加了“足栖号”巡洋舰为第四舰队旗舰，以全力协助第十军的登陆作战。

日军第十军的作战部署的第一期作战目的是：十一月二日“断然进行登陆”。之后，“以精锐的一部作为先遣队，神速地进入松江以南地区，掩护军主力渡过黄浦江。第二期作战目的是：“尽速以一个兵团通过水路，向苏州挺进”，切断中国军队回撤南京的退路。主力在松江西南面地区整顿后开始前进”，“进入苏州河北面地区”，策应上海派遣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作战计划。

如果日军成功登陆，并依上述作战计划占领沪浙交界处的松江地区，即可切断沪杭甬（上海至杭州至宁波）铁路，然后从南向北发动攻势，与从北向南打向苏州河的上海派遣军协同，对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之势。

日军选择的登陆地点，位于上海南侧杭州湾的北岸。这里近岸水深十米以上，且海岸平直，便于大型舰只靠近和重兵展开。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公路和铁路发达，不仅可以通往上海和杭州，也是通向南京的要道。早在两百多年前的明嘉靖年间，日本人进犯上海时就是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的——中国人或许忘记了，但日本人牢记心中——国民政府陆军大学聘任过的日本教官，曾公开对中国的军校学员说：金山卫“是登陆的好地方”。可见杭州湾登陆点早已在日本人的窥视下：“关于杭州湾沿岸，平时已在进行侦察，也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地质资料”。但中国军队的将领们认为，金山卫海水浅滩涂深，海岸纵深又多是水网地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日本军人与中国军人对同一军事问题的认知相距甚远。

淞沪会战初期，蒋介石接到过日军可能要在杭州湾登陆的情报，为

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作出部署，将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师加一个旅布防于杭州湾北岸。但是，随着淞沪会战的进行，杭州湾北岸部队不断地被抽调至上海战场，最后竟只剩下第六十二师的一部和少量的地方武装——中国军队统帅部似乎已完全陷于应对上海的惨烈苦战，遗忘了或是忽视了位于上海战场背后的杭州湾——空虚的后方如遭遇突袭，必会使腹背同时受敌的危境降临。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而置身于战场的第三战区指挥官们竟然毫无防范。

日军开始攻击苏州河南岸的时候，在海军的护卫下，集结于八口浦和五岛列岛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乘坐军舰在济州岛附近的海面上会合。然后，百余艘战舰经过距上海东南约一百公里的马鞍群岛，于十一月四日晚潜入杭州湾。五日拂晓，日本海军第四舰队的三十多艘战舰，突然向杭州湾沿岸的奉贤、金山卫、乍浦等城镇开炮轰击，并派出军舰向镇海方向实施佯攻。接着，在空军的掩护下，日军第六师团及配属该师团指挥的步兵第九旅团在金山卫西侧、第十八师团在金山卫东侧同时强行登陆。

第十军在日本本土还未启程的时候，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与第十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进行了一次“恳切的谈话”：

军的任务和作战要领等一如先已给予的指示，没有什么必须补充的。而军在作战上的各种条件并非有利，可以想象作战将是极端困难的，其艰辛程度是可以充分体会到的。但是为了打开目前时局，在上海附近夺取一个大战果乃是迫切的和绝对必要的。因此望能克服一切困难以完成这一作战目的，在全世界注视的战场上发扬我军威武。

日军担忧的“极端困难”没有出现。

在杭州湾北岸，中国守军仅有的防御部队，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突击，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击溃中国守军，开辟出登陆场。

正在徐家汇指挥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和副总司令黄琪翔，急调尚未整休完毕就奉命重回战场的第七十八师前往阻击，同时命令位于青浦方向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急进。但是，中国军队各部尚未抵达，日军已从金山卫向东推进至亭林镇、松隐镇一线，其步兵第九旅团已经进入金山县城，第六师团主力正向沪杭铁路急进。

获悉消息的蒋介石在电话里征询陈诚的意见，陈诚建议“为尔后长期

抗战计”，苏州河一带的中国军队应迅速后撤，转入武进（扼守着沪宁铁路的腰部以及南运河的南岸）一线的国防工事重新部署防御阵地。蒋介石“经半个小时之考虑”，同意了陈诚的建议。但之后不久，因为仍寄希望于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国联大会，为以正国际视听，蒋介石又命上海战场再坚持三天。

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撑这一命令的合理性。

而这一命令对于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是致命的。

六日，日军向松江方向急速推进，与中国军队第六十三师的一个团和第六十二师的一个营发生战斗，日军迅速将当面中国军队打散。七日，中国军队第六十二师和第七十九师曾向金山县城实施反击，但未能成功。松江是一个咽喉要点。松江中国守军第四十三军和松江保安队得到的命令是死守三天，以掩护上海战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撤退。第四十三军原本只有一个师和一个旅，之前在上海战场的苦战中损失惨重，全军现在只有五六百人，而保安队如何能对抗凶狠的日军正规作战师团？由金山卫西侧登陆的日军第六师团和步兵第九旅团如入无人之境。从华北战场移至淞沪战场的第六十七军奉命增援。第六十七军官兵服从命令，死打硬拼，但终究势单力薄，难以支撑，残部于八日夜晚实行突围。此战，军长吴克仁、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三二一旅旅长朱之荣、三二二旅旅长刘启文先后阵亡，三一九旅旅长吴骞身负重伤——第六十七军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仍是未能阻止日军向松江的推进。

与此同时，从金山卫东侧登陆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突破了迎面赶来的中国军队的阻击，开始向纵深推进。

七日，为了统一指挥上海战场的日军，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命令，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作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由日本皇族陆军少将朝香鸠彦担任。

十日，日军后续登陆部队第一一四师团于乍浦登陆完毕，从华北战场调来的第十六师团也在白茆口成功登陆。

至此，数路日军从北、西北、西南、南四个方向朝上海战场蜂拥而来，呈现出最后决战的态势。

中国军队除了全线撤退，已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淞沪战场前敌总指挥陈诚回忆：

十一月初，敌后续部队又复增加，我苏州河南岸阵地危如累卵。即于此时，敌第六、第十八师团登陆杭州湾。我为保障侧背安全，派队迎头堵击。但因敌空军侦炸甚烈，我军行动迟缓，敌遂长驱直入。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同时被陷，我淞沪阵地至此乃全陷入敌之大包围圈中，苏州河南岸之颓势亦未能挽回。为尔后长期抗战计，唯有迅速转移，重行部署，于是乃作全线之撤退。

—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蒋介石对忽视了日军从杭州湾登陆的可能，十分懊恼，并承担了责任：“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的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趁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撤退命令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签署下达。总的原则是：上海战场的部队分别向南京、杭州两个方向撤退，退至其间国民政府已经修筑完毕的国防工事一线。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在日军从各个方向发起的冲击下，中国军队数十万人马已不可能做到有序撤退，这导致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混乱。

由于撤退的时机过晚，下达命令的手段又十分落后，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不一。有的部队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只是看到友军撤了也就跟着撤了。撤退命令规定按照秩序撤退，并逐次掩护逐步布防阵地，但于匆忙混乱的撤退中已经没人遵守命令。更严重的是，撤退命令并没有规定各部队的撤退时间、顺序和路线，只是笼统地划定了撤退方向，而上海战场的许多部队都是紧急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兵根本无从知晓上海周边的地理方位，这种情况往往导致十几万的部队拥挤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成为日军飞机扫射轰炸的靶子。

贾亦斌，中国军队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四团一营营长——

十一月一日，日军从我友邻部队阵地附近强渡苏州河。五日，日军又在杭州湾北金山卫登陆。我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于十二日开始从上

海全线撤退。刘楚人团长向我们传达了李铁军师长的命令，要我们营到黄渡附近的一个村庄集合，我们找了一夜也没找到这个村子。天快亮了，才赶到虹桥附近上海到青浦的公路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难民挤在这条路上，潮水般向前涌流……天刚亮，一架日军飞机飞到我们头上狂轰滥炸。离我不远的一个孕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而且挑着一副担子，一头还装着一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向前奔逃着。一架飞机向她及周围的一堆人俯冲下来，我连忙喊她赶紧趴下，话音未落，一颗炸弹已在她身边爆炸，她和她的四个孩子都被炸死，她的腹部被炸开，腹腔里的胎儿还在不停地蠕动，血流满地，真是惨不忍睹。

在上海以西的方家窑附近，贾亦斌营长奉命停下掩护大部队撤退。这里有一条河，河上的桥是撤退的必经之路，中国军队的工兵通过后，为防日军追击埋设了大量的地雷。而贾营长知道，别说是大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团还有官兵尚未过河。正心急如焚中，夜晚，炮兵第十四团撤退至此，这是中国军队唯一拥有十五厘米口径重炮的部队，清一色的大炮都是从德国买来的。炮团团长彭孟缉听说桥上埋设了地雷，不禁“失声痛哭”，他对贾亦斌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一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大炮过不了河又不能留给敌人，只能“忍痛全推到河里去”。之后，当炮兵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桥上时，刚走不远就踏上了地雷，很多人都被炸死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

日军各师团立即对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开始了猛烈追击。松井石根下达的追击命令是：“方面军决定占领常熟、苏州、嘉兴一线，准备而后作战；上海派遣军占领福山、常熟、苏州一线，以约两个师团在昆山、太仓附近集结，作为直辖部队；第十军占领平望、嘉兴、海盐一线。”

中国第三战区在日军抢占安亭并向昆山进逼的情况下，发现日军有切断中国军队撤退路线的意图，遂决定改变在昆山一带占领预设阵地的计划，开始全线向吴福线国防工事撤退，企图利用预设的国防工事遏制日军的追击。但是，此时中国方面的任何命令都不起作用了。在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和步兵的急速追击下，拥挤在公路上的中国军队编制已被打乱，部队失去控制，部队之间也失去了联络，将领们甚至连自己部队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

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在九日那天先后接到了两个命令：第一个命

令让他必须再坚持几天，紧接着的命令让他立即撤往昆山方向。宋希濂看了一下地图，发现撤退的方向上全是河湖港汊，只有一条公路可走，于是带领部队匆忙西撤。公路上挤满了撤退的部队——“为避免自己陷入敌人的包围圈，各自拼命地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纷乱。”宋希濂遇到了胡宗南的第一军军部以及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原来胡宗南的军部在苏州河一线遭遇日军偷袭，“军部人员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撤出。薛岳乘小汽车，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军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车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逃脱后的薛岳在安亭附近遇到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霍军长看见薛岳浑身湿透，冻得缩成一团，忙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穿上。此时第五十四军处境也不妙，全军只剩下第十四师一个师，撤退到一座公路桥时又遇到了麻烦，因为守桥的第八十七师士兵要炸桥：

如果桥被破坏，我师的第四十旅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会无法过河。所以陈烈上前制止，守桥的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陈说我是第十四师师长，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马没有过来。守桥的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给我的上级，看怎么办。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收容部队的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表示愿意把师工兵营调来，把炸药安装好，另派一个连守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我们的人过桥……一直等了一天一夜，退却的部队仍未过完，我师第四十旅也有一部分伤号尚未到达。这时，混在我退却部队中的日军士兵，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队被冲垮了。工兵营聂营长即令炸桥，但因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冲过桥来，占领了西岸桥头阵地。

沿着太仓公路撤退的桂军第一七〇师在凌晨时分也被阻止在一座桥前：一群中央军系部队的工兵把几十桶煤油安放在桥上，正准备把桥烧了。如果天一亮，敌机一来，滞留在这里凶多吉少。可无论桂军官兵怎么哀求，工兵就是要立即烧桥，结果两支部队差点打起来。一边说：“不管你们哪一部，过得过不了，我奉命一到时间就烧桥。”另一边齐声大喊：“你现在若烧桥，不给我们通过，先把你杀掉再讲。”于是，急于过桥的桂军官兵端枪“保持着战斗姿态”才得以过桥。第一七〇师一〇一六团团长谢志恒，在日军飞机的扫射中阵亡在另一座桥上。官兵们把跌入河中的他拖上岸，他说了几句话：“我完了。望你们继续努力杀敌，报仇雪耻，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争取最好胜利……”谢志恒团长“被安葬在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

中国军队的大部终于撤到了预设的吴福线国防阵地。然而，官兵们

放眼望去顿时不知所措：在这条投入了巨额国防资金，动用了大量部队和民工修筑多年的国防防线上，有的工事虽已经完工，但杂草丛生；有的还没有完工，形同一片废墟。且多数工事位置不符合作战要求，在平地上孤零零地突出地表，连机枪工事和弹药库都暴露无遗，“顶上和周围的覆土多已坍塌”。有的机枪工事甚至修在坡顶上，“射孔很大，只求射界广阔；也有的虑及易被敌炮击毁的后果，工事建筑位置较低，或是因原有基础不固而下沉了”。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抵达常熟后，奉命在城东占领预设阵地：

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几十处像坟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土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找寻，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我们只有急急忙忙地占领阵地，构筑临时工事。镇的前面隔着一道十余公尺的小河，而敌人也到小河沟对面占领阵地，开始战斗。我所占领的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一班兵、一挺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粮弹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我官兵满以为退守到国防工事线定能持久抗战，现在看到公路南北两侧二三公里处，仅有十几座水泥掩体工事，如再往远处就没有工事了。

军政大员们在国防工程中的中饱私囊，让整个国家在战争来临时被袒露在敌人的刀锋下。

十七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制订了《从嘉兴向南京追击的作战指导纲要》：上海派遣军准备攻击无锡，第十军以一部攻击湖州，一部协助上海派遣军攻占无锡。在日军第十军召开的幕僚会议上，将领们都认为，只要抓住战机断然追击，“有二十天的时间可以占领南京”。

抵达吴福线的中国军队无法立足，只能继续后撤至锡澄线（无锡至江阴），而日军没有丝毫停止追击的迹象：第十三师团向锡澄线中间的青阳镇攻击，第十一、第十八、第九师团全力攻击无锡。二十三日，各路日军于太湖南北两侧向前推进。二十五日，上海派遣军突破中国军队第七十四、第三十九军的阵地，占领无锡；第十军突破中国军队第七军的防线，占领湖州。

无锡和湖州的陷落，令仍在回撤的中国军队又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各部队接到继续西撤的命令。

中国军队开始西撤后，日军命令第十三师团攻占江阴要塞。

江阴，南京水路之门户。

长江已经被中国海军用沉船的方式封锁，江阴要塞上原有火炮四十九门，上海战事爆发后，又增添了刚从德国进口的八十八毫米半自动炮八门和一百五十毫米加农炮四门。防守江阴要塞的中国军队有：第一〇三、第一一二师，要塞步兵两个营以及江防海军舰艇等部队，江防军总司令刘兴。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面前，江阴守军顽强抵抗，要塞外围阵地多次失而复得。要塞新添的大炮击沉了日舰一艘，击伤了两艘，并且击落日军的飞机一架。战至十二月一日，要塞的火炮被日军飞机炸毁，要塞与外界的通信联络中断。日军随即突入江阴城，中国守军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负伤，部队陷入混战状态。江防总司令刘兴下令突围，突围部队又遭日军阻击，部队被打散后多数各自为战。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和部分官兵渡江去了镇江，第一〇三师突围时遭遇日军突袭，六一三团团长罗熠斌阵亡，师长何知重、参谋长王雨膏、六一五团团长周相魁脱离部队渡江去了武汉，部队由副师长戴之奇带领退到了镇江。

十二月二日，日军占领江阴，南京的水路门户敞开了。

同时，日军第十八师团占领丹阳，第九师团占领金坛。

沿着太湖南侧攻击的日军，于十一月十四日占领嘉善，二十日占领南浔。中国方面为了阻止日军，命令桂军周祖晃部的第七军向吴兴推进，并集结川军五个师于泗安、广德策应。二十四日，日军向吴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第一七二师奋力苦战，副师长夏国璋不幸阵亡，吴兴失守。为了掩护第七军撤退，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奉命迎敌。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率领部队出川前曾在成都召开誓师大会，宣告“失地不复，誓不回川”。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出川前，在各界群众欢送会上预立遗嘱：“胜利归，败则死。”川军官兵满怀斗志地出发了，脚上的草鞋很快就在长途跋涉中被碎石磨烂，被泥水泡烂，光脚走路很是辛苦。在公路上看见好几个师的中央军部队装备精良，头戴钢盔，足穿军鞋，很是羡慕又很是生气，因为他们是败退下来的。接近前沿时，一路看见日军“对公路两侧五六华里附近逃离不及的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枪杀，无一幸免。所有房屋，纵火焚毁，凄风遍野，尸体横陈，其惨痛之状，不忍目睹。川军官兵“无不咬

牙切齿，悲愤交集，突遇敌军，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冒死冲杀，争先恐后，以手刃敌兵为快”。但是，战场地形平坦，川军装备低劣，面对日军的坦克冲击无险可守，经过苦战，川军没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击。日军占领泗安后，当面中国军队各部都接到了继续撤退的命，只有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没接到。这个师不但没有后退，而且还对日军实施了突袭，竟然把泗安夺了回来，歼灭日军数十人，缴获了大量文件和装备，其中包括日军女看护两人和日军军官一人。这名日军军官在中国士兵冲到他面前时剖腹自杀了。但是，没等第一四六师庆祝胜利，官兵们便发现周围的友军全撤走了，于是赶快撤退，泗安又失。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数天内孤军作战，部队伤亡惨重，已经失去作战能力。当师长饶国华命令团长刘洪斋率部反击时，刘团长拒绝执行命令。饶师长为自己的官兵如此懦弱而愤怒，也为丢掉了泗安阵地感到羞愧，于是在师部里给亲属和长官写下几封遗嘱后，径直来到广德城东门外，随从这才明白他们的师长并不是想撤退，而是想死在这里。——“嘱卫士铺好卧毯，饶盘腿坐于卧毯中间，面对日军方向大呼：‘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的日本，将来亦必灭亡！’言罢，饶向敌人方向怒目而视，拔出所佩手枪自戕成仁。左右见之，无不下泪。”

好一个烈性的川军师长！

十八日，日军第十八师团占领广德，第一一四师团占领宜兴和溧阳。南京，已经近在咫尺。

十一月十九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收到了第十军的电报：

一、集团本日正午许占领嘉兴，大概傍晚扫荡完了。

二、集团十九日晨命令全力向南京追击，大致部署如下：国崎部队（步兵第九旅团）经湖州、广德向芜湖追击，切断敌之退路；第十八师团经湖州、广德、溧水向南京追击；第一一四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追击。第六师团向湖州推进。

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看到电报后“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华中方面军的攻击如此神速，更没有想到置于中国战场的日军已决心进击中国首都南京。

占领一国首都，并非只涉及军事。

“因事关紧急所以督促立即发出中止的指示。”

当晚，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回复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发来报告谓已部署以全力经湖州向南京追击问题，被认为这已脱离了临命第六〇〇号（作战地区）的指示，殊为念念。”——日军参谋本部临命第六〇〇号：“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连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由此，各路日军暂时停止了追击的脚步。

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开始，至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战场止，历时三个月。

会战中，日军逐次增加兵力，最后投入战场的总兵力达到十个师团近三十万人，动用军舰三十艘，战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全国各地部队会集上海战场，投入总兵力达七十多个师七十余万人，舰艇四十多艘，战机二百五十架。

日军伤亡约四万人。

中国军队伤亡约二十五万人。

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野心，为保存国家的经济实力，掩护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同时，淞沪会战也暴露出中国军队在战役策划、指挥、调度上的弱点，以及军队在作战素质、后勤供给与相互协调上的缺陷，特别是会战最后阶段的溃退，表明中国军队距离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差距甚大，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的对日作战未来将更加残酷和艰苦。

关于这场会战的地点选择，史家众说纷纭。有说不该在中国经济中心引发战争，这样会严重损伤中国的战争实力；也有说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地区会战，是为了把日本的侵略战争从中国的北方引向东南地区，迫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不得不沿着中国特有的东低西高的地势艰难地仰攻。——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忽视了一个前提：如果中日双方不在上海开战，日本就一定不会在上海登陆？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一旦全面入侵中国，上海是必然的首战地点，因为上海不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距离中国的首都南京很近。因此，无论是中国的被迫进行还是有意为之，淞沪战事从一开始就是无法避免的。

从中国方面讲，淞沪会战的初衷，是出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淞沪地区要进行多长时间的作战以及作战需要多大规模的投入，必须从中国长期抗战的角度上综合考虑，详尽计划。将数十万大军部署于敌人掌握制空权、制海权的狭窄的滨海城市，依靠单纯的一线防御拼消耗拖时间，这完全违背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初衷。更为严重的是，企图用鲜血和生命换取国际干涉和支持，事实证明完全是幻想。世界上的列强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出于公理和正义而支持与帮助中国，除非这种支持与帮助能够同时维护或保卫他们自身的利益。

淞沪会战的最大收获，是中国全民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提升。中国军队面对强悍的侵略者拼死作战，没有丝毫的妥协与屈服，几十万官兵在注定将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作战中顽强勇敢，其铮铮铁骨令人对那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肃然起敬。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日军最大与唯一目的，在于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苟无以达此目的，纵土地若有所得，亦无多大关系。"中国军队"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的一页"，"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泰晤士报》专门发表社论，称上海的抗战证明中国军队"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异族入侵的所有"抵抗"，在世界的眼中无论其作战样式、武器装备、军事素质以及军与民的精神状态，都如同一部荒诞的历史滑稽剧。但是，一九三七年，在中国的淞沪战场上，无论是军与民，中国人终让侵略者看到了他们愤怒的容颜以及不屈的身躯！

溽热的酷暑已过。

南京城头，冷风瑟瑟。

第七章

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

当上海战事逐步扩大时，中国最高统帅部一度忽视了山西战场。

在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处，太行山纵贯南北，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整个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山西便是华北的西部屏障，控制了山西就等于在制高点上控制了华北。因此，要确保华北就必须确保山西，而攫取华北也必须控制山西。——华北日军从战事一开始，便将主攻方向放在了晋北，依据的就是这一军事常识。

但是，南口战役结束后，当平绥路上的日军大举向山西推进时，蒋介石却把位于第二战区的汤恩伯的第十三军调往了淞沪方向。对此，阎锡山表示严重不满，称其“急其所缓缓其急，何异补疮把肉剜”。共产党人对此也有异议，认为蒋介石“没有清楚认识到保卫山西的重要战略意义，未能以更多的精锐部队首先使用于山西的保卫，这是后来山西失利致使整个华北局势处于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军攻破平型关和雁门关后，攻势直指太原，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山西对于全国战局的重要性：“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蒋介石担心的是中国抗战后方的安全——战争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了后方，仗还怎么打下去？

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欲占领太原。

按照战争初期日军参谋本部的意图，华北战事应限定在华北的平原地区：“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地区（不包括航空），大概定位连接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北。”但是，板垣征四郎认为，必须全面控制山西，至少要占领太原：“攻克太原的作战基本理论，是根据这个古来公认的‘制伏山西就能制伏华北，制伏华北就能制伏全中国’而得出的。”板垣征四郎的参谋美山要藏大佐说：“当时第五师团的官兵，几乎都对这句话有一种魅力性的使命感，就好像是能用它来克服一切困难的一种咒语一样。”

关东军与板垣征四郎的看法高度一致，即必须使用强大武力控制山西和华北。之后，迅速建立由日本人掌控的伪政权，以从根本上保障“满

洲国”的“国防安全”。日军参谋本部最终同意了板垣征四郎的请求，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下达了攻击太原的作战指令。日军华北方面军随即命令关东军一部归板垣征四郎指挥；命令河北境内的日军一部突破石家庄中国守军的防线，沿正太路（正定——太原）向井陉方向发起攻击，策应第五师团。——井陉，位于河北的石家庄以西，山西的娘子关以东，是正太铁路线上从河北通向山西的要冲。

阎锡山自太和岭口撤退，刚一回到太原，就收到了蒋介石要求他坚守山西的命令，而且要求他坚守的时间越长越好——至少要一个月以上。为此，阎锡山请求将平汉线上的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调归第二战区指挥。蒋介石答应了。——阎锡山主动请求中央军部队进入他的山西地盘，这在以往是绝对不可能的。

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中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至少看上去与阎锡山的晋军完全不一样：官兵清一色的深灰色军装，扛着清一色的七点九毫米口径步枪。机枪也不少，甚至还有专门打坦克的德式山炮。大部分人操广东或安徽口音，坐下来休息时不怎么说话，行军时爱唱歌，唱的是卫立煌填词的《第十四集团军军歌》：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第十四集团军，英勇坚强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十月四日，卫立煌先于部队抵达太原。

见到卫立煌，阎锡山不住地慨叹“是咱把你求来的”。

第二天，阎锡山、周恩来、卫立煌、傅作义以及刚刚上任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等人一起讨论忻口防御问题。对于敌情，大家一致

的判断是："敌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位于雁门关西南）附近实行牵制攻击，以使其主力攻击容易。"因此，决定中国守军依托东起五台西至宁武附近的山脉，以忻口以北各处要地为作战支撑，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南下的日军进行阻击。具体部署是：以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为右翼，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为中央，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为左翼，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为总预备队。

因为日军已经攻占了晋北要地，其攻势的锋刃笔直地向南而悬。这导致了阎锡山对于太原正北面的忻口过于警觉，而忽视了太原以东娘子关方向的防守。为此，毛泽东专门致电周恩来，委托他提醒阎锡山：华北的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定会沿着正太铁路向西进攻，因此娘子关方向必须派出重兵把守，这样才能确保忻口战场侧背的安全。毛泽东认为，进入山西的日军总数不过两个半师团，为了确保晋北的各占领区，日军需要分出兵力守备。因此，攻击忻口的日军，顶多一个师团。如果我军部署妥当，是有可能击败敌人的，但前提是娘子关必须安全稳固。否则，一旦华北战场的日军西进，只要通过了娘子关，不但太原近在咫尺，阎锡山还会因日军的左右夹击而被迫两面作战。——在忻口阻击、后方袭扰与娘子关坚守这三个必须坚持的作战要点中，毛泽东明确地将坚守娘子关放在第一位。

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

……可否向蒋（蒋介石）程（程潜）阎（阎锡山）提议任命黄绍竑为娘子关、龙泉关沿太行山脉以东各军（红军不在内）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确保娘子关。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的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

无法得知阎锡山对于毛泽东的提醒是否真正理解并给予过充分重视。尽管后来负责娘子关作战的副司令长官黄绍竑依据毛泽东的提醒，将第一军团孙连仲部调往娘子关作为预备队，但从整个山西战场的兵力分布看，中国军队布防娘子关方向的兵力仍是过于单薄。后来的战争发展进程证明，毛泽东对娘子关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从而令中国军队在山西战场的作战出现了令人扼腕的遗憾。

就在中国第二战区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板垣征四郎指挥日军第五

师团步兵第二十一旅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集结于代县附近，之后开始攻击崞县和原平。

四日，日军占领代县西南方向的阳明堡，继续南下攻击崞县时，被中国守军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击退。五日，日军攻击阳明堡以西的阳方口，中国守军独立第七旅与日军彻夜激战后，退守段家岭、瓦窑一线，日军占领了阳方口以南的宁武县城。下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逼近崞县北关，第十九军独立第二旅的两个团与日军于城北混战，在日军猛烈炮火的打击下，中国守军阵地大半被毁，四〇七团团长刘良相、团附高振麟阵亡；第二〇五旅特务排和四〇七团残部奉命发动反击，但因部队伤亡过重被迫退入崞县城内。

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同日开始攻击原平。

此时，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主力尚在车运途中，最早也要到八日前后才能抵达忻口战场。这就意味着，原平和崞县一线的中国守军必须死顶不退，尽力迟滞日军南下的速度。可是，就在这时候，阎锡山下达了向日军全面出击的命令，要求左、中、右三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向当面日军发起攻击，骑兵部队同时在大同附近切断平绥铁路以绝日军后路。阎锡山的目的是对南下崞县、原平的日军实施围歼——无人知晓，在主力部队尚未展开时，何以能够做到全面出击。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包括八路军在内，中国守军必须堵住南下的日军，为主力部队在原平以南、太原以北的忻口布阵，赢得必要的时间。

七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二十余架飞机、二十余门重炮和三十余门山炮的支援下，向崞县发起猛攻。崞县的城墙倒塌了十余丈，中国守军的工事全部被毁，城内的电话线路均被切断，千余日军步兵在坦克的前导下开始了集团冲锋。下午，东桥阵地上的四〇九团伤亡殆尽，四一〇团团长石焕然率残部三百余人前去增援，在路途中遭日军冲击全部伤亡。日军从倒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中国守军在残酷的巷战后残部退出县城。崞县陷落。

这一天，在原平方向，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与中国守军第一九六旅形成对峙。

崞县失守，中国军队失去了阻击的支撑点，同时也失去了反击的支撑点，这让阎锡山发布的全面出击的命令瞬间成为泡影。

八日，阎锡山命令忻口全线改为守势。

毛泽东就八路军各师作战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

甲、完全同意周与程潜、阎锡山共商决定之作战计划。

乙、我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者外，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大营镇、砂河镇以南之山地，待敌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激烈时，袭取平型关、大营、砂河、繁峙线。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军向北突击，占领浑源、应县地区，开展新局面。

丙、王震部速归还贺师建制。贺师全部除游击支队外，主力此刻应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时，而我一一五师又已实施向大营、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长城，袭击朔县、左云一带，与五师相呼应，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

丁、一二九师以一个团位于孝义，主力位于包括娘子关在内之正太铁路侧后，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及两侧农民，战略上策应林、贺两师，巩固后路。

戊、林、贺两师原来划定之地区，均应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员，有计划地散开工作，于一定地区完成一定任务，不得因为主力作战而置原定地区之地方工作于不顾。以上部署意见，请朱、彭速即考虑执行。

己、我军部署仅能当面告诉阎锡山，不得用电报告诉他，并要阎不得下达于任何人，严防泄露。

在平型关伏击战取得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晋北前线受到了中国军队其他各路部队的尊重。毛泽东特别要求朱德和彭德怀转告八路军所辖部队的所有指挥员，一旦作战中有“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八路军应该“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他们要“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等错误态度。由于与八路军同处一个战场，阎锡山的晋军官兵惊讶地发现，八路军从官到兵都非常年轻，尽管武器简陋，军装粗糙，但每个人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得到了八路军送来的小册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根据八路军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十月一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雁北支队袭击了朔县以北的井坪镇，克平鲁县城，并在辛庄附近伏击了日

军运输队；八日，该师第三五八旅夜袭宁武县城；十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克涞源县城，该师第三四四旅在平型关附近断绝了日军的交通线。由于日军主力部队均已南下，晋北各处要地只能分兵守备。因此，位于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利用日军兵力薄弱之时，发挥袭击战和伏击战的优势，多次歼灭日军运输队，连续转战收复多个城池，“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的后方交通线”。

十月六日，蒋介石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捷报传来，无任欣慰。袭敌侧背，断其联络，收效甚大。

希更发动民众，扩大行动，使敌有后顾之虑，则于占据更有裨益也。

十月七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朱德和彭德怀：

宋支队（八路军雁北支队支队长宋时轮）奋勇杀敌，收复井坪，殊为欣慰。若能扩大游击，向平绥线山地行动，使敌感受痛苦，尤有意义。并希转前方将士，代致嘉勉，为盼。

八路军的作战，完全是敌后战场的孤军战斗，因此部队伤亡很大。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部）专就给予八路军作战奖恤问题，致电时任军事委员会管理部部长张治中：

据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德（阳曲）江（三日）电称“职路进入战斗以来，以主力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线之两翼侧外，另组织四个支队袭击敌之后方，截断运输，破坏交通，发动群众组织，扩大游击战争等为主要任务，计各支队先后均有胜利。总共缴获汽车八十余辆，九二野炮一门，七三、七五山炮弹三千余发，步枪三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并毙敌千余人。现涞源、广灵、灵丘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敌不敢白日运输。但我伤亡官兵六百余名，内副团长、营长各两名，务请颁给奖恤”等语，即希查照核办，径复为盼。

十日，日军在原平县城炮火轰开的城墙缺口处，不间断地发起集团冲锋，反复消耗撤入城内的中国守军第一九六旅的兵力。中国守军伤亡极重，弹药殆尽，在惨烈的巷战中，那些还活着的官兵在每一条街上每一处院内反复拼杀。第一九六旅领受的任务是坚守七天，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却接到了要求再守三天的命令，因为忻口方向主力部队的布防尚

未完成。眼见部队几近打光，有官兵主张撤出原平，但旅长姜玉贞表示要与原平县城共存亡。

姜玉贞奉命坚守原平后，光着脊梁，身背短枪，每战必身先士卒，提着手榴弹和士兵一起冲杀。战至十一日，原平县城里的残剩兵力只有五六百人。幸存下来的官兵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护送伤员出城，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原平城的失守已经不可挽回。只是，姜玉贞认为，只要他这个旅长还在，原平就不能算是失守。最后时刻，跟随姜旅长留在城里的，仅有特务排排长黄洪友和几名士兵，几个人坚守在一座院子里。围攻的日军越来越多，炮弹直接落进院内，姜玉贞被炸倒。士兵们拖着从泥土中爬起来的旅长，从预先挖好的城墙洞口往城外转移。转移途中，姜玉贞的腿部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他身材魁梧高大，士兵们难以背他行走，当日军追上来时，他已因失血过多失去知觉，日军的刺刀刺入了他的腹部。

日军堵截了第一九六旅运送伤员的汽车，将两百多名伤员全部刺死。

特务排排长黄洪友曾带领士兵冒死返回寻找旅长的遗体，未得，大哭不止。

日军查明这是坚守原平城的中国军队的旅长后，将姜玉贞的遗体拖走并将其头颅割下。

姜玉贞，山东菏泽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没出生即丧父，母亲艰难地将他抚养成人。十九岁入阎锡山的晋军，吃苦耐劳，作战勇猛，先后进山西陆军干部学校和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深造。一九三四年升任第一九六旅旅长，军衔少将，阵亡时四十三岁。

中国军队第一九六旅，死守原平近十天，歼灭日军近千人，全旅五千官兵仅存活二百余人。

崞县、原平的坚守，以及八路军袭击日军后方的作战，为第二战区主力部队于忻口一线的集结和布防争得了宝贵时间。

忻口，“前往太原途中最后一处可守的山口”。

忻口实际上是一个位于忻县、崞县、定襄三县交界处的大村落，南距太原约一百公里。东面的五台山与西面的云中山，在这里形成了一道

纵贯南北的峡谷，峡谷中横亘着一道长十六公里、宽三公里的山岭，地势十分险要。在山岭北端右侧的山脚下，即忻口大村落的北面，滹沱河从北边流来，云中河从西边流来，在此汇合后继续东流。被夹在两山之间的忻口，犹如一个葫芦口，自古便是出入晋中的重要交通孔道。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拨专款在忻口修筑了国防工事，并在忻口西南侧一条名叫“红沟”的山沟里修筑了数十孔窑洞以为战时军事指挥部。

截至十月十一日，忻口前线的中国守军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并占领了预设阵地。

十二日，日军由原平一线继续南下。

阎锡山将装甲车队和空军拨给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并重新划分了各部队的作战任务和区域：右翼兵团由刘茂恩任总指挥，辖第十五、第十七军和第九十四师；左翼兵团由李默庵任总指挥，辖第十四军所属第十、第八十三、第八十五师以及晋绥军的第六十八、第七十一师；中央兵团由王靖国任总指挥，郝梦龄为前敌总指挥，陈长捷为前敌副总指挥，辖第九、第十九、第三十五、第六十一军。

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的具体作战部署是：

（一）飞行队于明（十三）日起逐日派机侦炸原平以南之敌，并侦查原平、崞县、代县间敌后续部队之状况。

（二）右翼兵团（第十五军），应仍占领上社村、营房里、灵山之线，重点置于左后方，与中央兵团切取联系；并于下社子、东新庄、东西岔村各要点，配置警戒；另以一部向右前方对代县以南地区尽量活动，确实掩护军右侧之安全，并以一部占领南神头、亭子头以东高地，为尔后包围攻击之据点。

（三）中央兵团（第九军——欠第四十七师、第二十一师、炮兵第二十八团、战防炮二连、装甲车一队），仍应占领三家庄以北、界河铺、南怀化、新练庄之线，重点置于中央右后方，与右左两兵团切取联系；并于板市、下王庄各处占领前进阵地。

（四）左翼兵团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师、炮兵第二十七团之第二营、战防炮营——欠两连、山炮一连）仍应占领秦家庄、大白水、南峪之线，重点置于中央后方，与中央兵团切取联系；并于后城头亘一四八二高地之线配置警戒。另一部向神山以南地区活动，确实掩护军左侧之

安全。

（五）总预备队的位置：第十七军（欠二十一师）仍于西冯村附近地区；独立第五旅仍于忻县附近；第十九军于石岭关一带，构筑该线预备阵地。第一九六旅余部于代群村附近集结，而后赴关城镇归建。

中国军队集结于忻口战场的总兵力约二十八万，除了中央军嫡系部队第九军、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外，还有晋军、陕军、豫军、东北军、八路军等部队，还有炮兵八个团、骑兵四个师，以及可以支援作战的空军战机三十架。

攻击忻口的日军，除了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外，还有原属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独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以及萱岛高支队和堤不夹贵支队，共计约十五个步兵大队，配属坦克一百五十辆、大炮二百五十门、作战飞机三百架，总兵力约五万。

板垣征四郎总是抱怨兵力不足，特别是他的第九旅团被抽调到杭州湾登陆去了，兵力更觉捉襟见肘。尽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从担负平津警备任务的第一〇九师团中抽出了两个步兵大队，再加上一个机械化步兵联队，命其增援山西战场，但板垣征四郎还是认为自己兵力薄弱。

板垣征四郎知道，当面的中国军队必将与他死拼血战。

十月十二日，日军向忻口前沿进行尝试性攻击和潜进，中国守军左翼兵团首当其冲。在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后，三百多名日军骑兵和四百多名步兵，同时向忻口西北方向一条弧形防御线上的要地——兰村、阎庄、卫家庄和一四八二高地——发起攻击，随即突破中国守军于一四八中国守军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奋力反击，击毁日军坦克四辆，致使突入阵地的日军暂时后撤。战斗期间，中国军队左右两翼兵团出动部队，分别向广灵、灵丘、代县和崞县进行敌后游击作战。中国空军第七大队也出动了四架战机，在副大队长吴沛的率领下从太谷机场起飞，飞临崞县上空侦察和轰炸向前运动的日军，日军出现混乱和伤亡，被迫退回。中国战机返航时，一架因迷航撞山而机毁人亡，其余三架安全降落太谷机场。

试探性进攻受挫后，日军决定以混成第十五旅团、堤不夹贵支队为右翼，第五师团为左翼，发起正式攻击。

十三日拂晓，日军先以一部实施火力侦察，然后开始全面突击。由于中国守军的左右两翼有云中山和五台山阻挡，日军集中了五千多步兵，在三十余架战机、五十余辆坦克和五十余门火炮的支援下，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向中国守军第五十四师的南怀化阵地以及左翼兵团的阎庄阵地发起猛攻。战至上午十时，南怀化沿云中河北岸的阵地全被摧毁，中国守军伤亡殆尽。由于增援不及时，日军从撕开的缺口蜂拥而进，渡过云中河，继续向一二〇〇高地攻击。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命令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实施反击。李师长身先士卒，亲率六十三团冲锋。

在日军强大的火力面前，六十三团官兵伤亡巨大——“一上午就替换了几个连排长，最后连伙夫也上阵地支援，运子弹、送伤员。”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第二十一师击毁日军坦克十五辆，将突进来的日军逼回了云中河对岸——“我方终于收复了山头。当攻上制高点时，敌人只剩下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那名士兵往山下跑，被那个军官一枪打死了，然后军官自己剖腹自杀。”

左翼，日军将攻击阎庄的兵力猛增至三千余人，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十师的阵地，双方进入反复的争夺状态。

右翼，日军九百余人在原平以南的桃园附近渡过滹沱河，中国军队第六十四师的一个团前往迎击，双方陷于持续的激战。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主力“夜袭团城口，随后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县城”；同一个晚上，该旅六八八团袭击了砂河镇的日军守军，随后一举向西攻克繁峙县城。接着，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以一部向雁门关日军守军发动袭击，“一度切断了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

“日军似感受极大威胁，其重兵器有后撤模样。”

卫立煌和傅作义判断，当面日军攻击受挫，需要整理态势并等待增援，之后才能重新发动攻势，遂立即决定乘势发动反击。

卫立煌从忻县前线指挥部致电阎锡山，告知准备动用预备部队从中央兵团地域出击。阎锡山立即命令左右两翼兵团部队向敌后运动，阻击日军的增援；命令左翼的第六十八、第七十一师加入中央兵团的作战序列，以厚兵力。

卫立煌和傅作义共同策划了反击作战的要领，即以郝梦龄的第九军

（欠第四十七师）附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在现阵地抵抗日军的进攻；以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由大白水附近、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由忻口附近联合出击，从左右两路对当面日军实施夹击。

十四日凌晨一时，卫立煌下达了全线反击的作战命令：

一、右翼兵团，应以主力于明（十四）日拂晓向桃园、北郭下之敌攻击，与第七集团军密切联系，竭力威胁原平南北敌之增援部队，并控制一部于崞峪附近，依情况进出于原平以北地区，截敌退路。

二、中央兵团，须于本（十三）日晚，歼灭侵入南怀化附近之敌，确保原阵地，为第七集团军出击之支援。

三、左翼兵团，应于明（十四）日拂晓，以主力逐次向永兴村及其以北高地之敌包围攻击；一部先与第七集团军协力击灭侵入南怀化之敌后，再向王家庄、安家庄一带攻击。

四、第七十一师，着于本（十三）日黄昏前，接替阎庄、水油沟迄山水村一带第十四军及八十五师阵地之守备，并为该军出击的支援，尔后即归第十四军李军长（李默庵）指挥。

十三日夜，参加反击作战的中国军队均已抵达忻口以北界河铺附近的出击位置。

从军事角度上看，卫立煌的反击计划是正确和果断的：以攻为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失为积极防御的有效手段，而这种积极防御的理念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为缺乏的。

但是，此刻在忻口战场发动大规模的反击作战，理应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尽管当面日军攻击受挫，但未到无力攻击的地步，也未到必待增援的境地。日军在十三日攻击未果的情况下，十四日也许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而重点很可能是中国守军中央兵团的阵地，即目前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的阵地。——那么，卫立煌是否想到过，一旦第二十一师既是日军攻击的主要方向，同时又是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敌我两军迎头相撞，将会出现何种景象？

无法得知当面日军是否掌握了中国军队的情报——当中国守军全面反击作战开始时，当面的日军也同时发动了进攻。

凌晨二时，云中河岸边，中日两军瞬间就冲撞在了一起。

按照作战计划，董其武的第二一八旅向云中河北岸扑过去。在通过河上的一座木桥时，受到当面日军机枪的严密封锁，四二〇团二营机枪连连长王星明等二十多名官兵阵亡。该旅冒着伤亡继续攻击前进时，接到了增援南怀化阵地的命令。南怀化位于界河铺的西北方向，是中国军队忻口一线阵地的核心支撑点，阵地上的守军是第九军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向第一六一旅三二二营的阵地轮番攻击。三营出现严重伤亡后，一营增援而来，被迫与日军展开残酷的白刃战。日军突破了南怀化阵地前沿，中国守军退入南怀化村中，后又退到村外的小高地上。为了封堵南怀化缺口，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亲赴前沿督战，指挥部队连续反击，与日军在南怀化村几进几处。三二二团团长戴慕贞、团附赵子立以及三名营长身负重伤被抬了下去，全团伤亡已达千人以上。郝军长命令董其武的部队增援南怀化后，中国守军在阵地前组织起突击队，轮番向日军发动反击，但南怀化阵地依旧没能收复。郝军长将还在阵地上的三二二团官兵进行了合编，他对这些已经苦战多日的官兵说：“一天不死，抗战任务一天不能算完。出发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你们敢陪我再次坚守阵地吗？”官兵们齐声高喊：“誓死坚守阵地！”合编后的部队再次发起反击，试图收复南怀化阵地。日军集中了三十多架飞机、三十余辆坦克和数十门火炮向南怀化猛炸猛轰，致使中国守军置于如雨的弹片中。三二二团二营副营长翟洪章，刚刚接替了一营长的位置，他带领五名传令兵躲进一个临时挖出的掩蔽部里，“不料一颗炮弹恰落其上。掩蔽部被炸塌，五名传令兵全被炸死”。当翟营长从泥土中把自己刨出来时，发现“身上溅满了鲜血和脑浆”。翟营长请求郝军长增援，郝梦龄给他的回复是：“战在何处，死在何处。”

第二一八旅派出四三六团前往增援南怀化。董其武率领着四二〇团继续执行反击作战任务。团长李思温命令一营营长张世珍部为主攻，三营后续跟进，二营为预备队，全团冲进了位于南怀化西北方向的弓家庄。弓家庄里的日军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直接冲进来，慌乱中开始向村外逃，遭到预伏在村外的三营官兵的截击，双方混战在一起，日军死伤狼藉，三营七连连长杨子西、九连连长范希文等百余名中国官兵阵亡。接着，第二一八旅继续向东泥河村攻击，将村里正在吃饭的日军歼灭大半，可随后就受到日军坦克的反击，部队再次出现巨大伤亡，董其武旅

长负伤。

此时，在忻口一线，中国军队中央兵团的所有阵地都已处在日军不间断的凶猛攻击下。在弹片横飞的前沿阵地上，一颗子弹射进了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的左胸：

时至中午，我与郝军长、庄村夫团长在半山腰观察敌情。我正在与团长讲话时，突然感觉有个东西碰了我左胸部一下，当时也没在意，就同他们往山顶爬。郝军长发现我背后有血，大声说：“李师长，你受伤了！”我说：“没事，好像是什么碰了我一下。”“还说没事！子弹都从你的背后穿过来了！”郝军长说着给我吃了点白药，这时我还清醒。当包扎时，我就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

士兵们把李师长抬下山的时候，军医认为胸腔里有瘀血没有流出来，要求把昏迷的李师长头朝下抬着以控出瘀血，士兵们不忍心这么做，还是头朝上抬到了后山师部。接着，李仙洲被转送到汾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院长亲自给他做了手术，言子弹从左胸进入、后背出来时李师长恰在“呼气之瞬间”——“心脏向回收缩，子弹在肺叶中间穿过去了。若是在吸气的瞬间，子弹就会打穿肺脏，当时就完了。”两个月后，李仙洲伤愈归队，晋升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十四日晚八时许，卫立煌率独立第五旅来到前沿。他发现前线部队太多，伤亡严重，且指挥很不统一，于是重新调整了部署：命令陈长捷指挥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二、第三旅（欠第四团），新编第四旅，负责扫清南怀化之敌；命令郝梦龄指挥第五十四师，独立第三旅的四团，第二一八、第二一七旅，担任正面防御并向日军再次实施反击作战。

十五日，左翼中国军队第十师的大白水村阵地，受到日军在三十多辆坦克引导下的持续攻击。中国官兵最痛恨的就是日军的坦克，他们打坦克的山炮很少，只能在阵地前挖出很深的反坦克壕沟。日军的坦克被阻挡后，中国官兵便用机枪向日军步兵射击，壕沟的底部很快就被日军的尸体覆盖。中国守军为对付日军的坦克使用了各种方法：“先往坦克上浇汽油，再投以手榴弹；或是冲到坦克前面，把手榴弹塞到履带里。抗日战士为了往日军坦克履带中塞手榴弹，手指被辗断者有许多人。”李默庵的第十四军第十师，其武器装备在中国陆军中可算精良：每个步兵连有九挺捷克式轻机枪和七十五支中正式步枪，每个重机枪连有六挺马克沁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这使得每个营的阵地上能够配备二十七挺轻机枪、六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和二百五十支步枪，另外还临时配备了两

门德制的战防炮。但是，面对日军坦克的集团冲锋，大白水村阵地还是危机重重。有限的反坦克战防炮击毁了几辆日军坦克后，立即招致日军报复性的炮击——“十几门大炮集中轰击，雨点似的炸弹、炮弹和飞机上的机枪子弹，不过十几分钟，就把一个战防炮排阵地炸得血肉横飞，尘土漫天，战防炮排的官兵完全与阵地共存亡，无幸存者。”日军在炮击之后趁势冲锋，冲锋时竟把从中国百姓那里抢来的大群牛羊赶在前面挡子弹。第十师官兵与日军在大白水村里激战多时，大白水村阵地依旧在中国守军手中。

董其武旅长负伤后，孙兰峰接替指挥，第二一八旅奉命攻击威胁中国守军进攻的旧河北村日军阵地。四二〇团攻入村庄后，在一座院落里发现了数名脸上抹了锅灰的妇女，其惊恐万状的样子令官兵们心里十分酸楚。攻到最后一座大院子时，残存的日军龟缩在内不肯投降。突然，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中国官兵的射击骤然停止。

小女孩来到我们面前，声音颤抖地说：院子里的日本鬼子叫我告诉你们说，如果你们不开枪，他们就向西北走。我们照顾好小女孩，仍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语，但仍不见动静。最后两位李团长商定，派人上房投弹歼敌。随即竖起了梯子，二十余人上房顶，伏在外坡向里投手榴弹。敌人虽多死伤，但始终不肯投降……垂死之敌不肯投降，见房顶上有人，即由房内向房上穿射，致使伏在房上的三排排长张玉山等十余人壮烈牺牲……我军决定火烧大院，全歼该敌。大家积草堆柴，引火烧房。十几分钟，院内敌人始得全歼。

中国空军第二十七大队的两架战机自汾阳机场起飞，于凌晨五时三十分轰炸了位于崞县的日军阵地，十分钟后安全返航。六时十五分以及八时十分，两架中国战机再次轰炸了崞县日军阵地，返航时遭遇四架日军驱逐机的拦截，中国飞行员苏英祥、廖兆琼阵亡，飞机残骸坠落于忻县附近。十四时三十分，中国空军第七大队和第十二大队的战机再次起飞，轰炸目标是崞县西北日军运输线上的一座桥梁，但因投弹偏离没有命中，战机安全返航。

忻口激战的同时，根据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八路军继续深入敌后顽强袭扰。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将从灵丘方向开来的一百三十多辆日军汽车堵在了小寨村附近，尽管日军派出一个大队增援，但第三四四旅死顶不退，日军被迫撤回了灵丘。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在广灵以南的冯家沟伏击了日军第五师团的第二运输队，毙伤日军百余人后，先后克复广灵、紫荆关、易县、灵丘和蔚县。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忻口的右翼，

先后占领了攻击忻口日军的数个后方要点，并向原平附近出击，破坏了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严重打击了日军后方补给线。

但是，忻口全线的关键支撑点南怀化阵地，仍在日军手中。

十五日晚，卫立煌严令郝梦龄十六日出击，必须夺回南怀化阵地。

据此，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和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商定了作战部署：一、第五十四师之第一六二旅（欠一个团）向位于南怀化以北的“官村左前方之敌攻击”；二、第二十一师之第六十三旅向南怀化以北之敌攻击；三、独立第五旅由现地向南怀化东端之敌攻击；四、新编第四旅强行占领南怀化；五、第五十四师之三二二团为向导队，分属于第六十三旅、独立第五旅和新编第四旅；六、独立第二、第三两旅协同右翼各部队增援新编第四旅，攻击南怀化之敌；七、第二十一师之第六十一旅，由一三〇〇高地攻击南怀化以南新练庄东北之敌；八、第六十八师由南怀化以南的秦家庄、新练庄向北出击，协助歼灭位于南怀化西北方向的后城头的敌人；九、第十师派一部由兰村向北面的前城头与后城头协助攻击；十、第二一七旅及第一六一旅攻击南怀化北面龙庄、下王庄以北之敌；十一、第二一八旅攻占后城头以北的旧河北后，向南怀化之背后实行攻击；十二、第二一一旅、第十九军之第二〇九旅于金山铺泡池村集结，为预备队；十三、以上各部队，均于十六日二时开始行动。

出击的时间还是午夜两点。

这几乎是中国军队孤注一掷的反击。

与十四日的情况一样，中国军队刚刚发动反击，日军的大举进攻同时开始了。担负反击南怀化阵地任务的独立第三、第五旅和新编第四旅等部队，作战一开始就陷入了混乱——阵地狭窄，地形复杂，夜色黑暗，日军的枪弹炮弹大雨一般倾泻，新编第四旅二团团长梁鸿勋腰部和腿部负重伤，二营营长覃连登和三营营长张学英阵亡，全团的四名连长张振华、李登山、李明和王明亮阵亡后，接替的代理连长陈三缘和徐鸿章也相继阵亡。十二团代理团长李正元以及该团的营连长也伤亡过半，两个团士兵的伤亡人数已达两个营的兵力数。独立第五旅向日军无名高地连续发起三次冲锋都未能得手，组织第四次冲锋时，旅长郑廷珍亲上前沿，日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右眼入，后脑出。郑旅长不幸阵亡。

郑廷珍，中国陆军第十四集团军独立第五旅旅长，河南人，出身一

个中医世家，但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在二十岁那年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开始了从军生涯。此次部队奉命从河北开赴山西战场，他对第五旅的官兵们表示，过去打内战，胜不足武，败不足惜，现在是打侵略者日本，拼死拼光也值得，这是军人的光荣。部队途经河南时，他打电报让家人来车站见面。在车站站台上，戎装男儿跪倒在地向年迈的老母磕头道别，表示儿子此去奉令杀敌，鬼子不败誓不生还。郑旅长阵亡后，遗体被护送回河南老家，灵柩所经之路百姓沿途祭奠，家乡父老厚葬了他。

郝梦龄命令六一四团团长李继程代理旅长职务。

日军在南怀化阵地正面增加了兵力，李继程旅长指挥六一四团二营，再调来六一五团三营，避开日军的攻击正面试图从左右夹攻，日军的炮火即刻覆盖了战场的左右两翼。战至两个小时后，二营和三营的官兵因伤亡所亡剩无几，李继程旅长也在赴前沿督战时阵亡。

独立第五旅旅长再次易人，由六一五团团长高增级代理。

独立第五旅反击受挫，令军长郝梦龄焦灼万分，决定亲上前沿督战。部下阻止说，前往独立第五旅的阵地，必须通过一段长约二十米的小路，小路被日军的四挺机枪严密封锁，已经导致四名传令兵阵亡。如果军长坚持要去，必须绕路。郝梦龄军长不肯，认为绕路会耽误时间。部下又请求军长写下手令，表示他们愿意冒死送达独立第五旅的阵地。郝梦龄军长还是不肯，说正在前沿血战的官兵需要看见他：“今天的战斗，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胜利！你们要坚守阵地，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撤离！”说完，郝梦龄带着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走向了那条令他们一去不复返的小路：

将军在前，刘师长在后，拉开距离用快步奔向独立第五旅。刚进入被敌人控制的危险路口，即被占领烽火台南沿制高点之敌发现，四挺机枪一阵疯狂扫射，将军身中十余弹，倒在血泊中。师长刘家麒不顾生死，急救将军遗体，尚未离开地方，也同样殉国。

中国陆军第十四集团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阵亡的第一位军长，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

郝梦龄，字锡九，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十六岁从军，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参加过直皖大战、直奉大战、中原大战以及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虽多年在军阀部队里作战，但他始终洁身自好，严

于律己，不置私产，爱护士兵。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命率部北上，部队自贵州沿湘黔公路徒步行军，然后在汉口转乘火车至石家庄。原定参加平汉路作战，因山西战局紧张，遂跟随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增援晋北。十月三日进抵太原，四日午夜到达忻口。十二日，忻口阻击作战开始，他的部队始终处于中央正面战场，必须直面日军优势武器的猛烈打击以及重兵的持续攻击。官兵舍命血战五昼夜后，他知道自己“既无援兵，又不能放弃，只有拼杀到底”。部队北上路过汉口时，他曾与家人有过短暂的也是最后的相聚。他对他的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国家。如果国家亡了，你们就没有好日子了。我没有钱，如果我死了，你们就进国家设立的遗族学校去读书。郝梦龄军长给他的妻子留有遗书一封：

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之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所念者，此中华民国及我们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倘余牺牲，望汝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姊妹等，亦要照拂。致余牺牲，亦有荣焉，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这是郝军长无惧战死的唯一理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

陆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矢忠革命，夙著勋勤。此次奉命抗战，于南怀化之役，率部鏖战，历五昼夜，犹复身先士卒，奋厉无前，竟以身殉国。眷怀壮烈，轸悼弥深，应予特令褒扬。郝梦龄追赠上将，刘、郑各追赠陆军中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抚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勋荩，而垂永久。

卫立煌指令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郭寄峤接任第九军军长，第一六一旅旅长孔繁瀛接替第五十四师师长，指定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继续作战。

十五日，卫立煌致电蒋介石：

敌于文未刻（十二日五时）起，以重轰炸机二十余架，向我四九八团髻髻山阵地往复轰炸数小时，投弹数百枚。元（十三日）拂晓迄午，敌复以轻重炮数十门掩护步兵团一联队指向髻髻山进攻，发炮二千余

发，我阵地工事全成灰土。守军浴血抗战，与敌肉搏，阵地进出数次，均经击退。团长曾邦宪两次饮弹，殉国；营长三员，相继负伤；连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至午后一时许，阵地遂被陷落。当时抗战之勇敢、与阵地同存亡之精神殊为壮烈，而损失之奇重亦为前所未有……

日军显然也因久攻不下而筋疲力尽：

决心死守太原的山西军、中央军、共产军三方面联合部队，在背靠忻县盆地、忻口镇前面的高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迎击我大场、粟饭原、长野、和田工兵、竹田炮兵各部队，自十三日以来进行拼命的抵抗。总攻忻口镇，可以说是总攻太原的前哨战，展开壮烈的激战前后达四昼夜。敌军布防把前线部队配置在从沿大同至原平镇道路东侧的滹沱河左岸，忻口镇西方沿滹沱河支流；把主力配置在忻口镇西方高地。以迫击炮、山炮、机枪猛烈射击，在最前线以战车、装甲车疯狂地顽强抵抗。共产军到处使用擅长的游击战术，使我军大伤脑筋。十七日清晨，占领了忻口镇西侧高地的一角，仍在猛烈攻击中。

十六日，南怀化阵地依旧未能收复。

这天早晨，第六十一军司令部参谋张光曙奉命前去忻口，在这片战场上他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遥见忻口阵地上，浓烟爆起，喊声连天。十几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爆炸声震耳欲聋。双方正在激战中，大批伤员涌退下来，有的呻吟叫嚷，有的边走边骂：“鬼医生都滚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儿都不见。”有一个端着自己另一支骨断筋连血淋淋的伤臂，号啕大哭。还有一个躺着对过路人说：“给我一枪吧！我受不了啦。”原来他的小肠已经流出来一大截……

卫立煌判断，日军的增援部队最迟十七日抵达，在此之前击溃当面之敌当然有利，然而忻口一线的中国守军伤亡过大，消耗甚巨，已经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全线反击作战。尽管蒋介石命令驻扎潼关一带的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日夜兼程赶赴忻口，阎锡山也命令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等部队迅速抵达前线归卫立煌指挥，可援军的抵达毕竟需要时间。基于目前战场局势，卫立煌决定全线采取守势——坚守现有阵地，援军抵达再战。

忻口阻击的第一个星期，中国军队以顽强的作战顶住了日军的疯狂

攻击。从军事上讲，在忻口战场进入僵持的时刻，如果中国方面能够迅速增兵，或许只要再投入几个武器装备较好的陆军师，便有可能将当面日军击溃，至少能够利用有利的地形把日军阻挡在滹沱河边。但是，阎锡山和卫立煌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或许现在他们应该想起了毛泽东的提醒——在忻口战场的侧背，晋东的娘子关方向，此刻已是炮声隆隆。

娘子关，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一座要隘，是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铁路线上的要冲和门户。娘子关以西是太行山主脉和山西台地，以东群峰逐次下落直至华北平原。娘子关分为新、旧两关，旧关山峦交错，沟壑纵横，一条狭窄的古道沿着桃河在陡壁和深渊之间蜿蜒崎岖；旧关南面的新关，地形略为开阔，成为冀晋之间的主要通路，明清时这里便沿关筑有城墙。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阎锡山在旧关和新关都修筑了军事设施，并派出重兵把守，以阻挡任何势力由此进入山西，染指他的地盘。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此筑有窑洞式半永久性的国防工事。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北平向南的华北平原上，日军第二十师团配合第六、第十四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在平汉路北段的作战中，相继击败中国军队孙连仲指挥的第一军团、刘峙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各部。之后，日军第十四师团和第一〇八师团沿平汉路越过石家庄继续南下，第二十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奉命向西面的山西攻击，以配合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作战。而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则被抽调至淞沪战场。

当侦知华北日军有攻击娘子关的企图后，蒋介石立即命令位于晋东附近的西北军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和赵寿山的第十七师以及滇军曾万钟的第三军等部队担负娘子关防御任务。可是，被蒋介石从南京派往山西帮助阎锡山指挥作战的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娘子关方向始终充满忧虑："我方的计划，是想以少数的部队据守石家庄，牵制平汉路正面的敌人，使他们不能转向山西，而以主力转向太原，从事忻口的会战。因雁门关、平型关已失，敌人已进入山西之腹地，若能在太原以北忻口附近将敌歼灭，则太原尚可保，晋局尚可控制。否则，形势必相反地突变。但敌人何尝不预料及此。而且我们的部队行动，无一不在敌机侦察之中，他必针对我们的行动而确立他们的计划。敌人以迅速而有力的攻击，将石家庄的防线突破后，仅以少数的兵力配合较多的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向平汉路沿线的平原地区追击，而以主力转向娘子关会攻山西，并不受我正面的牵制。反而我因正面不能确保，将整个太行山脉的侧面暴露出来，变成一个绵长而单薄的防线。"

十月七日——忻口方向的日军已开始试探性攻击——黄绍竑决定亲自去一趟娘子关。他率领几名幕僚出娘子关来到井陉。井陉位于娘子关的东北方向，扼守着正太铁路线，是从北面或东面进入娘子关的必经之地。见到冯钦哉，黄绍竑问及娘子关防御，冯钦哉认为情况不妙，因为防御尚未部署完毕，而日军的先头部队距井陉已经不足三十里了。话音未落，黄绍竑的卫士就捉到一名可疑人员，经过审讯证实是日军的侦察兵。黄绍竑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这证明日军不但确实很近了，而且侦察兵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目前，防守娘子关正面的仅有赵寿山的第十七师，冯钦哉部所辖第四十二、第一六九师以及曾万钟部所辖第七、第十二师防卫娘子关的两翼。在兵力如此少的情况下，防御的正面却有一百七八十里宽，以致处处显出薄弱，处处都是空隙。相对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相对于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势来讲，娘子关的防御实在是过于单薄了。黄绍竑认为，应该迅速收拢左右两翼防线以集中兵力。而冯钦哉认为，部队已经向之前指定的位置移动了，能不能迅速收拢回来还是个问题。回到太原后，黄绍竑建议阎锡山改变娘子关的部署，要求派原计划增援忻口的孙连仲部加强娘子关的正面。

阎锡山指定黄绍竑为娘子关防御总指挥。

黄绍竑立即返回了娘子关。

赶回娘子关，黄绍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日军第二十师团竟然没有从井陉直接向南攻击娘子关的正面，而是于井陉的右侧向西斜插，从曾万钟与赵寿山两部队之间的间隙穿过，抵达了无人防守的旧关附近——旧关在娘子关的右后方，也就是说，真正的仗还没打，一股日军已经冲到了中国守军的背后。

黄绍竑紧急调部队赶赴旧关阻截，然后去察看娘子关正面的国防工事——

我在离娘子关车站十多里的磨河滩设立指挥所，这是以前国防计划中所指定的指挥地点。但除了依山做了三个防空洞外，其余一无所有。初到的时候，连打电话都要借用正太路或乡村的电话线。所谓娘子关的国防工程，仅是在那一带的山上凿出一些洞，既不是炮兵的炮位，又不是步兵的战壕。而且整个阵地上，除了太原通石家庄的一条长途电话线及几处乡村电话线外，阵地的通讯设备完全没有。军队在这样的既设阵

地作战，简直与临时遭遇战的情形差不多。

面对形同虚设的防御工事，黄绍竑制订了娘子关作战部署：“为确保山西，将来收复华北失地容易，使我晋北作战军无后顾之忧起见，以第一战区由保定南移之部队进占娘子关山地，确实保持之，并相机进袭石家庄，威胁由平汉路南进之敌。”

十一日正午，黄绍竑再次抵达井陉，下达了一系列命令：第十七师一部赶往井陉东面的南河头警戒，第三十师在井陉北面的南陉、上庄之线向北警戒；第三军向井陉靠近，主力集结在大小梁家。

但是，命令的下达已经晚了。

第三十师突然遭遇千余日军的攻击；第十七师因躲避轰炸，加上雨后道路泥泞，黄昏时分才抵达井陉附近，官兵尚未搞清楚阵地在哪儿就遭到了日军的攻击。特别是沿着正太路向娘子关靠近的第一六九师，早晨从井陉北面的贾庄宿营地出发时，突然发现村口的河沟里有一百多匹清一色的红色战马在饮水，官兵们正困惑，接着看见了几面太阳旗在四周晃来晃去。第一六九师顿时陷入混乱，拼死突围中部队损失惨重。

译电员石中立是突围的幸存者：

我背后村西南是一座孤零零的高山坡无法翻过。我和参谋处的官兵则在敌人机枪的射界内向西沿梯形田迅速突围，敌人的机枪和掷弹筒齐向我射来，打得梯田石子上乱冒火星。王国栋还在扶跑歪了的驮子，我喊他算了快卧倒。张云昭参谋扔掉了他的棉大衣，我把皮带上挂的茶缸毛巾牙刷也扔掉。我们都卧倒在梯田沿上，用自来得手枪向敌还击。熊参谋的勤务员小余身上背着拾到的四颗手榴弹不用，而拿一支白朗宁小手枪乱打。由山沟上来的敌人，正向我们山坡爬来，我随即拿过小余的手榴弹一颗一颗地向沟下敌人掷出。这时特务连上来一个班，用三挺轻机枪掩护我们向西突围，向我们包围过来的敌人，大部都被击毙。我们的石子忠副官大腿被打穿，我用绑腿给他裹上架着向西冲。徐茂才左臂被击中尚能跑得动。我们一气跑了三十五里，到达恋庄。

十二日拂晓，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以娘子关正面的雪花山阵地攻势最为猛烈。在这里防御的是赵寿山的第十七师。双方激战一日，黄昏时分，雪花山阵地右翼被日军突破。

日军继续向南攻击，天黑时逼近旧关。

此时，孙连仲的军团司令部和所辖第三十一师抵达太原，阎锡山立即命令该部返回娘子关归黄绍竑统一指挥。

十三日下午二时，旧关失守。

为了确保雪花山阵地的稳固，给孙连仲部赢得抵达的时间，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决定对日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兵分三路向井陉南关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左翼一〇二团二营佯攻井陉县城；右翼九十八团突击日军占领的刘家沟和长生口；中路在一〇一团团长张桐岗的率领下，在雪花山以南的石板片附近阻击增援之敌。傍晚时分，反击作战开始。右翼九十八团突击顺利，几乎全歼了占领刘家沟阵地的日军。而一〇一团更为勇猛，官兵们不顾生死奋力拼杀，日军在惨烈的肉搏战中伤亡惨重，开始后撤，中国官兵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井陉车站，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仅野炮和山炮就有数十门之多。然而，令赵师长大惊失色的消息随即传来：雪花山阵地失守。

雪花山是娘子关正面唯一的制高点。

原以为主动发起的反击会牵制大部日军，因此，赵师长在率部出击时于雪花山阵地只留下了第五十一旅一〇二团一营固守。孰料，战场的唯一制高点却在反击作战开始后不久失守了。赵寿山立即回调出击作战的部队，试图夺回雪乾山阵地。第十七师官兵们艰难地仰攻，与日军彻夜激战，伤亡巨大，始终未见成效。十四日黎明时分，赵师长率领残部千余人向雪花山西南面的乏驴岭撤退。

雪花山阵地的失守，严重影响了娘子关战局。

但是，赵寿山的第十七师以顽强的作战，为孙连仲部抵达赢得了时间。十四日，阎锡山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曾万钟的第三军之三个团在旧关以南的九龙关、北孤台设防，余部负责歼灭旧关之敌；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和李兴中的第一七七师之第五二九旅，于战场的西北面占领山关、龙泉关阵地；孙连仲的第一军团派出一个团扼守黑山关南面的六岭关；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在娘子关集结；张金照的第三十师派出一个旅占领井陉以北的桃林坪、小枣一线阵地；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位于娘子关的西南方向，由正太路上的阳泉向东推进，作为预备队。同时，阎锡山还致电五台县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命令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开赴阳泉，归黄绍竑指挥。

这一天的拂晓，娘子关前线的中国军队开始主动攻击，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第三十五旅将继续攻击旧关的日军击退；第二十七师部队攻占了旧关以北的核桃园和大小龙窝；第四十四旅不但击退了向西攻击的日军，占领六岭关，还与第十八集团军的八路军部队取得了联系，令娘子关中国守军左侧的威胁基本解除。由旧关向娘子关攻击的千余日军，进入两关之间一条名叫关沟的深沟时，受到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加两个营的围攻，被封锁在深沟里的这股日军伤亡巨大。下午，之前窜入旧关的那股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向关沟突击，企图救援受到围攻的日军残部，但被中国守军打了回去。日军第三十九旅团旅团长高木义人这才意识到他遇上麻烦了。他的第七十七联队虽攻占了雪花山和旧关，但损失太大，此刻关沟里的那些官兵还危在旦夕，这样打下去必定前景不妙。于是，他命令第七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和一个山炮中队增援旧关，命令第七十八联队余下的全部力量并加强一个加农榴弹炮大队增援娘子关战场。十五日，中国守军对关沟里的残余日军进行清剿。第七十九旅官兵从三个方向一齐杀入，在关沟里藏了两天的日军，背后是绝壁，无处可逃，数百人被击毙。而三名被活捉的日本兵，是在一个山洞里的一堆高粱秆里被发现的；被击毙的日军军官中，有第七十七联队联队长鲤登行一和大队长中岛力男。

此时，西面的忻口仍在血战之中。

侵入旧关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持续围攻下依旧不退，旧关遂成为娘子关战场的作战核心。十五日，黄绍竑决定对旧关实施反击作战，命令部队必须解决旧关之敌。其作战命令要旨为：

一、以歼灭敌军之目的，明（十六）日拂晓，我全线对敌实施总攻。

二、第三军为攻击主力，对旧关之敌攻击。

三、第二十七师，限今（十五）日将关沟之敌肃清，以主力由龙窝附近断敌后方联络，一部协同第三军会攻旧关。

四、第十四军团之工兵营附辎重兵营、第十七师、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二旅（欠一个团），固守原阵地堵击敌人。

五、第三十师抽兵两团，协同第十七师坚固占领乏驴岭。

当晚，日军第七十八联队全部抵达旧关。

十六日拂晓，中国军队发动反击时，日军也同时发动了攻击。占领了核桃园的第二十七师部队被迫向后撤退，第三十师从乏驴岭向井陉发起的出击未能奏效。第二天，黄绍竑、孙连仲依旧命令部队继续反击，激战一天，双方都付出巨大伤亡，中国军队依旧未获进展。十八日，日军向中国守军各阵地全面攻击，虽未能得逞，却导致中国守军伤亡剧增。晚上，黄绍竑命令第三十一师组织敢死队突入旧关扰敌，其余部队对旧关实施全面袭击。十九日凌晨二时，第三十一师一部冲入旧关，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将日军赶出了旧关。拂晓时分，日军增援部队抵达，重新夺回旧关。天大亮了，日军出动飞机进行持续猛烈的轰炸和扫射，迫使中国军队停止攻击。晚上，中国守军再次发动围攻，由于各部协同不够最终没能成功。

在中国军队围攻旧关时，赵寿山的第十七师阵地发生危机。得到增援的日军在凌晨四时向乏驴岭一带发起攻击，由于日军空中轰炸和地面火力明显优于中国守军，激战到下午，第十七师补充团团长翟济民身负重伤，营以下军官伤亡二十七人，弹药断绝，乏驴岭南侧阵地被日军攻占。同时，在乏驴岭的北面，荆蒲关阵地上中国守军一个营孤军苦战至傍晚，全营自营长到战士伤亡殆尽，阵地失守。

中国陆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原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的旧部，官兵中有不少共产党人。自娘子关作战开始后，第十七师一直战斗在娘子关前沿的雪花山、乏驴岭一线，全师各部始终处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官兵不畏牺牲，顽强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全师旅以下军官旅长仅剩一人，团长仅剩两人，营以下军官所剩不到三分之一，一万三千余人的陆军师战至不足三千人。

连日来，日军第二十师团攻击娘子关的部队，以第三十九旅团为主，师团主力仍保持于石家庄附近进行休整。当攻击陷入窘境时，为尽快完成华北作战以腾出兵力增援华中战场，十九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二十师团投入后续部队迅速攻占娘子关。

第二十师团的部署是：由六个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大队、两个榴弹炮大队、一个山炮大队、两个迫击炮中队，组成右纵队，攻击娘子关南面的新关；由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大队、一个迫击炮中队组成左纵队，担任助攻。后续部队集结于井陉。为了支援第二十师团，打破娘子关战场的僵局，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一〇八师团之第一〇四旅团归第二十师团指挥；命令第一〇九师团从石家庄以南的元氏出动，向西进入山西境内，通过昔阳县直插娘子关的背后。

负责娘子关作战的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已经投入了他能掌握的所有部队。从太原回防娘子关的孙连仲部，在西北军中是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但是卢沟桥事变后，该部奉命增援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历经数次作战兵力已经不足万人；又经过娘子关战场的连日苦战，当下剩余兵力不足六千。纵观整个晋东，防线千疮百孔，兵力捉襟见肘，面对日军将要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攻势，第二战区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无力再增加任何防御力量。

娘子关战场前途未卜，忻口战场亦在危境之中。

十月十九日，卫立煌密电蒋介石：

急。南京委员长钧鉴：一、已迭下严令，督励各部与阵地共存亡，死力抗战。二、惟以连日争夺要点，各部浴血苦拼，伤亡过巨，现在十四军及八五、廿一各师余部不过五六营，独立旅仅余战斗员五六百。每日消耗均在二三千左右。若不火速补充，诚恐守备无人。

日军增援兵力逐渐抵达后，十八日，西起大白水阵地，东至滹沱河南岸阵地，板垣征四郎向忻口一线的中国守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击。日军采取集团作战的方式，一波接一波潮水般地冲锋，中国守军一线官兵拼死抵抗不得喘息，指挥官只有再组织兵力适时迅速发动突然反击。两股冲击力在前沿阵地上猛烈撞击，白刃战使得双方的炮火被迫停止射击，阴沉的天色下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扭打声和呻吟声。这种残酷的攻防战，使得忻口最前沿阵地反复易手达十三次之多，中国守军六次丢失七次夺回。十日，日军使用了催泪性毒气和燃烧弹，向中国守军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新抵达战场的日军增援部队萱岛支队加入作战后，忻口中国守军左右两翼和中央阵地都进入了更为残酷的搏杀——

每个阵地都是经过反复争夺后，才能得以固守。敌人每次攻击，都要经过多次反突击，才能被压制下去。我第九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部，陆续加入战斗。全线合计约一百个团，兵力约十四五万人。一师一团上去，不到三五天就损失过半，不得不撤换下来。第七十二师仅剩的四三三团团长曹炳也牺牲了（该师在南口牺牲了四一六团团长张澍增，平型关牺牲了四三四团团长程继贤），全师原有八千多人，现在只剩下不到两千人……俯瞰敌我之间的一个山沟，只见枪支和死尸布满地面，血肉模糊，景象十分阴森，以致双方谁都不敢下去清理。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

冲锋的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中国守军阵地上一片火海，火焰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毒气。奉命上前沿接防阵地的士兵，在向前运动时不断地问老兵如何应付火焰喷射器，老兵们说阵地上没有水，就地打滚可以灭火。然而，士兵们看见那些被抬下去的伤员，有的浑身被烧得焦黑，有的满身都是水疱，加上中了毒气后的痛苦表情，这使得他们不由得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惊恐笼罩着。——中国守军各部队在通往阵地后方的每一个路口都设立了战场执法队，排列着大刀，架设着机枪，只要没有通行证即被认定为战场逃兵，无论是官是兵不由分说一律就地处决。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部队，与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一样，晋绥军在自己的地盘内打仗必须舍生忘死。第三十五军第二一一旅四二二团团长姓王，全团每名官兵左臂上都佩戴着一个印有黄色“王”字的臂章，人称“黄王团”。“黄王团”作战顽强，不但以死打硬拼闻名，而且还有轻伤不下火线的传统，这使得他们在阵地后面路口的战场执法队那里信誉极高：“凡是佩戴‘黄王团’臂章，从忻口前线到后方金山铺去取弹药，或是伤员到后方裹伤以及向前线送水、送饭，不论早晚通过，虽不持四二二团团部通行证，一概不阻拦盘问。”只是，该团为了这份荣耀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前沿坚持作战十七天官兵伤亡五百人。

阎锡山多年来购置的火炮，此刻全部用在了忻口战场，加上卫立煌中央军部队带来的，忻口中国守军的各类火炮达到了两百门以上。——“每次争夺不足千米的山头阵地时，敌我炮火齐轰，有时攻者守者会霎时同归于尽。”日军的火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中国守军。中国守军作战时，因武器简陋，必须保持兵力的绝对优势。于是，当一个范围不大的阵地处于敌我双方炮火的集中覆盖下时，中国守军成规模的作战往往会导致成片的伤亡，乃至出现过“一天就垮了十个团”的“奇重的伤亡”。

中国军队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第一九一旅防御的阵地只有几百米——位于忻口右翼的神山。“旅指挥部设在山顶上的庙里，这里地势高，能看到整个战场”。“神山下布置了第一道防线，半山腰的两个山口处布置了第二道防线，山背后是预备队”。贫苦人家出身的旅长邢清忠不识字，但是作战身先士卒，从不贪污军饷，尽管对部队实行的是打骂教育，但官兵依旧愿意跟着他打仗。第一九一旅武器装备之低劣，在中国军队中极具代表性：“除了几门八二迫击炮和一些三十节重机枪以及三八二团一营的新式步枪外，其余的步枪全是老掉牙的破烂货，而且大部没有刺刀，只好每个士兵另配一把不大好的大刀。”因为第一线的防御阵地距当面日军很近，只要一开战双方就会扭打在一起，所以第一九一旅的

官兵们认为，自己手中的大刀还是很有用的：

十月下旬，敌人可能感觉到攻打正面不成功，就把炮口转向我们旅这边来了。炮弹像下雨一样，一落就是一大片，而且是反复地轰击，一直打了将近三天，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我们的两耳都被震聋了……在敌人炮轰的第一天晚上，第一线的营就向旅部要求出击，冲到敌人战壕里去拼大刀。旅长当即用电话向师部请示。师部距火线十来里远，哪里会晓得第一线的战斗情况，所以不同意。第二天晚上又一次要求出击，照例没有得到同意。到了第三天下午，在敌人炮击最猛烈的时候，第一线仅有的百多名官兵，不顾上级的命令，提着手榴弹，掂着大刀长矛，冲向敌人。他们先向敌人战壕里摔了两排子手榴弹，炸得敌人死伤累累，惊惶失措；然后跳进敌人战壕，抡刀砍杀，并用敌人的轻机枪向逃跑的敌人射击追击，加上我们重机枪连在左翼的有效侧射，直打得鬼子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这次出击，把战斗打到敌人的阵地内，突破了敌人相当于一个营的阵地，几乎全歼敌人，并炸毁敌人重机枪四挺及一些轻机枪和步枪，缴获轻机枪二十多挺和步枪三百来支，连牛皮背包、饼干、罐头和香烟都捡回来了。

但是，使用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与日军的现代武器抗衡，这意味着中国士兵必须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除了武器装备外，中国军队的现代战时后勤保障更不完备，没有足够的战场救护队，从战场抬下来的伤员是幸运的也是少数的，只是这种幸运极其短暂，因为许多伤员会因为药品奇缺而得不到及时救治。

上海《良友》画报刊登了山西前线一名护士写给家人的信：

即使裹伤的纱布也十分短缺，甚至用了三个星期还不能换上新的。止痛止血药也非常缺乏。对于破伤风、水肿等药品更是难求。有的伤兵受伤之后，简直无能为力，眼看他们血流尽以后便死了。触目惊心，无过于此。

造成中国官兵严重伤亡的，还有头顶上的日军飞机的轰炸。由于严重缺乏对空武器，日军飞行员可以肆无忌惮地低空扫射，这种从天而降的打击令中国官兵几乎无处躲藏。

但是，突然有一天，忻口战场上空的日军飞机少了，甚至连续两天不见了踪影，消息很快传来：距忻口战场最近的一个日军机场让八路军给端了。

“八路军里有能人！”

十月八日，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曾赴忻县卫立煌的指挥部，其间卫立煌诉说了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令前线每天损失兵力将近一个团的苦楚。当夜，彭德怀返回位于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站在院子里仔细辨听，日军战机的轰鸣声穿过山谷隐隐传来。原以为这些飞机都是从北平起飞的，但是彭德怀突然判定：忻口附近一定还有一个日军的临时机场。依据日机的航速以及续航能力，若是从北平起飞，不可能每天这个时候抵达忻口一线。于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接到了进入代县附近地区侦察的任务。十月十六日，在代县以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村，七六九团官兵看到了从头顶上飞过的日军战机。他们找到当地的老乡问询，得知河对岸阳明堡镇的南侧有一个日军临时机场。机场驻扎的二十四架战机，白天飞赴忻口战场，晚上停放在机场跑道上。日军的一个联队负责守卫机场，但是联队的大部驻扎在阳明堡镇，机场里只有地勤人员加上一小股警卫共约两百人。陈锡联还了解到日军对进入机场的公路要塞警戒很严，盘查很细，但对机场周围疏于戒备。”

因为已经处在敌人的背后，因为敌人兵力不多且守备松懈，陈锡联部决定“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敌人以突然袭击”。

具体战斗部署是：以夜战见长的三营对机场实施突击；一营负责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可能来援的日军；二营八连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以保障三营侧后的安全；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占领滹沱河东岸阵地，支援三营的行动。

十九日夜，八路军出发了。

三营官兵一律轻装，在当地百姓的引导下，沿着漆黑的山谷迅速潜进，悄然渡过滹沱河，于浓重的夜色中摸进了日军的机场。营长赵崇德带领十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机场守卫部队的指挥所，十一连则直接向跑道上摸去。从忻口飞回来的战机，分成三列整齐地停放在跑道边。十一连二排的官兵首先摸到了这些大家伙。但是，突然间，从十连行动的方向传來月军的叫声，接着便响起清脆的枪声——十连已经与日军哨兵交火了。就在这一瞬间，十连和十一连在不同的方向同时向各自的战斗目标猛扑上去。这是一个混乱的时刻，没有任何防备的日军警卫仓皇抵抗，两军在火光中开始了近距离搏斗。日军飞机的座舱内有值班的飞行员，他们惊慌地发动飞机，并用机上的机枪盲目扫射。还有的

飞行员慌乱地逃出飞机，结果立即被十一连的官兵用刺刀刺倒。八路军官兵没有打飞机的经验，他们向飞机开枪，用铁锹和枪托砸，甚至用脚踢；他们爬上飞机，用尽全身力气撕扯飞机的蒙皮，直到中弹跌落下来。几乎在每一架飞机四周都发生着肉搏战，呼喊声、咒骂声和厮打声响彻夜空。激战中，日军的子弹击中了赵崇德营长。营长的牺牲令三营官兵万分悲痛，他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有的端枪朝飞机猛烈射击，有的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机，还有的把集束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冒着密集的枪弹，爬上飞机，拉响手榴弹，与敌机同归于尽”。——赵崇德，河南商城人，十七岁参加工农红军，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几十分钟后，阳明堡机场的二十四架战机全部被击毁，百余名日军被歼灭。

毛泽东曾经说过，打阵地战不是八路军的长项，八路军擅长打游击战，只要八路军充分发挥自己的长项，就能对抗日战争作出贡献。

八路军的敌后作战，给忻口战场上的日军造成极大的困扰。

对此，《东京日日新闻》进行了专门报道：

太原以北九十公里的忻口镇天险长达六十余里。在此半永久性阵地上，盘踞着山西军、中央军和共军组成的十五万盟军。对此，我××部队动用空军、陆军，每天每日地连续进行猛烈的攻击。时至二十六日，中央军仍防守第一线，山西军部署在第二线。共军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两省省界东一线，运用特种游击战术袭击我军的后勤补给线。共军威胁京绥铁路第一线至大同的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我军后勤补给线。加上各地的残兵，分别聚集在这座山头、那个村庄。我军若去讨伐，他们或许逃跑，或许在桥梁、狭路等处袭击卡车队。尽管将其击退了，但我方常常蒙受很大的损失……

由于共产党军队特殊的政治背景，八路军的每一次作战都能引起全中国的瞩目：

从战略上言，这不只是日寇长驱直入占据山西之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且击破了日寇从晋东转入冀北威胁平汉路上我军左翼的企图，因此也就破坏了日寇在北方战线上整个原定计划的实现。从政治上言，第八路军这些胜利，必然更加激励我国军民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勇气

与决心，同时也就使全世界反法西斯、反对侵略的一切人们得到更大的兴奋与推动。

作战双方都认为，只要再拼死一搏，就能达成最后之军事目的。

忻口战场中国军队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认为：虽然中国守军伤亡已达三分之二，但部队尚能执行命令，死打硬拼。据日军俘虏供述，日军死伤也在万人以上，士气与斗志逐渐低落。所以，消灭日军残敌应该指日可待——“此股解决，则华北问题、国际情势，必尤转变。”——但前提是，忻口战场必须得到兵力增援。若长时间得不到增援，或是增援有限致使“兵力平分”，那么战局前景堪忧。

忻口战场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每天早晨必“刮净胡须，换上洁白的衬衣”去前线巡视。他乘坐的“大卡车在田地里一直向前线的高地驶去，幕僚们的车子跟在后面，车距为约五十米的丁字形，车轮卷起的尘埃和雨点般的迫击炮硝烟卷上清澈的山西天空”。可是，板垣征四郎的心情并不晴朗，因为不但国内已经有舆论说他的第五师团看起来“战斗力较差”，而且他也必须承认他的第五师团受到了少见的顽强抵抗：“太原的二十万大军利用巍峨的高山天险，在华北战场的最后交战中异常顽强。我军正从北忻口镇方面和西正太线两方面向太原逼近，十几天来持续激战……（敌）在北部战线有十五个师，约十五万人；在前线部署了五个师，五万人；主力部队是精锐的中央军。在忻口镇方面，有共产军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两个师；在娘子关方面，朱德指挥的精锐的共产军一个师部署在最前线，他们利用拿手的山地游击战顽强地阻止我军进攻。战场是连绵起伏的山岳地带，作为黄土高原的特征，悬崖屹立……我军在这场壮烈已极的山地战，即向太原发起总攻的前哨战中，殊死战斗，南北夹击，在二十里长的艰险地带展开了异常肉搏战。现在是一鼓作气的时候了，如果我军攻陷忻口镇和娘子关的敌前线根据地，不管悬崖如何险峻，即使敌人企图阻止我军进攻，那也可以想象在我军的威力面前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正因为如此，敌人的抵抗激烈，我军的苦战也格外艰难。”

对于板垣征四郎来说，他的第五师团“无论陷入何种困境，也必须完成山西作战”；只有攻克了太原，第五师团才能算完成了他最初的作战设想。

山西战局万分凶险。

鉴于部队确实无法得到补充，山西战场上的中国将领开始考虑撤退的问题：

二十三日，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密电蒋介石：

……本师自八月中旬抗战以来，历经参加南口、蔚县、广灵、平型关、忻口各战役，转战数千里，血战三月余，牺牲之大，为他师所未有……现六十三旅仅存战斗兵二百五十一人，六十一旅亦伤亡三分之二。本师已无战斗力，拟恳速予指定地点整理补充，俾资再战……

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抄报傅作义电报："一周内敌我均到最后关头，但我无精锐援军，前途可虑。晋军十五（万），现只余五万。"

还是这一天，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密电蒋介石。言第二战区"已到最后阶段，虽极力苦撑"，若"无大力增援"，撤退仅仅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除以一部死守太原外，以八路任游击阻敌南进，其余各部拟酌量南移，整理补充，以图再战"。

忻口作战，中国军队兵力损失严重：阎锡山、傅作义的"晋绥军六十余团，现合并不足二万五千人"；赵寿山的第十七师损失四分之三；孙连仲的第一军团损失三分之二；李默庵的第十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陈铁的第八十五师均损失二分之一；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损失三分之一；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均损失三分之一；曾万钟的第三军损失四分之一……倘若继续再战，损失"尚难计算"。

自日军发起大规模的攻击以来，山西战场上的中国军队苦战多日，誓死不退。那些在侵略者凶猛的炸弹、炮弹以及子弹中倒下的官兵，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无不是为了与郝梦龄军长一样的梦想："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出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毛泽东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谁能说是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胜利的必然，无可置疑。

可是，战争刚刚开始，敌人就已深入国土腹地，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承载起漫长的苦难历程？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从南方传来：日军逼近了中国首都南京。

第八章

舍抗战外无生存

萧瑟的秋风中，日军第十军的将领们几乎可以望见中国首都南京城了。他们无不认为，能够首先攻占他国都城，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无上荣耀。

此刻，淞沪战场上的日军以超出预想的速度攻击至苏州附近。尽管东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将作战地域定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的指令，认为华中方面军的作战不应该“超过该线”，但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将领们——特别是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强硬地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向中国正式宣战，并下达攻击南京的命令。日军将领们认为：不让对手喘息而乘胜追击，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如果政府不正式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没有名分；更重要的是，已经进逼中国首都而不去占领，日本国民会对日军的战斗力产生误解。华中方面军在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说：

现在敌人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果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从而事变的解决越发推迟，国民也将无法谅解军的作战意图，有害于国民舆论的一致。为此，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当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二个月以内可以达到目的……我们认为第十军随着后方的建立将可继续跃进，上海派遣军经过十天休整即可向南京追击。

自中日开战以来，关于是否扩大战争规模，日本内阁与军部内部一直存有争论。如今，日军已经兵临中国首都，战争将如何演变下去，成为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一个巨大纠结。

就战争本身而言，日军华中方面军认为，一鼓作气地打下去，制胜的前景不可估量。但是，东京的政客们意识到，占领一国首都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而是必须给战争目的作出一个定义的政治问题一如何定义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或者说是否就此正式向中国宣战，日本内阁感到十分棘手。

毫无疑问，在不宣战的状态下，战争无法顺利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也难以达成：军事上受到各方面制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力；即使通过武力强行占领的地区，邮政、金融等行政系统也无法运作。另外，不宣战还会导致中国方面“由于怀疑日本的决心对建立政权不热心”，也就是说，不宣战连中国的变节分子都不敢在日本的庇护下组织起一个傀儡政权。一一日本不能真正统治中国，那么与中国打仗意义何在？

但是，日本的现实又需要不宣而战。宣战之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自不待言；更要紧的是，日本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钢铁、棉花和有色金属等，必须统统依赖进口，特别是从美国进口。一旦向中国正式宣战，战略物资的进口便会受到国际法的严重制约，美国极有可能首先拒绝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如果日本失去了进口供应，不要说支撑战争，就连本国人的日子都将过不下去。

因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和军部曾反复磋商，衡量利弊，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四委员会”负责论证此事。“第四委员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发布宣战对日本不利。——这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阁决定以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代替宣战诏书的原因。

近代以来，日本人从不愿清晰地定义其侵略战争的目的，他们之所以总是含糊其辞地把对外发动的战争称为“事变”，其原因被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更多属于精神上的”问题：

日本存在着官方神学，大量神学家，包括大学教授、禅宗和日莲宗佛教僧侣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据它的阐释：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也是公正的，永不会是侵略。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自然，对于那些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如意设想是：在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恶名的前提下，被占领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日本的统治。拿日本官方的表述便是：圆满解决事变。——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及上海之后，日本人认为，眼看就要丢掉国都的中国人表示臣服的时候已经近在眼前。

在日本人看来，实现灭亡中国和称霸世界，其手段有军事摧毁和政治迫降两种。在入侵中国之初，速战速决是日本的设想，即在两到三个月之内利用强大武力令中国屈服。但是，即使占领了北平、占领了上海，即使已经兵临太原、兵临南京，日军也没能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没能摧毁中国的主体防御体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没有丝毫屈服的征兆。加之国际舆论日趋严重的压力，纠结难堪的日本政界开始探求实行另一种手段的可能，即通过第三方与中国政府谈判，迫使中国政府鉴于强大的军事压力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日军参谋本部急令华中方面军停止在苏州—嘉兴一线暂不向南京实施攻击的原因。

能够胜任的“第三方”应该是谁？

日本人认为德国人最合适。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的话。”狄克逊将日本方面的意图报告给了德国政府，当即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首肯：“德国为了日华直接谈判，愿意从中联系。”但同时，德国外交部又同时提示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目前我们并不想超出一个递信员的地位。”日本人选择了在法西斯理念上与其有着共同立场的德国人，原因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判断中国政府不但有与日本谈判的意愿，而且德国也是一个中国能够接受的“第三方”。

德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德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中国则向德国输出重要的工业原料。在中日战争面前，德国面临着两难：支持中国，必定得罪日本，且有违法西斯的全球战略；支持日本，又会严重损害德国的在华利益。德国因此愿意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

而国民政府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就曾谋求过国际社会的外交调停，力求通过国际力量将战争局限在局部范围内。南京委员长侍从室秘书萧自诚曾向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透露过蒋介石让德国充当调停人的真实意图：“德国希望中国参加反共反苏阵线，自不愿中日间的战争演变为长期性的；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亦不希望进行长期战争，他是采取逐次吞并的策略，因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颇大。如果谈判，总需要一些时间，日军在这期间大约不会进攻南京。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整顿充实一下。”——“这虽是萧自诚的话，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想

法。”

十一月二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列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同时强调说，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这些条件，“强使日本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时，日本将一直进行到中国完全崩溃为止，而那时的条件将大大加重”。

一、内蒙古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类似外蒙古。

二、在华北，以满洲国国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划定为非武装地区，由中国警察队担任维持治安。如立即缔结和约，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南京政府，惟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如和平现在不能成立，即有必要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在缔结和约后其机能将继续存在。在经济方面，事变前已在谈判的开发矿产事，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满足日本的要求。

三、上海非武装地区须扩大，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关于其他方面没有再加以改变的企图。

四、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政策。这和一九三五年南京谈判时要求相同。

五、共同防共。这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没有抵触。

六、降低日本货进口税。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蒋介石都不可能接受日本人开列的上述条件。只是，他仍心存一个希望：《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就要在布鲁塞尔召开，会上将要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如果国际力量能够制止日本，一切危难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了。但是，连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都认为《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根本不值得期待。日本一九三三年就退出了九国公约组织，当下，日本和德国已明确宣布拒绝以任何身份参加这次会议。——世界历史一再证明，列强聚在一起的所谓“国际会议”，从来没有给国际社会带来过半点“公道”。特别是近代以来，凡涉及中国的议题，中国都不曾获得应有的权益和利益，遭遇的只有更深的屈辱和灾难。

果然，十一月三日——日本向中国提出谈判条件的第二天——《九国公约》缔约国中、美、英、法、意、比、荷、葡，以及后来加入的加

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挪威、瑞典、丹麦、墨西哥、玻利维亚，还有特邀国苏联等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是，会议还没有开幕，英美等国就相互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说服了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出面主持会议，但各成员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议题并不感兴趣。中国代表顾维钧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恳请各国在道义、物质和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对中国提供援助。各国代表中除了苏联赞同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外，其余各国都有怕得罪日本的理由：英国认为他们防范的重点是欧洲的法西斯势力而不是亚太地区，况且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与日本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对日本施加谴责制裁的问题上英国绝不带头；法国的担心是，如果谴责日本，很可能带来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的后果；美国人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立场，就是既不跑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当“英国风筝上的尾巴”随风摇摆——只谈亚洲和平，不谈对日制裁；至于意大利，其本身就是日本的盟友，不仅反对制裁日本，而且还极力为日本辩护。

布鲁塞尔会议仍在暧昧地进行着。

日军开始在中国杭州湾大举登陆。

十一月四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拜会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在日本提出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日本不能自视为战胜者，中国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最后通牒，中国的主权不得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蒋介石告诉陶德曼，如果接受日本人开列的条件，对于国民政府来讲无异于自杀——“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蒋介石的强硬令德国人有些意外。陶德曼劝说蒋介石接受德国在一战中的教训，不能任由战局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否则将导致资源与兵员的衰减枯竭直至崩溃。应该适时地尽早接受日本的谈判条件，不然等到整个国家精疲力竭的时候就晚了。可是，蒋介石依旧坚持他的立场。同时，蒋介石又狡猾地让陶德曼提醒日本人注意到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投降”。

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德国人继续向国民政府施压。思路还是蒋介石的意思，只不过他们是反过来说的。陶德曼向孔祥熙、白崇禧等中国军政高层人物描绘出这

样一种前景：如果中国不谋求与日本谈判，一任目前“战局拖延下去”，那么当中国经济崩溃之时，“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日本向国民政府施压的手段，依旧是军事上的强大攻势：蒋介石会见陶德曼的第四天——十一月八日——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冲进了太原城。

太原的陷落是军事上的悲剧。

从当时中国战场看，太原这一局部战场，是最有希望遏制日军的攻势并给日军以重创的。太原北部的忻口阻击，顽强进行到十月底时，日军已经死伤无数，精疲力竭，几乎丧失了继续攻击的勇气。——如果山西战场上的日军严重受挫，广田弘毅开列谈判条件的时候是否还能如此强硬？

但是，忻口战场侧后的娘子关，这个被毛泽东视为致命隐患的战略要点，却在山西战局的关键时刻崩溃了。

十月二十一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全部投入娘子关作战。在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的指挥下，日军兵分两路向娘子关发起攻击。娘子关正面防线上中国守军第八十八旅的阵地，当日即被日军突破。一股日军突入旧关与娘子关之间，切断了通向娘子关的铁路线，令孙连仲和冯钦哉的部队身陷娘子关车站内。这个时候，附近已经没其他部队可以调用，如果让日军继续向前攻击，娘子关的失守近在眼前。黄绍竑在电话里向阎锡山紧急求援，阎锡山正一筹莫展之时，另一个声音在电话里插了进来，阎锡山一听，是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李团长表示他的部队距娘子关约五十公里，如果现在出发，明天即可赶到战场。阎锡山和黄绍竑同时大喜过望：“这是杨虎城的卫队团，就叫他们开来吧！”

中国陆军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原是陕西绥靖公署教导团，是杨虎城储备干部的机构，官兵大多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程度。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陕西绥靖公署被取消，绥署部队被改编为第三十八军，其中的教导团官兵“近三千人，装备很完全，而且都是青年学生，团长李振西尤为勇敢”。

李振西的教导团以一种慷慨赴死的劲头冲了上去。

第二天黎明时分，跑在最前面的一营在快要接近娘子关时，发现了数百名日军骑兵正在生火做饭，营长殷盛义带领全营即刻发起突袭，日

军仓皇往回逃，钻进了狭窄的关沟。——几天前，日军在这条通向娘子关的狭窄深沟里已被痛击了一次。李振西带着后续部队赶到时，追进沟内的一营正与日军混战在一起。孙连仲将李振西团长叫到国防工事的窑洞里，说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的两个师“现在还没有联络上”，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也“才到昔阳境内”，娘子关附近已无兵可调，太原更是无兵可调，现在“就看你们了。你们这个团的战斗人员比一般的旅还要多，近战武器又好，当面敌人今天给你们冲了一下，仓皇钻进沟里，现在趁热打铁，能一下子冲出旧关最好。只要维持两三天，池峰城的援军抵达，就能稳定住战局。如果保住了娘子关，一定向南京申请将教导团扩编。李团长根本顾不上这些事，因为二营这时候也冲进了沟内，关沟里一片喊杀厮打声，抬出来的伤员个个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关沟有二十华里长，两边是悬崖陡壁，几千敌人挤在沟内，骑兵、炮兵、辎重兵和战车把道路都塞住了。尽管敌人挤着向后退，由于受地形的限制，我们也攻不动。

李团长决定改变死拼的战术，集中火力，把狭窄的关沟变成日军的一口活棺材。具体战法是：以营为单位，将每营的四十八挺轻机枪和八挺重机枪集中起来，再分成四个火力突击组，每组四十多人为一个冲击波。午后，步兵突击组在机枪的掩护下向关沟发起了冲击，一个组伤亡太大，就换上另一个组，一波接一波决不中断。战至黄昏，钻进沟里的日军第七十八联队及骑兵大队、炮兵大队、战车大队，“被我第一、第二两营歼灭殆尽，关沟里乱七八糟地摆着几十辆敌人自己炸毁的炮车、辎重车，躺着二百多匹马，还有几百支机枪、步枪。敌人的尸体还在燃烧着。我团伤亡了五六百人。黄昏后，教导团完全控制了旧关，残敌退到关外的山上”。

控制了旧关，李团长分析日军肯定会来增援：“今晚我们不把敌人撵走，明天敌人就会把我们撵走。与其待在这条死胡同里等死，倒不如干脆出去拼一下，成则可保旧关，失败也会叫敌人付出极大的代价。”冯钦哉惊讶于教导团年轻官兵的慨然血性，立即承诺每夺回一个山头赏大洋五千，决不失言。

这是一次连日军都没想到的局部反击。

夜色之中，教导团官兵杀声震天，日军尚未反应过来，大刀就砍在了他们头上。彻夜的激战，李振西团又付出了三百多人伤亡的代价，但是中国官兵居然连续拿下了八座山头。报捷电话传到指挥部，冯钦哉既

惊喜又因为奖赏大洋的承诺感到为难。

但是，自二十二日起，日军对娘子关的攻击更加猛烈。包括教导团在内的中国守军各阵地都出现了肉搏战。第三十师的阵地被日军突破，该师一七八团被日军包围于北峪。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伤亡甚重，被迫阵地后移。李振西的教导团在阵地上死守不退，伤亡殆尽时才接到换防的命令。教导团的三千官兵都是学生兵，读过书的军人应该知道中国先人曾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诗句。教导团在娘子关战斗三天，活下来的官兵仅剩几百人。——“孙连仲派了一个营会同教导团副官主任陈纯仁，把我们阵亡的两千多官兵集中起来，在旧关关沟里埋了几个大冢。我含着满眶热泪，默祝将士们爱国精神永世昭明。”

中国官兵的血战并没有令娘子关战局得到缓解。

娘子关阵地仅正面就宽达一百七八十里，连续苦战已经伤亡惨重的中国守军无法全面固守，而阵地的每一个点被突破都会使全线防御岌岌可危。特别是日军右纵队突击娘子关正面时，左纵队急促地推进严重威胁着娘子关的侧背。在这个方向上，奉命增援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部拼死阻击。该师第三八六旅陈赓部的七七二团袭击了日军攻击部队的侧翼，令其行动速度明显地缓慢下来。接着，该旅又在石门口附近打了一场阻击战，歼灭日军两百余人。

整日苦于无兵增援娘子关的阎锡山，突然得知一支部队抵达了太原附近：中国陆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清一色的四川人——在总司令邓锡侯的率领下出川来与日本人打仗了。

卫立煌对阎锡山说，现在是必须舍家底的时候，把仓库里的装备和弹药全拿出来装备川军，让川军上晋东战场挡住娘子关的日军。阎锡山连声说：“好，好，好，咱马上发，马上发，把咱的老底全花出去，花光算啦！”

卢沟桥事变后，川军纷纷请缨杀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川军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七军合编成第二十二集团军，令其出川抗日。川军武器简陋，第四十一军没有骑兵和炮兵，除了步兵团各有一个迫击炮连外，全军没有一门野炮和山炮，一个旅也只有八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且无论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的，因为步枪没有刺刀，每个士兵另外配发一把大刀。中国

军界几乎都知道，川军是一身单衣两支枪，其中的一支是烟枪——吃鸦片在川军中很普遍。川军出川时，除个别部队乘坐闷罐列车外，绝大部分官兵是步行。他们沿着川陕道路行走上千余公里，翻山越岭走了五十多天才到山西。这时候，山西已经很冷了，可川军不但没有棉衣，脚上依旧穿着草鞋，人人冻得直打哆嗦。当他们接到前往娘子关的命令时，各级指挥官连一张地图都没有——“黄绍竑电令我们即刻出发还击西进之敌，至于敌从何来，番号是什么，兵力有多少，我旅有没有配合作战的部队，归谁指挥，都不清楚。”

王铭章，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他给官兵提出的道德原则是：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是否能够抵达这一道德高度需要实战检验，但川人生来就有吃苦斗狠的性格。刚上来的川军第四十一军第旅与西进日军迎头相撞的地方叫东回村。川军尚未部署完毕，日军的攻击已经开始。七二八团官兵用手榴弹阻击，手榴弹用光了就与日军肉搏。日军使用了毒气炸弹，七二八团阵地丢失。日军接着攻击南山主阵地，七二七团的机枪被日军炮火压制，官兵们卧倒在战壕里等着。日军的步兵逐渐接近，那一刻川军跳出来抡起大刀开始肉搏。七二七团一营二连连长邵先志被日军的刺刀戳穿了左手，他右手紧握大刀把那个鬼子的脑袋砍了下来。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一营伤亡殆尽时被迫退守第二线。——“敌人趁势向我第二线进攻，双方又是白刃混战，反复冲杀，到下午五时，南山仍在我手中。”

川军匆忙上阵，死守硬拼，既不见掩护又没有协同，部队伤亡惨重被迫向后转移时，又遭日军的拦腰截击，川军钻入山地里与日军周旋一整天才得以摆脱。——川军不知道，此时娘子关防线上的中国守军已开始全面撤退了。

第旅退到榆次以东的长凝镇时，才同军长见面。在长凝镇曾一度与敌接触，当晚宿营北田镇。这时候才知道，第四十一军各部，竟是成团甚至成营地被黄绍竑直接割裂指挥，逐次使用到平定县的西村和阳泉、测石、赛鱼、芹泉一带作战。部队建制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结果分批被敌各个击破……当师长王铭章到达前线时，第一二二师已经被打烂了；军长孙震到达前方时，第四十一军已经打得不成形了；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到达太原时，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兵力只剩下半数了。

勿怪黄绍竑，娘子关防御从始至终“处处显出薄弱，处处都是空隙”，因此也就处处都需援军。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进至娘子关与新关侧后的柏木井，中国守军正面防御部队因侧背受敌开始后撤。正在奋力阻敌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见前线危急，立即命令第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开设阵地准备迎敌。七七二团将阻击地点选在一个名叫七亘村的地方。这里是一个隘口，处于山西的平定县、昔阳县与河北的井陉县交界处，是一条险要的山沟通道。三天前，也是在这个隘口，七七一团曾遭遇日军一个联队和数百骑兵的袭击，伤亡了三十多人，毛泽东为此给朱德打电报，告诫八路军官兵需克服轻敌思想：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再次选择七亘村作战，刘伯承布置得格外谨慎。

二十六日拂晓，娘子关其他中国守军部队开始后撤时，日军朝着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设伏的阵地走来了。

日军先头部队接近营庄时，辎重部队正好行至我十二连伏击地前面。王副团长即令重机枪向日军射击，伏击部队随之向日军猛烈射击。刹那间，成群的手榴弹，密集的子弹，像从山崖上泻下来的瀑布般倾向敌群。正在行进中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死伤一大片。这时候，我十一连按照原定计划，迅速抢占了七亘村南大道两侧及该村西南的定盘山，将日军步兵和辎重兵部队拦腰切成两段。当日军先头步兵企图掉头增援辎重部队时，遭到我十一连的阻击；后面的掩护部队又被十二连击毙得横躺竖卧的马匹、骆驼及抛弃的军用物资挡住道路。被截击在中间的辎重部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骡马和骆驼受到惊吓，四处奔跑，畜撞畜、人撞人、人畜相撞，在狭窄的道路上自相践踏，尘土飞扬，血肉四溅。残存日军一窝蜂地朝东石门方向逃窜，刚跑到甲南峪，又遭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连一个排的猛烈袭击。这时，王副团长命令九、十连投入战斗。紧接着，我十一、十二连在副教导员尤太忠的带领下，一个个犹如下山猛虎，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冲在最前面的十二连战士杨绍清，面对向他包围过来的七个敌人毫无惧色，左刺右挑，愈战愈勇，一连刺死了六个、捅伤一个。还有一个战士在同敌人拼杀中，

身上五处受伤坚持不退，当他同一个日本军官搏斗时；已精疲力尽，但他急中生智，嗖地一下将手中的步枪向敌人掷去，在敌人一愣的瞬间，猛扑过去将其压倒在地，用牙咬掉敌人的鼻子，并趁敌痛不可忍之时将其击毙。

此战，八路军歼灭日军三百余人，缴获三百多匹骡马、骆驼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刘伯承决心“在七亘村一带再打一仗”！

第二天，日军后续部队上来了，在七亘村再次遭遇伏击，又付出了百余人的代价。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两战仅伤亡三十余人。

在缴获的物品中，最让刘伯承高兴的是数张中国印刷的山西军用地图——刘伯承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军用地图，阎锡山说他没有——在此之前，刘师长指挥作战用的地图来自一本中学地理课本。

八路军的作战无法挽救娘子关的整个战局。

二十六日，日军占领娘子关。

卫立煌致电蒋介石，告知阎锡山已经决定放弃忻口：

即刻到。南京委员长蒋。密。一、一周以来，晋东情形异常混乱。昨夜铁路正面我军已退寿阳附近，两翼情况不明。顷据铁路报告，我军昨夜、今晨已过寿阳西洛，各部余兵不多，太原极感恐慌。二、此间剧战将及一月，虽均获胜利，然后防在在堪虞，且兵员消耗过多，交通早陷停顿。奉司令长官阎谕，为确保太原计，不得已忍痛定今夜向太原以北青龙镇东西线既设阵地转移。谨闻。职卫立煌叩。

卫立煌的“忍痛”二字说得痛彻入骨：忻口战场苦战，近十万官兵付出了生命，原本希图顽强地作战不惜一切换来阻敌胜利，现在巨大的牺牲都将付之东流。

娘子关方向中国守军的溃败，令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焦急万分。他在电话里对孙连仲说，如果不在阳泉一带重新设防抵抗，日军就会直接冲进太原城，那样我们就要负历史责任！孙连仲打电话给第四十二军

军长冯安邦，说如果再撤退就枪毙你。冯安邦的回答是：“我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手上仅有一连，其余的部队都脱离了掌握。”一一孙连仲和冯安邦是亲家关系，能说出“枪毙”二字，可见局势已恶化到何种地步。

十一月三日，阎锡山在太原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太原城的防御问题。阎锡山的计划是：利用太原城四周的既设阵地，实施“依城野战”，以阻敌进攻，待后续部队到达再发动反攻聚歼敌人。具体部署是：以傅作义部担负太原城防任务；以卫立煌部担负太原东西两面的侧击任务；黄绍竑指挥从娘子关撤退下来的部队继续阻击西进的日军；以奉蒋介石命增援山西战场的汤恩伯部“向榆次附近推进”，与太原守卫部队形成对日军的包围夹击之势。

那么，由谁来指挥太原会战呢？

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阎锡山想让卫立煌担负这个任务“又不好明言”，于是等着卫立煌毛遂自荐。但是，卫立煌坐在那里，就是“一言不发”。“其他将领也大多低头不语”。最后时刻，“傅作义挺身而出”。——卫立煌沉默的理由是：无论是从忻口还是娘子关撤退下来的部队，损失严重，疲惫不堪，怎么可能“大溃退之后再匆匆进行另一场会战呢”？

接着，便是如何防守太原城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将领们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阎锡山制订的计划是用野战的方式于城外布防，可与会的大部分将领认为，让目前已经处在败退中的部队重新布设阻击阵地，最大的可能是，还没等他们进入阵地，日军就已压到了太原城下。况且，那些所谓的国防工事，几乎无需实地检验就可判定必是不堪一击。目前，唯一可行的是，集中兵力坚守城垣。阎锡山坚持他的计划。双方争论到凌晨，阎锡山告诉将领们作战计划已经布置给各部队的指挥官了。会议至此结束。

阎锡山委任傅作义为太原守备司令。他告诉傅作义：太原城中储备的“粮食弹药够半年之用”，期待傅作义能够“再显一下身手”。

阎锡山决定离开太原城，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

黄绍竑也准备离开，但太原城内已混乱到了连他这个战区副司令长官都找不到车的地步。于是，只有去找负责守城的傅作义。只是，黄绍

竑甚至不知傅作义的指挥部在哪里。副官周士杰怕迟了被封锁在城内，劝他赶快走。——“我带着十多个卫士摸到南门，幸城门还开着，这大概是因为阎锡山还有许多贵重东西没有运完，汽车仍在进进出出。”出城到了汾河桥上，这里已经乱成一团，车辆和人流壅塞在一起。黄绍竑充当起临时交通指挥，这才截住了一辆卡车。天亮以后，他到了交城县城，得知阎锡山竟然也到了这里。阎锡山走的时候并未告诉黄绍竑他去什么地方，两人完全是“无意中”遇到的。——中国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就这样在远离部队远离战场的小县城里意外地相逢了。

共产党人周恩来也参加了阎锡山的军事会议。周恩来不同意以多数兵力在太原城与日军决战，认为这样只能带来巨大伤亡，而太原最终还是要丢失。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背靠山地，以运动战方式与日军展开周旋。会议结束时，周恩来特别对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十一月五日夜，周恩来带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人员撤离太原城。

板垣征四郎得知中国守军开始撤退后，立即命令部队自忻口一线大举向南追击。日军推进得异常迅速，导致中国守军无法在预设阵地立足，不得不再次向后移动。同时，从娘子关方向撤下来的中国守军，绝大多数因遭遇日军截击无法靠近太原，只有继续向西南方向退去。卫立煌命令中国守军主力转移到交城、太谷一线，防止日军继续南下；同时命令孟宪吉的独立第八旅、郭宗汾的第七十一师和马延守的独立第七旅等部队进入太原城以厚守城兵力。但是，命令的下达已经晚了，除独立第八旅的一个营最终进入了太原城外，其余部队均被日军阻击在汾河西岸。

六日，忻口方向的日军从北面逼近太原城垣，娘子关方向的日军插入太原以南切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太原已成为一座被日军包围的孤城，孤城内傅作义的守军仅有第三十五军的九个营以及陈庆华的独立旅等部的十个营。

傅作义守太原，与其说是在指挥作战，不如说是承受身心煎熬。

明知守城也是死路一条的傅作义，还是把仅有的部队进行了部署，并封闭了太原城门。封城之前，傅作义将部队集合起来，然后他对官兵们说：留下来守城，等于躺在了棺材里，就等着把棺材盖盖上，各位就当自己已经死了，我们与太原城共存亡。

这天，日军的“几十架飞机循城墙一线，轮番以巨型炸弹进行轰炸”，太原“三丈六尺高的城墙，已经成了不满两丈的土坡坡”。接着，日军以飞机和火炮猛轰太原城，城内的建筑物纷纷坍塌，到处燃起冲天的大火，供电线路和通讯线路均被摧毁，全城的商店都被抢劫一空，到处是为非作歹的散兵游勇。更令人惊心的是，太原城内潜伏着大批日本特务和汉奸，他们到处开枪制造出更大的混乱，太原戒严司令部的警宪部队根本无法捕捉到这些特务汉奸，戒严官兵反而受到黑枪的射杀。

七日拂晓，日军对太原城发起攻击，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从坍塌的城墙处向城内猛冲。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激烈的拉锯战导致双方死伤严重。第二天，日军以更大规模发起全面进攻，直打得中国守军的阵地上弹片与血肉横飞。傅作义去前沿督战，守卫城角的代理连长告诉他：“从忻口会战到现在，我们连已经换了十二个连长，现在全连参加战斗的只剩下七个人了。”

残酷的守城战几近两昼夜时，太原守军的将领开始动摇。第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从傅作义的防空指挥部里出来，并没有回到指挥岗位，而是直奔向他的马：

马已备好，曾立即上马，向大南门驰去。戒严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勤杂人等也都闻风赶来。跑到大南门跟前，发现早经封闭的域门前，土囊沙袋层层堆积原封未动。曾令跟来的卫士随从们搬移沙袋。守城官兵知道他是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当然不敢拦阻。没想到，封城时惟怕不牢固，现在才发现土囊沙袋积累得太多，移动不便。结果卫士们费了老大力气，城门仅仅打开一个小缝。好在两扇城门稍稍向后移动了一些，门头上甩出一个较大的三角空隙。曾延毅舍掉坐骑，爬上沙袋，让力气大的几个卫士把他举上门顶，钻出城去。出城以后，狼狈地向南赶路，恰巧遇上四三五团受了重伤的连长张霁浦，骑着一匹瘦弱的劣马。曾向张连长把马要了过来，骑上这匹劣马往正南方而去……曾出城打的是第三十五军副军长的旗号。他这一折腾，看见他的人都说：副（与傅同音）军长出城走了。消息很快传遍了靠近南城的部队。戒严副司令马秉仁不甘落后，也立时乘着“李牧号”装甲车赶到大南门，利用炮兵掩体钻出城外，落荒逃命。于是“副司令出城走了”的消息，又不胫而走传进守城官兵的耳朵。由此辗转相传，以讹传讹，把“副军长”当成“傅军长”、“副司令”当了“傅司令”，因而军心开始动摇……十二时以后，除过北城东城与敌人对峙胶着的部队无暇他顾外，其他城上的守军逐渐稀少，有些地段已看不到部队的踪影了。

傅作义坐立不安，脸色铁青，但就是不说“撤退”二字

这一天的中午左右，防守东北城角的四三五团李登明营长和大部连长都已牺牲，战士也伤亡过半。敌人就从这个营的阵地前面，在坦克的掩护下，伴随步兵利用城墙缺口突入城内，其后续部队也蜂拥入城。董其武旅长得知情况后，立即率领预备队驰援，在小东门、小北门之间的大教场、坝陵桥一带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四三六团二营营长王建业受伤坚持指挥战斗。这个时候，上下级之间、比邻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已全被敌人炮火破坏，彼此隔断，形成了各自为战的混战状态。就这样一直坚持到黄昏后。

天黑了，傅作义接到了南京相机撤退的命令。

太原城南面的城门尚还完整，傅作义一到这里立刻被卷进了溃兵的人流中：

城门跟前，有一部分人正在挪动沙袋，预备开门，但满门洞的人越挤越紧，妨碍着他们的工作。停在门洞外面的，有装甲车、载重车、马匹、驮骡、骆驼；门洞里面，满地是土囊沙袋、踏烂的自行车、挤死的骆驼、死人等等，一绊就倒。有力的猛力向前，绊倒的被践踏在地。有人哭喊叫骂，有人开枪瞎打，简直乱成一锅粥。被踏死踏伤的很多，四三五团少校团副解致信，就是在这里被踏死的。宪兵排长张大个子，腹部被踏起碗大的伤痕，几乎丧了性命。经这一乱，总部的行列只有宪兵第十队队长刘如砺，紧紧地掌握着自己的部队（刘出城后带队抢过汾河桥时被敌人机枪射死），其余都五零四散，自寻出城门路……有从城门缝挤出来的，有从炮兵掩体钻出来的，有从重机枪射击孔爬出来的，还有用绳缒城出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傅作义出城之后，落了个只有特务连排长薛文一人跟随保护。

从守城到失城，太原在极度混乱中仅坚持了四天。

山西抗战，是中国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官兵牺牲最多、战绩也最显著的会战。

但是，太原的最终失守，使得华北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控制下，华北彻底沦陷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

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攻占太原的消息，不但令日军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的欲望更加强烈，也令日本政界和

军界相信中国臣服之日已为期不远。

日本人充分利用这一筹码，进一步对国民政府施压。

太原陷落一周后，十一月十五日，广田弘毅外相召见美国驻日本大使詹鲁，要求美国人转告蒋介石："战争再继续的时候，条件就更苛刻了。"德国人也趁势告诫蒋介石："不要不加考虑"就拒绝日方的条件，依目前局势看，中国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无法"将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

接着，一个令国民政府压力倍增的消息从东京传来：为了支持更大规模的战争，十一月十七日，日本战时大本营正式设立。

近代以来，日本军人——海军部和陆军部——始终对内阁干涉军事持抵制态度。一九〇八年，日军参谋本部条令规定："参谋本部掌管国防及用兵事项，参谋总长直属天皇，参画帷幄之军务，掌管国防及用兵计划"。"参谋总长与军令部长，得不经由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可径行上奏天皇"。这种连内阁总理都不得干涉军事，国家军事事务只由陆军的参谋总长和海军的军令部长负责的制度，被称之为"统帅权独立制度"。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日军参谋本部曾研究过是否成立大本营一事，但因是否宣战等问题尚未议决而被搁置。随着对中国发动的战争逐渐扩大，设立大本营的建议被内阁再次提出："大本营作为统一政略、战略机关，是指导战争的最高机关。它不仅仅是统帅机关，而是把大本营中军部大臣处理军政事项的范围扩大，并使之发挥促进军部内外的国务机关协调一致的作用。"然而，建议遭到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内阁干涉军事。但是，战事规模的演变与战场地域的扩大，确需一个确保政令与战令统一的军事大本营为统帅部。于是，海军方面首先松口，表示"如果中国仍旧再高呼抗日，坚持长期抵抗"，成立一个大本营"大概可以"。接着，陆军向海军作出说明，阐述成立大本营对持续战争是必要的，并明确战争事宜将完全由陆军和海军做主："收拾时局问题等主要政务固在政府，但应先在大本营由陆、海军当局对其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然后移交政府。"——把军人们的意见"移交政府"，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为军方办事的机构——于是，海军同意了。

日军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就设立大本营事宜联合上奏天皇得到批准。十一月十七日"军令第一号制定大本营令"下达：

第一条　在天皇旗之下，设最高统帅部，称之为大本营。大本营战时或事变之际，按其必需而设立之。

第二条　参谋总长及军令部长各为其幕僚之首长，运筹军务机密，策划作战，基于最终之目的，以图陆、海两军之策应与协同。

大本营的设立，使得日本军人进一步掌控了国家的决策权力。它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改变日本军国主义者武力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决心与意志。

日本方面还是没能得到蒋介石臣服的任何表示。

因此，华中方面军被要求“以其航空部队与海军航空兵力协同，轰炸南京及其要地，并不断表现出进击的气势”，同时“整顿好该方面军新的准备态势，使其攻击南京或其他地区”。——日本政界与军界在此达成一个共识：只要从各个方面不断武力威逼南京，中国政府总有彻底支撑不住的那一刻。

在华北战场上，停止在德州—石家庄一线的日军开始向南推进。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在平汉路东侧追上了万福麟部的第五十三军，将其击溃；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沿平汉路西侧南下，在石家庄以南的元氏附近与中国军队商震部的第三十二军接战，两天后攻克元氏，接着向南占领了邢台。中国军队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为掩护中国军队各部后撤，沿平汉路东侧迎着日军而上，与谷寿夫的第六师团激战两天后，两军对峙于漳河两岸。十月十九日，日军炮兵猛烈轰击漳河南岸，日军步兵化装成中国农民混在难民里偷渡漳河，日军骑兵也发动了强渡，战至二十日上午，漳河南岸中国守军阵地相继失陷。前来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指挥两个师向日军发动反击，两军在漳河南岸滩头逐渐进入白刃混战状态，第五十二军伤亡士兵达三千以上，日军也伤亡惨重，双方再次形成对峙。由于西面娘子关吃紧，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奉命入晋。华北战场上平原地势本身就无险可守，平汉路上的中国守军又逐渐兵力单薄，以至于日军长驱直下越过邢台、邯郸，向冀豫交界处的安阳大举进攻。固守安阳的中国军队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师连日苦战，官兵伤亡殆尽后，安阳陷落。

日军在华北已经纵贯河北直抵河南在华北的西面，日军攻占了太原。

而在中国的南方，日军占领上海后正向南京逼进。

国民政府承受着难以撑持的军事压力。

然而，一直等着中国屈服的日本人，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中国政府决定迁都。

中国国民政府把首都从南京迁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文告：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蒋介石同时给全国所有部队的军事将领发去了通电：

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总司令、各军团长、各军长、师、旅长钧鉴：

密。国民政府为适应战略、统筹全局起见，业于号日（二十日）移驻重庆，公布宣言，谅已周悉。此项措施，在使中央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贯彻我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之妄想与狡谋。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进行。首脑既臻安固，则手足百体，更能发挥充分之效用；后方展及全国，则军事筹济，更有永久确实之根据。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敌人狡恶之企图，已失作用。倾兵深入，其困难必愈甚，而我方主动之地位亦愈强。我前

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遵有计划有步骤之策略，作更坚决更勇敢之奋斗。中正必与我全体将士，共安危、同生死，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而策光荣之胜利。其各辗转晓谕，一致奋勉，有厚望焉。中正。

面对日本强大的武力侵略，面对日本“狡恶”的政治威胁，除了抱着“破釜沉舟之决心”誓以血肉“撑持”国家的“寸地尺土”之外，蒋介石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选择。

布鲁塞尔会议终因开不下去宣布休会了——国联这个国际组织以后再也没有开过会，从此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因为会议不但没有形成对日本制裁的任何决议，国民政府的代表甚至没能说服各国“把日本定为侵略国”。

十二月一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突然出现了某些变化——或许是已经获悉再也无法指望布鲁塞尔国际会议，或许是同时获悉了日军决定攻击南京的情报。十二月二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是否存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可能性。由于此前与日本方面通过“第三者”进行的沟通高度保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第一次听到了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出乎蒋介石预料，徐永昌、顾祝同等人认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谈一谈，而白崇禧说得更直白：“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最后，蒋介石的态度是：既然认为日本人开列的条件并不是亡国的条件，那么让德国作为中间人的谈判可以继续。只是，华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定要保证，“开发经济及供给资源可以作相当的让步”；如果日本不能放弃驻兵权，那么只能按照之前《辛丑条约》“规定的区域执行”；另外，“上海恢复八月十三日以前的原状”。当天傍晚，蒋介石再次会见陶德曼，转达了上述立场。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日本人突然改变了态度。当德国人把中国的立场转告日本方面后，广田弘毅外相十分诡秘地说：“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军事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将在征求军部意见并进行研究后给以答复。”

“最近取得伟大军事胜利”，显然指的是攻占南京。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了——尽管国民政府已经宣布迁都，但无论如何南京仍是中国的首都——国都被敌国军队攻击甚至占领，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严重事件，对于被侵略的国家来讲更是一场空前深重的灾难。

南京，中国最具温情色彩的城市。自战国时期的楚国设金陵邑后，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均建都于此，素有十朝古都之称。蒙蒙烟雨中，巍峨的城墙，华美的宫殿，葱茏叠翠的紫金山，秦淮河边亭台之上传出的琵琶套曲，还有遍布在街衢市井中的吴侬软语——这座“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的千年古都，处处弥漫着一种安然与奢靡相互交映的情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国首都南京即将面对战争的残酷蹂躏。

从政治伦理上讲，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死守南京。南京城地处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弯道内侧，东边是紫金山，北边和西边是长江，南部是开阔地带，如此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南京的城池防御自古以来便是个难题：“南据溧阳，东捣镇江，西扼太平（当涂），据险阻，断粮运，不战而下金陵。”中国历代军事论述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外围的几处要点，背靠长江弯道的南京城因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便会唾手可得。——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

一九三二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南京防御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军方认为，一旦日军占据上海，必会沿着京沪铁路和长江水路进攻南京。为此，中国军方成立了南京城塞组，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上海至南京间修筑了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修整了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和江宁等地的要塞，还在南京地区构筑了内外两道防御阵地：沿着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至乌龙山要塞为外围阵地；沿着城墙以雨花台、孝陵卫、紫金山至幕府山要塞为城郭阵地。同时，在城内东面的北极阁、西面的清凉山等高地修筑了核心据点。但是，即便如此，南京城防依旧危机四伏。首先是吴福线和锡澄线的修筑质量很差，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中国军队，根本没能在这两条防线上站住脚，所谓的国防工事很快就被日军毫不费力地突破了。其次，紧急之中制订的南京防御计划仍然停留在纸上：城郭阵地还是残破不全的老样子，预定防守南京的部队大部分尚未抵达——他们不是被各地截留便是被调到上海战场去了。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后，国民政府感到南京城的危机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连续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城防问题。

首先是守还是不守的问题。

李宗仁的意见很明确：南京不可守。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路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白崇禧"极同意"李宗仁的意见。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的意见是"象征性的防守"。他认为对日作战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那么"即使他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非垮不可"。目前，日军正沿长江水道、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同时并进，一旦南京身后的长江江面被封锁，芜湖方向的退路被截断，南京就将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处于日军的"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但是，南京又是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所以，可作"适当抵抗之后就该主动地撤退。对于兵力使用上，以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

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前敌总指挥陈诚认为"南京孤立，无现代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他对蒋介石陈明的意见是："敌人在战术上虽获胜利，但在战略上实已失败。现在我军应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以贯彻我持久抗战之目的。"

只有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主张死守。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

于是，蒋介石的意见是："南京是应该守一下的。"

接着便是谁来守的问题。

多数史料认为，后来出任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的唐生智是"自告奋勇"，甚至认为官场一直不得志的唐生智想借此一战翻身——"唐生智那

次重要会议上精神状态不大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又蹲上去。”

唐生智此时患有严重的胃病，他自己对“谁来守”的记述是：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做声。他说：“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第二天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唐本友官至大清广西提督，父唐承绪也曾任湖南省府实业司司长。唐生智十六岁入湖南陆军小学，二十五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他崇信佛教，人称“佛教将军”，他的部队官兵一律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胸章，实行“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的“五戒”。北伐战争时，以他的湘军第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曾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由于政见不合，他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曾两次兴兵讨蒋，导致两度被迫下野。“九一八”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和训练总监部总监。

毫无疑问，唐生智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抗日将领。同时，他也是主张长期抗战战略的将领之一。没有任何史据表明，他承担防守南京的军事指挥任务是逞匹夫之勇，更没有史据表明他有以此谋求私利的企图——孤军守城，九死一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面对绝境，位高权重之人求生者比比皆是，求死者凤毛麟角。有史据表明，与唐生智一起在南京城内的，还有他的全家老小。

南京防御会议与会者之一白崇禧晚年回忆道：“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负防守与城共存亡。”

只是，无论是白崇禧，还是与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副部长王俊都不免为唐生智担忧：“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撤退的沿途，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对南京至少进行两个月的短期防守计划。为此，特成立第七战区，以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改任战区司令长官，原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武汉。同时命令刘湘指挥第二十一军团和第二十三军团东进，协同第三战区支援南京作战。蒋介石给第三、第七战区以及南京卫戍军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第七战区除固守现地外，其左翼须以有力部队留置于安吉、孝丰山地，相机攻击敌侧背，迟滞其前进”；第三战区“须以有力部队分别留置于龙潭以南、广德以北各山地，迟滞敌之前进”，破坏重要交通线，“掩护主力之行动”；各战区须与南京卫戍军相策应，“对敌作战保持动作之自由，其损失过大的部队，应酌令其撤退于宁国、芜湖以西地区，积极补充待命”；南京卫戍军“除固守南京既设阵地外，应与第三战区部队密切协同相互策应，击破敌之围攻军”。

蒋介石的部署粗糙笼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南京卫戍军的作战部队仅有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三个团的宪兵部队，且都是刚刚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亟待休整补充。严重的兵力不足，导致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线根本无兵可守，现有兵力仅能部署城郭阵地而已：

一、以第八十八师任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

二、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

三、以第三十六师任江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

四、以宪兵部队任城西清凉山附近之守备。

五、以教导总队之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

或许是以如此单薄的兵力防御首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说不过去，蒋介石开始截留或调动其他部队赶赴南京，先后调入了第三战区的九个师和第七战区的两个师。以上部队陆续抵达南京后，形成了南京保卫战的基本战斗序列：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

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辖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第四十八师，师长徐继武。

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师长谭邃；第一六〇师，师长叶肇（兼）。

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辖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

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辖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兼）。

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辖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

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辖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兼）。

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辖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第一五六师，师长李江。

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辖第一〇三师，师长何知重；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

宪兵部队（三个团），宪兵副司令萧山令。

江宁要塞部队，要塞司令邵百昌。辖炮兵第八团之一营，防空司令部所属高射炮队，城防通信营，本部特务队。

以上序列，虽然有七个军以上的番号，但总兵力仅十五个师，约十万余人。

得到兵力补充后，唐生智恢复了南京面向淞沪方向的外围防御阵地。其部署为：第七十二军派出一部至南京南面的江宁镇附近，“任右翼掩护”；第七十四军位于江宁镇以东，“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之守备”，并向秦淮河以南的“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东面的句容附近“派有力之前进部队”；第八十三军“任凤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南京东北方向的龙潭之守备，并向龙潭以东的下蜀派出前进部队。

接着，徐源泉的第十军抵达，第八十三军被前推至镇江和丹阳附近；第七十一军抵达后，被加强给镇江要塞方向。

十一月二十七日，唐生智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讲话：“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付出莫大之代价。”为了表示背水一战之决心，唐生智要求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把唯一能够从南京出逃的长江边的下关码头到对岸浦口码头的轮渡以及各类船只全部撤走，并通知驻防江对岸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和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中国首都南京寂静地等待着战火的降临。

日军攻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由两路作战部队组成：松井石根指挥的上海派遣军，辖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师团、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和天谷直次郎的第十旅团；柳川平助指挥的第十军，辖谷寿夫的第六师团、牛岛贞雄的第十八师团、末松茂治的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崎登的第九旅团。

担任沿长江南岸推进的上海派遣军的部署是：第十六师团沿句容——汤水镇——南京公路；第九师团沿天王寺——淳化——南京公路推进。由第十旅团的一个重炮兵大队、一个迫击炮大队和后备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组成天谷支队，沿常州——丹阳——镇江公路向镇江方向推进。担任南京正面攻击和向南迂回的第十军的部署是：第一一四师团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推进；第六师团沿长兴——广德——洪兰埠公路推进；第十八师团沿广德——十字铺——郎溪——洪兰埠——太平公路推进，国崎支队则从太平方向渡过长江向浦口推进，切断中国南京守军的退路。

显然，日军明确地了解南京的战场地理：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南京实施战役包围；而在北面，只要控制了长江江面和对岸的浦口，中国守军将没有任何进行战场回旋乃至战场撤离的可能。

中国守军在南京周边的紧急布防形同虚设。日军自十二月三日开始正式攻击，四天后即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阻击，从三面同时推进到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线前。南京卫戍军长官部命令第三十六师派一个团前往麒麟门附近阻止日军继续深入；命令将镇江附近的第七十一师和第八十三军紧急回调南京，第四十一师推进到龙潭、乌鸦山附近掩护第七十一军

和第八十三军的移动；命令镇江防御由第一〇三师师长戴之奇负责。——中国守军放弃运动防御而单纯守城的调动，令人忧虑：日军几天之内便兵临城下，中国守军没能拼死作战，只有迅速收缩外围防线而退守城郭。那么，是否就有把握在被敌人紧紧包围的孤城里，据城持久死守？

日军推进到南京外围防御线时，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心神不宁。为躲避日军飞机对南京城昼夜不停的轰炸，蒋介石转移到了清凉山中有防空洞的一座别墅里。他特地出来到南京的各个城门转了一圈，然后布置卫队去下关码头把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两艘兵舰看好——蒋介石的目的是让守城官兵看见他的兵舰还在，说明他依旧在南京城与他们同生共死。他还给全国各地的高级将领又发去一封电报，表述了国民政府决心死守南京的意图，说只要再坚守一个月，“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但同时，蒋介石也通告说，他就要离开南京城了：

徐州李司令长官、济南韩副司令长官、新乡程司令长官、林参谋长、汾阳阎司令长官、卫总司令、开封刘主任、商主席、西安蒋主任、兰州朱副司令长官、贺主席：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中拟暂移南昌，军委会迁衡阳。特闻。蒋中正。

蒋介石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指的是什么？

抑或此时他依旧对德国人的调停抱有幻想？

十二月七日凌晨，南京警备部队开始对城内的军火库、飞机库、汽油库以及军事要点实施有计划的破坏焚毁。

蒋介石走出了他的官邸大门：

委员长率钱主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及侍从室部分人员，连同送行者，分乘十数辆小轿车，从黄埔路官邸出发，路上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这时正值秋冬之交，梧桐树叶铺满街道。车队出中山门，没有直趋中山陵，而是绕经陵园新村、灵芥寺，车行甚缓。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有几十幢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此时都已人去楼空。绿树掩映下的“美龄宫”亦显凄清。我们瞥见委员长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早晨五点四十五分，蒋介石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在明故宫机场起

飞，经湖南衡山转武汉飞往江西庐山。

蒋介石走了。

南京城交给了唐生智和他指挥的十万守军。

这一天，日军华中方面军发布《攻占南京城要领》：

一、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选派步兵一个大队（九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

二、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

除上述部队以外的主力，在城外适当地点集结。

三、严格遵守指定城内扫荡战的作战区域，防止友军互相射击，并应明确宣布对于不法行为追究责任。

四、城内两军作战地区境界：

共和门—公园路—中正街—汉中路。

五、各军负责的城门：

派遣军：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

第十军：共和门、中华门、水西门。

六、进入南京城后的措施：

（一）各兵团担任指定地区的警备，主力在城外适当地点集结。

（二）入城式、联合追悼会、防空部队的推进，南京警备部队的部署等事项（略）。

清晨，日军在炮兵和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下，向南京城第一道防御阵地展开猛烈攻击。南京卫戍军长官部立即制订了一个调集部队出击的计划：从镇江回防的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十军之第四十一师，联

合向突入南京东面汤山附近的日军进行三面合击。但是，中国军队的行动速度太慢，日军的后续部队已经从突破口投入作战，第六十六军的汤山阵地和第四十一师的栖霞山阵地遭到猛烈攻击，三面合击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卫戍军长官部只能命令第三十六师预备二团在东流附近阻击攻占复兴桥的日军。配备有七辆轻型战车的预备二团连续发动攻击，一度攻占马基山，但随之就受到日军增援部队的猛烈反扑，马基山阵地再次失守，该团陷入日军的包围。——“所部究属新编，连排长指挥能力薄弱，意志极不统一，士兵亦无训练，类多束手待毙。其二营大部遂被敌完全歼灭，其余众亦完全溃散，营长朱丹负伤，一营、三营共伤亡连排长以下百余名。”

八日，各路日军继续收紧对南京的合围。东面，沿长江西进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二十六旅团击溃了当面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占领靖江；天谷支队昼夜急进，在第二十六旅团前面攻入了镇江。西南面，国崎支队从长兴向西，连续突破中国守军于郎溪和水阳布设的防线，一直推进到长江岸边的当涂附近；第十八师团攻占宣城后，向南京侧后的芜湖迅速推进；谷寿夫的第六师团绕行南京西南路程最远，但经过强行军也赶到了南京南面的秣陵镇附近，并于第一一四师团的左翼加入到对南京城的攻击。

在南京东南方向的淳化镇阵地，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打得很苦。第七十四军是中央军嫡系部队，所辖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冯圣法的第五十八师都属中国陆军精锐部队。王耀武是条山东汉子，以打硬仗和攻坚战闻名，他与日军打的是硬碰硬的对攻战，官兵猛打猛冲，迫使当面日军不得不数次增援。在持续三个昼夜的战斗中，该师排以下官兵伤亡达一千四百多人。第五十八师是在国民政府警卫旅的基础上改编的，部队装备好，甚至有当时中国陆军其他部队少见的德式反坦克炮。师长冯圣法为黄埔一期和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毕业生，曾当过蒋介石的警卫团参谋长。冯师长一身簇新戎装端坐在师指挥部，声称如果他被打死，日军会向他的遗体敬礼，因为他要让日军认识一下中国有个死战死拼的陆军师长。第五十八师顽强坚守阵地，“虽遇锐众之敌，而能固守不拔”，击毁日军五辆坦克，打死日军官兵三百多名。

但是，一处局部的坚持挽救不了全局。

鉴于日军全面逼近南京城，卫戍军长官部命令中国守军全部退守城郭阵地：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

第七十四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

第八十八师固守雨花台。

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铁路北）之线，右与第八十八师及第五十一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

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

第二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

第三十六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

第六十六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

第八十三军之第一五六师及第三十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

在镇江之第一〇三师、第一一二师向南京急进。

日军完成了对南京城郭的严密包围，迫使中国守军的防御线缩成一团。从战机上看，这是中国十万守军免遭覆灭厄运的最后时机——如果中国军队迅速改变死守战术，能够倾尽全力有步骤地突围而出的话。可是，中国守军没有任何突围的迹象，他们只是一再压缩防线，密集分布在南京四周的城墙附近。

九日拂晓，日军第十六师团进至麒麟门和沧波门，第九师团进至光华门附近并占领了大校场和通光营房，第一一四师团进至雨花台的南侧，第六师团进至雨花台的西侧。日军飞机向南京城里投撒了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劝降书”：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唯江宁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犹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交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以下办法处置。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

对本劝告的答复，当于十二月十日正午交至中山路句容道上的步哨线。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者时，本司令官亦准备派代表在该处与贵方签订有关南京城接收问题的必要协定。如果在上述指定时间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不得已将开始对南京城的进攻。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立即下达了一道命令，严厉禁止各部队擅自渡江逃离南京城，以为对日军劝降书的答复：

一、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二、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唐生智誓死不降。

从东京来到南京前线的新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在听取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关于日军“已攻破了南京城周围所有的环形防线，约有三十万的中国军队就要被围”的报告后，立即签署了“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据此，攻入南京城的日军各部，对已放下武器、失去战斗能力的士兵乃至无辜平民实施了大屠杀。

十日，日军从南京城的南面一直到东面，向中国守军中华门、雨花台、光华门、紫金山等要点发起全面进攻。战斗最为激烈处集中在东南面的中华门和光华门。日军第九师团在坦克和炮火的支援下，猛攻光华门城门，致使城门两侧的城墙被轰开两个缺口。一股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二五九旅的阵地；另一股日军突入光华门城门纵深百余米，占据了两侧的房屋作为据点，企图掩护后续部队拥入。卫戍军长官部急令宪兵教导二团预备队增援光华门，同时命令第八十七师进行反击。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中央军嫡系部队，刚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卫戍军长官部的命令是：把突入城里的日军消灭，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和第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商定，由易旅长率领一个加强团，由通济门外向东北方向实施攻击；陈旅长率两个加强营由清凉巷、天堂村协同攻击，兵分两路夹击光华门里的日军。战斗持续了八个多小时，守军官兵不但将突入城里的日军击退，

还收复了工兵学校阵地。反击作战中，第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第二六一旅参谋主任倪国鼎阵亡。

十日晚上，日军第十八师团占领了南京侧后重要的外围支撑点芜湖。在南京城垣防线上，雨花台方向的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受到日军两个师团的联合攻击，其阵地全被摧毁，残部退守二线。在南京东面的孟塘方向，中国守军第四十一师被日军击垮，被迫向城内撤退。卫戍军长官部索性把第六十六军也调入城内，准备开始巷战。在光华门和通济门方向，为了堵住缺口，第八十三军第一五六师被调了过来。中国守军突然发现，光华门封闭的门洞内竟然藏有少量日军，正等着新一轮攻击发起时里应外合。如果不把这股日军从门洞里挖出来，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任务交给了第一五六师和教导总队。教导总队的谢承瑞团长建议往城门洞里倒汽油，把日军烧死在里面。于是官兵们把多桶汽油背上了城墙，然后从门洞上方向下倾倒点火。同时，第一五六师组织的敢死队从城墙上缒绳而下，向门洞里四处逃散的日军猛冲猛杀。把门洞里的这股日军歼灭后，第一五六师官兵乘胜向通光营房追击，试图扩大战果，但在日军强大的火力面前伤亡极大，冲在最前面的敢死队员无一生还。

十一日，激烈战斗在紫金山第二峰、陵园新村至西山一带展开。中国守军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堪称中央军的精英部队，平时很少用于战场，现在只有毫不吝惜地把他们摆在第一线。总队官兵的营房在孝陵卫，平时的训练就在这一带，因此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主阵地工事也修筑得十分坚固，以致数日来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日军得知防守紫金山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后，加大了飞机和火炮的轰击，甚至使用了毒气弹，步兵更是一波又一波地轮番发动冲击。在植被茂盛的紫金山山峰上，双方官兵扭打在一起。教导总队坚守之顽强令日军大为意外，他们认为这里的中国军人的勇猛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最终双方都陷入了一种生命已经无关紧要的疯狂状态。在中华门方向，雨花台阵地左翼被日军攻占，城门外的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在猛烈的炮击下几乎无法立足，被迫向城内撤退，而日军竟然跟随着撤退的中国守军追进了城。卫戍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自到一线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巷战，最终把突入中华门的三百多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阵地获得暂时稳定。在南京城垣的西面，日军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由于雨花台左翼阵地的丢失，侧背受敌的第五十一师被迫退到了水西门里面。

这一天，日军国崎支队于当涂附近渡过长江，之后急促地向浦口运动，中国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眼看就要被截断了。

南京外围主阵地两天之内丢失殆尽，城郭阵地每一处都形势危急，而日军国崎支队的渡江更令十万南京守军命悬一线。十一日中午，由于意识到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可能，蒋介石开始考虑放弃南京的问题。他给长江北岸的顾祝同打电话说出了他的担忧，顾祝同当即给唐生智打电话："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唐生智虽被恶化的战局弄得焦头烂额，但他依然清醒自己的职责，认为死守南京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他先走了今后难以负责。唐生智要求必须见到蒋介石的正式命令才行。晚上，蒋介石的电报来了："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十二日拂晓，日军对南京城郭所有阵地发动了空前猛烈的攻击。

在水西门方向，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死守城墙，当日军突破城墙冲进来时，官兵们只有以血战到死的勇气发动反击。三营营长胡豪率领一百名敢死队员向突破口冲去，与突入的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胡营长和团附刘历滋当即阵亡。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三旅的阵地也出现了危机，因为相邻的阵地上已无人防守，日军从那里爬了上来。旅长李天霞奉师长命令实施反击，但反击数次均未得手——"战至午后五时许，因官兵伤亡过大，该旅所守阵地岌岌可危，水西门内外房屋均被日军炮火打毁，数处起火，烟火弥漫，死尸纵横，状甚惨烈。"

在雨花台方向，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第旅连同工兵营在内全部上了前沿，日军一次又一次地冲上山顶，一次又一次地被守军反击下去。师长孙元良对官兵们说："敌人不是打不死的！"在雨花台阵地四周，日军付出了伤亡千人以上的代价，致使雨花台前双方的尸体叠摞在一起，鲜血汇成涓涓小溪。第八十八师内无粮弹，外无援兵，日军步兵在重炮、飞机和坦克掩护下浪潮般地发起攻击，最终第八十八师伤亡殆尽，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韩宪元、华品章，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等人先后阵亡或自杀，连排以下官兵阵亡竟达六千人以上。上午十时，雨花台阵地陷落。第八十八师残部退守中华门，在残破的城墙上继续阻击。师长孙元良率领直属队向下关方向撤退，但被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阻止，第三十六师必须执行唐生智的命令：擅自向江北撤格杀勿论。孙师长只有带着残部退回中华门，此时的中华门已被日军封死。因为再也无法退入城内，孙师长只能带领官兵在日军的火力下沿护城河绕向城北，一路再次出现巨大伤亡。

下午，中华门西面的城墙数处倒塌，日军蜂拥而入。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从中华门撤走后，中华门内的南京市民也纷纷向城北逃去，以至

于南京城内秩序大乱。那些残剩在城内的成百上千的守军官兵，因为身边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只能向着日军蜂拥而入的地方“自发地迎上去，用自己的身躯阻遏敌人的长驱直入”。

但是，一切牺牲都已无济于事。

背靠长江的南京城，所有的城门都已被攻破。

卫戍军司令部必须制止混乱，唐生智命令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负责维持城中以及下关码头的秩序：“一、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唯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麇集，以确保要点。二、第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门与城内联络，禁止该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三、着该师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立即施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

黄昏，唐生智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他首先问询将领们是否还能坚守，没有一人应声。于是，他将蒋介石“可相机撤退”的电报给大家看了，然后分发已经制订好的突围命令和计划。面对默不作声的将领们，唐生智最后的表态是：“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终止，而是在南京以外地区无限地蔓延。请大家记住今日之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帅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突围令：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埠（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又芜湖有我第七十六师，其南石婋镇有我第六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间、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即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通信兵团除配属各部队者应随所配部队行动外，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讯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讯网应协同地方通讯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人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四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

一、第七十四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围，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军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以右地区突围，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教导总队，第六十六军，第一〇三、第一一二师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突围。教导部队向昌化附近集结，第六十六军向休宁附近集结，第一〇三、第一一二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第八十三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东北地区突围，向歙县附近集结。

以上各部队突击时机为十二日晚十一时后开始。但第八十三军突击时间为十三日晨六时。

五、第十军部队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掩护封锁线，于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第三十六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另有渡江计划表），先向花旗营、乌衣附近集结。第三十六师需掩护各部队渡江后撤离。

当时南京的东、南、西三面都已被日军封锁，只有北面靠着长江弯道的下关码头日军尚未抵达。于是，下关码头便成为南京守军北渡长江相对安全的唯一突围通道。由于不可能所有部队全都拥向一个码头。因

此按照突围计划，除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宪兵部队、直属部队和负责掩护的第十军被命令于下关码头北渡长江外，其余部队基本上是向南京的东、南、西三个方向正面突围。

接下来，唐生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被认为是导致南京守军溃散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下达了一个突围计划上没有的口头命令，允许第七十四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以及教导总队北渡长江突围。

被允许渡江撤退的都是中央军嫡系部队。

这一命令，给其他部队不按计划各自突围提供了借口。

南京守军的混乱由此不可逆转。

十二日晚，唐生智命令卫士们把他的唐公馆焚毁，然后带领随从前往下关码头，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一艘机动船，直接驶向了江北岸的浦口。上岸后，本想去滁州，得到日军正在包围而来的情报后，改向扬州。卫士们找来一辆百姓的板车，板车上满是牛粪，唐生智坐在上面心绪纷乱，想及自己带兵二十年，经历过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此时，再度遥望南京方向，只见“火光烛天，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得如同白昼，日机数架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吼叫着”。

南京守军各部队获悉撤退命令后，没有协同没有掩护甚至没有任何部署，所有的人立即放弃阵地开始撤逃。特别是绝大多数将领根本没有落实突围计划，有些甚至在接到撤退命令前就已离开了部队。更严重的是，那些负有固守阵地掩护撤退任务的部队，无一执行命令。卫戍军长官部之所以命令第十军固守乌龙山要塞，是因为乌龙山要塞俯瞰下关码头，一旦乌龙山阵地丢失，日军不但可以用炮火直接封锁下关码头及其长江江面，而且随时有居高临下直冲过来的可能。但是，布置撤退的会议刚刚结束，第十军便立即放弃了所有阵地。在军长徐源泉的带领下，第四十一师和第四十八师残部，从长江边上的周家沙和黄泥荡两处，登上了预先准备好的民船北渡长江，然后经安徽去了江西。——这支担负掩护南京守军撤退任务的部队，竟然成为南京守军中最早撤出的部队。

唯一按照计划突围的部队，是第八十三军和第六十六军。这是两支粤军部队。叶肇军长和邓龙光军长决定不遵从唐生智的命令。命令要求

第八十三军掩护其他部队突围，现在两个军长商量后决定，部队统一由叶肇军长指挥，集中在一起由太平门突围出去，目标是安徽的宁国方向。两个军的四个师中，除第一五六师没有接到命令外，其他三个师集中在一起开始往外冲。——“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将军的怒骂，汽车的喇叭，均失作用；只得弃车乘马，但马也无回旋余地，又迫而弃马步行……只见失去节制的队伍蜂拥向太平门方向移动，秩序大乱。”在太平门城门前，“由于互相拥挤，造成互相践踏，弱者倒地，强者即踏其身而过。据随后出城的人说，有一个被人践踏呼天不应的难友，愤而拉开手榴弹，造成同归于尽尸塞城门的惨剧。第八十三军和第六十六军的三个师冲出太平门后，在岔路口、仙鹤门、东流等地遭遇日军阻击，官兵们不顾一切地奋力冲击，十三日天亮时抵达汤山附近，又遭遇日军第十六师团的猛烈阻击，在极度的混乱中部队失去控制，分散成了各自为战的若干小股。两位军长都与部队走散，只好换上便衣仓皇奔逃。叶肇军长遇上了日军，不得已混在难民中，谁知日军士兵偏偏看中了他，强行让他挑担子。“于是，一个日军上等兵的行李就落到了叶肇军长的肩上。叶肇生平未尝挑担之苦，忽然压上几十斤的东西，确实难以走动。日本兵看他胡须长长，不能胜任，只好另找壮者代替，他才得以解脱。”

叶肇军长和他的绝大多数官兵终究是幸运的，因为此时滞留在南京城里的中国守军已经陷入绝境。

由于下关码头是唯一可以逃生的地点，同时南京守军也误认为既然部署从那里撤退，那里必有大量的船只在等着他们。于是，无论是否应该从下关北渡长江的部队，都一齐沿着中山路向下关码头蜂拥而去。他们必须通过挹江门。挹江门有三个门洞，左右两个均被堵塞，只有中间一个可以通过。部队蜂拥而至，争抢通过，互不相让，各路作战部队与维持秩序的第三十六师发生冲突几乎火并。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谢承瑞团长，曾勇敢地率领官兵歼灭了光华门门洞里的日军——竟然在成千上万官兵的拥挤中被踩死了。

出挹江门，便能看见长江了。

那是一条能够起死回生的分界线。

人是成千上万，渡船却只有两三只。长江此时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一只船刚靠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失的坠入江里，也没有人理会，几百只手紧紧拖住渡船的船缘。船上的人们怒骂着站在岸边不让他们开驶的人群，有的向天空鸣枪。水手经过一番好言劝说，竭力把船

撑动。可怜！有好多人，还是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跌在水里随着水流向东方……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的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

之前，为防止部队私自撤退，南京卫戍军长官部命令所有的船只必须上缴，上缴的船要么被运到对岸的浦口了，要么被开往长江中游的汉口了。此刻，唐生智的破釜沉舟令南京守军无以逃生。那些无船可乘的官兵，或是抱着门板、木桶，或是临时制作木筏向对岸划去，有的干脆跳入江中游水。——“此时敌舰已在江面上横冲直撞，来往梭巡不已，并用机枪不断地对我利用各种漂浮器材顺流而下的官兵扫射”，“被打死或被敌舰撞翻漂浮工具而淹死的人无法计数”。而大量的南京守军，还是被滞留在下关码头附近的长江边，他们因此成为追击而来的日军的俘虏。有的找不到自己部队的士兵脱下军装，神情恍惚地在南京街头徘徊，有的向难民收容所上交了武器。

“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南京沦陷的第二天——逃亡中的唐生智宣布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部撤销。

南京保卫战至此结束。

傅作义守太原守了四天，唐生智守南京也守了四天。

可是，南京不是太原，中国首都的迅速陷落令世界为之震惊。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历经淞沪会战蒙受重大损失，在没有得到补充休整的情况下接着进行南京保卫作战，这向全世界再次表明了中国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只是，对于一场战役来讲，无论攻守都要达到政治和军事的双重目的，而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两者均未达成。政治上，南京的过早失守，在世界舆论中对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形象影响甚大。军事上，中国统帅部虽然从战略上意识到了持久作战的正确，但在战场上执行的却是单纯防御的战术，没有达到严重消耗日军的目的而自己的损耗却巨大。在作战指导上，指挥紊乱，计划不周，准备不足，没有防御纵深，没有立体协同，缺乏应变能力以及作战指挥屡犯错误，撤退变为溃逃等等事实，已成不争。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接

到南京陷落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种的五亿民众的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妄而悲哀。”那些攻入南京城的日军，与他们在东京的首相一样，认为不但中国军人，包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劣等人。

日军“拒绝对中国使用国际法”。

日军对南京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以及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的施虐与屠杀，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凶暴、最野蛮、最残忍的事件之一，其永不可恕的反人类罪行令全世界闻之发指。

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十二月十三日日记：

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其中有从镇江两要塞逃过来的人。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以收拾的程度，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对一千、五千、一万之众，解除全部武器很困难。唯一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为稳妥。这帮人一旦闹事，将难以收拾。据知：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一万五千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处理掉一千三百人。现集中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至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处理掉这七千至八千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先把他们分成一百人、两百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理之。

对中国军人的集体屠杀集中在长江岸边。同盟社日本记者前田雄二记述：“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之外，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烧得焦黑……”——据战后统计，仅南京一处，被杀害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就在三万人以上。《纽约时报》记者都亭记述：“对俘虏的集体屠杀更增加了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恐怖。日军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役后，在市内到处搜查被认为是中国兵而现在换上便衣的男人。在难民区的一个建筑物里，抓走了四百个男人，日本兵把他们五十人一排绑成一串，由拿着步枪和机关枪的日本兵押往屠场……屠杀只用了十分钟……然后，许多拿着手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地在中国人尸体上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手脚还有动的，就再给一枪。干着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勾当的陆军，喊停泊在江边军舰上的海军观看这种情景……”

日军针对中国平民的虐杀更是疯狂。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描述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用机枪、步枪和手枪冲着所有能看见的人或人群射击，无论对方是溃兵、伤员还是普通难民，以致南京城内"大街小巷遍地横陈着被害者的尸体"。那个曾经是南京城唯一生路的下关码头，此时已如一座"黑黝黝"的尸山，"有五十或许一百个人影在其间来回走动，他们被命令往江里拖尸体。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鲜血，痉挛的肢体，再加上哑剧般的沉寂……就像月光下的泥泞一样，整个码头在微微闪光，那是人的血。不久，结束了作业的苦力被迫朝着江边站成一行，嗒嗒嗒……机枪的声音，他们仰身倒下落入江中……'结束了。约有两万人。'一个日军军官说"。在南京以北长江边的燕子矶，聚集着约十万难民，日军从三面扫射屠杀，难民的鲜血涌入长江。那些"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刺鼻，散发到几公里之外"。

战后远东国际法庭"接受了'二十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于'最初的六周内，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被杀害'的估算值"；而"在南京举行的战犯审判接受的数值是'三十万人以上'"。

日本占领军对中国妇女的兽性奸污，其施暴之多手段之残忍，超出了世界文明对人的定义。他们不分地点，不分昼夜，不分老幼，奸后残杀，疯狂肆虐，一个月内在南京城施暴达两万起以上，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一天内被轮奸达三十七次。目睹日军暴行的美国牧师麦卡勒姆于南京沦陷的第五天记述道："一个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如此破天荒的残暴，"比未开化之人种又有过之而无不及"。目睹了日军铺天盖地般的恶行的德国人拉贝，他留下的文字记述是："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

南京大屠杀令人类历史黯然，令世界文明蒙羞。

日本军国主义者有其变态的思维方式：他们从来不认为中国是正常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正常的民族。他们认为除了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之外，其他民族一律是低劣的种族。他们信奉只有依靠武力和杀戮才能让其他民族向日本臣服，以完成大日本帝国统治和管辖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事业。他们强硬而顽固地认为，这就是日本民族天经地义的和义不容辞的义务。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人类社会中暴虐的异类。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旧是。

日军在南京屠城之际，北平阴郁的冬云下，一个由日本人扶植的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权成立了。这个伪政权成立的时间，选在了南京陷落的第二天，这令日本方面很满意。出面组织伪政权的中国人叫王克敏，浙江杭州人，曾留学日本，北洋军阀时期担任过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后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他在发布的宣言中声称他的伪政府将奉行“中日亲善”“铲除共产主义”和“确立东亚和平”。这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出现的第一个伪政权，因此有必要把担任其主要官员的中国人的姓名开列如下：

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常务委员王克敏、朱深、董康、齐燮元、王揖唐；委员江朝宗、高凌霨、马良、王荫泰、余晋和、潘毓桂。

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部长王克敏。治安部部长齐燮元、教育部部长汤尔和、法制部部长朱深、赈济部部长王揖唐、财政部部长汪时璟、事业部部长王荫泰、秘书长祝书元、建设总署署长殷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长汪时璟、中央电报局局长邓子安、邮政总局局长潘传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安钦活佛、天津海关监督温世珍、长芦盐务局局长杨廷溧。

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委员吕世芳、张乘运、朱熙年，秘书长陶沐。最高法院院长董康。检察院检察长张孝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委员祝书元、罗世芳、朱熙年、游捷、吴爱修、黄孝平、丁光熙、冯君。

尽管华北大地已是天寒地冻，当板垣征四郎决定对华北民众“采取宣抚对策”时，北平伪政府立即予以响应：“某日，组织数十名少女舞蹈演员到司令部门前慰问官兵。从前历经被征服、有丰富的被占领经验的中国人，跳起非常有趣的舞蹈，锣鼓喧天地扭着高跷列队前进。师长也破例地登上了司令部门前的高台，像观音菩萨那样微笑着。”

无论政治、军事，还是世道人心，中华民族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南京沦陷的第三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发布《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观。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巨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中心痛苦，实十百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存，唯有捐糜顶踵，以期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持慢性蚕食政策，浸润侵蚀以亡我于不知不觉之间，则难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敌忾同仇之义，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返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败，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兹为我同胞约举其要义如下：

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故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国际间势均力敌之国家相互战争，大异其趣。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终不当以此为之屈挠。稽之各国史例，凡革命建国之大业，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经之险阻愈多，则所获之胜利亦愈大，惟赖我革命精神无所挠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则障碍摧毁之日，即最后胜利之时。敌人此次侵略中国，其最大目的，固不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灭我文化，而尤在消灭我三民主义与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达到艰难之极度，若遂自甘退屈，则精神一弛，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于今日战争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国同胞！须知任何国家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为国家民族与世世子孙计，牺牲虽巨，无可避亦无可辞。所谓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者此也。

二、即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则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盖抗战虽不能必胜，而屈服即自促灭亡。与其屈服而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国家独立之人格一隳，敌人宰割之方法愈酷，万劫不复，即永陷于沉沦。况战争成败之关键，常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是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中国自抗战之初，揭橥二义：为民族生存独立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数月以来，虽国际之制裁，尚未充分发挥，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天下。吾人对于此种伟大使命，既已毅然承当，则不问国际形势前途如何，必当尽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赖，但使世界正义不终灭亡，则吾人目的必有达到之一日，任重道远，不容稍懈。此尤全国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党国，有进无退，当此存亡呼吸之际，愿与吾同胞共勉之。

文告的主旨是：一、“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二、“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若遂自甘退屈，则精神一弛，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于今日战争之痛苦而不止者”。 三、“抗战到底为本务，则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

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决不屈服。

“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的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意志——蒋介石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个已经开始担任着国防任务的政府，已经开始代表着民族利益的政府，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一九三七年冬，中国的北方寒风凛冽，江南则是阴霾蔽日。

苦难中的中国，“舍抗战外无生存”！

第九章

用精神和血肉争取一个像样的结局

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举行了南京入城式后，日本占领军开始迎接新年的到来。他们把攻入中华门的坦克装扮起来，从南京郊外砍来松枝，搭起日本人过年用的“门松”。厨房里的伙夫开始大量地打制年糕，新年物品也从日本国内运来了：橘子、海带、鱿鱼干和日式大酱。新年年会上，日军官兵举着斟满清酒的酒杯，一遍遍地高呼“天皇万岁”。

开战仅仅五个月，中国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包括华北大部、华中东部、热河以及绥察等大片国土相继被占，中国军队在一次又一次的抗击作战中伤亡已达三十万人以上。那么，中国是否在开战之初便满盘皆输，而日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呢？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双方在这个时候似乎都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还不如说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军事混杂在一起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交战之中何为胜利？

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继续让德国充当中间人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判断：中国到底会不会屈服？谈判有没有可能达成？这一问题引发了主张适时结束战争的主和派与主张继续对华实行强硬政策的主战派的交锋。国都都已被日军攻占，难道中国人还不屈服吗？陆军方面坚持认为，中国屈服的可能性很小。陆军的判断缘于战场上受到的顽强抵抗和付出的巨大伤亡。为此，参谋总长特别说明，目前日本面对的局势，急需将国防力量“充实整顿”，外相应设法令谈判“不致中断”。但内阁成员认为，“不能老是浪费时间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继续施加强大武力国民政府必会彻底崩溃，那时战争才能真正结束。会议持续了几天，意见无法统一，直到与会者反复研究了日方提出谈判条件以来中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蒋介石的态度，这才得出了“作为战败国的中国所使用的言辞实属无礼”的结论。于是，与会者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

二十一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更为苛刻的谈判条件，其基本内容

是：

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排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以协助。

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附加的口头说明是：

一、中国应表现出有实行防共的诚意。

二、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

三、我方考虑大体上在本年内答复。

开列的条件细目有：

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

三、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四、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

五、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

六、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八、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

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

九、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分割占领中国领土，奴化中国政权，实施经济掠夺，最后通牒被侵略者要对武力劫掠者进行“必要的赔款”，日本右翼政客和军人延续近代以来“大日本帝国”的思维方式，认为日军铁蹄所至之处他国必会俯首称臣——“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这就是说，在日本人规定的期限内，中国人必须打着白旗前往规定地点向日本求和。

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远远越过了十一月二日的条件”，让“中国政府接受是极其困难的”。广田弘毅外相的回答是：“军事局势改变了，又有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了。”德国外交部将狄克逊的报告转告陶德曼。陶德曼要求会晤蒋介石，却被告知蒋介石“生病了”。孔祥熙和宋美龄会见了陶德曼，两人首先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感到“极其惊讶”，继而明确表示：“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中国的态度令德国人很是为难。陶德曼继续劝说国民政府，甚至警告，如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也许会导致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可是，中国方面再也没有任何答复了。

见不到蒋介石，也得不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本的政客们逐渐焦虑起来。日军参谋本部努力打探，才零星地得到以下情报：一、狄克逊与广田弘毅外相会晤后，傍晚拍电报给陶德曼，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答复；二、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尔根豪将军，已明确劝告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三、东京中国大使馆说他们对于国内的立场和态度一无所知；四、陶德曼当面问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有无答复，张群的回答极具中国特色：“还在研究中。”

日本人充满了困惑和愤懑。

一月十一日，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这样的御前会议是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统帅，参谋本部部长、次长以及全体内阁大臣，“并特邀枢密院议长出席”。会议最终确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要点是：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此刻重新考虑而悔悟过来诚意求和”，则根据谈判细目所开列之“日华和谈

条件进行谈判”。二、“如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第二天，日本外交次相堀内谦介会见狄克逊，表示：“希望尽全力要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如果到了十五日还没有接到答复，日本政府将不得不保留行动的自由。日本一而再地放宽了答复的期限，但已不能再等待两天或三天以上了。还有，‘答复’二字意味着表明明确的态度或关于每个细目的明确的质问，所谓‘正在研究中’的回答是不够的。”

十三日，中国方面终于有了答复，还是正在“研究”，只不过这一次变成了“仔细研究”：

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来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中国人的“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

十五日，最后期限的最后一天，日本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得更加厉害。主战派认为，中国方面没有诚意，哪怕不再以蒋介石为对手，抛开国民政府，也必须使用强大武力直到中国彻底屈服为止。主和派则认为，不能因为日本单方面制定的期限，“就在全国既未下定决心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前途黯淡的长期战争”。外相广田弘毅说：“中国方面的复文，很像是日本方面在向中国求和似的。说起来，讲和的条件本应由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结果却是虽然知道日本方面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方面并不表示意见，却要求日本方面说明条件。我认为这只能说明中国方面没有诚意，是在采取拖延政策。”内阁成员立即表示：外相的看法值得信赖，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外相，那就意味着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参谋本部考虑到“政府的垮台要在内外产生坏影响”，不得不对内阁的意见“予以默认不进行反对”。这天晚上，主战派的强硬立场被呈奏天皇。天皇询问了几个很实际的问题，令主战派与主和派同时意识到，此时，面对中国，无论战与和，都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了：一、在南方还有中国的抗日军队，日军打算怎么办呢？二、已经拥立的华北政权，是不是得由日本负担呢？三、怎样对付游击队的战术呢？四、据说陆军想到了“尽善处理的办法”，是怎么回事呢？

十六日，日本内阁发表如下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政府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充其量只是个流亡政权而已。以后所有日中之间的外交交涉，都与国民政府无关，日本只与他们扶植的中国"新政权"即伪政权"邦交"。

十八日，日本政府命令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回国。

国民政府立即结束了"研究"，命令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回国。同时宣布："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所谓"陶德曼调停"就此结束。

中日两国宣布断交。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日本人不可能意识到，他们将要为自己的狂妄愚蛮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从外交上讲，日本的蛮横与野心，从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时起，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警觉。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宣布扶植北平伪政权后，国际社会预见到暴戾的日本军国主义之危险，英、美、法等国由此考虑：是否有必要组成一个遏制日本法西斯势头的联合战线？而日本对其始终"怀着非常畏惧之心"的苏联，这时候则开始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南京沦陷之际，苏联一次给予了中国一百一十五毫米重炮八十门、七十六毫米野炮一百门、三十七毫米防坦克炮八十门、轻重机枪九百挺、驱逐机六十二架，以及大批的炮弹枪弹。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直接参加作战的飞行员、辅助指导作战的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员。自一九三八年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高达两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用来购买六百架苏联战机以及装备二十个步兵师。

日本人惊呼道："苏联以物质和技术援助中国与日本作战，同时谋求加强远东战备从北面牵制日本，成功地把日军战力一分为二。换言之，日本坠入了苏联远东战略的陷阱。"

事实上，真正令日本落入最终无法挣脱的战争泥潭的，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平津、沪宁失陷后，中国不但没有屈服，相反，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更加坚强。中国人在声称他们要“研究”的时候，早已将战争的前景研究透彻，那就是：把日本侵略者拖入中国广袤大地的深处，直到把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彻底拖垮为止。尽管在日本的政界和军界内，始终有人力求避免被拖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就整体而言，日本人无法克服由来已久的“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蔑视中国的看法”，“轻视广大的中国国力和觉醒了的民众的动向。这种“动脉硬化似的判断”，自以为优越地秉持着“把对手看为弱者，不把对手的实力和活动当回事”的狂妄。当然，日本人也有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时候，只是他们在这种时候的思索也是日式的：“战争是相对的事，不可能有单人相扑。”——用不了多久，指望中国伪政权的日本人便会发现，他们进行的正是一场“单人相扑”。

从军事角度讲，中日开战五个月来，无论对战争前景持何种看法，至少在一九三八年到来之际，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会被中国打败”的观点是虚张声势。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没有支撑现代化战争的工业，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国军队也不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中国的对手日本在战争爆发五个月后评述道：

中国现有军队共二百多个包含着许多步兵团的师，就士兵数量来说，共有二百多万。可是，能够称为现代化军队的，且是有现代化装备的，实在找不出一个师。中间偶然有一两个旅或团好一些，然而严格地说，仍旧是落伍的。在一·二八沪战时，虽然有一些下级干部和士兵很勇敢，但这不过是偶然的发现，不能因此便承认他们有现代军人的资格。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由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的战术，也就是南美洲的战术。中国军队之弱点为天下周知：中国高级将领不学无术，妄自尊大。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的经济中心，使他毫无接济，毫无办法。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期间内，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师人就可以到处横行，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连人。

这样的评述至少在表象上是事实。

一九三八年一月，蒋介石辞去多项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飞赴河南开封前线，召集第一、第五战区的军事将领开会，着重总结中国军队作战中的经验和教训。蒋介石一讲便是整整两天，尽管带有蒋氏连篇累牍、滔滔不绝、冗长啰嗦的特质，但其家长教训不肖子孙式的怒气和敢于面对自身丑陋的坦荡，使他的讲话由于内含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而值得一读。

蒋介石首先检查到会的高级将领是否带着《步兵操典》和《指挥纲要》，结果数十位高级将领中，只有两人带着《步兵操典》，而带着《指挥纲要》的一个也没有。“像这样统兵作战的基本书籍，大家都不随身携带，随时研究运用，凭什么来作战，凭什么来抵抗拥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从这个问题引申开去，蒋介石一口气列出了中国绝大多数部队的十二项致命弱点：

一、高级将领缺乏智慧的优良技能与艰苦卓绝的精神，下级官兵缺少新战术的训练。

二、军纪荡然。作为一支军队这是第一大祸害！

三、一般缺乏敌忾之心，尤以高级军官为甚！

四、缺乏协同作战的精神和技术。

五、高级将领缺少牺牲决心。

六、长官不知激发廉耻心，明耻教战。

七、命令不能贯彻。

八、懒惰疏忽，不能判明敌情真相，不检讨战斗经过、命令进退，掉以轻心。

九、高级将领缺乏坚决的自信心，长官不能和士兵同甘共苦。

十、武器弹药装具，专靠后方接济，不知在前方就地补充，因粮于敌。

十一、缺乏“私密习惯”——电讯管理使用不严密，每每容易泄漏军

情。

十二、一般部队缺乏政治训练。

然后，蒋介石以最严厉的言辞，开始抨击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之最顽固的弊端，即地方军阀部队为保存一己实力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

……现在我们丧失了许多土地，牺牲了许多生命财产，并不是敌人已经支付了绝大的代价，硬打进来的，而是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你们试们心自问，就知道我这句话，并不冤枉大家！老实说，只要我们不后退，敌人必不敢前进；只要我们不放弃阵地，敌人必不能侵占我国土。如果我们都能如郝军长梦龄、佟副军长麟阁、刘师长家祺、赵师长登禹等各先烈，以身殉国，发扬革命军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攻击精神，无论敌人如何顽强，武器如何厉害，我们都可以摧毁他消灭他……因此，我们又要反省到过去几个月的失败……不怪我们下级的官兵不肯牺牲，而全在我们的高级将领无决心，或是有了决心但决心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劣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只是望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试问我们国家丧失了如此多的土地、如此多的生命财产，而我们的部队依然存在，我们抚躬自问，如何对得起国家，如何对得起祖先！我们保存了许多部队又有何用？如此按兵不战，拥兵自卫，将来国家亡了，我们岂不同归于尽？像现在东四省的伪军，被日本人强迫到山西、上海来打自己的同胞，如果你怕死，你不打，他就要在你背后用机关枪先打死你本人，还要杀尽你全家……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再不铲除这种保全实力的落伍思想，洗刷这种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卫，就一定会蹈着东四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人压迫着来毁灭我们祖宗的庐墓，残杀我们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子孙的生命，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了！

蒋介石当场宣布了“十杀令”：

一、轻伤自退者监禁！

二、假伤图逃者杀！

三、无令擅退者杀！

四、擅入民房者杀！

五、强买勒索者杀！

六、调戏妇女者杀！

七、报告不实者杀！

八、造谣惑众，扰乱秩序者杀！

九、拥兵不进，奉令不力者杀！

十、坐视友军不加协助者杀！

蒋介石的愤怒和焦灼出自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原地带面临大战之际，中国军队中武器装备与作战能力稍好的中央军，多数部队因在淞沪和南京的作战中损伤严重而亟需整补，此刻在中原战场上除了依靠地方军阀的部队他已无兵可调。

欲得天下，逐鹿中原。

中原自古便是中国兵家的必争之地。

南京陷落后，停留在津浦路北段的日军与停留在沪宁地区的日军，被中原所分隔。于是，日军急欲打通津浦路——华北的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南京的日军沿津浦路北上——以彻底贯通中原，使日军能够自如地回旋南北、来去东西。

津浦路沿线，中原地区的要点是徐州。

徐州位于黄淮之间，为北南向的津浦铁路与东西向的陇海铁路线的枢纽，据守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实为淮北重镇。除东南为山地外，徐州三面均为平原，淮河支流密布其间，大运河纵贯南北。这个西楚霸王项羽的建都之地，几乎无险可守，但秦以来却发生成规模的战争数百次，只因若“觊觎苏皖而举兵南下者，或图保江淮而进窥鲁燕者”，唯“以徐州得失而定胜负”之故。就中国军队而言，于南北走向上，控制徐州可使平津与南京两地的日军隔绝；于东西走向上，可使从东海登陆的日军无法沿陇海路西进而“屏蔽华中”。就日本军队而言，夺取徐州便可将南北战场连成一体，中国的东南部便尽在囊中；同时，沿陇海路可于郑州折南，再循平汉路“进迫武汉”，更可向西“直趋西安”。

迫使中国屈服的谈判中止后，日本不得不面对扩大战争规模的抉

择。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施政演说，主张为使中国彻底屈服必须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二月，日军参谋本部制订了《昭和军制建设纲要》，将总体战设想具体阐释为“倾国家的权力遂行战争”。三月，日本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要求鉴于“中国事变的长期持久性”，特别是苏联已与中国合作的“动向”，日本陆军必须具有六十个师团的兵备。四月，日本公布拨款四十八亿日元作为临时军费预算，这使得一九三八年日本的战争预算高达八十亿日元。

就战争本身的进程而言，日本方面最感困难的是兵力不足。日军参谋本部虽然意识到，为应对战事确需六十个师团的兵备，但也同时明白“国力、经济力量、科学技术力量以及干部数量的不相称”。特别是新组建的部队，必要经过征召、训练、演练、实战等全过程，才能在作战技能与军事素质上确保军令的达成。因此，参谋本部的结论是“困难极大”。这种看法，导致了至少在一九三八年初，日军大本营与侵华日军将领间的争执。争执的焦点是：在中国战场上是否一鼓作气地打下去？

“华北方面军自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底以来，曾多次向中央阐述，为使华北、华中连结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从而占领黄河右岸据点（郑州、开封等）的重要性。”而东京大本营则认为：在确保编成六个新的师团前，“绝对不进行新的作战”，只以“增强态势为原则”；待兵力整备完毕后，“进行彻底的积极作战，而求得一举解决事变”。

……沿津浦线连结南北的作战，现地军，尤其是华北方面军提出这样强烈的请求，而梅津（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从新兴政权的南北合流及其他政治谋略的理由出发也极力主张。但是，从解决事变这一大局目的出发，进行这样一次作战，即使规模再小，即使作战能成功，然而为确保该地区的安定，估计至少也得要四个师团，因此才死了心……在黄河南岸的郑州、开封，为建立立足点而作战，为使将来的汉口有伸缩余地而作战，华北方面军有此迫切的希望，但因确保黄河以北，尤其是山西的治安，需要相当的兵力，而未被采纳……为威胁汉口的办法，海军方面希望攻占安庆，以便使用其飞机场，对中国内地进行轰炸。陆军省内对此也表示支持。但考虑攻占后，安庆、芜湖的连接也需要相当的兵力，亦被停止。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对东京的审慎十分不满，指示方面军作战课课长河边正三致电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据理力争：

在徐州东西两侧的陇海路北面，其中山东湖沼地带的西面地区，集结着还未曾受过我军大的打击的十数万中国军队，并以此为根据地，经常派出便衣队潜入我第一线后方，到处袭击。最近几乎连夜遭受袭击的第一线，渐有疲于奔命之势。对此，从军自卫观点出发，在适当时机对上述敌根据地给以痛击很有必要。尤其在济南南面地区，我们认为，情况已到不得不超越现在占领线进行反击作战的境地。关于此点，请予留有行动余地。

东京的参谋本部很清楚，所谓“连夜遭受袭击”不过是华北方面军在编造理由，因此回电的口气相当严厉：

由于没有鲜明的天然屏障可依，又面对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残败之敌，出现如贵电所述情况，不难想象。然而，我方应考虑的是，不要被敌诱发导致战局扩大，兵力全被牵制，而妨害国军（国内军队）全面整理整顿，以适应下步……在现在占据地区以南，即使说是自卫上的攻势行动，其结果扩大了占领地区和牵制住更多的兵力，这样依照中央既定的大方针，是绝对不能批准的，请予理解。

但是，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将领决定不理睬大本营持有何种意见。占领南京的华中方面军认为，他们有能力投入兵力沿津浦路北上，配合华北日军作战；华北方面军更是急切希图南下，与华中方面军在津浦路上会师。——侵华日军将领固执地认为：只要加大打击力度，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南北日军会师之日便是中国政府屈服之时。

继续向南作战的命令不顾一切地下达了。

一九三八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序列是：

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

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辖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第一〇八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中将；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山冈重原中将；第四、第五、第九独立机关枪营；第一、第五独立轻型装甲车连；第二坦克营；第一、第三独立山炮团；第二野战重炮旅；第八独立野战重炮团；第三、第五迫击炮营。

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辖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第六、第十二独立机关枪营；第

十、第十二独立轻型装甲车连；第一野战重炮旅。

华北方面军直属部队：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中国驻屯兵团，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第三、第四、第五独立混成旅。

临时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辖第一、第四飞行团；第三、第九独立飞行中队；野战高炮队六队。

为防止日军占领徐州纵贯中原，打通中国东部最重要的津浦铁路线，中国方面还在淞沪会战时就成立了第五战区，以期专门负责鲁南与苏北地区的战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但是，因为淞沪战事危急，地域内的部队奉命驰援，第五战区在成立的当日又被撤销。直到十月十六日，第五战区再次成立，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五战区所辖地域：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至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海岸。

对于徐州方向的作战，蒋介石是从保卫武汉的角度考虑的："现在我军战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道口至清化）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我军要巩固这两条铁路，一定不要呆守，必须积极对威胁我军之敌采取攻势，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陷敌人于被动。如此我军才能固守，才能借津浦、道清两铁路来屏障武汉。"基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了详尽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旨是："国军主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积极整补，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诱敌主力于津浦铁路方面，以迟滞敌人之过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平汉路方向的第一战区，苏浙方向的第三战区，两个战区内各有部队被抽调至第五战区。

中国第五战区作战序列：

司令长官李宗仁，参谋长徐祖贻。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下辖：

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兼）。辖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兼）；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第二十八旅（手枪旅），旅长吴化文。

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辖第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兼）；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

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下辖：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辖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

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兼）。辖第三十三师，师长韩德勤（兼）；第一一七师，师长李守维。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后为孙震）。下辖：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代）。

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辖第一二五师，师长王士俊；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

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

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兼）。辖第三十九师，师长马法五。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下辖：

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下辖：

第七军，军长周祖晃。辖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分。

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玮；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

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张自忠。下辖：

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兼）。辖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先烈；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

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下辖：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兼）。辖第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域；第一三四师，师长杨汉忠。

中国军队第五战区共有二十九个师附一个旅，兵力共约二十八万八千人。

在组成第五战区的部队里，邓锡侯、杨森部属川军，韩德勤的部队由江苏保安队改编，庞炳勋、张自忠部属西北军，李品仙、廖磊部是桂军，于学忠部属原东北军，孙桐萱部属山东部队——以上各路地方部队统由桂军首领李宗仁指挥。李宗仁对此牢骚满腹："这些部队均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与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而杂牌军的将领们内心也是惶恐不安："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成为光杆一根，即无以谋生。因此都怀着沉重惶惑的心情。"

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决定以既成事实迫使东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战略设想是：华北方面军的第十师团和第五师团，分别沿着津浦铁路和潍台公路（潍县至台儿庄）南下，为主攻方向；华中方面军的第九师团沿津浦路，佐藤支队（隶属第一〇—师团第一〇—旅团）沿运河北上，为牵制方向。同时，华北方面军第十四师团由濮阳南渡黄河经鲁西南，再向西直趋开封和郑州；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淮河后直趋豫皖交界处的永城和黄口，截断陇海铁路。

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对由津浦路南段前进之敌，须固守徐蚌两要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的命令，于二月三日下达了作战令："战区决对津浦南段之敌，拒止于淮河以南地区，由其侧方连续予以打击，渐次驱除肃清之，同时巩固鲁南山地。对津浦北段及陇海东段取侧击之势，

牵制敌之南下或西上，以拱卫徐州。”

中国军队在津浦路南北两端同时进行的作战，拉开了徐州会战的序幕。

战斗首先从津浦路南段爆发的原因，来自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狂妄。当时，津浦路南段直到长江浦口，几乎没有中国军队防守，日军以为这里的中国军队已被消灭，沿津浦路北上仅是一次行军而已。

李宗仁虽有兵力匮乏之忧，但他对津浦路防御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后，之所以没有西进武汉，就是因为受到北面津浦路方向的牵制。因此，日军必会首先消除侧背的威胁，那么津浦路防御实际上是为保卫武汉赢得时间。

李宗仁将刘士毅的第三十一军调到了津浦路南段的滁州、明光一线阻击日军。这一线，明光的西北面是津浦路上的蚌埠，滁州的南面就是长江北岸的浦口了。中国陆军第三十一军隶属于第十一集团军，是桂系部队。第十一集团军原本还辖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但这两个军投入淞沪战场后被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因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手里只有第三十一军了。李品仙是广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早年追随湘军将领唐生智，参加过北伐战争。唐生智在宁汉交战中与李宗仁部打仗，败北后李品仙接受了桂系改编。但是，蒋桂战争随后爆发，他又重回唐生智麾下。接着蒋介石与唐生智又打了起来，唐生智败了，他应李宗仁之邀再次加入桂系。因此，尽管李品仙不是李宗仁的嫡系，但也算得上是桂系干将，属于李宗仁的“亲兵”。

桂军以死打硬拼闻名。

当日军第十三师团沿津浦路开始向北推进时，受到了中国陆军第三十一军的顽强阻击。第三十一军官兵利用有利地形死守，同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实施袭扰性反击，竟与兵力多于自己数倍的日军纠缠了一个多月。日军得知当面仅仅是一股广西部队时，大感意外，认为被这样一群武器简陋的广西人阻击月余，简直是日本陆军的耻辱。

李宗仁对桂军的表现非常满意，命令第三十一军“始终钉住津浦线，使敌军不能北进”。

但是，当日军从南京调来坦克和重炮后，第三十一军顶不住了，明光很快失守。接着，日军第十三师团兵分三路同时推进：第二十六旅团

从明光北渡池河，沿津浦路向蚌埠推进；第十三师团主力从滁县出发，北渡池河后经由凤阳向蚌埠推进；第六十五联队从浦口以西的全椒出发，迂回津浦路西侧掩护主力北上。后撤中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一军奉命在蚌埠西面的铁路一带侧击日军，并以一部兵力于战场正面的池河与淮河间逐次抵抗以迟滞日军的推进。但是，三路日军协同发起的攻势极其凶猛，二月一日日军占领临淮关，二日占领蚌埠、凤阳和定远，其前锋已抵进淮河南岸。九日，一部日军强渡了淮河。

如果让日军主力渡过淮河，津浦路南段的中国军队将无险可守。

李宗仁将防守淮河的任务交给了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

于学忠，山东蓬莱人。早年在北洋军中供职，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爱将。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兵败后，于学忠追随张学良的奉系，因屡建战功深受信任和重用。在河北省府主席任上，面对日本人的劝降利诱不为所动，多次遭到未遂暗杀。被排挤出华北后，他率第五十一军进入陕西和甘肃。及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他的部队被调往江苏淮阴一带，整编为第一一三师和第一一四师，驻防青岛。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青岛失去防御意义，他又奉命率部转向津浦路方向。于学忠久经沙场，作风硬朗，他的第五十一军虽仅有两师，但东北军官兵因家破人亡战斗意志格外强劲。

于学忠率部在五河至蚌埠间布防，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防线，所扼守的淮河河段正对着北上的日军。官兵们还在赶修工事的时候，就与攻占临淮关后企图强渡淮河的日军接上了火，激战四小时后，强渡的日军被第一一四师官兵击退。之前日军占领蚌埠时，中国守军仓促间炸毁了淮河大桥，但没能毁坏停泊在淮河南岸的数百艘民船。二月三日，北上日军利用抢来的民船和自带的橡皮艇，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再次强渡淮河，遭到第一一四师第三四二旅的顽强阻击，被打死在淮河中的日军不下三四百人，但仍有一部分日军渡过了淮河。四日早晨，第一一三师赶到战场，与第一一四师一起发起反击，硬将渡过淮河的那部分日军赶回了南岸。但是，日军第二十六旅团一部绕道蚌埠以西渡河成功，攻占了怀远并进抵涡河。于学忠紧急调整部署，命令第一一三师和安徽保安二团防守小蚌埠镇直至怀远、涡河一线阵地，命令第一一四师在第一一三师的左翼防守临淮关北岸至西门渡的阵地。

小蚌埠镇位于蚌埠以北的淮河北岸。八日，二十余架日军战机密集地轰炸了小蚌埠镇，然后千余日军步兵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再次强渡

淮河。第一一三师第三三七旅官兵拼命抗击，两次击退强渡的日军。日军无奈，实施夜间强渡，一度登上淮河北岸，攻占了小蚌埠镇。第一师师长周先烈命令六七四团团长梁忠武率部反击，双方激战至凌晨一时，六七四团官兵将日军击退，夺回小蚌埠镇。十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攻击，六七四团昼夜战斗伤亡过半，小蚌埠镇阵地失守。军长于学忠亲临前线，命令第三三九旅组织敢死队反击。旅长窦光殿亲率敢死队身先士卒，东北军官兵即刻与日军扭打成一团，惨烈的肉搏战持续了数个小时，日军的尸体横陈于小蚌埠镇内，被赶下淮河淹死的日军也在数百人以上。小蚌埠镇反击战进行的同时，数千日军从东面的临淮关强行渡河，一度攻占了淮河北岸的几个村庄，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第三四二旅旅长李雨霖率部发起反击，将失守的村庄一一夺回。十一日，已坚守阵地近十个昼夜的中国守军迎来了战斗最血腥的一天，日军的飞机、重炮和坦克持续轰炸和轰击，第五十一军的防御阵地多处被突破，严重的伤亡致使预备队也使用殆尽，多天未食未眠的第五十一军官兵数次发起绝地反击，仅小蚌埠镇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竟达五次之多。最终，小蚌埠镇落入日军之手。

于学忠在阵地被撕破之际，将浑身硝烟的指挥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东北沦丧之痛刻在咱们心头，想生存下去就要与日军血战到底。我们下定必死的决心，我们可以都死光，但是必须让日军付出代价！

十三日，第五十一军展开了全线决死反击。于学忠军长和两位师长及四位旅长全部上了前沿。小蚌埠镇方向的第一一三师与日军死战不休，残酷的拉锯战进行了八个小时，双方仍处于胶着状态。临淮关方向的第一一四师，付出巨大伤亡夺回了部分阵地，但当日军后续渡河部队投入战场后，第一一四师伤亡已达两千多人，淮河沿岸阵地多处失守。

危急时刻，又一支中国军队赶到了战场。

张自忠来了。

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刚刚转隶第五战区，便接到了李宗仁让他们接替第五十一军防御淮河的命令。张自忠立即率部而上，将伤亡惨重的第五十一军替换下来，在防御线上布防了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和第一八〇师。

为了策应张自忠部，李宗仁部署了一系列的反击行动：韦云淞的第四十八军在蚌埠以南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的第三十一军在淮南

东北方向猛烈围攻上窑的日军；周祖晃的第七军在津浦路以西向池河、定远的日军发动侧击。同时，在李宗仁的请求下，中国空军轰炸了蚌埠至临淮关的日军阵地。

位于淮河战场正面的张自忠认为，与其死守不如全力反击。

张自忠对他的第五十九军官兵只说了一句话：“谁也不许后退，跟着我拼命保国。”

由于卢沟桥事变时在天津和北平的表现，张自忠始终在国人的谴责和自我的负疚中备受折磨。北平和天津迅速沦陷后，第五十九军官兵也与张自忠一样承受着全国舆论的压力，整个部队的心气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张自忠命令两个师各组一个加强团，以决死的意志向淮河全线发动反击。十五日，反击作战开始，两个加强团于左右两翼向当面日军扑了上去。强渡成功的日军由于主力已经到达，没有预料到中国军队能够实施反击。在第五十九军官兵的猛烈冲击下，日军阵地出现动摇，开始后退。战斗到十八日，张自忠部依旧在不分昼夜地猛打猛冲，直至把日军赶回淮河南岸。二十日，第五十九军官兵终于冲进了小蚌埠镇。——沿津浦路南段北上的日军，经过二十多天的苦战，付出巨大代价后渡过了淮河，自认为当面的中国军队已被打垮，可谁知又被赶回了淮河南岸。

中日两军再次于淮河两岸形成对峙。

淮河阻击战，面对日军一个师团另附三个联队、七个大队的步兵，加上七个中队的航空兵、工兵、炮兵、装甲兵和铁道兵的联合攻击，中国军队中的桂军、东北军、西北军轮番上阵，让日军付出了伤亡三千余人的代价，最终未能突破淮河防线北进，这不能不说是中日开战以来令人振奋的一次胜利。

日军南北夹击受挫后，改变战略为“南守北攻”，以图沿津浦路北段快速向南推进，津浦路北段局势因此严峻起来。

危机是从大半个山东失守开始的。

津浦路北段的防守，由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负责。

韩复榘，河北霸县人，生于一八九一年。早年入冯玉祥部，因作战勇敢，从排长一路升迁至军长。一九二九年，冯玉祥策划反蒋，他暗中

背叛老上级投靠了蒋介石；但在之后的中原大战中，“旧情难忘”的他又声明只打阎锡山不打冯玉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并负责山东防务。韩复榘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并且一干就是八年。与山西的阎锡山一样，除了在反共立场上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外，他拒绝国民政府对他的山东地盘的任何干涉，在这点上他与蒋介石势不两立。省府里有个年轻的办事员，因在济南城内贴标语而被捕。提审的时候，韩复榘拿着写有“共产党万岁”和“打倒蒋介石”的标语看了又看，然后说：“共产党万不万岁我不管，打倒蒋介石是可以的。”韩复榘写下“仍复原职，月薪四十元”的判决后，命令将这个青年当堂释放。他接收了国民政府在山东设立的税务机关，还把国民政府任命的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局长、税警局局长和中央财政特派员等全都赶走了，甚至把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暗杀了。两广事变时他支持李宗仁和陈济棠反蒋，西安事变时他称张学良所为乃英明壮举。——他自认为是山东地盘上说一不二的皇上，认为举国之内能够威胁他“皇位”的人，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各路军阀，而是那个居心叵测的蒋介石。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对韩复榘充满担忧。如果韩复榘动摇，北平的局面将蔓延至山东；而如果韩复榘坚决抗日，不但可以控制局势的恶化，还能对宋哲元部产生影响。没有确凿史据证明韩复榘是个变节分子。当日本人企图说服他和宋哲元、阎锡山脱离国民政府搞“五省市自治”时，韩复榘拒绝了日本人让他宣布山东独立的要求。同时，他以各种借口拒绝日本人进入山东，无论是驻军还是借道通过统统不行，为此他早早地就把黄河大铁桥炸了。只是，韩复榘此举更多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他告诉蒋介石“我决不能和日本人搞在一块”，他还告诉蒋介石“日本不让山东驻中央军”。韩复榘无法排解的忧虑是：即使在全国一致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有先牺牲他的诡计”。这让他不得不在日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缝隙中谋求自保。日军开始攻击津浦路北段后，李宗仁亲赴济南与韩复榘彻夜长谈，详细阐述国内形势以及赢得战争胜利的趋势，力图使韩复榘认识到“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韩复榘自然不会成为日本人的汉奸，但是他从“抗战是长期的”的观点引申而出的结论，却是自己的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短时间内“被消耗了”。于是，保存实力成为他的“第一要务”。部下提醒他说，现在是全国倾力抗战，部队有损失中央会补充，川军和滇军都已开到徐州，我们就在山东怎么可以按兵不动？韩复榘的回答是：“我们要最后参战。”——韩复榘无法摆脱认识上致命的局限，没有认识到：他和他的军队面对的敌人，不是与他抢占地盘的哪路军阀，也不是总想收编他

的部队的蒋介石，而是日本侵略者。

基于保存实力的原则，当停留在河北沧州的日军开始南下，并于山东淄博以西的周村渡过黄河后，韩复榘意识到日军沿胶济铁路即刻便可西进济南，于是下令从黄河南岸撤退军队并向河南转移财产。李宗仁得知后，一再致电，要求韩复榘遵守军事委员会“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的命令，绝对不能“把后方放在第五战区的范围以外”。韩复榘在李宗仁的电文上批复：“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李宗仁只好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韩复榘不得放弃济南，“万勿使倭寇垂手而得全鲁”。岂知韩复榘此时已经逃到了泰安。李宗仁只好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韩复榘的回复说，蒋介石连南京都不守，有什么理由让我守泰安？韩复榘认为，只要有枪有钱，“到哪里都可自立”，因此撤离济南前下令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一万五千两黄金、三万两白银以及公私辎重全部装车运走。韩复榘的四个军不战而退，致使千余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进占济南。退至泰安后，韩复榘认为自己仍处在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攻击线上，遂又命令部队放弃泰安退至济宁。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命令他死守济宁和大运河，李宗仁在电报里更是用了几近恳求的口气要求他的部队停住，哪怕打一仗。韩复榘回电李宗仁：“榘不能守济宁，如榘不能固守济南然。”李宗仁怒不可遏，斥责韩复榘就从没有过守卫济南的任何意愿！而韩复榘对于他放弃济南的说辞是：“现在不是千余敌人过河（黄河）的问题，而是要考虑保存现有实力伺机反攻的战略目的。”韩复榘的主力部队以及所有辎重，一直退到了鲁豫交界处的巨野和曹县。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日军占领济宁城，逼近徐州。

在短短的二十多天内，韩复榘连退数百里，轻易丢掉了黄河、济南、泰安、曲阜、兖州、济宁乃至徐州以北的运河防线，致使日军仅用一个半师团的兵力便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导致津浦路北段门户大开，徐州以及陇海铁路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下，中国第五战区的作战部署完全被打乱。蒋介石抵达开封召集高级将领会议时，韩复榘虽心有不安，但犹豫再三后还是前去参加了。蒋介石在讲话中把愤怒一股脑地倾泄到韩复榘身上：“有些将领，把国家的军队视作个人私有财产，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一味保存实力，不肯抗击敌人，只顾拥兵自重，不管国家存亡，不听命令，自由行动，哪里安全就向哪里撤退逃跑。试问，这样如何了局？”韩复榘当面顶撞：“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蒋介石依旧正颜厉色道：“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韩复榘被坐在旁边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劝出会场，谁知出了会场即被逮捕，之后被押解到武昌。韩复榘在高级军事法庭上申辩，他的部队没有

任何重武器，一个师也顶不住日军一个团的火力；他若固守济南，将受到南北日军的两面夹击；他不带走资产钱物，留下也是要被日本人所用。但是，面对国土未战而失的事实，任何狡辩都已无济于事。一月二十四日晚上七时，韩复榘被枪毙：

有个持枪的士兵到韩的房里说："何审判长（何应钦）请你谈话，请跟我走。"韩走出来，持枪士兵跟在后头。刚下楼还未到底，只见院内许多持枪士兵，戒备森严，韩已知情况不好，就说："我脚上的鞋太小了，等我回去换一双鞋。"他刚要返身，后边持枪士兵便开枪把韩打死了。

韩复榘的头部中了七弹。

这是全面抗战开始以来被处决的第一个中国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与那些参加伪政权的中国高官以及充当伪军的中国将领不同，他没有投敌变节。但是，纵使有千百条理由，在民族危亡之际违抗军令和拥兵自保，对于中国军人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尤其是面对武力强大的侵略者，必须具有战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的决心和意志，否则无以保证民族生存的底线。韩复榘事件，无疑是蒋介石对那些畏缩避战的高级将领的一次严重警告：国难当头，不尽抗战守土之责的军人，军法面前绝无宽贷。

津浦路北段的危机因山东失守而更加严重。

二月上旬，津浦路南段正在激战之时，为扭转因韩复榘避战而造成的日军大举南下的态势，第五战区决定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命令第三集团军向济宁和汶上、第二十二集团军向邹县、第三军团向蒙阴发动攻势作战。

韩复榘被处决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孙桐萱代理。二月十日，孙桐萱下令：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由金乡向北面的济宁南关发起进攻，谷良民的第二十二师由定陶经巨野、嘉祥迂回济宁以北，攻击济宁北门，协同第五十五军收复济宁。同时命令第八十一师对汶上的日军进行袭击，防止其南下增援济宁。十二日，攻势作战开始。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五十五军，仅以两个团各一部的兵力，对济宁火车站等地进行了骚扰式袭击，被日军打回来后，主力部队再也没有任何行动。而担负助攻任务第二十二师却仍在执行命令。部队抵达运河西岸后，以第六十四旅为主攻，第六十六旅为预备队，谋划的夺城方案是：小分队化装成百姓潜入

城内，待城外发起攻击后里应外合。济宁城门紧闭，日军戒备森严，小分队无法入城。第六十四旅旅长没有犹豫，立即命令位于北关的两个团攀城强攻。两个团的官兵扛着长梯分路攀城，尽管伤亡甚重，但一波接一波地往上爬，终于突进去九个连。防守济宁的日军约有三千人，中国官兵突进来后他们紧急求援。济宁城内的激烈巷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日军一千五百人的增援部队到达。城里城外的日军联合攻击，突入济宁的中国官兵孤军奋战，至十四日拂晓，九个连的官兵全部战死。第六十四旅残部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向运河东岸转移，掩护撤退的后卫营营长阵亡，负责接应的第六十六旅旅长薛明亮也中弹负伤。在济宁的北面，攻击汶上的第八十一师遭遇守城日军与从东、南两面增援而来的日军的围攻，部队因伤亡巨大仅在战场上坚持了一天便撤退下来。第三集团军反击济宁城的兵力，实际上只有一个旅，武器和兵力均不占优势，尽管九个连的官兵誓死血拼，但全军未能达成第五战区赋予的战略企图。

在济宁东面的邹县，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同时向日军发起了攻击。第二十二集团军是川军，韩复榘擅自撤退时，该部被从河南商丘调来牵制日军南下，其主力集结在邹县附近。川军官兵刚从山西前线下来，部队大量减员且武器简陋，均未来得及补充，所以无力支撑大规模的反击作战。集团军只好命令第三七三旅在邹县以南攻击位于两下店的日军。第三七三旅以七四六团并配属地方抗日红枪会的数百人担任主攻，以七四五团为掩护。七四六团三营接连发起两次攻击，都被日军击退。晚上，一营加强二营发起强攻，一度冲进了两下店，但很快就遭遇日军猛烈火力的反击，天亮时部队又退了出来。日军出城追击，第三七三旅向东一直退到了香城。

十七日，攻击济宁未果的第三集团军受到日军第十师团第八旅团的猛烈反攻。日军第八旅团的四个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兵大队在二十辆坦克的掩护下，于二十五日突破了中国守军的运河防线，攻占运河南岸要地嘉祥。在日军的反击中，第三集团军部队再次后撤至鲁豫交界处到巨野、独山、大义、孟家屯一线。

此时，另一路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津浦路以东开始沿着潍台公路南下，企图于津浦路北段的侧面直接攻占鲁南要地临沂，然后直下徐州。

日军第五师团原在山西战场，忻口会战前被调往华北地区。日军华北方面军给第五师团的命令是：沿胶济铁路迅速占领青岛。然而，日本海军也同时命令位于上海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占领青岛。关

系向来紧张的日本海军和陆军，都想抢得占领青岛的头功。一月十日，日本海军在胶州湾登陆，攻占了防御力量十分薄弱的青岛；而由于一路上的铁路和公路均被中国军民破坏，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行动迟缓，其先头部队十三日才抵达青岛，从南京海运来的该师团国崎支队（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国崎登指挥的第四十一联队）十四日停靠青岛港。第五师团主力刚到青岛，立即接到了由青岛、潍县一线南下的命令，具体任务是：向诸城、沂水、莒县方向攻击前进，迅速占领临沂，配合津浦路上的第十师团南下。

临沂，鲁南军事重镇，位于徐州东北方向，是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安危所系。如果日军第五师团向西顺利推进，与津浦路上南下的第十师团会合，将于北面大大加强威胁徐州的力量，中国方面的战势很可能变得不可收拾。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如此重要的方向上，中国方面竟然没有部署守军。从潍县到青岛再向南到临沂，只有从青岛撤出来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员约两千人，根本无法形成对日军第五师团的任何威胁，李宗仁只好命令驻防海州的第三军团火速赶赴临沂御敌。

中国陆军第三军团，原属于西北军旧部，是中国军队中典型的杂牌军。抗战初期，为调动杂牌军的作战积极性，国民政府往往给其将领很高的官衔，杂牌得越彻底官衔也就越高。因此，这支部队名义上为“军团”，实际上只有一个军，即军团长庞炳勋兼任军长的第四十军。而第四十军虽名为“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即马法五任师长的第三十九师。简单地说，第三军团只是一个加强师而已，全师下辖朱家麟的第一一五旅和李运通的第一一六旅，每个旅两个团，加上一个补充团，炮兵、工兵、辎重兵和通信兵各一个营以及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手枪连，兵力总计约一万三千人。虽然是杂牌军，但第三军团的武器装备算得上精良：步枪八千余支、手枪九百余支、轻重机枪六百六十余挺、轻重迫击炮六十余门、山炮四门、战马三百余匹，还有掷弹筒两百余具。

这样一支被边缘化的杂牌军，之所以能在连年的内战中生存下来，与其将领庞炳勋的带兵有方不无关系。庞炳勋，生于一八七九年，河北新河县人，出身贫苦，早年做小本生意糊口，二十岁那年从军，在北洋新军第三镇当炮兵，后于东北测绘学堂毕业任初级教官。辛亥革命时，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著名的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做贩马和倒卖粮食的生意。经商数年，庞炳勋练就了一套圆滑的处世经验。近三十岁那年再次入伍，在曹锟的军官教育团当副官。他经历过数次的军阀混战，从普通军官一步步升迁，带着自己的部队南征北战，一心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不贪不占，与士兵同甘共苦，因此，尽管常年受

到中央军的歧视排挤，他的部队始终没有散伙——“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或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他的部队以“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他本人则被认为是“极圆滑”的“不倒翁”。作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杂牌军将领，他的摇摆不定和复杂多变令人不可思议：北伐时他投靠冯玉祥，后又投蒋反冯；抗战初期他坚决抗日，后又投靠日本人当了伪军；受到共产党人的感召，他再次率部与日军作战，但不久又依附于蒋介石；日本投降后，他率部与共产党作战；国民党军兵败大陆他去了台湾，“为生活计，与昔日西北军同事孙连仲合开餐馆”为生。——从小本生意开始人生，到以小本生意维持晚年，庞炳勋的一生是一个坎坷的轮回。

至少在一九三八年初，庞炳勋是坚定的抗战派。他的部队被编入第五战区后，李宗仁召见过他一次，这次召见对他影响甚深。李宗仁对他很是敬重，自称小弟，说论军资年资都没资格指挥庞大哥，只因军务在身只好如兄如弟不分上下。李宗仁推心置腹地说，咱们在内战中打了二十多年，今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终“让我们这辈子有了一个报国的机会。如能为国家民族战死沙场，才真正是死得其所。你我都五十岁以上的人了，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为一个军人以终其生”。然后，李宗仁问他有什么困难，庞炳勋说杂牌军苦海无边，中央非要置他于死地，强令他把五个团缩编为四个团，不然就停发第三军团的军饷，可这样一来叫“剩下的弟兄们到哪里去呢”？李宗仁当即表示，一定和中央交涉，收回这一命令。李宗仁不但答应庞炳勋依旧拥有五个团，还给他配发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庞炳勋非常感动：“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庞炳勋真的准备与日本人拼了。

接到李宗仁防御临沂的命令后，庞炳勋立即率部奔赴战场。到达临沂地区后，他整合中国海军陆战队残部以及当地的民间抗日游击队，制订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并向蒋介石作了表态式的汇报：

职军奉李司令长官令将东海防移交一一二师，即全部向临沂集结准备，以一部配合游击队攻击蒙阴泗水而占领之，向泰安曲阜间威胁敌之侧背；以一部协力海军陆战队，固守莒县沂水以北要隘，并以该方面游击队向诸城临朐方向游击。职于虞日（七日）到达临沂，一一五旅及师直属部队明晚可到临沂附近。查鲁省第三、第八两行政区游击队，各约二千余，多系民众，枪支恶劣，亦乏训练。海军陆战队，计两大队，共

约二千人。又刘震东游击队正在集合中，刘本人在莒县。又有杨士元奉李长官令，委为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所部现有五百余，在集合中。此五部均归职指挥。名目虽多，战斗力微弱。诸城现有敌三四百，装甲车增至三十余，有西犯模样，已派厉司令文礼、刘司令震东率队截击。日照、石臼所海面，现泊敌舰两艘，连日炮击石臼所及日照县城。又日照东北泊儿镇有敌数百，已令张司令里元派队截击……

日军第五师团以第二十一联队的一个半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为先头，于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南进，中国守军陆战队员和游击队员抵挡不住，日军前锋推进到莒县东北方向的招贤镇。庞炳勋立即命令第一一五旅增援莒县。第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率二三〇团并配属两门山炮为左翼，副旅长黄书勋率二二九团并配属两门山炮为右翼，于二十一日午夜抵达莒县。部队抵达后才发现情报有误，原以为守城的是伪军刘桂堂部，可县城里面异常寂静，一打听才知伪军早就跑了，而日军在城外的攻击阵地已布设完毕。空城不能不占领，于是二二九团立即进城做固守准备，二三〇团位于县城的西边准备策应。

二十二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城。城内的二二九团立足未稳，日军从西北两面实施包围，中国守军城里城外的联系被切断。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日军步兵爬上城墙，双方在城墙上展开了肉搏战，二二九团团长邵恩三负伤。白天日军没能突破城池，半夜里实施偷袭，带着机枪爬上城墙的西北角，副旅长黄书勋和团长邵恩三登上城门督战，最终把偷袭进来的日军赶了回去。二十三日天一亮，日军爬上了城墙的东北角，并从那里向西、南两面延伸，中国守军的压制未能奏效，大批日军涌入莒县县城，双方随即展开了巷战。扼守东北角的是游击队刘震东部，刘震东战死后，游击队残部开始溃退。城外的二三〇团被日军和刘桂堂的伪军牵制无法增援，城里的二二九团只有两个营，两名营长都已负伤。最后时刻，副旅长黄书勋命令把无法携带的两门山炮毁坏，然后放弃县城从南门撤退。

撤退的二二九团一口气跑到莒县西南三十里的夏庄，才与二三〇团会合。但是，日军从莒县追了出来。第一一五旅官兵且战且退，一直撤到了夏庄以南约五十里的相公庄。

这一战，第一一五旅伤亡官兵五百余人，但毙伤日军也有两百多。庞炳勋认为朱家麟旅长指挥不善，应予“革职留用，戴罪立功”的处分。但实事求是地说，第一一五旅官兵面对日军第五师团，“众寡悬殊、竭力抵抗、节节巷战”，称得上进行了顽强的作战。只是那些倒在战场上的重

伤员，因部队撤退时情形急迫，加上莒县县民纷纷回避，他们都被遗弃在了战场上。

与莒县作战同时进行的，是补充团在莒县以西垛庄发起的突袭战。团长李振清率部前往蒙阴的路上，发现一股日军正在一个村庄里休息，于是决定半夜突袭。不料，日军察觉到了危险，连夜开始逃跑，李团长立即率部追击，一直追到垛庄。这是一个大村子，有坚固的寨门，补充团攻击寨门时伤亡很大，于是调来山炮进行轰击，终把寨门轰开了一个缺口。李团长命令三营冲击寨门缺口，二营爬上城墙。中国官兵攻击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前来助战，二营营长潘鸿恩被炸死。日机扔下炸弹的同时，扔下一个信号袋，里面的情报是：将派汽车从蒙阴前来接应。于是，二营和三营继续攻击，一营奉命在公路上伏击日军的汽车队。将少量押车的日军全歼后，一营缴获“全新六轮卡车一辆，步枪九支”。庞炳勋命令补充团即刻撤回临沂。——补充团撤走后的第二天，“垛庄之敌撤走，遗尸装了六汽车”。

占领了莒县和夏庄的日军，继续向临沂前沿阵地汤头推进。在汤头一线，第一一六旅二三二团顽强阻击了五天，最终还是在日军坦克和步兵的联合冲击下不得不撤退，汤头失守。为了迟滞日军的进攻，庞炳勋命第一一五旅二二九团进行反击。这个团在之前的莒县作战中伤亡数百，现在依旧不含糊，迎头与日军相遇时，呈包围态势冲了上去。冲击中，三营营长汪大章阵亡。二二九团最终收复了汤头以南的阵地。

板垣征四郎本以为中国的杂牌部队，别说是阻止他的推进，当是一见到日本旗就会望风而逃，他没想到第五师团此刻真的无法推进了。于是，他把攻击兵力增加到五千余人，并加强了三十余门火炮和二十多辆坦克，于三月九日对临沂前沿阵地发起了总攻。

庞炳勋意识到，李宗仁所说的“死也值得了”的时候到了。他的作战部署是：以第一一六旅之二三一团和二三二团，配属山炮两门，为临沂正面防守部队，由旅长李运通指挥；以第一一五旅（缺二二九团）为右翼掩护部队，由旅长朱家麟指挥；以二二九团、补充团、特务营、工兵营为总预备队，由补充团团长李振清指挥；第三十九师师长马法五为前敌总指挥。

李宗仁电告庞炳勋，临沂为徐州屏障，必须死守，“拒敌前进”。

日军发动总攻后，临沂前沿陷入了苦战。双方逐村争夺，来回拉

锯。在补充团的阵地上，日军飞机轰炸扫射，阵地燃起大火，弹片碎石冲天而起，接着日军的骑兵呐喊而来。骑兵被击退后，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蜂拥而上。补充团的阵地发生危机时，二连组织起一支敢死队，从日军冲锋阵形的侧翼迂回过去。敢死队就二十多人，但小伙子个个精壮，腰上掖着数颗手榴弹，手持一把雪亮的大刀，在夜色中摸了上去。临近时，发现日军正在加固工事，于是一声呼啸大刀疯狂地砍了下去。

我们趁势砍杀，虽是人少，却都是学过武术会耍刀弄棒的小伙子，混在敌人中间，挥舞着雪亮的大刀，如砍瓜切菜，十分得心应手。在刀比枪快的刹那间，日军只要碰着，不死即伤。经过几十分钟的白刃搏斗，敌人抵挡不住，向后溃退，我们抬着负伤的七名敢死队员和缴获的装备，在二班长用夺获敌人的歪把子机枪掩护下，迅速返回了阵地。从战斗中获得的文件表明，与我连激战的敌人，是第五师团田野联队。

十二日，日军加强了飞机的轰炸和火炮的轰击，中国守军阵地上的工事全被夷为平地，几乎所有的军官都伤亡了，临时担任指挥的全是士兵。日军从一个角落涌进阵地，士兵们蜂拥而上把敌人压下去；日军又从另一个角落冲上来，士兵们又朝那边冲去，每个人都浑身是血依旧死战不休。

终于，援军到了。

援军是张自忠部。

张自忠带着他的部队在津浦路战场的南北两端来回奔波。

庞炳勋没想到张自忠会来增援他。

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那时候庞炳勋和张自忠都是冯玉祥的爱将。但随后，庞炳勋被蒋介石暗中收买倒戈反冯，他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张自忠部，致使张自忠本人险遭不测。从那时起，张自忠认为庞炳勋不仁不义，此仇不报，誓不甘休。当初，张自忠部奉命从第一战区调至第五战区，他曾向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过，他的部队可以在任何战场上拼死作战，唯独不能和庞炳勋在同一个战场上，因为庞炳勋的资格比张自忠老，在同一战场必然要听庞炳勋的指挥，这是张自忠绝对不情愿的。于是，李宗仁只好让张自忠到津浦路南段增援于学忠部。但是，当津浦路北段危急时，除了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之外，李宗仁已经无兵可调。为此，李宗仁希望张自忠以国家利益为

重，不但要增援临沂，解救庞炳勋部，还要服从庞炳勋的指挥。出乎李宗仁的预料，张自忠没有犹豫，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自中日开战以来，萦绕在张自忠心头的自疚始终不能消释。卢沟桥事变时，作为宋哲元部的第三十八师师长，他先兼任天津市长后兼任北平市长，始终处于与日方交涉周旋的风口上，及至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他被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媚日求荣。一九三七年秋，他特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这才看到南京街头到处是骂他汉奸的标语，舆论也主张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更有人想趁机把他这支杂牌军部队瓜分了。张自忠除了忍辱负重外别无他法。这时候，李宗仁召见了他，听完他的陈情后，李宗仁去见蒋介石，表示：首先，张自忠绝不是汉奸。其次，如果此时将他的部队拆分，讲义气的西北军官兵如不接受而闹成兵变就糟了。目前，第三十八师全师停留在河南境内，那里将是中原的重要战场。因此，何不让张自忠带着他的部队去与日军作战呢？蒋介石思索了一下，同意了。

张自忠离开南京前去谢李宗仁，堂堂军人话说得竟是异常凄婉：

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缌（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一九三七年八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将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与特务旅合编为第五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及十一月，张自忠从南京回到部队，改任张自忠为军长。

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急促地向临沂靠近，于十二日下午抵达临沂城西。

张自忠和庞炳勋见面了，仇人相见竟然如同亲人久别重逢，前嫌只字未提，张自忠表示一定尽力帮助第三军团打好这一仗。

分析敌情后，草拟了作战命令：

五十九军以一部确占石家屯一带高地，向葛沟、白塔间分途侧击，牵制敌人之增援；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庄之间渡河，向南旋回，与四十军呼应，包围歼灭敌之主力于相公庄、东庄屯、亭子头以南地区。在高里附近之海军陆战队暂归指挥。四十军以主力由沂河东岸与五十九军

呼应，包围敌人之主力歼灭之；在沂河西岸之一部，渡河侧击尤家庄附近之敌。以上各部于十三日晚准备完，十四日拂晓开始攻击。

这是一个张自忠部向内突击、庞炳勋部向外反击的作战部署。十三日，张自忠部向出击阵地开进。第三十八师附属野炮一营为左翼，先占领沂河以西的茶叶山，然后掩护主力展开：第一一三旅和第一一二旅为第一攻击部队，向东渡过沂河攻击张家庄、白塔、沙岭一带日军；第一一四旅为预备队，跟随师部位于茶叶山以南的刘家湖。第一八〇师（缺第八十一旅）附属山炮一营为右翼，在刘家湖以南的安静庄带展开；第二十六旅为第一攻击部队，向东渡过沂河攻击徐家太平、亭子头一带的日军；第三十九旅为预备队，跟随师部行动。

十四日凌晨四时，在漆黑的夜色中，张自忠部冒着细雨开始强渡沂河。第三十八师东渡沂河后，占领了张家庄、解家庄，继续向南面的白塔攻击前进时遭遇日军主力的阻击，于是攻击演变成残酷的争夺战，最终日军后撤，白塔被第三十八师攻占。中午，日军数十辆汽车运来增援部队，在火炮、坦克和飞机的协助下，增援的日军向张家庄、解家庄发起猛烈反扑，第三十八师奋力抵抗后逐渐不支，傍晚退回沂河西岸。第一八〇师强渡沂河后，一路冲杀，先后占领徐家太平、郭家太平、李家太平等村庄。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后，这里也演变成争夺战。晚上，日军向郭家太平等村庄实施反击，第一八〇师血战两昼夜，将当面日军击退。

由于张自忠部的攻击突然而猛烈，日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于是，第五师团放弃了正面攻击临沂的计划，将张自忠部变成了主要攻击目标。

十六日，日军从莒县增援而来的千余兵力抵达战场，在大量飞机的掩护下向张自忠部实施反击，同时又向张自忠部的后方刘家湖等地发起猛攻，双方随即在沂河两岸展开了惨烈的混战。双方的战线犬牙交错，形成了逐村逐屋争夺的拉锯战。防守茶叶山的第三十八师第二二五团七连全部阵亡；在茶叶山以南，防守崖头阵地的两个连仅剩官兵数十人；在崖头的南面，刘家湖阵地被日军三面包围后，两个营的中国官兵反复冲杀，刘家湖数次失守又重被夺回，最终预备队赶到稳定了阵地。此战，张自忠部伤亡已达六千余人，两个师的连长和排长几乎全部易人，营长也已伤亡过半。李宗仁建议他们暂时后撤，但张自忠表示要再打一昼夜：“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很大。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利，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既然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血肉拼

命干一场，争取一个像样的结局！”

“争取一个像样的结局”，这与其是说临沂战局，不如是说张自忠自己的人生。

晚上十时，张自忠部再次向当面日军发动了猛攻。各部逐村进击。他们先投掷手榴弹，然后冲过去近距离肉搏。日军无法支撑，逐村后撤，之前丢失的主阵地被张自忠部一一夺回。三天之后，日军于拂晓重新发动反击，在沂河东岸一个名叫李家五湖的村落，一个营的中国守军被日军包围，中国守军虽弹尽仍不退，待增援部队抵达后这个营已无一人幸存。愤怒的增援官兵猛烈追杀正在撤退的日军，被杀死在村外草丛中的日军有三百多人。

在日军遗弃的尸体中，中国官兵发现有第十一联队联队长长野佐郎、第三大队大队长以及第九中队中队长等军官。据被俘的日军一等兵玉立陆夫说，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坂本顺指挥的支队伤亡了三千余人。

双方在李家五湖附近形成对峙后，因津浦路正面战局紧张，张自忠又奉命前往增援。但是，他刚率领部队离开临沂，日军得到补充后又发动了攻势，庞炳勋部再次陷入险境。二十三日，蒋介石电令正向费县转移的张自忠部，再次回头解救庞炳勋部。二十五日，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回临沂前线，他向李宗仁表示了“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的决心。部队再次强渡沂河与日军进入激战状态。随后，中国军队第二十军团的骑兵增援而来，张自忠部发起大举反击，日军抵挡不住，撤往莒县，临沂方面再次稳定。

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于临沂战场受挫，是这支日军自平型关后第二次受到中国军队的严重打击。败于兵力并不十分充足、武器简陋到重型火力极少的中国杂牌军手下，这令板垣征四郎颜面大失。而中国军队在临沂战场赢得的胜利震动全国，也令张自忠自此改变了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形象——“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

就在张自忠率部来回奔波的时候，津浦路北段一个叫滕县的要点出现了重大危机。

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攻击临沂的时候，在津浦路正面的日军第十

师团已经做好了攻击滕县的准备。

津浦路上的滕县，北面是界河和邹县，西面是独山湖，东面是凯龙山，南面直通徐州。邹县失陷后，滕县成为拱卫徐州的前沿。

三月八日，驻济南的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向第十师团下达了占领滕县的命令。第十师团当即组成了一支以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濑谷启为首的濑谷支队。这支加强了特种兵的突击部队的构成是：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十、第六十联队；独立机枪第十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十、第十二中队；野炮第十联队；临时野炮中队和山炮中队；野战重炮第二联队；中国驻屯军炮兵第三大队；工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以及师团的通信队、卫生队、野战医院和汽车中队等。

滕县方向的中国守军是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其防御部署是：第四十一军王铭章的第一二二师和所辖王志远的第旅进驻滕县；第四十一军税梯青的第一二四师同时开往滕县；第四十五军陈离的第一二七师师部进驻滕县县城内。孙震任命陈离为滕县外围部队的指挥官，负责指挥防守滕县北面界河至香城一线的第四十五军部队；任命王铭章为防御滕县县城指挥官以及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一二二师和第一二四师作战。

王铭章师长进入滕县后，命令王志远的第旅七二七团进驻滕县以北的北沙河；童澄的第三六六旅七三一团进驻滕县东北的平邑和城前，掩护第四十五军的侧背，防备东面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对滕县发动侧击。

中国陆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是川军。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是邓锡侯，因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生病，邓锡侯回川接任，集团军总司令由孙震替代。所辖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五两军，都是中国陆军“乙种军”编制，即每个军两个师，每个师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武器装备简陋的川军，一九三七年九月出川抗日，徒步走完上千公里的川陕大道，入潼关过黄河进入山西战场，与日军周旋作战一个多月后，官兵伤亡严重，以至于从山西战场下来后每个旅只能编出一个团，每个军实际兵力只有一个师两个旅，集团军的总兵力仅有两万余人。

太原失守后，无人过问的这支川军抢了阎锡山的军械库以补充自

己，还不时地骚扰百姓要求强买强卖，弄得山西王阎锡山十分恼火。阎锡山认为川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简直就是一股土匪，随即致电蒋介石，要求把川军从山西调出去。蒋介石很为难："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问程长官要不要？"结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一口回绝："阎老西都不要，你们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正是南京沦陷之际，蒋介石心烦意乱："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去吧！"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听说后，给李宗仁打了个电话，同为桂系将领果然心心相通。正愁手上兵力不足的李宗仁即刻领会了白崇禧的意思，他转而向蒋介石表示他要这支川军，还要求把他们调到徐州方向来。

桂系与川军历史上没什么瓜葛。李宗仁与邓锡侯、孙震在徐州第一次见面时，川军将领对李宗仁的收留心怀感念，说川军慷慨出川抗日，第一、第二战区竟然都不要，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川军的容身之处？现在第五战区要他们，司令长官恩高德厚，川军绝对服从指挥！李宗仁电呈武汉军事委员会，要求拨给第二十二集团军新枪五百支；同时又从战区的武器库里，调配给他们大批的子弹和迫击炮。

一群川人，不在战火未及的四川盆地过日子，非要千里万里地出川抗战流血牺牲，伤亡累累后还要环顾四周看谁能收留自己，就是一再遭受拒绝也绝不善罢甘休，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与日本人打仗——如何理解川人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固执呢？

如今，他们再次如愿以偿。

只是，川军官兵没人预料到，他们迎来的是一场残酷的血战。

三月十四日，日军出动步兵和骑兵万人，在二十多门火炮、二十多辆坦克以及三十余架战机的配合下，向第一二五师和第一二七师防御阵地展开了全线攻击。中国守军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抵抗，孙震亲临前线命令部队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死战到底。他同时宣布了李宗仁转达的蒋介石的命令：第四十一军必须在滕县死守三天，给后方加强徐州防御调动争取时间。

十五日，日军除加强正面攻击之外，还加强了两翼攻击。中国守军右翼第一二七师阻击顽强，加上阵地地形有利，战局暂时稳定；但左翼因为只有第三七〇旅防守，部队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伤亡很大，形势危急。在滕县县城内的王铭章为了保住正面阵地，防止日军腾出兵力向滕县侧后迂回，急调在滕县内防守的第三七二旅奔赴左翼阵地支援，开设

了左翼防御的第二道防线。最后，王铭章还命令派出一个营加强滕县西北阵地，防止日军逐渐渗入。下午，日军对左右两翼的攻击更加猛烈。尽管位于界河的正面阵地未被日军突破，但在两翼阵地上日军已经逐渐深入，其先头部队抵近了滕县东北方向的冯河、龙阳店，切断了滕县外围阵地与滕县县城之间的联系。日军的作战企图非常明确：对正面阵地实施牵制作战，向滕县中国守军的两翼形成大纵深包围，然后攻击滕县县城，迫使正面阵地上的中国守军不战而退。

黄昏时分，正面界河阵地被日军突破，侧翼的龙山阵地也被日军包围。滕县外围阵地已失去屏障县城的作用，滕县直接处在了日军的火力之下。

此时的滕县县城里，只有第一二二、第一二四、第一二七师师部以及第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有一个特务连或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作战部队。王铭章急令城外的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六旅火速回城，但该旅尚在距县城百里之外的外围阵地上，更何况回援途中难免遭到日军的阻击。滕县县城的险境令孙震万分焦急，他身边能够作战的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个营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手枪连。孙震顾不上集团军司令部的安危，只把手枪连留了下来，命令特务营营长刘止戎带上三个步兵连星夜赶往滕县。王铭章还直接给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打电话，命令他留一个营防御原阵地，另留一个营在北沙河二线阵地归第一二七师指挥，剩余部队立即回防滕县。——张团长把武器装备最好的两个营留在了城外，带回来的部队仅是没有机枪的三营、有四门土造八二迫击炮的炮连、有四部破旧电话的通信排以及有二十多副竹担架的担架排。但是，他在回防的路上，把滕县以北十五里处的北沙河大桥炸了。

张宣武率部抵达滕县北门，焦灼的王铭章已经在城门等候多时。不久，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特务营也赶到了。截至十五日夜，滕县中国守军共有一个团部、三个营部、十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师部和旅部的四个特务连，加上临时来县城领取粮食弹药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七四三团的一个步兵连，总计兵力约两千五百余人。此外，滕县县长周同手里还有警察和保安六百余人。王铭章的第一二二师师部在县城西关的电灯厂里。第一二四、第一二七师师部一起在城内北街的一座宅邸里，第旅旅部在西门里的一家盐店里。

部队连夜赶修工事，搬运粮食弹药。

深夜，从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临城运来了弹药，其中最多的是手榴弹，让滕县城墙上的守军“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这些手榴弹在之后的苦战中成为守军官兵最得力的武器。

此时，从东面迂回滕县的濑谷支队已经接近城垣。濑谷启作出的攻城部署是：第十联队负责攻城，第六十三联队绕到滕县以南，阻击中国军队的增援部队。

十六日凌晨，日军的炮火准备开始，天上十多架飞机投下暴雨般的炸弹，地面火炮发射的炮弹密集地落入城内，滕县居民在横飞的弹片中疯狂地自西门汹涌而出。很快，除了王铭章的守军之外，滕县成为一座空城。

第一二二师多数军官对死守没有信心，认为武器装备简陋的前提下兵力又实在是有限，不要说死守三天，就是坚守一天也尚无把握。既然守不住，不如出城实施机动作战。王铭章当即给孙震打电话请示，孙震的回答是：“集结残部，勉力杀敌，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王铭章只有下决心死守：

……我们决定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立即把南、北两城门屯闭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在四门张贴布告，晓谕全体官兵，没有本师长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王铭章这边刚刚部署完毕，滕县城东突然炮声大作。

日军集中了所有火炮向滕县城东的城墙猛烈轰击，城墙顷刻间被炸开了一道缺口。接着，日军集中轻重机枪数十挺，掩护步兵开始向缺口冲击。守卫城东城墙的七三一团一连官兵在日军冲到城墙下的壕沟时，一声令下，数百枚手榴弹同时投向日军，日军于血肉横飞中丢下数十具尸体仓皇退却。然后，日军再次开始炮击，炮击之后又一次冲击，如此反复，城墙下遗尸累累，一连守军伤亡百人以上，阵地由三连接替。下午，日军在飞机的助攻下，采取一次三个小队，每小队相距百米，前后重叠的梯形冲击战术，第一梯队伤亡殆尽，第二梯队接着冲上来。城东正面前沿的中国守军全部伤亡，尽管两翼部队紧急封堵，日军还是冲进城内数十人。天黑了，双方相距几十米对峙。七二七团三营十一连在连长张进如的率领下，趁着夜色向日军发动了反击，以阵亡两位排长和伤

亡七十名士兵的代价，将突进来的日军全部歼灭，收复城东关。

夜色中，枪炮声停止了。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奉命来到王铭章的指挥部。这个时候，王师长依旧很乐观，他告诉张宣武“把今天撑过去就不要紧了”，因为第三六六旅很快就能抵达了；如再把明天撑过去，蒋介石在电报里说的援军也能赶到了。

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并没有在滕县止步不前的准备，他认为伤亡数百人竟拿不下一个小县城不符合第十师团的声誉。这个晚上，他紧急调集了三万兵力将滕县县城三面包围。

十七日黎明来临，日军二十多架飞机的轰炸和五十多门山炮的轰击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滕县县城内所有的房舍皆成灰烬。在城东关，中国守军七四〇团官兵拼死抵抗，一直到中午依旧保持着阵地。在城的东南角，日军的炮火将城墙轰开后，坦克冲入了滕县县城。中国守军无力阻挡坦克，而坦克后面就是洪水般冲锋的步兵。眼看着日军深入进来，七二七团的一个连奉命反击。一阵手榴弹后，中国守军迎头而上，双方在城墙上下展开了白刃战。当日军被堵回去的时候，一百五十人的连队只剩下十四人，阵亡者中包括连长张荃馨和副连长吉昌。下午，日军把攻击重点放在了南门，十二门榴弹重炮集中轰击南城墙的正面，飞机也向南关投弹扫射。在这里防守的第三七二旅七四三团的两个连，昨天深夜才换防至此，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官兵在日军重炮的轰击中死伤半数，日军随即占领了南关。而在城东方向，当中国守军弹药告罄时被迫后撤，东关也被日军突破。

南关和东关丢失后，王铭章把他的指挥部搬到了滕县正中央的十字路口上，目的是让各个方向的官兵都看见他们的师长还在！

王铭章，四十五岁，四川新都县人。自幼聪慧过人，十二岁投考县高等小学名列榜首，十六岁入四川陆军小学，十八岁参加了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后进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即加入川军参加护国之役，屡建战功，北伐时已升任师长，以骁勇善战闻名。抗战初期，他率部出川，“单衣草履”，“竹席斗笠”，徒步出剑门翻秦岭进入山西战场。出川前，留下遗嘱嘱咐家人：“誓以必死报国。将积年薪俸所得，酌留赡家及子女教育之用，余以建立公益事业。”

十七日傍晚，滕县西门也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的子弹已从四面向县城中央打来。

王铭章师长在枪声中仔细辨听，希望听到城外增援部队的枪声。

奉命增援滕县的是中央军汤恩伯部。

十四日，李宗仁致电汤恩伯，言日军正在增加兵力凶猛反攻，“以牵制我鲁南之作战”，而川军部队“兵少械劣”，以致“正面薄弱两翼空虚”。因此，要求调派他的第四师火速赶往滕县附近，以助第二十二集团军“拒敌”。李宗仁望汤恩伯“即出动为荷”。当天，汤恩伯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恳以本军团全部调津浦路北段出击”，这样可以“避免分割零碎使用以益战局”，杜绝“分散或作无代价之消耗”。实际上，汤恩伯是不愿意把他的部队交给杂牌军指挥。直到蒋介石明确表示，汤恩伯部不归孙震指挥，但“务于十七日拂晓前达到临城”后，第四师才由河南商丘出动。

坐在滕县十字路口中央的王铭章发现，在汤恩伯可能增援的方向枪炮声渐渐地远去了。

王铭章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他向孙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心死力扼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王铭章对身边的滕县县长周同说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这儿的事有我。”周同县长说：“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也真惭愧得很。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决不苟生，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

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王铭章师长走上了滕县城墙残破的西北角，命令身边仅有的一个排官兵向西门猛扑，但此时的西门已完全处在日军的火力封锁下。王铭章转身，准备到火车站附近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去，日军的机枪手发现了他。——“王铭章将军一弹中腰扑地……”

“县长周同闻知王师长殉难，急忙从城北赶来，抚摸着王之遗体大哭。最后，缓步登上城墙，对天长叹，坠城而亡。”

滕县保卫战，与王铭章师长一起阵亡的，还有第一二二师参谋长赵渭滨、师部副官长罗甲辛，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师部副官长傅泽民、七四〇团团长王麟。第旅旅长王志远，第三七〇旅旅长吕康，第旅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均负重伤。

未能突围的滕县守军，没有一人放下武器，也没有一人投降，全部战死。因为官兵全部战死，没有人运送伤员，城内的三百余名伤员用手榴弹自杀殉城。

十八日中午，城内枪声停止，日军占领滕县。

滕县一役，中国守军第四十一军伤亡五千余人，外围作战部队伤亡四千余人，毙敌两千余人。

滕县作战，为中国军队于徐州战场的布防赢得一百多小时。

战后，王铭章师长的遗骸被民众寻到并细心收殓。遗体装船运回四川，船沿长江溯流而行，国民跪拜于岸，英、法船舶降半旗致哀。在故乡四川新都，民众为王师长举行了迎灵安葬仪式，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敬献的挽联上写着：“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王师长墓园楹联为蒋介石亲撰：“执干戈以卫邦家，壮士不还，拼将忠诚垂宇宙；闻鼙鼓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国民政府特令褒奖王铭章：

陆军第一百二十二师师长王铭章，赋性刚毅，志行忠贞，此次于滕县之役，苦守要区，逾三昼夜，卒待援军到达，阵线得以巩固，不幸殊勋甫建，以率部奋力巷战，竟尔殉职。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忠勋，以资矜式。

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民情安然。

一群川人以牺牲生命报效了国家，他们用精神和血肉赢得了一个“像样的结局”。

就在中国军队血战滕县之时，沦陷中的南京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是中日开战以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现的第二个汉奸伪政

府。“庆祝大典”的会场上挂满了北洋时期的五色旗，大批日本陆军和海军军官站在台上。但是，没有任何一国的使节参加。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员名单：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部长陈群，外交部部长陈箓（后廉隅），财政部部长陈锦涛（后严家炽），交通部部长梁鸿志（兼，后江洪杰），教育部部长陈则民（兼，后顾澄、赵正平），实业部部长王子惠，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司法行政部部长胡礽泰，秘书厅秘书长吴用威，印铸局局长李宣倜，宣传局局长刘镶业，禁烟局局长刘亚文。

中国遍地英雄。

中国也有汉奸。

攻陷滕县后，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研究继续南下的路线，他在地图上看见自滕县向南有个运河边上的小镇，卡在通往徐州的必经之路上。

这个小镇名叫台儿庄。

第十章

台儿庄是吾人光荣所在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日军士兵涩谷升日记：

上午六时，向台儿庄前进，第五中队机枪队在右侧第一线，总队部向铁路敌阵开始进攻，敌兵约数千，第五中队呼应总队部向敌阵进攻，受敌方猛烈射击，不支伏于麦田，谷川君战死，第三小队之见泽君去向不明，中仓、中原两君受伤。接着，向铁路东西面村落夜袭。小队长下令，各兵要抱死心。敌方以捷克机关枪猛射，我伏在地上，立在前面之森君中弹即死，黑川君亦中弹倒地，金田君负伤。战车队向南面蓦进，展开肉搏战，小队长负伤。因敌兵甚多，我军含泪而退，马十匹倒地，经理部长战死，其他死伤不少。敌方发射愈猛，我中队不能与总队部取得联络，约历一夜，川谷君战死。

这个名叫涩谷升的日军士兵并不知道，他在中国战场上的地狱般的经历才刚刚开始。

坚持要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的侵华日军，尽管在津浦路南段和北段均因受到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而推进缓慢，但并没有因此改变其既定的作战决心。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再次向东京大本营提出申请："追剿眼前之敌，决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警备后方希望增加兵力。"这一次，申请得到了批准，原因"与更换了过去一贯慎重作战的作战课课长河边大佐，于三月一日由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中佐就任作战课长很有关系"，而稻田正纯的上任被认为将推动战争进入疯狂状态。只是，东京大本营还是对华北方面军给出了限制："任何场合，均不得超越临城、枣庄、临沂之线。"

然而，侵华日军不会遵守这一限制。

在攻占临城、滕县之后，南下占领峄县，就已超越了东京大本营设置的限制线。此时，攻击临沂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因受到中国军队张自忠部和庞炳勋部的阻击无法脱身，第二军参谋冈本清福大佐来到兖州，向矶谷廉介转述了坂本支队的困境，希望得到第十师团的支援。矶谷廉介立即命令濑谷支队：在"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并警备临城、峄县"的同时，"应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临沂）方面突进，协

助第五师团战斗”。

濑谷支队由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十、第六十三联队，独立机枪第十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十、第十二中队，野炮兵第十联队（缺一个大队两个中队），工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等部队组成。

三月二十二日，支队长濑谷启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右追击队作为韩庄守备队，负责守备韩庄附近；

二、台儿庄派遣队（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配属野炮一个大队）明二十三日从峄县出发，确保台儿庄附近运河一线地区；

三、沂州支队（步兵第十联队）明二十三日从临城出发，向沂州方面前进，策应坂本支队作战；

四、支队主力集结于峄县附近。

濑谷启知道，中国军队的第二师、第四师、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九师都已进入台儿庄地区。但是，他依旧不顾中国大军云集，目中无人地决定孤军深入，其投入攻台儿庄地区的部队竟然只有一个大队——按照日本陆军的编成标准，一个大队的规模大于中国军队的一个营但小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兵力约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之间——足见对中国军队的极度蔑视。

台儿庄位于山东峄县东南，北接津浦路的台枣支线（台儿庄至枣庄），南临陇海铁路，西南距徐州五十多公里。大运河从庄南流过，水深两米多，自古便是鲁南的水陆码头。台儿庄名为“庄”，实际上是一座有环绕寨墙并有六个寨门的市镇，寨墙虽两丈余高却由砖土砌成，六个寨门分别是：西门、西北门、北门、东门、东南门、南门。城北是一片开阔地，矗立着大小碉楼数十座；西面是铁路；东面散布着村庄。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记述，他对日军狂妄地孤军深入是有所预见的：“我当时的作战腹案，是相机着汤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我判断以敌军之骄狂，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我正要利用敌将此种心理，设成圈套，请君入瓮。”由此，李宗仁拟定的作战计划的要义是：汤恩伯部提前集结于峄县以北，台儿庄防御仅仅是正面阻击和牵制，待沿台枣支线南下的日军被阻挡在台儿庄时，汤恩伯部将

从日军的侧背突然发起攻击，压缩并歼灭日军于微山湖畔。这计划的合理之处在于：南下冒进的日军兵力不多，且深入了中国军队阵线的腹地，只要不让日军很快地冲过去，在汤恩伯部主力的包抄侧击下，冒进的日军定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候，只要中国军队勇猛出击，紧密配合，完全可能给予南下的日军以重创。——这个先把主力藏起来，然后再杀回来的战术，被李宗仁称为“轴回旋”。

之所以选择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担任侧击主力，根本原因还在于汤恩伯部属于精锐的中央军部队。军团下辖第十三、第五十二、第八十五军。第十三军军长由汤恩伯兼任，下辖第一一〇师，师长张轸。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下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下辖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该军团装备齐全”，是当时中国陆军中的“精华”。

负责台儿庄正面防御的，是从第一战区调来的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该集团军名义上下辖两个军，即田镇南的第三十军和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但在之前的平汉路和娘子关作战中，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损失惨重，仅仅剩下一个空架子，孙连仲多次请求补充都未获批准。所以，此时的第二集团军，实际上只有三个师可以参加作战，即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的第三十师和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

第二集团军属西北军旧部，来徐州战场前被调来调去：先从山西调到豫鄂交界处的武胜关一带修筑国防工事；后又奉命把修了一半的国防工事交给滇军第六十军，北调至郑州附近去守黄河；刚走到黄河边上，听闻滕县失守，于是奉命东进徐州，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走到半路，又接到命令，要求赶赴台儿庄地区归汤恩伯指挥。此时，孙连仲的任务仅仅是牵制住日军，以便汤恩伯部主力从侧背出击。

因部队过郑州时师长池峰城因事停留，李宗仁将师参谋主任屈伸叫到了徐州，当面交代给第三十一师的任务是：背靠台儿庄，向北面的峄县出击诱敌；在日军受到引诱发起进攻时，坚决守住台儿庄阵地。李宗仁说：“敌如出而迎战，贵师应尽力堵击，追汤恩伯军团进击侧背，全力压迫敌人于微山湖畔聚而歼之；敌如固守待援，贵师应尽力牵制，监视敌人，掩护关麟征军北上与王仲廉军协力包围攻击，歼灭枣庄之敌，再回师合击峄县之敌，将战线推进到兖州以北。为了协同方便，贵师即暂归汤军团长指挥。”

师长池峰城赶到台儿庄后，正在北上的第二十军团路过台儿庄南车站，池峰城在车站里会晤了军团长汤恩伯和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汤恩伯表示：“贵师任务重大，务须努力堵击敌人南进。”而他的部队将在第三十一师与敌接火后，“不顾一切，马上抄袭敌之侧背”，绝不会让贵军“孤军苦战”。为了届时紧密协同，请池师长暂接受关军长指挥，“一切细节问题请与关军长就近协商”。池峰城立刻向关麟征询问了他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即一旦第三十一师与日军打起来，第五十二军何时才能发起侧击？换句话说，第三十一师在台儿庄到底坚守几天才算完成任务？关军长的回答毫不含糊：“贵师与敌接触，枪声一响，我们便能马上回援，按距离算，最多不出一日定可回援。贵师守台儿庄，能坚持三天即算完成任务。”

池峰城师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后来战局的演变与关军长的承诺毫不沾边，他的部队不但变成了日军的主攻对象，他负责防守的台儿庄也变成了战区的主战场；而且，围绕着台儿庄的惨烈战斗，竟然持续了半个月之久。其间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苦盼着李宗仁的那个“轴回旋”立即实施，苦盼着汤恩伯部能“不顾一切”“马上回援”。他不得不“孤军苦战”，在那些血肉横飞的日子里承受利刀剜骨般的煎熬。

第二集团军抵达台儿庄后，孙连仲将他的三个师铺开设防：第三十师在左翼，第二十七师在右翼，第三十一师在中间防守台儿庄。第三十师下辖两个旅四个团，加上师直属各部队，兵力约万余人。官兵手里的步枪型号很杂，以汉阳造的七九步枪居多，还有日本三八式和六五式，以及少量的捷克式七九枪。每连有轻机枪三至四挺，每营有重机枪至四挺，每团迫击炮连有八二迫击炮四门。全师配属一个炮兵营，有野炮十门。

刚进入台儿庄的时候，这里的店铺还在营业，街上的行人也是神情悠然。但是，一看到第三十一师官兵驻扎下来，听说这里将要和日本人打仗时，一夜之间台儿庄成了一座空城。

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发布作战命令，其中涉及第三十一师的部署是：

第三十一师应于本晚，由台儿庄渡河，主力控制于南洛、北洛一带，以得力之一部，在獐山附近占领阵地，向峄县方向警戒，掩护本军由台儿庄渡河。本月二十三日拂晓前，应推进至獐山、天桂山一一五高地、白西山之线占领高地，并以一部时时向峄县之敌袭击，以一部向韩

庄方面游击。

十五时三十分，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下达的作战命令是：

一、第九三旅之一八五团位置于北洛，以一营进至前城、赵庄地区，该旅之便衣队即向獐山、北山西、黄山湖搜索而占领之。旅部率禹营位置于南洛附近，应于明拂晓后向峄县之敌佯攻，后逐次抵抗于北洛附近。第一八六团（欠禹营）担任台儿庄之守备。

二、第九一旅一八一团控置于台儿庄，以一八二团担任台儿庄运河南岸警戒。

三、师骑兵（欠两班）于明日拂晓向峄县东南地区极力活动。

四、师部推进至台儿庄。

池峰城还命令工兵营收集船只，在西门外的运河上搭建浮桥，作为师指挥部与寨内的交通补给线和联络线。

这是背水一战的部署。

天黑了，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将运河南岸防务移交给军团直属的第一一〇师，然后经台儿庄、兰陵镇移至枣庄以东的向城一带；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则在峄县与韩庄一线与日军脱离接触，然后转移集结在率庄以北的抱犊圜山区里——这是在执行李宗仁的“让开津浦路正面”的设想。

二十三日拂晓，按照李宗仁诱敌深入的计划，第三十一师开始向台儿庄以北的峄县方向主动出击，实施佯攻诱敌。——汤恩伯说，日军占据的峄县城池很坚固，必须把他们引出来。第三十一师派出了由连长刘兰斋率领的骑兵连、由一八五团一营副营长王保坤率领的加强步兵连，第九十三旅旅长乜子彬则率一八五团主力随后跟进。此时，日军台儿庄派遣队正沿台枣支线南下，两军在峄县以南约二十里的康庄、赵庄附近遭遇，第三十一师的骑兵连和加强步兵连且战且退。接近中午时分，日军增加三百余兵力，又增加了七辆坦克，沿着铁路线凶猛地向前突击。骑兵连和加强步兵连分别陷入包围，激烈的交战中伤亡惨重，一营副营长王保坤、加强连连长寇葆贞均阵亡。十四时，日军逼近铁路西侧的北洛并发起攻击，第九十三旅的简易工事被日军炮火摧毁，一八五团坚持至傍晚时分，团长王郁彬指挥官兵退守南洛。

濑谷启从战场上的中国战俘那里得知：峄县以北是汤恩伯部的四个师，拟于二十四日发起攻击。濑谷启当即决定：支队主力集结在临城、峄县一带，准备与汤恩伯部展开决战，以确保徐州北面的门户韩庄以及台儿庄附近大运河一线。只是，他并没有改变台儿庄派遣队的任务。此时，中国第五战区的将领们尚未摸清日军的真正意图，认为日军向台儿庄方向的攻击是试探性的，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在峄县附近与汤恩伯部决战。那么，只要明天日军不继续向台儿庄靠近，以台儿庄为靠背的诱敌深入计划就仍需维持。依据这一判断，二十三日晚，池峰城师长下达的作战命令依旧是：与当面之敌保持接触，吸引敌军南进，以协力汤恩伯军团之攻势，歼敌于台儿庄以北地区。

令中国官兵印象深刻的是：日军向台儿庄进击的兵力并不多，但是在接敌的第一天，骑兵连和加强步兵连就有百余人阵亡，且多是陷入包围后被日军屠杀的。日军残暴而凶悍的杀伤力，令必须主动接敌的第三十一师官兵有了隐隐的不安。

二十四日拂晓，中国空军出动十四架战机，轰炸了韩庄、临城和穿庄一带的日军据点。濑谷启知道，这是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先兆。濑谷支队主力集结在临城、峄县一线，却一直没有等来中国军队的任何动静——汤恩伯并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发起攻击，他的军团部和第八十五军仍停留在抱犊山区里，只有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到达了预定进攻位置——枣庄东面的鹁鸽窝、郭里集一带，并在那里与濑谷启指挥的沂州支队形成对峙。这个时候，日军台儿庄派遣队仍在向台儿庄推进。

二十四日早七时，台儿庄派遣队从北洛出发，其前锋试探性地攻击了孙庄，在第三十一师的抵抗下没有进展。两个小时后，日军后续部队抵达，在二十余门火炮的掩护下，向北洛以南一线发动了猛烈攻击，台儿庄以北的刘家湖各村相继失守，第三十一师官兵一边抵抗一边逐次后退。中午，日军飞机对退入台儿庄东北方向园上村内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轰炸，守军伤亡殆尽时日军占领了园上村。

从刘家湖和园上村，日军已经能够看见台儿庄单薄的寨墙了。

日军台儿庄派遣队单刀直入，根本不管置于侧背的汤恩伯部，其一路进击的方向始终是台儿庄，而濑谷支队主力则集结在台儿庄派遣队身后，随时以备汤恩伯部不测。池峰城师长终于意识到，日军台儿庄派遣队既不是在试探性攻击，也从没有为中国军队所诱，其作战任务就是占领台儿庄，他的第三十一师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

池峰城立即联系汤恩伯部以求获得支援：

师自二十三日晨诱致当面之敌接触以来，迭将战况电报军团长汤、军长关，迄未取得联络。今十三时，始奉军团长汤、军长关电示：军团正于郭里集与敌激战中，爰悉军团主力迂回已远，未能即时回军南歼当面之寇。

汤恩伯的意思是，他的第二十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走出很远，正在枣庄东南方向的郭里集与日军“激战”，无法南下“回旋”台儿庄助池峰城部歼灭“当面之寇”。

池峰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命令一八五团不惜一切代价向刘家湖反击，命令一八六团务必收复园上村，以重新构筑起台儿庄北面的外围防御线。十四时，一八五团由南洛突然出击，当面日军猝不及防，出现伤亡后撤退，刘家湖阵地得以收复。但园上村里的日军据守不退，一八六团的反击没有成功。刘家湖阵地刚刚稳定，日军突然又反攻而来，致使台儿庄北面阵地全面陷入激战，一股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防线直逼台儿庄城下。日军集中起炮兵火力，对台儿庄实施了破坏性轰击，第三十一师师部所在的南车站大楼被击中，师部被迫转移到车站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下。台儿庄的北面都是开阔的平地，日军迫近寨墙时不得不暴露在中国守军的火力之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日军士兵只好疯狂地挖掘临时掩体，挖出一个坑趴在里面不敢抬头。为了压制中国守军的火力，日军再次对台儿庄寨墙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轰击，致使北部寨墙多处倒塌，形成几个大缺口，数股日军从缺口冲入。危急时刻，一八六团团长王震、团附姜常泰率领预备队紧急增援。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向突入的日军猛烈扫射，日军在伤亡不断的情况下仍持续冲锋，两军在寨墙附近混战在一起。战斗中王震团长和姜常泰副团长均负重伤。池峰城派副师长康法如上来顶替王震指挥，可康副师长刚上来便身负重伤，池峰城又派参议王冠五上来指挥。经过死战，中国守军终把突入寨内的日军逼退，北寨墙外的日军遗尸后撤。

台儿庄激战之时，二十三日蒋介石抵达徐州视察，并让随行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和作战厅厅长刘斐留下来，协助第五战区指挥作战。台儿庄受到的猛烈攻击，令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人颇感意外。或许此时李宗仁才意识到，让孙连仲部诱敌深入，再让汤恩伯部猛烈侧击，以图压缩日军于微山湖畔将其歼灭的“轴回旋”计划过于夸张了，台儿庄才是这股日军必要攻克的战略要点。于是，第五战区改变了作战部署：命令第三十一师防守台儿庄，取消原定之诱敌任务，并增

调一个炮兵营（携带七十五毫米野炮十门）、一个机械化野战重炮兵连（携带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两门），以及铁甲车第三中队，全部配属给第三十一师。同时，解除第三十一师归属汤恩伯指挥的命令，将第三十一师交还给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指挥。

孙连仲随即命令第三十一师全力死守台儿庄，命令右翼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火速增援台儿庄，然后他把自己的集团军总指挥部前推到距台儿庄不足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尽管处在日军火炮的射程内，但这个小村庄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日军始终未能判明这里就是孙连仲的指挥部。按照规定，总指挥部的位置应距战场第一线二十公里，但孙连仲率领他的参谋们上了前沿，足见其死守台儿庄的决心。

二十四日凌晨五时，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从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柳泉、贾汪地区徒步向台儿庄开进，辎重营及炮兵则由火车运至台儿庄南站。黄昏时分，第二十七师全部抵达并在规定地域展开：第七十九旅在铁路以西，第八十旅在铁路以东，师部与直属队在台儿庄以西约十公里处的贾桥。午后，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命令第二十七师，以一个营接替第三十一师的运河防线阵地，其余部队皆立即开赴台儿庄“暂归池师长指挥”。

午夜，白崇禧在孙连仲的陪同下来到第二集团军指挥部。了解敌情与战况后，白崇禧认为：“敌将以一部牵制我汤军团，而以主力攻略台儿庄，以崩坏我迂回军之旋转轴。”——我诱敌部队变成了敌主攻目标，我主攻部队变成了敌牵制对象，第五战区精心策划的“轴回旋”计划，于作战发动之际其“轴”就已“崩坏”了。临走，白崇禧嘱咐池峰城师长：“台儿庄乃徐州屏障，今此要点，已非汤军团之旋转轴，乃战区旋转轴也，期能三日守，俾战区获得时间余裕，敌可就歼也。”

同是这天晚上，濑谷启收到了台儿庄派遣队受到攻击请求增援的电报，他当即派出两个中队携带两门重炮南下增援台儿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得知台儿庄派遣队受挫后，决定由第六十三联队福荣大佐率领第三大队赶赴台儿庄指挥攻坚。

除了死守台儿庄之外，孙连仲已没有别的选择，但他知道进攻是防御的最好手段。二十五日凌晨二时，他命令部队北出向台儿庄外围的日军实施反击。在漆黑的夜色里，一八六团一部佯攻孟庄，主力则向园上村实施反击，日军据守在园上村的民房和碉楼里，反击部队因遭到炮火杀伤而无大进展。一八五团一部攻击裴庄的日军，经过激战双方形成对

峙。一八二团向沧浪庙方向的反击取得成效，日军开始向园上村方向撤退，一八五团乘机攻占了裴庄。中国官兵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日军第六十三联队第三大队已经到达战场。

凌晨四时半，池峰城发布命令：一八一团固守现位置，主力在台枣铁路线东侧，于日军南进时实施侧击，同时把台儿庄以北刘家湖附近的公路尽量破坏；一八六团参加反击作战的部队尽快回撤，加强台儿庄内城防工事；一八二团回撤北车站，作为全师预备队；炮兵七团占领并开设炮兵阵地。之后，池师长亲自带领铁甲第三中队出台儿庄向北，于早晨六时抵达南洛村北端，然后指挥炮兵向北洛及刘家湖的日军据点开始轰击——“敌顿形惊慌混乱，杀伤甚大，敌旋以炮还击，伤我士兵两名，机枪一挺，即撤回车站。”

天亮了。日军在飞机轰炸和炮火轰击后，猛攻南洛附近中国守军阵地。第三十一师两次北出台儿庄增援，依旧没能抵挡住日军步兵的冲锋，南洛北面的阵地失守，守军两个连的官兵全部阵亡。接着，南洛以东的刘家湖阵地失陷。为争取主动，第九十三旅旅长乜子彬率一八五团向南洛攻击前进。上午十时，部队行进到刘家湖附近时，乜旅长发现村东北的小树林里有日军的炮兵阵地，大约十门火炮正疯狂地向台儿庄方向轰击。三营营长高鸿立决心把那十几门大炮夺到手。

高是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刚直粗犷，一向作战勇敢果决。马上在麦田里集合全营部队，指着那片小松林说：“你们瞧，轰炸我台儿庄的炮弹，都是从那里发射的。我们要把狗日的那十几门炮夺回来，煞煞鬼子的威风！你们敢不敢？”话音刚落，高鸿立忽地把上身的棉军衣和衬衫全脱下来，左手握着手枪，右手举起大刀，赤胸露臂，以洪亮的声音喊道：”敢随我去夺炮的要像我一样！”话未说完，全营官兵霎时间全把上衣脱得精光，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高营长率领下，白光闪耀，直向小松林冲去。敌人见此情景，惊恐万状，一面以步枪向我高营阻击，一面拉出炮车掉头向东遁逃。高营官兵一片喊杀声随后追击。

正在追击中，北面突然出现日军的千余步兵和二十多辆坦克，见到自己的炮兵被中国军队追得在麦田里狂奔，日军坦克立即迎着高营长的部队冲过来。中国官兵没有打坦克的武器，很快就被日军冲散，各自为战地与日军步兵厮杀在一起。一八五团团长王郁彬闻讯率营赶去增援，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肉搏战在麦田里展开。喊杀声、枪弹声、坦克的轰鸣声和刺刀的碰击声汇成一片。双方血战两小时，待旅长乜子彬前来解救时，王郁彬团长的大腿被子弹洞穿，高鸿立营长头部负伤，一营和

二营营长都已阵亡，一八五团连以下官兵阵亡了一半以上。——尽管一八五团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使一向骄横的日寇认识到中国人的骨头还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好啃的”

外围的受袭，并没有阻止日军攻占台儿庄的决心。

二十五日下午，在日军猛烈的炮击下，台儿庄北门以及附近寨墙“倒塌数丈”，日军步兵从缺口处向庄内猛突。为减缓庄内守军的巨大压力，台儿庄外围部队奉命发起侧击，由于火力弱势没能减缓日军的强攻，台儿庄北门最终被突破，两百余名日军冲了进来。守寨墙的一八六团官兵奋力反击，以四百余名官兵伤亡的代价将缺口封堵，但一部分日军被堵在了庄内的大庙里。这是台儿庄城内的一座城隍庙，楼高院深，里面长满野草，中国士兵放火将草点燃，致使大庙燃起熊熊烈火，窜进来的日军官兵全部被烧死在里面。

这一天，战场上终于传来了汤恩伯部的消息：集结在枣庄以东的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一部，与濑谷启指挥的日军沂州支队前锋小部队发生了战斗；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也从鹁鸽窝方向对枣庄发起攻击，激战两昼夜后一度占领了大部市区，但随即便遭遇了增援日军的强力反击。师长郑洞国向汤恩伯求援，汤恩伯率第八十五军主力仍在抱犊崮山中，接到电报后仅派出一个旅，这个旅又只派出个团，这个团也就派出了几个排，在枣庄外围骚扰一番就撤走了。关麟征军长怒火中烧：“汤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对我们也玩弄这一手，实在太不应该。”但是，汤恩伯给李宗仁发去电报报告的却是：“枣庄之敌约一联队，经我第四师猛攻后，即退入枣庄东部之中兴煤矿公司顽强抵抗。该公司房屋坚固，敌并设外壕电网，不易攻击。枣庄西部均为我占，并经火焚烧敌战车七八辆。刻乃激战中。经饬该师如再不能奏效，即以一部对敌监视，主力仍撤回枣庄以北高地，本晚再行攻击，并一部进出枣庄南端之铁路线上夹击之。峄县县城及其附近有敌约三千余人。关军昨晚已开始攻击，请饬空军迅速前来轰炸枣庄之中兴公司及峄县县城。”——汤恩伯明知台儿庄正遭受日军持续猛烈的攻击，却按兵不动，反要空军来轰炸他的部队所在战场上的日军。

这天凌晨，日军士兵涩谷升跟随他的部队退至南洛村：

敌装甲车出现于前面约距五十公尺，因势寡不得动手，浜尾君战殁，排长率第五分队前往总队部联络时，我阵地北方发现敌兵数千人，吹喇叭而向我阵地进攻。刘家湖方面之敌兵亦甚众，向我攻袭，各兵抱

定决心待死，经历两小时许，忽闻友军枪声四起。第七中队及辎兵队负伤颇众，在刘家湖取抵抗态势，伤兵送往卫生队，中途所有乡村均放火焚烧。

台儿庄中国守军在数量上是日军的五倍，但装备上却与日军相差甚远。日军除了有大量飞机助战外，重型火炮的优势十分明显，步兵还配属了大量坦克。孙连仲部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反坦克武器，官兵们只能依靠血肉之躯阻击日军的进攻。台儿庄镇面积不大，回旋余地很小，庄内也没有可以利用的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在日军凶猛火力的轰击下，寨墙一次次地被突破，守军填补缺口变得越来越艰难，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台儿庄内的民居，大多由石块砌成，日军突进来占据一座民房，这座民房就会变成一座地堡，中国守军很难一一清除。但对于日军来讲，中国守军誓死不退，即使突进去部分步兵，也会遭到毫不犹豫的反击。在逐街逐屋的巷战中，突进去的士兵面对中国守军的顽强拼杀，很难扩大战果。在台儿庄这个狭窄的地域里，双方都无法投入更多更密集的兵力，镇内的短兵相接也使日军的优势火炮无法进一步发挥威力。攻者意志强硬，守者寸土不让，双方在这个运河边的小镇内外进行的犹如一场永无休止的拉锯式肉搏。

二十六日，台儿庄依旧处于混战之中。

早晨七时，园上村附近的日军炮兵开始向台儿庄轰击，步兵在炮火准备后再次强攻北寨墙。两个小时后，台儿庄北门再次被日军突破，一股日军又窜入了镇内的城隍庙。昨天，中国守军在这里放火烧死了数名日本兵，现在荒草已经烧光，再放火也无济于事，日军坚守在里面无论如何不出来。北门的缺口越来越大，涌入的日军越来越多，台儿庄守军开始内外受敌。——“我守兵塞街巷，抛瓦罐，掷家具，折栋倾墙以堵击，在敌炮击下死伤累累，城内始步步荆棘，卒遏制敌之进展，而敌亦自毙于轰击者甚重。”

傍晚，台儿庄的东面被日军占领。

中国军队据守着西面，与日军形成对峙。

这一天，第三十一师守军死伤达千人以上。

晚上，乜旅长视察台儿庄守军阵地，他对官兵们说，现在是巷战阶段，巷战全凭手榴弹和大刀，这是咱们拿手的，也是敌人害怕的。只要

保持旺盛的士气，就可以与敌人拼一阵子。为了防止日军放火，须把我军占据的民房草顶全部拆除。还可以大量使用民房里的木料和杂物——“向不忍于民者，今民已尽，任君放手为之。”同时要充分利用火攻制敌：“多备棉油弹，着火弯弓以射之。城中油商花行有余裕矣。”

入夜，一八五团团长王郁彬命令禹功魁、汝心铭、古文照和秦应岐的四个营，各配属一个工兵小组和两门迫击炮，向占据台儿庄东面的日军实施反击。四个营的八门迫击炮，首先轰击了日军的火力制高点碉楼，一口气打出五十多发炮弹，然后各营开始出击。日军顽强抵抗，中国官兵前赴后继，双方都不顾生死，最后一八五团的反击成果仅仅是夺回了三个民居院落。营长禹功魁由于作战勇猛，当场升任一八六团团长。

这时候，奉白崇禧之命从开封开来的战车防御炮连抵达台儿庄。这种新式大炮中国军队仅仅装备了两个连，虽然每个连只有两门大炮，却都是德国制造的大口径榴弹炮，还附有加农炮炮筒，射程达到两万米以上，且有现代化的通讯指挥系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最强大最新式的重炮。池峰城师长立即命令战车防御炮连开设阵地投入作战，四门重炮果然火力非凡，直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莫知所措”。

二十七日凌晨，台儿庄外的日军开始攻击西寨墙。飞机和火炮将寨墙轰塌之后，步兵在二十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冲锋。台儿庄寨墙已经千疮百孔，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的涌入——“我寨上官兵死伤于敌人炮火及塌陷的寨墙压埋而阵亡者甚多”。在西门附近防守的一八一团三营伤亡殆尽，三百余日军突入城内随即竖起日本旗，中国守军不得不退守街区纵深，依靠被毁坏的“破屋断墙”节节阻击。防守北车站及西阵地的一八五团，在之前的刘家湖战斗中损失惨重，这时因新的伤亡不断而致兵力捉襟见肘。第三十一师已抽不出任何增援部队，负责指挥庄内守军的副师长王冠五在电话里向师长池峰城请求撤退。池师长心力交瘁，犹豫不决，询问参谋主任屈伸。屈伸认为，一点放弃将影响全局，建议把工兵营和骑兵连拿上去。池峰城在电话里对王冠五说：“台儿庄是我们的坟墓，坚决顶住，不能撤退！援军马上就到！”随即命令工兵营和骑兵连增援寨内。同时，命令一八六团和一八二团必须各抽一个营紧急增援北门。援军到达后，王冠五亲率部队反击，官兵们拔下日本旗，换上中国旗，并把一部分日军从寨墙缺口堵了回去，城里的残余日军退入城隍庙。

日军士兵涩谷升也在攻击队伍里，他认为自己还活着是“非常奇迹”：

天亮六时半，各炮队开始发炮，其音响震动天地。第五第六两中队结成敢死队，由城墙之破裂口冲入。墙边有河浜，手榴弹如雨飞来，数人中弹倒毙，其惨状为人间地狱。队长命令，不管死伤如何惨重，各应尽本分。步兵几乎全员倒毙，手榴弹仍如雨飞来，我身边亦飞来数枚，我无负伤，非常奇迹。经激战方得占领城市之一隅，我方已牺牲半数以上。然后将死伤者全部收容于大房屋内。黄昏，敌再度来袭，我方受伤数人，手榴弹仍如雨似雪飞来。夜间，我与林原、足立两君刺死敌兵九名。通宵枪声不绝。

为了牵制日军的攻击，一八一团（欠三营）和一八五团二营奉命迂回到日军侧背，向刘家湖、三里庄和墩上村发起攻击。上午十一时，一八五团二营攻占墩上村，一八一团二营逼近三里庄，一八一团一营攻占了刘家湖。但是，日军紧接着就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墩上村即刻失守，三个营的中国官兵在撤退时伤亡大半。

下午一时左右，日军的十一辆坦克直接冲到距台儿庄西北寨墙两百米处，随即停下来向台儿庄内开炮射击。日军的坦克兵尚不知台儿庄中国守军已经调来了重炮，中国军队的重炮瞄准后突然开始轰击，十一辆日军坦克中六辆中弹起火，其余五辆见状仓皇而逃。寨墙上的中国守军不禁欢呼起来，胆大的士兵跳下寨墙，开始追击四处逃散的日军坦克兵砍杀射击，另一些士兵爬上被击毁的坦克卸掉上面的机枪。在刘家湖和园上村里的日军目睹了这一场景一“举目骇视，竟不发一弹，似为我欢声所震眩，竟达五分钟之久，实战场上绝无仅有之奇景也。从此敌战车不敢迫近台儿庄矣”。

台儿庄中国守军第三十一师几天来已伤亡了三千多人，池峰城师长把全师重新编成七个营。为加强台儿庄的兵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命令张金照的第三十师和吴鹏举的第四十四旅增援。

晚上，日军增援部队全部抵达刘家湖。

台儿庄的战局愈发严峻。

中国守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打来打去却让日军占了半个庄，这让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殊感诧异”，他严令第二集团军于二十九日前将冲入台儿庄内的日军消灭干净：

台儿庄为徐州前方要地，又为汤军团后方联络要道，关系重要。据

报该处附近敌人约一混成联队，我军兵力数倍于敌，早当解决，乃经几日战斗，台儿庄围子反被敌冲入一部，殊感诧异。着贵总司令负责严督所部，限于二十九日前将该地肃清，勿得延缓，致误戎机为要。

不知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下苦守台儿庄的孙连仲接到这封电报时是何心情。此时，孙连仲最关切的并不是李宗仁的“殊感诧异”，而是那个说好了由他发动回旋作战的汤恩伯究竟在哪里？

汤恩伯部仅以少部兵力在枣庄附近与日军纠缠，军团主力依旧躲在抱犊崮山区里不出来。虽然汤恩伯不断致电蒋介石和李宗仁，报告他的部队对枣庄、临城一带的日军进行了持续攻击，但至少从台儿庄方向的战场态势上并没有显出任何策应的效果。倒是二十七日这一天，由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明扬率领的游击队攻入了临城，不但将留守在城内的日军歼灭，还焚烧了日军储存的大量军用物资。大火烧了一天一夜，迫使日军抽调兵力从南向北增援临城，但增援日军赶到时，李司令的游击队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中国官兵在战场上捉到一个为日军探听情报的中国人，这个名叫宁天成的中国人是伪军第二师三团二营六连的士兵。从这个伪军的口中，他们了解到，在自己不畏生死与日军血战的同时，还有另一群中国人在为虎作伥：

刘桂堂任伪满第十七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位置在临城、济宁附近一带。该军有三个师，师无旅，直辖四个团；每团三个营及一迫击炮连，外加通信特务排各一；每连十二班，班有十二人，配有轻机枪一挺。每营有步兵连三，机关枪连一；连有机关枪四挺，每枪驮马三匹。迫击炮连有炮六门，每炮有驮马五匹；师直属骑兵连及特务营各一。每连有日人二，每营一，每团三，担任监视工作。该军第二师师长刘桂俊，是刘桂堂的乡亲。

孙连仲不断地打电报给汤恩伯，要求他的第二十军团积极行动，全力策应台儿庄的正面防御。汤恩伯主张由第五十二军和第八十五军各抽出一个团，组成一个混成旅，向峄县的日军守军发起攻击，以回应孙连仲的一再请求。令汤恩伯没想到的是，他的主张即刻遭到军团将领们的集体反对：“我们鉴于日军复由临城向枣庄增援，在短期内攻克该城已不可能，提出放弃攻击峄枣之作战计划，以军团主力全力攻击敌之侧背，这样既可以减轻台儿庄、运河一线我第二集团军的压力，又可包抄敌濑谷支队的后路，寻机将其全歼。关麟征将军尤不同意以小部队攻击峄县

敌人之侧背，主张要打就全力打，不可以零打碎敲。”

二十八日晚十时，李宗仁致电汤恩伯：“台儿庄方面孙集团陷于胶着状态，敌我均在困难中，贵军应为有力之援助迅速南下夹击之。”第二天晚八时，李宗仁再次致电汤恩伯：敌主力已“绕出台儿庄东侧第二十七师背后”，企图包抄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的后方。“着贵军团长以一部监视峄县，亲率主力前进，协同孙军肃清台儿庄方面之敌，限拂晓前到达”。汤恩伯这才决定第二军团向台儿庄方向出击。——当初，他与关麟征军长对池峰城师长的承诺是：只要台儿庄的枪声一响，“最多不出一日定可回援”。可现在，池峰城师长的第三十一师已在台儿庄苦战了五天。

即使已向台儿庄靠近，汤恩伯依旧存有私心：“第八十五军是汤氏的老部队，所以他处处想使该军在承担作战任务时避重就轻。在攻击枣庄时，第五十二军由东向西打，面对着临城、枣庄敌之主力，第八十五军却紧靠着抱犊崮山地。现在向台枣支线攻击，他却把原在北面的第八十五军南调，左翼依托台儿庄，右翼是第五十二军，使该军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

无论如何，汤恩伯部已开始向台儿庄靠近了。但是，也就仅仅是“开始”而已。

台儿庄内，日军据东，我军据西，交战双方近距离的对峙频繁引发残酷的巷战；而在台儿庄外，除了南面的徐州方向，剩下的三面都已处于日军的合围中。

二十八日午夜，趁庄外日军暂时停止攻击的间隙，庄内的中国守军向日军盘踞的城隍庙和碉楼实施反击，一次又一次，官兵们试图把闯进庄内的这股日军消灭。日军盘踞在房顶上，机枪火力十分猛烈，导致反击部队付出巨大伤亡。二十九日凌晨，第三十一师投入两个团的兵力，对城隍庙和西北角同时发起反击，“顽敌卒被驱入大庙及东南西北各碉楼内。敌每退出一房，即纵火燃烧，企图阻我前进，我官兵虽焦头烂额，终以兵器关系极难聚歼”。十日凌晨，第三十一师收集了所有的迫击炮弹，为驱赶西北角的日军开始了猛烈炮击，致使日军“纷纷窜据城角掩蔽部内及民房”内。炮击停止后，日军又纷纷窜出来，激烈的巷战开始了，一直到天再次黑下来，台儿庄内的肉搏“未尝稍停”。

为缓解台儿庄守军承受的巨大压力，外围的中国军队每晚都对日军据点发起反击。盘踞在这些据点里的日军，大多因白天作战疲惫而在睡

梦中。为了消耗日军的体力和兵力，不睡觉的中国官兵认为他们必须“妨碍敌人休息”。二十九日凌晨三时三十分，第二十七师的一个团向裴庄发起攻击。官兵们一举把裴庄里的日军赶跑了，然后部队继续向邵庄追击，“毙敌极众，毙敌马匹尤多”。日军跑到邵庄后，集中炮火轰击，大量的燃烧弹令中国官兵伤亡巨大。第二十七师的另一个团向刘家湖反击，遭到日军坦克的反冲击，双方展开炮战的同时，步兵在村庄边缘的麦田里混战，第二十七师伤亡三百多人。三十日午夜，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再次向刘家湖发起攻击，主要目标是刘家湖村内的日军炮兵阵地——“敌轻重大炮八十余门，陷入我火网之内，难以转移，死伤枕藉。刘家湖之敌向我反扑，园上之敌呼啸来援，与我发生激烈之白刃战，彼此皆腹背受敌，我为争夺此炮兵阵地，亦死伤甚众。”

无论中国军队于台儿庄内外发动的反击作战是否结束，只要天一亮，日军便再次集合起主力开始向台儿庄发动进攻。疲惫不堪的中国守军已经习惯了这一规律：大约六至七时之间，先是微明的天色中传来飞机的引擎轰鸣声，然后便是对庄里庄外的猛烈轰炸和低空扫射。同时，日军炮兵从东、西、北三个方向，集中火力轰击台儿庄内的中国守军阵地。烟火弥漫，砖石横飞，中国守军只能躲在临时挖掘的防空洞里，但寨墙上的守军不能躲藏，因为日军步兵随着炮火就上来了。寨墙已不知被炸塌过多少次，又修复过多少次，那些没有在轰炸和轰击中伤亡的守军官兵从瓦砾中爬出来，透过弥漫的烟尘，便能看见由日军士兵组成的土黄色波浪汹涌而来。

十八日早上，台儿庄中国守军发现进攻的日军多了。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参加攻击台儿庄的部队是：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约两个大队）、独立机枪第十大队、轻装甲车第十中队、中国驻屯军临时战车中队、野炮兵第十连队第一大队（缺第一中队）、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缺第二大队）、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一小队、工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一小队。

台儿庄寨墙的西北角再次坍塌，数百日军从缺口涌入逼近北站。中国守军编织起密集的火网，令日军步兵的冲锋受阻。九时，日军加强兵力强行冲锋，双方陷入白刃战。十一时，大股日军从西北角爬到寨墙上高高的文昌阁内。这座阁楼早已在炮火下坍塌，只剩下半截，日军士兵往上爬的时候，遭到中国守军的猛烈射击，阁下布满了日军的尸体，而冲上去的日军士兵发现他们下不来了，因为中国守军已向文昌阁发起了反击。防守西门的一八一团，把被击毁的日军装甲车作为机枪掩体，最终封堵上了西北角缺口，但寨墙上依旧有百余名日军在坚持，双方都已

筋疲力尽，不得不形成对峙。

晚上，庄里的日军突然发起反击，庄外的日军也同时发动攻击。台儿庄里外火焰冲天，中国守军的电话联络都被切断，只能在各个方向上各自为战。日军再次突入四百多人，举着火把到处放火，但火光也让中国守军寻找到攻击目标。黑夜里的混战一直持续到午夜，台儿庄内的战斗逐渐停歇。

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如果台儿庄失守，不但第二集团军全体官兵是死罪，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军令部次长林蔚都将严惩不贷：

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之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官兵死罪，即李长官白总参长林次长亦当严办。

获悉电文的孙连仲派出了两名执法官：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赴台儿庄右翼，负责督战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赴台儿庄左翼，负责督战第三十师和第四十四旅，同时督战坚守台儿庄的第三十一师。

二十九日晨，孙连仲召集军长和师长们开会，其间他特别嘱咐第三十一师：不要指望增援，必须坚持下去。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的表态是：“台儿庄是吾人光荣所在，亦为吾人之坟墓。”同是这天早晨，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命令濑谷启：“应以主力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之敌。”

台儿庄外的日军开始攻击了，隐藏在城里的日军也冲出来企图扩大占领，中国守军与日军的混战一直持续到黄昏。日军再次发动了新一轮的全面攻击，危机于此时出现了：一股日军冲入西北角，中国守军伤亡殆尽后，日军蜂拥登城夺取了西门。孙连仲急调一个团增援，增援部队几次反击均未奏效，日军切断了台儿庄内外中国守军的联系。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王冠五，再次向池峰城师长请求率残部撤退。池师长给孙连仲打电话请示，孙连仲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台儿庄失守，军法论处。”池师长对王冠五说：“总司令生气了，坚决不让撤。”王冠五指挥的守城部队，仅剩了不到一半兵力，因此这一次他的态度十分强硬：“城是不能再守了，弃城的责任我一个人负，决不连累你！”池峰城听到这句话，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池师长的痛苦在于：王冠五原本是一名参议，可以不上前沿打仗，但在指挥员越打越少的情况下，自己先是派他

代理一八六团团长，后又任命他为副师长指挥庄内所有守军，每一次王冠五都没有过二话，现在自己如何给他下达难以完成的严令？但是，万一王冠五不顾一切，真的率部放弃了台儿庄，不但第三十一师数天的血战前功尽弃，自己也必要承担军法责任。此时，参谋主任屈伸猛地把电话夺过来，对着那边的王冠五大喊："冠五！台儿庄得失存亡，不仅关系到徐州的安危，对整个抗战局势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已经苦战了十来天，牺牲了半数以上的官兵，才把鬼子顶住。如果我们放弃了台儿庄，不仅对不起死难的官兵，更对不起国家和人民，那就成了民族的罪人……总的一句话，台儿庄只能死拼不能撤。师部明天就撤入城内，决不会你们牺牲了我们活着回去！你听着，我现在传达师长的命令，台儿庄必须死守，谁再说放弃台儿庄，格杀勿论！"然后，屈伸转身对防守台儿庄运河浮桥的乜旅长说："从现在起，城里的部队无论是不是因公或负伤，只要擅自退回大桥者，上自旅团长下至兵由你先杀后报！"

电话那端传来的最后一句话是："请师长放心。"

王冠五，一条硬汉。

王冠五组织起一支由特务连七十二名官兵组成的敢死队。敢死队员短枪大刀，在追击炮的掩护下，向台儿庄西北角摸过去，他们要爬上寨墙上文昌阁，消灭那个居高临下威胁整个西城的日军火力支撑点。冒着日军密集的机枪封锁，敢死队员叠起土囊，不顾生死地向上攀登，震天动地的呐喊声令文昌阁上的日军魂飞胆破。午夜时分，文昌阁上的日军，除了被活捉的四人外，其余全部死于敢死队员的大刀下。——"我七十二壮士者，成烈士十四人。"

台儿庄派遣队久攻不下，第六十三联队严重受阻，情报显示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正向台儿庄靠近，那么，进攻台儿庄的部队很可能面临被全歼的危险。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急令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火速增援台儿庄，同时严令濑谷支队尽快攻克台儿庄。

三十一日清晨，日军的炮击前所未有地猛烈，二十多门大口径野炮集中轰击，犹如要"令台儿庄化为灰烬"。上午九时，大批日军涌入庄内，中国守军一八六团损失殆尽，一八五团奉命上前接替。在台儿庄外围，第二十七师在刘家湖附近反复与日军厮杀，那些配属给他们的战车防御炮也全都投入了战斗。——"激战至正午十二时，敌复以步骑炮联合部队约三四百名，战车八辆，围攻我郭团（一五九团团长郭金荣）守备之岔路口阵地。我官兵沉着抵抗，与敌死拼，毙敌甚重，敌仍猛进不

退，遂发生肉搏战，杀喊之声撼动天地。时我战车防御炮将敌战车击毁三辆，突受敌重炮还击，我战车防御炮两门被击毁。我伤亡官兵三百余名。”

这天傍晚，台儿庄北门寨墙已坍塌成一片平地，无法封堵的巨大缺口使城外的日军蜂拥而入。进入台儿庄的日军沿着每一条街道与中国守军肉搏。待天色完全黑下来时，一条条火舌向中国守军席卷而来，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以扫清中国守军的阻击。台儿庄满街都是中国守军设置的障碍物，一处障碍物燃起大火，守军官兵就退至另一处，他们投出的手榴弹下雨一般从日军的头顶上落下。至午夜时分，台儿庄全城都在燃烧，冲天的火光照亮了整个鲁南天空。

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致电李宗仁，称他的部队正做“最后之攻击”，若不能成功“即自杀以报国家”：

本师昨夜做最后之攻击。官兵勇敢用命，冒最大牺牲，卒将城西北角盘踞之敌歼灭大半。残敌仍据要点顽抗。我康副师长负伤，官兵伤亡三百余。刻城内之敌除西北角少数外，东南半部仍为敌据。顷间，官兵百余人义愤填胸，自报奋勇复仇歼寇，不成功即自杀以报国家，决不生还见我长官，悲壮激昂。师今夜为沉痛之格斗。今午前敌炮仍在猛轰，寇机十一架狂炸西关，北站渐成焦土。

第二天，四月一日，台儿庄内无大战。

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

那个名叫涩谷升的日军士兵还活着：

上午六时火葬尸体，八时开始进攻，死伤者全部送至后方，下午占领和尚寺一所，全员进驻该寺，准备明天战斗。敌机投弹于该寺附近，石仓君中弹重伤，重机关枪分队长亦中迫击炮而毙，第三分队战死三名，重伤一名。

短暂的寂静中，台儿庄战局开始显现出对中国军队有利的态势：包括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在内，中国军队的大批部队正向台儿庄靠拢，包围着台儿庄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实际上在更大的范围内已经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中。

四月二日凌晨，台儿庄内外万籁寂静，在城外围的东北角和西北角

同时出现了中国官兵的身影。孙连仲命令第二十七师挑选敢死队员二百五十人为前锋，一个营在后面跟进，从台儿庄的东北角向庄内实施偷袭。孙连仲决定在所不惜，言如能冲进庄去赏大洋五千元；如能配合城里的第三十一师把庄内的日军肃清赏大洋两万元。数百名中国官兵悄然无声地向台儿庄的东北角接近，然后突然一片呐喊向寨墙上猛爬。没有准备的日军猝不及防，反应过来时中国守军的敢死队员已经冲到跟前。战至凌晨四时，占据着台儿庄东北角寨墙的日军被全部歼灭。敢死队员们向东门和西北角方向发展，惊慌的日军在黑暗中纷纷躲进民房和碉楼里，中国官兵逐屋搜索后放火，将日军压缩至城的一角。

一个晚上的反击成效明显。天亮后，台儿庄的东门被中国军队打开，随即南门也被收复，第三十一师和第二十七师取得了联络。——这是数天来，这两支分别防御庄内外的部队第一次取得有效联络。但是，中国守军尚未巩固阵地，南下增援的日军第十联队到达战场，向庄外的第二十七师发起攻击，企图突破中国守军防线向台儿庄靠拢。

中国陆军第二集团军第四十二军第二十七师，三月二十四日从徐州以北的柳泉、贾汪抵达台儿庄战场后，一直处于外围防御的血战中。此前，没有多少人熟悉这支杂牌部队，仅知道这是原西北军中的一群粗鲁汉子。可是，自台儿庄作战开始以来，这支部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英勇无畏。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在与台儿庄咫尺之遥的外围阵地，没完没了地与日军进行拉锯战，坚守，失守，反击，再坚守，每一次战斗都出现巨大的伤亡，即使暂时没有阵亡的官兵也是军装破烂，浑身血污，他们被日军称为“叫化子部队。但是，这些可以数日不睡觉，以至于连走路都东倒西歪的官兵，只要作战命令一到，就能立刻又虎狼般地向日军冲上去。他们的顽强作战，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直接攻击台儿庄的日军兵力。

四月二日，濑谷启亲自率第十联队主力到达台儿庄以东地区，但是横在濑谷启前面的又是中国守军第二十七师。

黄樵松师长告诉他的官兵，决不能让增援日军冲进台儿庄。

上午十时，日军三百余名步兵在十辆坦克的引导下向台儿庄开进，在彭村、上庄、陶沟桥等处与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一五九团相撞。濑谷启立即派出两翼部队向一五九团阵地左右迂回。而在相撞的正面，双方激战至中午，日军“集中其野山炮数十门，向我阵地猛烈轰射，我潘坠、燕子井、彭村、石佛寺一带，守兵与阵地共为灰烬，孟庄、裴庄、陶沟

桥、五圣堂、五窑路、辛庄等处，均与敌发生血战”。到了下午，第二十七师各阵地都陷入日军的包围，但官兵只要不死就不后退一步，以至于战场上“杀声震天地，烟尘蔽日，血雨横飞，战况之惨烈，不克名状，双方酣斗竟日未休”。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日本陆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

研究敌二十七师第八〇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河，非独日军所特有。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本日（二日），我军伤亡官兵六十六人，而敌弃尸不下二百五十具。

不知那些中国士兵的骸骨至今是否仍散落在大运河以北的广阔田野上？

这片土地，血与泪，已成河。

鉴于日军第十联队和坂本支队都在向台儿庄地区推进，李宗仁认为围歼日军于台儿庄下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他将第七十五军的第六师、第九十二军的第十三师紧急调至岔河地区，同时命令临沂方向的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向西推进到鲁坊地区，统归第二十军团长汤恩伯指挥。晚八时，李宗仁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敌第十师团及第五师团之一旅，自经临沂、台儿庄诸战斗后，伤亡极大，现参加决战之兵力，至多不过五个联队，附山炮野炮五十至六十门、重炮十门、战车数十辆。其一部约一千人，在洪山镇北方秋湖附近被我军第二十军团包围，其主力向台儿庄东侧陈瓦房、凤凰桥一带运动，续向第二集团军右翼迂回攻击中。

济南、大汶口、济宁、滕县间为第十师团之另一旅团分段守备中。

二、本战区以迅速合围加歼灭敌人之目的，决于明（三）日开始全线总攻击，保持重点于第二十军团之右翼，将敌包围于台儿庄北侧地区而歼灭之。

三、各兵团任务如下：

甲、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以主力于三日保持东南正面，向台儿庄附近之敌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敌捕捉歼灭之。攻击开始时间，由该军团自定。因战况之进展，须随时遮断敌自峄县之退路，并对向城方面增援之敌严密警戒。

乙、第二集团军右翼与第二十军团联系，于三日全线攻击，消灭台儿庄之敌；第一一〇师准备以一旅由万里闸附近渡河，向北洛村附近敌之右侧佯攻。

丙、第三集团军前敌总司令曹福林指挥张测民支队五个团及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所部，为堵击兵团，迅速南下向枣庄、临城合围。

……

三日，被围困在台儿庄内的日军，获悉第十联队和坂本支队已到台儿庄以东地区后，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击。他们用十余门平射炮向第三十一师守军阵地连续炮击，日军战机同时向台儿庄内外狂轰滥炸，日军步兵在随后发起的冲锋中使用了催泪性瓦斯毒气。此时的第三十一师，没有伤亡的官兵仅剩一千三百余人，庄内的三分之二都已被日军占领，守军仅在南关一隅苦苦支撑。池峰城师长认为，继续苦撑下去，只有全军覆没，于是请示孙连仲，要求残部向运河南岸转移阵地。孙连仲难以抉择，只有向李宗仁请示，话语说出来令人内心酸楚："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猛，攻势过猛，但是我们也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李宗仁预计汤恩伯第二天即可到达台儿庄，如果此时让第二集团军放弃坚守，那么之前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内外的所有苦战都将功亏一篑。鉴于此，他给孙连仲的答复是："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我向他下这样严厉的命令，内心很觉难过。"他们过去没有过交往，仅在第二集团军调至第五战区后，在徐州的战区指挥部里有过一面之交。孙连仲最后这样回答了李宗仁："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此时的第二集团军，连预备队都用光了。

当池峰城师长再次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可以转移阵地时，孙连仲的回答是："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

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

孙连仲，一八九三年生于河北雄县。虽家境殷实，不必当兵，但他立志从军，一九一二年入北洋军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任学兵。北洋陆军各镇在清帝退位后改为师，孙连仲被选入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炮兵营任班长。他身材魁梧，胆识过人，曾在护国战争中一人扛着二百多斤的山炮带着他的部队包抄对手后路。因作战沉着勇敢，由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升迁，至北伐战争时已是方面军总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作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的官兵“报效国家、挽救危局，以尽军人天职”。他率部奔走于北平南部、河北涿县、山西娘子关战场，及至奉命坚守台儿庄，孙连仲面对的是他投身行伍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

孙连仲亲自进入台儿庄内，在守军苦撑着的东南一隅督战。他把右翼作战不利的一名旅长撤了，当众枪毙了左翼一名贪生怕死的营长，然后开始组织敢死队。当跟随着孙连仲的军需官把身上仅剩的大洋分给敢死队员的时候，敢死队员们把大洋扔在地上说：“我们以死相拼，为的是报效国家，不是为了几块大洋。”孙连仲见状不禁放声大哭。

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进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部分官兵手持大刀，向敌斫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筋疲力尽，初不意至此最后五分钟，我军尚能乘夜出击。敌军仓皇应战，乱做一团，血战数日为敌占领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毙敌无算，敌军退守北门，与我军激战通宵。

与此同时，在庄外防御的第二十七师官兵也面临着最后时刻。

三日一大早，日军第十联队向第二十七师阵地发射了两千余发炮弹，阵地工事连同附近的村落皆被夷为平地。然后，在四十多辆坦克的掩护下，日军步兵不顾一切地向台儿庄方向突击。第二十七师连日血战，伤亡惨重，能够作战的官兵已不足千人，致使日军相继冲入园上、孟庄、邵庄等村庄，第二十七师仅剩的官兵不得不用身躯与凶悍的日军展开决死拼杀。在彭村防御的是王景山营长指挥的营部和五连，当日军冲进村庄时，王营长赤裸着上身对官兵们喊：“今天是本营长和全营殉职报国的最后一日，只有杀敌，不计生命！”官兵们跟着王营长死拼不退，及至全部战死。王营长一人砍杀日军十二人，最后身中数弹倒地。——“敌恨之刺骨，死后犹被敌乱刀肢解。”

三日晚，台儿庄内外中国守军无不期待着汤恩伯部立即出现。

但是，直到四日，汤恩伯部队依旧没有抵达台儿庄。

凌晨，已经衣衫破烂的守军守备连，把被日军摧毁的庄内防线修复好。上午，日军集中了三十余门重炮向庄内轰击，使用的全是燃烧弹，“时东南风甚大”，庄内再次燃起凶猛的大火，之前仅存的一幢建筑物被彻底焚毁。大火中，日军向东南角和北门同时发动进攻，但都被中国守军击退。第三十一师再次组织起两百人的敢死队，在重迫击炮的掩护下向城隍庙反攻，里面的日军拼死抵抗，攻击没能成功。

这一天，在台儿庄以北的外围线上，准备围歼日军的中国军队陆续抵达，汤恩伯的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向北洛、泥沟发动袭击；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第十三师一部抵达台儿庄浮桥接防；周碧的第七十五军第六师一部也向当面日军发动了攻击；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第八十九师凌晨三时占领了朱滩和荣庄等村庄。

只是，对于坚守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来讲，所有的增援都已经是太晚了。苦等汤恩伯不到的孙连仲于四日晚再次下达手令：

一、今是我们创造光荣之良机，也是生死最后之关头，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本总司令将以成仁之决心，与台儿庄共存亡，亦必执行连坐法，以肃军纪。死为光荣而死，生为光荣而生，希我官兵共此努力。

二、训令本集团军：慎保本军守无不固之精神，发挥娘子关歼灭敌七十七联队之伟绩，今只有前进，绝无后退之途，过河者死，誓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深信必操必胜之信念。

此时，再严厉的“杀无赦”，对于第二集团军的官兵来讲，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他们所有的生命活力，都在撑持日久的血战中消耗尽了。

四日，《东京朝日新闻》登出的战况显露出罕见的悲伤：

恃众之敌，更增加部队，以五个师的兵力来袭。敌在运河南岸阵地，把五十门大炮排列成阵，不分昼夜，集中射击。所有民家均装置枪眼，机关枪、步枪乱射，城壁及屋顶，手榴弹如雨点乱飞。安永部队、大村部队的勇士，潜入枪林弹雨，在敌兵密集的民家，一户一户地扩张

战果，连日连夜之死斗，不饮不食负着枪伤，筋疲力竭地匍匐前进，往击敌人，子弹渐渐打完。没有子弹，把敌人杀死，夺其手榴弹，捡起敌人投来的手榴弹，再投回去。敌人退路已断，拼死迎战，以致城内的死尸累累，途为之塞，变成凄惨的修罗场……安永、中川两部队长业已负伤，伊藤敏雄、奥谷勤两部队长，金田幸弘、宫川喜一、市村满各少尉俱在台儿庄战死……

五日，汤恩伯的部队距台儿庄仍有近二十公里。

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了：

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一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各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功，其将何以自解！即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究竟有无把握？仰具报！

蒋介石很少对中央军嫡系部队将领如此质问连带斥责。既然委员长要求他“毋负厚望”，汤恩伯立即回复蒋介石，说他“已严令各军速向台儿庄攻击前进”，今明两天就能将当面日军“压迫于台儿庄北岸而歼灭之”。

第二十军团“攻击前进”的部署是：

第七十五军以一部巩固岔河镇东南、西南一带据点，主力则向萧汪、东庄、台儿庄方向攻击前进；

第八十五军向低石桥、燕子井、岔河山、刘家湖一带攻击前进；

第五十二军一部巩固洪山镇、兰陵镇，主力向泥沟、北洛方向攻击前进。

然后，汤恩伯主动给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发去一封电报，声称如果六日中午十二时第二十军团还没赶到台儿庄，“恩伯愿受军法处分”——此时，距汤恩伯承诺回旋台儿庄的最晚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四天。

五日当晚，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全线进入攻击地域，并随之向当面日军发起了攻击。日军坂本支队的后方完全被汤恩伯部切断，其所需给养必须从濑谷支队那里获得，而濑谷支队在台儿庄战场的正面，坂本支队在台儿庄战场的东北方向，日军自此开始出现混乱。

毫无疑问，日军如果从台儿庄败退，将是日本陆军史上的耻辱。因此，无论当时还是战后，日本战史对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台儿庄战事的叙述始终含糊其辞。据说，坂本支队接到了第五师团的撤退指令。——日本人从来不愿意使用“撤退”一词，就像他们给侵略找出过一个又一个替代词一样，他们把撤退一律叫作“转进”：“支队迅速歼灭当面之敌后，应即转进攻下沂州”。这就是说，第五师团的坂本支队，不能与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一起，冒着陷入中国军队重围的危险，继续在台儿庄附近待下去了，应迅速向临沂方向撤退。

五日晚八时，坂本支队致电濑谷支队：“支队为攻占沂州，奉命返回，预定明六日日没后开始行动。”濑谷启的沮丧可想而知，但又没有办法阻止。入夜，可能认为把濑谷支队单独丢下实在不妥，坂本支队决定推迟撤退时间，试图与濑谷支队配合行动：“支队虽奉命返回沂州，但拟给敌一击，希濑谷支队攻击该支队背面之敌背后。”谁知，濑谷启得知坂本支队即将撤退后，已于六日早七时下令部队“迅速结束台儿庄的扫荡讨伐”。为此，第五师团参谋奥信夫少佐极为不满：“我支队虽与濑谷支队紧密联系，但至六日夜，濑谷支队不做联系而后撤至泥沟，对此不做任何表示甚感遗憾。昨七日夜之返回，乃是在敌枪炮火力迫近下进行的。”其实，濑谷支队的后撤是请示了第十师团的：“暂时离开台儿庄，兵力集结于后方。”尽管师团长矶谷廉介不同意，认为没有夺取台儿庄很丢面子，但濑谷启还是不顾一切地“转进”了。

日军士兵涩谷升也在撤退的行列中：

与林原君两人舁足立君之尸体至收容所，途中迫击炮纷纷飞来，非常担忧。尸体舁至火葬场时，敌弹愈射愈烈，我伏于望远楼中。稍待，大队部再次中弹三名，第八中队八名亦倒毙，第三小队亦舁尸体前来。下午七时，收拾死伤兵之枪支，大队部无法支持，退至河浜附近，敌弹愈射愈猛，牺牲数百人之生命占领之场所又被敌方夺去。我队含泪跟随大队部后撤，退却时向战死者暂告惜别，且将所有房屋放火焚烧。

六日，日军的撤退仓皇而狼狈，大量的尸体和军用物资丢弃在台儿庄内外。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残存官兵，以密集的火力和手榴弹封锁日军撤退通道，大量日军在撤退时被击毙，一些终无法冲出的日军开始自杀：“台儿庄城内之敌，时有猛烈之战斗，二十时顷，将文昌阁之弹药及炮等举火自焚，敌兵投火者百余名。东北之敌已肃清，其东南之残敌亦举火自焚，致东南之房舍为烈焰所吞没，我官兵亦伤亡。时有潜匿掩蔽之敌，经我招降未效，遂投火焚杀之。凌晨四时，台儿庄遂完全收复，

已一片焦土矣。”

四月七日，李宗仁下达了全面追击的命令：

一、台儿庄附近经我孙、汤两军击溃之敌，现向峄县方向逃窜中。

二、汤军以一部肃清战场，以主力由台、枣支路（不含）以东，沿夏庄、马山、九山、潭山以南地区向峄县追击前进。

三、孙军指挥张轸师（第一一〇师）由台、枣支路（含）向峄县追击前进。

四、曹福林（堵击兵团）应于峄县以北地区截击敌人，勿使窜逸。

五、敌如退据峄县城，孙、汤两军各以一部占领峄县东、西方高地，主力协同击灭城外敌之野战军后，围攻峄县城。

六、敌如以峄县城为后卫阵地，孙、汤两军各以一部监视之，主力尾敌穷追。

七、孙震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应由新闸子渡运河，追击韩庄方面之敌。

八、李仙洲师应继续经向城向东，扫荡临沂以西之残敌，向临沂前进。到达后归张军长自忠指挥。

九、予在铜山（徐州）。

七日，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第五十二军主力，在底阁、杨楼一带与日军激战后将其击溃；第八十五军第八十九师主力攻击大顾栅；第四师和第八十九师各一部联合攻击关庄、辛庄等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冲出台儿庄后继续追击，一七五团相机占领邵庄和裴庄，一八二团占领了刘家湖。同时，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渡过运河后向韩庄发起追击。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第五十五军则在峄县以北堵截着日军。当晚，濑谷支队撤到峄县附近固守待援。

从九日直到十一日，中国军队全面迫近峄县，日军坂本、濑谷两支队集中兵力建立起坚固的阻击阵地，致使中国军队的追击进展缓慢且伤

亡甚大。即使是汤恩伯武器装备尚好的第二十五师，一夜之间也会“伤亡达五六百人之众”。——“战况之烈，于此可见。”

台儿庄内的日军肃清后，有中国记者进入了这座已成废墟的运河小镇，他们首先见到的是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他的头发和胡子都长得很长，嗓子已经哑了，面色有如无光的黄纸。”接着，记者们看到台儿庄满地的残垣断壁间，到处是没有来得及收殓的双方官兵的尸体，日军在撤退时对其遗弃的尸体进行了焚烧，此时成堆的残肢依旧在冒着白烟。

日方统计，台儿庄作战，第五师团战死一千二百八十一人，负伤五千四百七十八人；第十师团战死一千零八十八人，负伤四千二百三十七人。日军总计伤亡过万，但“甚少被俘”。

台儿庄胜利的消息，飓风一般迅速传遍全中国。

“日军毕竟不是不可战胜的。新的抗战希望将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这场胜利使人们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感到欢欣鼓舞。”

……在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张各报馆临时出的号外，在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无限的欢笑，逢着人就说：“台儿庄我们大获胜利，消灭敌人精锐部队一万多，你知道了没有？”家家户户都悬起了国旗……震人的鞭炮声自始至终不断地响着，这里停了，那里又响起来，那蒙蒙的烟雾和腥辣的火药味，像带着骄傲和光荣，永远飘浮在空间……下午七时，在武昌，一万余人集合在公共体育场；在汉口，二万余人集合在特三区江边、运动场，一万余人集合在中山公园，又复在府西一路会合，每个人手里执着一个火炬，熊熊的火焰照见了每个人脸上浮着的异样光彩……“啊，今天，四月七，兴奋了我们，刺激了我们，鼓励了我们，又给予了我们一个信念，长期抗战下去，我们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此刻的中国军队统帅部里并没有这般兴奋。

中国军队的追击行动过于迟缓，以至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告诉蒋介石：“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日军很快就会把八到十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担心如不迅速歼灭当面之敌，等来的只能是日军大部队的增援。十二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和白崇禧：

台儿庄之捷已逾五日，峄、枣、韩、临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援绝溃惫之寇，不急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隳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

然而，李宗仁的难处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经过半月多苦战，根本没有实力再对日军形成猛烈追击，而实力依旧的汤恩伯部一向的作战原则是避免攻坚。因此，李宗仁向蒋介石建议：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攻坚作战，采用机动作战的方式诱敌出动，然后相机实施歼灭。——实际上，这等于让位于鲁南前线的中国军队放弃了追击。

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作战中赢得的胜利，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路透社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电："中国一方面借其伟大之顽强，屡次摧毁向之侵略之敌人；一方面又开始发见其军事才能与团结力量，今似已明白警告日人，日本最多仅能占有中国土地三分之一，但其代价与牺牲已非日人所能忍受。"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英国《新闻记事报》："中国胜利之真实价值，不能以收复之地面积大小来表示，而应以日本所消耗之时日与弹药来估量。因为这种消耗，对日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依据这种显示标准来评论中日两国的战事，那么中国是无日不在胜利中。"——而一个活下来的中国守军士兵，告诉战事平息后进入台儿庄的外国记者：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也没有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蒋介石致全国同胞：

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将士牺牲之烈，同胞受祸之重，创巨痛深，至惨至酷，溯往思来，祗有悚惕。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之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步胜利，不过聊慰八余月来全国之期望，稍弥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凡我同胞与全体袍泽，处此时机，更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务当兢兢业业，再接再厉，从战局之久远上着眼，坚毅沉着，竭尽责任，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之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幸体此旨，共相黾勉为盼。

台儿庄之战，中国军队付出了两万多名官兵的生命。

两万多个年轻的躯体，消融在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大运河畔。

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据情报判断：日本从国内增兵中国战场，以期"及

早解决华北战局”的计划已经取消，如果能够调集中国军队的所有主力，“集中所有力量”在峄县一带发动全面攻势，也许可以一举确立中国抗战的“胜利基础”。

事实上，除了认为台儿庄的挫败“不符合日本陆军的传统”，继而将作战不利的濑谷启免职之外，日方并不以为这场挫败会影响整个战局。事实上，日军已经策划并部署了针对中国军队的更大规模的进攻。正如美国人史迪威上校所预测的那样，中日两军一场更大规模的混战已经迫在眼前。

日军士兵涩谷升四月七日日记：

台儿庄撤退后，上午到达泥沟，四面桃花盛开，春景颇佳。

不知经历了残酷血战还活着的中国士兵们，是否也注意到了在自己誓死守卫的国土上竟然有着如此盎然的春意？

第十一章

不让鬼子过黄河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空军两架B-10重型轰炸机从武汉起飞，在宁波机场加油后，于二十日凌晨三时，分别飞临日本熊本市、久留米市、福冈市、佐世保市和长崎市上空——中国空军重型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两百万份《告日本国民书》。

这份由中国国民政府发布的、以蒋介石口吻写就的告知书，详细说明了日军在中国究竟干了什么，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将给日本国民带来什么：

……

抗战已一周年矣，诸君虽怵于军阀淫威，谅亦必有沉重不胜之回想，贵国军部不尝谓不战即可屈服中国乎？不尝谓不过二三月短期间即可速战速决乎？然今则竟言必须准备长期作战矣。彼辈逐步困难，不得不一再变更其欺骗诸君之方式时，诸君几多兄弟子侄，已变大陆之鬼；几多闺中少妇，已作未亡之人；几多之幼小儿女，已成无告之孤，诸君所得于战争者究何在？即以我东北四省而论，被彼辈攫取，已历数年，然诸君除负担庞大之战费外，又何所获？

……

尤有一事，中正实不忍言，但又不能不言者，厥为对妇女同胞之暴行。自十岁左右之幼女，乃至五六十岁之老妇，一遭毒手，阖（阖）族难免，或数人轮奸污辱，使受辱者不旋踵而呻吟毙命。贵国向来尊重礼教，崇尚武德，为世界所称道。讵至今日，贵国军人行为上之所表现者，不特礼教扫地，武德荡然，直欲绝灭人伦，违逆天理！如此军队，不仅日本之耻辱，亦留人类之污点……而诸君在国内犹为军部宣传所蒙蔽，以为渡华作战死亡之子弟，皆是为国牺牲之荣誉国殇。宁知此等死者，皆为军阀驱使强迫下之冤魂，或负无穷之罪恶，或怀悲愤而没世，不但无荣誉可言，且使贵国全体国民同蒙不可洗涤之千载污名矣。

统上所述，诸君因受蒙蔽，或罕听闻，但国际正义之士，已有文字照片传播于全世界，并世人类莫不引为羞耻。然而诸君全体固不能负其

责。负其责者，乃彼辈狂妄之军部也。军部丧失人性，不能以理智御下，故在下者均无纪律，乃至上行下效，共趋于罪恶之深渊，而以制造罪恶相夸竞。任何国家，断无纪律扰乱军队堕落至此，而犹可不败者。诸君若不及时急起，声讨军阀，制止侵略，则贵国前途之可悲，实不堪设想！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有异国战机飞临其领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二十架式陆基攻击机，曾从朝鲜半岛的济州岛起飞，飞越黄海轰炸中国首都南京。事后，日本人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渡洋爆击”，是“世界最初的航空作战”。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经过近一年的对华作战，中国空军的有限力量损失殆尽，而就在日本大肆宣传中国在其皇军的“神威”下已无还手之力时，中国空军竟然也能越洋飞临日本进行“爆击”且安全返航。更何况，伴随着中国空军战机的轰鸣声，日本国民看到的是威力毫不逊色于炸弹的东西——两百万份告知书如同暴雪漫天狂舞。

中国空战史将铭记这几位勇士的名字：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少校，副队长佟彦博上尉，飞行员蒋绍禹中尉、苏光华中尉，以及通信员陈光斗少尉、吴积冲少尉，领航员雷天春少尉、刘荣光少尉——其中，佟彦博、苏光华以及雷天春、吴积冲，都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

《告日本国民书》，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份决议。

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面临着政略和战略上的调整，以便重新组织全国的抗战，于是决定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今后的战争任务和行动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三月二十五日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八项建议：

一、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致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

二、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贯彻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

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

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

四、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认真改善征兵制度。

五、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各党派中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

六、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游击队，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

七、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

八、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

四月一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甲、总则

（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

乙、外交

（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

（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

（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六）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

（七）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

丙、军事

（八）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

（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以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

（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丁、政治

（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意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

（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

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倡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

（十六）严惩贪污官吏，并没收其财产。

戊、经济

（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里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二十四）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己、民众运动

（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二十七）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及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

（二十八）加强民众之国家意识，使能辅助政府肃清反动，对于汉

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

庚、教育

（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充实其设备。

（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

（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

（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

《抗战建国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基本一致。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甚至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近似或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等等。

《抗战建国纲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中国向世界宣告：尽管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但中华民族决心不惜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苦，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会闭幕之际，蒋介石在致词中强调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即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民众的团结一心："如果我们国家内部能够团结一致，始终不渝，我们就没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

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吾同胞同志之血，一点一滴，皆所以使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凝结为一，以为中国之金城汤池。即此心力物力之夷为灰烬者，亦必于灰烬之中发生热力，为中国之前途燃其光明之炬。最后胜利之获得，不特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可以确保，自由平等之国家亦可由此实现，吾同胞同志惟有并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中国多么需要“人心凝结为一”。

台儿庄战事暂时平息后，中日双方都开始了对战局的考量。

在东京，关于“扩大”或“不扩大”战局的争论再次出现。不扩大派”的根本出发点，是基于对日本经济现状、工业能力、外交困境以及应对苏联的战争准备等诸方面因素的顾虑，不得不做出的固守现占领地，仅以军事和政治压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基本方针。但是，此时的“不扩大派”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日本政府已宣布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外交方。——此话一出，日本人便意识到，话说得太早也过于狂妄和鲁莽了。现在，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中国扶持的伪政权没有任何政治、军事和民意基础，依靠这样的伪政权不可能实现征服中国的目标。——一面与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和军事较量，一面又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种处境不但荒诞不经且有掩耳盗铃之嫌。那么，剩下的手段似乎只有扩大战争规模了，尽管这将使对华战争变成一场对日本十分不利的长期战争。可是，仅就战场现状而言，“不扩大派”还是坚持认为：当前在“作战上难以解决事变”，“不过是强使小局部特别是末梢部出血”而已。在这种情形下，“占据徐州，大致需要增加二个师团，对苏关系的兵力、资材也会因攻占徐州而愈益缺乏。况且，还将使既定的充实军备计划出现致命障碍”。

日本陆军是日本政治的主宰者。傲慢而强硬的陆军将领们，都是狂热的“扩大派”，他们相信武力能够实现大日本帝国所期望的一切。陆军将领们反驳“不扩大派”说，目前占领的“地域、人口、资源，难以实现就地自给自足，结果将逐步消耗减少日本的战力。必须将蒋介石政权驱除出中原，将其压迫至边陲地区，并在战略、政略、谋略上占据有利态势。目前，日军北面停止在济南，南面停止在南京，这样不但不能解决战争，反而会使战争无限地延长。所以，必须“断然实施徐州及武汉、广东作战”。“扩充对苏战备固然重要”，可现在一切的重点是“中国大陆”。尽管台儿庄战事令日本陆军蒙羞，但陆军部认为，从战争全局看这只是一次出击失利，不应影响早已设定的侵华战略，即歼灭黄河以南的中国军队主力，攻取国民政府目前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课致电东京参谋本部作战课：

第二军的作战，始终是基于屡次报告的方针进行的，但与优势之敌已近于接触，形成对敌之所谓决战攻势不能不予以迎击的形势。这次战

斗，肯定对我十分有利，尤其在蚌埠方面，依靠友军的积极行动，予以策应，很明显会收到更大成果。其结果，敌放弃徐州也未可知。可是现在，敌可自由运用兵力，我则逐次不可避免地以劣势打优势，造成重大损失，对全局极其不利，自不待言。徐州之得失尚属次要，主要为发挥我全面战略态势之有利方面，对正在以徐州为中心聚集之敌集团，尽可能以最小牺牲给敌以最大打击。如何处理，已是燃眉之急。

多年后，当时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回忆：

濑谷、坂本两支队自台儿庄后退问题，从战况看是当然的。当时，方面军也好，第二军也好，都焦急地感到，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后退呢？台儿庄的后退，并非败退。迟早要后退，这是从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所以不成问题。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的情报时，就担心情况要糟。过于突出的第二军那一部分，如不及早收住，就会危险。这是因为汤恩伯军的出现，意味着蒋介石的主力决战来了。由于濑谷、坂本两支队已脱险后退，所以安心了；但同时由于让敌人主力靠近了身边，这样就形成：那就来一场徐州会战吧，赶紧准备起来！

华北方面军的电报使东京大本营意识到：“在台儿庄方面有大量的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军的主力一大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好机会，因此决定进行徐州作战。”“扩大”与“不扩大”战局的争论就此搁置，既然发动徐州会战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特别是对日后的武汉作战有利，大本营批准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四月三日，大本营和陆军部联合下达了“大陆指第一〇六号”令：

第一、方针

华北方面军以一部有力部队及与之相配合的华中派遣军的一部，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并占领津浦线及庐州（合肥）附近。

作战时间预定于四月下旬。

第二、要领

一、华北方面军约以四个师团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将敌击败。为此，以主力从北面击败徐州附近之敌，约以一个师团从兰封东北方附近，向敌退路归德（商丘）方向进攻。

二、华中派遣军约以两个师团（其一部担任后方警备）从南面策应

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从津浦沿线地区进击，尤其应力求切断敌之退路。

三、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将敌击败后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

四、华中派遣军击败敌军之后，占据徐州（包括在内）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五、两军作战要紧密联络。

六、本作战完成之后，华北方面军约将三个师团配置在黄河以南，华中派遣军约将两个师团配置在徐州（包括在内）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日军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联络后，共同制订了徐州作战计划，其基本内容是把会战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华北方面军与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保持接触，将其滞留在韩庄、台儿庄、峄县和临沂地区；华中派遣军由江苏淮阴向西北方向的徐州推进，将中国军队主力牵制在徐州东南地区，以争取并掩护攻击主力第二军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

第二阶段，“以急袭战术开始攻势运动”，对徐州实施南北包围作战并最终攻占；同时从微山湖西侧进攻，切断“徐州以西及西南面”中国军队的退路。

第三阶段，华北方面军“占领兰封以东附近陇海线一带”，华中派遣军“确保徐州（包括在内）以南津浦沿线”。同时，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兰封至范县附近南渡黄河，攻占开封和郑州，切断兰封以东的陇海线和郑州以南的平汉线。

为了增强担负进攻任务的第二军的兵力，日军华北方面军把直属的第一一四师团，战车第二大队，野战重炮第三、第六联队以及工兵联队都配属给了第二军。之前调往淞沪战场的第十六师团也奉命归建。由此，日军第二军的总兵力达到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以及诸多的工兵和炮兵部队。

从日军作战计划上看，徐州会战规模虽大却仍属追击性作战。东京

大本营的指令，只要求包围并击溃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津浦线以及陇海线上的要地，并没有再提以期“解决事变”的战略目标，也没再指望由此“迫使蒋政权屈服”。但是，即将开始的徐州会战，却是中日开战以来日军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作战。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为十八个师团，约四十余万人，而被投入徐州战场的兵力就达八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五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达二十余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一半。由此可见，经历了台儿庄战役的日军终于意识到，中国的任何一处要地已不再可以轻取。

此时，在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孙连仲的集团军还是汤恩伯的军团，由于缺乏旺盛的持续攻击意图，未能趁敌立足未稳将其歼灭，以致在台儿庄以北的峄县一带与日军濑谷、坂本两支队形成对峙。这种对峙使战场态势变得微妙起来：日军主力并未受到严重损伤，如要打破僵局，势必进行反击作战，且这一反击很可能会越过台儿庄直指徐州；中国军队随着主力的逐步靠拢，在这一地区已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似乎也没有停止扩大战果的理由。同时，在中国军队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扩大战果表示认同。

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认为：应结束这种危险的阵地战，迅速转为机动防御，尽量缩小战场的正面，除以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外，主力应部署在有利于机动的位置，相机打击日军。同时，必须布防运河一线，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在徐州以西，一方面以备日军从鲁西南或皖北迂回徐州；另一方面纵使日军打通了津浦路，我军也可以发起侧击使其“不能安全利用津浦路”。刘斐的理由很简单：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作战时机，中国军队都不能与日军展开决战，如果贸然集中主力实施“固定一地”的决战，不但很难在正面强攻的阵地战中取胜，还容易落入日军多路包抄分割的圈套。这时候，刘斐已从台儿庄回到汉口军令部，他频繁地与李宗仁保持联系，阐释调整部署以确保机动的必要。但李宗仁认为可以“从既有的阵地线上取胜”，以致增援徐州战场的部队都被投入了第一线。

还在台儿庄战役刚刚打响时，蒋介石曾赴徐州第五战区长官部，因担忧徐州防御而问询李宗仁：“你看徐州可以守吗？”李宗仁答：“请委员长放心，徐州短期内没有问题。如果我能得到充足的补充，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蒋介石没有回应李宗仁，但李宗仁看出蒋介石对此“将信将疑”。只是按照李宗仁后来的说法，当时头脑发热的并不是他而是最高统帅部：“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达二十万，与本战区原有的军队合计，不下六十万。大军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是人满之

患。”李宗仁打电话给白崇禧：“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白崇禧答：“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李宗仁认为，扩大战果为时已晚，且“我方集大军数十余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

那么，在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方面到底是谁头脑发热了呢？

毫无疑问，蒋介石基于“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确实对在鲁西南再打一个如同台儿庄的胜仗抱有期望。从四月二十五日他给李宗仁的电报上看，他依旧舍不得放弃已控制的任何要点，要求一线部队作出固守防御的部署：“我鲁南与淮北各部，除固守运河阵地及徐州国防工事之外”，位于鲁西南的部队南下皖北砀山至黄口一线，然后夺取位于徐州西南方向的永城；“我鲁西豫东部队”向东发起攻击，占领徐州西北方向的丰县和沛县。蒋介石告诉李宗仁：“敌兵力不足，军纪废弛，士气颓唐，其淮北主力，已不敢北进；而其鲁西主力，亦为我后方各部牵制。其踌躇不决，畏缩不前，已甚明显，只要我运河线与徐州国防工事能固守不动，则敌此次大包围计划，必可被我粉碎，而且可予以歼灭也。”于是，汉口军令部制订的《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案》，体现出蒋介石的这种繁杂心绪：攻击方向仍旧是鲁西南，作战原则还是攻势歼敌，只是加了“不得已时”机动防御的内容。当第五战区遵循这份《指导方案》，将拟定的作战计划上报后，蒋介石对第五战区提出的要求是：“须着眼求敌主力包围于战场而歼灭之。”

事实上，蒋介石的“求敌主力包围于战场而歼灭之”，与之前李宗仁的“集中所有力量”发动全面攻势以奠定战争“胜利基础”，两者基本是一致的。

只有刘斐坚持认为，目前在徐州方向，中国军队机动和预备兵力太少，投入一线防御作战的部队还是太多。西起微山湖，经獐山、峄县、兰陵镇、向城，一直东延至沂河东岸的码头、郯城，在“绵亘三百多里”的战线上，中国军队投入了近四十多万的兵力，且基本都布防在运河以北地区。一旦日军从侧面或背后迂回徐州，宽大的战线将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局从而陷于被动。由此，刘斐不断地问询李宗仁，是否调配出了机动或预备部队？——“第五战区不仅没有抽调出机动部队，而且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入到第一线或紧接第一线，与敌做延翼竞赛。”所谓“延翼竞赛”，指的是中日两军主力都在企图包围对方，尽力延展各自的两

翼，看谁能把对方包围住。——这不是典型的决战是什么？刘斐的担心有相当的道理：至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国军队尚不具备与日军在徐州地区决一死战的能力。先不说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仅就兵力对比而言，中国军队六十万，日军投入二十余万，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十比一的兵力比例仍未能取胜，如今在三比一的比例下围歼日军的信心从何而来？

徐州会战，就这样开始了。

为协调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的关系，日军东京大本营派人到达山东济南，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关于徐州作战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大本营派来的桥本群少将、西村敏雄中佐；华北方面军作战课课长下山琢磨大佐，第一军参谋友近美晴中佐，第二军参谋长铃木率道少将、参谋冈本清福大佐；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大佐以及临时航空兵团参谋田中友道大佐。会议一开始，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就爆发了争执。首先，徐州会战以谁为主？华北方面军的意见是以第二军为主：“当面之敌，对世界和国民来说，为保持面子，恐不会退却。因此，以攻占徐州为目标，即使最小规模的包围，其成果也绝不小。”而华中派遣军认为，是否占领徐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第二军立即发动攻势，派遣军马上开始行动，则敌人可能退却。因此，从效果考虑，其方法应该是中止第二军的攻击，扣住敌人，然后以第一军及派遣军在归德方面完成大的包围圈，可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接着是关于作战时间的争执。华北方面军的意见是：“第五师团从四月十六日开始攻击沂州（临沂），第十师团从十八日开始攻击，进入台儿庄南面地区的作战，要持续到四月底。在这一进入线内为准备以后的攻势，第十六师团集结于济宁附近，从五月十日左右可开始徐州作战。”而华中派遣军的意见则是由他们首先行动：“为策应华北军作战而开始作战，东台、高邮附近的部队要走在前头，应尽量提前开始行动。派遣军最初的计划是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四日左右进入宿县、蒙城一线（重点蒙城方面）。如果华北方面军迟延的话，希望和第二军攻势开始同时行动，因为到徐州的距离比第二军远，多少需要提前开始行动。”

面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作战，在这个特别召开的参谋会上，除了最终对徐州形成南北包围外，其他问题均未达成一致。

会后，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各自制订了作战计划。

日军华北方面军徐州会战计划：

一、在徐州北面挫败敌人的进攻。但敌正在兰封以东、陇海沿线及其以北增加兵力，有阻止我进入的企图。

二、方面军必须走在敌人的态势完成以前，迅速击败徐州方面之敌，占据大致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华中派遣军与方面军相呼应，约以两个师团从蚌埠、怀远附近发起行动，由津浦线西面地区北上，大致在归德以东、陇海线以南地区，切断徐州附近敌主力的退路。以一部兵力于四月二十四日从东台（江苏省）北上，协助方面军作战。

三、第二军在其兵力集结的同时，对当面之敌进行攻击，并须占领徐州。

四、第一军应以有力的一部渡过黄河，首先迅速切断兰封、归德间的陇海线，并向归德方面挺进。与华中派遣军一部密切配合，使第二军的作战顺利进行。掩护第一军渡河部队由火车送到济宁附近，要求着即由该方面行动。另外，在兰封以西、黄河沿岸尽可能用佯攻牵制敌人。

五、临时航空兵团应以其主力协助向陇海线地区作战。特别应将其重点指向第二军正面。更应与华中派遣军第三飞行团及海军航空队密切配合。

四月二十四日，华中派遣军发布徐州会战作战计划：

一、方针

军与华北方面军相策应，将徐州附近之敌捕捉消灭在徐州西面地区，决战时间大概定为五月中旬。

二、指导要领

军预定于五月五日左右开始前进。根据情况，预期在四月底以后有可能开始前进。

军将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并列作战，首先击败当面之敌，神速向赵家集—蒙城一线挺进，此时的重点保持于左师团。进入赵家集—蒙城一线附近以后，应向归德、亳县方面，还是砀山、永城方面，或是向徐州方面前进，要看情况。特别是应根据徐州方面之敌情再行决定。但不管情况如何，必须以一部占领宿县附近。

派遣军为保证军的主力作战，在军的主力行动前，下令派遣如下部队：

第一〇一师团从现驻扬子江北岸的部队中，尽可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向阜宁方面前进。

第六师团迅速以步兵四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沿和县至巢县至庐州大道地区作战，咬住庐州方面之敌。

派遣军于四月十三日命令，在苏州附近警备的第九师团在凤阳附近集结，第十三师团在蚌埠、怀远间集结。

第九师团在四月中旬陆续集结于南京对岸的浦口，排除敌之障碍北上，到五月八日前集结于凤阳、临淮关地区，第十三师团也在五月八日前在所命令地区集结完毕。

从作战计划上看，日军两路部队虽是各管各的，但已经呈现出对中国军队的南北合围趋势。

在徐州战场的北线，位于鲁南的日军第五师团急不可耐，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把他的指挥部前推到临沂西北面的义堂集附近。日军华北方面军又从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以及第一一四师团抽出部队，归板垣征四郎指挥，以厚第五师团兵力。板垣征四郎随即派出了他最强悍的国崎支队，于四月十六日向鲁南重地临沂发动了攻击。

四月十九日，李宗仁致电武昌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当面之敌自应晨以来猛烈犯我，着着进逼迄未停止，啸（十八）日晚继续彻夜激战，炮火猛烈。我阵地全毁，房屋均着火，炮弹已渐达城垣，我官兵于火光烟焰中流血抵抗，前赴后继，伤亡累累，而干部伤亡尤重，陷于苦战状态。现援军仅到一部，二十一师尚无消息，现时情况二十一师如今晨不能到达，危险堪虞……

十九日中午，日军突入临沂，负责守城的庞炳勋部激战后“官兵伤亡甚重”，残部于二十日凌晨突围而出。

原定负责增援临沂的还是张自忠部。

之前，张自忠部两次奉命增援临沂，部队“伤亡奇重，兵员锐减”，“尤其是第三十八师，作战前约有一万五千人，临沂战役后仅剩不足三千人”，部队因此南撤卞庄（苍山）一带补充休整。自中国军队津浦路作战开始以来，张自忠部于南北战场不断奔波，哪里危急就赶赴哪里苦战。这一次，他又奉命从卞庄北进增援临沂，但因沿途受到日军猛烈阻击而未能及时赶到。及至临沂失守的消息传来，张自忠自责内疚得几近绝望，在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职部此次转战临沂，为时月余，激战四次，逐次伤亡，力量减削，而敌陆续增加，志在报复。职部以兵员疲惫、器械残缺之余，当生力增援机械化之敌，预料必危。今日徒以国势至此，分属军人，义无反顾，是以激励部属，奋斗到底，而在援军未赶到前，守城庞军退出临沂城垣，战局顿挫，是所痛心。兹查职部黄师（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伤亡殆尽，刘师（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伤亡达三分之二，两师现以战斗员并编一旅，尚觉不敷。职忝绾军符，以身许国，救国有心，杀敌无力，殊觉俯仰疚心。”

临沂失守，中国军队失去了鲁南的战略支撑点。

日军国崎支队占领临沂后，沿沂郯（临沂至郯城）公路迅速南下，目的是调动中国军队主力东援，以掩护日军第十四、第十六以及第一一四师团在鲁西南展开，切断运河以北所有中国军队的后路，进而实现围歼汤恩伯和孙连仲两军的目的。为避免被围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李宗仁命令汤恩伯的军团放弃对濑谷、坂本两支队的围攻，将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以及周喦的第七十五军等部，后撤至兰陵镇、洪山镇东南地区占领阵地。

四月十日，在临沂战场的西面，与第五师团并驾齐驱的日军第十师团主力由兖州向南推进到枣庄。枣庄位于兰陵镇的西北方向，距兰陵镇仅六十多公里，这意味着第十师团将向汤恩伯部发起攻击。按照日军徐州会战的计划，第十师团的任务是将中国军队滞留在台儿庄附近。第十师团投入的部队是：以濑谷启的第三十三旅团为基干的濑谷支队、以长濑武平的第八旅团为基干的长濑支队，还有由第五师团转隶而来、以坂本顺的第二十一旅团为基干的坂本支队。十八日，日军的攻击开始，其部署是：濑谷支队在左，沿枣台铁路线向台儿庄进攻，负责牵制滞留孙连仲部；长濑支队在中，先向兰陵镇，再向禹王山发起进攻；坂本支队在右，先向向城、再向四户镇发起进攻。长濑、坂本两支队的作战目标只有一个，牵制中国军队的主力汤恩伯部。

十九日，坂本支队突入向城，长濑支队推进到兰陵镇，只有濑谷支

队在攻击台儿庄时受到周喦的第七十五军的顽强阻击。汤恩伯部逐次放弃阵地向南后退，坂本和长濑两支队紧追不舍，两军激战于兰陵镇、洪山镇以南的四户镇一线，日军决绝强悍的攻击令汤恩伯部死伤严重：郑洞国的第二师剩下不足两千人，而新组建的梁恺的第一九五师只剩下不足千人。——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固守的大运河北岸阵地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这时，滇军第六十军增援而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将直属的步兵、炮兵、工兵、交通兵、护卫骑兵等部队合编为中国陆军第六十军。任命卢汉为军长，下辖第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第一八三师，师长高荫槐；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一九三七年十月，第六十军出云南经贵州，徒步行军四十多天，抵达湖南常德待命。一九三八年初，又转至武昌整训，四月奉命开赴鲁南战场。

中国陆军第六十军军歌，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创作的：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战场。

兄弟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军长卢汉先期赶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告诉他："台儿庄东北前线吃紧"，第六十军归第二集团孙总司令指挥，"速到台儿庄东南面运河以北集结"。而一旁的白崇禧说："台儿庄情况，前几天很紧，目前已趋缓和"，希望第六十军于二十四日前集结完毕。卢汉又去见了孙连仲，孙总司令说："敌军攻势虽猛，但我们打得很好，局势已趋稳定。"——卢汉后来说："李宗仁说话比较直率，白崇禧、孙连仲均未将台儿庄的真实情况相告。在我军赶赴集结地的途中，于学忠、汤恩伯两部已经转移，遂使我军未曾展开即与突入之敌不期而遇。"

按照命令，第六十军需集结在台儿庄的东南面，作为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的二线部队。可是，当第六十军向集结地运动时，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已经南撤，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获悉汤恩伯部撤走后，赶紧向西收缩了自己的右翼，以至于在台儿庄战场的东南面，中国军队的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日军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在三十多门火炮和二十多辆坦克的支援下大举南下，与向北开来的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先头部队尹国华营迎头相撞。尹营长的先头部队消灭了日军的尖兵，占领了台儿庄以东的陈瓦房，但随即便陷入日军主力的包围。为给后续部队赢得时间，被包围的中国官兵顽强抵抗。危急时刻，一〇八一团团长潘朔端率部增援，在小庄附近遭遇日军的猛烈阻击，团附黄云龙阵亡，团长潘朔端身负重伤。日军从四面冲进陈瓦房，被包围的中国官兵开始了白刃战。最终，除一名叫陈明亮的士兵冲出包围圈生还外，尹国华营的其余五百余名官兵全部殉国。

先头营的拼死作战，为第六十军赢得了展开布防的时间。

二十三日，日军向蒲汪、辛庄、戴庄一线发起猛攻。防御蒲汪的第一八二师一〇七九团，在团长杨炳麟的指挥下与日军反复冲杀，当重机枪阵地上只剩下机枪手杨正发一人时，身负重伤的杨正发依旧在猛烈射击，竟然使得日军"不能靠近"。为增援蒲汪阵地，迫击炮排排长靳家祥和步兵排排长吕建国率队向日军发起突然反击，两个排的中国官兵冲入日军的坦克群，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数辆坦克，毙敌十余名，但随后身陷重围，两名排长和二十余名士兵无一生还。二十四日，蒲汪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已伤亡三百余人。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后，二十多辆坦克冲进蒲汪横冲直撞，滇军官兵与村庄里的断墙一起被碾为平地，双方惨烈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日军不支退却。而这时候的一〇七九团，连同负伤的代理团长钟光汉在内，全团仅剩下不足五百人。

第六十军军长卢汉记述：

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约达七万人，敌军三万余人，伪军五千人，我军三万余人，在不到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反复厮杀，逐村争夺。这时，我军原在台儿庄东南面运河北面的集结地，由于陈瓦房、小庄、凤凰桥在遭遇战中为敌攻占，形成了东起台儿庄东北之陶沟桥、马家窑、李庄、五圣堂、邢家楼、五窑路，右至辛庄、蒲汪、西黄山之线的第一阵地，与敌在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对峙。

二十五日夜，孙连仲转达第五战区命令：二十六日台儿庄全线发动反击，于学忠部向东，汤恩伯部向西，第六十军向北，合力歼灭突入台儿庄东面我军袋形阵地中的日军。

二十六日晨，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刚一开始，就被日军前所未有的强大火力所阻，无论是汤恩伯部、于学忠部，还是卢汉的第六十军，都不得不退回原阵地。日军在中国军队后撤后，以炮兵、坦克、步兵联合发动了全线攻击。在第六十军正面的东庄阵地，日军一个小时发射了五千发炮弹，东庄上空烟尘蔽日，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那些在炮击中活下来的中国官兵，接着就与冲过来的日军步兵展开了激战。在右翼，第六十军一〇七八团团长董文英决心收复蒲汪，他带领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出击，于中午时分悄悄接近了日军据守的阵地。中国官兵的袭击是突然发动的，日军以一部在正面顶着，步兵与骑兵则绕到了董文英部的侧后，董团长率部一面试图冲出夹击一面奋力后撤，在得到一〇七七团的增援后才退至戴庄阵地。傍晚，伪军刘桂堂部换上滇军的军服，潜入第六十军胡山阵地，董文英团长奉命向胡山发动反击，战斗中董团长阵亡，三营营长陈浩如奉命代理团长，不久也在战斗中阵亡。这一天，一〇七八团出击部队伤亡官兵达三分之二。入夜，第六十军的胡山、窝山、戴庄等阵地相继弃守。

二十八日，日军越过戴庄，攻击台儿庄北面的禹王山阵地。第一八四师第五四四旅旅长王秉璋率部阻击，中国守军击中了日军的前锋坦克，王旅长在指挥战斗中胸部中弹。日军攻占禹王山山顶后，第五四二旅一〇八六团团长杨洪元要求三营三连组织敢死队，“趁暗夜发起进攻”，将山顶的敌人歼灭，然后向前推进，“构筑起坚固的防御阵地”。三连共计二百八十六名官兵，连长李佐认为：“到各排去挑敢死队员，不但贻误战机，且临时组成的敢死队，官兵之间互不熟悉，难以发挥夜战的威力。不如就用建制排，一个排接一个排连续冲锋，一定要把山顶夺回来。”首先冲上去的是三排，两个班的士兵趁日军不备将其赶下山顶。日军开炮了，已越过山顶的两个班的士兵全部阵亡。三排的其他官兵接着往上冲，同样，也在日军的炮火打击下全部阵亡。——“两个排一百三十

多人，经几次冲击，伤亡近百人，只剩下三十多人守着禹王山的山顶。”三营长王朝卿向杨团长建议：“不能再向前冲了，只要守住山顶就行了，不然部队会被打光的。”——自四月三十日起，中国守军在禹王山顶棱线上与日军形成对峙。

在台儿庄东南战场的作战中，第六十军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李宗仁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每一阵地失去，官兵均少生还。”近十天的血战中，第六十军十二个步兵团，伤亡兵力达七个团，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阵亡者达五千余人。

中国守军的苦战，令濑谷、长濑和坂本三个支队不但出现严重伤亡，且作战进展困难。

日军战史记述：

到四月底，各支队的战线形成胶着状态，受到多数之敌（当时估计在三十个师以上）的抵抗和反击，陷于苦战状态。在我第一线部队通过的后方地区，敌人再次侵入，因此战线成混战状态，后防联络线的保持也极困难。第十师团长四月二十二日从枣庄进入兰陵镇指挥作战，但除指导第一线外，还要对侵入后方之敌采取对策，很忙碌。

鉴于师团长矶谷廉介的“忙碌”，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派出了以草场辰巳的步兵第十九旅团为基干组成的草场支队，命其配属第十师团增援台儿庄东南战场。但是，草场支队刚进至金陵寺、白山西附近，就遭到中国军队第一一〇师和第三十师的顽强阻击，被迫停滞不前。

此时，沿沂郯公路南下的日军国崎支队，二十三日占领郯城，二十四日晚占领码头镇。二十八日，国崎支队从码头镇出发，拟向西北面的北劳沟发起攻击。但是，在北劳沟村的东、北两面，受到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和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的猛烈阻击。激战一天一夜后，国崎支队后方联络中断，弹药给养匮乏，官兵伤亡惨重。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追加了千余兵力前往增援，依旧没能使国崎支队摆脱困境。——“从二十九日起，国崎支队受到东、北两面之敌的反击，陷于苦战之中。因支队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弹药、粮秣缺乏，而呈现补给完全没有希望的状况。由于不断伤亡，战斗力急剧下降。国崎支队的步兵第四十一、第四十二联队，自攻击沂州以来，没有补充过兵员，各中队伤亡累计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联队实力还达不到一个大队。”

为了抵抗住日军在鲁南发起的攻势，李宗仁将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李延年的第二军、谭道源的第二十二军以及安恩溥的第一八二师、吴良琛的第十三师，都加强给了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这其中，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李延年的第二军、吴良琛的第十三师，都是当时中国陆军中的主力部队。由此，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第五战区内的中国军队，于台儿庄东南方向的邳县附近，北依禹王山、方头山、艾山、南北劳沟，重新建立起一条横向防御线，以期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进行顽强的阵地战。日军逐步增援后，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军队的这条防线，鲁南地区战事由此呈现出胶着状态。——就鲁南战局来讲，尽管日军难以推进，但无论是第五师团还是第十师团，其执行的任务就是“滞留台儿庄一带的中国军队"，并“吸引中国军队主力东援”，而这正是日军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只是，两个师团在“滞留”作战中所付出的代价，竟然比之前攻占任何一处要地时还大，日军官兵由此认为，环绕着台儿庄的那片地域，无疑是令他们“噩梦丛生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徐州战场的南线，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两支先遣队推进顺利：第六师团以坂井德太郎的第十一旅团为基干组成的坂井支队，四月二十三日从安徽芜湖出发，二十四日占领和县，二十六日占领含山，三十日占领巢县，五月十一日占领庐州；第一〇一师团以佐藤正三郎的第一〇一旅团为基干组成的佐藤支队，四月二十四日从江苏东台出发，二十六日占领盐城，二十八日占领新兴，五月七日占领阜宁。以上两个日军支队向北推进时，没有受到中国军队的有力阻击。由此，在徐州主战场的东南方向，日军已对中国军队的侧背形成了威胁。

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包括蒋介石本人——仍旧认为南线的日军华中派遣军仅仅是在策应北线作战，对徐州有所图谋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中国方面尚未弄清楚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日军的徐州会战计划显示，主攻的是北线的华北方面军，南线的华中派遣军为助攻，但是，战争全面爆发已十个月，中国方面应该了解，对于日军陆军来讲作战没有谁主谁次的概念。此刻，在徐州战场上，南北两线的日军都认为自己是在主攻。

中国第五战区将要为偏重北线而忽视南线付出巨大代价。

五月初，日军终于看到了他们希图出现的战场态势：由于鲁南方向第五、第十师团的牵制滞留作战，中国军队的数十万大军已云集徐州附近。于是，日军从南北两线开始对徐州实施战略合围。

正值淮北大旱时节，许多河流都已断流，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疾速推进。五月四日，集结在凤阳、蚌埠、怀远一带的日军第三、第九、第十三师团以及配属的机械化突击部队，在大量飞机的掩护下，一部沿着津浦铁路线西侧、主力则沿着涡河西岸开始向北挺进。在涡河一线，中国守军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因为防线正面过于宽大，被日军突破后不得不向西退却。周祖晃的第七军五月一日才由合肥调至涡河负责防守；同时，还接替了第三十一军在淝河北岸的部分防务。桂军官兵工事尚未修好，就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随后，第七军在日军步兵锋刃一般的强劲冲锋下弃守溃散。五日，日军突破了涡河两岸中国守军的阵地。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急令第四十八军，在津浦路西侧以及涡河西岸，向疾速北进的日军发动侧击，以减缓日军强悍的攻击势头。但是，中国军队的瞬间侧击，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根本无法收到任何成效。况且，日军也没有与中国军队纠缠作战的意图，日军的目标很明确，即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大包围。廖磊又急令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南下增援。刘汝明部五月三日才集结徐州，刚刚归属第二十一集团军指挥，西北军部队对增援桂军作战并不坚决，部队才走出徐州以南约五十公里，刘汝明见战场态势已不可能令他孤军南下，为避免被日军包围，第六十八军向西面的涡阳地区紧急收缩了。——至此，津浦路南段门户洞开，北进的日军华中派遣军有了直扑徐州的态势。

廖磊不得不下死令，命贺维珍的第一七三师在蒙城构筑起防御线，以迟滞日军北进的速度。

干旱的淮北突然下雨了，道路泥泞，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第一七师副师长周元率部向蒙城开进的速度极其缓慢。蒙城是个小县城，城墙是单薄的土墙，周围开阔的麦田也不利于守城。中国守军五月六日晚赶到，仓促修筑起简易工事后，日军已经迫近。一〇三三团团长凌云上的部署是：蓝权的三营布防东门外附近的村庄，一部在东门内大街构筑巷战工事；李国文的二营主力为团预备队，控制在北城，一连则在北门外和西北角布防，面向涡河警戒；贾俊优的一营主力布防南门外，并在城外西郊构筑阻击工事；团搜索队七十余人，轻机枪两组十人，步枪和手枪队各三十人，于涡河北岸向龙坑方向警戒。八日，日军骑兵先遣队接近蒙城，遭到一〇三三团搜索队的袭击，日军在短暂的混乱后重新冲击而来。搜索队利用麦田作掩护，与日军对峙到黄昏。这时候，日军炮兵的气球升起来了，悬停在蒙城东门的上空，炮兵瞄准方位开始猛烈地炮击，炮击之后是步兵的冲锋。三营守军抵抗顽强，一直打到天黑，令日军毫无进展。天亮了，日军的炮火再次轰击东门，战机也飞临蒙城上空

俯冲投弹。这一次向东门发起攻击的日军步兵中夹杂着十辆坦克，死守东门外阵地的中国守军伤亡达二百余人，最后被迫退入城内。同时，南门外阵地也在苦战后丢失。至此，蒙城城外阵地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城内的中国守军陷入重围。晚上，日军一面爬城墙，一面向城门袭击，除了有涡河天然屏障的北门外，蒙城其他三个方向的城门处均彻夜激战。凌晨时分，日军开始总攻，火炮、飞机以及直接抵近城墙的轻重火器组成极其猛烈的火网，蒙城的三面落弹如雨，硝烟弥漫，墙倒屋塌，日军从东面和南面倒塌的城墙缺口冲进来。关键时刻，团长凌云上亲自持重机枪向日军射击，终于把从缺口处涌入的日军堵了回去。日军整顿后再次发动攻势，工兵乘坐坦克冲击中国守军的工事，然后步兵依旧向残破的东门猛冲。中国守军兵力有限，外援无望，眼看着日军冲入城区，坦克沿着大街横冲直撞，守军官兵被分割成碎片。激烈的巷战中，三营营长蓝权阵亡，紧接着副师长周元阵亡。最终，蒙城中国守军。团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只有团长凌云上率十余名官兵冲出了日军的重围

五月九日，蒙城陷落。

在徐州主战场的西南方向，日军也已位于中国军队的侧后。

李宗仁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

此刻，北线鲁南地区的中国军队被日军第五、第十师团死死牵制着无法解脱，而南线日军的第三、第九、第十三师团全速北进的目的无疑是对徐州实施包抄。因此，必须在北线日军急速南下之前，阻滞南线日军的推进速度，以解徐州被南北合围之忧。但是，中国军队主力之前已大军云集北线，此刻让任何一支部队南下，不但会遭遇南线日军的猛烈打击，且相对于岌岌可危的战场态势而言，都已显得为时过晚。

五月七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达徐州会战作战命令：

一、第十六师团五月九日从济宁附近出发，击败当面之敌，首先迅速进入砀山、唐寨方面。

二、第十师团扣住当面之敌，随着作战的进展，准备向临城附近转进。

三、第五师团扣住当面之敌，随着作战的进展，准备向徐州东面地区前进。

四、随着第十六师团的前进，变更警备地区。

北线，鲁南战场完成牵制后，鲁西南的日军开始南下了。

九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从济宁出发向西挺进，当天渡过了大运河；配属该师团的第十四师团酒井支队，于十一日夜占领郓城。

南北两路日军合围徐州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

中国统帅部得到了如下确切情报：

据谍知：敌为攻占徐州，其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大将、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津浦路方面作战司令官稔彦王中将、胶济路方面作战司令官三毛一夫少将，均已在最前线之临城指挥作战。又平汉路方面作战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拟亲率第十四师团沿濮县渡黄河经菏泽到曹县，与津浦路以西之敌军相互呼应。又敌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畑俊六大将及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同在蚌埠设临时指挥所，亲身督战。

日军的作战目的是一举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但是，蒋介石的判断却出人预料，在日军对于徐州势在必得的情形下，他仍旧认为徐州战场上的日军是在“自取败亡”：

查日寇自鲁南屡败惊慌万状，近竟放弃晋绥江浙既得地位，仅残置小部扼守要点苟延残喘，而调集所有兵力指向陇海东段孤注一掷，以图幸逞，其总兵力合两淮鲁豫至多不过十五万，较之我军使用各该战场之兵力约为四倍以上之劣势，且敌之后方处处受我扰袭，补给不便，较之我之后方有良好交通线者，其补给及兵力转用之难易相去甚远。目下敌不顾其兵力之不足及战略态势之不利，竟敢采取外线包围作战，其必遭我军之各个击破而自取败亡殆无疑问。仰望忠勇将士明察彼我熟权利害，鼓舞所部以旺胜企图心各向任务迈进，击灭当面之敌以寒寇胆而扬国威为盼。

如果从军事上看，这封电报上的所有分析都很正确：兵力劣势的日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绝对是在冒军事上的大不韪。可作为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应该明白一个严酷的现实，那就是日军之所以敢违军事常规，以劣势之兵力包围如此众多之师，且不顾后方坚决贸然挺进，也是出于对中国军队全面作战素质的判别。显然，蒋介石的意图是：在徐州战场上，中国军队能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的反包围，然后聚而歼

之。这无疑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自以为是。

身在战场的李宗仁，已经意识到中国军队所处的危境。他认为，如果每一支部队在战术和作战上，都具备完成战略和战役所赋予任务的能力和素质，台儿庄血战胜利后也不会让战败的日军重新组织起坚固的防线，以至于在鲁南战场上形成僵局，导致中国军队的主力被牵制在那里，而当淮南的日军开始北进，鲁西南的日军开始南下时，中国军队已无法调整战线分兵主力前去阻击。

为了落实自己的战略意图，蒋介石带着作战厅厅长刘斐和军令次长林蔚等幕僚飞往郑州。刘斐提醒蒋介石：鲁南部队在运河一带的防御，能否保持到主力部队对日军实施反包围作战的时候，还是一个问题；同时，南线日军的第一线兵力，苏北方向不过三千多人，淮北方向不过五千多人，但两路日军疾速挺进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南线的中国军队能否击退淮北之敌然后再转身支持鲁南和鲁西南作战，确实很难说。但是，蒋介石坚持他的见解。他生怕李宗仁不贯彻他的意图，到达郑州后又声称要亲自去徐州指挥作战。——“我估计蒋的本意就是自己不想去，否则，他领着我们一道去就是了。”——因此，刘斐表示他和林蔚去就可以了，委员长不必冒这个险。蒋介石马上说：“你们去同德邻（李宗仁，字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向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方面的敌人，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

刘斐和林蔚去了徐州。

蒋介石还不放心，五月十二日，他又以训令的方式致电李宗仁：

一、国军决先击灭淮北及鲁西之敌。

二、鲁南方面在敌抽调兵力转用鲁西之情况下，除应以有力部队增强右翼防敌包围外，须即刻设法抽出三四师兵力位置徐州，为该战区的预备队，必要时用蒙城方面之攻势。

三、鲁南方面即决心取守势，于必要时可依运河逐次抵抗，至不得已时则固守徐州国防工事线，以获得攻势方面决胜之时间。

四、总之第五战区第一任务在击灭蒙城方面之敌，使全盘态势有利，否则保有鲁南阵地亦属无益。

希当机立断，速决实行具报。

此时，南线日军自蒙城出动，三天之内前行一百六十多公里。第十三师团进至永城，第九师团占领了百善，担任第九师团右翼保护的第十八旅团攻占了南坪集。——在永城、百善、南坪集以东，徐州已近在百公里之内。而在战场的正南方向，五月六日才从南京调入的日军第三师团，在蚌埠与怀远间集结完毕后，十五日进至宿县以南的大营集附近。十四日下午，日军第十三师团编成的快速挺进队抵达陇海路，炸毁了汪阁东面的铁桥。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第五战区后方唯一的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被切断了。

在北线，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五月十二日在濮城、杨集以南强渡黄河，直逼菏泽城下。菏泽守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藩决心死守待援。日军对菏泽发起攻击，第二十三师官兵奋力抗击，日军突破中国守军的外围阵地后，菏泽陷入重围。日军调来重炮猛烈轰击城内，第二十三师官兵死伤惨重。最后时刻，第六十七、第六十八旅旅长信心动摇，率部后撤，致使菏泽城防瞬时崩溃，大批日军涌入城内。第二十三师参谋长黄启东率残部在城内与日军肉搏，寡不敌众却誓死不降，最后独自跳城自杀。李必藩师长身边仅剩下一个直属连和几名随从副官，直属连官兵顽强肉搏，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李师长跑到距菏泽五公里的一个名叫曲只集的村庄内，在军用地图的空白处写下了一行字：“误国之罪，一死尤轻。愿我同胞，努力杀贼。”他为自己用人不当致使菏泽失守悔恨不已。——李师长在一块门板上平躺下来，举起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北线的另一支日军，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十一日主力自郓城开始南下，击退了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师的阻击，占领金乡和鱼台。之后，第十六师团也组织起一支快速支队，不顾一切地急促南下，于十五日早晨抵达陇海线，炸毁了汪阁东面的三段铁路后，与华中派遣军的快速挺进队会师。

南北两路日军在陇海铁路会师，标志着日军对徐州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的战略包围已经合拢。

为加强华北方面军在徐州会战中的攻击力量，日军大本营从关东军调来了混成第三旅团和混成第十三旅团，命其十五日到达战场配属第二军。至此，日军围歼徐州附近中国军队主力并占领徐州的会战计划已经完成大半的任务：以约六个师团部署于徐州以北，以约三个半师团部署

于徐州以南，以连续的攻击行动将中国军队吸引滞留于徐州地区，而后以迅猛的迂回作战南北对进，切断陇海铁路。那么，对于日军来说，剩下的任务就是：向包围圈的中心——徐州发起突击，以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十六日，南线日军第九师团推进到距徐州咫尺之遥的萧县。

同一天，北线日军第十六师团占领唐楼，第十师团从沛县以东南下到距徐州只有六公里的地方。

李宗仁急令从鲁南战场下来的第一三九师前往阻击。该师在师长李兆瑛的率领下即刻向萧县前进，中国守军进入县城的当天，萧县城外的高地和城关已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为了不让日军快速靠近徐州，李宗仁又急令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第九十二军增援第一三九师死守萧县。但是，张自忠部受到日军的猛烈截击，根本无法靠近萧县。萧县四面被围，当日军步兵由北门冲入县城时，第一三九师粮弹俱绝，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师旅两级预备队均已用尽。守军官兵一边肉搏一边突围，李师长和石副师长均负伤，参谋长邓佐虞、副旅长吕汝爽、马骥德和团附陈芳荣以及营长李彦文、黄超云、李廷舟阵亡。

萧县失守，徐州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深陷重围。

日军知道中国军队除了突围之外别无选择。

十五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

一、徐州东面敌主力开始总退却。

二、军与华北方面军协同向徐州缩小包围圈，将敌歼灭之。

三、第三师应急速开始行动，同时合并指挥第九师团的右侧支队，首先攻占宿县，接着冲进徐州，攻击驻在之敌。

四、第九师团除继续执行原任务外，须冲进徐州。

五、第十三师团应以主力迅速切断徐州至砀山大道，然后冲进徐州，攻击驻在之敌。

六、变更第九、第十三师团之间的作战境界为大吴集、穆集、卧牛山连接线，第十三师团与华北方面军之间不特别设置作战地区境界。

日军已经急不可待地要“冲进徐州”。

十六日，李宗仁下达了放弃徐州并全面突围的命令。

中国第五战区突围命令：

一、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及第五十一军、第六十军、第四十八军、第二十二军、第七十五军之第六师、第九十三师、第一三二师和第一四〇师为鲁南兵团，以孙连仲为总指挥，于学忠为副总指挥，守备徐州，掩护大军转移。

二、第二十军团（第一一〇师、第四师）及第二、第六十八、第五十九、第九十二各军，与第九十五师为陇海兵团，以汤恩伯为总指挥，刘汝明为副总指挥，由徐州西南转进亳县、柘城、太康、鹿邑、淮阳、涡阳一带。

三、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及第七十七军为淮北兵团，廖磊为总指挥，由宿县、固镇一带向太和、阜阳、颍上、凤台、寿县、正阳关之线转进。

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为淮南兵团，以李品仙为总指挥，确保官亭、舒城、怀宁之线。

五、第二十四集团军为苏北兵团，以韩德勤为总指挥，仍确保淮阴、东海一带。

六、挺进军（第六十九军）应在费县附近鲁南山区经营根据地，进行游击作战。

抗战史上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突围行动开始了。

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生存出路是有优势的。中原地区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庄稼茂盛的田野里公路和土路密如蛛网，尽管日军南北两路来势凶猛，但毕竟兵力有限，在徐州附近形成的包围圈到处是缝隙和漏洞。第五战区的突围命令刚一下达，十分熟悉地形和道路的数量巨大的中国军队，在迅速脱离包围圈的强大动力支持下，从战场上的各个缝隙蜂拥而出。日军虽然下达了猛烈追击的命令，但洪流一般的中国军队在徐州战场的各个方向狂涌不止，以日军有限的兵力能够追得上哪

一股又能堵住哪一支？

偌大的徐州战场上，庞大的中国军队转瞬间就没有了踪影。

日军目瞪口呆。

日军追上的仅仅是因负伤或生病掉队的中国官兵。他们在一名伤兵身上发现了一张第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的名片，不禁大喜：“铃木快速部队二十日急袭在尹集的第二军司令部，军长谭道源中将被俘（负伤后死去）。这位军长像个武人，很出色。”实际上，这名伤兵是谭军长的副官。

最后撤离徐州的中国军队，是卢汉的第六十军。无法得知李宗仁为什么命令这群在台儿庄附近已经血战数天且伤亡严重的云南人来死守根本无法防守的徐州。李宗仁的要求是：为掩护鲁南大军突围，第六十军坚守徐州的时间越长越好。为此，李宗仁送来一份“徐州附近五千分之一国防工事设施要图”，又用徐州中央银行来不及搬走的小额钞票拨给第六十军二十二万元作为“三个月的伙食费”。

第六十军军长卢汉记述：

日军对徐州的包围圈越缩越小，陇海、津浦东南西北四面铁路线已被切断，敌机在市区整天投弹轰炸，我鲁南二十万大军又都涌到徐州，挤在徐州至宿县公路的狭长地带，各自夺路，这时，李宗仁亦已离开徐州……遵照明令，我率部队立刻急行军向指定的汪庄前进，预计五月十九日晨到达。这时来自西南方向的枪炮声隐约可闻。我遂决定派一八四师杨宏元团先到徐州西郊段庄一带布防，掩护友军撤退；然后将我军分为三个纵队，由张冲师长率领，向徐州以南大五柳集、屠家庄地区集结。我则偕部分参谋人员先至徐州，勘察地形，规划守卫徐州部署。我先到战区长官部，院内空无一人，军政机关亦早撤走。我失望之余，只好赶往九里山视察工事。我沿着阵地看了一周，只有十几处钢骨水泥筑成的机关枪掩体，而且布置在北面，东南西三方均无防御设施。我又离开九里山到徐州市区，这时敌军已攻陷萧县，敌人的炮火已打到徐州西郊。敌机终日轰炸，火光熊熊，行人稀少，交通要道已无大部队通行，唯有零星散兵向南奔跑，道旁负伤官兵则卧地呻吟。徐州东火车站附近的仓库及停置路轨上的列车中，弹药、粮秣、器材等物资堆积如山，正放火焚烧，浓烟滚滚。

卢军长终于在徐州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他的上司孙连仲——“他和他的卫兵已倚装待发。”卢军长急切地询问：如果第六十军死守徐州，增援的部队是哪支？什么时候才能抵达？所有的部队都已撤走，只命令第六十军固守，统帅部是否已决定进行反攻？第六十军死守多长时间算是完成任务？一问三不知的孙连仲只好说：“局势到这个样，你们军也跟随大部队之后撤退吧。”

第六十军没有固守徐州，虽然是最后突围的部队，但所幸大部分官兵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相比之下，倒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的突围险象环生。

十七日晚上，日军的炮弹已经落在徐州市里，李宗仁转移到了郊外的一个村庄，但日军的炮弹竟然一路追着他打，其中的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了他的房屋顶上，所幸那一刻他不在里面，把他的传令兵炸死了。十八日晚，李宗仁和战区长官部的幕僚们开始乘火车突围。原计划火车抵达宿县后折向西，但才前行了几十公里便传来猛烈的爆炸声，有人报告说，前面的一座铁路桥被撤退的中国工兵炸断了，为的是不让日军追击过来。包括李宗仁在内，火车上的所有人开始下车步行，走了一夜才接近宿县，但坏消息随即传来：十九日晨，宿县已被日军占领。——在战区长官部开始突围时，李宗仁曾严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派出最有力的部队，死守宿县三天，直到长官部突围出去才能弃守。李宗仁以为这一重任只能交给他信任的桂军部队，然而，奉命死守宿县的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在日军第三师团与第九师团的联合猛攻下，不到一天就命令部队弃城撤退，导致战区长官部的突围之路被日军堵死。杨俊昌的理由是，第一七一师在上海血战后全部由新兵补充而成，奉命转进徐州战场，经过在淮南阻击日军北进的战斗，接到死守宿县的命令时，全师仅剩五百残兵。尽管他认为让这五百残兵坚守宿县“简直是胡来”，但还是执行了开赴宿县的命令。宿县是一个大县城，第一七一师的残兵难以布防四个方向，可是日军从四面包围而来。宿县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会超过一天。由此，除了杨俊昌认为应该孤注一掷死守外，第一七一师的其他将领都认为不如尽快撤走，以免被迅速全歼。杨俊昌知道违令的结果，最后时刻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用他一个人的脑袋保住其他人的性命。——一九三八年十月，杨俊昌因违抗军令弃守宿县，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监禁。

在距宿县六七公里处，李宗仁见到了南撤至此的汤恩伯。汤恩伯的军团不但仍有“数师之众”，且还有数门十五生（厘米）的大炮随行。汤

恩伯问李宗仁要不要与他一起突围，因为他的部队“实力雄厚"，日军难以围歼。李宗仁则认为，让这支中国陆军中的精锐之师脱离战场至关要紧，而带着他的长官部必会形成拖累。于是，两人决定，汤恩伯的军团继续向西突围，李宗仁的长官部绕过宿县向东南突围：

我即亲率长官部一行千余人向东南前进。沿途皆有敌机跟踪轰炸，然在大平原之上，部队分散前进，敌机杀伤力甚小。越过津浦路以西地区后，某次吾人正在一大村落造饭休息，忽为敌侦察机发现。该机兜了个圈子即行离去。我知其情不妙，匆匆饭毕，即令全体人马离开该村。我们走了不及二三里地，突有敌轰炸机二十余架比翼飞来，一阵狂炸，该村落顿时夷为平地，而我辈竟无一人死伤，亦云幸矣……我们自东边绕过了宿州，足足走了一整天，抵达涡河北岸，与第七军来接的部队共一团人相遇。涡河桥梁、渡船皆毁，人、物渡河已感困难，随行汽车数十辆自然无法携带，乃悉数在河边焚毁。渡过涡河，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四月十九日中午，日军占领徐州。

日军对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和技巧甚感惊愕，认为徐州会战的战果因此被大大打了折扣，折扣低到了作战计划预想的“一折”：

中国军的退却，实在巧妙，日军即或发现踪迹，在麦田中亦无法追及……中国军不但轻装，而且善走，同时所着服装与一般民众无异，故纵不及退却，亦可冒充一般民众，欲捕捉几不可能……况彼等之退却与一般大部队之退却方式不同，亦若蜘蛛之子，由四面八方各自分散，嗣在指定之安全地区集结……而且日军兵力仅五分之一，故对退却迅速之中国军，只能产生一折程度之打击而已。

徐州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大撤退，从军事上讲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数十万大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脱离战场，不但破坏了日军与中国军队决战的计划，还使国家军队的主力得以保存，这也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需要。

当日军意识到徐州附近战机已失后，迅速调整部署，把攻击方向转到了中国第一战区所属的豫东地区，目的是捕捉和歼灭陇海路东段的中国军队主力。

日军第十四师团从菏泽兵分两路，其先头部队于五月十七日抵进兰

封以东的仪封附近，再次切断了陇海路。中国第一战区紧急调动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由兰封反击仪封；薛岳指挥的豫东兵团主力也由归德向西夹攻，把突进豫东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重炮旅团和一个野炮团阻击在了内黄、马庄寨和人和集一带。

在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撤走后，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至少还存在着属于中国第一战区的近二十万主力部队，而土肥原贤二竟然指挥着他仅有两万人的第十四师团毫无顾忌地冲了进来，这不但使蒋介石大为意外，也令被如此蔑视的中国军队感到愤怒。——徐州会战后期，发生在豫东地区的未在计划之内的作战，被中国方面称为“兰封会战”。

蒋介石决定给土肥原贤二以重击。

蒋介石的信心来自这样一个前提：第一战区中国军队与冲进来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兵力对比几乎达到了十比一，而且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的主力均是精锐的中央军部队。

中国第一战区的作战构想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和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之一师组成东路军，自归德沿陇海路两侧向西攻击；以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组成西路军，由兰封向东攻击；由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和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组成北路军，在定陶、菏泽、东明、考城一线切断土肥原贤二的退路。为保证作战目标的达成，特别命令黄杰的第八军、郭忏的第九十四军之第一八七师以及杨光钰的第二十四师等部队坚守砀山和归德一线，阻击日军第十六师团由徐州西进增援。命令汤恩伯的第二军团、胡宗南的第一军等中国陆军之精锐主力集结豫东相机投入。

中国军队拟以二十万对二万的绝对兵力优势，彻底歼灭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

二十一日，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兵分三路，开始夹击深入到内黄、仪封一带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龙慕韩的第八十八师一部收复了人和集和内黄，两地的日军向西南方向混乱逃窜。同日，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向仪封的日军发动猛攻，迫使仪封日军向西北面的东岗头、毛姑寨方向逃窜。

中国军队随即发起了猛烈的围歼战。

战斗一开始，在毫无遮蔽的平坦的盐碱地上，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官兵遭到日军炮火和机枪的打击，日军火力之猛，使得冲锋号刚一响起，第一三八旅二七五团二营五连排长陈猷和他身边的司号员瞬间便被打倒在地。副排长李勋率领官兵投出一波又一波的手榴弹，然后官兵们趁着烟幕冲到了日军的战壕边，战斗由此进入了残酷的肉搏战。

……一名日军端着三八枪向我猛刺过来。我本欲先发制人，但枪比敌短，说时迟那时快，日军的刀锋已近我身，我急忙向左一闪，刺刀从我右肘飘过，刀尖划破了我右下臂皮肉。我顾不了许多，忍住疼，用枪托顺势横扫过去。日军眼快，以左手接住我的枪，用力一拖，我顺势一压，双方都脚失重心，同时倒地，在地上扭打一团，谁也不愿松手。这时，另一日军欲刺我的后背，但刚一举枪，就“呃”了一声倒下了。我回头一看，是机枪手周天禄砸死了该敌。接着，老周身子一转，冲着被我压在下面的日军一脚踢去，同时用枪托将该日军砸得脑浆崩裂。我刚站起，只见周天禄如闪电一般，抡起机枪左右开弓，勇猛异常，顿时就砸死了六个日军。周天禄是河南信阳人，二十五岁，农民出身，为人忠厚，力气很大，能双手同时举起两个成人，是我连第一大力士，平时我俩感情较好。这时，他虽身负轻伤五处，但毫不在乎。十余分钟后，我连毙敌八十余名，剩下的日军仓皇逃跑。

战斗持续到下午，第一三八旅已经拼得所剩无几了。阵亡者中有一名学生出身的士兵名叫费精进，日军的刺刀从他的前胸刺穿到后背，他的刺刀也刺进了日军的腹部，双方的刺刀就这样留在了对方的身上。旅长马威龙对官兵作战勇猛很满意，亲手写了两张嘉奖令，一张是因五连坚守阵地，还捉了一名日军俘虏，给予褒奖；另一张是论功行赏，中尉排长王永福提升为上尉连长，上士副排长李勋提升为少尉排长。大家一致推荐勇猛的大力士周天禄负责保卫旅长的安全，马威龙高兴地接纳了。可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排长李勋负伤，当他被抬到刚刚收复的罗王车站时，碰见了守着一副担架的周天禄。周天禄说，他和旅长一起上前沿时，旅长被炮弹炸倒了，除了一条大腿外，全身都被炸烂了。在放着马威龙旅长遗体的担架旁，排长李勋和大力士周天禄抱头大哭。

中国军队相继夺取了毛姑寨、杨楼等据点，日军向西逃窜的路已被封堵。土肥原贤二把第十四师团主力集中起来，拼死向杨固集、双塔集一带猛冲。连日苦战后第二十七军抵挡不住，溃败下来的队伍潮水般地向西涌去。——“桂永清知道自己的部队是控制不住了，如果丢了兰封，他的责任很大，便匆匆地写了一张字条给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率所部固守兰封。”而桂军长本人，则是“一口气就跑过了罗王车站”。

消息很快传来：兰封在几乎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被日军占领。

兰封的失守，至今仍是无法弄清究竟的一件战争往事。有人说是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撤离所致，但龙师长说是桂永清命令他们向第七十一军靠拢，他将兰封城防交给第三十六师工兵连后，部队才移防的。——尽管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被押解到武汉枪毙了，但兰封的失守最终导致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严重受挫。

坏消息接踵而至：在豫东战场的东面，为解救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正向西突进，想把中国军队包围第十四师团的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日军第十六师团的攻击方向是砀山。负责防守砀山的黔军第八军第一〇二师，在日军的猛攻下，师长柏辉章竟然下令放弃阵地西撤，砀山失守。

兰封和砀山的失守令中国统帅部大为震惊，因为这不但导致了围歼土肥原贤二的计划泡汤，反而还会令战局演变成日军的两个师团合拢后直取开封和郑州。二十四日，蒋介石任命薛岳为第一兵团总司令，统一指挥胡宗南、李汉魂、俞济时、宋希濂、桂永清各部，立即发动反攻夺回战场主动权，彻底歼灭日军第十四师团。愤怒的蒋介石告诫各位将领："此次兰封会战，关系整个抗日战局，胡、李、俞、桂、宋各军，应遵照薛总司令所示任务，务于本月二十五日午后六时三十分全线总攻，务须于明二十六日拂晓前将兰封、三义寨、兰封口、陈留口、曲兴集、罗王寨地区之敌歼灭。如有畏缩不前、攻击不利者，按律严惩；如战役中建殊勋或歼敌俘获最多者，当特予奖给。希饬所部凛遵勿违为要。"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了开封，并制订了围歼土肥原贤二的作战计划：胡宗南指挥第一军、第九十军和邱清泉的战车营，配属重炮兵营，攻击兰封以西的曲兴集、罗王寨；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在黄河北岸截击日军的增援，切断其补给线；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第二十师，以及新编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六师等部，攻击兰封北面的三义寨；第七十一军攻击兰封；第六十四军攻击兰封西面的罗王车站；商震部守备开封至郑州之间的阵地。

二十五日凌晨，中国军队各部队进入了攻击位置。

本该寂静无声的战场，此时却云集了大批渴求观战的中外记者。中国陆军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粤军余汉谋集团的主力，其任务是攻击罗王寨以夺取西侧的罗王车站。跟随在李军长身后的外国记者分别来

自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等国际著名通讯社，还有一位名叫阿特丽斯的美国女记者。二十五日午后，攻击准时开始，中国军队的炮火至少在这个方向上压制了日军，日军的阵地被轰击成一片火海，中国官兵随即发起了不顾一切的冲锋，终把罗王寨内的日军压到了寨外。日军拼死反击，罗王寨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拉锯战进行得十分惨烈。——“傍晚，残阳如血，硝烟随晚风荡漾，指挥所每个人凝视战场情况的惨烈，莫不怒发上指，后续部队川流涌上，视死如归。以我七年来培训出来的广东子弟兵，一旦血染沙场，我固涕泗如泉，而中外记者亦不禁暗弹热泪。”第六十四军再次向罗王寨攻击时，胡宗南派来了重炮助战，中国军队终于夺回了罗王寨和罗王车站。进入罗王寨的记者们开了眼：中国士兵缴获了一把日军战刀，经过考证，竟然是土肥原贤二的佩刀，可见土肥原贤二本人曾在寨内。土肥原贤二的这把佩刀，当场就把一叠二十枚的铜元一斩两半，可见其钢质精纯，锋利无比。

与此同时，宋希濂指挥第七十一军反击兰封。第八十七师负责攻击东北面，第八十八师负责攻击西南面——八十八师原师长龙慕韩因丢失兰封已被押解武汉，师长由宋希濂兼任。兰封城不大，土墙也不高，四周地势平坦不易接近。中国官兵事先挖了壕沟，以便前进时掩护，二线部队还捆扎了大量的梯子用以登城。二十六日，战斗开始后，中国官兵发起的数次攻击都没能成功，以致兰封土墙内外双方伤亡枕藉。黄昏，宋希濂命令火炮抵近射击，终于将土墙打开了缺口，中国军队由此获得了立足点，第八十八师自南门爬了进去，第八十七师也冲进去了部分官兵。双方在小城内彻夜巷战，凌晨时分日军弃城逃跑。士兵们把在城内缴获的一匹骏马送给了军长宋希濂，并为骏马取名为“土肥原”。

罗王车站以及兰封相继被攻占，陇海铁路线由此畅通，滞留在归德附近载有中国军队重要军用物资的四十二列火车得以全部西撤郑州。

土肥原贤二早已意识到，中国军队要吃掉他的第十四师团，他已经深陷十倍于己的众兵重围中，突围的方向无从判定，苦战已令部队伤亡巨大。更严重的是，他的后方联络线被完全切断，弹药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空投，师团的机械化兵器，特别是汽车和坦克，在没有燃油的情况下只能抛弃。困境中的土肥原贤二作出了唯一可行的决定：攻陷兰封，然后把主力转移到三义寨、曲兴寨、罗王寨这三个据点内，死守待援。土肥原贤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村庄，是因为它们都在黄河边上，可以从水路得到接济。但是，攻占兰封不久，兰封即被中国军队夺了回去。目前，三个据点中，只有三义寨仍在手里。——试想一下，如果侵华战争的策划者之一、著名的特务机关头子、日军精锐的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

肥原贤二被中国军队或俘虏，或击毙，或在最后的绝望之时只能按照日本军人的标准程序剖腹自杀，那将在中日战争史上留下一个怎样的谈论不尽的话题？

可是，中国军队围攻土肥原贤二所在三义寨的作战，从经过到结局都令人不可思议。

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手令，称此战如不能取得成效，将是一个“千古笑柄”：

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十二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务请毅然决心，速抽调六师以上兵力在侧后方做预备队，而指定李铁军、李汉魂、俞济时三军负责扫清当面残敌。即使被突破数点，冲出包围圈外，我可与之野战，则较为得计。此时东路敌军必于两三日内向西急进，由周口直出许昌、郑州，则后方在在堪虞。若我军不早为计，则如此大兵群集于狭小区域，且左限黄河，歼灭甚易。务希当机立断，即于本晚实施，一面整理战线，一面抽调部队，以备万一。并以此意转薛伯灵（薛岳，字伯灵）、胡宗南，决心遵行，勿稍延误。

但是，三义寨里的日军凭借战车、骑兵和飞机的支援，不但死守不退，而且还不断出寨反击。二十八日，日军的反击方向是第二十七军的阵地，桂永清又一次“独断命令各部队向杨固集、红庙间地区转移阵地，沿途抛弃无线电机及武器弹药，情形颇为混乱”。最终，围攻三义寨的中国官兵伤亡达两千五百余人，虽然攻克了柴楼、蔡楼、十八寨、何寨、薛楼等小据点，可直到二十九日仍没有攻克三义寨。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兰封战场的东南面，负责解救土肥原贤二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克了陇海线上的豫东要地归德（今商丘）。

日军第十六师团和混成第三旅团，从砀山向西突击，于二十六日攻占虞城，之后开始攻击归德的外围阵地。负责防御的黄杰的第八军当晚就撤到了归德郊区。二十七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黄杰：死守归德，在兰封之敌最后解决之前，必不能放弃。但是，黄杰根本没有执行命令，于二十八日擅自率部退向柳河和开封，只留下第一八七师守朱集车站和归德城。二十九日拂晓，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也率部撤走，归德随即变为一座空城，致使日军未经作战就占领了该地。

归德的丢失使得战局瞬间转变：准备围歼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作战，因侧背受到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威胁，中国军队不得不转为守势，且须立即调兵阻击日军第十六师团的进攻。同时，在战场的北面，日军混成第四旅团正准备强渡黄河，与近在咫尺的第十四师团会合。更严重的是，日军第十师团配属混成第十三旅团，攻占了豫皖交界处的涡阳和亳州，正向豫东急速包抄而来。——豫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已处在被日军反包围的态势中。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第一战区做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

一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战场态势极其有利、势在必得的战役，结局竟然是全面撤退。

蒋介石所担忧的“千古笑柄”成为了现实。豫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主力开始迅速向西转移。

在是否向中国军队实施猛烈追击并扩大占领区的问题上，日军大本营与华北方面军再次发生争执。十九日，日军大本营明确指示，追击行动如“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大本营的命令让日军华北方面军极其愤怒：在徐州作战之前，曾向大本营提出，将来攻击武汉时，希望把作战任务交给他们，因对武汉的攻击应从郑州方向开始。但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很快就得知，大本营在制订武汉作战计划时，根本没把郑州方向列入作战范围内，这让华北方面军感受到了蔑视和冷落。在徐州会战中，本来按照作战计划，也应由华北方面军夺取徐州，但竟然被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抢先一天占领，再一次让华北方面军颜面大失。因此，这一次，华北方面军决定不再顾及大本营的限制，命令第五、第十四、第十六、第一一四师团对西撤的中国军队实施猛烈追击，一直追到平汉线为止。

六月三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杞县、通许和陈留；四日，日军第十四师团攻占兰封后向西进击，与第十六师团一起合攻开封城。中国守军第一四一师，在师长宋肯堂的率领下拼死抵抗，无奈日军兵力和武器都占据优势，六日开封城陷落。随后，日军沿陇海铁路直扑中牟，第十六师团占领尉氏和扶沟，第十师团占领柘城。尽管薛岳命令死守中牟县城和车站，宣称谁再擅自撤退依法严惩，但还是有将领临阵溃逃。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致电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文中充满了愤怒与无奈：“（第一八七师）团长张鼎光于二日守杞县猪皮冈时，擅自撤退；该师参谋长张淑民屡次煽动退却，复敢弃职潜逃；旅长谢锡珍首先退出猪

皮冈，未经报告师长，即便借口收容，擅自乘车南下；叶赓常旅长，当睢县之战时，突告失踪，事后闻已易服赴汉口。”十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前锋部队炸毁了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十二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派出的挺进队，炸毁了新郑东南六公里处的京汉线铁路桥。

由开封、中牟至郑州，仅七十公里的距离。

日军战机开始轰炸郑州，“自朝至暮，未稍间断”。

郑州已处在日军第十四师团与第十六师团的夹击态势下。

郑州是中国中原重镇，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会点。一旦郑州被日军占领，不但平汉、陇海两条重要的铁路线将被切断，更重要的是：一、日军可沿陇海线西进，攻取洛阳和西安，进而窥伺汉中，逼近中国整个抗战的大后方西南；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沿平汉铁路线向南长驱直入，威胁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武汉。为此，中国统帅部的最后决定是：掘开黄河大堤，阻止日军前进。

这一惊人的决定，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酝酿甚久。

据中国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回忆，早在一九三五年，中国方面制订未来对日作战腹案时，就已考虑到一旦日军逼近郑州可以采取的应对方案：其一是把郑州付之一炬，其二便是掘开黄河大堤。

一九三七年秋，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曾建议用黄河作为“最后战线”，决堤造成“人工泛滥”以遏制日军攻势。一九三八年四月，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建议在河南武陟县境内掘开黄河北堤，目的是在日本人用决堤的方式阻挡我军之前，我方抢先选择合适的地点决堤以使日军置于“危地”。徐州失守后，利用黄河水阻挡日军的建议被再次提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认为，也只有决堤才能让中国军队“渡过此种难关”。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口头批准，但程潜深知此举后果严重，又正式发电请示，得到了蒋介石的复电批准。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孕育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因特殊的地理原因千百年来不断地溃决改道。黄河两岸，沃野千里的滚滚麦浪是它的赐予，连年不断的泛滥洪水也是它的面貌。只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的百姓绝不会想到，这条滔滔大河竟然还有一种军事用途。

决堤任务交给了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决堤地点选择在中牟县的赵口和郑县的花园口两处。黄河河堤，为防范泛滥连年修筑，以致高高耸立在河岸之上，无论是赵口还是花园口，河堤都宽达八米以上、高在十米以上，竟然使河堤本身成为坚实的公路。为此，中国统帅部专门派工兵专家王果夫对决堤进行设计和指导，在布置部队进行伪装和施工的同时，要求所有地方政府机构对附近的农民进行迁移和救济。

在赵口执行决堤任务的，是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六师的一个团，这个团六月四日凌晨开始作业，上级限定的时间是次日凌晨前放水。但是，赵口的河堤土质多沙，狭窄的掘口随挖随塌，炸药对沙质土壤效力甚微，沙土飞溅起来仍落于原处，因此到了限定时间挖掘仍没完成。心情焦灼的蒋介石怕决堤官兵心有顾虑，亲自打电话给刘和鼎军长："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急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干去，克竟全功。"第二天，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亲自到赵口监督，并加派了一个团协助挖掘，可直到七日下午仍旧没有成功。

日军已逼近中牟县的白沙镇。

这时，有人向商震建议，既然赵口河堤难以操作，为尽快完成任务，可集中力量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任务交给了蒋在珍的新八师负责。在花园口，由于当地农民对决堤有抵触情绪，于是新八师把农民们赶走，选出八百名强壮士兵，分成五组昼夜轮流掘堤。坑道掘好后，炸药放置在数十口大水缸里，深埋之后引爆。九日凌晨，经过爆破，花园口黄河大堤被掘开，有水流出但仅是涓涓细流，远未达到一泻千里的程度。于是，蒋在珍师长请求调重炮打宽缺口。在一名炮兵连长的指挥下，重炮一连发射了数十枚炮弹，缺口被轰开了两丈有余。滔滔黄河水汹涌而出，大堤在湍流的冲击下再次垮塌，加上上游连降五天大雨，黄河水持续暴涨，从花园口决堤处涌出的河水与赵口涌出的河水汇成了滔天浊浪。

黄河水沿着贾河汹涌南下，贾河和涡河流域的乡村和城镇顿成一片汪洋。十四日河水抵达尉氏，十六日河水抵达鄢陵和扶沟，十八日河水抵达西华、太康和淮阳，二十日河水抵达周口，然后向着安徽境内的太和、阜阳席卷而去，进入淮河后，狂泻千里冲进洪泽湖和大运河，一路将淮河两岸完全淹没，蚌埠和宿县一带成为泽国。

滚滚黄河水恣肆于豫、皖、苏三省，形成了近五十万平方公里的浑

黄水障。日军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被漫无边际的黄水困住了。第十四师团的两千人被困在中牟县城里，华北方面军不得不派出一个工兵联队和六个工兵中队，携带着大量的舟艇前往救援。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被黄水隔离在新郑以南地区，日军官兵只能利用门板等简易工具逃生。深陷黄水中心地带的第十六师团主力，大批官兵被洪水卷走淹死，车辆、火炮和坦克都被淹没在大水中，那些还活着的士兵饮水和食物断绝，有的爬在草屋顶上随着泛滥的河水漂流，有的攀在树梢上等待着救援。华中派遣军只好出动临时航空团的轻重轰炸机，“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

日军攻击郑州的计划中止了。

花园口决堤，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市约六千万民众受灾，两千余万百姓流离失所，中国中原地区的上千万亩良田被淹没。对于被迫掘开黄河大堤，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心绪复杂。参加掘堤的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处长黄铎五，目睹了当地百姓突遇的灭顶之灾：

当局虽然也有安置居民的计议，实际徒托空言，到时只不过乡、保长们催促迁移罢了。仓促迁移，谈何容易，故迁徙者寥寥无几，一转瞬间，无情的洪流滚滚而来，哪里逃避得及。有的扒上屋顶，有的攀登树梢，一时嚎哭呼救之声杂成一片。过了两天，我陪同长官部派来的人视察黄泛情况，那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能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在水面荡漾着。起伏的波浪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漂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洪水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

花园口决堤，破坏了日军企图南北两路夹击武汉的战略，基本上使南北两路日军仍旧处于隔绝状态，为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此后，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日军只能隔着黄水泛滥区与中国军队对峙，这从大战略的格局上也有助于中国持久抗战的目的。但是，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决口黄河的行动，仅仅起到了暂缓紧张局势的作用，并

未给日军造成致命的打击，特别是没有严重损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滔滔黄水过后，郑州和武汉仍然相继陷落，这说明“以水代兵”并不能彻底阻敌，更不可能就此赢得战争。

中日两军隔黄泛区形成对峙，标志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会战、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的又一次大会战。会战历时四个多月，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日军虽然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没能实现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和挫伤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再一次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彰显了不惜一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徐州会战，中国军队投入兵力约六十万人，伤亡官兵达十万以上；日军投入兵力约二十四万，伤亡近三万人。

中国北方的大片国土，被滔滔黄水所覆盖，从此“黄泛区”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在战争过后的数十年里，黄泛区的善后工作一直持续，但那片广阔的土地所遭受的战争巨创始终没有平复。

我是一个大丈夫，

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

不愿做亡国奴！

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啊，

鱼还可以作浪兴波，

掀翻鬼子的船，

不让他们渡黄河！

不让他们渡黄河！

这首歌的名字叫《黄河之恋》。

黄河，千百年来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爱恨情仇。

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悲戚还在于：鬼子过不了黄河又能怎样？北方沦陷的国土难道不要了吗？在这个世界上哪一条河流能把善良与邪恶彻底隔离？一-只是，一九三八年盛夏，中国人能够做到的是：不让鬼子过黄河！

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为淮南兵团，以李品仙为总指挥，

确保官亭、舒城、怀宁之线。

五、第二十四集团军为苏北兵团，以韩德勤为总指挥，仍确保淮阴、东海一带。

六、挺进军（第六十九军）应在费县附近鲁南山区经营根据地，进行游击作战。

抗战史上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突围行动开始了。

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生存出路是有优势的。中原地区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庄稼茂盛的田野里公路和土路密如蛛网，尽管日军南北两路来势凶猛，但毕竟兵力有限，在徐州附近形成的包围圈到处是缝隙和漏洞。第五战区的突围命令刚一下达，十分熟悉地形和道路的数量巨大的中国军队，在迅速脱离包围圈的强大动力支持下，从战场上的各个缝隙蜂拥而出。日军虽然下达了猛烈追击的命令，但洪流一般的中国军队在徐州战场的各个方向狂涌不止，以日军有限的兵力能够追得上哪一股又能堵住哪一支？

偌大的徐州战场上，庞大的中国军队转瞬间就没有了踪影。

日军目瞪口呆。

日军追上的仅仅是因负伤或生病掉队的中国官兵。他们在一名伤兵身上发现了一张第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的名片，不禁大喜："铃木快速部队二十日急袭在尹集的第二军司令部，军长谭道源中将被俘（负伤后死去）。这位军长像个武人，很出色。"实际上，这名伤兵是谭军长的副官。

最后撤离徐州的中国军队，是卢汉的第六十军。无法得知李宗仁为什么命令这群在台儿庄附近已经血战数天且伤亡严重的云南人来死守根本无法防守的徐州。李宗仁的要求是：为掩护鲁南大军突围，第六十军坚守徐州的时间越长越好。为此，李宗仁送来一份"徐州附近五千分之一国防工事设施要图"，又用徐州中央银行来不及搬走的小额钞票拨给第六十军二十二万元作为"三个月的伙食费"。

第六十军军长卢汉记述：

日军对徐州的包围圈越缩越小，陇海、津浦东南西北四面铁路线已

被切断，敌机在市区整天投弹轰炸，我鲁南二十万大军又都涌到徐州，挤在徐州至宿县公路的狭长地带，各自夺路，这时，李宗仁亦已离开徐州……遵照明令，我率部队立刻急行军向指定的汪庄前进，预计五月十九日晨到达。这时来自西南方向的枪炮声隐约可闻。我遂决定派一八四师杨宏元团先到徐州西郊段庄一带布防，掩护友军撤退；然后将我军分为三个纵队，由张冲师长率领，向徐州以南大五柳集、屠家庄地区集结。我则偕部分参谋人员先至徐州，勘察地形，规划守卫徐州部署。我先到战区长官部，院内空无一人，军政机关亦早撤走。我失望之余，只好赶往九里山视察工事。我沿着阵地看了一周，只有十几处钢骨水泥筑成的机关枪掩体，而且布置在北面，东南西三方均无防御设施。我又离开九里山到徐州市区，这时敌军已攻陷萧县，敌人的炮火已打到徐州西郊。敌机终日轰炸，火光熊熊，行人稀少，交通要道已无大部队通行，唯有零星散兵向南奔跑，道旁负伤官兵则卧地呻吟。徐州东火车站附近的仓库及停置路轨上的列车中，弹药、粮秣、器材等物资堆积如山，正放火焚烧，浓烟滚滚。

卢军长终于在徐州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他的上司孙连仲——“他和他的卫兵已倚装待发。”卢军长急切地询问：如果第六十军死守徐州，增援的部队是哪支？什么时候才能抵达？所有的部队都已撤走，只命令第六十军固守，统帅部是否已决定进行反攻？第六十军死守多长时间算是完成任务？一问三不知的孙连仲只好说：“局势到这个样，你们军也跟随大部队之后撤退吧。”

第六十军没有固守徐州，虽然是最后突围的部队，但所幸大部分官兵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相比之下，倒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的突围险象环生。

十七日晚上，日军的炮弹已经落在徐州市里，李宗仁转移到了郊外的一个村庄，但日军的炮弹竟然一路追着他打，其中的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了他的房屋顶上，所幸那一刻他不在里面，把他的传令兵炸死了。十八日晚，李宗仁和战区长官部的幕僚们开始乘火车突围。原计划火车抵达宿县后折向西，但才前行了几十公里便传来猛烈的爆炸声，有人报告说，前面的一座铁路桥被撤退的中国工兵炸断了，为的是不让日军追击过来。包括李宗仁在内，火车上的所有人开始下车步行，走了一夜才接近宿县，但坏消息随即传来：十九日晨，宿县已被日军占领。——在战区长官部开始突围时，李宗仁曾严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派出最有力的部队，死守宿县三天，直到长官部突围出去才能弃守。李宗仁

以为这一重任只能交给他信任的桂军部队，然而，奉命死守宿县的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在日军第三师团与第九师团的联合猛攻下，不到一天就命令部队弃城撤退，导致战区长官部的突围之路被日军堵死。杨俊昌的理由是，第一七一师在上海血战后全部由新兵补充而成，奉命转进徐州战场，经过在淮南阻击日军北进的战斗，接到死守宿县的命令时，全师仅剩五百残兵。尽管他认为让这五百残兵坚守宿县“简直是胡来”，但还是执行了开赴宿县的命令。宿县是一个大县城，第一七一师的残兵难以布防四个方向，可是日军从四面包围而来。宿县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会超过一天。由此，除了杨俊昌认为应该孤注一掷死守外，第一七一师的其他将领都认为不如尽快撤走，以免被迅速全歼。杨俊昌知道违令的结果，最后时刻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用他一个人的脑袋保住其他人的性命。——一九三八年十月，杨俊昌因违抗军令弃守宿县，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监禁。

在距宿县六七公里处，李宗仁见到了南撤至此的汤恩伯。汤恩伯的军团不但仍有“数师之众”，且还有数门十五生（厘米）的大炮随行。汤恩伯问李宗仁要不要与他一起突围，因为他的部队“实力雄厚"，日军难以围歼。李宗仁则认为，让这支中国陆军中的精锐之师脱离战场至关要紧，而带着他的长官部必会形成拖累。于是，两人决定，汤恩伯的军团继续向西突围，李宗仁的长官部绕过宿县向东南突围：

我即亲率长官部一行千余人向东南前进。沿途皆有敌机跟踪轰炸，然在大平原之上，部队分散前进，敌机杀伤力甚小。越过津浦路以西地区后，某次吾人正在一大村落造饭休息，忽为敌侦察机发现。该机兜了个圈子即行离去。我知其情不妙，匆匆饭毕，即令全体人马离开该村。我们走了不及二三里地，突有敌轰炸机二十余架比翼飞来，一阵狂炸，该村落顿时夷为平地，而我辈竟无一人死伤，亦云幸矣……我们自东边绕过了宿州，足足走了一整天，抵达涡河北岸，与第七军来接的部队共一团人相遇。涡河桥梁、渡船皆毁，人、物渡河已感困难，随行汽车数十辆自然无法携带，乃悉数在河边焚毁。渡过涡河，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四月十九日中午，日军占领徐州。

日军对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和技巧甚感惊愕，认为徐州会战的战果因此被大大打了折扣，折扣低到了作战计划预想的“一折”：

中国军的退却，实在巧妙，日军即或发现踪迹，在麦田中亦无法追

及……中国军不但轻装，而且善走，同时所着服装与一般民众无异，故纵不及退却，亦可冒充一般民众，欲捕捉几不可能……况彼等之退却与一般大部队之退却方式不同，亦若蜘蛛之子，由四面八方各自分散，嗣在指定之安全地区集结……而且日军兵力仅五分之一，故对退却迅速之中国军，只能产生一折程度之打击而已。

徐州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大撤退，从军事上讲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数十万大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脱离战场，不但破坏了日军与中国军队决战的计划，还使国家军队的主力得以保存，这也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需要。

当日军意识到徐州附近战机已失后，迅速调整部署，把攻击方向转到了中国第一战区所属的豫东地区，目的是捕捉和歼灭陇海路东段的中国军队主力。

日军第十四师团从菏泽兵分两路，其先头部队于五月十七日抵进兰封以东的仪封附近，再次切断了陇海路。中国第一战区紧急调动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由兰封反击仪封；薛岳指挥的豫东兵团主力也由归德向西夹攻，把突进豫东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重炮旅团和一个野炮团阻击在了内黄、马庄寨和人和集一带。

在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撤走后，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至少还存在着属于中国第一战区的近二十万主力部队，而土肥原贤二竟然指挥着他仅有两万人的第十四师团毫无顾忌地冲了进来，这不但使蒋介石大为意外，也令被如此蔑视的中国军队感到愤怒。——徐州会战后期，发生在豫东地区的未在计划之内的作战，被中国方面称为“兰封会战”。

蒋介石决定给土肥原贤二以重击。

蒋介石的信心来自这样一个前提：第一战区中国军队与冲进来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兵力对比几乎达到了十比一，而且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的主力均是精锐的中央军部队。

中国第一战区的作战构想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和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之一师组成东路军，自归德沿陇海路两侧向西攻击；以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组成西路军，由兰封向东攻击；由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和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组成北路军，在定陶、菏

泽、东明、考城一线切断土肥原贤二的退路。为保证作战目标的达成，特别命令黄杰的第八军、郭忏的第九十四军之第一八七师以及杨光钰的第二十四师等部队坚守砀山和归德一线，阻击日军第十六师团由徐州西进增援。命令汤恩伯的第二军团、胡宗南的第一军等中国陆军之精锐主力集结豫东相机投入。

中国军队拟以二十万对二万的绝对兵力优势，彻底歼灭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

二十一日，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兵分三路，开始夹击深入到内黄、仪封一带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龙慕韩的第八十八师一部收复了人和集和内黄，两地的日军向西南方向混乱逃窜。同日，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向仪封的日军发动猛攻，迫使仪封日军向西北面的东岗头、毛姑寨方向逃窜。

中国军队随即发起了猛烈的围歼战。

战斗一开始，在毫无遮蔽的平坦的盐碱地上，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官兵遭到日军炮火和机枪的打击，日军火力之猛，使得冲锋号刚一响起，第一三八旅二七五团二营五连排长陈猷和他身边的司号员瞬间便被打倒在地。副排长李勋率领官兵投出一波又一波的手榴弹，然后官兵们趁着烟幕冲到了日军的战壕边，战斗由此进入了残酷的肉搏战。

……一名日军端着三八枪向我猛刺过来。我本欲先发制人，但枪比敌短，说时迟那时快，日军的刀锋已近我身，我急忙向左一闪，刺刀从我右肘飘过，刀尖划破了我右下臂皮肉。我顾不了许多，忍住疼，用枪托顺势横扫过去。日军眼快，以左手接住我的枪，用力一拖，我顺势一压，双方都脚失重心，同时倒地，在地上扭打一团，谁也不愿松手。这时，另一日军欲刺我的后背，但刚一举枪，就“呃”了一声倒下了。我回头一看，是机枪手周天禄砸死了该敌。接着，老周身子一转，冲着被我压在下面的日军一脚踢去，同时用枪托将该日军砸得脑浆崩裂。我刚站起，只见周天禄如闪电一般，抡起机枪左右开弓，勇猛异常，顿时就砸死了六个日军。周天禄是河南信阳人，二十五岁，农民出身，为人忠厚，力气很大，能双手同时举起两个成人，是我连第一大力士，平时我俩感情较好。这时，他虽身负轻伤五处，但毫不在乎。十余分钟后，我连毙敌八十余名，剩下的日军仓皇逃跑。

战斗持续到下午，第一三八旅已经拼得所剩无几了。阵亡者中有一

名学生出身的士兵名叫费精进，日军的刺刀从他的前胸刺穿到后背，他的刺刀也刺进了日军的腹部，双方的刺刀就这样留在了对方的身上。旅长马威龙对官兵作战勇猛很满意，亲手写了两张嘉奖令，一张是因五连坚守阵地，还捉了一名日军俘虏，给予褒奖；另一张是论功行赏，中尉排长王永福提升为上尉连长，上士副排长李勋提升为少尉排长。大家一致推荐勇猛的大力士周天禄负责保卫旅长的安全，马威龙高兴地接纳了。可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排长李勋负伤，当他被抬到刚刚收复的罗王车站时，碰见了守着一副担架的周天禄。周天禄说，他和旅长一起上前沿时，旅长被炮弹炸倒了，除了一条大腿外，全身都被炸烂了。在放着马威龙旅长遗体的担架旁，排长李勋和大力士周天禄抱头大哭。

中国军队相继夺取了毛姑寨、杨楼等据点，日军向西逃窜的路已被封堵。土肥原贤二把第十四师团主力集中起来，拼死向杨固集、双塔集一带猛冲。连日苦战后第二十七军抵挡不住，溃败下来的队伍潮水般地向西涌去。——“桂永清知道自己的部队是控制不住了，如果丢了兰封，他的责任很大，便匆匆地写了一张字条给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率所部固守兰封。”而桂军长本人，则是“一口气就跑过了罗王车站”。

消息很快传来：兰封在几乎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被日军占领。

兰封的失守，至今仍是无法弄清究竟的一件战争往事。有人说是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撤离所致，但龙师长说是桂永清命令他们向第七十一军靠拢，他将兰封城防交给第三十六师工兵连后，部队才移防的。——尽管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被押解到武汉枪毙了，但兰封的失守最终导致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严重受挫。

坏消息接踵而至：在豫东战场的东面，为解救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正向西突进，想把中国军队包围第十四师团的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日军第十六师团的攻击方向是砀山。负责防守砀山的黔军第八军第一〇二师，在日军的猛攻下，师长柏辉章竟然下令放弃阵地西撤，砀山失守。

兰封和砀山的失守令中国统帅部大为震惊，因为这不但导致了围歼土肥原贤二的计划泡汤，反而还会令战局演变成日军的两个师团合拢后直取开封和郑州。二十四日，蒋介石任命薛岳为第一兵团总司令，统一指挥胡宗南、李汉魂、俞济时、宋希濂、桂永清各部，立即发动反攻夺回战场主动权，彻底歼灭日军第十四师团。愤怒的蒋介石告诫各位将领：“此次兰封会战，关系整个抗日战局，胡、李、俞、桂、宋各军，应

遵照薛总司令所示任务，务于本月二十五日午后六时三十分全线总攻，务须于明二十六日拂晓前将兰封、三义寨、兰封口、陈留口、曲兴集、罗王寨地区之敌歼灭。如有畏缩不前、攻击不利者，按律严惩；如战役中建殊勋或歼敌俘获最多者，当特予奖给。希饬所部凛遵勿违为要。”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了开封，并制订了围歼土肥原贤二的作战计划：胡宗南指挥第一军、第九十军和邱清泉的战车营，配属重炮兵营，攻击兰封以西的曲兴集、罗王寨；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在黄河北岸截击日军的增援，切断其补给线；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第二十师，以及新编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六师等部，攻击兰封北面的三义寨；第七十一军攻击兰封；第六十四军攻击兰封西面的罗王车站；商震部守备开封至郑州之间的阵地。

二十五日凌晨，中国军队各部队进入了攻击位置。

本该寂静无声的战场，此时却云集了大批渴求观战的中外记者。中国陆军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粤军余汉谋集团的主力，其任务是攻击罗王寨以夺取西侧的罗王车站。跟随在李军长身后的外国记者分别来自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等国际著名通讯社，还有一位名叫阿特丽斯的美国女记者。二十五日午后，攻击准时开始，中国军队的炮火至少在这个方向上压制了日军，日军的阵地被轰击成一片火海，中国官兵随即发起了不顾一切的冲锋，终把罗王寨内的日军压到了寨外。日军拼死反击，罗王寨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拉锯战进行得十分惨烈。——“傍晚，残阳如血，硝烟随晚风荡漾，指挥所每个人凝视战场情况的惨烈，莫不怒发上指，后续部队川流涌上，视死如归。以我七年来培训出来的广东子弟兵，一旦血染沙场，我固涕泗如泉，而中外记者亦不禁暗弹热泪。”第六十四军再次向罗王寨攻击时，胡宗南派来了重炮助战，中国军队终于夺回了罗王寨和罗王车站。进入罗王寨的记者们开了眼：中国士兵缴获了一把日军战刀，经过考证，竟然是土肥原贤二的佩刀，可见土肥原贤二本人曾在寨内。土肥原贤二的这把佩刀，当场就把一叠二十枚的铜元一斩两半，可见其钢质精纯，锋利无比。

与此同时，宋希濂指挥第七十一军反击兰封。第八十七师负责攻击东北面，第八十八师负责攻击西南面——八十八师原师长龙慕韩因丢失兰封已被押解武汉，师长由宋希濂兼任。兰封城不大，土墙也不高，四周地势平坦不易接近。中国官兵事先挖了壕沟，以便前进时掩护，二线部队还捆扎了大量的梯子用以登城。二十六日，战斗开始后，中国官兵发起的数次攻击都没能成功，以致兰封土墙内外双方伤亡枕藉。黄昏，

宋希濂命令火炮抵近射击，终于将土墙打开了缺口，中国军队由此获得了立足点，第八十八师自南门爬了进去，第八十七师也冲进去了部分官兵。双方在小城内彻夜巷战，凌晨时分日军弃城逃跑。士兵们把在城内缴获的一匹骏马送给了军长宋希濂，并为骏马取名为“土肥原”。

罗王车站以及兰封相继被攻占，陇海铁路线由此畅通，滞留在归德附近载有中国军队重要军用物资的四十二列火车得以全部西撤郑州。

土肥原贤二早已意识到，中国军队要吃掉他的第十四师团，他已经深陷十倍于己的众兵重围中，突围的方向无从判定，苦战已令部队伤亡巨大。更严重的是，他的后方联络线被完全切断，弹药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空投，师团的机械化兵器，特别是汽车和坦克，在没有燃油的情况下只能抛弃。困境中的土肥原贤二作出了唯一可行的决定：攻陷兰封，然后把主力转移到三义寨、曲兴寨、罗王寨这三个据点内，死守待援。土肥原贤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村庄，是因为它们都在黄河边上，可以从水路得到接济。但是，攻占兰封不久，兰封即被中国军队夺了回去。目前，三个据点中，只有三义寨仍在手里。——试想一下，如果侵华战争的策划者之一、著名的特务机关头子、日军精锐的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被中国军队或俘虏，或击毙，或在最后的绝望之时只能按照日本军人的标准程序剖腹自杀，那将在中日战争史上留下一个怎样的谈论不尽的话题？

可是，中国军队围攻土肥原贤二所在三义寨的作战，从经过到结局都令人不可思议。

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手令，称此战如不能取得成效，将是一个“千古笑柄”：

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十二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务请毅然决心，速抽调六师以上兵力在侧后方做预备队，而指定李铁军、李汉魂、俞济时三军负责扫清当面残敌。即使被突破数点，冲出包围圈外，我可与之野战，则较为得计。此时东路敌军必于两三日内向西急进，由周口直出许昌、郑州，则后方在在堪虞。若我军不早为计，则如此大兵群集于狭小区域，且左限黄河，歼灭甚易。务希当机立断，即于本晚实施，一面整理战线，一面抽调部队，以备万一。并以此意转薛伯灵（薛岳，字伯灵）、胡宗南，决心遵行，勿稍延误。

但是，三义寨里的日军凭借战车、骑兵和飞机的支援，不但死守不退，而且还不断出寨反击。二十八日，日军的反击方向是第二十七军的阵地，桂永清又一次“独断命令各部队向杨固集、红庙间地区转移阵地，沿途抛弃无线电机及武器弹药，情形颇为混乱”。最终，围攻三义寨的中国官兵伤亡达两千五百余人，虽然攻克了柴楼、蔡楼、十八寨、何寨、薛楼等小据点，可直到二十九日仍没有攻克三义寨。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兰封战场的东南面，负责解救土肥原贤二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克了陇海线上的豫东要地归德（今商丘）。

日军第十六师团和混成第三旅团，从砀山向西突击，于二十六日攻占虞城，之后开始攻击归德的外围阵地。负责防御的黄杰的第八军当晚就撤到了归德郊区。二十七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黄杰：死守归德，在兰封之敌最后解决之前，必不能放弃。但是，黄杰根本没有执行命令，于二十八日擅自率部退向柳河和开封，只留下第一八七师守朱集车站和归德城。二十九日拂晓，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也率部撤走，归德随即变为一座空城，致使日军未经作战就占领了该地。

归德的丢失使得战局瞬间转变：准备围歼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作战，因侧背受到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威胁，中国军队不得不转为守势，且须立即调兵阻击日军第十六师团的进攻。同时，在战场的北面，日军混成第四旅团正准备强渡黄河，与近在咫尺的第十四师团会合。更严重的是，日军第十师团配属混成第十三旅团，攻占了豫皖交界处的涡阳和亳州，正向豫东急速包抄而来。——豫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已处在被日军反包围的态势中。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第一战区做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

一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战场态势极其有利、势在必得的战役，结局竟然是全面撤退。

蒋介石所担忧的“千古笑柄”成为了现实。豫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主力开始迅速向西转移。

在是否向中国军队实施猛烈追击并扩大占领区的问题上，日军大本营与华北方面军再次发生争执。十九日，日军大本营明确指示，追击行动如“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

批准”。——大本营的命令让日军华北方面军极其愤怒：在徐州作战之前，曾向大本营提出，将来攻击武汉时，希望把作战任务交给他们，因对武汉的攻击应从郑州方向开始。但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很快就得知，大本营在制订武汉作战计划时，根本没把郑州方向列入作战范围内，这让华北方面军感受到了蔑视和冷落。在徐州会战中，本来按照作战计划，也应由华北方面军夺取徐州，但竟然被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抢先一天占领，再一次让华北方面军颜面大失。因此，这一次，华北方面军决定不再顾及大本营的限制，命令第五、第十四、第十六、第一一四师团对西撤的中国军队实施猛烈追击，一直追到平汉线为止。

六月三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杞县、通许和陈留；四日，日军第十四师团攻占兰封后向西进击，与第十六师团一起合攻开封城。中国守军第一四一师，在师长宋肯堂的率领下拼死抵抗，无奈日军兵力和武器都占据优势，六日开封城陷落。随后，日军沿陇海铁路直扑中牟，第十六师团占领尉氏和扶沟，第十师团占领柘城。尽管薛岳命令死守中牟县城和车站，宣称谁再擅自撤退依法严惩，但还是有将领临阵溃逃。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致电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文中充满了愤怒与无奈：“（第一八七师）团长张鼎光于二日守杞县猪皮冈时，擅自撤退；该师参谋长张淑民屡次煽动退却，复敢弃职潜逃；旅长谢锡珍首先退出猪皮冈，未经报告师长，即便借口收容，擅自乘车南下；叶赓常旅长，当睢县之战时，突告失踪，事后闻已易服赴汉口。”十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前锋部队炸毁了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十二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派出的挺进队，炸毁了新郑东南六公里处的京汉线铁路桥。

由开封、中牟至郑州，仅七十公里的距离。

日军战机开始轰炸郑州，“自朝至暮，未稍间断”。

郑州已处在日军第十四师团与第十六师团的夹击态势下。

郑州是中国中原重镇，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会点。一旦郑州被日军占领，不但平汉、陇海两条重要的铁路线将被切断，更重要的是：一、日军可沿陇海线西进，攻取洛阳和西安，进而窥伺汉中，逼近中国整个抗战的大后方西南；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沿平汉铁路线向南长驱直入，威胁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武汉。为此，中国统帅部的最后决定是：掘开黄河大堤，阻止日军前进。

这一惊人的决定，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酝酿甚久。

据中国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回忆，早在一九三五年，中国方面制订未来对日作战腹案时，就已考虑到一旦日军逼近郑州可以采取的应对方案：其一是把郑州付之一炬，其二便是掘开黄河大堤。

一九三七年秋，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曾建议用黄河作为“最后战线”，决堤造成“人工泛滥”以遏制日军攻势。一九三八年四月，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建议在河南武陟县境内掘开黄河北堤，目的是在日本人用决堤的方式阻挡我军之前，我方抢先选择合适的地点决堤以使日军置于“危地”。徐州失守后，利用黄河水阻挡日军的建议被再次提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认为，也只有决堤才能让中国军队“渡过此种难关”。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口头批准，但程潜深知此举后果严重，又正式发电请示，得到了蒋介石的复电批准。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孕育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因特殊的地理原因千百年来不断地溃决改道。黄河两岸，沃野千里的滚滚麦浪是它的赐予，连年不断的泛滥洪水也是它的面貌。只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的百姓绝不会想到，这条滔滔大河竟然还有一种军事用途。

决堤任务交给了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决堤地点选择在中牟县的赵口和郑县的花园口两处。黄河河堤，为防范泛滥连年修筑，以致高高耸立在河岸之上，无论是赵口还是花园口，河堤都宽达八米以上、高在十米以上，竟然使河堤本身成为坚实的公路。为此，中国统帅部专门派工兵专家王果夫对决堤进行设计和指导，在布置部队进行伪装和施工的同时，要求所有地方政府机构对附近的农民进行迁移和救济。

在赵口执行决堤任务的，是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六师的一个团，这个团六月四日凌晨开始作业，上级限定的时间是次日凌晨前放水。但是，赵口的河堤土质多沙，狭窄的掘口随挖随塌，炸药对沙质土壤效力甚微，沙土飞溅起来仍落于原处，因此到了限定时间挖掘仍没完成。心情焦灼的蒋介石怕决堤官兵心有顾虑，亲自打电话给刘和鼎军长：“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急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干去，克竟全功。”第二天，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亲自到赵口监督，并加派了一个团协助挖掘，可直到七日下午仍旧没有成功。

日军已逼近中牟县的白沙镇。

这时，有人向商震建议，既然赵口河堤难以操作，为尽快完成任务，可集中力量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任务交给了蒋在珍的新八师负责。在花园口，由于当地农民对决堤有抵触情绪，于是新八师把农民们赶走，选出八百名强壮士兵，分成五组昼夜轮流掘堤。坑道掘好后，炸药放置在数十口大水缸里，深埋之后引爆。九日凌晨，经过爆破，花园口黄河大堤被掘开，有水流出但仅是涓涓细流，远未达到一泻千里的程度。于是，蒋在珍师长请求调重炮打宽缺口。在一名炮兵连长的指挥下，重炮一连发射了数十枚炮弹，缺口被轰开了两丈有余。滔滔黄河水汹涌而出，大堤在湍流的冲击下再次垮塌，加上上游连降五天大雨，黄河水持续暴涨，从花园口决堤处涌出的河水与赵口涌出的河水汇成了滔天浊浪。

黄河水沿着贾河汹涌南下，贾河和涡河流域的乡村和城镇顿成一片汪洋。十四日河水抵达尉氏，十六日河水抵达鄢陵和扶沟，十八日河水抵达西华、太康和淮阳，二十日河水抵达周口，然后向着安徽境内的太和、阜阳席卷而去，进入淮河后，狂泻千里冲进洪泽湖和大运河，一路将淮河两岸完全淹没，蚌埠和宿县一带成为泽国。

滚滚黄河水恣肆于豫、皖、苏三省，形成了近五十万平方公里的浑黄水障。日军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被漫无边际的黄水困住了。第十四师团的两千人被困在中牟县城里，华北方面军不得不派出一个工兵联队和六个工兵中队，携带着大量的舟艇前往救援。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被黄水隔离在新郑以南地区，日军官兵只能利用门板等简易工具逃生。深陷黄水中心地带的第十六师团主力，大批官兵被洪水卷走淹死，车辆、火炮和坦克都被淹没在大水中，那些还活着的士兵饮水和食物断绝，有的爬在草屋顶上随着泛滥的河水漂流，有的攀在树梢上等待着救援。华中派遣军只好出动临时航空团的轻重轰炸机，“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

日军攻击郑州的计划中止了。

花园口决堤，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市约六千万民众受灾，两千余万百姓流离失所，中国中原地区的上千万亩良田被淹没。对于被迫掘开黄河大堤，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心绪复杂。参加掘堤的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处长黄铎五，目睹了当地百姓突遇的灭顶之灾：

当局虽然也有安置居民的计议，实际徒托空言，到时只不过乡、保长们催促迁移罢了。仓促迁移，谈何容易，故迁徙者寥寥无几，一转瞬

间，无情的洪流滚滚而来，哪里逃避得及。有的扒上屋顶，有的攀登树梢，一时嚎哭呼救之声杂成一片。过了两天，我陪同长官部派来的人视察黄泛情况，那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能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在水面荡漾着。起伏的波浪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漂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洪水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

花园口决堤，破坏了日军企图南北两路夹击武汉的战略，基本上使南北两路日军仍旧处于隔绝状态，为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此后，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日军只能隔着黄水泛滥区与中国军队对峙，这从大战略的格局上也有助于中国持久抗战的目的。但是，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决口黄河的行动，仅仅起到了暂缓紧张局势的作用，并

未给日军造成致命的打击，特别是没有严重损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滔滔黄水过后，郑州和武汉仍然相继陷落，这说明“以水代兵”并不能彻底阻敌，更不可能就此赢得战争。

中日两军隔黄泛区形成对峙，标志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会战、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的又一次大会战。会战历时四个多月，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日军虽然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没能实现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和挫伤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再一次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彰显了不惜一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徐州会战，中国军队投入兵力约六十万人，伤亡官兵达十万以上；日军投入兵力约二十四万，伤亡近三万人。

中国北方的大片国土，被滔滔黄水所覆盖，从此“黄泛区”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在战争过后的数十年里，黄泛区的善后工作一直持续，但那片广阔的土地所遭受的战争巨创始终没有平复。

我是一个大丈夫，

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

不愿做亡国奴！

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啊，

鱼还可以作浪兴波，

掀翻鬼子的船，

不让他们渡黄河！

不让他们渡黄河！

这首歌的名字叫《黄河之恋》。

黄河，千百年来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爱恨情仇。

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悲戚还在于：鬼子过不了黄河又能怎样？北方沦陷的国土难道不要了吗？在这个世界上哪一条河流能把善良与邪恶彻底隔离？一-只是，一九三八年盛夏，中国人能够做到的是：不让鬼子过黄河！

第十二章

保卫“东方马德里”

日军波田支队的官兵面对的是中国的另一条大河。

由波田重一中将率领的这支部队，官兵大多来自日本南九州地区，此前驻扎在中国台湾，因此被认为是一支适应在炎热多雨的亚热带地区作战的部队。淞沪会战时，他们曾奉命乘船渡过台湾海峡，沿着东海直抵中国长江的吴淞口岸；现在，他们再次奉命穿越台湾海峡，沿着东海再次进入中国烟波浩渺的长江。

波田支队士兵得到的信息是：东京大本营要求他们沿长江向西，去占领中国腹地一座名叫武汉的城市。同时他们还听说，那座城市有“火炉”之称，暑热会像烈焰一般灼人。波田支队沿长江逆流而上，在蒸腾的热雾中被水运到中国江苏镇江。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协同，攻取长江芜湖以下之安庆、马当、湖口和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六月一日，华中派遣军和海军方面协商后，决定由波田支队，海军第十一战队，第四、第五特别陆战队以及第二联合航空队共同组成西进部队，从芜湖出发沿长江南岸发起进攻；同时，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与第三飞行团协同，从长江以北的庐州（今合肥）出发，向西南方向进攻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黄梅等地，与波田支队并行以为策应。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日军第六师团。

第六师团的先头部队，是以坂井德太郎指挥的第十一旅团为基干的坂井支队。六月二日，配属了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的坂井支队从庐州南下。同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也从北面的蒙城南下，四日攻占凤阳，

五日攻击正阳关。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在庐州以西的中国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不但破坏了道路，而且对南下的日军不断地进行奇袭式阻击，使得日军的推进艰难而缓慢。当徐源泉部逐步向西退至六安附近时，日军坂井支队开始全力攻击舒城方向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蒋介石电令徐源泉火速增援杨森部，对攻击舒城的日军加

以侧击。但是，大雨导致山洪暴发，徐源泉部的增援行动受阻，直到十二日才接近舒城，而这时候由于杨森部被击溃，舒城已经陷落。

徐源泉想弥补失误，命令第八十七军第一九九师反击舒城。第八十七军一九三八年初才组建，主要由湖南地方保安部队组成，原在武汉外围构筑防御工事，奉命增援徐州战场后，在庐州遭遇日军受挫，部队损失严重，撤至六安附近整补。接到命令时，该师刚接收了四千多新兵，基本的射击训练尚未进行，军官们认为："使用未经军事训练的壮丁去作战，不但无法完成战斗任务，同时也是一种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最后决定：把全师的老兵集中起来组成一支突击队，由一一四五团三营营长陈扬汉为队长，反击舒城。第一九九师的反击作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有成功的希望：固守在舒城县城里的日军用重炮不断轰击城外的中国军队，天空还有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日军骑兵也多次出城实施突击。第一九九师的老兵们凭借着战斗经验，分成若干个小组，数次爬上舒城城墙与日军展开近距离肉搏战，但没有炮兵的支持和后续部队的增援，反击行动很快以失败告终，伤痕累累的第一九九师不得不南撤，退入岳西一带的山区再次进行整补。

在长江以南，六月七日，波田支队由镇江起锚出发，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从南京出发，两军在芜湖会合编组后，波田支队乘坐海军舰船开始溯长江西进。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馆，宣称日军将沿中国长江西进作战，芜湖至湖口间的航道为作战区，各国军舰和商船必须立即撤出。十二日中午，日军舰队抵达安庆东南方向的铁板洲、阎王庙和将军庙一带江面停泊。下午三时，日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冒着大雨在长江南岸登陆，占领了一个名叫上窑沟的炮台；波田支队主力则从长江北岸登陆，沿着江堤经新河口、大王庙、鲍家村等地向安庆推进。

在这个方向防御的中国军队，还是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

第二十七集团军是川军部队，下辖第二十军的第一三三、第一三四两师，奉命调入第五战区后，第三战区部队第二十一军之第一四五、第一四六两师被配属给杨森指挥。虽然有了四个师的兵力，但杨森负责的防线却纵贯长江以北的舒城、桐城、安庆一线。杨森感到在他的部队的正面，战线太长，兵力太少，任务太重，于是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起码再给他增加两师兵力：

查淮河附近之敌积极西进，职部遵光（李宗仁）、远（李品仙）指示，以主力转移至舒城、桐城、怀宁之线，避免决战，逐部抵抗，尔后

以潜山、太湖、桐城西北山地为决战地带。在目前兵力单薄情况下，自以此种部署为适当。惟敌人如以大部兵力由合肥南下，与由长江西上之敌会合攻占安庆，则江南我军之正面太大，愈难防守，马当封锁线亦容易被敌突破，再沿北岸西进九江，武汉将受最大威胁。职意欲求江南防线巩固，欲确保马当封锁线，必须确保安庆及巢湖西南地区，且以舒城、桐城间大关附近山地及庐江、盛家桥、白湖南侧山地至江岸间地区之地形尚属良好，若以相当兵力布守，再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在巢湖东南地区游击，必能阻敌西进。惟正面甚大，职部现有兵力不敷分配，拟请钧座抽派两师兵力以用之。如兵力过大，职不便指挥，则请钧座派大员负责，以利军机。谨呈所见，伏乞垂察。

这是日军由淮南和芜湖兵分两路发起直指武汉的进攻后，中国军队的战地将领首次有人提醒最高统帅部：武汉以东长江沿线的防御十分薄弱。这封电报对战场局势的判断基本正确，建议和请求也符合战局的需要，特别是对一旦安庆丢失产生的严重后果的阐述将被日后的战争进程与演变所证实。

蒋介石致电杨森：

急。安庆。杨总司令：安庆飞机场应速基本破坏，最好灌水成湖，使其不能作用。又安庆东西各区堤坝，凡于我军事有利者，从速设备，决堤放水，以阻止敌军之前进。前方战况如何？务望督励所部，确保安庆，完成使命。此间已派新锐部队，由广济东下增援。勿念，中正手启。

广济至安庆尚有两百公里的路程，而日军距安庆仅剩二十多公里，蒋介石应该知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速度。这也就是说，杨森部已不可能在日军对安庆发起攻击前等来“新锐”的援军。况且，杨森部原本就兵不敷出，还要应对迫在眼前的攻击，要将安庆机场“灌水成湖”得需多少兵力为之，杨森部又如何能在日军到达前做到这一切？

结果，连波田支队都甚感意外，沿长江防守的中国军队其稀薄程度近似于弃守。在长江的大堤上，仅有杨森指挥的第二十一军以及一些地方保安团进行了些微的抵抗。于是，日军犹入无人之境，十二日晚占领安庆城郊机场，十三日早晨占领安庆。杨森部因腹背受敌，被迫向潜山、太湖方向撤退。同时，南下的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在突破了杨森部的节节抵抗后，于十三日占领桐城。然后，两路日军水陆并进，开始向大别山麓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潜山疾速推进。

舒城、桐城、安庆的相继陷落，使日军得以利用庐州至安庆的公路，从而拥有了进攻武汉的战略出发点。

令人费解的是，在长江以北地区防守的中国军队，共有九个师之多，再加上地方武装，相对于其防御区域的面积而言，也许兵力确实稀薄，但也没有稀薄到无力抵抗的地步。从庐州一路南下的日军，仅动用了少量先头部队，攻击安庆的波田支队甚至只动用了几百兵力，但是中国守军无不是一触即溃，十余日内竟然失地数百里。

蒋介石以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名义，发电给杨森部驻湖北办事处。电文说，川军在几百日军的攻击下丢失安庆，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命令杨森必须坚守潜山的现有阵地：

据报犯安庆之敌只陆战队数百，未经力战，轻弃名城，腾笑友邦，殊属遗憾。委座对杨总司令森极器重，徒以御众关系，尚祈转致杨总司令努力前途，有以自见，最小限须固守潜山、石牌，以策马当封锁线之安全为要。至于舒、桐西方山地并太湖，如有余力仍望兼顾，并请与徐克成（徐源泉）部切取联络。

杨森接到这封电报时，潜山已经失守。

日军坂井支队占领桐城后，十四日开始向潜山推进，突破中国守军第一三四师的外围阻击后，兵分三路迂回潜山城，第一三四师撤退到潜山城北，但在日军步兵和航空兵、炮兵和骑兵的联合攻击下，被迫再向潜水西岸转移，十七日潜山落入日军之手。

十八日，日军坂井支队强渡潜水，遭到中国守军的阻击。连日的阴雨导致山洪暴发，潜水涨水致使河面宽达三百米，日军在付出极大伤亡后突破潜水，占领了西岸阵地。十九日，日军骑兵部队快速向潜山以南突击，冲破中国守军第一四五师的阻击，当晚占领石牌。

面对日军的快速突击，蒋介石一面调动部队向潜山方向实施反击作战，一面命令长江沿线各部队将领掘开长江大堤，企图再次利用水障阻挡住日军凶猛的攻击势头：

一、乘江河湖涨水之期，凡在我军作战有利方面，务处之构成泛滥，并望先行后报。二、江北方面：在宿松以东，江北岸地方，务尽量构成泛滥，以利我军作战为要。实行经过，望随时电告。三、构成泛滥后，对敌汽艇勿庸顾虑，因较敌陆军易于击灭也。

长江大堤比黄河大堤更宽更高也更为坚固，因沿江中国军队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设备，加上战局瞬息万变，这一再次使天然大江溃决的命令最终没有得到执行。

中国军队开始了反击作战。

曾经反击舒城未果而进入山区整补的第一九九师，在潜山至太湖间一个叫渡埠的要点对日军进行了夜袭，从睡梦中惊醒的日军面对中国官兵的刺刀在稻田里四处逃命。第一九九师还烧毁了公路大桥，使得日军第六师团被分割成了两截。日军试图发动反击时，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损失了大量的汽车和坦克。陷入困境的第六师团与中国守军第八十七军形成对峙。

安庆、潜山和怀宁的失陷，使得长江上重要的阻敌屏障马当和湖口要塞暴露在西进日军的攻击下。

六月十八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波田支队与海军密切配合，“继续沿扬子江溯江行动”攻取马当和湖口。

长江要塞之一马当，地处江西彭泽县境内，南距彭泽县城三十公里，沿江距九江八十公里，矗立于江边的马当山和小孤山互成犄角。江中的沙洲把江流一分为二，左水道极其狭窄，早已淤塞不通；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形成长江中游最狭窄的江段，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江面宽不及千米。马当由此成为长江天堑，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为防日军沿江而上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成立了长江堵塞委员会，负责马当要塞江防的设计和施工。该工程在本已十分狭窄的长江水道上，又修筑了一条横贯两岸的阻塞线。阻塞线的施工过程十分复杂：第一步，先用铁丝铅丝编织出大网，里面塞满石块，灌注水泥凝固后投入江底，再用铁丝将其相互连接，并在上游处用铁锚拉住，在下游打下木桩固定。第二步，把大块石头和大型铁锚放在大帆船或铁驳船里，把铁锚的尖朝上，搅拌上水泥，然后把船移至第一步修筑的基座上凿沉。第三步，征用更大吨位的驳船，同样装上大石块和大铁锚，用水泥凝固后再次凿沉。如此这般，等于在长江的狭窄水道上筑了一道拦江坝。工程完工后，马当水面仅在靠近南岸的地方留出了一条可通行一只船的航道。拦河坝浸在水面下约两米处，除了百姓的大小木船，任何在江面上航行的大型舰船，只能在预留的狭窄航道上谨慎航行。即便如此，也很容易撞上乱石和铁锚构成的拦河坝，要么受损搁浅，要么被撞伤沉没。

六月中旬，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专门负责马当、湖口、九江和田家镇等长江沿线诸要塞的防御作战。江防总司令刘兴所辖的要塞防御部队是：马（马当）湖（湖口）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下辖周启铎的第五十三师，薛蔚英的第一六七师；马当要塞守备司令部，司令王锡焘，下辖步兵守备营一个、守备总队两个，炮兵教导队两个，以及陆战支队的一个大队，还有三座炮台。也是六月中旬，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视察马当要塞，重新部署了要塞防御阵地：主力部队配置于江南岸的黄山、香山、下隅坂、黄栗树、香口一线；另以第五十三师一部在江北岸的华阳、雷港、望江一线设防。沿着马当江面的堵塞线，又设置了人工暗礁三十处，沉船三十九艘，布设水雷一千六百颗，两岸构筑的大量碉堡火力全部指向江面，三座炮台上的八门十二厘米口径大炮也都计算好设计诸元并完成试射，随时可用密集的炮弹轰击狭窄江面上的任何目标。中国空军还集中了战机于汉口和南昌机场，以备给马当要塞以空中支援。然而，看上去几乎不可逾越的马当要塞，却因中国守军的怪事迭出仅仅坚持了四天。

六月二十二日，波田支队和海军第十一战队，由安庆溯流西进攻击马当。果然，在中国军队精心布置的堵塞线前，日军海军舰船受到两岸中国炮兵的猛烈轰击，日军“鹊”号战舰中弹起火，“利华”号炮舰触水雷沉没，三艘汽艇葬身于长江的漩涡。日军的攻击持续了两天，付出惨重伤亡后，仍无法打开马当通道。于是，波田支队从要塞江面后退，于长江南岸登陆，企图从陆路迂回马当。

在波田支队的攻击下，马当要塞外围阵地失手，除阻击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弱之外，真正的原因竟然是：当日军猛烈进攻马当要塞阵地时，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正召集部队主官在马当镇里聚餐。半个月前，李韫珩军长召集马当、彭泽两地的乡长、保长与第十六军的军官们集中训练，他把这一训练取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就在日军已经攻至马当江面时，六月二十三日，李军长下达了一道命令：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举行盛大结业典礼。而正是二十四日这天，波田支队从陆路开始迂回马当，接敌的第五十三师三一三团团长负伤，全团官兵在激烈的阻击战中伤亡殆尽，以致马当要塞外围黄山、香山和香口要地相继丢失。——李军长的命令中有个规定：各部队主官必须参加，典礼之后集体聚餐。为了表示“结业典礼”和“集体聚餐”的隆重，李军长还正儿八经地给要塞所有上尉以上军官发了请帖。

无法得知，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李军长是根本不了解前沿日军攻击的情况呢，还是认为马当仅靠那道坚固的堵塞线便可高枕无忧？此事

充满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怪异。

在马当阵地上，有一位上尉接到请帖但没去聚餐，他就是要塞守备司令部陆战队第二大队副队长杜隆基。杜隆基是学过要塞作战专业的军官，被军政部派到这里训练陆战队士兵。因为这支要塞部队的官兵大多原来是海军，会操作军舰上的火炮，但对陆地火炮不会使用，杜隆基决心在日军发起进攻前教会他们。二十三日傍晚，没去参加集体聚餐的杜隆基，眼看着军官们纷纷离开了防御阵地。二十四日拂晓，他跟防守香口的一大队联系，电话不通；又跟最前沿的三一三团联系，也联系不上。透过清晨的雾气，杜副队长突然发现香口方向有部队移动，这时士兵报告说香口已被日军占领。香口位于马当江面的南岸，这就是说日军已经登陆了。那么，日军是从哪里登陆的？又是何时登陆的？接着，几名三一三团的士兵溃退到了杜隆基所在的长山阵地——

日本人是今早四点左右从我连阵地登陆的。敌人以小艇靠岸，偷偷上来，上岸后用轻机枪向我阵地扫射。班长被敌人打死，我们连长去参加毕业典礼了，有的排长去受训，连里只有一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敌人猛烈射击后，我连阵地被敌人占领，敌人还在不断地登陆，向南沿江岸扩张，我连向黄寄树团部退去，边打边走，敌人就向香山推进。

确定日军正从陆路迂回马当后，杜隆基立即向要塞守备司令部报告，但电话总机说司令参加结业典礼去了，杜隆基只能用无线电与位于汉口的江防司令部取得联系并报告敌情。

此刻的马当要塞，防御阵地上只有少量的守备部队。日军波田支队攻克外围阵地后，分成三个突击组，抬着重机枪，以太白湖口的水荡为掩护向马当推进。杜隆基指挥阵地上的火炮和机枪齐向水荡射击。而在马当江面上，日军舰船再次向堵塞线接近，十九艘舰船集中在一起利用舰炮向两岸中国守军阵地实施猛烈轰击。

下午三时，李军长的“集体聚餐”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结束了，阵地上的部下也终于和他们的李军长联系上了。听闻日军已经在马当要塞登陆，李军长说他并没有接到报告。部下说：“香山、香口早被敌人占领。”李军长还是难以置信，问部下“确实看见敌人了？”部下告诉他：“我们的阵地被敌人打乱了，人死了一半，还说我们没有看见敌人！”接下来，怪事再次发生：李军长确定马当危急后，本应抽派就在马当附近的他的第十六军增援，遏制住波田支队从陆路发起的攻击，但是，李军长却命令远在彭泽方向的第一六七师薛蔚英部前来增援。

二十五日，马当要塞阵地上的激战持续一天。中国守军一度夺回黄山阵地，攻击香口的日军遭遇中国守军的反击后也退至香口以东。中国空军轰炸了马当江面上的日军舰船，炸沉炸伤了多艘敌舰。二十六日，日军后续部队在娘娘庙、牛首矶大规模登陆，炮兵发射了大量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严重，阵地已多处破碎，要塞岌岌可危。

奉命增援的第一六七师仍不见踪影。

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在接到李韫珩增援命令的同时，也接到了白崇禧要求他迅速增援马当的命令。但是，薛师长选择的增援路线，只能说明他在暗中违抗军令：从彭泽到马当，本有一条平坦的公路可行，薛师长放着平坦的公路不走，走的是一条绕太白湖东边的小道。小道崎岖蜿蜒，泥泞不堪，师参谋长提醒他：以一师之众，走如此难行的小道，何时才能赶到马当？薛师长的回答是：这样可以避免遭遇日军的阻击。结果，第一六七师才走到半路，在日军步兵、海军和空军的联合猛攻下，马当要塞已于二十六日上午九时落入日军之手。

马当要塞的丢失，令人无法解释。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干脆把江防各部队发给他的报告集中起来，一并转发给蒋介石，让蒋介石自己去判断这件事到底荒诞在哪里：

一、第二总队鲍长义感（二十七日）戌代电称：职队已牺牲四分之三，昨晨因敌屡攻屡败，伤亡在二千以上，致羞恼成怒，不顾国际公法，竟释放毒气，我方中毒者极多，敌即趁机以千人向我包围，致我牺牲极大，各中队长、队副大部均作壮烈牺牲，指挥所亦被包围。斯时，各山遍插日旗，各中队电话均不通，援兵不到。职不得已，率同残余员兵冲围而出。二、第三总队副崔重华感亥电称（总队部在湖口）：第三大队已牺牲三分之二，炮毁四门，合计第一、三两大队共有炮十四门，现仅余七门。颜总队副刻在彭泽负责收容，已收容者约二百五十名。此间给养极端困难，有线电及长途电均炸断不通。三、陆战支队第二大队长金宝山感戌电称：职队七五野炮八门，被炸毁六门，现仅余二门，已运到湖口，子弹均已用尽。四、第三总队长康笔祥（该员本驻湖口，因两个大队调赴前方，遂前往督率）俭（二十八日）酉电称：马当区自与敌接触后，我守备各队苦战三昼夜，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援兵不到，今上午全线不支后退，本军大受影响。此役敌舰被职属各队击伤起火者甚多。第三大队大队长、副各一员，中队长、副各二员均为国捐躯，士兵伤亡甚重。职队各炮被炸毁及击毁者甚多，现残余员兵均已离开马当

区。

由于怪事连连，幸存下来的马当要塞守军官兵严重怀疑：要塞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内部出了汉奸。理由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定在六月二十四日，事先发出的通知是二十三日下午到马当镇军部集合，而日军恰好选在这个时候登陆袭击马当，选择的突击目标又是没有主官的团阵地。同时，在马当战斗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空军前来袭击江面上的日军舰船，而向马当江岸要塞阵地开炮的日军舰船，往往在中国战机还没抵达上空的时候，就已经事先把炮口转向了天空，这说明日军对中国战机到来的时刻了如指掌。——的确，马当要塞守军残部撤退时，果然在路上捉到了汉奸："敌机三架前来袭击彭泽县，当时发现有一人身穿白衣服在岗上喊叫。很快，一幢军用仓库被敌机炸毁。我们很奇怪，鲍长义总队长即派一名排长带一班人去查看，原来高岗附近有一个防空掩体，内藏有三名汉奸，并备有收发报机一部。这位排长气极，当即将这三个汉奸打死。"

一九三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的职务，而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畏敌如虎，贻误战机"被军法会执行枪决。

为挽回马当失守对江防全局造成的危害，陈诚急令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督率调归他指挥的李韫珩的第十六军、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黄维的第十八军等部向香山和马当一线实施反击，并特别强调"如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香山三面环水，山险坡峻，不易正面攻击。二十八日夜，中国军队以伤亡六百多名官兵的代价，突破了香山东南方向日军的阵地，战至天明收复香山。日军退到香口后增兵两千，二十九日拂晓，日军舰炮、飞机连同地面部队一起阻击反攻香口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退回香山与日军形成对峙。

日军华中派遣军决定增兵。

刚从日本本土调来的第一〇六师团一部，被加强给波田支队；日本海军也调来第二十一水雷队、第二炮舰队和第三、第十五航空队，以厚海军第十一战队兵力。二十九日，日本海军爆破组终于炸开了马当堵塞线，波田支队主力和第一〇六师团一部得以乘坐第十一战队的舰船，顺利通过马当水面向彭泽推进。上午十时，日军水陆并进包围了彭泽城。中国守军在抗击中伤亡巨大，第三战区急派何平的第十六师增援，但增援部队受到波田支队左翼部队的阻击。彭泽城随即陷落。

沿着彭泽西湖，便是长江的另一处江防要塞湖口。

湖口是鄱阳湖通向长江的入口处，为九江之门户。

一旦日军占领湖口，其舰船便可进入鄱阳湖，直接威胁南浔路（南昌至九江的公路）中国守军的侧翼。同时，从鄱阳湖向西可对武汉侧背形成进击之势，向东则可对位于江浙地区的中国第三战区后方构成威胁。

为了确保湖口，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任命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区指挥官，归第三十四军团军团长王东原指挥；命令王东原指挥第七十七师、第十六师等部向娘娘庙、彭泽的日军实施反击；第七十七师原湖口防务移交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奉命在湖口附近江面大量布雷。

七月一日，第七十七师反击先头部队四六〇团，在堂山附近与波田支队一部迎头相撞。激战后四六〇团退守杨家山，波田支队猛烈追击，配属的日军野战毒气第十三中队释放了毒气，四六〇团上百名官兵中毒，残部二百余人被迫撤退。第二天，王东原指挥第七十七师主力与第十六师分路从侧后攻击波田支队，第七十七师给波田支队第二联队一部极大的杀伤，但自身也损失官兵数百人。三日，第七十七师继续向日军猛攻，再次击毙日军百余人。而在第十六师方向，因当面日军得到第一〇六师团一部的增援，双方胶着在一起。

就在中国军队与波田支队一部苦战时，波田支队主力在海军第十一战队以及第二、第三、第十五航空队的支援下，向防守湖口的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师阵地发动了水、陆、空联合攻击。第二十六师刚刚接手湖口防务，尚未完全进入作战状态，加之部队主要由川籍保安编成，不但新兵多且全师没有任何重武器。川军官兵虽奋力苦战，但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势下，湖口外围阵地龙潭山很快失守，波田支队主力距湖口县城仅三公里。中国统帅部严令第二十六师死守湖口，同时命令彭善的第十一师向湖口方向的日军实施侧击。日军必夺湖口，第二十六师官兵伤亡一批再上去一批，誓守防御阵地不退，日军再次释放毒气，湖口城垣的中国守军多数中毒，城防阵地随即被日军突破。

七月四日晚，湖口被日军攻占。

天堑要塞马当、湖口的迅速陷落，再次将一场战争必会涉及的所有

问题摆在了中国军队面前。

江防总司令刘兴写出了一份《马当、湖口两要塞相继失陷之实情》，除了措辞有所吞吐外，报告的内容基本属实。

（甲）马当失陷原因：

一、该区指挥官李蕴珩，到防后，举办抗日学校，调集所辖各部队官长三分之二入校受训，对于实际战备，过于疏忽。

二、香山及马当要塞外廓之要点，早经筑有据点式的工事，并令派有力部队固守，乃该指挥官不加注意，致被敌轻易夺去，而深入我要塞区。

三、敌占香山，本部已得报告，比转饬该指挥官，犹云并无其事，太不沉着，妄报不好消息。嗣确证香山失守，渠又云恢复香山并非难事。宥未马当失守，渠亦不自承，经反复责询，至次辰渠始承认。

四、当敌攻藏山矶时，该指挥官不将部队向马当增援，反将指挥部由马当移至马路口，经劝止不听。当令派兵一团归王司令指挥，固守要塞。亦未照办。

五、敌由香山迫至藏山矶，曾令该指挥官以在黄栗树之一旅，向香山增援，以马路口之一旅，向马当要塞夹击敌人；同时，深恐该指挥以为该区已划归罗总司令指挥，不听命令指导，请林主任蔚文转报委座，并请径电该指挥官，亦未遵行。

六、马当要塞守备部队，总计不过五营，且系混合编成，份子复杂，战斗力甚形薄弱。自敬辰起，激战两昼夜，求免藏山矶阵线动摇，王司令一面将后方有枪的士兵尽调前方，一面派李指挥官增援，而李终未应援。迄敌由娘娘庙登陆，一面迫近炮台，一面将藏山巩后路截断，致全被包围。

七、曾在望江五十三师李旅之一部，宥辰已撤回彭泽，径电李指挥官，即令该部驰援马当，并由王司令派汽车迎接。该部终未移动。

八、一六七师驻湖口之一旅，原限两日赶到马当，增厚兵力。该部七天始到，行动迟缓。

九、薛师武器，曾经德顾问检查，机枪迫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

（乙）湖口失陷原因：

一、要塞直属守备部队，甫经核准，正陆续组织，力量太弱。

二、守湖口野战部队，原为七十七师，嗣以彭泽失陷，该师奉令恢复驻军彭泽；另由驻浔、湖间之二十六师推进至湖口，不意敌陷彭泽后，复以汽艇绕至上游登陆，致彭泽未克，而湖口已告紧张，二十六师正当半渡，其先头即已与敌接触矣。

三、湖口危急时，奉命增援之七十七师、十六师，为敌牵制，迄未到达；且王东原与二十六师始终未取得联络。

四、配属湖口总台长指挥之长江要塞守备总队，湖口紧张时，竟声言奉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电令，开往安全地点休息整理，致影响其他部队，咸感不安。

五、湖口正面太宽，职曾申请以有力部队驻守，二十六师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不能胜此重任，而终无其他部队。故开战三昼夜，湖口即告失陷。

六、湖口、马当两区要塞炮台，对江面设置，对野战军作战，完全不能支援。

七、敌施放毒气，我部队毫无防毒设备及经验，致有惶惧失措，影响战斗。

有史料统计，日军在一九三八年进攻武汉的作战中，曾使用毒气三百七十五次。相关史料也表明，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决定使用毒气武器的权力不在前线部队，甚至不在方面军司令官，只有作战部队要求并接到陆军部的授权后才能使用。日本军方清楚地知道，《凡尔赛条约》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其他国际公约，都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但是，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的京津、淞沪、太原和武汉战场上都使用了化学武器。日本人对他们在公然蔑视国际公约是这样解释的：“陆军在对待技术上落后的敌人时，没有把不遵守禁令视为问题。”日军只有面对“技术上落后的敌人”时，才会无所顾忌地使用化学武器，当然首先是因为对方没有相应的化学武器可以还

击，还有就是“技术上落后的敌人”是可以随意欺辱和残害的。

湖口的陷落令九江危急。

焦灼万分的中国统帅部严令黄维的第十八军等部对波田支队实施反击作战，中国军队的反击暂时将波田支队压制在了湖口附近的沿江地带。

自日军沿长江向西攻击以来，仅有七八千人的波田支队，在数十个中国师的围攻和阻击下长驱直入，即使在被压制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受到重创，个中原因，仅以其适应亚热带作战为由是无法解释通的。只是，波田支队也确实精疲力尽了。自镇江出发以来，连续作战已令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火化成灰，那些还活着的官兵接到的命令依旧是沿长江向西攻击。长江中游令人窒息的憋闷潮湿包裹着他们，他们西望长江的眼神与江面上的热雾一样迷茫：沿江而上还会有什么样的作战？那座叫武汉的城市到底还有多远？

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东接苏皖，西临黔蜀，南连湘粤，北通豫冀，长江与汉水、平汉与粤汉铁路在此交会相连，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南京陷落后，武汉即成为中国抗日作战的指挥中枢，也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日军大本营在实施徐州会战时，已将下一步攻占武汉一并考虑。经过粗略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进攻武汉，需要耗费作战军需三十二亿五千万日元以上，且至少需要“增兵约四十万人和新编兵团二十四万人”。由此，日本内阁对攻占武汉充满巨大的心理矛盾，但是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对占领武汉极为渴望，认为“攻占汉口（武汉）的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

一、早日解决中国事变是陆军部的一致希望。

二、即使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这是第二部（情报）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海军也积极主张，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

三、为对重庆进行轰炸，占领武汉周围也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国民政府大部机关已后退到重庆。

四、攻占汉口、广东，只要投入陆军主力，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作战。

五、估计苏联此时不能参战。

六、但是攻占武汉和广东，再加上政治谋略工作，能否使蒋政权屈服，尚无把握。

七、海军对溯江作战直指汉口，有很高的积极性，广东作战当然有攻占海南岛的意志。

除了“使蒋政权屈服”这个终极目的外，日军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有着具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即一举捣毁中国的抗战中枢，把国民政府再向西驱赶，使其彻底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即使国民政府仍不屈服，武汉的丢失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大量武器的输人通道——粤汉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这样一来，即使该政府逃到了四川或是云南，以保余命，但在这种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

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方案，一直在不断地改变。

原先拟定的方案也是华北方面军切望的方案，即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接攻占汉口。这个方案的优点是道路顺畅，除武胜关等关隘外，大部分地段适合机械化兵团运动和作战，且能随时攻击中国军队整体战线的侧翼，包围武汉以东长江以北的中国军队主力，以期收到战略上的最大效果；缺点是推进的距离较远，进攻路线也就是平汉路的西侧，容易受到中国第一、第五、第九战区部队的威胁。后来由于作战的后方华北不断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的牵制与袭扰，这一方案最终被否定。第二个方案是从淮河地区向南，通过大别山区向武汉实施包抄。其优点是攻击的距离较近，且徐州会战后日军在对中国军队的追击作战中已形成了实施这一方案的自然态势；缺点是大别山地区道路崎岖难行，是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阻障，更何况中国军队在大别山麓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随着黄河决口引发淮河泛滥，这一方案遂被取消。最后，日军大本营制订了第三个方案，即以主力沿长江西溯直冲武汉，同时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作为策应。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动用占据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充分利用长江良好的水运条件以为补给线路。虽然攻击的距离比第二方案远，但比第一方案近，地形也比第二方案有利。更重要的

是，这条路线是中国军队准备最不充分的一面。只是，这一方案也有明显的缺点：长江沿岸是中国水网密集地带，湖沼池塘布如繁星，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和作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主要集中在徐州地区的日军主力需要进行大规模调动，还必须事先占领九江附近地区作为攻击的出发地。同时，即使从这个方向攻击武汉成功，也只能将中国军队主力西驱，很难将其包围歼灭。

按照第三方案的作战原则，六月十八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武汉作战准备令。

一、大本营准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在扬子江及淮河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给下一步作战做好准备。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继续执行原定任务，特别要求对占领区内的残敌进行扫荡。另外，要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为把敌人牵制在北方，应准备进行一部分作战。

四、有关细节，由参谋总长指示。

为完备攻取武汉的作战态势，七月四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编组新的第十一军，同时将第二军与第十一军编入华中派遣军。

扩充后的日军华中派遣军主要战斗序列为：

司令官畑俊六大将。

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辖第十师团，师团长筱冢义男中将；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后为藤江惠辅中将。

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辖第六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波田支队，支队长波田重一中将。

派遣军直辖：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后配属第二军；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后配属第十一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牛岛贞雄中将，后为久纳诚一中将，后编入第二十一军战斗序列；第一一

六师团，师团长清水喜重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后编入第十一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岩松义雄中将；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广野太吉中将；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岛吉藏少将。

至此，侵华日军兵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日本陆军扩建了十个师团，即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一〇四、第一〇六、第一一〇和第一一六师团。在这十个师团中，除第二十三师团调至中国海拉尔地区、第一〇四师团调至中国大连地区以外，其余的八个师团全部被调入中国关内。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日本陆军总计为三十四个师团又六个混成旅团，共约九十万兵力以上，除日本本土的近卫师团和第十一师团、驻扎朝鲜的第十九师团、驻扎台湾的半个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全部投入到中国战场。以至于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日军总兵力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人，占日本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九十一以上。

依照大本营的准备令，日军华中派遣军制订了两路攻取武汉的作战计划：第十一军辖五个师团，先攻占黄梅和九江，而后在瑞昌、德安线集中兵力，沿着长江及其两岸攻击前进，以南岸为主要攻击方向，分兵切断粤汉铁路，迂回武汉以南，合击并最终占领武汉；第二军辖四个师团从合肥附近出动，在长江以北沿大别山麓向西推进，攻击河南信阳，切断平汉线，然后南下从北面进取武汉。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直辖的三个飞行团全力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三舰队配合陆军溯江攻占沿江的一系列江防要塞。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日军共有九个师团，总兵力二十五万余人，支持陆军作战的海军和航空兵部队投入舰船一百十艘、战机四百余架。

在军事准备上看，日军攻取武汉的作战态势已不可逆转。

而在中国方面，当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时，关于日军将攻取武汉的情报纷至沓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决定筹备武汉会战。黄河花园口决堤后，中国第一战区程潜部主力退至信阳以南和以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主力退至大别山一带，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主力仍驻扎在九江以下长江南岸一带。为适应武汉会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战斗序列，组建了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并决定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共同保卫武汉。其中，第九战区负责长江南岸的鄱阳湖西岸以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的防御，所辖薛岳的第一兵团在南昌至德安附近的鄱阳湖西岸一线布防，阻敌进攻南昌和迂回长沙；张发奎的第二兵团

在德安至九江一线布防，阻敌沿长江进攻田家镇等要塞，同时防止日军西攻岳阳。第五战区所辖部队为五个兵团，右翼兵团负责防守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以及广济和浠水一线；中央兵团负责防守太湖、潜山西北的山地；左翼兵团负责防守大别山北麓和淮河间地区；苏北兵团担任敌后游击；二线兵团控制在湖北黄陂和麻城一带。中国最高统帅部关于武汉会战的总构想是：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和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在延迟武汉陷落的同时尽可能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运用第五、第九两战区兵力，以粉碎敌继续攻势能力之目的，保持重点于江南，向武汉逐次抵抗，消耗敌军，以换取至少四个月之时间”。

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总计十四个集团军，四十七个军，一百二十余个师，总兵力约七十五万。中国海军尚存的“中山”号、“永绥”号等十四艘炮舰，“宁”字号、“胜”字号等十五艘炮艇，“文天祥”号、“史可法”号等十艘快艇，加上少许的布雷艇和运输舰船，约有四十余艘舰船可以参战。中国空军截至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尚有轰炸机三十八架，驱逐机六十五架，侦察机二十七架，苏联空军志愿参战轰炸机二十六架，驱逐机和战斗机共六十四架，两者总计二百二十架。

尽管日军大本营很清楚，他们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攻取武汉在作战方面应该没有悬念，但是日本的政客们仍旧忐忑不安。无论军方多么凶狠狂妄，政客们总还知道，战争的目的远不是对一座城市的占领。因为使中国屈膝臣服的渴望过于强烈，日本政客们决定不管军事上如何推进，须着手谋划如何推翻蒋介石政权：

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

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企业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权自行消灭。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认为，军方过于跋扈，根本没把内阁放在眼里，

比如淞沪会战时，日军三个半师团在中国杭州湾登陆，内阁的阁僚们竟然是第二天从广播里听说的。首相认为自己总在被军方牵着鼻子走，遂以辞职为要挟表示须改组内阁。徐州会战结束后，近卫文麿进行了内阁改组：陆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取代杉山元出任陆相，曾任陆相和朝鲜总督的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近卫文麿的目的是：希望有“陆军前辈”之称的宇垣一成能够遏制陆军部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新内阁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个执政目标是：一九三八年年底前，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换句话说，一九三八年底前，必须彻底让中国屈服。

如何让中国屈服再次令日本政客们绞尽脑汁。

宇垣一成入阁时，曾向近卫首相提出如下条件：“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一月十六日的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迫于必要时予以取消。”令近卫文麿没想到的是，早在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的蒋介石便与宇垣一成相识，在蒋介石看来，那时的宇垣一成是一个能够“理解国民党事业”的开明的日本人。果然，宇垣一成收到了同样与他友谊甚深的张群的电报。张群时任中国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电报的内容是祝贺他出任新内阁的外相。据《宇垣一成日记》记载，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始，他与张群在来往电报中提到了和谈：

张群去电：“此次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之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努力予以实现。”

宇垣回电：“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

张群去电：“能让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或者本人出面接洽。”

宇垣回电：“我们期望谈判。无论如何应立即对话。但是，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同您或汪兆铭对话，很容易谈拢。但是，贵国国民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不如选定同日本关系不深的人士出任我们的谈判对手。”

张群去电：“阁下所见甚是。我们居于二线，派他人出面，我们在其后声援。阁下认为何人为适宜？”

宇垣回电："作为我个人意见而言，派遣孔祥熙先生如何？"

六月二十二日，日军波田支队向马当要塞全力攻击时，孔祥熙的代表，其机要秘书乔辅三，与宇垣一成的代表，即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两人在香港会面了。

所谓的和谈刚一开始就面临崩溃。

板垣征四郎就任陆相后，任命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自己的副手，即陆军次官。关东军将领从来都是侵华强硬派，东条英机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对板垣征四郎影响极大。七月八日，在日本内阁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下列四条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

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

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改称或改组国民政府；

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

四、蒋介石下野。

狡猾的孔祥熙反复强调，蒋介石是国家元首，如果让蒋介石下野，没有人再有资格替代他与日本签订条约。但日本人的态度很坚决：蒋介石必须下台。随后，日本人又开列出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谈判条件："满洲必须独立，内蒙古自治和华北特殊化"；清算和共产党的关系，加入日本制订的防共协定；中国必须向日本赔偿，等等。孔祥熙表示，现在让中国"写明承认满洲的独立"非常困难，可否先设置领事？承认内蒙自治和划定华北特殊地带也很困难，是否中日共同经济开发？至于对日赔偿，"中国现在荒芜而贫穷"，根本没有"赔偿之能力"。但是，日方的态度极其强硬："满洲国"是庄严的既成事实，防共是日本方面最重视的，中国再穷也有其他方式对日本作出赔偿。

即使仅从用政治手段结束战争的意愿出发，蒋介石许可的对日和谈中对中国主权的伤害也令人吃惊——特别是东北问题和内蒙古问题。但是，这样的和谈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因为蒋介石坚持起码的前提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他明确指示孔祥熙："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由此，日本内阁立即改口，声称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日本帝国一贯不变的方针。

六月二十一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接到了出任新组建的陆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命令。他立即动身回国，由于天气原因，三十日才抵达东京。第二天，他向参谋总长报到，接受军装检查、派遣命令和作战序列后，被安排晋见天皇和皇后——“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拜领侍从长送下的赐金，在吉本参谋长、铃木专署副官伴同下，参拜皇宫内殿，拜受御赐神酒。”七月十二日，冈村宁次抵达上海，十五日到达位于南京的第十一军司令部。十九日，冈村宁次向沿江进攻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一〇—师团推进到湖口附近；波田支队和第一〇六师团与海军协同向九江发动攻势；第六师团由潜江向太湖、宿松、黄梅攻击，策应溯江西进的作战。

马当要塞陷落后，中国统帅部的判断是：

一、敌兵力大时（至少五个师团以上），以主力在星子附近登陆，进攻南昌、长沙或趋岳阳、蒲圻、咸宁，截断粤汉铁路，包围武汉；并以一部于姑塘、九江登陆，牵制我军。

二、敌兵力少时（三个师团以下），以主力于姑塘登陆，一部于九江附近，企图包围九江，夺取瑞昌。

为此，第九战区把第一兵团部署在鄱阳湖西岸，“以防敌万一第一行动之实施”，同时策应九江方向的作战；“而以第二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亘码头镇沿湖江之线，以备第二行动之实施”。由于阻击日军西进的主要方向在第二兵团的沿湖沿江防区内，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制订了具体作战部署：一、第二十五军王敬久部的两个师又一个旅加所属炮兵部队，位于九江南面，防守星子至姑塘之间的阵地；二、第二十九军团李汉魂部下辖的七个师又两个保安团加所属炮兵部队，防守姑塘至九江及其以西地区；三、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的三个师，扼守九江至瑞昌的公路，阻止日军登陆；四、第五十四军霍揆彰部的两个师，防守九江以西的码头镇至富池口一带长江江岸，阻止日军登陆；五、第九集团军吴奇伟部的两个军一个师又一个旅为兵团预备队，分区控制在瑞昌和九江附近。

为了阻截日军溯江而上，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上布设了七百六十枚水雷以封锁航道。

自七月九日起，日军的舰炮和飞机不断轰炸以清除中国军队的水雷。二十三日零时，波田支队在一部伪军的带领下，由湖口乘坐海军第十一战队的舰艇和汽艇，冒雨进入了鄱阳湖，随即在九江东南二十公里

处的姑塘强行登陆。在此布防的中国守军预备第十一师疏于警戒，发现日军后仓促开火，但日军已在舰炮的掩护下向滩头发起了冲击。天亮后，日军战机飞临姑塘上空实施轰炸和扫射，预备第十一师竭力抗击，用手榴弹和刺刀近战肉搏，击沉日军汽艇十余艘，但自身伤亡惨重，至守卫滩头阵地的一个营全部阵亡时，波田支队抢滩成功。

第八军军长李玉堂急令第十五师派出一个团增援，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也急将兵团预备队第七十军调归李汉魂指挥。

上午十时，波田支队突破了预备第十一师的二线阵地，开始向左右两侧扩大战果。位于姑塘两侧的中国守军第一九〇师以及赶来增援的第十五师的一个团，均未能抵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攻占了姑塘以南约七公里处的猪桥铺和塔顶山。对于九江防御，尽管中国方面对日军登陆点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战事一起，中国军队在这个方向上的布防还是显得十分薄弱，以至于波田支队在倾盆大雨中成功登陆并得以向纵深发展。蒋介石命令罗卓英的部队向彭泽和湖口发起攻击，以牵制九江方向的日军；同时命令九江守军，务必把登陆未稳的日军迅速歼灭。第九战区当即命令第二兵团部队向波田支队发动反击。

二十四日，中国军队的各路反击作战进展都不顺利。尽管李汉魂不断地调整部队位置，试图构筑起一条稳固的阵地线，以遏制住日军的攻势，但是二十四日午后，波田支队和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全部登陆完毕，兵力大增的日军对当面阻击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猛攻。中国守军第八军伤亡惨重，第七十军与日军苦战到天黑，由于伤亡过重和侧翼被抄连夜撤退。夜色之中，波田支队和第一〇六师团从东、南两个方向向九江并行迂回，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则沿长江向九江实施正面攻击。

二十五日，日军向九江发动总攻。

凌晨三时，第九战区紧急调动部队以厚九江防御。

天亮后，长江上的日军舰船二十多艘和飞机六十余架，猛烈轰击和轰炸九江中国守军阵地以及九江市区。日军海军陆战队一部在九江码头附近成功登陆，开始攻击中国守军第三师的侧背；接着，日军另一部在九江西北的小池口成功登陆，中国守军预备第九师和第一一九师很快就难以支持。

九江，江西和湖北的门户，长江上著名的要塞。一旦九江丢失，不

但武汉岌岌可危，日军还可以从此迂回长沙和南昌。为了九江的防御，中国最高统帅部在这个方向上部署了十万大军，而攻击九江的仅仅是日军刚成立的一个师团加上一个旅团以及部分的海空军。可是，在日军发动攻击的第三天，当从姑塘登陆的日军与从九江码头登陆的日军会合后，防御九江的十万中国守军抵挡不住了。

二十五日晚十时十分，张发奎下达了放弃九江的命令。

二十六日早七时，日军进入九江市区。

九江的失守对保卫武汉构成巨大威胁。

中国军队的将领们曾追究九江失守之原因。

首先还是武器装备之差距。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称，小池口以北常家湾之守军报告："该连在缺堤口一带对敌舰开炮数发，暴露目标后，敌舰二十余只向该连集中猛烈炮火轰击，飞机数十架轮炸缺堤口，小池口附近炸成灰烬，无存身之处，及后撤守小池口队伍死伤惨重。"

二是所有部队均为临战仓促布防，且都被投放在沿江沿湖一线。战场没有纵深，部队又立足未稳，极易被敌突破，难以展开反击。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谈及日军在小池口登陆原因时说："龙坪至小池口以东一带，后为湖沼水田，野炮不能通行，因此炮兵不能抵达，仅战车炮连，工事均在堤上，不能后退配备，受敌空军袭击，又受兵舰炮击，堤上守军立足不稳，虽经四次将敌击退，终于午后四时为敌登陆，占领小池口。"

三是陆地交通线被过早破坏。日军从水路而来，又有强大的空中及江面火力支援，因此陆地交通的断裂反而有碍于中国军队的调动以及军用物资后勤补给的运输。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在报呈蒋介石的报告中写道："查九江附近公路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阳新、瑞昌至德安、永修至箬溪以及南浔铁路北段，早经彻底破坏……九江军队虽勉强集中，而交通困难，筑城材料运输不及，阵地无法立臻巩固……"九江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将近十万，"仅恃九江至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因之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

四是部队上级缺乏战斗决心，下级缺乏战斗意志。前者导致部队不能有效执行军令，后者导致官兵战前疏于警戒、战时不能效命。而部队

与部队之间，更是全无策应协同的意识与能力。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在报呈蒋介石的报告中写道：此次领兵九江期间，曾“与师长以上各将领晤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或武器不足，战斗力弱，动摇必胜信念，影响作战士气，益以中下级干部掌握不利，精神涣散，故每遇敌机袭击，多数溃散，甚有未见敌人，溃不成军者”。

七月，武汉暑热如火。

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武汉的“献金活动”已持续三天。老人们拿出多年的辛苦积蓄，工人和小商贩们拿出血汗挣来的微薄收入，身无分文的流亡学生沿街为人擦皮鞋再把挣来的钱投入献金箱，文艺界举行大规模公演收入全部捐献，妇女们拿出她们出嫁时娘家或是夫家给的首饰，武汉的外国友人和华侨也参加了捐款。三天之内，国民为支持抗战而捐出的现金达到百万元以上。此时的武汉市区，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见一首由冼星海作曲的高亢歌曲，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当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军民英勇抗击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围攻，今日中国武汉军民决心战胜攻击他们的日本法西斯。

大批中国军人从武汉开赴战场。

尽管日本人的判断是：“目前中国一般政局是逐渐丧失抗战的自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显出“崩溃之虞”；“蒋介石不顾财政、经济等内政问题，专心军事”，他的政权正在“走向危机”；至于蒋介石本人，其“健康状况，近来越发不良”，据说“腰间缠着石膏绷带，单独步行困难”。但是，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在日军越来越接近武汉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空前团结的中国。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为广集民意支撑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决定在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会议之下，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全国各党派和各社会阶层人士为参议员以共商国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政府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将国防参议会扩大为国民参政会，并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一个临时特设机构，符合规定条件的国民都有被推荐和被选举的资格。六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共计二百人的参政员名单，其中国民党八十九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七人，国社党六人，社会民主党一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一人，无党派和各界社会名流八十九人。国民参政会开创了国民党

执政中国以来邀集各党各派各方共商国是的先河。全国各党派和各社会团体对它的热诚欢迎与期待，已远远超出了关乎政治民主的任何诉求，而是在日本侵略者向中国腹地大举进攻之际对举国团结一致战胜凶残敌人的强烈渴望。

作为共产党参政员的毛泽东，以“齿病及琐务缠身”的原因向大会请假。七月五日，毛泽东致电即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当此抗战周年，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再接再厉，誓驱强寇，而敌人进攻，亦正有加无已之际，国民参政会恰于此时开幕，民意攸宣，国人同庆。”毛泽东在电报里特别指出，救中国于战争苦难的重要因素是：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和打持久战。——“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綴，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六日大会开幕。参政员一百六十二人出席，因故未出席的三十八人都以函电形式请假。英国、美国、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驻华大使或使馆代表也应邀出席，大批中外记者云集会场，国际援华组织和华侨团体纷纷发来贺电。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等人一应出席；元老名流张伯苓、蒋梦麟、沈钧儒、黄炎培、傅斯年、胡适等人也一应到全；中国共产党另外六位参政员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以及邓颖超出席了会议。国民参政会发布了慰劳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电、慰劳前方诸将士电。先后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院部关于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外交、司法、监察等方面的报告，各院部长答复了参政员们的质询。大会讨论通过了一百三十多项提案。参政员们先后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坚决拥护长期抗战国策，誓以全国军民的“精诚团结、艰苦奋斗”战胜日本侵略者！

东京的日本军政要员惊愕地发现：“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的抗日意见占支配地位，誓死保卫武汉的主张被采纳。”日本人此言指的是，六月九日，国民政府曾下令汉口的所有机关、大学等移至重庆或昆明，而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人提出的《加强保卫武汉问题案》获得一致通过，并“密送国防最高会议交武汉卫戍司令部采择”。日本方面不但没有看见中国屈服的任何迹象，而且国民参政会发布的《宣言》明确宣告，无论日方如何挑拨国民党人所谓共产党“赤化”的危险，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仍会坚定地站在一起抗击日本侵略：

……一年以来，我全体将士忠勇赴战，壮烈牺牲，我全体国民，包含边疆各民族，无分党派宗教职业，一致决心忍受艰苦，奋斗到底。盖中国于敌寇凭陵之日，反得发扬其整个民族之爱国意识与牺牲精神，故日本军阀虽恃其海陆空之暴力猛烈进攻，而决不能屈中国民族自卫之意志……中国民族从不敌视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中国全体国民，誓以一切牺牲达此目的……本会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本会同人，兹据实宣布：南京傀儡组织，乃敌阀之俘囚，吾族之败类，虽僭称政府，而无任何政权，仅供敌阀名义上之利用，决无言论行动之自由。此在国际法上，且远逊于丧失独立后之被保护国之地位；夫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家国也，神圣不可侵犯之统治大权，既以国民公意托之国民政府，而蒋委员长则我国家之最高统帅，而全国军民所公认为代表我国家意志之领袖也……至于赤化之谣，亦属不攻自破中。中国今日，全国一致，各党各派，在《抗战建国纲领》基本方针之下，共同奋斗，纲领具在，事实甚明……熟察大势，敌阀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日趋穷途，覆亡可待，然其暴力犹在，正图最后一逞。故我全体国民，唯有继续并加强一年来之奋斗精神，更绝对认清国家民族利益之所在，以统一与团结为一切行动之准绳……夫国难之险，险于覆舟，应战之急，急于救火，凡我同胞，安危相关，生死与共。惟有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

随着九江的陷落，日军已进逼武汉。

中日在军力上差距明显，空中力量相距犹殊。中日开战以来，中国空军原本不多的战机已损失大半。但是，随着苏联大批援华飞机的抵达，苏联志愿航空队员陆续进入中国战场，中日空中战场再次进入激烈搏斗的阶段。苏联空军援华作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无论当时的苏联出于何种目的，在中国基本没有任何外援的艰难时刻，苏联果断派遣空军人员参加对日作战，这无疑是对中国极大的支持。苏联除了援助作战飞机，提供空军后勤保障，培训中国飞行员以及参与空战战术指挥外，大批优秀的苏联飞行员为了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血洒中国蓝天，其英勇无畏当为中华民族所铭记。

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利用中国腹地的机场设施，对中国内地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实施轰炸。随着中国空战中心转向华中和华南，大批苏联飞行员和中国飞行员集中在了以武汉为核心的机场，开始了与日军的新一轮空战。有了苏联飞行员参战的中国空军，不但升空截击日本轰炸机，在徐州会战和沿江作战中，还曾主动出击配合陆军作战。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当日本战机轰炸武汉时，中国空军奋勇迎战，一举击落十二架日机。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和飞行员巴清正、王怡英勇牺牲。

武汉上空最为激烈的空战，发生在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日军出动六十九架战机直扑武汉上空，中国空军起飞迎战，武汉市民不顾防空警报纷纷仰天观战。敌我双方战机穿梭翻腾，天空硝烟弥漫，在短短半个小时的激战中，中国和苏联飞行员以损失战机两架、牺牲五人的代价，击落日本战机竟达二十一架之多，其中战斗机十一架、攻击机十架，日军飞行员五十人丧生，两人跳伞被活捉。

整个武汉欢喜若狂。

就是在这次空战中，武汉市民目睹了一个壮烈场面：一架中国战机在负伤之后，向日本战机迎头撞去。——驾机与日军战机同归于尽的中国飞行员名叫陈怀民。

陈怀民生于长江边上的镇江，曾在“一·二八”上海战事时和哥哥一起参加义勇军。入伍后毕业于中央航校第五期。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因击落多架日机获“空中勇士”称号。他曾因战机油料耗尽迫降而被抛出舱外负伤，也曾因战机受损而不得已高空跳伞再次负伤，武汉空战开始后他驾机升空时战伤仍未痊愈。他的母亲战前曾为他提了一门亲事，他以“日寇未灭，焉用婚为”作答。生在长江畔死在长江中的他时年二十二岁。

被陈怀民撞落的日军战机飞行员名叫高桥宪一。

高桥宪一的遗物中，有他妻子的照片和信件，妻子美惠子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我甚至有时想到，不做飞行士的妻子才好，做了飞行士的妻子，总是过着孤凄的日子。家里人无限挂念着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死，并不是荣誉的事，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履行你的职责。

陈怀民烈士的妹妹陈难看过这封信后，给这位名叫美惠子的日本女人写去一封信：

我失去胞兄的心境，使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你失去高桥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贵国军阀的错误政策之下，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个真实！怀民哥坚毅地猛撞高桥的飞机，与高桥君同归于尽，这不是发泄他对高桥君的私仇。他和高桥君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只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我告诉你，我家里的父母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像关怀他们的儿女一般，不带一点怨恨。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为着这个信念而努力。

两封信通过各种媒体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会是怎样一种人类之梦？

与这个梦想相比，战争带给人类的又是怎样的厄运？

日军第六师团切身体验到了什么是“火炉”。该师团从桐城南下占领潜山和怀宁后，严酷的暑热令多数官兵头晕目眩，加上疟疾流行，病倒的官兵达两千人以上，于是不得不在原地休息了近一个月。七月二十四日，该师团编入日军第十一军作战序列，奉命向潜山西南方向的太湖、宿松、黄梅一线发起攻击。长江以北地区属于中国第五战区，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立即部署中国守军节节阻击，第六师团的先头部队经过三天的作战才占领太湖。当日军继续向西攻击时，中国军队的反击格外猛烈，在太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双方都在不断增加兵力，于酷热之中逐村争夺，战火所及之处一片焦土。在这个方向上，日军第六师团的作战记录显示：中国军队“日夜死战”，仅反击作战就达二百九十次之多。八月一日，在二十多架飞机的助攻下，日军进攻黄梅，中国守军刘汝明部第六十八军顽强抵抗三天，官兵伤亡两千人，最终被迫放弃黄梅县城。中国守军随即在长江大堤上人工决口，滚滚长江水淹没了广济、黄梅、宿松、太湖、潜山和怀宁等六县，水淹面积达三千二百平方公里。日军第六师团被长江水所围困，又处在疾病和给养断绝的困境中，只得再次停止进攻，于太湖和黄梅地区休整。

比第六师团更饱受煎熬的是在九江以南的第一〇六师团。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为新组建部队，在国内征召的是后备役，士兵主

要由大阪的商人和职员组成，属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弱的部队，士兵们不但军事技能差，且必须在军官的督战下才作战。

七月二十八日，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路两侧向沙河镇、南昌铺进攻，企图占领德安，遭到中国守军的阻击。经过七个昼夜的激战，第一〇六师团才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但即刻又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在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作战中，第一〇六师团四个联队共一万六千人，伤亡高达约八千人，其中军官的死伤尤为严重。

鉴于第一〇六师团已无力进攻，且南浔路正面中国守军阻击顽强，冈村宁次决定以第一〇—师团在海军的配合下进攻星子。星子是鄱阳湖西岸仅次于湖口的要冲，日本海军方面早有夺取的计划。八月二十日，第一〇一师团之第一〇一旅团在海军的协助下，突破中国守军第二十五军第五十二师的防线，占领星子。接着，日军开始向西进攻庐山南麓——虽然“师团主力也加入了战斗”，“但战况仍不能急速扭转”。

只有攻击瑞昌的波田支队依旧在强硬作战。九江失陷后，瑞昌成为日军西进武汉的重要关隘。中国第九战区在这个方向上，以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之第二十二、第八十一、第二十师等部队构筑起阻击线，同时命令第三十二军团关麟征部随时准备增援。为了给日军造成更大的困难，第三集团军官兵破坏了青龙寺以东的江堤造成泛滥。但是，令中国守军没想到的是，在青龙寺附近掘开的江堤缺口，恰恰给了波田支队以可乘之机。八月十日，波田支队乘坐多艘舰艇，从青龙寺决堤的缺口处驶入官湖，攻占港口后不断增兵，相继占领了望夫山和平顶山等地。十三日，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调整部署，在瑞昌附近部署了三层防御线，准备作持久抵抗。十五日，波田支队一部在大树下登陆，经过数天的拉锯战，战线的胶着终被打破。二十一日，波田支队与并行进攻的日军第九师团一部发动了全面攻势。中国守军在一道道阻击阵地上顽强作战，日军开始大量使用窒息性毒气，中国守军的阵地不断因官兵中毒而被突破。二十四日下午一时，瑞昌陷落。

“汉口的酷暑，是世界闻名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我在壮年时代尝受过汉口酷暑的滋味，夏季气温大体为华氏九十七八度，温度极高。而且深夜和白天，几乎无大差别，非常不舒服。”多年之后，冈村宁次再次看到了他的士兵是如何在中国长江中游的酷暑中饱受折磨的：“当时部队发的汗衫土黄色的很少，白的又太显眼，所以官兵都是赤膊上阵。有胡须的老兵，脸上长满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

酷暑中，冈村宁次对武汉方向的作战心情恶劣，并对他指挥的部队充满抱怨。在这些抱怨里，他证实了中日战争中的某些史实——这些史实至今被日本右翼政客极力否认——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以及日本军队对中国战俘的残忍暴行。在他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后，听取了他的先遣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和杭州特务机关长的汇报，几个人明确地报告说："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对数万市民进行抢掠、强奸等大暴行"，"第一线部队借口给养困难而杀戮俘虏"。冈村宁次了解到，在他当下指挥的部队中，军纪最为败坏的是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第六师团以及波田支队，就连第六师团的军官们自己都说："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冈村宁次认为，在战场奸污妇女已成为日军"难以避免的罪行"，因为他的军务局长向他报告说，不少官兵在向家乡寄信时，同时邮寄了大量残暴行为的照片，冈村宁次惊讶于士兵们扭曲的心理"竟发展到如此地步"。八月二日，冈村宁次到达九江，他之所以在酷暑中追述日军的军纪问题，是因为"攻占南京时犯有暴行的师团"即将成为进攻武汉的作战部队。

武汉近在眼前。

就在此时，在中、苏、朝边界，图们江边一个名叫张鼓峰的地方，日军与苏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张鼓峰本是中国领土，沙俄在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时窃取，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将其划入"满洲国"。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十余名苏军突然进占张鼓峰，并开始在山上修筑工事。十日夜，日军第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命令部队向苏军发起攻击，苏军被迫向东撤退。正当日军得意之时，八月二日，苏军突然发动猛烈反击，两个师的苏军在飞机和重炮的支援下，以二百多辆坦克的攻击阵容直冲日军阵地。经过五天的战斗，日军遭遇惨败，伤亡一千四百多人。第十九师团参谋长中村美明不得不致电东京，要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件。

日苏在张鼓峰发生的军事冲突，令东京的要员们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日军在中国已推进至江南，如果日苏之间再爆发战争，日本将无法南北应付。于是，日本政府立即与苏联政府展开谈判，并于八月十日午夜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

"张鼓峰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与苏军在长期对峙中发生的偶然性摩擦。虽然日军在此次摩擦中领略了苏军在火力和机动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但也同时判定出：苏联并不愿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从而分散其应对西方的力量。至少目前，苏联没有与日本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意愿。由

此，日本人用北方的惨败换来了这样一种急切：趁苏联尚未对日本下手，必须尽快让中国屈服。因此，“张鼓峰事件”后，侵华日军对攻占武汉更加急不可耐。为了说服东京大本营，他们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令大本营无法拒绝的理由：

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以及国共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的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只要占领了中国的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就会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瓦解——日本人依据什么逻辑得出这样一个古怪的结论？只是，这一结论反映出萦绕在日本人心头的两个最令他们惧怕的词：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持久战”。前者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最强硬的精神对手，而后者直指他们发动的这场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的死穴：如果被中国拖入长久的战争，对日本来讲是一场无法摆脱的灾难。

一九三八年，在中国难耐的暑热中，日本人最惧怕的两个词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希图一旦占领武汉国共就会分裂，一旦国共分裂中国就会屈服，一旦中国屈服战争就会结束，一旦战争结束就在中国的国土上为天皇修建一座皇宫的日本人此时并不知道，一部深刻影响了抗战进程乃至战争结局的历史性著述即将在中国出版。

著述名为《论持久战》，作者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第十三章

日军没有后方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所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著述，重要前提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深刻的历史针对性。

中国的对日作战已历时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巨大的疑问由此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这些疑问不仅产生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和国土迅速沦陷的严酷现实，更是流行于国内的各种观点和言论所造成的认知混乱。此时在中国，关于对日战争，至少有两种观点极其危险，有可能致中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观点之一是“速胜论”，也称为“高调理论”。

“速胜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侵略者，战争很快就会以中国的决战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种观点在战争爆发之日就已出现。国内许多人曾经表示，日本不具备吞并中国的能力，如果日军向华北进攻的话，其军队前锋不可能越过长城，更不可能攻入山西。在淞沪会战初期，当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登陆并坚守上海外围阵地时，日军一度举步维艰，于是又有国人宣称，只要中国坚持三个月，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国际会干预苏联会出兵，中国军队很快就能把日军赶下海去，甚至预言中国军队将乘胜追击夺回失去的东北。“速胜论”在台儿庄战役后达到高潮，不但认为中国军队的胜利是日军崩溃的标志，而且认为接下来的徐州会战将是一个“准决战”，日军将在这样的决战中面临“最后挣扎”。——如果“速胜论”为一般民众和社会舆论所持，或许在某种情境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为中国决策层中的人所持，就会导致不顾一切乃至赌上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将是一种危险。

首先，无论从国力和军力上相比，中国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中国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有着相当的差距，

这种差距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造成的。战争除了精神质量的比拼之外，还是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拼，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与已进入工业强国时代的日本几乎没有可比性。承认劣势需要勇气，也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盲目的自以为是不是自信，是鲁莽和愚蠢，由此产生的乐观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要承担后果的。自日本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举国抗战，军队拼死作战，但是却没能抵抗住日军从北向南的节节进攻，在这种情形下何以谋求中国之速胜？

其次，“速胜论”也是受到日本支持的。没有人不希望对手越鲁莽越愚蠢越好。如果中国继续并固执地盲目乐观下去，日本便可以获得他们“速胜”的结果。因为在“速胜论”的指导下，中国将会不计后果地投入所有国力和军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或者死守某一要地名城，形成大规模的决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将会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对中国军队实施毁灭性的歼灭，使得中国彻底地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将中国沦为日本的战利品。对于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技能均占据优势的日军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寻找不到决战契机，消耗不掉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得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观点之二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

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

“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在他的各种演说中大肆宣称“战必大败”的“亡国论”，其代表作是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其中，汪精卫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誓死抗战的结局：“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迫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

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其结果只能是民族与国家“俱成灰烬”。那么，照此推论，中国浴血抗战的意义何在？继《最后关头》之后，汪精卫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通篇以阴阳怪气之语暗示坚持抗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汪精卫观点一致的群体，这一反对坚持抗战、反对国共合作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投敌求和的政治集团。

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投靠国民党，一九二四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国民党骨干党员，曾任总司令部行营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佛海给他们这一群体取名为“低调俱乐部”：

回到南京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去，渐渐地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无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汪精卫与周佛海不但没有历史渊源，而且曾经是政治对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右翼，左冀领袖汪精卫讽刺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周佛海反击汪精卫道：“他本是国民党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

无论如何，“低调俱乐部”成员的立场相当一致：鼓吹抗战失败和民

族投降论，千方百计地阻止举国抗战，肆意攻击共产党，竭力破坏国共合作，积极充当对日妥协的穿线人。——在国家政府决策高层中，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毫无顾忌”的“不是东西”的人，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丑恶，还令苦难中的抗战中国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忧患下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史观，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总结。

首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全国团结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毛泽东认为抗战爆发十个月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那么，中国会灭亡吗？毛泽东回答：“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毛泽东回答：“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给出的依据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但是，“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这种带有封建军事特点的退步和野蛮的战争，完全“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同时，由于“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日本统治者原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其结果只能是它为解决这个困难而“发动战争”，困难反而会因战争不断增加，战争还会将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再有，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毛泽东说，这就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而对于中国，毛泽东指出，

中国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但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积累了百年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力量，今天的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况且，中国的抗日钺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它能“唤起全国的团结”，并“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自身“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因此，这些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在明确抗日战争最终结局的前提下，针对十个月以来日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的现实，毛泽东分析道：这只是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因为“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毛泽东指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将得到未来历史的完全验证。其中，关于战争的第二个阶段，即战争的相持阶段，毛泽东预言，中国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艰难，要熬得过去这段较长的痛苦时期。然而，“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因此，战争的胜负，不在于部分城市的和部分国土的得失，在于中国人民“绝不动摇地

坚持战争”，在于“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在于“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

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其“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它最为特殊的特点：“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而“利用国家的总后方”，“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从整个战争形态上看，敌之进攻我之防御，似乎我处于敌人的包围中；但是“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敌后的游击战根据地也是，看似每个根据地“都处在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如果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也算在内，那么属于和平阵线的国家犹如天罗地网，当法西斯国家处在这张大网中无处逃跑时，也就是它被“完全打倒之日”。总之，“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战争的规律，让全中国军民明白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从而“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赢得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又一历史贡献，它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的问世，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规模巨大且将耗时甚长的战争中的砥柱作用，那就是无论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军力有多么强大，无论中国的抵抗作战现时如何失利，也无论哪个党派或哪些国人有怎样的悲观论调，甚至哪怕是国民政府的高层中出现了妥协乃至投降，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屈服。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保证着中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民族意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十分清楚，战争爆发之初他就说过：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人将必须面

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同时日本人也明白，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也是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决绝的强硬对手。

《论持久战》单行本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

毛泽东的论述，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以极大触动和启发。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给予了蒋介石指挥的一系列以撤退弃守告终的战役以极其客观的分析：“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歼灭和消耗敌人的目的达到了，争取了时间和“广大的回旋余地”，战斗者的血就“一点也不是白流”。“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蒋介石高度认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他的许可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白崇禧也对《论持久战》甚为赞赏，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作《论持久战》时，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南部的黄土沟壑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阎锡山指挥的部队再次联手，共同抗击着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日军侵占华北后，面临的严重的挑战是：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这时已成为威胁日军在华北统治的主要力量，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以及他们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逐渐蚕食着日军在华北的控制区域，甚至有把这些区域掏空或是包围之势；二、一部分归属蒋介石指挥目前却滞留在敌占区的部队，在战争初期也是牵制日军大后方的一支军事力量。因此，当华北日军大举南下进攻时，不得不分出极大的兵力驻守后方，以保证其占领区和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日军将这一行动称为“治安肃正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制订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纲要》规

定："维持治安的宗旨，是我军存在的需要，促进军占领区的全面安定，以帮助奠定新政权之基本为目的"。而"维持治安"的"重点指向共军，特别是已经建成的共产地区应努力从速加以摧毁"。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阎锡山向蒋介石报告了八路军坚持山西、华北抗战，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津浦路南段作战的部署情况：

一二九师以两个团位于平定、昔阳、和顺以东，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之山地，配合一一五师之三四四旅夹正太路，积极打击消灭该线之敌，并大规模地破坏正太铁路与石家庄以南之平汉路。一部位于榆次、寿阳以南地区，一部在武安、邢台以西地区。该师张、韩支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两支游击队，张贤约、韩东山各为支队长）仍在沧石路以南地区向沧石路及向东活动。

一二〇师集结精干部队于雁门、阳曲之线以西地区，配合五台区部队，在同蒲路北段积极打击该线之敌，并继续破坏敌之交通道路；宋支队（八路军的一二〇师雁北支队，司令员宋时轮）仍积极活动于大同以南，破敌交通，袭击沿线之敌。

一一五师之三四三旅组织精干部队在太原以南交城、文水地带积极活动。

晋察冀杨支队（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司令官杨成武）以精干部队配合陈支队一部及赵支队（晋察冀军区第四支队，司令员陈漫远；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司令员赵侗），分途向正太、平汉线积极活动；以小部队进入紫荆关以北之山地，向保定以北地区行动。周支队（晋察冀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建屏）配合三四四旅活动，不断破坏平汉线铁路。赵支队（晋察冀军区第二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向浑源、繁峙、代县、崞县、原平间，配合一二〇师积极动作。在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北之陈支队主力及吕支队（晋察冀军区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基干部队，应领导当地游击队，配合张、韩支队向沧石路、向津浦路行动，努力破坏交通，阻滞敌南移及东运，以直接配合津浦南段作战。

就上述电文看，尽管日军已占领太原以及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主力部队都已向南撤退，但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内，八路军仍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广泛地分布着。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路军与日军在正太路上发生了战斗：

我徐旅（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六八八团在温汤镇附近伏击井陉前进之敌。九时许，即与井陉来敌开始接触，当即将该敌约千余人击溃，敌伤亡约二百余人，但未能解决战斗。十二时，平山之敌赶到，随来敌机二架助战，敌发炮千发。该团长督率所部奋勇扰击，反复冲锋十余次。战至黄昏，温汤镇终被敌占领，该团团长陈锦绣及第三营营长均作壮烈牺牲，并伤亡连长以下三百余人。但敌亦伤亡颇大。

太原失守后，中国第二战区拟对太原发动反击作战。

在临汾举行的军事会议上，第二战区决定把现有部队分编为中央、东路和西路三个集团军，其中东路军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为正副指挥，统辖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和第三纵队以及第八十四师朱怀冰等部，负责向正太路的愉次、娘子关一带出击。

就在中国第二战区准备实施反击作战时，日军也在策划向山西南部地区发动作战，其主要目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军的部署是：由香月清司指挥第一军所属的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山冈重厚的第一〇九师团，由太原沿同蒲路两侧南下，直指晋南的运城和风陵渡；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由新乡向西，沿着黄河北岸攻击晋南的运城、平陆等地；下元熊弥的第一〇八师团自邯郸出发向西，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长治、屯留、安泽向临汾攻击。日军在这个方向上投入的兵力，并不亚于徐州会战的参战兵力，足见他们决心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敌后武装一举全歼。

二月二十日，日军第一〇八师团协同沿同蒲路南下的第二十师团向长治发起攻击。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第三一一旅一部奉命阻击，中国守军在与日军的血战中全部阵亡，长治失守。接着，晋南重镇临汾陷落。日军来势凶猛，以至于中国第二战区反击太原的计划已无实施的可能。一股日军从汾阳方向向西，直逼阎锡山的退路隰县。阎锡山命令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前往迎敌。但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位于川口的第七十师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杜堃差点被俘，旅长赵锡章阵亡，团长马凤岗率部猛冲才把被日军包围的师旅机关人员救出，王靖国军长带着第七十师残部跑到山里去了。而在大麦郊第六十八师阵地，中国官兵激战两昼夜后，阵地还是被日军突破。中国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大怒，严令第

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增援，并警告陈军长完不成任务小心脑袋，但陈军长还是因战事不利撤退了。张培梅怒不可遏，坚持要枪毙王靖国和陈长捷，说只有砍了这两个军长的脑袋才有可能扭转晋南危局。但是，阎锡山坚决不同意杀他的军长。——“张培梅见日军逼近隰县，阎军一再败北，而自己杀一儆百的主张又不为阎所采纳，悲观失望，即萌生自杀之念，吞食鸦片身亡。”

为了牵制日军的进攻，配合阎锡山部作战，八路军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出击。阎锡山急忙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的出击和收获：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鱼日（六日）“亲至平汉线督战。今得电话，真将新乐、望都收复，杀敌百余人，擒四人，夺步枪五十余支。定州正在鏖战中。北路浑源一战，杀敌四五十人，我伤亡二十余人。现敌困守孤城，不敢出城。”“……定县、新乐、望都三县各有敌人数百名，佳日（九日）被我杨支队悉数歼灭，并俘获敌人甚多。敌之增援部队亦被我击退，现正跟踪追击。一部已到保定南关车站与敌对战，大有占领保定的可能”。“正定至保定间铁路桥梁完全破坏，并毁敌车一列。平汉线伪组织亦多被抄获。现向津浦线急进，企图断敌后方交通”。二十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陈光部，收复了之前王靖国的第六十八师失守的大麦郊，“获炮一门，粮食数百担。养日（二十二日）在石川镇（石口镇和川口镇）与敌激战，获六五弹十四万发、信号弹五箱、步枪七十余支、军用品一部。我伤亡九十余人”。

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定在正太路向日军发起袭击，地点选在了几个月前娘子关战役时伏击过日军的长生口。“复战长生口这一仗，简直就是一次周密的军事演习。”第三八六旅参谋长李聚奎说。师长刘伯承在干部会上阐述了他的观点：打仗就要选择敌人的弱点。如果敌人没有弱点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当然还要打，但先要给敌人制造出弱点，给敌人制造弱点的战术叫作“围点打援”。即先佯攻旧关，吸引井陉的日军出动增援，然后在敌增援的必经之路上设点伏击。二十二日，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开始围困旧关，井陉的日军果然出动增援了，结果在长生口伏击圈内遭到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的猛烈袭击。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日军八辆汽车被击毁五辆，两百余人的队伍被击毙一百三十多人，其中包括这股日军的指挥官荒井丰吉少佐。

川口失守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奉命支援友军作战，但是这一次该师出师不利——师长林彪出了意外。三月二日九时许，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家庄时，被驻防当地的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所伤——子弹“从右侧

进由右侧背穿出后，幸未中要害，须移至妥当地点修养”。第一一五师师长随即由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三月十七日，日军第十师团一部从蒲县出发向大宁进攻，遭到杨得志的六八五团的截击，被迫撤回位于吕梁山脉中南部的午城。第一一五师把午城包围起来并实施攻击——

……午城的敌军，因连续遭我打击，夜晚总防备着我们进攻。当我六八五团的两个营，趁夜从东北向午城打来之时，固守在北山的日军虽进行了一番抵抗，但毕竟是惊弓之鸟，很快就支持不住了。与此同时，我六八六团三营从西北面向东进攻，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工事，并消灭部分敌人。敌人的汽车队见势不妙，就想逃窜。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是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的驾驶员车灯都不敢开，驾车就往前窜，可那么多车，天黑又找不到道，于是许多车在沟里乱冲乱撞。后来，有些车虽上了路，却正好跑到我们的伏击地带。送上门来的肥肉，怎么能不吃？打！经过一阵猛烈袭击，敌人的六十多辆汽车全都报销了……

接着，第一一五师派出六八六团在井沟附近设伏，从临汾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一〇八师团步兵六百余人、骑兵二百余人和一个炮兵中队进入了伏击圈。八路军发起突然攻击后，日军经过短暂的混乱疯狂反击，伏击圈内的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日军炮火猛烈，战机也赶来助战，六八六团官兵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持续“与敌人肉搏拼杀”。战斗中，两名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罗自坚、党总支书记肖志坚及其他营连干部大都挂了彩，有的壮烈牺牲了。战士中的党员站出来代理指挥，“阵地上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同志们！不要管飞机，只管去消灭地上的敌人！’‘用刺刀，用手榴弹！杀啊！打呀！’”傍晚时分，六八六团将部队分置于井沟公路的南北两侧，然后一起夹击，终将数百日军全部解决，并“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机枪十挺”。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则向占领着宁武、神池、河曲、偏关、保德、五寨和岢岚县的日军发动了攻击。作战前，贺龙想得到友军的支援，他去找了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郭军长表示自己是个“烂军队”，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贺龙又去找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赵军长答应先支援两门山炮，至于部队待相机行动。第一二〇师首先打的是岢岚城。第三五九旅先把岢岚城围起来，将通往城里的水源截断，就这样围了三天，城里的日军果然弃城出逃了。出逃的日军在三井镇被第一二〇师包围，官兵们奋勇冲击，日军抵挡不住死伤过半。阎锡山立即致电蒋介石：“贺师反攻岢岚，迫近五寨，两战役计：三五九旅阵亡政治主任一员、营长一员、排长四员，受伤参谋长一、特派员二、连长四、指导员四、排长五、班长战士二百四十五人；消耗手掷弹千余颗，步、机枪弹

一万二千余粒；俘敌五十三人，获山炮一门、炮弹车七辆、炮弹数百颗、步枪二十余支，敌死伤二百八九十名，骡马百余头。”第一二〇师跟踪追击，追到了五寨城，把五寨包围之后，“将主力放在机动位置，待机打击来援之敌”。果然，日军由神池增援五寨。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主力拦截了日军的援军，并发起猛烈袭击，激战六小时后，歼敌四百余人。八路军的持续攻击令日军丧失了战斗意志，先后放弃了保德、河曲、偏关和五寨县城，向朔县方向逃窜。第一二〇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神池并收复了该城。在攻击被日军占领的宁武时，第一二〇师还是“以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牢牢围住县城”，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主力则“分布在同蒲路东西两侧”，形成“二虎拦路”之势“单等敌人就范”。三月三十一日，日军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进至八路军的伏击圈时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宁武之敌本想趁机出城，第三五八旅的一个团，在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的配合下，以夹击之势对日军发起围歼，双方激战一天，日军伤亡惨重。联队长千田负伤，退回宁武县城后不堪支撑，于四月一日弃城向北逃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口气收复了晋西北的七座县城。

长生口伏击战后，为配合津浦路南段的作战，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迅速南下，以主力进军晋东南的襄垣地区，拟侧击西进的日军。三月十日，陈锡联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突袭黎城，又以主力击退涉县的东援之敌；而陈赓的第三八六旅，则在日军从潞城增援黎城的必经之路神头岭设伏。此时，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为了保护其补给线，在涉县、黎城和潞城都驻有重兵。八路军的伏击如能成功，不但可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还能遏制其进攻的势头。神头岭位于潞城东北十几公里处，从一张晋军提供的作战地图上看，神头岭公路是从一条深沟中间穿过的，两侧险峻的山势是个伏击的好地方。但是，当旅长陈赓带领干部们勘察了现场后，不禁大吃一惊：军用地图与现场相差甚远，神头岭段公路竟然盘在山梁之上。干部们不知这下如何是好，陈赓却认为出其不意也是军事上的险招：在“独木桥上打架”，谁先下手谁就能占据主动。陈赓的部署是：七七一团在左，七七二团在右，两个团都埋伏在公路北面，补充团在对面。由七七二团的一个营担任断敌退路的任务，再派小部队把浊漳河上的桥炸断，切断河两岸敌人的联系。三月十五日，部队向伏击地点运动时，主要由新兵组成的补充团的战士手里的武器竟然还是红缨枪。凌晨，万籁寂静。突然，黎城方向传来沉闷的枪炮声，这是七六九团开始攻击黎城了。天亮后，终于看见了从潞城出动的大约一千五百多日军。陈赓很高兴：多了吃不下，少了不够吃，一千五百多人正合适。这股日军是第十六师团和第一〇八师团的混合辎重队。在把日军先头部队放过去后，第三八六旅的官兵突然跃出开始了袭击，成百上千的手榴弹

大雨一般落下，而补充团的官兵们高举的红缨枪闪闪发亮——无法想象在与日军作战时，中国士兵竟然仍使用着这种冷兵器，但八路军锋利的红缨枪还是让日军很是惧怕，他们称其为“长剑”。——“一营一个战士负伤四处，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又一口气刺死了三个敌人，当他停止呼吸时，手里的刺刀深深地插在敌人的肚子里……”浊漳河上的大桥被炸断了，三百多日军跑进神头村负隅顽抗。陈赓大喊：“村边的是蒲达义的那个排吗？”蒲排长立即带领二十多名士兵冲进村，以伤亡五人的代价，把数百日军从村里赶了出来。在主力部队与日军激战的时候，被放过去的日军先头部队被七六九团特务连截住。混战时，日军从潞城来的增援部队抵达，可第三八六旅两个连的增援部队也赶到了，增援日军的十辆汽车被击毁一半，剩下的仓皇逃回潞城。

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有战士给喜欢照相的陈赓旅长送来一部刚缴获的照相机。陈旅长爱不释手，把战场详细完整地拍了一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特别欣赏的是其中的一张照片：一名八路军战士站在一个小土堆上，脚下踩的是一面日本旗。

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人事书记员木村源左卫门，在受到八路军伏击的第二天写下了日记：

昨日遭受袭击之部队为栢谷部队（日军第一〇八师团辎重第一〇八联队，联队长栢谷留吉）第三中队和第十六师团兵站辎重队，几乎全部被消灭，马匹全部被带走。昨日逃回潞城者仅十四人，其惨状可想而知。昨日部队卡车也同时到达被袭击现场，拟掉头折回，车身倾覆，人员弃车暂时退却。因而车载武装、用具全被夺去，所幸车辆尚完好无缺。昨日之敌两千人，目下正紧急追击中。该敌可能为朱德指挥的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之一部，附近之敌尚有高桂滋的第一六九、第八十四、第九十四等三个师，以及曾万钟的第七师、第十二师。昨日我方之损失，八百人中伤亡两百名，其中战死一百名。

八路军官兵从被俘的日军那里了解到，日军第一〇八师团辎重队多为“三十至四十岁以上者”，“多系第二次被征入伍”，士兵中“老年者甚多”，且因部队中不准传说八路军的情况，因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游击战争“均不知道”。

三月二十四日，在沁县东南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东路军总司令朱德召开了军事会议。与会者均为归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将领，除八路军的彭德怀、左权等人外，还有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

钰、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共计三十多人。会上，朱德和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特别阐明应该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与会的将领们都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为此，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专门给他们作了一场介绍游击战经验的报告。

会议即将结束时，朱德向各位将领发出了邀请：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即将打响一场伏击战，各位可以现场观战。

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哪里会有如此惊人之举。

伏击战的地点，是距神头岭战场不远的一个名叫响堂铺的地方。这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以东的一个公路边的小村子。村子的南侧和北侧，耸立着两座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陡峭山峰，两峰之间狭长的峡谷中有一条日军修筑的简易公路，这条公路是日军从河北向山西进攻的必经之路以及后勤补给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决定投入三个主力团，在这里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朱德特地将曾万钟、李家钰、赵寿山等将领安排在公路边的山峰上，请他们居高临下地现场观摩八路军如何打仗。

第一二九师投入的三个团是：第三八六旅的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以及第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作战部署是：七七一团为右翼，七六九团为左翼，分别埋伏在公路两边；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负责阻击可能由涉县增援的日军，保护战场的左翼；七七二团负责阻击可能由黎城增援的日军，保护伏击部队右翼后方。

“七七一团指战员绝大多数未见过汽车”，因此，听说这次伏击战主要是打日军的汽车后，官兵们都有点紧张。贫苦农民出身的官兵们无法想象汽车是什么样子，也不知如何对付那些轰然作响的家伙。于是，部队事先进行了关于汽车知识的教育，教给战士们如何打驾驶员，如何打油箱和轮胎。一切都准备好了，部队进入阵地后，情况突然变化了：数百名日军原因不明地绕到了伏击阵地的背后。副师长徐向前经过冷静的分析后，认为伏击行动并没有暴露，作战计划可以照旧执行。他告诉官兵们，你们尽管打仗，不要担心后面，七六九团和七七一团各留一个连，由我负责“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徐向前在官兵中威信极高，徐副师长亲自指挥掩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和政委吴富善回忆：八时左右，观察哨报告，公路上出现了日军车队，待数到一百八十辆时说后面没有了。

敌汽车过了下弯，进入河底，公路比较平坦，速度加快了。我们看到最后的几辆坐着六七十名日军掩护部队的汽车，刚到下弯，前面的七十多辆汽车已进入七六九团地段，急待出击命令时，突然听到“啪啪”两声枪响，抬头一看，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悬挂在上空，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向前副师长发出的总攻击命令。顿时，我们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响起“嘀嘀哒，哒哒嘀……”的冲锋声。我们的部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了下去，霎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随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我们的战士火速冲上公路，跳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公路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在汽车下面。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大家的决心是，敌人不缴械就坚决消灭他。跳下汽车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刺刀和长矛（新战士没有枪）刺死在地上。残余敌人向南山逃窜，被我南山的部队一阵猛打，又滚回公路上被消灭。就在我们七七一团紧张战斗的同时，七六九团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十一时，战斗基本结束。敌人的一百八十辆汽车和随车的一百七十多名日军，除了三十多个敌人乘我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空子逃掉外，其余的敌人均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都被我缴获。那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一百八十辆汽车一一点着。顿时，一团团黑色烟柱冲上几十米的高空，一百八十辆汽车很快全部被烧毁。这时，我指战员满怀胜利喜悦，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轻机枪和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挂着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日方关于这支运输队受袭的记述是：

该兵站的路线在陡峭险峻的山地，八路军到处出没。兵站第七十八汽车中队于三月二十七日的行动中遭到厄运，三分之一人员战死，四十五辆汽车全部被毁坏……中队长森本少佐率领一百三十人、四十五辆汽车，于三月二十七日晨从邯郸出发，向潞安运送军需物资。当日，武藤准尉以下五十人留守邯郸，检修二十多辆有故障的汽车。去潞安往返需要五天，行车路线横穿太行山脉，只有第一〇八师团的运输队穿行过这条公路，但从未发生事端。而此次该中队至预定返回的三月三十一日，车队竟杳无音讯。次日，四月一日，第五兵站汽车队松本中佐及下属留守人员接到急报后，立即在步兵支援下赶赴现场，只见到车辆全部毁

坏，一片激战后的惨状。原来，兵站七十八汽车中队三月三十日夜在响堂铺西方露营休息。三十一日晨，车队出发不久，即进入两侧山地狭路。前进中为遮断壕所阻，头车刚一停下，立即受到两侧敌人射来的弹雨。陆续到达的全部车辆，被敌包围，车辆被破坏烧毁。此外，后续的高桥队（兵站汽车队）同样遭到伏击。支援的步兵分队在队尾同行，战斗一直进行到午前，森本少佐以下六十二人战死。冲出血路的幸存者峰岛准尉以下七十人，无伤者不及本数。急忙赶到的留守人员眼含热泪，以悲愤心情收容伤员及阵亡者尸体。

阎锡山向蒋介石报告的战果是："响堂铺伏击山田、森本两汽车队，毙敌森本少佐以下四百余人，毁敌汽车百八十辆，缴获敌轻重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三百余支。"

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八路军如何作战，令阎锡山的将领们大开眼界。朱德现场点评道：打好伏击战，一要把地形选好，二要把情况判断准确，三要决心果断，四要担任打援的部队密切配合。

神头岭和响堂铺两场伏击战，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所为，可以说是动用了八路军的优势实力。但是，两场战斗中都有八路军战士使用"红缨枪"的记录。——使用最原始的武器，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军作战，还要打胜仗，八路军官兵需要付出怎样的勇气和牺牲？

或许，这才是令阎锡山的将领们真正惊愕的原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赴第十八集团军少将联络官乔茂材致电蒋介石："八路军抗战意志坚定，机动力大，为七九步枪弹缺乏，不能放胆作战。拟恳提前酌量补充，俾在华北牵制敌人，使津浦线我主力更易奏功。"

深感八路军严重威胁的日军，决定对晋东南发动大规模围攻，以消灭或驱除太行山区的共产党军队以及退入山中的阎锡山的部队。

为了迎战日军的进攻，中国第二战区决定，由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朱德统一指挥晋东南所有的中国军队。

此时，共产党著名的军事领袖朱德指挥的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部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曾万钟的第三军、李默庵的第十四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武士敏的第九十八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赵寿山的第三十八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王奇峰的骑兵第四师、山西新军决死队第

一、第三纵队等。

太行山中之所以仍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中国军队，是基于蒋介石三月八日下达的一道严厉指令：不准山西抗日军队的一兵一卒越过黄河，必须全部在敌后坚持进行对日作战。蒋介石所说的山西的抗日军队，主要是指阎锡山和卫立煌指挥的部队，因为八路军明确宣布其作战区域就是敌后战场，决不会渡过黄河跑到正面战场上去。如果没有这道严令的话，滞留在山西的阎锡山部和卫立煌部很有可能全部退到黄河以南避战。这是蒋介石万分担忧的。就华北的战局而言，只要山西境内仍有中国军队作战，日军就无法宣称控制了整个华北；就全国的战局而言，只要太行山战场还在作战，日军的后方就无法得到安宁，日军由此向西攻击西安并冲入四川的妄想就不会实现。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母亲。

四月四日，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了第一〇八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〇九师团、第十六师团各一部，在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指挥下，兵分九路向位于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及其他中国军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攻作战。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在沁县，因此沁县成为日军围攻作战的重心。日军九路部队的攻击方向和目标是：第二十师团的一个联队由洪洞进攻东北方向的沁源；第一〇八师团由长治、屯留、平定各出动一个联队，分北、中、南二路向武乡、沁县和辽县进攻；第一〇九师团的一个联队由祁县和太谷向南进攻沁县，两个大队由榆次进攻马坊；第十六师团一部由元氏、赞皇向西进攻九龙关，另一部由邢台进攻浆水镇，还有一部由涉县向西进攻辽县。

朱德制订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迎战。而共产党的将领如何指挥国民党的军队？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应采取爱护和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朱德和彭德怀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在战区兵力部署上，将八路军配置在第一线，友军配置在第二线”。

从四月十日开始，各路进犯的日军都受到了猛烈阻击。

在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的作战方向，从榆次发起进攻的两个步兵大队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秦基伟、赖际发支队阻击在寿阳、和顺一带无法前进；另一个联队占领祁县子洪镇后，陷入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以及八路军游击队的包围中，双方的激战持续了五天，日

军伤亡联队长以下千余人。在第二十师团的作战方向，日军的一个联队前推至沁源，被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以及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赵寿山的第十七师堵截，尽管日军最终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逼近沁县，但随即遭到八路军三个团的反击，日军向南退往安泽方向。在第十六师团作战方向，一个大队的日军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游击支队阻挡在九龙关附近，另有千余人被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阻滞于浆水镇；另两个大队的日军被王奇峰的骑兵第四师阻击在辽县东南——以上五路日军在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下，均没有完成预定的作战计划，被迫停止了深入晋东南的军事行动。

只有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的三路部队进攻到了太行山腹地：分别由长治、屯留北进的两个联队的日军，突破了曾万钟第三军的防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武乡、襄垣和辽县；由平定和昔阳南进的一个日军联队，在炮兵、工兵、辎重兵和骑兵的配合下向辽县发起进攻，遭到八路军秦基伟支队、汪乃贵支队和第一一五师曾国华支队的奋力截击，日军伤亡数百人，被迫多次改变路线，于十四日抵达辽县和辽县东南的芹泉镇。——此路日军是围攻作战的主力，指挥官是骄横的旅团长苫米地四楼。

苫米地旅团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武乡和沁县，这给八路军总部带来了巨大威胁。但朱德认为，苫米地旅团孤军深入，这也给八路军提供了围歼日军的战机。当时在榆社至武乡附近，有中国军队朱怀冰、曾万钟和武士敏等部。朱德命令曾万钟以一部在武乡边打边退，将第三军主力隐蔽在附近山地间，等日军通过武乡后追尾攻击，并与事先埋伏好的朱怀冰部实施夹击。但是，由于部队行动迟缓，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苫米地旅团不断地寻找八路军总部，又从武乡北进到榆社，进入榆社才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无人无粮道路也被破坏了，苫米地突然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立即决定退回武乡。此时，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已转移至武乡西北的义门村。朱德认为，苫米地旅团继续向南退回长治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决定打一场歼灭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奉命急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待机。四月十五日黄昏，日军果然放弃武乡企图连夜东渡浊漳河。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当机立断，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以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池漳河两岸的山地对撤退日军实施追击，并以七六九团沿武乡至襄垣的大道实施尾追。十六日清晨，七七二团追到长乐村，发现了日军侧翼警戒部队数百人，七七二团机警地隐蔽起来，这时日军的大部已经通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后面，歼敌的时机终于到了。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撤退中的日军转瞬间被截成了数段，大队人马和大量辎重被

压制在长乐村以西的狭窄河滩上。在两侧八路军的猛烈攻击下，日军欲战无力，欲逃不能，混乱不堪。

这就是八路军战史上著名的“长乐村之战”。

激战之后，日军在浊漳河河滩上留下了两千二百余具尸体。

八路军付出了伤亡八百余人的代价，其中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因头部中弹而牺牲。

苫米地旅团长战后受到了严厉处分。

由于日军深入太行山腹地的精锐一部被歼，其他参加围攻作战的数路日军闻讯纷纷撤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一口气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高平、晋城等十余座县城。日军在整个晋南作战中伤亡达四千人以上。从此，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支撑敌后战场的太行山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是敌后作战，敌后作战的首要条件是在敌后扎下根来，建立起稳固可靠的根据地。

中日战争爆发仅仅一年，在日军声称的占领区或控制区内，共产党武装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创建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种奇迹。

晋察冀根据地是共产党人在华北敌后创建最早的根据地。

最初，这片根据地指的是“同蒲路以东、平汉路以西，平绥路以南、正太路以北的察南、晋东北和冀西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到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地区”，甚至深入到辽宁和热河的一部分。该地域内山峦和平原相间，处在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关内的咽喉，扼守着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和津浦等铁路大动脉，是日军侵占整个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为使游击战的展开有稳固的根据地依托，八

路军将领罗荣桓、聂荣臻先后率工作团抵达晋察冀地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县内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下辖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辖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辖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王平，辖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辖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不久，中共北方局成立了晋察冀省委，在各军分区所辖地区成立了党的特委及县以下党组织。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位于太行山区内的河北阜平县，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一百四十九名代表出席，代表着根据地内三十九个县一千万以上的民众，大会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当日军进行徐州会战以及准备进攻武汉前，华北方面军的许多部队被编入了华中派遣军，以致在敌后形成大面积的空虚地带。中共中央发出了“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令，要求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即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推进至天津、沧州和石家庄附近；第一二〇师则向河北和平绥路以北发展；第一二九师向冀南和豫北展开。其中，第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由雁北进入平西”，与第一一五师的邓华支队会合，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随即攻占了北平附近的昌平、延庆、平谷等县城以及天津与北平间的宝坻、蓟县、丰润等地，令日军大为惊慌。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以及已经发展到数万人的河北游击军的基础上，编成了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了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政委，“开辟了西自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迄北宁路、南至沧石路，包括三十八个县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民主政权由此建立。

至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晋察冀根据地已建立起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和平北五个抗日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武装力量、政治影响和民众基础，几乎对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作为侵华日军最为重要的后方基地，日军的后方已经成为另一种前线。

共产党创建的晋绥根据地，包括晋西北和大青山两块地盘。一九三八年入夏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将宋时轮的雁北支队调往平西，第三五

九旅派往浑源、广灵地区，配合晋察冀部队建立恒山地区的根据地。之后，第三五九旅一部与地方游击部队共组大青山支队。同年冬，大青山支队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武装在平绥路以北地区不断捣毁敌伪政权，直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接成一片，创建出晋绥根据地。随着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向绥中、绥西、绥南和察哈尔地区的推进，晋绥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冀鲁豫各根据地之间极为重要的战略连接点。

晋冀鲁豫边区是共产党人在华北开辟的面积最大的根据地，包括了晋冀豫和冀鲁豫两大战略区。根据地西至山西的同蒲路，东至进入江苏的津浦路，南临黄河和陇海路，北接正太路和石德路，在华北和华中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梯形地带。经过了反击日军的大规模围攻之战，共产党人对这片地区的掌控日渐稳固，西起太行山、东至东海边，连日军都不敢声称那是他们的控制区。特别是在青纱帐茂盛的华北大平原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几乎深入到了河北的每一个县。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东进纵队一九三八年初进入平陆地区，占领了巨鹿和南宫，收编了部分地方抗日武装。三月，宋任穷率领骑兵团进入冀南，占领广宗、曲周、平乡、南和等县，在各县都建立起抗日政权。五月，徐向前率领第一二九师的两个团占领威县，把日军彻底赶出了冀南。六月，八路军又先后占领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永年、成安、肥乡等县城。七月，邓小平来到冀南领导根据地建设。八月，冀南八十多个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选举产生了抗日行政公署的领导机构。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的触角还深入到山东。在鲁西地区，共产党人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武装，展开游击战争。四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进入鲁西北，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开辟了鲁西北根据地。六月，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进入河南北部，与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联合作战，开辟了豫北根据地。同时，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各一部打入冀鲁边界，又开辟出一片根据地。从此，在山东与河南交界处的广大地区，由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这一年的夏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一部深入到山东腹地，与第一二九师的工兵连以及当地抗日民众武装，合编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十月，中共中央决定迅速扩大山东的抗日力量，第一一五师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全部进入了山东，之后，山东的抗日武装被统一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下辖四个旅和四个支队，兵力达到五万人之多。

这是中国军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时期。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不间断的敌后作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

日军的战地报道中充满了八路军在敌后袭击日军的消息。

八月四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部袭击朔县榆林车站，打的是火车。日军张家口通报部通报：

当时，车站有满铁职员三人，即站长熊谷范雄、青木传助、大桥八。加上昨夜从马邑方面撤回待命的警备列车司机川岛贞作、乘务员岩田宽二人……得知敌人袭击后，熊谷站长立即想向岱岳及朔县请求紧急救援，但电话线已被完全切断。为了匪袭报警时用的烽火，平时在站前铁轨对面备有很高的劈柴垛，但那里已经布满敌人，无法前去点火。站长立即命令发给全体站员子弹，护理伤员，部分士兵与铁路员工一致协力应战。然而，由于孤立无援，寡不敌众，虽已用尽全力，敌人却毫无畏色。

交战约一小时半，很遗憾，敌虽可能有很多伤亡，但我方不断出现死伤，已经难以支持。终于在四时二十分忍痛放火焚烧附近兵营及苇席房屋，以代替匪袭报警烽火。全体人员逐渐聚集在车站房舍内。可恨敌兵轻视我方人少，愈加狂暴，竟利用东北侧小厨房登上车站房舍的屋顶，从被迫击炮、手榴弹炸开的屋顶大洞投进手榴弹。车站房舍变成人间地狱，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可怕的喊声一直不断，满屋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炮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口眼难开。某军曹倒下，某上等兵负伤。充血的眼睛，只见前后左右尽是血人。熊谷站长终于也被手榴弹炸伤，自认无一人想活下来。然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子弹逐渐告罄，剩下的只有捷克造的子弹。青木匆忙将子弹装进子弹盒，各处奔跑分发子弹……

……四时五十分，准备完毕的救援列车从岱岳出发，车上载有某部队阿部少尉率领的几十名精锐士兵，还有铁路职工六名。然而由于夜间运行，破坏铁路是敌人惯用的手段。因此，强压焦急心情，列车时速降到十公里左右。行驶到九十公里左右处，开始挂上制动器，边警戒边徐徐行进，果然不出所料，在吃惊的瞬间，机车完全出轨。与此同时，埋伏的敌兵从右、前、左三个方向，一齐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击机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破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司机井田头部负伤，迫击炮弹打穿煤水车铁板，火星迸发飞溅，发出可怕的声响。此时阿部少尉立即命令全体人员下车，靠近十米后铁路两侧的

土堤，组成圆形阵地应战。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五十米、三十米、十米，有的冲到了五六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了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的战场。

没多久，“凄惨景象”再次发生，这次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所为，时间在九月二十日，打的是汽车。日本《大阪每日新闻》：

快速部队（队长所富造中尉）二十日上午十时从汾阳乘车去离石，车队穿行在山岳重叠、步步登高的天险之间。当车队临近该路最大难关王家池附近时，前方突然出现在此等候的八路军约一千五百人。他们正面构筑了机枪掩体，仅在二三十米近处开始向我猛烈扫射。地形对我军极其不利，道路左侧群山叠嶂，长满矮树，险峻的陡坡令人生畏；路右侧有数十丈断崖耸立，一步失足就会坠入万丈深谷。我军面对狂妄之敌，紧急刹车，奋勇应战。几乎与此同时，又有约一千余敌人从左侧山坡蜂拥而下，边打迫击炮，乱射机枪，边向我几十辆汽车冲去。隔着山谷的右侧山上，也有约五百敌人开始向我射击。我方寡不敌众，所队长见已到如此地步，万事皆休，即令全体下车，掩护兵用步枪，其他人用手枪，为夺取左边高地发起拼死冲锋，与数十名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我军终于占领了半山腰的高地，以此为据点，居高临下，向阻断道路之敌机枪阵地发起猛烈射击，顽敌放弃阵地退却。我军进而转向扫射山顶之敌，交火达五小时，勉强将敌击退。此时，敌已迂回到我后方迫近汽车部队，战况陷入危险，汽车掩护兵用手枪应战，努力守住车辆。然而，敌人的手榴弹密集如雨，我方全部负伤，弹药已尽，死亡不断增多。至此，已无路可走，含恨忍泪，自行焚毁汽车。该部队的木户逸郎上等兵、吉川求一等兵等五人与汽车共命运壮烈战死。负责掩护的山崎部队奥村三郎上等兵、大野部队井村实伍长也战死。急忙赶来救援的石田部队也有一人战死，九人负伤。

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开始，侵华日军不得不抽调出五万多兵力，专门围剿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官兵以艰苦的作战，不但令抗日根据地屹立不倒，而且有力地支持与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八路军连续作战，屡屡得手，这令阎锡山十分惊愕。他仔细研究了八路军的作战战例，发现利用特殊地形袭击敌人，本是没有更多奥妙的军事常识。——“我军对此种方法，人无不知，及其他种种袭击方法，亦无人不尽知。然何以八路军每次击敌，皆收奇效，我军则反是？”阎锡山命令他的将领“切实研究八路军的作战经验”，并通告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八路军屡屡打胜的根本原因，不是军事技巧所致，而是“聚精会神”——“事前无不竭尽全力筹划制敌之策，实施侦察战斗之术，临时置全军聚精会神

统一集结于主歼敌战方面，其他一切皆可不顾，故不动则已，动则胜。”

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中佐，战后著文分析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认为是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什么是“攻势战略”？

共产党崇尚的理论是：争取民心是最大的攻势战略。

就在侵华日军宣布他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晋冀鲁豫等省的时候，一九三八年的大半年间，共产党仅在山东就组织领导了抗日暴动达十次以上。每次暴动都带动了当地抗日民间武装和抗日地方政权的建立，每次暴动的结果都使日伪又失去了一片控制区。这一年的七月，共产党人在冀东平原上组织的抗日暴动规模更是惊人，暴动波及二十二个县，参加民众达二十万人以上，暴动后成立了拥有十万之众的抗日联军。——从最艰苦的动员基层民众、唤起地方乡绅的抗日热情开始，共产党人忍受一切困苦，不怕付出任何牺牲，用他们的热诚和勇敢顽强地争取着民心。民众的抗日激情被激活后，只要有人敢于领导，成百上千的人就会跟随其后，以致参加敌后抗战的民众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地主、爱国的商人以及地方名流，甚至还有伪政权里的警察和伪军。尽管日军动用了极大的兵力残酷镇压，但山岳纵横之中、平原辽阔之处到处是抗日的怒火，日军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维持住他们的后方？事实上，在整个华北，“嚣张的日军只能占领其火力范围以内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专门给蒋介石转发了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吕正操的电报——八路军第三纵队在国民政府编成的中国军队序列里是第一战区第一游击支队：

一、我军所控制冀中卅六县，地方政权早已恢复。复根据国民参政

会之决议，准备普选及建立各级参政机关。

二、我军所恢复政权各县，均已成立自卫队、游击队。所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之男女，均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三、军民合作精神甚为紧密，由于支持一年来冀中游击战争，足资证明。

四、现在职指挥下之武力约十万人，尚能人手一枪，唯机关枪较少，炮十余门，弹药极感缺乏。

五、给养由地方供给，因实行统筹统销办法，尚不感困难。

六、现时工作着重于津浦、平汉、北宁三路之破坏。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敌后作战对于中国抗战全局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几乎占侵华日军主力半数的兵力都已被牵制在了敌后战场，而日军占领的地区越大被牵制住的兵力越多，就越能缓解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巨大战争压力。因此，一些成建制的中国军队被派往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国统帅部还以极大的热情举办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官的游击战训练班，以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经验推广到敌后所有的中国军队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告诫各部队将领，最应该学习的是共产党军队领兵打仗的政治经验。

阎锡山给所属部队发过这样一封电报：

各部队：

将本部参谋张象山与新泽（绛）乡北董村村民谈话电示如下：

问：你村驻军好不好？

答：好。但是多啦，免不了有坏的。

问：你很年轻，为何不当兵？

答：我打算当八路军。

问：你为何要当八路军？

答：八路军好。

问：八路军什么地方好？

答：从前八路军驻在我们村中，给我们磨面、扫院、喂牲畜、抱小孩，好像一家人一样。

读了以上这种谈话，就知道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好，好的原因就是能与人民的同情。仰各级长官要切实注意，要做到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能存在的新军队为要。

在山西，八路军与阎锡山指挥的部队经常并肩作战，经常驻扎在一个村子里，相互来往，互相尊重。尽管阎锡山部的某些将领曾警告过官兵，要对共产党保持距离和警惕，但至少在抗战初期，两军发生摩擦的事件很少。在晋南，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同驻洪洞县城，第二十二集团军官兵对共产党队伍有着极大的好奇心：他们发现八路军点名时答“到”而不是像他们必须答“有”；他们发现街上的小贩卖给八路军的白菜豆腐一律半价，而卖给他们从不愿意打折扣；他们喜欢八路军总部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演出，特别是八路军的女兵个个都像穆桂英；他们爱听朱德等共产党将领的讲话，认为和拉家常一样，有真学问却没官架子；他们发现八路军之所以打仗不要命，是因为八路军的指挥官首先不要命；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八路军最高长官的“军饷”还不如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而且八路军每月的“军饷”公开透明：士兵一元，连排长二元，团长四元，从师长到总司令一律是五元。

一九三八年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特意来给朱德总司令拜年，他在讲话中说：

我很久想来看朱总司令及诸位同志，好多次都是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能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看见大家精神活泼，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谁都明白，把日本打走以后，我们才能建设好国家。所以，不管是军是民，大家的目标是把日本打出去，是把日本势力完全消灭了，使世界上没有了侵略人的国家，我们要在中国境内作一个世界上反抗侵略的模范！

刚才朱总司令提到忻口战争，我觉得非常惭愧。惭愧的是我们没有能够把那一些敌人完全消灭。那时，如果我们能把这一股敌人完全消灭了，华北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可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力量。但是，就整个来说，大家都以革命的立场说话，说坦白的话，我们在忻口的确打得不错；八路军也尽了很大的力量，像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那正是由于诸位的努力。

同志们，我们不能消灭几万敌人就算满意，今后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完，能得大胜利就是大胜利，能得小胜利就是小胜利，几千几百个小胜利，凑成一个大胜利，直到我们完全胜利，才达到我们最后的希望！将来我们在一个战场上，希望我们能够消灭更多的敌人！

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两军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正是日本侵略者最苦闷的时期——日本人知道，只要中国的两大政党紧密地团结在一个统一战线里，彻底征服中国就是无望的。

这便是日军攻击武汉时心绪复杂的重要原因。

就在日军即将对武汉实施最后攻击的时刻，一个更令他们焦灼的消息传来了：在武汉战场的后方区域内，又出现了一支共产党武装，这支武装在中国抗日军队的序列里被称为“新四军”。

“这个新奇的队伍，自开到江南以后，引起‘孤岛’（沦陷后的上海）上的人们热切的注意。”——上海的报刊不断地描绘着新四军的模样，试图让中国南方的民众对这支共产党武装有所了解：

新四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呢？他的编制又是怎样的呢？这至少引起了我们的两个联想：一、使人记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的“铁军”第四军；二、使人想到新四军与八路军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密切关系和历史的渊源。

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这是尽人皆知的；新四军也是由红军改编的，这却不为一般人所完全知道的。不过八路军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余剩下来的及从新招编过的；新四军的红军根本就没有到过西北，他们是红军西行长征的时候，留下来担任后卫及收容流散的部队，仍保留着它原来的存在，分散在豫、鄂、皖、粤、闽、浙、赣七省老根据地，由项英负责担任七省游击队总指挥。

留在这七省的红军实力，名义上虽然称为“游击队”，但实际上因主力已去，加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已经提出，故只算得是“游而不击”。中央方面也不曾加以积极干涉，所以这支有战斗历史而又甚为坚实的部队一直能保留到现在。在台儿庄大战前后，经由国共双方经过了许多时间的接洽改编，“新四军”的番号才能够正式成为国军构成之一单位，为民族解放战争而贡献他们的力量，并开始向各个作战目的地出发了。

中国南方最大的报纸《申报》如此夸耀地介绍新四军，或是特意为了让日军看到，同时也代表民众的一种期望。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上海《大美晚报》上的报道客观一些：

新四军活动之地域，东起南京，沿江而西至芜湖，北至长江以北，南至江南湖沼重山地带……彼等之活动，大抵于黑夜或黎明时为之。如强袭日本驻军，攻击日方运输船，破坏日方卡车，俘绑日军，炸毁日方之军火库，破坏桥梁及公路，日日从事牵掣日军之行动，予日军哨兵以极大之威胁。有时更乘日方大军之不备，而予以出其不意之突击……新四军并非为一种新异之军队。该军现二万人，分为四个支队，其中三分之二，皆为以往之红军。此辈皆为红军主力“长征”时所留落于后方者……红军之未被政府军所消灭，此点并不可奇；最可奇者，即红军之根据地及其组织，始终能保持不坠耳……项英所部红军之得以保持至今，亦由于当地人民之支持。盖于彼等为政府军重重包围粮食断绝时，一地之农民，往往以食物接济之，同时更为向导僻静小路从事突围……自西安事变之后，中央军固已停止其军事行动，但对南方之红军则仍不绝进行进攻之策略……项英当时曾请政府停止军事行动，并请朱毛转请政府停止军事行动，但皆无结果，战争已然在不绝进行中，甚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政府军仍未停止其进攻。至沪战爆发，南方红军请政府派往前方抗日，因而暂时成立停战协定。于是项英九月前往南昌，会见何应钦。至十月二日，军事委员会始许收编红军为国军，以广州暴动时之领袖叶挺为司令，是为“新四军”名目之由来。

由于南方红军分布的地域极其广泛，新四军成立后，国民政府下令：长江北岸的游击红军集结于合肥，长江南岸的游击红军集结于芜湖、屯溪之间，国民政府派车前往闽、浙、赣、皖、豫、湘、鄂、粤八省，以便所有的南方红军集合起来。——“唯此项集中工作，殊为艰巨，因其中与总部相隔距离，有在八百里以外，甚至有两千里以外者。”至一九八年四月，“在长江以北者，已集合者达百分之四十，在长江以南者达

百分之六十。人械皆由中央政府派人点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国共双方认可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受邀抵达延安，受到隆重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了叶挺，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起研究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诸项事宜。叶挺返回武汉后，经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规定：新四军独立建制，不隶属八路军，归战区统辖；军以下不设师和旅，辖支队和团，部队全部开赴抗日战场。同时，新四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敌后游击战的独立性原则，国民党不派人进入新四军。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三眼井，正式宣布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所辖一团团长傅秋涛兼任，二团团长张正坤；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所辖三团团长黄火青，四团团长卢胜；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所辖五团团长饶守坤，六团团长叶飞；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周骏鸣，所辖七团团长杨克志，八团团长周骏鸣兼任，九团团长顾士多，手枪团团长詹化雨。

军部辖直属特务营。

全军总计一万零三百人。

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首先在安徽舒城打响了阻击日军的战斗。之后，在巢县东南的蒋家河口伏击了日军的守备船队，又在南京至句容间伏击了日军南进的汽车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的另一支汽车队，同时夜袭南京以南西善桥的敌人守备队，破坏了南京至镇江间的铁路，致使交通“阻断三日”。由于日军兵不敷出，只能沿交通线驻扎于重要的城镇和车站，于是新四军控制了宁沪铁路沿线的大部分村庄。——新四军与日军“每日必有接触。据称在此六个月中间，新四军所杀伤之日军，达二千五百之多，并夺获日军步枪五百余支”。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频繁作战，令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为日军同样需要作战乃至大规模作战的另一条前线。这一前线上虽然没有大兵团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但无处不是令日军机械化部队毫无用处的游击战、袭击战、伏击战或破袭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文汇报》载：

日军侵华，耗资巨万，历时三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始攻下上海，继而占领京沪、沪杭各地。然其兵力所及者，仅几条铁路线和几座城厢而已，泰半丰沃的土地仍操于游击队手中。京沪各地郊外，游击队网密布四周，十分联络，势力浩大，到处放有步哨。除身穿灰布制服，雄赳赳气昂昂，手握来复枪或盒子炮的游击队之外，甚至在田畴中割稻的农夫，小河中打桨划舟的乡下土老，实际上便是正式游击队的化身，若辈一有消息，马上通风报信，于顷刻间即能全部皆知，遂预先从容加以严密防范。故而日军之于游击队，休想有得逞的机会，反而时时诚惶诚恐。如欲经过游击区域，非大队人马绝不敢冒险通行。入夜往往枪声不绝，城内日军闻而丧胆，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日军兵力有限，仅能依仗优良之武器死守城厢，倘思大举出击或歼灭中国军队，不啻自陷绝境，反被各路游击队群起包围，一鼓而歼之。

苏联《莫斯科新闻》刊文称：“日本在后方和前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去年秋天，《泰晤士报》曾明显地称日本的占领是‘名义上’的。到现在，这种事实，自认更真确了。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占领’也只限于主要铁路线两旁的窄狭地带。接近铁路线的广大的领土，完全在游击队的手中。他们日益加多并且更有效力地袭击日本的交通线、军事运输、军队的分队和当地的驻军。在目前尤其是如此……第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之所以说日军对中国的占领是“名义上”的，指的是侵华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

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

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

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兵力甚微，武器简陋，尚不具备与日军现代化师团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但是他们于广大的敌后战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创建扩展抗日根据地，不惜代价不间断地战

斗，为的就是把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变成前线，令敌人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为其侵略付出代价。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就在日军孤注一掷地向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武汉推进之时，毛泽东再次向共产党高级干部发出通电，再次强调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应该把握的“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的“总方针”：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

中国举国保卫大武汉的时刻来临了。

第十四章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至少在九江失守后，中国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如果日军执意进攻武汉，固守是极其困难的，以至最终难以守住。

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路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视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这就是说，保卫武汉，“须守备其外围要域”；若外围要地尽失，则武汉即失去屏障，“其本身无险可守”。

然而，至少在九江以东，长江沿岸“要域”已落入日军之手。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沼地带尽力实施防御作战，固守的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内：“第五、九战区沿江部队须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阻塞尤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当时，中国的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因此，蒋介石要求两战区在武汉会战的同时考虑到今后的作战：第五战区须“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后方依托，第九战区须“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后方依托，密切“注意襄阳与宜昌及南昌与长沙之间之交通线。以后两战区之联络线应以宜昌为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武汉会战兵力使用的整体把握是：“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

上述战略预想基本符合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势。

只是，一九三八年的酷夏，当日军逼近武汉之时，中国人的心理还是备受煎熬。

就政治军事而言，武汉显然不可轻易放弃，因此，蒋介石不惜损失百分之六十的兵力防御固守。可就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而言，死守型的防御战究竟能够打多久，是否会重演南京保卫战的惨痛往事？如果真的损失兵力达一半以上，中国有没有能力迅速恢复？一旦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将如何在西南一隅撑持其政权并保证指导战争的权威？中国富饶的东部和中部丢失后，国家支撑战争的政治、经济和资源能力从何而来？更为重要的是：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理解并相信，南京和武汉的相继丢失，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顶之灾，而是战争实现转折的另一种历史契机？自日军发动对武汉的攻势以来，中国军队已经苦战了两个月，官兵伤亡数字惊人，补充供给杯水车薪。国民政府有限的财政几乎全部用在了购置军火上，以至于前线的作战部队衣粮短缺、伤员难以转运。长江沿岸天气酷热难捱，患病和中暑者日益剧增，特别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兵，一旦病倒就不得不撤离阵地。——打仗是要靠士兵来实施的，那些在阵地上苦熬的官兵，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切实履行作战职责？他们是否还有足以支撑一场会战的牺牲精神？

六月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地，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沿江夹击突进之敌。"其指导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之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瑞昌至武穴）及木石港西进之敌。""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十三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三师、五十五师使用于九战区与敌决战。最后应固守核心阵地，使两战区野战部队得重新部署，向敌夹击。""第一、二、三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第三战区沿江要塞炮兵更应排除万难，妥为部署，俾发挥威力，截断敌舰长江联络线。"

至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日军已完成制订作战计划、扩大集结地域、修建前进机场、轰炸中国战略要地等攻取武汉的一切军事准备。日

军第二军的第十、第十三师团集结于安徽庐州（今合肥）地区；第十一军的四个师团和一个旅团集结于江西九江地区，其中第六师团在黄梅附近、第一〇六师团在九江以南、波田支队在九江以西、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东南、第九师团先头部队连同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指挥部进至九江。而海军航空兵也已进驻安庆和九江机场；海军舰只在长江中下游集结完毕；空军的三个飞行团分别抵达了庐州、安庆和南京等机场。

日军攻取中国武汉的态势已不可逆转。

日方对中国战场的情势判断是："蒋介石认为此次会战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因而倾注最后努力确保武汉。但其决心并不巩固，其内心为在本次会战后仍能保存自己的势力而煞费苦心。"对于中国军队即将投入的兵力估算，日方认为是九十个师，但"其中大部，都是在过去数次会战中吃败仗的部队以及训练不佳的新编部队"。其中位于长江北岸的中国第五战区威胁不大："白崇禧以强大的一部配置在大别山脉以北地区，准备从该方面向我采取攻势。主力集中在该山脉以南地区，沿扬子江北岸前进，对我稻叶部队（第六师团）进行反复攻势，但其攻击能力不大，因受该部队的反击，正败退中。"而来自长江南岸的中国第九战区的反击则应给予重视："对于来自扬子江两岸地区的松浦、波田两部队采取攻势的敌人，将主力集中在前线，企图使该两部队受到挫折，同时陆续向阳新、吴宁、南昌方面增加兵力，有分数段进行抵抗的企图。"日方估计，中国空军可以投入武汉作战的"破损飞机和组装进口飞机"，数量大约为"二至三百架"。

大战在即，看似准备就绪，但日军的将领们仍有焦虑之事：极度的暑热中，上一阶段的作战每每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部队推进困难，伤亡严重，加之患病者增多，各部队都出现减员，亟需新兵补充。而从国内抵达战场的新兵，于酷热潮湿中乘船长途行军，不免因极度的水土不服导致身心疲惫、情绪低落。

一名日军前线士兵写道：

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里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了茶色且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一八八号”、“大海令第一三五号”和“大陆指第二五〇号”，命令华中派遣军对中国武汉发动全面进攻。

当日傍晚五时，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

……

二、军的意图在于与海军合作攻占武汉地区要地，同时以消灭途经各地之敌，以挫伤敌之继续作战士气。为此，首先应自大别山北麓地区及扬子江上并其北岸地区，依次向西获得地盘。在扬子江南岸方面应将兵力集中到九江西南地区，然后切断京汉及粤汉铁路，做好直接攻占武汉三镇的准备。

三、第二军于八月下旬自现在集中地开始行动。当击败途中驻在之敌后，应继续首先进入光州、商城一线，而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北侧地区前进。

四、第十一军在扬子江及其北面地区，依次向西获得地盘，同时击败当面之敌，大致继续前进到瑞昌、德安一线集中，伺机占领永修附近。准备从九月中旬向武汉三镇及以南粤汉铁路一线前进。沿扬子江作战应与海军配合。

五、航空兵团应以主力配合第十一军，以一部配合第二军的作战，以资扩大其战果，细节可直接与两军协商。

又，协同海军，大致在影响地面作战的地区内应投入飞机，摧毁敌空军力量和攻击敌要冲。

六、华中港口监理部应仍在扬子江，担任船舶输送任务。

又，为了配合第十一军作战，在彭泽以西担任船舶运输的官员，应受该军司令官领导。同时为该军溯江作战指挥下的部队和资材各一部，编入第十一军指挥下。

……

上述部署，意味着日军将兵分四路同时向西，以便对武汉形成围攻之势。其中间的两路将沿着长江南北两岸齐头并进：第六师团在北岸，

目标是广济、田家镇要塞方向；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在南岸，目标是富池口要塞方向。同时，在长江以北的大别山方向，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向西突击，目标是占领河南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从北面包抄武汉；而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方向，第一〇一、一〇六等师团向西南突击，突破德安等地，从南面沿着粤汉铁路北上包围武汉。

就长江水道上的要塞而言，田家镇要塞是护卫武汉的最后屏障，而广济城南倚长江、北屏大别山，乃田家镇要塞的正面屏障。日军第六师团占领黄梅后，由于官兵伤亡以及患病太多，被迫停止进攻。八月二十三日，接到第十一军攻占广济的命令后，师团长稻叶四郎认为，第六师团的补给如果设定在安庆、潜山、太湖、宿松这条陆路上，不但运输线太长，易受到中国军队截断，且派出大批部队保卫补给线又会影响作战。于是决定利用鄱阳湖水路从长江上的小池口进行补给，并因此放弃了潜山和太湖，将主力向南移至宿松、黄梅地区。日军的这一移动，引起了白崇禧的注意。中国军队迅速收复潜山和太湖后，白崇禧决定趁第六师团立足未稳，在这个方向对日军发起攻势。——日军没有想到，沿长江北岸的进攻还没正式开始，便遭遇到中国军队的主动反击。

广济方向的中国守军是第五战区李品仙的第四兵团。

李品仙的反击部署是：第八十四军附第一七六师及第六十八军第三十一旅，向黄梅进攻；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一六一、第一六二师收复多云山、白杨岭阵地，切断宿黄公路（宿松至黄梅）；炮兵第六团协助第八十四军进攻；第二十六军、第六十八军以及第一三八师在龟山、团山河、笔架山、大河铺、排子山一线占领阵地；第八十六军为兵团预备队。

二十八日，李品仙各部按照作战部署发动了进攻。猝不及防的日军第六师团顿时陷入被动，前沿阵地不断失守，中国军队步步紧逼，最后日军被迫放弃宿松，向黄梅撤退。二十九日，中国军队继续进攻，第六师团主力在黄梅地区拼死防守。三十日，日军两个装甲车中队的增援部队抵达。于是，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在黄广公路（黄梅至广济)北侧、第十一旅团在公路南侧，并行向广济实施进攻。同时，日军出动了大批战机，对中国军队和广济县城实施狂轰滥炸。黄梅至广济直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中国军队第六十八军和第八十四军与日军在这片狭窄的地域里展开了残酷的阵地争夺战。

第六十八军原是山东部队，在日军施放毒气弹后，第六十八军官兵

仍然坚守阵地不退，前沿一个营四百多名官兵全部战死。

第八十四军是广西部队，由原驻南宁、横县、贵县等地的独立团编成，军官们也是临时从军校凑起来的：军长覃连芳、副军长徐文明、参谋长钟纪均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员；而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和副师长刘建常是军校步兵科的战术教官，第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则是从安徽前线临时调回来的。由于是桂军，白崇禧格外要求第八十四军必须努力作战，在初战中给广西人争面子。

桂军以作战凶狠闻名，第八十四军果然打得顽强。第一八九师在防御大洋庙山口阵地时，日军的飞机实施了密集轰炸，前沿阵地和战壕几乎被夷为平地。但第一八九师官兵依旧利用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迫击炮和机枪的作用，将大量日军射杀于阵地前沿的开阔地上。日军攻击受挫，便向大洋庙山口阵地侧翼的一个小高地迂回，企图对中国守军阵地构成火力威胁，于是与拼死阻击的中国守军发生了残酷的拉锯战。最后时刻，第一八九师一一〇六团团长意志崩溃，率部连夜撤离阵地，躲到了大洋庙山口后面的山沟里。可是，尽管一一〇六团的阵地战壕里已空无一人，日军竟然仍不敢突进，而是去绕攻第一八八师的阵地。

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指挥作战经验不足但战斗热情很高，他命令两个团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击。由于协同联络不佳，加上当面敌情不明，两个团遭遇日军密集火力的严重压制，尽管投入了预备队使两个团解困，但成片的中国官兵已遗尸于日军架设的铁丝网下。在区寿年的第一七六师前来接防后，第一八八师成为预备队，但在第一七六师出现危机时，第一八八师副师长刘建常亲自率部前去解救，结果解救部队又陷入阻击日军的重围。——第八十四军的两个师都打得很苦，官兵们虽然作战意志顽强，但部队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第一八八师被迫撤退时，竟然一下子撤到了军部的后面。军长覃连芳怒不可遏，将第一八九师擅离阵地的一一〇六团团长黄伯铭就地枪毙，并把指挥作战不力的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交给了第五战区军法处置。

在日军持续的凶猛进攻下，中国守军逐步退至二线阵地。

在广济前线指挥作战的李品仙苦不堪言。

九月三日，李品仙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他的防御正面过于宽大，预备队已使用殆尽，前线部队伤亡惨重，加上酷暑导致疾病流行，部队几乎就剩不下多少人了。而更令人愤怒的是，附近的友军不听命

令，所有的增援都行动迟缓：

……敌分数纵队向我八十四军及刘军团（刘汝明部）正面昼夜猛攻，并以优势之空、炮轰击，我军在破山口、塔儿寨、恶席寨、双城铟、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时我军炮兵因敌空军之轰炸及射程之短近不能制压敌炮，加以工事不良，以致我军伤亡惨重。截至本日止，八十四军损失已达二分之一以上，一七六师伤亡亦在二分之一附近，刘军团之一一九师及三十一旅，据刘军团长报告每团仅剩二三百名，合共不过千余人……八十四军病兵亦占四分之一以上，敌虽未能深入，该两军战斗兵员均不足维持正面之阵线。萧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须任田家镇侧背之守备，未便抽调，仅将大金铺以东至吴文贵刘军防地交由萧军抽部接防，俾刘军得以集结兵力固守现在阵地。但萧军之正面又复过广，兵力单薄，一旦龙坪方面有事，必易为敌突入。二十九集团军，在二郎河、渡头桥之线，始终无大敌情，本拟将其主力集结，由东向西侧击后山铺、大河铺敌之侧背，牵制当面之敌，而该军行动延迟，发令后至今尤未动作，对于协同精神，殊欠恰当。三十一军由英山赶调两师前来增援，昨日仅到三团。我正面之阵线，昨日为敌攻占，各点已无余力反攻，若再勉强出击，兵力损失更大，恐以后全线阵地，恐难确保。因此不能不调整阵线，已于昨晚十二时将正面阵地撤回第二线阵地……

尽管日军第六师团付出很大代价，但仍在强行推进。中国守军退守二线阵地后，李品仙命令第四兵团所属部队轮番对日军的正面和侧面进行反击。九月三日，第一六二师进占杨树岭、破山口后向英山嘴进攻，第一六一师则向大河铺出击，第四十八军配属的第一四九师向渡河桥推进，第一七四师准备进攻黄梅。日军第六师团以一部掩护黄梅附近的后勤补给线，主力沿着黄广公路不顾一切地向前猛攻。李品仙致电蒋介石：“今晨四时半起，（敌）复以四路分向我蓝家湾、刘朝二、大佛寨、杨湾冲、田家寨、生金寨、后湖寨轰击，平均炮击每分钟二十发，飞机轰炸迄今未停，各路均有敌数千，我生金寨阵地于八时、后湖寨阵地于十五时失守。田家寨阵地于十七时陷敌包围，现正分令反攻中。”日军继续向卓木尖推进。奉命增援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六军全部抵达战场后，李品仙立即命令这两支桂军部队向日军的侧背实施夹击。第三十一军一部五日凌晨向生金寨附近的日军发起攻击，两个小时后攻占了几个高地，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天亮后日军发动反击，中国官兵被迫撤回原阵地。第二十六军以第四十四师固守原阵地，以第十二师配属一个山炮排和一个战车连，于五日凌晨攻击凤凰山的日军侧背，当晚突破

日军阵地，占领了狮子山和凤凰山。但是天亮后，在日军战机和炮火的猛烈轰炸和轰击下，凤凰山阵地也被日军夺回。

八月三十日，日军第六师团牛岛满少将指挥的以步兵第三十六旅团为基干的牛岛支队，今村胜次少将指挥的以步兵第十一旅团为基干的今村支队，在二十余门火炮和八架飞机的助战下，分别沿着黄广公路及其以南地区向西对广济发起夹击，而第六师团其余部队则绕至广济北面实施围攻。

广济全线危急。

焦灼万分的李品仙再次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表示部队伤亡惨重，仗已无法再打下去："现在各军因连战一周之久，　伤亡过重，约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预备队均已用尽，第二线兵团仅剩曹福林军。若以之再填补前线，恐缓急间已无兵力可用，应如何处置？乞速训示。"

九月六日，日军第六师团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

经白崇禧批准，李品仙部于二十二时弃守广济。

日军第六师团经过八天的苦战占领了广济，但部队伤亡严重，无力继续进攻，只好就地构筑工事等待补充。

黄梅、广济地区，是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第一线重要阵地，为此中国方面先后调集了川、鲁、桂三省的五个军拼死防守，结果还是以广济失守告终。而这一结果，致使沿长江西进武汉的最后屏障田家镇要塞被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下。

纵观广济作战，中国军队不可谓不舍命，战斗意志不可谓不坚定，重要问题依旧出在作战指导思想。尽管一再说要灵活机动地组织防御，避免固定阵地的死守，但打起仗来仍是只会打以守阵地为主的防御战，把主力固定在阵地上与敌人拼火力耗实力；同时，分属于不同派系的各路军队，极其缺乏协同配合的意识，常常是彼此近在咫尺却照旧各打各的。为此，白崇禧专门就广济作战致电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若不改变这种战法和现状，抗战的未来堪忧。——实际上，这也是对蒋介石指挥作战观念陈旧的一种委婉的提醒：

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重。且在敌炮、空威胁之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则以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

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若部队脆弱，则辄三、二日即不能成军，乃战术无灵，指挥棘手。职身临前方，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一年以来，计划作战者，率以装备相等之战术，因袭而用，原则未尝不合，胜利卒归泡影。尤以积兵愈多，损害更巨，实力消耗，远逾于敌。设非改变战法，不但胜利难求，且恐持久不易……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联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积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机变被动为主动，将士乐于效命，抗战可期长近延迭。据探报，敌拟集中各地兵力，求于武汉行大决战。证以寿县敌数百汽艇之西进及江轮运兵之上驶，其企图甚大，未可忽视。在战略上果应如何应付，乞早为策定，俾南北各战场资以实行，深为迫切之需要。谨贡所见，用备采择。

白崇禧所见极为精准。

抗战一年来，中国军队之所以屡屡败退，除了武器装备、作战素能的悬殊差距外，最为重要的是战争之战略战术的落后。

就在日军第六师团于长江北岸向西攻击时，在长江南岸，日军攻占瑞昌后，自八月二十七日始，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分别沿着长江以及瑞昌至阳新的公路向西进攻。首先接敌的是川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连失鲤鱼山、新塘铺等要地，九江至南昌间的南浔路正面防御出现危机。薛岳命令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黄维的第十八军以及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实施反击，初步遏制住了日军第九师团的进攻势头。九月七日，冈村宁次命令第九师团和波田支队攻取马头镇和富池口要塞，以支援长江北岸的第六师团作战。中国守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在瑞昌至马头、瑞昌至武宁、瑞昌至阳新三条公路上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至十二日，双方都付出重大伤亡，但中国守军依旧扼守着一线阵地。日军集中兵力在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再次发动猛攻，十四日，波田支队主力突破中国守军防线抵达马鞍山附近，其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与中国守军激战八昼夜，最终日军投放毒气弹后占领马头镇。接着，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继续推进，近逼富池口要塞。

富池口，继马当要塞之后长江南岸的第二个要塞。要塞的东、南、西三面都有环形山地层层屏障，北面是水流湍急的长江，江面狭窄弯曲。与富池口要塞相对，在长江北岸，便是军事重地田家镇。从地形上看，要固守富池口，必须坚守三面的山地，只要山地阵地不丢，要塞便

能稳如磐石。

当日军攻击到富池口时，防御要塞的中国守军不可谓不充实：从前线退下来的张轸的第十三军、张刚的第九十八军、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以及要塞守备军霍揆彰的第五十四军。多达六个军的中国守军由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统一指挥，面对的是日军的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利用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中国守军与日军血战多日。特别是在瑞昌以西的仙女池附近，日军第九师团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攻势受制。但沿江西进的波田支队在海军舰炮的配合下，对富池口中国守军核心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击。核心阵地守军是第五十四军第十八师。最后时刻，当日军从陆上和江上发射毒气弹后，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向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请求撤退，但遭到严词拒绝。张发奎严令李师长再守三天，并告诉他第二兵团司令部就设在大冶县城西南面的山上，已沿着公路派出了督战队，无论是谁擅自撤退，就地枪毙。第十八师苦守三日，除富池口东南山头阵地依旧在手外，其他方向高地的数层防御阵地均被日军突破，整个要塞都已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下。李师长再次请示兵团，言如无增援必须撤退，可张发奎的命令是：第十八师还要再守三天。二十三日夜，身为师长的李芳郴“坐一小划子渡网湖，向阳新城方向逃走。师长逃遁，兵无主将，顿形慌乱”。

当晚，第十八师残剩官兵破坏了要塞的主要设施后，拆除了网湖通向长江的浮桥，撤离要塞。

富池口要塞的陷落，令与之相对的江北军事要地田家镇顿陷危机。沿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第六师团，在广济作战后原地休整七天，补充了三千二百新兵，并得第三师团一部的加强以及海军第十一战队的配合，当长江南岸的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逼近富池口时，九月十五日，第六师团部队开始向田家镇方向攻击前进。

田家镇背靠丘陵，面向大江，地势险要，是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军事堡垒，扼守着西去武汉的长江水路。八月六日，蒋介石亲自打电报给要塞指挥官李延年，要求守军要与田家镇共存亡：

……查田、富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其地位重要，勿待多言。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徇我国最坚之要塞。查各该部乃国军精锐，其各激发忠勇，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久固

守，以利全局，以扬国威，并晓谕官兵共体兹意。

中国方面在田家镇要塞附近布防了大量守军：在田家镇南、东、西面共有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何知重的第八十六军、李延年的第二军以及郑作民的第九师和张珙的第六师等部队。直接防御田家镇核心阵地的，是施中诚的第五十七师、原要塞守备部队杨宗鼎的第一七一旅以及炮兵十六团。第二军军长李延年为要塞总指挥。

九月十五日，日军数十架战机、二十余艘战舰向田家镇要塞猛烈轰炸和轰击，日军海军陆战队一部企图在潘家湾、中庙、玻璃庵一带登陆，被中国守军击退。日军第六师团攻击田家镇的地面部队，主要是重新编组的以步兵第十三联队、独立山炮第二联队主力、辎重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等部队为基干的今村支队。十五日晨，今村支队在海军的配合下攻占中国守军第九师的铁石墩警戒阵地。但之后遭到的抵抗之烈出乎预料，在中国守军第二十六军、第八十六军和第二军的联合阻击下，今村支队的攻击没有丝毫进展。第二天，日军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和舰炮的支援下，再次试图在潘家湾、玻璃庵登陆，被施中诚的第五十七师击退。下午，李延年决定缩小正面：第五十七师的主阵地改为前进阵地，主力移至周家、苍谷垴、乌龟山、沙子垴、老鹳窠一线开设主阵地；要塞核心守备部队和炮兵十六团归第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指挥，独立炮兵六营协同第九师和第五十七师作战。第五十七师按照李延年的命令，把防守田家镇东南方向的一个团调回来做预备队，只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日军。十七日凌晨二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在舰炮的支援下再次登陆，中国少量留守部队与日军展开拉锯战，付出伤亡百余人的代价。突围之前，官兵们掘开了广济以东的长江江堤，长江水灌入武山湖和黄泥湖，日军海军陆战队被洪水围困，行动受阻。

十七日，天降大雨。天上日军战机受到影响无法起飞，地上洪水一片致使日军炮兵无法移动，今村支队在中国守军的顽强阻击面前陷入粮弹两缺的境地，但仍强行发动攻势。拂晓，中国守军第九师正面阵地被突破，守军退守骆驼山一线阵地。十八日晨，今村支队继续进攻，骆驼山阵地又被突破，中国守军第九师再退香山、竹影山和潘家山一线。下午，日军攻击香山，中国守军一个连全部阵亡，阵地陷落。

此时，为了指挥作战便利，田家镇要塞北岸所有中国守军被划归第五战区，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负责指挥。

李品仙深知责任重大，也深知现有部队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为

此，他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大有“丑话说在前头”的含义：

窃查鄂东方部归职指挥者共有十军，现萧之楚、何知重两军已令南下，协同李军（李延年）作战，王缵绪部内容复杂，指挥不灵，已失作战效用，至曹福林军，病员最多，刘汝明军参战之后，现在前方服务者均不过二千余人，三十一军一三八师已开麻埠，其余两师自经太湖及广济两次会战，损失甚大，现有兵力不过四千人，八十四军原仅两师，现每团仅得五六百人，以上各军似应速调后方或加编并、或事补充，恳祈核夺。目前勉强应战者，惟第七军及四十八军各两师而已。依目下情况，敌以一部死守广济，我军屡欲围歼，尚未奏效；若敌增援改取攻势，则更难应付。为求巩固鄂东防务起见，拟恳迅派精锐赶速调防为祷。

蒋介石无力再抽调出“精锐”部队增援田家镇。接到李品仙电报的第二天，他致电中国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各级将领并田家镇防区指挥官李延年，严厉警告了那些消极避战、观望不前、贪生怕死的将领：

溯抗战以来，赖我全军将士敌忾同仇，忠勇用命，万众一心，屡予敌以重大打击，粉碎敌人“速战速决，三月亡华”之企图，提高国家民族国际上之荣誉，足证精神一致，克服万难。当兹敌寇深入，攻我武汉，我军第三期会战展开之际，凡我官兵，更应如何破碗，协同歼敌，挽回局势。乃近查有少数部队，或对敌情侦察不明，或对友军支援不力，迹近观望，予敌各个击破之好机，无异坐以待毙，影响全局，殊堪痛恨。须知唇亡齿寒，非团结不足御敌，惟协同乃可致胜。特此令仰各该指挥官咸体斯旨，并严令所属切实遵照，继续努力，共同奋勉，为民族国家之生存，争取最后胜利为要。如再有互相推诿、观望不前，致失机宜，定予严惩。此令。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中国守军各部队开始对日军实施反击。

长江北岸的今村支队终陷求告无门的境地：“在支队主力前面的敌主阵地有两道铁丝网，关键部位设有水泥碉堡，而且还有数道坚固阵地。从十八日晚，敌向支队的侧背攻击非常活跃，十九日敌从蕲春方面又增加二千人，第十三联队第三大队继续苦战。支队长用后方部队编成步枪部队，担任防御。二十日，后侧之敌又有增加，不断伤亡，形势危急。支队长从主力部队中抽出步兵中队增援后方，并命令山炮中队支援。由于激烈战斗，支队的弹药、医疗物品极感不足。前方的田家镇要塞也有炮击，支队遭受三面围攻，只东面湖沼地带开放着。”

为救援陷入困境的今村支队，师团长稻叶四郎派出第四十五联队第二大队前往增援，但被中国守军第一〇三师阻击在四望山；又派出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率四个步兵中队、两个山炮中队、一个工兵小队和一个辎重兵小队前往增援，又被中国军队第一二一师阻击在铁石墩。无奈之下，日军航空兵第十二战队冒着恶劣的天气强行起飞，飞到黄泥湖上空给今村支队投放军需物资。——“二十一日午后，劈开云雾空投下来医疗药品及一百发山炮弹，使支队得到补充，愁眉稍展。”

二十二日，今村胜次派出一个大队向铁石墩方向突击以接应增援部队，同时以主力猛攻乌龟山、沙子垴阵地并释放毒气。乌龟山阵地的中国守军两个连苦战后突围，阵地被日军占领。增援的日军第三十六旅团黄昏时分攻占四望山，两个连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二十三日，日军独立工兵中队的数艘装满弹药和粮秣的铁船，终于艰难地驶过了中国军队制造的洪水泛滥区，抵达今村支队所在的黄泥湖畔。铁船将补给卸下后，将六百八十名死伤人员运走。得到补给的今村支队全力攻占铁石墩，然后向中国守军的侧背实施攻击，突破了第一二一师的阵地，袭击了第一〇三师的指挥部，占领张家湾。二十四日，田家镇遭到日军飞机和舰炮更为猛烈的轰击。形势危急之时，李延年从第九师抽调出一个团归第一九八师指挥，加强了马口湖北面的防御；李品仙则命令第一七四师火速增援第二十六军，以阻止日军第三十六旅团的突进。

田家镇战局开始恶化。

日军在数十架飞机的助战下，由黄泥湖向中国守军第九、第五十七师阵地发动持续攻击。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亲临前沿指挥作战。日军的轰炸给中国守军造成了巨大威胁，中国官兵用机枪对空射击，甚至迫击炮也破例对空开炮，一架日军战机俯冲时，正好撞上一颗飞行中的迫击炮弹，飞机凌空爆炸，中国守军的阵地上欢声雷动。第九师第二十七旅官兵在与日军的白刃肉搏中，营长以下军官伤亡六十多人，士兵伤亡多达近千人。——“五十三团重机枪一连少尉排长袁次荣，在弹药用尽全排士兵严重伤亡的情况下，眼看他的阵地就要被敌人攻占了，他一个人把阵地上的手榴弹收集在一块，接连向进攻的敌人投掷，敌死伤数十人。敌人发觉阵地上只有他一个人，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袁排长毫无惧色，从容打开重机关枪的机匣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放进机匣，拉断火索后，用双手将枪身紧抱，轰的一声，阵地上顿时血肉四溅……”二十六日拂晓，日军火炮和舰炮向田家镇要塞核心阵地连续炮击三个多小时，而后日军第三十六旅团和第十一旅团部队向中国守军阵地实施合击。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伤亡巨大，李延年一面派兵增援第五十七师，一面命

令第二十六军对日军实施侧击以为策应，但是第二十六军因行动缓慢致使战局无法转变。

二十七日，日军两路夹击部队会合了。今村胜次集中起四千多兵力向中国守军的主阵地发起攻势。星家山阵地中国守军团长负重伤，营长伤一人亡一人，官兵突围而出的仅四十余人。日军继而连续突破中国守军第九师的胡家山、鸭掌庙阵地和第五十七师的乌龟山、下郑一线阵地。同时，日军海军第十一战队在盘塘附近成功登陆，开始沿江岸向田家镇要塞的象山炮台进攻。

田家镇要塞已被日军三面包围。

二十八日，日军陆、海、空军协同猛攻田家镇核心阵地。海军陆战队集中了上百门火炮，空军出动战机达八十余架，田家镇核心阵地落下两千多发炮弹，中国守军的所有工事都被摧毁。激战延续到下午，要塞制高点玉屏山被日军攻占。

二十八日晚李延年下达放弃田家镇要塞的命令。

二十九日十一时三十分，田家镇要塞陷落。

田家镇要塞防御作战持续十五天，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同时也给日军极大的打击。日军第六师团九月三十日电报："截止，战死二百八十四名（内将校七），负伤八百六十名（内将校十五），合计一千一百五十名；预料还要增加。"

关于田家镇要塞失守的原因，要塞守备司令杨宗鼎给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

一、本区外围守备军（第九师、第五十七师）因伤亡过重，被敌强力压迫，与核心守军失去联系，敌得任意攻击核心阵地。

二、工事未得全部完成。宗鼎于七月九日兼任田塞司令职，当时接收永久工事计二十个，野战工事全未动工，当即区分工段严饬日夜赶筑野战工事，于八月下旬将对武穴方面主阵地各线完成并同时完成对江面之工事。九月初旬开始构筑对北面及西北面山上之工事，其正面宽约七千公尺，全线均为岩石（永久工事仅有五个），施工困难又兼材料缺乏，迄剧战时，工事仍未得完成。

三、地区的守备兵力不足。查本核心阵地对武穴方面右自上公大堤起，左至后壁山（不含）止，其正面宽约三千公尺；对江方面右自冯家山西端起，经盘塘沿大堤，左至上公附近止，其正面宽约六千公尺；对北及西北方面右自郭家冲东口起，经黄谷脑、立儿脑、阳城山、杨树坪至冯家山西端止，其正面宽约九千公尺；共计四周正面宽约一万八千公尺。如择要配置，以每营担任三千公尺正面计算，亦须六营守兵方敷分配，而当时核心尚不足三菅，曾一再请求增加迄未办到，卒以守备力薄无人，一被突破遂致无法维持。

四、对江面封锁无力。因备炮被敌机炸毁（因七五高射炮调走），轻榴弹炮、野炮调走，南岸失守，以至于敌舰上驶与其扫雷工作无力制止，敌可在其飞机炮火掩护下任意扫雷，随地登陆。

其实，真正的原因杨宗鼎并没有说出来。中国军队在田家镇外围作战打得不错，曾把日军今村支队困在湖沼中长达十天，完全有将其合围歼灭的契机和可能。但是，一方面江对岸富池口的陷落给田家镇防御带来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依旧是令蒋介石十分恼怒却又无力改变的中国军队的痼疾所致，即各部队间从不协同和配合。

作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李品仙对此也有难言之隐。广济战事吃紧时，他曾急电请求第九战区增援，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始终以无兵可调为由拒绝。当李品仙得知田家镇炮台仅剩下不足五十官兵时，只有直接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发电求援。蒋介石得知后大惊，电令陈诚火速增援，陈诚依旧以无兵可援为由拒绝。战后，李品仙在自请处分的电报中，虽然回避了陈诚的名字，但把那些增援不力的将领顺带告了一状：

查田家镇要塞失守原因颇多。至李军团长（李延年）原任防守专责，要塞陷落，在理亦应负相当责任，至其指挥督率亦欠适当，因部队使用未能集中，指挥位置在王家湾要塞之外，对守兵心理不无影响。及前线部队之溃退，要塞核心守备人员擅自退出，未能严为督饬，不无过失。至萧军长之楚、何军长知重策应要塞作战行动迟缓，未能依照命令及时夹击，亦有相当过失。至其他各官长之失职贻误戎机者，已令李军团长查明详报矣。自职奉命指挥要塞及派遣各军南下作战，供职无状，以至要塞失陷，影响战局，尚乞从严处分为祷。

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得知自己被告后，特地致电蒋介石解释他的部队增援迟缓的原因，除了担负的作战任务重之外，还有天黑下大雨导

致部队行动困难以及通信器材匮乏导致联络不畅等等：“职跟随钧座十余年，虽未建功立业，以报知遇，对于命令之服从，自信尚能做到，此次对田家镇要塞策应迟缓，实为事实与环境所促。”——为此，萧军长特地报告了他的第二十六军在广济作战中的损失：伤亡和失踪官兵五千七百一十二人，目前他的一个军仅剩下四千九百五十五人。即便如此，萧军长仍向蒋介石表态说，自己当“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率残疲之卒，向赋予之任务迈进”。

所有的总结、埋怨、解释和表态，于事何补？

长江上最坚固的沿江堡垒，屏障武汉的最后一道水上要塞，已经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第六师团因攻占田家镇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进入休整状态，这使得日军沿长江西进的攻势因而暂缓下来。

长江北岸再向北，是大别山脉。

绵亘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山峰险峻，北麓是一片丘陵，从安徽六安延伸出的一条公路穿越这片丘陵，经河南固始、潢川、罗山，直通河南境内平汉路上的重要城市信阳。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军发动攻取武汉的作战时，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判断，日军从北面的平汉路进攻武汉的可能性很小，其主攻路线应是溯长江而上，因此第五战区兵力部署的重点是长江北岸。八月二十五日，日军第二军沿着大别山北麓的公路向西进攻，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仍旧判断大别山北麓是日军进攻武汉的次要方向。

综合近几日情报：敌军在桃溪镇、舒城等处增兵约万人，并有小部分向六霍（六安至霍山）进迫，抢修六霍公路，召集伪维持会，研究进攻六霍道路。宿黄（宿松与黄梅）敌之步兵、骑兵、战车、汽车不断由南向太湖运动。以此种种，表面上似系对我左翼有所企图，然敌进窥武汉，以沿长江两岸为最捷径，不但南北两岸兵力转用容易，且利用优越之海空军，协同陆军沿江突进易收战果。故职截至今日止，对敌情判断仍然同前。即敌主力侧重南岸，遮断粤汉路，战略上利益较大。至北岸主力仍在黄广（黄梅与广济）方面，南点容易策应，黄广公路可用大兵，六安商城迂回过远，霍山则地险粮缺，六霍方面不过支作战而已。

根据这一判断，中国第五战区在大别山北麓的部署是：霍山方面为

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六安方面为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固始、商城方面为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信阳方面为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所辖之第三十军和第四十二军，控制在豫鄂交界处的商城与麻城之间。

显然，在这个方向上担任进攻任务的日军第二军，至少从两个方面已判断出中国军队对这一方向的忽视：一是“大别山北麓方面之敌陆续向扬子江方面转移。据观察，北麓方面之敌的兵力有继续显著减少之现象”。二是“六安和霍山以东的各条道路虽被敌破坏，但该地以西的道路至今未被破坏”。因此，日军“第二军根据以上情况，为了不给敌人破坏六安及霍山以西道路的机会，乃变更原计划，急速（八月下旬）开始行动，从现在线上（庐州地区）一举进入光州——商城一线，而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以北地区作战”。

七月下旬，日军第二军所辖部队开始向庐州地区集结：第十师团从河南永城南下，在蚌埠附近渡过淮河，“经过难走的道路”集结庐州；第十六师团从开封经陇海线东移，再由津浦线南下，渡过淮河，集结庐州；第三师团从南京长江对岸的浦口北上，集结庐州。而炮兵、辎重兵则被从青岛水运至安庆，然后“陆地行军开向庐州地区”。八月二十日，第二军下达基干部队组成概要以及指挥官名单：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下辖藤田进中将的第三师团、筱塚义男中将的第十师团、荻洲立兵中将的第十三师团、藤江惠辅中将的第十六师团、内山英太郎少将的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以及包括独立山炮、高射炮、探照灯、工兵、通信、运输和野战医院等在内的直属部队。

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命令是：第二军主力沿大别山北麓攻占河南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另外一部横越大别山南下向长江边靠近，策应于长江北岸作战的第十一军。根据命令，第二军制订的作战方案是：以第十师团和第三师团沿安徽六安至河南信阳的公路向西占领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攻占武汉北部；第十三和第十六师团从六安出发，向西攻占河南商城一线，然后横越大别山，向南攻取湖北麻城、黄陂，协同第十一军的第六师团攻占汉口。

二十七日，第二军开始了作战行动。

在这一中国方面认为的“支作战”方向，日军攻击强度之烈、推进速度之快，大大出乎了中国方面的预料。

日军兵分两路从庐州地区出动，第十师团向六安、第十三师团向霍山发动了攻势。二十七日晚，第十师团击退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军的警戒部队，包围六安城。第二天凌晨，日军开始攻城，中国守军第一一四师的两个团奋力抵抗终不支，六安于二十八日晚失守。在霍山方向，日军第十三师团击退中国守军第七军的警戒部队后，陷于与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师的拉锯战中。二十九日，第十师团继续向西推进。为协助第十三师团尽快攻占霍山，日军第一飞行团出动了五十一架战机对中国守军阵地实施毁灭性轰炸。师团长荻洲立兵把师团所有的山炮集中起来猛烈轰击，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师的阵地被摧毁，官兵大部伤亡，当晚霍山失守。三十日，日军第十师团攻占了独山镇和杨柳店。

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连夜抵达商城，中国军队作出的反击部署是：第七十七军占领黑石渡至齐头山阵地；第五十一军占领齐头山至开顺街阵地；第七十一军以一个师占领富金山、下板桥一线阵地，主力集结在武庙集、段家集以北地区，并与第五十九军取得联络；第五十九军派一个师守卫固始城，主力集结在固始西面的潢川；第二集团军一部守商城，主力在小界岭和麻城之间为预备队。

九月一日，日军第十师团先头部队攻占乌龙庙。第十三师团由霍山向北与第十师团协同攻占了熊店。二日，第十师团攻占黎家集，第十三师团则攻占了开顺街。至此，节节后退的中国守军，隔着纵贯豫皖边界的史河，与从庐州一路西进的日军形成对峙。

日军攻势放缓的重要原因，是其官兵已被中国的烈日烤得精神恍惚："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之间，因连续晴天，昼夜温差达摄氏四十度以上，天气酷热。由于各条道路被彻底破坏，后方补给部队尾随困难，因而加重了战士背带粮食的负担。更因缺水发生大量掉队现象，又发现很多士兵中暑。道路情况比预料的还坏，特别是六安附近的道路完全被破坏，车辆部队追赶第一线极为困难。因此，第十师团特别将必需的部队改编组成驮马，以利作战。"

三日，日军第十、第十三师团先后强渡史河，第十师团占领了中国守军第六十一师的警戒阵地南大桥，第十三师团则在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的配合下，向史河西岸中国守军第七十一军防守的富金山主阵地发动强攻。中国陆军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是中央军序列中的精锐部队；而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师团，也是日本陆军中的精锐部队，两支部队在富金山撞在一起，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攻防战。第七十一军首当其冲的是陈瑞河的第三十六师。第三十六师的阵地沿山地的几条棱线呈梯形逐

次配置，日军必须沿着山的棱线向上仰攻，这令他们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代价。宋希濂的军指挥部设在山顶上，能把日军的进攻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有炮兵，如果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有一个炮兵营，就可以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第十三师团的仰攻很快就陷入困境，整整十天，未能突破第三十六师位于山腰一带的主阵地。而且，本来就脆弱的后方也出了问题：中国军队第一一四师袭击了第十三师团的后方补给线，并一度占领了第十三师团身后的八里滩。

日军第十师团的进攻方向是固始。固始守军是钟松的第六十一师。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第六十一师的外围战打了四天，全师伤亡三千多人，等于损失了一个团，但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第二十七军团奉命接替第六十一师，其先头部队刚抵达固始西面的小河桥，第六十一师已经放弃固始西撤了。——这一撤退，让第六十一师的官兵很不理解:“当天晚上，大家都很疲劳，想要好好睡一夜，以便明天再打。按以往常规，日军在夜间一般是不敢出动的，我们完全可以抓紧时间吃饱睡好。可是万万没想到，师长却来了紧急命令，规定各单位于当晚三点钟全部撤离阵地，以团为单位，火速沿平汉铁路向湖北方向撤退，在孝感县花园车站集中。命令还要求所属各部严格执行，违者严惩，其他什么也没讲，我们只好照命令执行。”

第六十一师对固始的放弃令人困惑。

无法得知第六十一师到底接到了什么样的命令，不撤便罢，一撤就撤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湖北去了。

固始城当晚被日军第十师团占领。

但日军第十三师团对富金山的攻击依旧没有进展。鉴于第十三师团攻击受挫且官兵伤亡惨重，第二军司令部决定从第十师团抽调部队向南攻击富金山西面的武庙集，以切断富金山中国守军与后方的联络。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濑谷启率领一个步兵联队，七日从固始南下，部队刚出发就被宋希濂派出的侧翼侦察部队第八十八师五二三团一营发现了。一营营长梁筠决定采取伏击的办法，在濑谷启必经的坳口塘隘口设下埋伏，结果一举歼灭了五百多日军，濑谷启仓皇逃回了固始。

此时，奉命接防的第二十七军团仍在固始附近的小河桥与日军第十师团激战。为了争取主动，军团长张自忠指挥部队不断对当面日军实施反击。而日军第十三师团对富金山的攻击也仍在进行中，日军曾一度从

中国守军第三十六师与第一一四师的接合部突入，结果第一一四师的一个团奉命反击，将突入的日军击退，但团长李超林阵亡。两军混战之时，日军第十六师团抵达战场，日军工兵也把后方道路修好了，免去后顾之忧的第十三师团集中全力向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阵地发动猛攻。从九月十一日凌晨起，在二十余架战机和二十余门火炮的助战下，日军从富金山与石门口接合部再次突入。激战至下午，除富金山最高峰外，中国守军的主阵地全被日军攻占，陈瑞河的第三十六师全师仅剩下不足八百人，富金山失守。

富金山作战虽然最终失利，但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

富金山之役，自江日（三日）起敌以第十三师团荻洲全部与第十一师团，极全力向我宋希濂阵地猛攻，并以空军及化学部队协同肆虐，激烈战斗，持续九、十日之久，我三十六师自师长陈瑞河以次官兵夫，咸抱与富金山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坚守阵地，肉搏逆袭，支撑危局，始终保持富金山八百高地之阵地线，一再坚强抵抗，屡予敌以反击，士气极旺，迭挫顽敌。至元（十三日）午后，敌再举进攻，以飞机数队，往复轰炸，我预备队使用殆尽，营长及守兵八十余人同时殉难，富金山遂陷敌手。但八百高地屹然仍在我手，并未被敌夺取。该师伤亡极重，所存寥寥。在所获敌军官日记载，为其部队入中国以来首次遭遇最坚强之抵抗，并称为最优秀之敌云云。而敌之损失各方报告：四联队长伤二、亡二，旅团长沼田德重负伤，生死莫卜，干部、将、校、士兵伤亡达六千以上，即敌之广播，亦自知无以掩人耳目，直认为开战以来空前未有之激战，又部队长之死伤未尽讳言。是则宋军陈师之壮绩，已获到超出之代价，尤其精神上足使敌确认我愈战愈强，抗战精神，历久弥增，令其气短。第十三师团在此严重打击下，战斗力锐减，实可想见。据确报：敌此次进攻为汉奸所策划，今受此奇重损失，老羞成怒，归咎汉奸，在开顺街将大小汉奸百余名，付之一屠。为虎作张，堪资殷鉴。查陈师此次抗战之壮烈，予敌巨创，全在官兵一体，同抱牺牲决心，誓洒热血于最后五分钟，歼敌之精神有以致之，殊足矜式。近两月来，我五、九两战区作战部队皆能发挥此种英勇精神，杀敌致果，诚为国军士气提高之表征。希常保持此朝气，各奋英勇，期于大武汉保卫战中，予敌以彻底的打击，证以陈师之事实，足见决心一足，敌即创伤随之。嗣后各战区之作战，特须注意攻防兼施，适合机动部署，要击敌人，并晓谕所属共体斯意为要。

富金山失守后，九月十六日，日军占领商城。十八日，刚刚加入作战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在沙窝地区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的攻防战，同日第

十三师团在新店地区也与中国守军进行着苦战。二十日，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分别向中国守军发动全面攻势，中国守军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命令第第四十二军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和幽深密林不断出击，与日军周旋作战。在北面的日军第十师团的攻击方向上，十九日，日军占领潢川；二十日，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分别向中国守军发动全面攻势，中国守军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命令第三十、第四十二军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和幽深密林不断出击，与日军周旋作战。在北面的日军第十师团的攻击方向上，十九日，日军占领潇川；二十日占领光山；二十一日，日军突破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防线，占领罗山。——罗山，与平汉路上的信阳咫尺之距。

日军夹长江两岸向西攻击拟直取武汉。

在长江以北，日军从安徽和河南分路向西，将从东面、北面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

而在长江以南，由江西北部向西突击的一路日军，以三个师团的众多兵力于狭窄的战场地域里也开始全力攻击前进，目的是横穿江西北部进入湖北，对武汉的南部实施战略包抄。

根据中国第九战区的部署，在这一地区御敌的中国军队是第一兵团，兵团总司令薛岳。

薛岳，广东乐昌人，出身于农家，又名仰岳，字伯陵。他十岁入黄埔陆军小学，十三岁入中国同盟会，十八岁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深造。一九二〇年五月，与叶挺、张发奎分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第一、第二、第三营营长，曾在叛军发动的叛乱中冒死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孙中山领导的东征战役中，他率部打仗常常以少胜多，三十岁时已是北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他不是黄埔出身，因此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时，薛岳被列入“具有左倾迹象”的名单，他只有装病躲避。中原大战时，他身处反蒋阵营，但之后蒋介石起用他为第五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参加对江西共产党中央根据地的“围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是尾随中央红军追击时间最长距离最远的国民党军将领。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是左翼军中央作战区的军事总指挥，指挥第十九集团军给日军以重创。徐州会战时，他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扎河南开封，在兰封战役中与日军拼死血战，遏止了日军西进切断平汉路之企图。武汉会战开始后，他改任中国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指挥

江西北部南浔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御作战。

在当时中国军队的诸多将领中，薛岳以作战风格凶狠著称。

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分为三路：第一〇一师团在鄱阳湖以西，沿九江至星子的公路进攻；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路，进攻位于九江西南方向的德安；第二十七师团则沿瑞昌至武宁的公路，直接插向武汉南部。

日本陆军序列中有一些部队被称为“特设师团”，即除主要指挥军官外其他官兵均为后备役人员的部队。由于属于临时组建的师团，因此“特设师团”的战斗力比“常设师团”要弱。在侵华日军第十一军的序列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都是“特设师团”，以致司令官冈村宁次对第一〇一师团的现状很不满意：“东京附近出身的第一〇一师团，虽然不是草草新编的，但在前年夏季以来的上海激战中，竟牺牲了一万多人，大部分战斗员是杂有应召老兵的补充兵。”而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战斗力相比第一〇一师团更差。

第十一军部队在酷暑中进入了中国长江中游河湖港汊纵横的水网地带，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悍的薛岳指挥的士气旺盛的中国军队，其噩梦般的经历自此开始了。

八月二十一日，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占领鄱阳湖西岸的星子后，在二十余门野炮以及飞机和舰炮的支援下，向中国守军第五十二师的东孤岭、鼓子寨一线主阵地发起攻击。二十四日，日军另一部乘坐汽艇从牛屎墩登陆，企图袭击第五十二师的侧背，结果遭到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亲自率队反击，日军少佐石田道一等二百多名官兵被打死。二十六日，冷欣的第五十二师因伤亡太大，将阵地移交给第六十六军叶肇的第一六〇师。鉴于前一天进攻受挫，第一〇一师团在攻击中增加了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但中国守军第六十六、第二十五军等部队顽强阻击，令日军的进攻十分艰难。两军激战十几天后，第一〇一师团仅仅攻占了中国守军的前沿阵地，但自身却损失惨重，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被击毙，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被炮弹炸伤，冈村宁次只得向该师团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虽算不上弱旅，但也是一个月前才由中国驻屯军的一个步兵旅团扩编而成。被编入第十一军的作战序列后，第二十七师团于九月十日被航运到瑞昌，十六日便接到了冈村宁次的命令：向中国第九战区第一、第二兵团的接合部箬溪发动进攻，向西夺取武宁，割断

修水北岸上下游中国守军的联系，并逐渐向武汉南部迂回。在第三飞行团的支援下，第二十七师团从瑞昌出发，沿公路两侧向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三师、第十八军的阵地攻击前进。中国守军的抗击十分顽强，以至于第二十七师团苦战八天，仅仅推进了二十公里。糟糕的战绩令冈村宁次十分恼怒。为加强第二十七师团的攻击力量，冈村宁次把第一〇一师团留守在九江的第一〇二旅团配属给第二十七师团，准备强行突破中国守军的阻击线。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薛岳在这一方向部署了大量部队。中国守军兼备攻击性能的防御阵型，显示出典型的薛岳式的作战风格。第七十二军、第七十八军、第十八军、第八军、第一三九师、第一四一师、第一四二师、第九十一师和预备第六师等部队，除阻击沿公路进攻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外，各部队还将从各自防守的方向主动向日军实施大规模攻击。

二十五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得到加强后，向中国守军的麒麟峰、覆盆山、马鞍山主阵地猛攻，中国守军一面坚决阻击，一面发动反击。日军伤亡惨重，仅在麒麟峰阵地前就留下了三百多具尸体。冈村宁次配属第二十七师团的第一〇二旅团在左翼的进攻也不顺利，中国守军第九十一师和第一四二师甚至打到了日军的身后，而实施正面反击的陈沛第六十师更是凶猛异常，日军第一〇二旅团第一〇三联队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被击毙。——仗打到十月一日，冈村宁次终于明白了，第二十七师团的攻击难以推进，被迫改变了作战计划。

二十七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得到补充后，奉命沿南浔路再次开始进攻，在雪里坡、十里山、长岭等阵地，遭到中国军队第七十军、第六十四军和第四军的持续阻击。由于邻近的日军第九师团也开始向前推进了，薛岳命令中国守军主动后撤。九月四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占领了马回岭，但随即便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断反击。

焦灼的冈村宁次突然发现了一个战机：由于薛岳把主力部队移动到了阻击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方向，以致在南浔路（南昌至九江）与瑞武路（瑞昌至武宁）之间出现了一个空隙。正在第一〇六师团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刻，冈村宁次立即命令该师团西进，从这一空隙向纵深渗入，以配合第二十七师团作战，打开战场的僵持局面，同时也为进攻德安创造条件。九月二十五日，根据冈村宁次的指令，日军第一〇六师团除将第一一一旅团一部留守在南浔路上以掩护后方外，主力则由马回岭西进向万家岭方向前进。

无论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是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松浦淳

六郎，此时都没有意识到，向西推进将是一条令他们魂飞魄散之路。——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行进前方，那个名叫万家岭的地方，将以一场空前的恶战被载入中日双方的战史。

暑热中的崇山峻岭，令日军走得万分辛苦。山路崎岖，地形复杂，地图不准，又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第一〇六师团各部队之间经常失去联络，以至连师团长松浦淳六郎都弄不清他的部队到底走到了哪里。从二十八日开始，大雾弥漫，后勤补给和飞机侦察都中断了，松浦淳六郎只能依靠无线电向冈村宁次报告他目前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不断袭击他的中国军队的大致番号。

但是，从战场态势上看，薛岳并没有乐观的理由。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自马回岭出发后，向西突破五台岭，目前向万家岭的推进依旧采取的是主动进攻的态势，目的是包围薛岳德安防线的左翼。虽然日军行进困难，但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目标实施的。

为把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纠缠在山里，薛岳和松浦淳六郎展开了一场包围和反包围的混战。三十日，第一〇六师团第一三六旅团抵达万家岭，包围了薛岳部的左翼；薛岳立即命令吴奇伟的第四军向日军实施反包围，但第四军很快便陷于日军的包围中。第四军抵抗着日军的猛烈进攻，薛岳急令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的一个团增援第四军。随着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万家岭，薛岳调动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李兆瑛的第一三九师、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第一八七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等部队，再次对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实施第二层包围。第一〇六师团从左翼抽调后续部队，对赶至万家岭战场的中国军队再行包围，双方由此展开了层层激战。

至此，战局似乎依旧对薛岳不利，因为附近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已经占领罗盘山，正在向箬溪推进。箬溪位于万家岭的左侧后，第二十七师团既可以威胁中国军队，又可以向第一〇六师团靠近。薛岳命令李汉魂的第九十一师、刘若弼的新编第十三师和吉章简的预备第六师，在杨家山、城门山、洼山、蒋家坳、排楼下、河浒一线构成阻击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防线，命令第一四二师和第六十师为预备队，命令第一八七师、第十九师各一个旅以及第一三九师的一个团为二线防守部队，迅速构筑阻击阵地。——此时的薛岳，已死死盯住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

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与第一〇六师团之间建立起坚固的阻隔阵地后，薛岳果断地抽调傅立平的第一四二师、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叶肇

的第六十六军驰援万家岭，把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第三次包围起来。——此时，第一〇六师团在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三飞行团的助战下，正集中全力向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阵地猛烈攻击，第七十四军拼死阻击并不断反击，令日军的攻击举步维艰。——对于第一〇六师团来讲，此时已经没有后续部队可调，眼看着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的中国军队，松浦淳六郎已经无能为力了。

兵力充沛的薛岳终于在争取外线上占据了上风，万家岭战局的有利态势开始朝着中国军队倾斜。薛岳明确地意识到，打一场歼灭战的时机已经出现：只要在外围坚决阻击，同时调动部队对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实施坚决突击，完全有可能把孤军深入的这个日军师团吃掉。——在中日战争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尚没有吃掉日军一个师团的先例，薛岳要在中国赣北山区里创造出这一奇迹。

十月六日十三时，薛岳制订出围歼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作战部署：李汉魂部坚守现有阵地阻击日军，并向当面日军发起佯攻，相机向左侧背转移攻势；第十八军副军长陈沛指挥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和第一四二师七二五团，竭力迟滞永武路（永修至武宁）上的日军，掩护战场的侧背；炮兵一营加强一个连开设阵地，以火力压制日军炮兵，协同部队向万家岭实施攻击。在万家岭地区围歼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第六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统归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向石堡山、万家岭、箭炉苏、长岭、雷鸣鼓刘一带实施包围攻击，攻击开始时间和详细部署由吴奇伟确定。

两个小时后，吴奇伟下达攻击命令：总攻时间为七日下午四时；第六十六军从北，第七十四军从南，第九十师从东，第九十一师从西，对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实施四面围攻。

攻击作战开始后，南面的第七十四军尽管遭到日军战机的猛烈轰炸，但其第五十一师还是发动了攻击，数次猛攻后占领长岭和张古山制高点。北面的第六十六军则攻占了石堡山和老虎尖，并与第四军配合攻占了狮子岩的西北高地。此时的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粮弹两缺，已经显现出被全歼的危险。

八日，冈村宁次收到了第一〇六师团发来的电报：

师团正面之敌，每到夜里仍然从各方面进行数次袭击，有逐步将师团包围之势，虽要求急攻，但因地形错综复杂，部队行动易出错误，进

展不能如意。若拖延时日又恐师团态势不妙。谨请求给师团以战斗指导。

所谓“战斗指导”，不过是个日式的委婉说法，实际上是请求紧急解救。冈村宁次立即命令组织救援部队，把第一〇六师团从中国军队的包围圈里解救出来。日军的救援部队，一路沿瑞昌至箬溪的大道向南急进，企图从正面增援第一〇六师团；另一路从箬溪出发向北推进，企图从背后攻击围困第一〇六师团的中国军队。薛岳不得不从包围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出新编第十三师、新编第十五师、第六十师、第九十一师以及预备第六师等部队迅速南下阻击救援的各路日军。

九日，中国军队艰难地压缩着包围圈。下午，薛岳命令各部队选拔精壮士兵二百至五百人组成敢死队。十八时，敢死队准备完毕，炮兵开始炮火准备，十九时敢死队开始突击。中国军队的数支敢死队向日军坚守的各个阵地拼死猛冲，肉搏的呐喊声响彻夜空。中国军队各部队主力随后跟进，前赴后继，奋勇冲杀。天亮之后，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周边的防御体系完全被打乱，工事被摧毁，阵地上到处是日军的尸体和伤兵。第六十六军官兵冲上万家岭和田步苏阵地，日军残敌向北溃逃，遭到北面石堡山阵地上中国守军的阻击，残敌又逃向西面的雷鸣鼓刘村。——这股日军在来回逃命的山路上留下了三百多具尸体。十日下午，企图突围的日军向张古山方向突击，张古山与长岭之间的狭窄隘路曾被日军突进了几百米，但最终还是被中国军队堵了回去。

救援的日军在第一〇六师团的不断呼救下急切地向前突击，但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死战不退。

十日傍晚，为了迅速歼灭第一〇六师团主力，薛岳再次命令部队发起攻击，要求各部队不顾牺牲完成任务。当晚，第六十六军和第一四二师等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几个山头，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残部已被压缩在了仅五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在这个区域里，除了雷鸣鼓刘村之外，其余的几个小山村名字也十分古怪：石马坑刘、桶汉傅、松树熊。就中国军队而言，部队大量聚集，后勤供应严重不足，弹药和粮食都发生了短缺，伤员在狭窄的山路上呻吟，而还战斗着的官兵在山腰上与日军肉搏。日军战机鉴于中国军队没有对空武器，疯狂地低飞扫射，往往中国军队的防空监视哨哨声还没有吹响，炸弹便雨点般地落了下来，中国军队的军师一级指挥部，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轰炸。日军的火力猛烈，第一〇六师团尽管伤亡惨重，但他们能够得到数量可观的、持续不断的空投补给，因此弹药相对充足。由于第一〇六师团的士兵没有军官督战

便不能打仗，因此，冈村宁次在向他们空投粮食和弹药的同时，竟然还给他们投下了二百多名连级干部。

日军的救援部队拼命地向第一〇六师团靠拢。

尽管薛岳不断地抽调部队加强阻敌兵力，但阻击部队因伤亡极大被迫节节后退。

十二日，中国军队继续向包围圈内的残敌发动围攻，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残部已经被压缩在仅有的几个山村里，在昼夜不断的攻击和反攻击中双方似乎都陷入了混乱：

有几次我军已攻至其师团部附近，但是夜间攻击，也不明了何处是敌首脑部，天一亮敌机就来助战，我军又退回原来攻击阵地，后来据敌俘说，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了，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一百公尺，松浦就被俘或者切腹了。

十三日，外围救援的日军已经接近，无论是围攻还是阻击的中国军队都伤亡过大，薛岳遂下令撤出战场。

万家岭一战，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被歼达三千多人。

万家岭一带，本是江西北部的重峦叠嶂之地，人烟稀少。战斗开始后，当地百姓逃亡一空，而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依旧没有人返回这片尸骨狼藉之地。直到一年多以后，中国陆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率部在这一带打游击，终目睹到昔日万家岭战场令人惊悚的景象：

在这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葬。日军的辎重兵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的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蛆虫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但是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万家岭西北一村，叫雷鸣鼓刘村，周围日军坟墓最多。村东稻田中，日军辎重兵马骨不下五六百具，铁制驮鞍亦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将要复员回国的三百多人，在该村住了三天，向阵亡的日军祭吊。日军砍伐附近树木、竹片，在墓上安插灵牌，并沿着

坟墓四周镶上三四层砖台，墓碑上用墨笔题字，诸如“皇军陈殁将兵之碑”、“故福见步兵中尉五名之灵”、“皇军爱马之碑”等等。坟前用竹削成短筒，每坟一对，内插松枝野花，还留有燃烧过的香烛残迹。

雷鸣鼓刘村边一裸大树，日军用刀削光，上写：“雷鸣鼓刘战之地”，旁署“昭和十三年十月竹内队宿此树下”。许多马头骨仍然系着皮制缰勒，口内仍含有铁衔。万家岭西南哔哄街村，日军遗骨最多，据当地人谈，一个村民曾从骷髅堆中捡获金牙三十余枚。这当然是日本兵的，因为中国士兵镶不起金牙。哔嗔街村正南的张古山，仅有三十多公尺高的小山，山上灌木丛生，山顶上军用物品、日制弹药箱、防毒面具、毒气筒、刺刀、皮带等极多。山坡上有日军尸骨，也有中国士兵的尸骨。张古山是一个制高点，双方在此争夺肉搏，从尸骨可见当时战斗激烈程度。

万家岭在雷鸣鼓刘和哔哄街村正东，为一连绵的岗丘地带，最高峰不过四五十公尺高，山顶墓碑林立，中间用一丈五尺长的厚木制成一碑，上写：“濑川部队北川队奋战之地”，下写“昭和十三年十月九日”，旁边是“忠烈故陆军辎重兵中尉东鸥哲雄之墓”、“故陆军辎重兵军曹松木吉人之墓”以及尚里豪盛、岩下嘉藏、桥口武雄、梅田茂德、鲛岛富夫等之墓。墓边草丛中，我捡拾“濑川部队”破烂军旗一面。辎重部队属于后勤部队，在作战时，一般应该由步兵部队作掩护，辎重部队被歼如此之惨，其他兵种伤亡之大可想而知了。

薛岳的第一兵团于江西北部的作战，遏制了日军向南急进的凶猛攻势，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就在万家岭战斗结束的十月十三日，在保卫武汉的最北部前线，虽然中国守军付出了战死一万三千名官兵的代价，平汉路上的重要城市信阳还是失守了，平汉铁路线随即被日军切断。信阳的失守和中国第五战区部队的撤退，引发了中国方面保卫武汉整体防线的连锁性溃退：沿长江北岸推进的日军第六师团再次发动攻势，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便占领了浠水。接着，日军第三十六旅团组成机械化追击部队，二十四日占领武汉以北的黄陂。位于田家镇附近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一九旅团十七日在第六师团的左翼向西进攻，二十一日占领兰溪，二十四日推进到距武汉仅三十多公里的阳罗附近。沿长江南岸推进的波田支队击退中国守军第三十九军的阻击，二十一日占领大冶，二十二日占领鄂城，二十四日推进到距武昌仅三十多公里的葛店。位于波田支队南侧的第九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五十三军的防线，十七日占领三溪口，二十

四日推进到武汉南部的贺胜桥以东地区。位于第九师团南侧的第二十七师团向北迂回，与第九师团并列西进，二十四日推进到贺胜桥南侧的咸宁地区。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除了几乎被中国军队全歼的第一〇六师团和损失巨大的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地区留守整补外，日军华中派遣军各路主力师团全部推进到了武汉周边地带，已从北、东、南三面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

长江中下游的极度暑热已快过去。

南中国的浅秋悄然来临。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发表《告武汉同胞书》：

抗战的序幕已进到第三期的阶段，现在的武汉三镇已成为敌我必争之地，一面敌人企图处心积虑，倾其海陆空军最后的力量，向着最困难的途径，企图大举进犯武汉。而我们的一面，军事已进展到了于我有利的地带，当局为着确保武汉三镇之完整，已经有了很周密的部署。我们相信在这次会战当中，我们一定可以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然而残暴的敌人，非到绝对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不肯轻易认输的，相反地，他将要恼羞成怒，更残酷更疯狂地来滥肆轰炸我们后方的市区，屠杀我们非武装的市民。敌人的野蛮兽行，非但不足以动摇我们的决心，反而足以加强我们同仇敌忾的情绪。但我们认为许多非武装而无力参加抗战的同胞们麇集在武汉一隅，遭受这样无谓的牺牲，是毫无必要的损失，因此我们希望老弱妇孺的同胞们赶快疏散到后方去、乡村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在这里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认识：我们疏散武汉的人口，并不是消极的叫民众逃难，抛弃武汉可爱的家园，而是我们希望留居在武汉的老弱妇孺的同胞们暂时避免无谓的牺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更可以积极地安心致力于应做的生产事业，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同时更可以补助国家，增加抗战的力量！现在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轮船等，目前感到缺乏的时候，我们为着大家的安全，希望能尽快和尽量地利用马车、人力车、民船，或者徒步，自动地离开武汉，疏散到安宁的后方去，安宁的乡村去……现在，政府为顾念到大家旅途的困难，在沿途都设有“难民站”，尽可能地在招待保护大家。我们热烈地期望着大家：为着自己的安全，为了体念政府爱护民众的衷诚，为求有利抗战的前途，能尽快尽量的疏散。如果我们没有汽车、火车、轮船可乘的时候，然而我们还有马车、人力车、民船，可供我们的利用；即使一切交通工具都缺乏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还有自己康

健的两脚！应该疏散的武汉同胞们，不要再等待犹疑了，我们诚意地在祝祷着你们旅途的安全！

在武汉周边，那些被政府“诚意地在祝祷着你们旅途的安全”的市民百姓，阖家老小拥挤在大路、小路和田埂、荒野之上，慌不择路的他们并不知道往哪里走才能有安全的旅途。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矗立在武汉长江岸边的名楼之上，今夕黄鹤是否还在？

中国的对日战争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第十五章

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

谁也没想到，就在日军全力攻取武汉时，中国南部沿海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陷落得如此之快。

这是中国最高统帅部对广州方向的防御严重误判的结果。

日军要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建立自己的海军攻击基地，必须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主要口岸，这是战争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军事常识。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日军对福建厦门的攻击，便是封锁中国海岸的具体作战行动。而当日军攻击福建沿海时，中国守军力量之薄弱令人吃惊：福建海岸长达三千多公里，仅有中国军队的七个团防守，而防御厦门方向的仅有一个团。五月十日凌晨，在日本海军少将宫田喜一的指挥下，日军第五舰队出动巡洋舰、驱逐舰和运输舰三十余艘，从金门出发向厦门靠近，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三十余架战机同时飞临厦门上空实施轰炸。当日本海军陆战队向厦门发起冲击时，他们预料中的大规模抗击并没有发生，因为防御厦门东南海岸的只有中国守军一个营——第七十五师四四五团三营在营长王建章的率领下奋力抵抗，但终因兵力薄弱，在战至伤亡惨重后主阵地失守。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韩文英率部增援，途中在日军的轰炸下损失过半，旅参谋长樊怀明阵亡——“卫士将樊的尸体推入弹坑，把一内装五节电池的军用手电筒置于其后枕部下（作为日后识别标记），然后草草掩埋。”在厦门防御阵地的阻击战中，副师长韩文英、四四五团团长水清浚、二营营长杨永山、三营营长王建章负伤，一营营长宋天成阵亡，副营长以下的军官非死即伤，四四五团阵亡官兵达八百人以上，其中王建章的三营副营长和四位连长全部阵亡。王营长曾在战后尽力收容他的部队，他苦苦等待和寻找了二十多天，全营官兵只收容到六人。

中国国土广大，海岸线漫长，仅凭优秀儿女的血肉之躯，如何能御凶残强敌于海岸线之外？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州即成为中国与海外往来的重要通道之一；

特别是在日军相继占领华北和华东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转运枢纽。早在淞沪会战时，日本陆军就提出占领广州的建议，认为切断中国这条重要的外援路线，就能削弱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并随之做好了代号为“A计划”的作战方案，攻击时间定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但是，十二月上旬，日军于南京上游的长江江面上炸沉了英国炮艇“瓢虫”号以及美国护卫军舰“帕奈”号。虽然日本人马上表示他们是“误炸”，但还是引起了国际关系上的巨大危机。美国派出海军作战局局长英格索尔赴伦敦，商讨与英国合作对抗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问题。日本海军方面认为，此时攻占广州必会引起香港占领者英国的干涉。于是，“A计划”被暂时搁置。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在计划攻取武汉时，又将攻占广州一并考虑在内，但由于船舶运输方面准备不足，最终决定占领武汉之后再进攻广州。到了七月，日军大本营认为：海路运输的资材已经准备充分，可以在攻取武汉的同时实施广州作战。陆军吸取上次的教训，事先征求海军的意见，谁知这一次海军比陆军还要积极，提出了同时攻占中国海南岛的建议。建议被陆军以兵力不够分配为由拒绝。在随后召开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海军坚持认为，必须对日后攻占海南岛予以同时考虑。而令日本陆军和海军一致认同的是，攻占广州将给英国以极大冲击：

对中国方面来说，一方面丧失了华北和华中的重要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我海军封锁了沿海，广州地区则成了以英属香港为背景的重要补给据点。在开始广州作战以前，向内陆地区的补给量，估计占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在广州周围，除了英属香港外，还有珠江口的葡属澳门。在广州有英、法的租界，在广州以及惠州、博罗等地分布着英、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机关、学校、教会、医院、商铺等。另外，英、法两国除对广九铁路（英）、粤汉铁路（英法）有借款上的权益外，还保有各种通商航海上的利益。特别是香港，包括九龙租界地及其附近一带租界的海面上，更驻有英军（陆、海、空军），它不仅是英国对华进行政治谋略活动的根据地，而且是各敌对国家暗中活动的根据地。广州作战意味着驱逐英国势力，这会给英国极大冲击是可以想象的。

七月十三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关于广州作战方略是：于攻占汉口的前后，“采取急袭方式，果断迅速地攻占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至于具体作战方案，大本营主张从大亚湾登陆后向广州进攻，陆军方面建议溯珠江而上攻取广州，最后陆军勉强接受了大本营的意见。

一九月十九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进攻中国广州的“大陆命”和“大海令”。之后，参战部队陆军第二十一军和海军第五舰队开始磋商，决定将攻取广州作战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十月十二日开始，以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主力及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从中国广东大亚湾登陆，经惠东、平潭、惠州一带向东江推进。第二阶段，待第五师团主力抵达后，强力突破东江防线，分路向广州进攻。同时，第五师团以部兵力于十月二十七日从珠江口登陆，攻占虎门要塞，由南向北配合师团主力攻占广州。

编入日军第二十一军的三个师团中，第五师团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转战山西和徐州战场后由华北地区调来；第十八师团在淞沪会战后一直驻守杭州附近；第一〇四师团则是由预备役组建的特设师团，从中国东北地区调来。九月底，运送日军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的舰船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起程，相继于十月初到达集结地——澎湖列岛的马公岛。此前，三个师团分别在青岛、上海和大连进行了登陆训练。显然，日本方面对攻占广州作战极为重视，认为中国方面为保住国际补给线必会拼死抵抗，因此编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作战序列：

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副参谋长藤室良辅大佐；

第五师团，师团长安藤利吉中将；

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中将；

第一〇四师团，师团长三宅俊雄中将；

第四飞行团，团长藤田朋少将；

军直辖部队：独立机关枪三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三个中队、山炮兵两个联队、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迫击炮两个大队、臼炮三个大队、野战高射炮八个队、气球一个中队以及兵站部队。

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盐泽幸一中将，参谋长田结穰少将；

第九战队，重巡洋舰“妙高”号（旗舰）及轻巡洋舰“多摩”号等；

第十战队，轻巡洋舰“天龙”号、“龙田”号等；

第八战队，轻巡洋舰“鬼怒”号、“由良”号及“那珂”号等；

第二水雷战队，轻巡洋舰“神通”号及第八、第十二驱逐队；

第五水雷战队，轻巡洋舰“长良”号及第十六、第二十三驱逐队；

第一航空队，航空母舰“加贺”号（舰载机约四十架）及第二十九驱逐队；

第二航空队，航空母舰“龙骧”号（舰载机约七十架）及第三十驱逐队；

第十四航空队，航空母舰“千岁”号（舰载机约四十架）；

高雄航空队（陆基机十二架）以及第三驱逐队和第一炮舰队等。

由于是登陆作战，日军准备了大型舰船八十艘、小型船一百八十艘、机动船三百艘、舢板船二百五十艘、渔船二百五十艘、拖船十艘、载货汽船二十五艘以及摩托艇十艘。运送登陆兵力被分为四个批次：第次运力为四十万吨，第二次二十万吨，第三次为十五万吨，第四次为二十五万吨。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方面对日军即将攻击广州一无所知。

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成立了第四战区，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全面负责福建、广东和广西沿海地区的防务，以确保中国对日作战的海外补给通道。但是，直到广州作战开始前，中国第四战区的指挥机构并没有建立起来，仅以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下辖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和第六十五军以及两个独立旅和虎门要塞部队。由于军事委员会认为广州方面尚无战事，为了支援武汉保卫战，又从余汉谋有限的兵力中抽调出四个师，以致第十二集团军实际上仅剩了八个师的兵力：第一五三师守备东莞以南的宝安至虎门要塞，第一五一师守备面对大亚湾的惠阳，第一五七师守备广东东南海岸的潮汕以及大亚湾，第一五六师守备广州东面的增城，第一五四师守备增城北面的从化，第一五八师守备广州东郊，第一五二师第四五四旅守备海南岛，第一五二师第四五六旅驻守广州市区，独立第二十旅守备广九铁路沿线，独立第九旅守备海丰以北的莲花山。——余汉谋有限的兵力被分散于五百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海岸纵深地带。

中国方面防御广州的军力如此薄弱，根本原因是军事委员会的决策者们包括蒋介石本人，始终认为日本会顾及侵犯英国等国家的利益引起国际干涉而不敢进攻广州。日军开始向澎湖列岛方向集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两次急电蒋介石，报告说根据香港方面的可靠情报日军将对广州发动进攻。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日本人为攻取武汉制造的假象，他不但认为广州不会发生战事，而且要求余汉谋再抽调一个师增援武汉。蒋介石令人困惑的手令发自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此时，日军第五舰队载着登陆部队已从马公岛起航向大亚湾驶进。

最急。广州余主任幄奇（余汉谋，字幄奇）兄：无论如何，须抽调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究抽何师何时可到？盼复。

无疑，手令显示出蒋介石对武汉战局的极度焦灼，因为即使是他本人也不可能相信“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只是，武汉固然需要守卫，但日军舰队已向中国东南海岸驶来的军事行动就可全然不顾？

有史料表明，日军对中国方面特别是余汉谋部的防御部署了如指掌，原因是余汉谋身边掌握核心作战机密的人竟然是日本间谍：

日本利用广州毗邻港澳和沙面系外国租界的条件，于抗战前后在广州设立谍报机构做种种活动。此种活动还深入到余总部的心脏部分，如余总部的少将工兵指挥郭某、少将高参李某（东北人）均是潜伏的汉奸。这两人系在抗战开始后由余汉谋的前任参谋长徐景棠以日本陆军士官同学关系介绍进来的，当时广州等处的防御工事设计和阵地组织图案都归他们掌握。余总部本身和蒋介石军统局派来的反谍人员固属不少，但对郭、李活动一直无从发觉，直到广州沦陷前不久才发觉，可是他们已事先逃到香港去了。

广州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保全的可能。

十月十一日黄昏，日军第五舰队抵达大亚湾，凌晨时分全部舰船抛锚完毕。——“当夜月光明朗，风平浪静，各项作业极为顺利。”“准备登陆时，敌未加妨害，在及川支队登陆地区的敌岸上，只见灯光忽隐忽现，并无火光，极为肃静。”——中国海岸没有任何抗击登陆的准备和反应。

中国方面在制订广东防御方案时，曾准确地判断出如果日军在广州附近实施登陆，登陆地点必会是大亚湾一带，因为日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根据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条约规定，大鹏湾至宝安一带海域的领水权属于英国，日本舰船不可能进入这片海域作战；虎门的防御设施比较完善，又要绕过香港海面，从虎门至广州的珠江水系极为复杂，不适宜大兵团作战。只有大亚湾，水深可泊万吨舰船，海面宽阔便于展开，而澳头至淡水和惠州间都有公路相通，便于机械化部队开进。——既然中国方面早有判断，那么十二日凌晨的这个月朗之夜出现的情景令人不可思议：

第十八师团长命令左侧支队（步一一四第一大队为基干）于十二日二时四十五分出发前进。接着命令师团主力及及川支队于三时三十分开始登陆。四时十五分，左侧支队在亚铃湾（大亚湾）的小龟海岸奇袭登陆；第十八师团几乎未受到敌之抵抗于四时二十分前后从虾涌圩、岩前港地区登陆成功。及川支队也几乎未遭敌抵抗，于四时二十五分在盐灶背南岸地区登陆成功。十二日四时三十分，军司令官命令一〇四师团登陆。第一〇四师团的登陆掩护部队（第十八师团的步一二四、第一〇四师团的步一七〇第三大队为基干）未受敌之抵抗在玻璃厂北面海岸登陆，师团主力于十时左右在玻璃厂北面海岸登陆完毕。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时，防守大亚湾海岸的中国守军兵力与厦门一样，只有一个营。十二日拂晓，大亚湾海面上日军舰船靡集，敌人的登陆已经开始，驻守惠阳和淡水的第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急忙打电话给余汉谋，请示准许他调动部队向大亚湾地区推进。余汉谋接着请示蒋介石但遭到了拒绝，蒋介石的理由是：日军在广州方向的作战，重点是切断广九铁路并占领虎门要塞。因此，大亚湾方向的进攻，至多是小部日军所做的佯攻。蒋介石要求余汉谋要以确保广九铁路为作战目的，现部署不许擅自改变。

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从大亚湾顺利登陆后，立即向北进攻，在通湖圩以南与中国守军第一五一师的罗懋勋团相遇，中国守军一触即溃。其左翼部队从岩前港附近登陆后，向淡水方向迅速推进，淡水的中国守军两个营抵抗两小时后溃退，淡水陷落。日军第十八师团开始全力向惠阳追击前进。——“中午气温高达摄氏六十度，连续行军三十分钟以上极为困难，出现了大量的中暑者，师团在永湖圩设立了患者疗养所，以收容病员”。惠阳是大亚湾通往广州的第一道门户，背依东江，广九铁路横贯其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惠阳中国守军为第一五一师的一个团和独立旅一部。十四日夜，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冒雨攻击惠阳城，

中国守军利用较为完备的城防工事进行抵抗，双方彻夜激战，十五日凌晨四时以后，日军逐渐从惠阳北、南、西三面突入城内，中国守军弃城退却，惠阳于早晨七时陷落。接着，十六日夜，惠州也被日军占领。

十七日，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向增城推进。

余汉谋决定利用广州和增城的既设阵地集中兵力阻击日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紧急电令位于九江以南的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六军从南浔路南下增援广州。

十八日，日军第十八师团先头部队抵达增城东南，遭到中国守军的炮击。步兵大队长吉村藏五郎少佐登上增江东岸的高地，看清楚了增城内的中国守军只是“小部队”，于是集中起各中队的掷弹筒猛烈轰击，日军的骑兵大队也加入了步兵的冲击，中国守军被迫退至增城外。余汉谋准备集中第一八六师、第一五三师、第一五四师和独立第二十旅，在增城至博罗间的公路上聚歼日军。二十日，日军在增城地区的兵力已达五千以上，在航空队的助战下，日军向正在集结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后顺势追击，中国军队顿时陷入全线混乱的态势。当夜，余汉谋率领他的指挥部撤离广州，去了北部的清远，广州城内留下的部队仅是警税团和少数宪兵。

二十一日午后，日军侦察机传来报告：

一、早晨以后未受到来自广州附近原有阵地的射击；

二、有汽车约六百辆沿广州至从化公路北进中；

三、在广州南面的珠江上聚集着无数的帆船和小汽艇；

四、广州市内数处起火。

日军由此判断，中国军队已经放弃广州。

二十二日傍晚，日军第十八师团未经作战进入广州城。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则从增城一路向北，二十二日占领太平场，二十二日占领从化。

由于第二十一军攻占广州的作战出奇顺利，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遂

决定第五师团在海军的配合下，向位于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发动攻击。第五师团乘坐的舰船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于二十二日晨进入伶仃洋。在战机和舰炮的支援下，日军强行登上大角头岛西岸，攻陷蒲州炮台。附近大角炮台的中国守军一个营顽强抵抗，整整坚守了一个昼夜，直到三百名官兵伤亡殆尽，大角炮台失守。日军从大角头岛继续向川鼻岛前进。此前，为使虎门要塞上的军事设施统统“沉默”，日军护卫舰队以及航空兵主力已对虎门进行了持续两天的轰击和轰炸，中国要塞守军兵力单薄无力支撑，于二十二日晚撤守。二十三日傍晚，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从川鼻岛登陆，占领虎门要塞至二十九日，日军完全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

直到这时候，奉命增援广州的中国军队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六军仍不见踪影。

在广州作战中牺牲的中国军队的最高将领，是第一五三师的一位名叫钟芳峻的旅长。十七日，第一五三师在福田一线阻击日军，钟旅长对友军的不能配合以及部队的畏惧退缩感到极度愤怒，对自己作为一名指挥官不能有效地抗击敌人感到羞愧难当，于是决定一死。——钟旅长的自杀不是做个样子，他是真心想死：

……将自用左轮手枪从下颚向上发射，穿顶不死，昏迷不省人事。幸好该村民众所闻，群集围睹，争先慰问，救醒医治。唯自杀心决，第二天他又跳河自杀，又被民众营救捞起扶回村中，因伤口入水不治而死。钟芳峻之死可谓以身报国，尽忠职守，颇得村人崇敬，集资厚葬于该村。

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虽然兵力薄弱，部署分散，但其装备在中国军队中尚属较好的，轻武器和弹药充足，又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和装甲车，特别是拥有大量的卡车和内河舟楫，他们应该比日本人更为熟悉珠江流域复杂的水网，因此完全有可能与日军周旋作战相当一段时间。但是，余汉谋的部队，除了第一五一师坚守惠州十几个小时、第一五和第一五四师在增城附近进行了短暂抵抗以及大角炮台坚守了近二十个小时之外，其余部队均未作强有力的抵抗，致使大量的军事装备被丢弃给日军。根据日军统计，广州作战中，日军俘虏中国官兵一千三百四十人，缴获轻重机枪二百零八挺、火炮一百三十四门、要塞炮五十三门、坦克和装甲车二十一辆、汽车一百五十一辆、大米一万七千五百五十袋。

广州陷落，粤汉铁路被截断，港口口岸被封锁，日军得以建立南方

作战的前进基地，而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补给要道被彻底阻断。

此时的武汉已被日军三面包围。

武汉之于国民政府的重要地位已经丧失。

即使固守最终也会失守。

倘能保全若干力量，即是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况且，在武汉外围长达五个月的作战中，中国军队已毙伤日军数万，击沉日舰百余艘，击毁日军战机百余架，并迫使日军不断从国内增兵致其国力损耗日剧。——中国军队消耗日军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即“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华东沦陷后中国“聚集武汉之人员物资亦得先期西运”。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

这是坚守之后的放弃。

只是，放弃武汉意味着另一种军事行动的开始，即位于前线的众多中国军队将全面撤退。

军事委员会秘密地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通报了这一决定，并要求他们尽快进行部署从而使部队有计划地撤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军队弃守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蒋介石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

日军第二军占领信阳后，其第十师团沿平汉路南下，主力则在平汉路以西经应山、安陆、云梦、应城向汉阳和汉口迂回，沿途没有遇到中国军队成规模的抵抗，于二十三日抵达应山地区。而位于大别山北麓的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也发现，之前顽强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没了踪影，因此得以迅速向麻城地区推进。

中国第五战区数量惊人的部队的预定撤退部署是：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的第三十、第四十二军，第三集团军的第十二、第七十一军，改称为“豫西兵团”，划归第一战区，经应山向豫西撤

退。

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的第一军和第十六军，向豫西南的南阳方向集结，归军事委员会直接管辖。

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的第七军和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的第十军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并与已在苏皖边区游击的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部的第五十七、第八十九军以及第五集团军于学忠部一起，改称为“苏皖鄂边区兵团”，由廖磊任总司令。

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的第三十一、第八十四、第三十九军向鄂北广水附近的洛阳店及马坪集结。

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的第五十九、第七十七、第六十八军，向鄂中应城以西的坪坝集结。

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的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三十六军，担任位于武汉西南方向的金口以西长江南岸的守备。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撤退到平汉路以西，向鄂中的钟祥集结；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撤退到鄂北的枣阳；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的第四十四、第六十七军向鄂南的潜江转移；第八十七军刘膺古部向潜江以东的沔阳转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退到鄂北随县。

只是，撤退命令一经下达，部署便成一纸空文。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近查各军撤退以后，均未能遵照制定地点遂行任务，川军各将领多到宜昌，队伍凌乱，无法指挥，又无生力军部队担任掩护。”

川军擅自撤至宜昌，是因为那里离他们的家乡不远了。李宗仁对溃兵如潮既愤怒又无奈，他指责川军只是一个借口，更令他怒不可遏的是中央军部队根本不听他这个桂系将领的指挥：

十月十二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

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相互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胡宗南的擅自西撤，差点要了李宗仁的命。当时李宗仁率战区司令长官部刚撤至平汉路花园站以西的陈村，突然发现正面的胡宗南部不知去向，于是急调附近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和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来武胜关和平靖关，以填补胡宗南的防线。但是，大军全线撤退之时，司令长官部根本联系不上覃连芳，刘汝明部也已经跑到了应城。焦灼万分的李宗仁"惊觉战况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令通知长官部同人速即整装，向西移动"。——他们离开陈村两个小时后，日军骑兵就冲进了村庄。

武汉前线中国军队的混乱，令蒋介石大为光火，他给一系列将领同时发去电报，说如此混乱的撤退将成为中外媒体的笑谈，对于这种只图逃命的无耻行为必须严惩：

一、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二、查放弃武汉原为预定计划，进至武汉之敌，已极疲惫不堪，南犯之敌不多，而我该方面部队竟不审敌之兵力，我有多数部队，不知筹划使用，有良好地形，不知利用防守，只图逃命溃走，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军之精神。此后应力挽颓风，凡无令擅退，不论各级长官，均照连坐法严厉执行，并着陈长官查明此次从新店镇、崇阳狼狈撤退部队具报，以凭核办。三、南江桥至城陵矶之线应尽力固守，无命令不得先期撤退，致干惩处。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蒋介石离开武汉后，乘车先至湖北钟祥，然后经沙市、常德"拟返长沙"。不料行至十里铺时，汽车发生故障，白崇禧只有在路边等待司机修理。不一会，周恩来的汽车恰好经过此地，他告诉白崇禧敌人的骑兵部队距这里已经不远了，请白崇禧坐他的车一起去长沙。白崇禧不知自己的车何时才能修好，乃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留学法国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其知识

丰富。”

最后撤离武汉的，是中国第九战区守城部队第一八五师。撤退前，官兵们完成了对城内重要军事设施的破坏，并掩护仅剩的一些政府机关人员渡过了长江和汉水。

蒋介石离开武汉的第二天，日军第六师团在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主力占领汉口北郊的戴家山阵地，其先头部队直接冲进了汉口。波田支队得到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的增援，在海军第三舰队的配合下，从阳新向北进攻武昌。二十四日，击退中国守军第九十四军第五十五师的阻击后，波田支队占领武昌东面的葛店，先头部队于二十六日凌晨冲入武昌。二十七日，日军第十五师团主力从武昌渡过长江攻占汉阳。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沦陷。

只是，日军占领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

日军占领武汉后，第十师团、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兵分三路南下攻占岳阳。至此，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隔着赣西北之修水、湘东北之新墙河形成对峙。

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对中国军队放弃武汉作了这样的解释：

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以扬言进图武汉，追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全力，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敌军死亡超过前期作战一年以来之总数。敌人计无复逞，乃不得不暴露其弱点，以发动华南之侵战，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国际通

路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缺乏……自敌入侵粤以后，粤汉交通既被截断，则武汉在一般局势上之重要性，显已减轻。至就军事而言，武汉在军事上的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如此，不唯无需于武汉之核心，且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致不能发展全面之实力。敌人用意，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陷于困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图；以时间而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绝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僇（戮）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语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之成功，必赖于最艰辛之努力与大无畏之奋斗。又曰：“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必须吾人抱定最大之决心，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彻底之解放。国家存亡，抗战成败之关键，全系于此，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

为了攻取中国武汉，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初期投入作战的兵力约为二十五万，会战期间又数次补充，最后投入的总兵力约为三十万。日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海陆空装备上的优势，苦战数月，最终却没能达到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预期目的，自身却损失严重。日本陆军第十一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四千五百零六人（内将校一百七十二），负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内将校五百二十六），伤亡合计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内将校六百九十八）”；日本陆军第二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约二千三百人，负伤约七千三百人”，连同海军和航空兵的伤亡，总计约为三万五千五百人。——尽管中国军队战斗详报的数字偏高，但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却明显偏低。白崇禧的记述是：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陆军伤亡人数当在五万左右。如果再加上海军和航空兵、加上在酷热中患病以及失踪官兵的人数，日军损伤兵力约计九万。

在武汉会战中，武器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于酷暑中苦战大别山麓和

江汉平原，在日军飞机、大炮和毒气等大杀伤性武器的杀戮之下，后勤供给不足，伤员难以转运，加上热带疾病流行，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第十一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十四万三千四百九十三具，俘虏约九千五百八十一人”。日军第二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五万二千具，俘虏约二千三百人”。——综合各方史料估算，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阵亡、负伤、染病、失踪的官兵人数约在十八万以上。

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便确定：用顽强的外围作战逐渐消耗日本的国力和军力，以求达到在抗战初期的某一阶段，将日本国力和军力消耗到无法发动更大规模战役的目的。可以说，武汉会战基本上达成了这一作战目的。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在《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讲话中，针对正在进行的武汉保卫战说：“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

武汉会战后，为调整战略部署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第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百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蒋介石连续作了五次重要讲话，阐述了他对抗日战争进程的重新认识，提出将战争进程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即武汉撤退和岳阳失守前为抗战第一期、之后为抗战第二期：

……在第一期战斗过程当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去了很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是，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详细一点说，我们最高统帅部所定的这个战略，就是拿我们的劣势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我们与敌人打了十七个月，不但我们全国的部队仍能继续抵抗，使敌人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且我们抗战的精神愈益坚强，抗战必胜的自信心，也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这就是我们强固部队士气和国民心理一种最大的成功，使一般军民确信我们这次抗战一定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我们第一期抗战已稳

固地建立了这个必胜的基础……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大家要知道，敌人兵力的使用，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量。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了胜利，他这胜利，亦已经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敌人的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地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事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这就是由于我们过去十七个月的战斗，已陷敌人于泥淖，而稳定了我们最后必胜的基础……

一年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曾说过："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虽然在蒋介石所说的第一期作战中，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消耗着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和军力，并使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布局得以基本完成。但是，武汉会战还是再次暴露了中国军队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上，尽管强调了"积极的运动防御"，甚至把这一原则写进了作战指导，但大多的中国军队既没有真正领会，也不会具体实施。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曾向军事委员会建议，迅速调集军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中的日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保卫武汉。但是——

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中国军均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中国军队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去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军队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中国军队利用阻截式的利用工事做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中国军队的阵地……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

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

《孙子兵法》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也就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而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指挥作战时，依旧是连绵不断的一线阵地式防御，实力薄弱的兵力被分散在各条防御线上，既缺乏有力的预备兵团，也少有在防御中的协同攻击。“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以至于作战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每每都在应对日军主动发起的进攻，采取的措施除“剜肉补疮”外似乎没有他法。其结果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同中国的官场，结构复杂而臃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战后总结说：“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教训，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拖着如此“叠床架屋”的沉重的指挥机构，同时各指挥官又有根深蒂固的派系之见，于是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另一个致命的痼疾：没有协同意识。武汉会战中，仅第九战区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但是量的优势未能发挥即被质的劣势所抵消，没有任何协同意识的部队堆积在战场上，除了被对手各个击破外几乎起不到兵力充足的作用，以至于日军的结论是中国陆军“只有一个师”，意思是中国军队只会一个师一个师地单独作战。单独作战的表现是：协同作战不讲联络，友军危急不去相救，奉命增援敷衍了事，两军衔接推倭扯皮造成空隙。协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特质。殊不知，对于同一战场、同一战役、乃至同一战争中的每一支部队而言，“荣辱生死、胜败存亡”是紧密相关的，是互为因果的，是要共同承担的。“昧于利害，不辨是非，因而观望友军，怀疑友军，甚至规避责任，推倭责任，妄想贪生自私，而其结果，不仅贻误军机，害了友军，害了国家，而且适以自害，终必自取败亡”。关于武汉会战中的协同问题，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日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中国第三战区的所有部队均按兵不动，既没有向日军的后方或侧翼进行有力攻击以牵制敌人，也没有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这到底是中国第三战区长官的“自私”，还是中国军队高层在战略布局上根本没有协同意识？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痛切地指出了“我军之十二耻辱”：

一、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乃我军耻辱一。

二、伤兵病兵有流徙途中（如乞丐）乃我军耻辱二。

三、士兵逃亡，不能防止，乃我军耻辱三。

四、军行所致民众逃避，乃我军耻辱四。

五、谎报军情不负责任，乃我军耻辱五。

六、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由于指挥官能力缺乏，乃我军耻辱六。

七、不能贯彻命令，不能达成任务，为抗战挫失之总因，乃我军耻辱七。

八、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乃我指挥官缺乏胆识与决心，乃我军之耻辱八。

九、规避责任乃军人自私自利，贪生怕死，乃我军耻辱九。

十、缺乏秘密性能，战术上因受无上的损失，乃我军耻辱之十。

十一、谍报与侦探不健全，接战不知敌队番号，乃我军耻辱之十一。

十二、监视封锁不严密，阵地附近发生敌探与汉奸，乃我军耻辱之十二。

蒋介石要求参加南岳军事会议的所有将领“明责任、知耻辱、识时势、知彼此”，完成整理军队、建立军队之任务，提高军队作战素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

日军占领岳阳后，并没有显出继续南下攻占长沙的迹象。

但是，十一月十三日凌晨时分，长沙城内突然不明原因地燃起大火——不是个别地方失火，而是全城一片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残酷景象。到处是一片混乱，拖

儿带女的，裹着棉被背着老人孩子的，路上充满了大小汽车，喇叭嘶叫声被哭叫声淹没，车撞人，人挤人……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均付一炬，民房除车站路及城外一部未全毁外，其余全部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

长沙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市民被烧死达两万余人，房屋被焚毁五万余栋，原有四十二万人口的长沙城成为一片废墟。

令人不解的是，长沙遭此浩劫，原因竟然不明。

长沙属于中国第九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而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对于长沙大火起因说法不一。张治中说，这是一个“意外的、突发的灾变”；而陈诚则说：“寇军于十一月十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 陈诚认为，正是这一字之差，导致了张治中判断失误。只是，没有任何史据证明陈诚所说是真。

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日军南下进入湖南北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预计日军会攻占长沙，遂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并吸取武汉撤退时破坏不彻底的教训，先期制订了“焦土抗战”的原则，以备放弃长沙时不留一草一木资敌。为此，从十一月一日开始，张治中便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府迁至沅陵、市府迁至邵阳。七日，蒋介石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了放弃武汉时没有做到将城市彻底破坏的原因和后果，同时强调一旦日军兵临长沙要不惜一切将全城焚毁。军事会议结束后，张治中召集秘密会议，商讨了长沙如何焚城事宜。十一日晚，日军占领岳阳的消息传来，长沙城内一片恐慌。十二日上午九时，张治中接到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紧跟着蒋介石的电报就到了：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立即决定：焚城事宜由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负责，省保安处长

徐权协助。

中午，陈诚来到省府会晤张治中，两人在焚城一事上统一了意见。

这一天，长沙城内的紧张令张治中陷于忙乱中：伤兵须于十四日转运完毕的问题、召集新兵以紧急补充部队问题、征集民夫转移政府机构设施的问题、安抚长沙城内的外国人的问题，等等。下午四时，警备司令酆悌拿出制订好的焚城方案，张治中嘱咐：待中国军队自汨罗江撤退后再下达焚城命令，届时先放空袭警报再放紧急警报，以利还没撤离的市民紧急躲避。

但是，到了晚上，张治中发现，不但逃难的人流充斥于出城大道，而且警察局里竟然也没人了，街上所有的岗位都没了警察的踪影。张治中立刻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打电话，限他两个小时内恢复所有的岗位职守。可是，凌晨时分，当张治中想叫上文局长一起去城内巡查时，发现警察局的电话断了，副官告诉他，警察局的大门已经用竹板钉起来了。

十三日凌晨两点，张治中刚躺下，副官就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地方起火了，然后各处电话都断了——“四点酆悌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的。’”张治中的紧急处置是：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派出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对伤兵难民加以救济；维持秩序，恢复交通；设法恢复电讯交通；电呈委员长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

既然不是偶然失火，那么，长沙大火是谁放的？

从大火中逃出来的目击者说：“确有佩戴放火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后来证实，放火的是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当夜该团分为二十四个队，散布于长沙市各区，带着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点燃，然后各处同时动作。——这显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纵火。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长沙大火调查说明，从官方认定起火原因是“出于民族义愤”：

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

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事件，这一结论显得简陋不堪。

十六日，蒋介石从南岳来到大火刚刚熄灭的长沙城。

一个星期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均被判处死刑，于二十二日上午执行枪决。

不久，张治中被革职留任。

鉴于陈诚对张治中的指摘，蒋介石回到南岳后，亲笔致信陈诚言："……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以为戒慎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

一九三八年底，一个比长沙大火更令国人惊悚的大难真的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了。

毫无疑问，汪精卫是国民党内部"失败论"的首领，是"低调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南京陷落后，亲日的"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曾向汪精卫和蒋介石提出，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用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主张。建议得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接受。"灰色的文化团体"的宗旨非常简约，即反共亲日："一、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二、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当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迁至重庆后，"低调俱乐部"发展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只从事谋求与日本秘密交涉的活动，并最终形成以汪精卫为核心的投降集团。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人便开始从国民政府高层中寻找拉拢对象，以达成迅速令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和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成为联络中间人。毫无疑问，高宗武频繁地来往于上海与香港之间，日方的秘密信件应该是直接交给蒋介石审阅的。只是，尽管内心存有与日本媾和的愿望，但蒋介石绝不会同意诸如"承认满洲国"之类的屈服条件，这就使得中日高层之间的隐秘接触一波三折，最终导致日本方面对蒋介石失去耐心，并明确宣布拒绝承认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方加强了对中国的暗中外交攻势，高宗武等人借机向日本人表示，汪精卫愿意促成陷入僵局的谈判，以"调处"两国间的战事。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日军对武

汉的攻势作战已经开始，周佛海指派高宗武背着蒋介石秘密潜往东京，先后会晤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和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会晤的结果是，日本人终于探明，在中国的抗战阵营中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大相径庭，并由此确信应由汪精卫出马实现“议和”。七月十二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即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迫使蒋介石垮台”；“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显然，三十多年前便以刺杀清廷大员而名满天下的汪精卫，酷爱“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称谓。当获悉日本方面确立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后，受宠若惊的他当即召集汪派集团的主要人物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连日密议。——此时，他们已完全把蒋介石隔离在外了。

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以及广州等名城要地相继陷落，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况且，中国在战争前线尚有百万多的军队，在战场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崩溃，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除了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和被日军切断的铁路线之外，中国还有着广大辽阔的国土以及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人民。日本倾尽何等国力和军力战至何时才能将这样一个中国彻底灭亡？于是，日本方面把政治诱降的全部希望聚焦在了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不仅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且具备了日本开展诱降活动的对象所需之媚日亲日、反对抗战、反共、反蒋等基本要素。于是军部和内阁一致决定采取‘倒蒋立汪’的方针。”而汪精卫也对日本人的急切心知肚明，他在广州陷落的当天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这个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政府声明，虽然重申如果中国“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但是为了对汪精卫作出呼应，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申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十一月七日，汪精卫派高宗武为全权代表与日方开始密谈，地址在上海的重光堂。重光堂为一栋西式二层住宅，原是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密谈的核心内容是：日汪“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关于后者，日本人的计划是：汪精卫接受日本政府确定的“和平”条件后，先寻找借口设法去昆明；在他到达昆明之际，日本

政府公布“和平”条件；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然后乘飞机飞往越南河内再转香港，在香港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日本方面表示，为声援汪精卫的上述行动，侵华日军可向中国的贵州发动进攻。而关于前者，双方于十九日晚正式开始密谈，二十日晚七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同时达成的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其中《日华协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

四、“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卖国文件，被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秘密汇报。汪精卫深知日本人的条件无异于剥夺中国的独立自主权益，但是已然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他只好表示：“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精卫认可协议的立场，并承诺汪精卫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没有史料证明，在汪精卫进行上述活动时，蒋介石有所察觉。倒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对立日益加剧。汪精卫本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可等蒋介石因专于军事而辞去行政院院长时，接任的却不是汪精卫反倒是孔祥熙。虽然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参政会议长，但这只是一个参议性机构，并无政治实

权。于是，从晚清就开始参加国民革命的汪精卫，自认为是国民党第一元老级人物，却总是屈居于蒋介石的下风，他一直压抑的愤懑使得日本人的“倒蒋立汪”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的撤守，并不意味着完全战败，恰恰是中国军队于撤守过程中的不断作战严重消耗着日军，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转变。对此，汪精卫嘲讽道：“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乎不肯收手。”汪精卫给蒋介石指出的出路是：“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介石的回答是：“抗战易，和平难。”蒋介石认为：“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汪派成员的结论是：“国家已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而蒋介石对于国家的困难处境根本不予考虑，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甚至“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因此只有“下决心去国”。

为了掩人耳目，汪派叛国投敌成员分途逃离重庆：周佛海以视察昆明抗日宣传工作为名，于十二月五日离开重庆；住在成都的陶希圣以去昆明讲学为名尾随而至；同样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两天后飞赴昆明。而汪精卫本人出逃的计划是：以去昆明讲演为名，于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之所以选择八日，是因为这天蒋介石尚在桂林考察军事。可是，蒋介石提前返回了重庆，汪精卫大为惊慌，以为自己的出逃计划泄露。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十天，其间不断地琢磨蒋介石的活动安排，以给自己找寻最有力的出逃时机。十八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趁机仓皇飞往昆明。十九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等十余人飞抵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也抵达河内，而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已经抵达香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出逃成功后，发表内阁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同时申明“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于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方面合作为基础”。

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这一声明意在破坏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长篇讲演，言日本人的“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项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为奴隶国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络而成的”。日本人阴谋无非是“以防止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

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命脉”。至于日本人所说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不过是要推翻目前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中国在一年半的抗战中，以“前方百余万将士后方数百万民众的死伤牺牲，坚强奋斗，始终不屈”，为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建立了坚强的保障”。而如今的日本“民众无力，朝廷无权，政治家没有节操和见识，坐令少数少壮派军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国力动摇了国本，仅往损人利己残人以逞率兽食人的路上走去”。在日本军阀的心目中，“不但没有中国，也没有世界”。最后，蒋介石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民将“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中国人民“宁愿忍受千辛万苦，到了最后关头，宁可举国牺牲来抗战”！

然而，二十九日，位于河内的汪精卫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艳电”），明确阐释日本人的声明一为“善邻友好”，二为“共同防共”，三为“经济提携”。建议中国“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电文公开发表前，汪精卫给蒋介石写去一封私信：

介石总裁钧鉴：兹有上中央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犹忆本月九日在黄山晋谒时，铭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其待日本之觉悟。日本国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谅蒙忆及。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助我结束战争，比较有利，决不能助我至出兵参战，此早为睿断所及，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接受和平谈判，必欢然协助，国际情形大致如此，似无可疑。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党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伏望毅然决定，见之施行，不胜大愿，铭经过沈思熟虑之后，始敢为此冒昧之进言。如蒙鉴其愚呈，俯赐矜恕，幸甚，幸甚。专此，敬请崇安。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

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义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辞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汪精卫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靠，但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三十日，他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摩擦；二、在三至六个月内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三百万元；三、日军应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展开作战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汪精卫内心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已令他不惜要求敌人进攻自己的国土、轰炸自己的同胞。他的用意是：如果英美等国因为某种摩擦卷入战争，日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同时，只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顽强坚持抗战而不屈服，日本同样也没有胜算。一旦日本人最终失败了，他这个“第一流人物”也就到了命运终结的时候。

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行为以及他所发表的电文，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声讨，各战区的将领和各省府的官员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宋庆龄斥责汪精卫是“国家叛徒”；何香凝斥责汪精卫“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海外华侨纷纷捐款设立了“缉汪基金”，宣称对诛杀叛国者悬以重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则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同胞，其犀利言辞顿时震撼全国：“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汪精卫事件初始，蒋介石曾下令封锁消息，幻想汪精卫能够有所改变。即使在汪精卫公开发表通敌电文后，蒋介石还是想留一条生路好让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及至知道汪精卫不会再回重庆，蒋介石仍派人劝告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后，蒋介石派人携带护照和巨款去河内，再次劝说汪精卫“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伪政权，“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汪精卫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统局在河内成立了工作组，军统局局长戴笠亲临河内指挥布置。很快，河内

工作组侦察到了汪精卫的住所：高朗街二十七号。军统特务们决定对这里实施突然性强袭。这次于深夜开始的行刺行动，由于弄错了房间致汪精卫的心腹成员曾仲鸣夫妇当场丧命，而汪精卫本人躲过一劫。——军统的行刺也使汪精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与所有谴责他声讨他乃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已经不共戴天，今后他只有依靠同样令他惴惴不安的日本人了。

就在汪精卫逃离重庆的时候，同在这片国土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奔波在路上——他们不是背离国土而去，而是走向国土的更深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沦陷区的百姓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向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大后方开始长途迁徙。——抗日战争中，中国巨大的难民潮，其流离人数之多、流徙时间之久、生存境遇之悲惨，乃中外近代史所罕见。由于面对的是异国的侵略，因此难民几乎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失去土地的农民、商人、工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以及下层官吏。难民潮最早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大批东北难民涌入关内。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又汇入全国性的难民潮中。北平沦陷前，城内的富裕人家已携带家财细软外迁。日军占领北平后，大批平民为躲避战乱举家出城，由于天津距离北平最近，导致天津租界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数十万难民。及至天津沦陷，逃离天津的难民沿平津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洪流。火车不通难民就徒步向南，有钱人则从天津乘船到山东烟台或青岛。日军占领德州和济南后，有钱人又拥挤到青岛港购买昂贵的船票向上海流动，而更多的难民则徒步沿着津浦路南下。济南城原有人口四十多万，难民出逃后城内仅剩万余人，且大部分是依附日军的汉奸官吏，或者是无力迁移的赤贫者。中原地区河北、河南的难民，则沿着平汉路和陇海路南迁，以近百万的规模流入陕西。陕西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流民，于是难民开始向更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方向流动，有的举家一直走到了新疆。淞沪会战后，战火不但把华东地区的难民裹挟在内，从东北、华北流动来的难民也开始再次迁徙。数百万的难民逐步向西或向南迁移，徒步者塞满道路，木船在河湖港汊中更是首尾相接数十里。上海、无锡、苏州、镇江、芜湖、江阴、扬州，都是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区，难民纷纷逃入南京，期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南京很快陷落，难民又追随政府迁徙到武汉。华南地区的难民潮随着广州的陷落而出现。中国的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广东、福建等地的居民不是逃进山区，便是向香港、澳门方向移动，有的更直接下了南洋。国民政府宣布放弃武汉后，西迁的难民潮大约分成三股：一股经湖北西北部进入四川和陕西，一股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股从湖南南部和广东进入广西西部。其中最大的一股难民，追随着国民政府，

涌入四川盆地。——四川盆地，一个四周被险峻山峰包围着的巨大平原，成为中国百姓最后的避难所。

雾气蒙蒙而又湿漉漉的公路上挤满了老年妇女、儿童、各种各样的士兵、大车、独轮车以及黄包车……身穿半现代化丝绸衣裙与凉鞋的小巧玲珑的中国女孩；在长木棍的帮助下保持平衡并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踉跄而行的缠足老妇；偶尔出现的老年男人；乘坐黄包车的富商的妻子；麻木而又步履沉重的村姑；浑身湿透却在这条中国人建立的漫长的逃难之路上显得无动于衷的小孩；坐在沉重的木轮牛车上的整个家庭，这些大车由一些难以想象的家畜的组合牵引着，他们那点可怜的家当与他们身旁疾行而过的士兵的装备混杂在一起；婴儿则被放置在有着很小的轮子的木箱里，或者背在走路踉踉跄跄的较大一点孩子的后背上，偶尔也有身体强健的农夫驾着装得满满的巨大的独轮车车辕，他们所剩无几的驴子或是妻子及孩子在前面奋力拉着车子，所有这些人都与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难以区别地混杂在一起。

尽管国民政府设立了难民救济机构，但所能提供的帮助杯水车薪。

最为恐怖的是日军的追杀。

难民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群。成千上万的难民被日军追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驱赶到一起集体屠杀。乘坐火车的难民认为可能不会被日军追上，但是在铁路沿线或是在列车站台，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地面上是日军官兵的突然而至。男人们被日军视为泄愤的对象，劫掠财物之后，多数被当作活人靶子用以训练刚从日本国内来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难民中的女人和儿童境遇最为悲惨。她们跌跌撞撞地走在漫长的逃难路上，满面尘灰，衣衫褴褛，饥渴难耐，在日军的追杀中惶恐不知所措，女人于绝境中与孩子失散，然后在日军残暴的侮辱下，不是痛苦中死去便是精神失常地呼号。

这是一片苦难的大地。

有史料粗略地统计过，仅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难民总数达到八千万以上。

秉性并不愿意迁移的人们，之所以背井离乡，之所以成为难民，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日本人发放的那张“良民证”。他们可以在沦陷区当被统治者，但是他们选择了抗争，作为手无寸铁的一群人，他们抗争的方式

是远走他乡。

中国人远走他乡的时候，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一切。

日军发动进攻武汉的作战后，继上海的民族工业大迁徙后，中国倾尽举国之力的又一场大迁徙开始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四川。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马当要塞失守，国民政府即刻下令拆移武汉的工业设备。工人们喊着号子，把从上海运来的沉重设备拆卸搬运，再次转上船只或火车。除了一些工厂沿陆路迁至湘西、湘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省外，大部分则沿长江水路向着重庆溯江而上，宜昌因此成为最繁忙的中转站，江边的工业设备堆积如山，而江中轮船、木船和小型拖船在船工的号子声中前后衔接，昼夜航行。据《民国档案》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底，中国从华东、华中迁往内地的工厂达三百零四家，其中迁往四川的有一百三十四家。这些工厂包括机器五金、电器无线电、陶瓷玻璃、化学、罐头食品、印刷文具、纺织印染、矿业等等，这是基础薄弱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精华，是维持战争的工业能力的最后一点家当，也是昭示着一个民族不屈服的无声的宣言。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统辖区内，共有专科以上高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北平十四所，上海二十五所，河北和天津八所，广东七所，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早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就曾大规模地轰炸上海的同济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南开大学数小时之久。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先后有选择地重点轰炸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等二十三所著名院校。因此，自一九三七年始，除个别的教会学校之外，中国国土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始了向西南的迁移，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迁移奇观。毫无疑问，中国高校的迁徙与国民政府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国民政府深知，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和文化与守卫这片国土同等重要。国民政府于支撑战争而万分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专款，对所有迁移的高校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上的保障：给予内迁的高校师生生活救济；发放教育津贴、教育无息贷款以及减免学杂费用。国民政府希望这个国家优秀的学者以及年轻的学生在战争环境下把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顽强地进行下去。

最先迁徙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平津沦陷后，这所著名高校决定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新校，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代表、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为筹备委员。在日军的迫近和封锁下，三所高校迁出时携带的图书和科研仪器并不多，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便开学了。南京沦陷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徙，目的地是云南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没有直达的铁路，也没有条件完好的公路，只能乘火车先到广州，然后转到香港，再从海路到越南的海防，改乘滇越铁路线上的火车。参加迁移的八百多师生分成两路：身体弱的和女师生乘火车，由教务长樊际昌率领；另一路由男师生组成，从湖南进贵州，从贵州入云南，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艰难行走六十八天后，终于抵达昆明。抵达昆明后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日本侵略者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时候，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一所代表着中国教育文化最高水准的大学在西南开学了，文、理、工、法商、师范共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时间，全中国的知名学者和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此，教师有吴大猷、周培源、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赵九章……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郭永怀、汪曾祺、殷海光……

至今为中国人深情记忆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是：刚毅坚卓。

同时西迁的中国著名学府还有：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

文化不死，民族永存。

这片国土生存欲望之顽强、承受磨难意志之坚韧，世所罕见！大迁移途中的课堂上，师生们在山野茅棚下，阅读着中华文明史，这部历史证明“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

真正代表一个民族不屈意志的是人民。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一九三九年到来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的第三十一、第八十四、第三十九军向鄂北广水附近的洛阳店及马坪集结。

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的第五十九、第七十七、第六十八军，向鄂中应城以西的坪坝集结。

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的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三十六军，担任位于武汉西南方向的金口以西长江南岸的守备。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撤退到平汉路以西，向鄂中的钟祥集结；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撤退到鄂北的枣阳；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的第四十四、第六十七军向鄂南的潜江转移；第八十七军刘膺古部向潜江以东的沔阳转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退到鄂北随县。

只是，撤退命令一经下达，部署便成一纸空文。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近查各军撤退以后，均未能遵照制定地点遂行任务，川军各将领多到宜昌，队伍凌乱，无法指挥，又无生力军部队担任掩护。"

川军擅自撤至宜昌，是因为那里离他们的家乡不远了。李宗仁对溃兵如潮既愤怒又无奈，他指责川军只是一个借口，更令他怒不可遏的是中央军部队根本不听他这个桂系将领的指挥：

十月十二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相互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胡宗南的擅自西撤，差点要了李宗仁的命。当时李宗仁率战区司令长官部刚撤至平汉路花园站以西的陈村，突然发现正面的胡宗南部不知去向，于是急调附近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和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来武胜

关和平靖关，以填补胡宗南的防线。但是，大军全线撤退之时，司令长官部根本联系不上覃连芳，刘汝明部也已经跑到了应城。焦灼万分的李宗仁“惊觉战况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令通知长官部同人速即整装，向西移动”。——他们离开陈村两个小时后，日军骑兵就冲进了村庄。

武汉前线中国军队的混乱，令蒋介石大为光火，他给一系列将领同时发去电报，说如此混乱的撤退将成为中外媒体的笑谈，对于这种只图逃命的无耻行为必须严惩：

一、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二、查放弃武汉原为预定计划，进至武汉之敌，已极疲惫不堪，南犯之敌不多，而我该方面部队竟不审敌之兵力，我有多数部队，不知筹划使用，有良好地形，不知利用防守，只图逃命溃走，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军之精神。此后应力挽颓风，凡无令擅退，不论各级长官，均照连坐法严厉执行，并着陈长官查明此次从新店镇、崇阳狼狈撤退部队具报，以凭核办。三、南江桥至城陵矶之线应尽力固守，无命令不得先期撤退，致干惩处。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蒋介石离开武汉后，乘车先至湖北钟祥，然后经沙市、常德“拟返长沙”。不料行至十里铺时，汽车发生故障，白崇禧只有在路边等待司机修理。不一会，周恩来的汽车恰好经过此地，他告诉白崇禧敌人的骑兵部队距这里已经不远了，请白崇禧坐他的车一起去长沙。白崇禧不知自己的车何时才能修好，乃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留学法国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其知识丰富。”

最后撤离武汉的，是中国第九战区守城部队第一八五师。撤退前，官兵们完成了对城内重要军事设施的破坏，并掩护仅剩的一些政府机关人员渡过了长江和汉水。

蒋介石离开武汉的第二天，日军第六师团在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主力占领汉口北郊的戴家山阵地，其先头部队直接冲进了汉口。波田支队得到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的增援，在海军第三舰队的配合下，从阳新向北进攻武昌。二十四日，击退中国守军第九十四军第五十五师的阻击后，波田支队占领武昌东面的葛店，先头部队于二十六日凌

晨冲入武昌。二十七日，日军第十五师团主力从武昌渡过长江攻占汉阳。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沦陷。

只是，日军占领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

日军占领武汉后，第十师团、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兵分三路南下攻占岳阳。至此，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隔着赣西北之修水、湘东北之新墙河形成对峙。

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对中国军队放弃武汉作了这样的解释：

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以扬言进图武汉，追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全力，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敌军死亡超过前期作战一年以来之总数。敌人计无复逞，乃不得不暴露其弱点，以发动华南之侵战，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国际通路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缺乏……自敌入侵粤以后，粤汉交通既被截断，则武汉在一般局势上之重要性，显已减轻。至就军事而言，武汉在军事上的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如此，不唯无需于武汉之核心，且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致不能发展全面之实力。敌人用意，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陷于困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图；以时间而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绝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

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僇（戮）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语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之成功，必赖于最艰辛之努力与大无畏之奋斗。又曰："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必须吾人抱定最大之决心，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彻底之解放。国家存亡，抗战成败之关键，全系于此，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

为了攻取中国武汉，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初期投入作战的兵力约为二十五万，会战期间又数次补充，最后投入的总兵力约为三十万。日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海陆空装备上的优势，苦战数月，最终却没能达到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预期目的，自身却损失严重。日本陆军第十一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四千五百零六人（内将校一百七十二），负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内将校五百二十六），伤亡合计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内将校六百九十八）"；日本陆军第二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约二千三百人，负伤约七千三百人"，连同海军和航空兵的伤亡，总计约为三万五千五百人。——尽管中国军队战斗详报的数字偏高，但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却明显偏低。白崇禧的记述是：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陆军伤亡人数当在五万左右。如果再加上海军和航空兵、加上在酷热中患病以及失踪官兵的人数，日军损伤兵力约计九万。

在武汉会战中，武器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于酷暑中苦战大别山麓和江汉平原，在日军飞机、大炮和毒气等大杀伤性武器的杀戮之下，后勤供给不足，伤员难以转运，加上热带疾病流行，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第十一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十四万三千四百九十三具，俘虏约九千五百八十一人"。日军第二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五万二千具，俘虏约二千三百人"。——综合各方史料估算，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阵亡、负伤、染病、失踪的官兵人数约在十八万以上。

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便确定：用顽强的外围作战逐渐消耗日本的国力和军力，以求达到在抗战初期的某一阶段，将日本国力和军力消耗到无法发动更大规模战役的目的。可以说，武汉会战基本上达

成了这一作战目的。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在《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讲话中，针对正在进行的武汉保卫战说："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

武汉会战后，为调整战略部署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第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百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蒋介石连续作了五次重要讲话，阐述了他对抗日战争进程的重新认识，提出将战争进程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即武汉撤退和岳阳失守前为抗战第一期、之后为抗战第二期：

……在第一期战斗过程当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去了很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是，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详细一点说，我们最高统帅部所定的这个战略，就是拿我们的劣势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我们与敌人打了十七个月，不但我们全国的部队仍能继续抵抗，使敌人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且我们抗战的精神愈益坚强，抗战必胜的自信心，也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这就是我们强固部队士气和国民心理一种最大的成功，使一般军民确信我们这次抗战一定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我们第一期抗战已稳固地建立了这个必胜的基础……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大家要知道，敌人兵力的使用，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量。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了胜利，他这胜利，亦已经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敌人的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地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事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这就

是由于我们过去十七个月的战斗，已陷敌人于泥淖，而稳定了我们最后必胜的基础……

一年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曾说过：“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虽然在蒋介石所说的第一期作战中，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消耗着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和军力，并使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布局得以基本完成。但是，武汉会战还是再次暴露了中国军队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上，尽管强调了“积极的运动防御”，甚至把这一原则写进了作战指导，但大多的中国军队既没有真正领会，也不会具体实施。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曾向军事委员会建议，迅速调集军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中的日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保卫武汉。但是——

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中国军均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中国军队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去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军队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中国军队利用阻截式的利用工事做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中国军队的阵地……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

《孙子兵法》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也就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而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指挥作战时，依旧是连绵不断的一线阵地式防御，实力薄弱的兵力被分散在各条防御线上，既缺乏有力的预备兵团，也少有在防御中的协同攻击。“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以至于作战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每每都在

应对日军主动发起的进攻，采取的措施除“剜肉补疮”外似乎没有他法。其结果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同中国的官场，结构复杂而臃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战后总结说：“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教训，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拖着如此“叠床架屋”的沉重的指挥机构，同时各指挥官又有根深蒂固的派系之见，于是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另一个致命的痼疾：没有协同意识。武汉会战中，仅第九战区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但是量的优势未能发挥即被质的劣势所抵消，没有任何协同意识的部队堆积在战场上，除了被对手各个击破外几乎起不到兵力充足的作用，以至于日军的结论是中国陆军“只有一个师”，意思是中国军队只会一个师一个师地单独作战。单独作战的表现是：协同作战不讲联络，友军危急不去相救，奉命增援敷衍了事，两军衔接推倭扯皮造成空隙。协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特质。殊不知，对于同一战场、同一战役、乃至同一战争中的每一支部队而言，“荣辱生死、胜败存亡”是紧密相关的，是互为因果的，是要共同承担的。“昧于利害，不辨是非，因而观望友军，怀疑友军，甚至规避责任，推倭责任，妄想贪生自私，而其结果，不仅贻误军机，害了友军，害了国家，而且适以自害，终必自取败亡”。关于武汉会战中的协同问题，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日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中国第三战区的所有部队均按兵不动，既没有向日军的后方或侧翼进行有力攻击以牵制敌人，也没有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这到底是中国第三战区长官的“自私”，还是中国军队高层在战略布局上根本没有协同意识？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痛切地指出了“我军之十二耻辱”：

一、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乃我军耻辱一。

二、伤兵病兵有流徙途中（如乞丐）乃我军耻辱二。

三、士兵逃亡，不能防止，乃我军耻辱三。

四、军行所致民众逃避，乃我军耻辱四。

五、谎报军情不负责任，乃我军耻辱五。

六、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由于指挥官能力缺乏，乃我军耻辱六。

七、不能贯彻命令，不能达成任务，为抗战挫失之总因，乃我军耻辱七。

八、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乃我指挥官缺乏胆识与决心，乃我军之耻辱八。

九、规避责任乃军人自私自利，贪生怕死，乃我军耻辱九。

十、缺乏秘密性能，战术上因受无上的损失，乃我军耻辱之十。

十一、谍报与侦探不健全，接战不知敌队番号，乃我军耻辱之十一。

十二、监视封锁不严密，阵地附近发生敌探与汉奸，乃我军耻辱之十二。

蒋介石要求参加南岳军事会议的所有将领“明责任、知耻辱、识时势、知彼此”，完成整理军队、建立军队之任务，提高军队作战素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

日军占领岳阳后，并没有显出继续南下攻占长沙的迹象。

但是，十一月十三日凌晨时分，长沙城内突然不明原因地燃起大火——不是个别地方失火，而是全城一片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残酷景象。到处是一片混乱，拖儿带女的，裹着棉被背着老人孩子的，路上充满了大小汽车，喇叭嘶叫声被哭叫声淹没，车撞人，人挤人……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均付一炬，民房除车站路及城外一部未全毁外，其余全部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

长沙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市民被烧死达两万余人，房屋被焚毁五万余栋，原有四十二万人口的长沙城成为一片废墟。

令人不解的是，长沙遭此浩劫，原因竟然不明。

长沙属于中国第九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而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对于长沙大火起因说法不一。张治中说，这是一个“意外的、突发的灾变”；而陈诚则说：“寇军于十一月十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 陈诚认为，正是这一字之差，导致了张治中判断失误。只是，没有任何史据证明陈诚所说是真。

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日军南下进入湖南北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预计日军会攻占长沙，遂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并吸取武汉撤退时破坏不彻底的教训，先期制订了“焦土抗战”的原则，以备放弃长沙时不留一草一木资敌。为此，从十一月一日开始，张治中便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府迁至沅陵、市府迁至邵阳。七日，蒋介石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了放弃武汉时没有做到将城市彻底破坏的原因和后果，同时强调一旦日军兵临长沙要不惜一切将全城焚毁。军事会议结束后，张治中召集秘密会议，商讨了长沙如何焚城事宜。十一日晚，日军占领岳阳的消息传来，长沙城内一片恐慌。十二日上午九时，张治中接到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紧跟着蒋介石的电报就到了：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立即决定：焚城事宜由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负责，省保安处长徐权协助。

中午，陈诚来到省府会晤张治中，两人在焚城一事上统一了意见。

这一天，长沙城内的紧张令张治中陷于忙乱中：伤兵须于十四日转运完毕的问题、召集新兵以紧急补充部队问题、征集民夫转移政府机构设施的问题、安抚长沙城内的外国人的问题，等等。下午四时，警备司令酆悌拿出制订好的焚城方案，张治中嘱咐：待中国军队自汨罗江撤退后再下达焚城命令，届时先放空袭警报再放紧急警报，以利还没撤离的市民紧急躲避。

但是，到了晚上，张治中发现，不但逃难的人流充斥于出城大道，而且警察局里竟然也没人了，街上所有的岗位都没了警察的踪影。张治中立刻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打电话，限他两个小时内恢复所有的岗位职守。可是，凌晨时分，当张治中想叫上文局长一起去城内巡查时，发现警察局的电话断了，副官告诉他，警察局的大门已经用竹板钉起来了。

十三日凌晨两点，张治中刚躺下，副官就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地方起火了，然后各处电话都断了——“四点酆悌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的。’”张治中的紧急处置是：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派出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对伤兵难民加以救济；维持秩序，恢复交通；设法恢复电讯交通；电呈委员长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

既然不是偶然失火，那么，长沙大火是谁放的？

从大火中逃出来的目击者说：“确有佩戴放火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后来证实，放火的是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当夜该团分为二十四个队，散布于长沙市各区，带着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点燃，然后各处同时动作。——这显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纵火。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长沙大火调查说明，从官方认定起火原因是“出于民族义愤”：

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事件，这一结论显得简陋不堪。

十六日，蒋介石从南岳来到大火刚刚熄灭的长沙城。

一个星期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均被判处死刑，于二十二日上午执行枪决。

不久，张治中被革职留任。

鉴于陈诚对张治中的指摘，蒋介石回到南岳后，亲笔致信陈诚

言：“……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以为戒慎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

一九三八年底，一个比长沙大火更令国人惊悚的大难真的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了。

毫无疑问，汪精卫是国民党内部“失败论”的首领，是“低调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南京陷落后，亲日的“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曾向汪精卫和蒋介石提出，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用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主张。建议得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接受。“灰色的文化团体”的宗旨非常简约，即反共亲日：“一、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二、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当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迁至重庆后，“低调俱乐部”发展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只从事谋求与日本秘密交涉的活动，并最终形成以汪精卫为核心的投降集团。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人便开始从国民政府高层中寻找拉拢对象，以达成迅速令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和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成为联络中间人。毫无疑问，高宗武频繁地来往于上海与香港之间，日方的秘密信件应该是直接交给蒋介石审阅的。只是，尽管内心存有与日本媾和的愿望，但蒋介石绝不会同意诸如“承认满洲国”之类的屈服条件，这就使得中日高层之间的隐秘接触一波三折，最终导致日本方面对蒋介石失去耐心，并明确宣布拒绝承认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方加强了对中国的暗中外交攻势，高宗武等人借机向日本人表示，汪精卫愿意促成陷入僵局的谈判，以“调处”两国间的战事。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日军对武汉的攻势作战已经开始，周佛海指派高宗武背着蒋介石秘密潜往东京，先后会晤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和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会晤的结果是，日本人终于探明，在中国的抗战阵营中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大相径庭，并由此确信应由汪精卫出马实现“议和”。七月十二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即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迫使蒋介石垮台”；“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显然，三十多年前便以刺杀清廷大员而名满天下的汪精卫，酷爱“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称谓。当获悉日本方面确立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后，受宠若惊的他当即召集汪派集团的主要人物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连日密议。——此时，他们已完全把

蒋介石隔离在外了。

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以及广州等名城要地相继陷落，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况且，中国在战争前线尚有百万多的军队，在战场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崩溃，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除了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和被日军切断的铁路线之外，中国还有着广大辽阔的国土以及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人民。日本倾尽何等国力和军力战至何时才能将这样一个中国彻底灭亡？于是，日本方面把政治诱降的全部希望聚焦在了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不仅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且具备了日本开展诱降活动的对象所需之媚日亲日、反对抗战、反共、反蒋等基本要素。于是军部和内阁一致决定采取‘倒蒋立汪’的方针。”而汪精卫也对日本人的急切心知肚明，他在广州陷落的当天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这个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政府声明，虽然重申如果中国“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但是为了对汪精卫作出呼应，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申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十一月七日，汪精卫派高宗武为全权代表与日方开始密谈，地址在上海的重光堂。重光堂为一栋西式二层住宅，原是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密谈的核心内容是：日汪“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关于后者，日本人的计划是：汪精卫接受日本政府确定的“和平”条件后，先寻找借口设法去昆明；在他到达昆明之际，日本政府公布“和平”条件；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然后乘飞机飞往越南河内再转香港，在香港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日本方面表示，为声援汪精卫的上述行动，侵华日军可向中国的贵州发动进攻。而关于前者，双方于十九日晚正式开始密谈，二十日晚七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同时达成的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其中《日华协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

四、“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卖国文件，被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秘密汇报。汪精卫深知日本人的条件无异于剥夺中国的独立自主权益，但是已然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他只好表示：“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精卫认可协议的立场，并承诺汪精卫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没有史料证明，在汪精卫进行上述活动时，蒋介石有所察觉。倒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对立日益加剧。汪精卫本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可等蒋介石因专于军事而辞去行政院院长时，接任的却不是汪精卫反倒是孔祥熙。虽然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参政会议长，但这只是一个参议性机构，并无政治实权。于是，从晚清就开始参加国民革命的汪精卫，自认为是国民党第一元老级人物，却总是屈居于蒋介石的下风，他一直压抑的愤懑使得日本人的“倒蒋立汪”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的撤守，并不意味着完全战败，恰恰是中国军队于撤守过程中的不断作战严重消耗着日军，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转变。对此，汪精卫嘲讽道：“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乎不肯收手。”汪精卫给蒋介石指出的出路是：“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介石的回答是：“抗战易，和平难。”蒋介石认为：“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汪派成员的结论是：“国家已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而蒋介石对于国家的困难处境根本不予考虑，对“日本

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甚至“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因此只有“下决心去国”。

为了掩人耳目，汪派叛国投敌成员分途逃离重庆：周佛海以视察昆明抗日宣传工作为名，于十二月五日离开重庆；住在成都的陶希圣以去昆明讲学为名尾随而至；同样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两天后飞赴昆明。而汪精卫本人出逃的计划是：以去昆明讲演为名，于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之所以选择八日，是因为这天蒋介石尚在桂林考察军事。可是，蒋介石提前返回了重庆，汪精卫大为惊慌，以为自己的出逃计划泄露。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十天，其间不断地琢磨蒋介石的活动安排，以给自己找寻最有力的出逃时机。十八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趁机仓皇飞往昆明。十九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等十余人飞抵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也抵达河内，而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已经抵达香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出逃成功后，发表内阁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同时申明“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于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方面合作为基础”。

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这一声明意在破坏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长篇讲演，言日本人的“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项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为奴隶国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络而成的”。日本人阴谋无非是“以防止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命脉”。至于日本人所说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不过是要推翻目前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中国在一年半的抗战中，以“前方百余万将士后方数百万民众的死伤牺牲，坚强奋斗，始终不屈”，为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建立了坚强的保障”。而如今的日本“民众无力，朝廷无权，政治家没有节操和见识，坐令少数少壮派军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国力动摇了国本，仅往损人利己残人以逞率兽食人的路上走去”。在日本军阀的心目中，“不但没有中国，也没有世界”。最后，蒋介石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民将“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中国人民“宁愿忍受千辛万苦，到了最后关头，宁可举国牺牲来抗战”！

然而，二十九日，位于河内的汪精卫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艳电”），明确阐释日本人的声明一为“善邻友好”，二为“共同防共”，三为“经济提携”。建议中国“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电文公开发表前，汪精卫给蒋介石写去一封私信：

介石总裁钧鉴：兹有上中央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犹忆本月九日在黄山晋谒时，铭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其待日本之觉悟。日本国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谅蒙忆及。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助我结束战争，比较有利，决不能助我至出兵参战，此早为睿断所及，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接受和平谈判，必欢然协助，国际情形大致如此，似无可疑。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党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伏望毅然决定，见之施行，不胜大愿，铭经过沈思熟虑之后，始敢为此冒昧之进言。如蒙鉴其愚呈，俯赐矜恕，幸甚，幸甚。专此，敬请崇安。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义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辞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汪精卫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靠，但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三十日，他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摩擦；二、在三至六个月内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三百万元；三、日军应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展开作战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汪精卫内心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已令他不惜要求敌人进攻自己的国

士、轰炸自己的同胞。他的用意是：如果英美等国因为某种摩擦卷入战争，日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同时，只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顽强坚持抗战而不屈服，日本同样也没有胜算。一旦日本人最终失败了，他这个“第一流人物”也就到了命运终结的时候。

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行为以及他所发表的电文，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声讨，各战区的将领和各省府的官员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宋庆龄斥责汪精卫是“国家叛徒”；何香凝斥责汪精卫“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海外华侨纷纷捐款设立了“缉汪基金”，宣称对诛杀叛国者悬以重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则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同胞，其犀利言辞顿时震撼全国：“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汪精卫事件初始，蒋介石曾下令封锁消息，幻想汪精卫能够有所改变。即使在汪精卫公开发表通敌电文后，蒋介石还是想留一条生路好让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及至知道汪精卫不会再回重庆，蒋介石仍派人劝告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后，蒋介石派人携带护照和巨款去河内，再次劝说汪精卫“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伪政权，“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汪精卫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统局在河内成立了工作组，军统局局长戴笠亲临河内指挥布置。很快，河内工作组侦察到了汪精卫的住所：高朗街二十七号。军统特务们决定对这里实施突然性强袭。这次于深夜开始的行刺行动，由于弄错了房间致汪精卫的心腹成员曾仲鸣夫妇当场丧命，而汪精卫本人躲过一劫。——军统的行刺也使汪精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与所有谴责他声讨他乃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已经不共戴天，今后他只有依靠同样令他惴惴不安的日本人了。

就在汪精卫逃离重庆的时候，同在这片国土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奔波在路上——他们不是背离国土而去，而是走向国土的更深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沦陷区的百姓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向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大后方开始长途迁徙。——抗日战争中，中国巨大的难民潮，其流离人数之多、流徙时间之久、生存境遇之悲惨，乃中外近代史所罕见。

由于面对的是异国的侵略，因此难民几乎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失去土地的农民、商人、工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以及下层官吏。难民潮最早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大批东北难民涌入关内。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又汇入全国性的难民潮中。北平沦陷前，城内的富裕人家已携带家财细软外迁。日军占领北平后，大批平民为躲避战乱举家出城，由于天津距离北平最近，导致天津租界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数十万难民。及至天津沦陷，逃离天津的难民沿平津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洪流。火车不通难民就徒步向南，有钱人则从天津乘船到山东烟台或青岛。日军占领德州和济南后，有钱人又拥挤到青岛港购买昂贵的船票向上海流动，而更多的难民则徒步沿着津浦路南下。济南城原有人口四十多万，难民出逃后城内仅剩万余人，且大部分是依附日军的汉奸官吏，或者是无力迁移的赤贫者。中原地区河北、河南的难民，则沿着平汉路和陇海路南迁，以近百万的规模流入陕西。陕西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流民，于是难民开始向更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方向流动，有的举家一直走到了新疆。淞沪会战后，战火不但把华东地区的难民裹挟在内，从东北、华北流动来的难民也开始再次迁徙。数百万的难民逐步向西或向南迁移，徒步者塞满道路，木船在河湖港汊中更是首尾相接数十里。上海、无锡、苏州、镇江、芜湖、江阴、扬州，都是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区，难民纷纷逃入南京，期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南京很快陷落，难民又追随政府迁徙到武汉。华南地区的难民潮随着广州的陷落而出现。中国的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广东、福建等地的居民不是逃进山区，便是向香港、澳门方向移动，有的更直接下了南洋。国民政府宣布放弃武汉后，西迁的难民潮大约分成三股：一股经湖北西北部进入四川和陕西，一股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股从湖南南部和广东进入广西西部。其中最大的一股难民，追随着国民政府，涌入四川盆地。——四川盆地，一个四周被险峻山峰包围着的巨大平原，成为中国百姓最后的避难所。

雾气蒙蒙而又湿漉漉的公路上挤满了老年妇女、儿童、各种各样的士兵、大车、独轮车以及黄包车……身穿半现代化丝绸衣裙与凉鞋的小巧玲珑的中国女孩；在长木棍的帮助下保持平衡并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踉跄而行的缠足老妇；偶尔出现的老年男人；乘坐黄包车的富商的妻子；麻木而又步履沉重的村姑；浑身湿透却在这条中国人建立的漫长的逃难之路上显得无动于衷的小孩；坐在沉重的木轮牛车上的整个家庭，这些大车由一些难以想象的家畜的组合牵引着，他们那点可怜的家当与他们身旁疾行而过的士兵的装备混杂在一起；婴儿则被放置在有着很小的轮子的木箱里，或者背在走路踉踉跄跄的较大一点孩子的后背上，偶尔也

有身体强健的农夫驾着装得满满的巨大的独轮车车辕，他们所剩无几的驴子或是妻子及孩子在前面奋力拉着车子，所有这些人都与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难以区别地混杂在一起。

尽管国民政府设立了难民救济机构，但所能提供的帮助杯水车薪。

最为恐怖的是日军的追杀。

难民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群。成千上万的难民被日军追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驱赶到一起集体屠杀。乘坐火车的难民认为可能不会被日军追上，但是在铁路沿线或是在列车站台，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地面上是日军官兵的突然而至。男人们被日军视为泄愤的对象，劫掠财物之后，多数被当作活人靶子用以训练刚从日本国内来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难民中的女人和儿童境遇最为悲惨。她们跌跌撞撞地走在漫长的逃难路上，满面尘灰，衣衫褴褛，饥渴难耐，在日军的追杀中惶恐不知所措，女人于绝境中与孩子失散，然后在日军残暴的侮辱下，不是痛苦中死去便是精神失常地呼号。

这是一片苦难的大地。

有史料粗略地统计过，仅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难民总数达到八千万以上。

秉性并不愿意迁移的人们，之所以背井离乡，之所以成为难民，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日本人发放的那张“良民证”。他们可以在沦陷区当被统治者，但是他们选择了抗争，作为手无寸铁的一群人，他们抗争的方式是远走他乡。

中国人远走他乡的时候，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一切。

日军发动进攻武汉的作战后，继上海的民族工业大迁徙后，中国倾尽举国之力的又一场大迁徙开始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四川。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马当要塞失守，国民政府即刻下令拆移武汉的工业设备。工人们喊着号子，把从上海运来的沉重设备拆卸搬运，再次转上船只或火车。除了一些工厂沿陆路迁至湘西、湘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省外，大部分则沿长江水路向着重庆溯江而上，宜昌因此成为最繁忙的中转站，江边的工业设备堆积如山，而江中轮船、木船和小型拖船在船工的号子声中前后衔接，昼夜航行。据《民国档案》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底，中国从华东、华中迁往内地的工厂达三百零四家，其中迁往四川

的有一百三十四家。这些工厂包括机器五金、电器无线电、陶瓷玻璃、化学、罐头食品、印刷文具、纺织印染、矿业等等，这是基础薄弱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精华，是维持战争的工业能力的最后一点家当，也是昭示着一个民族不屈服的无声的宣言。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统辖区内，共有专科以上高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北平十四所，上海二十五所，河北和天津八所，广东七所，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早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就曾大规模地轰炸上海的同济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南开大学数小时之久。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先后有选择地重点轰炸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等二十三所著名院校。因此，自一九三七年始，除个别的教会学校之外，中国国土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始了向西南的迁移，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迁移奇观。毫无疑问，中国高校的迁徙与国民政府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国民政府深知，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和文化与守卫这片国土同等重要。国民政府于支撑战争而万分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专款，对所有迁移的高校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上的保障：给予内迁的高校师生生活救济；发放教育津贴、教育无息贷款以及减免学杂费用。国民政府希望这个国家优秀的学者以及年轻的学生在战争环境下把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顽强地进行下去。

最先迁徙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平津沦陷后，这所著名高校决定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新校，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代表、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为筹备委员。在日军的迫近和封锁下，三所高校迁出时携带的图书和科研仪器并不多，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便开学了。南京沦陷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徙，目的地是云南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没有直达的铁路，也没有条件完好的公路，只能乘火车先到广州，然后转到香港，再从海路到越南的海防，改乘滇越铁路线上的火车。参加迁移的八百多师生分成两路：身体弱的和女师生乘火车，由教务长樊际昌率领；另一路由男师生组成，从湖南进贵州，从贵州入云南，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艰难行走六十八天后，终于抵达昆明。抵达昆明后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日本侵略者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时候，一九三

八年五月四日，一所代表着中国教育文化最高水准的大学在西南开学了，文、理、工、法商、师范共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时间，全中国的知名学者和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此，教师有吴大猷、周培源、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赵九章……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郭永怀、汪曾祺、殷海光……

至今为中国人深情记忆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是：刚毅坚卓。

同时西迁的中国著名学府还有：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

文化不死，民族永存。

这片国土生存欲望之顽强、承受磨难意志之坚韧，世所罕见！大迁移途中的课堂上，师生们在山野茅棚下，阅读着中华文明史，这部历史证明“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

真正代表一个民族不屈意志的是人民。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一九三九年到来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十六章

相持阶段的到来

一九三九年元旦，陪都重庆。

为加强抗战后方的纵深，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西康省位于川藏之间，分康定、雅安和西昌三个区，辖区面积相当于五个浙江省。被任命的西康省政府主席，是与蒋介石有着很深隔阂的川军首领刘文辉。为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抗战，刘文辉特地把雅安最宽的一条街命名为“中正街”。人烟稀少的西康省，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少数民族多数是康巴人。在当时的中国，没多少人清楚西康到底是什么样地方，只是其省会康定后来却为国人熟知——因为那首“张家大哥”爱上了“李家大姐”的《康定情歌》脍炙人口。

执政的国民党人，自一九三九年初开始，按照军事委员会的说法，即抗战的“第二期”开始时，竟然发现政府已经没钱了。

抗战近二十个月，国民政府丢掉了二十五个主要城市，几乎涵盖中国所有的物产精华地区。农作物丰产区以及工矿企业集中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使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受到极大打击；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工矿企业虽向后方转移了大部，但原材料供应短缺、生产设备陈旧以及技术工人的缺乏，使得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急剧萎缩。国民政府的税制中没有所得税，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海关，但沿海的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汕头、南通、宁波等重要海关丢失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少损失一半以上。蒋介石曾经说过，全国只要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不丢，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但是，不知他说这话时，是否考虑到了作为一届政府支撑一场战争的财政能力。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支出却大幅上升。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飞机、油料等主要军事物资都要依赖进口，世界上所有的军火商都认为此时的中国是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于是国外黑心的军火商人与国内承办军需的官吏勾结在一起，导致国民政府的军火采购黑幕重重，每一发子弹和每一颗炮弹都贵得吓人。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尚有三百万官兵位于前方，后方训练中的壮丁也有一千一百万，仅吃穿这一项，养活所有现役和非现役的官兵每一天都是一笔惊人的开销。况且，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土上，还有数量惊人的难民需要政府救济，还有涌向云、贵、川三省的数量可观的教授、教员和学生需要政府资助——中国自民国以来就有

把教师纳入高薪收入阶层的惯例，但本身已处在颠沛流离中的国家教育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大洋既能供发放又能供支出？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仅就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而言，中国的抗战顶多还能支撑半年。

可是，尽管国家财政已经濒临崩溃，还是要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便无法支持与日军在漫长战线上的军事对峙。

武汉失守后，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的对峙态势是：

卫立煌的第一战区：主要作战兵力十二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洛阳为轴心，背靠豫西伏牛山，钳制着晋南中条山，与占领同蒲路（大同至风陵渡）南段和豫北的日军平田健吉的第三十七师团以及前田治的第三十五师团对峙。

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三十二个步兵师和五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晋西南的吉县为轴心，囊括了晋西数县，背靠陕北宜川，与占据太原的日军筱塚义男的第一军对峙。

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二十二个步兵师，战场地域以皖南屯溪为中心，背靠浙赣闽腹地，与日军藤田进的第十三军对峙。

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主要作战兵力十八个步兵师，战场地域以广东韶关为基地，与日军安藤利吉的第二十一军对峙于北江、西江两侧。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三十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湖北襄樊为根据地，主力位于鄂北和豫南的大洪山、桐柏山区。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率桂军的两个军滞留在平汉路以东的大别山区，以牵制或阻滞日军西进。

朱绍良的第八战区：主要作战兵力六个步兵师和四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兰州为基地，指挥西北马家军和傅作义的部队，与日军冈部直三郎的蒙疆军对峙于绥蒙与黄河河曲地带。

薛岳的第九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五十二个步兵师，战场地域以湖南衡山为基地，与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对峙于赣湘鄂边的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和洞庭湖畔。

蒋鼎文的第十战区：作战兵力九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为陕西省周边。

另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的敌后游击区是：于学忠的鲁苏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七个步兵师和部分游击部队，战场地域为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鹿钟麟的冀察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以及河北游击部队。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直辖三十二个步兵师，其中二十三个步兵师用于一线部队的轮替和应急作战，主力配置在衡阳至桂林之间；剩下的九个师布置于川康陕地区，任务是“绥靖”。

尽管中国军队陆军总兵力已达二百四十二个师又四十个旅，可打起仗来却总是捉襟见肘。就中国军队综合战斗力而言，每场作战都须投入对战日军十倍左右的兵力，此时日军侵华兵力总数已达四十多万，中国军队一线战场配置三百万兵力显然不够。由于与日军连续苦战近二十个月，中国军队中有不少部队已徒有其名，伤亡过重，缺额甚多，基本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亟待补充。南岳军事会议提出在全国征调百万新兵的计划。虽然中国人口充沛，壮丁不少，但散沙一样的国民征调起来十分困难；且中国军队的官兵，特别是新兵，普遍缺乏政治和军事训练。因此，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三分之一”计划：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一线作战，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敌后游击，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训，争取一年之内把全国军队轮训一遍。可是，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时日里，这一轮训计划直到数年后战争结束时都没能完成。

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敌后游击的设想，显示出中国最高统帅部的这种认识：在战争的第二期，敌后作战的重要性已等同于正面战场。蒋介石决定举办游击训练班，由他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并请游击战的行家里手共产党将领出任讲师。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第一期游击训练班正式开学，学员一千零四十六人，分别来自军事委员会指挥机关、中央军校、各战区部队、各地政府机关等。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游击战战略、战术、技术以及民众运动和游击战政治工作。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负责讲授训练班主课《游击战概论》；而周恩来担任国际问题讲师。周恩来后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说：“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但是，周恩来也发现，虽然做中央军的工作最重要，但中央军军官却“最难接近，最难工作”。不排除训练班的学员中有决心坚持敌后作战的军官，但是，连蒋介石本人都明白，游击战是共产党武装的专利，国民党军不但学不来，也学不会。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蒋介石游击作战的设想和计划都没有得到有

效执行。

毫无疑问，共产党武装不但是敌后战场的绝对主角，而且凭借着民众工作的经验和传统，其军事力量必定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至少在日军暂时还没有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时，成为国民党人的心头之患。

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国民政府颁布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

方针

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开展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有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但第四战区应尽先集中有利部队，转移攻势。

部署

战斗序列及作战地境如另纸。

要领

一、第四战区，应以国军一部，配合民众武力，实施机动性游击战，主力确保现在态势，速行整补，俟增调部队到达，转移攻势，保持主决战方面于东江方面，击破侵入之敌，至少须吸收敌多数兵力而消耗之。

二、第三战区，应以一部加强游击兵力，指向京沪杭要线，袭击敌人后方，并保持沿江据点，腰击敌人舰船，继续妨害其运输。主力应尽可能保持现在态势，尽量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

三、第九战区，应以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主力配置于浙赣、湘赣、粤汉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尽量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

四、第五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主力守备荆沙（汉宜公路）及襄樊（襄花公路）各地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尽量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

五、第一战区，应以一部续在豫北游击。主力守备南阳、临汝及陇海线各地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尽力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

六、第二战区，继续积极开展广大之游击战，指向重点于正太、同蒲各要线。以有利部队配置中条山地区，与右岸河防部队协力，阻止敌人渡河。敌若由包绥进犯甘宁，应以有力部队由晋北向包绥侧击敌人。

七、第八战区，应加强绥西、五原、临河之守备，并向宁夏以北附近地区集结有力部队，确保西北国际交通线。

八、（天水行营直辖部队）第十战区，应以第二区协力，巩固河防守备，分别控置有力部队于潼关、大荔、韩城及西安各地区，策应第一第二第八各战区之作战。

九、鲁苏及冀察各战区，应增强军民力量，建立并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分别指向重点于津浦、陇海及平汉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

这一作战指导方案，内容之空泛、战略之消极、行文之简陋令人吃惊。它流露出的信息有二：一、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如能保持并巩固现有态势，就是军事上的成功。也就是说，自一九三九年起，正面战场的作战原则是守势，作战任务一律笼统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尽力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二、敌后战场将成为重要作战地域。为此，蒋介石一再要求“增强军民力量”，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但是，从这一简陋的方案中又可看出，蒋介石特别设立的第十战区以及鲁苏、冀察战区，其主要针对的不是日军，而是共产党武装。第十战区所辖地域，将共产党中枢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严密地包裹起来。从一九三九年开始，第十战区的辖区内没发生过任何一场与日军的作战，但其保持强大兵力的态势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后国内战争爆发。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百五十五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出席。会议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

基于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蒋介石严厉要求国民党人检讨自身缺陷，他认为目前党内充斥着“惰性”、“虚伪”、“散漫”和“迟滞”等不良习气，最严重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几乎导致国民党“奄奄一

息”：“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轻蔑……我们现在要振兴本党，领导革命，第一根本要务，就是树立党基，巩固党基，恢复党誉。”作为一个执政党，坦率地承认自身的问题，尤其是为了适应艰难抗战的需要，加强党务、净化党风、提高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国民党人的自省很快就变成了对共产党的攻击，即把国民党失去民心归结于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会上公开表示：共产党当然有它的策略，看过它的党的建设就可以知道，它对于中国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意。它所以要和我们合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国民党必须拿出“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来应对。今后，要格外注重在乡村宣传国民党的主义，过去偏重城市而忽略乡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特别是在敌后，尤应注意“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

“国民党人的精神萎靡导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蓬勃发展”——如果这一逻辑成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进程中，国民党放松了对共产党的防范，或者是对共产党的警惕严重松懈，从而给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显然，这一逻辑的荒诞之处在于：首先，这是空前残酷的对日作战时期，国土的沦陷、民族的危亡也许让执政的国民党困难重重；但是，国民党人不论是其政客还是军人，于惨烈的战争中表现出的种种不堪，原因怎么可能源于在敌后打鬼子的共产党武装？其二，共产党武装于敌后战场的发展是对日作战的必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制订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时，已经特别意识到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同等重要，那么共产党武装作为活跃于敌后战场的中国军事力量的主力，其得不到发展壮大又如何与日军进行作战？

根据国民党人的思维逻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议题重点从对外转到了对内，会议制定出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会后一系列相关的秘密文件相继出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等。——在与日军的军事对峙中“极力保持现在态势”的同时，国民党已开始转向于如何防范、限制、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共产党在本党权力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纳于各种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

足，更无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止异党活动之方，亦惟有采取此种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制定了防范共产党的具体措施：“如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必要时，并于保甲组织中建立保甲通讯网，指定乡村中纯良知识分子，担任调查异党活动之通讯工作，以辅助保甲长力量不逮。”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基层组织制度，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联保连坐法是保甲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五户联合签订联保连坐合同，互相监督，互相告发，一户违反各户连同办罪。更为严重的是，为遏制共产党武装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决心不惜与共产党兵戎相见：“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

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进一步详细制定了限共、反共的具体措施，包括“各战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十八集团军部队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侵越之部队剿灭之”；“对十八集团军之游击行动只给予临时任务及攻击目标，不划给固定或永久区域，保持中央军队对任何地方均可开去”等等。《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明确要求：“一、中央党政军高级长官每月会商一次，研讨对共党问题之处置。地方党政军每半月或一旬开联席会议一次，战地则由党政委员会分会协同当地最高军事机关，随时协商，或规定例会。二、党政军机关对付共党之态度，中央应示宽大，地方务须谨严，下级积极斗争。在分工上，当不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三、制裁共党活动，应尽量运用民众力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须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四、党政军各机关应指定本党忠实同志，专责办理关于共党案件，以保持绝对机密性。五、蒐集各地共党活动资料，每半月汇编调查专报，密令各级有关机关协同防止。六、以组织打击组织，仍为对共党必要之方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均应加强本党党团及特种组织之活动，并使中央颁布之《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能具体执行。七、加强特务工作，以对付共党之间谍，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八、利用共党内部派别矛盾与思想斗争，令其组织类似‘AB团’之反共活动，以分化其内部力量。九、以一切有效办法，尽量破坏共党各地组织网、通讯网及其发行网。”

令国民党人心绪复杂而又颜面难堪的是，就在他们拟订反共文件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不断地接到共产党武装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战况电

报。

一月二十九日，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

一、第一支队陈毅部，微日（五日），叶团一部袭镇江东南虏城，激战一小时，毙敌十余，伤二十余，我亡七。又该团一部，齐日（八日），在丹、镇间破坏京沪路两段，敌两日未通车。

二、第二支队张鼎丞部黄夔，文晚（十二日晚）袭供蓝埠冲入街心，我伤二亡一。元日（十三日），敌进攻倘郎桥，被我击溃，俘三，获步枪二，我伤三。寒日（十四日）。袭吴镇附近绥靖队，获步枪九，俘九，捕汉奸三，获军用品一部，我亡一伤三。寒晚（十四日晚），袭黄池镇，毙敌五，我伤三。马日（二十一日），袭朱门镇，毙敌六，伤七，我伤亡十二。马晚（二十一日晚），袭芜湖人□清之夏明才叛部，将其全部击溃，毙十五，伤十八，俘三十，获步枪四十、轻机枪三、驳壳枪五、手枪二、脚踏车一、子弹五百余发、军用品一部。我伤亡七。养晚（二十二日晚），破坏丹阳至薛埠电线杆五根。梗日（二十三日），伏击溧水至天王寺之敌，毙敌五。

三、第三支队谭震林部孙团，删日（十五日）于徐家垄、峨桥镇毙敌四。巧日（十八日），我侦察队在顺安镇附近张家亭击毙敌三，伤一。马已（二十一日九时至十一时），姚团伏击由湾址南开之敌，毙敌六，我伤五。养晚，特务连袭横山桥之敌，敌伤亡十余，我死五。

一月三十日，关于八路军的作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

一、据报，定县一带之敌为桑木师团小野旅团部米部队。

二、保定敌七百，梗（二十三日）攻占喇嘛镇，有犯高阳样。

三、吕（吕正操）纵队一部，巧（十八日）在琉璃河以东击溃敌百余，俘伪军十余、日兵三，缴获山炮一门及轻机枪四挺、步枪四十余支、汽车三辆、马十余匹。

四、沧州敌千余有（二十五日）陷河间。又，蠡县、安国敌千六百余，有（二十五日）会陷肃宁。我段（段海洲）纵队正增援反攻中。

五、我冀南游击队，敬（二十四日）晚袭击杰阳庄（宁晋东南），焚毙敌军五十余，夺获七五野炮一门。

六、永年敌七八百，梗（二十三日）陷曲周，敬（二十四日）南犯尤村，被我刘（刘伯承）师一部击退，毙敌五十余。

七、彭支队一部，有（二十五日）晚袭击丰县，毙敌百余，俘伪军十余，夺枪七十余支，毁汽车三辆。

鉴于共产党武装在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鉴于全国民众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寄予着厚望，国民党又不得不对反共行为有所顾忌，其一系列反共文件的出笼都极其机密：

查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露入于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摩擦。为防患未然计，嗣后各地方党政机关关于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方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以应根据地方事实环境，立言不可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至必须保存之文件，亦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密保管，以免泄漏。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十七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三十多人。——比起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人数少很多，但这也是共产党自“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及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结论《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我之抗战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谓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现了时，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谓三阶段……”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原因是：“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

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那么，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战争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说：“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这种新形势包括：在正确的方针和指导下，游击战争在广大地区得到“广泛的发展”。在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巩固已建立的基础；在游击战争尚未发展的地区，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而在将来，“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支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毛泽东预言：“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特别指出：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

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与抗日战争发展到新阶段同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发展到了新阶段。毛泽东指出："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现其向困难斗争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组织与扩大民众的组织；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减少相互间的摩擦，做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鉴于统一战线之于持久抗战极其重要，毛泽东特别对国民党进行了客观的评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抗日战争的大势所趋，国民党如果不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那要负担起继续抗战与战胜敌人的艰难任务是不可能的……现在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扩大组织的运动将取何种态度？赞成还是反对？我们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赞成国民党把它自己扩大发展成为革命民族联盟的……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然而，谁都明白，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了一股逆流，顽固地抵抗进步之舟……然而我们坚决相信，这种守旧势力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没有占优势也难于占优势的，他们是逆流，并非主流……

以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为基础形成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发展了新形势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展了抗日战争新时期的游击战争理论，为中国的抗战进程以及必胜结局奠定了理论基础和保障。同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的论述

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民族大义时的宏阔韬略与宽广胸怀。

不幸的是，自一九三九年起，国共的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还是不断显现。而此时的中国，不仅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形势，还要面对外部凶险四伏的混乱世界。

日军进攻武汉期间，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召开国际会议，签订了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慕尼黑协定》。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时，英、美等国所抱的表面“中立”实则纵容的态度，极大地刺激了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冒险行为。日本在中国制造卢沟桥事变三个月后，希特勒便提出必须“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必须“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一天后希特勒宣布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版图。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扩张，英国人不但漠然坐视，而且依旧表示出纵容。他们对希特勒说，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注定要发生，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德国随即把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当捷克斯洛伐克眼看就要被德国军事侵占时，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立场是对“绥靖主义”的完美注解：“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们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在法国履行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法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在英国人表态之后，法国也决定采取不得罪德国的立场。于是，英法两国联手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迫使其向德国让步，同时向德国索求“和平方案”以为自保。九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连续三次赴德，他向希特勒说的一句话，谄媚得让整个大英帝国蒙羞：“你完全可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的境遇极其相似：面对强国的野蛮入侵，世界上的国际正义消失得无影无踪。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慕尼黑会议达成《慕尼黑协定》。这个背着捷克斯洛伐克出卖其领土主权的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将被确保“不受侵犯”。只是《慕尼黑协定》签订四个月后，德军便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归属德国。接着，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作战计划；然后，意大利军队冲入了阿尔巴尼亚。德国的凶猛扩张把英法逼入了死胡同，英法这才匆忙宣布与波兰、罗马尼亚、希腊、荷兰、土耳其等国形成军事联盟。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等，并与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至此，在欧洲，形成了政治和军事截然对立的两大集团，

欧战一触即发。

《慕尼黑协定》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危险，并成为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得以膨胀的催化剂。《慕尼黑协定》出笼后，日本立即发表了确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一声明与希特勒的行动一样令列强惶惶不安：过去亚洲历史上所有已经形成的、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包括对殖民地的占领、势力范围的划分、贸易市场的占有和军事影响力的存在等等，统统作废。历史上其他各国无论用何种手段得到的权益也统统到此为止，亚洲的一切都要重新纳入日本制定的以日本为轴心的“新秩序”中。

面对日本在亚洲的挑战，西方列强终于尝到了自食其果的滋味。

美国人一向崇尚自利主义。日本侵华之初，为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美国口头上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动上执行的却是美式“绥靖主义”。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一九三九年一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承认：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中国方面屡次向英、美、法等国提出对日实行禁运，以削弱日本的国力和军力，减轻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并对中国的抗战提供援助。但是，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美国仍对日出口了价值七亿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各类物资，是同期对华出口额的五倍。仅一九三八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种战略物资，就占其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美国政府借给中国的数量不多的贷款，全部是中国用桐油、锡和其他工业原材料换取的，可是，美国的对华援助已远远比不上它给中国造成的祸患。——在日军向中国腹地大举进攻的时候，美国军火商源源不断地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在淞沪、南京、徐州、武汉乃至重庆，难以计数的中国军民死于美国制造的炸弹。美国人对日本的汽油、钢铁、机械等军需物资的输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

与美国相比，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更为恶劣。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是第一个向中国开炮的西方列强，也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英国始终与日本暗中勾结，置中国正在承受的战争苦难于不顾，只竭尽全力地维护其自身的在华利益。英国人的策略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汉失守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筋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

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什么叫作“合理解决”？说白了，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打得越惨烈，越可以满足英国人消减日本实力的期待；而中国遭受的战争损失越惨重，英国人越能在战后的重建中捞取最多利益。

可是，日本人的“东亚新秩序”公开了，英、美等国这才强烈地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还要把西方势力赶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此时的英、美只有三种选择：一是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对日战争，以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谁都不愿与日本全面交恶，尤其是在欧洲已现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由此会促使日本加速投靠德国。二是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换取远东局面的暂时稳定，以便集中力量于岌岌可危的欧洲。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将全面丧失，还会导致整个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与战略利益的失衡，很可能最终得不偿失。三是折中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伤日本的扩张，然后寻找合适的时机以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哪怕是重大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的让步，实现双方的妥协，以保全列强的在华利益以及在亚洲的基本地位。英、美等国决定选择第三项。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和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美、英两国政府相继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这时候，有一种观点得到了美、英等国的广泛认同：“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他们才没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英、美等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抵抗意志和抗击能力，他们发现中国的战争潜力远比之前预料的要大得多，其可靠证据便是：日本人几乎穷尽全力，尽管占领了武汉，但中国依然没有屈服，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垮台。因此，避免中国被战争挫败便是避免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的认知，逐渐占据了上风。英、美等国终于承认，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目前对抗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有效办法。而援助中国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供政府贷款。但是，英、美对华贷款可谓风声大雨点小，不但总是因为各种顾虑难产，而且往往限制颇多。比如，为了不刺激日本，贷款对象不能是国民政府，必须由中国民间机构出面，等等。尽管如此，美国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提供给中国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四天后，英国宣布提供给中国五十万英镑的贷款用于购置卡车、五百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平准基金以稳定中国货币。——仅就贷款的数量而言，对于中国可谓杯水车薪，只能说是精神意义大于物质意义，

即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公开表达了基本立场。

可是，即便如此，列强依旧幻想着劝说国民政府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的代价谋求与日本平分中国利益的目的。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时，英国人就提出愿意就中日和解进行斡旋。武汉沦陷后，法国人也表示“公正解决”中日冲突的时机已经出现。英国人甚至向日本和中国两方提出了具体建议：英国愿意承担让中国人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而中国应该放弃满洲。列强向日本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日本愿意和解，他们可以为此召开一次“远东国际会议”，或者称为“太平洋会议”——说穿了，就是“东方慕尼黑会议”，只是会议不是向德国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向日本出卖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历史会有力地证明，英、美等国将为纵容德国和日本付出惨重的代价。

此时，中国的主要外援是苏联。

据统计，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三次易货贷款，总金额达两亿五千万美元。武汉会战前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损耗的重武器，包括飞机、火炮、汽车和轻重机枪，基本上都是苏联援助的。苏联先后派出两千多名航空志愿者直接参战，武汉会战前后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苏联飞行员有二百余人。斯大林曾当面指示出任中国短期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更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中，苏联远东军的强大存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关内战场。如果没有苏联远东军与近七十万乃至日后增至一百二十万的关东军的对峙，日本就可以在中国关内战场投入更多的精锐师团，那么一九三九年的中国对日战局又将是什么样子？

国际关系永远是利益的博弈。

赢得利益的前提是国家实力。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南京陷落

时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群众面前亮相”。但是，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和将领都知道：武汉之战虽是对华战争的一个制高点，但是日军的进攻能力也至此达到了极限。——“在陷入一场僵持战而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情况下，日本领导人坚持进行战争，与其说他们不愿意改变最终目标，毋宁说是似乎已经无法改变……重要的是，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日本都丧失了能够控制中国战争的希望。”

占领武汉之后，日本方面陷入了困境。

“对日本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日本战史记述：“这时日本贸易结算用的黄金库存量，还不足日俄战争时可资筹措的外汇量的一半。也就是说，事变爆发时日本银行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日俄战争时储备正币（硬通货）一千四百万日元及外债八亿日元，按昭和十二（一九三七）年价格折合为二十八亿日元，两相比还不足日俄战争时的一半（百分之四十八）。”

自中日战争爆发到武汉会战结束，近二十个月的战争期间，日本方面不但付出了损伤二十余万兵力的代价，而且连续四次追加军费，军费累积支出总额已达八十亿日元以上，这是日本历史上四次对外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九一八”事变战费总额的一点六三倍。一九三八年，日本的黄金储备量为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武汉会战前后，日本使用外汇结算的进口军用物资花费额高达九亿六千万日元。由于出口严重萎缩，为弥补贸易逆差，只能动用黄金储备，这使得日本的黄金储备由原来的三百八十八吨急速下降到二十五吨左右。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消耗使出口产业因原材料不足而生产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减少，工业生产因原材料短缺几乎陷入困境，日本国力的穷困已经显现。

仅就支持战争而言，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是首要的，日本感到要满足战争需求已难以为继。开战之初，原以为动用现有军需就可以征服中国；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战费消耗急剧上升，迫使日本政府紧急实施“军需动员”，即除兵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之外，大批民营工厂也必须参与军需生产。可是，尽管如此，生产速度仍追不上消耗速度。“步枪、炮弹都不够用，买飞机是当务之急，到昭和十三年六月（一九三八年），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据此，陆军部上奏天皇说：“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担负的军需品的整

备补给，但由于各种原因……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这是非常遗憾的。”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兵员开始发生短缺。侵华战争发动后，日本曾大规模扩军，一九三七年扩编了七个师团，一九三八年扩编了十个师团。于如此短的时间内急促扩编，不得不在民间大量征用预备役和后备役。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侵华日军中，现役兵仅占百分之十一点三，预备役兵占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后备役兵已占百分之四十五点，而补充役兵占百分之二十点九。这种畸形的兵源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武汉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已达三十二个师团，日本国内只剩下一个师团。其军事配置是：东北八个师团，华北十二个师团，华中十个师团，华南两个师团。日军仅分散在交通要道上和主要城市里，兵力还是不够。在正面战场，即使与中国军队对峙，也需要大量兵力才能保持现有态势，因为中国军队随时可能发动反击；而在敌后战场，华北地区必须配置更多的兵力，因为共产党武装不断地骚扰日军的后方基地、蚕食日军的占领区、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并且建立起很多面积可观的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内危机四伏。

汪精卫的投敌，无疑曾使处于战争困境中的日本人喜出望外。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中称，日本“希望通过蒋介石的敌人与中国达成和平的愿望”，而“他所说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派领导人——汪精卫”。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发现，尽管汪精卫极力拉拢各方要人，但在中国社会各界高层内，认同汪派“和平建议”的人寥寥无几。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密报：“现在，汪派所搜集的人，大多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和腐败分子，在广大民众中没有任何基础。今后，汪派的活动若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若得不到广大国民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而对于在中国国土上的侵华日军来讲，本想依靠汪精卫的力量“逐步减轻”自身的占领负担，“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还只能由军本身配置相当大的兵力。随着政略谋略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军的负担的时机的到来，并非不可指望，但是过早期待其实现不能不说是危险的”。——日本人并不相信汪精卫“有结束战争的能力”。

日本的盟友德国也在其困境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尽管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引起了英、法、美、苏等国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有利于日本在亚洲展开“新秩序”；但是，德国的咄咄逼人也令日本人意识到，德国很可能早于日本的预期发动世界大战，这对日本又是绝对不利的。日本原本打算速战速决中国战事，再与德国呼应驱逐美、法、英等国在亚洲的势

力。而如果急于求成的德国很快与英、法开战，势必会减轻苏联于欧洲方向的警戒压力，那么苏联远东军事力量的存在，就将给日本的后方造成巨大威胁。——只要没有彻底征服中国，在进一步瓜分世界的目标上，日本就不能说已经准备好了。在日本人看来，德国人固执而自私，不但可以不顾及日本的利益，而且正在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其手中的武器，一半以上都是从德国买的，还不知有多少日本人死在了德式武器下呢。

战争双方都面临着困难，只看哪一方能够坚持下去了。

这就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的标志。

三月，春风又绿江南岸，北方的柳芽也挂满了枝条。

突然，日军发动攻势了。

日军的攻势直指江西南昌。

这次被中国战史称为“南昌会战”的作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因此，战役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似乎都有着一种开局的意义。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方面在军事上并不乐观：“国民党军队虽自日中开战以来屡吃败仗，受到打击，经过攻占汉口和广州之战，其战斗力更会下降。但遗憾的是，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保存着余力。其主力军（尤其是中央军）大概部署在湖南、江西和贵州省方面，强有力的一个兵团部署在河南西部及西安方面。蒋政权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统制能力，掌握着上述兵力，遵循原来的方针，企图长期抗战。其中江西、湖南两省是抗战的屏障。可以预见，仍将继续对水陆重要交通线及我占领地区内外进行游击。”

从整个战场态势上看，占领武汉之后，日军沿着长江已深入中国海岸线内一千二百多公里的区域内。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犹如一个伸入中国腹地的大脑袋，如果把沿长江部署的部队比作它的脖子的话，因为脑袋伸进得过于远了，脖子又长又细因而显得十分脆弱：长江以南是陈诚指挥的中国第九战区，拥有五十二个步兵师；长江以北是李宗仁指挥的中国第五战区，拥有三十四个步兵师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再加上游击部队，占领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实际上已处在中国近一百个步兵师的夹击之中——这条又长又细的脖子随时都有被折断

的危险。尽管冈村宁次在武汉周边不间断地进行“扫荡”，但依旧无法改变这种战场态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清除危险因素，而卡在日军脖子上的最为重要的城市，就是长江边上的南昌。

江西省会南昌，坐落在南浔铁路与浙赣铁路的交会点，不但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后方联络线以及补给线枢纽，还是中国以有限的空军利用南昌机场袭击九江附近长江江面上的日军舰船以威胁其后方补给线的作战前沿。因此，日军如果能够攻占南昌，不但可以利用南昌机场缩短航空兵对中国南方进行战略轰炸的航程，切断中国军队于浙江、安徽、江西经过浙赣铁路至大后方的交通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解除长江航道上的威胁，保持武汉占领军的后勤补给，稳定占领区的安全形势。

日军决定攻占南昌，还有政治上的目的，即配合汪精卫的卖国投靠：“蒋政权即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因此，今后军的重要任务为给将要诞生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创造良好的温床，扶植其成长，以完成战争目的……然而，如对本来已被压缩的蒋政权采取放任，也将成为严重祸根带来后患，因而适当地进行促使其崩溃的各项工作，为支援此等工作，必要时应进行一部分作战。”

武汉会战后，日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撤销了第二军序列，把原属于第二军的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派遣军直属的第三、第九师团，全部配属给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使其兵力扩大为七个师团，即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三、第十六、第一〇一以及第一〇六师团。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又增加了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三月十五日再增加了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由此，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成为日本陆军中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支，成为侵华日军中和中国军队对峙、作战的主力部队。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冈村宁次发布南昌作战指导：

第一、方针

军以一部预定三月上旬击败南浔沿线方面之敌，一举攻占南昌，割断和粉碎浙赣沿线之敌军。

第二、指导要领

一、军约以两个师团及强大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等，沿南浔一线地区攻占南昌。另外，以有力的一部向箬溪一修水公路挺进，以利于上项作战。

二、对南浔沿线的作战，尽量不要暴露意图。在周密的准备下，急袭和突破敌阵地，以主力一举经安义、奉新附近从南昌西南地区渡过赣江。

三、在攻占南昌中，要确保大概三都、奉新、丰城、进贤之间地区。

四、为策应南浔沿线的作战，事先在江北地区安陆方向进行一部分作战。

第三、兵团部署的大要

一、二月下旬以前，第一〇一师团主力、第一〇六师团及必要的军直部队集结于德安以南地区，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在箬溪附近集结，做好必要准备。其他交通线路的修补和战场侦测作业以及必要的作战物资的整备，概于二月中旬前结束。

二、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配属战车一个联队、独立山炮两个联队、十五厘米榴弹炮三个联队、十厘米加农炮两个大队）要有组织地一起发挥各种战斗力量，在永修附近突破修水右岸的敌人阵地，以一部从南浔一线方面、以主力从安义、奉新方向向赣江、瑞河一线追击，并消灭沿途之敌。

三、第六师团的主力要大概在开始攻击的同一时间突破箬溪附近之敌阵地，从修水河两岸地区向三都附近挺进。随着以上作战的进展，尽快以强有力的一部，向奉新方向挺进，切断修水河畔敌军的后方。

四、在直接攻占南昌时，以主力从南昌上游渡过赣江从南面攻占。在此期间，要以一部确保奉新及南面要点。

五、在以上作战期间，水路情况若允许，以一个支队（以一〇一师团的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部队）从鄱阳湖方面向进贤方向前进，切断浙赣线。

六、本作战的初期，将第六师团的一部（步兵约三个大队）作为军的直辖部队由军控制，根据情况决定使用。

七、二月下旬末，把军的战斗司令部指挥所向德安推进。

八、为策应这一作战，要夺取汉水上游的要冲，防止敌人企图在涨水期决口泛滥，和隐匿我对南浔沿线的意图，第十六师团在二月下旬要对安陆一带以南汉水移动地区进行扫荡，并要确保该地区。

九、随着为这次作战兵力的移动，第十三师团以有力一部（步兵约四个大队）向江南地区转移，主要是令其担任武昌、山坡（武昌南五十公里）、大冶之间地区的警备。

为了隐匿意图，各兵团的行动务必利用夜间进行部署。

在对主攻部队的使用上，无论是东京大本营还是第十一军司令部，都对冈村宁次将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列为主攻部队感到吃惊，因为这不但是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弱的两个特设师团，而且第一〇六师团在之前的万家岭作战中几乎被中国军队消灭过半。——“南昌作战终究是极为艰巨的战斗。我也了解有不少人对这两个师团缺乏信心。如何是好？我陷入必须使作战成功的职业伦理的义务和同是日本人就要挽回其弱兵污名的社会伦理的义务的矛盾之中，感到非常苦恼。”冈村宁次为他之前对特设师团的使用不当感到内疚，认为他应该对第一〇六师团悲惨的损失和低劣的名声负有责任，于是，“如有机会想使其打一次胜仗，以便挽回名誉，攻占南昌，正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冈村宁次还认为：第六师团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官兵都来自熊本、大分、鹿儿岛和宫崎四县，既然第六师团能成为陆军中的强悍部队，第一〇六师团为什么不能？——这也是冈村宁次在南昌作战预案中投入如此多的炮兵和坦克兵的原因。

二月六日，华中派遣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

日方正式确定南昌作战的代号为“仁号作战”。

一九三九年二月，在长江以南，与日军第十一军对峙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仍处于补充整训中，其位置和部署是：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指挥的第十九集团军的第七十、第四十九、第三十二、第七十九军以及第二十九军之预备第五师，位于鄱阳湖以西，防守从吴城经永修一直向西沿修水西岸至武宁的一线

阵地以及南昌外围的二线阵地，总司令部设在南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的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八军，防守位于南昌西北方向修水河边的武宁地区；卢汉的第一集团军的第五十八、第六十军和新编第三军以及战区直辖部队俞济时的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七十四军，控制在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预备队；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的第十三、第十八、第九十二、第三十七、第五十二军，守备鄂南和湘北；另外，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崧甫的第八军防御武宁以北的北横路地区。

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复杂，不仅来自机构的重叠和结构的多头，更重要的是内部派系林立的人际关系所致。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陈诚兼任，他基本上是遥控指挥，实际负责作战的是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薛岳属于陈诚的人，但第九战区名义上却必须接受位于桂林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指导，行营主任是与陈诚对立的白崇禧。因此，“薛岳根本不理会白崇禧”，更何况“北伐时白崇禧还撤过薛岳第一师师长的职”。薛岳还是个敢于和蒋介石抗争的将领，于是，白崇禧以“行营主任名义给他的电报或公文，不合他心意时，常见他批上‘不理’、‘胡说’。对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和公文，不合他心意的，敢于力争，或批上‘存’、‘待办’，置之高阁。在作战上不受别人牵制，只要他同意，幕僚就可以放心办事”。

对于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中国方面根据日军调动的情报事先有所判明。二月下旬，薛岳向蒋介石提出应使用出其不意的袭击战法，避免冒险出击以及堂而皇之的正面决战：“我军攻击目的，在牵制消耗敌人；攻击手段，在乘虚捣穴，出奇制胜。若以堂堂之阵击之，势与力均不如敌。若以大军击之反受挫，不若以奇兵袭之而取胜。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知己知彼，积小胜而为大胜。”但是，蒋介石的意见正相反，他要求薛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三月十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三月十五日”。薛岳果然不是个言听计从的人，他连续复电蒋介石，说“战区直辖各部整补尚未完毕”，“阵地直后之横向交通毫无设备，部队不易转用”，要求延迟至三月二十四日再开始攻击。蒋介石批准了：“惟因目的在先发制人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二十四日）。”

应该说，既然战争已经转入新的阶段，蒋介石以积极攻势作战为最好防御手段的主张，于战略战术上可以说是有了观念上的进步。就南昌战场的双方态势而言，蒋介石的攻势作战部署，也有相当合理的成分，甚至是颇具积极意义的战法：罗卓英指挥第十九集团军部队于战场的左翼，“固守现阵地”，防御日军渡过修水河；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樊崧甫指挥第八军和第七十三军从武宁向东“指向德安、瑞昌间”，攻击南

浔路上的日军的右侧；王陵基部的两个师向武宁东北地区集结，杨森部的两个师向武宁西北地区集结，卢汉部的四个师向武宁西南方向的修水推进，阻止日军从西南方向迂回南昌。而在整个战场的西面和北面，第三十一集团军周碞、关麟征部“不断向鄂南、湘北之敌袭击，牵制敌兵力之转用”；孔荷宠的游击部队“破坏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庐山游击队及各县游击队“不断在敌后方活动，破坏交通，袭敌辎重”；“洞庭湖西北岸各部队对江面、湖面应严密戒备”。

只是，薛岳的部队尚未整补完毕确是实情，毕竟他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损失严重。

最后，薛岳和蒋介石达成妥协，预定发动攻势的时间为三月二十四日。

但是，还没等薛岳动作，冈村宁次就先动手了。

除了被动防御之外，薛岳已经没有他法。

冈村宁次首先在战场正面的两翼发动了多层次的佯攻作战，目的是把中国第九战区的部队调开或分散。二月二十一日，日军第十六师团猛攻安陆以南的汉水左岸，第九师团则沿粤汉铁路发起进攻。由于第十六师团攻击强度极大，连克汉水左岸的数个要点，中国统帅部被迫从第九、第五战区急调陈诚和汤恩伯的精锐部队增援。同时，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乘船对鄱阳湖东岸的中国第三战区部队进行扫荡，然后派出由半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兵中队和一个独立工兵联队组成的村井支队，在八十艘各类舰船的掩护下于吴城附近强行登陆。位于鄱阳湖西岸的吴城，是个楼阁店铺林立的繁荣小镇，素有“小南昌”之称，在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下，小镇居民逃亡一空，小镇房舍几成废墟。在这里防御的中国守军，是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等部队。日军登陆滩头时付出了很大代价，双方进入巷战后反复拉锯、逐屋争夺，突击的日军几进几出，苦战四天仍没攻占吴城。之后，日军投入了大量的飞机和火炮，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二十三日吴城被日军占领。为了牵制南昌正面中国军队的阻击，三月二十日，日军第六师团由箬溪附近攻击前进，遭到中国守军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李玉堂的第八军和夏首勋的第七十八军等部队的顽强抵抗，尽管第六师团的进展缓慢，但确实起到了牵制中国军队的作用。

三月十八日，日军的两个被认为“最弱”的师团，配属着数量众多的

炮兵和坦克部队，在修水北岸占领了出发地域。二十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冈村宁次命令专为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配属的二百多门火炮、三十多架战机，向修水河南岸中国守军阵地实施猛烈炮击和轰炸。

炮击和轰炸持续了两个小时，修水河南岸中国守军的防御阵地基本上被摧毁，守军官兵伤亡惨重。日军炮兵竟然把阵地暴露无遗地设置在公路上，而中国炮兵的火力还击甚微——中国炮兵虽然数量不多，尚具相当的作战能力，但不知是训练不足还是教官就是这样教的，在防御阵地上，中国炮兵一律采用分散配置的方式：第七十四军和第四十九军的炮兵因为缺乏弹药等原因被滞留在后方；第七十军和第七十九军的炮兵随军被配置在两翼，因为距离遥远而形同虚设；罗卓英直接指挥的兵也被配置在后方公路上，根本无法支援前沿——中国军队进攻中“步炮无法协同”的老问题仍是没有解决，以至于步兵们除了撤退时在拥挤的公路上能看到炮兵将路途壅塞之外，作战期间几乎无法体会到自己的炮兵的存在。

在炮火准备中，日军再次使用国际法明令禁止的毒气弹。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已经多次使用毒气弹，而在攻击南昌的作战中其数量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仅二十日傍晚七时二十分至三十分的十分钟内，日军炮兵便发射毒气弹三千余发。接着，日军专业毒气部队又在十二公里的进攻正面施放了中型毒气筒一万五千个，其中在第一〇六师团正面施放了一万个，在一〇一师团正面施放了五千个。修水河中国守军大约两公里纵深的防御阵地全部被毒气所笼罩。指挥发射毒气弹的日军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联队长佐佐木孟久大佐回忆：

三月二十一日拂晓是阴天，有约每秒三米的风吹向敌方，这是使用特种弹的绝好天气。按照预定计划，从拂晓开始，进行试射、校正射效，以后转入炮火准备后，一百四十门大炮的炮声盖住了修水河畔，实为壮烈。最后发射特种弹，亲眼目睹了浓浓的红云渗透至敌阵的情景。结束炮火准备后，前沿步兵放射特种筒，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当炮兵计划延伸射击后，步兵一齐进攻，突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

日军很清楚使用毒气弹是违反国际法的，于是明文规定，在使用毒气弹的地区“务期歼灭华军，以希灭口”。根据被俘的日军笔供，日军曾在战斗中将中毒的中国官兵全部刺杀。

位于修水河前沿的中国守军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六师，官兵们因为缺乏防毒设备和训练出现了无法遏制的惊恐：

困守阵地束手挨打的六三〇团，经过昼夜不停的炮击和敌机的配合轰炸，阵地不断地被摧毁，通讯设备不时地被破坏，守军士气益加低落；加以团长于址源，新任不久，有些焦躁。他对“死守到什么时间”、“挨打到什么程度”、“牺牲换得什么代价”、“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从不去考虑，竟被飞机大炮吓昏了头脑，借“瓦斯中毒”而放弃了指挥，去向不明。这样，就更导致守军的涣散无主，不待敌人渡河，已溃散大半。

十九时三十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虬津附近开始强渡修水；半个小时后，第一〇一师团在涂家埠附近开始强渡。正值涨水期，宽约三百米的修水河，河水上涨了三米多，虽然给日军的强渡增加了困难，但上涨的河水也淹没了南岸中国守军的滩头阵地，原来设置在滩头的防登陆障碍物大部分都被河水冲走了。在日军施放的大量烟雾弹和毒气弹的浓烟中，中国守军因看不清修水河面只能盲目射击。结果，第一〇一师团只用了五分钟就强渡成功，并突破当面中国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的阵地；第一〇六师团也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六师和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的阵地。二十一日拂晓，日军两个师团分别开辟了纵深两公里的滩头阵地，掩护工兵迅速在河上架设起浮桥，坦克部队通过浮桥后直冲南岸。

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并没有显示出其“弱”，强渡成功后随即发起猛烈突击。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的一线部队第七十九、第四十九军在混乱中努力阻击，但还是一溃再溃。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攻击据守太子岭的第七十九军王凌云的第七十六师阵地，该师抵挡不住，退守馒头山；日军随即跟进，直趋五谷岭，威胁第四十九军王铁汉的第一〇五师凤栖山阵地。罗卓英急令王甲本的第九十八师和王严的第一一八师以及张言传的预备第九师向战场右翼增援，但王严的第一一八师因大雨受阻没有按时抵达。张言传率领预备第九师试图向日军实施突袭，遭到日军战机和坦克的火力拦截。中国守军各师不得不协力据守二线阵地以稳定局面。

日军强渡修水河后，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于二十一日命令第九战区固守阵地，二十三日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派柏辉章的第一〇二师进驻南昌以加强防御力量，并调第十六师、第七十九师至南昌东南地区警戒鄱阳湖南岸，策应南昌方面；同时命令罗卓英派出两个师的兵力向日军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要点进行袭击，切断日军后方交通，阻止日军后续部队增援。

但是，中国方面的战场调动，由于通讯不畅、部队行动迟缓和协同意识淡薄等原因，白崇禧的部署最终没能得到实施，而在此期间战场形势已发生急促变化。

二十二日上午，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在第三飞行团主力的掩护下，沿南浔路两侧急促地向南昌推进。二十三日，设在滩溪的罗卓英的通讯中枢被日军炸毁，罗卓英与第十九集团军所属各部失去了联系，导致位于南昌以北防御阵地的中国守军在日军的猛攻下遗弃了大量的火炮等重武器，纷纷撤离滩溪地区。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向南昌东南面的曾家攻击，第一〇一师团则向南昌西南面的生米街攻击，其中第一〇一师团的第一〇一旅团直冲赣江岸边，南昌已经处于被日军包围的态势中。

日军在追击中国军队的过程中实施了残酷的杀戮。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第一一一旅团第一一三步兵联队联队长饭野贤十，在安义以东砍下了八颗被俘中国士兵的头颅。这个联队长还举着枪指向前面正在溃逃的五名中国士兵，与他的副官稻田龟三郎打赌说，他能一枪把右边的那个中国士兵打倒。他举起枪，枪声响了，那名中国士兵依旧在狂逃，而饭野贤十自己却倒下了。日军官兵即刻围上去，看着饭野联队长背上冒血的弹孔困惑不解。有人说，可能是中国士兵打的，可四下里没有中国士兵呀，如果有，只是躺在四周的中国士兵的尸体。稻田副官逐个摸那些中国士兵尸体上的步枪，终于发现有一名躺在地上的中国士兵的枪管是热的。

已经死亡的中国士兵，胸章上的中国字历历在目：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师第七二一团，班长，强三娃。

强三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饭野贤十开了一枪。

这个没人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年龄有多大的士兵，仰面朝天地倒在了中国南方名叫“安义”的偏僻之地。

饭野贤十，东京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毕业生，一九三六年晋升为大佐军衔，一九三七年九月在中国长江吴淞口登陆进入中国战场，死后被追晋陆军少将。

在南昌作战中，对中国军队威胁最大的是日军的坦克部队。根据冈村宁次的战前设计，日军步兵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掩护下撕开中国守军的

一线防御阵地后，坦克部队要立即投入，进行快速锥形突入。他的计划得到了坚决的贯彻：由石井广吉中佐指挥的一个战车队，共一百三十五辆坦克，不顾一切地向纵深猛插，比步兵深入几乎两天的行军距离，于二十二日黄昏五时二十分冲到安义，七时四十分冲到乾州圩，九时三十分冲进南昌西面的要地奉新，占领南门外的潦河大桥。日军坦克部队骤然突进，奉新中国守军没有任何防备，在匆忙逃离时丢弃了大量的重装备，包括十厘米加农炮四门、十二厘米榴弹炮三门、野炮三十一门和汽车十辆。

由于坦克部队推进过快，以至于燃料很快用尽，冈村宁次收到了空投燃料的请求。——“幕僚们悲喜交集”，喜的是石井中佐的“神勇”，悲的是他们从没有做过给坦克空投燃料的预案。好不容易才凑了十五桶每桶仅十八公斤的燃油，“立即用运输机低空投到水田里”，然后“从飞机上看到士兵们欢呼着拾走油桶，装满了油的战车也陆续开动起来”。可是，在奉新南侧，还有“大约四十辆坦克和三十辆装甲车”亟待补充，而“负责补充燃料的幕僚们却不得不告以‘今天只能补充这些’”。那时候的心情，“实有难言之痛”。尽管如此，冈村宁次还是对他实施的坦克战术非常得意，认为他对坦克快速部队的使用要比德国人发明的坦克闪击战至少早半年。

二十三日，当日军前锋出现在赣江边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情极其矛盾：守可能守不住，就这样丢了南昌，又于心不甘。于是，在萌生放弃南昌的念头时，仍旧要求各部队积极抵抗，下达的命令也因此内容颇为自相矛盾：

长沙薛代长官、南昌罗总司令并转熊主席（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为要。希以此意明告各将领，严督所部各向指定目标积极进击，达成任务为要。中正手令。

在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蒋介石突发奇想，向薛岳和罗卓英下达了另一个命令，命令他们组织一支突击部队，从日军攻击阵型的缝隙中间，独立向敌军远后方一意挺进。蒋介石的想法是：动用两个有力师，分成三个支队，三路同时猛插敌后，截断日军交通线，断绝其后勤补给，并扰乱日军的作战部署。突击部队“不可寻求大道，最好能不依正道”，要“超越山岭”，以达出其不意的效果。“担任此种任务之部队，应以中正名义，切实训诫，并悬重赏，必令达成目的，否则当以畏缩违令

论罪”。——蒋介石的意图是好的，可问题是：不走大路走小路，翻越崇山峻岭，迅猛深插敌后，然后面对强敌拼死出击，这是共产党武装的本领；即使以“中正的名义”，许诺更高的赏金，制订严厉的惩罚，哪支国民党军队敢于接受这个命令并能完成这种任务？

薛岳和罗卓英对蒋介石的这道命令没有任何具体反应。

日军坦克突击部队在奉新得到燃料补给后，继续向南昌西南方向迂回推进。冈村宁次把预备队第一四七联队加强给了第一〇六师团，该师团二十三日攻占南昌西北方向的安义，其第一一一旅团占领南昌西南方向的高安。在阻击中国军队增援的同时，第一〇六师团主力由南昌西面的奉新向东，二十五日击溃中国守军第一〇二师，二十六日抵达赣江左岸，当日便强渡赣江，从南面迂回南昌，并切断了浙赣铁路。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主力也于二十六日夜强渡赣江，由西向东突进南昌，其第一〇一旅团沿南浔铁路同日抵达南昌西北面的赣江岸边。

鉴于日军全面迂回南昌，罗卓英急忙命令第三十二军沿南浔路回二十五日夜，第三十二军军部星夜进入南昌，紧急动员市内全部保安、宪兵和警察布防，但该军主力却在大城一线受到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阻击。此时，日军的坦克、骑兵和步兵已分别突入南昌西面以及北面的赣江大桥。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中国守军于危急时分将赣江大桥炸毁，阻止了这个方向日军的推进。但是，傍晚，日军两个师团的主力利用民船分别从曾家和生米街横渡赣江。二十七日晨，第一〇一师团从南北两个方向呈钳形突入南昌城。

二十七日，蒋介石命令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全部固守南昌，以待我主力由湘赣路方面之反攻，完成任务，应予重赏，非有予之命令，不得撤退。”

但是，蒋介石的命令发出时南昌已经陷落。

在日军攻击南昌的同时，其第六师团攻击的武宁方向，是中国第九战区赣北防御的左翼要点。中国第三十集团军所属的第七十二、第七十八军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所属的第八、第七十三军部署在修水岸边，由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统一指挥。南昌危机显现时，军事委员会曾计划王陵基部派出有力部队从武宁向东出击，打击向南昌推进的日军的侧背，但王陵基部被第六师团死死地牵制着，未能按计划出击。

十八日，日军第六师团集中力量对武宁发起攻击，中国军队由于伤亡过大撤守，二十九日拂晓武宁陷落。

为了保卫南昌，中国第九战区在南昌周围部署了五十一个师约四十万左右的兵力，另外第三战区还有部分部队参战，而日军的两个师团加上坦克部队，兵力最多也不过五万人左右。南昌东依鄱阳湖，西临赣江，周边多丘陵山地，从军事地理上看易守难攻，冈村宁次的机械化部队只能沿着公路和铁路两侧发挥作用。中国守军本应有优势的地形可以利用，以对日军实施层层阻击，甚至是迂回打击；但是，不到十天，南昌便落入日军之手，这在军事上有点解释不通。

除了日军使用空前规模的毒气，投入大量的坦克突击部队以及进行了各种牵制作战外，中国军队在防御部署和防御指挥两方面的失当应是主要原因。第一是敌情判断有误。第九战区将防御南昌的主要方向，确定在南浔铁路沿线，而日军突击的主要方向则在修水以西，两者距离甚远，中国军队没能考虑到日军机械化部队强大的移动乃至迂回能力。第二，中国军队仍旧沿用观念落后的、事实多次证明一触即溃的一线形防御部署，在缺乏纵深阵地的情况下，数十万主力在南昌周边绵亘布防达四百多公里，担任正面防御的第七十九、第四十九军等部队，不但防御正面都在十五公里以上，且在第一线阵地只部署了一个师，军主力都部署在第一线后方一天行程之处，机动性能极差，既违反了以军为单位、军长直接指挥战斗的原则，也必然导致一旦某一点被突破就绝难填补。第三，中国军队对日军突击沿途的道路和桥梁没有彻底破坏，这使得冈村宁次投入的坦克快速部队得以蜂拥直入。第四，毫无协同增援意识。南昌四面受敌时，奉命增援的中国第三战区部队第十六师和第七十九师，距离南昌还有数日行程之遥，而第七十四军直到南昌陷落其先头部队才抵达大城附近，致使日军冲进南昌城时真正意义上的守城部队只有两个团。

日军攻占南昌后，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和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部队形成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日军虽然占领了南昌，但消耗很大，尚未整补，于是决定打击突出于九江以南的日军的两个师团，反攻南昌。中国方面动用的部队，是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和第九战区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高荫槐的第一集团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共计八个军、二十二个师。

四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反攻南昌的命令：“先以主力进攻

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四月二十四日。”具体部署是：

一、高集团军以一部监视安义、奉新、靖安之敌，相机攻略之。主力（至少两个师）由奉新、安义两侧，向乐化、永修间南浔沿线挺进。

二、俞济时军以一部监视高安之敌，相机攻略之。主力由大城、万寿宫向牛行、乐化间南浔线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南昌之攻略战。

三、刘多荃军逐次向高安方面推进，为总预备队。

四、上官集团应以一部固守现阵地，主力（至少三个师）与九战区相策应，击破南昌之敌，相机占领之。该集团应预组袭击部队（约一团），务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

五、以上各部，均归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指挥。

六、武宁方面，王陵基集团以有力一部，向永修以北南浔沿线挺进，主力攻击武宁之敌，相机占领之。

这一反攻计划，实际上是分两路对南昌实施反击：一路是侧翼的武宁、奉新方向，主要进攻目标是南浔路，断绝南昌日军的后方；另一路是沿赣江西岸北进，直接进攻南昌。第九战区接到蒋介石反攻南昌的命令后，曾策划过两个方案：一是和第三战区部队一起，集中兵力，特别是集中炮兵，对南昌实施大规模的钳形攻势。但战区没有空军，炮兵多了，没有空军掩护，会受到很大损失，而中国步兵又不够坚强，能否攻下南昌，实无把握。如日军借空军的支援进行反攻，且有丢掉炮的危险。”第二个方案是先向南昌城派入便衣，争取内应，用奇袭手段偷袭南昌。——“这种办法，虽然可行，但是没有把握，且蒋介石已下了命令进攻，是不会给与充分时间的。”

四月十八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认为既然要实施反攻，那么“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二十二日左右”。

二十一日，在南昌战场的西面，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主力渡过锦江，分路攻击高安、大城和万寿宫一线的日军阵地；第四十九军一部同时渡过锦江，攻击了大城以东的生米街。第九战区部队反攻南昌的战斗正式打响。

二十二日，中国第一集团军万保邦的第一八四师、刘正富的新编第十师向奉新、靖安以西的日军发动进攻，鲁道源的新编第十一师攻击了靖安北面的滩溪。二十四日，第一八四师和新编第十师占领了奉新四周的要点，把日军围困于奉新城内。新编第十一师则迅速推进到靖安以西的螺丝岭。同时，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于二十三日收复了高安。第二天日军全力反击，高安再次失守，但二十六日第五十一师又把高安夺了回来。之后，中国军队连续得手：施中诚的第五十七师占领大城和鼓楼铺，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攻占石头岗、生米街，王铁汉的第一〇五师攻占了高邮。日军第一〇一师团集结在锦江和赣江交汇处附近，拼死控制高安至奉新之间的公路，以阻止中国军队直接北进攻击南昌。二十七日，各路中国军队继续猛攻，日军顽强抵抗，双方都出现了很大伤亡，但除了第一集团军预备第九师收复了牛行车站外，在赣江以西的其他中国军队只抵达了赣江以西日军各据点之间的地域。尽管进行了艰苦而顽强的攻坚作战，中国军队仍没有达到预定方案中指定的南涛路沿线，没能完成切断南浔路的反攻目标。

第三战区的第三十二集团军以段朗如的第七十九师作为进攻南昌的主力部队，第七十九师于二十二日开始攻击南昌城。二十三日，何平的第十六师和蒋超雄的预备第十师从赣江东岸以及赣粤铁路、闽赣公路两侧向北攻击，击退了当面日军，二十四日占领新村圩和西梁山，然后直趋南昌东南郊。段朗如的第七十九师渡过抚河后，于二十六日抵达冈下、吴村，接着向莲塘发动进攻。预备第五师抵达南昌机场附近后，派出的一支便衣队，成功地潜入南昌城内，在城内到处放火制造混乱，并与守城日军发生激烈的巷战。

对于中国军队来讲，攻城的大好形势似乎已经形成。

二十七日，冈村宁次派出海军陆战队紧急增援南昌，第一〇一师团则在航空部队的配合下向城外发动反击，双方在南昌周边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村庄据点的争夺战。

但是，段朗如的第七十九师攻击南昌城的作战却不顺利。日军利用城防工事顽强防守，第七十九师伤亡惨重，不但城池没有攻下来，先前潜入城内的预备第五师便衣队也被日军赶了出来。攻击南昌城，必须拿下南昌西南方向的莲塘。虽有军长陈安宝的严令，但段师长还是丧失了信心，因为他得到情报，莲塘的日军已增至一个旅团的规模，他认为别说南昌，就连莲塘，他也没有能力攻下来。他向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上官云相大怒，命令他依照命令继续进攻，完不成

任务要负军法责任。

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此时犯了一个必定要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他决定派一支便衣队摸进南昌城，然后谎报说本师已经攻入南昌。但是，段师长在制造谎言时出了问题：

段朗如受了上官云相的斥责以后，很气愤，当即召集团长会议，任献廷（第七十九师工兵营长）也在场。当时见他手中拿一本拍纸薄向桌上一摔，将当时的敌我情况和所受任务讲了一下，接着就说："大家都是本师的老人，现在处境像这个样子，大家想怎样才能既可完成任务，又可保持本师的生存？"这时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后来第二三五团团长王永树建议说："组织一个突击队，钻隙到南昌市区，进行袭击和放火，并发出电报说本师已到达南昌。"段说："这个办法好，谁带这个突击队去呢？"各团长又都不吭声，这时王永树又说："突击队由各团各派一部组成，突击队长可由本团中校团副徐进之担任，师长可找徐进之来，鼓励他一下。"段朗如当即找到徐进之来，授予他上述任务，并说："你只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让你当团长。"徐进之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段立时就亲笔写了一份报告陈安宝、上官云相、顾祝同的电报稿，稿上说："本师已攻至南昌，正扫荡焚烧中。"并交代徐说："你一到南昌，就让电台把这个电报发出。"段说罢将电稿交给徐。徐说："我回去准备一下就来。"徐进之是黄埔四期生，嫖赌好嫖，做事马虎，不善逢迎，上级对他不满，因此爬不上去，以黄埔四期生的资格，仍屈居中校团副之职，心中不满。此次给他这个任务，他气愤地认为："升官找不到老子，送命找到老子了！老子去告你们！"

第七十九师的突击队员凑齐了，但突击队队长徐进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徐进之真的去告状了。他拿着那份段朗如亲手起草的假电报，直接找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陈军长主张将段师长作免职处理，但参谋长不同意，向总司令上官云相报告了。此时的上官云相正在焦躁中，因为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部队已经攻到牛行和乐化，而他的部队还没有攻到南昌城。原来那个敢跟自己顶嘴的段师长竟然企图制造对南昌的假占领，简直胆大包天！

段朗如师长接到了左翼预备第十一师的电话，说集团军总司令要到本师师部召集师长会议。段师长去了，发现上官云相根本没来预备第十一师师部，而他自己在那里被逮捕了。

尽管有人求情，但上官云相说，不杀段朗如他就不抗日了。

五月一日，蒋介石下令，将贻误战机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就地正法。

蒋介石同时指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必须亲临前线督战，限定五月五日前攻占南昌。

五月二日，上官云相将指挥部前移，将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投入了作战。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凭借优势火力和空中支援，沿着铁路线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防守，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巨大。经过持续苦战，柏辉章的第一〇二师收复了向塘和市汊街，何平的第十六师收复沙埠潭后又在日军增援部队的反击下丢失。上官云相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指挥第二十六师、预备第五师和第七十九师主力，于四日黄昏向南昌发动进攻。五日中午，预备第五师抵达红门桥，晚上发动攻击，推进到南昌城外，破坏了日军设置的铁丝网，但日军拼命反击，双方都伤亡奇重，预备第五师被迫停止攻击。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部队五日拂晓占领南昌机场，击毁敌机三架；其另一部抵近南昌火车站，与防守的日军展开残酷的拉锯战。同时，第二十六师主力和第七十九师在莲塘也与日军陷入苦战中。

中国军队无法攻占南昌城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薛岳认为，南昌防御战后部队没有得到补充、武器装备又远远劣于交战对手的中国军队，对据守坚固工事里的日军实施攻坚作战，是不可能实现蒋介石五月五日前拿下南昌的限令的。五月三日，薛岳给陈诚发电，请求陈诚代为向蒋介石陈述他的意见，指出蒋介石严令攻下南昌的命令有悖于“持久抗战”的原则：

自四月漾日（二十三日）开始，已十一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

五月五日，陈诚将薛岳的电报转发给了蒋介石。

同一天，白崇禧致电蒋介石与参谋总长何应钦，也委婉表达了蒋介石的限令不可能完成之意：

窃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训，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而实际则变换攻击目标，另以有力之二师兵力，并配合轻装之炮、工兵，用最密速之行动，由渣津附近袭击，进出蒲圻两侧，切断粤汉北侧公路、铁路。武长正面同时亦猛烈攻击，该方面敌仅一师，正面尤广，且不预期我行有力之攻击……如果武汉或赣北方面之敌前来增援，则我牵制目的达到；如赣北敌兵力调动或防备松懈，则我以整理休养之新锐，再袭南昌，善用声东击西之法，使敌疲于奔命，则我能确保主动地位矣o刍荛之见，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五月六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从南昌和莲塘夹击城郊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此时，军长陈安宝兼任第七十九师师长，负责指挥第七十九师和第二十六师与日军激战。对于战场的这个局部来讲，陈军长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处于绝对劣势，但仍旧率部苦战。激战至黄昏，第二十九军被日军包围，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负伤，陈安宝军长在突围中负重伤，但是日军已经追了上来：

部队都跑散了，最后只有四个卫士，又被打死两个。陈安宝很胖，两个卫士架不动他。日军赶上，两个卫士跑了，日军将他的头割掉带到南昌去了。日军撤回据点后，第七十九师才在一块稻田里，将他的无头尸体找到。

陈安宝，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他为人宽厚，作战沉着，在第二十九军中颇有口碑，阵亡时年仅四十八岁。

五月九日，蒋介石下达中止反攻南昌的命令。

苦战后的日军也无力反击了。

南昌会战结束

中国军队对南昌的反攻违背了战略原则。

蒋介石的限令显然严重脱离实际，不仅未能如愿收复南昌，还令攻坚部队再次遭受严重的伤亡。

日本战史统计：“据报告，第十一军在南昌战役中的战果是：敌遗弃尸体约两万四千具、俘虏约八千六百名；缴获武器，计火炮约七十门，机枪一百八十挺。我方伤亡，计战死约五百名，负伤约一千七百名。”

中国有关战史统计，南昌会战中，除阵亡和被俘官兵外，负伤和失踪的官兵约在万人以上。

如果说南昌会战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自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始终处在消极防御然后仓皇撤退的局面中，而在南昌会战中，中国军队首次发动局部战役级别的反击作战。尽管反击以失败告终，但中国军队的举动不但出乎日军的预料，也标志着战争形态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完成了“仁号作战”，日军面临的困境却依然如旧：攻占中国的又一座城池，甚至是又一片国土，从在中国的整体处境上看，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或者说，以后的作战，无论是中国的国土，还是中国的城市，到底是占领还是不占领呢？

第十七章

中国实在太大了

日本陆军认定，凡是与水和炎热有关的作战，非波田支队莫属。

这支由驻守台湾的混成旅团为基干组成的部队，因旅团长波田重一的名字而被称为波田支队；后来的新任旅团长名叫饭田祥二郎，于是支队又改称为饭田支队。一九三九年二月，饭田支队接到的作战任务是：攻占中国的海南岛。

海南岛，面积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南隔南海与越南相望，北隔琼州海峡与广东雷州半岛相对。

“海军对占领海南岛所抱的远大企图，其构想堪与陆军对满洲所抱的企图相匹。”日本海军始终对南太平洋抱有极大野心，他们不甘心跟在陆军后面经营没有海军施展余地的北方。这也是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亚洲扩张的总体“蓝图”究竟是“北上”还是“南进”长期争执的根源。就日本人制订的“东亚新秩序”而言，“东亚”所指的地理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了东北亚和东南亚。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陆军准备发动武汉作战时，海军就在台湾总督府设立了海军武官府，专门研究“南进”的相关策略和计划。到了九月，以台湾总督府名义拟定的《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策》和《海南岛处理方针》相继出笼。这两个文件，把占领海南岛与控制东沙、西沙和南沙群岛联系起来，同时也与向南太平洋扩张的战略联系起来：“鉴于海南岛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应着眼于帝国对外扩充统治的精神，确立对该岛的全部统治实权”；“确立对以海南岛为中心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新南群岛的坚强支配权，使之与台湾相结合，作为帝国南方政策的前进据点，以图强化遂行我国既定国策”。日本海军坚定地认为，海南岛必是未来日本向南太平洋延伸的前沿据点，因此在大本营研究广州作战时就希望一并占领海南岛。“另外，海军表示特别关心获取海南岛的地下资源”。——对于资源万分匮乏的日本来说，海南岛不但令官方和军方垂涎欲滴，就连“工商界”都已“非常关心此一天然资源宝库”。

尽管日本人意识到，攻占海南岛很可能会触及英、法的利益从而引起国际争端，因为海南岛距离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已经非常近了，可日本海军还是认为机不可失：“占领海南岛是基于军事需要这种解释，终究

难以取得是等诸国的谅解。而且，占领海南岛还将间接地影响美国及荷兰等各国，彼等当然会疑惧日本的领土野心……海南岛的占领可否，不应依据对欧美诸国的影响来判断，考虑我方的南洋政策，此时占领海南岛，对我方来说是千载一遇的良机，此点要予以考虑。”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大本营发出“大陆命第二六五号”：

一、为建立对华南进行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的基地，大本营计划攻占海南岛重要地方。

二、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应协同海军，以军的一部兵力占领海口附近的要地。

三、有关细节由参谋总长指示。

当天，日军参谋本部指定：陆军以饭田支队为基干，海军以第五舰队为基干，登陆时的航空作战也由海军担任。预定的攻击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

日本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和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商定：在未来海南岛占领区内，陆上警备由陆军负责，海上警备由海军负责，机场、港口等由陆军和海军共同管理和使用。“攻占海南岛作战称‘Y作战’，与陆军协同进行的海口方面的作战称‘甲作战’，海军单独进行的三亚、榆林方面的作战称‘乙作战’”。

尽管日本陆军和海军战前作了大量的现地侦察，秘密测量航道水情并设置隐秘标志，还提前在海南岛西北方向的涠洲岛建起一个临时机场以提供支援。但是，进攻海南岛的作战真正打响后，日军这才知道他们准备多日的作战更像是一次海陆联合登陆演练。

二月八日，饭田支队的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和一个工兵联队，在海军第五舰队的护卫下，从中国万山群岛锚地起航，向西南行驶约二百三十海里，于第二天夜晚十时抵达海口以西约二十公里的澄迈湾抛锚；海军和陆军联合指挥部则乘坐第五舰队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在海口北面的琼州海峡停泊。十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日军开始在澄迈湾的东北角登陆。

此时，海南岛上的中国防御部队已全部被调至广州作战方向，岛上只剩下少量的地方部队，包括琼崖守备司令部保安第五旅一团的九百多

人、二团的七百多人、独立自卫队的三百多人以及守备队新征集的壮丁一千多人，还有秀英炮台守备队二百五十人，总计约四千人。登陆的日军击退中国守军微弱的抵抗，迅速扩大登陆场，并向纵深迅猛发展。天亮后，秀英炮台向日舰开炮，但炮台很快就被日机炸毁了。十日中午，日军占领海口，下午占领琼山，黄昏占领海口以南的安定以及东南的清澜港。

中国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率残部退入海南岛腹地的深山中。

日本海军的单独作战，是把八百六十人的横须贺特别陆战队、七百三十人的吴港特别陆战队、八百六十人的佐世保特别陆战队合编在一起，乘坐舰船绕岛向南，于十四日凌晨抵达海南岛南端的三亚港。五时，日军开始登陆，没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三亚、榆林和崖县。

然后，日本海军和陆军南北对进，迅速占领了海南岛全境。

三月三十日，日本政府声称中国的南沙群岛“作为自古以来无主的珊瑚岛屿”从现在开始归日本所有了：

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政府把曾有日本人在那里进行过开采磷矿的南中国海的新南群岛（香港以南一千三百公里，现在的南沙群岛）作为自古以来无主的珊瑚岛屿，宣布归日本领有，按台湾总督府令属高雄市管辖。新南群岛位于法属印支北部湾以东三百二十浬的海面，法属印支以地理上的理由也想争夺领有该岛，因此，三月三十一日外务省召见了法驻日大使安利，将本件通知了他。四月十八日以官报明确地向内外发出公告。我国是根据自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以来日本人走在其他国家前头投下巨额的资本和永久性设施，从事对该群岛的经济开发的历史事实而宣布领有的。执行本宣言的是海军。

日本沿用殖民主义者的一贯伎俩，把任何他们认为需要占领的土地一律称为“无主的土地'——南沙群岛自古以来为中国所有，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日本人不但宣称南沙“是无主的珊瑚岛屿”，而且给自己找了个“走在其他国家前头投下巨额的资本和永久性设施”的理由，且这一无赖逻辑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其侵略行径令人发指。

蒋介石称日军占领海南岛是“发动了太平洋上的满洲事变”。

反应最激烈的是美、英、法、荷等国，因为列强意识到日本已将对

华战争延伸到了他们利益所在的南太平洋。英、法政府责成各自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诘问，高度关切日本占领海南岛的目的和性质。美国则把派往大西洋的舰队调回太平洋以牵制日军南进。面对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激化，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宣布：“攻占海南岛是出于加强华南沿岸的封锁，加速蒋政权崩溃的军事上的需要，并没有领土野心。”

到底是占领，还是不占领？日本方面因国力和军力不足而产生的纠结，终归无法战胜其不断膨胀的扩大占领区的野心。

早在日军攻占武汉后，日本陆军部就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虽然蒋介石政权受到重创，其势力范围被严重压缩，但也不能就此对之采取放任态度，“需要适当进行各种工作促其崩溃”，而为了配合这些工作仍有必要进行局部作战。仅就武汉地区而言，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作为一支“强大的作战军”，被赋予了压制洞庭湖、长江方面中国军队的任务，同时还要寻找这一地区中国军队的主力予以歼灭，以不断重挫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只是，无论指向何方的作战，都“应力求避免扩大战局”。

冈村宁次将下一个进攻目标指向了湖北腹地。

汉水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汉水流域被称为“江汉平原”，是中国著名的丰饶之地。汉水从襄阳到汉口段被称为襄河，襄河以东，西依荆山，东据大别山，北有桐柏山，南是大洪山以及长江，一片沃野被四面天堑紧紧环绕。这个区域内公路纵横：自襄阳到沙市的襄长公路、襄阳到汉口的豫鄂公路、汉口到唐河的汉唐公路、枣阳到唐河的枣唐公路、汉口到宜昌的汉宜公路以及从平汉路上的花园车站经安陆、随县、枣阳直抵襄阳的襄花公路。这些公路蛛网般将鄂北与豫南交界地带的随县、枣阳和襄阳等重要城镇连接起来。襄阳、随县和枣阳地区，自古便具重要的军事意义：东可以俯瞰武汉，西可控制商洛，北可进至南阳，南可威胁江陵。

日军占领武汉后，随枣地区的战略位置显得格外突出。中国的东部地区已基本都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主力被迫转入西部山地和高原地带。这时候，在长江以北，通往中国西部的主要交通要道有三条：北路是沿陇海铁路向西进入潼关；南路是上溯长江沿水路进入四川；中路便是上溯汉水进入江汉平原转向西北进入陕北。日军想在中国的国土上继续西进，无论走哪一条路，扼守中路的随枣地区都至关重要：如日军沿长江西进直取重庆，随枣地区是必须控制的右翼；如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随枣地区是必须控制的左翼；如日军直接走中路，那必须拿下随枣

地区自不待言。由于中国军队控制着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河南地域，以武汉为军事基地的日军如想北上攻取中原，也要首先攻占挡在其正面的随枣地区，因为中国军队控制下的桐柏山和大别山是严重威胁日军的第一线阵地。还有就是，随枣地区的大洪山距离武汉很近，即使从巩固占领的角度讲，日军也要将随枣地区据为己有，以保证军需补给的安全。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老河口，战区主力大多部署在老河口以东的随枣地区。日军得到的情报是，中国军队的绝对主力汤恩伯的六个师，已从江南移至江北，集结在枣阳以南。那么，攻占随枣地区的作战，必将消耗中国军队的主力，摧毁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事前沿。

冈村宁次很清楚，中国军队的战略是强化大洪山、桐柏山阵地，并力图以此为依托不断地向日军发动攻势，以达到牵制和消耗日军的目的，威胁武汉并逐渐缩小日军的占领区。而第十一军要想在武汉站住脚，并且在扩大占领区上有作为，就必须把中国军队赶出大洪山和桐柏山，控制随枣地区，并趁机歼灭这一地区中国军队的主力。

还在指挥南昌作战的时候，冈村宁次便收到一份来自重庆的情报，情报显示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抗战第二阶段，要排除万难，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而努力。

二、派党政人员去战地，加强各县游击队及正规军的政治工作。目前，各县在训练方面虽不十分彻底，但应该承认对现在的日军后方的扰乱已收到百分之六十的成功。

三、打算把将来的反攻目标置于广州及江西。这个计划需要三十万兵力。但万一陷入危机，战局出现不利怎么办？或者改变抗战计划，这些大家可以讨论。

四、为配合广州及江西的反攻，拟以六十架飞机的牺牲，轰炸日本国内及散发传单，使日本国内发生动摇。

无论情报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反攻”有没有根据，但为了牵制和消耗武汉地区的日军，蒋介石确实已向中国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的将领下达指令，命令他们面向河南信阳以及湖北应山做好进攻的准备。自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旬以来，中国第五战区不断地向随县以东和安陆、应城、

天门等地出击，同时频繁地袭扰平汉铁路的南段。为了加强第五战区的进攻实力，蒋介石将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到了随枣地区，布防于大洪山至平汉路之间，与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对峙，并有随时大举出击歼灭第三师团主力于信阳、广水一带，以重获武汉以北平汉路这一区段铁路控制权之势。

冈村宁次决定先发制人。

只是，冈村宁次策划的攻击区域，超出了东京大本营对第十一军规定的作战范围。经向华中派遣军请示，获得了大本营的同意，但大本营同意的前提条件是："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地区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不允许占领，也就是说打了还要回来，这样的限制自中日开战以来从没有过。而东京大本营之所以明确这一限制，只能理解为：即使日军有军事能力攻占更多的中国国土，但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战争资源来统辖这些地方了。号称"中国通"的冈村宁次自然知道大本营的无奈之处：无论日本有多大的野心，"中国实在太大了"！

日军对中国随枣地区发动的攻势，被称为"襄东作战"。

四月十七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指导策略：。

作战目的

为了确保作战地区、加强安定和进一步挫伤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军决定乘新兵团的到来，大概在五月上旬于江北地区消灭企图向我西北正面采取行动的敌军。

方针

军以江北兵团秘密做好准备，捉住敌军准备进攻的态势，采取快速奔袭给予反击，一举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

指导要领

一、军决定利用新兵团到来之机和敌军正在准备进攻的间隙，大概在五月初一前，秘密将江北各兵团及军直辖部队的主力集结在应山及安陆附近，做好会战准备。在会战准备期间，要避免局部的、单独的积极行动，必须贯彻和认真执行会战指导。

二、军所要发动的攻势，固然要尽量利用敌军进攻的冲势，但如果我主动准备的一切就绪，则不管敌人是否来攻，概自五月初采取攻势，以快速奔袭，突破各自当面之敌阵地。

三、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迂回突进。同时，以机动兵团向纵深的泚源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向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

为呼应军的作战，在信阳方面应尽力用佯攻牵制敌军。

四、军在完成作战目的后，迅速回到大概原来的态势，整顿警备的最前线。有关细节随后规定，但必须确保随县一带。

五、对军的全面意图要尽量保守秘密，并且应采取一切佯攻、宣传、迷惑等手段，以期扩大会战战果。

鉴于这次会战的特殊性，冈村宁次对他的部队作了如下训示（要点）："不考虑城镇的攻陷，立足于单纯作战，专心致志消灭敌军。"无论冈村宁次是否情愿，侵华日军的作战不再"考虑城镇的攻陷"，作战目的从扩大占领区转变为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变化，也将带来中国抗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

襄东作战所指目标明确："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重点兵团第三十一集团军。"

中国军队第三十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嫡系部队汤恩伯部。

冈村宁次动用了三个师团：第三、第十三和第十六师团。

这三个师团都是日本陆军中的甲种师团：

成立于一八八八年的第三师团，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攻击平壤的部队。一九三七年八月从上海吴淞口登陆中国，参与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后编入第十一军序列，辖步兵第五、第二十九旅团，骑兵第三联队、炮兵第三联队、工兵第三联队和辎重兵第三联队。现任师团长为山胁正隆。是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极强的师团之一。

第十三师团编成于日俄战争中的一九〇五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从上海吴淞口登陆中国，参与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辖步兵第二十六、第一〇三旅团，骑兵第十七联队、炮兵第十九联队、工兵第十联队和辎重兵第十三联队。现任师团长为田中静一。

第十六师团也是编成于一九〇五年的老部队。一九三七年从中国天津塘沽口登陆，参加平津地区的作战后，又在上海长江口岸登陆，转隶华中派遣军，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辖步兵第十九、第三十旅团，骑第二十联队、炮兵第二十二联队、工兵第十六联队和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现任师团长是藤江惠辅。

按照日本陆军的编制，甲种师团定员为两万余人，但此时这三个师团的编制都没有满额，每个师团约有一万三千余人左右。因此，日军投入随枣会战的兵力，约四万人左右。

冈村宁次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师团集结于孟畈店地区，攻击发起后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随县以北的高城镇、唐县镇前进，牵制中国军队主力于枣阳东南；另一部兵力则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负责切断中国军队撤往桐柏的退路。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集结于湖北中部的钟祥附近，作为进攻主力在作战开始后并列北进，向枣阳以南的吴家店和枣阳以西的双沟前进，切断枣阳与襄阳间的联系。同时，军直属骑兵第四旅团向枣阳西南的新野、唐河迂回，对枣阳形成第二重包围。——总之，须把中国第五战区的部队割裂开，然后将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包围并歼灭。

武汉会战后，中国第五战区的作战范围包括安徽西部、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其东面是第三战区，北面是第一战区，南面隔着长江是第九战区，位置居于各战区的中央，控制着长江上游进入四川的门户，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除了调入该战区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外，第五战区所辖部队有六个集团军、十八个军、四十四个步兵师、两个独立步兵旅、两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六个游击纵队。以上部队，除隶属于江防军的十三个师和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兵力和装备较为完整外，其余的师都尚未整补完成，人员装备多数不足二分之一。因此，第五战区的总兵力约为二十万，且部队战斗力已不如武汉会战期间。

第五战区各部队担负的防御任务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周碞的第七十五军、廖

震的第四十四军、郭忏兼任军长的第九十四军以及曹勖的第七游击纵队，担任宜昌以下长江北岸、襄河以西及宜昌、当阳、江陵各要点的防务；以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和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组成右集团军，由张自忠统一指挥，辖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张自忠兼任军长的第五十九军、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许绍棠的第六十七军和柏启元的第六游击纵队，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至钟祥的公路以及襄河两岸的防务，重点防御汉阳西出至宜城的公路；以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和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组成左集团军，由李品仙统一指挥，辖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担任鄂东北大洪山至鄂豫交界处的桐柏山之间的防务，重点在襄阳至花园公路的随县到枣阳地段；以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辖张义纯的第四十八军、张淦的第七军和沈光武的第二游击纵队、黄瑞华的第三游击纵队，在鄂东与院西南交界处的大别山开展游击作战，以牵制日军。加强到第五战区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辖张轸的第十三军、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孙震兼任军长的第四十一军和石毓灵的第一游击纵队、傅光咸的第五游击纵队。第三十一集团军加强到第五战区后，接替第二十二集团军在随县与枣阳间的防御任务，第二十二集团军调到襄樊附近担任战区总预备队。同时，第一战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奉命调至桐柏山区，下辖池峰城的第三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协同第五战区作战。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五战区的任务是：“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主力守备荆沙（汉宜公路）及襄樊（襄花公路）各地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尽量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二月，蒋介石又颁发《国军攻势移转部署方案》，其赋予第五战区的任务是：“以一部约两师攻击武胜关方面之敌而牵制之，以主力约五师指向孝感、花园间，与鄂东、豫南游击部队相策应，求平汉南段之敌而歼灭之，并彻底破坏敌交通线。”到了四月初，日军将对第五战区发动攻势的迹象日益明显，可蒋介石依旧命令李宗仁遵从原定部署：

第五战区敌军增兵，无论其为防为攻，我军应仍照预定计划进行。正面部队更应利用气候、地形与民众等有利条件，分路出击，只要应用无孔不入之要领，继续不断予以打击，以粉碎其进攻企图。而总预备队应仍控制相当地点，作为最后使用。以敌既增加重兵，则我军更应控制有利预备队为之备也。此时只要第九战区努力反攻，向武汉方面挺进，则敌当不敢进犯襄、宜（襄阳、宜城）。

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并没有看到第九战区有任何“向武汉

方面挺进”的意图和行动，他得到的确切情报是冈村宁次要向第五战区大举进攻了。

李宗仁在日军内部安插有间谍，这个名叫何益之的间谍是日军雇用的翻译。何翻译又与日军内部反战军官逐渐结交，于是能够“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以至于日军“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

李宗仁综合所得情报，判断日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将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后，直捣襄阳和襄樊。李宗仁决定“在敌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襄阳至花园）上布一陷阱，预备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具体设想是：待汤恩伯部抵达桐柏山之后，用正面防御部队把日军诱至随枣地区，然后汤恩伯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襄花公路，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

李宗仁这一作战计划的重要前提是：让汤恩伯打冲锋。

汤恩伯即刻发了脾气。

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绝对嫡系的一支战略别动队，之所以被调入第五战区，是因为这里扼守着进入四川的门户，如果让日军长驱直入便可直接威胁重庆。因此，虽然调到了第五战区，可汤恩伯并不是来为李宗仁打头阵的，而是要作为总预备队使用的。长期与桂系勾心斗角的蒋介石也知道，只要汤恩伯到了第五战区，李宗仁肯定会让他承担最重要的作战任务，而李宗仁也会为他的部署找到最合理的借口，因为汤恩伯部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极少数的精锐之师。于是，蒋介石三令五申：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批准，第五战区不得擅自动用汤恩伯的部队。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专门打电报给军令部次长刘斐，称随县、枣阳南靠大洪山，北依桐柏山，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守住这两个要点，中国军队于南北东西皆能进能退；一旦守不住，不但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且因襄河以西不产粮食，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军队“将成饿殍”。目前第五战区部队兵力单薄，不得已时是否可以动用汤恩伯的部队？还是无需死守随县、枣阳要点以保存实力？——徐祖贻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可以动用汤恩伯的部队，要么大家都保存实力算了。刘斐立即回电称：只要保住大洪山和桐柏山，其他要点没有死守的必要，汤恩伯部绝对不能轻易使用。为了堵住第五战区的嘴，蒋介石专门从第一战区

将下辖两个军的孙连仲部调给了李宗仁。

李宗仁不死心，见到汤恩伯时还是把他的设想说了，谁知李宗仁话未说完，汤恩伯便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李宗仁解释道：“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汤恩伯不再搭理李宗仁，竟然“拂袖而去”。李宗仁不禁感叹道：“在任何战争中，当前线危急之时，部将不听主官约束而擅自行动，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战期中，所谓嫡系的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等，皆习以为常。当时作战区司令长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

汤恩伯有足够的胆量“拂袖而去”。

因为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与桂系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

日军的试探性进攻已经开始。

四月二十二日，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在钟祥以北、长寿店以南，与日军第十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接战。清晨五时，第五十九军第一八〇师五三八团阵地突然遭到日军的炮火轰击和飞机轰炸，双方战至天黑，一营的阵地被日军步兵突破。日军向长寿店继续攻击时，受到五八团和五三九团的夹击，日军被阻止在长寿店以南李家畈地区。二十四日早晨五时，日军再次进攻时出动了十余辆坦克，向五三八团与五四〇团的接合部猛冲，两个团的阵地均被日军突破。张自忠命令第一八〇师把当面日军引诱到田家集、流水沟地区，并计划亲率第三十八师、第三十七师、骑兵师等主力部队在流水沟一带截击日军。与此同时，命令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北出侧击日军的后方，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南下攻击日军侧背，并派出一部在京钟（京山至钟祥）公路上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二十五日晚，第三十八师经过一夜的顽强激战，顶住日军的猛攻，日军因为伤亡严重被迫后撤。张自忠当即命令部队追击。第三十八师将日军追至田家集地区，日军受到了中国军队的四面夹击。二十六日，日军大批增援部队抵达，十余门重炮也参加了战斗，中国军队经过两个昼夜的交战渐渐无法支撑。张自忠命令部队坚持最后五分钟，并派出骑兵部队冲击日军的侧背，日军攻势渐弱，分路向花园车站以及钟祥地区后撤。张自忠命令第五十九军猛追，并亲率部队渡过襄河侧击日军，截断了日军的补给线。

第三八师追到灌子口南，田家集东北地区，在亭子山附近向敌猛攻，敌军伤亡五百人左右，俘敌战马八十余匹和弹药很多。同时，一八

〇师在不到三小时内，将长寿店东北十五里黄泥坑攻破，当天中午占领了长寿店，敌人向钟祥县和洋梓镇溃逃；我军尾追，至二十八日到达洋梓镇北，收复了上洋梓地区原阵地……这次作战胜利之后，第三十三集团军受到重庆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嘉奖，并发给奖金十万元。张自忠将军当即将奖金分配给各部队，并将功劳归到全体官兵身上，将各单位有功人员各升一级。

日军的试探性攻击，采取的是猛烈冲击后再撤回出发地的模式。无疑，这是即将开始大规模作战的战前预演。

四月三十日，日军发动了正式攻击。

中国战史所称的“随枣会战”开始了。

日军按照预定方案，采用锥形突进、钳形夹击的战术，从鄂北和鄂西两个方向多路进攻，极力在战场上寻找中国军队主力，特别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企图进行歼灭作战。

鄂北方向——中国第五战区的左翼——负责牵制作战的日军第三师团由应山出发，攻击之前因围攻日军而突前的中国军队，并采取向随县进攻和向枣阳东北地区迂回之势。第三师团第五旅团猛攻郝家店、孙家寨一线的中国守军第八十四军的阵地。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下辖钟毅的第一七三师、张光玮的第一七四师、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等部队，全军共三万余人。日军攻击的第一天便投入了大量的火炮、战机乃至毒气弹，大有长驱急进的态势。五月一日，孙家寨一线阵地完全陷入日军的火炮轰击下，毒气弹的烟雾四处弥漫，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阵地丢失后最前沿的一个连仅幸存八人。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判定，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应是随县北面的塔儿湾地区。五月一日晚，李品仙下达了部署命令。左集团军总指挥李品仙同时也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他不但给本集团军部队、右集团军部队、江防军以及从第一战区调来的孙连仲部下达了指令，且在日军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动用了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这严重违背了蒋介石“不可过早使用”汤恩伯部，“使用必须得到军事委员会批准”的严令。

一、我右集团军河防部队，竭力防止敌由钟祥附近渡河，并以其右翼军有力部队渡河攻击，牵制敌北进；并增强襄河左岸部队拒敌北进；

掩护本集团军之右翼；我廖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与本集团军相互策应夹击敌人；第一战区以孙集团军（第二集团军）主力在桐柏一带，策应本战区之作战。

二、本集团军固守现阵地线，阻敌西进，长久保持襄河左岸地区；以主力集结襄花公路北侧，适时转移攻势，击破当面之敌。

三、第三十九军固守现阵地线，置主力于左翼，拒止当面之敌，并彻底破坏阻绝通敌方之主要道路，攻势转移时，向平林市方向攻击。

四、第八十四军固守现阵地线，拒止当面之敌，务纵深配备，增强工事。

五、第三十一集团军以第十三军固守现阵地线；军主力集结于青苔镇、太山庙、唐王店间地区，准备由高城南北之线相机为攻势转移，向马坪、应山、广水间求敌主力之侧背攻击；对桐柏附近友军须直接切取联络；对万和店、唐王店之线预备阵地工事，应努力增强之。并以第八十五军集结于袁家堂、马家集间地区，对桐柏方面掩护本集团军之左翼；积极准备与第十三军成梯次向敌施行攻击。

六、第三十九、第八十四军未撤回之出击部队，仍保持已占领之前方要点，与敌保持接触，不得已时，逐次撤回原阵地。

七、第四十五军归本集团军区处，集结于茅茨畈地区，准备策应第三十九军及第三十三集团（属右集团军）方面之作战。

至少第八十四军照此命令连夜完成了阵地配置。

二日上午九时，日军对第八十四军塔儿湾阵地发动攻击，遭到第一七三、第一七四师的拼死阻击。塔儿湾是由随县直达唐县镇以至枣阳、襄樊捷径上的一个要点，如被日军突破，向北可以席卷第一七三师的阵地，向南可截断第一七四师和第一八九师的后路，还可以对左翼的第三十九军形成包围之势。因此，双方在这个要点上展开了殊死战斗。日军攻击的主要方向是第一七三师的主阵地。该阵地前面是宽三十米左右的蒋家河，水浅可以徒涉，两岸的麦苗仅数寸，没有任何隐蔽物可资利用。因此，第一七三师构筑在低矮土丘上的阵地，很容易被日军炮火所覆盖。武器处于劣势的中国守军，官兵们在战斗中积累了经验，他们在土丘上做出很多伪装工事以吸引日军的炮弹，而在距离伪装工事不远处挖了许多散兵坑，并在炮火不能及的死角构筑起能容纳一个班的隐蔽

部，散兵坑和隐蔽部可以轮换着休息。同时，在伪装工事的两侧，还设置了机枪阵地，以形成阻击日军步兵冲击的火网。

敌阵后忽升起一只艇形氢气球，观察我方阵地，为其炮兵指示目标。天破晓后，敌炮数十门循其气球指示，对我阵地连续轰击了两小时。其炮弹落在我阵地上，自右而左，复自左而右，循回不停。敌炮停射时，随派大队步兵，用密集队形，向我阵地蜂拥而来。敌军以为我守兵即使未死伤殆尽，也已被吓跑，岂知当敌接近我阵地四百公尺内外时，即遭到我散兵坑中和各掩体内轻重机枪的突然交织射击，敌死伤累累，逃脱者为数寥寥……如此战斗情况，持续五日之久。敌人每日所耗炮弹，约六千多发，在七天战斗中，总数在四万发以上。

日军终于冲到第三十一集团军的阵地前，汤恩伯只有命令部队与日军接战。五月二日，日军第三师团第二十九旅团由徐家店向北进攻，与防守塔儿湾以北高城附近的张轸的第十三军发生激战。日军在炮兵和空军的支援下，向第十三军阵地数次投放毒气弹，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官兵毫无畏惧，不但守着阵地，还连续发动小规模的反击，双方一直混战到五日。日军一部强行向桥头方向推进，马励武的第一九三师和张雪中的第八十九师一起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但是，中国官兵苦战多时没能击退日军。六日，日军攻陷高城。七日，日军数千人增援桥头，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在师长李楚瀛的指挥下猛烈侧击日军。

这时候，守卫塔儿湾的第八十四军因无力支撑开始全线后撤。

敌飞机、坦克和远近射程的大炮，一齐出动，一开始战况就十分剧烈。但右翼地区的第一八九师方面的情况无甚变化，敌只增加一些兵力，作佯攻的牵制。第一七四师对当面之敌，仍作顽强的抵抗。每一个据点都战至被敌机及炮火轰炸到无法立足，转移第二线阵地继续抗击。在敌人攻击点纵深只有一公里的地区内，作了四线对敌决斗，坚持了两个星期之久，战况之烈，牺牲之大，极为罕见。

襄花公路沿线都是平原，日军发挥机械化部队的威力，坦克在公路上横冲直撞，导致撤退中的第八十四军伤亡极大。

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来的坦克简直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官兵中的勇者，竟攀登上敌人的坦克，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然血肉之

躯终究难敌坦克、大炮，以至敌人坦克过处，我军的战壕每被压平，守壕士兵非被碾毙，即被活埋于壕内。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密集扫射，弹如雨下，锐不可当。

第八十四军不得不再次向西退向唐河、白河西岸。

第八十四军的撤退使得鄂北中国守军的防线被日军撕开。

尽管第八十四军官兵已经付出巨大代价，但第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仍对部队撤退时的混乱不堪极度不满：

参战部队除第一八九师是奉命有计划地自动撤退之外，所有第一七三师的两个团和第一七四师的三个团，都是由战场溃败下来的，情形相当狼狈。因此全军不能集中作统一的行动，三个师分成三路转进。各师的团、营以下亦有因中途被敌击散而分数路退却的……全军凌乱奔逃，一泻几百里，停脚点竟超过战区指挥部后方甚远。

第一七四师撤退时，遭到日军坦克部队的重创，师部副官何伟豪被俘。第一八九师撤退时，副师长兼第五六六旅旅长李宝链竟然阵前叛变，而当李宝琏与汉奸取得联络后，第五六六旅官兵因不愿当伪军将李宝琏扣押，由于没有看管严密，李宝琏逃脱后只身投敌。

在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方向，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在东岳庙给日军极大杀伤后退往江头店。九日，日军向江头店猛攻，第八十五军顽强激战一整天，日军的进攻没有取得成效。十日，从河南信阳出击的日军在战场的北面攻占了桐柏，汤恩伯鉴于他的部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危境，决定将主力向西面的唐河方面转移。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在战斗中伤亡很大，而该师一直是汤恩伯部的基本队伍，为此汤恩伯指责军长张轸有意牺牲第八十九师，导致蒋介石最终将张轸免职。

张轸，湘军将领程潜的爱将，历史上曾跟从程潜与蒋介石作战。

蒋介石迁怒于张轸的原因不言而喻，而李宗仁对汤恩伯的指责是消极避战："纵在这种劣势下作战，敌我在随县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大小二十余战，我方正面始终未被突破。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

公正地说，就这个方向的作战而言，汤恩伯并没有明显的避战意图。日本方面战史的叙述是：“最初敌人的抵抗是微弱的，但随着战况的进展，汤恩伯集团的全部逐次向东南方向推进，抵抗变得顽强起来。”退一步讲，即使汤恩伯按照李宗仁策划的“大歼灭战”去打，能否取得“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也很难说，因为此时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并不具备。日军是三个师团的多路进攻且为向心突击，如此态势下，在一个方向上要吃掉其精锐的第三师团，不要说正面至少要集中十万以上的中国军队，且四面还要有二十万以上的兵力顶住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的猛攻。李宗仁哪里有这么多能战而不退的部队？其实，如同蒋介石一样，李宗仁的剑锋所指也不言而喻：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他指挥不了汤恩伯的部队；可蒋介石偏偏总把汤恩伯的部队放进他的战区，这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况且，从台儿庄战役到徐州会战，再到武汉会战以至随枣会战，日军始终在战场上寻找着汤恩伯部以求将其歼灭。日本人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还是不肯屈服，就是因为仍掌握着庞大的中央军部队，如能给一个个中央军部队以重创乃至将其歼灭，就等于掏光了蒋介石不屈服的底气。可是，由于汤恩伯每一次都能避锋而退，日军终是没能达到歼灭汤恩伯部的目的。

日军在鄂北的襄花公路上已经突进来时，鄂西方向的日军也在同时向北突进，当面的中国军队尽管顽强阻击却无法阻挡其攻势。

在鄂西方向防守的中国军队是张自忠指挥的右集团军。

日军第十六、第十三师团主力以及第四骑兵旅团发起攻击的时间稍晚，在第三师团突破中国第五战区左集团军防御阵地，并把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牵制在襄花公路一带后，五月五日，第十六、第十三师团以及骑兵第四旅团才从京山、钟祥、黄家集出发，分多路向大洪山西南麓直至襄河左岸间的中国军队第五十九军刘振三的一八〇师、黄维纲的第三十八师和第七十七军吉星文的第三十七师发动进攻。

张自忠所辖的部队，大多刚从武汉战场上退下，尚未来得及休整和补充，连续的作战使得本来就已残破的部队遭到进一步损失。尽管官兵疲惫，装备低劣，但张自忠照例对部队进行了强硬的战斗动员：“现在国家到了危亡时期，我们应下定决心为国家、为民族的存亡，不顾一切牺牲，与日寇一拼。打日本鬼子，死了也是光荣的。如果敌人发动进攻，我们当以全力将其消灭在襄河地区。”

五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在炮火和坦克的支援下，当晚突破了当

面张自忠部的阵地，之后分兵向北和西北迅速突进。中国守军第一八〇师退守长寿店，第三十七师退守姚家河，第三十八师退守流水沟。六日，跟进的日军突破长寿店、流水沟一线，尽管张自忠部主力仍坚守着主阵地，但日军留下部分兵力牵制第一八〇师和第三十七师，主力沿着襄河以东地区继续急促北进。面对已经恶化的战局，张自忠命令第三十七师占据肖家冲高地，第三十八师在清水桥一带集结，命令王长海的第一三二师渡过襄河向日军实施反。

七日，冈村宁次认为合围枣阳附近中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已经形成：

一、第三师团在突破高城附近敌主阵地后，以一部将当面之敌向枣阳方向追击，以主力经合河沿西新集一湖阳镇一湖家镇公路突进，切断敌军主力向北的退路。以信阳部队的主力击败当面之敌，首先占领桐柏一带。

二、第十三师团进入滚河一线，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突进消灭敌军。在新集、平林店、吴家店、梁家集等交通要地上，各以一部击败向西面逃脱的敌军。

三、第十六师团进入滚河附近后，以几个梯团向湖河镇方向突进消灭驻在之敌。以一部留驻白河下游地区，面对襄阳方面掩护军的左侧背，并援助骑兵团在白河的渡河。

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的作战地区境界暂定为连接蔡阳铺、隆兴寺、三关店、草店、清凉寺一线。

五、骑兵团要尽快向白河右岸移动，消灭驻在之敌后沿襄阳—新野—泚源公路地区向泚源方向挺进，切断敌军的退路。

无论在哪个方向上，中国军队都无法遏制日军的猛攻。

但张自忠部作战意志坚定。张自忠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说他将亲率两个团北渡襄河去攻击日军，“任务不能达到，决一死以报钧座”：

一、据一八〇师刘师长报称：当面之敌以优势兵力，五昼夜以来，向我猛攻未停。因飞机、炮火轰炸过烈，致阵地悉为摧毁，赖我官兵舍死争夺，往复血战，致迄今尚阻该敌于马服集以南地区，惟伤亡颇重。虞（七日）早后，敌复增加车六辆，向我猛攻猛扑，刻尚在激战中。
二、据吉师长报称：连日与步炮联合之敌约两千人彻夜激战，双方伤亡

奇重，我干部牺牲尤多，刻尚在姚家集以东与敌血战中。刻我一三二师之张团，现正由贺家集向洋梓、长寿店攻击，我五十五军即派两团，由沿山头方面渡河北进。职现亲率三十八师两团渡河，攻击北窜之敌，如任务不能达到，决一死以报钧座。

但是，战局并不是张自忠拼死所能挽救的。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七日推至长寿店以北地区；八日抵达郑家岗、方家集；九日从蔡阳、张集渡过滚河后，沿滚河北岸快速向新野、唐河推进。日军第十三师团则从黄家集、坪坝镇向中国守军第四十五军发动攻击，六日突破王志远的第一二二师阵地，该师因伤亡巨大退守张家集。七日，日军晚上偷袭了陈离的第一二七师师部，占领双河。与此同时，在战场的北面，日军第三师团开始迂回枣阳的东北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占领新野后，向东移动攻占唐河，与第十六师团会合。第十三师团则在枣阳东北地区与第三、第十六师团会师。

各路日军对枣阳的包围基本形成。

日军的企图是：缩小包围圈，把中国第五战区主力，特别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压缩在桐柏至枣阳间的狭窄区域内予以围歼。

九日，李宗仁命令各部队迅速撤退，并规定了撤退方向和路线。

蒋介石复电表示同意：

甲：钟祥以北情况即趋变化，希即妥筹对策，予轻举妄进之敌以严重打击，牵制敌人于汉水以东地区。如状况万不得已时，须照下列要旨部署实施：一、刘汝明、刘和鼎两军，仍留置桐柏、大洪山内，担任游击；二、汤恩伯集团可转进樊城迄老河口地区，覃连芳军转进至老河口以西地区；三、张自忠集团转进襄河布防。

乙：已令孙连仲集团先在南阳集中候命，其余可斟酌处理，具报为要。

这是一个把襄河以东全部放弃的决定。

可能考虑到这样的处置过于悲观，蒋介石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来电补充了几点要求，其中要求之一是张（张自忠）集团攻击钟祥以北之敌，应令刘和鼎部协助之。左集团及汤部转移态势后，可暂在枣阳以北

地区，牵制襄花公路方面之敌，使张集团之作战容易，并相机予该方面敌人以打击。”——蒋介石的意思是，部队不要全速撤退，要适时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而且，蒋介石甚至改变了庇护汤恩伯部的初衷，要求第三十一集团军暂时留在襄花公路一带牵制日军。

从积极防御上讲，蒋介石是对的。

可是，这也正是日军所希望的，因为冈村宁次的作战目标就是在枣阳一带“击败和追击顽强抵抗的汤恩伯兵团的三至四个师”。

此时，在枣阳的西面，日军第三师团追击纠缠着汤恩伯的部队；于是，日军第十三师团开始迅速北进，以期对汤恩伯部形成合围。

汤恩伯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日军围歼的目标。

即使是蒋介石的命令，对于只想逃生的汤恩伯也没有用了。

汤恩伯下令全军迅速撤离战场。

战后，在会战总结中，军令部对汤恩伯不顾蒋介石让他暂留战场以牵制襄花公路方面的日军并策应张自忠部作战的命令而擅自撤退是这样解释的：

汤恩伯集团在桐柏迄枣阳以北山地，自五月七日起，敌由三合店、唐王店、倒峡流、江头店等地包围，积极进攻，我汤部仍与敌彻夜鏖战，肉搏相拼。迄十一日，敌终未得逞。复以战略上无固守之必要，更无其他部队能相互策应，为保持战力，应付而后战斗起见，汤总司令恩伯遂留张轸率两师兵力，于桐柏山内担任游击，并掩护主力之撤退，亲率四个师向唐河转进，沿途遭敌之轻快部队及我之溃兵袭击，已分成数段，于十二日到达泌阳以北之二十里铺地区，迄十四日始收容完毕。

军令部的叙述令人疑窦丛生。首先，说汤恩伯部曾与日军拼死鏖战，但却“无其他部队能相互策应”。那么，到底是哪支部队拒绝策应汤恩伯？友军不策应汤恩伯的证据是什么？接着便说汤恩伯部在撤退时之所以“分成数段”以至需要收容，是因为他不但受到日军的袭击，还受到“我之溃兵”的袭击。那么，袭击汤恩伯部的是哪支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为什么不去阻击日军而要袭击他？——在蒋介石统领下的中国军队中，嫡系和杂牌间的恩恩怨怨，永远是一笔离奇古怪的糊涂账。

值得庆幸的是，汤恩伯的迅速撤退，使日军的作战目的没能达成。

中国第五战区的其他部队也都相继撤出战场。

谁也没想到的是，中国军队的后撤，客观上反而对前出的日军形成了反包围之势，这令冈村宁次感到不安，他决定不再进入战场纵深，命令部队原地掉头往回打：“到五月十二日，军计划对中央直系军的作战已基本上达到使之溃败的目的，因此决定立即折回，从大洪山东北地区消灭彷徨中的敌人杂牌军。”

冈村宁次的部署如下：

一、“第三师团以一部东进扫荡大别山北侧”，主力西进随县以北的厉山、塔儿湾附近，“配合第十三师团进入环潭镇一带”，向南面的洛阳店方向攻击前进，消灭沿途的中国军队。

二、第十三师团在随县与枣阳之间，“迅速扫荡吴山店一唐县镇公路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然后西进，“向吴家店、资山、新集（吴家店南二十公里）前进，扫荡大洪山东北地区”。

三、第十六师团在大洪山北麓，“消灭西新集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后，“迅速转向枣阳一带前进，准备向江北德安方向前进，一部分向安陆前进”。

四、“骑兵团在击败沘源附近之敌后，向唐河南岸转移，经枣阳附近向安陆前进”。

日军的突然掉头，出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预料，因为当日军集结于枣阳周边的时候，中国方面仍认为日军即将发动新的攻势。因此，尽管第五战区立刻下达了追击命令，但除了日军第十三师团在长冈地区遭到坚持在大洪山里的中国第十一集团军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两个师的阻击外，其他各路日军均未受到严重阻击和追击先后回到了原出发地。

中国军队除随县之外，跟在往回打的日军的后面，先后收复了新野、唐河、枣阳、桐柏等地。

双方再次回到了战前的对峙态势。

随枣会战就这样突然终止了。

李宗仁因第五战区没能阻止日军长驱直入向蒋介石请求处分：

未能拒止敌之北进深入，惟我部署未周，致敌得逞，除各部奖惩另电呈察外，拟请予职以处分，以资惕勉。

蒋介石的回电很客气：

此次随枣之役，暴敌豕突北进，狡焉思逞。吾兄指挥若定，动合机宜，终予敌以意外莫大之打击，使其狼狈退窜。正念贤劳，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仍望为国珍重，争取最后胜利为盼。

随枣作战，日方的战果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一万五千具，俘虏约一千六百名”，“我方战死约六百五十名，负伤一千八百名”。关于日军的损失，中国方面的统计为：“敌之伤亡达一万三千人以上。”

随枣会战是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一场战役。

中国方面改变了战争初期以阵地战为核心的防御作战样式，相机以攻为守，以期打击和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这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日军的强悍攻势面前，中国军队仍不能彻底阻止对手实现作战预想，也不能对日军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攻势作战。日军第十一军各路部队长驱直入，尽管没能围歼中国军队的核心主力，但却可以顺利地推进到事先预谋的任何作战位置。此次战役呈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是：至少在中国内陆，尽管扩大占领区的欲望依旧强烈，但日军也只能采取“攻而不占”的作战方针，即打一仗便撤回来，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巩固所有占领区必须的额外兵力了。只是，无论兵力多么捉襟见肘，为了令国民政府屈服，日军必须继续攻击中国的战略要点，特别是进入一九三九年后，日军一直企图将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此时，驻守广州的日军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滋润中国抗战力量”的漏洞，那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汕头：

汕头在华南是仅次于广州的大港，是外国船舶出入较多的商港。广州失陷后，敌人把汕头作为对外联系的重要地点，经潮韶公路（潮州—韶州）运送了相当大量的军用物资。汕头地区是南洋华侨的主要出生地，这一地区的侨汇款额很大，所以它又是滋润中国抗战力量的源泉。大本营感到强化封锁华南沿岸的同时，还有获取对华侨进行谋略工作据点的必要，于是在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下令攻占汕头一带。

日军大本营命令第二十一军和海军“中国方面舰队”联合对汕头地区发动攻势，陆军作战代号为“华号作战”，海军代号为“J作战”。

日军第二十一军决定出动的部队规模不大：由第一〇四师团第一三二旅团旅团长后藤十郎少将率第一三七步兵联队和独立步兵第七十六大队，配属山炮兵两个大队、工兵两个中队、轻装甲车一个小队和渡河材料一个中队，组成后藤支队。海军参加作战的是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派出的第九战队、第五水雷战队、第十二和第二十一扫海队以及第四十五驱逐队、第三联合航空队、佐世保第九特别陆战队等。

汕头地区的中国守军仅有隶属第四战区的张兰荪的独立第九旅，另有一个保安团和地方自卫队。

日军攻占汕头的过程简单而迅速。

后藤支队于六月十四日在黄埔港登船出发。出发时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除将领之外谁都不知道船开往何处，以至于不少官兵以为是让他们回国而“引起了不小的兴奋”。但是，舰队到了澎湖列岛的马公岛不走了，开始了换乘以及登陆训练，官兵们这才明白是让他们继续打仗。二十日，日军从马公岛起航，二十一日凌晨一时抵达汕头港外。先遣小部队于二时二十分在濠岛东岸登陆，主力的一部分在新津港附近登陆，另一部分沿韩江支流西溪逆流而上，八时三十分左右于汕头以东浮州登陆。日军登陆后，迅速向汕头以北地区分路迂回，二十二日向汕头发起正式进攻。

中国守军独立第九旅仓促应战，稍事抵抗后便撤离防御阵地，日军当日占领汕头。

二十七日，在潮州西南郊的枫溪，后藤支队再次突破中国独立第九旅的阻击，于午前占领潮州。

日军又占领了中国的一片国土，特别是从东南沿海的角度看，日军似乎把中国的外援补给线全部截断了。但是，让日本人感到很无奈的是：中国不但有漫长的海岸线，还有更为漫长的陆地国境线。不要说在中国的云南方向还存在通过印度、缅甸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仅就苏联援华的西北通道而言，日方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步兵前往中国的西部地区实施占领显然不可能，只有靠空军。

苏联援华通道的要点，是甘肃省会兰州。

日本空军第一次轰炸兰州，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空军第十二战队的五架重型轰炸机从包头机场起飞，前往兰州实施轰炸，但是，中途遭到中苏联合空军的截击，日军轰炸机损失惨重。为了解决“中国实在太大了”的问题，日本空军决定尽可能地向中国内地转移，寻找距离兰州更近的机场，最后选择了山西南部的运城。运城距兰州直线距离约六百八十公里，符合日军轰炸机作战半径的要求，但却在日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外。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日军二十架轰炸机冒险飞往兰州，轰炸了兰州机场和市区。二十三日，日军二十一架轰炸机再次出动轰炸兰州，导致大量的中国平民伤亡。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发现，对兰州的远程轰炸，不但对苏联的援华行动没有丝毫影响，而且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在中国空军的截击和反击下，日军的重型轰炸机大多毁伤，于是得出了“无战斗机掩护的重型轰炸机单独攻击至为困难”的结论。或许，日本人这才初步意识到中国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真正含义。

在以后漫长的战争进程中，萦绕在日本人心头无法根除又无法排解的最大心结是：“中国实在太大了！”尽管国土面积大并不意味着国家绝对强大，但是相比中国而言，日本又实在太小了。

而在中国方面，战争进程至此，执政的国民政府认为，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一退再退，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从“国民精神”的角度上讲，此种状况不但是这一代国民的耻辱，也是这一代国民的罪恶。

国土的广大并不代表着民族精神的强大。

国民政府认为，生活在广大国土上的中国人精神必须强大起来。

国民政府将振作中国人精神的运动，叫作“精神总动员”。

第十八章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颁布《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

今日为总理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中正谨以庄敬严肃之至诚，宣布实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所有纲领办法乃国民公约，业已发表，全文刊登各报。总理有言：“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又曰：“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赖精神，两者相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仅占其一。”总理尽瘁革命，身经战阵，凡此遗教，均为躬亲体验而有征之言，稽之革命史实，吾人最初以赤手空拳，推倒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其后誓师北伐，扫除军阀障碍，完成国家统一，亦均赖精神制胜，乃克奠此始基。不幸革命未成，导师早逝，国难日深，外侮日亟。今抗战进入第二期，北望燕云，东瞻京阙，寇虏之凶锋未戢，陵寝之瞻拜莫亲，无数同胞之涂炭待救，国家民族之命脉，犹在存亡呼吸之中，而革命建国事业成功，犹极辽远。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纯由吾人对总理主义与遗教，服膺不力，信奉不诚，精神未能振作，意志不能集中；或虽振奋一时，而未能强毅不懈，以致敌寇朝野，竟尚有打击吾人精神与收揽吾国人心之狂想。自侮人侮，非尽无因，以是思耻，耻可知矣。当前国运之危殆，强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为之颓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结果。今当抗战之际，天下兴亡，所系至巨，若犹不悲愧奋发，急起直追，共同努力于民族之固有道德，一致发挥，总理之革命精神，集结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个共同目标之下，扫荡萎靡腐败之障碍，养成蓬勃奋发之朝气，各竭其能，各尽其职，以戮力奋斗于抗战建国之大业，将何以自救而救国，亦何以上对民族祖先，下对后世之子孙。中正痛总理之不作，念遗教之可循，确认国民精神总动员，实为建军建国克敌制胜之基本，循是而行，则一可当百，十可当千。切望我前方后方全体将佐士兵，全国各省市各界男女同胞，矢诚矢信，对纲领揭示各点，深切体察，一致实行，誓行国民公约，确立抗战意志，以精神之改造，著于实际之行为，期对我总理逝世十四周年做具体之纪念，用慰总理与阵亡军民先烈在天之灵。所以竭尽吾侪后死者尽忠报国之天职者在此，所以湔雪我中华民族被暴敌侵略蹂躏淫掳焚杀莫大之耻辱者亦在此。语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务当表里贯彻，切勿视同寻常为要。

为什么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要进行全体国民的“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演讲中开列了若干理由：一、“当前国运之危殆，强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为之颓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结果”；二、“在我们抗战开始，不到两三个月的时候，那时国外舆论对我国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中间有一句极其怵目惊心的评语，说是‘中国不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不够抵御外力’”；三、“我们必须承认精神力量的伟大，超过于一切物质的力量，和一切的武力”；四、“一个国家如果因为精神的衰微，而遭受外来的侵略，已经是这一代国民无比的耻辱；如果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还不能集中我们的精神，家喻户晓、父诏兄勉地来保卫国家，渡过当前的艰危，开辟未来的命运，那不仅是这一代国民的耻辱，简直是一种罪恶”。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特别详尽地列举了中国人精神上必须改造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读来依旧令人惊怵：

（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

生活者，精神之根本，无合理之生活，即无健全之精神，是以沉溺于声色货利之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加以彻底之改正，而实行新生活之信条。否则不仅个人之精神耗散，自误误国，必致相习成风，使整个社会顿呈亡国之现象，而招致世界之鄙视，与寇仇之深入，不唯有害于国家，犹且影响军事。

（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

次于醉生梦死之生活，而为国民精神之蟊贼者，厥为消沉颓废之风气，此风气之存在由于心理与生理两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心理方面，由于民族自信心，与个人自强心之缺乏，不谓民族无复兴之望，即视民族复兴之事业于己无关，此两种心理若不纠正，国民奋发蓬勃之朝气，即无法养成。在生理方面，则运动、卫生、整齐、清洁，乃至早起之习惯，均须提倡与实行，然后能使国民精神充实，朝气焕发，以担当非常之革命事业。

（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

抗战中有一种不可不注意之精神现象焉，即在前方之民众，欠缺誓死复仇之决心；而在后方之人员，多有避难就易之私图也。前一现象，足使敌人之顺民增多，而寇氛益张；后一现象，足使民族之战士减少，

战意薄弱。究其动机，则皆由民族至上之观念不固，苟且偷生之习性犹存。欲纠正前一现象，在于阐明春秋大义复仇主义，所谓“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使沦于失地之国民，永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观念。纠正后一现象，在提倡“见危授命”之风气，表扬殉职死难之忠烈，更须严饬纲纪，昌明正义，使人人咸视规避职守、潜图安全，为莫大之耻辱，而后革命精神乃能树立。

（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

只图保全个人之生命财产，增长个人之名位与权力，而不顾民族全体之利害与存亡者，亦犹有兵权者之欲保存其实力与地盘，同一私的动机也。充此自私之心理，必至私见高于一切，私利高于一切，乃至于个人名誉地位与权力欲望之扩张与满足，必先于一切，推衍所极，必至牺牲民族利益，破坏抗战计划而后已。今当抗战剧烈，存亡呼吸之际，而犹不自觉悟，岂唯不智，实亦不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下，此种痼习，必须排除，所当发扬舆论之权威，加以尽量之指正，务使尽祛私见，共输肝胆，而归于至公与至诚。

（戊）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

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之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分散，贻战事以不利，故必于吾人上述国家民族至上、军事胜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原则下，确立标准，分别纠正，俾统一之基础获得进一步之巩固，尤必积极疏导，造成共同之国论，俾吾国民与青年，在认识上对国家前途怀抱同一之理想，在行动上趋赴同一之目标，既以万众一心而克敌制胜，亦所以造成战后全国永久之团结，而免于纷歧与抵牾。

拯救中国国民精神的总运动，是在日军对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的狂轰滥炸下进行的。

在没有力量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利用优势空军力量，对中国大后方战略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首选目标。或许日本人以为，把这座山城从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就能挫败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使其面临崩溃。

重庆，中国西部古城，位于嘉陵江与扬子江的汇合处，依巴山和巫山天然屏障，扼守着长江水路要冲，在地理上犹如一座天然军事城堡。

日军占领武汉后，曾仔细研究过攻占重庆的作战计划，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陆军无法突破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险峻山路，海军也无法突破长江三峡的凶险水道。日军虽然被巴山所阻，但他们可以向重庆倾泻炸弹。

日本人把轰炸重庆的军事行动称为“政略攻击”。

“政略攻击”这一军事术语，最早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时日军大本营颁发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对“政略攻击”的概念作出如下阐释：“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日军认为，他们实施的这种恐怖攻击，可以单靠航空兵的力量，就能让中国的战时首都体无完肤。——造成战争对手精神上的陷落，比起翻山越岭地进行地面占领，不但划算，且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征服。

至于国际法明确规定战争行为不得殃及平民的条例，日本人不屑顾。在对中国重庆实施的规模空前的轰炸中，日军以其不可理喻的疯狂与残忍，制造了世界空战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页。

日军占领武汉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轰炸重庆的作战计划。随后，日军决定将陆军的飞行战队、航空兵的飞行团、海军的联合飞行队以及空战队整合在一起，以武汉和孝感为飞行基地对重庆实施轰炸：

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须集中兵力，投入优良的飞机，特别是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对中国各军可使用特种弹（红色弹、绿色筒、红色筒），但使用时须尽量避开第三国人居住区域。对毒气的使用须严守秘密，不留痕迹。特种弹指毒气弹“红筒”，“红色弹”是砒砷联系的，“绿色筒”是催泪毒气弹的荷号。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华中派遣军指定陆军第一飞行团执行轰炸重庆的作战任务。

从汉口到重庆之间，航空距离八百公里。

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主要由第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八重型轰炸机战队，第五十九战斗机战队，独立第十战斗机中队以及独立第十八侦察机中队组成。其作战飞机的作战半径分别是：第六十重型轰炸机战队

拥有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携弹量五百公斤，作战半径八百公里；第十二和第九十八重型轰炸机战队拥有的意式重型轰炸机，携弹量五百公斤，作战半径约七百五十公里；第五十九战斗机战队和独立第十战斗机中队拥有的九七式战斗机，作战半径四百五十公里；第十八侦察机中队拥有的侦察机，作战半径九百公里。显然，对于轰炸八百公里外的重庆而言，九七式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达不到。于是，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以及将携弹量减至三百公斤以延长作战半径的意式重型轰炸机，只能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单独作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下达作战命令：二十六日十三时对重庆实施第一次轰炸。至于攻击目标和任务，寺仓正三的表述是："重庆市街，务使敌政权上下感到震撼。"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日军第一飞行团的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自汉口机场起飞，十三时三十五分抵达重庆上空。可是，飞行员根本看不到重庆，机翼下是一片灰白色的浓雾。即使降到了安全允许的最低高度，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油料有限，转了几圈后，日军飞行员只好返航。在第一批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起飞二十分钟后，十架意式重型轰炸机跟着起飞，于十四时抵达重庆上空，盘旋良久后，日军飞行员终于从云雾的缝隙间发现了一片看似城市的目标——"推测这可能是重庆东侧地区，即以此为基准进行了推测轰炸"。第一次轰炸就这样结束了，日军认为："战果虽不明，但从敌人的无线电信判断给了敌人极大威胁。"

日本人只顾考虑自己飞机的作战半径了，没有想到中国的重庆还有一个"雾都"的绰号。——每年春节过后的一至五月，这座山城基本上昼夜不断地被笼罩在潮湿的云雾中。在此期间，山城居民会把阳光照射大地的某个瞬间视为出现了人间奇迹。

日军对重庆的第二次大规模轰炸，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此时日本方面获悉，国民党即将在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出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决定。于是认为，应该立即使用军事手段在中国的政治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日军第一飞行团根据气象情报，判断七日那天重庆的浓雾有开裂的可能。是日，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分三批从汉口机场起飞，于下午三时左右飞临重庆上空，却没有看到浓雾裂开的迹象："云量十米，云高二千五百米，但扬子江上云量稍薄，可以判断出江的形状，在东南云上望见了金佛山。"于是，日军以隐约可见的长江的形状以及距重庆约九十公里的露出云层的金佛山顶为基准，依据航程和航向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推测性轰炸。——"敌机没有迎击，所以我未受损失。战果不明，但重庆发布

广播称：重庆遭到轰炸，击落敌机八架。”

炸弹迟迟不能落在重庆市民的头上，这令日本军方焦躁不安。一月十日，第一飞行团的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第三次飞往重庆，这次终于在重庆上空的云缝中看到了市区，日军飞行员从四千五百米高空投下了四千五百公斤航空炸弹。受到这一战果的刺激，十五日，日军第一飞行团的重型轰炸机第四次起飞，拟对重庆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但是，令日军飞行员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重庆上空遭到了中国空军的猛烈截击。飞在最前面的侦察机发现云层上的十二架中国战机后，马上通知后面的轰炸机，可轰炸机已经飞临重庆上空。中国战机立即向日军轰炸机扑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空战。重庆地面的中国防空炮也首次向日军轰炸机开火。尽管重型轰炸机不适合空中格斗，日军还是在空战的同时把携带的航空炸弹全部投向了重庆。此次空战的结果是：中国空军损失战机十一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四架被击伤，但均安全返航。

日本人从反馈的情报上看，大批量的炸弹似乎没有几颗落在重庆平民头上，连续的轰炸后也没见中国方面有什么激烈反应。——“连日来天气恶劣，寺仓第一飞行团长认为坚持攻击重庆不妥当，建议应把攻击转向天气较好的兰州方面。一月二十一日，航空兵团司令官采纳了这一建议”。

日本人决定耐心地等待中国“雾都”上空的浓雾消散。

尽管日军已经四次飞临重庆进行轰炸，但这座中国的战时之都并没有显示出日本人想象中的惊恐。

无论日本方面如何强调蒋介石政权已经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作为国家统帅机构的国民政府依旧在照常运转。国民政府完善了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归并改组成立经济部，实行金融外汇管制，成立粮食部和农林部，组建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水路运输联合委员会等。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期抗战国民参政会，审议事项涉及军政、外交、侨务、赈济、财政、经济、教育、交通、蒙藏等国家战时建设的所有方面。为新县制在全国的实施，国民政府督办成立了各省市首届临时参议会，推行地方自治，完成县政计划，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间，蒋介石不间断地举办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每一期训练班都要亲自训话，因为他认为中国“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就必须有现代的干部”。——蒋介石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记述：“本年，蒋公所最致力者，军事而外，为干部训练，为县政建设，为经济建设。第

一事由中央训练团分期举办党政训练班。第二事则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第三事以牵涉繁多，未有所兴举，然备战区经济委员会之设置，金融机构之调整，及工矿交通之督促改进，蒋公无不昼夜筹策以赴之。”

每一天都盼着国民政府崩溃的日本人终于等到了五月。

五月，笼罩在重庆上空的云雾裂开，阳光倾泻山城。

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莉莉?阿梅斯，显然对雾散之后的重庆所显露的真实面目十分惊讶：

中国的新首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景色优美得宛如一座大花园，这远远抵消了气候的不足。满山梯田，到处竹林，一片棕榈、柑橘，使人想起亚热带的地方。这个富饶的盆地平原，松树弯曲茂盛，神秘的群山环抱，悬崖峭壁耸立，任何初来四川的外国人，都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富于幻想的图画。

一个名叫西奥多?怀特的美国青年，以记者兼作家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宣传部顾问。当他抵达重庆的时候，沿着码头陡峭湿滑的台阶，几个近乎全身赤裸的中国舆夫扛着滑竿把他抬进了重庆的城门。怀特看见这座中国的战时都城被陡峭的山崖环绕着，城墙古旧得弥漫着斑驳的陈年色泽，城门上装饰着金色圆形大钉，而城门之外农民们开垦的梯田从一条山脊延伸到另一条山脊。走进重庆高低不平的街巷里，花摊比他的“故乡波士顿的还要多”，在水仙花、杜鹃花和各种各样不认识的花朵的香气中，怀特看到了中国百姓的市井生活，其坦然从容令他感到眼前的一切并非是在战争中：

重庆真正的持续不断的生活脉搏，却与中国最富饶的四川省的五千万农民息息相关，他们种植的大米充盈了战时中国的粮仓。平底敞舱驳船运载稻米从上游顺流而下，装进麻袋后运往前线，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运往沿海城市销售。重庆最有钱的富翁是粮商和拥有稻田的地主。肉类还是像从前那样来自农村。每天清晨，苦力用粗竹竿抬着猪陆续进城送往屠宰场，猪的四条腿捆在竹竿上，眯合着眼睛，一路痛苦地嚎叫着。猪屠宰后在市场上出售，肥厚的鲜肉在卖肉的案板上渗着血滴，有的猪肉则制成沾满蝇屎的灰白色肉条，还有的制成长达几英尺的布满尘埃的暗褐色的干腊肠，挂在露天肉摊的铁钩上，肉商往往把这种腊肠切成一英寸到两英尺不等，卖给顾客……小巷总是那么阴暗，有的还很狭窄，雨天里小巷两侧屋檐上淌下来的雨水，能同时滴落在行人的雨伞上。巷

里还散发出各种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又香又臭——既有食品、香料、鲜花和鸦片烟的香味，又有未清除的垃圾和流到浅沟里的小便的恶臭。嘈杂的声音构成了另一种交响乐男人和妇女的叫嚷声，婴儿的啼哭声，与人们同在一间棚屋里的母鸡的粗厉叫声。此外，还有挑着木桶的苦力或带着货物的小贩单调的吆喝声。每一种活动都有其独特的声音。木材搬运工吊运圆木时声如吼叫；卖棉花的小贩边走边有节奏地敲打着一块木头；卖杂货的小贩把他所有的货物都装在一个大黑箱子里，用特殊的声调唱着商品的名目，一如波士顿市埃里街上的香蕉商人和鱼贩所做的那样。

最令怀特吃惊的是，重庆到处充斥着的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气概”：中国人不把日本人称为日本人，他们必须称之为“倭寇”；中国人也绝不称日本人在进攻，而是称“日本军队在到处流窜”；汉口被日军占领后，中国人说“敌踪在汉口出现”了；中国军队的每一次退却，都被说成是“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而来自前线的哪怕是小小的胜利消息，中国人都要口口相传以至变成“虏获无数”；当又一座城市陷落时，中国人要特别强调是他们“诱使敌人陷入罗网”。怀特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灌注方式，相比这种方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即中国正在进行的极端艰难的对日作战，他隐隐地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感：

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本来可以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沿海地区，奴颜婢膝地屈从于战胜的日本人的颐指气使。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宁可忍受重庆的酷暑和高温，忍受在既湿而又无取暖设备的屋子里度过严冬，他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生病，甚至因病夭折，但他们不肯屈服。在重庆周围几英里以外的几所临时大学避难的几千名大学生和教授也是如此。沿海地区的许多小商人也不例外。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发财，而纯粹是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出于一种始终要作为中国人的坚强意志。接踵而至的，是那些不愿留在敌占区侍候敌人的手艺出众的厨师，到战争结束时为止，我在重庆吃到的珍馐佳肴，除了偶尔能在巴黎和纽约吃到以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所没有的。

日本人想用炸弹使这样一个重庆“陷落”能有多大的胜算？

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清晰地袒露在万里晴空之下。

日军航空兵团全面总结了前期轰炸重庆的经验和教训，详细研究编成、技术、情报、补给和通信等诸方面构成要件，不但补充了必要的装备和通信器材，还加强了远距离、高强度、夜间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

行以及投弹训练。

日军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第十四战队以及高雄航空队奉命加入轰炸重庆的作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十六时，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四十五架中型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日军机群沿着长江北岸开始俯冲，向重庆的繁华商业区投下了密集的炸弹。中国空军三十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两架，但自己损失了五架，对日军的轰炸没有起到严重妨碍作用。重庆城中心的二十七条主要街道十九条中弹，中弹区烈焰熊熊，房倒屋塌，人声惨叫，血肉横飞。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投弹一百六十六枚，炸死重庆平民六百七十三人，伤三百五十人，炸毁房屋一千零六十八间。

日军轰炸的不是战场，是城市市民区。

这是肆意的屠杀。

为了应对日军的空袭，国民政府要求重庆所有的人倚山城的特点挖掘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防空洞。国民政府希望把日军空袭的伤亡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谁也不可能把一座城市和它的百姓全都藏起来。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决定对重庆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再次发动空袭，时间定在黄昏。为应对中国空军的截击，日军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机群先在重庆附近上空盘旋，与中国战机周旋，待中国战机燃料耗尽必须加油时，突然集群式地向预定目标俯冲而下。四日十七时左右，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分三个批次在预定目标上空投下了携带的航空炸弹，落弹区从中山公园到嘉陵江边长一公里多，从朝天门码头到七星岗之间长约两公里。日军投弹一百二十六枚，炸死重庆市民三千三百一十八人，伤一千九百三十七人，毁坏建筑三千余间，始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荡然无存，连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都未能幸免。

依然置身重庆的美国青年怀特，看到了一座城市“遭到现代世界第一次野蛮轰炸的后果”：

通红的大火四处蔓延，人们从火海中四散奔逃。他们有的徒步跋涉，有的坐人力车，有的坐滑竿，有的推着独轮车。当他们像潮水般外涌时，一辆突然出现的小轿车或军用车使劲地按着喇叭，或者干脆从长长的人流中急驶而过，于是行列散开了。接着又很快合拢起来，继续逃亡乡下。他们带着床垫、铺盖、锅盆碗盏、食物和少量家具。有的抱着

吃奶的孩子，有的背着老奶奶，他们默默地走着，你甚至能够听到他们沉重的脚步声……电线已被炸断，大街上的自来水管也被炸毁。没有一丝灯光，四下所见只是一片火光，也没有水去扑灭大火，火势到处蔓延，城内小巷都被吞噬在火焰中，当火焰烧着竹材的时候，竹节噼啪作响……我的房间里有一具被炸弹掀起的强烈气流抛进来的尸体，冲击波已使其面目全非，肋骨也被压扁了，我只能根据皮肤剥落的乳房认出那是一具女尸……我见到一尊佛像，它嵌在一道峭壁的侧面，由于寺院已被烧毁，这尊盘着腿的巨大铜像在火焰的映照下闪耀着红光，它那仁慈的面孔含笑面对着这座哭泣和哀号的城市。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战争时期人口的混乱流动，使得伤亡数字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来。作为战时首都，重庆难民遍地，而日军实施“无差别轰炸”，因此官方发布的平民伤亡数字应该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尽管这个国家的平民也要像军人一样，在日军发起的军事攻击中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但国民政府依旧没有显现出日本人所期望的崩溃征兆。就中国人的秉性而言，苦到了极致反而能够静默如常——中国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是独一无二的。大火在燃烧，成堆的尸体被拉出城掩埋，哭声震天，天地缟素。而伴随着这一幕的，是入伍的青壮年被隆重地送出防空洞，一碗浓烈的川酒令他们个个面如重枣。城郊的农民，每家每户都接纳了城里人或是外地人，他们宁愿把本来并不宽裕的米粮拿出来，很自觉地在日军的轰炸中与自己的国家同舟共济。中国广大民众的抗日意识，已经被战争的残酷进程所唤醒，老百姓懂得努力生产是为了什么，节衣缩食是为了什么。无论日军如何疯狂轰炸，中国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始终没有停顿，一九三九年的农业竟然获得了丰收，抗战前线的军粮供应因此从未间断。

抗战爆发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努力帮助国家，无论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有资料显示，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华侨筹集的抗战军需物资总数在三千批以上，平均每个月就有一百批抵达中国沿海口岸。一九三九年春夏，南洋华侨总会一次就募集了五十万套棉衣，二百一十七架飞机、二十三辆坦克和一千辆救护车。华侨还特别关注战场药品的筹集，他们希望抗日子弟即使负伤了也要多一点活下来的可能。于是，仅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几个月内，华侨就筹集了足够五十万伤员服用一个月的药品。华侨希望自己的祖国不要因为战争垮塌，尽管城市在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华侨仍以投资的方式向国内输入了大量资本，即使明明知道没有利润回报，甚至可能终致倾家荡产。至一九三九年底，

华侨投资的工矿、垦殖、金融以及各种实业，总金额达到十六亿元。国民政府出台了鼓励华侨投资的政策和法规，在战争的动荡局势下，尽最大可能保护华侨的投资安全和权益。华侨的巨额投资为稳定战时中国的金融和工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华侨还为国民政府拮据的财政募捐。他们节衣缩食，各尽所能，采取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捐、义演义卖捐等形式，每月向国内输入的款额多达一千多万元，成为国民政府一项稳定的财政来源。纽约华侨李国钦，自一九三九年开始，数次捐款累计达七十六万美元；南洋华侨陈嘉庚认购十万元救国公债后，宣布每月再捐二千元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为止；菲律宾华侨巨商李清泉临终前，嘱托家人把他购买的十四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给国家，还把遗产中的十万美元交给国民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扬名海内外的新加坡华侨巨商胡文虎，除了捐献大批物资外，还捐款二百万元以建设残疾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印尼华侨刘长英捐出巨款的同时，送子回国参战，一九三九年冬其子刘盛芳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老人把国民政府发给他的一万元抚恤金又寄回国内，要求充作抗战军费。

华侨背井离乡，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很多人捐出来的都是毕生的血汗积蓄。华侨中的底层劳工生活悲惨，一贫如洗，但哪怕捐出一个铜板，也能聊慰他们的爱国之心。英属北婆罗洲华侨小贩郑潮炯，虽然生活困顿，得知国家遭受巨大苦难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他人，将所得八十元悉数捐献；仰光华侨叶秋莲，把楼房和财产变卖所得全部捐献后，自己出家为尼，日夜为祖国祷告；马来西亚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华侨，为了筹集捐款，竟把自己当作奖品设立彩票，中奖者可娶之回家；越南西贡的一些华人妓女与旅馆老板商量后，决定以对折房租的方式优惠顾客九天，收入的房租连同她们的卖身钱共计八千元，这些被社会认为最下贱的女人分文不少地全部寄给了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卑微生活的人。

即使是卑微生活中的中国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卑微。

在沦陷区，尽管汉奸遍地，“维持会”的牌子随处可见，跟在日军后面的伪军队伍很长，可就连日本人也明白，那些伪军与中国人的整体数量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在每一个日军占领区内，都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抗日组织；在日军占领区的每一座山上，几乎都有抗日游击武装的影子。即使是那些领了“良民证”的农民，只要有泄愤且能安全脱身的机

会，他们个个胆大包天且下手凶狠。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举办的宴会上，日本人和来宾们突然都中毒了，死伤惨重。很快查明，这是在领事馆工作的一名“中国仆役”干的。这名中国人逃走后，给总领事馆写来一封信：“我常年在总领事馆工作，多蒙关怀，不胜感谢。但在攻占南京作战时，我的亲属等遭到强奸暴行，使我恨入骨髓。所以，当我知道当天来客中有日本司令官时，就进行了报复。”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的一则《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消息令日本举国震惊：“阿部规秀中将于十一月七日在华北太行山讨伐共军作战中壮烈阵亡。武将战死在沙场前线之事例，在我军战史上尚属罕见。”

当我军全面攻击太行山八路军之际，担任左翼的辻村部队于三日上午七时抵达长城以南雁宿崖险峻山岳地带时，与优势之敌独立第一师、第一二〇师约三千人遭遇。辻村部队对敌发起猛烈攻击，但敌以迫击炮、重机枪、多数轻机枪顽强抵抗，辻村部队长等挥舞战刀杀入敌阵，展开空前的激战。阿部中将得到辻村部队的急报后，立即率领部下跋涉四十公里艰险山路，连夜翻越鼻子岭，前往救援，四日中午到达辻村所在的战场。此时，辻村部队业已连续战斗二十八小时。当日上午十一时许，暂时将敌击退至南方，正相对峙。恰在此时来到的阿部中将，立即认出站在前面山顶监视敌阵的辻村部队长，“嗯”了一声，就要登上山去，无奈山坡陡峭，难以攀登。于是，命令部下去叫辻村部队长下山，阿部将军与下山来的辻村部队长相互凝视，随即含泪紧握辻村之手，相对无言，只把无限感慨压在心头。

报道的行文充满日式的阴郁委婉，把描述停止在阿部规秀和他的一名部下含泪握手，“相对无言”的空茫瞬间，而将下面血肉横飞的场景剔除得干干净净。

一九三九年十月，鉴于华北北部共产党武装已严重地威胁到日军的占领，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开始第三期“治安肃正”作战，动用的部队是驻蒙军阿部规秀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驻平汉线以北的桑木崇明的第一一〇师团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兵力约两万人。阿部规秀率领他的部队自张家口南下，二十五日赶到河北西部的涞源，与驻扎在涞源县城的堤鸠大队会合。然后，日军兵分三路从涞源、满城、唐县和定县出发，开始了寻找和扫荡八路军主力的作战行动。

日军从涞源一出动，八路军就得到了情报，因为涞源是八路军北上

抗日解放的第一个县城，县城里外布满了“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虽然日军后来又占领了涞源，但是县城周边所有的乡村依然在共产党人的掌握中，日军或伪军的一举一动，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报告给八路军。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决定：用少数兵力牵制西路和西南路的日军，将第一军分区的一团、三团和第三军分区的二团集结在东路日军的必经之地，“打一个胜仗”。

十一月二日午夜，日军辻村、堤鸠两个大队从内长城线出发，天亮时通过雁宿崖南边的险峻山路时，突然遭到来自两侧的猛烈袭击，袭击他们的是杨成武率领的八路军的三个团。八路军官兵的猛打猛冲下，辻村大队很快就被压缩在狭窄的山沟里，不到一天工夫就伤亡了五百多人。接到辻村发来的求救电报后，阿部规秀立即率部前往救援，四日凌晨赶到雁宿崖南边时，却发现八路军已经没了踪影。阿部规秀判断八路军正在撤退，于是命令堤鸠的第四大队和刚赶到战场的中熊的第二大队，以残破的辻村大队为前导，向八路军撤退的方向追击。六日，追击的日军进入了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地区——黄土岭。

聂荣臻得到情报后，立即命令贺龙的第一二〇师特务团赶赴黄土岭，同时命令第一军分区二十五团也赶赴黄土岭，统归杨成武指挥。同时命令第一军分区二十团、三十四团以及第五军分区二十六团牵制易县、满城和徐水方向的日军。

黄土岭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岬口，四周都是大谷深沟。七日清晨，大雨停歇，湿雾弥漫。日军还在继续东进，因为知道这样的地势往往是八路军的战场，因此其先头部队携带着轻重机枪，总是先行站稳路边的小高地，然后再让大部队跟进。直到下午三时，日军的全部人马才通过黄土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浓雾已经消散，阳光照进峡谷，八路军的攻击猛烈地开始了。峡谷两边的悬崖上都是八路军的枪口，一百多挺机枪一起朝沟里打，日军的三个大队拥挤在仅百余公尺宽的山沟里无法展开，造成了密集的人员伤亡。战斗进行到下午四时，日军掉头企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县城，但遭到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三团和第一二〇师特务团的顽强阻击。

黄土岭东面有一个名叫教场的村子，阿部规秀将他的指挥部移至教场村的一座农家院里。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被牵制在这里，而八路军更大的部队将包抄他的后路。被这一不祥的预感所驱使，阿部规秀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但是，还没等他下达撤退命令，一颗迫击炮弹准确地落在院子里，阿部规秀的腹部以及双腿中弹，他的参谋人员也全部负伤。原

来，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看见一群穿黄呢大衣的日军军官正站在一处农家院里，立即把目标指示给炮兵连连长杨九坪，杨九坪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陈正湘团长再拿望远镜看去时，穿黄呢大衣的日军军官已全都倒地。失去了指挥机关的日军发生严重混乱，不得不收缩部队据守黄土岭抵抗待援。傍晚，绿川纯治率领的第三大队赶到了。坚持了一天后，森田春次的第五大队也赶到了。同时，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的两个支队、第二十六师团的一个支队正分路向黄土岭靠拢合围。于是，聂荣臻下令八路军撤出战场。

是役，日军伤亡千余人，八路军伤亡八百余人。

全身多处负伤的阿部规秀没有当场死掉，他的生命一直苟延到那天午夜十一时五十分。

阿部规秀，一八八六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一九〇七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九期步兵科，一九三七年以第一师团第一旅团少将旅团长之职率部入侵中国东北，一九三九年六月调任华北方面军“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死前的一个月晋升为日本陆军中将。

阿部规秀赴涞源前线时，曾写信给长女纪子：

现在是十月二十六日四时，爸爸从今天起去南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三、十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八点三十分乘汽车向涞源进发。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此地已经下了两场雪，然而比北满还是暖和的，所以还好过……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

没有人知道，浑身中弹的阿部规秀死前是否依然认为打仗“是最悠闲而且有趣的”，定格在他意识中的也许只有中国太行山那层峦叠嶂的铅灰色山峦。

蒋介石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据敌皓日（十九日）广播，敌辻村部队本月江日（三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四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

……当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辻村大佐）并附辎、炮各一中队共七百余，上月江日（三日）进到三岔口（涞源南），被我杨成武支队歼灭之际，随即该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领独立步兵第二、第三大队及炮兵二中队共一千六百余人由涞源来援，是晚占三岔口，其时辻村大队已被歼灭殆尽。是晚我杨成武部第二、第三团以有力部队监视和袭扰该敌外，以大部截断敌之退路，微日（五日）敌继续东窜占黄土岭。我为歼灭深入敌计，贺师特务团由阜平附近冰天雪地中星援，微晚（五日晚）赶到黄土岭附近。鱼日（六日）敌图东窜，数度向我猛攻，在我猛烈合击下均未得逞，反陷我包围中。是晚我向该敌猛攻，敌凭民房顽抗，激战彻夜。虞晨（七日晨）该敌以全力，在飞机七架轮番掩护下向东猛烈突围，企图绕五回岭回窜。正午该敌复被包围于上庄子，我在敌飞机猛烈炮火下向敌猛攻，敌死伤极重，阿部旅团长当场被我击毙，以下伤亡约八百余人，敌已失掌握难立足。正在我歼敌之时，复由涞源增援来敌七百余，合股激战竟日未能解决战斗。同时，我已苦战多日，部队颇受疲劳，尤以弹药消耗甚重。齐日（八日）残敌在十余架飞机掩护下突围，经五回岭窜回涞源……

在几乎占据了半个中国的沦陷区，共产党武装开辟的敌后根据地，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感到吃惊。而且，无论敌后作战多么残酷和艰难，共产党武装不但频繁出击而且战果迭出，这使得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之重要，已经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更令人瞩目的是，共产党人决心在日军占领区内，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能够组织广大抗日民众和敌后武装与日军较量的抗日民主政权。

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表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毫无疑问，随着日军不断地攻城掠地，随着中国军队的不断后撤，沦陷区原国民党政权已经分崩离析，华北和华中的多数地方因此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这正是日本占领军希望看到的，因为不但可以使日军的占领更有威慑性，而且还可以扶植伪政权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共产党人在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并使之成为一个公开的、强大的、对日本占领军具有威慑力的政治力量。

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山西、绥察、河北、山东和华中的敌后地区，纷纷建立起以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

的、半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或民众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成为沦陷区动员武装民众、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完全替代了已经瓦解的原国民党地方政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和抗战形势的演变，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共产党人坚持敌后斗争的重要任务。

在晋察冀，除了中共秘密党员五台县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没有逃亡外，其余各县的原国民党县府官员全部逃跑了。聂荣臻率领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以山西第一行政区主任宋劭文和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开始向各县派任县长，先后建立起三十九个县政府。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部署，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阎锡山报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任命了各位委员。这是抗日战争进程中诞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三九年，山西境内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已对大部分最基层的村长进行了全面改造或更换。这些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基层政权，对保证全民持久抗战、保证抗战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山西的经验，河北西部、河南北部的抗日根据地，也逐渐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由共产党领导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政权逐渐趋于统一。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在蓬莱、黄县和掖县等地建立，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山东全省建起了三百五十个区级、七十余个县级、十个专区级的政权和两个行政公署，其规模之大以及层次之健全，使得日本占领军扶植的山东伪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由于华中沦陷区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以新四军为主的抗日武装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困难颇多，进展缓慢。中共中央中原局要求，必须在华中敌后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凡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初，自共产党人魏文伯出任淮南定远县县长始，华中沦陷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之后便很快扩展为四十七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而这意味着，在华中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内，已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建立起新型的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政权是极其复杂的政治行为。

中国社会的基层权力机构，向来以各阶层混杂且互相掣肘著称。在建立新型政权的样式上，共产党人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中共中央特别强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绝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执掌的政权，

而是“几个革命的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据此，中共中央对构成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进行了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但是，毛泽东继而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普选”。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阐释道：“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之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主政治的榜样，也是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样板，它完成了乡、区、县的各级民主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权，在残酷而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民众参加抗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并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赢得胜利、建设国家的希望。在陕甘宁边区样板作用的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实行的普选中，选民占公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根据地中心地区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比例在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上堪称奇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大力恢复生产，本着“以农为主，重视多种经济”的方针，采取的措施包括：减租减息、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全面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等。同时，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发展商业，发展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合作事业。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敌后民众的生活，还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坚持敌后作战提供了经济保障。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地区创建发展起来，面对以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状态，共产党人表现出原国民党政权无法比拟的智慧与能力。抗日根据地采用对外实行贸易统制、对内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将根据地内可以作为商品的物资

尽量销售出去，把急需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尽量交换回来，但日军占领区的其他商品严禁入内。根据地内部，公营、公私合营、私营以及合作社经营几种商业模式并存，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根据地内部的商品流通空前繁荣。共产党人还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货币，以对抗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发行的各种货币。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行”“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安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浙东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其数量、规模以及运行状况，不但令日本占领军晕头转向，还令国民政府财政部大为吃惊。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为敌后抗日作战以及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共产党人还极其重视民众的文化普及，利用农闲时节举办的“冬学”在各个根据地普遍设立，农民们参加识字运动的热情极高。在日军残酷扫荡的一九三九年冬，晋察冀根据地的入学率，竟然由上一年的十八万人增加到十九万余人。在“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办学方针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农民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曾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中西部，在途经吕梁山里的抗日根据地时，她“碰到一队队身体壮实的农民，里面偶尔也有几个年龄稍大的。人人手里拿着棍子和绳子”。史沫特莱问农民们，是哪个村的？要上哪去？农民们说，他们要去“把受伤的八路军抬回来”。还说八路军在他们村里开过会，讲过抗日的道理，号召大家“自告奋勇把伤员运到陕北去”。结果，会一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了”，翻山去找八路军的伤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力源于千万抗日民众，正像朱德所说的：“八路军需要人民的帮助，人民也需要八路军的帮助，他们彼此相依为命。”八路军在敌后战场英勇地作战，“人民还必须懂得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军队”，“懂得怎样破坏公路、铁路、装甲车、卡车和坦克”，“懂得怎样彻底毁掉日本摩托化部队能够通行的一切道路”。“中国人民千千万万，日本军队就那么一些，如果我们的人民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并把自己武装起来，那我们就能够打败敌人”！

美国青年怀特于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际离开重庆，前往山西。尽管他还无法正确地判别国民党游击队、共产党游击队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抗

日武装，但他看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真实存在：“阳城、晋城和高平三县，各有农民约二十万到三十万，其县城四周都筑有雉堞起伏的城墙。其中的两个县，即阳城和晋城，新县长年龄都是二十六岁，高平县的县长只有二十四岁。两个县长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的哈佛，他们还都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是省立山西大学的毕业生。这些学生从被占领的城市逃到山区进行抗战，他们不愿受日本人的统治。”怀特仔细观察了三位年轻县长的工作：早晨的时候，阳城县县长在村子里对地主讲什么是“政府”，不准他们再拷问农民和擅自收税；晋城县县长则在山沟里组织农民试制用来对付日军汽车的手榴弹；高平县县长圆脸上戴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从日军那里缴获的肥大的大衣，他对自己的工作是这样叙述的：“人人都必须挺身起来进行战斗。妇女们必须和日本人做斗争——于是成立了妇女民族救亡会，她们纺纱，为部队织毯子、编草鞋。学生也必须战斗——于是成立了学生民族救亡会。每个村子必须组织自卫队——大的村三十人，每人发手榴弹五颗，每一小队发两三支枪。儿童必须编入儿童团。不能逃走的老年人必须在日军经过时进行侦察活动。宁可让田地荒芜，并烧掉自己的房屋，也决不能为日本人办事，每个村子的墙上都刷有标语——‘坚壁清野，转移别处’。”

阳城、晋城、高平三县，处在各种政治力量重叠存在的地区，但怀特发现年轻的高平县县长对共产党情有独钟。他亲自带怀特去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占领的游击区，刚一进村，就看见一群农村孩子举着上面写有“美国和中国是朋友” 的欢迎横幅。怀特与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共产党干部进行了交谈，这位干部说他们恨日本侵略者，同时也恨蒋介石政府，因为“共产党的义勇军每人每月的军饷仅一块钱，而政府军的军饷每人每月却达八元。政府军能领到经过各道关口用麻袋运来的粮食，而他的部队却必须动员农民来提供。政府军有枪支弹药的补给，而他的士兵却必须在战斗中去缴获敌人的步枪和机枪”。最后，他告诉怀特，尽管他们憎恨国民党的行为，却并不惧怕国民党给共产党武装造成的困难，因为八路军可以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战术袭击日军，用以保持自己的武器和弹药供给；同时广大的民众的支持，也能够缓解所有生存的困难。——毛泽东说：‘人民是海，我们是海里之鱼。’这句话被尊为至高无上的信条。”

怀特骑着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里走了五天。——旧的体系在日军入侵后已经融解或瓦解，共产党便渗入了业已瓦解的旧体系的残存部分。日本人在进攻、袭击、掠夺、轰炸中国国土，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结构。剩下来的不是一个完整社会，而是像海绵体那样一团东西，像一

个由许多被捣碎了的蜂室组成的蜂房，其中大部分还留有螯刺。有些村子拥护国民党，有些村子拥护省政府，还有一些村子拥护共产党，但农民们所拥护的政权组织必须能够有效地保卫他们的家园。”怀特认为，在中国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只有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卓有成效地保护了人民”：

我已经上了有关政治、政府和历史的真正的第一课：政府首先是在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人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组织形式，是想仰仗政府保护他们免受胡作非为的暴行和杀戮之害。在大轰炸以后中央政府接管重庆地方政府时，我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我这时更懂得了山西省山区政府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组成政府，却正在向这种形式过渡。他们卓有成效地保护了人民。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显然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不符。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已无法避免。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对这种情况有所预见，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的两大危险，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的两种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深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群众和准备舆论，以应对可能突发的问题。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九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为了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沦陷区的民众，为了在敌后能够生存和战斗下去，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冀鲁地区，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以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对冀中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朱德致电蒋介石，通告日军沿津浦、平汉及北宁铁道线大举扫荡的情况：“一，敌依据铁路向前推进，进占各县城后，正在积极构筑据点，修复公路，并以沧石线以南至德州、南宫、宁晋线，邢台、威县、临清、高唐、济南线，邯郸、大名、冠县、聊城线屯积大兵为其基干线。二，敌依据已占之据点，仍逐渐向外发展，扩大其占领区，更进一步地来缩小我活动区域，若一查明我军所在地，即由各据点组织成快速部队，分数路向我行包围，企图歼灭。”面对日军的大举扫荡，八路军对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出击作战：

一、以陈光旅长率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进出长清、肥城线，向济

南地带之敌袭击”，于三月五日进击郓城，“消灭日军百余及伪军刘本功部，获枪三百余支，俘伪团长以下日伪军四百余人。

二、以师长贺龙率第一二〇师之一部及吕正操之第三纵队，“继续在冀中坚持游击”。该部几乎每日都发生与日军的战斗，而发生“在河间黑马张庄村一战尤为烈，敌人伤亡二百余，我伤亡连长以下百余人，略有俘获。

三、以副师长徐向前率陈再道的东进纵队、宋任穷的冀南军区司令部以及第一二九师一部，“每日均不断与敌接触”，其中三月三日在武邑徐沙村、四日在高唐琉璃寺的“战斗极为激烈，我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耀同志阵亡，营长以下伤亡六百余。

四、以师长刘伯承“率第三八六旅及先遣支队转到磁县、邢台线、平汉线两侧，袭该地带之敌。

五、以肖华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袭击沧县、德州线上之敌”。在陵县作战中，肖华纵队“消灭日军五十余，伪军于志良部三百余，缴获机、步枪二百余支。

六、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进袭完县、满城线及以东地区，袭击保定、琢州线之敌”。

八路军“尤为烈”的一仗，发生在冀中的河间地区。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津浦、平汉、北宁铁路以及沧石公路中间，区域内流淌着大清河和滹沱河，人口多达七百余万，“为晋察、晋绥敌后根据地的兵源粮源所在”。二月，为配合驻邯郸、德州的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滹沱河以北各据点的日军纠集起三千多兵力，在坦克和装甲车等重武器的配合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摧毁共产党的军政机关。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急行军百余里赶到战场，拼死拒敌，毙伤日伪军百余人。很快，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抽调出近万兵力，再次向冀中根据地发起进攻。八路军冀中总指挥部命令靠近平汉、津浦两路的各分区部队积极袭扰日军，命令冀中军区率杨家瑞的特务团、第一二〇师师部率七一六团等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战术”与日伪军周旋作战，其间不断地派出部队打击日军的侧翼，使得日伪军对八路军的包围企图屡次落空。到了四月下旬，虽然日伪军占领了冀中的所有县城，却既没能歼灭八路军的主力，也没能

将抗日根据地扫荡干净。

日军扫荡部队撤退后贺龙部的处境依旧不好，其所在的高阳地区，敌人据点林立，部队回旋余地很小，因此决定向河间东北方向的齐会村附近靠拢，以求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获得休整。但是，第一二〇师的行踪被日军察觉了。二十二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的八百余人从河间出动，企图与八路军贺龙部决战。同时，驻任丘、大城等地的日军也开始出动，以求配合吉田大队的作战。贺龙认为，虽然日军来势汹汹，但齐会村附近集结着八路军七个团的兵力，至少有能力歼灭一个方向的日军。所以，决定打上一仗。

二十三日，吉田大队开始炮击齐会村，驻扎在村内的八路军七一六团三营被日军包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七一六团一营从村外向日军发动攻击，试图与村内的三营会合，没有成功；七一五团七连突进了村内，但突破口很快又被日军封闭。第一二〇师后续部队立即在齐会村周边地域内对日军实施反包围。与此同时，从任丘出动的日军被独立第二旅五团阻击，从大城出动的日军被独立第一旅一团阻击。下午五时，为了打破战场僵局，日军释放了毒气，贺龙和他身边的参谋人员因躲避不及都中了毒。但贺龙依然命令七一六团一营和二营从北面、东北面向齐会村外围攻击，村内的三营和七一五团七连向村外反冲击，独立第一旅七一五团和二团的一个营以及独立第二旅的一个团在日军增援的路上设伏。晚上，七一六团对日军发动了内外夹击，日军据守齐会村的村边工事进行抵抗，战斗一直持续到二十四日黎明，伤痕累累的大队长吉田终于支持不住了，命令部队开始撤退。急于撤退的日军遭到了八路军的猛烈追击，最后只能据守在一片坟地里挖掘工事，企图与八路军对峙待援。黄昏，第一二〇师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进一步将日军压缩在坟地的狭窄范围内，然后用迫击炮和机枪对残敌进行歼灭打击。二十五日拂晓，第一二〇师发动了最后总攻，突然间战场上风骤起，黄沙漫天，日军残部趁天昏地暗之机冲破包围向南逃窜。第一二〇师官兵狂追二十里，吉田大队只剩下了八十余人。逃到一个名叫枯树泊的村子时，与接应他们的日军发生误会，又伤亡了十余人，最后跟着吉田逃回河间的日军仅有五六十人。

吉田大队山炮第四中队中队长菅沼荣对这场作战的回忆是：

四周枪声停止时，我原拟命令山炮队迅速脱离战场，与东南方的主力部队会合。此时，高井军曹跑来传达大队命令：尖兵中队返回，攻击大超市村南方、西方地区。突然一颗子弹从右臂穿过他的胸部，好汉一

言不发倒地而死，正值五时三十分……八时三十分，我军粮食、弹药均告缺乏，但仍尽力攻击，敌虽未采取积极行动，但其包围形势愈加严密……增田曹长勇敢搜索敌之位置，向其射击。敌也再向坟地射击，子弹碰上树干，树叶纷纷落下。再继续射击时，一颗无情子弹穿透增田曹长右前侧头部，好汉终于在“啊呀”声中倒地不起（十时二十分）。偏巧当时我正在大队部，接到报告，感到肌肉僵直，极为痛心。我立即返回阵地，握其手尚温，但已不能讲话。洗净其血污前额，默默为之祈祷……二十时，夕阳西下，突然刮起一阵北风，漫天尘土飞扬，一千米外的村庄不见踪影……大超市村已模糊不清。

吉田大队第八中队上等兵内匠俊三，在战斗中目睹了身边的军官和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而他自己则是不断地逃命才冲出了八路军的火网——“长期苦战的武汉会战结束，第二十七师团回到华北”。吉田大队驻守河间县城时，听说周围有四五万的八路军。只好派“第五中队和第六中队轮流隔日出动七八十人，扫荡各自担任的地区”。而在第六中队的警备地区，只要部队一出动，就会遭遇八路军的袭击，“经常要派出三四十人救援，为此伤亡甚多。在城外急造简易机场，隔日运送伤员，部队在极艰苦的作战中度日”。四月二十二日午夜，吉田大队“带着众多车马行列”从河间出发，接近位于河边的齐会村时，发现村庄的房顶上有八路军的身影。吉田大队立即“摆开了战斗队形”，第八中队则“登上房顶，开始沿房顶前进”。这时，紧跟其后的第七中队突然遭到激烈的射击，“房顶上不断有人受伤”。竹中曹长要求内匠俊三干掉八路军的火力。内匠俊三刚要动身，有人拉住他的腿说：“上等兵，那儿危险，别过去。”内匠俊三找到一个火力死角迂回过去，看见“约五十米远的高大房屋上，周围堆满被褥、家具等物”，三四十名八路军正在那里猛射第七中队。内匠俊三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股风暴平地而起，尘沙扑面而来，内匠俊三趁机“窜到房顶上，以火炕的小烟囱做依托打了一枪”。谁想，子弹正中对面一个八路军的面部——“似乎被炸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内匠俊三目瞪口呆：只见那个八路军“身体略一转动，胸前的带柄手榴弹爆炸了”。待内匠俊三返回第八中队后，竹中曹长命令他去“看一下机枪中队的战斗状况”。此时，齐会村里“正在进行激烈的屋战，有的伤员被炸掉半个脸，尽管伤亡惨重，仍在进行猛烈战斗”。终于到达机枪中队，看见他们“将大队炮抬到房顶上，直接轰击五六十米外”的八路军。可是，待内匠俊三“回到中队报告时，中队人员已不在，只剩一名联络员。说是由于担任右侧尖兵的第三小队全部覆灭，中队迅速转向村右侧”。内匠俊三赶到村右侧时，第八中队“正向五十米外”的八路军阵地“发起冲锋”。内匠俊三一下子冲到了最前面，而竹中曹长“挥舞着战刀”超过了他。不一

会，枪声减弱，内匠俊三朝四周看去，“只见三四十米处，人们都躺在地上。竹中曹长左胸口有两厘米的擦伤，另两个伤员一个被子弹打穿大腿，一个打穿腿肚子……前方七中队的战斗毫无进展，传来激烈的枪声和掷弹筒的爆炸声”。而在八中队的后方，八路军“屡次发起攻击”，双方“反复进行一进一退的战斗”……傍晚时分，吉田大队开始撤退，八路军在后面“开枪射击”。竹中曹长命令内匠俊三：“你一人留在这里阻击。”随后给了他一堆八八式带木柄手榴弹。“就我一个人吗？”“是的，坚决顶住！”尽管内匠俊三心里发慌，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埋伏在这里等候”。“过了四五分钟，友军部队的马车声听不到了”，孤独的内匠俊三感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黑暗中，八路军仍在一边射击一边叫喊，“子弹漫无目标地乱飞”。内匠俊三不等八路军靠近，先“把十五发子弹打完”，再把带柄的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掉头向部队前进的方向拼命奔跑”。终于回到八中队时，竹中曹长大声斥责说：“怎么不再坚持一会儿！”夜幕终于降临了，内匠俊三听说，“这里距沙河桥警备部队还有四五十公里”，如果他们“今晚突围失败，部队将面临严重危机，将造成致命的损失”。他们已经“三昼夜不曾合眼”，可“奇怪的是竟然毫无睡意”。此刻，在步兵“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人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有的人头部中弹……一连二十多辆马车都装着战死者的躯体”。竹中曹长告诉内匠俊三：“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出现如此之多的伤亡，这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即使是南苑战斗，或武汉作战，也不曾有过……”而日军最后的总结是，他们不幸地遇到了“从延安进入冀中战区的八路军著名人物贺龙的主力及延安来的最精锐的部队”。

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作战序列中，有一位来自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即加拿大共产党）的外科医生，名叫白求恩。齐会战斗时，白求恩的医疗队就设在靠近前沿的一座小土地庙里。战斗最残酷的时候，七一六团三连连长徐志杰被抬了进来，他腹部中弹，肠膈膜动脉血管破裂，肠子至少有十多处被弹片洞穿。白求恩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紧急手术。手术完，他拿出自己的木匠工具，专门为徐连长制作了一副带靠背的担架。他把自带的炼乳喂给徐连长吃，把香烟点燃放在徐连长的嘴唇上。他守护这位年轻的八路军连长整整二十八天，徐志杰连长最终活了下来。伤员向后方转移的时候，徐连长拉着白求恩的衣角泪流不止，他哽咽地说：“我以后只有多杀几个鬼子来报答你！”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部队。该部东进后，越过平汉铁路，抵达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了摧毁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武装，

日军从武汉前线把主力部队第十师团一部调了来，再加上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各一部，致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必须面对的日军主力达三万人以上。但是，第一二九师丝毫不怯敌避战，果敢坚决地出击袭扰并消灭日军。日军第十师团第十联队的战斗日志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与八路军的作战经过：

各队到达驻地，立即遭敌执拗顽强袭扰。而后九个月的期间，联队为应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东奔西跑，接连不暇，不断进行讨伐作战。八路军长于情报活动，每当我军发动突然袭击，他一夜之间即行逃遁，同时经常乘虚对我实施骚扰袭击。而且军纪严格，即使溃退时也不留一具尸体。自津浦铁路静海县初战以来，第十联队经历了许多凄惨激烈的战斗，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日夜夜在与最难对付的敌人交手。在此期间，第十二中队第一小队长岸本重德中尉、第九中队小队长堀口茂中尉、第十中队小队长玉男木辰雄少尉、平松贡少尉等四十余人战死。

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率领下，以第三四三旅杨勇的六八六团为主力，从山西南部出发东进山东，与山东抗日根据地部队会合后，稳定了原有根据地的根基，扩大了抗日武装队伍，开辟了泰西新根据地。他们在中国绿林好汉聚集地水泊梁山，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的长田敏江大队打了一仗。长田大队护送一个炮兵小队以及两门意大利火炮、两辆运弹药的炮车，从汶山出发渡过运河向梁山开来。梁山周围没有日军的据点，稍远处的东平、济宁、阳谷、郓城也没有日军增兵，四野的青纱帐正值茂密季节，极有利于八路军攻敌不备。于是，罗荣桓与陈光决定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战机”消灭这股敌人。第一一五师投入了师部特务营和六八六团的两个连以及骑兵连等共六百多兵力，把日军长田大队的六百多人压缩在梁山西南一个名叫独山的山包下，两个连在前面开火，一个连在后面开火，日军受到两面夹击顿时混乱——“步兵堵住了炮兵，骑兵又冲散了步兵”。战至第二天上午，第一一五师骑兵连冲入战场，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洼地里发现了长田敏江的尸体”。此战创造了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的战斗纪录。

新四军处在中国第三战区的作战区域内。因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每周都向蒋介石汇报一次新四军的作战情况，这些汇报电文详细记录了新四军的出击规模、作战经过、战果和伤亡情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

新四军段焕竞团一部，有晚（二十九日晚），密奔伏牛、新闸间，并埋置地雷于铁轨侧，适由丹阳上驶敌兵车数辆，当即将机车炸毁，其余车厢十余辆越出轨道，我伏兵突起猛追，激战约一小时。敌援赶至，我因众寡悬殊，遂行引退。此役敌伤亡三十余，我伤亡十余人。同晚，该团另一部动员民众千余，破坏镇丹公路约八十里，并炸毁洋桥二座。又破坏镇江南官塘至西罗、长山巷两公路共约三十余里，毁西罗桥梁一座。同时另一部袭击丹阳守敌，激战约三小时，毙敌十余。又该军孙仲德团，寝日（二十六日），猛袭横山桥敌伪军，敌不支退缩横山。此役我缴获敌旗四面，其他军用品一部，毙敌二伤四，我伤亡各一。又感日（二十七日），孙团一部在三山南之岳山、南山间与敌百三十余遭遇，激战三小时，敌伤亡三十余，我阵亡战士十七名、伤十名、损失步枪六支。又感日，敌三百余企图进犯延阳，该军段焕竞团即派队迎击，于麦溪附近激战三小时，毙敌八，伤敌二十余，后溧敌增援百余，又被我杀伤七八名，敌不支向原路溃退，并夺获军用品被服一部，我亦伤亡五名。

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为华东沿海的繁华地带。作为这一地带唯一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新四军格外引人注目，以致中外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新四军的作战。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情况：

新四军按照中央的指挥，运动到芜湖地区周围时，驻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的敌人，只有两个日本师和两个台湾旅。现在，单在新四军的地区内，就牵制了三倍那么多的日军，同时还迫使日军需要派出更多的援兵来驻守游击区，以便对付游击队。现在新四军及其指挥的基地，已扩充到九个县，而日本人在该地区仅占领了五个县……当新四军开始作战时，日本人是没有准备的。铁路运输被切断了，桥梁被炸毁了，道路被破坏了，给养车被夺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警备部队被清除了。日本人被迫向这里增兵，扩大警备部队，增加警备据点，维持一个特别师的兵力，来单独对付游击队作战……与此同时，新四军通过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依靠宣传和关心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信任新四军……游击战的胜利鼓舞了农民，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的良好纪律性消除了他们中的所有顾虑，使军队和人民团结起来了……现在，对于日本警备部队来说，整个占领区已经越来越不安全和难以守住。中国人频繁进攻日本据点的真正目的，是迫使日本人沿着有利于游击队作战的农村道路来增援，而在那里，他们埋伏下了或是集中了一支大部队……新四军将很快成为一支正规军。它已经超

出了游击战的狭小形式，并在较大范围内向正规战过渡，运动战与广泛的游击战的结合，为民族抗战进行的全民动员和全民武装，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它正在促进所有中国正规军的发展。它已经确立了在每个战场，在所有敌占区以及在每一个日军据点，对日军不停地发动攻击的原则。在蒋介石委员长的指挥下，所有中国军队需要团结一致，更加密切军民关系，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进行伟大的斗争。

国民党内部的顽固反共分子，特别是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大肆挑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以期达到他们与日本人共同希望的国共反目或分裂，“游而不击”四个字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武装的口头禅。为此，毛泽东专门发表文章，愤怒驳斥反共分子的肆意攻击，郑重声明在中国共产党这边，既没有汪精卫的党徒也没有腐败官僚的麻将牌，而共产党武装所坚持的敌后作战，得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称赞是有道理的：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号召实行于上，全国民众同声拥护于下，却有不少人员对于这个纲领讳莫如深，不但讳言之，而且阻挠之。对于这个纲领中施行民权主义的项目，例如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不是实行者奖，而是实行者罚，这种状态是非常离奇的，是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的。晋察冀边区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精神，是值得钦佩值得奖励的。过去汪精卫辈开口闭口八路军与游击队“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某些应声虫起而和之，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了，应声虫们则在四圈八圈麻将世界大打其“游击”，真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晋察冀边区里面没有汪精卫党徒，也没有四圈八圈麻将，那里却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蒋委员长曾经着重称赞华北的战争，不是没有原因的。

蒋介石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要求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为此，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一系列口号，并通报八路军、新四军全军将士：

“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各党派精诚团结反对内部摩擦！”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汉奸卖国贼！”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反对妥协投降！”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肃清贪官污吏，制裁土豪劣绅！”

“实行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国共合作、拥护统一战线！”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实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万岁！”

……

面对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人以其不屈的抗战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成为苦难中国精神上的中流砥柱。

那位在齐会作战中救活了八路军连长的白求恩医生，几个月后在河北涞源抢救伤员的手术中不慎割破手指，后在另一台手术中伤口受到感染转为败血症，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牺牲在中国河北唐县的黄石口村。毛泽东专门写出《纪念白求恩》一文以为哀悼。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如果具备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无疑是中国人精神和道德的最高标准。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极其复杂，这也是中国历史格外纷杂的重要原因，只是中国人从没有机会认真梳理自己民族的精神脉络。

一九三九年，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变。

中国的抗战进程由此变得更加曲折。

第十九章

究在何地可以一战？

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当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准备在湖南境内展开一场厮杀的时候，双方都没有想到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猝然爆发。

武汉会战后，湖南成为中国第九战区与日军第十一军对峙的前沿。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划定的辖境，第九战区作战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的湖南和江西西部，任务是保卫湘、赣，重点是对长沙的防御。第九战区的北面是第五战区，以长江为界；东面是第三战区，以赣江和鄱阳湖西岸为界。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陈诚，代司令长官是薛岳，前敌总司令是罗卓英，参谋长是吴逸志。

第九战区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军队部署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战区，尽管没有空军编制，海军也仅有少量的布雷队，但是陆军师多达四十多个，加上游击队武装，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

第九战区的主要部队是：

第一集团军，驻扎江西奉新西南，总司令卢汉，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孙渡的第五十八军（滇军，辖刘正富的新编第十师和鲁道源的新编第十一师）；安恩溥的第六十军（滇军，辖杨宏光的第一八三师和万保邦的第一八四师）；高荫槐的新编第三军（滇军，辖安恩溥兼任师长的第一八二师和龚顺壁的新编第十二师）。

第十五集团军，驻扎湖南长沙，总司令薛岳，代总司令关麟征。指挥陈沛的第三十七军（湘军，辖梁仲江的第六十师、罗奇的第九十五师和李棠的第一四〇师）；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中央军，辖赵公武的第二师、张汉初的第二十五师和覃异之的第一九五师）；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中央军，辖侯镜如的第二十一师、罗启疆的第八十二师和梁汉明的第九十二师）。

第十九集团军，驻扎湖南浏阳以东，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彭善的第十八军（中央军，辖叶佩高的第十一师和盛逢尧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晋军，辖李兆瑛的第一三九师、唐永良的第一四

一师和傅立平的第一四二师）；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东北军，辖王铁汉的第一〇五师和张言传的预备第九师）；李觉的第七十军（湘军，辖唐伯寅的第十九师和段珩的第一〇七师）；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中央军，辖李天霞的第五十一师、施中诚的第五十七师和冯圣法的第五十八师）；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中央军，辖王凌云的第七十六师、王甲本的第九十八师和王严的第一一八师）。

第二十七集团军，驻扎湖北崇阳东南地区，总司令杨森。指挥杨森兼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川军，辖杨汉域的第一三三师和杨干才的第一三四师)。

第三十集团军，驻扎江西武宁以北地区，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王陵基兼任军长的第七十二军（川军，辖范南煊的新编第十四师和邓国璋的新编第十五师）；夏首勋的第七十八军（川军，辖刘若弼的新编第十三师和吴守权的新编第十六师)。

湘鄂赣区游击部队，总司令樊崧甫。指挥李玉堂的第八军（中央军，辖赵锡田的第三师和丁炳权的第一九七师）；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湘军，辖汪之斌的第十五师和柳际明的第七十七师)。

长沙警备区部队，总司令欧震。指挥欧震兼任军长的第四军（中央军、粤军和黔军混编，辖张德能的第五十九师、陈荣基的第九十师和梁华盛的第一九〇师）。

与中国第九战区对峙的日军第十一军，用于湖南作战的部队是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甘粕重太郎的第三十三师团、中井良太郎的第一〇六师团、齐藤弥平太的第一〇一师团步兵第一〇二旅团（佐枝支队）、藤田进的第三师团步兵第五旅团（上村支队）以及田中静一的第十师团步兵第二十六旅团（奈良支队）。配属的航空兵，是菅原道大的第飞行团。海军有第十三炮艇队、第十一陆战队等部队。总兵力在十万以上。

自八月下旬开始，中国第九战区即发现当面日军举动异常：铁路运输频繁，车站附近断绝交通，不许中国人靠近；无线电里的战场通信单位急剧增加；在沦陷区开始大量强征中国民夫。——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都是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

第九战区判断正确。

冈村宁次正策划一场新的攻势。

日军大本营始终认为，在与日军展开大兵团作战的中国军队中，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的中央军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以黄埔系骨干为将领的部队无不是作战的中坚力量。那么，如果能把这些部队一个个地给予重创乃至歼灭，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就会完全解体。为此，在向湖北中部的突击作战中，日军的首要攻击目标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尽管并未将第三十一集团军彻底歼灭，但日军大本营认为给予很大杀伤也算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接着，冈村宁次盯上了隔着岳阳以南的新墙河与日军对峙的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

关麟征，一九〇五年生于陕西户县，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第一期学员。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率部转战平汉路、台儿庄、徐州、武汉战场，出任第五十二军军长、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其部队曾是汤恩伯部中的主力。在当时的中国陆军中，名将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张耀明都曾是他的部下。

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制订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规定："在武汉地区配备一个强大的作战军，以压制洞庭湖、长江方面敌军主力，对集中之敌及时予以反击，以挫败其抗战意图，但应力求避免扩大战局。"于是，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即为配置于重庆军主力部队四周的唯一纯野战军，承担摧毁中国军队主力的作战任务"。

冈村宁次自豪于自己居于如此重要的战场位置，他认为："第九战区光是中央直系军主力就有约五十个师，这部分军队配合所谓夏季攻势，逐渐表现得顽强而活跃。第十一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九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另外，冈村宁次之所以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还因为这里是中国盛产大米的粮仓，为国民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粮食和兵源。占领这一地区，不但可以破坏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还可以缓解日军在供给上的日趋困难。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指导大纲：

作战目的

军的作战目的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指导方针

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九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

二、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大概恢复原来态势。

作战准备要领

一、军制定会战指导策略所需各项情报在八月下旬半以前，军及师团执行战争指导所需各项资料在九月上旬以前要进行逐次搜索和整理妥当。

二、会战指导策略大概在八月下旬半以前制定，和海军的协定在八月底以前制定出来。

三、使用兵力概要

军主力方面：第六师团主力，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及第十三师团各支队部队、军直部队的主力。为此，尽速调第三十四师团担任武汉警备，令原武汉警备队归还第三十三师团。高安修水方面：第一〇六师团主力、第一〇一师团的一部、军直部队的一部。

四、集中完毕时间：奉新方面在九月中旬半以前，军主力方面在九月中旬末以前。

五、作战兵力要改编为驮马部队，并尽量以轻武器装备之。

六、为与军的作战相呼应，宣传及谋略工作主要应指向宜昌、福建方向，并须立即着手。

军在八月下旬，以攻占宜昌为内容的迷惑宣传中，秘密做好准备。九月中旬以后，以一部（第一〇六师团）从奉新方面，以主力从粤汉线方向开始奇袭攻击，迅速机动地把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捕捉、消灭在赣湘边境北部山地内。

这份作战指导大纲，附加着冈村宁次的附记。

附记一：

虽战斗迭兴，亦所谓适应形势也。只有以充足的研究和准备方能求得万全。一、鉴于我军实情，早日结束战局乃唯一且最主要之行动；二、最重要的是以此作为确保现准备地区安定的手段；三、目前的蒋军的全般配置和抗战主体为第九战区（总计五十四个师，计中直十六个师、中旁十五个师、其他二十三个师）。

附记二：

秘密：一、敌军判断我军下一步作战目标为长沙、宜昌，因而对此的防备和刺探极严；二、最近敌军逃跑得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极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四、以后恢复原来态势问题，预计可能出现不利情况，为消除此害，要像襄东作战一样，在宣传、谋略等方面制定计划措施。

从以上军事文件中可以看出：一、无论是日军大本营还是冈村宁次，再次发动攻势作战的目的，并不是扩大占领区，他们甚至没有攻占长沙的意图；二、其基本战术是，强力突进中国军队的防线，捕捉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快速加以围歼，然后退回原出发地；三、中国军队的特点是脱离战场十分迅速，因此，如果突进去了却没能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等于作战失败；四、如同随枣会战一样，撤退时必会受到中国军队的围追，如不预先制订好退回出发地的计划，部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突进去打，然后迅速撤回来。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不得不如此作战。

随枣会战时即是如此。

但这一次是在湖南，面对的是薛岳的部队，冈村宁次深知要格外审慎。

日军即将攻击的地域，位于长江以南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的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交界处，战场东西约三百公里、南北约二百五十公里，从洞庭湖东岸的岳阳南下长沙直线距离不足二百公里。在洞庭湖和鄱阳

湖之间，北起通山，南至萍乡，是一道南北走向的山地，其中最高峰标高一千七百米，地形险峻，大部队难以展开。两湖的湖滨地区和湘江、赣江下游沿岸，除了到山地的过渡地带是丘陵外，大部是平坦的冲积平原，粤汉铁路蜿蜒其中。从军事上讲，如果日军自北向南攻击，由于山地和两湖的阻隔，只能沿粤汉铁路线和两湖的湖滨地区南下，地境狭窄。更重要的是，武汉会战后，为防止日军南下，这一地区的中国军民已把自北向南的所有道路，包括乡村中的小路破坏殆尽；没有了路的稻田里被放满了水，其中地雷密布；重要的隘口都设置了坚固据点，不要说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即使是步兵徒步南下都会感到相当困难，更何况这一地域是中国军队主力密集部署所在。

“从地形及敌军阵地构筑情况观察，除西面洞庭湖畔局部地区之外，我军不得不向凭借山地据守的敌阵进攻。”冈村宁次分析道，“这恰似日俄战争时，我第一军渡过鸭绿江向山地进击的情况。唯一的妙策就是用一支有力部队，利用水路（扬子江、洞庭湖、湘江）向粤汉路沿线（敌防卫重点）的敌军阵地背后突击上岸。上村支队（从第三师团抽出）承担了这一重大任务。”冈村宁次的具体设想是：首先由第一〇六师团从江西北部发动攻击，牵制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并相机予以歼灭，然后主力向湘北转进；第六师团负责突破湖南北部正面新墙河中国守军的阵地，然后南下向汨罗江以南高地进逼；第十三师团的奈良支队（步兵第二十六旅团长奈良晃少将部）由湖南北部平江方向从右向左迂回，待第三师团的上村支队（步兵第五旅团长上村干男部）偷渡洞庭湖后，协力插入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的背后，切断其退路予以彻底歼灭；第三十三师团同时从湖北南部向通城发起攻击，切断中国第九战区与赣北和鄂南的联系，然后全力协助湘北的作战。——这实际上是中央突破、两侧迂回的寻常战术。

当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的位置和部署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以及高荫槐的第一集团军在江西西北部，负责防守赣江以西，沿锦江的高安一线；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在江西北部，作为机动部队置于锦江以南的上高、万载、分宜一带；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在江西西北部，负责防守修水北面的武宁一线；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在湖北南部，负责防守渣津、咸宁、崇阳和蒲圻一带；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在湖南北部，负责防守新墙河、营田、浏阳等地；欧震的第四军和李觉的第七十军控制在长沙和衡阳；薛岳兼任军长的新编第六军、高荫槐兼任军长的新编第三军控制在株洲、醴陵和湘潭；彭善的第十一师作为战区预备队控制在湖南岳麓山。

中国第九战区制订的作战原则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保持外线，后退决战。即利用现有的数道阵地，特别是自北向南横亘在日军攻击路线上的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三条河流，逐步抵抗，消耗敌军，保持主力部队于外线，等日军推进到我军控制区域后，全力总攻，左右夹击，包围日军并歼灭之。而最后决战地点，将根据日军的主攻方向而定：如果日军主攻湘北，决战地域预定在长沙以北的捞刀河下游地区；如果日军主攻湘北并在赣北同时进攻，决战地域则预定在湘赣交界处的上高、铜鼓以及湖南长沙附近；如果日军由湖北南部进攻洞庭湖以西的常德方向，就在常德与日军决战。

什么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保持外线，后退决战？

中国第九战区的将领和参谋们自有一套理论。他们对日军指挥官擅长的战术并不生疏，中国陆军大学在第九期之前请的都是日本教官。日军的战术原则虽然很多，但总的精神是“攻击第一，包围第一”，即在正面实施强力突击的同时，两翼实施快速的迂回包抄，以求把对手一网打尽。日军对这一战术往往实施得凶狠迅猛，日俄战争中的营口会战和辽阳会战，日军都是通过快速的侧翼插入从而把俄军装在了口袋里。因此，第九战区的将领和参谋们认为，把主力努力保持在日军包围部队的外侧，对日军包围圈的侧翼不断地施以猛烈打击，让日军的包围圈支离破碎；同时在正面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打一阵退一步，把日军引诱到预定的决战战场上来，等其疲惫不堪、粮草匮乏之时，外线主力突然联合向心突击，并截断日军的后路，用反包围的战术将其歼灭。

对此，第九战区代总司令薛岳踌躇满志：“将战地公、铁、驿路彻底破坏，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用；将战地民众物资疏藏于公铁路三十里外安全地带，使敌无食无用。平时准备周到，战时自然应付裕如。且会战全期，不呆守阵地，不死用方案，彻底集中兵力使用兵力，采取绝对优势，以反包围破敌之包围，于战术上开一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元。”

冈村宁次期待其攻势能够“摧毁中国军队主力”，而薛岳期望“开一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元”，双方的司令部在同一天下达了作战指令。

中国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下达的，是为应对日军可能首先从赣北发动攻势的指令，指令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后退决战”的作战思路：

一、方针

我为达成持久消耗战之目的，先依锦河南岸，亘奉新以西之现设阵地线，极力消耗敌人，敌如继续进犯，则于新洽、新喻线以北，亘新喻、宜丰线以东地区，行逐次抵抗，相机断然采取

攻势。

二、指导要领

甲、第一线为市汊（不含）——松湖街——湾头街——赶车垄——猪婆大坦（或米峰）——对门山——故县街——船下洲丁概略线。

乙、第二线为樟树（不含）经楼圩——太阳圩——石头街——官挢街——棠浦概略线。

丙、第三线为新淦（不含）——东乡山——罗坊街——鸡公岭——鹰嘴脑——水口圩——石洪桥——官桥街——棠浦概略线。

三、于各线作战指导要领如左

甲、第一线为现占阵地线，我应于此线极力消耗敌人。但在整训未完了前，敌如向我进犯，以现有第一线部队打击敌人为原则；在接近整训完毕时期，敌始发动攻击，我整训部队能参加第一线作战时，则依本部五月下旬所策定之高安附近作战计划，指导作战。

乙、第二线为中间阵地线，仍以第一线部队转进此线，担任作战为原则。

丙、第三线为最后阵地线，应于此线利用整训部队之增加，断然采取攻势，并应长时确保该线。在此线采取攻势，重点预定保持于新喻、上高间地区，将敌压迫于赣江、锦江间三角地带内而击灭之。此时期希望使用整训部队应在三师以上。此外在此线后方应选定新洽（不含）--观音山---百丈峰——鱼鳞山——太和圩——公和圩——鹰嘴脑——洞口脑——同登脑——南门山——罗坪头之预备阵地，并设法构筑之。

四、在现态势下，如有机可乘（假如发现敌人抽调主力向他方向转进，或我其他战场处于有利形势，确认转移攻势可以成功时等），应脱离阵地断然转取攻势，此时期之作战指导，应着意能以主力截断修河以南敌之公铁路交通，遮断敌之退路，而期聚歼敌人。

同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吕集作命甲第四百三十四号”：

军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九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

接着，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了作战准备令：

一、上村支队自汉口乘船溯江，于九月六日在临湘、城陵矶附近集结，以割断敌后背为目的，为在营田附近登陆进行准备和训练。另外，以一部于九月十二日及十七日两天与海军协同，向扬子江上游的监利（岳州正北偏西四十五公里）方面进行佯攻。

二、第六师团于九月十八日前将大部分兵力集结在新开塘附近，准备向新墙河南岸之敌阵地奇袭攻击。

三、奈良支队九月十七日在桃林以南地区集结，准备对沙港河以南的敌阵地奇袭攻击。

四、第三十三师团九月十九日在通城附近集结，准备奇袭攻击通城东南的敌人阵地。

五、第一〇六师团九月十三日（自六月六日起，中井良太郎中将担任师团长）在奉新及干州附近将部队集结完了，准备奇袭攻击当面之敌阵地。

中日双方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将影响中国和日本的重大事件。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

前一天——八月三十一日晚上，一批化装成波兰官兵的德国党卫军分子，冲进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格莱维茨小城的广播大楼，在播音器前面开了几枪，然后德国人用波兰语宣布：“波兰和德国开战的时候到了。”接着，希特勒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说德国遭到波兰的入侵，德国决定“以炸弹回敬炸弹”。九月一日凌晨四时四十分，德军出动了一百五十万军队、两千五百辆坦克以及两千架作战飞机，从两个方向对波兰发起攻击：由德国境内西里西亚向波兰华沙方向攻击的南方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上将指挥，部队包括第十四、第十、第八集团军，共三十

三个师，其中四个坦克师、四个轻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师，任务是击溃德波边境上的波军，进至维斯瓦河，消灭波兰西部的主力军；从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向华沙方向攻击的北方集团军群，由博克上将指挥，部队包括第三、第四集团军，共二十一个师，其中有两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任务是与南方集团军群协同，消灭维斯瓦河以北的波军。德国空军的任务是袭击波兰的象征中心和铁路枢纽，阻扰波军展开战争动员并压制波军的军事抵抗。同时，德国海军封锁了波兰的海军基地，以保证海上交通安全，并防止其他国家可能的干预。

德军采用了著名的"闪电战"战术，即将绝对优势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放置在突击第一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压倒一切当面阻碍的强度向纵深突击——在广阔的波兰平原上，波兰骑兵向德军的坦克群发起冲锋，但战事很快就演变成德军对波兰骑兵的疯狂杀戮。

天亮了。

十一时，英国向德国宣战。

十七时，法国向德国宣战。

接着，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希特勒要大家明白，如果德国想要夺取必要的生存空间，那么同西方的冲突迟早会发生。按照他的看法，任何其他道路都意味着国家灭亡。如果对外部世界放弃使用武力，那就势必要限制生育率。这是最大的怯懦。他建立武装力量不是为了养兵不用。"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理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标志着一战结束的《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签订，和约全名为《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和约的所有条款只有一个指向，即严重地惩罚并削弱德国。它瓜分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和部分领土；要求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且以黄金支付；严格限制德国的军备使其不再具有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例如禁止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禁止德国拥有坦克和火炮等进攻性武器，禁止德国制造重机枪以及组织空军等等。最后，它

要求当众处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如同二战结束时战胜国对日本的限制一样，欧洲的政客们希望《凡尔赛和约》能够防止德国东山再起。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因其对德国极其严苛的惩罚，而被美国的政客们讽刺为：这哪里是战争的结束，简直是又一场战争的开始。

而希特勒不但要让德国东山再起，还要让德国主宰欧洲乃至世界。

《凡尔赛和约》签订的那一年，作为一名上等兵在惨烈的一战中先被炮弹炸伤腿又因遭芥子气袭击而短暂失明的希特勒，虽自诩作战极其勇敢，却不得不目睹德国签下极尽屈辱之条约。这时候，一个叫安东?德雷克斯勒的慕尼黑机车工和一个叫卡尔?哈勒的新闻记者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党”——德国纳粹党的前身，默默无闻的希特勒加入了该党，并很快因其特殊的鼓动力和煽动力成为该党主要领导人。他制定的党纲公然宣布，日耳曼血统至高无上，其他民族一律为低劣种族。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宣称世界应为“大大的日本帝国”一样，希特勒宣称只有日耳曼种族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并有权对外使用任何手段去夺取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希特勒用“德意志至上”的种族主义理论蛊惑德国民众，特别注意拉拢中产阶级、垄断资本阶层和金融寡头。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垄断资本家，包括美国的福特、摩根、洛克菲勒以及英荷石油大王德特丁和法国大军火商克雷佐，都是希特勒的赞助人。希特勒很快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之后成为在德国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元首。

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继承了日本的“神道”和“武士”传统一样，希特勒也认为早期德国武士的“美德”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是上帝选择了日耳曼人，这个“大自然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做地球上的唯一主宰。因此，日耳曼种族必须得到足够大的空间以保证其生存和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然后去征服全世界，让纯粹的日耳曼人成为世界各地的高贵领主，其他所有种族要不成为德国人的奴隶，要不就干脆从地球上彻底地消失。但是，希特勒“德意志至上”的梦想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掣肘。为了废除《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德国先后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希特勒以“德国受到军事威胁”为幌子开始扩张其陆军、空军和海军。一九三四年，当欧洲各国发现德国的军费已远远超出《凡尔赛和约》的限定时，希特勒的回答几近无赖：《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的军备，没有限制德国的军费。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彻底撕毁《凡尔赛和约》限定的德国陆军不得超过十万人的条款，建立起五十万人的陆军部队；《凡尔赛和约》限定德国不能拥有潜艇，但一九三五年德国潜艇的

吨位数已经达到四十二万吨。

应该说，西方列强对待野心勃勃的德国，如同对待同样野心勃勃的日本一样，采取的是一种极端自私的绥靖政策。所有的列强国都只权衡自己的利弊，甚至试图私下与希特勒达成某种协议，以换取政治或经济上的偷安，其所作所为几乎是在纵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只有到了自身利益乃至自身生存受到致命威胁时，列强才觉悟绥靖就是在养痈遗患，但往往为时已晚。——一九三六年，德国完全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其陆军达到十四个集团军八十多万兵力，坦克一千五百辆，军用飞机四千五百架，并拥有了一支舰船吨位数惊人的海军。希特勒决定武装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军的装甲部队隆隆驶过德奥边境线，奥地利政府没有抵抗便屈服了。此时的英国首相正在伦敦唐宁街十号官邸宴请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而法国人也当世界上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接着，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英国和法国为了避免与德国交恶，联手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致使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整个世界沉默着，如同日军入侵中国国土时一样。

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开始公开攻击《凡尔赛和约》的“罪恶”，说它给德国带来了无边无际的痛苦，同时宣称《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失效。——德国要对波兰动手了，借口是波兰必须把但泽地区交给德国，允许德国穿过波兰走廊，修建通往东普鲁士的公路和铁路。波兰岌岌可危，这令与波兰接壤的苏联人心急如焚。斯大林主张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建立起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遏制德国骇人的军事扩张。苏联与英、法等国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苏联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单独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的考虑是：必须换取时间为应对希特勒可能发动的军事攻击进行准备。而希特勒的考虑是：要避免过早地与苏联发生冲突使德军陷于两线作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军毫无顾忌地开进波兰，其装甲部队直抵华沙城下。这时候，苏联又作出了一个令整个世界瞠目结舌的举动：既然德国占领了波兰，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已不存在，那么苏联与波兰签订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也就失去了意义。九月十七日，由科瓦廖夫率领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由铁木辛哥率领的乌克兰方面军，共七个集团军四十个师，在八个航空兵群的支援下冲进波兰国土。——德军与苏军在波兰国土上碰头了。两军商定，为防止冲突，双方相隔二十五公里同时停止军事行动。然后，德国和苏联如同强盗分赃一样瓜分了波兰，两国在波兰领土上的利益分界线由两国外长的名字命名，即里宾

特洛甫-莫洛托夫线。

此时，苏联是唯一支援中国抗战的大国，他刚刚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一笔高达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这已是苏联第三次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以供中国军队购买急需的由苏联生产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只是，苏联和德国在波兰的分赃，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在这个世界，本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国际法准则”。

与中国一样，波兰被严重侵犯。

被侵犯的内在原因是自身的衰败与落后。

作为德国的盟友，日本人对德国的突然之举十分吃惊。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年度各军参谋长会议上，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中岛铁藏谈及今后战争作战指导时说：“最近的欧洲形势虽在急剧变化，但从全面看，德国真正具备对外进攻实力的时间，估计当在昭和十六年、十七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前后。另外，英、美完成其国力和军备建设的目标，大概也在昭和十六年前后，其他列强也多追随其后。因此，预料昭和十七年前后将是世界性的大转折时期。”这也就是说，日军大本营预计世界性战争爆发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但是，德国的行动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突然爆发的欧洲战争，不久就发展成左右世界形势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也好，中国事变也好，都不能不卷入这一漩涡中去。”日本方面对国际形势的转变，特别是在此情况下如何处理对中国的战争，尚没有准备，这令日本方面颇感被动，甚至有些惶惑不安。

更令日本惶惑不安的是，苏联在西线缓解了与德国的危机后，转身在东线开始收拾日本关东军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边界一个名叫诺门坎的地方，日军与苏军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史称“诺门坎战役”。

一九三一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在日本人看来，实力雄厚的苏联远东军始终是其头号假想敌。随着关东军部队兵力逐渐充实到近百万，日本人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驻扎海拉尔的关东军不断在中蒙边界上向苏军挑衅，借以试探苏军和外蒙古的军事实力，双方的摩擦最终演变成“诺门坎事件”。

事件起因还是划界问题。苏方和外蒙古认为，中蒙边界处的哈拉哈河是外蒙古领土之内的河流，因此边界应该划在河的东侧和北侧；而日方则认为哈拉哈河是界河，边界应该划在哈拉哈河的中间——边界划分的分歧所涉及的是一个长约一百二十公里、宽约四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冲突遽然爆发：日方说外蒙古边防军在海拉尔正南偏西二百公里处的诺门坎地区越界了，“驻在海拉尔附近第二十三师团派出一部兵力将外蒙军击退”。日军将“满洲国军”留下警备，第二十三师团部队于十七日返回原驻地。——日本人“估计事件不会扩大”。然而，二十三日，外蒙古骑兵第六师开到了边界，苏军坦克第十一旅、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等部队也随之开来，两军再次越过哈拉哈河。二十八日，日军第二十三师团派出以第六十四联队为基干的山县支队，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指挥下，向外蒙古骑兵第六师发动进攻，外蒙古军队根本无法抵挡，骑兵第六师师长被当场打死。苏军立即组织反击，一千二百名步兵在十二辆坦克的引导下分路包抄日军，外蒙古骑兵也配合苏军发起冲锋，山县武光的部队因伤亡惨重转为守势。

关东军不服。他们认为苏联的注意力在欧洲方向，且斯大林正在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苏军中许多优秀的将领都被他枪毙了。更何况关东军掌控的铁路线到诺门坎才二百公里，苏军却要横跨八百公里的地域才能到达诺门坎，因此判断苏联不会付出巨大代价来与日本对抗。关东军开始向诺门坎增兵。第二十三师团由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亲率全部兵力出动，关东军战略预备队第七师团也随即出动。该师团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为日本陆军中最强悍的部队，其坦克第一师团是日军中唯一一支全员坦克部队，尚未舍得使用过。——关东军决心给苏军点颜色看看，以彻底平定边界危机。

但是，日本人严重低估了苏联人的决心。

朱可夫来了。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受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指派，飞到诺门坎前线掌握了苏军的指挥权。除朱可夫之外，苏联统帅部还把空军代理司令鲍尔吉金少将、炮兵司令沃罗诺夫大将、装甲兵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也都派到诺门坎前线，其阵势远远超出了应付一场边界冲突的需要。为增加前线兵力，除第五十七军之外，朱可夫又调来三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大量的炮兵。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给朱可夫派来的飞机，是最新式的伊尔-型和“鸥”型战机，飞行员中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竟有二十一名之多。——斯大林决心不打则已，打就把日本人彻底教训了。

六月二十二日，日苏开战。连续几天的空战后，苏军的战机越打越多，日军逐渐丧失制空权。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军的坦克群冲向日军的坦克师阵地，大规模的坦克战在平坦的草原上上演，在苏军一百多架轰炸机、几百门重炮和庞大的坦克集群的猛烈打击下，装甲单薄的日军坦克无力招架，宝贵的坦克第一师团很快就瘫痪了。七月二十三日，日军也调来了大口径重炮，但因步炮协同出现问题，步兵冲锋时被自己的炮火杀伤不少，而苏军的装甲集群火力猛烈异常，使日军的冲锋如同迎着火力在自杀。八月二十日，朱可夫发动总攻，日军在苏军诸兵种的联合作战中被包围，关东军的失败已成定局。三十日，关东军司令部接到东京大本营“停止攻势”的命令。

败局已定之时，绝望中的日本人又得到一个坏消息：苏联与日本的盟友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本以为苏联无法于亚洲和欧洲两面作战，现在德国把日本出卖了。之前为了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日本不惜与德国商谈七十多次，德国却始终不给日本人以明确答复。因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突然签订，令日本政府颜面尽失，平沼骐一郎首相被迫辞职。

九月十五日，日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

停战的第二天，苏联“开始向波兰越境前进”，诺门坎战场上的坦克和装甲车被陆续西运。

诺门坎一战，目空一切的日本关东军参战约八万人，死伤将近五万人——“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道太郎剖腹自杀。从此，日本军方再也不提“北进”战略，而将其战争触角转向了太平洋和东南亚。这一转变，导致日后苏联能够倾举国之力打击法西斯德国，导致日后日本突袭珍珠港而使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国加入二战盟军阵营。

日本新任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于九月四日发表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日本人认为，对华战争之所以如此拖延，蒋介石政权之所以还不屈服，就是苏联和美、英、法各国暗中支持的结果。现在欧洲战争爆发了，各列强将无力顾及中国，这或许正是结束战争的时机。因此决定先不介入世界大战，待对华战争解决后，再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竞争。特别是，对中国的全面占领将会使日本更具实力。

同一天，日军大本营决定对侵华日军进行调整：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一军。总司令官由西尾寿造大将担任，总参谋长由板垣征四郎中将担任。侵华日军调整序列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强对华日军的统一指挥，使其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无论是暂时置二战于不顾的策略，还是调整在华指挥机构的措施，日本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依旧是：要使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必须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只要正面战场上的两百多万中国军队还在与日军对抗，只要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近百万抗日游击武装还在顽强作战，期望中国屈服只能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于是，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冈村宁次所策动的新攻势，因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但显得异常必要和重要，也使东京方面陡然增加了对其战果的期望。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日在湖南开始的作战，中国方面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方面称为“湘赣作战”。

九月十三日，冈村宁次把军指挥部移到湖北咸宁，准备在那里指挥主力进攻湘北。当日，他飞到江西安义，视察了集结在那里的第一〇六师团。按照战役设想，湘赣作战将从赣北打响。第一〇六师团新任师团长中井良太郎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虽在万家岭作战中尽失元气，但在之后的南昌作战中已基本恢复了士气，更何况在这个方向又加强了从第一〇一师团抽调来的第一〇二旅团（佐枝支队）。同时他也知道，第一〇六师团的作战任务仅仅是助攻，率先发起攻击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军队第十九集团军牵制在赣北，使之不能西进加入湘北主攻方向上的作战。而且，冈村宁次明确表示，达到牵制目的后，悄悄脱离战场，转向湖北南部。——既然如此，就可以不求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只需把中国军队吸引住就算完成了任务。

冈村宁次视察的第二天，中井良太郎行动了。他的计划是：第一〇一师团佐枝支队从奉新东南面的大城镇出动，向西南方向的莲花山和高安发起进攻；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则从奉新以西南下，向高安方向发起突击。

高安四周是低矮的丘陵和稻田。中国守军在这里构筑的阻击阵地都是半永久性野战工事，这些工事由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先连接成线，再连

接成面。据点地域内挖有各种武器的掩体，预设的火力网很严密；掩体前设有铁丝网和鹿砦；阵地后方还有大量的掩蔽部可供屯兵和休息。高安中国守军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和高荫槐的第一集团军，共五个军，即第七十四、第三十二、第四十九、第五十八军以及第六十军。具体配置是：由锦江口至高邮（位于锦江北岸，乃高安重要渡口之一）一线是第四十九军；从高安向北至祥符观一线是第五十八军，该军的新编第十师守备第一线，新编第十一师位于高安附近；由祥符观至故县一线是第六十军，该军的第一八四师为右翼，第一八三师为左翼。罗卓英的总预备队，是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控制高安西南方向的上高附近。

十五日拂晓，第一〇六师团和佐枝支队同时开始行动。罗卓英因南昌作战不利，很想挽回声誉，因此命令部队利用坚固工事顽强阻击。在佐枝支队的攻击方向上，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和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死死地堵在了日军进击高安的路上。在第一〇六师团的攻击方向上，安恩溥的第六十军和孙渡的第五十八军没能顶住日军的突入。第一八四师的阵地被突破后，部队边打边向潦河岸边撤退。第六十军将第一八三师调上来遏制日军的推进，但由于相邻的第五十八军阵地已被日军突破，奉命增援的第一八三师在日军的紧逼下被迫后撤。日军攻占了高邮以及祥符观西北面的杨庄。尽管新编第十师师长刘正富把丢失高邮阵地的营长枪毙了，但依旧无法挽回战局的不利。十六日，在潦河岸边，湘鄂赣游击部队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拼命阻击着日军。第一集团军命令第六十军和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师向西转移。这时，日军开始迅速南下，大有把第六十军的第一八三、第一八四师吃掉的企图。十八日，第六十军抵达集结地吃午饭的时候，又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一直等到晚上才从日军的包围圈中冲出来。

然而，罗卓英命令第六十军必须杀回去：

此次作战罗卓英比之南昌战役时神气十足，大打官腔，一定要收复高邮和杨庄失去的阵地，逼得口吃的高荫槐结结巴巴地向他的两个军长孙渡、安恩溥说：“我……们要收复失去的阵地，不……然罗……总司令要惩办我们啦！”于是孙渡督着新十一师师长鲁道源收复高邮。鲁道源亲率所部，猛攻高邮数次，都为日军步炮空联合战斗所拒止。鲁道源在战场上立时杀了一个营长，撤了一个团长（名叫王筱丰），再度猛攻，伤亡很大，终于把高邮收复了。安恩溥使用第一八三师，也把杨庄收复了；第一八四师又派部队增援新编第十师，才稳定了祥符观的阵地。第一八三师的正面战斗甚为激烈，日军猛攻骑马山（在故县东南）达一个多星期才停止。我军付出严重的代价，虽然保住了原阵地，但未能以第

七十四军或更多的兵力使用于最必要的方面，以打击日军。这与整个作战计划的精神是不协调的。

中井良太郎的作战目标并非安恩溥的滇军部队，而是高安城。防守高安方向的，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第三十二军等部队。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接近高安的时候，薛岳似乎看出了冈村宁次声东击西的伎俩。但高安毕竟是扼制赣北日军横向进入湘北主战场的咽喉，因此薛岳严令罗卓英务必指挥第一、第十九集团军把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西进湘北的孔道堵死。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率部与日军在锦河北岸激战数天，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也向高安增援而来。十八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和佐枝支队从东、北两面夹击高安城，佐枝支队突破了第四十九军的阻击，威胁着宋肯堂部的侧背，宋肯堂部于十九日退出高安城，在锦河岸边的高地上炮击进入高安的日军。

至此，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于赣北发动的进攻，已经吸引了中国军队多达八个师于高安城下。中井良太郎认为已经达到作战目的，于是留下佐枝支队继续牵制中国军队，自己则率师团主力转向西北，与原驻守赣西北的日军一起，向武宁、修水和三都附近的中国军队第三十集团军扑过去，目的是继续吸引中国军队东援，配合冈村宁次在湘北发动的攻势。

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和第三十二军趁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转调之机，于十九日收复村前街，二十二日收复高安。

但是，防御修水、武宁地区的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只有两个军四个师，而且都是新编师，装备很差，战斗力弱。在日军的攻击下，第三十集团军部队一路南撤，一直撤到赣西与湘东交界的铜鼓附近。中井良太郎的这一阵势，令薛岳很是焦虑，他急令罗卓英抽调部队前往增援。罗卓英命令高荫槐派部前往铜鼓，高荫槐的第六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在高安地区打得很苦，这一次坚决不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只有再派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前去增援。——第七十四军，中央军嫡系部队，不但是中国陆军的王牌部队，更是第九战区的中坚力量，薛岳本想把这支部队放在湘北正面，但罗卓英就是不肯。果然，现在第七十四军派上了用场。

中井良太郎在中国军队的联合攻击下有些力不能支，又留下少量部队与中国军队纠缠，主力则悄悄地退出战场，试图北进与位于湖北南部的第三十三师团会合。

罗卓英指挥中国军队在赣北的作战，尽管没有损失太多兵力，最终也没有丢失军事要点，但还是中了冈村宁次的圈套：多达两个集团军的中国军队，包括实力较强的第七十四军，在这个方向被日军的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牢牢地牵制着。——“高安方向的战斗，在日军方面来讲是一个拉后腿的战斗，拉住罗卓英的后腿，不让他指挥的几个军参加长沙方面的决战。在我军来说，是个目的性不明的拼老命的战斗，牺牲不小，价值不大。”

就在中井良太郎与罗卓英在赣北杀来杀去的时候，在湖南的北部，也就是冈村宁次策划的主攻方向，长沙会战已经打响。

十七日，冈村宁次来到湘北与鄂南交界处的城陵矶，视察了上村支队，然后乘船进入洞庭湖，到达岳阳视察了第六师团。第六师团已经准备完毕，将与第十三师团的第二十六旅团（奈良支队）、第三师团的第五旅团（上村支队）一起，向湘北中国守军的正面实施大规模突击。

在湖南北部，中日两军对峙的正面，隔着一条新墙河。

薛岳命令关麟征率第十五集团军并指挥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沿新墙河东起湖北南部的麦市、西至湖南北部洞庭湖东岸的鹿角，在八十公里宽的正面构筑起第一道防线：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在右翼，该军的三个师和炮兵一团五连以及第十挺进支队守麦市、九登、黄岸一线；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在左翼，该军的三个师加上陈沛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炮兵一团八连和二营以及第十一、第十二挺进支队守杨林街与新墙河一线。

冈村宁次的主攻方向在新墙河中国防线的左翼。

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首当其冲。

十八日，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日军开始向新墙河北岸中国守军的前哨阵地发起攻击。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设置了两个前哨阵地，即据守草鞋岭的第二师胡春华营和据守比家山的第一九五师史思华营。两个营孤悬于新墙河北岸，被直接暴露在日军进攻的刀锋下，数百名官兵心知肚明，只要战斗一打响，他们不但是日军的首攻目标，而且所有的人必会九死一生。既然抱定一死的决心，官兵们开始了不顾一切的阻击。日军火炮和战机空前猛烈的轰击和轰炸，将两个营的前哨阵地几乎炸平，所有的野战工事全部坍塌。日军本来以为，中国守军在新墙河北

岸设置的两个据点，除了因为兵力单薄很快就会崩溃外，还因为这两个据点仅具象征意义，所以只要炮声一响中国守军定会仓皇逃到新墙河南岸去。

但是，十九日，激战进行了整整一天，两个前哨据点的中国守军还在战斗。

这一天，冈村宁次回到湖北咸宁的指挥部，作为司令官，他觉得应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是静等战报了。

这一天，薛岳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是从湘北直冲长沙，于是把位于浏阳的第七十军和位于修水的第七十三军调拨给第一线的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随即把这两个军指派为他的总预备队。

静候战报的冈村宁次没有想到，从十八日进攻开始直到二十二日，湘北正面的日军不要说渡河，连新墙河边都没能靠近，而阻击他们的只有中国军队的两个营。二十二日这天，苦战后的日军登上草鞋岭，发现据守该阵地的中国守军胡春华营官兵已全部阵亡，日军官兵站在遍布尸体的阵地上一片茫然。而令他们更加茫然的是，此时比家山阵地的中国守军依旧在抵抗。——直到这一天的黄昏，中国营长史思华阵亡后，日军才冲上比家山阵地。

就在湘北的日军为扫清渡河障碍苦战的时候，在湖北南部，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也开始了进攻。这是湘北正面战场的另一个侧翼，第三十三师团的作战目的与位于赣北的第一〇六师团一样，都是牵制中国军队，配合湘北的正面攻击。在这个方向防御的，是中国军队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军和第十五集团军第七十九军以及湘鄂赣游击部队的第八军。

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是一个新编师团，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才在日本仙台编成，师团长是从日本陆军户山学校调来的校长甘粕重太郎。该师团辖有第三十三步兵旅团（拥有三个步兵联队）以及搜索联队、山炮联队、工兵联队、辎重兵联队各一个，还有一些后勤部队。师团编成后被派往中国战场，编入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遇到的第一场战役便是在湖北南部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显然，日军新编师团的战斗力不强。二十一日，第三十三师团在湘北与鄂南交界处的通城以南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受到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的猛烈抵抗。苦战两天后日军才知道，他们一直在与中国军队的一

个团纠缠不休。第三十三师团集中兵力，转向通城东南方向的麦市。麦市是第七十九军的防御主阵地，其第一四〇师在麦市外围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双方都伤亡惨重。中国军队杨汉域的第二十军加入战斗后，日军受到两面夹击，处境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使用了毒气弹。但是，每当毒气落在长满茅草的中国守军阵地上时，山上都会燃起熊熊大火，中国官兵利用点燃的山火使空气升腾翻卷将日军施放的毒气冲上高空，而匍匐在地面上的中国官兵中毒者甚少。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打了数天，仍旧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被滞留在麦市附近进退两难。

对于第三十三师团的战况，冈村宁次并不特别在意，只要他们在那里与中国军队纠缠着就可以了。冈村宁次的注意力全在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行动上：二十二日晚，上村支队乘坐海军舰船，从岳阳秘密地进入了洞庭湖。——“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从驻在北方的第三师团抽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冈村宁次说，“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他们要采取大胆行动楔入敌军的侧背。”——冈村宁次指望以上村支队的突击行动，大纵深地插入汨罗江以北中国守军的背后，将薛岳的战局布势割裂开来，然后把中国军队主力包围在汨罗江以北加以歼灭。

冈村宁次之所以从第三师团抽调部队，是基于对洞庭湖纵深穿插行动的格外重视。日本陆军第三师团，是一八八八年组建于名古屋的精锐部队。进入中国战场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始终是侵华日军的绝对主力。而上村支队由第三师团第五旅团为基干组成，指挥官是旅团长上村干男少将，下辖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大队、一个工兵联队和一个独立渡河工兵联队，以及两个辎重兵中队。

在海军舰船的带领下，上村支队进行了“八十余公里的水上机动”，于二十三日六时二十分在洞庭湖西岸以南的营田地区登陆。上村支队的行动让冈村宁次彻夜未眠，因为这次突击是一次冒险行动，特别是情报说登陆地点水深不足一尺，他生怕海军的摩托艇因此搁浅在泥滩上，使陷在泥里的上村支队成为中国军队的活靶子。——“九月二十三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

薛岳没有想到冈村宁次会实施纵深突击——隔着广阔的洞庭湖水，薛岳认为在这个方向上日军没有实施突击的可能性——于是，营田中国守军只有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的一个营。该营营长也认为，营田北面

是湘江封锁线，湘江西岸通往洞庭湖的沟汊都处于干涸状态，因此营田正面的水路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证明冈村宁次得到的情报是准确的，营田正面湖岸水深仅在一尺左右，日军的摩托艇如果往岸上冲，根本抵达不了岸边就会陷在河泥之中。——但是，二十二日晚上，洞庭湖上大雨倾盆，导致河湖水位猛涨，不但营田正面的湖岸水位急剧抬高，湘江连接洞庭湖的那些干涸沟汊也都水满盈盈，载着上村支队的日本海军舰船就这样得以顺着沟汊直冲营田。

二十三日凌晨，上村支队在日军舰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向仅有一营守军的营田阵地发动袭击，很快，中国守军数百名官兵伤亡殆尽。冈村宁次给上村支队的任务是："在营田附近奇袭登陆，以一部在夺取归义及新市附近汨水渡河点后，切断沿粤汉线敌军退路；同时主力从营田—大娘桥—李家墩（推测记入地图）—高桥公路沿线地区，首先向高桥方向突进，切断平江至长沙的道路。"冈村宁次已经计算好了：与上村支队在营田登陆同时，二十三日早晨六时，在新墙河北岸，扫清中国军队前哨阵地的第六师团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行动。这也就是说，日军第六师团正在战场的正面与关麟征部激战，而通过纵深突击迂回到战场西南方向的上村支队，已经处于关麟征部的侧背，一旦上村支队向东进击成功，不但会切断关麟征部的退路，还将与第六师团一起对关麟征部形成南北夹击。那时候，因为在战场的东边有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和第一〇六师团，战场的西边则是广阔的洞庭湖水，关麟征部就等于陷入了日军的合围。

凌晨时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八十多门火炮向新墙河南岸中国守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师阵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猛烈轰击。然后，五千多名日军步兵开始强渡新墙河。新墙河浅，可以徒涉，日军没有使用任何渡河工具便直接向南岸冲锋。中国守军在河面上编织成密集火网，将冲锋的日军阻挡在河水之中。第一次冲锋失败后，日军炮兵把炮火集中到第二师十二团的阵地上，日军地面部队释放了毒气弹和烟幕弹。十二团的官兵没有配备防毒面具，只能用毛巾浸上水捂在口鼻处，但阵地上的轻重武器射击强度没有减弱，日军的第二次冲锋又告失败。战场短暂的寂静后，日军的火炮和战机一起，对十二团阵地开始了毁灭性轰击，致使十二团守军伤亡严重。接着，日军的步兵又一次冲了上来。中国陆军第五十二军的前身，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属的六个教导团，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前被蒋介石编成第二师，两年后扩编为第十七军。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战全面爆发，第十七军以第二十五师为主扩编成第五十二军，隶属第一战区，下辖郑洞国为师长的第二师和张耀明为师长的第二十五

师，军长为关麟征。武汉会战后，关麟征升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张耀明任军长。第二师作为中央军的老部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薛岳把强有力的部队放置在第一线，足见湘北的较量关乎长沙会战全局。

在湘北战场上的残酷战斗中，第二师上等兵曹锡所在排位于新墙河以南、新墙镇以西的王街坊。他们守卫的阵地上至少落下了上千发日军炮弹，身边的人大多都死了。曹锡把几十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放在河南岸的堤坝上。日军冲上来时，他用机枪扫射，日军的冲锋居然被他打了回去。日军施放了毒气，毒气弥漫中，他发现活着的人只有他和朱班长了。毒气消散后，三十多个日本兵冲上来，他和朱班长拉响了放置在堤坝上的手榴弹，数十颗手榴弹一起爆炸的威力，让冲锋的日军全都倒在了堤坝上。他又捆绑了数十颗手榴弹，再次放置在堤坝上。朱班长的眼睛中弹，血流尽后人死了。曹锡的机枪坏了，他在尸体中寻找机枪和子弹。太阳很高的时候，营部派来一名传令兵，告诉他大部队已撤，他也得撤退。向后撤的时候，日军追在后面，那名传令兵被打死，曹锡躲躲藏藏终于回到了营部。几天后，师长赵公武专门来与曹锡握手，当场提升他为班长，并奖励法币三十元。按照当时湖南的物价，三十元可以买一百斤猪肉。——曹锡是个老兵，那年二十九岁，参军前是个种田的农民。

日军终于从第二师十二团的阵地上撕开一个缺口。

从这个缺口处日军渡过了新墙河。

正是中秋节。

位于防御第一线的第五十二军向南撤退的时候，一路看见的是成千上万的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

日军第六师团撕破新墙河防线的时候，奈良支队也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一九五师一三一团的阻击渡过新墙河。

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命令第二十五师实施反击，并给第二师增调了一部分兵力以求稳住阵脚。

晚上，渡河后的日军没能继续推进，双方在夜幕降临时于新墙河南岸地区形成对峙。

薛岳在长沙战区长官部召开紧急会议，参谋们在会上提出三种方

案：一是如果新墙河守不住，就退到汨罗江一线，占领二线阵地迎敌；二是利用纵深地带逐次抗击，根据战局变化再决定下一步如何打；三是干脆在湘北敞开口子，把日军放进捞刀河以南的长沙外围，然后左翼依托湘江、右翼依托浏阳一带的山地，在长沙附近与日军决一死战。薛岳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表示须报蒋介石后才能决定。此刻，令战区长官部最为焦虑的是日军上村支队从营田登陆的消息，因为这等于在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的侧面插进了一把刀。薛岳命令唐伯寅的第十九师和罗奇的第九十五师向日军发动反击，特别强调必须把上村支队压制在洞庭湖岸边，决不能让日军继续东进到关麟征部的背后，完成任务有重赏，否则军法从事。

可是，营田方向的中国守军没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上村支队的插入，使得湘北第一线的关麟征部处境危险。冈村宁次的作战预想就是要把中国军队的第十五集团军吃掉。面对日军即将形成的三面合围，关麟征请示薛岳：除留少量部队牵制日军外，将第五十二军、第七十军和第七十三军全部向南撤往汨罗江二线阵地。

薛岳给第十五集团军下达的命令是：

一、第五十二军以一部在汨罗江、新墙河之间的田家瑕、渡头桥、关王桥之线占领阵地，阻敌南进；主力移至颜家铺以东，沿汨罗江左岸占领阵地，以一九五师集结白沙桥附近待命。

二、第六十师于二十四日晚到达桥墩后，以一个团沿汨罗江左岸新市、颜家铺间占领阵地，师主力仍位于桥墩附近。

三、第七十军以一部迎击营田方面之敌；主力在于家嘴、湘阴、马头山、三塘桥、东塘、归义、新市之线占领阵地。

薛岳的命令意味着第十五集团军将向泪罗江左岸阵地转移。

同时，薛岳命令战区预备部队和炮兵集结在长沙附近，做好与日军决战的准备。为了预防万一，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率长官部移至耒阳，薛岳则带着少数幕僚留在长沙。

按照薛岳的部署，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开始边打边撤。

二十四日晚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最高幕僚会议，会议拟订出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

第九战区作战，应本四月二十一日酉电要旨，保持幕阜山根据地，袭敌侧后。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路线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而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四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

第二案

为保持实力，避免损失，并乘敌深入予以打击，拟即令第九战区以一军位置长沙东侧，准备向长沙突进之敌侧击，其余湘北方面之主力，即向浏阳、萍乡、株洲之线转移。

以上两个方案都以放弃长沙为前提，区别仅在于与日军在长沙附近打一场多大规模的仗而已。

这与薛岳的想法相距甚远。

二十五日，综合两案基本意图，蒋介石命令薛岳在放弃长沙后，指挥部不要撤得过远，向西移至湘赣边界处的萍乡即可，以便指挥滞留下来的游击部队作战。而当日军抵近长沙城时，要动用一个军规模的兵力予以侧击。如果日军从长沙继续南下攻击衡阳，要防御，但要避免直接的正面防御。——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长沙甚至衡阳都可以不要，中国军队的主力必须保存下来，不能损失过大甚至全部拼光。

为阻止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动用了中国军队中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该军奉命从广西移至湖南东部的衡山。

如果说蒋介石有些保守的话，首先是出于长期抗战的考虑，保存主力部队总比死守一座城市更符合持久战的原则。另外，不能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使蒋介石既想到中国战场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同时也猜测着极端艰难的战事是否有缓解的可能。在目前无法判清前景的情况下，保存军事实力显然是最要紧的。

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对中国军队穷追不舍的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

到达汨罗江边。汨罗江不是新墙河，水深不能徒涉。日军舟桥部队分三处架设浮桥，然后步兵通过浮桥强行冲击。因为架设浮桥目标很大，招致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日军连续冲击了三次都没成功。下午二时左右，日军除在浮桥上继续强攻外，派出骑兵寻找其他的渡河地点。一部骑兵冲上了汨罗江南岸，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的伏击，数百骑兵全数被歼。傍晚，第六师团主力和奈良支队抵达，日军开始不顾一切地大兵力强渡，一部分日军官兵甚至化装成中国难民，混在真正的难民人流中向南岸涌动，结果日军主力冲上了南岸，直抵中国守军第七十军的防线。李觉的第七十军陷入苦战，特别是汨罗江南岸的要点归义，日军一旦占领便可沿长岳铁路南下。因此，日军的火炮和飞机猛轰归义守军第一〇七师三二一团的阵地，工事全被炸塌后阵地失守。接着，新市也被日军占领。第一〇七师师长段珩命令三二〇团掩护三二一团组织反击。三二一团团长李标率部发起了三次冲锋，一度夺回两个山头阵地，甚至一度冲进了新市，但随即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部队伤亡巨大，反击最终没能奏效。而第一〇七师另一部却趁日军增援新市之际冲进了归义。

李觉的第七十军出身复杂，原属唐生智的湘军一部，一九二七年桂系讨伐唐生智时被桂军收编，但蒋桂战争爆发后该部又投靠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该部队被改编成第七十军，先后参加浙江镇海抗击日军登陆作战、淞沪会战和南昌会战。由于属于杂牌军，第七十军打仗尚可，但武器严重不足，各师的步枪和机枪大多是陈旧的汉阳造，每个步兵连只有六挺轻机枪，每个营只有四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无论军部和师部都没有配备炮兵。长沙会战开始前，该军没有接到战区赋予的备战命令，但日军强渡新墙河后，特别是上村支队在营田登陆后，薛岳命令位于后方六十公里外的第七十军立即赶赴前线。第七十军仓促行军，先跑到营田方向堵了一下，然后奉命防守汨罗江，部队被拉来拉去，以至于军长李觉很有意见：“从九月二十日开始，星夜兼程地急行军，跑了三个昼夜，官兵在疲惫仓促中与日军激战两天；二十五日以后，奉令南撤，又是星夜兼程地跑了三天两晚，打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疲劳战。全军共死伤团、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余人，其中第一〇七师较第十九师伤亡大。”

晚上，汨罗江中国守军全面撤退。

冈村宁次决定趁中国军队未稳之际，把湘北战场上的日军集中起来，寻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战机。他命令第六师团向新市以南追击，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则向新市集结。

至此，尽管湘北正面的攻击还算顺利，但冈村宁次发觉他所布置的攻势也许会出现意外：湘北的两翼部队已经显露出危机。

在赣北方向，中井良太郎的第一〇六师团似乎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第一〇六师团从高安地区掉头向北，企图转进修水和三都方向，途中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不间断的侧击，行动变得十分困难。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一线，走到修水东南方约三十公里的黄沙桥时，被中国军队第七十二军新编第十五师阻截。左纵队似乎好些，攻占了奉新以西的上富、横桥和甘坊。但此时，中国军队第三十二军在薛岳的命令下已赶往铜鼓布防，第六十军在罗卓英的严令下也开始行动，协同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向占领甘坊的日军包围过来。二十五日拂晓，第六十军在甘坊接敌，日军企图继续西进靠近湘北战场，双方在山谷中的公路两边激战不休。无论日军的飞机如何扫射轰炸，也无论日军的地面火力如何凶猛，第六十军官兵顽强阻击，死战不退。傍晚，第一八四师一部在团长曾泽生的率领下攻占甘坊东端的要点，使甘坊的日军陷入两面夹击；接着，从甘坊北面的九仙汤南下的第一八三师也赶到了战场，中国军队对日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夺回上富，日军东西两面的退路都已被切断。——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大部，被中国军队死死困在了甘坊附近的山谷中。

在湖北南部，甘粕重太郎的第三十三师团情况更为不妙。按照冈村宁次的设想，第三十三师团突破当面中国军队的防线后，应向湖南境内突击，协助第六师团围歼中国军队的第十五集团军。但是，在幕阜山区，第三十三师团被中国军队第二十军顽强阻击在福石岭，日军久攻不下之时，湘鄂赣游击部队总司令樊崧甫率部赶到，中国军队对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也形成了包围。甘粕重太郎决定绕过福石岭转向西南方向，无论如何也要使部队推进到汨罗江边的长寿街。但是，前进途中，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追击和侧击。待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好不容易接近长寿街时，落在后面的辎重部队遭遇中国军队的伏击，以至于师团的后勤和退路都没有了。令甘粕重太郎更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军队夏首勋的第七十八军和王陵基的第七十二军已抢先一步抵达长寿街，正等着他的到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实际上已被困在长寿街进退皆不能。

伏击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辎重部队的中国军队缴获了不少军用品，其中有一本日军上士本田四郎的日记。这名上士腿部受伤，疼痛悲观之时在日记上写下了一首诗：

长江之水往东流，

中国的河流永不朽。

要使中国不抗日，

除非长江之水不会流。

这是中国军官简单草率的翻译。

想必这个日军上士是俳句爱好者，原诗可能更具日式的阴郁。

二十六日，蒋介石命令薛岳：“准备以六个师的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并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

二十七日凌晨，薛岳下达作战命令。

薛岳的命令让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吃惊不小：

第一 方针

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即包围歼灭之。

第二 指导要领

一、正面部队应极力诱致敌人于伏击区域，而后转移于右侧后待机。

二、伏击部队之行动，须秘密敏捷，俟敌突入伏击区域，则突起奇袭之。

三、控制金井、福临铺以东之部队，须不失时机转移攻势，与伏击部队协力，包围敌人于战场而歼灭之。

四、后方各要点，派有力部队占领，以为前方部队之支撑。

五、敌如以主力指向我右翼控制兵团时，则正面部队迅速攻击之。

第三 兵力部署

一、第七十三军军长，指挥第七十七师、第一九五师，占领金井、福临铺一带地区，对西侧击由汨罗江方面南进之敌；并对西南协同第五

十二军，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

二、第五十二军军长，指挥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六十师，并留置两团兵力于新市、浯口现阵地，牵制敌军，以掩护军主力之转进。军主力应于二十七日晚，占领永安市、上沙市一带地区。右翼协同第七十三军，左翼协同第五十九师，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

三、第五十九师应于长沙及其东南地区设伏，并以一团占领易家湾阵地。右翼协同第五十二军，左翼协同第十一师，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

四、第十一师应占领岳麓山至乔口现阵地，重点保持于岳麓山附近。右翼协同第五十九师，以火力侧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左翼与第八十七军（洞庭湖南岸）切取联系。

五、第七十军军长指挥第十九师、第一〇七师、第九十五师，并留置两团兵力于白泥湖、新市现阵地，牵制敌军，以掩护该军之转进。该军主力经讽林港、渡头市道及石子铺、仙人市道，于二十八日晚转进至株洲、渌口市一带地区，以主力占领渌口市（含）、石亭、河口之线阵地；以一部占领株洲及其以东地区前进阵地。

六、第四军以第九十师及第一〇二师主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不含）之线，以一部占领其前方附近据点。

七、第七十九军以第八十二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以第九十八师及第一〇四师协同第二十军（桃树港东侧）攻击桃树港之敌军。

八、第七十三、第五十二、第七十及第四各军，暨第五十九师与第十一师等部队，均归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积极反攻。

在这一命令中，薛岳不但一个字也没提放弃长沙，并且远远突破了蒋介石投入六个师兵力的限定，几乎以第九战区的全部主力在长沙四周设伏，摆开了与冈村宁次决一死战的架势。

二十八日，日军第六师团由汨罗江向南突进，上村支队沿粤汉铁路向南突击，奈良支队则由汨罗江南岸的瓮江转向平江。冈村宁次给奈良支队的任务是："策应第三十三师团夹击中国第二十七集团军和第七十九军。"实际上，就是帮助第三十三师团从被动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仍是接敌前沿，该军的任务是一边实施伏击作战，一边逐步向南撤退，直到把日军主力引诱进薛岳布置的大口袋里。张耀明指挥第二、第二十五、第一九五师以及配属过来的第六十师，与迎面而来的日军第六师团混战在一起。第一九五师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激战一天后快速后撤。日军紧随其后，抵达上杉市附近时，第一九五师和第六十师对其进行了夹击，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立即赶来，中国军队的两个师再次后撤。然后第一九五师在金井、第六十师在上杉市分别阻击日军，战斗一直持续到三十日凌晨三时。与此同时，沿粤汉铁路南下的上村支队，在三姐桥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的阻击，该师二二九团顶住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坚决不让上村支队前进一步，直到日军向二二九团实施迂回包抄时，二二九团才与二三〇团一起撤至青山市。

日军已经兵临长沙城下。

此时，中国最高统帅部与战场最高指挥官薛岳发生了激烈冲突。

二十九日，白崇禧和陈诚抵达株洲以南的渌口会晤薛岳。他们要求薛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撤退，说如果坚持在长沙附近发动大兵团作战就是抗命不遵。各类史学界对这场冲突曾有过大量的描写，说薛岳当场声明他就是要打，打完了再杀也不迟。甚至说薛岳当晚直接给重庆打电话，蒋介石睡了，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表示打胜了情愿被枪毙，打败了就自杀，总之不计后果一定要打。宋美龄的回答很是温柔，说没有什么抗命之说，委员长能够接受你的意见，尽管好好打便是。

陈诚的回忆是较为可靠的佐证：

敌军长驱直入，于二十九日，已窜至长沙附近之永安市、桥头驿等处，长沙已隐闻炮声。委员长得讯，命我偕同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星夜入湘，协助伯陵（薛岳，字伯陵）处理一切。动身之前，我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案，奉批“不守”。我遂与白飞桂，旋即转往渌口晤薛，面达统帅意旨。薛仍以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健生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实力为急务。伯陵愤然曰：“如此，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装了！”我见二人相持不下，因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伯陵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谓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既然如此，我乃一面商之

于健生，令伯陵反攻；一面将伯陵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委员长，请准因时因地制宜。

陈诚的意思很清楚：放弃长沙向后撤退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坚决站在薛岳一边，与白崇禧唱对台戏，并力促蒋介石改变决定。众所周知，陈诚与白崇禧一向不和。只是，陈诚的反问甚为重要：即使国土再辽阔，退却也有尽头时，那么中国军队究竟在哪里可以不再退却？

就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与最高统帅部发生冲突的这天，冈村宁次作出一个出乎中国方面预料的重要决定：全线迅速撤退。

九月二十九日，我照例乘大型机，遍访了战斗着的第一线兵团长。飞行中与第三十三师团长、奈良支队长、上村支队长取得了联系，投下了奖励、感谢辞和慰劳品。在飞机上，虽然看到了第六师团长长的行军队伍，但对方未展示对空联络信号，终于未能同该师团长取得联系。军的主力即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

冈村宁次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一次打了就回来的行动，但那应该是在攻占长沙之后。攻占长沙，至少对中国方面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无能为力了：少量部队突过了捞刀河，前面至少有五个军以上的中国军队在等着。如果现在不迅速撤退，部队就有被重创的危险。

三十日，奈良支队的先头部队终于在长寿街与被困阻的第三十三师团会合了，但依旧处在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和第二十军的夹击下，再向南突击已经不可能。而由于赣北的第一〇六师团仍被包围在甘坊，冈村宁次不得不命令奈良支队和第三十三师团掉头向东攻击，再把第一〇六师团接应出来。

在此情势下，接近长沙城的第六师团和上村支队，除了赶快后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十月一日，进至永安的日军首先撤回捞刀河以北。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发现日军后撤的迹象，当即命令部队尾随：第七十三军向平江推进；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一九五师围歼上杉市之敌，并向金井、福临铺和青山市方向跟踪；第五十九师向三姐桥方向追击。

六日，抵达修水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和奈良支队开始向奉新、靖安和武宁方向全面撤退。九日，中国军队第三十集团军收复修水。至此，赣北地区基本上恢复了长沙会战开始前的态势。

七日，冈村宁次位于咸宁的前线指挥部撤退。

湘北正面的日军第六师团和上村支队，四日退到汨罗江，九日退回新墙河以北，也是长沙会战开始前的位置。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冈村宁次在长沙城下的撤退完全是迫不得已：道路全部被中国军民破坏，辎重无法跟上部队，后勤补给发生严重困难，后方的游击部队不断骚扰，当面的中国军队边打边撤，使之始终不能形成合围，且局部的阻击十分顽强。其先头部队突过捞刀河后，如果执意向长沙城进击，不但是否能攻占长沙是个悬疑，第六师团还很可能陷入被围歼的境地。——“第十一军的作战课，是根据我一个大队可以与敌军一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由此看来，薛岳在日军第六师团当面集结的中国军队实在是太庞大了。

中国方面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给予日军以很大的消耗和打击，但在日军撤退之时没能迅速追击围歼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中国方面的统计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二万余人，击落敌机三架。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余人。

日本方面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四万四千具，被俘约四千名”；“我方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七百名”。

此次长沙会战，作战双方都没有达成预想作战目标：“双方均为一厢情愿之指导，国军第九战区企图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予以歼灭之战略指导，因敌并未深入，致不能获预期战果。日军则以不充分兵力，企图在平江、修水之线击灭国军第九战区之主力，因国军避免在该地区与敌决战，故日军之企图亦落空。”

无论如何，薛岳的抵抗意志令人肃然起敬。

不然，让冈村宁次直接攻入长沙，中国军队一直撤到衡阳，甚至不得不退守广西桂林，那么，战场态势又该是如何的难以挽救？

战后，双方统帅的情绪迥然不同。

为宣传“长沙大捷”，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让人排演了一出名为《新战长沙》的新编京剧：

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这四个字是薛岳标榜的口号），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及至遭到外界的讥笑和内部的反对（当时的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以后，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诿，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呀！”

冈村宁次情绪低沉。他晋见了刚刚上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当面提出了他对中国战局的看法。冈村宁次认为，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主要来自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军官。因此，日本要想不陷入长期抗战的泥潭，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穷追猛攻，决不能再像这次会战一样打了便回来，这样不但对日军的士气有极大的伤害，而且由于日军的撤退，每打一仗中国方面都宣称是一次“大捷”，只会更加鼓舞中国军队的士气：

敌军以游击战、特务战为其抗日战略，将主力保存于后方，并不主动寻求大规模反攻作战。对敌此等长期抗战形势，我军如无相应策略，势必坠其术中。对于摧毁敌抗战意图之道，卑职以为除穷追猛攻之外，别无他途。此外，敌军抗日势力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也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的全部二百万抗日敌军，而仅在于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事变，无异缘木求鱼。中国派遣军之成立，使敌一时为之震动，视我发动湘赣会战为总司令官就任伊始之重大表态而惊恐，从而决心放弃长沙，但我军对之攻而不取，回师原防，敌则立即宣称业已反攻夺回长沙，且对其作战军、师颁发奖赏，竭力鼓舞其士气。由此看来，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

第一次长沙会战，至少给了中国人一次胜利的感觉。

这在一九三九年十分重要。

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在急剧变化。急剧变化的世界对中国是否有利尚无法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方面将会利用德国在欧洲大举进攻的情势——正如冈村宁次建议的那样——对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穷追猛攻”。

“何地可以一战”没有必要争执，因为只要是日军所到之处，中国军队都必须一战。

这一战，很快便爆发于中国国土的南端。

第二十章

用最大的韧力和敌人拼下去

驻扎中国齐齐哈尔不到两个月的日军第五师团，官兵刚刚换上厚厚的冬季军装，就接到了向南开拔的命令。

日军第五师团不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主力，还是一九〇〇年庚子事变时入侵北京的日本兵团之一。自一九一二年起，该师团就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一直是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五师团在板垣征四郎的指挥下，先后参加南口会战、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一九三八年，板垣征四郎调任日本陆军大臣，该师团在安藤利吉中将的指挥下南下广东，从大亚湾登陆占领虎门要塞。安藤利吉升任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后，接替师团长职位的是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局长今村均中将。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第五师团调驻中国齐齐哈尔地区，为日军大本营直辖部队。

第五师团为日本陆军常设师团编制。此时的作战序列是：师团司令部；步兵第九旅团，辖步兵第十一、第四十一联队，旅团长及川源七少将；步兵第二十一旅团，辖步兵第二十一、第四十二联队，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骑兵第五联队；野战炮兵第五联队；辎重兵第五联队以及通信队、卫生队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医院。师团齐装满员时总兵力约为两万八千人。

九月中旬，第五师团开始向渤海湾移动。至十一月初，师团各部队在大连和旅顺港同时登船。满载着第五师团的舰队向东行驶——那是日本本土的方向，官兵们激动不已，猜想着很可能要回国休整了，有人在甲板上彻夜不眠：

载运第五师团的运输船，自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三日之间连续从大连、旅顺港起航，驶进了官兵们做梦都在怀念的濑户内海，在宇品港投锚。但是，严禁官兵上甲板，只可从船舱的小圆窗眺望广岛市的霓虹灯。

舰船在日本本土港口装上高射炮等重型装备后，再次起航，方向正南。庞大的舰队很快驶入漆黑的海浪中，茫然无措的第五师团官兵没人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

此时，整个中国正沉浸在“长沙大捷”的喜悦中。

蒋介石在南岳召集了第二次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是：中国军队反攻的时刻到了。

首先，蒋介石认为二战爆发后，日美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预计在今后三个月内，远东局势也将随之发生重大转变。最近的两件事颇具说服力。一是十月九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东京日美协会宴会上，对日本军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斥责，说美国民众对日军在中国的野蛮暴行以及日军对美国侨民的排斥普遍感到强烈愤慨，并说美国人深知日本军阀声言“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诡谋”所在。格鲁警告日本朝野，如不改变侵略政策，美日关系必将“有不可收拾之一日”。二是不久前日本人组织上海伪警察越界侵入租界区，美国国务卿赫尔当即表示，美国坚决反对“日本企图改变上海租界现状”，同时宣称“美国在上海及远东的驻军决不撤退”。蒋介石认为：“这实在是国际外交形势的好转，关系于我抗战前途最大的一件事，也就是我国两年又三月的抗战，尤其是去年此时武汉撤退迄今我全国军民牺牲奋斗所得的结果。”

……与远东利害关系最切而实力最大的美俄两国，对中日战争的政策趋向，既有明确之表示，其他英法两国，此后亦必能坚定其一贯的立场，共谋压制侵略暴力，亦为必然的趋势。所以国际外交形势，实在是一天一天明显进步，足以助成我抗战的胜利，而策进东亚之安全与和平……我们要求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一切要求之于本身。如果我们本身健全充实，一切党务政治经济等都能及时进步，使前方抗战能历久弥坚，着着胜利，则外交情势好转，固然有利于我，即令不然，我们亦能独立抗战，自立图强。反之，如果我们自身不健全，抗战无进步，无论国家外交会不会好转，即令好转，我们也不能获得如何大的利益……

蒋介石认为，刚刚结束的湘北作战充分暴露出日军衰败的趋势，而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不但令国人信心更坚，还令国际观感“焕然一新”。敌我军民士气的彼消我长，国际力量对日的明确反对，将促成中国军队转入抗战的反攻阶段：

敌我两方军民士气与心理之消长情形如此，实为我抗战胜利最大关键。我全国军民，实在越战越强，而敌人越战越弱。各位高级将领对于敌我两军这种战斗心理与战斗力量之转变，要时刻注意研究，唤起部属的注意。我们对本身力量的日加强固，如果没有察觉，还不要紧，但敌人厌战心理与敌军所表露出来的最大弱点，我们一定要研究明白，多方

设法来打击他，以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更进一步说，仅消极地保持战果还不够，我们一定还要积极前进，发扬战果；否则，我们如不前进，敌人就要前进……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立刻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固然我们现在的武器与装备，还不能从事于彻底的大规模的攻击战，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研究出避实击虚、乘间蹈隙的方法，使各地敌人都受到我们的打击，不能不失败退却，如此次湘北战胜之例……要知道，我第二期作战的要旨所在，不是要在装备上武器上与敌人决胜负，而重在战略上与精神上来与我们的敌人决生死！

蒋介石拟借助长沙会战后中国军民的高昂情绪，在全国各个战区发动一次主动出击的冬季攻势。

无论二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是否已对中国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在中国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是否发生了决定性改变，也无论侵华日军的士气是否到了蒋介石所说的“厌战不敢前进”的地步，至少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从没有大规模地主动出击过。因此，中国军队的十二个战区一起发动冬季攻势，至少看上去具备了将侵华日军一举彻底打垮的阵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下达指示各战区任务手令：

一、第一战区，攻击开封、博爱，牵制敌人。

二、第二战区，应首先切实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之交通，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之敌。

三、第三战区应以主力约十一个师，截断长江交通，分由湖口、马当、东流、大通、铜陵、荻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重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

四、第四战区，应以一部相机攻略湖、汕，主力扫荡广九路及南宁之敌。

五、第五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之敌，进取汉口，并向汉宜公路之敌攻击，截断襄花、汉宜公路之交通。

六、第八战区，应以一部协同第二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附近之

敌。

七、第九战区，应向粤汉北段正面之敌攻击，重点指向蒲圻、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袭瑞昌、九江之敌。

八、第十战区，仍任原河防，并依晋南三角地带攻击之进展，准备以一部渡河扩张战果。

九、苏鲁战区，应以广正面由东西两面向泰安、临城间及铜山、酴县间攻击，以策应沿江方面之作战。

十、晋察战区，应以主力切断保定、邢台间及石家庄附近敌之交通，一部切断沧县、德县附近敌之交通，以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

此外，并规定各战区攻势开始日期，除第五、第九两战区攻势日期，限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实施外，其余助攻方面，限于十一月底、主攻方面限于十二月上旬，分别实施。

这份手令如果落在日本人手里，不知道他们该是如何的惊愕。中国军队真能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发动如此规模的反击作战？如果尚不具备如此的军事能力，蒋介石的自信又是从何而来的？——只是，无论如何，日本人必定会十分沮丧，因为如果中国方面实施大规模反攻，不仅以侵华日军现有的布防难以应对，且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作战，非但没有在军事上把中国军队打垮，中国军队居然还主动反攻了。

日军第五师团已经驶过台湾海峡，在风浪的颠簸中继续向南。

舰船上的官兵脱下棉衣换上单衣，心情随着气温的升高逐渐躁热起来。

中国方面发动的冬季攻势开始了。

各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相继开始向当面日军进行反攻作战。但是，除了第一、第八战区的作战让蒋介石基本满意外，其余战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斥责。

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在豫东和豫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在豫东，第三集团军切断开封至兰封间的公路和铁路，贺粹之的第八十一师同时向

开封和兰封实施攻击，并一度突入开封城内，烧毁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的一个指挥部和一座军用仓库。骑兵第二军袭击商丘，点燃了日军机场内的汽油库，前来增援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半路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在豫北，新编第五军、第四十七军和第九军等部队破坏了与平汉铁路相通的公路，裴昌会的第四十七师一度攻进泌阳城，歼灭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一部。蒋介石对第一战区的作战评价是：“第一战区奉命惟谨，勇往奋进，卒得攻入开封省城，且能继续扫荡其附近之敌，焚毁敌军多数仓库物资，其后又复继续渡河袭击中牟等城屡次，此种不折不挠之勇气，殊堪特嘉。”

第五战区各部队向日军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出击：第二集团军第六十八军以及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在鄂豫边区游击总队的配合下，于平汉路南段的信阳附近频袭日军第三师团部队；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和第八十五军向鄂东北的广水方向发起攻击，大有威胁武汉之势；在鄂北襄花公路方向，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和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在当地游击部队的配合下，向位于随县和应山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发动攻击。规模最大的反击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方向，兵力多达十五个师以上的中国军队分别向钟祥、京山、皂市的日军发起攻击，日军第十三师团部队在这一地区呈一线分散配置，结果被中国军队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据点，但日军忍受粮弹两缺之苦顽强抵抗了一个多月，致使中国军队最终没能攻破日军的任何一个据点。蒋介石无法确信第五战区的战果报告，认为该战区并没有完成反攻任务：“第五战区襄河东岸之战，各军或进或退，胜败之数前后异词，其所得战果虽比其他各战区为优胜，但亦详查当时敌我之兵力与态势以及战后我方死伤与俘获之确数，而各军之进退、前后、勇怯、强弱、功过等情，更不可不一一详报，以功罪之大小而定赏罚之轻重。然此次该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实未达到其任务。”

刚刚结束长沙会战的第九战区，以第十五集团军的五个师向湘北岳阳发起攻击；第二十七集团军六个师的攻击方向则在鄂南的通山、蒲圻。中国军队将日军第六师团若干个独立据点包围，并与增援而来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展开激战。第三十集团军的四个师在赣北的武宁、奉新方向，向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发动攻击；第十九集团军的五个师向南昌附近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部队作战。其中王陵基的第七十二军在战斗中击毙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联队少将联队长佐藤谦。第九战区动作很大，战果不大，特别是动用九个师的兵力围攻鄂南与湘北交界处的大沙坪据点时，部队伤亡很大却没有打下来，令蒋介石十分恼火：“第九战

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伤亡不可谓不大，敌方播音且称为空前之持续战斗。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到任何战果。究为何因？此九师之中进退、前后、勇怯、强弱，与其优劣、功过，更应有意明确之审查，切实之检讨。”

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蒋鼎文的第十战区、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都没有大的作战。

蒋介石认为顾祝同的第三战区表现最差。中国第三战区处在交战双方军队密集对峙地区，无论哪一方稍有动作，都会即刻演变为一场混战。第三战区一开始策划的反击攻势规模可观：在长江沿岸集结第十八、第二十五、第八十六、第二十一、第五十八军，共五个军十四个师的主力部队被编成长江方面攻击军，攻击军分成左、中、右三个兵团，将从安徽南部的荻港到贵池间约一百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全线进攻。但是，当面日军第十三军发现中国军队的异常集结后，判断中国军队很可能向担任长江航道护卫任务的第一一六师团发动攻势，于是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在贵港北面的大通地区向中国军队展开攻势，还抽调部队加强第一一六师的兵力，同时命令第十五师团配合第一一六师团作战。日军的调整尚未部署完毕，第三战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中国军队在第一时间就突破了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位于大通与荻港间的防线，一举冲到了长江边，在江面上设置水雷，还炮击了江面上的日军舰船。可是，当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从九江乘船沿长江水道紧急增援而至时，第三战区的进攻戛然中止，其主力部队全部撤回了荻港与贵池以西的青阳地区，只留下小部队对日军进行局部骚扰。位于杭州方向的中国第十集团军，虽然袭击了杭州、富阳等地，但遭遇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反击后，部队迅速放弃萧山仓皇退却。——兵力强大的第三战区的冬季攻势，虎头蛇尾，敷衍了事，以致蒋介石斥责顾祝同“军誉扫地，廉耻安在”：

冬季攻势本以截断长江敌之交通为主攻，当时第三战区以十四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一师团之敌军，并未受到桂南以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致其任务未成，上下官兵不知发奋补过，而且弛懈偷安视为平常。军誉扫地，廉耻安在？其将何以革命，复将何以抗战期得最后胜利？忧念痛苦莫甚于此。而我军号令不严，士气颓靡，于此可见，岂尚有军纪与军誉之心存于其间乎？及其事后仅撤军长郭勋祺一人了事，不知其影响所及岂止一军！未几，而萧山失陷，望风溃退，不问责任，不究罪恶，军情如此，能不忧愤？若长此因循，贻误党国，其何以堪？此第三战区之功过不能不彻底追究者也。

所有战区中就数第八战区打得苦。

中国第八战区的域内戈壁连天，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敌情严重。战区范围包括内蒙古南部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等地。一九三九年一月，傅作义率领第三十五军，经山西河曲转进绥西河套地区，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此时，包头以东地区皆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开始后，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第八十一军第三十五师、骑兵第六军第七师，进行了包头、绥西和五原三个战役。

军事委员会给傅作义的任务是攻击乌拉尔山一带的日军，但傅作义决定攻打包头。其理由是：包头为平绥铁路终点站，是日军控制绥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敌伪向宁夏扩展的前进基地。且日军想不到中国军队会突然转入进攻，必定疏于防范，只要中国军队的攻击果断并坚决，就有相当大的胜算。为此，傅作义命令第一〇一师在与日军的对峙线上大张旗鼓地建筑工事，让日军误以为傅作义是想在黄河冰封前加强防守。同时，他还请来当地的剧团慰问部队，锣鼓喧天，歌舞升平，以示他的部队准备过年了，根本没有从五原出动的意愿。而实际上，傅作义拟定孙兰峰的新编第三十一师，配属警备旅的一个团和一个山炮营从西面对包头发起攻击；袁庆荣的新编第三十二师在北面负责掩护，阻截安北、固阳方向增援之敌；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则沿黄河南岸运动，进至平绥铁路萨拉齐至归绥一带，破坏铁路并相机占领萨拉齐县；董其武的第一〇一师为总预备队，协同新编第三十一师从北面进击包头。

十二月十五日，各部队开始向指定地点秘密运动。十九日，骑兵第七师在萨拉齐附近与日伪军接战，傅作义命令新编第三十一师立即开始攻城。师长孙兰峰命令刘景新的九十一团和警备旅的于霖瑞团为主攻，由包头城墙的东西两面分别登城，同时命令安春山的九十三团向包头城东运动，准备阻击增援之敌。担任阻援任务的九十三团运动到包头西北城门时，发现守敌并没有察觉，碉堡也没有人防守，团长安春山决定即刻动手。隆冬夜半，弯月寒星，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气温已降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包头城外的护城河冰层坚硬，九十三团官兵直接把木梯子靠在城墙上，然后爬城。爬到半截，城墙上竟然有人和他们搭话，问正在爬城的是不是抗日的部队，如果是就赶快上来吧。问话的是在城墙上站岗的伪军士兵。在这群良知尚存的伪军士兵的帮助下，九十三团官兵爬上城墙，迅速打死守卫西北门的日军，然后打开城门，城外的于瑞霖团蜂拥入城。

包头城内驻有日军两个联队、伪蒙军的一个师以及宪兵队和日军守备队。发现中国军队已经冲进城内，日伪军立即集结部队，开动坦克，企图把中国军队堵回去。九十三团官兵与日伪军展开勇敢的巷战，包头民众纷纷出来为九十三团官兵带路，日伪军纷纷退到了司令部大院里，包头城区大部分被傅作义部占领。

二十一日晚，得知大量日军从张家口、大同和归绥等地紧急增援包头后，傅作义认为奇袭包头城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部队撤出包头向五原方向转移。

包头之战，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日军死伤了包括联队长小林一男和小原一明在内的军官二十余人，士兵三千多人，城内大量的武器和军需品被傅作义部掠走。

驻扎张家口的日军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对包头被袭感到极大的愤怒和耻辱，决定对傅作义部进行围剿。他调集了三万多日伪军、一千余辆汽车、数十辆坦克和大量的火炮，命令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指挥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内蒙河套地区猛扑过来。

傅作义分析了战场局势，决定主力在有利地域预设阵地诱敌深入，然后对突入的日军实施两面夹击。南路日伪军自包头出动后，连续遭到骑兵第七师的阻击，接着又遭遇新编第三十二师的伏击。北路日伪军兵分两路，一路沿着乌加河北岸推进，结果在长满芨芨草的草滩上受到新编第三十一师的伏击，日伪军猝不及防，损失严重。另一路日伪军在乌镇和折桂乡遭遇第一〇一师的阻击。由于傅作义部队边打边撤，日伪军相继占领五原、临河和陕坝，但始终没有找到傅作义部主力。指挥官黑田重德认为围剿已经获得大胜，傅作义本人估计正在逃往重庆。但是，话音未了，傅作义部就打了回来，中国军队连续收复临河和陕坝，双方在五原城外形成对峙。

三月初，傅作义决定把五原城夺回来：

黄河在春分前后一两天，一定开河解冻流凌，冰汛流凌期间，大约要七八天，船只不通，人马难行。我们利用这个时机，在五原东北乌拉壕，挖渠放水泛滥，淹没南北两条大路，到时泥泞翻浆，敌军人马汽车均无法行进，失去机械化的作用，使其逃窜无路，束手就歼。我们要设法利用春分开河这一时机。这是天时。利用乌加河天堑是地利，而且作战地区地理环境、地形地物，我们都了如指掌，这也是地利。

原以为傅作义的部队已被歼灭，因此，当其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五原城门并刺死守城岗哨时，五原城内的日伪军万分惊慌。傅作义部官兵随即冲破城门，凶狠地向城内穿插，经过一夜的激战占领了城内大部分要点，日伪守军四处逃散。在五原外围，阻击部队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浴血抵抗，日军企图在乌加河上架设浮桥，但始终未能成功。得知日军第二十六师团主力赶来增援五原时，中国军队掘开了从北向东环绕着五原城的乌加河河堤，河水泛滥，道路被淹，日军增援部队因无法通行，被迫撤回包头。傅作义部收复整个绥西河套地区。

五原作战中，傅作义部击毙了日军中将水川伊夫。这是继八路军击毙阿部规秀四个月后，又一名日本陆军中将被击毙。击毙水川伊夫的，是绥远游击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一连。一连连长张汉三得到百姓的报告，说一股日军逃出五原城，过了结冰的乌加河，但无法渡过乌梁素海。张汉三化装成伪警察队长前去侦察，在与这股日军中的一个矮个子军官交谈了一阵后，张汉三主动提出去给他们弄船，然后张连长就带着部队来围攻了：

敌人的武器好，我们的武器差，要避开他们的火力，决定利用跟前的一条干渠，把队伍埋伏在渠堰下，等敌人接近时，一齐投手榴弹袭击。但必须听候我的命令，没有命令，绝对不准乱投。不久敌人过来了，但走到离我们还有二百米远，不再前进，停了下来；停留不久，又退走了。我们就跃出干渠，奋勇追击，同时我率十多人绕到敌人的后面，这个地方叫十份子，地处乌梁素海岸边，芦苇很多。我们包围了敌人，展开激战。因为我认准了敌人的军官，就同一个枪法好的战士，两人瞄准了那个军官，一齐射击，一枪打中他的左臂，一枪从他的右脸擦过；他摇晃了一下没有跌倒，我们随即又一齐打了两枪，都打中了他的胸膛，他立刻倒了下去。指挥官一死，敌人惊慌失措，混乱一片，我们缩小包围圈，逼近敌人，并把正在抬军官尸体要逃走的三个敌人打死了，截留下尸体，又把机枪射手打死，于是敌人才举手投降。这一战役，敌人有被打死的，有在乌梁素海水里被淹死的，只逃脱二十多人。我们俘虏了许多人，但是这些家伙顽固得很，死赖着不走，不得已将他们大部分打死，只生俘两人。打扫战场时，检查日军军官尸体，搜出个人图章一枚，得到他的手枪一支、战刀一把。根据他的肩章、图章，认出他是侵占五原的日酋指挥官水川伊夫中将，后来我们把两个俘虏送到我游击区司令部，将那把锋利的战刀交给了第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

张汉三由连长直接晋升为上校团长。

那个日军中将水川伊夫，原本不是军人。他以地质学家的身份供职于重工株式会社，侵华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到中国收集和勘查地质情报，大本营临时授予了他中将军衔以及绥西警备队队长的职务。

此次作战，被中国战史称为“五原大捷”。

这是中国方面发动的冬季攻势中少有的胜仗。

傅作义部官兵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仅最后的五原一战牺牲官兵近七百人，其中前赴后继战死的连长就有十七人。

蒋介石对傅作义的第八战区的评价是：“亦能遵令直前，攻克包头重镇，且能苦守数日，其后虽战果不完，功败垂成，而其精神，殊堪嘉尚。此皆应确实查明出力有功之官兵姓名，从优奖赏，以励有功而昭诸续。”

时年四十四岁的傅作义正值壮年。他一身布衣，消瘦憔悴，指挥作战果断，一腔热血澎湃。战斗中他奔跑于各个战场，每天奔跑的路程都在百里以上。他心血耗尽，总是向勤务兵喊着要喝口水。他的一双布鞋鞋底总磨穿，勤务兵天天给他缝，他怨勤务兵缝得不好，勤务兵怨他穿得太费，最后实在没法缝了就用麻绳绑住。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身上长满虱子，顿顿吃着豌豆，他能把部队排以上军官的名字全叫出来。在他的指挥部里，墙上挂满了白布，白布上写着阵亡官兵的名字，随着战斗的持续，白布整整挂满三间屋子。夜深时分，面对这些阵亡者的名字，他总是泪流满面。沙窝战斗中，他的指挥部遭遇敌机轰炸，他被掀起的沙土埋了起来。卫士把他挖出来后，他让卫士收集马棘和干草点燃火堆，让火光把戈壁荒漠照亮，这一天正是一九四〇年的除夕。

傅作义部在西北戈壁的凛冽寒风中与日军作战的时候，航行在海上的日军第五师团官兵已经热得打赤膊了。

他们终于看见了陆地，陆地上高大的椰树在海风中摇曳。

这支从黑龙江风雪中起程的日军师团，居然一直开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

他们历经如此遥远的航程要去干什么？

英国的侦察机在海南岛海域发现了这支日军的舰队。

英国人立即把情报通报给中国最高统帅部。

没有中国方面作出反应的历史记录。

中国军队发起的冬季攻势，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军。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中国军队在冬季攻势中损失兵力约为五万，但日军“伤亡合计也约达八千，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更为重要的是，冬季攻势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士气，日本方面对此总结道；中国军队“仍能大致保持命令统一”，命令不仅贯彻至正规军中，“甚至深入到了游击队的最基层”。更糟糕的是，“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至今仍在全军保持着统辖力量”，军政统一的中国军队依旧很强大。“对于已经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这次冬季攻势“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从新估计”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量。只是，从战果上看，中国军队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并没能收复任何一个军事要点和任何一座城市。蒋介石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不高；而冈村宁次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无能，具体表现是“缺乏战略联系而各自为战”。

突然，在中国的南方海岸，日军第五师团大规模登陆了。

第五师团抵达三亚后再次起航，舰船北上，出现在中国广西南部的海面上。

正在指挥冬季攻势的中国最高统帅部对此没有任何准备。中国方面不清楚日军为什么在广西登陆。

而日军大本营却已经策划很久了。

进入一九三九年以来，日本方面加紧了对中国地方军将领的劝降活动，以达到在军事上没能达到的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同时也配合汪精卫的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一系列的劝降活动中，汪精卫甚至亲自出马，把劝降重点放在了中国第四战区。

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第四战区所辖的两广地域，是日本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特别是广西，自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除城镇曾遭日机轰炸外，境内没有侵入日军的一兵一卒。广州沦陷后，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曾在广西游历，他看见这里的城镇破败不堪，“街道上活着的生物除了野狗、野猫和耗子之外，就只有路旁破衣褴衫的小贩，他们贩卖的都是些肮脏不堪的东西”。

农民们穿着“用热带森林木纤维粗织成的蓑衣，蹲在市场的各个角落里，喧闹着讨价还价”。相比之下，广西军政要员们所过的奢靡生活，令格兰姆?贝克印象格外深刻：

到达的当晚，我们这些外国旅行者就被国民党驻军的将领请来这座屋顶花园做客了。那是一席豪华的酒宴，有鲨鱼唇、大虾、鸡、猪肉、高级调味品等。在吃了一个星期的干鱼和瓜片之后，这样的一餐，的确味美非凡。这座有玉石花鸟装饰的屋顶花园凉爽宜人，那些肥胖的官员和商人们在笑语欢声中开怀畅饮。他们像孩子般地玩笑打闹，把他们新近走私来的珍品相互比较，其中有自来水笔、温度计、手表、旅程表、标着诸如“摩登时代”“欢迎”等英语字样的衣带环扣等。这些客人中，有各种国民党人的面型，有狡诈的三角型，有粗鲁的方型，还有那常会大声发笑而毫无欢乐感的大胖子圆型。所有这些，后来我就都非常熟悉难忘了。

正因为这里远离战争，且存在这些骄奢淫逸的军政官员，日本人才把劝降活动主要放在了中国的第四战区。一九三九年五月，日本人通过特务与广东军阀余汉谋接触；八月，汪精卫利用他的旧关系与张发奎以及第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人接洽，甚至派人去与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滇系将领龙云等人商谈。汪精卫试图煽动中国的这些地方军阀与他一起“肃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日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借机表示：如果两广方面的军队“和平反共”，日军不但立即停止对其攻击，还将更进一步将已占领地区的权益“次第交还”。但是，出乎日本人的预料，劝降活动均遭拒绝，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日本人认为，这还是因为重庆的国民政府尚能支撑下去的缘故。而令国民政府每每恢复战斗力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和英国通过中越口岸卖给中国大量的军火和军用物资。有了这些外援，国民政府很难屈服，地方军阀也下不了向日本妥协的决心。

中国事变进入长期持久阶段后，切断中国和各国联系的补给联络线，成为我国对华战略上的首要问题。特别是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通道，自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强对粤汉铁路的轰炸以后，运输量增加了三倍，它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了。

中国广西省府南宁，位于邕江之畔，是中国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北向，桂越公路由越南境内经广西龙州抵达南宁；南向，桂越铁路从南宁通往越南的谅山、同登抵达河内。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国开始通过越南至龙州间的左江水路、越南至南宁间的公路以及铁路，大规模向

内地输送战略物资。同时，滇越铁路也由越南海防直通中国昆明，国民政府购买的军用物资沿着滇缅公路进口，仅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中国从缅甸方向就输入了近三万吨的战略物资。

为切断中国的外援通道，日本方面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以越南为殖民地的法国提出交涉，要求法国封锁海防港以及中越陆路交通。法国迫于日本的压力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没有按照日本人的意愿将通道完全切断。外交努力失败后，东京大本营认为：唯一办法就是攻占广西南宁。

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谅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北部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即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它可更为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

日军大本营认为，二战爆发后，由于英、法对德宣战，两国已无力顾及远东，这正是日本下手的好机会。从世界大战的前景推断，日本势必要大举南下，如果占领整个广西，并陈兵于中越边境，一旦时机成熟，日军还可便捷快速地直接冲入法属印度支那。——一九三九年的侵华日军远不似蒋介石判断的那样已进入衰退期，军国主义者的扩张野心依旧远大。

十月十四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三七五号”：

一、大本营企图彻底切断敌之西南补给路线。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以一部迅速切断敌人沿南宁一龙州公路的补给路线。

三、上项作战部队的作战区域，大概为南宁、龙州以南。

当天，日军大本营又发出“大陆指第五八二号”：

一、作战目的：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敌人沿南宁一龙州公路的联络补给线路。

二、作战时间：预定为十一月中旬。

三、报道：在登陆第二日正午前，由大本营负责发表，禁止现地报道。

四、保守机密：要特别注意。此次作战陆军代号为“和”号作战，海军代号为“N”号作战。

十九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向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下达了作战命令。

但是，第二十一军兵力严重不足，编制内仅有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该军负责广州周边及珠江三角洲的守备，还有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韶关的作战任务，没有机动兵力可供调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决定，将第五师团从齐齐哈尔调出，编入第二十一军序列；同时命令新编成的第三十八师团立即从日本本土启程，抵达广州后编入第二十一军序列，接替台湾混成旅团在佛山地区的防务。第二十一军最后决定投入南宁作战的部队是：陆军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海军第五舰队以及第三联合航空队。

关于进攻路线，日军多方面考量，如果从陆路进攻，广州到南宁约一千公里的路途上，横亘着粤桂两省交界处的连绵大山，道路崎岖难行，不但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还易受到中国军队的伏击，因此只有选择从广西沿海登陆。如果选择得当，登陆点距南宁仅二百多公里，不但可以快速推进，也有利于后勤补给。为隐蔽作战意图，日军选择了诲南岛的三亚作为集结地。十一月七日，第五师团抵达三亚；九日，台湾混成旅团被运抵三亚；十日夜，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抵达三亚。至此，日军完成了攻占南宁的一切准备。

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指挥的中国第四战区部队较少，只有八个军、十八个师，且大部分集结在广东，位于广西南部的只有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为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冬季攻势计划，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又把该集团军的第六十四军调走了，令该集团军只剩下第四十六军和第三十一军共六个师，加上四个独立步兵团和少量的地方民团，却要防御由广西南宁至广东新会间约八百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二百多公里的纵深区域。由于兵力实在单薄，这些部队只能守几个要点。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十六集团军两个军的位置是：第四十六军

（欠第一七〇师），附属独立步兵一团、二团，龙州、玉林各区民团，广东第八区地方团队，组成右地区部队，司令部设在南宁，主力位于南宁东南方向的小董、灵山、玉林等地，重点防守防城、合浦、廉江沿海。第三十一军（欠第一三一师），附属独立步兵三团、四团，梧州区民团、广东第五游击区部队、广东第七区地方民团，组成左地区部队，司令部设在桂东南的桂平，主力位于粤南的鹤山与高明之间，重点防守新会、江门和三水。另外派出小部队配合地方民团，防守粤西南电白至阳江沿海线。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〇师和第三十一军的第一三一师，分别位于桂平西南的兴业和桂平东南的容县，为集团军总预备队。

尽管防线单薄如纸，为应对日军可能实施的登陆，第十六集团军还是拟订了三个预案，其中对日军登陆地点的预测是：广东电白附近、广西北海附近和钦县附近。第十六集团军认为：日军从电白或北海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从钦县到南宁沿途都是大山，崎岖的山路早已被彻底破坏，所以日军从钦州湾登陆的可能性很小。

于是，广西钦州湾沿海防御几近空白。

而日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正是钦州湾。

早在一个月前，日军侦察部队就已到达钦州湾，勘察登陆点的地形地貌，测量沿海水位，绘制战场地图，中国守军对此毫无察觉。为保证作战顺利，东京大本营还把中井增太郎派入第五师团司令部任参谋兼特务机关长——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中井大佐曾担任过白崇禧的军事顾问，对广西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在作战准备方面，日本方面的谨慎细微与中国方面的粗枝大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十一月十三日，日本海军以“加贺”号航空母舰为主力，在包括“妙高”号、“长良”号、“名取”号等巡洋舰在内的五十多艘舰艇的掩护下，七十多艘运兵船自三亚榆林港起航。庞大的舰队在海面上行驶两天后，于暴风骤雨中驶进广西钦州湾并抵近海岸。接着，日本海军开始猛烈的海岸炮击，陆军同时开始了登陆行动。

此时，在钦州湾防御的中国军队，只有何宣的第四十六军新编第十九师。第四十六军是一九三八年新组建的部队，辖第一七〇、第一七五师和新编第十九师。而新编第十九师是一九三八年秋在钦县组建的，由第一七五师调拨的两个团为基本部队，再加上两个地方民团的兵力，番号是五十五、五十六和五十七步兵团以及一个野战补充团，师长黄固。

新编第十九师所防御的海岸线长达两百公里：五十五团团部在钦县，负责防御犀牛脚、犁头嘴、金鸡塘一线海岸；五十六团团部在防城，负责防御龙门、企沙和白龙尾一线海岸；五十七团尚在小董整训；野战补充团团部在那丽圩，负责防御乌家附近海岸。师部位于小董。

发觉日军登陆后，师长黄固立即命令部队把登陆之敌消灭在海滩上，数量稀少的中国守军顶着倾盆大雨进入了简陋的阵地。

十五日早晨八时十分，由及川源七率领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组成的及川支队，在企沙附近首先强行登陆。接着，海军佐世保陆战队在龙门附近实施了登陆。新编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一营负责防御企沙海岸，一营官兵冒着日军强大的舰炮轰击拼命抵抗，全营伤亡严重，残部不得不放弃滩头阵地，退守防城附近的后备工事。在龙门防御的是新编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二营四连，一个连队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攻击，日军很快在龙门登陆成功。十六日凌晨，中村正雄率领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组成的中村支队，乘海水涨潮之际，乘坐汽艇沿着渔洪江上溯直趋黄屋屯；盐田定七率领的台湾混成旅团在也在犁头嘴登陆。随着日军炮兵的推进，新编第十九师在防城的阵地全部被毁，五十六团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放弃防城。日军乘胜向北推进占领了黄屋屯。

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北海附近的登陆属于佯攻。在这里防御的中国军队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官兵，发现海面上突然出现大批日军舰艇后，大为吃惊。日军舰队在距离海岸四千多米处停泊，然后放下二十多艘汽艇开始登陆，同时二十多架飞机也前来助战，中国海岸守军的炮台被全部炸毁。此时，守军接到了彻底破坏北海城的命令，但守军军官鉴于长沙大火的教训迟迟不肯执行。傍晚，守军军官突然发现了日军的破绽：日军的舰炮轰击不但逐渐减弱，且舰队始终距离海岸很远，乘坐汽艇的日军也数量有限。如果日军真要在北海登陆，早就该投入大兵力冲击滩头了。军官们把这一疑惑报告给上级，上级鉴于日本广播已播出在北海成功登陆的消息，判断出日军在北海完全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转移中国守军的注意力。军长何宣命令北海守军指挥官第一七五师五二四团团长巢威向全国发布通电，宣布北海依旧在中国守军之手。——得出日军在北海佯攻的判断后，巢威团长松了一口气——他没有执行彻底破坏北海的命令是对的。不然，北海没有被日军攻占，反而毁在了自己手里。

在犂头嘴、金鸡塘一线海岸防御的，是新编第十九师五十五团九连。日军第五师团及川支队一部，仅用一个小时就占领了滩头，九连残兵纷纷向钦县撤逃。五十五团团长听到海岸方向的枪声后，不断给第九

连打电话，但一直联系不上，直到日军冲到钦县城下时，才命令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钦县位于钦州湾北岸，邕钦公路经小董直达南宁，自古便是南宁的门户。日军很快突入钦县城内，与中国守军展开巷战，五十五团完全陷入自卫战状态，各级之间都失去了联系，混乱的巷战持续两个小时后，黄团长带领小部分官兵撤出城，钦县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成功登陆后，分三路向南宁猛扑：一路从防城出发向北直趋南宁；一路从钦县西北的黄屋屯出发，直逼大塘；一路从钦县出发，沿邕钦公路向小董进攻。新编第十九师五十六团向小董以西的上思方向撤退，五十五团干脆撤到了南宁以北的武鸣方向，位于小董的师部与这两个团均失去了联系，因此对前方战况不甚明了，只能命令正在小董整训的五十七团进入阵地准备御敌。五十七团刚进入阵地，日军便冲到了眼前，且阵地两侧也同时出现了日军，小董实际上已处于被日军包围的态势中。于是，五十七团也赶快撤退。——至此，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九师对钦州湾海岸的防御完全垮了。战后，师长黄固因指挥无方被免职，五十五团团长黄廷才因作战不利被撤职查办。

登陆的日军长驱直入，至十九日，对南宁城形成三面包围。

广西沿海中国一线部队自日军登陆时起，“参战官兵约一万零六百七十八人，伤亡和生死不明约一千一百五十人”。

日军从钦州湾突然登陆直逼南宁城下，这令正在指挥冬季攻势的中国最高统帅部大惊失色。南宁是中国西南重镇，如果南宁乃至整个广西失守，不但中国的对外补给线会被彻底切断，还将直接威胁抗战大后方云南和四川的安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责成第十六集团军的两个师死守南宁，没有命令不得撤退。同时开始紧急调动部队驰援南宁：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奉命从湖南湘潭和贵州方向开来，姚纯的第三十六军奉命从重庆和湖北当阳方向开来，中国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军——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湖南衡阳向南宁急进。

在增援部队抵达前，第十六集团军迅速调整部署，夏威命令第三十军（欠第一三五师）向玉林、城隍、兴业、灵山急行军，命令该军扩大番号团改师、师改军以虚张声势欺骗日军，部队抵达后协同第四十六军侧攻登陆的日军；命令第一七〇师经贵县、横县、蒲庙向南宁以南的吴圩方向急行军，阻敌北上；命令广西绥署的所有地方部队火速集结，准

备参战。——夏威的计划是集结主力，在南宁以东地区夹击登陆的日军，以期将敌压缩回海岸线予以歼灭。但是，登陆日军的推进速度极快，还没等夏威调整完毕，日军便已越过小董、大塘到达百济附近。二十日，日军继续向吴村墟和那马一线攻击，二十一日其前锋抵达那连，刚刚到达蒲庙和良庆的中国军队第一七〇师，虽是仓促投入战斗，但官兵阻击顽强，致使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防守蒲庙的五〇九团二营全部阵亡。

突破中国军队第一七〇师的阻击后，日军准备北渡邕江。

一旦日军渡过邕江，南宁等于唾手可得。

中国统帅部调集的增援部队尚在数百里之外，加上都是徒步行军，山高路险，行进缓慢。至二十二日晚九时，陆续赶到南宁外围的部队除第十六集团军第一七〇师的四个团和第一三五师的两个团之外，增援部队仅有杜聿明的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一部，这部分官兵乘坐火车在桂林车站下车，然后换乘汽车正向南宁方向赶来。——此时，真正防守南宁城的部队，只有第一三五师四〇五团。

没等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部署完毕，日军第五师团的中村支队和及川支队已抵达邕江岸边。日军选出敢死队，在西乡塘、恩沿塘等地泅水渡过邕江后，疯狂抢夺民船，然后开始运送大部队强渡。二十三日，南宁外围开始陷入激战。二十四日，渡过邕江的日军已达数千人，在大量飞机的助战下，日军中村支队从东南面、及川支队从西面猛攻南宁城。南宁城危在旦夕的时刻，城内守军四〇五团团长伍宗骏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守城，一个团的兵力根本守不住；不守，必定要军法从事。他请示上级，可师部和军部都联系不上了。下午二时，焦头烂额的伍团长决定放弃南宁。正在集合部队准备撤离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六〇〇团团长邵一之打来的，说他们团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南宁北面的二塘，主力尚在运输中，邵团长询问南宁目前的情况。伍团长立刻感到有了希望，要求六〇〇团直接开进南宁接替城防。邵团长说，上级给他的任务是在二塘附近掩护师主力开进，他没有义务防守南宁城。接着，两个团长在电话里吵起来，吵的结果是南宁丢失了。

伍、邵两团长在电话中，互相推脱责任，得不到解决，结果伍团长提出两团共同负责守备南宁，邵团长则以未奉上级之命不肯答应。于是伍团长决心放弃南宁，在下午七时通知各机关后，即率部向四塘方面转进。四〇五团撤走后，南宁市已无防守。下午八时，南宁民团指挥部、

警察局、邕宁县府与市民纷纷经心圩、香炉岭向隆安方面撤退。敌人于九时由津头村渡江，未遇抵抗而占领南宁。敌一部窜至邕宾路之茅桥、二塘附近，与我第二〇〇师六〇〇团发生小接触。六〇〇团即向五塘方面撤退。南宁遂于二十四日晚完全陷于敌手。

第二〇〇师六〇〇团在二塘附近的战斗，并不是什么“小接触”，而是阻击日军北进的拼死作战。整整两天的激战过后，六〇〇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一，那位曾与伍团长在电话里吵成一团的邵一之团长，连同他的团附吴其生均在战斗中阵亡。

第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团长伍宗骏，以擅自放弃南宁之罪被桂林行营军事法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中国军队丢失南宁之责，岂是一位团长所能承担的？

日军第五师团攻占南宁后，立即以中村支队和骑兵联队沿南宁至宾阳的公路向北追击，同时派出一千多兵力沿公路的侧翼直接迂回四塘，企图把退却中的中国军队包围歼灭。鉴于迂回四塘的日军已经抵达中国军队的侧后，当面第二〇〇师、第一七〇师、第五师等部队乘夜色向高峰隘方向迅速撤退。——因夜暗撤退，道路不熟，且曾被日军截击，官兵大多失散，到达高峰隘附近部队，不过四千至五千人。”日军于三十日凌晨攻击八塘，中国军队被迫退守九塘。十二月一日，日军攻占高峰隘，中国军队一部退向北部的武鸣，第二〇〇师则朝南宁东北方向的昆仑关转移。

日军占领南宁后，中村支队防卫南宁以东地区，及川支队防卫南宁以西地区，森本（森本宅二中佐）大队防卫八塘北面地区，松本（松本总郎少佐）大队防卫四塘地区，友野（友野几久治少佐）大队防卫高峰隘正面。二日，刚刚抵达战场的中国军队第一八八师五六四团在战车的配合下袭击了驻守八塘的日军，日军第五师团随即派中村支队从南宁出发，向中国军队第一八八师和第二〇〇师六〇〇团展开攻击。第二天，日军从八塘向北推进约十公里，占领昆仑关。

日军留下松本大队驻守昆仑关，中村支队返回了南宁城。

至此，双方在南宁以北的昆仑关、高峰隘附近形成对峙。

二月十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接到一封信，是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发来的：

大日本军占领南宁地方的唯一目的是，切断蒋介石政权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交通线。

我南宁方面的大日本军对白、李两将军在广西省的建设和政令甚表敬意，因此将极力注意避免损坏其事业。两将军治下的一般民众的生活及其幸福，将尽力予以保护。

愿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为促进同文同种之东亚两民族的提携奋起前进。

将军若仍执迷不悟而欲与日本军为敌到底，则可随时举全部兵力前来夺回南宁。我驻南宁军队将独立对抗将军之五十万军队，且有足够的兵力、装备、航空力量和信心取得战争胜利。

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殁的将军部下四千二百余名勇士，我军已将该等合葬于南宁公园，郑重供祭，请放宽心。

这是明目张胆的诱降和狂妄至极的叫板。

李宗仁和白崇禧给今村均师团长的答复是：

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如近卫首相在去年底所发表的言辞足可证明，它的意思就是吞并，决不是公平合作。对中国来讲，与其让日本吞并就不如抗战到底，使日本幡然大悟，自行消除吞并思想。待事实上确有和我公平合作表现时，才有开始谈判的余地，而现在时机尚未成熟。由于这次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也应该由日本提出。

如果真的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

日本贫穷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抛弃仇恨、恢复友好才是谋求自救的方法，以友谊的援助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接到这样的答复，日本方面终于明白，“那些眼花缭乱的谋略路线，对中国并无损害，倒是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方面的虚弱”。而更令日本人难以言表的痛苦是，中国军队的将领表示，他们对于日本资源贫瘠、人口有限的穷困情况“非常清楚”。日本人认为，这恰恰是支撑军力明显处于弱势的中国对日作战近三年的“最大依靠”。

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判明，在南宁附近的日军不过是四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和少量的炮兵，日军的重武器和机械化装备因邕钦公路被破坏而没能及时跟进，因此决心实施反击以夺回南宁。

十二月十六日，白崇禧发出“第一号命令”：

一、自钦（钦州）防（防城）上陆侵攻南宁之敌，业已判明为第五师团及台湾旅团。日来钦防附近，似有后续部队到达，昆仑关附近，有敌约一联队，高峰隘方面约敌二三千，高田墟及腾翔附近，时有敌骑兵及伪军出没，六塘附近似有敌之旅团部，南宁之敌，似有敌四十一联队，亭子墟及蒲庙均有敌占领，连日以来，敌集结兵力二三千，向旧州及陆屋附近我四十六军攻击，现仍在激战中。

二、军以攻击北攻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未到之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攻势开始时机，预定十二月十日拂晓。

三、空军应于攻势期间服行如左之任务（略）。

四、西路军应以第一纵队配合战车，从武鸣方面向高峰隘之敌攻击，最低限度，须牵制吸引之，并派遣多数小部队，由高峰隘东西小路迂回袭击；另以有力部队，从葛墟附近小径进出于四塘、五塘附近，协同北路军包围歼灭昆仑关方面之敌，尔后迅速压迫当面之敌，协同北路军围攻南宁，担任南宁西北方面之攻击。第二纵队即向苏墟附近集结，袭击吴村墟、大塘、南宁一带之敌，遮断敌之联络，并确实占领吴村墟、亭子墟等处，阻止击破敌之北进。

五、北路军应以主力从宾阳方面，配合战车，攻击昆仑关附近之敌，并多派支队迂回包围敌之侧背，将该处之敌歼灭，尔后迅速向南宁方面进出，协同东、西两路军攻取南宁。第九十九军之一部，从那河、鹿头、伶俐向七塘附近，协同第五军包围昆仑关附近之敌歼灭之。尔后从邕宾路二塘至五塘以南高地带，对蒲庙、剪刀墟、良庆之渡河点，组织打击敌之北渡，必要时，以一部渡河占领蒲庙、良庆。

六、东路军之第四十六军及第三挺进纵队，应以陆屋、灵山为根据，配合民众之武力，任邕钦路交通通讯之破坏，并妨碍其修路，置重点于小董南北地区，多方袭击扰乱敌军，崩溃其伪组织，阻止截击敌之后续部队。第六十六军向古辣、甘棠附近出发，从永淳、南乡间渡河，

对邕、钦路以东地区袭击敌人，遮断其交通通讯，并阻敌增援部队北上。

七、各路军之作战地境如此（略）。

八、第九十九军主力为战略预备队，位于宾阳、古辣附近。

九、炮兵主力于思陇附近占领阵地，协力北路军对昆仑关之攻击，一部分于双桥附近，协力高峰隘之攻击，尔后于攻略南宁时集中全部火力，协力北路军对南宁之攻击。

当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召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场设在茂密树林中的山洞里，洞壁上挂着桂南地区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图上标示着敌我双方目前的态势。

杜聿明的第五军，源于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的中国军队第一支陆军装甲兵团。在淞沪会战中，装甲兵团两个连的战车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成功阻击了企图登陆的日军。而在之后的南京保卫战中，杜聿明装甲兵团的战车几乎全部损失。一九三八年，随着中国进口武器装备的增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扩编装甲兵团为第二〇〇师，这是中国军队的第一支机械化陆军师，全师兵力约两万人，以杜聿明为师长、邱清泉为副师长，廖耀湘为参谋长。这一年的年底，第二〇〇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不久，新编第十一军番号改为第五军。第五军下辖：由装甲兵团扩充的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部队驻扎广西全州；由抗战伤愈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部队驻扎湖南零陵；由新兵组成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部队驻扎湖南东安。再次扩编后的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有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团、重炮团和辎重团各一个，全军兵力约五万余人，是中国陆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此刻，杜聿明的作战计划是："我军以收复南宁为目的。决于十八日拂晓开始攻击，先行击破昆仑关、八塘附近之敌。以主力由公路两侧及其西南地区向昆仑关、八塘包围攻击，以一部迂回八塘敌阵地之右侧背，重点保持公路西侧，将敌压迫于七塘附近地区而歼灭之。"具体作战部署是：以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主攻；第二〇〇师为总预备队，支援荣誉第一师的正面战斗；新编第二十二师从右翼迂回，向五塘和六塘守敌发起攻击，以截断南宁与昆仑关间的公路桥梁，孤立昆仑关，使郑洞国、戴安澜两师放胆作战；第二〇〇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领两个补充团为

左翼，进占七塘和八塘，策应正面攻击部队的行动；军直属重炮团、战车团、装甲搜索团和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作战；军汽车团和辎重团担任粮弹运输和伤员后送任务。

十七日夜，杜聿明赶赴位于昆仑关附近的第五军战斗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一个名为高大岭的制高点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昆仑关战场全貌。

昆仑关，重峦叠嶂，奇峰耸立。

从南宁向北有两条公路，一条从南宁往北通向武鸣，在这条路上距南宁约二十公里处，是隘口高峰隘；另一条是向南宁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邕宾公路，为南宁通往桂北的主要通道，沿途散落在公路边的村庄，以数字排列的一连串“塘”字命名，从“二塘”一直到“九塘”，九塘再往北就是著名隘口昆仑关。在邕宾公路上，从八塘向北直到宾阳县是一条崎岖的山路，唐宋以来称之为“昆仑古道”。其中，距南宁约五十公里的昆仑关，雄踞于古道中央，关口两山夹立，东面是六五三高地，西面是四四五和四四一高地，关隘险峻，易守难攻。日军占领南宁后，如要确保南宁，首先须保昆仑关。

此时，凭险据守昆仑关的，是日军第五师团的第五骑兵联队和第二十一联队的第三大队（森本大队）。

杜聿明的第五军将承担夺取昆仑关的任务。

日本陆军和中国陆军中最强悍的部队，将在广西腹地的一个隘口撞击在一起。

十二月十八日，昆仑关之战正式开始。

凌晨一时，第五军的重炮和山炮集中火力向驻守昆仑关的日军开始了猛烈炮击。日军在沉寂片刻后，也开始以炮火还击，双方的炮战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日军的炮火最终被第五军的重炮火力所压制。接着，第一线的荣誉第一师和第二〇〇师官兵向日军的阵地发起冲击。日军无法抵挡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和步兵冲击，前沿很快被中国官兵突破。荣誉第一师大多是老兵，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其一团在团长吴啸亚的率领下，先后攻占昆仑关外围的仙女山、老毛岭、四一一等高地；二团在团长汪波的率领下占领罗塘高地。第二〇〇师五九八团在团长高吉人的率领下，攻占六〇〇和六五三高地；五九九团在团长柳树人的率领下，随同战车部队沿着邕宾公路逼近昆仑关。与此同时，第五军的两翼

迂回部队也相继占领了五塘和六塘。

中国军队对昆仑关的猛攻，令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三木吉之助，率领联队部以及一个骑兵分队、两个半步兵大队和机枪、炮兵中队，从南宁乘坐三十一辆汽车火速赶往昆仑关。一路上，三木部队强力突破中国幸队的层层阻击，于三个小时后抵达九塘。但是，后尾的第二大队以及补给部队没能跟上，在六塘与七塘之间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

三木吉之助此时还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令他终生难忘。

当夜，日军增援部队从九塘出发，向昆仑关攻击前进。

十九日拂晓，三木吉之助突然发现，他的处境十分不妙。

在高峰隘方向，中国军队正向他的侧后迂回；而在眼前，沿着邕宾公路两侧，中国军队四处出击，已将公路截成了数段。他的部队不但被割裂在数段公路上，关键是他们的后路已经没有了。

有五六千重庆军占据着三面高地，居高临下钳制着我军，敌从两翼高地逐步压缩包围圈，并用战车冲进中央公路。左侧第一线的第一大队勇敢战斗，夺取了标高四四五东侧的高地，以后就和敌人在三四十米的距离对峙着。右侧第一线的松本大队，一面放着催泪弹一面与来敌展开肉搏白刃战，反复争夺阵地。我军的攻击受到挫折，并开始感到弹药缺乏。更不幸的是，那天后方联络线也被切断。联队从南宁出发时，第二大队和联队炮、速射炮的弹药等因车辆不足随后追赶，今晨被优势敌人阻拦在六塘以西两公里的地方。六塘至七塘之间的桥梁也在今晨被重庆军烧毁。警备七塘的小队已被二三百重庆军包围着，翌二十日，随后赶来的第十二中队也在五塘附近被六百名敌人阻住。这样一来，在攻击的头一天，联队即在突出在南宁五十公里以外的昆仑关，完全被孤立起来。

十九日，围绕着昆仑关主战场，双方陷入混战中。

新编第二十二师占领五塘和六塘后，在五塘附近拼死阻击北援的日军，五塘失守后又退到六塘死守不退。第二〇〇师迂回部队控制着七塘和八塘。而在昆仑关战场，荣誉第一师三团在左翼向可以俯瞰昆仑关的高地猛攻，日军据守顽抗，三团伤亡惨重。关键时刻，连长杨朝宣和排长杨明率领一支突击队，携带刺刀和手榴弹冒死冲入日军阵地，与日军

展开了血腥的肉搏，终将高地上的日军大部歼灭，控制了这个制高点。在昆仑关口，双方反复拉锯，阵地数次易手，中国军队的炮火依旧猛烈，日军的补给被完全截断，只能靠空投弹药维持作战。

与此同时，白崇禧部署的西路军在高峰隘方向，与从南宁出动的日军第四十二联队陷入血战；东路军则在日军后方的钦县、小董、大塘、蒲庙等地频频出击，大量地牵制着日军。

二十日，因荣誉第一师连日作战，伤亡巨大，杜聿明命第二〇〇师接替荣誉第一师的部分阵地。凌晨，荣誉第一师的一团和二团从老毛岭和四四一高地出击，与二团一起夹击八塘和九塘的日军；第二〇〇师则从仙女山、六五三高地方向联合攻击昆仑关。中国军队的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步兵也从三面逼近，但日军骑兵第五联队和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实施反击，中国军队因立足不稳又退了回来。

这天，鉴于昆仑关的严重危机，今村均命令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率领两个大队组成中村支队，从南宁出发向昆仑关方向突击。但是，中村支队刚刚走到五塘，便受到中国军队山炮和迫击炮的猛烈阻击。中村支队停下来，就地反击，于下午三时才继续推进，可没走一会，又遭遇据守在公路两侧的中国军队居高临下的打击。自此，中村支队的增援行动陷于“极尽艰难”中。

二十一日，昆仑关日军开始面临粮弹匮乏的困境。

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在逐渐缩小。

下午，中国空军的十架战机飞临六塘上空，对日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六架战机在九塘上空，向日军阵地投下了炸弹。晚上，荣誉第一师在战车和重炮的配合下，再次向昆仑关北端的日军阵地实施突击，日军弹药耗尽，不得不“用刺刀和竹子做的扎枪战斗”。——昆仑关北端阵地遂被荣誉第一师攻破。

晚上九时三十分，三木联队长向前来增援的中村旅团长发出电报：

本日午后起，本部队在九塘附近遭到敌之包围攻击，现以一个小队作为预备队固守九塘。在各种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决心依靠刺刀消灭敌人。

然后，他又给师团参谋长玉置温和打去电报：

九塘前线的桥梁已被破坏，希将弹药直接投在第一线。

二十二日，昆仑关的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中国军队的攻击，随时可能因为从南宁增援而来的日军的抵达而前功尽弃，杜聿明焦急万分。他认为，除了低估了日军的顽强之外，第五军攻击正面过宽、兵力不集中，步炮协同不好以及在攻击中没有拔除日军在昆仑关两侧的坚固据点，致使直接攻击关口时部队在日军的交叉火力下难以立足等，都是致使战斗陷入僵局的原因。杜聿明决定改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拔掉昆仑关两侧的日军据点，然后再一举攻关。

昆仑关两侧日军的重要据点之一是罗塘高地。

杜聿明命令荣誉第一师对该高地实施攻击，由第二〇〇师进行佯攻掩护。

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命令一团主攻，三团连夜从右翼袭击九塘的日军阵地，对昆仑关作战术包围。

罗塘高地是昆仑关西北面重要的支撑点，日军第一二一联队的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多人，配备着十余挺重机枪和数门迫击炮固守其上，而在附近小高地上的日军还可以对他们提供火力支援。

二十三日傍晚，一团团长吴啸亚执行了攻击命令。但是，该团一直打到后半夜也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杜聿明彻夜不眠，不断地询问攻击情况，蒋介石也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郑洞国的指挥部，可直到二十四日天亮，罗塘依旧在日军手中。

在中国军队不间断的攻击下，昆仑关的日军逐渐处境悲惨：携带的干粮已经吃尽，空投的食品根本落不到狭窄的阵地上，官兵们开始生吞稻田里的稻谷、树叶和草根。阵地上遍布着尸体，活着的也衣衫褴褛，大多仅剩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比食品更为重要的弹药所剩无几，迫击炮中队因为炮弹没有了，只好把炮埋在地里藏起来，然后和步兵一起砍竹子削成扎枪当刺刀使。阵地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氛。三木联队长命令烧掉军旗，但就在收军旗的时候，又有几发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落在军旗边，死者的残肢到处散落，伤者在大声地呼号。此时的三木部队已经战死近百人，其中包括十名军官，负伤者近三百人。下午时三十分，三木联队长又给中村旅团长发去了电报：“傍晚前旅团若来不

到，第一线难以确保。”尽管中村回电称，今晚一定突击前进与木会合，但三木还是感到联队的末日近在眼前。

三木不知道的是，中村正雄比他更早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末日，他在距离七塘西北两公里处中弹负伤，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颊穿了过去。满脸鲜血令他视野一片模糊。

第五师团今村均师团长手上已无兵可调，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盐田定七提出，他可以再派部队增援昆仑关。但今村均知道，中国军队的兵力实在太大，即使勉强再派出几个中队，也很难转变大局。事到如今，他只能苦盼着远在中越边境的及川支队能够回到南宁，尽管命令他们返回的指令十九日就发出了，但现在还没见其踪影。

及川支队奉命前往中越边境的龙州和镇南关，是去抢东西的。第五师团占领南宁后，今村均得知中国方面在龙州和镇南关储存了从越南口岸进口的大量军需品，这些物资堆积如山，却没有多少中国军队护卫，因此立即命令及川支队长向中越边境急速开进。——今村均下达这一命令的时候，已得到中国军队即将反击南宁的情报，但是他不相信。及川支队派出一支小部队奇袭镇南关，主力则向龙州攻击前进。二十一日，刚刚占领龙州，就接到师团长让他们立即返回的命令，于是，及川源七命令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乘坐一百多辆汽车火速往回赶。但是，车队行驶到南宁西面约六十公里处，突然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及川源七接到的报告是该大队“因疲劳过度陷于死守阵地的苦战中”。师团命令支队即刻返回南宁的电报再次到达，及川源七陷入矛盾之中，因为他已在中越边境搜索到了中国方面囤积的军用物资：“汽车约一百辆、汽油及重油五十八万加仑、电解铜及铁棍各二千根、铅一百八十吨、锡六点八吨、钨钢约一吨、步枪三百五十九支、重工业材料三十二捆以及大量火药、弹药和被服。”大量的物资没有时间搬运了，及川源七命令把它们“就地烧掉或抛到河里”，然后以急行军的速度返回南宁。

此时的昆仑关已经岌岌可危。

十四日，连日鏖战的一团已损失很大，兵力仅存两个营。荣誉第师师长郑洞国命令二团接替一团，继续对罗塘实施攻击。荣誉第一师将炮兵观察所推进到从日军手里夺取的第一线高地上，然后集中起所有的重炮及十三毫米以上的火炮猛轰罗塘高地，团长汪波命令一营官兵组成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罗塘高地发起冲锋：

我军排长喻国强中弹负伤，卧在血泊中坚持指挥战斗，后见另一名排长陆谨卿率队前来增援，勇气倍增，手持大刀一柄，振臂高呼“兄弟们！杀呀！”与陆排长并肩率先冲锋，奋力劈开敌阵前沿的铁丝网，后续官兵一拥而上，突入敌阵，与敌展开激烈肉搏。我军另一连指导员李高荫，在其连排长相继负伤后，自动督率全连官兵向敌突击，最后壮烈殉国。

日本战史对于此战——日军将罗塘高地称为“田村山”，因其罗塘守军中队长名叫田村能康——有惨烈的描述：

在我左翼的据点田村山方面，薄暮中重庆军在大炮集中轰击掩护下，一千数百人步步包围靠近。下午八时左右，在一阵纷乱的手榴弹的掩护下，突入我方阵地。守军也以手榴弹还击，但很快就弹尽。彼我进入混战状态，展开了壮烈的白刃战。混战中，第五中队长田村能康中尉首先战死；接着第一中队长迫田广一大尉也失去了双眼。剩下的三十八人用尽全力前后左右应战，但寡不敌众，终于一个个倒下，山顶被敌人占据，时间是二十四日下午十时。第五中队自十二月十九日一时三十分占领该地以来，至少有一个师的敌人三面包围之，虽在敌人各种炮火凌厉的攻击下，仍击退敌人前后不下二十余次的进攻，最后一卒不剩全部战殁。

此时，向昆仑关增援的中村支队经过拼死突击终于抵达九塘。但是，刚刚抵达九塘的中村正雄再次中弹，这一次子弹贯穿了他的腹部。卫生队在九塘附近的一间民房内为他实施紧急手术，手术刚开始，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就落了下来。炮弹是荣誉第一师三团打来的。第三团奉命迂回九塘，团长郑庭笈发现九塘公路边的草地上有日军军官在集合讲话，于是命令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向日军开火。炮弹落在正在实施手术的民房屋顶上——“执刀进行手术的军医马上以胳臂和身子盖住打开的腹部……到翌二十五日五时十八分，中村少将终于死去。”

中村正雄，日本石川县人，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五期步兵科。一九三六年任日本陆军第十二师团参谋长，在中国东北地区与抗日联军作战。一九三八年回国任参谋本部通信课课长。一九三九年三月晋升为陆军少将，出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

就在日军因中村正雄的死茫然无措时，昆仑关上空出现了中国战机。中国战机刚一出现的时候，日军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来空投了，急忙在地面上铺设对空联络板，但即刻数架中国轰炸机俯冲而下，由于有对

空联络板的指引，投下的炸弹全部命中目标，日军伤亡惨重。

中国空军尽管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援地面作战，但还是尽力派出战机飞到昆仑关上空轰炸和扫射。在日军进攻南宁时，驻防柳州机场的中国空军只有一些地勤人员，仅有的飞行员都被派到兰州担任教官去了。应白崇禧的请求，中国空军开始向广西集结飞机，但因天气恶劣和协调不力，直到十二月初才集结了少量飞机，担任对衡阳和柳州机场的保卫。尽管如此，中国飞行员还是数次飞临昆仑关上空，不但轰炸和扫射日军阵地，甚至还击落了一架日军战机。广西空军没有几架战机，由广西航校飞行教导队改编的中国空军第三十二驱逐机大队，能够参战的飞机仅有两架，但副大队长陈瑞钿和中队长韦一青还是应昆仑关前线指挥部的请求驾机前往助战。他们知道，只要飞到那里，让地面苦战的官兵看见，就是死了也值得。在昆仑关上空，两人驾驶的战机遭到大批日机的围攻，相继中弹起火，陈瑞钿副大队长迫降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人已昏迷，面部被严重灼伤，因为他是从美国志愿回国参战的华侨，后被送回美国治疗。韦一青的座机中弹后坠落，机毁人亡，地面上的中国官兵拼死抢回遗骸，并派专人护送回柳州，柳州军民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十二月二十五日夜，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第二中队在中队长足立半的率领下，终于冲进昆仑关日军固守的阵地，并带来了机枪子弹六万发、步枪子弹四万发，几近绝望的三木部队犹如绝境逢生。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由于连战数天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昆仑关第一线的战斗趋于缓和。

但是，日军依旧在向昆仑关顽强地增援：由南宁向昆仑关增援的台湾混成旅团第二联队，突破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的阻击，两千名日军进至昆仑关后，向四一一高地发起猛烈反击并夺取了该高地；另一部日军也突破了新编第二十二师的阻击，开始向六塘、七塘与八塘之间渗入；第四十二联队长坂部队用了六天的时间推进到九塘。

面对严重的情况，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变更了部署：

一、第三十八集团军，指挥第五军及配属之特种部队，仍对昆仑关附近敌据点攻略。

二、第三十七集团军，指挥第六十六军（第一五九师、第六〇师）

及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九师、第一一八师），任八塘以南敌后方交通线之截断，阻止增援之敌，策应第三十八集团军方面之作战。第六十六军以一部攻略昆仑关以东敌据点，另以一部配置于九塘、八塘附近，确实遮断交通，主力控制于富兴村，乘敌增援部队进入而击破之。该军各部队，限明（二十九）日以前集结完毕。第九十九军以一部守备伶俐附近，主力确保和群村、山心、高山岭之线，并攻击七塘，遮断敌后方交通。

三、第十六集团军之第一纵队（由第一三五师及第一七〇师组成），着于现占领之线，迅速构筑阵地，并准备如敌攻击时，配合战车以行出击，另派一部构筑黄墟附近阵地。

根据桂林行营的部署，为进一步收缩兵力，集中攻击昆仑关四周重要据点，杜聿明也调整了部署：将六塘和八塘附近的新编第二十二师等部队调回，充当第五军的总预备队；命令新增援上来的第一五九师接替第二〇〇师在六五三、六〇〇等高地的防务；命令第二〇〇师配属军补充第一团、山炮一连、战车一连和新编第二十二师的迫击炮连，在罗塘南端同兴北侧至界首北侧一线展开，并逐次向昆仑关四周各要点实施攻击；荣誉第一师占领仙女山和老毛岭一线，策应第二〇〇师的进攻，同时严令荣誉第一师务必把四一一高地攻下来并固守。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笼罩着悲观情绪的广州第二十一军司令部里，大本营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一行因担心第五师团而来访。”接着，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命令：第五师团从昆仑关撤退，将兵力收缩到三塘与四塘之间，全线采取守势。

但是，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对这个命令予以“断然拒绝”：

目前各个据点的部队被敌军的两层、三层包围着，这时候命令他们后退到南宁附近，在那里构筑防御阵地，等于给我全体官兵增加战败情绪，相反地助长敌人的锐气，形成一种无法收拾的支离破碎的局面。那才是欲掩护军的集中而不能。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从现在的九塘附近撤兵，都挤在靠近南宁的这一小块地区，那么敌人就会把对付我师团的全部兵力拿出一部分或分出一半去钦县附近，以很大的兵力对付军的主力登陆。如果军决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那么，师团考虑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进行抗战，牵制住敌人的兵力，使他不能将全部或大部兵力向其他方面转移，所以方才副参谋长佐藤在图上划出的撤退线，纵属命令，但实在无法服从。

日军第二十一军在地图上划出的撤退线，位于三塘与四塘之间。

今村均的决定是亲自率队反击。

他给昆仑关前线的日军发出了一封信：

一、在广东方面的主决战（指翁英方面作战），敌人从昨（二十七日）开始退却，我全军正转向追击。

二、你们方面的激战，由于大家的奋斗，使敌遗尸合计已接近万具，这一重大胜利已向国内详细报告。

三、敌人的士气逐渐衰退，内部斗争又起，武鸣方面之敌自己相互对打就是一例。

四、诸位的父兄和全体国民根据兵团的报告都在注视着你们的战场，以内心感谢诸位，恳切希望皇军的荣誉永放光辉。

五、祝大家保持坚如铁石的意志，继续奋斗。

六、自三十日起还将有有力的飞行员们来上空相助，并尽最大的努力补给弹药和粮食。

二十九日，杜聿明的第五军以全力向昆仑关发起猛攻，荣誉第一师一团攻击四一一高地，曾几度冲上主峰，又被日军反击下来，双方在主峰两侧反复肉搏，形成拉锯状态。昆仑关东北的界首高地，是支撑昆仑关主阵地的重要据点，山势陡峭，高地的东西两侧都可俯瞰昆仑关，拿不下来中国军队就无法立足。戴安澜指挥的第二〇〇师在争夺界首高地的战斗中受挫，杜聿明命令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将三团郑庭笈部调归戴安澜指挥，说拿不下界首高地军法论处。郑团长在接受任务后表示：如果还拿不下高地，不用军长杀头，我自己自杀。

荣誉第一师三团官兵冒着日军的火力网向陡峭的山头顽强攻击，数批爆破日军火力点的爆破手相继阵亡，该团九个步兵连中的七名连长伤亡。天色暗下来时，郑庭笈团长组织起一支敢死队，敢死队分组悄悄向山上爬，埋伏在日军阵地的面前，当主力部队重新组织进攻时，敢死队队员一跃而起跳进日军的战壕，残酷的肉搏战持续了三小时，主力终于冲上了高地。界首高地的日军守军由第四十二联队第五、第七两个中队的官兵混杂而成，但加起来兵力不足一个混成小队。这些日军在这里死

守了十二天，全部战死后，高地终被中国军队占领。

界首高地的失去，使昆仑关的日军失去了支撑屏障。

三十日，杜聿明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超越第二〇〇师，向昆仑关主阵地冲击。三十一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官兵冲上昆仑关，日军残敌退往九塘。

此时，日军与荣誉第一师一团在昆仑关西南面的四一一高地的拉锯战仍在继续。昆仑关失守后，日军为掩护撤退，协同航空兵向四一一高地实施猛烈反攻。荣誉第一师一团死守髙地和附近的几个山头不退，残酷的拉锯战中，一连连长张咸顺、三连连长刘世昌和六连连长溶开先后阵亡，五连连长王延安双腿被打断身负重伤。士兵伤亡更为惨重，每个连队已经不足二十人。当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再次猛攻四一一高地时，师长郑洞国把全师最后的预备队——二团一部——派了上去。此时的二团，苦战通宵后仅存官兵不足三百人。日军调来毒气部队，中国官兵中毒者甚多，二团团长请求撤退，郑洞国严厉地说丢了阵地就砍他的头。郑洞国把荣誉第一师师部特务连和传令兵、伙夫等勤杂人员集中起来，共有一百八十多人，组成了最后的突击队。这支杂牌突击队绕到日军阵地的背后，突然大喊着发起冲锋，二团团长也同时率领残存的官兵奋力冲锋，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彻底崩溃，仓皇奔逃，四一一高地最终得以稳固。

郑洞国师长和舒适存参谋长爬上了四一一高地：

双目所及，但见主峰及附近各山头上弹坑累累，子弹壳、炮弹壳、手榴弹木柄、破损的枪械比比皆是，草地树木悉被焚烧，无一块完好之地，双方许多阵亡官兵的尸体散卧其间。高地北侧，是我军最后据守的阵地，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棱线两侧敌我死伤枕藉，双方阵亡官兵交错卧在血泊中，几无法插足。沿着高地北侧前行，仅几十公尺距离内，我军阵亡将士的遗体就有近百具。据汪团长介绍，这些烈士是在向敌人反冲击时先后倒下的。有不少烈士虽已停止了呼吸，但还怒目圆睁，身躯保持着向敌冲杀、投弹的姿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个子士兵，他的左腿已经断了，身上几处弹伤刀痕，军衣浸满紫褐色的血迹，但一双粗壮的大手却死死钳住一个日军士兵的喉咙，将其压在身下。显然，这位烈士是负伤之后又与敌人肉搏牺牲的。目睹此悲壮情景，连我这个久经战场的军人，也不禁落下热泪。

没人知道郑师长所说的那个“大个子士兵”的姓名，也没人知道他年龄几许家乡何处，只有那双“粗壮的大手”或许能表明他曾是个在田间辛苦劳作的青年农民。

昆仑关一战，是抗战中国首次赢得的对日攻坚作战的胜利。

为此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军负伤官兵一万一千一百人，阵亡官兵约五千六百人，失踪（生死不明）士兵约八百人；第六十六军及第九十九军负伤官兵约六千二百人，阵亡官兵五千零七十九人，失踪士兵约五百六十人。

日本陆军第五师团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在九塘附近的作战中，日军参战二千八百五十一人，死伤一千一百三十一人。伤亡率已高达百分之四十。

中国军队攻占昆仑关后，在九塘与八塘之间与日军形成对峙。此时，日本第二十一军正以第十八、第一〇四师团在广东北部作战，目标是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韶关。由于广西的第五师团吃紧，安藤利吉决定把兵力集中到广西方向。中国军队攻占昆仑关不久，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前后，日军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分别抵达南宁以南以及七塘附近，这使得日军在桂南的兵力达到七万人之多。日军制订了反攻昆仑关的计划：以第五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向昆仑关反攻；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迂回宾阳，切断昆仑关一带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和退路。

中国方面仍旧在准备攻占南宁，为此调集的部队达十五万人。

二十六日，日军开始反攻。

此时，中国军队调集的后续部队还有八个师尚未到达指定地点。

在日军强大的攻击面前，中国军队陷入混乱。

二月二日南宁以东的宾阳陷落，三日日军再占昆仑关，八日南宁以北的武鸣陷落。

尽管日军兵力强大，但战线太长，后方空虚，自九日开始不得不尽量收缩。中国军队跟踪推进，又把昆仑关夺了回来，并与日军在七塘与八塘之间再次形成对峙。

为了巩固南宁，二月九日，日军大本营撤销了陆军第二十一军编制，组成华南方面军，统辖两广南部的日军。日军第五师团、近卫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被混编成第二十二军，负责防护南宁。

桂南会战开始之时，中国方面没能预料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导致那里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会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援军一个月后才陆续抵达战场，导致南宁轻易落入日军之手，随后中国军队为夺取昆仑关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是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战略上的一大失误。

战后，蒋介石承担了责任：

自湘北会战后，我已成主动地位，曾于南岳会议说过，我当时判断敌人绝不攻南宁，因此将桂南部队调粤西江，而将西江部队移粤北，此当然我负责任，我很惭愧，故北海防务松懈。孙子所谓：毋恃其不来，恃我有所备也。失去了此原则，故而判断错误，此为最大错误。

南宁丢失之后，中国方面调集了多达十五个师，特别是把唯一的机械化军投入作战，并把残破的空军也拉进了会战，足见其夺回南宁的决心之大。二十多天的昆仑关攻坚战，中国军队官兵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以极大的牺牲重创了日军第五师团，其胜利的意义绝不仅在于攻占要点，而在于在精神上挫伤了日军的士气，也让日军大本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仍有着坚强的抗战意志和足以对抗日军的作战力量。但是，中国方面反攻南宁的作战计划没能实现。特别是在日军第二十一军把广东方面的部队调至广西大举反攻昆仑关时，中国方面对此估计不足，没有命令广东的部队乘机猛击日军侧后，这不但再次暴露出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战略全局谋划上的弱点，也再次暴露出中国军队相互没有协同只会各自为战乃至只求自保的顽疾。实际上，日军大举反攻的行动，都集中在昆仑关以东，高峰隘以西地区兵力空虚，如果中国第四战区乘虚大胆直趋南宁，不但可以迅速消减日军对昆仑关的反攻，如果行动果敢坚决还可以造成重占南宁之势。可惜，第四战区将领不敢大胆作战，反应消极迟缓，致使战机令人遗憾地错失了。另外，日军迂回昆仑关侧后宾阳的行动，无论桂林行营还是第四战区都没有料到，致使日军突击部队如人无人之境，造成了正面部队虽仍在抵抗日军的进攻但后路已断，结果全盘陷入混乱。蒋介石对此极度不满，随即宣布了一系列处分名单：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前来第四战区指导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押法办；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第六十六军军长陈骥和第九十九军军长傅仲芳，以及第三十六军参谋长郭肃、第四

十九师师长李精一、第一六〇师师长宋士台等撤职查办。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在历次会战中高级将领被处分人数最多的一次。

将领们接受的是处分，数万士兵付出的是生命。

一九三九年年底，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国内的来访者那里听到了一些日本国内的情况，令他“很不愉快”：

一、农村一般比较紧张，但大城市中看不到战时的紧张情况。百货店、娱乐场所、花街柳巷等，反而繁荣起来。

二、由于经济统制及物价统制，国民生活相当穷困。但黑市猖獗，贪图私利的奸商到处横行。

三、战争已两年有半，财界及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厌战情绪逐渐浓厚，怀疑当局解决事变的能力，结合诺门坎战败的摇言，反陆军的风潮逐渐抬头。

四、国民精神动员未获成果。国民本身自主的团结运动也未兴起。不少人非难政府：“由于政府不把事实真相告诉国民，因而国民无法与政府合作。”

五、欧洲大战爆发后的对外政策，表面上还处于原来状态，但从内部动向来看，则有主张与英美接近的传统派，有主张与苏联结合解决中日事变的一派，有主张与德、意轴心合并的一派等，各派对立，意见不一。

六、各界特别是政界，缺乏卓越人物，在内外形势紧迫下，缺乏定见。对现在和将来抱悲观态度者甚多。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告诉中国军队的将领们，“横行无忌”的日军已到“不能安寝之时”，中国的抗战一定要“持久到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正气伸张之日，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我们这次抗战，一方面在求中国之独立自由与平等，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国际信义与确立永久和平。我们认定中日问题，实在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现在欧战已起，而我们抗战转胜，东亚西欧的两大战争，已经连接起来，可以说我们第一步目的，已完全实现……此后第二步目标，就是争取最后

的胜利，就是要勇猛坚定地抗战下去，以承接欧战结束的新局势。因此，我们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如此，才可以彻底解决远东问题，才能获得永久和平……我们的抗战，就是要持久到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正气伸张之日……如其不然，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与日本妥协讲和，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这是我们抗战一贯的方针和最大的政策……本次方针与政策，在各前线坚忍奋斗，愈战愈劲，不问国际形势如何变迁，不管抗战环境如何困难，只是埋头努力，一意作战，用最大的铜力，和敌人拼下去！以尽我们对国家和世界一贯的使命。要知道抗战到了今天，我们最后光荣伟大的胜利，必有完满达成的一日，这已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了！

一九三九年即将过去，尽管战争还要持续相当漫长的时间，乃至要持续到世界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但抗战中国仍然要“用最大的韧力，和敌人拼下去”，直至获得最后胜利。

第二十一章

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

一九四〇年元旦，蒋介石广播训词：

我们中国物质文明比较落后，又适当这个艰难困苦的大时代，抗战建国的两大事业都要在这个时期一并完成，真是五千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严重时代……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整个国家民族兴衰存亡最大关头的今日，每一个人有一份良知良能，都要用来为国家尽忠，为民族祖先尽孝，大家应该如古人所说的“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发挥我们忠孝的伟大力量，突破这个生死关头，以必死的决心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把个人的全部时间精力一切智能乃至生命，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经有了精神，一分物质可以作十分物质使用，而且可以运用精神的力量，创造许多新的物质，自然可以把我们抗战建国的力量无限地增强。可是大家应该反躬自省，是不是我们已经确立了三民主义一致的信仰？是不是已经实行了救国的道德？是不是已经认定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而达到全国上下绝对统一的程度？是不是已经每一个人的精神力量都能尽量提高使用，使一切的艰难困乏都有方法来克服？是不是已经立定了舍生取义的决心与临难无避的觉悟？……总而言之，精神总动员是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抗战成败的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的完成纯然需要每个人能够实事求是、以身作则去实践，才能够得到效果。现在我们胜利的基础已经确立，问题就在我们能不能做到“确实”和“力行”两句话……我愿与国人共勉，以完成这一件大事，来纪念民国缔造的艰难，来告慰创造民国的先烈，以及抗战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在天之灵……

中国的国民精神是一个老问题。

蒋介石的话音刚落，中国的南北汉奸便在南京集合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经过一年多的密谋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导演下在南京成立。这天清晨，满目疮痍的南京城内，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悬挂起汪精卫伪政权的旗帜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上挂着一条黄色三角条，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分别使用了楷书、隶书、行书和草书，看上去无论如何是世界

上最为古怪的“国旗”。

为建立伪政权并“还都”南京，汪精卫可谓费尽周折。侥幸躲过军统特务的暗杀后，汪精卫准备离开河内前往上海，大批换上西装的日本军人奉命一路护送。汪精卫既想与日本人合作，又想力避卖国之嫌，于是拒绝乘坐日本人准备的“北光丸”号轮船，特意租用了一条只有七百六十吨的法国小货轮。可是，这艘法国小货轮没走多远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最后还是被载重量五千五百吨的“北光丸”号营救。到了上海，为安全起见，汪精卫直接住进了戒备森严的土肥原贤二公馆。这时候，汪精卫才发现，日本人只是把他视为一个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根本没有支持他建立伪政权的意愿。

时间进入一九三九年后，日本方面终于意识到，战争已经转变为他们最不想见到的长期态势，为此不得不调整指导对华战争的准则，其核心内容是：现地兵团保持长期持久的自给，在所有占领区获取各种所需资源，利用一切机会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对扶植的各地政权不予“特殊的独立性”——“中国将来的政治形态，可采取分治合作制”。日本人并不认为汪精卫有让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影响力。汪精卫急切地向日本人表达他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具备兵力的“和平政府”。他告诉日本人只有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才能达成中国与日本的“精诚合作”。与出逃重庆前和日本人达成的协议不同的是，那时汪精卫计划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也就是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成立一个与重庆国民政府抗衡的“新政府”；而眼下他准备把“和平政府”建立在日军占领区，亦即他的“和平政府”将是与华北、华中伪政权一模一样的汉奸政府。汪精卫的投怀送抱，并非日本人之最想——“从实际上看，今后要树立的中央政权，可以设想为以下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如统帅部期望的那样，成功地瓦解重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重庆政府合并过来，由此成立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唯一的中央政权，与之进行交涉，逐步将日本军的地位移让给中国军。第二个类型是新政府没有把重庆政府合并过来，可以预想这时新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出现对立状态。从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央政府处在日本强有力的指导下，变成一种傀儡政权，事变就得不到真正解决。万一遇到了这样的事态，在陆军方面，比树立政权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大规模持久战的决心。”日本人的根本初衷，还是让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或是屈服，或是垮台，或是瓦解。三年的战争已经证明，只要国民政府还在领导中国抗战，只要国民政府还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同一个抗日阵营中，日本人就必须负担在中国战场上的持久作战。所以，日本人的希望是，由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实力并能影

响中国军队将领的人组建“新政府”，这样才足以日渐消损乃至最终挤垮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只有亲自前往日本，与日本军政要员会晤磋商。汪精卫希望组建一个唯一的“中央政权”，为此，就须解散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扶植的“已设政府”。但是日本人强硬地表明：所有日军占领之地，汪精卫皆不能染指。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对汪精卫说：“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防卫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由于对南方国防上的必要，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但不能不考虑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二十天的交涉，除了面对日本人规定的种种限制，忍下日本人给予的种种屈辱外，汪精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汪精卫乘船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后，又开始与华北伪政权头目王克敏和上海伪政权头目梁鸿志等人见面，商讨组建“政府”事宜。为保存自己的势力地盘，各伪政权头目无不给汪精卫一张冷脸，华北的王克敏甚至公开宣布，他的“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为表明自己才是国民党的老资格首脑，汪精卫召集了一次“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搜罗了半天也凑不齐三百人的代表定数，只有把周佛海等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弄来充数。“代表大会”对外宣称“三天盛会”，实际上只浮皮潦草地开了半天。接着，汪精卫开始筹划建立伪中央党部，并与南北两个业已存在的伪政权展开明争暗斗。——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必须全心全意地投靠日本人，才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在接下来与日本方面的谈判中，几乎答应了所有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包括“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接受日本关于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国防上必须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对于日本人来说，终以条约的形式保障了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略；对于汪精卫来说，终以卖国为前提可以组建他的“中央政府”了。汪精卫彻头彻尾的投敌叛国，令他之前的亲信陶希圣和高宗武万分难堪。陶希圣慨叹：“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至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而高宗武的质疑是：“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百姓将何以安家？”陶希圣和高宗吾叛离汪精卫而去，然后将他与日本人的密约公之于众。

蒋介石说：“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身穿礼服，出现在南京原国民党考试院大礼堂的“还都”典礼现场。宣读《还都宣言》后，宣布他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伪行政院院长。接着，其他官员分别宣誓就职：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伪司法院院长温宗尧，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中国的南北汉奸混杂在一起，表演了近代史上最丑陋的一幕。

即使组建成立了中国又一个“国民政府”，汪精卫依旧没能获得日本人的真正重视。日本人看得很明白从本质上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已。”于是，汪精卫只有用毫无廉耻的卖国向主子献媚，而他的主子则借机同样毫无廉耻地对中国大肆攫取。汪伪政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与日本签订《基本关系条约》，条约的“所有条款都由日本单方面提出”，虽然汪日代表商谈了十五次，但日本人规定“原则性条款是不可更改的”。依据这一条约，日本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从中国获得广泛权益，中国完全沦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汪精卫甚至表示：“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完成战争行为的目的，应积极予以配合。”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带给中国的屈辱，其程度远远超过一九一四年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

印本人对《基本关系条约》很满意。于是，在日本的怂恿下，德国、意大利以及法西斯的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承认了汪伪政权。但是，汪伪政权成立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指出：“南京政权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美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国民的大多数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作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紧跟着，四月一日，英国和法国也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代表中国政府。

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公布了《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

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视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纲纪。此令。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讨汪大会，号召全国抗日民众把汪派分子从抗日队伍中彻底清除；并以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汪救国通电”：

汪逆登场，全国震愤。伏读国民参政会通电及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之演说，诛奸讨逆，大义凛然。德（朱德）等率部深入敌后，为保卫祖国而战，已历三年，深知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近日以来，敌伪所至各地，竟敢高揭伪青天白日旗，遍设伪军、伪党，号召和平反共。夫所谓和平即投降也，反共即灭华也，固已昭然若揭。然一部分丧心病狂之人，随声附和，亦复所在多有。欧战扩大，国际阴谋分子与敌伪沆瀣一气，企图建立东方所谓反共阵线，抗战危机，千钧一发。当此之时，国内少数不明大义之徒，或策动投降，或策动反共，而以反共为投降准备步骤。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倡言反共，汪精卫之覆辙，其证明也。故居今日而言，抗战之危机，实不在敌伪之猖狂，而在我抗战阵线内部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敌近在中条山脉附近，设置无线电广播，倡言国共即将分裂，中国即将内战，呜呼！是何言欤？夫敌之厚者我之薄，亲所痛者仇所快，德（朱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惟求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弭磨擦，反对内战，在我蒋委员长领导下，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坚持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以我中华土地之大，人口之众，乘敌寇衰竭之时，遇欧战方酣之会，如能加紧团结而不自坏其长城，再接再厉而不自丧其勇气，则抗战未有不胜，建国未有不成者。德（朱德）等不敏，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尚祈各界先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共救危亡，临电不胜屏营析祷之至！

令历史显得诡异的是，即使到了这时候，日本方面依旧对汪精卫将信将疑：“关于汪政权的性质问题，一直被一个问题纠缠着：是不是一个和蒋串通的阴谋？”日本方面不露声色的怀疑，源于一份不知真伪的秘密文件，即一九四〇年五月汪精卫写给重庆一位国民党要人的信。汪精卫在信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说中国武力取胜日本的可能性不大，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通过卧薪尝胆的策略达到令中国取胜的目的，亦即他是在“用外交手段进行抗日”。为什么中国武力取胜的可能性不大？汪精卫的理由是：“日本以万世一系之天皇及武士道精神，其人民勇敢善战而不畏死。”日本的民众思想简单，军人思想尤其简单。因此，思谋复杂的中国人与日本人进行武力对抗，“实为以我之短攻彼之长”。汪精卫在信中开列了一个“五年、十年足可打败日本，决用不了二

十年”的“抗战”计划：

一、第一步把满洲给日本，使之取消溥仪皇帝的名义，打下解散满洲国的基础；

二、第二步藉亲善的美名向日本青年灌输三民主义；

三、第三步使日本兴起革命，然后将其在华势力驱逐出去收回满洲，并光复台湾和高丽。

日本人了解中国人思谋之复杂：“由于这事情出在本来喜欢沿袭三国志传统的中国，所以这究竟是汪写的密信，还是哪个人出于谋略而搞出来的，没法知道。即便真是汪写的，它究竟是一种对日谋略，还是相反，出于对蒋谋略，也弄不清楚。”只是，有一点日本人很清楚，那就是汪精卫政权的出现，还是无法解决看不到尽头的战事，因此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其关注的重点还在重庆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密制订了一个“守势作战计划”。

所谓“守势”，就是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而是采取相应防御的态势。以军令部名义制订的《国军守势作战计划稿》，篇幅庞大，内容详尽，对每一个战区的战略要点都进行了部署，重点强调的是：首先要确保现有态势；其次要有利于日后作战；敌若有所行动，战区间须相互策应；兵力配备的重点在第五、第九战区——

第一战区：“以有力一部于豫东、豫北续行游击，主力保持现在之态势，不得已时，亦须确保南阳、临汝、巩县以西陇海沿线地区，依情况预行控置二个或三个师兵力于临汝及洛阳附近，支援河防，并确保豫西山地，联系第五战区左集团军击灭入侵之敌”。

第二战区：“积极实施广正面之游击战，尤应积极阻断正太、同蒲、白晋各铁路线及晋西各公路之敌交通，同时以有力各一部确保晋东南及中条并吕梁山脉地区，阻止敌之渡河及消耗敌人，并随时以主力策应第一、第十两战区之作战”。

第三战区：“以肃清钱塘江南岸及攻取沿江各据点为目的，预为所要之准备，妨害钱塘江大桥之修复，对京、沪、杭附近地区，加紧游击及交通之破坏。敌如渡江进犯时，以一部逐次抵抗，以主力侧击敌之右侧背，而包围歼灭之，并策应第五、第九两战区之作战”。

第四战区：一、“桂南我军，应以消耗敌兵力，并确保我西南新国际路线安全之目的，以有力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行局部之攻击，并加强截断邕钦路之交通，主力分别控置于后方整顿，迅行恢复战力，相机收复南宁”。二、“广州方面，第十二集团军，应确保现在之态势，不断袭击敌人。敌如深入时，以一部利用粤北山地，分数线扼守阵地，拒止敌人，以一部侧击尾击敌之侧背，主力适时出击，转移攻势，包围歼灭敌人”。

第五战区：一、长江上游江防方面——“江防军以确保宜昌、巩固中枢门户之目的，以一部配备于莲花市—沙洋—马良一线之前进阵地与第一、二中间阵地，以主力配备于杨林市—当阳之线之主阵地。如敌小规模进犯荆（荆门）、宜（宜昌）时，应以前进阵地与第一、二中间阵地之兵力，打破敌之企图。如敌真面目进犯宜昌时，应以一部就原有阵地逐次抵抗，主力迅就主阵地与敌决战”。二、第五战区对于江防军之策应作战——“第五战区应以一部控置钟荆路南北附近地区。如敌进犯宜昌，重点指向于沙河时，即以该部主力南下侧背，与江防军协力，压迫敌于江河湖沼地区而歼灭之。如敌强渡襄河向荆、宜进犯时，第五战区襄河东岸部队，应以一部向当面之敌进攻，并应亘战局之始终，以强有力部队南下侧击，以协力江防军作战。如敌在汉宜、京钟路集结兵力，企图进犯襄、宜时，第五战区应以鄂东部队之主力，亘战局之始终，积极向鄂东方面攻击，威胁汉口，并须截断平汉线，牵制敌之西进”。三、襄樊方面及鄂豫皖边区方面——“第五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豫南、鄂东、皖北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并消耗敌人。如敌进犯襄樊时，以一部行正面之拒止，以一部袭击敌之后方，确保襄樊南阳南北之线，以有力部队由右翼转移攻势，此时第一线以有力之一部侧击敌之右侧背，包围歼灭之”。第四，第五战区对第九战区之策应作战——“如敌真面目向第九战区进犯时，第五战区豫皖边区部队，应以一部挺进浠水江边，截断长江敌之交通，主力向黄陂方面佯动，威胁汉口，以牵制敌兵力之转用”。

第六战区：“应与第九战区协同，以击破南犯之敌，加强洞庭湖之封锁，控置主力于常德附近，并加强湘西之既设阵地，确保湘黔、潭宝、湘桂各路之安全。敌如沿长江西犯，或在洞庭湖西岸登陆，以策应其进攻宜昌之作战，应以有力之一部，向澧县公安地区侧击敌人，以策应第五战区之作战”。

第八战区：“应加强绥西五（五原）、临（临河）之守备，并控置有力部队于临河，及宁北、绥新公路附近，拒止敌之进犯，并相机协助第

二、第十两战区之作战”。

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任敌后方袭击及交通破坏，以一部配置于第一线，与敌保持接触，并加强既设阵地，以主力控置后方整理，确保修水、铜鼓、万载、浏阳、平江、长沙、株洲等据点。如敌由粤汉路及湘江两岸南犯，或由铜鼓、平江方面西侵，以一部逐行抵抗敌人，并袭击敌之侧背，主力适时进出于敌之侧背，转移攻势，以击灭敌人。敌主力进犯荆、宜，或进犯襄樊时，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之部队，迅速进出阳新、大冶及岳阳以北地区，截断长江，威胁武汉，以协同第五战区之作战”。

第十战区：“应与第二战区协力巩固黄河西岸防御，控制有力部队于华阴、大荔、郃阳各附近。敌如渡河西犯，则河防部队竭力阻止敌之渡河，主力适时进出，乘其半渡移转攻势而击破之”。

鲁苏战区：“应于鲁南及苏北建立游击根据地，展开广大游击战，指向重点于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制而消耗之，策应第一、第五及冀察战区之作战”。

冀察战区：“应于冀西太行山及冀中建立游击根据地，展开广大游击战，指向重点于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要线，尽量牵制敌人而消耗第二及鲁苏战区之作战”。

就在几个月前，国民政府军事高层普遍认为：日军已处于颓势，中国军队的反攻时机已到。在这种积极昂扬情绪的鼓舞下，中国方面发动了抗战爆发以来唯一的一次全面攻势作战，即一九三九年底的“冬季攻势”。但是，日军登陆钦州湾并攻占南宁后，不但“冬季攻势”不了了之，直到日本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遵循“敌不来，我不打”的原则，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战役规模的攻势作战。那么，国民政府的军事高层何以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毫无疑问，中国方面已经判断出，对日战争的走势是：即使不再主动进攻，日本也将自行垮台。

陷入对华消耗战中的侵华日军承认：“历经南宁苦战及冬季攻势的防御战，这在整个中国事变中成为陆军最暗淡的阶段。”三月十七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离职前，他对他的部下这样说：“唯一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上而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二万阵亡（战死

一万三千）、三万七千负伤之事，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大本营和政府的苦恼以及国民的焦虑心情，逐渐达到难以掩饰的地步。欧洲大战的爆发，乍一看好像是解决事变的时机，但实际上并没有立即导致局面的好转。汪兆铭单独政府的成立，结果使事变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而越发使人感到前途不容乐观”。

日本已成为一个难以支撑战争的贫穷国家。

“从昭和十四（一九三九）年秋天到十五（一九四〇）年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而且进入与美国之间无条约约束的时期，正在过着压抑的日子。中国事变使日本陷入泥潭已经三年，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而且平时那种政治、经济状况，也无法转入长期战争体制。”日本人所说的“压抑的日子”，实际上是饥饿的日子。除了因战争机器的开动导致工业扩大化生产，带来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从而使得国家黄金储备急剧下降以及政府财政十分拮据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没有大米吃了。工业需要电力，发电需要煤炭，日本本土几乎不产煤炭；日本本土虽生产大米，但不能满足日本人的吃饭问题，所以必须进口大米，多数大米是从殖民地掠夺来的，但更急需的煤炭也需要掠夺。日本内阁藏相樱内幸雄这样向国民解释为什么从一九四〇年起必须减少从朝鲜运进大米一千万石：“中国事变爆发以来，朝鲜的矿山、企业急剧扩大，过去生产大米而吃杂粮的农民转业的结果，也变成了以大米为主食。”无论樱内幸雄是否向国民隐瞒了国家财政窘迫的真相，但这一看似荒唐的理由还是有内在逻辑的：由于必须扩大朝鲜的煤矿生产，以满足日本国内的能源需求，大量的朝鲜农民变成了矿工，原来在田野吃杂粮或野菜就能活下去的农民，现在必须吃日本矿主提供的大米了。不让矿工们吃大米，就无法为日本提供发电的煤炭；大米让矿工们吃了，日本的国民就要挨饿。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以至于每次内阁开会，都要激烈地讨论到底是满足煤炭进口重要，还是应该首先解决大米问题。最后，新任首相米内光政决定：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大米。——仅这一项进口，就相当于日本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以致扩大工业生产的进口计划被完全打乱。

更严重的是，从中国北方主要产粮区掠夺的粮食也减少了，因为中国的华北地区正在遭受粮荒。华北伪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居然向日本人伸手要粮食，说吃饭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也在敦促日本内阁，不但要减少从中国掠夺粮食的数量，而且还要大量进口粮食以供应华北地区，不然日军就无法有效地维持华北治安。——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地鼓动敌占区饥饿的百姓，一轮又一轮的袭扰

使得日军的统治摇摇欲坠。

日本政府火速从澳洲进口了面粉六百万袋，同时从满蒙输入了杂粮，对华中、华南用以货易货办法购入了面粉。这就是说，“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刚刚发表一年，在经营华北占领地问题上，很快就从“资源开发主义”转移到了“粮食第一主义”。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

有资料显示，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动用大量外汇，从英、美两国购入一千一百七十万袋面粉；一九四〇年，又购入了七百二十万袋面粉。两年的时间里，为缓解华北占领区的面粉供应，花费近五亿日元。但是，这点面粉对于华北的粮荒乃杯水车薪，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实在大得惊人。——“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日本陆相畑俊六的观点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观点令日本军方明确意识到：“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就是“把蒋介石追到任何地方他也不会屈服”。——“陆军统帅部打赢战争的信念首次发生了动摇”。

既然判断日本难以支撑战争，中国军队就无需再大规模地主动出击。

对于日本而言，缓解经济衰败的唯一出路是：继续扩大对外占领和掠夺。

就在日本人被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大米危机和战局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他们听到了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德国坦克的履带声。——一九四〇年，四月，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五月，比利时、卢森堡被德军占领；接着便是荷兰总司令宣布投降，德军全面突破马其诺防线；六月十四日，德军占领了法国巴黎。——西欧大陆已完全处在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空军开始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本土。希特勒席卷西欧，宣称要建立“欧洲新秩序”，这极大地刺激了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日本。法国已经败北，英国将被炸成焦土，如果不利用这天赐良机大举向南进军，去占领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夺取日本急需的大米、石油、橡胶等物资，更待何时？

日本人所说的南方，大致指“印度以东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日本人所说的“解决南方问题”，即指武力入侵东南亚，并称这是目前日本的“当务之急”。

东南亚令日本垂涎欲滴。——“日本处在这样的穷困之中，把解除经济压力的指望转向了南方资源地区。同时预料欧洲战争将更加扩大，形成一种对该地区先下手为强的气氛。”

南进的狂热顿时席卷整个日本。

他们那种露骨的野心和粗暴的态度是令人憎恶的。他们丝毫不顾正常的外交礼节而炫耀其飞机和军队。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时可能身穿西方商人的便服，态度冷淡地谈论技术问题，同时却向荷兰殖民地当局递交最后通牒，勒索石油；要不然就可能穿着棕色衬衣，坐在河内洛可可式的旧大都会饭店里，要求法国殖民地当局把印度支那南部的三个空军基地让给他们，以便空袭中国的南部地区。他们一边咕哝着，一边随地吐痰，态度十分傲慢。你在日本人扩张所及的任何地方碰到他们，他们都很蛮横无礼。

如果南进，就必须从中国调出大量部队，并大幅缩减对华战争经费。可是，侵华日军认为，在华兵力和经费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于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兵力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先是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对立，然后是陆军部与中国派遣军的对立。当时，侵华日军陆军（不包括关东军）总兵力为八十五万，一九三九年的军费为二十一亿三千三百万日元，陆军省计划一九四〇年度将上述兵力减至五十万，这就意味着一下要削减三十五万。“削减一个兵就等于节省二千日元”，由此，一九四〇年对华战争经费将减至十六亿日元，即减少五亿多日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一听就火了，表示如果这样他就辞职不干了。为缓解矛盾，东京参谋本部的幕僚们来到中国南京，与西尾寿造当面商谈，经过数天的讨价还价，最终决定的折中方案是：一九四〇年度，侵华日军减少九万九千人，加上消减的非作战人员，“预定到十一月底，兵力态势稳定在七十二万”。折中方案刚刚达成，参谋本部又一批幕僚抵达南京，通告说大本营正在考虑日军撤离武汉的计划，这令西尾寿造的幕僚们又是大吃一惊。

对于这个提案，军事课长岩畔随后回答一句说：“皇军将士流血得来的土地就撒手不要了吗？”接着，岩畔大佐大叫说：“应该攻占新加坡！”当时我们都被吓得发了呆。实际上，参谋本部所提“缩小战局”的意见，并不是刚刚提出的。大概在半年前，讨论汪兆铭要求的条款时，参谋本部作战课就提出过：“放弃华中、华南"，当时的第二部长樋口季一郎少将也在省、部首脑会议上提过。那时，陆军次官阿南涨着红脸大叫：“要从皇军流过血的地方退下来吗？”

急切地试图调兵南进，夺取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以尽早把急需的能源和战略物资据为己有，完成扩大日本疆土的宏愿，同时又要保持在中国战场上的强大兵力，以继续对国民政府造成震慑。——日本人在这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面前几近疯癫。

西尾寿造对冈村宁次离职前提交的《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很感兴趣。冈村宁次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不可轻视的抗日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的效果。"这就是说，侵华日军必须以积极作战来换取中国的最终屈服。冈村宁次提出了两个作战方向：一是湖南的长沙和衡阳，二是湖北的宜昌。由此，西尾寿造向参谋本部提出一个建议："占领宜昌，切断第五战区，然后和李宗仁、白崇禧谈局部的和平。如果李拒绝接受，就进攻襄阳方面，进行击败李宗仁军的作战。"对于西尾寿造来说，唯一的顾虑是：攻入宜昌后是否长期占领？如果长期占领，兵力定会不足，所以他希望参谋本部再给他两个师团。参谋本部一开始的回答是"时机不成熟"，但在海军表示坚决支持后，又改变态度说"成功的话倒也不错"。——一旦日军占领宜昌，从军事态势上讲确实"不错"：宜昌是从湖北沿长江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抗战中枢重庆只有四百八十公里。无论是否长期占领，只要攻击到那里，对国民政府就是一次巨大的军事威胁。

西尾寿造制订的作战计划是：

第一 作战目的

军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做出贡献。

第二 会战指导方针

军在最短期间内做好准备，大概在五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集合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

第三 会战指导要领（摘要）

投入兵力约为四个驮马改编的师团，在汉水东岸的枣阳周围构成数道包围圈（第一期作战）；在汉水西岸进行两翼包围，将敌人消灭在宜

昌附近（第二期作战）。

此时，接替冈村宁次第十一军司令官职务的，是原关东军第七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第十一军共有七个师团加四个旅团，园部和一郎决定最大限度地抽调部队参战，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从长江下游的第十三军之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各抽出一个旅团，加强给第十一军。最后确定的参战部队为：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的池田支队，第三十四师团的小川支队，第四十师团的石本支队，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临时混成第一〇一旅团，重炮、高射炮吉田支队以及第十一军直辖的第十五师团仓桥支队，步兵第二十二旅团松井支队，第十七港口司令部汉水支队，坦克第七、第十三联队，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此外，第三飞行团、海军第一分遣舰队和第二联合航空队等也参加作战。上述兵力共计二十万以上，这是武汉会战后日军为即将发动的战事准备的最大兵力。

四月七日，第十一军拟订出两个阶段的详细战案：

第一阶段，向鄂北发动猛烈进攻，歼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于随县、襄阳以北地区，尔后将汉水以西的中国军队向宜昌压缩并歼灭之。兵力部署是：第三师团配属第四十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大队和第三十四师团的两个步兵大队，由豫南的信阳与明港间出动，折向鄂北的随县与襄阳之间，进攻白河地区以及白河以南的樊城，与第十三师团会合，切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向北的退路；第十三师团，配属第十五师团的四个步兵大队以及第二十二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沿大洪山以西汉水东岸北上，迂回包围樊城一带的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与第三师团协同作战；第三十九师团，配属第六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在随县正面展开，从中路向枣阳进攻，与第三、第十三师团协同，歼灭包围圈里的中国第五战区的第十一集团军。第二阶段，第三师团从鄂北的襄阳、宜城之间汉水的弯曲处渡河，南下当阳，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三十九师团于宜城附近渡河，南下荆门，对宜昌构成包围之势；第十三师团在宜昌以东的沙洋镇附近渡河，西进河溶地区，伺机攻击宜昌。

预定攻击开始的时间是五月一日。

为给中国方面造成日军依旧是“打了就回去”的假象，日本方面故意丢失了一份写有“战后退回原防地”命令的机密文件。果然，中国方面得到日军要大举进攻的情报后，立刻判断日军的企图并不是占领宜昌，而

是与上次随枣会战时一样，企图在襄河以东的枣阳一带寻歼中国第五战区主力。基于这样的判断，四月十七日，蒋介石给李宗仁打电报，要求第五战区不要消极待敌，要争取先机，骚扰日军的后方，牵制和破坏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特别强调，因为日军不会攻占宜昌，所以主力要设伏在日军的攻击路径上：

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以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故我军在襄河以西与江防部队，不妨抽出有力之一、二军（莫树杰或张自忠部），速向大洪山附近以东潜伏，以代汤恩伯部之任务，作待机之势，专待敌军西进或东退时而截击之，并以中正名义手令王缵绪部积极准备向敌攻击，悬以重赏。至于襄花路正面阵地，只派相当部队防守外，其余有力部队仍从速集结，即由黄琪翔总司令指挥，准备全力向敌出击。因此对于江防部队，可以减少，尽量向襄河上游移防，以接替张自忠部等防务；或江防军抽出两军兵力，集结于荆门以北地区，作待机向南或北出击之势。

中国方面的作战部署，正是园部和一郎希望看到的。

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五战区确定了作战方案：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指挥第二十六、第七十五、第九十四军以及第一二八师和第六、第七游击纵队，依托襄河右岸阵地，阻击日军渡河。

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的隘路，主力控制在钟祥以北的长寿店地区，伺机攻击北上宜城、襄樊的日军。

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指挥第十一集团军、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和第一游击纵队，在鄂北的高城至随县以西阻击日军，不得已时可转移到西北方向的唐县一带，从两翼包围日军。

左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第二集团军和鄂东游击队，于信阳和襄花公路方向对日军实施牵制作战。

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集结在枣阳东北地区待命。

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位于枣阳以西、唐河东岸的双沟待命。

第二十一集团军兼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所部对沿江日军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攻击，并袭击平汉路南段，威胁日军进攻部队的后方。

史称“枣宜会战”的大战尚未开始，仅从双方的作战部署上看，日军攻占宜昌意图明确，而中国方面的战前判断已出现严重失误。

为掩蔽其战役企图，日军于四月下旬向薛岳的第九战区实施了佯攻：海军舰艇二十日向洞庭湖和鄱阳湖出动，航空兵对湖南和江西中国守军的阵地实施轰炸，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向九江以西地区进行了“扫荡”式作战。——日军想让中国方面误认为其大规模攻势将发生在第九战区方向。但是，经过近三年的作战，中国方面已不再焦躁盲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日军的佯攻起到了实际效果。

五月一日，日军向中国第五战区发动了大规模的三路并进。

首先行动的是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的石本支队。该部从豫南的信阳和明港出发，沿桐柏山北麓，向鄂北的泌阳和枣阳发动进攻，此为日军进攻的北路。第二天，日军第十三师团从鄂中的安陆开始北上，目标仍是鄂北的枣阳，此为日军的南路。四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的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西突击，此为日军的中路。——根据作战计划，三路日军将分别从南、北、中三个方向，快速向枣阳西北方向推进二百至三百公里，对驻扎在豫西南邓县、新野地区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予以包围歼灭。然后迅速掉头南下，突破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汉水防线，进攻宜昌。不知为什么，日军固执地认为，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乃汤恩伯部，只要捕捉到汤恩伯部并将其基本歼灭，中国第五战区就将丧失战斗力。侵华日军的陆军军官们受冈村宁次的影响很深，认为在正面战场强硬抗战的，都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其他杂牌军非但不堪一击，且其将领均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实际上，此时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并不在邓县、新野地区，而是在枣阳东北方向的桐柏山一带。

三路日军的推进速度和强度十分惊人，一线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很快瓦解。日军进攻的阵势与一年前随枣会战时如出一辙，这更加证实了中国最高统帅部战前的判断。现在，蒋介石唯一担心的是各部队作战消

极，他对他的军队和将领们了如指掌，认为必须防止他们在日军并无占领意图的攻势面前避战。五月五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和前线各部队高级将领，重申此次日军攻击兵力不大，也没有什么重大战略企图，因此要不顾一切给予日军“铁锤痛击之举”：

综合各方情报，并证以敌方广播，现敌军增调第五战区者为第六师团之一旅团，第三十九师团之一旅团及第四十师团之一联队。合原有之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共只三个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布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可以推见。但无论其作用如何，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乘长蛇出穴之顷，为铁锤痛击之举。各官兵应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克奏光荣之肤功，以发挥我致人而不致于人之革命战略。反之，若中其摇惑耳目之计，遂存避免决战之心，结果必使敌人得以纵横窜扰，而我军仍不免遭受损失，断非我革命军所宜出也。务望本此意旨，监督决心，并切实传谕所部，积极出击，一体遵照为要。

但是，第五战区对蒋介石“铁锤痛击之举”的命令，似乎并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愿，更没有“奏光荣之肤功”的热情。就在接到蒋介石电报的当天，第五战区重新调整了部署：第二十九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鄂豫边区游击纵队和第一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根据地的作战；江防军策应右集团军的作战，右集团军主力在汉水东岸阻击日军；中央集团军在现地阻击日军，不得已时转移到唐河和白河西岸；左集团军打击信阳以北的日军，不得已时转移到唐河两岸。——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得已时如何转移”的部署。

此时，北路日军在信阳北面的小林店附近，突破中国守军池峰城的第三十军的防线；接着又在小林店以北的明港，突破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的防线；然后沿平汉路继续北进，于任店突破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的防线。日军在六十余辆坦克的引领下，迅速折头西进，直插纵深，在泌阳、桐柏附近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四日占领泌阳，七日进占唐河镇。而南路日军在安陆西北方向的洋梓、长寿店地区，突破了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的防线。防线右翼的第四十一军孙震部接到“万不得已时”可撤退的命令后，迅速撤离，导致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田家集阵地，与北路日军第三师团取得了联系。中路日军在随县突破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和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的防线，五日向西猛攻唐县，陷入包围的中国守军被迫放弃阵地，日军随即向枣阳发起攻击。

尽管日军的推进速度极快，可仍没捕捉到汤恩伯部的行踪，只发现汤恩伯部好像在向南运动，似乎想攻击西进的第三师团的侧背。第三师团“立即改变主意，停止西进，转向准备攻击汤恩伯军”。——“军的任务在于围歼敌军主力，而主要目标即为消灭汤恩伯军，消灭了汤军就可说是完成了任务。”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与第十三师团在枣阳会合后，于白河附近徘徊寻找中国军队主力，“但重庆军已逃脱日军的捕捉，全部向侧面退去”。——每天以三十至四十公里的速度连续进攻近十天，日军显然已经非常疲惫。推进到预定的合围地点，中国军队主力却没有踪影，只有少量的部队在继续阻击，日军查了一下番号，是中国军队的第八十四军。

在掩护主力跳出日军包围圈的作战中，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打得很惨。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是粤军出身，但其集团军基本部队第八十四军却是李宗仁训练出来的桂军。现任军长莫树杰在接受任务时，发现黄总司令确实在把他的部队当主力用，他的三个师全被部署在襄花公路的防御正面。五月一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池田支队从中路发起进攻时，第八十四军首当其冲。一年前随枣会战时，第八十四军就在这一带防守，桂军官兵对阵地经营得很仔细，挖出很多可以躲避炮火的散兵坑，每当日军的炮火猛烈轰击时，官兵们就轮流在散兵坑中躲避。日军连续轰击了近两个小时，以为中国守军已伤亡殆尽，但步兵冲上来后，却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攻击受挫后，日军用炮火一遍又一遍地轰击第八十四军的阵地，几乎把阵地上的土翻耕了一遍，可桂军官兵誓死不退。一线的第一七四师和第一八九师阵地曾出现过动摇，军长莫树杰下达了“即使阵地上剩下一人也要坚守”的命令，警告官兵擅自撤退当场枪决。沿着襄花公路攻击的日军配备了数量众多的坦克，缺少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官兵冲出战壕，爬上日军的坦克掀开坦克盖子往里扔手榴弹，不少官兵被坦克碾压致死或是与坦克同归于尽。第八十四军一直坚持到五月四日，才接到撤退到二线阵地的命令。

这一撤，部队就出现了混乱。

由于第八十四军撤离的是日军正面攻击线上的要点，因此该军一撤退，日军就直接向二线阵地冲击而来，并派出一路骑兵包抄第一八九师的后路。师长凌压西担心自己的部队陷入包围，随即放弃二线阵地再次撤退。由此，第八十四军的作战意志全面崩溃。第一七四、第一七三师紧跟着第一八九师后撤，一撤就撤到了枣阳附近，依旧挡不住日军的攻击，又撤往邓县，这里已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门口了。可是，第八十四军仍没有停下来，官兵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在后撤。

在中国军队的溃散中，日军占领了樊城。

但是，第一七三师失踪了。

襄花公路正面阻击一开始，第一七三师便是第二梯队。该师辖五一七、五一八和五一九团，担任着撤退时的后卫掩护任务。在唐县附近，第一七三师官兵顽强阻击，阵地始终在手，令一线撤退部队得以安全脱身。但该师撤到枣阳附近时，陷入日军的包围。天色漆黑，道路泥泞，各团在突围中失去了联络。五一八团与日军遭遇，部队被打散，团长李俊雄和六十多名官兵被俘。五一七团误入日军的伏击，拼死作战才突击而出。师长钟毅率五一九团在唐河东岸遭遇日军，由于没有防备，部队顿时大乱，激战过后，钟师长身边只剩下警卫连的三十多名护卫。当他们抵达仓台镇以北的河曲时，再次与日军骑兵遭遇，日军发现这是一小股中国手枪兵，断定其中必有高级将领，迅速里三层外三层实施了包围。钟师长指挥卫士冲杀，两个小时后，卫士只剩下不足十人，钟师长本人胸部中弹，鲜血染红了军衣。最后时刻，他冲入一片芦苇丛，把随身携带的日记、私章和作战文件掩埋起来，但是大批的日军已将他团团围住。钟师长仰望苍天，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颅。

钟毅，时年三十九岁，广西扶南县（今扶绥县）人，入桂系军队的韶关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曾跟随桂系将领李宗仁参加北伐战争。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刚从陆军大学毕业，立即回到桂军开赴抗日战场，率部参加了津浦路南段防御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晋升为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师长时，被授予中将军衔。

钟毅的遗体被前线部队找回，灵柩运往重庆，蒋介石在码头迎灵，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其后，遗骸运回故乡，被安葬于抗日烈士公墓。

日军发动攻势一周后，无论是日军还是中国军队，都认为剧烈的作战到此为止了。日军分三路急进，中国军队稍一抵抗便开始撤退，日军终究兵力有限，松散的包围圈到处都是缝隙，日军进攻得有多快，中国军队撤退得就有多快，众多兵力几乎瞬间就能从日军的眼皮底下跑光。因此，日军第十一军认为，其第一阶段作战成果不大：

第一次会战（汉水东岸作战）不是这次作战的主要部分。这次鄂西会战的主要目标是歼灭汉水西岸之敌。为了保证作战的左侧背的安全，

所以先有此第一次会战。为此，本作战未能使用较长时间和集中各方面的战斗力量求逐次消灭敌军。因此，在兵力分配上，由于兵团的间隙过大，造成敌人容易从侧面避退的缺陷。

由此看来，战前李宗仁违反蒋介石积极出击的指令，制订了看似消极的“不得已时撤退”的方案，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许李宗仁要采取的是薛岳战长沙的战术，即先把日军进攻之路让出来任其长驱直入，主力部队则撤到进攻日军的两翼侧后，待扑空的日军准备原路返回时相机实施夹击或反击。问题是：这次日军是否会原路返回？

位于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撤到了鄂西北的郧县，但李宗仁本人仍留在老河口。五月十日，李宗仁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说日军正在企图原路返回，第五战区应全力以赴猛烈反击，不但要围歼日军，还要穷追不舍，不能再像长沙会战时一样对回返的日军没有奋力追击以致难取战果。

一、鄂北之敌经我多日围攻，粮弹殆尽，必将向原阵地退却。二、第五战区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战场附近，而后即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三、李及兰军应全力进袭花园、孝感，遮断平汉路。四、王缵绪集团应全力转向随县、唐县镇间进袭，遮断公路。五、张自忠集团应以主力先向唐县镇、枣阳间进攻，遮断公路，再转攻敌背后。六、周善军速东向枣阳方面进攻。七、孙连仲、汤恩伯两集团，速南向随、枣，截击敌人。八、刘汝明、王赞斌两部，应袭击信阳，如奏功，准悬赏五十万元。九、张、周、孙、汤各部，应切取联络，协同动作。十、敌主要退路只有唯一的襄花路，而该路雨后车辆不能运动，希严督各部，努力进击，必能收获空前战绩。以往湘北、粤北诸役，缺乏有计划的追击，致成果不良。此次我各部战力健在，应乘胜穷追，扩大战果。其作战不力，不能达成任务者，自总司令以下，应予处罚。

蒋介石的判断没有错误，日军确实在南撤。

只是，日军南撤的目的并不是返回出发地，而是南下集结准备执行第二阶段的作战，即攻取宜昌。

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国方面没人预料到日军是这样一个攻击计划。

中国军队刚刚转入反击，蒋介石的电报接二连三，焦灼之情跃然纸

上。电报不但详细指明了每一支部队的出击方向和任务，而且强调如果轻易让日军就这么退了，不但是我军的耻辱，还会让日军更加蔑视中国军队。因此，各部队须“不眠不休，各向任务迈进”，以期将撤退中的日军一举歼灭。

查鄂北之敌佳日（九日）进至唐白河畔，似已完成其作战计划，开始撤退矣。我军依适切之机动，粉碎敌包围我军于襄东平地之企图，并造成反包围态势，殊堪嘉慰。惟截至现在为止，敌我之损害略等，倘纵敌悠然退回原阵地，则我军决不能自矜为战胜，而且将为敌所蔑视。仰即督率所部，克服一切困难，不眠不休，各向任务迈进，乘敌脱离据点态势不利及补给缺乏之好机，努力一举将其歼灭。并仰各将士深体追击为完成战果最有效手段之明训，以坚强意志与卓越统帅相配合，完成光荣之使命，勿得逗留不进，坐失战机为要。

中国第五战区各部队展开了猛烈反攻。

中国军队的反击速度，竟也出乎了日军的意料。

根据李宗仁的部署，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及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由北向南；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和周砉的第七十五军由西向东；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和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由南向北；同时，在战场的外围，郭忏的第九十四军在京山和应城方向攻击日军的后方补给线，游击第七军和鄂东游击队袭击了平汉线上的重要据点。——中国军队的反击目标明确：把日军第三师团主力压缩在枣阳以西约三十公里处的双沟地区，予以歼灭。

在中国军队合围圈的北部，从十二日开始，孙连仲部和汤恩伯部逼近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的石本支队后，立即发起攻击，两个集团军同时将当面日军分割成两半，使日军陷入他们没有料到的苦战中。由于携带的粮弹不多，获悉后方补给线被切断时，第三师团和石本支队感到了危机。

五月十二日，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胁正隆日记：

晴热。本日为左右纵队靠拢集结的日子，但四面都是敌人。又，野炮部队正遭受北面之敌的攻击，粮秣补给都无法想象。

十五日，步兵第二十九旅团旅团长大城户三治，致电园部和一郎师团长：

敌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乞望增援一个大队。另外，希望在白河右岸采取收容措施（连续出现伤员）。

接到求救电报后，第十一军作战主任参谋天野正一中佐紧急拟订救援方案：

在制定如何救出第三师团的作战方案时，考虑了两个方案：一是令正在南下的第十三、第三十九两个师团再次北上；二是令第三师团独自解围后退。但前一方案如在讨伐张集团军（张自忠部）后再北上，则将失去时机。于是与第三师团联络，师团司令部表示还有一些力量。因此，决定采取后一方案，令第三师团独自后退。

十五日中午，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日军第三师团从中国军队的围攻中冲了出来，于十六日集结于枣阳。

中国第五战区对日军第三师团的损失估算如下：第三师团从信阳出发时兵力为两万多，“五月十日以后，由新野、唐河镇向枣阳撤退时，仅七八千余，其中虽间有向桐柏、信阳退窜者，但被我击歼数目，亦在四千以上”。日军第三师团确实损失严重，而中国方面对战果的估算也有夸大之嫌。

只是，中国军队围攻的，仅是日军三个主力师团中的一个。

此时，在咫尺之遥的战场南部，张自忠部正孤军面对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

张自忠，中国军队中的一位悲情将军。

由于卢沟桥事变前后不断地与日方周旋谈判，张自忠曾被中国民间舆论称为“汉奸”。这以后，深深的负罪感令他随时准备以死来证明自己。他率部奔波于从淮河到临沂、从汉水到枣阳的广阔战场上，他只想一死，但须拼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枣宜会战打响后，日军突破中国守军的正面防线直插枣阳地区，身处襄河西岸的张自忠意识到实现夙愿的时刻又一次来临了。他对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将领们表示：“只要敌人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寇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五月七日，判断日军将要返回出发地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张自忠部出击枣阳截击日军。

其实，张自忠已从日军俘虏口中得知，日军并不是要返回出发地，而是准备集结进攻宜昌。他立即把情报上报给重庆，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张自忠不敢也不愿指责重庆统帅部。他知道，如果他的部队迎着优势之敌而上，必定凶多吉少，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率领他的部队与日军决一死战。

他让副总司令冯治安负责襄河西岸防守，自己则渡河到东岸战场上亲自督战。

临行前，预感九死一生的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一封遗书：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七九、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张自忠还给他的老部队第五十九军多年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军官们，留下了一封长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中国军人，捧读此信都会令人警醒：

近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等敷衍，弟对部下也敷衍；敌人未来，我们对敌人是敷衍的布置；敌人即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敷衍一下就走。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聪明，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其实更难；似乎近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今天不打，明天还是要打；在这里不打，退到任何地方还是要打。平定是一样的平定，牺牲是一样的牺牲。所以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我与弟等同生死、共患难十余年，感情逾于骨肉，义气逾于同胞，我是不忍弟等走这条灭亡的死路。弟等素识大体、明大义，谅必也绝不肯走这条死路。无疑地，我们只有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拼。我们既然奉令守这条线，我们就决定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

我们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令绝不后退。我与弟等受国家豢养数十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还拼不了吗？幸而我们的拼，能挡住了敌人，则不仅少数的几个人，就连我们全军，也必然在中华民国享有着无上的光荣，我们的官兵也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我们没有亏负了他们的豢养，我们也不愧做了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的，是我们唯一无二应该走的路。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最后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功亏一篑？故惟有盼弟等打起精神，咬定牙根，拼这一仗，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张自忠出击了。

日军已经得到了张自忠部出击的情报：

张自忠右翼集团主力逐次在大洪山北麓地区集结，有开始北进之模样。军决定捉住敌军蠢动之良机，在汉水彻底消灭之。

张自忠渡河后，与黄维纲的第三十八师取得了联系。五月九日，他亲自指挥三十八师，以伤亡五百多人的代价，突袭了日军辎重部队的指挥所，大量歼敌，缴获甚丰。十二日，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命令他迅速率部截击襄河东岸向南运动的日军。在后续部队尚未跟进的情况下，为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截击日军的先头部队，张自忠亲率第七十四师的三个团向方家集、南瓜店一带推进。此时在襄河东岸的中国军队，只剩下张自忠的部队了。攻占方家集后，张自忠清点了一下兵力，第七十四师二千人左右，骑兵第九师五百多人，再加上总部手枪营，总兵力不超过三千人。后方补给线已断绝。

日军认为与他们纠缠的中国军队人数不多，但混战了一天一夜后，不但当面的中国军队依旧作战顽强，且夜间日军阵地还受到猛烈奇袭。日军这才知道，当面的中国军队非同小可。十五日天一亮，日军集中了更大的兵力，在三十多架战机的轰炸下，发动了更为凶狠的围攻。

张自忠和他的官兵一面嚼着炒黄豆一面与日军拼死作战。

前沿的数次肉搏结束后，日军终于决定撤出战斗，避开这群死战的中国官兵，从另外一个方向南下。

十五日，张自忠给蒋介石发出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封作战电报：

即到。渝委员长蒋：影密。

报告：一、职昨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亲与南窜之敌约五千余名血战竟日，创敌甚重。晚间敌我相互夜袭，复激战终夜。今晨敌因败羞愤，并因我追击，不得南窜，并调集飞机三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向我更番轰击，以图泄愤，并多路南窜。我各部经继续六七次之血战，牺牲均极重大，但士气仍颇旺盛，现仍在方家集附近激战中。二、我三十八师、一七九师，昨已将新街敌数百名击溃，当将新街克复，现仍继续向南追击中。三、据报，残敌一部约千余人，因被我各处截击，现企图沿襄河东南窜，已饬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努力截击中。谨闻。

职张自忠叩。

发现当面日军绕道南下后，张自忠立即率部开始追击。被张自忠死缠不放的日军，是企图向南集结的第三十九师团。

此时，张自忠完全可以不去追击，因为他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

日军已经知道决心与他们死战到底的中国军队将领是谁了。日军通信部队截获了重庆与第五战区之间的电报，也截获了张自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五月十六日晨，第三十九师团在扫荡圆沟（宜城东北约一公里）附近山地时，九时接到通讯部队的通报说'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即在圆沟'。第三十九师团接到这一情报，顿时紧张起来，黄昏前向敌人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掉头转身，对张自忠部完成了战术包围。

张自忠顿陷绝境。

张自忠部兵力单薄，没有后援，无法构筑纵深阵地，狭窄的前沿后方就是总指挥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集中了五千多兵力以及所有的火炮，向张自忠部的阵地发动了凶猛的合围。调集部队增援，至少需要半天，如果即刻撤离，也许尚可冲出去，但临阵脱逃是张自忠誓死不能的。为坚持到增援部队抵达，张自忠指挥少量部队死守阵地。残酷的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阵地四周的小高地便相继失守。那些还活着的中国官兵知道总司令就在身后的小山包上，于是纷纷向总指挥部靠拢。而张自忠身处的小山包，在日军的攻击下已尸体遍布，张自忠左臂负伤仍立于山头督战。日军的又一阵弹雨过

后，张自忠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倒下了。

日军向山顶蜂拥而来。

之前，张自忠把他的卫队全部派往一线阵地，此时身边只剩了始终不肯离去的高参张敬。张敬用手枪射倒几名登上山包的日军，随即被后面冲上来的日军用刺刀刺倒。

一颗子弹再次射入张自忠的腹部。

一名日军士兵冲上来，用刺刀向张自忠刺去，张自忠突然挺立起来，试图抓住日军士兵的刀刃。

另一名日军士兵的刺刀凶狠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张自忠永远地倒下了。

日军士兵开始检查尸体，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一名日军少佐上来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了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闻讯赶来，因为他认识张自忠。他与张自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他对张自忠的印象是：“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专田盛寿跪在地上，为张自忠整理了破碎的军衣，然后命令下属用担架将其遗体抬下山埋葬。

敌将尸体抬至三十余里之陈家集附近，将尸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标志，上书英勇上将张自忠灵等字样，并向灵墓敬礼。

张自忠，抗战中国阵亡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官兵得知噩耗后，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后山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日军的记载是：“当夜即被数百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

张自忠的遗骸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着上将领章和短剑，装入一副贵重的楠木棺材里。灵柩运抵宜昌后，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护送前往重庆，一路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中国百姓在长江岸边长跪不起。五月二十八日，灵柩抵达重

庆，蒋介石臂挽黑纱立于江边迎灵。此时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重庆全城无人躲避，百姓们把盛满手擀面条的大碗高举过头顶，这是他们为张自忠做的一碗送其远行的北方饭。

时年五十岁的张自忠，十六岁那年由母亲做主，与山东老家的一位名叫李敏惠的十七岁女子结婚。婚后数十年中，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得知丈夫殉国后，李敏惠从容料理好家事后，绝食而死。

蒋介石通电全军，认为张自忠以身殉国之举，不但令全国百姓认知了曾“为全国人民所不谅”的他，且其所作所为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始大白于世。夫见危受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为张自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写道：张自忠的殉国之举“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至，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只要秉承张自忠这种不屈的精神，中华民族就能渡过“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

张上将的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所需要的宝贵精神，尤其是在抗战接近胜利而艰危过于往常时，更需要这种精神。不动摇、不妥协地来咬紧牙根，牺牲一切，以渡过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

不苟私利的献身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尊严来讲，永远都如金子般宝贵。

因此，张自忠的死，成为国人心头难忘的痛。

这就是这片国土上至今以“张自忠”命名的城市街道如此之多的原因。

张自忠部的拼死作战，令日军决定暂缓攻击宜昌，即刻向中国军队实施反冲击。

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训示：

襄东之敌妄自判断我军将返回原驻地，因而将搜罗的残兵和招募的新军集中在白河下游地区，企图进行全面反攻，突进枣阳。各兵团作战半月，纵横驰骋于襄东原野，未得一日安宁，英勇奋战，功劳殊大。今更面临利用敌军之冲动，将其诱至唐河以东予以消灭之良机。各兵团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广用虚实战术，加深敌人的骄傲情绪，然后转用轻装兵力，做好隐蔽态势，待时机到来以闪电般的速度，一举将敌歼灭在白河河畔。

日军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再度北上，与摆脱了中国军队围攻的第三师团在枣阳附近会合，三路日军形成了一种相互连接的迎击态势。当日军秘密集结时，中国方面没有判断出日军的反击意图，各部队仍旧在向枣阳附近靠拢，以致交战两军迎头接近，前沿部队最远相距五公里，最近相距仅一公里。

十九日，日军突然发动全面反击。

在四十多架战机和二百多辆坦克的配合下，日军的反击铺天盖地，当面的中国军队孙连仲部、汤恩伯部和郭忏部猝不及防，只有迅速脱离战场，向白河以西转移。出乎日军预料的还是中国军队的撤退速度，无论日军的反击有多么快速，始终赶不上中国军队的撤退速度。二十一日，日军第三师团追到老河口东北约六十公里的邓县，第十三师团追到老河口附近，第三十九师团追到老河口东南的樊城地区，但就是没能追上任何一支中国军队。

日军全面逼近老河口，李宗仁急令桂军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前来阻击。第八十四军之前几乎是溃不成军地撤退到这里，此时还是遵照李宗仁的指令在樊城外围以及白河岸边布置了防御线。

日军追来了。

追到白河岸边的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

或许是被战果冲昏了头，日军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于是灾难突然降临：

步兵第二三三联队于二十日黄昏派出三名将校，在白河下游侦察渡河点的地形，其中两人卧倒，从芦苇中用望远镜察看，另外一人因敌人打来的子弹不密，即以站立姿态展望，后者判断前岸为河中的沙洲，但在向上报告时却采用了前者的判断：就是对岸。结果当二十一日零时左右升起渡河成功的蓝色信号弹时，在对岸业已做好瞄准准备的敌人一齐开始猛烈射击，联队在毫无隐蔽体的沙洲上不断出现伤亡，瞬间就牺牲了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以下三百数十人。

在白河对岸阻击日军第二三三联队的中国军队，正是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

瞬间日军就被打死了三百多人，这在日本陆军的作战史上尚不多见。

或许直到此时园部和一郎才意识到，他被中国军队在此纠缠得太久了，于是命令全线停止追击。

从日军发动攻势始，已经连续作战二十多天，不但部队疲劳，且伤亡很大。从战斗过程上看，尽管日军说他们取得了大量歼敌战果——日方的统计是：“敌遗弃尸体三万三千余，被俘一千余。”——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已丧失战斗能力，如果日军再打下去的话，中国军队依然能与之进行顽强的周旋。

进退两难的日军第十一军的将领们，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悲观的想法：此战到此为止，部队打道回府，不再进行攻击宜昌的第二阶段作战。这种半途而废的想法，自中日开战以来，在日军的作战中尚无先例：

本来，此次作战是园部军司令官到任伊始决定的，给敌人的冬季攻势以反击，取得粉碎敌军的战果，就算达到了目的。这一点，从过去两旬的战绩看，已充分达到目的。于是五月二十三日，园部军司令官以下军司令部的大多数，对今后作战“开始犹豫不决”，即所谓按计划即使不进攻宜昌，也无损于“军的威望”，“作战到此为止”的想法开始抬头。军首脑们被爱惜部下的感情所笼罩，实在找不到继续进行作战的切实理由。

在湖北应山的第十一军司令部里，就是否继续进行第二阶段作战发生了激烈争论。参谋长青木重诚明确表示，作战必须到此为止。大多数

参谋，特别是负责后勤的参谋，更是一致赞成就此停止，他们的理由是：一、中国军队的抵抗顽强，第一阶段作战花费了比预期多出一倍的时间，天气炎热，部队来回机动作战，既然从战果上看已经达成了目的，就不必驱赶极度疲劳的部队再去苦战。二、原来呈报此次作战计划时，大本营就在是否占领宜昌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表态十分含糊，更没有必须占领的说辞。那么，第十一军有什么必要非到那个宜昌去不可呢？但是，第十一军作战主任参谋天野正一坚决反对“到此为止”。他认为，作战虽然出了点小问题，但仅仅是局部的问题，以部队疲劳为理由停止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毫无道理。如果此时终止作战，就会失去上下的信赖，有损于第十一军的荣誉：“我第十一军直到现在，一向被誉为派遣军独一无二的能完成摧毁敌军任务的部队。如果照这样，今后只好把任务奉还了。”

园部和一郎的最后决定是：继续作战。

为了支持第十一军的第二阶段作战，中国派遣军从第十三军的第二十二师团调来了辖三个步兵大队的松井支队和一个山炮大队。同时，第十一军还出动数百辆卡车，为前线部队运送了多达一千多吨的粮食和五百多吨其他军需品。

二十九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在第三飞行团和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助战下，用奇袭的方式强渡汉水，击垮中国军队的防线。第三师团三十一日从襄阳东南方强渡，攻占襄阳，消灭当面中国军队后迅速南下，向宜昌攻击前进；第三十九师团三十一日在襄樊以南的王家集一带强渡汉水，南下攻击占领荆门后，与第三师团合力攻击宜昌；第十三师团稍后在荆门东南方向的旧口附近强渡，向西直插宜昌城；第四十师团位于大洪山一带扫荡，保护战场后方安全。

三十一日十九时三十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开始炮击汉水西岸的中国守军阵地。该师团在白河渡河时曾遭到重大损失，因此这一次格外小心，炮击竟然长达一个半小时，步兵才开始强渡。在日军强渡点的对岸，中国守军右边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个警备旅，左边是第四十一军一部，两支部队装备都低劣且兵力不足。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开始强渡时，中国守军竟然把日军用小马达牵引的木筏和橡皮艇看成了水陆两用的坦克，于是惊慌失措地报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部根据这一判断向重庆要求空军参战。中国空军派出了九架蚊式轰炸机前来轰炸，这时候，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个警备旅已撤走，第四十一军的阵地也无人防守了，中国空军飞行员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强渡成功。

午夜，日军第三师团在襄阳附近开始强渡，拂晓前全部渡过汉水，在没有遇到强烈抵抗的情况下迅速南下。

汉水江防之所以十分薄弱，是由于战前的判断失误。从重庆军事委员会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始终着眼于汉水以东的抵抗，根本没有制订一旦汉水以东阻击失败、日军强渡汉水向西进攻的作战预案。因此，江防部队被第五战区调走了，汉水西岸部队也大多被调到了东岸。

六月一日，日军第三师团轻取襄阳城。

三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行南下，迅速推进。第十三师团与池田支队、汉水支队也于四日从旧口镇附近渡过了汉水。

中国江防军的防御阵地都是正面朝东构筑的，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已经占领武汉的日军必定是正面朝西进攻。但是，此时日军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都在从北向南进攻，攻击的是中国江防守军阵地的侧背，也是中国江防守军的第二甚至是第三线阵地。由此，中国江防军事先构筑的一线阻击阵地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同时，当阳、荆门以北的远安、南漳等地，相对于鄂北的随枣战场而言，都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中国方面在此没有任何作战准备，现在都成了日军攻击的一线。所以，当日军两个强大的师团强渡汉水后，突然从江防军的侧背插进来时，兵力薄弱的中国守军瞬间就溃败了。

得知日军强渡汉水并开始攻击宜昌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紧急重新部署防御：第五战区部队被分成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由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组成，统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负责正面阻击；右兵团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和江防军组成，统归陈诚指挥，负责确保宜昌安全。同时命令周碞的第七十五军、郭忏的第九十四军火速从汉水以东渡河，回归江防军建制。

战局危急万分，以致政治部部长陈诚也被派赴前线。

六月二日晚，陈诚抵达万县，三日便在宜昌附近的三游洞开设了作战指挥所。为确保宜昌，陈诚请求蒋介石将在重庆整训的中央军主力部队第十八军紧急船运宜昌。

但是，中国方面的紧急部署为时已晚。

六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

一、汉水右岸之敌军在局部地区虽有抵抗，但全线正向荆沙路以西退却中。陈诚正在用第二线兵团和重新集结的数个师，在当阳南北一线紧急组织新的抵抗。

二、军决定以追击余势，乘敌态势未整备好之前，突破当阳南北之敌阵地，将敌围歼在宜昌以东地区。

三、第三师团席卷当阳西北面敌军左翼，向宜昌东北地区突进。

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当阳附近敌军防线后，将敌压向宜昌方向。

五、第十三师团突破敌阵右翼后，向宜昌方向突进，粉碎敌人向南面逃脱的企图。

六、池田支队攻占荆州、沙市。

七、松井支队（配有仓桥支队、小川支队）面对襄阳方面之敌，掩护军的右侧背。

在荆州东南方向的旧口附近，日军第十三师团强渡汉水后直接西进，其前锋距离宜昌已经很近了。南下的第三、第三十九师团攻占南漳和襄阳后，不顾中国军队的尾随，继续南下直插宜昌。六日，日军推进到观音寺、荆门、十里铺一线；八日，日军池田支队攻占江陵和沙市；九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当阳。当阳为宜昌门户，陈诚特别调来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当阳顽强阻击，部队伤亡惨重，当南面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苦战数日撤退后，第十一师因两面受敌也随之撤退，当阳失守。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没有力量按照指令沿宜沙公路边撤退边逐次抵抗，而是分成若干小股寻找渡口南渡长江脱离了战场，致使沙市至宜昌之间成为不设防地区，宜昌以东的防御屏障完全洞开，沿着公路推进的日军长驱直入猛扑宜昌城。

在危机中，重庆军事委员会再次决定，用决堤手段阻止日军的攻势——中国最高统帅部曾在徐州会战时掘开过黄河大堤，在武汉会战时掘开过长江大堤，现在又要掘开汉水大堤。决堤地点选在旧口镇附近，决堤部队是配属两个工兵营的第四十四军。第四十四军位于大洪山一线，要携带大量炸药前往决堤地点，路上敌情不明，路况复杂，导致行动迟缓，走到半路竟然找借口回返，致使决堤之事不了了之。但是，即使第

四十四军按时掘开汉水大堤，遭殃的也只能是当地百姓，因为推进速度极快的日军早已突过了中国方面预定的泛滥区。

宜昌是沿长江进入重庆的重要门户，负责城防的江防军肩负着保卫战时首都的重任，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蒋介石曾下令，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得调动江防军部队。但是，由于此前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不会攻击宜昌，加上枣阳附近的作战吃紧，宜昌江防军中的两个军都被调到枣阳方向，导致此时的宜昌几近无人防守。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陈诚只有紧急调兵，可直到十日左右，第十八军的第十八师和第一九九师才陆续抵达宜昌附近——第一九九师被配置在宜昌西北面，第十八师负责死守宜昌城。一个师守一座城池，兵力显然单薄，第十八师命令五十四团守城区，五十二和五十三团守城防一线阵地，所谓一线阵地就是短短的一线而已：右至长江岸边，左至镇镜山。

十一日拂晓时分，日军第十三、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分三路围攻宜昌城。日军猛烈炮击中国守军的阵地，然后步兵开始冲锋，双方陷入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日军突破中国守军五十二团城郊的正面阵地，直扑宜昌机场，防守城区与防守城郊的中国守军被分割成两段。镇镜山上的第十八师指挥部与守城的部队失去了联系。

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造成混乱。五十二团一部撤入市区，影响守城部队亦陷于混乱，五十四团守城官兵大部过江，逃往西岸（长江出西陵峡到南津关改向南流，宜昌城区在江东岸），找到船的幸免于难，泅渡的不少淹死江中，该团团长皮宣猷畏罪潜逃。五十四团虽未经什么战斗，但战后收容仅剩四五百人。五十二团除伤亡外，大部越过黄柏河向南津关方向溃退。在此情况紧急时，军长彭善急调第一九九师的一个团到前坪背后占领三一〇高地，掩护第十八师侧背，同时彭善本人（一九九师师长宋瑞珂和参谋长梅春华随行）亲自走到前坪小高地上指挥观察当前情况。到黄昏时，他命令第十八师师长罗广文到后坪收容部队，以其副师长李钦若和参谋长赵秀昆指挥五十三团守镇镜山，以作逐步收复宜昌的支撑点。罗再三在电话中请求说，李副师长情况不熟悉，愿自己留在那里，让他们下来收容，彭遂以赵参谋长和参谋主任汤国城留在山上指挥。在六月十一日入暮前，敌集中火力向镇镜山猛攻，赵等躲在的掩蔽部，因敌炮火硝烟浓密冲入，使人感觉呼吸困难，汤国城素来胆小，喊了一声“是毒瓦斯”，赵当时将计就计伪装中毒，自动率五十三团放弃镇镜山，撤过黄柏河。至此，仅经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六月十二日完全陷于日军手中。

日军以三个主力师团夺取宜昌，深入到中国军队控制地区的腹地。但是，日军的既定策略是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而不再占领地盘。因此，攻占宜昌的当日，第十一军司令部就下达了从宜昌撤退的命令。

日军的战果统计是：中国军队“交战兵力约为三十五万人，遗弃尸体为六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具，被俘为四千七百九十七人”；日军的损失是“战死一千四百零三人（内将校一百零六名），负伤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内将校二百零三人）”。

十七日，根据日军第十一军的命令，三个师团撤出宜昌，开始向汉水东岸撤退。

中国军队尾随而至：十六日，第五战区左兵团的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进抵荆门和当阳以北地区；右兵团开始向沙市、荆门和当阳留守日军发起进攻；十七日，彭善的第十八军尾随撤离的日军进入宜昌城。

就在中国方面准备庆祝“收复”宜昌之时，撤到半路的日军突然停住了脚步。

也就在日军围攻宜昌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以及东京的日军大本营之间，已就宜昌问题爆发了严重冲突。

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扼守着三峡水路咽喉，东距武汉二百七十多公里，西距重庆四百八十多公里，既是两湖唯一水运通道上的要冲，又是沿长江西进重庆的门户。无论对中国方面还是对日军来讲，宜昌的地理位置都是无可替代的。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沿岸，再也没有哪座城市如此地接近中国的抗日中枢。如果日军能够长期占领宜昌，不仅军事上占据了梦寐以求的战略要点，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效果极其明显。但是，要实现长期占领，所需兵力从哪里来？首先提出确保宜昌的是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可派遣军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长期占领宜昌就须投入兵力，而东京大本营已决定削减在华兵力。日军强渡汉水那天，东京陆军省的幕僚们抵达南京，派遣军司令部提出了确保宜昌的建议，由于建议与削减在华兵力相矛盾，结果谁也拿不准主意。九日，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飞抵汉口，确保宜昌的建议得到了海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少将的赞赏，海军的理由是更加便于轰炸重庆。当日，井本熊男又抵达位于应山的第十一军司令部。显然，陆军的将领们很是恼火：原定计划就是长期占领宜昌，后来被否决了，现在又重新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经过彻夜的争论，终于有了一个模棱两可的

结论：根据第十一军现有兵力，确保一至两个月可以，但难以确保长期占领；如需长期占领，大本营就须给第十一军增加两个师团的兵力。十日中午，失望的井本熊男只有飞回南京，飞机起飞后他特意到宜昌上空转了一圈——“虽有无限贪恋但又不得不放弃”。

就在这时，那个惊人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德军占领了巴黎。

日军参谋本部的军官们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不要耽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声又一次弥漫日本朝野。而已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也认为：“总得想个办法确保宜昌。”于是，大本营再次征询第十一军，是否能确保宜昌？第十一军决心与大本营对抗到底：或者改变减少在华兵力的决定，或者实施大兵力增援，否则第十一军就无法确保宜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同时向大本营施压：因为削减在华兵力而迫不得已从宜昌撤退会是千古恨事。

宜昌问题摆在了天皇面前：

六月十五日下午十一时三十分，闲院宫参谋总长和代理军令部总长一并向天皇上奏了“日华新关系谈判开始后统帅部应采取的措施”。这时海军方面报告了当时正在实施的海军航空队轰击重庆的问题，提出把“宜昌”作为中继基地有极大的价值。天皇当即问陆军：“陆军对宜昌有什么好办法吗？”

第二天，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确保宜昌“一个月”的命令。

第三师团接到命令后，紧急命令所属第二十九旅团迅速往回走。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田中静一于十七日上午在距宜昌十公里处接到第三师团送来的紧急命令后，部队立即掉头。

中国军队没想到日军会回来。

掉头回来的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很快与中国军队混战在一起。十七日当天，日军的先头部队再次冲进宜昌城。此时，刚刚“收复”宜昌的中国军队第十八军官兵连背包都尚未放下。

日军认为，重新占领宜昌可谓“充满了苦难”：之前撤离时把可以利用的兵营等设施全炸毁了，回来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撤离时还把所有的通信设施破坏了，一根电线杆都没留下，现在全部要重新布置。特别

是粮食和弹药，本来宜昌是中国东部沿海物资转运西南的重要中转站，光囤积的大米就有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五袋，燃料和弹药之多更是“其数无法形容”，但此前撤离已经把它们都“烧毁或扔在长江里了”，现在吃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经过数天的整顿，重新集结在宜昌四周，他们决不会甘心日军占领宜昌，那么，日军还要出动多少兵力，经过多少次苦战，才能真正稳定对宜昌的占领局面？

日军重新占领宜昌后，中国军队在宜昌、江陵、当阳、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与日军形成对峙。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设置了第六战区，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湘西和川东。

枣宜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结束。

就日军而言，除了占领宜昌之外，既没有歼灭中国第五战区的主力，也没有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

中国军队从早期的判断失误，到中后期指挥上的错误，不但使作战部队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且丢失了战略要地宜昌。

针对枣宜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联军事总顾问福尔根给蒋介石写出一份总结报告，严厉指出了中国军队致命的两大问题：一是最高军事统帅部作战指挥的问题，二是军队将领们拥兵自保的问题。

窃此次宜昌失陷，其原因异常明显，无须加以详细陈述。

职兹拟就其基本原因，加以检讨如下：

一、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此种偏见，无形使前方各级将领，尤其军委会之心理，遭受很大影响，形成消极及动作异常迟缓等现象。

二、对于部队作战，缺乏坚强与连续一贯的领导，尤其军委会方面为然。

三、极端迟缓，一切处置照例，耽误时机，以致凡事落在敌后，未能制敌机先，敌则处处制我机先。

四、缺乏监督及贯彻目的之严厉要求，尤其军委会方面如此。军委

会一切命令，往往刚刚下达到部队去，便立刻从事变更与修正，事实上无异取消自己甫经发出之命令。

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

上述一般基本原因，产生种种战略战术原因。兹择其最主要者如下：

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在作战进程中，完全没有协同，第三、第九战区（尤其是第九战区）之按兵不动，不但使敌从容由武汉南部抽调大批军队转用于第五战区，增强其进攻我第五战区之兵力，且直无异促成敌大胆之冒险行动，结果遂使敌占领宜昌。敌占领宜昌，乃第九战区消极不动所致。

二、战区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及军长等，缺乏勇敢与主动精神，无有贯彻任务之毅力与决心。

三、兵力使用不集中，且犯各个使用之弊。换言之，即作战时不用主力。例如命令一军攻击，军则只派一师，师派一团，团派一营，结果所谓一军攻击者，实际不过一营兵力而已。

四、不善于事先筹划并组织通信连络，以至于战局过程中，未能保障军队指挥之不间断。结果每遇战线一部发生些微动摇，有线通信中断，部队指挥随之即告停止。

五、完全不明情况，所有报告照例，不合实际情况，往往夸大敌情及本军之损失。间有一部将领，欲求掩饰其不明情况及不善指挥之过，转而藉口下级指挥官或部队不行。须知部队素质之良否，厥惟其主官及司令部之良否是赖，凡指挥得当之部队，必能勇敢善战。

……此等问题，前在南岳、柳州、重庆等会议中，业经钧座阐明无余，并指出具体办法，一再下令，要求各级指挥官根本改进在案。但观此次宜昌失守，显然证明钧座对于此项问题之指示，军委会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等，依然未能切实明了，以故迄未遵照实施。

职认为军队作战指挥问题，乃我军最落后的问题之一，此问题最为重要，亟需于短期时间，加以彻底解决。

吾人应确保对于部队之指挥的坚决性、连续性与果断性，对此问题

之解决，首须自军委会始。军事委员会对大军统帅与指挥，须按时化、具体化、坚决化、连续化，成为全军之表率。

我军尔后作战之胜利，全唯军队指挥问题之能否正当解决，能否根据现代大军作战指挥方式，实施指挥是赖。

此论极其精准。

无论如何，日军已经逼到了重庆的大门口。

日本战史的记述是："众所周知，这次作战给了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区部队，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在重庆很快传出'日军逼近重庆'的风声，加上欧洲形势激变，使重庆政府内部抗战与和平两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这时，一个走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时机已经来临。"

然而，日本人一直渴望的这个"时机"真的来临了吗？

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集结在枣阳东北地区待命。

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位于枣阳以西、唐河东岸的双沟待命。

第二十一集团军兼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所部对沿江日军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攻击，并袭击平汉路南段，威胁日军进攻部队的后方。

史称"枣宜会战"的大战尚未开始，仅从双方的作战部署上看，日军攻占宜昌意图明确，而中国方面的战前判断已出现严重失误。

为掩蔽其战役企图，日军于四月下旬向薛岳的第九战区实施了佯攻：海军舰艇二十日向洞庭湖和鄱阳湖出动，航空兵对湖南和江西中国守军的阵地实施轰炸，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向九江以西地区进行了"扫荡"式作战。——日军想让中国方面误认为其大规模攻势将发生在第九战区方向。但是，经过近三年的作战，中国方面已不再焦躁盲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日军的佯攻起到了实际效果。

五月一日，日军向中国第五战区发动了大规模的三路并进。

首先行动的是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的石本支队。该部从豫南的信阳和明港出发，沿桐柏山北麓，向鄂北的泌阳和枣阳发动进攻，此为日军进攻的北路。第二天，日军第十三师团从鄂中的安陆开始北上，目标仍是鄂北的枣阳，此为日军的南路。四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的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西突击，此为日军的中路。——根据作战计划，三路日军将分别从南、北、中三个方向，快速向枣阳西北方向推进二百至三百公里，对驻扎在豫西南邓县、新野地区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予以包围歼灭。然后迅速掉头南下，突破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汉水防线，进攻宜昌。不知为什么，日军固执地认为，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乃汤恩伯部，只要捕捉到汤恩伯部并将其基本歼灭，中国第五战区就将丧失战斗力。侵华日军的陆军军官们受冈村宁次的影响很深，认为在正面战场强硬抗战的，都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其他杂牌军非但不堪一击，且其将领均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实际上，此时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并不在邓县、新野地区，而是在枣阳东北方向的桐柏山一带。

三路日军的推进速度和强度十分惊人，一线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很快瓦解。日军进攻的阵势与一年前随枣会战时如出一辙，这更加证实了中国最高统帅部战前的判断。现在，蒋介石唯一担心的是各部队作战消极，他对他的军队和将领们了如指掌，认为必须防止他们在日军并无占领意图的攻势面前避战。五月五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和前线各部队高级将领，重申此次日军攻击兵力不大，也没有什么重大战略企图，因此要不顾一切给予日军“铁锤痛击之举”：

综合各方情报，并证以敌方广播，现敌军增调第五战区者为第六师团之一旅团，第三十九师团之一旅团及第四十师团之一联队。合原有之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共只三个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布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可以推见。但无论其作用如何，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乘长蛇出穴之顷，为铁锤痛击之举。各官兵应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克奏光荣之肤功，以发挥我致人而不致于人之革命战略。反之，若中其摇惑耳目之计，遂存避免决战之心，结果必使敌人得以纵横窜扰，而我军仍不免遭受损失，断非我革命军所宜出也。务望本此意旨，监督决心，并切实传谕所部，积极出击，一体遵照为要。

但是，第五战区对蒋介石“铁锤痛击之举”的命令，似乎并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愿，更没有“奏光荣之肤功”的热情。就在接到蒋介石电报的当

天，第五战区重新调整了部署：第二十九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鄂豫边区游击纵队和第一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根据地的作战；江防军策应右集团军的作战，右集团军主力在汉水东岸阻击日军；中央集团军在现地阻击日军，不得已时转移到唐河和白河西岸；左集团军打击信阳以北的日军，不得已时转移到唐河两岸。——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得已时如何转移”的部署。

此时，北路日军在信阳北面的小林店附近，突破中国守军池峰城的第三十军的防线；接着又在小林店以北的明港，突破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的防线；然后沿平汉路继续北进，于任店突破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的防线。日军在六十余辆坦克的引领下，迅速折头西进，直插纵深，在泌阳、桐柏附近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四日占领泌阳，七日进占唐河镇。而南路日军在安陆西北方向的洋梓、长寿店地区，突破了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的防线。防线右翼的第四十一军孙震部接到“万不得已时”可撤退的命令后，迅速撤离，导致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田家集阵地，与北路日军第三师团取得了联系。中路日军在随县突破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和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的防线，五日向西猛攻唐县，陷入包围的中国守军被迫放弃阵地，日军随即向枣阳发起攻击。

尽管日军的推进速度极快，可仍没捕捉到汤恩伯部的行踪，只发现汤恩伯部好像在向南运动，似乎想攻击西进的第三师团的侧背。第三师团“立即改变主意，停止西进，转向准备攻击汤恩伯军”。——“军的任务在于围歼敌军主力，而主要目标即为消灭汤恩伯军，消灭了汤军就可说是完成了任务。”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与第十三师团在枣阳会合后，于白河附近徘徊寻找中国军队主力，“但重庆军已逃脱日军的捕捉，全部向侧面退去”。——每天以三十至四十公里的速度连续进攻近十天，日军显然已经非常疲惫。推进到预定的合围地点，中国军队主力却没有踪影，只有少量的部队在继续阻击，日军查了一下番号，是中国军队的第八十四军。

在掩护主力跳出日军包围圈的作战中，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打得很惨。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是粤军出身，但其集团军基本部队第八十四军却是李宗仁训练出来的桂军。现任军长莫树杰在接受任务时，发现黄总司令确实在把他的部队当主力用，他的三个师全被部署在襄花公路的防御正面。五月一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池田支队从中路发起进攻时，第八十四军首当其冲。一年前随枣会战时，第八十四军就在这一带防守，桂军官兵对阵地经营得很仔细，挖出很多可以躲避炮火的散兵坑，每当日军的炮火猛烈轰击时，官兵们就轮流在散兵坑中躲

避。日军连续轰击了近两个小时，以为中国守军已伤亡殆尽，但步兵冲上来后，却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攻击受挫后，日军用炮火一遍又一遍地轰击第八十四军的阵地，几乎把阵地上的土翻耕了一遍，可桂军官兵誓死不退。一线的第一七四师和第一八九师阵地曾出现过动摇，军长莫树杰下达了“即使阵地上剩下一人也要坚守”的命令，警告官兵擅自撤退当场枪决。沿着襄花公路攻击的日军配备了数量众多的坦克，缺少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官兵冲出战壕，爬上日军的坦克掀开坦克盖子往里扔手榴弹，不少官兵被坦克碾压致死或是与坦克同归于尽。第八十四军一直坚持到五月四日，才接到撤退到二线阵地的命令。

这一撤，部队就出现了混乱。

由于第八十四军撤离的是日军正面攻击线上的要点，因此该军一撤退，日军就直接向二线阵地冲击而来，并派出一路骑兵包抄第一八九师的后路。师长凌压西担心自己的部队陷入包围，随即放弃二线阵地再次撤退。由此，第八十四军的作战意志全面崩溃。第一七四、第一七三师紧跟着第一八九师后撤，一撤就撤到了枣阳附近，依旧挡不住日军的攻击，又撤往邓县，这里已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门口了。可是，第八十四军仍没有停下来，官兵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在后撤。

在中国军队的溃散中，日军占领了樊城。

但是，第一七三师失踪了。

襄花公路正面阻击一开始，第一七三师便是第二梯队。该师辖五一七、五一八和五一九团，担任着撤退时的后卫掩护任务。在唐县附近，第一七三师官兵顽强阻击，阵地始终在手，令一线撤退部队得以安全脱身。但该师撤到枣阳附近时，陷入日军的包围。天色漆黑，道路泥泞，各团在突围中失去了联络。五一八团与日军遭遇，部队被打散，团长李俊雄和六十多名官兵被俘。五一七团误入日军的伏击，拼死作战才突击而出。师长钟毅率五一九团在唐河东岸遭遇日军，由于没有防备，部队顿时大乱，激战过后，钟师长身边只剩下警卫连的三十多名护卫。当他们抵达仓台镇以北的河曲时，再次与日军骑兵遭遇，日军发现这是一小股中国手枪兵，断定其中必有高级将领，迅速里三层外三层实施了包围。钟师长指挥卫士冲杀，两个小时后，卫士只剩下不足十人，钟师长本人胸部中弹，鲜血染红了军衣。最后时刻，他冲入一片芦苇丛，把随身携带的日记、私章和作战文件掩埋起来，但是大批的日军已将他团团围住。钟师长仰望苍天，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

颀。

钟毅，时年三十九岁，广西扶南县（今扶绥县）人，入桂系军队的韶关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曾跟随桂系将领李宗仁参加北伐战争。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刚从陆军大学毕业，立即回到桂军开赴抗日战场，率部参加了津浦路南段防御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晋升为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师长时，被授予中将军衔。

钟毅的遗体被前线部队找回，灵柩运往重庆，蒋介石在码头迎灵，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其后，遗骸运回故乡，被安葬于抗日烈士公墓。

日军发动攻势一周后，无论是日军还是中国军队，都认为剧烈的作战到此为止了。日军分三路急进，中国军队稍一抵抗便开始撤退，日军终究兵力有限，松散的包围圈到处都是缝隙，日军进攻得有多快，中国军队撤退得就有多快，众多兵力几乎瞬间就能从日军的眼皮底下跑光。因此，日军第十一军认为，其第一阶段作战成果不大：

第一次会战（汉水东岸作战）不是这次作战的主要部分。这次鄂西会战的主要目标是歼灭汉水西岸之敌。为了保证作战的左侧背的安全，所以先有此第一次会战。为此，本作战未能使用较长时间和集中各方面的战斗力量求逐次消灭敌军。因此，在兵力分配上，由于兵团的间隙过大，造成敌人容易从侧面避退的缺陷。

由此看来，战前李宗仁违反蒋介石积极出击的指令，制订了看似消极的“不得已时撤退”的方案，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许李宗仁要采取的是薛岳战长沙的战术，即先把日军进攻之路让出来任其长驱直入，主力部队则撤到进攻日军的两翼侧后，待扑空的日军准备原路返回时相机实施夹击或反击。问题是：这次日军是否会原路返回？

位于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撤到了鄂西北的郧县，但李宗仁本人仍留在老河口。五月十日，李宗仁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说日军正在企图原路返回，第五战区应全力以赴猛烈反击，不但要围歼日军，还要穷追不舍，不能再像长沙会战时一样对回返的日军没有奋力追击以致难取战果。

一、鄂北之敌经我多日围攻，粮弹殆尽，必将向原阵地退却。二、第五战区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

战场附近，而后即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三、李及兰军应全力进袭花园、孝感，遮断平汉路。四、王缵绪集团应全力转向随县、唐县镇间进袭，遮断公路。五、张自忠集团应以主力先向唐县镇、枣阳间进攻，遮断公路，再转攻敌背后。六、周善军速东向枣阳方面进攻。七、孙连仲、汤恩伯两集团，速南向随、枣，截击敌人。八、刘汝明、王赞斌两部，应袭击信阳，如奏功，准悬赏五十万元。九、张、周、孙、汤各部，应切取联络，协同动作。十、敌主要退路只有唯一的襄花路，而该路雨后车辆不能运动，希严督各部，努力进击，必能收获空前战绩。以往湘北、粤北诸役，缺乏有计划的追击，致成果不良。此次我各部战力健在，应乘胜穷追，扩大战果。其作战不力，不能达成任务者，自总司令以下，应予处罚。

蒋介石的判断没有错误，日军确实在南撤。

只是，日军南撤的目的并不是返回出发地，而是南下集结准备执行第二阶段的作战，即攻取宜昌。

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国方面没人预料到日军是这样一个攻击计划。

中国军队刚刚转入反击，蒋介石的电报接二连三，焦灼之情跃然纸上。电报不但详细指明了每一支部队的出击方向和任务，而且强调如果轻易让日军就这么退了，不但是我军的耻辱，还会让日军更加蔑视中国军队。因此，各部队须“不眠不休，各向任务迈进”，以期将撤退中的日军一举歼灭。

查鄂北之敌佳日（九日）进至唐白河畔，似已完成其作战计划，开始撤退矣。我军依适切之机动，粉碎敌包围我军于襄东平地之企图，并造成反包围态势，殊堪嘉慰。惟截至现在为止，敌我之损害略等，倘纵敌悠然退回原阵地，则我军决不能自矜为战胜，而且将为敌所蔑视。仰即督率所部，克服一切困难，不眠不休，各向任务迈进，乘敌脱离据点态势不利及补给缺乏之好机，努力一举将其歼灭。并仰各将士深体追击为完成战果最有效手段之明训，以坚强意志与卓越统帅相配合，完成光荣之使命，勿得逗留不进，坐失战机为要。

中国第五战区各部队展开了猛烈反攻。

中国军队的反击速度，竟也出乎了日军的意料。

根据李宗仁的部署，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

军以及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由北向南；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和周碞的第七十五军由西向东；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和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由南向北；同时，在战场的外围，郭忏的第九十四军在京山和应城方向攻击日军的后方补给线，游击第七军和鄂东游击队袭击了平汉线上的重要据点。——中国军队的反击目标明确：把日军第三师团主力压缩在枣阳以西约三十公里处的双沟地区，予以歼灭。

在中国军队合围圈的北部，从十二日开始，孙连仲部和汤恩伯部逼近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的石本支队后，立即发起攻击，两个集团军同时将当面日军分割成两半，使日军陷入他们没有料到的苦战中。由于携带的粮弹不多，获悉后方补给线被切断时，第三师团和石本支队感到了危机。

五月十二日，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胁正隆日记：

晴热。本日为左右纵队靠拢集结的日子，但四面都是敌人。又，野炮部队正遭受北面之敌的攻击，粮秣补给都无法想象。

十五日，步兵第二十九旅团旅团长大城户三治，致电园部和一郎师团长：

敌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乞望增援一个大队。另外，希望在白河右岸采取收容措施（连续出现伤员）。

接到求救电报后，第十一军作战主任参谋天野正一中佐紧急拟订救援方案：

在制定如何救出第三师团的作战方案时，考虑了两个方案：一是令正在南下的第十三、第三十九两个师团再次北上；二是令第三师团独自解围后退。但前一方案如在讨伐张集团军（张自忠部）后再北上，则将失去时机。于是与第三师团联络，师团司令部表示还有一些力量。因此，决定采取后一方案，令第三师团独自后退。

十五日中午，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日军第三师团从中国军队的围攻中冲了出来，于十六日集结于枣阳。

中国第五战区对日军第三师团的损失估算如下：第三师团从信阳出发时兵力为两万多，“五月十日以后，由新野、唐河镇向枣阳撤退时，仅七八千余，其中虽间有向桐柏、信阳退窜者，但被我击歼数目，亦在四

千以上”。日军第三师团确实损失严重，而中国方面对战果的估算也有夸大之嫌。

只是，中国军队围攻的，仅是日军三个主力师团中的一个。

此时，在咫尺之遥的战场南部，张自忠部正孤军面对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

张自忠，中国军队中的一位悲情将军。

由于卢沟桥事变前后不断地与日方周旋谈判，张自忠曾被中国民间舆论称为“汉奸”。这以后，深深的负罪感令他随时准备以死来证明自己。他率部奔波于从淮河到临沂、从汉水到枣阳的广阔战场上，他只想一死，但须拼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枣宜会战打响后，日军突破中国守军的正面防线直插枣阳地区，身处襄河西岸的张自忠意识到实现夙愿的时刻又一次来临了。他对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将领们表示：“只要敌人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寇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五月七日，判断日军将要返回出发地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张自忠部出击枣阳截击日军。

其实，张自忠已从日军俘虏口中得知，日军并不是要返回出发地，而是准备集结进攻宜昌。他立即把情报上报给重庆，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张自忠不敢也不愿指责重庆统帅部。他知道，如果他的部队迎着优势之敌而上，必定凶多吉少，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率领他的部队与日军决一死战。

他让副总司令冯治安负责襄河西岸防守，自己则渡河到东岸战场上亲自督战。

临行前，预感九死一生的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一封遗书：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七九、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本着我

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张自忠还给他的老部队第五十九军多年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军官们，留下了一封长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中国军人，捧读此信都会令人警醒：

近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等敷衍，弟对部下也敷衍；敌人未来，我们对敌人是敷衍的布置；敌人即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敷衍一下就走。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聪明，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其实更难；似乎近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今天不打，明天还是要打；在这里不打，退到任何地方还是要打。平定是一样的平定，牺牲是一样的牺牲。所以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我与弟等同生死、共患难十余年，感情逾于骨肉，义气逾于同胞，我是不忍弟等走这条灭亡的死路。弟等素识大体、明大义，谅必也绝不肯走这条死路。无疑地，我们只有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拼。我们既然奉令守这条线，我们就决定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我们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令绝不后退。我与弟等受国家豢养数十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还拼不了吗？幸而我们的拼，能挡住了敌人，则不仅少数的几个人，就连我们全军，也必然在中华民国享有着无上的光荣，我们的官兵也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我们没有亏负了他们的豢养，我们也不愧做了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的，是我们唯一无二应该走的路。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最后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功亏一篑？故惟有盼弟等打起精神，咬定牙根，拼这一仗，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张自忠出击了。

日军已经得到了张自忠部出击的情报：

张自忠右翼集团主力逐次在大洪山北麓地区集结，有开始北进之模样。军决定捉住敌军蠢动之良机，在汉水彻底消灭之。

张自忠渡河后，与黄维纲的第三十八师取得了联系。五月九日，他亲自指挥三十八师，以伤亡五百多人的代价，突袭了日军辎重部队的指挥所，大量歼敌，缴获甚丰。十二日，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命令他迅速率部截击襄河东岸向南运动的日军。在后续部队尚未跟进的情况下，为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截击日军的先头部队，张自忠亲率第七十四师的三个团向方家集、南瓜店一带推进。此时在襄河东岸的中国军队，只剩下张自忠的部队了。攻占方家集后，张自忠清点了一下兵力，第七十四师二千人左右，骑兵第九师五百多人，再加上总部手枪营，总兵力不超过三千人。后方补给线已断绝。

日军认为与他们纠缠的中国军队人数不多，但混战了一天一夜后，不但当面的中国军队依旧作战顽强，且夜间日军阵地还受到猛烈奇袭。日军这才知道，当面的中国军队非同小可。十五日天一亮，日军集中了更大的兵力，在三十多架战机的轰炸下，发动了更为凶狠的围攻。

张自忠和他的官兵一面嚼着炒黄豆一面与日军拼死作战。

前沿的数次肉搏结束后，日军终于决定撤出战斗，避开这群死战的中国官兵，从另外一个方向南下。

十五日，张自忠给蒋介石发出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封作战电报：

即到。渝委员长蒋：影密。

报告：一、职昨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亲与南窜之敌约五千余名血战竟日，创敌甚重。晚间敌我相互夜袭，复激战终夜。今晨敌因败羞愤，并因我追击，不得南窜，并调集飞机三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向我更番轰击，以图泄愤，并多路南窜。我各部经继续六七次之血战，牺牲均极重大，但士气仍颇旺盛，现仍在方家集附近激战中。二、我三十八师、一七九师，昨已将新街敌数百名击溃，当将新街克复，现仍继续向南追击中。三、据报，残敌一部约千余人，因被我各处截击，现企图沿襄河东南窜，已饬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努力截击中。谨闻。

职张自忠叩。

发现当面日军绕道南下后，张自忠立即率部开始追击。被张自忠死缠不放的日军，是企图向南集结的第三十九师团。

此时，张自忠完全可以不去追击，因为他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

日军已经知道决心与他们死战到底的中国军队将领是谁了。日军通信部队截获了重庆与第五战区之间的电报，也截获了张自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五月十六日晨，第三十九师团在扫荡圆沟（宜城东北约一公里）附近山地时，九时接到通讯部队的通报说‘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即在圆沟’。第三十九师团接到这一情报，顿时紧张起来，黄昏前向敌人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掉头转身，对张自忠部完成了战术包围。

张自忠顿陷绝境。

张自忠部兵力单薄，没有后援，无法构筑纵深阵地，狭窄的前沿后方就是总指挥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集中了五千多兵力以及所有的火炮，向张自忠部的阵地发动了凶猛的合围。调集部队增援，至少需要半天，如果即刻撤离，也许尚可冲出去，但临阵脱逃是张自忠誓死不能的。为坚持到增援部队抵达，张自忠指挥少量部队死守阵地。残酷的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阵地四周的小高地便相继失守。那些还活着的中国官兵知道总司令就在身后的小山包上，于是纷纷向总指挥部靠拢。而张自忠身处的小山包，在日军的攻击下已尸体遍布，张自忠左臂负伤仍立于山头督战。日军的又一阵弹雨过后，张自忠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倒下了。

日军向山顶蜂拥而来。

之前，张自忠把他的卫队全部派往一线阵地，此时身边只剩了始终不肯离去的高参张敬。张敬用手枪射倒几名登上山包的日军，随即被后面冲上来的日军用刺刀刺倒。

一颗子弹再次射入张自忠的腹部。

一名日军士兵冲上来，用刺刀向张自忠刺去，张自忠突然挺立起来，试图抓住日军士兵的刀刃。

另一名日军士兵的刺刀凶狠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张自忠永远地倒下了。

日军士兵开始检查尸体，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一名日军少佐上来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了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闻讯赶来，因为他认识张自忠。他与张自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他对张自忠的印象是：“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专田盛寿跪在地上，为张自忠整理了破碎的军衣，然后命令下属用担架将其遗体抬下山埋葬。

敌将尸体抬至三十余里之陈家集附近，将尸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标志，上书英勇上将张自忠灵等字样，并向灵墓敬礼。

张自忠，抗战中国阵亡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官兵得知噩耗后，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后山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日军的记载是：“当夜即被数百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

张自忠的遗骸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着上将领章和短剑，装入一副贵重的楠木棺材里。灵柩运抵宜昌后，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护送前往重庆，一路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中国百姓在长江岸边长跪不起。五月二十八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臂挽黑纱立于江边迎灵。此时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重庆全城无人躲避，百姓们把盛满手擀面条的大碗高举过头顶，这是他们为张自忠做的一碗送其远行的北方饭。

时年五十岁的张自忠，十六岁那年由母亲做主，与山东老家的一位名叫李敏惠的十七岁女子结婚。婚后数十年中，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得知丈夫殉国后，李敏惠从容料理好家事后，绝食而死。

蒋介石通电全军，认为张自忠以身殉国之举，不但令全国百姓认知了曾“为全国人民所不谅”的他，且其所作所为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始大白于世。夫见危受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

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为张自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写道：张自忠的殉国之举“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至，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只要秉承张自忠这种不屈的精神，中华民族就能渡过“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

张上将的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所需要的宝贵精神，尤其是在抗战接近胜利而艰危过于往常时，更需要这种精神。不动摇、不妥协地来咬紧牙根，牺牲一切，以渡过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

不苟私利的献身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尊严来讲，永远都如金子般宝贵。

因此，张自忠的死，成为国人心头难忘的痛。

这就是这片国土上至今以“张自忠”命名的城市街道如此之多的原因。

张自忠部的拼死作战，令日军决定暂缓攻击宜昌，即刻向中国军队实施反冲击。

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训示：

襄东之敌妄自判断我军将返回原驻地，因而将搜罗的残兵和招募的新军集中在白河下游地区，企图进行全面反攻，突进枣阳。各兵团作战半月，纵横驰骋于襄东原野，未得一日安宁，英勇奋战，功劳殊大。今更面临利用敌军之冲动，将其诱至唐河以东予以消灭之良机。各兵团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广用虚实战术，加深敌人的骄傲情绪，然后转用轻装兵力，做好隐蔽态势，待时机到来以闪电般的速度，一举将敌歼灭在白河河畔。

日军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再度北上，与摆脱了中国军队围攻的第三师团在枣阳附近会合，三路日军形成了一种相互连接的迎击态势。当日军秘密集结时，中国方面没有判断出日军的反击意图，各部队仍旧在

向枣阳附近靠拢，以致交战两军迎头接近，前沿部队最远相距五公里，最近相距仅一公里。

十九日，日军突然发动全面反击。

在四十多架战机和二百多辆坦克的配合下，日军的反击铺天盖地，当面的中国军队孙连仲部、汤恩伯部和郭忏部猝不及防，只有迅速脱离战场，向白河以西转移。出乎日军预料的还是中国军队的撤退速度，无论日军的反击有多么快速，始终赶不上中国军队的撤退速度。二十一日，日军第三师团追到老河口东北约六十公里的邓县，第十三师团追到老河口附近，第三十九师团追到老河口东南的樊城地区，但就是没能追上任何一支中国军队。

日军全面逼近老河口，李宗仁急令桂军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前来阻击。第八十四军之前几乎是溃不成军地撤退到这里，此时还是遵照李宗仁的指令在樊城外围以及白河岸边布置了防御线。

日军追来了。

追到白河岸边的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

或许是被战果冲昏了头，日军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于是灾难突然降临：

步兵第二三三联队于二十日黄昏派出三名将校，在白河下游侦察渡河点的地形，其中两人卧倒，从芦苇中用望远镜察看，另外一人因敌人打来的子弹不密，即以站立姿态展望，后者判断前岸为河中的沙洲，但在向上报告时却采用了前者的判断：就是对岸。结果当二十一日零时左右升起渡河成功的蓝色信号弹时，在对岸业已做好瞄准准备的敌人一齐开始猛烈射击，联队在毫无隐蔽体的沙洲上不断出现伤亡，瞬间就牺牲了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以下三百数十人。

在白河对岸阻击日军第二三三联队的中国军队，正是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

瞬间日军就被打死了三百多人，这在日本陆军的作战史上尚不多见。

或许直到此时园部和一郎才意识到，他被中国军队在此纠缠得太久

了，于是命令全线停止追击。

从日军发动攻势始，已经连续作战二十多天，不但部队疲劳，且伤亡很大。从战斗过程上看，尽管日军说他们取得了大量歼敌战果——日方的统计是："敌遗弃尸体三万三千余，被俘一千余。"——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已丧失战斗能力，如果日军再打下去的话，中国军队依然能与之进行顽强的周旋。

进退两难的日军第十一军的将领们，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悲观的想法：此战到此为止，部队打道回府，不再进行攻击宜昌的第二阶段作战。这种半途而废的想法，自中日开战以来，在日军的作战中尚无先例：

本来，此次作战是园部军司令官到任伊始决定的，给敌人的冬季攻势以反击，取得粉碎敌军的战果，就算达到了目的。这一点，从过去两旬的战绩看，已充分达到目的。于是五月二十三日，园部军司令官以下军司令部的大多数，对今后作战"开始犹豫不决"，即所谓按计划即使不进攻宜昌，也无损于"军的威望"，"作战到此为止"的想法开始抬头。军首脑们被爱惜部下的感情所笼罩，实在找不到继续进行作战的切实理由。

在湖北应山的第十一军司令部里，就是否继续进行第二阶段作战发生了激烈争论。参谋长青木重诚明确表示，作战必须到此为止。大多数参谋，特别是负责后勤的参谋，更是一致赞成就此停止，他们的理由是：一、中国军队的抵抗顽强，第一阶段作战花费了比预期多出一倍的时间，天气炎热，部队来回机动作战，既然从战果上看已经达成了目的，就不必驱赶极度疲劳的部队再去苦战。二、原来呈报此次作战计划时，大本营就在是否占领宜昌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表态十分含糊，更没有必须占领的说辞。那么，第十一军有什么必要非到那个宜昌去不可呢？但是，第十一军作战主任参谋天野正一坚决反对"到此为止"。他认为，作战虽然出了点小问题，但仅仅是局部的问题，以部队疲劳为理由停止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毫无道理。如果此时终止作战，就会失去上下的信赖，有损于第十一军的荣誉："我第十一军直到现在，一向被誉为派遣军独一无二的能完成摧毁敌军任务的部队。如果照这样，今后只好把任务奉还了。"

园部和一郎的最后决定是：继续作战。

为了支持第十一军的第二阶段作战，中国派遣军从第十三军的第二十二师团调来了辖三个步兵大队的松井支队和一个山炮大队。同时，第十一军还出动数百辆卡车，为前线部队运送了多达一千多吨的粮食和五百多吨其他军需品。

二十九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在第三飞行团和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助战下，用奇袭的方式强渡汉水，击垮中国军队的防线。第三师团三十一日从襄阳东南方强渡，攻占襄阳，消灭当面中国军队后迅速南下，向宜昌攻击前进；第三十九师团三十一日在襄樊以南的王家集一带强渡汉水，南下攻击占领荆门后，与第三师团合力攻击宜昌；第十三师团稍后在荆门东南方向的旧口附近强渡，向西直插宜昌城；第四十师团位于大洪山一带扫荡，保护战场后方安全。

三十一日十九时三十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开始炮击汉水西岸的中国守军阵地。该师团在白河渡河时曾遭到重大损失，因此这一次格外小心，炮击竟然长达一个半小时，步兵才开始强渡。在日军强渡点的对岸，中国守军右边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个警备旅，左边是第四十一军一部，两支部队装备都低劣且兵力不足。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开始强渡时，中国守军竟然把日军用小马达牵引的木筏和橡皮艇看成了水陆两用的坦克，于是惊慌失措地报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部根据这一判断向重庆要求空军参战。中国空军派出了九架蚊式轰炸机前来轰炸，这时候，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个警备旅已撤走，第四十一军的阵地也无人防守了，中国空军飞行员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强渡成功。

午夜，日军第三师团在襄阳附近开始强渡，拂晓前全部渡过汉水，在没有遇到强烈抵抗的情况下迅速南下。

汉水江防之所以十分薄弱，是由于战前的判断失误。从重庆军事委员会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始终着眼于汉水以东的抵抗，根本没有制订一旦汉水以东阻击失败、日军强渡汉水向西进攻的作战预案。因此，江防部队被第五战区调走了，汉水西岸部队也大多被调到了东岸。

六月一日，日军第三师团轻取襄阳城。

三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行南下，迅速推进。第十三师团与池田支队、汉水支队也于四日从旧口镇附近渡过了汉水。

中国江防军的防御阵地都是正面朝东构筑的，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已经占领武汉的日军必定是正面朝西进攻。但是，此时日军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都在从北向南进攻，攻击的是中国江防守军阵地的侧背，也是中国江防守军的第二甚至是第三线阵地。由此，中国江防军事先构筑的一线阻击阵地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同时，当阳、荆门以北的远安、南漳等地，相对于鄂北的随枣战场而言，都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中国方面在此没有任何作战准备，现在都成了日军攻击的一线。所以，当日军两个强大的师团强渡汉水后，突然从江防军的侧背插进来时，兵力薄弱的中国守军瞬间就溃败了。

得知日军强渡汉水并开始攻击宜昌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紧急重新部署防御：第五战区部队被分成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由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组成，统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负责正面阻击；右兵团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和江防军组成，统归陈诚指挥，负责确保宜昌安全。同时命令周碞的第七十五军、郭忏的第九十四军火速从汉水以东渡河，回归江防军建制。

战局危急万分，以致政治部部长陈诚也被派赴前线。

六月二日晚，陈诚抵达万县，三日便在宜昌附近的三游洞开设了作战指挥所。为确保宜昌，陈诚请求蒋介石将在重庆整训的中央军主力部队第十八军紧急船运宜昌。

但是，中国方面的紧急部署为时已晚。

六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

一、汉水右岸之敌军在局部地区虽有抵抗，但全线正向荆沙路以西退却中。陈诚正在用第二线兵团和重新集结的数个师，在当阳南北一线紧急组织新的抵抗。

二、军决定以追击余势，乘敌态势未整备好之前，突破当阳南北之敌阵地，将敌围歼在宜昌以东地区。

三、第三师团席卷当阳西北面敌军左翼，向宜昌东北地区突进。

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当阳附近敌军防线后，将敌压向宜昌方向。

五、第十三师团突破敌阵右翼后，向宜昌方向突进，粉碎敌人向南面逃脱的企图。

六、池田支队攻占荆州、沙市。

七、松井支队（配有仓桥支队、小川支队）面对襄阳方面之敌，掩护军的右侧背。

在荆州东南方向的旧口附近，日军第十三师团强渡汉水后直接西进，其前锋距离宜昌已经很近了。南下的第三、第三十九师团攻占南漳和襄阳后，不顾中国军队的尾随，继续南下直插宜昌。六日，日军推进到观音寺、荆门、十里铺一线；八日，日军池田支队攻占江陵和沙市；九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当阳。当阳为宜昌门户，陈诚特别调来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当阳顽强阻击，部队伤亡惨重，当南面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苦战数日撤退后，第十一师因两面受敌也随之撤退，当阳失守。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没有力量按照指令沿宜沙公路边撤退边逐次抵抗，而是分成若干小股寻找渡口南渡长江脱离了战场，致使沙市至宜昌之间成为不设防地区，宜昌以东的防御屏障完全洞开，沿着公路推进的日军长驱直入猛扑宜昌城。

在危机中，重庆军事委员会再次决定，用决堤手段阻止日军的攻势——中国最高统帅部曾在徐州会战时掘开过黄河大堤，在武汉会战时掘开过长江大堤，现在又要掘开汉水大堤。决堤地点选在旧口镇附近，决堤部队是配属两个工兵营的第四十四军。第四十四军位于大洪山一线，要携带大量炸药前往决堤地点，路上敌情不明，路况复杂，导致行动迟缓，走到半路竟然找借口回返，致使决堤之事不了了之。但是，即使第四十四军按时掘开汉水大堤，遭殃的也只能是当地百姓，因为推进速度极快的日军早已突过了中国方面预定的泛滥区。

宜昌是沿长江进入重庆的重要门户，负责城防的江防军肩负着保卫战时首都的重任，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蒋介石曾下令，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得调动江防军部队。但是，由于此前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不会攻击宜昌，加上枣阳附近的作战吃紧，宜昌江防军中的两个军都被调到枣阳方向，导致此时的宜昌几近无人防守。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陈诚只有紧急调兵，可直到十日左右，第十八军的第十八师和第一九九师才陆续抵达宜昌附近——第一九九师被配置在宜昌西北面，第十八师负责死守宜昌城。一个师守一座城池，兵力显然单薄，第十八师命令五十四团守城区，五十二和五十三团守城防一线阵地，所谓一线阵地就是

短短的一线而已：右至长江岸边，左至镇镜山。

十一日拂晓时分，日军第十三、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分三路围攻宜昌城。日军猛烈炮击中国守军的阵地，然后步兵开始冲锋，双方陷入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日军突破中国守军五十二团城郊的正面阵地，直扑宜昌机场，防守城区与防守城郊的中国守军被分割成两段。镇镜山上的第十八师指挥部与守城的部队失去了联系。

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造成混乱。五十二团一部撤入市区，影响守城部队亦陷于混乱，五十四团守城官兵大部过江，逃往西岸（长江出西陵峡到南津关改向南流，宜昌城区在江东岸），找到船的幸免于难，泅渡的不少淹死江中，该团团长皮宣猷畏罪潜逃。五十四团虽未经什么战斗，但战后收容仅剩四五百人。五十二团除伤亡外，大部越过黄柏河向南津关方向溃退。在此情况紧急时，军长彭善急调第一九九师的一个团到前坪背后占领三一〇高地，掩护第十八师侧背，同时彭善本人（一九九师师长宋瑞珂和参谋长梅春华随行）亲自走到前坪小高地上指挥观察当前情况。到黄昏时，他命令第十八师师长罗广文到后坪收容部队，以其副师长李钦若和参谋长赵秀昆指挥五十三团守镇镜山，以作逐步收复宜昌的支撑点。罗再三在电话中请求说，李副师长情况不熟悉，愿自己留在那里，让他们下来收容，彭遂以赵参谋长和参谋主任汤国城留在山上指挥。在六月十一日入暮前，敌集中火力向镇镜山猛攻，赵等躲在的掩蔽部，因敌炮火硝烟浓密冲入，使人感觉呼吸困难，汤国城素来胆小，喊了一声“是毒瓦斯”，赵当时将计就计伪装中毒，自动率五十三团放弃镇镜山，撤过黄柏河。至此，仅经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六月十二日完全陷于日军手中。

日军以三个主力师团夺取宜昌，深入到中国军队控制地区的腹地。但是，日军的既定策略是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而不再占领地盘。因此，攻占宜昌的当日，第十一军司令部就下达了从宜昌撤退的命令。

日军的战果统计是：中国军队“交战兵力约为三十五万人，遗弃尸体为六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具，被俘为四千七百九十七人”；日军的损失是“战死一千四百零三人（内将校一百零六名），负伤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内将校二百零三人）”。

十七日，根据日军第十一军的命令，三个师团撤出宜昌，开始向汉水东岸撤退。

中国军队尾随而至：十六日，第五战区左兵团的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进抵荆门和当阳以北地区；右兵团开始向沙市、荆门和当阳留守日军发起进攻；十七日，彭善的第十八军尾随撤离的日军进入宜昌城。

就在中国方面准备庆祝“收复”宜昌之时，撤到半路的日军突然停住了脚步。

也就在日军围攻宜昌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以及东京的日军大本营之间，已就宜昌问题爆发了严重冲突。

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扼守着三峡水路咽喉，东距武汉二百七十多公里，西距重庆四百八十多公里，既是两湖唯一水运通道上的要冲，又是沿长江西进重庆的门户。无论对中国方面还是对日军来讲，宜昌的地理位置都是无可替代的。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沿岸，再也没有哪座城市如此地接近中国的抗日中枢。如果日军能够长期占领宜昌，不仅军事上占据了梦寐以求的战略要点，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效果极其明显。但是，要实现长期占领，所需兵力从哪里来？首先提出确保宜昌的是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可派遣军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长期占领宜昌就须投入兵力，而东京大本营已决定削减在华兵力。日军强渡汉水那天，东京陆军省的幕僚们抵达南京，派遣军司令部提出了确保宜昌的建议，由于建议与削减在华兵力相矛盾，结果谁也拿不准主意。九日，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飞抵汉口，确保宜昌的建议得到了海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少将的赞赏，海军的理由是更加便于轰炸重庆。当日，井本熊男又抵达位于应山的第十一军司令部。显然，陆军的将领们很是恼火：原定计划就是长期占领宜昌，后来被否决了，现在又重新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经过彻夜的争论，终于有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根据第十一军现有兵力，确保一至两个月可以，但难以确保长期占领；如需长期占领，大本营就须给第十一军增加两个师团的兵力。十日中午，失望的井本熊男只有飞回南京，飞机起飞后他特意到宜昌上空转了一圈——“虽有无限贪恋但又不得不放弃”。

就在这时，那个惊人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德军占领了巴黎。

日军参谋本部的军官们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不要耽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声又一次弥漫日本朝野。而已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也认为：“总得想个办法确保宜昌。”于是，大本营再次征询第十一军，是否能确保宜昌？第十一军决心与大本营对抗到底：或者改变减少在华兵力的决定，或者实施大兵力增援，否则第十一军就无法确保宜

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同时向大本营施压：因为削减在华兵力而迫不得已从宜昌撤退会是千古恨事。

宜昌问题摆在了天皇面前：

六月十五日下午十一时三十分，闲院宫参谋总长和代理军令部总长一并向天皇上奏了“日华新关系谈判开始后统帅部应采取的措施”。这时海军方面报告了当时正在实施的海军航空队轰击重庆的问题，提出把“宜昌”作为中继基地有极大的价值。天皇当即问陆军：“陆军对宜昌有什么好办法吗？”

第二天，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确保宜昌“一个月”的命令。

第三师团接到命令后，紧急命令所属第二十九旅团迅速往回走。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田中静一于十七日上午在距宜昌十公里处接到第三师团送来的紧急命令后，部队立即掉头。

中国军队没想到日军会回来。

掉头回来的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很快与中国军队混战在一起。十七日当天，日军的先头部队再次冲进宜昌城。此时，刚刚“收复”宜昌的中国军队第十八军官兵连背包都尚未放下。

日军认为，重新占领宜昌可谓“充满了苦难”：之前撤离时把可以利用的兵营等设施全炸毁了，回来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撤离时还把所有的通信设施破坏了，一根电线杆都没留下，现在全部要重新布置。特别是粮食和弹药，本来宜昌是中国东部沿海物资转运西南的重要中转站，光囤积的大米就有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五袋，燃料和弹药之多更是“其数无法形容”，但此前撤离已经把它们都“烧毁或扔在长江里了”，现在吃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经过数天的整顿，重新集结在宜昌四周，他们决不会甘心日军占领宜昌，那么，日军还要出动多少兵力，经过多少次苦战，才能真正稳定对宜昌的占领局面？

日军重新占领宜昌后，中国军队在宜昌、江陵、当阳、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与日军形成对峙。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设置了第六战区，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湘西和川东。

枣宜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结束。

就日军而言，除了占领宜昌之外，既没有歼灭中国第五战区的主力，也没有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

中国军队从早期的判断失误，到中后期指挥上的错误，不但使作战部队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且丢失了战略要地宜昌。

针对枣宜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联军事总顾问福尔根给蒋介石写出一份总结报告，严厉指出了中国军队致命的两大问题：一是最高军事统帅部作战指挥的问题，二是军队将领们拥兵自保的问题。

窃此次宜昌失陷，其原因异常明显，无须加以详细陈述。

职兹拟就其基本原因，加以检讨如下：

一、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此种偏见，无形使前方各级将领，尤其军委会之心理，遭受很大影响，形成消极及动作异常迟缓等现象。

二、对于部队作战，缺乏坚强与连续一贯的领导，尤其军委会方面为然。

三、极端迟缓，一切处置照例，耽误时机，以致凡事落在敌后，未能制敌机先，敌则处处制我机先。

四、缺乏监督及贯彻目的之严厉要求，尤其军委会方面如此。军委会一切命令，往往刚刚下达到部队去，便立刻从事变更与修正，事实上无异取消自己甫经发出之命令。

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

上述一般基本原因，产生种种战略战术原因。兹择其最主要者如下：

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在作战进程中，完全没有协同，第三、第九战区（尤其是第九战区）之按兵不动，不但使敌从容由武汉南部抽调大批军队转用于第五战区，增强其进攻我第五战区之兵力，且直无异促成敌大胆之冒险行动，结果遂使敌占领宜昌。敌占领宜昌，乃第九战区消极不动所致。

二、战区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及军长等，缺乏勇敢与主动精神，无有贯彻任务之毅力与决心。

三、兵力使用不集中，且犯各个使用之弊。换言之，即作战时不用主力。例如命令一军攻击，军则只派一师，师派一团，团派一营，结果所谓一军攻击者，实际不过一营兵力而已。

四、不善于事先筹划并组织通信连络，以至于战局过程中，未能保障军队指挥之不间断。结果每遇战线一部发生些微动摇，有线通信中断，部队指挥随之即告停止。

五、完全不明情况，所有报告照例，不合实际情况，往往夸大敌情及本军之损失。间有一部将领，欲求掩饰其不明情况及不善指挥之过，转而藉口下级指挥官或部队不行。须知部队素质之良否，厥惟其主官及司令部之良否是赖，凡指挥得当之部队，必能勇敢善战。

……此等问题，前在南岳、柳州、重庆等会议中，业经钧座阐明无余，并指出具体办法，一再下令，要求各级指挥官根本改进在案。但观此次宜昌失守，显然证明钧座对于此项问题之指示，军委会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等，依然未能切实明了，以故迄未遵照实施。

职认为军队作战指挥问题，乃我军最落后的问题之一，此问题最为重要，亟需于短期时间，加以彻底解决。

吾人应确保对于部队之指挥的坚决性、连续性与果断性，对此问题之解决，首须自军委会始。军事委员会对大军统帅与指挥，须按时化、具体化、坚决化、连续化，成为全军之表率。

我军尔后作战之胜利，全唯军队指挥问题之能否正当解决，能否根据现代大军作战指挥方式，实施指挥是赖。

此论极其精准。

无论如何，日军已经逼到了重庆的大门口。

日本战史的记述是：“众所周知，这次作战给了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区部队，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在重庆很快传出‘日军逼近重庆’的风声，加上欧洲形势激变，使重庆政府内部抗战与和平两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

昌作战的时候。这时，一个走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时机已经来临。”

然而，日本人一直渴望的这个“时机”真的来临了吗？

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刹那”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接到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写来的一封亲笔信：

蒋介石阁下：

闻悉过去半年多来，阁下委派的代表与板垣中将的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的结果，近期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

余深信此次会谈，定可奠定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麿

昭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此时，米内光政内阁倒台，近卫文麿再次出任首相仅一个月。

一九四〇年盛夏，在战场上经过长时间的苦战后，战场下又经过长时间的“谋略”后，日本人以为他们看到了结束战事的契机。

与重庆方面展开的秘密谈判，日本人制订的代号是“桐工作”。

日军攻占宜昌后，除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仍在袭扰日军之外，广大的正面战场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交战双方于对峙线两边保持着原本态势。

由于日本支撑战争的国力日渐衰退以及用战争令中国屈服的目的无望，东京军界高层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其中一部分军官坚持认为：指望与汪精卫的政治交易，无论如何也结束不了战争，要想尽快结束战争并保持日本的在华利益，就必须面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需以谋略对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进行诱降。——“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谈判不可。”在日军参谋本部中，持这种观点的军官以天皇的弟弟、作战课参谋秩父宫雍仁中佐为首，他曾向天皇提出“以蒋为对象即刻无条件停战”。秩父宫雍仁的建议得到认可后，日本方面确定，此项工作由曾任日本驻华武官、现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今井武夫大佐以及刚从香港返回日

本、出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的铃木卓尔中佐共同负责。铃木卓尔随即以“语言军官”的身份返回香港，开始了“桐工作”的前期准备。

深陷战争泥潭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在结束对华作战的问题上同样急迫。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都积极主张与蒋介石政权秘密接触以谋求战争之外的解决方式。西尾寿造上任之伊始，就确定了“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的原则；板垣征四郎则对“汪蒋合流”极为热衷；多田骏甚至已经为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而托关系找门路了。

铃木卓尔回到香港，请求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从中斡旋，促成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会面。宋子良时任中国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公司总经理，常住香港。宋子良听说此事，一开始断然拒绝，之后又答应可以会面。于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政治游戏拉开了序幕。

参与“桐工作”的日本人，此前谁也没有见过宋子良。宋子良不但按时抵达秘密会见地点，还带来了重庆方面的立场：一、中国准备在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希望得到美国等第三国的调停；二、谈判前实行停战，日本方面必须保证谈判成功后从中国撤军；三、日本方面应该信任国民政府有镇压共产党武装的能力。同时，宋子良也向日本人提出三点疑问：一、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现在又主动要求接触谈判如何解释？二、一旦谈判成功，日本方面是否有诚意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态势？三、日本方面能否给蒋介石本人写一封信，让世界知道是日本方面主动要求和谈的？

铃木卓尔与宋子良见了三次面，他渐渐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宋子良。他让人从门锁的钥匙孔里秘密拍下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送到南京伪政府让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辨认。但是，放大数倍的照片依旧清晰度不够，两人一会儿说可能是一会儿说不太像。板垣征四郎的态度是：“只要是同重庆进行着联络，即使是冒充的也没什么妨碍。”——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日军逮捕了一名“重庆间谍”，审问时被担任过“桐工作”现场翻译的日军军官认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的“宋子良”，其实他是重庆军统局头目戴笠派出的一名特务。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在中国战场上走进死胡同的日本人，对谈判抱有急切的希望是真实的。

与“宋子良”有了接触后，日本方面批准正式开展“桐工作”，并阐明了下列谈判条件：中国承认“满洲国”；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

汪精卫合作；日军驻扎华北和蒙疆；华北和长江下游实行日中经济合作；治安恢复后日军可撤走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日军在海南岛建立海军基地，等等。 “桐工作”开始进入讨价还价的正式谈判阶段。为此，双方都加强了阵容。日本方面的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白井茂树；重庆方面的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当然还有那位“宋子良”。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夜，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一开始就进入了三个最为重要的议题：中国抗日问题、承认“满洲国”问题以及共同防共问题。日方代表要求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重庆代表没有反驳，说如果实现了和平自然就不抗日了；关于承认“满洲国”，重庆代表没有断然拒绝，但要求这个问题拖延一下再说，理由是如果中国承认“满洲国”，势必损害国民政府的形象，会失去国际上的信任和援助，所以最好待条件允许时再谈；关于“日中经济合作”，双方一致认可。只是，在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上，重庆代表没有表态。

会谈持续四天，双方签订备忘录，然后各自回去汇报。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终于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门路和关系，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于是，司徒雷登专程赴重庆，向蒋介石传达了这样的口信：如果重庆方面有诚意，改变抗日容共政策，同意与汪精卫合作，日本就有与国民政府积极接触的意愿。蒋介石的回答颇为照顾这位著名美国人的面子：中国决心与日本打下去，除非美国出面调停；为与日本作战到底，中国愿意向美国申请贷款；至于与日本方面接触，日本必须首先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且要放置“满洲国”等问题。只有满足了上述条件，国民政府才可能与日本谈判。而与汪精卫合作，蒋介石断然拒绝。他告诉司徒雷登，无论是日本人的谈判还是美国人的调停，关于这一点想都不要想。

四月中旬，日本人等来了重庆的正式反馈：鉴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鉴于重庆军政内部对谈判存在相反意见，更鉴于中国共产党“收复失地”的坚决立场，日本方面必须重新考虑承认“满洲国”和在华驻军等条件，不然谈判难以继续下去。

谈判似乎就这么中止了。

尽管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返回东京作汇报时，仍旧认为事情并非完全绝望，一个月后很可能会有进展，参谋本部也同意再做一番努力，可

是中国方面完全没了动静。

对于中国历史来讲，这是一个危险时刻。

没有史据表明蒋介石想对日投降。原因很明显：首先，如果中国方面迫于军事失利而屈服，早在日军大规模入侵华北、华中、华南时就已经屈服了，何必等到现在？其次，作为中国抗日政权的首脑，气节姑且不论，仅从国内外舆论讲，蒋介石不能也不敢这样去做。因为他了解日本人的谈判底线是什么，而这条底线是他无论如何不可突破的，否则他将在中国历史上无法逃脱万年骂名。如果必须给蒋介石此刻的行为寻找依据的话，恐怕有二：首先，在反共问题上他与日本人有共同利益，至少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其二，用与日本接触的方式提醒美、英，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如果不想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亚洲战略基地，就必须加强对中国抗战的实质性援助，因为一旦中国屈服于日本，除了美、英等列强在亚洲的利益化为乌有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结局？

但是，历史无法揣测，更无法假设。

事实是：一九四〇年酷夏，蒋介石确实在与日本人进行看上去颇为正儿八经的谈判。在这一刻，历史进程哪怕有一丝闪失，中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让人产生巨大担忧的缘由是：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对日妥协和主张屈服的势力。特别是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导致国民党分裂成南京与重庆两个“中央”；即使在号称“抗战中心”的重庆，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庞大群体内，对日妥协的鼓噪始终没有停歇。

进入一九四〇年以来，欧洲不断传来德军所向披靡的消息。

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德军迅速北上吞并丹麦，同时向挪威发出最后通牒。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拒绝投降，英、法两国援军遭到德军重创后撤退，挪威绵延两千多公里的海岸以及重要城镇均落入德军之手。五月十日，德国空降兵空降阿姆斯特丹，荷兰女王逃亡伦敦，五天后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向德军投降。十三日，德军突入比利时，三天后布鲁塞尔沦陷，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在法军认为德军根本无法突入的阿登地区，德军只用了一天就突破了法军防线。德军装甲部队直逼巴黎，英、法联军三十五万人被困在法国与比利时边境的敦刻尔克，唯一的生路就

是从海上撤往英国。二十八日，就在日军向中国第五战区发动强大攻势的时候，重庆的报纸上描绘出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在法国海岸的暗夜中，成千上万的火星在闪烁，浓雾在海滩上升腾翻卷——那是陷于恐惧与绝望中的英、法联军同时做着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抽烟。为把仅剩的部队撤回英国本土，英国海军部动员了英伦三岛上所有的船只，从军舰、货轮到游艇、帆船。突然，不知为什么，希特勒下令德军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于是，被困在海滩上的英、法联军，至少有三十三万余人得以通过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本土。“敦刻尔克大撤退”令整个世界心有余悸。接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一节火车车厢里，逼迫法国人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短时间内席卷北欧和西欧的德国，伴随着战争掠夺了无以数计的财富，这让国力日益窘迫的日本人妒火中烧，扩大战争的言论在日本朝野更加甚嚣尘上。

令国民政府感到悲观的是，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对日实施禁运等制裁措施，但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国家卷入战争，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日本。英国在本土抵抗问题上态度强硬，对亚洲已经无力顾及，但还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关闭滇缅公路，禁止从香港向中国输入军械和汽油等作战物资。而苏联则一面支持中国抗战，一面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解除了日本扩大在华战争的后顾之忧。

此时的中国，无法预料战争到底还要持续多久。

毫无疑问，国人的这种茫然，很大程度源自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

四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在成都中央军校给即将毕业的军校生训话时，滔滔不绝地列举了中国军队军官队伍中的种种恶劣表现：

过去本校毕业学生，派到前方部队服务，往往有不到差的，也有故意迟误到差日期的，譬如一星期可以到达的，往往半个月或一个月，还没有赶到，而最不好的就是他不仅迟误时间，而且根本借故他说，如同逃跑一样，完全忘记了他自己是军官学校毕业的一个革命学生，而随便自找差使，自图便利，这就是自私自利完全不成其为革命军军人，而污辱了我们学校的名誉，对于这种学生我们大家都要当他作为革命军的败类！……临此时机，如果我们踌躇不前，逃避任务，那还能成为一个人吗？在社会上，一般人还能看得起你吗？就算你自己侥幸能找到一个差使，或是混过一时，但终究总要破案的，否则，就是你清夜扪心，想到

你自己受了国家与学校的培养，而不能尽到国家与学校所交给你的职责，反而偷生怕死，自私自利，你的良心能自安吗？

第二，就是本校过去毕业的学生，往往自以为在本校毕业了就是一个军官，就只要求做官，因而没有刻苦牺牲的精神，忘了他奋斗创造的本务，这是我们革命军最大的一个危机！……我们现在做了革命军军人，就与此前的军官完全不同，也就是要将从前军人只知做官的观念和升官发财的思想，完全改变过来。否则，不仅不能建立军队，而且要害了国家害了自己！你看我们中国从前清以来，到本党北伐成功为止，许多窃据名位的军阀和腐败自私的军官，一时非不喧赫，到现在还有哪一个能够存在，能不败亡吗？这就是因为他只知升官发财，自私自利，来图个人的安富尊荣而没有革命精神的必然结果！

第三，你们今天毕了业，以后派到部队服务，如果自以为做了一个官，不仅少尉中尉不乐意就任，就是上尉少校似乎都还不能满足个人的欲望，那你们存了这种做官心理，就无异自承做了士兵以外的一种特殊的军阀。由此一念，就要使你们在精神上和起居行动上一切生活完全与士兵脱离，这样断断不能达成革命的任务，更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须知我们官长的生活和事业，完全系之于全体部属与士兵，你的生活既与部属士兵脱离，那他还能信仰你、服从你吗？你的部下还能敬爱你这个官长而不和你疏远吗？现在一般军队最大的弊病就是在此！

从旧军队脱胎而出的中国军队，距现代化军队的标准相差甚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这些偷生怕死、只图自利的痼疾相比，滋长在中国军队某些将领身上的妥协倾向，更令苦度时艰的中国抗战前途莫测。

“曲线救国”这个词，最早出自于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

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职前率队赴冀中游击，期与之联络，卒因途远不果。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实施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

这封电报发出的缘由是：国民党军驻防文安、新镇的柴恩波部投降了日军，因事发在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的地盘上，他不得不发电报向

蒋介石解释，说柴部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日军，实际是在等待“时机成熟”以便反正。——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讲，投敌叛变都是无以复加的罪行，因此，张荫梧为部下的投敌行为寻找理由时很有策略：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自不必说，关键是“与八路不两立”以致孤单无助，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这支部队还是蒋委员长的忠实拥护者。更可“谅解”的是，这支部队的投敌实乃“保存实力”之举，“时机成熟”时将给日寇“重大打击”，这不是对国家的“侠肝义胆”是什么？

张荫梧的“曲线救国”论一出，立刻受到处于敌后或敌我交叉地带国民党军的热捧，成为那些“势甚孤单”的国民党军将领最时髦的词语。与河北省相邻的山东省主席牟中衍嘱咐他的旅长们：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重庆中央就永远不会原谅了。——及至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伪军部队果然全被蒋介石“收留”，伪军将领们一个个都被委以高级军职，想来这个牟主席还真是“有远见”之人。于是，鲁苏战区副司令沈鸿烈创造了一套口号：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在“曲线救国”论的掩护下，一些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开始与日伪密切接触，甚至联合日伪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一九三九年六月策动的“深县惨案”，一次就残杀八路军四百余人。国民党山东第十二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杀害八路军团以下官兵五百余人。仅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八路军发起攻击多达九十次，杀害八路军官兵及抗日游击武装一千三百五十人。

一九四〇年，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这个杂牌军将领对能当上省府主席颇为受宠若惊，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器重，而是以为天下大乱之时他终可“渔翁得利”了。

共产党在河北省敌后发展很快，闹得委员长惊惶失措，他派出的鹿瑞伯（钟麟）、张桐轩（荫梧）都完蛋了，这才想利用我去补缺。这是共产党和日本鬼子促成我当了河北省主席。真是天下不乱，我辈饿饭。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即将上任的庞炳勋，向他暗示：部队要化整为零，派到河北敌后要压过共产党武装，千万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要运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

没有史据表明蒋介石怂恿他的部队向日本投降。一边指挥军队在战场上与对手血拼，一边鼓励军队叛变投敌，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蒋介石之所以暗示庞炳勋，虽出于百般纠结但目的非常明确：牵制、压制、排挤，甚至是消灭共产党武装。蒋介石绝不希望看到共产党武装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虽然他深知敌后游击战的重要作用，也深知共产党武装在敌后战场不可替代的地位。毫无疑问，共产党武装的积极作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极大减轻了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巨大军事压力。但是，毕竟共产党是他的死敌，他只能两害取其轻，宁可消减敌后战场的军事战果，也要遏制共产党武装的扩大。

关于国民党军将领充当伪军头目，这是中国军阀混战的历史遗留下的一块难以愈合的疮疤。敌后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将领，大多是旧军阀出身，地盘意识非常浓烈，一旦自己的地盘处于日军占领区或是敌我拉锯区，那么他们既要奉命抗日，还要打击共产党武装。为了生存，他必须偏重于打击共产党武装，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两全其美：首先是维持好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领到军饷得到委任；其次是对共产党武装的攻击也符合日军的利益，如果日军减轻了对自己的打击，地盘区域就会安全得多。地方军阀们都把账算得很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与日本人打仗而扣你的军饷，只会因为你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甚至是与共产党武装合作抗日，而猜疑你，排斥你，乃至找机会把你的队伍收编。那么，还打日本人干什么？何况日军是我能打走的吗？老蒋几百万正规军都打不走，我为什么要逞能玩命呢？部队打光了，军饷没有了，自己变成个穷光蛋，这样的傻事谁肯干？至于共产党武装，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地方军阀们也是懂得分寸的：不能总与共产党武装打，也不能真与共产党武装打，把八路军惹急了是会招致灭顶之灾的，适当地打一下可以向蒋介石交代就行了。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自己的地盘里，日本人、共产党都是“友军”，剩下的事就是向老百姓收税了——站在蒋委员长这边收的是“抗日税”，站在日本人和汪主席那边收的是“治安税”。收完了这边收那边，这日子该有多享受？

即使没有公开投敌，敌后一些国民党军将领与日军的关系也令人匪夷所思。独立第三旅旅长许绍祖奉命移动部队，临行前他给当地的日军将领写了一封信：

大日本皇军司令官麾下：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号召，我们是极度的赞成和拥护。但是中国的赤祸，到处滋延。这个祸根不除，贵国协助中国的计划无法实施，和平也无法出现。我们现在奉了汪先生的密令，向正太路以南地区开拔，剿除八路军，现在已和八路军接触了数次。特函达

知，并希赐教。如有敝军零星人员经过此地，请为关垂。

无法得知日军对这支奉汪精卫密令去与共产党武装打仗的国民党军是否予以了配合。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

在这股投敌风潮的烘托下，日方策划的“桐工作”得以开展毫不意外——如果说国民政府与日方的周旋也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话。

五月十三日晚上，双方代表再次开始了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还是“满洲国”问题、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关于共产党问题，章友三向日本方面暗示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不久的将来国民政府会“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

关于前次商定的“备忘录”，在重庆成为问题的是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我想如果把这些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进行商谈，即使在汪兆铭政府的善后问题上有些困难，也不会成为决定性的障碍。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防共，但希望不要先把“华北”两字提出来。现在先是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解决。表面是如此，实质上会是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不久将来日本方面将会了解其真相。

会谈持续到十七日，鉴于一旦提高谈判级别很难做到保密，双方决定六月初将谈判移至澳门继续进行。

六月四日，在“澳门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样的空房子的地下室”，显然“更为郑重”的会谈“每晚点着蜡烛进行”。日本方面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重庆方面出示的委任状内有委员长蒋介石的签名，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了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让日方感到意外的是，那个“宋子良”突然间叫“宋士杰”了，说“宋子良”是他的别名。日方对“满洲国”问题态度十分强硬，因为板垣征四郎定下的原则是：“承认满洲国是日本的绝对要求。”重庆方面表示，蒋介石有实现和平的愿望，愿意克服国民党内部“错误的对日观念”，特别是在反共问题上国民党内部是一致的。因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鉴于中国方面的诚意，日本方面应该放宽条件。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但同意“举行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以便“一举解决”所有谈了又谈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双方代表再次回去各自汇报。

突然，大批日军战机飞临重庆上空，向中国战时首都倾泻下暴雨般的杀伤弹、爆破弹和燃烧弹。日军把这次大规模的轰炸叫作“第一〇一号作战”，目的是“压制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以便“配合对重庆的‘桐工作’”。

为给中国抗战中枢造成更大的恐慌，日军计划对重庆实施三千架次的轰炸，对邻近的成都实施两千架次的轰炸。参战部队有：陆军第三飞行集团司令部所属飞行第六十、第四十四战队，独立飞行第十、第十六中队，武汉地区的航空部队、通信情报部队以及气象部队；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所属鹿屋航空队、高雄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所属第十、第十二航空队以及第十四航空队的华中派遣队。上述作战飞机分别集结于武汉、孝感、宜昌和运城机场。五月十三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密切协同进攻内地，以挫伤敌人的抗战意志，压制敌之军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然后摧毁其主要设施”。攻击目标是“重庆、成都及其附近之敌航空势力”和“重庆及成都市区周围潜在之敌军事及政治主要设施”。

五月十八日，日军对中国空军各机场实施了连续突袭。二十六日开始轰炸重庆广播电台、报社和钢铁厂，二十八日的轰炸目标是兵工厂、机场和市中心。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的三十二架战机，投弹一百九十枚，轰炸了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一带的平民区，造成包括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在内的上千名平民伤亡和千余间民房焚毁。六月十一日，日军的炸弹落在重庆市中心，包括苏联大使馆、德国和法国通讯社在内的大量房屋被炸毁，上千平民死伤。十二日，日军出动一百一十一架战机，对前一天被毁的城区进行再次轰炸，重庆著名的古寺长安寺化为灰烬。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日军连续出动一百多架战机对重庆进行反复轰炸，“一波波的空袭通常长达八九个小时”，其中投掷的燃烧弹达一千余枚，日夜不断的熊熊大火席卷重庆全市。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记述道：

……攀附在山坡上的房子绝大多数是木造房屋，底下以长柱顶住，一烧即成燎原之势……重庆这座城市房屋稠密，堆积在一个又长又高的地岬上，周遭都是峭壁。房子从坡地一路向山顶攀登。它们靠狭窄的石头巷路连通，每户房子只有一个门。当燃烧弹把前门烧了，老百姓没有后门可逃生……为人父母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子女活活烧死。有些子女看着父母奋力想要从烈火中冲出一条生路，却被落下的梁柱吞噬。垂死者的哀号、受伤者夜里的呻吟，唯有不间断的大火才能掩盖下去……

美国记者韩素音认为：“日本人，对重庆似乎有一种执迷，仿佛生命在两江之间大岩岭上继续存在，是对其力量的侮辱。”

接下来的七月到八月，日军轰炸重庆，最少的一次出动战机五十四架，最多的一次达一百三十五架。中国空军力量薄弱，但在苏联空军的支援下，还是不惜一切地作战。当时，苏联航空志愿队有五十架战机进驻重庆，在日机轰炸重庆期间，中国和苏联飞行员以最大的努力给予日军杀伤。但是，当日军的“零式”战机参战后，由于飞机性能相差太大，中国空军一天之内被击落战机十三架、击伤十一架。尽管如此，根据日军的统计，在“第一〇一号作战”中，日方被击落或击伤战机达四百架之多。

美国记者韩素音在日本人歇斯底里的轰炸中，见到了和他的幕僚们一起躲在重庆防空洞里的蒋介石：

其他将领低头交谈或看文件。委员长却坐在木椅上全身挺直，双臂环抱，背部离椅背有十五公分距离。他闭目养神。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放松、低头走路或两腿交叠。他动也不动。头顶上炸弹爆开，防空洞里其他人不免抬头张望。他们嘴巴张开，有人竖耳倾听。蒋介石则不然。他脸上的表情是压制的愠意，仿佛努力不去听无聊的演讲。他两眼直视，不动如山。

重庆承受着大轰炸的摧残。

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压抑着他的愠怒。

六月二十二日，“宋子良”通知铃木卓尔，中方原则上同意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三人会面，地点必须在长沙。

长沙，中日军队主力对峙的前线。

但是，第二天，“宋子良”变卦了：蒋介石不同意与汪精卫见面，只同意与板垣征四郎单独会晤。

这是一个让南京伪政权很是惊恐的消息。

“七月十四日夜，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汪政权的首脑集聚一堂研究了形势，谈论中甚至提到，在全面和平后的一年内，为了对日谈判蒋介石会重用我们，但一年后恐怕就要遭到暗杀。”

反复讨价还价之后，七月二十二日，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达成会谈备忘录，即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面。前提是：日本首相要给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明确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就在此刻，在四川成都，蒋介石麾下的军统和中统联合行动，突然逮捕了数十名共产党人，罪名是煽动民众抢米。宜昌沦陷后，江河运输阻断，湘米无法入川，加之春寒夏旱，四川稻米收成锐减，价格随之暴涨，民怨鼎沸。而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囤积的仓米因为发霉变质往河里倾倒，结果引发大批饥民冲进刘家仓库，抢走一千多石大米，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国民党当局立即把事件定性为“共产党策划的暴动”，由此逮捕了包括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车耀先等在内三十多位共产党人。只是，抢米风潮依旧如火如荼，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还蔓延到四川各地。抢米者除了饥饿的百姓，还有国民党军官兵：“本市发生米荒以来，各军不受秩序，任意阻挡车运，已为公然事实。”九月二十一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发布《告川省人民书》：“前两年四川粮食丰收，今年二月以来粮价继续上涨，越出常理常规，这种畸形姿态，完全不是天然缺粮，而是人为造成。我多方细查结果，知晓其中固有少数豪猾商贾囤积居奇，政府自应严厉彻查，从严取缔。”——抢米风潮缘于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关系。

重庆遭遇着惨无人道的轰炸，四川盆地内的米价尚未跌落，与日本人的谈判前景凶险诡异，就在这时候，蒋介石接到了一个令他十分吃惊的消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敌后战场向日军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作战。

更感吃惊的是日本方面：

在这昭和十五年六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似乎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显然是指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的媾和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这危机四伏的“一刹那”，自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二〇师，合

力发动了以破袭正太路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战役。因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参战部队便达一百零五个团，史称“百团大战”。

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以其所发生的历史节点的至关重要，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没有史据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具备了可以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实力。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武装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历史阶段。

一九三九年以来，特别是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的两大战场格局基本形成，即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敌后战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两个战场在整个战争中相辅相成，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正面战场上，由于国民党军队绝少主动出击，采取的是防御式的阵地消耗战，在日军不再扩大占领区，不断缩减与国民党军的对峙规模的情况下，正面战场的作战次数大幅下降；而在沦陷区，由于日军必须巩固后方，所以始终保持着巨大兵力。这种态势，使处于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敌后作战牵制的日军兵力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但自己的武装力量无论兵力规模还是装备质量，都还不能与强大的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抗衡。于是，被牵制在敌后战场的日军越多，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生存就越艰难。

一九三九年以来，华北日军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其作战目的即是全力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日军采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地扩张增设据点，封锁并切割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集中的地区，日军的封锁据点遍布于城镇、车站、桥梁和隧道，日军利用铁路和公路筑成严密的封锁线，不断压缩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生存空间，使之成为相互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区。除了军事进攻以外，日军利用政治诱降、经济封锁和文化欺骗等手段，竭力使抗日根据地发生给养困难，伪军的大量出现也是严重的安全威胁。到了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大多变成了游击区，共产党抗日武装控制的县城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讲，更为艰难的是政治环境的严重恶化：与国民党军队以及政治立场暧昧的地方军阀武装之间不断发生的摩擦似乎已经到了必须作战的程度。

首先向共产党人发难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

阎锡山有着中国旧军阀最重要的特征：将其统辖的地盘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只属于自己的王国，为了自己在这一地盘上的统辖权甚至可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阎锡山有自己创立的一整套处世哲学，亦即地方寡头翻云覆雨随机应变的生存之道。他反蒋但联蒋，反共也联共，反日却联日。可以说，他把中国地方军阀的只顾自己不计其余发展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境地。

一九三八年，晋南重镇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守山西吉县，在日军的进攻中曾一度西渡黄河跑到陕西的秋林镇。一九四〇年，他从秋林镇回到吉县的南村坡，名曰自己在“向敌推进”。他把村名改为“克难坡”，把他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改名为“克难城”，还把他重回山西的这一年命名为“克难年”。阎锡山在“克难坡”一待就是五年，没有向任何方向再推进一步，直到抗战胜利。

“克难坡”距吉县县城三十公里，坡下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小渡口，黄河水奔腾而下，直泻壶口瀑布。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就驻扎在这里。阎锡山在黄土山坡上挖出上千孔窑洞，用于公共场所的大窑洞都被他取了名：“实干堂”“乐干堂”“合谋堂”“克难室”等等。虽然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但阎锡山的实际辖地只有吉县、乡宁、汾阳等七个完整的县以及临汾、介休、离石等十几个不怎么完整的县。辖地的北面是共产党区域，东面是日军占领区，南面有蒋介石的中央军部队——阎锡山说自己做梦都会有一种深陷包围的恐惧。更主要的是他的晋军——他称之为旧军——已经所剩无几了。晋军在忻口会战和太原会战中损失严重，虽仍保有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实际上不少部队徒有虚名。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产生的山西抗日部队和牺盟会，相对于阎锡山的“旧军”而言，被称为“新军”，这些抗日武装却发展迅速。在阎锡山统辖的七个行政区中，由新军政委兼任专区专员的有四个，一百多个县长中半数以上由牺盟会会员担任，新军的人员和武器均超过了阎锡山的旧军，为此他颇有一种大权旁落的失落感。

苦闷恍惚中，阎锡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哲学”思考。

首先，受国民党内部妥协风潮的影响，他用“中”的理论写了一首诗：“主和主战莫纷纭，自古和战意难同。和战果与国有利，主战主和有何分。”阎锡山的核心观点是：“假若对方于我们一个顶有利的条件来妥协，妥协并不是灭亡。”

阎锡山所说的“国”，指的不是中国，而是他的山西；“顶有利的条

件”，则指对巩固他的地盘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阎锡山认为抵抗与妥协之间没什么区别。

接着，他开始思考“扶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抗日新军压制下去，把他的旧军扶持壮大起来。阎锡山在晋绥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称为“某友军”，把他起家的旧军称为“我军某部”：“某友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增至四倍，我军某部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十个月，就是友军的一变成十六，我某军的一变成四分之一，这就成了六十四比一了，你们看可怕不可怕？知此而尚不觉悟岂非自杀？”阎锡山强调，共产党、蒋介石以及日军是山西地盘上的三个威胁，其中共产党的威胁最大。“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由于阎锡山拒绝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蒋介石开始故意给第二战区制造困难。但是，阎锡山明白，自己还是要依靠蒋介石支持；而蒋介石也明白，要压制共产党武装，不拉拢阎锡山不行。于是，阎锡山派出代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刻表示出和好的热情：“二战区处于抗战和防共斗争的最前线，不仅肩负着抗战的重任，而且必须打好反共复兴的基础。”“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阎先生无论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地给予支援。”于是，阎锡山不但同意马上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而且要求山西的军政高级干部统统加入国民党。

阎锡山的暧昧立场被日军所掌握。日军专门制订了“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策略，与“桐工作”遥相呼应，试图对阎锡山实施诱降。阎锡山自然有他的算盘，他不会贸然做汪精卫第二，但在第二战区他的部队则开始“游而不击”。日本人把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称为“对伯工作”，由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负责。“对伯工作”的展开要比“桐工作”直截了当得多。一九四〇年春，日本人先与阎锡山的警卫军军长傅存怀商洽了防共问题，随后便直接去吉县会见了阎锡山，双方开始商议在山西境内停战的问题。阎锡山派他的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等人数次去太原，与日军及伪省政府取得联络。到这一年的年底，阎锡山的亲信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开始正式谈判。阎锡山提出的“四项原则”是：“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达成的秘密协议是：一、晋绥军改编成“中

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名义上抗日实际上反共，但日军须从隰县、午城等地据点撤退；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铲除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三、山西晋军各将领的住宅和财产，日军须完全归还；四、日军须接济晋绥军的武器弹药。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阎锡山一不做二不休，突然向新军和八路军动手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阎锡山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第十九、第三十三、第六十一、第八十三军共四十七个团，兵分三路向八路军晋西支队和决死二纵队发动进攻。十二月三日，第六十一军和第十九军将决死二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包围，旅部全部政工人员被扣捕，大宁、永和等六个县的县政府、公安局和牺盟会等被捣毁，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遭捕杀。之后，阎锡山开始进攻位于晋西的新军部队，新军北撤后，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数十名伤病员惨遭杀害。在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击败了阎锡山的进攻。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形势严峻。十二月四日，旧军突袭阳城，抗日干部群众百余人被杀。随即，晋城、浮山等七个县都发生了杀害共产党人的惨案。二十三日，决死三纵队部分军官哗变，纵队四个团的政工人员全部被杀。

为反击阎锡山的进攻，八路军集中兵力打击晋军中制造惨案最积极的孙楚部。在黄克诚的指挥下，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和决死三纵队的攻击令孙楚部受到重创，阎锡山的全面进攻被初步遏制。

对于阎锡山向共产党武装发动的进攻，蒋介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意图是：趁阎锡山与共产党武装打成一团的时候，把中央军的势力布防进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命令程潜去山西，名义上是与阎锡山交换反共意见，实际带有“考察晋绥军内部情形是否仍伏危机”的任务。接着，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将领胡宗南直接提出，拟派两个军东渡黄河“增援晋军”。阎锡山即刻识破了蒋介石的企图，当即命令进攻共产党武装的部队迅速撤回原驻地。

事后，阎锡山算了一笔账，发现此战令他很是受伤：自己的地盘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旧军全部被赶出了晋西北，中央军趁乱进入了晋东南，他的地盘损失近四分之三。其次，除一部分决死队队员被他收编外，新军全部背他而去，调出山西被蒋介石收编了。盛怒之下的阎锡山处分了一批作战不力的旧军军官，结果导致旧军也对他怨声载道，纷纷投向蒋介石：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去了重庆就不再复返了；第八十三军军长杜春沂和第十九军军长孟宪吉先后脱离了第二战区，前者调任

重庆办事处处长，后者调任重庆的军事高参；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等，这些从前的心腹也都开始频频向重庆汇报军情。更严重的是，阎锡山在政治上损失惨重：抗战初期的“模范战区”称号蒙上了阴影，原来慕名来山西的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纷纷离开，全国舆论再也不把他列入“抗日先锋”了。

在阎锡山最痛苦的时刻，共产党人主动接近了他。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向阎锡山提出调停。尽管阎锡山对抗日进步力量的残害罪行累累，但共产党人仍愿顾全抗日大局和平解决山西问题，以免被日本侵略者或是国内的投降势力所利用。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肖劲光和王若飞赴陕西秋林与阎锡山谈判。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嘱咐肖劲光和王若飞：“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肖劲光和王若飞给阎锡山带去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八路军久隶屏蒙，获有某些进步，亦无非受先生之赐。目前国际形势日见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取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由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

毛泽东的信令阎锡山尴尬无措，同时又“不胜感谢”。

共产党人不但对阎锡山宽大为怀，针对新军被收编的问题也给予了他极大理解。共产党人的态度，赢得了阎锡山和其他晋军将领的认同，双方最终一致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

阎锡山致信毛泽东：“肖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四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竟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肖主任当能面悉不赘。”

会谈结束时，肖劲光向阎锡山特别申明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阎锡山听后，再次尴尬，忙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似乎太强硬了些”，能否回去“禀报一下毛先生，是不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肖劲光和王若飞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回答是：“一个字也不能改。”

除了阎锡山之外，在共产党抗日武装创建的各个根据地内，国共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特别是阎锡山进攻八路军和新军时，蒋介石竟借机命令朱德和彭德怀放弃太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同时命令位于中条山的范汉杰、位于太行山的庞炳勋、位于豫北的朱怀冰和孙殿英等部北上，位于冀南的石友三、位于冀鲁豫交界处的高树勋等部西进，割断西北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西北与江南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日军“肃正作战”没有达到的目的。蒋介石命令的这些国民党军队，除范汉杰的部队外，后来都成了清一色叛变投敌的伪军。朱德和彭德怀只有命令八路军各部队坚决保卫得之不易的抗日根据地。

在向八路军进攻的几路国民党军中，身处冀南抗日根据地腹地的石友三部最具特点——他奉的是蒋介石的命令，但配合其作战的却是日军。石友三在中国抗战史上是一个畸形的另类。

冯玉祥护兵出身的石友三，以没有人格反复无常闻名。蒋冯大战时他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不久又背叛蒋介石投靠阎锡山；中原大战时他背叛阎锡山投靠张学良，后来又联合粤军起兵反张，结果被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联军打得很惨。后来他投奔宋哲元部，被宋哲元委任为冀北保安司令。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扩充部队，他向蒋介石表示忠诚。阎锡山开始进攻八路军时，他率部向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击，两个月内杀害二千多名共产党人。共产党方面获得石友三已秘密投降日军的情报后，朱德和彭德怀专门给重庆呈送了两份缴获的机密文件：一份是石友三策划进攻八路军的会议决议，内容是“奉总裁命令，决定进行肃清共匪的作战，进攻抗日根据地，希望取得国军的支援”。决议还制订了派出间谍抓捕共产党人的办法：“搜到共匪重要分子，即行枪决”。另一份文件竟然是与日军达成的“联络办法”：

一、开始与日军接近后勿发生误会，彼此渐趋融洽，双方派员联络说明。

二、飞机来时，可用白布在屋顶上铺盖，不准射击。

三、各部队不准超界线征发给养，以团武装部队活动（受匪军压迫时不在此限）。

四、昼间联络法用识别旗（或白旗）左右摇动，夜间用红电筒联络“纵灭”。

五、昼间行军，应距其驻地十里（最小限制）。

六、在黄河以南行动，应在日没前，不得在午后八时以后。

七、本军反对匪压迫，须向驻军区以外活动时，应一面活动，一面通知之。

八、彼已通知各驻军，遇我须要派部队时，即随援助（但兵力不能限）。

重庆方面对这两份文件概不承认。

给八路军总部的回复是：这是敌伪的反间，勿信谗言。

八路军决定把石友三这个汉奸连同他的部队消灭掉。

石友三名义上是集团军，实际上只有一万多人，依附他的杂乱武装也只有四千多人。

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一二九师集中兵力发动了“讨石战役”。

仗还没打，得到消息的石友三就开始率部逃跑。八路军各部队立即穷追猛打，石友三部被打得七零八落。八路军正在对之实施合围时，日军出动来接应石友三了。八路军只好先与日军打，打完了再继续追。日军发现无法阻止八路军对石友三的追击，于是调动上千兵力试图抄袭八路军的后路，而在正面一面攻击一面施放毒气。两面受敌的八路军追击部队只好撤退，石友三得以侥幸逃脱。其后，在日军的配合下，石友三又数次向抗日根据地进行骚扰性进攻，直至有一天石友三突然消失得没有了踪影——由于投敌证据确凿，重庆方面以叛国罪将石友三枪毙了。

在一系列反共事件发生之后，朱德代表中共中央给重庆的国民党大员们发出一封长电。电报的抬头十分壮观，几乎囊括了国民政府的所有要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副院长覃振、西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程潜、国民参政会诸位参政员、中央党部各位委员和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们。而电报的签署者也颇为壮观：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委关向应，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中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以及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肖劲光。

长电行文汹涌，言辞尖利：

据报，政治部陈诚主任在韶关演说，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事之真实与否未可知；然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奸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然职军将士闻之，未免寒心，愤慨之情，殊难禁遏。群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东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四十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十七个师团，占总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扬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十万，而敌伪伤亡则达二十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二万，缴获敌伪枪达四万。全军二十二万人，月饷不过六十万元，平均每人每月不过二元七角二分。而币价跌落，实值十五万元，则平均每人每月不过六角七分，全国无此待遇菲薄之军。有二三千人而升级为军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级为集团军者，我八路则至今三个师，始终不予升级。八路对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毁谤之来，则为游而不击，谓发动民众为非，谓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纲领为非，谓恢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为非，谓培植民众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非，事之可怪，未有过于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奋战未尝少懈，执行上峰之命令未尝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导未尝少懈，八路之于国家于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则集中于八路，奇冤大辱，又有过于此者乎？我八路在晋绥，在河北，在察热，在山东，收复沦陷区，建立根据地，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天经地义，至迫切，至正当也。而论者谓为非是，必欲破坏之，昨日败军之将，丧地之官，望风而逃，惟恐不及者，今日貌堂皇，声罄款，戟指而骂，挥军而进，从八路阵后打入亦谓之“恢复失地”，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游击

队，取消我民众团体，杀戮我工作人员，百端磨擦，必欲同归于尽而后快，古今奇事怪事，又有奇怪于此者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之后方也，区区二十三县，至今不予法律上之承认。且点线工作布于内，大军包围发于外，今日袭一城，明日夺一县，亦谓之“收复失地”，更谓之“打倒伪边区”，“消灭伪八路”。警报纷传，后方不固，磨擦事件，百次千回。而我前线犹死撑硬打，一步不退，八路亦可谓无负国家民族矣。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八路必经之交通线也，三民主义青年团，拦路劫人。特务机关，关卡林立。凡赴八路之青年，一概阻拦，设立招待所，谓之“唤醒盲从八路者”。抗大学生，无走路之自由权，一经被劫，再无踪影，勒写悔过书，绑入干训团。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盗窃八路军车，伪造八路护照，物证具在，可以复按，如此例他，他可知矣。此等行为，伤国家之体制，毁中央之尊严，法纪坠地，贻笑万邦，其不可为训，亦彰彰明矣。特务机关，恣意横行，勾引八路与共产党人员，立有赏格，上级二百元至三百元，中级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下级四十元至一百元。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厉行破坏，则用无数万之金钱。在湖南则有平江惨案，在河南则有确山惨案。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不足，继之以《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又不足，再继之以《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开训练班，上磨擦课，“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者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祸乎？然而我八路历千辛，冒万苦，忍辱负重，不敢告劳者，大敌当前，抗日第一，为国家民族负责，寄希望于光明之前途也。抗战两年半，全国事实昭示，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彼辈发国难财，吃磨擦饭，黑暗重重，屈指难数。而官官相卫，壅于上闻，此亡国之气象也。古人有言，“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今且污辱及于苦战之军，纷扰及于后方之地，阻挠及于交通之途，此而隐忍，则国家民族危矣。凡此将士之呼声，德等未敢充耳不闻，默然不告，诚以如此下去，绝不利于抗战，绝不利于团结。再四思维，惟有请求钧座派遣陈主任诚，亲临前线，实地考查，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后方之纷扰几端，道路之阻挠几次，俱可一览了然。陈主任贤者，维护前线将士之心，至深且切，必不惮于一行。德等恭候莅临，如旱望云，如饥望岁，钧座一纸遣之令，陈主任欣然命驾必矣。如此则流言可销，诬谤可止，纷扰可靖，阻挠可息，奸人可以敛迹，正气可以伸张，而前线与后方团结一致，抗战之胜利可期矣。所有请派陈主任诚到前线考查职军情形，以雪冤诬，杜磨擦，固团结而利抗战一节，敬谨上呈，是否有当，敬祈裁决示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国民党方面不是不知道，如果置侵华日军于不顾而专门剿灭共产党武装，后果将是敌后战场的瘫痪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而一旦敌后战场不存在了，日军获得了稳固的后方，其侵华兵力的全部就能用于正面战场，正面战场将会不堪重负乃至崩溃。但是，促使国民党方面这样做下去的原因，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阐述得很露骨：

一、华北游击战将暂时失效，但不如此，更将长期失效。

二、对十八集团军有引起全般破裂之虞，但此时不加制裁，将来羽翼长成，更难收拾。

三、此时破裂，十八集团军之力量尚小，在策略上中央尚可作为地方事件，逐次解决，若将来破裂，中央即少回旋余地。

四、对于国际观听，固属不好，但制裁有效，亦可使英、法、美对中国减少赤化疑虑，增加信心。

五、对苏俄关系，虽云投鼠忌器，但苏联之根本策略，在利用他国之人力物力，以消耗其假想敌国之国力，而便于自国之坐大，对欧洲对远东莫不如此。在远东方面，假使“中共”根本失势，在彼惟有帮助中国中央政府，乃能消耗日本。反之，若“中共”极端得势，则苏联对中国之外交策略，即有不可测度者矣。故中国制裁共党愈有效或十八集团军愈无力，则中国对苏联之外交将愈见顺利，虽实施制裁之初，不免稍稍隔阂，但经过相当时期后，即不难使其谅解。

总之，此次战争，对外即为长期抗战，对内即须巩固政权。如此，乃能操最终和战之局，而导国家于有利。假使在战争过程中，顾虑当前之影响，忽略最终之结局，而听任共党势力自由扩张，将来必大受牵制。

国共两党的冲突，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

如果不是外敌当前，也许将继续兵戎相见。

而正因为外敌当前，民族大义为最重，毛泽东主张在团结抗战的原则下忍耐：“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我军则谨守防线，深沟高垒，以备不虞。对其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多写诚恳坚定而无刺激性的函件、传单、标语，达到缓和其情

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而一旦国民党军“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无论如何，强敌入侵国土之时，中国内部的诸多问题，加剧了历史演进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身处乱局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忧患就是国民党方面可能的对日妥协。反复权衡利弊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用决死的作战才能在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刹那”，对逐渐弥漫的对日妥协风潮起到警醒、遏制乃至阻止作用。

日军得到了共产党武装将在华北有大动作的情报，并对这一大动作的性质作出了初步判断，依据是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我坚决相信有了华北抗战近三年所奠定的基础，有了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了我们党中央坚强的正确领导，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参加全国反攻，而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去。”日本方面认为，共产党此举有政治目的：“看来，这种激烈的主张，是针对当时成立的汪政权和重庆阵营内的动摇分子而发的，为的是使之转向积极抗日。这也可以说，中共根据当时的国共关系，以夸耀中共军的实力，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兵力有限，武器简陋，没有接济，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前线均处在与日军、伪军或国民党军敌对的境遇里。因此，共产党方面完全可以预料主动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艰难程度，尽管值此抗战历史重要的“一刹那”必须发动这样一场苦战。

这场艰苦的大战，便是“百团大战”。

一开始并没有“百团大战”之称，作战计划的名称叫“正太路破袭战”。

之所以把作战目标确定在交通线上，八路军的将领们基于这样一个思考：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域广阔，从内蒙古的大青山到广西钦州达千多公里，从东海海岸到湖北宜昌也有一千多公里，为了维护所有的占领

区，日军必须依赖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在华北敌后，八路军与日军的作战，主要围绕着交通线争夺；即使在正面战场，日军发起的大规模战役，也都与打通交通线或占领交通线上的要地有关。日军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对交通线的依赖就越大，只有保住交通线，日军才能有效地统辖占领区。在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和压缩的主要手段，便是利用铁路或公路交通线编织连接成网状的封锁线。在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地图上，华北地区几乎所有的铁路或公路两侧，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日军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简单数一下，仅冀中地区日军沿交通线修筑的碉堡和据点就有五百多个，几乎每十公里就有一个。山西境内更为密集，仅沿白晋路日军就修筑了八十多个碉堡和据点，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举着油灯在作战地图前苦苦思索的八路军将领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作战思路：如果向日军占领区内的主要交通线全线出击，既可以摧毁日军占领的基础，使其机械化装备瘫痪，还可以就此打通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络，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切割和封锁。

至于八路军的兵力不足问题，需要用辩证法来看待：那些碉堡和据点是死的，不能背着跑，须派驻部队防守；那么多的碉堡和据点，即使一个地方派一个班，日军就要派出多少兵力？交通线上修筑的碉堡和据点越多，日军的兵力就越分散。——“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一平方公里为.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二百个地点。”华北的二十七万日军和十四万伪军中，除了守碉堡和据点的之外，还能有多少兵力投入机动作战？如果运用运动战方式与日军作战，日军势必会在守据点和机动作战两者之间陷入疲惫艰难之中，这不正是看似强大的日军的弱点吗？

七月二十二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命令》规定了作战意图、战役组织、兵力组成和战役准备要求。着重说明：“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八路军总部拟定的战役发起时间为八月十三日以前。

八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参谋土田兵吾向东京报告：

独立混成第四旅司令部所在地阳泉，在盂兰盆会（俗称“鬼节”）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八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健壮男子”们，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侦察员。

日军察觉到了八路军在集结兵力。

不久，日军华北方面军获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致信河北省主席庞炳勋，说八路军要与专门搞磨擦的国民党部队算账。于是日方认为，八路军集结是为了去打庞炳勋。后来日方才知道，这封信是彭德怀让人伪造的，并让八路军作战参谋潘开文在跟随朱德去卫立煌司令部的路上，故意丢在了日军封锁区里的。

八月八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和作战区域划分：晋察冀军区主力十个团，破袭正太路平定东至石家庄段，重点攻击娘子关；第一二九师主力八个团附属总部的一个炮兵营，破袭正太路平定西至榆次段，重点攻击阳泉；第一二〇师主力六个团破袭平遥以北的同蒲路和汾离公路，阻击日军向正太路的增援。其他各路部队对其相关的铁路和公路进行猛烈破袭，并相机收复日伪军的重要据点，阻击日伪军向正太路的增援。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下良、西营地区集结待命，参战的数万民兵和民工也集结完毕。战役发起时间确定在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八路军从南北两面突然间对正太路全线发起了猛烈攻击。正太路横跨太行山脉，全长二百四十九公里，连接着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是华北日军重要的战略交通线和补给线，该线上的阳泉和井陉煤矿则是重要的钢铁能源基地。为了确保这条铁路的安全，日军在沿线大小城镇、车站、桥梁和隧道修筑的坚固据点达五十多个，铁路线两侧二十至三十公里的范围内还修筑有外围据点二十多处，由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八和第九旅团各一部负责守备。突袭正太路的八路军分成左、右和中央三路纵队，同时开始了行动。

右纵队由第四军分区五团和第二军分区十九团组成。五团一部首先潜入娘子关村，歼灭村内的伪军后，仰攻日军构筑在关口上的四个大碉堡，激战三个小时后，将红旗插上了娘子关。——自太原会战以来，日军占领娘子关已达三年之久。接着，八路军工兵部队炸毁了娘子关附近的铁路桥，彻底切断了铁路沿线的通信和交通，使得关下日军的据点均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十九团官兵数次攻入平定北部的巨城和移穰车站，炸毁了铁路和水塔。五团一营一连同时袭击了磨河滩车站。这个车站原驻有日军不足二百人，但此时车站上停着的客车里装有八百名即将退役回国的日军，一连的突击因此打得很苦。天降暴雨，一连反复冲

杀，数次攻入车站，至少让五十多名日本兵无法活着回国了。

左纵队由冀中军区警备旅二团、晋察冀军区特务团和第四军分区平井获支队组成。二十日夜突击开始后，平井获支队袭击岩峰，炸毁铁路；特务团攻击上安车站，警备旅二团官兵攻入头泉车站，然后连续袭击了平山、获鹿、微水和岩峰至石家庄之间的公路。

中央纵队辖主力第三军分区二团、第一军分区三团和冀中军区第十六团，负责袭击正太路上的要害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是日军重点防御目标，矿区内筑有大量的坚固堡垒，形成可以覆盖全矿区的火力网；矿区周边筑有四米高的电网和围墙，围墙外还挖了深壕。二十日夜，三团对井陉煤矿发起了猛攻，一营官兵在矿工的帮助下切断电源冲入矿区。井陉煤矿攻防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日伪守军全部被歼。八路军迅速破坏了煤矿生产设施，并在矿工的协助下引水将井陉煤矿全部淹没，使得日本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的重要基地至少半年内无法开工。根据日方统计，八路军的攻击使之损失一亿日元以上。与此同时，二团和十六团攻击乏驴岭、南峪、贾庄等日军据点，歼敌数百，彻底破坏了铁路线。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负责攻击的正太路西段，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也是阳泉煤矿基地所在地，西面的榆次方向还驻有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二十日的战斗开始后，第一二九师左翼第三八六旅十六团，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二十五团等部，猛烈袭击寿阳至榆次间的驻守日军。十六团炸毁铁路后，攻入芦家庄车站，歼灭守敌大部；三十八团攻战上湖车站，二十五团攻占马首车站。第一二九师右翼新编第十旅的二十八、三十团等部队，对阳泉至寿阳段发起了猛攻，二十八团攻击狼峪、张净和芹泉车站，三十团攻击燕子沟和桑掌，彻底破坏了沿线铁路设施。战前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的第一二九师全面控制了正太铁路西段。阳泉西南四公里处的狮垴山阵地，既是阳泉的门户，也是正太路西段的咽喉。第一二九师十四团奉命坚守，阻击日军对阳泉的增援，掩护主力部队作战。为抵抗八路军突然发动的大规模攻击，日军和武装起来的日侨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开始向狮垴山阵地施放毒气，十四团官兵死守不退，在阵地上坚守六个昼夜，保证了主力的侧翼安全。

正太路上由于有煤炭资源，住有大量的日本侨民，他们大多是日本占领军的家眷或煤矿技术人员。在井陉煤矿作战中，八路军杨成武部官兵从战火中救出两名日本女童。后查明，井陉煤矿火车站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在炮火中死亡，这两个孩子似是他们遗留下的。晋察冀军区司令

员聂荣臻找来可靠的老乡，将这两个女童送回石家庄日军兵营。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的指挥下，组织起二十个团，分段破袭山西境内同蒲路北段及晋西北地区的主要公路。二十日晚，该路段日军最大的康家会据点遭第三八五旅袭击，八路军官兵毙伤日军百余人，继而袭击了丰润和大庙。独立第一旅袭击岚县等地的日军据点，伏击了日军的增援部队，彻底破坏了公路。独立第二旅七一四团攻克日军阳方口据点，歼敌百余，切断了同蒲路。同时，新军暂编第一师攻入五寨县城，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切断了汾阳至离石的公路，攻入日军的王家池据点。第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袭击了柳林，太原至汾阳的公路被切断。

战斗进入第三天时，随着正太路破袭战的发动，战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各主要交通沿线。八路军的作战区域绵亘晋冀大部和热、察、绥部分地区，遭到破袭的铁路线包括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津浦路、平绥路、北宁路、德石路、沧石路、白晋路以及遍布在华北平原上的主要公路，日军据守的五千余里交通线遭到彻底破坏。战斗规模扩展如此之快，是八路军总部没有预料到的。在八路军发动攻击作战的区域内，驻有日军第一一〇、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五、第十六旅团和骑兵部队，总计二十七万日军和十四万伪军被卷入战场。二十二日，八路军总部统计，参战的八路军部队，兵力远远超出了战役部署的原定数目，其中晋察冀军区三十九个团，第一二九师四十六个团，第一二〇师二十个团，总计一百零五个团，共二十多万官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索性将此次作战定名为“百团大战”，并把扩大之后的战役部署上报给中共中央军委、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以及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甲、关外之敌向关内增加，津浦及冀南、冀中之敌陆续南移，猬集陇海东段，似有进窥潼、洛，犯我西北，断我西北国际交通之企图。

乙、职等决定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之进攻战，长期截断该线交通，以至彻底毁灭该路交通；同时对华北各铁路亦予大规模之破坏与截断。

丙、百团大战除第一一五师主力及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余均参加。谨将兵力部署如下：（一）正太线三十个团；（二）平汉线由卢沟桥至邯郸段十五个团；（三）同蒲路大同、洪洞段十三个团；

（四）津浦线由天津至德州段四个团；（五）汾军公路六个团；（六）白晋线六个团；（七）北宁线两个团；（八）平绥线两个团；（九）沧石线四个团；（十）德石线四个团；（十一）邯济线三个团；（十二）代县至蔚县四个团；（十三）北平至大名各线六个团；（十四）辽县至平定线三个团；（十五）宁武、岢岚、静乐线四个团。共一百零五个团，并分为三个集团。由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分任指挥。丁、大战已于本月二十日开始，正太路交通已全被切断。请饬各友军部队积极抑留当前之敌。

可以想见蒋介石看到这封电报后该有多么惊愕。

首先，共产党武装竟能向日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击；其次是，共产党武装竟然已经拥有了如此众多的部队。

日军受到打击后开始反击。

八路军总部决定在抗击日军反击的同时，进一步在正太路两侧实施破袭作战。

九月二日，晋察冀军区发动盂北战役，各据点的日军仓皇逃进盂县，八路军猛烈追击，日军从阳泉方向增援，八路军再度攻入娘子关和井陉。在抵抗日军的反击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受到合围，该师以四个团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第三八六旅十六团和冀南军区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团阻击日军的进攻，掩护师部和后勤机关冲出日军的合围。日军开始撤退的时候，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纵队突然把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一个大队四百余人包围在双峰地区。

日军战史记录了该部被全歼的经过：

由于第一线第十一中队挺进深入敌众，右侧背即遭侵入双峰镇方向的八百敌人之攻击，伤亡不断增加……中队长中野中尉指挥部下竭力奋战，反击击退十数倍于我之敌人冲锋，机枪子弹、手榴弹都已用尽，仍投掷石块，挥舞刺刀，展开了一场恶战……从楠高地撤回的三浦军曹及其士兵，亦增援奋战，不断出现伤亡，三浦德之助军曹因全身四处被手榴弹炸伤而壮烈战死……大队炮小队弹药用尽，小队长有部政夫少尉，右肩胛骨被乱弹射穿，仍不屈服，准备做最后的白刃战……中野头部负伤，但他继续射击，当打完一箱半子弹时，敌弹再次穿透他的胸膛，终于战死在机枪旁……高桥孝英中尉在敌弹纷飞的山坡上挺进中，于二十

三时三十分中弹，挥舞军刀，壮烈战死……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认为，他的部队之所以伤亡惨重，是因为八路军不但得到民众的支援，且其游击作战时能够“轻如猿猴”：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重。因此，任凭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战果。

九月四日，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出嘉勉电：

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与敌甚大打击，良用嘉慰。除已电饬其他有关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该部作战外，仍希督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与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敌交通，为要。

蒋介石还给各战区将领发出训令，要求他们效仿八路军的战法：

查游击战术要旨，即在准备充分、行动秘密与侦查周到，而其基础，则在对敌后各地区民众加以组织和爱护。各战区应以十八集团军此次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作为法则，拟定自本年九月至十二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栈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在此游击期间，其第一要务，务使敌军不能抽调在各地区之部队，破坏其十月间秋季攻势，造成我军有利形势……

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全面出击，给全国民众以极大的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正在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的重庆民众，于苦难中看到希望的兴奋溢于言表：

担任华北出击主力的部队，在装备方面及军事技术训练方面，都不及一般的正规部队。但是他们终于能以劣势的装备，在敌人统治比较巩固的华北，予敌人以重创，原因何在呢？问题的答案是：这个部队具有长期的战斗经验，高度的民族觉悟与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认识，

使每个官兵成为自觉的富有民族意识的战士，发挥最大的积极性。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基本上完成了破坏日军交通线并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预定任务。尽管将八路军隔正太路相望的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设想没能实现，但毛泽东显然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十分满意：“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由于日军向正太路东西两面的大量增援，八路军总部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重点转向了正太路的外围地区。

自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八路军各部队对日军分割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包括主要县城，实施了包围攻坚作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发动涞（源）灵（丘）战役，直接攻击盘踞在涞源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驻守灵丘的第二十六师团部队，双方在县城四周形成混战状态。为配合晋察冀部队作战，冀中军区第八分区的十个营在河北任丘、河间、大城和肃宁一带发动攻击，大量地牵制了日军。在太行山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十个团发动了榆（社）辽（县）战役。榆社县城是日军伸进抗日根据地的据点，也是其转运弹药和粮秣的重要枢纽。八路军官兵先将县城外围的据点一一攻克，最后通过坑道作业将一口装满炸药的大棺材运进城内，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日军碉堡的碎片连同守军的肢体四面飞散，八路军官兵趁机攻入城内，日军守城中队长剖腹自杀。二十五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朱德部陈赓旅攻占榆社，毙敌四百余，俘获颇多。我伤亡及中毒者约四百余。”同时，第一一九师一部袭击了长治机场。为了策应第一二九师作战，冀南军区部队大规模地破袭平汉铁路元氏至安阳段。在同蒲路方面，第一二〇师向内长城以南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内长城以北的驻蒙军第二十六师团的接合部，实施了大规模的运动战。

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作战在十月上旬结束。八路军不顾装备简陋，对日军的主要据点进行了顽强攻坚。由于不具备强攻日军坚固设防的城镇的实力，在不断歼敌的同时自身伤亡很大，原定攻占四个县城，除一度攻占榆社城但很快又被日军夺回外，其他的三座县城都没有攻克。更严重的是，日军修复交通线的能力大大出乎了八路军方面的预料。日军在抢修交通线后，于十月六日起开始，对正太路两侧以及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八路军立即转入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作战，即反扫荡作战。

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持续了四十多天。这一期间，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日军付出了伤亡代价，八路军和抗日民众也伤亡惨重。特别是日军为“摧毁共军生存条件”而实行的“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受到巨大的摧残：日军进入根据地“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和顺县石拐镇先后被烧了五次，村庄成为一片焦土；在平西马家庄，日军将百姓逼到一所大房子里，一把火烧死二百九十多人。仅太岳区沁源一个县，就有五千男女老幼被日军残杀，在沁源县城，仅姚家院一处就烧死一百三十七人；在韩洪镇，日军把从山中搜出的躲藏群众四百多人集中到龙王庙内，一齐烧死”。鉴于日军已经进入到根据地，八路军依据“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转至日军占领区进行袭扰，继续打击日军恢复的据点和交通线。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日军全面撤退。

历时五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正式结束。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囚笼政策”，致使日军在整个华北的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能源基地被彻底捣毁，主要大的碉堡和据点均被削平，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歼灭。日军战史记载：“昭和十五年度（一九四〇年），华北方面军的伤亡总数为，战死五千四百五十六名，负伤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更为重要的是，百团大战发生在中国抗战进程危机四伏的“一刹那”，中国共产党以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决绝作战，“无情地打击了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毒计，揭穿了一切投降妥协分子，反共反八路军之内战制造者的鬼脸，以无限的鼓舞，兴奋了广大抗日军民，坚定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争取了时局的好转。因此百团大战的意义，不仅取得军事上之伟大胜利，亦更取得政治上之伟大胜利。”

毫无疑问，百团大战也暴露了作战预想中的某些问题：战役的规模过大，对日军实力估计不足，连续作战的时间过长；特别是第二阶段作战，采取了攻坚战术，过分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在日军大规模的反击和扫荡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对此，彭德怀很快意识到，发动大战的时机可能有些超前：“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

一九四一年一月百团大战结束之时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日本两院演讲时对八路军仍心有余悸：“一九四〇年，重庆方面敌之抗战特点，作战

非常消极，至今未曾出现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只有共产军去年八月在华北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在妥协投降风潮蔓延，正面战场沉寂的情况下，深深嵌入敌后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在并不具备作战实力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极其有限的编制规模、驻扎地点和活动轨迹，放弃与实力相适应的分散式山地游击战，几乎让所有的军事力量倾巢而出，采用大规模联合出击的运动战方式，在广阔的区域里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使得共产党武装的出击看上去确实如同以卵击石的决死一战。——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如果着眼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局，而不是仅仅从局部利益上考量，有谁还会指责八路军对入侵者发动的殊死作战呢？

百团大战尚在进行时，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的谈判戛然而止。

九月四日，重庆方面电告日本方面，说近卫文麿首相写给蒋介石的信“内容空洞”，完全是一副“旁观者的态度”，一旦日本内阁再度更换，日方就会把谈判之责推到板垣征四郎身上，而拒绝履行商谈的相关义务，因此“日本不可信任”。十七日，“宋子良”正式告知铃木卓尔：中国方面认为“不应马上召开长沙（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的会谈”。理由是：“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的和平。”铃木卓尔答道：“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蒋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庆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将无望。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

日本中止了“桐工作”。

日方强硬的表态基于一系列原因：首先是日本已与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德国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协定》规定：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而德国和意大利也愿意承认日本在“东亚新秩序”中的统治地位。三国法西斯联盟约定“受到非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彼此应运用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其次，近卫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组阁时，任用了一批军国主义的强硬分子。新任陆相是东条英机，新任外相是松冈洋右，松冈洋右上任后便大放厥词，说“法西斯主义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日本发展”。至于日中之间的战争，必须打到底，因为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先必须力图确立日、满、支大东亚共荣圈”。最后，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的战事很可能因为中国抗战力量内部的分裂从而令日本赢得胜利。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日，是日本全国纪念“神武天皇建国二千六百周年”的庆祝日。庆祝活动耗费一亿六千万日元，安排了多达一万五千多项活动，包括“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动员青年人参军入伍演说大会，等等。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来自日本各地和世界的五万名代表，包括纳粹德国的青少年团成员，齐声高呼‘万岁！’，停泊在东京湾的战舰鸣响了礼炮”。然后，在皇宫广场上举行了大型广场宴会——宴会食品全部按照军队的野战食品准备，据说是为了表示对前线士兵的怀想与思念——参加庆祝活动的五万余人当场把这些野战食品吃喝殆尽。

数万人聚集在一起大吃野战食品，这是一个何等怪异的场面？

二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

中日调整国交条约，已全部完成，兹余将举行签字之前，对于执事，再进最后之忠告……中日共荣，东亚复兴，所必由之道也。惟因执事仍持继续抗战，中国之内，战争状态依然存在。伴随次战争状态而起之事实，遂亦有不得不听其存在者，此种痛苦，非至全面和平实现之后，不能全部解除。兆铭每念及倘使当日艳电得蒙同意，则在此二年，战后秩序已告恢复，内则修明政治，以固国本，外则与友邦结成轴心，以应世变，国力民力早已蒸蒸日上，何止糜烂迄今，尚无归宿……为此切盼执事勿再迁延，立下决心，宣布停战，使全国人民，咸得致其心力于和平之恢复，治安之确立……

对于承受着战争之苦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的电报无异于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

“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并没有真正过去。

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第二十三章

结成胜利之果报答国家

一九四一年伊始，日本天皇向参谋总长进行了这样的“垂询”：

是否按预定计划整理在华兵力？据侍从武官长说，预定六十五万已变成七十二万。要下决心整理，不要半途而废。后方的准备是否完成？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入困境吗？

就日军会不会在中国陷入困境这一问题，参谋总长杉山元找到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商量如何回答天皇。商量的最终结果是：必须继续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军事压迫，特别是华北治安问题严重，要集中陆军和航空兵在该地区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一月十六日，日军大本营召开陆军会议，审议《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者的相同点是都强调了令日本军政高层深感忧虑的“长期”二字。陆军将领在回答内阁各部首脑关于目前战争形势的质询时，充满含糊的狂想和遮掩的无奈：一、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极大，但在一九四一年内不大可能；二、如果进攻东南亚，陆军需要五六个月的准备时间；三、如果苏联与日本开战，苏联也要准备三四个月，但苏联目前没有对付两面战争的准备；四、“大东亚共荣圈”除了包括日、满、华之外，还应该加上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现档案不存，其大致内容是：“使用武力解决南方问题”，“使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骨干地区”，“继续对中国实施压迫，力求在昭和十六年夏秋之际，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对北方，目前方针是保持稳定，以在满洲和朝鲜的十四个师团，确立坚忍不拔的态势”。会议通过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的要旨是：

一、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二年）前，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昭和十六年以后转向长期持久态势，数年后将在华兵力保持在五十万态势。

二、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

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据地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三、准备在昭和十六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压力，力求解决事变。但考虑到欧洲战局演变引起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对苏邦交等），要充分做好进行政治和军事调整的准备。

四、不要放松空中进攻作战，继续加大压力。

五、在整个时期，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

六、要充分运用以对话压迫为目的的政治和谋略措施。

七、政务指导以《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为依据。特别要努力充实帝国的国力，加强国防的机动性。

八、为了适应长期作战的方针，力求在所需的编制、制度及其他方面，进行合理化改革。

日军大本营每年颁布“对华作战指导计划”时，都规定该年度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后期限，可直到一九四一年，庞大的日军仍陷于中国战场上。因此，这一次，陆军省次长阿南惟几在会上明确表示，他本人“对积极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更加忧虑”。

一月十九日，东京参谋本部派人携带《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飞到中国南京，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见面。西尾寿造对大本营削减在华兵力的决定耿耿于怀：什么叫“北方要坚忍不拔”？什么叫“长期作战态势”？什么叫“适当的经济措施”？

难道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就不需要坚忍不拔吗？难道缩减了在华兵力还能保持长期作战的态势吗？日军在华战斗力的减弱难道是亲日的中国武装能弥补的吗？单纯杜绝抗战物资流入敌区就能增加我方战力吗？西尾寿造的结论是此份计划很不符合实际情况。

西尾寿造对大本营的“指导”作出如下书面回应：

一、一九四一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

区。尤其在夏秋季节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

二、在夏秋之际，最大限度发挥航空进攻作战的威力。

三、在整个时期加强陆地及海上的封锁杜绝流入、流出，特别将重点放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

四、政务方针根据《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办理。尤其在占领地区内，建立对敌隔绝区域。

五、无论为适应中央部于一九四一年内获得解决事变头绪的意图，或考虑到明年以后的国际形势，都必须在本年内为消灭敌军战斗力取得显著成果。

西尾寿造的核心观点是：想要结束在中国的战事，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作战。

急于“取得显著成果”的情绪，已经演变为侵华日军普遍的焦躁。焦躁源于这样的矛盾：不能不作战，不作战就等于原地消耗，既不能得到日见短缺的给养，也无法掠夺国内紧缺的资源，更无法谈及“给敌人以更大的压力”从而结束战争。但是，又不能大规模作战，且不说大本营要缩减在华兵力，仅就现有兵力来讲，如果大规模作战就无法巩固占领区，且数次作战证明，中国军队一打就跑，是无法捕捉到他们的主力加以歼灭的。

西尾寿造决定，日军今后的作战方式应为“短距离截断作战”。即为节省兵力和减少消耗，不与中国军队远距离大纵深作战，而是取短促突击的方式，“师团进入的限界于十里至十五里之间（距离敌师部的位置）”。问题在于：迅速突击到距离中国军队师部“十里至十五里”的位置，这完全是西尾寿造的一厢情愿，中国军队接敌就撤，尤其是师部撤得更快，怎么可能让日军在十里之外看见中国师部的影子呢？

根据派遣军司令部的部署，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开始积极寻找“短距离截断作战”的战机。经过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之后，不知为什么，日军第十一军的将领们依旧认为，他们当面中国军队的主力还是汤恩伯部。第十一军占领宜昌后，汤恩伯部曾是与日军对峙距离最近的中国军队，可是，很快，日军就找不到汤恩伯部的踪影了。一九四一年一月间，突然传来情报说，汤恩伯部出现在河南信阳以北约一百多

公里的遂平和项城一带。汤恩伯到河南干什么去了？日军分析后认为，其移动目的不是针对日军，而是针对共产党武装：

由于国共斗争激化，汤恩伯集团的东进意在讨伐安徽省方面的新四军。但因恐日军切断其退路，将不再向东面前进。其所以向平原移动，目的在于给养问题，这样判断较为适当。因此，他的位置暂时不会移动，而且当我攻击时，估计很可能向西北退避。

这一判断令日军很是兴奋。第十一军立即拟订出作战设想：先向中国第五战区的襄阳方向实施佯攻，以造成日军大规模进攻第五战区的假象，按照中国军队一战即退的惯例，汤恩伯部必会向西北方向避退，那时候在半路上将其包围歼灭。根据“短距离”的原则，日军第十一军把攻击限度定为河南信阳东北八十公里的光州、新蔡和西平一线——他们估计汤恩伯部要跑也只能跑到这里就会被围住了。

凭什么判定汤恩伯部会在设定的范围里等着被围歼？

豫南地区，指的是淮河平原以西、大别山和桐柏山以北、伏牛山以东的大平原，平汉铁路纵贯其中，公路四通八达，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日军占领宜昌后，侧背依旧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因此与第五战区对峙的兵力约有步兵七个半师团、独立骑兵一个旅团、独立战车三个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总兵力为十五万，集中在安阳、新乡和信阳等机场的一百余架飞机可随时提供作战支援。

而位于平汉路和黄泛区一带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除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配置在豫皖交界处的界首负责监视豫东的日军外，其他各军都部署在平汉路的正面。此时，中国第五战区其他部队的大致位置是：平汉路东侧大别山地区，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的两个师；桐柏山地区，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和孙渡的第五十八军的五个师；随枣地区，孙震的第四十一军和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的五个师；大洪山到襄河东岸为廖震的第四十四军和余念慈的第六十七军的四个师；襄河西岸向宜昌方向防御的是池峰城的第三十军、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和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的六个师。此外，在黄泛区还布防着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从第五战区部队分布上看，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位置有点向东孤悬——尽管日军判断汤恩伯部向东去打新四军之说没有确实证据佐证，但就其位置来看确实有点异样。

为围歼汤恩伯集团，日军第十一军抽调了第三、第四十师团的主力以及第四师团一部参战，位于京沪地区的第十三军以第十七师团主力和第十五师团一部增援。参战部队分成三路，其兵力部署是：左兵团由第师团主力并附属第四师团的步兵第八联队和水野坦克部队组成，沿平汉路在信阳以西由小林店向北面的高邑、舞阳方向进攻；中央兵团由第十七师团主力并附属第十五师团的步兵第六十七联队以及吉松、楠獭等坦克部队组成，沿平汉路从信阳以北的明港向北面的西平方向进攻；右兵团由第四十师团主力组成，在平汉路以东由正阳向北面的上蔡方向进攻。此外，为了策应作战，在战场外围的皖北方向，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并第二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由宿县向西攻击；在豫东方面，第三十五师团出动两个步兵联队和骑兵、坦克和炮兵各一部，分别由开封以及南面的朱仙镇向黄泛区进攻。

日军开始集结兵力。

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日军的大规模调动无密可保，中国方面关于日军集结的情报纷至沓来：日军已从东北地区调三万兵力入华北；长江以南的日军有向江北移动的迹象；长江下游的日军舰船满载着步兵和弹药正向上游开进；汉口的日军陡然增加了几万；河南信阳至湖北汉口间的客车车票已停售一个多星期；广水、孝感以南以及鸡公山至广水间都出现了日军师团的新的番号；日军沿平汉路南段铁路运来了大量的铁路器材。——日军将在豫南发动进攻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

中国方面的判断正确无误：日军不但将在豫南发动进攻，而且是沿着平汉路向北攻击，目标是驻扎在南阳以东地区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而皖北和豫东的日军西犯，是为了策应平汉路的攻势。

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直接致电汤恩伯：

急。汤总司令恩伯：敌军必于下月初或本月底向弟所属各部进攻，务须严令各部积极准备，不可为敌所制。此次敌之攻势，其范围必较远大，豫东南之商城、阜阳、郾城，豫西之南阳、临汝，皆为其预定之目标，近则舞阳、沔阳、桐柏、确山、正阳，自为其必窜之途，希以此敌之意图，速作对策，限于本月底布置完妥。总以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两翼，做主动的侧击；另以有力一部埋伏敌后，待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其交通。望于本月内布置完妥，豫东方面尤应特别注意。接电后速复。中正手启。

中国第五战区迅速调整部署：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平汉路以西，主力集结于豫南泌阳附近；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于平汉路东西两侧，分别集结于西起象河关东至汝南一线；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主力位于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侧面，集结于汝南以南的息县；黄维纲的第五十九军向鄂北与豫南交界处的枣阳靠拢；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枣阳以东的桐柏和新城开进；第二十九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还需派出有力部队潜入日军后方实施骚扰。

汤恩伯判断，日军必会沿着泌阳至舞阳的公路以及平汉铁路分路北上。依据这一判断，他将第三十一集团军部署如下：第十三军控制在舞阳以南的尚店、象河关、土山镇、仪封镇一带，形成向东或向西都可以实施夹击的姿态；第八十五军派出一个师沿平汉铁路正面节节抵抗，负责诱敌深入，主力则控制在上蔡至汝南之间，准备自东向西侧击沿平汉路北上的日军；位于鄂北随县的第二十九军进至豫南的桐柏附近，一路跟踪日军北上，伺机行动。然后，汤恩伯复电向蒋介石表示："一切当遵钧电办理，如敌果大胆北犯，谅能予敌以严重之打击也。"

无论蒋介石的作战策略，还是汤恩伯的御敌部署，实际上还是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形成的战法：以小部队阻击正面的日军，迟滞其推进速度；另派部队向日军的背后迂回，骚扰甚至截断日军的后路；主力部队则迅速向日军进攻方向的两翼撤退，以待时机合适时实施两面夹击的围攻。这样的战法，中国军队在长沙会战后的枣宜会战中也曾使用。令人不解的是，日军将领们非但没有警觉，且固执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而不敢正面作战。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不主动发动攻势可以说是一种消极，而一旦日军发动进攻，双方混战在一起，消极与否的问题就会瞬间转化为战术问题——正面硬拼不敌对手，移动一下便可创造战机，至少在长沙战场上这一战术令日军吃亏不小，此次日军何以还能满不在乎地多路并进？

二十日，为隐蔽向豫南进攻的意图，也为牵制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吸引其向西移动，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以及第四、第三十九师团各一部，在湖北当阳、荆门和钟祥方向，向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阵地实施了佯攻，一直突进到当阳以北的远安地区。但是，日军的此路佯攻不但被中国守军击退，且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没有移动。二十四日夜，日军左兵团的第三师团向信阳北侧的中国守军阵地实施奔袭，企图一举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但遭到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第六十八军的顽强阻击。这一路日军的袭击也没有奏效。

尽管前期作战没达到目的，日军对豫南的正式进攻还是在二十五日开始了：左翼在小林店、古城和查山一线，中央兵团在明港附近，右翼在槐角镇和正阳之间，三路日军沿平汉路齐头并进向北攻击。日军航空兵照例协同地面作战，对中国守军阵地实施了猛烈轰炸。

中国守军按照预定部署，滞留少量部队在正面阻击，主力则逐步向日军进攻路线的侧后转移。

二十六日，日军左翼和中央兵团推进到泌阳、邢店和确山一线；二十七日继续向北，推进到春水、沙河店和驻马店一线。两路日军两天之内深入了近百公里。这一天，中国第五战区的命令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在日军主攻路线的侧后，对日军实施尾追和夹击。即张雪中的第十三军在平汉路西侧，攻击象河关附近的日军第三师团；李楚瀛的第八十五军在平汉路东侧，攻击上蔡附近的日军第四十师团。同时，第五战区命令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尾追日军第三师团并实施攻击；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由鄂北的唐河向豫南的泌阳方向移动，第三十二集团军黄维纲的第五十九军也速向南阳靠拢。

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夹击开始了。

二十九日，汤恩伯部的左右两军都陷入与日军的激战中。

日军中央兵团得知两翼都陷入苦战后，显得有些进退两难。为挽救战场颓势和两翼危机，第十一军司令部不得不变更部署，命令中央兵团分别向两翼迂回，即第十五师团向东移动，试图与第四十师团合击中国军队第八十五军主力；第十七师团向西移动，试图与第三师团合击中国军队第十三军主力——日军发动三路进攻的一周后，中央突击的一路就瓦解了。中央兵团的日军迅速分兵奔向两翼，但中国军队再次使用老办法，命令当面部队迅速后撤，只留下少量部队与日军纠缠。

中国军队第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基本部队，他在该军当过师长和军长，该军现辖蔡棨的新编第一师、吴绍周的第一一〇师和舒荣的第八十九师。为了阻击日军的进攻，军长张雪中亲赴舞阳指挥作战，他把第八十九师放在第一线，第一一〇师和新编第一师放在了第二线，两条防线之间相隔三十公里的距离。但是，由于日军加大了兵力，舒荣的第八十九师在象河关没有顶住，导致第二线的第一一〇师在尚店的阵地骤然临敌。日军对第一一〇师前沿三二八团阵地实施了狂轰滥炸，然后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冲击。下午三时，三二八团阵地被日军突破，第二线

阵地全线动摇——迫击炮营和战防炮连首先后撤，然后步兵也溃退下来。师长吴绍周命令三三〇团团长陈钦文阻击沿公路蜂拥而来的增援日军。为与日军抢占公路边一个叫将军墓的制高点，陈钦文团长亲率官兵仰攻，冲到半山腰，部队被日军的炮火压制，官兵伤亡极大，让日军抢先了一步。冲在前面的陈钦文团长穿着一身与士兵不一样的灰蓝色卡其布军服，由于目标过于明显，被日军狙击步枪击中阵亡。团长阵亡后部队大乱，日军的战机疯狂低空扫射，中国守军丢失的阵地已无法挽回，师长吴绍周下令全线撤退。

实际上，三三〇团的阻击任务本来就是打了就跑。

平汉路以西的第十三军和平汉路以东的第八十五军，趁日军的合围尚未合拢之际，第十三军转向叶县以北，第八十五军转向郾城和商水以北，日军突入舞阳和上蔡地区后，发现包围圈里并没有中国军队的一兵一卒，连中国军队的前沿都找不到，更谈不上什么距离“敌师部”十里至十五里了。至此，日军不敢也不能再往前追了，这是“短距离截断作战”所要求的。

此时，豫西中国军队第五十九、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分别由唐河、泌阳方向北进舞阳，皖西的第八十四军和游击部队也在向正阳北进，中国军队于平汉路东西两面死死顶在了日军的尾部。

日军发现战场局面有些不利了：既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没能在战场的任何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控制局面，反而被中国军队到处堵截，特别是侧背方向，至少有中国军队的三个军随时可能围上来。二月二日夜，日军第十一军决定全面撤退。

日军突进容易，撤退便是另一回事了。

二月三日，日军分路由大石桥、镇平向南阳撤退，四日过境时攻占了南阳。在南阳附近阻击的中国军队中，有一支当地的回民游击队，除了运送弹药、护理伤员和埋设地雷外，年轻的游击队队员们直接参战。回民游击队勇猛彪焊，队长是擅长武艺的大汉胡振清，绰号胡大娃。战斗中，胡大娃只身一人守一座寨门，誓死不退。日军利用夜色悄悄绕到胡大娃身后，胡大娃误认为是自己人，结果被冲上来的日军用乱刀砍死。回民游击队队员怀着深仇大恨对撤退中的日军紧追不舍，终于捉到了五名掉队的日本兵，算是为英勇的胡队长报了仇。因回民游击队在此次战斗中毙敌百余名之多，战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亲自慰问，向

他们颁发了一面“为国争光”的锦旗。

二月四日，鉴于第三师团独自南撤有点危险，日军第十七师团主力和第十五、第四师团各一部由象河关出动向第三师团靠拢，企图在接应其撤退的同时，与第三师团一起夹击中国军队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和第二十九军。但是，日军第十七师团主力刚从象河关出来，便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在急促向北回窜尚店一线时，又受到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的凶狠截击，日军的尸体、辎重、行李和车辆遗弃得到处都是。

这是日军最苦恼的时刻：尽管中国军队的尾部追击和两翼围攻不能算是决死上前，但纠缠不休，苦战不止，让日军疲惫不堪。日军必须与这一股中国军队打一阵，又与另外一股中国军队打一阵，前面刚打开通道后面又咬了上来，无心恋战的日军只有不顾一切地往回跑。

中国军队一直把日军赶回了他们原来的出发地。

在皖北和豫东方向，策应平汉路作战的日军也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分路发动进攻：一路为第二十一师团的太田联队，由宿州向西南攻击；一路为骑兵第四旅团附属平林坦克部队，由亳县向西进攻。骑兵第四旅团是攻击的主力，其部队分了三路，兵力分布有些零乱。中国骑兵部队在什字河、倪邱集附近与日军骑兵相互冲击，双方步兵也在大平原上展开了阵地攻防战。就这个方向的中国军队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空中，从安阳等机场起飞的日军战机，对中国守军一线阵地的轰炸造成很大伤亡。中国守军只有采取边打边撤的办法，日军最终攻陷太和、界首。但是，当平汉路方向的日军开始撤退时，进攻这个方向的日军也动摇了，退到两翼的中国守军乘机反击，不但把太和、界首夺了回来，还把这个方向的日军也赶回了原出发地。

这次作战，日军战史称为“豫南作战”，中国战史称为“豫南会战”。日本方面对此战评述简单，甚至显得有些避讳，称“这一战役敌交战之兵力约九万五千，伤亡达一万六千，日军只是轻微损失”。

中国方面的公布是：“是役敌伤亡九千余，在南阳附近被我焚歼敌汽车三百余辆，虏获军用品无算，我遂得极大胜利。”至于我方伤亡，中国方面的宣布也是“损失轻微”。

此战之后，第五战区参谋长王鸿韶甚为乐观：

敌军的战斗力量，较之以前确已减弱太多。在南阳、方城一带，捕

住俘虏，均着单衣，手面皆黑，形容枯槁，当被审问时，渠皆痛苦流涕，战斗意志之低降，至于此亟。今后致敌与无机械化部队（尤其空军）配属，仅以步兵与我展野战，其战斗能力，当远逊于我了。

豫南会战战役规模不大，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多，“短距离截断作战”的原则使日军不敢奔袭过远，且撤退迅速。所以，依此一战便认定日军的野战能力“远逊于我”，为时还早。但此战对于日军来讲，在焦躁、狂妄以及轻率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无论是前期策划，还是作战实施，乃至战场上的相互协同，都存在着极大的漏洞。此战再次坚定了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周旋作战的自信：

我以劣势装备，不能与敌在火力上拼胜负，乃大胆留置敌之侧后，实行尾击截击，至此已逐渐成熟，运用上亦甚灵便，自此以后诸战役，尤甚明显。

不幸的是，日军始终对中国军队的这一战术认知模糊。

豫南会战结束不到一个月，日军于南昌附近的上高地区再次发动攻势，与之作战的是中国第九战区部队。

这次作战中方称为“上高会战”，日方则称为“锦江作战”。

锦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湘赣交界的幕阜山脉，流经赣西北的万载、上高、高安等县境，在南昌附近的市汊街注入赣江。群山之间的上高县城，位于南昌西南约十二公里处的锦江上游北岸，背靠九岭山和罗霄山脉，扼守着锦江和赣江的要冲，既可以东出南昌，也可西出长沙，中国第九战区的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驻扎在这里。

一九四一年，南昌的日军同样处于焦躁之中：自一九三九年三月攻占南昌后，日军以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守备南昌和南浔铁路附近，与中国军队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对峙，两年以来双方都没有过大的军事动作。但是，南昌日军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认为自己处在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在赣东，西起南昌东南，东至鄱阳湖东岸，是中国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部；在赣北，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部；在赣西，是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部。特别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副司令长官罗卓英，都是很强劲的作战对手，很难说他们没在虎视眈眈地图谋反攻南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赣江流域是中国第三战区与第九战区的接合部，为了收复南

昌，薛岳和罗卓英建议军事委员会把第九战区的作战区域向右延伸，这样驻守赣江东岸的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就被列入了第九战区序列。罗卓英取得了赣江东岸的指挥权后，将李觉的第七十军部署在赣江以西的锦江南岸，以为攻击南昌进行准备。

驻守南昌的日军，本来兵力仅有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可是大本营决定把第三十三师团调到华北去，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武装已强大到必须使用主力师团去作战了。为弥补南昌的兵力薄弱，第十一军从上海调来了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日军的这一移动，让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发现了一个战机：第三十三师团调出的时间定在四月，第二十旅团调来的时间是二月。这也就是说，从二月到四月之间，第三十三师团还没走，第二十旅团已经来了，南昌的日军将比原来整整多出一个旅团。这不正是趁机发动攻势以打击对南昌威胁最大的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的最佳时机吗？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不在第三十三师团调走之前给当面的中国军队主力以致命打击，自己将来独守南昌的日子会非常难过。

大贺茂开始极力怂恿第十一军司令部进行“锦江作战”。

大贺茂向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描绘的战役蓝图是：以第三十三师团为右翼（北路），由南昌西北方向的安义向西南进攻；以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为左翼（南路），由南昌西南沿着锦江南岸向西攻击；第三十四师团在中间，沿着锦江北岸向西进攻。三路部队分进合击，将中国军队第十九集团军包围在上高地区加以歼灭。其作战核心是：利用第三十三师团对中国军队的侧翼实施压迫，将其压迫到战场南侧第三十四师团的作战区域里，然后由第三十四师团获得战果。

大贺茂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园部和一郎的积极响应。尽管第十一军司令部最终还是批准了此次作战，但园部和一郎没有按照常规去南昌指导作战，甚至没有在南昌设立军指挥所，大有让第三十四师团与第三十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商量着办的意思。

司令官的消极态度，被抵达南昌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察觉，他认为这是“高唱‘短距离截断作战’的消极方针”导致的现象：

这是三个兵团并立作战，第十一军也没有为此作战特别设置司令部

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时态势的汉口军司令部指导进行了。这样做究竟是守旧思想所支配呢？还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从开始作战，各司令部的意志就不统一，这里包藏了极危险的问题。

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由于豫南作战的糟糕结局，第十一军对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倡导的“短距离截断作战”已经没了兴趣。

那么，园部和一郎为什么还要批准此次作战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军有一支部队调走之前必须出击一次的惯例。大贺茂拉着第三十三师团一起申请作战，不是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的。

为了此次作战，除滞留少量后方部队外，南昌的日军几乎倾巢而出：第三十三师团由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缺步兵第二联队，但配属了独立工兵第三联队一部，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第三十四师团由师团长大贺茂中将指挥，缺步兵第二一八联队，但配属了独立山炮第二联队和独立山炮第五十一大队，兵力约为二万人；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由旅团长池田直三少将指挥，配属独立步兵第一〇二、第一〇五大队和独立工兵第二联队，兵力约为八千人。

大贺茂为促成此战不停地忙碌，他的部队二月中旬就开始紧急整理装备，为适应山区作战还对炮兵进行了驮马改装和训练，并在当地大量征用中国民夫。东京来的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认为，大贺茂简直是不顾一切了，因为“征用民夫一事很快传到重庆军那边，而使其加强防备，这是中国战场的常识”。

果然，中国方面察觉了南昌日军的动作。

罗卓英不断地给重庆发出关于南昌日军动态的电报：

……增南昌敌约五千，现集结于南昌、望城岗，似尚无动静。其队号有池田、森重、木本等步兵部队，金井炮兵部队。又增安义敌约一千五百，均分开前方，似补充兵……

……三十四师团，合增敌约一万五六千，除守一线约四千外，集结上谌店千余，莲塘四千余，罗家集二千余，南昌四千余，并拉夫二千余。莲塘线出现运输甚繁，有窜扰模样。新旧机场现停机二十架。

事实证明，以上情报相当准确。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制订的作战方针是：当日军向上高、万载进犯时，位于赣西的第十九集团军各部队，应从市汊街开始沿锦江南岸绵亘至锦江以北构筑第一线、第二线阵地，逐次对进犯日军予以打击，诱敌深入至上高东北的第三线阵地后“与敌决战”。

日军采用的依旧是分路合击的战法。

薛岳采取的应对战术依旧是诱敌深入。

三月十四日，利用暗夜作掩护，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在干洲街、第三十四师团在万寿宫、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在厚田街，三路攻击部队集结完毕。十五日凌晨，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由安义分成两股向当面中国守军李觉的第七十军发动攻击，目标是攻占奉新城。第七十军唐伯寅的第十九师、宋英仲的第一〇七师和张言传的预备第九师的正面阵地全都发生了激战。当时，预备第九师在奉新城东，第十九师在奉新城西，中国官兵两面抵抗，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日军的重炮和飞机将奉新外围阵地炸成一片废墟，预备第九师虽然组织过反击，但因战力过于悬殊被迫退守奉新城内。当外围阵地大部失守后，奉新成为一座孤城。日军的重炮部队迅速向前推进，向奉新城内展开猛烈轰击，日军的飞机也低空盘旋投弹，小小的奉新顿时被炸得稀烂，日军步兵从被炸塌的城墙废墟上蜂拥而入，县城很快落入日军手中。第三十三师团占领奉新后，越过潦河，再次推进到第十九师和预备第九师的阵地前。两个师的阵地于南北隔着潦河而设置，日军趁夜色从两师阵地的接合部钻了进去，渗透到奉新西面的车坪、棺材山一带。预备第九师拼死抵抗，但第十九师没有主动协同，使得日军继续向西推进，于十六日拂晓进至水口甘附近。

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是刚由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在上海改编而成的部队，改编后不足两个月便被调往南昌前线。该旅团在池田直三的指挥下，十五日凌晨从赣江北岸的牛行出发，企图利用黎明前的暗夜偷渡锦江向西进攻，但却出师便不利。旅团出击的位置在锦江即将汇入赣江的大拐弯处，因此必须首先向西再向南两次渡过锦河。两次偷渡，都被中国守军第七十军第一〇七师击退，直到十六日凌晨借助炮兵和飞机的掩护才渡河成功。第一〇七师退守仙姑岭阵地。罗卓英得知这股日军渡过锦江之后，立即命令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出动一个团，前往独城附近会合第一〇七师对日军实施阻击。第七十四军派出的部队是李天霞的第五十一师的主力团。在红石岭一带，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遭到了他们没有想到的顽强阻击，激战中该旅团伤亡四百余人，向西推进的计划顿时受挫。

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还有一支被称作“赣江支队”的单独作战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沿着赣江南下，直扑樟树、清江、丰城，然后实施偷渡，为接应攻击上高的主力回撤作掩护。十九日晨，赣江支队先头部队二百余人企图偷渡赣江，立即遭到中国军队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的迎头痛击，偷渡的日军有一半被打死在江中，另一半不得不退守江心的沙洲以待增援。可是，援兵乘坐的舰船又被中国守军击沉，日军的尸体顺流东下，残敌向东面的曲江方向撤退。此时，支队长坂本正带领支队主力攻击清江，没想到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师的七十六团迎面而来，日军猝不及防，在张家山、崇祯观和蜀家地附近被冲得七零八落，仅崇祯观一地就遗留下尸体四十余具、战马三十多匹。赣江支队主力的残部也向曲江方向后撤。

大贺茂指挥的第三十四师团气焰嚣张。在南北两路日军发动攻击第二天，即三月十六日拂晓，该师团从锦江以北的万寿宫出发，沿着湘赣公路大举向西。这是一支由两万人组成的部队，头顶上有飞机的掩护，地面上是炮兵、骑兵和步兵的混合，浩浩荡荡，烟尘蔽日。大贺茂的设想是：在这条西进的路上，没有任何一支中国军队能够阻挡这支部队，他要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上高，不但将中国军队主力第七十四军包围歼灭，还要把北路第三十三师团向南压下来的第七十军一起吃掉。部队还没有抵近高安城，大贺茂首先碰上的是中国军队第七十军的第一〇七师，双方在高安城以东展开了阵地攻防战。激战至中午，日军相继占领赵家山和莲花山。李觉的第七十军，前身是湘军的一部，第十九师是其基本部队，第一〇七师是一九三九年新组建的部队。第七十军拥有一定的战斗力，负责防御南昌以西的第一线阵地。其第十九师和预备第九师在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攻击路线上，是右翼防御；而第一〇七师面对的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为左翼防御。第一〇七师为加强阻击力量，把二线阵地的部队推进到一线，其三二〇团位于一线的支撑阵上地。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发始攻击后，三二〇团的前沿阵地立即遭到被中国官兵称为“猛虎洗脸”式的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然后便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的冲击。三二〇团的最前沿是个圆锥形的小山包，三营官兵顽强阻击，死伤者被一个个地抬下来，但阵地仍是没有失守。下午，日军的十几辆轻型坦克在左侧强行突破，绕到了三营的背后，三营终于支持不住撤了下来。但是，在三二〇团的主阵地前，日军再次受到阻挡，主阵地前面的开阔地成为日军官兵的死亡之地，中国守军各种火力编织的火网让日军的多辆坦克中弹起火瘫痪在稻田中。晚上，日军组织起精锐小队实施偷袭，一营一连的前沿只有一个班，结果除副班长跑出来之外，班长胡晃等九名士兵都死在日军的刺刀下。第二天，日军再攻三二〇团的主阵

地，由于右边三一九团的阵地被日军突破，三二〇团的阵地开始动摇。苦战持续了一整天，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候，第一〇七师已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仅三二〇团官兵就伤亡了一半多。

第一〇七师的苦战迟滞了大贺茂的推进速度，为中国军队的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十八日，罗卓英下令高安附近的中国守军迅速脱离战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顺利突过高安后，大距离地快速奔袭，西进至上高与高安之间的龙团圩。在龙团圩，他们遇到了他们要找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

第七十四军，中央军嫡系部队之一，辖第五十一、第五十七和第五十八师。此次战役前不久，为加强陆军的攻击力量，蒋介石命令把中央军嫡系部队中的第一、第二、第五和第七十四军，装备成四个“攻击军”。所谓攻击军，即在人员编制和武器编配上比常规部队提升一步：常规部队每个军通常为两个师加一个新编师，攻击军的每个军辖三个正规步兵师，且员额齐整；在武器配备上，攻击军拥有野炮山炮混编成的炮兵团、特务团、工兵团、辎重兵团和补充团各一个，战车防御炮、重迫击炮营各一个，由骑兵和脚踏车混编成的搜索营一个，通信营一个，特务队一个。除此之外，每师还配属了山炮或重迫击炮营一个，战车防御炮和高炮各一队。攻击军可谓当时中国陆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遵照罗卓英的指令，将其部队部署在龙团圩至上高之间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攻击路线上：余程万的第五十七师进入坎头岭、索子山、下曹港一线的主阵地；廖龄奇的第五十八师进入桥头、官桥、棠浦、泗溪一线的主阵地，并以龙王街、杨公圩、黄峰岭一线为前进阵地；李天霞的第五十一师作为军的右翼在锦江南岸的泉港街、钩水岭和石头街一线。十八日晚八时，在龙团圩西南方向，王耀武派出的搜索部队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前哨遭遇，激战随即开始。日军千余人冲击中国军队的阵地前沿，受到第五十七师补充团的阻击，尽管日军后续部队一再增援，且一度试图迂回补充团的侧背，但始终没能突破正面阵地。十九日，日军在飞机的助战下再攻第五十八师阵地，第五十八师以一个团在正面死守，另派一个团迂回到日军的侧后，双方一直混战到天黑，都伤亡惨重。在无法突破当面阵地的困境中，大贺茂亲率一万多人死攻第五十八师的左翼。军长王耀武认为这种态势令第五十八师有被包围的危险，遂下令部队乘夜色从龙团圩西南后退至官桥街、泗溪防御线以西，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形成对峙。

按照大贺茂的作战计划，从南昌出击的三路日军都需以上高为目标

向心突击，在钳形攻势里将中国军队的第七十、第七十四和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全部压缩在上高附近的狭窄地域里，然后合围歼灭。但是，在日军发起三路攻击的第五天——三月十九日晚，大贺茂突然发现情形有些不对劲了。从第三十四师团的攻击进程上看，似乎没有什么意外，不但击溃了阻击的中国军队，而且捕捉到其主力第七十四军，并且将第七十四军粘在了对面的战场上。可是，另外的两路——第三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现在又在哪里呢？

日军入侵中国之后少有的战势反常情况，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江西西北部的大山里出现了。首先是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现在还处于苦战之中。该旅团从一出发就受到阻击，好不容易推进到锦河南岸，又遭遇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师李天霞部，第五十一师在死守鸡公山阵地的过程中实施了反击。在迫击炮的掩护下，中国官兵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在预备队的增援下与日军血战一天，日军伤亡二百余人，樊逢春连长和他率领的百余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黄昏，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一部在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向鸡公山阵地猛扑，中国守军阵地落下的航空炸弹和炮弹在五百发以上，阵地上一个营的官兵大部伤亡。第五十一师随即派出一支小部队猛烈突击日军的侧背，毙伤日军三百多人，日军被迫退守猪头山顽抗。半夜，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的三个独立大队联合反扑，与第五十一师反复争夺阵地，持续不断的激战中，日军伤亡达千人以上。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推进艰难，无法得知什么时候才能与第三十四师团会合。更为严重的是，第三十四师团的南翼等于向中国军队敞开了。

而在战场的北面，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竟然不打了，掉头回去了。

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在此战中表现得十分古怪。按照原定作战计划，他的师团应把当面中国军队第七十军不断地由北向南挤压，一直挤压到第三十四师团的主战区域里，然后与第三十四师团一起对上高附近的中国军队实施合围。但是，第三十三师团从南昌出发后，遭遇中国军队第七十军的阻击，部队一边打一边向西前推，推至五桥河、村前街一带时，第七十军突然脱离战场跑了。按照一般的战场原理，第七十军撤退的方向应是主力所在地，这样既可以加强集团防御的力量，保卫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还可以获得自身的相对安全。但是，此时第七十军的两个师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一直跑进赣西北上富地区的深山里了。这下，樱井省三不得不面临选择：要不就朝着预定战场相反的方向去追第七十军，要不就放弃第七十军，遵循原定作战计划，转头向南面的上高方向推进，与第三十四师团一起合围中国军队主力第七十四军。

——较为合理的选择，应该是放弃追击第七十军，继续执行预定计划，后果只不过是让中国军队第七十军漏网而已。

但是，樱井省三作出了两个不可理喻的决定。首先，他决定去追第七十军，也就是说，他将带着部队向预定合围战场的相反方向而去。作为军事将领，樱井省三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那就是不但大部队进入深山后给养跟不上，且机械化部队于山区作战很难取得战果。更重要的是，他向相反方向的运动必会使战场的侧翼出现空白，第三十四师团很有可能因为侧翼的暴露而招致灾难。接着，樱井省三作出的另一个决定更为离奇。他认为，第三十三师团所担负的任务是驱赶第七十军——至于驱赶到哪个方向他不管，现在驱赶的任务已经完成，他的师团四月就要调到华北去了。于是，他只派出师团的一部象征性地去追击第七十军，而大部队则朝着出发地安义开始打道回府了。日本战史对樱井省三的举动叙述得模棱两可："北翼的第三十三师团，按预定从北面攻击敌七十军的两个师，将其向南压迫，十九日达到目的，开始返回。也就是说，夺取了村前街西侧高地的步兵第二一四联队，从十八日半夜返回；当夜在凤凰墟大休息的步兵二一五联队，十九日拂晓前从当地出发北进，在长隘路突破敌群，烧毁了上富镇，二十三日返回原驻地。"

或许对南翼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的受阻情况不甚了解，或许尚没确定北翼的第三十三师团已离开战场的消息是否属实，中路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依旧斗志昂扬，大贺茂命令部队继续向当面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实施猛烈突击。

薛岳终于看到了战机。

位于赣江东岸的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致电战区长官部，称第四十九军连续袭击南昌外围，发现南昌守军缩在碉堡里不敢迎战，还把南昌城墙外的城壕里都灌满了水。薛岳判断，南昌日军已倾巢出动，因此可以调动赣江东岸的部队前来参战。于是当即命令罗卓英严饬各军积极向日军实施攻击，将孤军深入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歼灭在锦河南北地区，并调位于赣北的第三十集团军的两个师迅速南下参战。

十九日，罗卓英下定了作战决心：把深入锦江南岸的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的先头部队吃掉，再向第三十四师团主力实施合围。具体部署是：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王铁汉部渡过赣江西进，与第二十六师王克俊部和第五十一师李天霞部协力，先将锦江南岸的独立混成第二十旅的先头部队歼灭，然后从南向北压缩；第七十军第十九师唐伯寅部和预备

第九师张言传部向村前街、龙团圩以及高安推进，从北向南压缩；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和第五十八师廖龄奇部在正面坚守上高城，把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死死顶住，并将其滞留在战场以待合围之后歼灭。

就薛岳和罗卓英的决心而言，围歼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关键在于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正面的两个师。他们能够顶得住，才能给围歼部队的移动争取时间；一旦他们顶不住，或是让日军攻占上高，或是让大贺茂率队跑了，都会使中国军队的围歼计划成为泡影。

二十日，大贺茂把他的师团指挥部推至距上高东北仅十公里的毕家。日军集中起大量的重炮以及三十多架战机，采取锥形突入的方式猛攻泗水西岸第七十四军的阵地，试图一举攻陷上高城。激战之时，一部日军强渡泗水，第五十八师奋力堵塞缺口，两军于泗水两岸混战到天黑。这时候，第五十八师一七二团的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廖龄奇派预备队补充团对日军实施逆袭，尽管暂时遏制了日军的攻击速度，但第五十八师的阻击面太宽，每个营的防御正面约七公里，阵地显得十分单薄。二十一日午夜时分，师长廖龄奇率部转移到白茅山、梓树下、荷舍线，与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的阵地衔接成一体。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主力跟随而至，向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猛攻不止，但整整一个白天始终没能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

在锦江南岸方向，根据罗卓英的命令，李天霞的第五十一师于二十日向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发动了进攻。但是，其前锋刚从石头街出发，便遇到大批日军从北岸横渡而来，原来日军首先发动了攻势。第五十一师的前锋部队受到日军两面夹击，加上重炮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被迫退守石头街西南高地。军长王耀武立即改变部署，命令第五十师主力向左翼转移，同时命令军直属补充团迅速前往阻截日军，坚决不能使其继续向西接近第三十四师团。补充团的官兵冒着日军的轰，不顾一切地急促行军，于二十一日凌晨赶到战场，率先占据了一个无名高地。中国官兵刚刚站稳，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主力便蜂拥而至。补充团兵力并不充足，但面对日军凶悍的攻击毫无惧色，日军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中国守军的阵地岿然不动。日军向补充团的侧翼熊坊迂回，补充团也随即转移防御方向，仍旧与日军死战不止。日军在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从空中向补充团阵地投掷燃烧弹，在地面投放大量的毒气弹，补充团官兵伤亡巨大，熊坊失守。李天霞命令第五十一师的两个团火速增援，增援部队向日军猛冲猛打，午夜时分把熊坊夺了回来，同时夺回的还有石头街和鸡公岭阵地。血战至二十二日，双方伤亡都在四千人以上。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的后面是锦江，前面是挡在路上与他们死

战的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师，他们无异于陷入了背水为阵、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上高方向的战事依旧胶着，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的两个师横在路上，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就是过不去。大贺茂对上高城近在咫尺却不能得而备感焦虑，连支援其作战的日军第三飞行团指挥官都感到再这样拖下去前景不妙。二十二日这天，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给大贺茂空投下来一封信，信上话说得很客气，但催促的意思也非常明显：

大贺中将阁下：连日连夜之战斗，想极辛苦，气象台虽稍报天气恶化，但仍继续晴天，可谓天佑。上高占领，即在目前，请继续奋斗，以收赫赫战绩，不胜盼切。池田支队、圾本支队，已取得联络，弹药已投下，状况较为缓和，请安心！本团虽力量微薄，当尽死力协助于上高占领，倘因时间迁延，故敌将整顿态势，后方扰乱，亦将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即行回师。请示知上高总攻击时刻，本团当以全力协助之！请决定时刻，一举突入如何？

这封信没能空投到大贺茂手里。

中国军队截获后送到了罗卓英的指挥部。

即使大贺茂收到了这封信，被挡在上高城外围的他又如何能够确定对上高城实施总攻的时间？

大贺茂依旧在指挥部队向第七十四军阵地发动猛攻。

在余程万的第五十七师方向，日军投入了四千兵力，还有三十多架飞机参战，曾一度突进到距余程万的师部千米左右处，但一线阻击主阵地仍在中国守军之手。随着日军骑兵部队迂回到侧后，第五十七师开始两面受敌，身后的锦江大桥也遭到日军的轰炸，第五十七师坚持到天黑后向后收缩阵地。在廖龄奇的第五十八师方向，大贺茂一次就投入了万余兵力，还配属了两个炮兵大队和数十架战机，猛攻中国守军的白茅山阵地，该阵地在守军伤亡殆尽后失守。王耀武再次把补充团派了上去，补充团三营急促行军赶到后，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把白茅山阵地夺了回来。二十三日，战斗进入白热化。第七十四军两个师的官兵连日苦战，每个阵地上都发生了惨烈的肉搏战。第五十七师伤亡惨重，仅在一七〇团的阵地上，中校团附张劲梅、八连连长邢吉麟、四连连长杨传镇和二连连长沈士福先后阵亡。第五十八师防守的聂家、下陂桥、徐楼一线，

阵地三次易手，日军的轮番进攻彻夜未停。晚上，大贺茂派出一支便衣队，化装成中国百姓，在汉奸的带领下潜入到中国守军阵地的背后，在通往上高的路上大肆放火并破坏电话线。第五十八师随即派出搜索队，漫山遍野地抓捕日本便衣和汉奸。

二十三日夜，罗卓英亲拟《胜利保障十则》颁布部队，警告各将领不要在“抗战四年来仅有的对敌取得包围歼灭战有利态势”的关键时刻，犯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老毛病，否则军法无情。

一、记住委座的训示：“我不怕敌，敌便怕我。”

二、记住司令长官的训话：“苦斗必生，苦干必成。”

三、记住本总司令的训告：“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四、目下对敌包围形势，业已完成，包围圈也已缩小，今天就是我军全线对敌施行求心攻击开始的时候，也是我军对敌展开歼灭战的良机。

五、我忠勇将士，苦战八日，业已取得八分胜利，今天第九日，必须努力争取九分胜利，以保障明天的十分胜利。

六、依昨日战况判断，敌军攻势，业已顿挫，力量已经耗尽，若无后续援军，不仅不能攻我，而且必遭惨败。纵有增兵，亦不过一大队。而我合围已成，力量凝集，增援部队新编第十四师今日可加入战斗，新编第十五师明日即可赶到参力卩，预计战局多延一小时，我军多得援兵一营，多延一天，多得援兵一师，围歼力量，绝对优势。

七、过去八天苦战中，万余伤亡将士的血花，正期待吾人今明两日之努力，结成胜利之果，报答国家。第七十七军奉新烈士墓，第七十四军高安烈士墓，巍然在望，吾人必须迅速歼灭巨敌，报慰英灵。

八、吾人必须把握抗战四年来仅有的对敌取得包围歼灭战有利态势，将十天以后的作战精神及力量，提前到今明两天来，适时使用，充分发挥，俾在赣北战场，收一劳永逸之效，而开今年胜利年之先路。

九、各级指挥官，绝对不许有怕牺牲、保实力之观念，务须指挥中国之军队，歼灭中国的敌人，以表现中华民族革命军人之真精神。凡属

最能牺牲最奏战绩之部队，我领袖必然予以优先补充与厚赏，本总司令亦当负责报请补充，迅恢战力。

十、各级指挥官，务须确实掌握部队，向指定任务坚定迈进，并切实执行连坐法。

二十四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一部终于突入第三十四师团的战场，加入了对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的作战行列。第三十四师团得到兵力增援后，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几乎把他所能指挥的战机全部派来助战，大贺茂再次命令向第七十四军阵地发动猛攻。日军的七十多架战机在第五十八师阵地上投下了一千七百多枚炸弹，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炸毁，中国守军伤亡严重。午后，日军从下陂桥突入第五十八师阵地，遭到中国守军的拼死反击，双方反复肉搏死伤累累，最终日军被赶出了下陂桥阵地。

大贺茂感到了极度的疲惫。

在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两翼，各路中国军队已逐渐压缩而至。二十四日，李觉的第七十军预备第九师攻占南茶罗，开始向大贺茂指挥部所在地毕家发起攻击；第七十军第十九师也已抵近土地王庙，正在攻击泗溪；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的两个师正在快速向南推进。大贺茂已被压缩在了南北五公里、东西十五公里的椭圆形包围圈里。罗卓英致电蒋介石，兴奋之情无法掩饰："本集团诱敌包围计划，赖各部队遵令实施，至昨夜，业已完成……仗我领袖德威，长官指示，将士用命，酣战终日，往复争夺，声震遐迩，杀敌挫锐，卒保阵地无恙……申刻（十五至十七时），敌机三十余架分批向下陂桥以北投掷接济，足证敌路已断。当再严令各军迅速奋勇紧迫围击……判断：包围圈内尚有敌军约四千人，必向东北、西北两方面突围。我正加紧围歼，并作追击准备。"

大贺茂这才意识到，自己不但在孤军作战，且已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四周仅明确番号的中国军队就有九个师之多。后路被截断，弹药给养无法送上来，数百名伤兵不能运下去，而新的伤亡还在增加。看起来，攻占上高并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已没有实现的任何可能。

为避免全军覆没，大贺茂紧急向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援。

园部和一郎获悉第三十四师团的处境后，大为吃惊。参谋长木下勇少将立即带着作战主任参谋山口中佐、参谋大根大尉飞往南昌现场指挥

作战。同时，军司令部命令脱离战场的第三十三师团马上返回战场。樱井省三接到命令后，当即决定以第二一五联队为右翼，第二一四联队为左翼，自己率领师团主力在中央，从牛行、奉新等地迅速按照原路往回奔袭，攻击五桥河、村前街，然后分别向棠浦、官桥急进。同时，第三十四师团也开始向第三十三师团的解救方向突围。

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攻击的是中国军队包围圈左翼的第七十军预备第九师张言传部的阵地。预备第九师官兵拼死作战，力图把强行向北突围的第三十四师团挡住，却发现南下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已经出现在身后。二十四日黄昏，在两面日军的夹击下，预备第九师撤退到土地王庙附近，想与唐伯寅的第十九师取得联系。但此时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正在猛攻第十九师的阵地。鉴于形势对第七十军极为不利，军长李觉又不在前线，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传以副军长的身份，命令两个师向凤凰圩、庄坊撤退。

第七十军的撤退，导致中国军队的包围圈敞开了一个缺口。

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五联队在联队长荒木正二的率领下，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出，与第三十四师团会合于上高与龙团圩之间的官桥。而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奉命返回高安，并派出独立步兵第一〇四大队不顾一切地向西推进，攻占龙团圩，开设收容阵地，以掩护大贺茂的第三十四师团撤退。

罗卓英获悉张言传的两个师脱离战斗后大为恼怒，但冷静下来分析又发现战局依旧对中国军队有利：此时，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在上高东北正面的阻击部队已全线出击，进展顺利；奉命前来增援的王铁汉的第一〇五师、陈良基的新编第十四师和傅翼的新编第十五师均已赶到战场。因此，中国军队有可能对日军实施第二次包围。罗卓英迅速调整部署：预备第九师和第十九师在官桥附近尽力堵截日军突围部队；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经潘家桥向北攻击前进；第五十八师和第七十军第一〇七师以官桥为目标实施正面突击；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在官桥以东攻击日军的侧背；第七十二军新编第十五师向江家洲以南、新编第十四师经棠浦转向东南。各部迅速以官桥为轴心实施向心突击。

二十六日，阴雨连绵，乌云低垂，日军飞机无法投入作战。中国军队各部根据罗卓英的命令，逐渐向第三十四师团压缩而来。第五十七师驱除了东港附近的残敌，推进到泗溪、良口，从左翼压上来；第五十八师收复云山和罗坑后，从右翼压缩上来；新编第十五师在南坑与日军激

战；第一〇七师推进到离楼村西侧高地——尽管得到了冲进包围圈的第三十三师团一个联队的增援，但是大贺茂发现，在官桥附近中国军队对他形成的第二次包围更加严密，南北半径竟然不足五公里。

二十七日，大贺茂选择了中国军队包围圈上最薄弱的方向——因久战而残破的第一〇七师和刚刚抵达战场的新编第十五师所在的离楼阵地实施猛烈突围。大贺茂的选择显示出其战场经验的老到。中国军队第一〇七师和新编第十五师，因阵地交错和协同不力竟然相互间发生了冲突，漆黑的夜色中两支部队正在调整，大贺茂的突然袭击使得这两个中国师仓促应战。混战持续到天亮，日军飞机赶到了战场，在步兵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中，第一〇七师和新编第十五师皆因伤亡过大而撤退。新编第十五师四十五团团长张雅韵和团副宋文华相继阵亡，失去指挥官的部队乱成一团。日军不顾伤亡拼死推进，数百名骑兵直接冲到了江家洲附近新编第十五师的师部，从而引发了新编第十五师更加混乱的溃退。日军趁机突破水口圩，袭击了第一〇七师的左翼。

至此，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又被大贺茂冲开了一个缺口。

可是，大贺茂依旧处于危机之中。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按照部署正在猛烈地向前突击。二十七日拂晓，第五十七师攻占泗溪，第五十八师克复炉下，撤退中的日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七十四军的凶狠攻击。在后退不及之时，日军投掷了大量的毒气弹。尽管官兵中毒者甚多，第七十四军仍没有减弱攻击强度。下午，中国官兵冲进了大贺茂曾作为指挥部的毕家，其前锋距离大贺茂已经不足两公里。这时候，宋英仲的第一〇七师再次后撤，理由是白茅山发现了日军。第一〇七师的这一撤，让中国军队的左翼彻底暴露，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暂停了攻击。——在战斗的最后时刻，合围官桥的计划终成泡影，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夺路向东狂逃。二十七日晚，罗卓英下达了总攻命令。

这已经不是合围了，而是追击。

虽然冲出了重围，但对于大贺茂的第三十四师团来讲，从二十七日夜开始的溃逃依然如同一场噩梦。

二十八日，中国军队全面迫近官桥。第五十八师与日军后卫部队展开了激战。中午时分，李天霞的第五十一师赶到，猛烈侧击日军撤退的

队伍。第五十七师协同第五十八师，把日军后卫部队逼进了官桥镇里，中国官兵冲进去与日军展开巷战，下午官桥镇内的六百余日军全部被歼。

在撤往南昌的公路上，大贺茂第三十四师团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或截击，长达十几公里的溃逃队伍于极度惊恐中仓皇移动。日军战史对这一悲惨情状的记述，仅是其中一个极小的局部：

二十七日，第三十四师团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土地王庙在五日前已成为待命的第九师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六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加戒备下度过了黑暗的一夜。二十八日凌晨二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八中队，终于在土地王庙村庄西端遭到优势的重庆军攻击，致使该中队在处理了火炮后，全体壮烈阵亡。野炮兵大队六角少佐曾将该中队编入自己指挥下，在采取增援措施的同时，向步兵团司令部报告请求派兵，但得到的答复是：“因情况紧急，部队可放弃第八中队，迅速向旅团司令部前进。”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司令部在第二一七联队和工兵部队的护卫下抵达龙团圩。随之抵达的是抬着伤员的队伍，由于伤员的不断增加，这支担架队竟然长达七公里。因为龙团圩被提前占领，第三十四师团得以在这里稍事休整，然后继续向东撤退。

二十九日，薛岳电令罗卓英立即组成两路追击部队，对撤退中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实施穷追猛打：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指挥第二十六、第一〇五、第三师和新编第十五师，为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大城向牛行方向追击；第七十军军长李觉，指挥预备第九师、第十九师和第一〇七师，为左追击军，沿五桥河、奉新大道向安义方向追击。三十日，中国军队各路追击部队对撤退中的日军发起三面攻击，在龙团圩、杨公圩附近歼敌两千。

在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东逃的路上，游击第二纵队突然冲进了高安城，守城日军四处逃散，高安被收复，第三十四师团东逃之路被截断。大贺茂请求飞机支援，同时指挥部队转向斜桥方向继续溃逃。中国军队随即改变追击方向，咬住不放，收复了沿途要点，一直把残破的第三十四师团追到他们的出发地。

大贺茂侥幸逃脱，但想必他会长久地惊魂不定。

奉命返回战场的第三十三师团在撤退中也遭受重大损失。二十八日师团主力渡过泗溪，二十九日刚开始后撤，便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和侧击。在同一条路上来回走了两次的第三十三师团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无法用语言形容”：

不时和顽强地尾随追击的敌人进行激战，展开全部兵力以求摆脱敌人。此间山炮队所有的炮弹用尽，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以后接到了空投弹药，经过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重重苦难，于四月二日返回了原驻地。

薛岳在致电蒋介石的《上高会战战报》中称：此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军一万二千五百零二人，俘敌十四人。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蒋介石给第九战区发出贺电，电文中用了“全国腾欢”的字样：

长沙。薛长官、罗副长官，并转李、王、刘、邓各军长，师长：赣北歼敌，全国腾欢。足慰我党总理与先烈诸将士之灵。我军伤亡之数究竟如何？希将各军师确数详报，以慰悬念，而备补充与抚恤也。并希代向我全体官兵抚慰，期申悃忱。中正手启。

至于中国军队的伤亡，根据罗卓英的报告，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一万三千多人，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三千余人，傅翼的新编第十五师一千二百余人，李觉的第七十军没有统计，仅统计的总计约二万人。

上高一战，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上少有的胜仗。

会战的规模不大，日军参战部队只有两个半师团，中国军队也只有五个军；战场地域也十分狭窄，方圆半径不出一百公里；会战持续的时间也仅有二十天。但是，中国军队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这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进程中十分难得。

首先是日军方面犯了低级错误。惯常的轻敌与狂妄，再加上极度的焦躁，在没有上级指挥部指导、各部队相互不协调作战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一厢情愿地制订了以有限兵力全歼中国军队第十九集团军，特别是中国军队主力第七十四军的作战计划，可谓冲动又鲁莽。第三十三师团的消极作战，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的战斗

力低下以及大贺茂不顾一切地孤军深入，一连串的因素最终导致第三十四师团陷入危急境地。

中国方面，无论是战前侦察、部署以及兵力的战场配置，都显示出指挥的稳健与用兵的合理。战术上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控制主力侧翼待机和最后阶段的向心突击，因为符合战场实际而实战效果明显。特别是罗卓英命令第七十军的“离心撤退”，一反常规地把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引向了预定战场的反方向，这一动作不但很快使大贺茂的合围计划破产，还把第三十三师团彻底带出了战场，令大贺茂的侧翼暴露，孤军突悬于上高城下。第七十军诡异的撤退路线，可谓是中国方面的一着妙棋。更可圈点的是第七十四军的正面防御。该军抗击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凶猛攻击达六天之久，将其牢牢地滞留在了上高城下，为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争取了移动合围的时间。为此，第七十四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对于中国的对日作战而言，将士之鲜血与生命是完成预定作战方案和取得战场胜利的意志力所在。

但是，上高一战依旧暴露出中国军队攻击精神的欠缺和战斗力量的薄弱：“我第七十四军全军迎击于前，第七十军尾击于后，第四十九军侧击于右，第七十二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围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两次被压缩在极为狭窄的地域内，从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连续三天中国军队的合围部队都未能结束战斗。二十七日以后，竟让兵力不大的回援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突入合围圈，接应被大量伤员拖累的第三十四师团突围而出，在随后追击的路途上再也没有形成合围态势。这对于中国军队来讲，不仅是遗憾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体军事素质的问题。

无论如何，上高一战给了日军极大的教训，也带来双方从此作战样式与心态的微妙转变。

此战之后，赣北日军不再有非分之想，防区内的中国军队也没再主动攻击，南昌方面暂时平静下来。

原本四月要调到华北去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在上高一战中不但名誉扫地，损失也不小，为此推迟了调动。

但推迟不等于不走，因为华北急需部队。

当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再次奉命开赴华北的时候，官兵们隐约预感到他们要去参加一场大战，战场也许就在中国北方的连绵群山之中。

那片群山，名叫中条山。

第二十四章

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中条山之战，中国抗战史上最耻辱的一战。

当重庆的军政大员为庆祝上高会战的胜利而推杯换盏之时，蒋介石认为：在军事上，一场小胜不足以证明中国军队素质低劣的现状得到了根本改变；而在政治上，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危机正在日趋加重，因为中国的民众根本不信任国民党，信任危机源自执掌权力的军政大员们的精神堕落。

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了每月例行的“国民月讲会”。军政大员尚未完全落座，蒋介石便突然进入会场。他没说任何开场白，直接把他亲自制订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朗诵了一遍，然后说他很惭愧，因为本党同志的“精神基础”仍未树立起来，所以“要完成抗战建国，实行三民主义，前途还很渺茫”。接着，蒋介石列举了一系列本党的“精神问题”，其核心是前方在流血打仗，后方在醉生梦死：

我们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民众之所以对于我们不生信仰，就是因为我们只有标语口号而没有工作成绩，只有文字的规定而没有实际的行动，这是本党目前最大的缺点。我们再不深自惕励，痛加改革，那我们革命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要知道，《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颁布，已经在历两年以上了，而我们精神上、生活上、行动上还留着许多缺点，反而一般民众老弱妇孺却有誓死不屈、持久耐苦的精神，我们回想以往抗战所得的成绩，应该怎么样负责知耻！今后国家的存亡，革命的成败，完全要看我们全党的精神毅力如何以为断……

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生活者，精神之根本，无合理之生活，即无健全之精神，是以沉溺于声色货利之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加以彻底的改正，而实行新生活之信条。否则不仅个人之精神耗散，自误误国，且必致相习成风，使整个社会顿呈亡国之现象，而招致世界之鄙视与寇仇之深入，不惟有害于国家，尤必影响于军事——现在外面许多人说我们党内同志和政府高级官吏还有悉求享受的，有级情逸乐的，我们今天要切实反省，赤裸裸地检讨出来！

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次于醉生梦死之生活，而为国民精神之蟊贼者，厥为消沉颓废之风气，此风气之存在，实由于心理与生活两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心理方面：由于民族自信心与个人自强心之缺乏，不谓民族无复兴之望，即视民族复兴之事业与己无关，此两种心理若不纠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就无法养成。在生理方面：则运动、卫生、整齐、清洁，乃至早起之习惯，均须提倡与实行……其实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要求，并非陈义过高，做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我们总不去做，当然没有结果！这就是我们没有革命力行的精神，因而丧失了革命领导的资格……

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于抗战中有一不可不注意之精神现象焉：即在前方，民众欠缺誓死复仇之决心，而在后方之人员，多有避难就易之私图也。前一现象，足使敌人之顺民增多，而寇氛愈张；后一现象，足使民族之战士减少，战意薄弱。究其动机，则皆由民族至上观念之不固，苟且偷生之习性犹存……要革除我们一般同志和国民苟且偷生的习性，真是非常困难！这真是我们国家民族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其实除病不难，而难于无决心，只要看我们过去恶习惯中最难革除的莫过于吸鸦片烟，而现在一般有烟瘾的老百姓都可以戒绝……而我们还有许多同志，连一般普通国民应该做到的事情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我们党的耻辱，不仅不能革命，反要成革命之累了！……

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只图保全个人之生命与财产，增长个人之名位与权力，而不顾民族全体之利害与存亡者，亦犹有兵权者之欲保存其实力与地盘，同一私的动机也。充此自私之心理，必至私见高于一切，私利高于一切，乃至于个人名誉地位权力欲望之扩张满足必先于一切，推衍所极，必至牺牲民族利益、破坏抗战计划而后已。当今抗战剧烈，存亡呼吸之际，而犹不自觉悟，岂唯不智，实亦不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下，此种痼习，必须排除，所当发扬舆论之权威，加以尽量之纠正，务使尽祛私见，共输肝胆，而归于至公与至诚……

蒋介石的话音未落，巨大的耻辱接踵而至。

中国山西省的南部地区，位于黄河由南北走向转为东西走向的巨大弯曲处的北岸。此处的黄河成为三省的界河：黄河转弯之前，河西为陕西，河东为山西；黄河转弯之后，河南是河南，河北是山西。三条著名的山脉高耸其间：太行山在东，吕梁山在西，中条山在南。东西走向的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北岸，东西长约一百七十公里，南北宽约五十公里，与太行山、吕梁山形成一个箕形山地，贯穿山西的汾河在此注入黄

河，其下游河谷就是箕形山地的箕底。三省交界处向东控制豫北，向南控制洛阳，向西控制潼关，是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战略支撑点。中国第一战区的二十万大军驻守在中条山一线。

一九四一年五月，华北日军向中条山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突击作战。这次突击作战造成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罕见的巨大损失。日军的战场统计是：中国军队“被俘三万五千名，遗弃尸体四万二千具”。而日军的损失微乎其微：“战死六百七十三名，负伤二千二百九十二名。”日军没有对中国军队的负伤人数进行估算。按照之前作战的常规计，中国军队每战负伤人数要比阵亡人数多出近一倍。无法想象在日军士兵的刺刀下，三万多被俘的中国官兵组成的将是怎样一支冗长的悲惨人流；更无法想象在并不开阔的战场上横陈数万具尸体，会是怎样一种令人惊悚骇然的景象。

中国第一战区的二十万人马伤亡殆尽。

中条山战略要地尽失。

蒋介石所说的“前途渺茫”顿成现实。

中条山扼守着中原的战略中枢，在战场划分上，被列为中国抗战诸战区之首，即第一战区。第一战区部队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在这片至关重要的地区已经驻扎三年。三年来战区内没有发生大战，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域内交叉驻防着卫立煌军、阎锡山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特别是八路军创建的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成为拱卫第一战区的重要前沿屏障。

毫无疑问，中条山是华北日军的心腹之患。但是，日军也知道，只要不断壮大的共产党武装仍在苦战不休，只要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然牢不可破，进攻并占领这一地区仅仅是设想而已。

进入一九四一年，日军终于等来了良机，那就是：国共似乎要彻底分裂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也许会随之瓦解。

除了不断爆发的国共间政治和军事的剧烈摩擦外，让日军作出这一判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九四一年初发生在距此千里之遥的安徽大山里的一个惊人事件。

这一事件，史称“皖南事变”。

一九四〇年七月间，国民党内部妥协和投敌之风盛行，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武装的摩擦日渐频繁。特别是当新四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进驻黄桥地区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先是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来源，后又调集重兵企图趁新四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新四军一再呼吁韩德勤团结抗日，甚至为了避免冲突主动退出姜堰地区。但韩德勤自恃兵多粮多，妄想与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共中央决定后发制人，在黄桥歼灭韩德勤的部队，以彻底解决苏北的问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正面阻击诱敌，两翼设伏夹击，歼灭韩德勤部第三十三师师长以下一万余人，其中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团向新四军缴械投降。黄桥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得以坚持苏北敌后抗战，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得以发展。新四军的凌厉的战斗力，令重庆方面很是不安。蒋介石以避免发生冲突为借口，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共产党方面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区域”问题，并附带着一个命令式的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各部队，限时全部开到河北、察哈尔两省以及河北与山西北部地区，“并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并规定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规定之地区”；除“军事委员会别有军事命令规定外，在其他战区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新四军编为两个师（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等等。

命令在敌后已经形成有利作战局面的抗日部队后撤，放弃艰苦作战和付出巨大牺牲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军事上讲与助敌为虐无异，因为这等于解除了日军在敌后战场上的军事压力。

蒋介石的这一命令连日军都感到意外。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惊讶之余，努力判别蒋介石这一命令的深意：

判断

目前不断发生的国共矛盾，结果共产党方面虽表示让步以至妥协，但重庆方面的要求，也将不能全部付诸实行。新四军一部虽可勉强实行一定程度的移动，但全部移至华北，则可断定决不能实行，矛盾的祸根依然继续存在，甚至有加深的危险。

理由

一、华北方面的共产党势力，从未得到重庆方面大量物资援助，痛感武器、弹药、物资等不足之苦。而今敌方物资普遍贫困，从日军占领地区取得物资愈加困难，加以遭受日军讨伐作战的损失等，穷困处境更趋严重。在此情况下，又使华中方面的新四军移驻华北，其生存将更加困难，尤其可以断定，河南、江苏方面的共产党部队，是负有从上海取得物资供给陕西根据地的。

二、重庆方面的意图是，华中方面的共产军移驻华北后，使之与日军战斗，彼此相互消耗力量，并将华中完全养成自己的势力加以确保，此乃一举三得之计，同时重庆势力又可截断陕西省后方。不难想象，熟知重庆居心的共产党方面决不会轻易听从重庆的命令。

三、尽管如此，共产党在武力方面尚不能与重庆抗衡，而且破坏一致对日抗战，也有悖于共产党本来的使命。更必须看到，历来由重庆支给的军费（七十万至九十万元），乃是共产党方面从日军占领区或第三国取得物资唯一的外汇来源，因此在重庆战局困难的今天，应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

四、从重庆方面来看，共产党势力在华中的存在，以及在当地的互相斗争，不仅妨害抗战的统一，而其所盘踞的河南、江苏各省及长江沿岸，是各种生活资源的重要地区，也是从上海秘密输入物资的重要路线。由于正当物资缺乏之际，该地区被共产党夺取，对重庆是相当痛苦的事情，故其首要目的即须除去此一弊端。

五、然而，对重庆方面来说，共产党的势力虽比较小，但也不可轻视。因为与拥有战斗力、斗争心及工作能力的共产党发生冲突，必将严重影响全面抗战。并且又有需要苏联援助的问题，即使诉诸武力，恐也难以彻底达到要求。

六、……然而，共产党方面在华中的势力全部移驻华北一事，虽如此说但并不执行。重庆为保全面子，始终强烈要求执行，同时在各地经常采取督促、驱逐的方法，因而双方的矛盾，无论在中央在当地，即使在将来也将继续，并且随着抗战及生存困难的增加，可以看出斗争肯定会日益激化。

七、由于国共有本质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有关情况不予详述。

参考情报：

据一个中国要人观察，重庆要求新四军移驻华北，是蒋介石的和平准备工作。

据中国某要人说，在不久将来，蒋介石必然为共产势力失去性命。

“和平准备工作”即指对日妥协谈判。

日本方面的判断，仅仅窥视到了蒋介石命令内涵的局部。

让新四军移驻华北不是蒋介石的根本目的，蒋介石是要寻找借口将新四军彻底消灭。至于怎样寻找借口，那就是，只要共产党方面表示不执行命令，他就可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执行军法的名义，对新四军进行军事制裁。位于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部队曾接到过蒋介石这样的电报：“该地区战斗序列无新编第四军或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如有上项部队或该战区无案之游击队在该战区活动时，即系匪伪潜入冒充，仰自即日起，由该战区长官指定部队，分区剿办，彻底肃清，以遏乱萌，并克日部署实施具报。”

归根结底，蒋介石所进行的是政治设防。

就执政的国民党而言，无论如何不能让共产党武装不断壮大，因为这种壮大的后果几乎可以预见，即直接威胁国民党政权。

一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了那个一直游走于中国战场上的美国记者怀特，他这样表述了自己与日本人、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日本人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削弱敌后的抗日力量会使日军在战争态势上得利，这就如同身上的某一部位长了疥癣，但是顶多溃烂却不会夺命；而共产党武装的不断壮大，等于是致命病毒侵入了内脏。蒋介石这句露骨而又诡异的话令怀特惊讶之余明确认定，蒋介石自欺欺人地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那就是，即使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框架内，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宗旨、严密组织系统以及铁一般纪律的独立政党，而决不是对蒋介石一面俯首帖耳，一面与他玩弄割据游戏的地方军阀集团。

敌占区的社会已经瓦解，纪律松弛的部队忽而充当军阀部队，忽而变成恣意劫掠的土匪。日本人的暴行和各类中国人的激烈反抗，已使战争脱离了一切文明的习尚。唯独共产党人以其理论、思想和政治技巧，

使人们重新结合成抱有共同奋斗目标的集体。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地方集团和军阀集团，虽然他们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激烈，但他们却能把他们的激烈手段同某项意图和战略紧密配合起来。

七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

在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工作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汇报后，毛泽东特别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关注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次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针对目前的政治形势以及国共关系，周恩来主张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采取“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的方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何应钦和白崇禧的要求进行讨论，最终形成的意见是：同意陕甘宁边区名义上改为“陕北行政区”；同意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以及山东黄河以北并人第二战区，但冀察两省省府主席须由共产党方面保荐；要求八路军编为三军九师而不是三军六师，新四军编为三师而不是两师。

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回到重庆，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以及何应钦会晤，周恩来表示共产党方面愿意“稍做让步”，但蒋介石坚持“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到旧黄河以北，游击队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九月，针对调整新四军作战区域问题，周恩来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各地游击队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断然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并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电报，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等等，再次限令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规定之作战境地内”。

此时，蒋介石已调动部队包围了共产党中枢所在地陕甘宁地区，兵力达四十万以上；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从浙赣前线抽调部队，包围位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同时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分别由豫西和鄂东同时向东移动，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进攻。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叶挺和项英，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毛泽东甚至想到："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为出发点。"就目前局势来讲，共产党人需要面对的很可能是"最黑暗的局面"。十一月九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分别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答复重庆军事委员会，除了驳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种种诬蔑之外，婉言拒绝了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集移至黄河以北的要求。但同时表示，新四军位于皖南的部队可以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北移动，只是部队移动需要准备，须宽限时日。

鉴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国民党军已有围攻皖南新四军的迹象，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须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之前全部北移。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

（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

（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承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复电。

叶挺，字希夷。

新四军军长叶挺专门前往江西上饶，与顾祝同当面商谈新四军移动问题。新四军谋求移至皖北，其次是移至苏南，特别要求顾祝同保证新四军在移动中不受国民党军的袭击。就在这时候，共产党方面突然发现，位于豫西的汤恩伯部的九个师正在东进。毛泽东立即致电新四军军部，请叶挺当面质询顾祝同，"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毛泽东嘱咐叶挺，在与顾祝同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叶挺与顾祝同的会商没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顾祝同同意新四军北移经过苏南，但不准驻扎停留；至于汤恩伯部的东进，顾祝同说他不知此情。

叶挺和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一、因为“地方工作之转变，残废伤病之安插，各种资财之处置，特别是大多数士兵均系本乡本地之人，如无相当之教育与政治的巩固工作，无法消灭大批逃亡的严重现象”；二、从皖南进入苏南向北到达长江边，沿途日军据点众多，“特别是溧河至铁路之封锁甚严，小部队通过尚有困难，若无相当时间逐渐分批转移，大军是不能停留该区，又无法一下通过，停留则受敌打击”；三、部队进至苏南后，如果没有安全北移的充分时间，一旦发生战事“我甚不利”，因为日军在溧阳一线已布重兵，进入该地区的皖南部队，将“处于河湖及敌封锁线之狭小包围圈中”；四、皖南部队有很多非战斗人员，随大部队行军“不利作战”，只有“分批先行”，才能使作战部队“便于应付敌顽之进攻”……综上所述，“皖南部队开动需相当时间”，要求中央同意目前“暂留皖南”，同时积极部署北移之事。

一天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语气和措辞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

（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转移，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财势必被打散。”

延安方面之所以一再催促，是因为有关皖南方向的所有情报均显示，十二月底之前各路国民党军将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

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命令：

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距离蒋介石的最后时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两个团，总计九千余人。

国民党方面给新四军北移规定了一条路线：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云岭后，向东偏北方向，沿着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进入江苏南部的竹篑桥、水西地区，然后北渡长江到达苏北。这条路线，要通过第三战区第五十二师的防区。为防止意外，新四军制订了一旦受到攻击就深入日军占领区的策略，因为国民党军是不敢往那里追击的。但是，十二月十日，蒋介石突然命令改变北移路线，要求新四军部队出发后向北偏西，在皖南的铜陵与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这是一条陌生的路线，也是一条危险的路线。新四军军部派出精干的侦察兵，携带电台，从铜陵与繁昌之间渡过长江，潜入江北的无为县一带。侦察兵们在沿江二十多公里的范围内周密地观测了江水水位，选定了十几个渡江地点，并在当地党组织和民众的协助下，筹集到一百多条大小船只并联络了三百多名有经验的船工。但是，他们发现长江江面上日军的巡逻舰艇过往频繁，江边据点里的日军和伪军也有准备出动的迹象。

事实证明，皖南的新四军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陷阱。

在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命令的同时，顾祝同调集了七个师八万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在新四军渡江后的移动路线上对其实施堵截和袭击。二十九日，上官云相确定了围歼新四军的作战部署：以第五十二、第一〇八师为右翼，在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一线展开；以第四十、第一四四师和新编第七师为左翼，在茂林、包村、钱家桥一线展开，构成以云岭为中心的东、南、西三面包围，然后齐头向北推进，把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予以歼灭。同时，第七十九师在太平、第六十二师在三溪镇附近形成防线，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向南撤退；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和第二游击区部队布防郎溪地区，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东进。以上部署限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秘密完成。

尽管新四军的将领们已有相当的戒备，但仍然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蒋介石会下达令中国抗日军队自相残杀的作战命令。

新四军的官兵高唱着一首名为《国共进行曲》的歌曲：

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已站在了一条线上，

他们贡献了全部力量，一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全国精诚团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动员，

两党亲密合作，发挥了抗战杀敌的坚强力量。

看！抗日高于一切，二党是站在一条线上，

他们贡献了全部力量，一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在当时的国内舆论乃至外国记者看来，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十分特别的一支。这支部队几乎全部由知识青年组成，官兵要么来自富庶的江南乡村，要么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沿江城市，其中还有不少归国参加抗战的青年华侨。这支部队的文化程度之高，在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各色军队中绝无仅有。他们每人都有一身军装，包括一顶军帽、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同时他们还有一身卫生衫之类的内衣；起床号响过之后，他们在河边蹲成一排用牙粉刷牙的情景，令中国的百姓们很是好奇；他们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而行军时就是战士的模样了，重约三十多斤的背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一支步枪、一柄刺刀、一条子弹带和一百多颗子弹、四颗手榴弹，当然还有一双筷子、一只搪瓷碗、牙刷、牙粉、毛巾和一本书。他们的脚上穿的大多是布鞋或草鞋，女战士的草鞋上有一朵红色的绒花。他们给中国江南的农村带来了新鲜的生活样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为百姓开办识字班，宣传抗日主张，讲解平等自由，号召民众觉醒；他们在春种秋收时帮助百姓干活，尽管药品十分紧张还是为百姓诊病，那些被治好了病的百姓挑着鱼和肉来谢新四军，若是官兵们不收他们就跪在医院门口不走。新四军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上海的《华美》杂志发表文章，描述了新四军官兵的生活：

……他们现在的人数相当于普通军，中央每月发给他们的经费是十七万，所以他们不得不在生活上力求紧缩，所以他们从上到下都不拿薪饷，只拿津贴。过去战斗员（他们的士兵称战斗员，官长称指挥员）每月拿津贴二元，按次递升，五毛钱一级（这五毛钱的差别，在他们也有解释的，那是因为指挥员有时公出，需要一些零花），到军长拿五元。最近实行节约运动，战斗员每月的津贴减到一元五毛，军长津贴减到四元。除此之外，他们每天每人可以领到一斤八两米和一毛的菜钱。对这样的生活他们甘之若饴，这一种耐于刻苦的精神，是该从他们传统的历史上找解释的……

上海的《大美晚报》刊登了美国记者对新四军医院的描述：

在过去五十年的任何一次战争中，伤兵所受的待遇，再没有比此次抗日战争中中国士兵所受的那样难堪了。中国士兵时常得不到照顾，死在前线上，即使他被人抬了起来，也大半让他独自躺在人家屋子里，没有医药也没有看护。要是他负的不是重伤，他大半要走上几百公里，回到后方的伤兵医院去，即使路上有空车开过，也不会让他搭载。到了医院里，服侍他的人也许要偷他的衣物和钱财，而得到的至多是潦草的治疗……因此，当你看到新四军所设的那些新式整齐而又十分简单的医院时，你就不免大吃一惊，新四军对士兵的救护，大概比中国任何军队都要好……新四军救护事业中最特殊的一点，是所有的医师都是胜任舒快的。其次，他们对各自分内工作也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从病人入院到出院，他们全有详细的记录。每个医生平均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他们每晚轮流值班。这些事情你看来似乎十分普通，但在一个陆军医院里，特别是一个距离前线那样近的医院里，这是十分罕见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日军占领区的残酷环境中，新四军发动的袭击日军据点的作战，有时竟然那样地靠近上海、南京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几乎每场战斗都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惊呼和热议，他们被中国江南的报刊称为“第一等的抗日军队”。

新四军聚集着一群有着崇高信仰的青年。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过一位年仅十七岁但已经参军两年的新四军战士。当问他为什么参加新四军时，这位小战士回答说，在这支军队里他学到了“关于中国的一切”，包括抗日救国、自由民主、国际主义、道德修养和人生目标。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成为一个不怕死的抗日战士的经历，如同这支军队的将领一般，他在讲述中总是严肃地把新四军称为“本军”。史沫特莱认为这位新四军小战士很是神奇：

我对任何人都不爱用“美丽”这个字眼儿，但他却正像一个新日子的黎明那样“美丽”，想到他在两年前本是怎样一个孩子，而五年后（那时中国将解放了）他又将变为怎样一个人，我惊讶起来。这两年来，世界的知识之门已向他打开来，他满怀着兴趣和惊异穿过门进去，不管他在这支部队里多久，那些门将永远向他打开着，而他也将更向前迈进。当我望着他时，忽然转念到他可能在什么时候会倒在一颗鬼子的子弹前而不能再起来了。这念头使我战栗。人生中有些事情在我看来往往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它们却常常存在着。我曾经看见像他一样的别的青年，

受了致命的重伤，却说：“我不怕死，我加入这部队来救我的国家。”

新四军开始移动了。

年轻的官兵不会想到无情的袭击来得突然而短促。

此时，无论是从皖南北渡长江，还是从苏南北渡长江，都已是万分危险了。新四军北移的消息被国民党方面故意宣传出去，皖南铜陵与繁昌之间的日军已在江北据点增兵，而苏南的日军严密封锁了公路和铁路。特别是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的三个师，进驻庐江和无为一线，控制了铜陵与繁昌之间的长江北岸，挡在了新四军的北移之路上。

大雨滂沱，山路泥泞。

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编成三个纵队，由驻地云岭一带艰难地向东南方向行进，准备经过茂林、三溪、宁国和郎溪，沿着天目山麓进至苏南根据地，在那里待机北渡长江。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拂晓时分，走到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突然遭遇国民党军第四十师的拦截。军部立即停下来开会，讨论还手还是不还手、前进还是后撤的问题。会议从下午三时一直开到晚上十时，还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长达七个小时的会议严重地耽误了时间，丧失了突围而出的最后时机。八日，部队改向前进，再次遭遇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的拦截。于是，改向茂林方向突围。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四师、第四十师、第七十九师、第一〇八师共五个师已完成了对新四军的合围。军长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天，部队移至茂林以东五公里的石井坑。在整顿队伍的时候，国民党军合围部队又从四面发起猛攻，新四军官兵陷于苦战。

十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

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若无转机，则将全军覆没……

身在重庆的周恩来获悉新四军陷入国民党军的重围后，受中共中央委托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提出严重抗议。周恩来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立即撤围”，给北渡长江的新四军让路，说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将导致全军覆没的灾难性后果。蒋介石答复

说将下令查处攻击新四军的将领，但同时又命令顾祝同把新四军一网打尽。

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人联名发布抗议通电。通电的抬头从蒋介石一直开列到全国各地的国民政府党政军首脑：

……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至泾县以南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六日）至文（十二日），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守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德等远在华北，未悉命令移防底蕴，迄今始知聚歼计划。今不问对敌行动如何，但对我则是聚歼，何、白两总长皓（十九日）电、齐（八日）电所称之仁义道德何在？所谓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者究属何人？所谓军政军令军纪者究在何处？似此滔天罪行，断不能不问责任。同时全国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在西北则修筑万里长城之封锁线，在华中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实行大举进攻，国内局面顿改常态。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即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十四日，经过八昼夜的抵抗，新四军皖南部队弹尽粮绝，固守阵地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前去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押，部队除突围而出的两千余人外，七千余人少量被俘大部阵亡。

近万名新四军官兵，没有牺牲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却死在了国民党军的联合夹击下。那些昨天还充盈着青春热血的身躯，如今冰冷地横陈在皖南被阴雨浸透的山峦中。

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变”之军，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时，命令李仙洲的二十万大军向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发动全面进攻。

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言皖南事变“是抗

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重大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决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日，这一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号召新四军全体官兵继续高举团结旗帜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认错；承认事变的祸首是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的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的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部队；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爱国的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逮捕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盐城重新设立。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的舆论乃至海外华侨的谴责铺天盖地。原因很简单：这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国难时期！谴责给国民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恶果：“政府那条绕在自己脖子上的自我毁灭的绳索从另一端拉紧了。”驻重庆的美国记者贝克说：“新四军事件的最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在许多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的人群中造成了不安和不满。政府不久就不得不再次加强‘思想控制’了。有些非共产党人士被捕，有的逃往香港或共产党统治区去了。”

共产党方面的强硬和社会舆论的愤怒，令蒋介石不得不在公开讲话中反复解释，强调事件仅仅涉及军令军纪问题，而决不涉及党派和政治。他甚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只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了。

皖南事变后，被俘的新四军官兵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一九四二年，日军逼近上饶，集中营转移途中，新四军官兵发动暴动，除少数人越狱而出外，多数被国民党军屠杀在江西北部的山涧里。

叶挺军长拒绝蒋介石的万般利诱，作《囚歌》以明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期所犯的带有“自我毁灭”和助纣为虐”性质的政治错误之一。

国民党当局将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关于这个代价，毛泽东说得十分明确：

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仅就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进程而言，皖南事变的发生是一个绝大的民族悲剧，事件导致中国的抗战几乎失去了华中敌后战场的支撑，中国南方的敌后战场自此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鉴于国共之间的剧烈冲突，日军在其占领区和战场拉锯区内开始了极为凶狠的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华北占领区，其作战对象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慑于八路军的强大威力，日军确定了以剿灭共产党武装为核心的策略。但是，就华北地区而言，以中条山为轴心的中国第一战区毕竟还驻扎着卫立煌的二十万人马。日军认为："由于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因此必须"首先将其消灭"，这样日军才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由此可见，中条山作战是日军对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全面作战的前期准备；也由此可见，日军根本没把中国第一战区的二十万国民党正规军放在眼里，认为很快就能将他们一举歼灭干净，为之后的真正作战——与八路军的决战——腾出兵力与战场空间。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对中条山作战目的的阐述是：

利用这次增兵之机，本军对晋南地区的中央军，努力以大兵力作战，除图谋一扫黄河以北的中央军势力外，主要是为了好集中力量对共产军根据地进行毁灭战。

中国第一战区卫立煌部共有十一个军。其中四个军配置在太行山和太岳山地区，与八路军的太行和太岳两个抗日根据地呈对峙状。其余的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配置在中条山地区。中条山西侧守备：孔令恂的第八十军，辖新编第二十七师、第一六五师和游击第四、第八纵队以及河北民军。垣曲、桑池以西的中条山西部守备：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指挥唐淮源的第三军，辖第七、第十二师和第三十四师；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辖第八十四师、新编第二师和游击第一纵队。中条山北侧守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指挥武庭麟的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武士敏的第九十八军，辖第四十二、第一六九师；刘戡的第九十三军，辖第十、第一六六师和新编第八师；赵世铃的第四十三军，辖第七十师和暂编第四十七师。中条山东侧守备：裴昌会的第九军，辖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以及新编第二十四师。

而日军位于中条山周围的部队是：晋城附近的第三十六师团，运城附近的第三十七师团，临汾附近的第四十一师团以及豫北的第三十五师团。确定实施中条山作战后，为加强这个方向的兵力，日军从华中方面军的第十一军抽调出第三十三师团，配属给华北方面军的第一军；还将位于上海方向的第十三军的第十七师团与位于苏北方向的第二十一师团

换防，把第二十一师团抽出投入中条山战场。同时，日军第一军还从本辖区内抽调了独立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以及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参战，这就使得进攻中条山的总兵力达到十万以上。东京大本营又从关东军调来飞行第三十二、第八十三战队，加强给第三飞行团，以运城和新乡两个机场为基地，协同陆军作战。

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筱塚义男决心以“不顾”华北占领区“治安状况下降”为代价，集中兵力将中条山一线的中国军队一网打尽：

一、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为此，决定从四十二个大队中集结三十五个大队，俾能保持优势兵力（敌九个师五万人。敌我战斗力对比大致为一比零点七），把敌人完全包围起来予以歼灭。

二、为此，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

三、为了确保包围圈，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外侧包围兵团为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内侧包围兵团为第三十六师团与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作战过程中还要调整退路切断线（包围线），防止敌人逃脱，并且特别要增强外侧包围兵团的兵力。

四、要特别重视切断作战，防止敌人向黄河南岸逃走。为此要部署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走在敌人退却和逃脱的前面，占领黄河北岸的主要地点，截断敌人退路。为此要采取一切措施，隐蔽企图，在黄昏以后开始行动，快速袭击敌人。

五、为使作战准备周到、完善，各兵团长及幕僚们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的口号下，共同对作战指导进行彻底的研究。另外，各兵团在进行地图、兵棋和现地研究的同时，要进行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战况的部队训练。

日军向晋南调动兵力的幅度很大，中国方面很快便察觉日军有攻击第一战区的企图。为此，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订出三个方案：一是主力向黄河南岸撤退，巩固河防，这是放弃中条山而退守黄河的方案；二是趁敌人尚未部署完毕，先发制人，用攻势作战粉碎日军的战役企图，这是主动进攻的方案；三是采取机动战术，变内线为外线作战，即放日军

进来在中条山里与之周旋的方案。

四月十八日，参谋总长何应钦从重庆抵达洛阳，召集第一、第二、第五战区高级军官会议，研究晋南作战问题。何应钦认为，日军进攻中条山是为了夺取洛阳并西窥西安：“在北战场方面，第一、第五战区甚为重要，如第五战区方面巩固，则不独洛阳免受威胁，而第六战区亦得巩固。在第一、第二战区方面，中条山地位异常重要，如现三角地带一部为敌占领，则陇海路不独深感威胁，且洛阳恐亦难保，西安亦危。设洛阳西安不守，则第五战区侧背完全受敌威胁。”目前，“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会议持续至二十日，最后由何应钦拍板决定，采取军令部提供.的第二方案，即以主动的攻势作战粉碎日军进攻中条山的战役企图：

（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九十三军），由东向西（二十七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前之态势。

（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

（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

何应钦的作战指示近乎异想天开：在日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绝少有发动主动攻势以提前瓦解对手进攻意图的行为，中国军队尚不具备这样的作战能力。在日军已集结起如此大的兵力，进攻作战意图已非常明确时，何应钦竟然幻想向日军出击合围并一举收复失地——“恢复二十九年四月前之态势”，这到底是重庆的军事统帅机关对敌情掌握不清呢，还是本来就昏庸？

五月三日，第一战区作战计划制订完毕：中条山东面，第二十七军在豫北向新乡、博爱之间的铁路沿线游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豫北与晋南交界地带向安阳、淇县和壶关一带游击；第九军的游击第一纵队在豫西北向温县以东游击。中条山西面，第十四集团军在晋东南向高平、沁水和翼城方向游击；第八十军和河北民军在晋南向同蒲路、安邑和闻喜方向游击；第三十六集团军向中条山西段游击。——如此四处游击，哪里是以攻势作战破敌围歼的计划？

但是，即便这样一个简陋的作战计划，也没能得到实施。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四川，等他五日返回洛阳司令长官部后才将上述命令发出。而所属部队接到命令尚未动作，日军的攻击已经开始了。

第一战区部队自一九三八年春进入中条山以来，除了与共产党抗日武装发生过摩擦之外，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没有打过大仗。官兵日子过得懒散，军事训练懈怠，阵地疏于戒备，工事修筑拖沓，部队原定一年内完成的整训拖了两年半仍未完成。

由此，中条山的苦难降临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日军航空兵首先轰炸了西安、咸阳、潼关和郑州等地，并炸断了陇海铁路。七日晚，日军六个师团外加两个半混成旅团，采取“中间穿透、四面合围”的战术，向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其作战部署是：在中条山西部地区，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分别从翼城、绛县并列南下，直插中条山的核心地区垣曲，割断中国军队第五集团军与东面的第十四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并对第五集团军实施双重包围；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分别从闻喜、运城并列向东向北，与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会合，合围中国军队第五集团军和第八十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在运城以南，从平陆沿黄河北岸快速东进至济源，与东路的第三十五、第二十一师团会合，切断中国军队第五、第十四集团军以及第八十军向黄河南岸的退路。在中条山东部地区，日军第三十五、第二十一师团分别从豫西北的温县、沁阳并列西进，攻占邵源后与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会合，切断中条山地区中国守军向南或向东的退路，然后沿济源至邵源的公路向北压缩，攻击中国军队第十四集团军。在中条山北部地区，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从沁河岸边的阳城南下，协同第三十五、第二十一师团，对中国军队第十四集团军实施南北夹击。

显然，中条山西部是日军攻击的重点方向。

这个方向上的中国守军，是第八十军以及第五集团军的第三军和第十七军，而日军投入了第四十一、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无论在兵力还是武器装备上，日军都处于绝对优势。日军首先实施的是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穿透行动，他们要从中国军队第五集团军与第十四集团军的中间插过去，先把这两个集团军割裂开来再实施各个包围。日军事先侦知，中国军队第四十三军为阎锡山的晋军部队，战斗力较弱，于是选择了第四十三军所在部位

发动了猛烈突击，而这里恰恰是第五集团军与第十四集团军的接合部。七日傍晚，第四十三军的两个师和第十七军的两个师据守木耳河、天盘山阵地，中国官兵与日军彻夜作战，八日拂晓日军突破了第四十三军的十八坪阵地。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命令第十五军协同第四十三军对日军实施反击。十八坪阵地一度被中国官兵夺回，但日军在攻击中释放毒气，第四十三军不得不撤退，第十七军阵地也随之被日军突破。日军地面部队迅速向垣曲推进，日军伞兵已抢先投放到垣曲周边。八日晚，日军步兵和伞兵协同攻占了中条山的核心部位垣曲。中条山西部中国守军被日军分割成了互不联系、各自为战的两部分。与此同时，沿着黄河北岸，日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在晋东南的夏县至张店间展开，并列向西，攻击中国守军第八十军与第三军的接合部。八日拂晓，日军突破第八十军的右翼阵地，切断了第八十军与第三军之间的联系，然后沿着黄河北岸迅速向东突击，迫使中国军队退守秦家岭、望原等二线阵地。

至此，中条山西部中国守军的防线全面瓦解。

日军攻占垣曲后，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以垣曲为核心，分头向东西两面扩展。向东的一路攻占了晋南与豫西交界处的邵源，向西的一部逼近中国军队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马村，总司令部匆忙转移到漳南沟。在漳南沟，曾万钟接到卫立煌的电报。电报命令第五集团军南渡黄河撤出战场，并说已派黄河南岸的第八十五师的两个团北渡黄河，占领黄河渡口五福涧以北高地，并提前在河边征集船只，以掩护第五集团军撤退。但是，第八十五师的两个团还没抵达五福涧，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先头部队提前抵达，经过激战，中国军队的两个团退回到黄河南岸，第五集团军的南撤之路由此被封堵，部队完全陷于日军的包围中，只能独自拼死苦战力图解脱。

中条山北部中国守军，是第十四集团军所属的第十五军、第九十八军、第四十三军以及第九十三军第十师。七日晚，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一部，从晋南南岭至阳城一线，向第十四集团军正面阵地发动攻击，八日拂晓突破第四十三军的阵地后，继续向南突进到煤坪。在这里，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军的顽强抵抗。中条山战场上的第九十八军由西北军杨虎城部所属陕军一部编成，军长武士敏。武军长跟随冯玉祥多年，受杨虎城、张学良影响很深，主张全民抗日，与共产党人关系融洽，曾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在中条山北面，他指挥官兵顽强作战，仅在王村一处就击溃日军两千多人，毙伤数百人，缴获重机枪十二挺、步枪两百支。第九十八军一直抵抗到十三日，日军得到增援后突

破其守卫的董村阵地。第一战区命令第九十八军向西北方向的沁水至翼城公路以北转移，武军长率领部队开始了艰难的突围。

在中条山东部地区实施进攻的，是日军第三十五、第二十一师团以及骑兵第四旅团一部。中国守军是裴昌会的第九军。七日，在飞机和坦克的助战下，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从豫西的沁阳和博爱出发，第三十五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从沁阳以南的温县出发，并列沿着黄河南岸向西突击。中国军队第九军是由浙军和奉军合编而成的部队，曾在忻口会战中与日军苦战，军长郝梦龄不幸殉国。现任军长裴昌会指挥部队拼死抵挡日军的进攻，其据守沁阳至济源公路的第五十四师七十二团官兵毙伤日军二百多人。八日，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在航空兵的助战下再次猛烈突击，终于突破了第五十四师的阵地，攻占孟县。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继续西进，与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合击济源，企图把中国军队第九军包围在济源以东地区。第九军撤出济源既设阵地后，济源城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陷落。军长裴昌会命令第五十四、第四十七师退往济源以西的王屋方向，新编第二十四师主力和第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固守封门口阵地，独立第四旅和该军指挥的几支游击队在孤山一带打游击。九日，日军兵分三路追来，新编第二十四师和第五十四师一部在封门口一线与日军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日军在进攻中施放了大量毒气，第五十四师一一六团官兵大多中毒。午夜，裴军长接到卫立煌的电话，鉴于日军已突入黄河北岸各渡口，河防空虚，命令第九军撤到黄河南岸建立防线，掩护第十四集团军的后方。第九军各师立即向黄河北岸的官阳渡口转移，军直属部队和第五十四师在日军的轰炸中冒险渡河，午夜时分才渡河完毕，而后续部队就不那么幸运了。十一日，日军的持续轰炸导致黄河渡口的渡河设施和船只全被炸毁，第四十七师和新编第二十四师已无法渡河，不得不退回到王屋至邵源的公路附近。徘徊中，他们试图与第十四集团军取得联系，但第十四集团军正处在日军的南北夹击下。第九军未能渡河的部队只能跑向济源北面的大山里。

至此，日军控制了中条山地区沿黄河北岸的平陆、垣曲、济源、孟县等县城，封锁了黄河北岸中国守军退往黄河以南的所有渡口，彻底完成了对中条山中国军队内外侧的双重包围。

十一日，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给蒋介石打电报，说他不能再坚持原地作战了，原因是部队饿坏了，必须突出去找饭吃了：

连日以来，晋南之敌大举向我进犯，职部所属四十三军防地被敌突破，刻十五军及四十三军在同善镇以东拒止敌人，第十师及九十八军仍

在阳城西南及董封附近与敌激战，九十三军本夜由北向沁水一带攻击。惟垣曲渡口既已不保，第九军在封门口阵地，亦被敌突破狂口，补给线已被截断。潦山内瘠苦，又无屯粮，大军绝食业已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拟率军主力向沁（沁水）、翼（翼城）以北展开，并于阳城以南酌余一部，以期就食，而便截击。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在第九十三军第十师的掩护下，在中条山里辗转半个月才得以分散突围而出，部队损失惨重，七零八落的幸存官兵有的向南偷渡黄河，有的向北进入山区。第九十三军主力在日军战机的跟踪轰炸下疲于奔命，十八日抵达太岳山区，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山西新军的帮助下，经过沁源，越过同蒲路，由临汾渡汾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直接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指挥了。豫北的第二十七军在军长范汉杰的率领下，曾试图策应第十四集团军突围，但遭到日军的阻截后，索性全部撤出了晋南地区，向东转入太行山东麓的河南辉县一带。第四十三军军长赵世铃带着他的基本部队经沁水和翼城躲进浮山，其他部队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转来转去，大部队溃散后，少数官兵渡过汾河向西溃逃，后勤人员以及随军家眷在黄河滩上被日军俘虏。

中条山西侧的第八十军终于撤到了黄河边，因为争抢渡河导致溃不成军：

敌人的飞机数架向我部队狂炸，混进我军之敌伪便衣队，穿着新编第二十七师士兵服装，在各部队之间进行扰乱射击，河北民军到处乱窜。一时间敌我阵营无法分辨，所有部队都各自跑散。配属我师之炮兵连，因目标暴露，受敌轰炸较重，该连王连长负伤。我二营营长姚汝崇奋不顾身，率兵抢运火炮，与敌便衣队激战，不幸身负重伤，因无人抢救而殒命。傍晚，跑散的各部队陆续集中在南沟附近（南沟与河南岸白浪渡口遥相对峙）。当时，新编第二十七师、河北民军之溃兵，仍与各部队混杂在一起，少数人造谣生事，扰乱军心。军长孔令恂目睹此情，束手无策，竟率军直属部队争抢船只渡河逃跑，并令第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跟随渡河。此时，师直属部队尚未跑回，王师长乃令四九四团三营营长赵承志率该营护送他们抢渡黄河。河面上拥挤不堪，新编第二十七师与河北民军散兵千余人，争抢船只，鸣枪怒吼之声震撼人耳。亦有抢夺不到船只而寻找木板、木头漂浮过河者，淹死的不下百余人。

第二十七师担负着掩护主力渡河的任务，多数官兵坚守阵地，奋力作战，激战中师长王峻、副师长梁希贤和参谋长陈文杞相继阵亡。——

师长王峻，陕西蒲城人，时年三十九岁，曾任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跟随杨虎城参加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副师长梁希贤，陕西铜川人，时年四十三岁，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由于在军中表现优异，从排长逐级升任至现职。参谋长陈文杞，福建莆田人，时年三十七岁，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战前已接到赴陆军大学深造的通知。

第五集团军的损失最为惨重。部队被包围后，第十七军以团为单位分散向西突围。军长髙桂滋与大部队分离，带着少数官兵在日军的包围圈里转了二十多天，其间参谋长金醒吾和副官长王秀泉被俘，高军长本人几次遇险并企图自杀，最终侥幸逃了出来。而第十七军官兵都已跑散，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四处乱突，最终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山的只有四个团，那些没有冲出来的官兵散落在中条山里不知所终。向西北方向突围的第三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军从五福涧南渡黄河无望后，军长唐淮源率部开始突围。但是，直到十一日，仍旧无法冲出日军的包围圈。此时，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以及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都已不知去向。十三日，天降大雨，日军的攻击没有丝毫减弱，中国军队第七、第十二和第三十四师凭借山地抵抗，伤亡惨重，山谷里的溪流被官兵们的血染成了红色的泥浆水。十四日，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中国官兵浸在大雨中已数天没有吃饭和休息。唐军长召集第七师师长李世龙、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和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在山谷中的一座庙里开会，决定把伤员藏在山洞里，部队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向外突围。

军长唐淮源率领一个团奋力突围未成，被日军包围在一座小山上。不愿做俘虏的他在日军逼近时举枪自戕于山顶。——唐淮源，云南江川县人，家境贫寒，自幼丧父，母亲在乡绅家做佣人供他读书。他苦读私塾，辛亥革命前入同盟会，继而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加入滇军后，参加推翻清王朝的云南起义，护国战争时是蔡锷手下的一名营长。抗战爆发，他率部北上，在太原会战中与日军苦战于娘子关。其后他的部队驻守中条山三年。此战前，他曾对各位师长表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自己将为国家和民族保全人格。

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带领三十六团突围，但该团很快陷入日军的追击。大雨倾盆，山路难行，部队伤亡严重。寸师长的右肩中弹，官兵们用滑竿抬着他继续奔逃。十三日，三十六团又被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二二七联队包围，双方在泥泞中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日军联队长上田胜大佐被打死，而寸师长再次负伤——他的右腿被炮弹炸断。由于伤势严重，为免被俘受辱，在一个名叫毛家沟的山坳里，寸师长用平时佩带的短剑自戕，时年四十六岁。——寸性奇也是云南人，曾参加护国战争和

护法运动，深受孙中山器重，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少将参军和中央直辖宪兵司令。

在第三军的指挥序列中，第三十四师的身份有点特殊。这支部队不是滇军出身，而是由陕军改编而成的，一九三八年隶属第五战区第三十九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条山作战前，该师突然接到命令被划归第一战区指挥。这一调动，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都感到奇怪。后来才得知，蒋介石把第三十四师的番号给了川军，新成立了一个新编第十二军（下辖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七师），目的是以给番号及升官为诱饵调动川军出川抗战。中条山里这支不明不白的部队开始突围了。师长公秉藩带领部队跑入一个小镇时陷入日军的围攻，战斗中部队全被打散，军长公秉藩、副师长王自强、参谋长唐汝昌、政治部主任欧阳瑛等各自逃命，最终公军长本人被日军俘虏。有史料称“公秉藩率两万余人投敌”。其实，公秉藩身边根本没有两万人，只有他的两名卫兵刘荫学和赵学仁。无论怎样，战前公军长就已满腹牢骚，认为他的部队被无端地调来调去，调到哪里都低人一头。部队始终缺员严重，上边虽然补充了一点，但远赶不上逃亡的数量。士兵大量逃亡的原因有三：一是兵役人员贪污腐败，买卖壮丁成为公开的生意，洛阳附近一名壮丁可以卖一千斤棉花或三十石小麦。壮丁来了就跑，跑了又被买回来，第三十四师中就有反复逃跑以至被买卖十次以上的壮丁。二是这一带乡镇的保甲都有民间武装，士兵一旦逃走，就被保甲们收容保护起来，部队根本不敢去寻问。三是中条山里的生活太苦，只要一听说进中条山，士兵们都争相逃跑。

苦到什么程度？公军长的描绘是：

第五集团军前线部队距黄河渡口白浪渡一百二十里，第一战区后方勤务部在这里设立粮食供应站，让前线士兵从这里背粮，遇着好天气披星戴月往返需要两天多，遇着刮风或雨雪天，就要三四天才背一回。士兵要自己推磨，把原粮变成面粉，还需上山打柴，才能有燃料。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士兵营养不够，劳动繁重，疲惫不堪。中条山气候寒冷，士兵在高山放哨，冻手裂足，只有一套棉衣，日夜不脱，夜间睡草铺，遍身生虱，虱子传染病，名曰回归热，或曰阵地热。师医院在前线设立灭虱站，用蒸笼把士兵的棉衣脱下蒸一次，不久虱又重生。疾疫流行，重病号送至师医院，缺少医药病床，医院附近尽成坟墓。士兵把中条山视为活地狱，强壮者争先逃命，乘夜间放哨之际，放下武器，逃至黄河边，乘当地人的牛羊皮筏渡河。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也有之。

这样的军队，纵然号称二十万之众，又能如何？

日军进攻中条山时，八路军向晋南战场伸出了援手。

日军发动进攻的当天，即五月七日，八路军攻入白晋路（白圭至晋城）上的牛寺，捣毁日军的地堡，破坏了铁路。九日，又连续攻克同蒲路上十几个日军的据点。十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对同蒲路以南、白晋路长治以南、平汉路石家庄以南的各条铁路进行了破袭。十三日，又伏击了日军运输队，突袭并烧毁了日军位于阳曲的仓库。太行山根据地内的八路军，由于受到第一战区与其对峙的国民党军四个军的阻挡，不能向西进入中条山，于是他们向东而出，破坏了邢台附近的铁路，令日军的后方交通中断了三天。毛泽东特别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告知因为晋南战事危急，国民党方面“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因此，八路军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是“周密考虑情况”前提下的“有计划的配合”。两天后，彭德怀致电八路军所有部队将领：“为提高与坚定国民党作战决心，兴奋民众，扩大我之政治影响，除由一二九师及决死一纵队各以一部兵力在安阳以南之平汉路、洪桐南北之同蒲路先行破击外，我华北各兵团（除山东部队外）应立即准备于最近期内作较大规模之行动，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的具体部署是：第一二〇师贺龙部在平遥以北，破袭同蒲铁路和汾离（汾阳至离石）公路；平北军分区萧克部破袭平绥路；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破击正太路、石德路、沧石路以及石家庄以北之平汉路；晋冀豫军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部继续破袭平汉线和邯郸线。重庆中央社对八路军的作战进行了连续报道：“第十八集团军在同蒲路北段崞县与原平间，破坏铁路数段，并向忻县以北日军据点攻击，共毙伤敌二百余，其他在白晋、平汉、平绥路沿线，纷纷破坏敌之交通，敌甚恐慌。”

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后，仍在中条山里反复搜索和扫荡，继续围歼第一战区失落的零散官兵。直到六月十五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

关于中条山作战的失败，第一战区列举了一系列原因：战场条件恶劣，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背靠黄河，战场调动艰难，作战补给困难，阵地没有防御纵深，“徒具有阵地之躯壳，并无阵地战之条件”；日军的兵力过于强大，还有航空兵和伞兵的配合，武器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不要说数百架战机，仅就火炮而言，日军拥有七十五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多达五百门，而同样口径的火炮中国军队每师只有一门。中国军队普遍缺少真正能投入作战的士兵。由于中条山缺乏粮食，所有给养都要靠

士兵自己运输，“运粮、磨面、挑水、打柴各种勤务，实占全连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更有突击队、搜索队、侦察队、便衣混城队等特种勤务，复占去若干兵额。加以新兵、病兵，所余战斗兵不及编制数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官兵普遍骄怠，每每都说“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恃而无恐”；而当战事真正来临时又士气低落，不仅因为士兵待遇很差，还由于各部队之间待遇相差很大，“饷糈显有丰窘，待遇间不平均，相形见绌，啧有烦言”。

对于中国军队的状况，外国记者有现地报道，所描绘之情景令人难以置信：

最前面的是骑马的指挥官，身披带彩穗的值星带，腰悬带装饰品的指挥刀，其次是他的高级部下。他们步行或骑马，装备由勤务兵背着。然后，在由下一批下级军官和可靠士兵组成的武装卫队当中，夹着一长列被劫持来的农民，那是用来扛战地用的大锅和其他重装备的民夫。入了伍的士兵走在民夫后面，有时用齐步，有时则疲疲沓沓地移动着，就像一群乌合之众……不难看出，这些士兵是想逃的，其中也偶尔夹杂着少数虽然消瘦，但穿着整齐的，吹嘘说他们从军阀混战时就南征北战了……但大多数人面露愁苦之色，通常都是四肢消瘦，手脚腕子由于营养不良而纤细异常，眼神显得满怀心事或亮得像发烧。发肿的双脚上裹着血迹斑斑的破布。在武装卫兵之后，跟着一批病、弱或面临死亡的士兵，呻吟着移动，对他们，用不着看守了，除非他们能跟上队伍，他们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的情况越糟，就越不想逃走，因为逃回遥远家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当然也无法另找别人照料他们。国民政府故意把拉来的壮丁都编入远离家乡的军队，致使他们无法逃跑回家……

蒋介石认为，中条山惨败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

中条山作战的结果，暴露出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作战能力严重低下，而当地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员在日军刚开始进攻时就丢下百姓跑了，他们的惊慌失措和仓皇逃亡也是导致“最大之耻辱”的重要原因：

国民政府官员的撤退在老百姓撤退的好几天前就开始了，他们在当前这场混乱中是带头的。几乎所有的汽车和半数以上的大车，都装着文武官员的家眷和家具以及省府文武衙门的公文。政府看来也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气氛的主要制造者。他们的大车是征雇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不给钱的。……他们有权有势，可以命人运任何东西。一切家庭用具，从帽架、吊床到油瓶，什么都有，有的甚至是些坏家具、零星木

板、碎草垫子之类的东西，简直如从地窖里搜罗出来的破烂集市……在这种状态中，带头无所不为的正是政府官员，连警察也和政府官员一样，匆忙逃走了……没有人试图告诉老百姓，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危险，其基本情况如何。也没人告诉他们，到什么时候撤退，往哪儿撤退，如何撤退……过了几个星期，人们一回忆起在敌人对中条山进攻前的这场撤退，就觉得异常愤慨，好像国民党政府的仓皇逃跑对造成这次洛阳大混乱的作用仅次于日本人……

战后的史料显示，在中条山作战中被俘虏的中国军队官兵，大部分被押送到了南洋、“满洲国”或日本本土做苦工。他们绝大多数都悲惨地死于非人的劳动强度和日本监工的虐待。但是，这仅仅是中条山苦难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在中条山战场上的溃败，使得这一地区的普通百姓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为防止中国军队再次于中条山立脚，日军对中条山一带的中国百姓采取了彻底的“三光”政策，实施了极为野蛮和残忍的屠杀、抢掠和强奸。特别是沿着黄河北岸的平陆、夏县、垣曲、济源等地，日军所到之处，县城与村庄皆成一片废墟，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皆遭屠杀。在疯狂的烧杀劫掠中，日军以屠杀中国平民取乐，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中条山里的百姓为躲避日军的蹂躏，往往整整一个村镇全部逃亡，除了逃到邻近的省市之外，甚至还有辗转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的。难民们因衣食无着而冻死、饿死和病死者遍布田野山路。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平民被杀害，多少中国妇女被蹂躏，多少人成为异乡的孤魂野鬼，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依旧有人在试图追查统计，但仍是无法取得准确数字。

……通往上凹岭路旁的赵家凹是第三个杀人场。日军把我同胞捆在一起，拉到崖根，从崖上撬土先后活埋七十余人。本村七十四的张振华说，他小时候在这里看见日本兵杀死三个人，先挖好坑，再命令这三个人喝水（据说，人喝了水，刺刀好戳）。这三个人中，两个较矮，一个大个子，日本兵把两个小个子连续背起摔倒，折磨半死再用刺刀戳死，对这个大个子的人摔不倒，就用刺刀戳，那个日本兵戳进去的刺刀拔不出来了，另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夺过带刺刀的枪，用脚蹬住被刺者的肚子，再抓住刺刀扭了几下拔出来，然后连戳数下，把三个人一起推进坑里埋掉……

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的惨败，华北抗日根据地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撑。日军在完成中条山作战后，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击共产党武装

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了。——“对于方面军来说，发动中条山会战歼灭了重庆军，使过去被牵制在该方面的日本军获得了行动自由，以后可以举全力对共军作战了。”只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突然发现，情形并非如他们预想，把中条山一带的蒋介石的军队赶走了，日军在华北丧失了牵制共产党武装的另一股力量。由于共产党武装极强的渗透与扩展能力，对于日军来讲，整个华北地区的局势“反而恶化了”：“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他们与共产军系统相比，其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产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于是，日伪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其残暴到了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程度。

在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个名叫潘家峪的村庄，村民坚决不肯领“良民证”。自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一年初，日军对这个不屈服的小村庄进行了一百三十八次围攻，却始终没能让这个村庄低头。一九四一年一月，驻扎唐山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在联队长佐佐木的指挥下准备再度突袭潘家峪。潘家峪的中共党支部得到情报后，把全村的老弱妇孺转移进深山里。眼看着春节要到了，想回家过年的乡亲们纷纷返回村庄。二十五日凌晨——这一天是腊月二十八，三千多日军和两千多伪军突然包围了潘家峪。乡亲们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被赶出家门，老弱病残不能走动的全部被当场杀死。村民潘凤柱的老母亲被日军用木棒击碎头颅，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军砍成了两段，潘忠元八十多岁的双目失明的祖父和潘树弟九十多岁的祖母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死。全村一千多村民被驱赶到村西的一个大坑里，坑里满是积雪，凌晨的气温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佐佐木逼问乡亲们，八路军和八路军伤员在哪儿，没有人回答。沉默持续了数小时之久，妇女和婴儿被冻僵，但依旧无人回答。在这数小时内，日军彻底洗劫了每一户人家，把年轻的姑娘和媳妇集中在一起肆意奸污。中午，佐佐木下令将所有被押村民赶进一个院落，然后开始了集体屠杀。在一片惨绝人寰的呼喊声中，乡亲们用木棒、石头和牙齿拼死搏斗，迎着机枪子弹和刺刀向日军冲过去。由于院落狭窄，不少人虽然已经死了，仍呈互相依靠而站的状态。为彻底灭绝这个村庄，日军士兵从尸体中搜索没有死去的人，然后用刺刀再次刺死。在村南的山沟里，三十多名躲在那里的妇女和孩子被搜出，日军把他们逼上山崖，然后用刺刀全部刺死。日军士兵在杀害婴儿的时候，或

用石头压死，或用布袋闷死，或扔向高空摔死，潘家峪村东的一个藤萝架下，婴儿的小尸体堆成了一堆。

潘家峪被杀的村民共一千二百三十人。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二团的官兵连夜奔袭而来，他们看到的已是人间炼狱般的惨景。幸存的村民中有二百七十六名青壮年村民，当即参加了八路军，他们和八路军官兵一起组建了一个“潘家峪复仇团”。一年后，日军军官佐佐木被“潘家峪复仇团”击毙。

日军认为，用最残忍的手段令中国百姓身处噩梦般的恐惧中，是达到其殖民统治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日本侵略者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骨头是硬的，特别是表面看去格外温良的中国农民。农民在被残暴彻底激怒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无情的复仇。在华北敌后的任何一个地方，被激怒的农民很容易寻找到能够给予他们胆量和信心的八路军。

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持续不断，其总兵力一度达到八十多万，甚至超过了正面战场的兵力投入。在日军的不断进攻下，华北抗日根据地被切割分隔，散布很广的八路军各部队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每一支部队都处在激烈的作战和频繁的转移中。由于在日军进攻时不能置根据地的百姓于不顾，因此八路军必须首先拼死作战，然后才能疾速转移，所以伤亡极大。八路军处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的三重重压下，物质极度匮乏。虽然名义上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但在涉及一支军队需要的所有方面，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家军队的待遇。由于必须面对十四个师团以上的日军，即使装备物资乃至生活用品极度短缺，也不能不扩大作战部队的规模。这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始终困扰着敌后战场的抗日作战。武器简陋，弹药奇缺，衣食无着，伤病无医，武器装备大多需要依靠战斗缴获，维持生存的衣食来源只能依靠民众支持或者是自力更生。由于得到武器的渴望到了朝思暮想的地步，鲁西的八路军提出了“打胜仗，缴大炮”的口号，官兵们在郓城附近的潘溪渡，围绕着几门大炮进行了一场伏击战。八路军用刺刀和手榴弹与日军展开血战，经过反复残酷的肉搏战，官兵们终于得到了“日思夜想的九二步兵炮”——“干部战士解下绑腿做绳索，像护送宝贝一样把火炮送往杨孟庄，然后用牛车运往范县根据地。”战斗后仅两天，日军就发动了疯狂的报复。在猝然而至的进攻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特务营的两个连，为掩护鲁西根据地机关和部队转移全部阵亡。

八路军的作战往往伤亡巨大。在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在攻击安华时，遭到大批日伪军的包围，周旋两个昼夜后，掩护部队转移的二营五连成功突围，六连和七连的官兵全部牺牲。在冀中根据地，日军集中五万余兵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对八路军部队展开大规模扫荡。日伪军在封锁圈内反复进行拉网式作战，尽管八路军和当地抗日民众一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但日伪军还是占领了冀中所有的县城和重要集镇。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两千多个小块区域，每一个区域都处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在日军的来回扫荡中，冀中根据地八路军减员一万多人，抗日民众被杀五万余人。

中条山作战后，日军大本营撤换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委任所谓的“中国通”冈村宁次到华北任职。

冈村宁次把华北地区分成日军可以控制的“治安区”、八路军控制的“未治安区”以及双方交错控制的“准治安区”——对应八路军的说法，便是“敌占区”、“根据地”以及“游击区”。冈村宁次发现，前任多田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作战效果并不明显，以致在华北地区“日军与中共军势力深入的状况大致相等”——“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及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等，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为治安区。而约占总面积百分之十，为中共的中心根据地地区，是日本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区，其中百分之六十大致是日本方面势力占优势，称之为准治安地区。”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的确长于情报，而且足智多谋”，导致经常出现一个日军小队“被全歼的惨状”。由此，他亲自主持编纂了一本《缴共指南》，以指导部队如何对八路军采取“综合措施”：

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

日军在“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之间，修筑了大量的隔离壕沟以及碉堡据点，仅沿着平汉路两侧十公里的地带，修筑的隔离带就长达五百公里。关于与八路军打仗，日军有着深切的体会。日军第八师团师团长塚本政登士曾专门撰文，分析他的部队与八路军周旋的经验和教训，结果这篇文章立即成为华北日军的作战教材。塚本政登士介绍了八路军抗日

根据地的情况，说那里不但有兵营、仓库和医院，甚至还有大学——“经过教育的工作人员，开始以献身精神对日军占领区进行政治工作。”而在平原地区，看去似乎没有八路军的踪影，实际上八路军已经藏身在地下——“村庄与村庄之间挖通地道”，在整个村子的底下可以挖出“两层、三层的地洞”。八路军的游击战原则贯彻精到，以致日军“发动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未能给敌以重大的打击，很遗憾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以此相反，讨伐中的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被共军全歼的例子却非常多”。所以，日军必须对八路军的谋略格外小心。

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居民如此热情地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很大的损失。有时，中国人的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如此大殡，实在少见，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孝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碉堡开火。

塚本政登士认为，八路军的本事出自“狩猎民族”的传统——“他们事先选好易于消灭敌人的地形，像张网一样展开部队，然后用一部兵力诱使日军进入其中，日军小股部队或后方部队遭到全部覆灭，大都因为上了口袋战术的当。”

更令日军头痛的是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关系：

根据地附近，全村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参加民众组织，如抗日青年团、妇女团、少年团和老年团等，每个组织都承担一定的任务。青年团担任自卫，少年团和老年团专管站岗放哨监视敌人，妇女团负责缝补被服等。日军拂晓出发讨伐，一出基地大门，村民立即跟随日军的行动发出信号。一部分民众组织与日军同时并进，随时监视日军动静。共军命令并训练他们在日军到达之前把情报送给共军。通常有一部分群众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破坏桥梁，以妨碍日军的行动。日军一接近共军根据地时，几乎每一个民众都可看作是共军的哨兵和侦察员。可以肯定，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会用铁锹示意的方式传送情报。

与游击战术同样被认为十分可怕的是八路军作战不怕死：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都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

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支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体背回去……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接连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在冈村宁次的亲自部署下，日军第一一〇、第三十三、第二十一师团企图合围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封锁、消耗、摧毁八路军根据地。冈村宁次决定改变以往作战目标过大的弊端，集中兵力专门针对共产党武装最早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一路自长城向南，一路自石家庄、井陉、阳泉一线向北，两路对进“采取鱼鳞式的包围阵”，“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装备”以确保达成作战目标。晋察冀军区令员聂荣臻派出一支小分队携带一部电台，不断地与找寻八路军首脑机关的日军周旋，而晋察冀军区机关以及主力部队则向西奔袭，进入太行山北麓，利用日军在龙泉关方向敞着的口子，顺利跳出了敌人从河北阜平至山西五台一线设置的包围圈。九月二十五日，日军侦察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部指挥机关隐蔽在易县西南六十余里的狼牙山地区，立即集结起三千多兵力对狼牙山实施奔袭。晋察冀军区命令第一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第一分区一团七连则奉命扼守险要地形阻击敌人，以掩护游击支队、地方党政机关以及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百姓转移。一团团长邱蔚叮嘱七连连长刘福山、指导员蔡展鹏：必须死死地拖住敌人，至少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不能让鬼子越过狼牙山顶峰棋盘坨。面对三千多日军的进攻，七连官兵在山上到处开火，让鬼子以为满山都是八路军。激烈的战斗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在七连的前沿阵地上，二班和机枪班的战士大部阵亡，刘连长身负重伤。危急时刻，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坚守阵地掩护连队撤离。六班拼死作战，誓死不退，入夜时全班只剩下五名战士。天又亮了，日军猛烈炮击棋盘坨后，步兵小心翼翼地开始向山上爬，六班的五名战士投出最后的手榴弹、打完最后的子弹，高呼着“八路军誓死不当俘虏”，砸烂枪支，从棋盘坨右侧的牛角壶峰纵身跳下悬崖绝壁。马宝玉、胡福才和胡德林坠落崖底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挂在山腰的树枝上脱险归队。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流传至今。

十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一、第九旅团一部，共一万五千余兵力，奔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

由于八路军早有准备，提前跳出了日军的合围。扑空的日军只有转而袭击黄崖洞兵工厂。黄崖洞位于晋东南，是八路军官兵艰苦创建的最大的兵工厂，一九四〇年生产出八路军自己制造的第一批步枪，时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五十五岁生日，步枪即被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为了让兵工厂有足够的时间坚壁清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有利地形抗击日军的攻击——“共军进行了罕见的顽强战斗。”日本战史记述道，“第一线小队遭到敌人猛烈射击，不断出现伤亡。小队长市原少尉身中数弹，在‘懊恨！懊恨！’的绝叫声中倒下来，鲜血染红了山坡，然而无任何隐蔽物，从头顶上方遭受敌人猛烈射击。中队长命令第二线小队超越突击，激励市原少尉越过死亡者向敌弹雨中冲进。梅津少尉一边注视前方高地上敌之阵地，一边高叫‘继续前进’！犹如凶神敏过猿猴，迅速冲上陡坡，带伤攀登顶部，挥舞战刀砍倒数名敌兵，不幸此时一颗敌弹穿透了他的头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与日军血战八个昼夜，毙伤日军七百余人。

为了把侵华日军大量地牵制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自一九四一年后承受着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空前牺牲。根据日方统计，仅一九四一年，在华北地区，日军就与八路军交战一万七千一百九十八次。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发生近五十次战斗。而在这一年里，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民众死亡“九万八千三百一十八人”，日军的损失是：“战死二千三百五十三人，负伤五百零一人。”事实上，在日方称之为“三光作战”、中方称之为“三光政策”的残酷屠杀中，被杀害的中国军民远远超出九万多人这一数字。

在日军对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武装发动全面攻击的同时，日军航空兵再次对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实施了“第一〇二号作战”。七月三十日，日军出动战机一百三十架以上，八月初的五天之内，日军出动战机三十余次五百架次，对重庆不分昼夜地进行了间隔不足六小时的“疲劳轰炸”，轰炸时间最长的一次竟然持续五个小时之久。日军的轰炸导致了一桩大惨案的发生。六月五日黄昏，正是重庆市民下班、下课和换班的时候，日机再次来袭。空袭警报中，重庆市民纷纷涌入防空隧道避难。由于避难人数超出了正常容量的一倍，隧道内拥挤不堪，严重缺氧，在炸弹强大冲击波的冲击下，通风机无法启动，濒临窒息的市民只好拼死向洞外拥挤，而洞外的市民还在往洞里拥挤，反向而挤的人群相互踩踏导致死亡惊人。重庆市市长吴国桢赶到现场，见“洞门之内，一望若有二三百人，手持足压，团挤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重庆当局调动军队前来救援，仅

仅是拖出死难者的尸体而已。

在大隧道里，特别是洞口一带，遇难者你抓我扯，相互扭成一团，很难分开。有的尸体浑身汗如水淌；有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衣裤撕成了襟襟片片；有的两眼鼓凸，舌头伸出口外；有的抓破身子；有的手指抓地，嘴啃岩石泥土；有的赤身裸体，遍体鳞伤；有的全身发黑，披头散发，口角流血；有的孕妇被拥挤践踏，大小齐死。洞内悲惨情景，令石人下泪。

有资料统计，重庆大隧道惨案，平民死亡万人以上。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民族耻辱，椎心泣血。

苦难的中国，有人醉生梦死，精神颓废；有人唯利是图，蝇营狗苟；有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有人助纣为虐，叛变投敌。

也有人在与残暴的入侵者作决死的战斗。

而这些人，是让苦难中国屹立不倒的脊梁。

第二十五章

伯陵防线

一九四一年三月，木下勇少将接替青木重诚，就任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参谋长。抵达位于武汉的军司令部后，他立即感到“参谋部以及军司令部的气氛普遍沉闷”。于是，他制订了两条“工作准绳”：

一、鉴于第十一军所处地位，需积极运用武力击破周围的重庆军。为此，应计划连续作战。

二、应使司令部的气氛明朗，以威武的气魄充实勇敢战斗的精神。

接着，第十一军司令官也换了：阿南惟几中将接替了园部和一郎。

阿南惟几和木下勇立即命令军司令部的参谋们着手研究对中国第九战区的作战。但是，作战参谋山口贞男向两位新任长官汇报的，并不是如何进行下一步的作战，而是一九三九年“湘赣会战”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湘赣会战，即中国方面所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听完汇报后，两位新任长官依旧表示：“攻取长沙不成问题。高山、大河何所惧，应即进行具体研究。”于是，“第十一军就以当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开始了研究”。

第十一军的参谋们不是惧怕作战，而是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考虑，向长沙方向实施大规模攻势作战，理由并不充分，时机也不恰当：第十一军于长沙方向面对的是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战场遍布江河湖汊的地理条件，也不适合展开大兵团作战。更重要的是，在华日军面临的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或许这才是第十一军司令部里“气氛普遍沉闷”的真正原因。

此时，日美之间正逐渐接近战争状态。

长期以来，在日军大本营内存在着“北进”与“南进”的战略分歧，从而形成两个派别。所谓北进派，以日本陆军军官为主，主张向北进攻苏联，这是自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军人始终怀抱的志向。特别是随着欧战的爆发，北进派主张立即向苏联开战，占领苏联国土的亚洲部分，与德国东西呼应一起瓜分苏联。但是，北进苏联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必须首先征服中国。在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确保进攻的后

方安全，拥有充足的工农业以及人力资源后，北进才有可能实施。可是，中国战事已陷入持久战争的泥潭，国民政府仍是没有屈服的迹象。鉴于目前日军无法集中兵力攻击强大的苏联，只能运用外交策略暂时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所谓南进派，以日本海军军官为主，主张趁英、法、荷等国忙于欧洲战事，立即向有着丰富资源的东南亚扩张，以缓解国内资源严重短缺的压力，同时把美、英、法、荷等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全部赶走，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霸主的“宏愿”得以实现。海军军官们认为，陆军在中国战场上被大量牵制，大日本帝国的海军还没派上用场呢。只是，即使是海军大举南进，也要靠陆军完成占领，整个东南亚战场将需要相当数量的陆军，所以南进的前提仍是首先解决中国战事。

总之，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日本必须有所作为，不能在中国战场上原地不动。

海军的南进主张逐渐占据了上风。

日本海军南进东南亚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诡异的日本人开始与美国人谈判，以避免在南进时爆发对美战争。一九四一年三月，日美之间开始接触。日本提出的条件是：日美之间签订相互谅解协定；两国共谋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要的物资；日美之间进行通商和金融合作；日本可应允美国提出的从中国撤军，尊重中国独立以及不要求赔偿的条件，但中国必须实行蒋、汪合作并承认“满洲国”。针对日本提出的条件，美国提出了四条原则：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须享有机会均等的待遇，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当前状态。最后一条的提出，说明美国人已看出日本有南进的企图。

美国在日本入侵中国后始终采取绥靖政策，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日本没有警惕。出于对自身远东利益的考虑，一九四一年三月，日美两国开始外交接触之际，美国宣布《租借法案》对中国生效。这一法案规定：二战期间，美国向同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和其他物资。其中的五分之三供应英国，五分之一供应苏联，其余的供应法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五月，中英在新加坡召开军事会议，之后在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由此形成。紧接着，美、英两国分别向中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和五百万英镑的贷款。就在日美谈判期间，日苏外交斡旋有了进展，双方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最重要的一条是：“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

国以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一方须在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而日苏签订中立条约的前提是：日本须尊重“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于是，日方的立场强硬起来，不但要求美国不要插手中国事务，还要求美国承认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

美国当即答复：这些条件与美国的想法相距太远。

日美谈判随即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候，震惊世界的苏德战争爆发了。

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三十分，德军从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约一千五百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了突然进攻。当时，德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八百五十万，火炮四万七千二百门，坦克三千七百辆，作战飞机四千九百八十架。德军已经占领了中欧、西欧大陆以及北欧和巴尔干半岛。整个世界，只有英国凭借着海洋在与德国作战。于是，希特勒认为他可以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施“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了。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是：集中三百万德军，以闪电战的方式，从三个方向对苏联进行大纵深迅猛突击，占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这三大城市，将苏联红军主力部队消灭在其国土西部。然后，向东抵近伏尔加河线，用空军摧毁位于乌拉尔山以东的苏联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区，击败并肢解苏联。战争爆发伊始，德军出动大规模机群轰炸了苏联西部的军事基地、交通枢纽、重要城市以及六十六个机场，大批德军伞兵被空降至每一处战略要地，数千门火炮把苏军边防指挥机构、防御工事连同通信设施轰成了一片废墟。德军的一百一十三个陆军师，包括十九个坦克师，还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等国的四十个师，共计五百五十万兵力，配属着三千五百辆坦克以及四千架作战飞机，分三路向苏联国土的腹地快速推进。猝不及防的苏军在慌乱中应战，半天之内就损失了一千二百架战机，半个月之内损失了两千列火车的军火、三千门大炮、一千五百辆坦克，二十八个陆军师被全歼，七十个陆军师损失过半，三十万苏军成为德军的俘虏。

德国人扩大战争的疯狂之举，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日本陆军再次蠢蠢欲动，与德国步调一致北攻苏联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日本内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却出乎陆军的预料：认为日本北攻苏联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趁机南进东南亚的战略，得到了大多数阁僚的支持。为此，七月五日，日军大本营为南进进行了军事准

备：解除日军华南方面军战斗序列，大本营直辖部队第二十三军改隶中国派遣军，驻防广东承接华南方面军之任务。迅速在国内编成陆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五军将于七月二十五日——德国进攻苏联一个月后——从中国的三亚起航，直接突击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

日本人果然要南进了，美国人深感震怒。

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为中国空军装备五百架战机并随之配备美国志愿飞行员的计划。同时，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终止了对日本的石油输出。七月三日，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作出了向中国派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决定。——美国人的目的非常明确：用支持中国抗战的方式，把日军拉回到中国战场上，并将他们牢牢地钉在那里。

此时，日美谈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美国人意识到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生冲突不可避免。

而日本人决心不惜后果与美国开战。

问题是：南进占领东南亚的广阔地区，就等于与那里的殖民者英、法等国同时进入战争状态。

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力投入。

除了继续推进国内的军备扩张外，唯一的办法是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可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近百万的日军必须牢牢护卫“满洲国”，防备苏联远东军四十个师的强大威胁；还有近百万的日军被共产党抗日武装死死地纠缠在华北地区；而在正面战场上，必须保持相当数量的兵力，才能维持与国民政府几百万军队的对峙。因此，不要说发动攻势作战，就连保住现有占领区和对峙线，也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日军第十一军的参谋们认为，再次实施大规模进攻长沙的作战，几乎等同于“以国家命运孤注一掷”。——“当时在中国战场上，作为南方会战的预定兵团，除驻在华南的第十八、第三十八师团外，另有第四、第三十三、第二十一师团以及第五师团（驻上海待运南方，由大本营直辖）。空军部队的比例更成问题，虽有海军中型攻击机约二百架进入汉口，战斗机队利用宜昌机场正在攻击内地，但担当这一作战任务的第十一航空队为准备新的作战，决定停止对华作战，于九月一日撤离，

陆军的第三飞行集团，也必须在九月份调出。作为发挥地空综合作战能力的夏秋作战，前途堪忧。”

阿南惟几还需说服大本营同意他实施长沙作战。

东京大本营极端矛盾：从南进东南亚所需兵力的角度讲，不允许在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作战；可如果不再作战，就等于向重庆方面和共产党人释放出这样一个对于日军来讲十分危险的信号——日本在中国支持不下去了。

八月二十六日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五三八号”，批准第十一军的长沙作战计划。但是，大本营同时设定了一系列的前提：不能动用即将调往太平洋地区的部队；支持长沙作战的第三飞行集团九月份必须调走；作战必须迅速推进，完成之后迅速回撤；宜昌固守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以后——设定前提的含义是：打长沙可以，不能把宜昌丢了。

上高作战后，在中国第九战区辖区内，日军调走了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此时，日军第十一军所属部队散落在必须固守的各个要点上：第三师团驻守鄂北应山一带，第四师团驻守鄂中安陆一带，第四十师团驻守鄂南咸宁，第三十九师团驻守鄂南荆门，第十三师团驻守鄂南宜昌，第六师团驻守湘北岳阳，第三十四师团驻守赣北南昌，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驻守赣北九江。——无论哪一个方向，都是与中国军队的对峙线。如何才能集结起足够的兵力支持长沙作战呢？阿南惟几决定：趁大本营还没有正式抽调他的部队，使用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尽快发动攻势。

九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开始为长沙作战集结部队：

丰岛房太郎中将指挥第三师团，配属四个山炮大队，八月下旬从湖北应山附近出发，向岳阳东南的小桥坳集结；

北野宪造中将指挥第四师团，配属一个山炮大队和一个迫击炮大队，八月下旬从湖北安陆附近出发，向岳阳东南的新开塘集结；

神田正种中将指挥第六师团，配属两个山炮大队和一个迫击炮大队，移动至岳阳以南的草鞋岭附近集结；

天谷直次郎中将指挥第四十师团，配属一个山炮大队，九月上旬由湖北咸宁附近出发，移动至岳阳以东的桃林附近集结；

早渊四郎少将指挥早渊支队，由第十三师团的四个步兵大队和两个山炮大队组成，八月中旬从宜昌南面的紫金岭出发，九月十五日前移动至岳阳以东的冷水铺集结；

荒木正二少将指挥荒木支队，由第三十三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和个山炮大队组成，从江西安义出发，配属第四十师团行动；

平野仪一大佐指挥平野支队，由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中队组成，九月中旬由江西瑞昌向西，移动至岳阳以北的城陵矶附近集结；

江藤大八中佐指挥江藤支队，由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的一个步兵大队组成，由江西瑞昌向西，移动至岳阳东北方向的临湘附近集结；

战车第十三联队，配属两个轻装甲车中队，由武汉南下向岳阳集结；

野战重炮兵第十四联队，由武汉南下向岳阳集结；

军工兵队，由三个工兵联队和八个架桥材料中队组成，由武汉南下向岳阳、临湘集结；

岳阳地区的兵站队，由十八个汽车中队、九个辎重兵中队组成，保障战场的后勤运输。

以上部队，约四十五个步兵大队和四个骑兵联队，总兵力十一万五千余人。

第十一军制订的作战计划是：首先击败新墙河、汨罗江之间的中国军队主力，然后突破汨罗江，南下攻击前进，把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包围在湘江岸边一举歼灭。

为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教训，阿南惟几彻底集中了兵力：沿新墙河仅二十公里的狭窄正面，四个主力师团自东向西一字排开：第四十师团、第六师团、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而他制订的作战原则是：大兵力迅猛推进，然后迅速撤回原地，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作战。至于作战目的，阿南惟几强调的是：“为粉碎敌人的抗战力量，给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

这是阿南惟几第一次指挥大规模作战。

接任战地军司令官前，他是日本陆军省次官。

一九三九年十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以湖南北部洞庭湖西侧的新墙河为界，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与日军第十一军于这条对峙线的两侧，已有近两年没有发生过战事。

一九四〇年七月，中国重设第六战区后，第九战区的北面和西面与第五、第六战区的分界线是：从常德以南约十五公里的石门桥向北，沿着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然后沿着长江一直延伸到江西九江一线。东边与第三战区的分界线是：从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口向南，一直延伸到抚河一线。——一九四一年，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三、第五、第六和第九战区，自东向北、向西、向南，将日军的第十一军包围着。

此时，第九战区辖有正规军三个集团军十三个军三十五个师，还有七个游击纵队、六个保安团，再加上四个野战炮兵营、一个重迫击炮团、两个战防炮营、一个工兵团和四个独立工兵营，总兵力三十七万八千余人。空军只有两个大队，海军只有能执行水道布雷任务的少量部队。

第九战区部队的守备位置是：

由战区直辖的第九十九军，军长傅仲芳，辖第九十二、第九十九、第一九七师，驻守湘北，任汉寿、沅江、青山一带的湖防以及湘阴、营田、归义之间的汨罗江、湘江守备。

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部设在湘东北的平江，下辖：

第四军，军长欧震，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〇二师，守备湘北新墙河南岸阵地；

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辖新编第十、新编第十一师，驻守湘鄂交界地带，守备黄岸市西至九岭、赛公桥，北至北港阵地；

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辖第一三三、第一三四师，驻守鄂东南，守备通城北至铁柱港、斗米山北至杨芳林阵地。

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部设在赣西北的修水，下辖：

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辖新编第十四、新编第十五师，驻守赣西北，守备东坑岭、留咀桥阵地，主力在修水以北的三都整训；

第七十八军，军长夏首勋，辖新编第十三、新编第十六师，驻守赣西北的修水北岸，守备观音阁、潭埠阵地。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部设在赣西北的上高，下辖：新编第三军，军长杨宏光，辖第一八三师和新编第十二师，驻守赣西北，守备靖安、奉新、祥符观阵地；

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辖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以及预备第五师和江西保安纵队。其军主力集结于株洲至南昌铁路沿线的新喻、宜分地区；保安纵队守备南昌以南的七星冈、市汉街一线阵地，预备第五师守备市汉街至东南方向的温家圳阵地；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辖第六十、第九十五、第一四〇师，集结在湘北汨罗江两岸的长乐街、瓮江铺、福临铺一线。

由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辖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四师，集结在平江至长沙之间的金井、浏阳一带；第十军，军长李玉堂，辖第三、第一九〇师和预备第十师，集结在株洲以南湘江岸边的衡山。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长沙。

薛岳判断，日军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其作战方向的选择有如下可能：在赣北方面，或者由德安、安义向西，进攻武宁、修水和铜鼓；或者沿上高作战的路线向南，进攻高安和上高；或者由南昌一路南进，攻击新淦和吉安；在鄂南方面，由崇阳、通山、通城向南，进攻平江和浏阳；在湘北方面，沿着粤汉铁路两侧地区直接攻击长沙。薛岳认为，日军按照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路线，对湘北实施进攻的可能性最大。

薛岳制订的作战计划是：

战区在赣北、鄂南，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夹击于赣北山地。在湘北方面则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

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位于汨罗江与捞刀河之间。

薛岳获悉，日军此次作战兵力并不比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多，因此还是使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诱敌深入的战术。

在没有战事的近两年间，薛岳已在第九战区防区内建立起一条坚固的防线：在战场的北面，利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河流，修筑起大纵深的多层工事，以对日军实施节节对抗；在战场的东侧，利用幕阜山、连云山山地，挖掘出大量坚固的阵地，部署了机动部队，以在日军南进长沙时对其进行侧击。在位于前沿的新墙河，薛岳把第四军和第三十七军配置在正面，把第五十八军配置在侧面幕阜山麓的丘陵地带，然后，彻底地破坏了这一区域内所有的道路。而沿着新墙河河岸，利用天然河流屏障，修建了六公里纵深的防御阵地，形成河岸阵地与村庄据点相配合的网状结构，阵地与据点之间都有交通壕相互连接。阵地上的工事则由砖石构成，火力配备周密，还布设了对河面的侧击火力。在河岸上，除了铁丝网外，还埋有大量地雷。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之间，重要的高地都筑有据点式阵地，利用丘陵和沟渠等天然地形呈五角形的碉堡星罗棋布。

薛岳把他建立的这条防线称为“伯陵防线”。

薛岳，字伯陵。

至少在防线未被彻底摧毁之前，军事将领们都喜欢这样的命名。

第一次指挥大规模作战的阿南惟几，作战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主力师团还在调动之时，他即命令守备岳阳地区的第六师团开始对大云山进行扫荡。

大云山是中国第九战区越过新墙河，在河北岸几公里处建立的一个前进阵地。横亘在湘鄂边界处的大云山，虽然海拔只有九百六十米，但山峦峻险，森林茂密，山顶由第四军的一个加强营守备，山顶西侧是第四军第一〇二师的三〇六团，东侧是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的一个营。

日军第六师团的作战任务是，把守备大云山的中国军队赶到新墙河南岸去，以掩护主力师团在新墙河北岸展开，为正式作战时强渡新墙河的行动开辟出较大的渡河空间，并保障战场后方的安全。

看上去简单的作战开局却并不顺利。

九月七日晨，在空军的支援下，日军第六师团的第十三、第二十三、第四十五联队进入了大云山，向北侧的雁岭、詹家桥展开进攻。大云山茂密的树木，让突然闯入的日军瞬间便“被淹没在巨大的林海之中”，日军不得不费力找寻迷宫一般的羊肠小道，各个联队之间“彼此未能保持联系”。在遭到中国守军的阻击后，第二十三、第四十五联队向东南迂回，第十三联队向西进攻中国守军第一〇二师阵地，该师在师长柏辉章的指挥下死缠硬打，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双方在甘田附近再次陷入激战。入夜后，两军形成对峙。

此时，一份情报引起了中国军队的注意：鄂南咸宁地区的日军第四十师团正向湘北移动，据判断，很可能是要与第六师团换防。黄昏时分，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下达命令：第四军确保大云山，第五十八军派出部队协同第四军作战；第二十军从通城向西，侧击从咸宁南下湘北的日军。中国军队决定趁日军换防之时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九月八日，驻守鄂南与湘北交界处的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师、新编第十一师之三十一团向大云山推进。应他们的请求，第九战区同意把集结在长乐街附近的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也拉上去参战。九日，日军第十三联队依旧被第一〇二师阻击在甘田附近，但其第二十三、第四十五联队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中国军队第五十九师一七七团堵截无效，直到师主力参战后，才把这个方向的日军阻击在了长安桥附近。

十日，日军第四十师团果然与第六师团进行了换防。中国军队第五十八军趁机又掌控了大云山主峰。此时，向大云山增援的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抵达战场。第二十七集团军随即命令第六十师归第四军指挥，命令第五十九、第六十师与新编第十师合力围歼日军第十三联队。十一日，三个中国师的联合攻击开始，日军第十三联队因伤亡严重，只能困守待援。

日军第四十师团首先抵达的是先遣部队重松支队。

重松支队由步兵第二三四联队联队长重松洁大佐指挥，该联队缺第二大队，但加强了第二三五联队的第三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支队出发时得到的情报是：“第六师团已经扫清了大云山的敌人，你们将不会遇到大量敌军。”但是，当重松支队接近被围困在甘田的第十三联队时，遭遇中国军队新编第十师的猛烈伏击。重松支队猝不及防，慌乱中急忙调整

应战。——“此一情况完全出乎师团意料之外”。被包围在甘田的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趁机脱离了战场，第四十师团的重松支队却成为中国军队围歼的对象。十二日晚，重松支队被迫兵分两路突围。其中的一路由第二三五联队第三大队的后藤寿文少佐指挥，日军拼了一夜的手榴弹，才占领了一个小高地；另一路是支队主力，则完全陷入中国军队第五十八军的围攻。晚上，第五十八军组织起夜袭队，中国官兵的手榴弹下雨一般，日军左突右跑，“重松大佐高呼‘军旗危险’，亲自拔刀在附近一带展开了混战”。十三日黎明时分，激战一夜的重松支队再次遭到中国守军既设阵地上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打击——“该高地顿时化为凄惨的战斗场所。第十一中队主力虽赶往救援，但敌军火力更加炽烈，士兵相继倒下。十三日夜，该中队后退。”

重松支队苦战之时，第四十师团主力也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由于事先得到的情报依旧是第六师团已把中国守军赶走，于是第四十师团命令步兵第二三六联队，在联队长龟川良夫大佐的指挥下，向预定地域推进。十三日上午，龟川联队涉渡白羊田河时，突然受到猛烈射击。龟川良夫立即命令第一、第二大队并列反击。但是，中国军队第五十八军的突击部队已从日军两个大队之间的空隙突了进来，直逼第二三六联队的侧后，甚至逼近了日军的联队部。第四十师团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急忙命令第二三五联队参加战斗。日军的第二三五、第二三六联队，在东西不足三公里的狭窄范围内，与中国军队混战成一团。

十五日，阿南惟几终于明白，扫荡大云山并不容易，第六师团刚刚脱离麻烦，第四十师团又陷了进去，如果不另派部队前往解救，第四十师团就有可能遭遇厄运。晚上，第十一军司令部命令第三十三师团的荒木支队前往解救第四十师团。荒木支队搭乘汽车，于十六日半夜赶赴大云山。但是，当他们抵达甘田东侧时，遭到中国军队新编第十一师的打击。日军只能采取挖掘战壕的方式，一寸寸地向重松支队靠近。直到十八日凌晨，才推进到后藤大队苦战的位置。同时，被困的重松支队终于攻占了中国守军的一个包围支撑点。只是，“该师团的伤亡已达此次作战的半数以上”。

这时候，日军四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已在新墙河北岸集结完毕。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主力向新墙河南岸转移备战。

大云山作战结束。

日军战史这样叙述了大云山之战：

军曾令第六师团扫荡了横亘于开阔地东侧的大云山（标高一千米），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反而于九月十日引出了重庆正规军四个师的大攻势。按照作战部署，那一带被指定为第四十师团负责扫清的开阔地。该师团自十一日逐次进入，突然与上述之重庆军不期而遇，各部被迫陷入苦战。十五日夜，军才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把荒木支队投入战斗，吃到了没有预料的苦头。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大云山作战中的中国军队成分十分复杂：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是川军将领，所辖的第二十军是他的川军老部队；第五十八军是滇军部队，官兵清一色的云南人；而薛岳的老部队第四军则是粤军部队，但其中的第五十九、第九十师则属中央军嫡系部队；柏辉章的第一〇二师却是一支地道的黔军部队——中央军和各路地方军混合在一起，竟能把仗打得如此有声有色，实在难得。

开战伊始在大云山的遭遇，令日军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九月十七日，日军主力抵达新墙河北岸的出击位置，其阵型是主力师团居中，支队部署在两翼，所有部队一字排开，并列于出击第一线：第四师团在三港嘴附近，第三师团在簟口附近，第六师团在草鞋岭附近，第四十师团在马家桥附近，独立混成第二十六旅团的早渊支队在青冈附近，第三十三师团的荒木支队在甘田附近。只有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的平野大队在战场的最西侧，从岳阳南下洞庭湖，然后沿湘江继续南下，准备于侧翼掩护正面的进攻。

此时，参加大云山作战的中国军队第五十九、第一〇二、第六十师还在仓促回撤新墙河南岸阵地中；新编第十师、新编第十一师还在甘田附近与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对峙；第二十军主力也尚在向指定防御阵地推进中。以上部队直到十八日拂晓，才全部进入新墙河南岸阵地。中国官兵们刚刚进入战壕，日军的炮弹就飞了过来。

十八日拂晓，日军第十一军的“长沙作战”开始了。

中国方面称之为“第二次长沙会战”。

凌晨四时，新墙河北岸，日军三百二十二门火炮一起发射。炮火轰

击持续一个小时后，战机加入攻击行列。新墙河南岸，中国守军阵地工事坍塌，土石飞溅。接着，日军四个主力师团齐头并进，开始了强渡新墙河的突击作战。

阿南惟几赶到了前沿，兴奋的心情难以掩饰：

六时，由岳州出发，沿被雨水冲洗过的公路南下，超越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段列及早渊支队等部队，于八时到达二〇三高地（篢口西北六公里）战斗指挥所。阴云渐晴，在隆隆的重炮、山炮声中，夹杂着激烈的机枪声。八时三十分，第四师团正面在烟幕掩护下一齐开始前进。八时五十分攻破左岸敌军的第一线，继续前进。通过电话向北野师团长祝贺胜利，并勉奋斗。第三师团正面于七时三十分开始前进，未做攻击准备射击，即突破敌第一线，向大荆街突进。第六师团方面炮声隆隆，只见各处村落起火。一场大规模野战正在展开。统率大军，亲视战况，指挥会战，此正其时。殊感光荣，应谢上苍。

中国第四军防守的新墙河一线各处阵地，同时遭到日军火炮和战机的凶猛打击。第四军刚刚结束大云山作战，部队既没有得到休整，也没能得到补充，前沿的第一〇二、第六十、第五十九师拼死应战，仍无法抵挡住日军强大的火力突击和优势兵力的集团冲锋。尤其是第一〇二师阵地，受到日军第三、第四、第六师团的联合冲击。日军从第一〇二师溃败的阵地横穿而过，迅速冲到长湖、白羊冲的第九十师阵地面前。上午九时，鉴于前沿阵地的全面瓦解，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命令第四军向二线阵地撤退；同时命令第五十八军向杨林街出击侧击日军，命令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归第五十八军指挥。第四军在撤退中发生混乱，军长欧震努力控制部队，希望在二线阵地站稳脚跟，但是日军很快就扑了上来。下午四时，第九十师的长湖、白羊冲阵地被日军突破，第一〇二师刚刚占领的二线阵地也被日军席卷。

日军已经大规模深入，正并列急促向南推进。

中国军队失去新墙河一线和二线阵地后，欧震军长不得不命令部队向东面的山区转移。

随着第四军撤退的脚步，日军直扑汨罗江边。

大云山作战后，第九战区没有要求第四军守住新墙河一线阵地，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尽可能迟滞日军的攻击速度。因此，可以说他们完成了

作战任务，只是部队损失巨大，其中以第一〇二师为最。第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是黔军中的老资格将领。日军突破新墙河后，柏师长严令三〇四团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在团长许世俊的亲率下，中国官兵全歼了占领河边桥头堡的日军，还活捉了一个日军军曹。三〇六团正面阵地遭到日军骑兵的猛攻，柏师长命令该团坚守据点，没有命令不许后退一步。三〇六团官兵浴血苦战，鲜血染红了河畔的草坡。战斗最残酷的时候，柏师长把他的指挥所推进到距新墙河南岸咫尺之遥的潼溪街附近。三〇六团一营的比家山阵地危急，师直属工兵营奉命前往增援。很快，工兵营打得只剩下营长杨炯和三连连长孙逸民等三十一人了。日军向潼溪街方向发起攻击时，杨营长带着官兵们坚守高地，猛烈射杀冲上来的日军骑兵。与此同时，据守古家村的刘威仪团一营在日军的围攻中拼死作战，连长曾德政牺牲；二营代理营长徐锦江率领十八名官兵坚守黄泥港阵地，最终全部阵亡；三营营长孙国桢也在激战中阵亡。在请求军长增援没有得到答复后，柏师长红了眼，他命令副师长到三〇四团督战，自己到三〇五团督战，和官兵们一直坚持到接到撤退命令后才转移。转移途中，第一〇二师的后勤辎重部队和随营家属遭到日军骑兵的追杀。最后，待全师残部撤退到相对安全地点时，活着的军官不足百人，士兵仅剩六百余人，全师伤亡高达百分之九十。看着寥寥无几浑身血污的官兵，柏师长说：

此次战斗到现在，全师仅存官兵六百余人，牺牲损失九成人数。在历次战役中，先期出省的贵州士兵已经伤亡殆尽，军官生存的寥寥无几。历次新兵补充不久，未及训练就匆匆赴战，在敌人的强大炮火下，军官身先士卒，士兵负伤不下战场，全都抱着誓死为国的决心浴血奋战，杀敌报国。殉战的官兵弟兄是军人的楷模，是我们大家的榜样。现在在场的官兵，都是久经沙场富有战斗能力的将士，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再赴战场，为国献身，努力杀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黔军第一〇二师的顽强作战，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表彰。参谋总长何应钦早年曾任贵州讲武堂校长，柏辉章是讲武堂的学生。何应钦，字敬之，因此柏辉章称他为“敬师”。何应钦发来慰问电：“该师临战奋勇，阻击强敌，保卫长沙，克尽厥功，致嘉勉。对殉战将士深寄哀悼。”柏辉章回电：“敬师钧鉴，生辉所部，每战当敌精锐，痛歼顽寇，伤我士众，生以身存，实深愧疚。嗣当效命奋力，竭尽我责。”——柏师长说他的部队每战当面都是精锐之敌，官兵勇战，死伤众多，而自己还活着，深感愧疚。贵州的父老乡亲在贵阳大南门外建起了一座“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彰显贵州抗战将士的荣耀，纪念血洒抗日战

场的贵州好儿男。

为加强湘北主战场的力量，十八日晚，第九战区命令位于修水附近的第七十二军西进，并指挥暂编第五十四师，准备担任反击作战任务；命令第二十军进至王安屋、朱公桥方向，协助第五十八军和第四军侧击南下的日军。十九日凌晨，第二十军由桃树港向朱公桥急促推进。黄昏时分，第一三四师抵达指定位置，第一三三师也抵达枫树桥，军司令部抵达饶村。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命令新编第十一师到指定位置待命，新编第十师继续在朱公桥附近阻击当面日军。日军第四十师团不断地向中国军队第五十九、第六十、第九十师阵地攻击，双方激战一天，重松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古山常磐少佐被击毙。对第四十师团的使用，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与作战参谋主任岛村矩康之间存在着分歧。司令官认为，第四十师团须用于战场的东侧以袭击平江，因为那里是中国军队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而作战参谋主任认为，第四十师团应该向第六师团靠拢，以加强战场中央突破的兵力。由此，第四十师团自进入大云山受到打击后，南下途中不断地接到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导致部队的行动混乱不堪。因出现混乱而牢骚满腹的还有第四师团。部队突破新墙河后，配属的坦克和野战重炮部队，因为道路完全被中国军队破坏，根本无法前进，只能返回出发地。没有了坦克和重炮的支援，第四师团的步兵拥挤在一起向汨罗江靠近——“师团向左岸推进极为困难，道路为宽一至一点五米的粘土路，中间铺石部分仅余宽约四十厘米，每隔二十米，道路两侧即挖有反坦克壕，暗夜中路旁两侧的水田泛滥，变成潮湿地带，又无迂回道路可寻，全体部队在已被破坏后仅存的路上继续前行，加以重庆军的抵抗，成为此次作战中最艰苦的一次行军。”

十九日傍晚，日军第四、第三和第六师团分别抵达汨罗江北岸的石头铺、长乐街一线。第六师团一部甚至已经从磨刀石附近渡江，与南岸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在颜家铺、浯口一带接战。

防御汨罗江南岸的中国军队力量单薄，只有第三十七军四个团编制的第九十五、第一四〇师以及第九十九军三个团编制的第九十二、第九十九师。但是，薛岳还是按照原定方案，决定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其部署是：第三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沿汨罗江一字摆开，从平江以西一直到湘江岸边，全线固守正面阵地，利用汨罗江天险拼死阻击；同时调动战场上的两翼部队，对日军实施夹击。为支援步兵作战，薛岳把战区直属炮兵旅拉到了汨罗江南岸。

薛岳这种死拼硬打的方案，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内引发分歧。有人认为，现在与日军决战的兵力不够，须等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和李玉堂的第十军上来。目前只能节节抵抗以争取时间。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和第五十八军应依汨罗江、捞刀河交替抵抗，到浏阳河南岸后转为防御。待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军抵达战场，再一起实施反攻。但是，薛岳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十九日，第九战区发布了作战命令：

一、第三十七军（欠第六十师）守备浯口亘骆公桥之线，第九十九军之第九十九师守备骆公桥以西亘营田迄湘阴之线，第九十二师推进于三姐桥以北彭家煅附近占领阵地，各师均归第三十七军军长指挥。

二、第二十六军军部及第四十四师即开金井，第三十二师集结金井，第四十一师向将军霸推进，准备作战。

三、第七十二军改调平江，准备参战。

四、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率炮兵第一团，即开金井。指挥该团及重迫击炮第二团，先协力第三十七军之守势作战，拒止由长乐街南犯之敌，尔后支援第二十六军攻势。

五、工兵第五团仍归第三十七军指挥。

这一命令意味着：第三十七军被置于汨罗江南岸宽大的正面阻击日军；第二十六军在第三十七军的南面，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的二线阵地，以备日军冲破第三十七军的防线后再次实施阻击；第七十二军则被命令赶赴汨罗江战场的东侧，以向南下日军的侧背实施攻击。随后，薛岳又命令位于战场东侧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全力向汨罗江北岸的日军侧背发起攻击。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的正面阻击是在诱敌，真正的打击将来自汨罗江战场的东侧，其作战指向是南下日军的侧背。

决战在即，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六战区抽调出第七十九军、第七战区抽调出暂编第二军，命其增援第九战区。

但是，薛岳的作战命令被日军截获了。

日军推进到汨罗江北岸后，十九日晚，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拟出了二十二日向汨罗江南岸发动总攻的命令。按照日军的作战方案，总攻

将沿着岳阳到长沙的公路向南推进，然后在捞刀河以北向东面的金井和西面的湘江扩展，并以第三、第四师团为主力向长沙实施中心突击。由于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向军司令部提出了从侧翼包围中国军队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军司令部的讨论，导致总攻命令没有及时发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二十日晨——第十一军司令部获得一份情报，即侦听部门破译的薛岳将集中主力从东面侧击日军的命令全文。

为证实这一重要情报的可靠性，日军立即派出侦察机飞到现场核实，结果发现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确实正由浏阳地区向北面的金井方向移动，中国军队的动向与情报中的部署完全一致。

阿南惟几立即决定，变更原作战方案，将主力移向战场东面的瓮江地区，从中国军队试图侧击日军阵形的外围，对中国军队主力实施合击。各师团的进攻方向是：第四十师团由平江向洞阳迂回，第六师团向瓮江以东包抄，第三、第四师团向瓮江东南方向攻击前进。

二十一日，日军各师团开始行动。

这一天发生了日全食。

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太阳变成下弦的月牙形”，天地间“犹如黄昏时的微暗”。

交战的两军都不知这将预示着什么。

日军第三、第四、第六师团以及早渊支队，由骆公桥、新市、杨家仓、伍公市、磨刀滩、浯口等渡口，分成数路强渡汨罗江。防守汨罗江南岸的中国守军第九十五、第一四〇师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两个师防守的地段，位于汨罗江与洞庭湖间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尴尬的死角：日军不来不敢撤退，日军来了难以脱离。日军的攻击开始后，第九十五师和第一四〇师伤亡很大，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二十二日，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日军第三、第四师团以一部正面攻击中国守军的阵地；第四师团主力则由第九十九师与第九十五师的接合部突进；第三师团主力从西面的浯口方向对第一四〇师右翼实施包抄。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第一四〇师师长李棠，分别命令所属部队向两面阻击日军，严令不准擅自撤退，违者军法从事。二十三日拂晓，日军第三师团从第一四〇师右侧突入，日军的便衣队四处出击，主力则向双江口阵地猛攻。第三十七军各师面对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顽强抵抗

了三天。至二十四日上午，正面阵地多处被突破，两侧的日军已迂回到纵深。第一四〇师后方收容所被日军突袭，伤兵大部被杀。全师陷入包围，各部队联络中断，官兵各自为战，师长李棠率残部冲出包围圈向南撤退。第九十五师顽强顶着日军第四师团的攻击，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接到向南撤退的命令。

日军第六师团留下小部队作局部攻击，师团主力开始沿着汨罗江向东横向移动。按照作战命令，他们要从当面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的阵地前，横向移动到第二十六军的阵地北面去。天色灰暗，背靠河流，田间小路泥泞不堪，机械化装备移动艰难，再加上从中国军队防御阵地的眼皮底下横向移动，绝对违反作战常规，因此官兵们普遍感到紧张不安："全体官兵在日全食的这一天，跌倒爬起，满身泥水，奋力前进。神田师团长也与官兵一起，沿着敌军既设阵地艰苦行军。在无限忧虑的心情中，本日勉强进至谷溪源（瓮江西北四公里）。"因横向移动而筋疲力尽的第六师团，很快就与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撞上了。此时，按照薛岳的命令，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刚刚从汨罗江二线战地抵近瓮江^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冲击下，部队很快支撑不住向后撤退。日军第六师团急促推进，对第四十四师形成了包围态势。二十二日，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命令第三十二师火速解围。但是，第三十二师与同样正在东移的日军第三师团遭遇，激战一天后，第三十二师被迫南撤。包围第四十四师的日军第六师团猛烈穿插，一直突进至瓮江口，绕到了第四十四师的侧后。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急令第四十一师前往堵截。日军第六师团一面应对第四十一师，一面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进，二十三日其先头部队抵达金井附近。鉴于第二十六军已被日军完全分割，第九战区命令该军后撤到蒲塘，各师尽力靠拢，组成环形阵地，继续阻击日军。第二十六军战至二十五日，环形阵地被日军突破，残部向金井东南转移，试图与从平江南下的第七十二军会合。

第二十六军之所以很快就垮了，是由于在战场侧翼受到日军三个主力师团的合攻。

此时，日军第四十师团也赶到了金井附近。

在这个方向上，无论是中国军队第四军，还是日军第四十师团，实际上都在向同一个方向推进。第四军执行的是向汨罗江东侧集结，以对日军进行侧击的命令；而第四十师团执行的是向金井方向推进，以对中国军队实施反包围的命令。两军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混战局面。二十日，第四军第九十师对日军第四十师团进行侧击，即刻受到日军的凶猛反

击，第九十师这才发现自己攻击的并非日军的侧背，而日军的反击倒是来自自己的侧背方向。第九十师边打边撤，日军趁机从第四军第九十师与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之间的缝隙插进来，随即攻击了第六十师的侧背。二十一日，日军第四十师团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继续攻击前进，中国军队第九十师退往东港、黄泥岭，第六十师退往马嘶洞，第五十九师退往风角尖。

日军第三、第四、第六师团把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包围并击溃后，乘势向栗桥、福临铺、金井一线推进，三个师团凶狠地并列南下，却遇到了中国军队另一个军的阻拦，即刚刚赶到战场的第十军。中国陆军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其下辖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该军奉薛岳的命令，从株洲以南的衡山北上石湾、金井、高桥一线，加入到汨罗江两岸与日军的决战中。部队由衡阳和渌口乘火车到长沙，然后开始步行。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官兵没有防雨装备，背着子弹袋、米袋和军用毛毯，周身湿透，精疲力竭。二十二日晨，第一九〇师抵达高桥，其先头部队抵达金井。此时，日军已击溃中国军队的正面阻击部队，正大举南下企图对实施侧击的中国军队进行包抄。李玉堂率第十军司令部抵达高桥后，立即部署了作战行动。

二十三日晨，奉命向班召庙方向推进的第一九〇师前卫，与日军第师团前锋在长岳公路上迎头遭遇。刚上战场的第十军官兵喘息未定，对战场环境与周边敌情全然不知。第一九〇师前卫刚与当面日军发生战斗，就接到了迅速北上解救第三十七军第一四〇师的命令。第一九〇师决定留下五七〇团继续阻击日军，师主力则向白杉桥方向推进。五七〇团一度冲到了黄泥岭，师主力也攻到了白杉桥，但部队伤亡很大。更严重的是，日军第三师团一部插到了第一九〇师的右后方，第六师团一部也越过第二十六军右翼，对推进到金井附近的预备第十师发起了攻击。刚刚抵达了金井西北地区的预备第十师认为，东北方向有第一九〇师扼守大路，瓮江方向有第三十七军防守，他们这里是相对安全的。于是，疲惫不堪的官兵准备睡上一觉。谁知，半夜，日军突袭了他们——日军快速部队从浯口取崎岖山路，袭击了预备第十师一个营的宿营地，酣睡中的中国官兵遭日军乱刀砍杀，瞬间就伤亡数百人。预备第十师各部在黑暗中盲目抵抗，彼此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拂晓，师长方先觉才初步弄清情况。

终于，第三十七军第一四〇师从大头岭以北突围而出。

日军第三师团不再管第一四〇师，直接南下向第一九〇师扑来。

二十四日，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推进到竹山铺附近，围攻第一九〇师五六九团阵地，五六九团阵地被突破后，官兵向南突围。该师的五六八团与师部一起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激战中伤亡甚重，残部向福临铺方向溃逃。日军展开了猛烈追击，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负伤，年仅三十八岁的副师长赖传湘阵亡。

二十五日，日军第三师团占领福临铺。

第四师团和早渊支队开始向中国军队第十军第三师发起进攻。

二十六日，第三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金井、栗桥失陷。

当面日军长驱直入，在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和第十军的后方横冲直撞。第三十七军军部遭到袭击，第十军军部被日军包围，军长李玉堂和参谋长带领特务营侥幸突围而出。

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的强烈感受是，日军的猛烈穿插令中国军队各部队均猝不及防："我们刚离开第一个指挥所，日军就抢先把我们第二个指挥所打烂了，破坏了通讯。他们有空军优势，侦察情报准确及时，行动迅速，使我们上下失掉联络，指挥意图无法下达，部队群龙无首，遇有情况无心应战，一味后退，战斗力完全丧失，以致我们这次如此惨败。"

到此为止，不但薛岳在汨罗江两岸围歼日军的作战企图没能实现，这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反而因受到日军的围攻而损失惨重。

日军在汨罗江以南击破中国军队的防御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前后陆续进抵捞刀河北岸。

长沙城已经遥遥在望。

二十四日十七时，日军第十一军发布向长沙方向全面追击的命令：

一、军决定以一支有力部队扫荡歼灭金井方面包围圈内之敌，并以主力向长沙追击敌军。

二、第四师团应经黄花市向浏阳河口附近追击敌军，并及时渡过浏阳河向长沙东侧地区继续追击。

三、第三师团应经上沙市向金潭附近追击敌军，并在该地渡过浏阳河向长沙南侧地区继续追击。

四、第六师团应急速进入北盛仓附近捞刀河河谷，如敌第七十四军已进入该河谷，应即就地将其击破。

五、第四十师团应从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扫荡金井包围圈内敌军，以后于金井附近准备追击。

由于第九战区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的行动被日军各师团的急速东移、包抄、围攻所打乱，因此，当日军突破汨罗江向捞刀河乃至长沙推进时，第九战区要想重新部署战场上零乱的部队，必会既艰难又被动。

中国守军在捞刀河以北的部队有：

第九十九军第一九七师在湘江口南岸的青山、芦林潭附近与日军平野支队对峙，第九十九、第九十二师在捞刀河北面的粤汉铁路以西地区；

第七十二军奉命由修水向西移动，现位于平江以南地区；

第二十六军被日军击溃后，从瓮江、蒲塘一带向南面的石湾、更鼓台、文家场屋转移整顿。

在捞刀河以南的部队有：

第七十九军奉命从常德、澧县向长沙增援途中，其先头部队第九十八师已经抵达岳麓山；

暂编第二军奉命从曲江向长沙增援，正在乘火车开往株洲的途中；

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位于麻林市附近；

第七十四军奉命由江西分宜向西移动，其先头部队第五十七师抵达洞阳，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师位于浏阳附近。

显然，重新整理战线已经没有时间，而长沙附近的现有部队无法阻挡日军四个师团的联合攻击。

二十五日，薛岳下达命令：第七十九军防御捞刀河两岸地区，保卫长沙外围；限暂编第二军二十六日抵达指定位置待命；第七十四军兼程向长沙以西的黄花市推进，在捞刀河岸的春华山、赤石河、夏家塘、石灰咀一线占领阵地，准备抗击日军。

把最强的部队第七十四军顶到第一线，用以迟滞日军对长沙的进攻，这是薛岳此时唯一能够做到的。

但是，薛岳的命令再次被日军情报部门截获。

中国军队中央军精锐部队第七十四军的出现，令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阿南惟几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敌军以国家处于存亡关头激励人心，将兵力送往战场，第七十四军也于十五时进入浏阳北方的新开市（浏阳西北偏北约三十公里），全线敌我均呈紧张状态。”夜半，第十一军司令部讨论后认定：“敌军为最精锐部队，不与之交战即行撤退，则将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须避免此等情况发生。”阿南惟几调整部署：命令第三、第四师团向捞刀河以南突进；解除第六师团攻占平江的任务，命其在捞刀河河谷拦截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解除第四十师团在捞刀河以北围歼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等残部的任务，命其从金井地区迅速南下加入攻击第七十四军的行列。——日军四个师团张网以待，等着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到来。

二十五日，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命令先头部队第五十七师占领携刀河北岸赤石河、春华山一线阵地，掩护军主力集结。黄昏时分，第五十七师一六九、一七〇团抵达捞刀河南岸的天鹅山。前锋搜索队与日军遭遇后，才知对岸春华山阵地已被日军占领。春华山位于长沙城东三十公里处的捞刀河上游，通往湘北和江西的公路从附近经过，控制了该地便可以西下长沙、南通株洲。第五十七师当即对日军发起进攻，经过一夜激战，中国官兵攻克春华山，占领了这处战略要地。二十六日拂晓，第五十八师主力在天鹅山、永安市一线展开，击退日军的反击后，占领了春华山至东林寺之间的要点。

二十六日，蒋介石电令薛岳：

湘北之敌，经各部队奋勇截击，其势已疲，其兵站线亦不易推进，此为我军截断敌人后方覆灭敌寇之良机，希我全体将士，抱定必须灭敌之决心，纵敌进抵长沙附近，更须再接再厉，抱定必胜信念，猛烈向敌截击，迫使敌人无法立足而击溃之，以争取最后胜利，发扬湘北再捷之

光辉。

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陈诚、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宗仁、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顾祝同，命令他们在各自的战区内向日军发动攻击——“遵限实行，勿得迟误为要。”

此时，从第六战区抽调的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和暂编第六师已经抵达长沙，其第八十二师正兼程向长沙靠近。

薛岳决定战场部队和增援部队一起合力向日军实施反击。

薛岳的反击，取决于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的作战结果。如果第七十四军能够遏制住日军的疯狂推进，为各路增援部队的抵达赢得时间，在战场上形成对中国军队有利的态势，反击作战或许能够取得效果，至少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将严重受挫。

二十六日上午八时，根据薛岳的指示，王耀武命令第五十七师从赤石河向麻林街攻击，第五十八师从春华山向路口畲攻击，第五十一师从李家巷向沙市街攻击。命令要求各师必须在十二时以前抵达攻击位置。

二十七日凌晨五时，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指挥该部向当面日军第三师团发起了攻击。天还没亮，日军在第七十四军的突然袭击下一阵慌乱，稳住阵脚后急忙请求航空兵支援。天亮了，日军三十架战机飞抵战场，协助第三师团进行反攻。战斗中双方均死伤严重。王耀武命令第五十一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率一七一团和补充团，迂回到日军第三师团的东侧实施侧击。李翰卿少将身先士卒，在突入日军阵地时阵亡，他的死极大地刺激了士气，官兵们不顾一切地向日军冲锋。此时，第五十七师的左侧开始受到日军第四师团的攻击。在日军两个师团的夹击中，第五十七师激战至下午，伤亡达三千余人。

第五十八师在师长廖龄奇的指挥下，在春华山阵地击退日军第六师团的攻击后向永安推进。二十七日拂晓，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在三十多架战机的助战下开始反攻。第五十八师很快被切割成数段，各级指挥都失去了联络，全师呈现出崩溃态势，但每一个局部依旧在抵抗。在永安市附近，第五十八师与日军陷入苦战：

石井部队乘占领永安市的余势，一气向其南方约一公里的一四七高地一带敌阵地进攻，但敌军抵抗极为猛烈，重庆军在二时许，在冲锋号声中，猛然转入反攻，反复达三次之多。到处展开手榴弹战，在燃烧的

永安市中进行着凄惨的白刃战。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战死，攻击受挫。当时联队长全部兵力仅为森胁大队、土屋大队及军旗中队的不过四个步兵中队。于是，石井联队长请求将第八中队归还联队，并立即配属于第一大队。但第八中队初战以来经多次激战，兵力丧失过半，仅剩下中队长竹下喜兵卫中尉以下四十八名。森胁大队长决心拼死战斗，亲自指挥第八中队的一个小队，并由正面部署中队主力潜入敌阵的间隙，一齐发起冲锋，冒着迫击炮的密集炮火潜入敌阵，突破手榴弹的火海。经过激烈的交手战后，于二十七日五时终于夺下一四七高地。重庆军勇敢进行了多次反攻，但在森胁大队长挥舞战刀带头冲锋下一一予以击退。石井联队长于六时，继森胁大队之后，攻击前面的敌军，并命令土屋大队（第七中队为基干，配属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六中队）尽量由东方联系第一大队攻击前面之敌。准备向永安市东南侧地区攻击的土屋大队，在山炮的紧密支援下，于八时三十分向一五六高地北侧台地发起冲锋，当即占领该地。重庆军在大举进行猛烈掩护射击的同时，并以手榴弹反复进行肉搏攻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此期间，得到山炮的紧密协助，过午才保住了该地。但第七中队一次丧失了中队长西谷诚太郎大尉以下全体干部，中队的伤亡达到六十余名。

军长王耀武急令第五十一师迅速前出，占领有利地形以阻击日军，并收容第五十八师的溃兵。但是，二十七日凌晨，日军第六师团平冈联队的第三大队，在刺杀了三名中国哨兵后，猛烈突袭了第五十一师驻地，刚刚抵达战场的第五十一师猝不及防：

……曾认为仅有少数残敌的我大队官兵，也对敌军如此之多大为吃惊。所有的房屋中都住满敌军。这个第五十一师是由大约一百一十公里东方的宜春附近急进，刚刚到达战场的。其后，联队自右方起第三、第一、第二大队展开全力继续猛攻，步炮一体展开歼灭战，仅在洞阳市附近的鹰林大正面，即取得了敌遗尸六百九十具，缴获重机枪四挺、捷克机枪七挺、步枪七十支等的战果。使敌濒于溃灭。午后，新成为前卫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小镐庸胜中佐）也顺利继续追击。当夜扫荡了跃龙市（洞阳市南十五公里），仅尖兵第八中队即缴获捷克机枪五十六挺，步枪一百零三支等。这样，联队毙敌第五十一师副师长以下多数敌军……二十八日进入镇头市。

黄昏时分，迫于日军的强大压力，第五十一师师长李天霞擅自将阵地向东退缩。结果，第七十四军的整体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第五十七师的阵地也随即被日军突破。入夜，日军以大兵力袭击了第七十四军军部，将军部直属部队打散。军长王耀武率卫士紧急突围，卫士

排长被俘后被日军砍死，王耀武在夜色的掩护下得以逃脱。

经过一天的战斗，第七十四军的三个师只有第五十一师还算比较完整，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残部只有向第五十一师靠拢。

二十八日凌晨，第九战区命令第七十四军撤出战斗，向战场的两侧转移。本指望第七十四军能够在长沙东北方向抵挡住日军的攻势，但没想到第七十四军溃败得如此之快。第七十四军溃败后，第九战区在长沙附近已经没有强有力的部队了——战区的主力已经残破，增援部队很难迅速形成作战态势。

就在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与日军第三、第六师团激战时，日军第四师团沿着粤汉铁路左侧迅猛地向长沙突进，并派出骑兵部队向长沙城奔袭。冲在最前面的是从第十三师团抽调来临时配属第四师团的早渊支队。

无论是重庆的军事委员会，还是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都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击长沙城，因此未在长沙近郊以及市区做防御作战的准备。

薛岳准备放弃长沙了。

二十五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转移到了湘潭。

二十七日，早渊支队前锋抵达了石子铺，这里距长沙城已不到十公里。此时，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抵达了长沙以北两公里的新河街、九尾冲、杨家山一线，并派出一个营向石子铺方向警戒，这个营立刻发现了早渊支队的前锋并与之接火。第九十八师师长王甲本决心在此抗击日军，随即命令一个营原地坚守阵地，主力则向石子铺方向出击迎敌。在长沙以北的三窑堂、白茅铺一线，第九十八师与早渊支队主力遭遇。早渊支队得到了航空兵的支援，猛烈的空中打击令第九十八师伤亡惨重，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早渊支队迅速强渡浏阳河，于当天下午二时二十五分冲进长沙城。

早渊支队单刀直入冲入长沙城，长沙城内的市民还未及外出避难，而从北向南败退的第九战区部队也在涌入长沙城——日军“最初曾加以俘获，但终于应接不暇，不得不在市街北部将其击退，使向湘江方面溃逃”。

几乎与此同时，奉命从广东增援而来的暂编第二军暂编第八师已赶到长沙东郊。但暂编第八师只有一个旅，官兵刚发起攻击就被日军压制了。师主力试图向长沙急行军，但道路被难民壅塞无法前进。

二十八日，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抵达岳麓山。薛岳命令该师渡过湘江进入市区，把早渊支队赶出城去。暂编第六师在师长赵季平的率领下，强渡湘江攻入长沙城，与早渊支队展开巷战。巷战持续之时，日军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四十师团全部抵达长沙外围。

更严重的是，日军第三师团一部渡过浏阳河后，绕过长沙，继续向南直接冲向了株洲。日军第三师团一部向株洲的孤军深入，显示出其胆大妄为以及对中国军队的极度蔑视。日军一路南进，与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混杂在一起，不断激战不断伤亡，但却“一心向株洲挺进”。二十九日九时三十分，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三十四联队第三大队冲入株洲城。

同一天，日军第四师团主力进入长沙城，在长沙体育场举行了军旗奉拜仪式。此时，从四川温江机场起飞的九架中国空军战斗机飞临长沙上空，在城北向日军山炮第十九联队的阵地俯冲扫射，并投掷了三十多枚炸弹。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受到美国人的攻击——“这是美国支援的陈纳德志愿飞行团的第一次出击。”

十月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陷入了一个欣喜与苦恼相互交织的矛盾境地。欣喜的是，他上任军司令官以后，第一次指挥大规模作战就取得了重大战果：第十一军不但攻占了长沙，甚至攻到了株洲，连中国军队精锐的第七十四军也被他打得七零八落。苦恼的是，按照作战计划，第十一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必须迅速回撤至出发地。放弃付出巨大代价占领的长沙和株洲，这令阿南惟几心有不甘，但他知道大本营不会同意第十一军长期占领长沙，第十一军的兵力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可是，如果按照原路回撤，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作战——尾随上来的中国军队已经抵达长沙城外围。而就在这时，一个令阿南惟几的所有欣喜顿时烟消云散的消息传来了：在距长沙上千公里的湖北宜昌，据守在那里的第十三师团突然遭受中国第五战区部队的大规模围攻，局面已经岌岌可危。——一旦宜昌丢了，不但长沙作战会转瞬失色，他本人还很有可能受到大本营的严厉处分。所以，必须迅速带领部队返回，并且设法援救宜昌。

十月一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了返回命令：第四十师团先行，第三、第四和第六师团并列。其中，第四十师团和第六师团在右，经永安

市一麻峰咀一长乐街路线北返；第四师团在左，沿长沙一湘阴一线北返；第三师团居中。

鉴于阵前撤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为策应阿南惟几的第十一军北返，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强渡黄河的作战，以吸引和牵制平汉路南段的中国军队，避免这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加入追击围歼第十一军的作战。只是，日军华北方面军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们这次钳制性的出击作战，竟然一下子把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郑州攻占了。

中国的黄河，在抗战期间，是一条令中国人心绪复杂的河流。

当时驻扎在郑州两翼据守黄河河防的中国军队是：东侧从花园口、中牟、尉氏、扶沟、西华，一直延伸至商水周家口一线，为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的防地。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同时还兼任第十二军军长。第十二军的防区从黄河岸边的花园口起，弯弯曲曲地由北向南，足有两百公里之长。郑州的西侧是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两个集团军同属卫立煌的第一战区指挥。

沿黄河与中国军队对峙的日军主力，是华北方面军的第十二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

这一带久无战事，对峙双方也就是不断地派出侦察或情报人员。相安无事的日子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利用黄河封锁线走私。

由于中国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等物资，必须从黄河对岸的日军占领区运来，因此，来往于黄河两岸的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除了每天写一份“敌情和黄河水位与流速”的报告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利用工作便利来回捎带货物。黄河两岸物品的差价非常大，一来一往能赚不少钱，这让走私成为当地国民党军将领发财的一条捷径。——“军统局、指挥机关、游击队、战地服务队等等，都巧立名目，在河口设立办事处、联络处等，都以派人过河‘搜集情报’为名，实际上干走私行当。”走私活动给防区的军事带来很大隐患，作为驻守一线河防的孙桐萱部很是为难，既要防止日军情报人员混入，又要照顾上级和友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日军第十一军各师团开始从长沙北返，日军第三十五师团配备着骑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向郑州河防发动攻击。

日军主力的突击方向之一是中牟的黄泛区。

当日军派出小股部队向黄河边靠近的时候，河对岸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二师的前哨发现有人想偷渡黄河，立即报告。但是，从连长到营长都认为这是“奸民”在偷渡以便“走私贩货”。凌晨三时，日军突然增大兵力强渡，在火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分三路大举向南进攻。中国河防部队寡不敌众，伤亡惨重，黄河河防被日军突破。参与阵前登陆的日军军官的看法是：

由二日晨开始渡河到正午是第一期作战的最危险时期。如果在此期间，中国军乘我渡河中途，进行逆袭，其结果将不堪设想。因为炮兵分离不能支援，在广阔正面展开的第一线步兵部队，相互间也不能联系。

尽管孙桐萱立即部署防御，但天亮后，大批日军战机对郑州市区以及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实施了猛烈轰炸，日军步兵同时开始了一轮接一轮的地面进攻。四日，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日军所到之处的村庄，没有来得及撤离的村民也手持农具参加了战斗。孙桐萱赶到前沿，鼓励官兵发扬西北军的光荣与日军血拼到底。五日，中国守军和中国村民们与日军的对抗进入惨烈阶段，以致日军每攻占一个村庄，便对村民进行不分男女老幼的残忍杀戮。郑州附近是平原地带，日军机械化部队横冲直撞，中国守军武器低劣，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的推进。

很快，日军靠近了郑州。

孙桐萱决定放弃郑州。

在通知郑州的工厂、银行、机关等单位撤离后，第三集团军部队逐次撤退到郑州以南构筑工事。此时，战场附近突然出现了汤恩伯的部队。汤恩伯在孙桐萱部队的阵地附近布防，并声称丢了郑州的孙桐萱部如果再后撤，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汤恩伯还扣留了战区运送来的物资，甚至还扣留了押运弹药的第三集团军的军官。孙桐萱盛怒之下，命令部队去打欺人太甚的汤恩伯部，被部下劝阻后，他只有向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告状。可是，孙桐萱是西北军出身的杂牌军，哪里能与中央军嫡系部队讲道理？一肚子委屈的孙桐萱派人带上他的亲笔信去重庆，请教他的老上司冯玉祥该怎么办。冯玉祥给孙桐萱写了回信：“当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整饬部队，爱护民众，努力抗日。只要为抗日死，即使全军覆灭，第三集团军也能万古流芳。孙桐萱能战死抗日沙场，做一个抗日民族英雄，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无论如何，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仅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便占领了中原

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平汉铁路上的交通枢纽郑州，这足以说明中国军队的黄河河防形同虚设。

中国军队突然撤离郑州，普通百姓没有预料到。之前由于日机轰炸，城内的居民大多跑到城外躲避去了。在田野里躲藏了几天后，不回去就意味着饿死或冻死，听见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郑州的居民又往城里拥挤。他们与撤离的中国官兵擦肩而过。这些官兵炸毁了发电厂和营房，“他们随意抛弃武器和军服，偷窃老百姓的衣服、自行车、食品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星期六早上，郑州好像就是空城了”。这时候，日本的骑兵部队突然冲进了郑州。为防止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构筑街垒和碉堡。但是，从第二天起，沦陷的郑州坠入了恐怖的地狱。美国记者贝克当时在郑州城内，他看见完成街垒构筑的日军开始了有系统的抢劫：

为储藏碎铁、小麦、棉花、大麻以及走私来的日货，都建起了仓库。所有这些物资在收走之前都贴了封条。对中国强盗现在是一经发现，就开枪击毙。据说，日本人这下子从国家仓库里搞到了大批走私货。至于小麦，那就更多了，因为夏季从郑州附近的农民那里征收的公粮大都被放在了这里。美造的军用汽车，穿梭般地在黄河两岸往返，最后都把这些物资送到了开封……任何人想躲开日本人都会遭到枪杀……沦陷期间，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暴行一直接连不断，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和早期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行……为了构筑工事和运送抢劫来的东西，日本人征用了他们所能找到的人和民夫，而不管有无劳动力，都得整天干活，不给饭吃。当他们喊饿时，就给盐吃，用以取乐。如果他们听错了命令，就被杖责或用刺刀枪杀。其中，有些只是由于不懂日语，就被加重残害。试图逃跑的，就被活埋……我听说，有两个女孩为了逃避强奸就把周身弄脏，结果，她们被用刺刀枪杀了。

三十一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撤离了郑州。

负责善后的少量日军和汉奸们撤退时很从容：

十月二十九日，汉奸们讨价还价，把最后一批小麦以十二元一斗售光，就带着最漂亮的妓女回开封去了。翌日，大多数日本人也走了，方向是东北面的新桥梁，那里升起了缕缕烟云。据说，他们把搞到手的走私日本货都烧掉了，这是为了制造新的需求。十一月一日，这座城市如此平静，以致有些传教士就大胆进城，以便看看日军后卫如何撤离。这些日军顶多不过十多名，动作很从容，显得很有自信。他们将个人抢来

的东西装好卡车，就开走了。此后还不到一小时，难民们就涌进来了。警察没有出现。几个小时之内，又发生了更多的抢劫以及抢匪之间的打斗。一批人手持刀斧，涌向日本人用电线搭成的路障。没等任何权威人士到来，那些电线和电线杆就都被砍走，不见了，它们都被穷人用了或卖了。下午，有些国民党部队开进了城。大捷就这样完成了。

日军向黄河北岸返回时，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断袭击，一个名叫鲤登的日军少将被打死。起初，中国军队第八十一师的敢死队在一座寨子里遭遇日军并发生肉搏战，全歼寨内包括联队长小林大佐在内的百余名日军。在小林大佐的尸体上，中国官兵发现了文件和地图，得知这股日军的总指挥官是鲤登少将，其指挥所就设在黄河岸边的一座大庙里。中国官兵当即包围上去。攻击时，又接到日军飞机给鲤登空投下来的文件，文件上标明了掩护鲤登部队回撤的路线。中国官兵在这条路上设伏，猛烈袭击了鲤登和他的卫队。为了抢救鲤登，日军的数十门火炮向中国军队猛烈轰击，还空投了伞兵以加强鲤登的卫队，但鲤登少将还是被中国官兵击伤，最终因伤势严重而死亡。

就郑州作战而言，日军的最大收获是在黄河南岸平汉路西侧的霸王城附近建立起一个桥头堡阵地，由第二一九联队的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驻守。这一桥头堡阵地，为后来日军打通南北大动脉的攻势作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此时，在南面的湖北战场上，阿南惟几获悉了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从郑州撤退时遭到猛烈追击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阵前撤退的巨大危险。同时，宜昌方向的第十三师团的告急电报不断传来。阿南惟几这才意识到，最大的危险不仅是阵前撤退，还有当他贸然攻击长沙时把宜昌丢了。

日军第十一军进攻长沙期间，按照重庆军事委员会的电令，为配合第九战区作战，中国军队第三、第五和第六战区分别向当面日军发动了范围广泛的袭扰。

第三战区九月二十三日开始行动。担任鄱阳湖东岸、湖口至安徽境内长江南岸防御的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对当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所据守的长江沿岸主要据点发动了多次袭击；担任宣城以东、太湖以西苏皖边界地区防御的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向当面日军第十五师团的各个据点及重要交通线实施了攻击；担任钱塘江两岸至浙江东部沿海防御的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向当面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发动攻势，破

坏了嘉兴附近的铁路；担任福建沿海防御的刘建绪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对厦门岛和闽江口的日军发动袭击，一度攻占了南日岛；特别是在距离岳阳很近的南昌附近，刘广济的第一〇〇军在南昌周边对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各据点频繁发动进攻，前进到牛行、乐化和南昌近郊，夺取了楼前市、黄溪渡等要点。

第五战区主要以破坏铁路和公路为重点。从九月二十五日开始，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基地，在广济至武汉之间，向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和第四十师团一部防守的长江北岸据点以及日军第三师团一部防守的平汉路南段，发起了多次攻击；何柱国的第十五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在淮河南北地区向津浦路以南的日军据点发动攻势，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段、平汉铁路信阳南北段，日军防御的铁路线受到多处打击；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以桐柏山为基地，向平汉铁路花园至孝感之间以及应山、随县等地出击，一度攻入随县县城；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以大洪山为基地，向京山、钟祥附近的日军据点发动袭击，破坏了京钟公路。

第六战区行动最晚。

中国第六战区是在日军占领宜昌后的一九四〇年七月成立的，所辖部队有长江上游江防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六集团军等，共十个军二十七个师。战区当面日军是防守宜昌和当阳的第十三师团、防守当阳以东襄河以西的第三十九师团，还有掩护交通线的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等部队。日军第十一军发动长沙作战后，第十三师团奉命抽调出早渊支队前往参战，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也调往第四师团原驻地接防。因此，宜昌方向的日军兵力大大减少。第十一军开始长沙作战时，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五战区所辖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暂归第六战区指挥，蒋介石连续发出三道电令，督促第六战区趁机把宜昌夺回来，限定发动攻击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三日。

第六战区的攻击部署是：吴奇伟的长江上游江防军第二、第九十四军和第八军之第五师等七个师作为主力攻击宜昌；周磐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三十二、第七十五和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三十九军攻击当阳，负责切断汉宜公路，阻止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向宜昌增援；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进攻荆门，与第二十六集团军协同作战；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三、第七十三、第八十七军向鄂南的白螺矶、沙市和江陵进攻，切断汉京公路，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各部队开始攻击的时间为九月二十七和二十八日。

但是，直到九月三十日，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已全面强渡捞刀河，其先头部队早渊支队已接近长沙时，第六战区对宜昌的攻击才正式开始。

令人不解的是，一向以情报收集准确及时自居的日军，竟然完全没有获悉中国第六战区将进攻宜昌的情报。即使阿南惟几从宜昌方向调出部队参加长沙作战时，有消息说中国军队正向宜昌方向移动，日军的情报部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由此导致“第十一军从长沙返回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下的约十五个师，为夺回守备薄弱的宜昌蜂拥而来”。

宜昌被日军认为是直接威胁重庆的“最尖端的要冲”，也是轰炸重庆的最便捷的前沿基地，更是动摇中国抗战意志的一个前锋要点。日军知道，“当地居民自占领以来一年余，表面装作归顺，但其反面，一直从事于最前线的激烈的情报活动”。——中国统帅部从宜昌民众那里得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得知长沙作战开始后，日军从宜昌方向抽调出大量部队，宜昌周边和城里只剩下第十三师团的第六十五、第五十八、第一〇四联队。因此。中国方面认为：只要在荆门和当阳方向阻击住可能增援的日军，必定能将宜昌夺回来。

第六战区对宜昌的攻击虽然启动晚了，但行动坚决且果敢。宜昌外围兵力薄弱的日军据点立即陷入恐慌中。在北面龙泉铺地区凤凰观据点，日军第六十五联队正在举行宴会，祝贺第一大队大队长山本义雄少佐升任旅团副官和第二中队中队长高桥东太郎升任大队长。突然，中国官兵冲了过来，整个据点遭到毁灭性打击。在双莲寺地区仙人砦据点里的警备队几乎被全歼。在宜昌的东部和西部，日军在激战中纷纷溃退。宜昌西部地区是隔着长江俯瞰宜昌的重地，由日军第五十八联队和山炮一个大队防御，中国军队居然在这一方向集结起一百多门大炮，第九十四军的八十四个连在炮火的支援下猛扑过来，攻击的凶悍程度令日军心惊胆战：“以无声息的肉搏，连夜顽强持续攻击。其攻击极为壮烈，甚至将棉被盖在通电的铁丝网上进行冲入。拂晓后，正准备对冲入阵地的数十名敌兵加以捕捉时，刚一接近，他们就用手榴弹集体自杀。”

十月三日晚，中国军队对宜昌形成了包围态势。

日军第十三师团是组建于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时的老部队，曾强行登陆库页岛迫使俄国守军投降。但是，一九二五年日本大裁军时，该师团的番号被取消。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第十三师团才在仙台重新组建。新组建的部队在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的指挥下，被派

往中国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之后参加了津浦路作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是侵华日军的主力师团之一。一九三九年八月，荻洲立兵调任第六军司令官，师团长由田中静一中将继任，部队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枣宜会战。日军占领宜昌后，田中静一调任宪兵司令官，师团长由内山英太郎中将继任，部队驻守宜昌地区。

内山英太郎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个老资格的日军师团会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四日，他在部署宜昌最后防御时，发现外围据点已纷纷崩溃，中国军队正从四面八方涌来，而他的手上根本没有部队可以用来防守宜昌城。他组织起一支“宜昌防卫队”，防卫队的士兵都是由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各类后勤人员组成——“组成完毕后，检查了人员的军装。当时，内山师团长、秋永参谋长等问到，有无步枪实弹射击、刺枪等经验时，竟无一人具有这样的体验。师团长内山中将大为吃惊，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士兵还是东北（日本本州东北部地区）的健儿，所以尚抱一线希望。”更令内山英太郎心烦意乱的是，九月四日这天，由东京浅草来的一个演出慰问团抵达了宜昌。无法得知这个演出团是如何通过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进入宜昌城的。内山英太郎命令演员们去野战医院护理伤员，可演员们被伤员们的悲惨情景吓坏了，这个命令随即被迫取消。但是，“因情况紧张，对宜昌市内的警备，除当地的日侨、军乐队（第十一军派遣的）等外，就连这个慰问团的成员也都拿起了武器”。

十月七日，中国军队经过激战，逐渐向宜昌市区压缩，宜昌城内的日军濒临崩溃。那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宜昌防卫队”，在师团通信队长鸟居贞雄大尉的指挥下，虽然拼命射击，但阵地前的一百米却总是死角，因为所有人都“不能有效射击”。而鸟居贞雄本人“站在矮墙上”，其指挥方式是不停地比画，“据说在守军们看来就像恶神一样”。结果由于目标格外显眼，“该大尉不幸大腿受到贯通枪伤”。入夜，内山英太郎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求救电报：“敌总兵力为北正面九个师，西正面三个师，南正面两个师。敌的一部由我配备的空隙潜入，内外呼应，似在企图夺回宜昌。”然后，他给驻扎汉口的日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二郎少将写了一封亲笔信，告知第十二师团已经“抱定玉碎之决心”，“务乞”远藤三郎“前来宜昌”以交代“善后对策”。

远藤三郎接信后，“决心向敌炮击下的宜昌飞机场前进”。

八日晨，远藤三郎乘坐的轻型轰炸机在宜昌机场降落。他发现宜昌城内的危机远比想象的严重得多。内山英太郎对他说，第十三师团连伤员和后勤人员都上战场了，但愿在机场还能使用时哪怕空运来一个分队

的兵力也好。谈话间，“两将军的眼中闪烁着泪花”。

远藤三郎返回后，日军第三飞行团对包围宜昌的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开始紧急空运增援部队。八日一天，日军出动作战和运输机六十四架次，九日达到一百二十五架次。这天，当阳方向的日军第十九师团一部，突破中国军队阻击后急速西进，于下午二时三十分到达宜昌。

中国军队的攻击依旧十分顽强。距离第十三师团司令部仅千米的外围阵地东山寺度发可危，中国官兵的前赴后继、昼夜作战极大地挫伤了日军的士气：“在我阵地前，战死的重庆士兵的尸体，连长在前，军官继后，在地面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战死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十日）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

十日，阵亡的中国连长盼望的胜利之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绝望了，他作出四项决定：

一、烧毁步兵第一〇四联队军旗——军旗一旦送回，即安置于地下壕内，旁边准备一罐汽油。

二、烧毁机要、秘密文件。

三、决定师团长、幕僚、各部长的自尽位置，做好设备及烧掉尸体的准备。

四、致军司令部的最后文电的拟稿（秋永参谋长取得许可，将文电译成密码，放在衣服口袋内）。

师团参谋长秋永力专门指派副官酒井留四郎，在师团长、参谋长都自尽之后，设法携带电文突围出去，争取逃到长江对岸的第五十八联队那里，然后向大本营报告。

八日深夜，远藤三郎来到第十一军司令部，见到了刚从岳阳返回武汉的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恳切地报告了宜昌的困境”。当阿南惟几听到“第十三师团长及幕僚决心一死”时，断然命令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澄田赉四郎指挥江北所有兵力迅速推至宜昌地区，首先歼灭宜昌东侧的中国军队；并命令刚刚从长沙方向回撤的第三、第四师团紧急增援宜昌。

十月十日，“双十节”。

凌晨二时，中国军队对宜昌发动了最后的总攻。攻击受到突降大雨的严重影响。等待增援的日军宜昌守军拼死抵抗，第三飞行团不顾天气恶劣倾巢出动，极力遏制中国军队的攻势。天亮后，中国军队第二、第三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第十三师等攻击部队，在攻占了宜昌外围最后的几个坚固据点后，一股部队终于从东面突入宜昌城内。内山英太郎将他的师团司令部移到了战壕里。日军的战机疯狂地轰炸扫射，地面部队施放了大量毒气弹，中国突击部队因伤亡巨大又撤到了城外。第六战区紧急调整部署，准备再攻，但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已经靠近，最先冲进长沙城的早渊支队以连续作战的惊人速度返回，会合了宜昌以东的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三旅团向宜昌突击而来。

十日，大雨依旧。

为避免陷于被动，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

十一日，还是大雨。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抵达宜昌。

中国军队第六战区部队已经撤离。

日军增援部队给阿南惟几发出的电报是：“错过攻击时机，实感抱歉。”

宜昌作战结束了。

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但最终功亏一篑。

只是，日军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战争进行到此，已不是日军随意主宰战场的时候了。

正如阿南惟几担忧的那样，从长沙北返的日军沿途遭受了严重损失。在猛烈追击、侧击和堵截日军的严令下，中国军队对回撤的日军展开了多路攻击。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背对湘江，日军第四师团为打开回撤的通道，向该师据守的鹤羊山阵地猛攻，中国官兵誓死不退。连长余应勇阵亡后，继任的两位连长也相继牺牲。两军肉搏在一起，小山上血肉横飞，仗一直打到阵地上只剩下十五名中国士兵。十五名士兵在副

师长的带领下，与守湘阴的第九十九师取得了联系，迂回到日军第四师团的背后猛冲猛打，打死了日军第一一六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川崎进和第二大队大队长横泽三郎。五日，第四师团主力抵达汨罗江南岸，配属其指挥的早渊支队因紧急增援宜昌，由营田乘船急速北返。

湘阴城是日军回撤的必经之地，日军的军需物资以及伤员都要通过这里北运。守城官兵是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二九五团一营。基于日军轮番向湘阴城发动进攻，一营在营长曹克人的指挥下拼死血战。正是宜昌危急的时刻，为了尽快回撤增援宜昌，第十一军命令平野支队尽快攻下湘阴，打开北返的通道。日军投入了千人以上的兵力，并空投了伞兵对湘阴城形成合围。一营官兵四百余人抵挡日军达五天之久，血战到最后一刻全营伤亡殆尽，营长曹克人和另外十八名官兵因负伤被俘。为了泄愤，日军将他们残忍地凌迟处死。四日，荒木支队赶到，日军进占湘阴城。之后，平野支队与荒木支队一起经营田水路北返。

第六师团在捞刀河以北的福临铺遭遇中国军队阻击，五日傍晚抵达汨罗江北岸。第三师团在枫林港以北，遭遇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师主力以及第九十二师一部的阻击，双方的交战一度陷于胶着状态。第三师团全力突击，才得以摆脱第九十九师的纠缠。然而，第九十九师后退了，第九十二师主力又围上来了，炮火的轰击十分猛烈。由于第三师团被限期回撤，因此只有改变回撤路线，一面阻击中国军队的攻击，一面向右翼的第六师团靠拢。第四十师团十月一日夜开始回撤，在金井附近遭遇中国军队第二十军的攻击，师团拖带的一千二百名伤员被滞留在该地，师团主力不得不一边与中国军队作战，一边掩护兵站输送队转运伤员，直至七日晚才抵达汨罗江北岸。

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统计的数据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俘虏四千三百人；日军战死一千六百七十人，负伤五千一百八十四人。这个统计显然严重夸大了中国方面的损失，缩小了日军的伤亡。但从中国方面的相关史料看，参战各部队的损失接近百分之五十。

日军发动此次作战，显得盲目而轻率，作战期间差点把宜昌丢了便是例证。中国方面大力宣扬“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和民心，提高中国抗战的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可以理解。在这次会战中，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各战区都做了战略和战役协同，特别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进攻颇有声势。这种协同在以前的诸次会战中是很少见的，由此显示出中国军队在作战全局意识上的某种进步。

但是，第九战区的所谓“伯陵防线”，乃至“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此次作战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一直说日军第十一军处在第三、第五、第六和第九战区的包围中，亦即中国军队对日军第十一军始终呈现着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但是，从日军敢于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角度看，这种判断站不住脚，因为战略外线并不等于战役外线。当日军集中兵力，对准中国军队防线上的某一个局部发动大规模纵深突击时，中国军队的这个局部即刻便会陷于被动状态。而“诱敌深入”一说，在此次作战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只是第九战区的一厢情愿。第九战区设想中的日军突击到此的颓势，并没有出现；而中国军队主力也没有按照“诱敌深入”的原则保持在战场的两翼，他们大部分被放置在日军攻击的正面拼死阻挡，以致部队伤亡惨重。

再者，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相邻各战区虽然有协同，但由于投入的作战兵力不大，没有一处令日军感到疼痛，可以说，并没有充分发挥战略外线的作用。即使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攻击，也因为发动时间过晚，兵力不够集中，最终无功而返。设想一下：如果第五战区能够同时积极行动，切实切断汉宜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几天时间，克复宜昌也不是不可能的。而在日军对郑州的攻击中，中国军队最大的失误，是听任日军在黄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阵地，这将在一年后的战事中显现出对中国方面极其不利的后果。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作战检讨是：中国方面对敌情的判断过于主观；友军之间依旧彼此不信任，导致缺乏必要的协同；部队运动往往因迟缓而贻误战机。至于中国军队的素质低下和军纪涣散，虽然是老问题，但杨森的实话实说还是令人吃惊：

各级指挥官统率能力薄弱。敌突过新墙河南岸后，我各部官兵辄多因敌骑骤至，望风披靡，官长全失掌握，士兵四处溃散，纷纷到平江、浏阳，络绎不绝，甚至团长亦有只身后遁者。既不见官长收容，复不见自动集合、寻觅部队。本部曾令受训始回之张德能师长，多方截堵收容，奈以能截堵地方有限，收容者不过什一，但亦在千以上。其他地方可以想见。后闻此等溃兵，有到醴陵、攸县、衡阳者，以此概计，名为一军一师，其实作战未终伤亡者不过十分之一二，溃散逃亡者十分之五六，战场作战者亦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部队官长平时教育不良，约束之无方可以概见。奉行命令不彻底，甚至对所受任务取巧规避。各部常因战斗情势恶劣之际，对命令多取怀疑态度，毫无自信能力，不肯排除万难，尽最大努力，以致迟缓徘徊，系图一己苟安，不顾整个战局。例如，担任侧击及非敌主力方面之攻击部队，每以一个军或师辄为敌数

百人所抑留与牵制，不肯取断然手段歼灭或驱逐敌人，而保持对峙状态。甚至在此战局极度紧张时期，不肯拼命与友军协力，反抛弃任务，率部遁入深山，事前并不通知上级指挥部与邻接有关友军，而将有线无线通信停止，故意隔绝，致命令无法下达，事后见敌退去，始出而电询战况敌况者，大有人在。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成为全国舆论焦点的事件，是蒋介石下令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处决了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廖龄奇和他的副师长张灵甫同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两人都以能征善战闻名。特别是廖龄奇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在中国军队带兵打仗的师长中实不多见。但也许正因为才高过人，加上国民党军中复杂的派系，廖龄奇与陈诚、白崇禧、薛岳，甚至与军长王耀武，都存在着严重的隔阂。此次长沙作战，第七十四军因被薛岳放在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正面，全军陷入苦战，而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因战前请假去江西吉安结婚，顺便转道回老家湖南祁阳省亲去了。长沙丢失，自然要追究责任，薛岳提出了应该受到处分的将领名单，包括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和第十军军长李玉堂。蒋介石没有采纳薛岳的名单，因为他知道第三十七军和第十军在作战中还是卖力的。特别是，萧之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时，曾与薛岳分任第一、第二营营长，两人积下过旧怨，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而当薛岳提出廖龄奇时，立即得到了陈诚和白崇禧的支持。廖龄奇虽是黄埔出身，属蒋介石嫡系派别，且在以往的历次会战中无不是率部坚守战场，但这一次，蒋介石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赞同了薛岳的意见——蒋介石知道，所有的将领都在盯着他如何对待“临阵脱逃”的黄埔系。在幕僚们多方奔走说情未果的情况下，十月二十二日，廖龄奇被押解刑场执行了枪决。

执行者宪兵第十八团团长姚应龙的执行报告：

奉手令：“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着既枪决可也。并奉主任贺批‘奉谕交宪兵第十八团团长姚应龙立即执行具报’”。遵即于本（二十二）日午后二时三十分会同钧会警卫团第一营营长郑畴，在侍从室将该师长廖龄奇提出，验明正身，解赴南岳市蒋家垄执行枪决矣。该师长当写遗嘱三件：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其表弟托照应家庭及结算师部账目；一致其妻劝改嫁。此外并无他语。理合检同该师长遗留物品单一纸，抄呈遗嘱三件，暨执行情形，呈报鉴核。

贺，即重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

事实上，廖龄奇得知部队开往湘北战场后，曾从湖南祁阳乘车赶回，指挥部队阻击南渡汨罗江的日军，直到部队从汨罗江北岸撤退后，他安置好因伤亡严重亟待整理的部队，才又返回老家去了。

廖龄奇的被处决，引起了国内和军内舆论大哗，愤愤不平的第五十八师官兵差点哗变。

但是，这位年仅三十六岁的师长的命运，很快就被动荡的历史湮没了。

一九四一年，国际环境剧烈地动荡和变化着。

这种动荡和变化波及亚洲。

突然，一个令世界目瞪口呆的消息传来了。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日本海军突袭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此前，没人能够料到，这一爆发于大洋深处的战事，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将深刻地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第二十六章

我们总算赢了

太平洋海域腹地。

清晨，被湛蓝海水环绕的瓦胡岛曙光初照。

岛上的珍珠港内，停泊着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九十四艘各类战舰。

昨天晚上，这一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周末，战舰相继返港后，海军军官和水兵们都上岸开心去了。整个夜晚，瓦胡岛上的军官俱乐部、水兵酒吧以及电影院和咖啡馆灯火通明，欢愉的喧闹声直至凌晨时分才平息下来，瓦胡岛和它环抱的军港在海浪细碎的抚慰声中入睡了。

这是珍珠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周日的清晨。

那些昨晚没有喝醉的水兵起床了，一边懒散地洗漱刮脸，一边盘算着这天该到哪里去消磨明媚却无聊的时光。

突然，晨光中传来刺耳的马达声。、

东方天际，炫目的日光从云层的裂隙中倾泻而出。

但是，近在眼前的却是黑色的烟云。

接着，炸弹从天而降。

这一刻，是东京时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夏威夷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早晨七点五十五分。

此时，位于太平洋西海岸的中国大陆尚处在黎明前的暗色中。第二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中国正面战场上一片寂静，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广阔的地域内对峙着；在敌后战场，共产党抗日武装和支持他们的广大民众一起，坚守在牵制着日军的根据地里；在日本占领区内，中国百姓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解决吃饭问题，配给的面粉里谷糠等杂物越来越多，且配给的份额越来越少；而在中国的抗战中心重庆，虽然整个城市已被炸得满目疮痍，但城门上“拥护蒋委员长把抗战进行到底”的标语依

旧十分醒目。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发生在数千公里外的太平洋上的事件，将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日本海军以偷袭的方式重创了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

日本向美国开战了。

这正是爆发于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混战的时刻。

德军正在一路狂飙冲向整个欧洲。

四月，德国和意大利集结了八十多个师、两千多辆坦克和两千多架作战飞机，发动了针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巴尔干战争。四月五日夜，德意两国战机对南斯拉夫所有机场和首都贝尔格莱德实施了猛烈轰炸，德军第十二集团军从三个地段越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边境，在坦克集群的支持下向纵深实施迅猛的向心突击。只有二十八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三十二个独立团以及一百一十辆坦克和四百一十六架陈旧战机的南斯拉夫军队根本无法抵抗。三天之内，德军的坦克部队突进二百多公里，十三日攻占贝尔格莱德，十五日南斯拉夫军队无条件投降。

五月，德军出动空降第七师、山地步兵第五师以及若干独立部队，在两个军的航空兵和七十多艘海军舰船的支持下，攻击由英军和希腊军队防守的地中海东侧门户克里特岛。岛上只有六辆坦克，没有作战飞机，还有三万人的英军和一万四千人的希腊部队。德军伞兵在航空兵密集轰炸后实施空降，但遭到岛上守军的顽强抵抗。德军用飞机和滑翔机把山地步兵第五师空投下来，彻底扭转了战局，英军在防守崩溃后撤往埃及。此战，德军损失四千余人和两百多架战机；英军伤亡近一万五千人，海军损失了一艘航母、三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七艘雷击舰；而希腊军队伤亡与被俘一万人以上。德国控制了地中海东部航线，英国丧失了地中海内的重要战略据点。

入侵苏联的规模庞大的德军自西向东挺进，目标是莫斯科。六月，德军第一坦克集群与苏军西南方面军的机械化军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这种战争样式，与中国军队以刺刀、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为主要武器的作战相比，仿佛不是在一个星球上。交战双方数千辆坦克猛烈地撞击在一起，苏联广袤无垠的大平原顿时变成骇人的“炼钢工地”：烈焰冲腾，钢铁熔化，人为蝼蚁。二十六日，苏军机械化第九、第十九、第八、第十五军抵达战场，向德军第一坦克集群的两翼发动突

击，两军你退我进你进我退，拉锯战持续数天之久。尽管苏军没能彻底击退德军，但严重迟滞了德军的推进速度。在制造了一望无际的钢铁废墟后，双方僵持在斯特尔河与戈伦河之间的罗夫诺、杜布诺地区。七月，德军的坦克集群突破了苏军防线，以两昼夜推进一百一十公里的速度，抵近基辅以西二十公里处，长达一个多月的基辅战役开始了。苏军的五个集团军围绕着基辅与德军苦苦鏖战到九月，德军在基辅以南强渡第聂伯河，坦克第一集群和第二集群在苏拉河西岸的洛赫维察地区会合，苏军西南方面军陷入重围。苏军被迫放弃基辅，重围中的六十六万人被歼。苏军退守第聂伯河地域后，黑海沿岸的敖德萨成为后方堡垒。苏军的黑海舰队和独立步兵部队顽强固守，而德军必须切断苏军的黑海运输通道，双方在激烈的争夺中不断地向敖德萨增援，直到苏军南方面军作战区域出现危机，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向顿巴斯突击时，苏联最高统帅部才决定放弃敖德萨。在德军的疯狂进攻和狂轰滥炸中，黑海舰队不但撤出了全部部队，还撤出了一万五千居民、五百门火炮、一千多辆汽车、一百六十三辆拖拉机以及近三万吨的各类物资。在这座城市的边缘，最后阻击德军的是苏联游击队队员，他们宁死不退，直到身后的敖德萨成为一座空城。

德军逼近了莫斯科。

希特勒认为，占领莫斯科具有全局性的军事意义和历史意义。为此，德国统帅部策划了代号“台风”的大规模进攻计划：以坦克集团军群实施强大突击，从北面和南面包围莫斯科。德军拟动用的兵力为：步兵一百八十万人、坦克一千七百辆、火炮一万四千门以及战机一千三百九十架。为了保卫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依托有利地形，建立纵深梯形配置阵地，尽可能地消灭德军的有生力量，为组织大规模反击争取时间。在这个方向上，苏军部署了一百二十五万步兵、九百九十辆坦克、七千六百门火炮和六百七十七架战机。九月三十日，德军开始了全线大规模进攻，一周之内便突破了苏军的第一道防线，苏军的两个方面军陷入合围，被围部队坚持作战至损失殆尽。此时，沿着莫斯科河一直到南面的卡卢加，二百三十多公里的莫斯科外围防线上，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只剩下不足十万人。苏联最高统帅部将西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合编，任命朱可夫为新编西方面军司令员。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发动了一系列防御和攻势作战。十一月七日，在德军重兵进逼莫斯科的形势下，苏军在红场举行了隆重阅兵式，斯大林号召苏联人民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莫斯科。受阅的苏军官兵直接从红场开赴前沿作战。德军的前锋距离莫斯科只剩下三十公里，德国各报已经预

留了版面，准备刊登德军占领莫斯科的消息。但是，一个口号响彻莫斯科周围前沿阵地的上空：苏联国土虽大，但已无处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

同样在与德国人苦战的还有英国人。

五月，德国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率队进入北大西洋，英国派出最大的战列舰“胡德”号和新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率队前往迎战。五月二十二日，两支舰队交火，“威尔士亲王”号中弹，“胡德”号被击沉。英国海军当即再派“英王乔治五世”号、“却敌”号战列舰和“胜利”号航空母舰率队参战，仍未击溃德国海军舰队。顽强的英国海军又派出了“声威”号战列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以及“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组成的舰队。终于，英国海军成功拦截了“俾斯麦”号。二十七日，当时世界上装甲最厚、样式最新、威力最大的“俾斯麦”号战列舰，被难以计数的鱼雷击中沉没。英国空军与德国空军在海峡上空的格斗也同时进行着。尽管英伦本土遭受到持续不断、疯狂至极的轰炸，但英国人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与坚强。英国首相丘吉尔站在德军轰炸后的伦敦废墟中，只向英国民众重复着一句话：只要英伦三岛不沉没，英国就不会屈服！但是，英国是一个岛国，它没有巨大的国土可供战略周旋。一旦英国空军和海军在与德军的血拼中消耗殆尽，德军的步兵和坦克冲上英国本土之时，就是整个英国沦陷之日。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全世界没有比英国更盼望它可靠的盟友美国参战的了，尽管美国在物质上已倾尽全力支持英国。

英国人对美国人感到既恼怒又无奈。

丘吉尔甚至万般无奈地设想过，如果还有一个办法让美国卷入战争，那就是德国或者日本直接攻击了美国本土。但是，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说：“德国不希望与美国打仗，也不想刺激美国。”

八月，英美之间签订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

《大西洋宪章》的签订是丘吉尔焦虑之后的精心策划。

德军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的判断是：希特勒打垮苏联后，欧洲大陆尽收囊中，德军就将转而进攻英伦三岛。换句话说，如果苏联垮了，英国也就完了。而只要斯大林坚持作战，就等于在为英国赢得准备战争的时间。所以，德军入侵苏联的当晚，丘吉尔即在广播演说中宣布，英国将给予苏联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意识到，当希

特勒征服了欧洲后，法西斯德国绝不会就此止步，下一个危险之地难保不是美洲。促使希特勒灭亡，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罗斯福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宣布向苏联提供援助。

希特勒使原本对立的苏联与英美成为同盟。

此时此刻，从地理上看，这个星球除了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外，亚洲、欧洲、非洲、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都已卷入了战争。那么，必须有一个国际组织出现以联合所有的反法西斯国家。在这种渴求的促使下，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至十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停泊于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附近阿根夏湾的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进行了会谈。会谈涉及三个核心问题：如何制止日本在太平洋发动新的进攻、如何援助依旧与德军苦战的苏联，以及是否有必要发表一个联合宣言。在对苏联的援助上，英美之间没有分歧，为了“让俄国保持一条活跃的战线”，两国都表示将全力支持斯大林。但是在对日本的态度上，丘吉尔希望坚决遏制日本，罗斯福只同意对日本发出警告。最后，英美两国签订了《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这个通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最终文本涉及的竟然是世界秩序问题，甚至是“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后”的世界秩序问题——战争才刚刚开始，便规定战后秩序，其前瞻性令人惊愕，或许只有充当“世界领导人”的感觉最为良好的英美两国才能如此。《大西洋宪章》规定：两国不谋求领土扩张；反对未经有关民族同意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在尊重现有义务的同时，使一切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贸易和获得原料；促进一切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摧毁纳粹暴政后，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居乐业；放弃使用武力，实行裁军；在“建立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前”，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等。

《大西洋宪章》立即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加入，英美苏三国为此秘密签订了协议，这标志着国际性的反法西斯联盟初步形成。《大西洋宪章》也得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拜见美国国务卿赫尔，表达了中国政府赞同《宪章》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人也认为，《宪章》表明了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但是，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认为《宪章》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它没有明确涉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问题。——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已有四年，世界仍没认识到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息息相关。英美只是警告日本，如果继续向南扩张，就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大西洋宪章》签订后，丘吉尔依然忧心忡忡：没人知道斯大林是否能够守住莫斯科，苏联与英国都已危在旦夕，如何才能让置身战火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国参战呢？

从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月七日这一个星期内，太平洋上是一种不堪忍受的寂静。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决定了他的行动，但是他将向何处进攻，我们却还不知道。我们为日本打算：最好是只进攻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而不惊动美国。那时候，英国与荷兰非向日本宣战不可，美国却不必对日宣战。英国添加了一个对日战争，在远东方面，自认无法招架日本，却仍然不能获得美国的参战，这难道不是日本的上策？美国如果不直接被日本攻击，美国国会是否愿意参战，大有问题。几个月前，美国延长强迫兵役法，国会下议院，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这个间不能容发的关头，令人咋舌！假若这个法案不以一票多数通过，美国岂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很猛烈的时候，却要解散他的陆军？在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月七日这一个星期内，英国所最恐惧的，也就是这一点。

历史已处于被丘吉尔形容为“间不能容发”的危急时刻。

丘吉尔甚至要为大洋彼岸的国会表决提心吊胆。

但是，十二月七日，在丘吉尔“最恐惧”的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日本既没有攻击英属马来亚，也没有向南冲进荷属东印度，而是偷袭了太平洋上瓦胡岛上的珍珠港。

太平洋腹地的瓦胡岛不是美国领土吗？

岛上的珍珠港不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吗？

难道美国领土夏威夷也在日本人划定的“大东亚共荣圈”里？

美国不想卷入战争。

美国人不认为他们有理由卷入战争。

或许正如丘吉尔所说，美国人的判断是：如果日本南下太平洋，只会对别人的殖民地下手，日本人还没有胆量招惹美国。只是，如果据此认为美国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没有警惕，也有失公允。

日美之间的谈判旷日持久。

日本人与美国谈判的动机，依旧出自复杂的矛盾心理：既要攫取太平洋上的利益，又要避免在太平洋与美国交战。——“就眼前的现实问题来说，我国也迫不得已必须选择在大东亚圈内走自给自足的道路。对君临西半球，进而向大西洋、太平洋扩张的美国来说，上述日本的理想和欲望能说是没有道理吗？难道允许日本做这种程度的事情都不可以吗？”

四月十六日，日美低级别会谈代表共同拟定了《日美谅解方案》。方案认为，两国都不愿意看到关系恶化的局面，且都认为长期谈判而没有结果有害无益。两国彼此承认是关系对等的太平洋强国，应互相保持各自传统的国家观念以及作为国家生活基础的道义准则。关于正在进行的欧战，日本政府认为，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防御性的，日本和德国的结盟只限于德国受到攻击时才会履行；而美国政府申明，对于欧洲战争，不会为攻击性的同盟所左右，决定的依据只能是保卫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关于中国问题，日本方面提出，美国须承认蒋、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基本条件，日本方面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再与中国达成协议，然后从中国领土上撤军。美国重申了四项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维护通商机会均等的原则，不得扰乱太平洋地区现状。毫无疑问，太平洋问题，是日美两国此刻最为关注的，也是彼此最需要提防明枪暗箭的。然而，《日美谅解方案》中竟然拟就了这样的条款：“日美两国为维持太平洋和平起见，彼此不得部署威胁对方的海军兵力和航空兵力”；“日美两国政府不容许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割让或合并现有的国家”。

尽管《日美谅解方案》不是正式的外交文档，却依旧让日本的政客们“高兴得不得了”。日本人认为，只要美国承认日方的基本条件，就能暂时避免日美之间发生冲突。“今日我们国力的消耗很大，亟需迅速解决事变，以便恢复并培养国力。虽有一部分人主张南进，但统帅部现在既无此准备也没有信心。所以就培养国力来说，实有暂时与美国提携，充实物资，以图将来之需要。”——日本人的思路是：由于被中国战场拖累得国力和军力消耗太大，必须暂时与美国合作，设法利用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影响，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只要能从中国战争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养精蓄锐、扩大军备、培养战力，到时候再与美国翻脸去争夺太平洋利益为时不晚。

但是，日美会谈始终未能上升级别，因此也就无法获得正式的外交

成果。

日本人逐渐感到，美国人似乎也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备战。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美国人明显倾向于中国的抗日力量——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了对中国的援助计划，通过《租借法案》不但向重庆提供贷款、汽车、飞机等，还向中国派出了志愿航空队和军官顾问团。更有甚者，就在日美拟定《谅解方案》的同一时间，中、美、英、荷四国的军事人员在新加坡召开参谋会议，决定一旦日军进入南太平洋，将联合对日采取“对抗手段”，并建议在中国部署美国空军以直接威胁日本本土。——尽管四国参谋会议的建议尚未得到美国政府的首肯，但着实让日本人吓出一身冷汗。

六月二十四日，日本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其方针是：

一、无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确立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方针。

二、帝国仍坚持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继续向南方扩张；另外，根据形势的演变解决北方问题。

三、为达上述目的，帝国决心排除一切障碍。

日本人为这一国策拟定的要领包括：

“为促使蒋政权早日屈服，进一步从南方各地加强压力”；

为保证帝国的“自存自卫”，“加强向南方的扩张态势”，为达此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

“如苏德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根据既定方针极力防止美国参战”，万一美国参战，帝国“行使武力的实际和方法，应自主地决定之”；

“迅速向彻底加强国内战时体制过渡，尤其努力加强国土防御”。

七月，罗斯福的远东事务助理柯里访问中国后，向总统提出了一系列支持中国的建议，包括为恢复中国的空军力量，向中国提供五百架战

机并配备技术人员。柯里的理由是：“中国人正在勇敢地对抗日军，问题只在于没有足够的武器把日本军扔进海里。”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也对总统说：“让中国牵制住日本，美国才好有更多的时间武装起来，当然合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很快批准了援助中国计划。为了简化程序和渠道，更好地“综理对华租借法案作业”，总统甚至让他的老舅舅德拉诺以及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联合挂名董事长，登记了一家由美国财政部出资的“国防供应公司”——这家公司从没在“正常的有竞争的市场营运，它唯一的客户就是中国政府”。

更令日本人心惊的是，皖南事变后，美国不断向重庆方面施加压力，特别是何应钦于七月五日到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共产党中枢所在地陕甘宁地区进行武力进攻后，美国人提醒蒋介石，美国援助中国的目的是打击日本，因此不会漠视运往中国的武器被用来助长内战。如果国共不能实现具体的军事合作，将严重影响美国的援华政策。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中止对陕甘宁边区的攻击。总之，决不能因为美国人的不放心，导致国民政府最大的外援中断。

美国是世界上反共的核心国家。此刻，他之所以制止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进攻，原因只有一个：中国人必须一致抗日，在美国的援助下，将日军主力死死拖在中国战场上。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或军事纷争，只要会导致抗日力量削弱，统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极其友好。美国人始终认为，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上，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的国民党坚定得多也坚强得多——无论是汪精卫的伪政权，还是助纣为虐的伪军，都是从国民党阵营中分裂出去的，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民众，顽强作战，纪律如铁，意志如钢。

美国人从来极其推崇实用主义。

日本人觉得他们上了美国的当。

日本人得到的情报显示，美国国务卿赫尔的立场是：“鉴于日美两国的政策背道而驰，日美谈判从开始的那天起，圆满达成协议连百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而美国“之所以答应举行谈判，只是打算为了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尽最大努力，同时也是为了赢得美国军事当局所需要的进行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在谈判中，美国始终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而美国的真实愿望是日军被牢牢地钉在中国战场上。美国人知

道，这一条日本人肯定不会答应。日本人既不能答应撤军，又渴望与美国达成协定，只好持续不断地谈了又谈，美国人以此作为与日本不断周旋的巧妙策略。果然，当日本内阁的政客提出，实在迫不得已时，为让美国影响蒋介石政权妥协，为保证日军集中兵力顺利南进，或许可以答应撤军的条件。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听闻勃然大怒，说出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真心话：

撤兵是个要害。关于撤兵问题，陆军极为重视。如果应允美国主张，则中国事变的成果将完全丧尽，进而危及满洲国的存在，并动摇对朝鲜的统治。帝国圣战的目的并非吞并、无赔偿。自中国事变以来，我死亡数十万人（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即大东亚战争开始时，因中国事变陆军战死约十八万四千人），遗族更数倍于此，而且负伤数十万人，更有几百万军队及一亿的国民在战场及后方含辛茹苦，另外所费国币已达数百亿。当然与其这样，不如模仿各国先例要求割让领土。然而帝国以宽容态度，理所当然地以驻兵来保持事变的成果，不必对世界有什么顾虑，不必服从美国的巧妙压迫。如果对于巩固华北蒙疆的态势，稍存客气之念，则将危及满洲建设的基础，贻将来祸患无穷，更将再引起战争。绝对不能答应再回复到满洲事变以前的小日本。

接着，美国人就得到了日军突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消息。

美国人立刻宣布了一系列制裁日本的手段，包括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以及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同日，美国宣布在菲律宾成立远东军区，任命麦克阿瑟中将为司令。

对于资源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全面禁运是致命的打击。

罗斯福总统非常清楚，一旦切断了日本的石油进口，美日之间距离战争也就不远了。他在华盛顿的讲演中说：

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南方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他们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所需要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

日军突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重要目的是取得国内奇缺的资源。美国一宣布对日本实行禁运，法属印度支那国家立即响应。之前，日本每年从那里进口九百万石以上的大米，以维持国内需求的最低限度。当法

属印度支那国家宣布将出口日本的大米减少一半，然后又宣布在减少一半的基础上再减少一半时，日本人认为，这种不合作态度是由美、英、法以及当地华侨策动的。同时，日本人用美元购买一万五千吨橡胶以及锡、锰等战略物资的合同，也面临着被法属印度支那国家废止的危险。而冻结日本的海外资产，就等于全面断绝了日本与世界的经济往来，日本与日元集团以外的所有贸易都将戛然而止。最为严重的是石油，石油对于正在进行战争的日本绝对不可或缺，美国的石油禁运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恐慌。自一九一八年以来，日本花费二十多年的努力，主要通过海外掠夺的手段，好不容易储存了约六百万吨的石油，但这点储备不要说支持长期战争，仅日军待命一天就要消耗一万两千吨石油，而日本本土的石油产量不足此数的十分之一。那么，如果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断绝石油进口的前提下，用不了两年的时间，日本目前的石油储备就将点滴无存。届时，海军所有的舰船、空军的所有战机以及陆军所有的战车和坦克，都将是一堆废铁。——“所谓一天天穷下去的局面是在所难免的，对日本来说，断绝经济来往的确比行使武力更为痛苦。”苦不堪言的日本人转而开始了与荷属东印度的经济谈判，“就战略物资对日出口份额问题反复进行交涉”。可是，荷属东印度也响应美国人的立场，坚持将出口日本的石油、橡胶、锡等物资“限定在日本的实际需要量以下”，甚至还要参考日本已从法属印度支那获得的数量“来酌减自己的出口量”。日本人很是愤懑，认为荷属东印度也“充当了美英对日经济战略的帮凶”。

日本人面前只剩下一条路了：不但要维持对中国的占领，还要不顾一切地挺进东南亚，夺取那里的石油、橡胶、锡和大米，直到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使日本人构想的“大东亚共荣圈”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

日本人认为，横在他们面前的对手只有一个：美国。

所以，必须在开战之初，用突然袭击的手段，给予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打击，要使它两年之内无法在太平洋上有任何举动。那时候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建立起来了，日本人在资源问题上就无需再看美国人的脸色了。

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样做，即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

此前，日本不断谋求不与美国发生冲突，而美国针对日本提出的谈判建议，提出了他们十分强硬的反建议：满洲应该归还中国，无条件从中国撤军，中国必须享有无差别待遇，日美贸易须固定在事变前的额度

上。美国人明明知道日本无法接受，可就是照着日本人的痛处来。对此，松冈洋右的形容是：蛮不讲理，骇人听闻，自日本有外交以来“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美国人的“蛮不讲理”令松同洋右体会深切。他认为，如果日本没有做好对英美同时开战的准备，就不能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如果硬要南进法属印度支那，就一定会导致与英美发生不可收拾的冲突。

然而，七月十六日夜，首相近卫文麿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令松冈洋右下台了。一天后，在近卫文麿重新组阁的政府中，出任外相的是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

九月，经过政界和军界的反复磋商，日本制订出如下决策：“帝国为了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十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依此，日本向美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谈判条件：“美英不得干涉或妨害帝国处理中国事变”；“封闭滇缅公路，不得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援助蒋政权”；“美英在远东不得采取威胁帝国国防的行为”；“恢复同帝国的通商，并自西南太平洋的两国领土供应帝国生存上所必需的物资”；“对帝国同泰国和荷属东印度之间的经济合作须予以友好的协助”等等。

日本人知道这些条件美国人绝不会答应。

日美之间似乎只剩下战争这一条路了。

日本军方建议开战的理由是：“帝国目前已处在石油和其他重要军需资材日趋枯竭以至国防力量逐渐减弱的状况。如果这种现状继续下去，经过若干时间，难免要减低国家的活动能力，终将陷于瘫痪困境。与此同时，英美和其他国家在远东的军事设施和要地的防卫，以及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备却在极其迅速地增强，到明年下半年就将面临美国军备有了极大的进展而难以对付的局面。因此，现在无所作为，拖延时日，对于目前的帝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如果对方不承认帝国自存自卫上最起码的要求，以致战争终于不可避免，那么帝国就必须采取死里求生的办法，先妥善地做好准备，不失时机地下定决心，以毅然决然的态度走向积极作战。”

九月五日，日本天皇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君臣开始了这样的对话：

天皇：日美开战，陆军能在多少时期内结束战争？

杉山：仅南洋方面，预定三个月内结束。

天皇：当中国事变发生之时，你以陆军大臣身份，曾说过在一个月内结束事变，可是现在已过了四年，仍然未获解决。

杉山：中国内地广大，以致未能按预定获得结束，实不胜惶恐之至。

天皇：中国内地广大，早该知道。因为广大而四年未获解决，那么太平洋岂不比中国更为广大？不知有何根据，相信在三个月内可以结束？

永野修身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日本现状，如同需要开刀手术的.病人，如不开刀，即将衰弱下去，终至死亡；如实施手术，虽有危险，也许有救。统帅部希望外交成功，但不能成功，则必须断然实施手术。”

十月，中国战场上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已接近尾声，日美谈判也临近了日本军方限定的最后期限。首相近卫文麿不想让谈判失败，向军方再次提出，可否应允美国人的条件从中国撤兵？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军方立场强硬，决不让步，最终导致近卫文麿辞职。出于必须能够控制势力强大的陆军部的考虑，天皇下达敕令由东条英机出任首相并负责组阁。东条英机随即提出了三个方案供阁僚和军方思考：一是向美国妥协，极力避免战争；二是决心开战，且在政略和战略上立即实施；三是外交和战争准备同时进行。日本人思考之后的结论是：外交可以继续进行，开战已经不可避免，时间预定在十二月初。

一旦日美开战，中国战场将会怎样？

东条英机对历史走向的判断是：

一、日本对美、英、荷开战后，将使蒋介石愈益坚决地依靠美、英、中、荷联合阵线，以进行长期抗战的决心。一开始即将激扬其抗战意志，促使其与美英等国的合作越发巩固，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至少要延迟到整个战争完结之时，才能实现日华全面和平。

二、上海、香港等援蒋据点将丧失，随着帝国向南发展，滇缅援蒋路线将被切断；由于我方保持南方作战的成果，南洋华侨对蒋的援助将

中断。这些将促使其财政经济紧迫，实际抗战力量逐渐降低。随着战力的递减，一般民众固不待言，即使重庆政权的主流，其继续抗战的意志也将受到重大影响。骑墙的将领将投降到南京方面，其数量将逐渐增多，最终将造成重庆方面统一战线的分裂，蒋政权更加衰弱。

十一月五日，在御前会议上，日本人制订出与美国摊牌的最后条件：一、必须坚持在中国驻军；二、维持日本在东南亚的权益。为了给美国施压，日本众议院发表了一个充满日式狂妄的声明，可以视为对美国的最后通牒：

日本与中国大规模作战已四年。而中国之能继续抗战，实由以美国为中心之敌性国家群的支持。美英等国，不仅利用中国妨害日本圣战；且干涉泰国内政，压迫缅甸及荷属东印度拒绝供应必要物资。更不当强化新加坡、关岛、菲律宾及夏威夷等地的防备，而做无益的威胁，以致#造成一触即发的危机。

日本欲藉民族自给自足，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以谋贡献于世界和平的正当主张，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竟敢加以妨害。吾人并非好战，尤其不愿与美、英作战。倘有谈判余地，必将尽其最大努力。至若蹂躏我正义；威胁我独立；拦阻我进路；且更向我侮辱，迫我屈服，则吾人的正义感，吾人的爱国心，绝对不能容许！吾等国民均认为若不继续战争，则惟有自取灭亡！吾人将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以求战胜……须知我所畏惧者，亦即对方所畏惧。一旦发生战争，人民的伤亡、物资的消耗，不仅我方而已。

日本人的声明被刊登在美国的报刊上。

美国舆论大哗。

面对日本的强硬，美国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提出了著名的“赫尔照会”。美国国务卿赫尔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了基于之前日美双方所提建议的新的调节方案，即“赫尔照会”。方案共列十项条款，其中最为重要的四条是：

一、日本政府自中华民国及法属安南，撤退一切陆、海、空军兵力及警察。

二、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除对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不得对中国其他任何政府或政权，作军事、政治及经济的支

持。

三、美日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的外国租界与居留地及其他有关的各种权益，包括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事件议定书所载各种权利，如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等，均须放弃。

四、美日两国政府，关于任何一方国与第三国缔结的任何协议，均同意该国不得作与本协议的根本目的，即太平洋地区全般和平的确定及保持，有矛盾的解释。

美国提出的每一条，都让日本人感到彻骨的疼痛。

无论哪一条付诸实施，都意味着日本要放弃所有的“扩张成果”。

日美谈判不可避免地彻底破裂了。

日军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唯有开战而已”。

此时，日军已为南进太平洋编成南方军，总司令官为寺内寿一大将。南方军下辖：

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下辖第十六、第四十八师团以及第六十五旅团，在菲律宾方面作战；

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下辖第三十三师团和第五十五师团（缺一部），在泰国和缅甸方面作战；

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下辖第二师团和第五十六混成步兵旅团，在荷属东印度方面作战；

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下辖近卫师团以及第五、第十八师团，在马来方面作战；

直属部队：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第四独立混成联队，以及第三、第五飞行集团和第二十一独立飞行队。

南海支队，以第五十五步兵团为骨干，支队长堀井富太郎少将，在关岛、俾斯麦群岛等地区作战。

接替西尾寿造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上将，接到日本即将对美国开战的消息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他认为：“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是日本人不得不承认的严酷现实。为此，畑俊六向大本营建议：如果从中国抽调兵力去太平洋打仗，派遣军就要从华中、华南，至少从武汉地区撤退。在确保华北和华中三角洲的局面下，重庆政府压力减小，或许会愿意进行对话。尽管畑俊六强调他的建议关系到“日本民族的生存问题”，但是东京似乎认为他的意见“不足挂齿”。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时，御前会议在日本皇宫东面的一个房间里召开。

东条英机首先阐述了日本不能接受美国开列的条件以及必须开战的理由：“如果帝国屈服于美国压力，将不仅丧失帝国的威信，不能完成结束中国事变的使命，而且结果势将使帝国的生存和独立也陷入危险境地。因此，十分明显，依靠外交手段已经完全不能贯彻帝国的主张。另一方面，美英荷中等国愈发加强其对我国的经济、军事压迫，无论从我国国力的角度讲，还是从作战的重点来看，都绝不能允许这种状态继续发展下去。尤其作战方面的要求，更不允许再拖延时间。事已至此，为了打开目前危局，以求生存和独立，帝国已到了不得不对美英荷开战的地步了。”

接着，枢密院议长阐述了议员们的立场，表示日美谈判已进行七个月，其间日本对美国再三让步。然而，美国从始至终高谈“理想主义的陈词滥调”，对日本的态度可谓“唯我独尊，冥顽无礼”，已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程度：

如果忍辱屈从，则不仅会葬送日清、日俄两战役的成果，而且也不得不放弃满洲事变的成果。是可忍，孰不可忍！让整整克服了四年多的中国事变的苦难的国民再去忍受更大的苦难，实在于心不忍。然而很明显，目前帝国的生存已经受到威胁，明治天皇的勋业也将完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再想办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我认为，遵照先前御前会议的决定而开战也是迫不得已的……

“就这样，天皇终于作出了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大本营陆海军立即请求皇上批准发布开始进攻的命令，开战的第一天是十二月八日。”

日本敢于向美国开战，是衡量过力量对比的。

开战前夕，日美两国军力，综合地看，大致相当。

陆军：日本拥有训练良好的兵员约二百四十万，完成预备训练的后备兵员约三百万；美国拥有兵员约一百五十万，但其中的一百万尚未完成训练。

空军：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兵共有各类作战飞机七千五百架，储备作战飞行员六千人，每年还可以新训二千七百五十人；美国陆军和海军用于海上作战的飞机约五千五百架，其中的二千六百架可用于对日正面作战。但是，一旦开战，美国的飞机制造能力和速度至少是日本的十倍以上，随着战争的进程，美军空军力量将会迅速压倒日本占据绝对优势。

海军：日本海军拥有军舰二百三十五艘，总吨位约九十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三吨，其中航空母舰十艘；美国拥有军舰三百四十五艘，总吨位一百三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六吨，其中航空母舰八艘。虽然美国的航母比日本少两艘，但其每一艘的吨位都比日本大。同时，美国的军舰制造能力比日本大三倍至五倍，仅一九四一年底美国正在建造和计划建造的军舰总吨位就达一百九十万吨。另外，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各类民用商船都可征召参战，这一数字会大得惊人。因此，如果日本不能在短时间内用非常手段击垮美国海军，只要美国能够稳住阵脚，其海军力量也势必在随后的战争进程中占据压倒性优势。

至少在工业能力和综合国力上日本没法与美国相比。

战争武器是要用钢铁支撑的，美国每年的钢铁产能是日本的十二倍以上，汽车产能是日本的一百零五倍。

至于支持战争的其它物资，日本人如同强盗动手前一样，仔细开列了他们将从东南亚抢夺的物资清单：

大米：战争初期可能从东南亚掠夺的大米会减少，国内考虑用大豆、杂粮和甘薯为替代品；一旦战争告一段落，就可以从东南亚将大量的大米输入日本。

石油：战争第一年，特别是占领荷属东印度后，每月可以掠夺三十

万千升；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每月得到的石油可达四百五十千升以上。

战略贵金属镍，每月可得六千吨；

用于耐磨合金的锡，每月可得一千二百吨；

铝原料铁矾土，每月可得一万七千吨；

橡胶，每月可得一万七千吨；

酒精生产的原料糖浆，每月可得五千吨；

机械润滑油生产原料棕榈油和椰子油，每月可得一万三千吨；

工业用盐，每月可得七千吨。

美国不是对日本实行运吗？

日本可以用武力得到。

在太平洋上，美国海军主力是太平洋舰队，共有战列舰九艘、航空母舰三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十八艘、驱逐舰五十四艘以及各类潜艇二十二艘。护卫珍珠港海军基地的陆军兵力约五万九千人。再加上夏威夷以西同盟国的地面部队，总兵力约三十八万余人。只是，日本人根本看不起同盟国的部队，认为那就是一群由义勇兵、雇佣兵和当地人组成的大杂烩。

日本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

首先他们占据着地理上的优势。日本在太平洋上有不少“托管”岛屿，是发动战争的良好前沿基地。从这些岛屿出发，向北和向东可以攻击夏威夷、关岛和威克岛；向西可以攻击菲律宾；向南可以攻击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乃至澳大利亚。日本千岛群岛的港口和机场，向北可以直接威胁阿留申群岛；日本从中国夺取的海南岛以及南部沿海地区的空军基地，可以掩护日本海军向南的攻势。特别是日军占领安南后，其前进基地接近了马来西亚，能够非常便捷地支援针对马来半岛以及英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新加坡的作战。

日本人认为，在战略上他们已经把太平洋南部包围了。

而在兵力上，日本人认为他们将在太平洋局部战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因为美国本土距离战场很远，兵力调动要横跨太平洋，费尽周折不说，关键是要花费时间。所以，只要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首先打垮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然后速战速决，最多用五个月的时间横扫南太平洋各国。——“速战速决”也是日本入侵中国时的设想，但战争至今已持续四年尚未终结。现在，他们的对手不是贫弱的中国而是强盛的美国。“速战”日本人也许可以做到，但是“速决”如果指的是把美国彻底打垮，日本人自己能确信吗？

日本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赌注，那就是德国绝对不会战败，欧洲的战事将会越演越烈。

东条英机内阁对欧洲战局作出过如下判断：

德军已逼近莫斯科，苏联在欧洲的野战军已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次苏德之战将以德军的作战成功告一段落。不过，对于斯大林政权来说，向德国屈服就有导致自己政权崩溃的危险。因此，他现在必将依靠其较为巩固的政治基础和不很充裕的伏尔加河以东的资源，与美英的援助，做消极的抵抗。另一方面，鉴于德苏之战事，事实上正呈现出民族战争的局面，苏联民族的抗战意志一时还不会很快衰减下去。在德国方面，据德国首脑人物以前透露，德国想要彻底打垮共产主义，若不把苏联打到再也不能起来反击的地步，那就失去了这次对苏开战的意义。因此不妨说，德国以宽大的条件进行媾和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德国已经占有乌克兰宝库，今后必将掌握高加索油田，进而攻占近东和苏伊士运河，从而称霸欧洲大陆，树立不败的态势，确立欧洲新秩序第一阶段。因而没有必要一举击溃英国，更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德国如果着手进攻英国本土，或登陆成功，或对英反封锁奏效，势将动摇英国的决心，再加苏联势力日趋困窘，难保欧洲不出现媾和局面。另外有人说，如果德国对英国本土登陆成功，英国舰队可能逃往太平洋方面。但是鉴于德国所表示的态度：对英国国民不负责提供给养。那种置四千七百万祖国同胞于不顾的作法，从道义上来讲也不会发生。

以上判断表明，从确信德国不败的观点出发，大本营和政府对欧洲战局最关心的，主要是德、英、苏能否单独媾和的问题。因为日本担心

对美、英、荷开战后，一旦欧洲出现和平，将造成只剩下日本一国以美英等国为对手在太平洋上作战的最坏局面。

只有德军在欧洲战场极大地牵制苏军以及英美的军事力量，日本才有可能在太平洋战场上向强大的美国开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发布作战命令：下达给南方军的“大陆命第五六九号”，下达给南海支队的“大陆命第五七〇号”，下达给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五七二号”以及下达给联合舰队的“大海令第九号”。所有命令的核心内容是：“帝国决定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南方军进入泰国，南海支队攻占关岛和俾斯麦群岛，中国派遣军攻占香港，联合舰队“攻占美国、英国、荷兰在东南亚的主要根据地”。

二日下午二时，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致电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

一、大陆命第五六九号命令（鹫）业已发布。

二、“日出”定为“山形”。

三、在皇威之下预祝成功。

四、受到本电后望仅就第二项回复。

“鹫”是“大陆命第五六九号”的代号，“日出”是开始作战日的代号，“山形”是作战开始日期的代号，即“八日”。

三日晚八时十五分，寺内寿一复电杉山元：

谨拜受“鹫”的敕命——“日出”为“山形”。

全军将士士气愈益旺盛，在皇威之下誓死完成任务，以慰圣怀。

“将发动武力的时机预定为十二月八日，其理由主要是根据月龄和星期的关系。为使陆海军的第一次空袭都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效果，利用午夜至日出前有月亮的阴历二十日左右的月夜是合适的。另外，海军机动部队对夏威夷的空袭，应以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军舰艇较多，且为美军休息日的星期日较为有利，所以选定了夏威夷方面的星期日，即阴历十九日的十二月八日。”

美国人卷入战争的历史命运已经不可逆转。

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应事先宣布中止谈判。但是，当外相东乡茂德提出，既然已经决定开战，为了日本的国家信义，开始军事行动之前须向美国提出最后备忘录，并通告停止外交交涉。但是，日本军方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对珍珠港的进攻属于偷袭性质，偷袭是否成功关乎日本国家命运，命运和信誉相比前者更为重要，绝对不能让美国对日本的行动有丝毫察觉。最后，内阁与军方商定的结果是：向美国提交最后备忘录的时间定在华盛顿时间七日下午一点。

这一时间，离日本偷袭珍珠港不足一小时。

负责向美国递交备忘录的，是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他事后表示因为翻译和誊写电文，七日下午一时五十分才从大使馆出发，走进美国国务卿赫尔办公室已是下午二时二十分。而在此之前一个小时，日本海军已向珍珠港发动大规模攻击——日本人的“事先通告”成功地变成了“事后通告”。赫尔国务卿把日本大使送来的备忘录摔在桌子上：“这种充满无耻谎言与歪曲事实的文书，是地球上任何国家所难想象的。”

十二月七日凌晨四时三十分，日本海军舰队在瓦胡岛以北约二百十海里的海域展开。六时，第一波一百八十三架舰载机起飞，从瓦胡岛西部进入，七时五十五分开始攻击；七时十五分，第二波一百七十一架舰载机起飞，从瓦胡岛东部进入，八时五十五分开始攻击。在持续两个小时的偷袭中，日军以损失二十八架战机的轻微代价，击毁击伤美国太平洋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内的二十四艘各类舰船以及三百架战机，美军伤亡三千五百余人。所幸的是，美军的航空母舰未在珍珠港内，油库和其他主要军事设施也未被击中。但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依旧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重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

……

今兹不幸，与美英两国开启衅端，洵非得已者，岂朕之志哉？曩者，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亚之和平，卒使帝国操戈而起，于兹已四年有余矣。幸而国民政府有所更新，帝国与之结善邻之谊，互相提携。然重庆残存政权，恃美英之庇荫，兄弟阋墙，

罔知悔改。美英两国支援残存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假和平之美名，逞称霸东洋之野心，并进而勾结与国，于帝国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战，更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挠，终于断绝经济关系，对帝国生存予以重大威胁。朕饬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恢复事态，隐忍弥久，而彼方毫无退让之精神，徒迁延时局之解决，近则反愈益增大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以图使我屈从。长此以往，帝国多年来争取东亚安定之努力，悉将化为泡影，帝国之存立亦将濒于危殆。事既至此，帝国今为生存与自卫计，唯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皇祖皇宗神灵在上，朕深信尔等众庶之忠勇，必将恢弘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

得到珍珠港被偷袭的消息后，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写道：

现在由于日本在珍珠港对我们进攻，所有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我的第一感觉是得救了，优柔寡断就此完结了。危机使我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方式到来了。事到如今，国民的团结用不着担心了。过去在不爱国的人民中表现的冷淡和分裂状态，令人非常担忧，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美国陆军部部长有同样感觉的，还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当他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不禁欢呼道：“好了，我们总算赢了！”

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对国会的演讲中称：

……昨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的蓄意的进攻……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不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我们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要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加入了同盟国的行列。

战争的最终结果已经毋庸置疑。

尽管战争的时日可能会持续很长。

十二月八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重庆。

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是：美国卷入战争，将使中国摆脱长期孤立地与日军作战的局面，日本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同时，国民政府也无需再顾忌宣战者的责任，中国可以公开地正式地对日本宣战了。——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入侵中国已十年之久，中国方面至今尚未向日本正式宣战。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建议中国立即向德、意、日宣战。蒋介石认为，宣战是必须的，前提是与美、英、苏协商立场，中国方面的三个条件应该得到满足：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美、英、苏、中一致对德、意、日宣战；三、在战争胜利之前，谁也不能与日本单独媾和。

这一天的黄昏时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郭泰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外宣布：中国决定对德、意、日宣战，自即日起中国与上述三国进入正式战争状态。

九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认为日本策动太平洋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掠夺战争，而美英等各国的抵抗，是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在美英等国的丰富资源和强大军力支持下，在中国人民英勇不屈作战的情况下，日本侵略者最后的失败已经注定。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八项任务：

一、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二、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并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

四、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向朝鲜、台湾、安南各民族，向中国沦陷区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

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

五、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饷弹。

六、制裁亲日派与亲德派，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七、实行民主政治，使全中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都能在政治、组织上担负抗战建国的责任。

八、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十二月九日，中国国民政府颁布对日宣战文：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之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为，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同日，中国国民政府还发布了“对德、意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文”。

中国提出的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答复。十二月二十三日，应罗斯福总统的请求，蒋介石邀请美、英、荷三国军事代表团到重庆，商讨建立联合军事机关事宜。与此同时，英美两国也在华盛顿召开首脑会议，商讨如何把世界上的反法西斯国家团结起来。二十五日，双方拟定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当时，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文件的签署将是未来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的先声。美国的幕僚们在给罗斯福准备备忘录时明确建议：“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区别的办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

国家为一类，另外则是已经被轴心国征服了的国家。”《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迅速电传中国并报呈蒋介石，蒋介石当即首肯，并授权常驻纽约负责外援事务的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签字。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针对我们新的共同战争，我们誓言竭尽全力，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脱离残暴力量及无尽的不义之诅咒。”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的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这份宣言。因此，这份宣言又被称作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宣言》的内容简单到只有两条正文：一、保证运用军事和经济的全部资源同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作战；二、相互合作，不与敌国单独缔结统战协定和和约。

在签名顺序上，罗斯福想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但是，丘吉尔坚决反对。于是改成了中国第四。在正式签字仪式上，首先是美、英、苏、中四国签字；然后，其他二十二个国家按照字母排序依次签字。

战后，当这个联合组织演变成“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不但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而且按照当时的规定，理所应当地成为当然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对于近代以来衰败不堪的中国来说，居然与美、英、苏并列成为世界四强，这令中国人有点不知所措。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蒋介石的感受是真实的，因为他很清楚中国的现状。

当时的中国，无论国力和军力，还是政治与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世界强国相距甚远。罗斯福之所以这样做，自有他的目的。从现实来讲，没人知道与日本的战争要打多久，中国的抗日战场牵制着大量的日军，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对日作战的主战场，所以必须有其正式的地位；从长远来讲，战争胜利之后，只有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才能填补日本出局后的空白。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蒋介石专门给全国各行营主任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去一封电报，告诫他们，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确实能使中国抗战最深重的危机得到缓解，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时局“皆我军民先烈牺牲生命所造成，决非凭空而倖致”。中国抗战的路还很长，战斗还

会依旧残酷。所以，无论是官吏还是将领，绝不能腐败堕落、走私贩私、吃喝嫖赌、精神堕落。

……今日前方最大恶德为精神败坏，上下交征利而不以为耻。若干战区之部队竟至公开走私，且有以合作社等为名而实行走私者，不仅丧失军营，怠弛斗志，亦且放纵敌谍，引致敌军，过去中条山之战，郑州之战，以及第三战区浙东之战，究其失败之因，纯由走私为祟，以致敌人混入我阵地而未之察觉，甚至长江大河最难跨越之天险，亦被敌人偷渡而任其驰骋自如。今后应若何彻底整顿，以洗刷此莫大之污点，此实为我高级将领目前最大最重之责任。同时我前方军官之私人生活举凡嫖赌等之恶习，更应严格检察，上下交儆，务期紧张严肃，刻苦勤劳，俾风纪得以整饬，精神藉以振奋。

中国抗战部队虽然番号很多，貌似兵力不少，但往往“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战不能作半师之用”。导致这一现象，皆因部队长官虚报伤亡以及吃空饷十分严重：

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皆知之缺点。各级层层欺蒙不一而足，至有一师之战缺额至三千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战不能作半师之用，及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此不仅贻误战机，尤丧失我军人之人格……总之，今后吾人抗战，已非过去四余年之可比，吾人不仅应急起直追，准备反攻，以驱逐深入我国境之寇敌，且必须具备现代军队之条件，期与我反侵略各友邦共同努力联合作战，以彻底击灭侵略之暴力，求取最后最大之胜利，举国安危，千秋功罪，皆在吾军人之肩头……

一九四二年来临了。

政治上，国民党政权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至少有效地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几个最富饶的省份。而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国民政府的权力机构早已被日军从富饶之地赶走。从国民政府的版图上看，其控制的国土连一半都不到，且多数是贫穷落后的省份。即使在名义上控制的西南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政府也被半独立的地方权力系统所制约着，“国家统一”这句话早已名存实亡。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为了自己的地盘利益，阎锡山始终游移在国民党、汪伪政权与日本人之间，蒋介石的军队依旧不能进入山西一兵一卒。在更为遥远的甘肃、青海、宁夏和绥远，地方政权被民族首领或远离中央系的军人控制着。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西藏的达赖喇嘛与英国

的关系，都远比与重庆的关系密切得多。云南的龙云和蒋介石始终关系紧张，广东和广西仍是粤系和桂系的天下。即使是陪都所在地四川，国民政府的权力也受到川系军阀势力的掣肘——对于一个处在战争状态中的政府，征税、征兵、发展经济和部署军队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强有力的政权控制力来应对大规模作战是难以想象的。可是，国民政府的权力似乎就在重庆附近的小范围有效，政令和军令一旦出了重庆就很难发挥效力，在各地权力机构沿袭甚久的半割据状态的种种陋规面前，除了折中屈服之外蒋介石政府似乎别无他法。

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死敌是日本人扶持的汪精卫伪政权。这个也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南京伪政府，令重庆的国民政府十分尴尬。尽管汪精卫的政治影响力很弱，但终究是受到日本强大军力支持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一些意志薄弱且利欲熏心的国民党军将领投敌叛变。一九四一年二月，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领所部第一支队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队司令颜秀五、第六支队司令陈才福、第七支队司令秦庆霖、第十支队司令范杰，共计三万多官兵投敌，立即被汪精卫编成了“和平建国第一集团军”。三月，国民党军江苏保安第三路总指挥杨仲华投敌，被汪精卫任命为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四月，国民党军苏北第八十九军副参谋长兼第一一七师参谋长潘干丞、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相图先后率部投敌。五月，国民党军游击第六纵队司令男梅轩率部投敌。七月，国民党军江南游击第十八纵队司令周九如率部投敌。十一月，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和教导师师长文大可在山东韩城率部投敌。投敌之风最后竟然刮到了空军。九月，国民党军空军第一大队分队长张惕勤，队员汤厚涟和梁文华，驾驶战机在宜昌投敌。进入一九四二年之后，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带着他的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九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以及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处长孙玉田等将领一股脑儿投敌。汪精卫随即将这堆人编成了“和平建国第二方面军”。

与投敌性质稍有差别的是阎锡山。从一九四〇年开始，阎锡山便秘密派人与日军接触，双方你来我往，反复谈判，年底竟然达成了一个“消除敌对行为，相互提携，共同防共”的协议。阎锡山请求日军让出一部分占领区，特别是盛产粮食的孝义地区；日军答应后真的撤离了。阎锡山立即派他的骑兵第一军进驻孝义。苏德战争爆发后，阎锡山认为德、意、日的势力不可阻挡，于是单独与日军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

规定阎锡山的晋绥军与日军停战，并与汪精卫的伪政府合作。日本人答应如果合作成功，阎锡山可以“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来时机成熟可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和华北国防军总司令”。为了支持阎锡山积极投靠日本，日本人甚至承诺为阎锡山部出三十万兵力、十万步枪、八千轻机枪、九百重机枪以及各种弹药和粮食，汪精卫的伪政府也答应每月付给阎锡山军费一千二百万元——这个史称《汾阳协定》的投敌文件，是抗战史上最为怪异的文件。其怪异之处在于，似乎阎锡山不是身处中国，不是中国人，他的山西也不是中国的土地，而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蒋介石在重庆获悉后十分震惊，但阎锡山说他的战区条件恶劣，不这样做战区就会自我毁灭，以此逼迫蒋介石给他增加军费和物资供给。同时，阎锡山自以为知道蒋介石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告诉蒋介石，他准备与日本人暂时和谈，然后“先打共产党，后打日本人”。蒋介石派人亲赴山西告诫阎锡山：“你不能投降，如果你投降了，我先打你，后打日本人，再打共产党。”阎锡山愣住了，他从不知道在蒋介石看来决不能投降日本是第一位的。最终，由于阎锡山不断开价且开价太高，还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阎锡山心存顾虑，他与日本人的谈判终止了。作为国民党要员的阎锡山的行径，说明了执政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已混乱到何等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而在军事上，国民政府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中央军力量的逐渐衰落。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曾大力扩展加强中央军，经过训练方式的改进以及武器装备的更新，中央军尽管数量上尚不如地方军阀部队，但其战斗能力已远比地方部队强得多。但是，经过淞沪会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会战，中央军不断遭受重大损失，加之日军占领沿海港口所造成的武器进口困难，中央军的作战实力大为减弱。和平时期，中央军完全依靠政府供养；而战争时期，中央军须在驻扎地学会生存，然而他们的生存技能比地方部队要差得多，这也是军官贪污腐化和部队军纪败坏的原因之一。一九四二年初，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多达数百万，但由于吃空饷的现象普遍存在，实际兵力要少很多，且补充兵员十分困难。虽然国民政府颁布过战时征兵法规，但任何法规只要到了地方就会在执行上走样。地方征兵制度中充斥的腐败和不公引起民众强烈的抵抗情绪，这使得征兵变得非常棘手。

国民政府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经济的濒临崩溃。随着东南沿海主要城市和港口的相继沦陷，中国自十九世纪末艰辛起步的单薄的工业化成果化为泡影。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后，之所以在兵力匮乏的情况下坚持驻军，主要是为掠夺中国的资源以供日本国内之需。日本掠夺

中国的资源，无论手段还是数量，都达到了骇人的程度。在华北和东北，日本人设立的各种“开发公司”，完全控制了资源开发以及工农业生产和销售，大量的煤炭、矿石和稀有金属矿产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仅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就从华北运走煤炭四百五十万吨、铁矿石三十万吨、棉花四十二万担。日本还利用中国的工农业产品为其出口创汇，他们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然后向全世界贩卖，一九四〇年，这种交易给日本带来了一亿三千万日元以上的外汇收入。日本军队实行“以战养战”的方式，残酷地掠夺占领地的粮食和各种战略物资，其中华东等地盛产的各种稀有金属更是支持日本军火工业的主要原料的来源。钨、铅、锑、锡、铁、金等各种矿石以及石油、油页岩、大理石、石膏等等，日本人都疯狂攫取，使得每一处中国占领区都犹如日本工业的原料仓库。抗战爆发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工矿企业搬迁到内地，但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加上日军连续不断的轰炸和封锁，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工业生产几乎倒退到了清末的水平，甚至还不如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连一部汽车都不能制造的中国，面对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以及航空母舰的日本，其国力和军力的悬殊可想而知。

即使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百姓和不计其数的难民都需要救济，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困扰着重庆的执政者。尽管进行了货币改革，实行了战时金融政策，但是，在法币是全国通行货币的情况下，南京的伪政府币、日本人发行的各种货币以及为扰乱中国市场印制的假币，甚至民国成立以前流通的各种地方货币，一起在这片国土上混杂缭乱地流通着，导致普通民众无法相信任何货币，只能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时代。物资匮乏情况下的市场流通被严重扭曲，流通领域中的囤积居奇，走私贩私，投机倒把遍地横行，以致一些政府官吏和军队将领也热衷于此，于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外国记者认为，这样一个经济上行将崩溃的重庆政权，能够支撑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一九四二年的中国应该怎样生存下去？

就在世界性反法西斯联盟组建的同时，日军横扫东南亚。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个小时，日军登上了英属马来亚地区。十日，日军轰炸了关岛附近海面上的英军特混舰队，在近两小时的疯狂攻击中，英国海军舰队主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却敌”号巡洋舰被击沉。消息传到英国，军令部部长向首相丘吉尔报告时，声音“像是在咳嗽”：“我必须报告一个消息，‘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都被日军击沉

了，大概是飞机击沉的。汤姆?菲利普斯淹死了。”丘吉尔心惊肉跳，他后来回忆说：“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没有受到过比这更直接的打击。”——与菲利普斯海军上将等四十七名军官一起沉入大海的，还有七百九十三名英国水兵。

还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日军对菲律宾美军机场和海军基地实施突袭，瞬间便摧毁了美军停在机场上的半数以上的重型轰炸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机。接着，日军先遣队开始登陆作战，至二十二日，第十四军主力全部登陆成功。同时，日军还在棉兰老岛和霍洛岛成功登陆。麦克阿瑟指挥的驻菲律宾作战力量，只有美军和菲律宾军队各一万二千人以及民兵十一万人，拥有轻型坦克一百零八辆、B-17轰炸机三十五架、P-40战斗机七十二架以及几门大炮，这点儿家当根本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击。麦克阿瑟和他的美国兵一向看不起日军，认为日本兵绑腿不齐，军衣肥大，裤管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但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日军攻占马尼拉，麦克阿瑟不得不命令他的美军官兵撤往马尼拉湾以北的巴丹。

接着，日军又攻占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及七万官兵投降，向日军交出步枪六万支、山炮三百门、高射炮一百门，要塞炮五十门以及军用汽车一万辆——当时中国全国的汽车总数才五千辆。

日军朝着缅甸席卷而去，那里与中国的云南省接壤，日军就要抄中国的后路了。

就在日军横扫东南亚之时，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希特勒在柏林西南部万湖附近的一座别墅里，召开了纳粹政府十四个部门的联合会议，会议议题是如何处理犹太人。最后决议：为种族优异的日耳曼人腾出生存空间，就必须在地球上彻底灭绝犹太人，史称《万湖会议纪要》。

此时的日本人与希特勒极为相似：就生存空间而言，日本以外的世界多么广阔、多么富饶！

然而，“日本毅然进入世界战争的主要依据，是以德国不败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在日美开战的十二月八日已开始崩溃”。“十二月八日当日本初战大胜的时候，作为日本世界战略基础的德军，正在狂风大雪、缺少冬季装备的境况下悲惨地继续后退”。——无法想象，在日本突然向美国发起攻击，肆意扩大侵略战争的同一天，他的盟友德国已经开

始仓皇撤退了。

自希特勒命令进攻莫斯科以来，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苏联首都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十月十五日，苏联政府迁往莫斯科以东约一千公里的古比雪夫，德军的坦克部队已经能看见了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了。但是，十二月四日，莫斯科保卫战在最后时刻出现了转机——莫斯科地区突降大雪，降雪竟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积雪刚刚融化，更猛烈的风雪再次来临。德军的汽车、火炮、坦克以及没有有效御寒装备的官兵完全处于被冻僵的状态。就在这时，朱可夫指挥苏军对德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包围。八日，在疲惫、伤亡、严寒和后勤供给匮乏的情况下，希特勒终于决定停止莫斯科方向的进攻，部队从前线撤退。

日本海军大将野村直邦，是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委员，希特勒对盟友们封锁了德军在莫斯科失利的消息，以致野村直邦认为，如果日本能够及时地获得消息，“历史也许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

面临着从莫斯科战线败退的德国军事当局，担心这一事态对德国国民及全军士兵的士气影响极大，所以禁止一切报道。甚至对我们这些盟邦的使臣，也是保密的。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的时候，已经是日美开战以后的事了。我们在德国是负有重任的，而对这样重大的战局变化却无法知道，每想到不能及时迅速地向本国报告，实在感到遗憾。如果能迅速地把当时的情况报告本国，日本的历史也许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实在遗憾！

如果十二月八日那天日本得到了德军从莫斯科撤退的消息，日本人会骤然停止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攻击吗？

绝对不会。

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已使整个国家即将“陷于瘫痪困境”。

日本必须继续扩展不断掠夺。

所以，日本的历史不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宿命。

历史已经证明，这也是所有法西斯主义者的宿命：即使从莫斯科战场传来的消息犹如噩梦，希特勒还是排除了德国陆军和外交当局几乎一

致的反对，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正式对美、英宣战。当天，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不单独与战争对手媾和的协定。——“曾经把德军不败当作打赢世界战争的基础的日本，从今以后除了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外，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中国人先是被美国卷入战争的消息惊喜，然后又被日军在东南亚的所向披靡震惊。悲喜交加中，流传在中国大地上关于战争的消息五花八门，有人说美国的飞机把日本东京炸烂了，日本很快就要投降了；有人说正相反，美国和英国都已经向日本投降了，中国也会因此打不下去的。传言满地飞的原因，是中国民众对自己的政府乃至对整个世界的不信任。

中国人心无所依。

无论如何，战争怎样才能像丘吉尔预言的那样“我们总算赢了”呢？

与中国人的预料相反，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更为凶猛的攻势。

第二十七章

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时——在中国内地与香港分界线上的内地一侧，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第三十八旅团旅团长伊东武夫，带领步兵第二二九、第二三〇联队以及炮兵第三十八联队，在漆黑的夜色中潜伏在深圳附近茂密的芭蕉林中。三时四十分，日军大本营向第二十三军发来暗语："花开，花开。"

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回复："'鹰'命令已经发出。"

同时，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向躲藏在芭蕉林里的伊东武夫发出了进攻命令。伊东部队即刻跃出芭蕉林冲入深圳河。

"花开，花开"的意思是：日本已经在太平洋上动手。

"'鹰'命令"，指的是日军进攻香港的作战命令。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南沿海主要港口相继落入日军之手。但是，"虽已对中国沿岸海面进行了封锁，但一直不够严密，无数帆船以香港为中转基地，横行于华中、华南沿海一带，到处形成了向腹地走私的通道"。至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成为重庆与国际保持联系的唯一门户，国民政府在香港设有军政部武器购入部、外交部办事处、交通部办事处等机关。"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大量的国际援助通过香港转运至内地，启德机场与重庆之间保持着每周的航班往来。因此，早在一九三九年底，日军大本营制订下一年度作战计划时，就已将攻占香港列入其中，但前提是英、美在欧洲参战以后。

为了顺利地攻占香港，一九四〇年六月，日军华南方面军第十八师团进行了广九作战，攻占深圳、宝安和沙头角等边界一线，彻底阻断了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陆路通道。尽管日方极力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但日军逼近港中边界的行为，还是引起了香港的巨大恐慌。"六月，香港出现了许多不祥之兆的传说，中文小报声称长城内下了六月雪；上海的太阳还出了晕圈。二者都是收成不好或刀兵之灾的征兆。"六月二十八日，香港公布妇女儿童以及与保卫香港无关人员一律离港的总督令；还颁布了类似进入战争状态的一系列社会法令，包括征用载重汽车、驾驶员必须

登记以及关于土地、房屋、船舶、车辆和飞机的征用条例。——“中国居民中，富人为防盗，购买了更加结实的铁门并砌高了围墙。而他们爱国的孩子们的团体，却给重庆的蒋介石夫人送去一面锦旗。中产阶级大量储粮，穷人跑去向算命先生问吉凶。难民们只要还逃得起，就都转向珠江口对岸的葡属澳门。”

香港当局极力表示，英国人定会个个都是保卫香港的好汉：

英语报刊对东方的坏消息一律不登载，对欧洲的坏新闻也多方避免。其手法一是拖延，二是突出鸡毛蒜皮的好消息，最后是一再重复英国的光荣历史。在报导法国的最暗淡消息的同时，报纸就发表社论，高谈阔论香港的财政问题以及对历史影片日益增长的兴趣等。有家报纸竟然发表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说对保卫香港是勿需担忧的，因为任何英国人都能在几小时内学会持枪杀敌。

香港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知道，当日军真的冲到英国人面前时，他们将是什么样子。

七月，日军大本营命令重炮兵第一联队和独立重炮兵第三大队移至广东。七月下旬，日军参谋本部又从中国东北和华中地区抽调航空兵部队集结于华南。

这些消息令香港更加人心惶惶。

此时的英国为抵御德国已是焦头烂额：“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德军开始了西线大攻势，在优势机械化部队和空军主导力量的闪电战面前，英军抛弃了全部装备，在同月下旬由敦刻尔克撤退回本土；法国军队溃退，于六月十七日贝当政府投降。一向君临七大洋（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大洋）的大英帝国的命运，现在似乎已成风中残烛。”而日本人最关心的是：德国何时在英国本土登陆？当然，在日本人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大英帝国的崩溃已是预料中的事了。”

这样一个英国，无暇顾及香港。英军参谋总长迪尔对此辩解道：“即使我们能够向远东派遣强大的舰队，面对已在中国大陆上站稳脚跟的日军，能否确保香港仍属疑问。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能作为一个前进海军基地使用。对于既不能救援，又不能长久抗战的香港，只能做尽可能长期保持的前哨阵地。对于主张加强守备部队的压力，应当坚决顶

住。”于是，英国只从遥远的英属加拿大，向香港派来了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通信连。

日本人认为，他们攻占香港的时机终于来了：“欧洲战局如此急转直下，必然要对南方各地区的政治局势带来很大的变化。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已成为失去本国的殖民地，香港也已孤立无援。过去我们曾力求彻底切断列强的援蒋行动，但未获成功。多年来苦于寻求解决中国事变的途径，并渴望形成东亚自给圈，以对付英、美的经济压力。如今形势的发展，对于希望进入自给圈一环的东南亚地区的日本来说，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六月十日意大利作为德国的盟邦参战，日本朝野上下，为德国的闪电战所激动，跃跃欲试。一时街头巷尾充满了‘不要赶不上公共汽车’的暗语。”日本陆军普遍认为，攻占香港，最低限度可以阻断英美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从而再度迫使重庆政府在坚持还是屈服面前作出选择。

香港已在日军的虎口之下。

香港总督兼全军指挥官是杨慕琦，香港英军总司令是玛尔特比少将，他们能够指挥的部队大致如下：罗松准将指挥的加拿大旅，辖皇家步枪团一营、威尼帕古_古拉那达司团二营；瓦利斯准将指挥的香港步兵旅，辖皇家苏格兰旅二营、密道尔?赛克斯团一营、拉吉普特七团五营（印军）、旁遮普蒂十四团二营（印军）；玛古?劳德准将指挥的皇家炮兵团，辖第八重炮营、第十二重炮营、第九六五独立炮兵连、第五高射炮营和新加坡炮兵队所属的两个山炮连；考林松准将指挥的海军，官兵约八百七十名，有驱逐舰三艘、炮舰四艘、鱼雷艇八艘、巡逻舰十五艘以及少量的陆战队；撒利潘中校指挥的空军，官兵约一百名，有鱼雷轰炸机三架和水陆两用机两架；总督直属部队还有皇家工兵、通讯、辎重、军械勤务、卫生、宪兵等各队。

以上部队共计一万余人。

蒋介石知道仅凭这点兵力，香港无法抵御日军的进攻。于是向香港派遣了军事使节团，帮助建立起由香港人组成的义勇军，规模大致为一个团，由英军上校劳兹指挥，辖七个机枪连、四个炮兵连、一个高射炮连和工兵、辎重、通信、救护等小队，总计兵力一千七百二十人。

香港乃弹丸之地，少量的高射炮遮蔽不了天空，几门岸炮也封锁不了海岸，构筑的所谓防线仅仅是依低矮的山包挖掘出的一条步兵战壕而

已，根本没有防御纵深可言。——所有这一切，日本人很清楚，他们依旧精心准备的原因只有一个：虽然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但他们攻击的对象包括了“西洋鬼子”。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对美、英、荷的作战计划。十二月二日，日军第二十三军正式下达攻占香港的命令：

一、帝国决心对美国、英国、荷兰国开战。

二、本军即将开始攻占香港。

三、佐野兵团、北岛部队及本军飞行队，根据波集作命甲第一百三十四号命令，立即对香港开始攻击。

八日凌晨，日军第二十三军航空队扑向了香港启德机场。

香港上空云雾弥漫。

日军战机飞抵机场上空四千二百米处，率队作战的土生大佐并没有看见机场上停有战机，只看见附近的海面上泊有几艘英军舰船。土生大佐认为，英军的飞机可能提前得到消息跑了。但是，当护航的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一起俯冲的时候，终于发现在启德机场的一角英军战机整齐地排列着。日军轰炸机把携带的三百五十公斤炸弹全扔了下去，之后战斗机反复俯冲扫射，英军的战机瞬间全毁。——英军的战机之所以全部停在机场上，是基于英军指挥官下达的这样一道古怪的命令：“鱼雷轰炸机在黄昏或拂晓，为攻击日本海军主力舰或重巡洋舰的好时机。在此时机到来之前，全部飞机不准离开陆地。”

日军先遣部队第三十八旅团冲入了香港境内。

边境上已无英军。所有道路、田垄，一切能通过人马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和马，进击犹如怒涛一般指向边界。向东南侧的铁舟桥在一个半小时内，渡过了轻坦克、汽车三百余辆、马四百匹，人员约一千名。东面第二十三军炮兵部队的炮声轰鸣。步兵第二二九联队于九时在沙头角西侧突破边界，向大和市开始进击……从粉岭到石湖墟，不见敌踪，据驻民说，英、印兵已向九龙方向退却……到达大和市北面的铁路桥时，突然受到两挺机枪的直射，部队遭到兵力不明的英军的抵抗，在此瞬间，尖兵中队散开并开始还击，第一大队也随之展开队形。约三十分钟后，英军后退。日英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就此短促地结束。

日军伊东先遣队兵不血刃地突破了边界。

十一日，日军逼近九龙要塞。由于突破边界的行动过分顺利，以至于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产生了某种警觉，认为英军要不就在九龙要塞里企图依据坚固工事抵抗，要不可能还有战术上的更大陷阱。因此，攻击需要足够的准备，特别要等重炮部队上来，于是命令各部队停止前进。但是，一个令日军司令部震惊的消息随即传来：日军的一支部队竟然直接冲进九龙要塞，并发来电报说他们已占领了要塞核心高地。日军第三十八师团师团长佐野忠义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是真的。至少在当时，日本人对赫赫有名的大英帝国军队充满了惧怕。他们认为，如果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进攻英军防守的坚固要塞，将会遭受空前的损失。但是，前往现场调查的师团参谋长回电了：步兵们不但冲进了九龙要塞，而且确实占领了制高点金山。

防御九龙要塞主阵地的，是瓦利斯指挥的英军香港步兵旅。主阵地环绕着铁丝网，由地下交通壕连接着五个以上的火力点。但是，当日军小部队摸上来的时候，各据点里居然都没有配备火力。负责守备的中队长吉姆斯大尉的解释是："由于对陈旧落后的地下阵地不满意。"堡垒受到攻击后，瓦利斯旅长认为这里地形险要，日出前不宜进行反击。于是一直等到天亮，瓦利斯督促皇家苏格兰大队反击被日军占领的堡垒，苏格兰大队的大队长持反对意见，认为他的有限兵力不可能完成反击任务。瓦利斯旅长认可了这一理由，他向玛尔特比总司令报告说："强迫大队长去执行他认为无把握的计划是无益的。"

日军很快就冲到了苏格兰人面前。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叫山本的中队长，其奋不顾身的举动像要实现"武士道置生死于度外似的"，弄得他的传令兵在后面疯狂地追赶。山本很快发现了从主阵地撤下来的皇家苏格兰旅的一个连队，但同时他也被苏格兰人发现了——山本立刻被密集的子弹打倒在地。后续的日军狂风一样冲击上来，苏格兰人伤亡惨重地仓皇撤退。"十一时三十分，玛尔特比总司令决心撤出九龙并向杨慕琦总督作了报告"，之后"发出了向香港岛撤退的命令"。

九龙半岛上唯一的坚固防御阵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日军一直冲到维多利亚海湾的北岸——隔着海湾就是香港岛了。

此时，几个擅自行动的日军——第三十八师团少尉伊藤三郎和小池礼三，他们都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游泳选手——从九龙这边的鲤鱼门

到对岸香港岛的东北角之间，海湾水道狭窄，大约只有一千米左右，因此两个少尉认为他们可以游过去。他们以能游泳四公里为挑选条件，迅速组织起一支敢死队。但是，敢死队员们下了海才感觉不对劲。尽管这是南方，但十二月的海水依旧冰冷刺骨，加上身上的装备很重，仅游了五分钟就不行了。返回后，发现淹死了十几个人。

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向香港总督发出劝降书：

我善战之攻城炮兵及英勇之空军已做好准备，香港覆灭弹指可待。香港命运已定，胜败不言自明。我攻城军念及贵军之命运及香港百万无辜民众，不能一任事态之推移。溯自开战以来，贵军虽努力作战，但如继续抵抗必将断送百万无辜男女老幼之生命，此皆为贵国骑士精神及我国武士道所不忍，望总督深思，立即承诺举行献城会议。倘不接受本劝告，余只有忍泪诉诸实力，以使贵军屈服。

杨慕琦总督拒绝投降："我等自信尚有作战的能力，而且我等对大英帝国国王尚未完全尽到忠诚的义务。"——总督的拒绝很快传到英军官兵中，但总督的这番话变成了"在日军于香港登陆以前投降，是大英帝国体面所不允许的"。据此，英军官兵的普遍理解是：只要日军在香港岛登陆，英军就可以投降。

杨慕琦总督拒绝投降后，日军对香港岛实施了猛烈的飞机轰炸和炮火轰击。日军独立重炮第二、第三大队，使用了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以及全部的重炮将香港岛上的炮台大部摧毁。日本海军也出动了第二十一航空队的三十多架战机，炸毁英军驱逐舰一艘，击沉英国商船两艘。十七日，随着一百五十毫米加农炮的开火，日军新一轮的轰击再次开始，香港总督官邸四周落下了雨点般的炮弹。中午，日军再次派出军使劝降，还是遭到了杨慕琦总督的拒绝。黄昏时分，日军第二十三军下达了登陆香港岛的命令。

英军的败局已定。

十八日，日军首先对登陆地的炮兵阵地等军事设施进行了破坏性轰击。二十时五十分，日军分成数路开始强行登岛，一个小时后其前锋登陆成功，香港旅的拉吉普特营溃散。自十九日黎明开始，瓦利斯旅长命令部队反击。随着英军反击火力的逐渐加强，日军登陆的后续部队遇到阻力。英军的鱼雷艇也驶人了海湾。同时，英军步兵在北角、黄泥涌、毕拿山、赛马场、香港饭店等地与登陆的日军展开激战。从加拿大增援

香港的加拿大旅旅长罗松准将阵亡。英军之所以还在苦战的原因，来自蒋介石派来的军事使节团团长陈策对英军的承诺，他说六万多的中国军队正在向港中边界集结，很快就会向日军的背后发起攻击。但是，六万多的中国军队至今没见到影子，英军的阵地已在日军强大的攻击面前不断丢失，各路反击都没能奏效。二十三日晚，残存的英军被压缩在湾仔山峡等狭窄的地域内。二十四日，军事使节团团长陈策乘坐一艘民间小艇逃离香港，途中受到日军的射击而中弹负伤。二十五日，总督杨慕琦召开防卫委员会议，对是否投降进行咨询，该委员会决定对日本的劝降置之不理。消息传出后，日军的飞机和火炮立即对残存英军躲藏的湾仔山峡、歌赋山、扯旗山、西高山等地实施了集中的轰炸和轰击。下午，英军总司令玛尔特比评估了形势，认为主要阵地已经全部失陷，能够机动使用的火炮只剩下八门，炮弹所剩无几，十五时四十五分他向杨慕琦总督作出了“无法进行更有效抵抗”的报告。

很快，英军第一线阵地上举起了白旗。

十八时二十分，香港总督杨慕琦和英军总司令玛尔特比前往日军指挥部正式向日军投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一时，日军占领香港。

日方统计：此战日军战死六百八十三人，负伤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香港方面死亡一千五百五十五人，被俘九千四百九十五人——被俘者大多是投降之后放下武器的，其中只有少数中国人，大多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加拿大人。

日军大本营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新总督。

香港的陷落，令抗战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援助通道。而此时，冲入缅甸的日军正在向中缅边界推进，如果那条脆弱而崎岖的滇缅公路再被切断的话，国民政府控制区将成为孤岛。

就在蒋介石为香港的迅速陷落感到吃惊的时候，从湖南方向又传来发生战事的消息。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在他的部队从长沙回撤后几乎喘息未定之际，又发动了一场大战。而令人奇怪的是，无论作战样式、作战方向以及作战目的，竟与两个月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一模一样。

这就是中方所称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偷袭珍珠港、东南亚作战以及香港作战，都与占领着中国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没有关系，东京大本营也没有给第十一军任何作战指令。可是，自大本营决定为南方作战从中国派遣军抽调部队时起，阿南惟几就成了大本营的死对头。凡是大本营作出的削减他的战力的决定，包括缩小作战区域、发动南方作战以及放弃对宜昌的占领，他都表示强烈的反对。阿南惟几的这种耿耿于怀，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突然得到了缓解——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大本营发来的关于抽调兵力的电报称：“除第四师团外，不抽出第六师团，决定于一月中旬增派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第十一军的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阿南惟几接此电报后在日记中记下了‘欣喜若狂’四个字。”原以为至少要从第十一军抽调走两个师团，现在居然只抽走一个，还补充了一个混成旅团，阿南惟几晦暗的情绪一扫而光，立即想到了再开战端。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战场一共抽调了五个师团编入南方军，另外还抽调了第四师团作为大本营预备队。此时，在中国战场上，除关东军之外，日军保留着二十一个师团、二十个独立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约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由于兵力的严重减少，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达了“大陆命第五十七号”，规定了侵华日军的基本任务。与一年前相比，任务发生了微妙变化，比如，原来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现在变成了“摧毁敌人的抗战力”；陆军航空兵的任务也从“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变成了“协助地面作战并根据需要担任要地防空”。最为特殊的是，命令强调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资源物资的开发和现地谋求自给的问题，成为今后战争指导上极为重要的问题”；“确保占领区内的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获取和运输”；“加强当地自给自足措施，积极地获取和利用占据地区内外的资源”。

从战略上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侵华日军基本转为守势。

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放在了华北、华中等占领区。针对长江中下游中国物产富庶的地区，日军第十一军保持着相当的力量。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第十一军的作战部队有：丰岛房太郎的第三师团、神田正种的第六师团、青木诚一的第四十师团以及池上贤吉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军直属的部队有工兵、输送队和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还有秋山丰次的第一飞行团，总兵力在十二万左右。

面对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迅速推进，阿南惟几特别对第十一军的幕僚们强调："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试图以有所作为的积极作战避免沦为"次要战场"的阿南惟几，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再起战端的机会：日军第二十三军从广东方向进攻香港后，有情报显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英军的抵抗，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二十三军发动攻势；并命令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军从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支持英军对缅甸的防御作战。特别是在第十一军的对峙当面，中国军队第二、第四军已由长沙南下，看样子是去支持第四战区策应香港的行动了。——如果趁此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策应第二十三军的香港作战"，不是绝好的理由吗？

木下勇参谋长立即给第二十三军发出问询电报："中国第四军的移动对贵军有何影响？"同时委婉地表示，第十一军愿意采取牵制动作。木下勇对上一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以旺盛的战斗意志，连续不断大举向汨水河畔出动"，从而使第十一军"进行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心有不甘，认为是中国军队"轻侮了"第十一军。

十三军明确答复，他就迫不及待地下定了作战决心："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十二月十二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

自然，阿南惟几立刻批准了木下勇的作战计划。

日军第十一军拟订的作战方案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向湘北新墙河一线发动攻击。首先以第六、第四十师团击溃新墙河一线的中国守军第二十军的防御部队，并在关王桥附近将第二十军主力包围歼灭；然后投入第三师团于第六师团的右侧，把汨罗江附近的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击溃后结束作战。作战周期大约为两周。同时，第三十四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从南昌方向出击实施牵制性进攻。

因为只是一次短距离进攻然后迅速回撤的作战，况且确实能够起到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的作用，中国派遣军基本上予以了首肯。

但实际上，阿南惟几"已经考虑了进攻长沙的问题"。

关于是否进攻长沙——或者说，是否在突破汨罗江后，像上次一样攻占长沙——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内又发生了争论：如果进攻长沙，不但

超出了“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的范畴，而且作战规模要比木下勇的目前计划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在上报中国派遣军的计划中并没有这一作战目的——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就是擅自行动。除了阿南惟几之外，心存攻占长沙念头的，还有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他对目前只攻击到汨罗江就结束作战很不满意，明确表示应该继续南进攻击长沙。持反对意见的，是负责后勤的军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他认为作战不能违背已获批准的计划，且“第一线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完成的信心”都需要考虑。

十二月二十二日，第十一军发动进攻的前夕，阿南惟几从汉口出发前往岳阳的战斗指挥所。木下勇参谋长提醒司令官，先不要向部队提是否攻占长沙的问题，以免人心混乱。

日军第十一军就这样匆忙决定了作战计划。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一笔糊涂账，除了必须打一仗的固执而又鲁莽的冲动外，无论作战实施步骤以及将要达成的作战目的都模棱两可。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在总结前两次会战的基础上，分析了日军再次发动攻势时可能的攻击方向：一是全力向湘北进犯，重点保持在左翼，力图包围我军右翼；二是在主力攻击湘北时，以一部兵力由南昌、武宁和通城等地进犯，以策应主攻方向。无论哪一种情况，日军将基本按照前两次长沙会战时的路线，向南突破新墙河直指长沙。由此，薛岳确定了第九战区的基本原则：在赣北、鄂南和湘北方向上，竭力把日军阻击在分宜、上高和甘坊以东；修水、龙门厂和南江桥以北以及澧县和宜都以东地区，争取各个击破。而在重点作战区域的湘北，“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的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与前两次长沙会战一样，薛岳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边打边撤地将日军诱至预定决战区域加以围攻。其基本要领是：预定决战区域在长沙外围，决战时主力保持在长沙东侧。日军开始进攻时，一线中国守军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一部分主力向战场的东面移动，一部分主力则移动至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的隐蔽地区，待日军抵达预定决战区域后，采取两侧夹击和截断后路的方式克敌。决战时刻，长沙要坚守不退。如果日军向鄂南和赣北等地进行牵制性攻击，当面的中国军队同样要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反击的基本策略。

薛岳自称本着“既往所得之经验教训，创天炉战法何谓“天炉战法”？

薛岳的解释是：

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薛岳把新墙河至汨罗江之间地域，设定为伏击和诱击地带；把捞刀河至浏阳河之间，设定为决战地带。同时命令动员作战地区的二十万民众破坏所有的道路；把水田翻犁并蓄水；清查户口，严防奸细；组织战勤民工构筑阵地，输送给养和救护伤员。

“敌之进犯，无异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

薛岳信心满满。

进入十二月，第九战区发现当面日军调动频繁，不断地向湘北和赣北集结兵力，且民众报告说日本人正在抓夫抢修南昌机场。薛岳判断日军很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

此时第九战区部队的位置如下：

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在赣北方向与日军对峙。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一部与武宁方向的日军对峙，一部控制在修水附近。

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在岳阳以南与日军对峙，其在新墙河前沿的部队是杨汉域的第二十军和孙渡的第五十八军。

战区直属的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担任汨罗江至洞庭湖东南岸一线的防御；陈沛的第三十七军担任汨罗江两岸长乐街至新市一线的防御，主力控制在汨罗江与捞刀河之间的蒲塘和栗山港附近；李玉堂的第十军负责守备长沙；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为战区预备队。

十八日，新墙河北岸的日军炮兵向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了数次试射；第六、第四十师团的小股部队也对中国守军的阵地进行了试探性攻击。一切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在即。

二十日，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欧震的第四军从广东返回湖南，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由广西向湖南移动。

同日，薛岳下达了第九战区行动部署：

罗卓英率领第十九集团军战斗指挥所，二十一日晨由上高进驻浏阳，指挥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以及暂编第九军郭礼伯的第一九四师。第七十九军由衡阳乘火车运送株洲，限二十三日抵达；第一九四师向醴陵开进，限二十七日抵达；第二十六军负责浏阳河阵地的防御作战。

王陵基率领第三十集团军战斗指挥所，二十一日晨由修水进驻平江，新编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师全部开至平江附近。

杨森指挥第二十七集团军准备作战，其第二十军在新墙河南岸逐次抵抗日军，必须坚持十天以上，然后向侧面阵地转移；第五十八军在日军强渡新墙河时，由东向西侧击日军，协助第二十军作战，然后向侧面阵地转移。

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南岸防守，必须坚持十五天以上，然后向侧面的山地转移。

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确保现有阵地和洞庭湖南岸湖防，然后待命自西向东夹击日军。

李玉堂的第十军固守长沙，第一九〇师守外围，第三师守城内核心阵地，预备第十师守岳麓山。

十二月十四日，日军第十一军开始向岳阳附近集结。

二十三日，阿南惟几下达作战命令：

一、飞行第四十四战队，协助我军攻击。

二、军企图以第六、第四十师团，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开始攻击，在新墙东南地区击溃新墙河左岸地区之敌后，再击溃汨水左岸地区之敌。

三、第六师团应于二十四日夜发起攻击，在新墙西方地区突破敌线，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三江口（关王桥西南五公里）附近。

四、第四十师团应于二十四日夜发起攻击，在潼溪街东方地区突破敌线后，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关王桥附近。

五、第三师团应于二十日拂晓，以一部炮击潼溪街附近的敌阵地，协助第四十师团的攻击。主力转到第六师团的右侧，在新墙河渡河，捕捉所在之敌，进入归义附近。

薛岳的“天炉”已经在等着阿南惟几了。

中国第九战区位于新墙河最前沿的部队，是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二十军。薛岳把杨森的川军放在第一线颇有用意。杨森的部队出川抗战后，无论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还是长沙会战，川军在中国军队里算得上是打得不错的。更重要的是，川军有家族军队的传统，第二十军的主要军官都是杨森的子侄，他常对军官们说的话是：“龟儿子们，不要给杨家丢脸，要像杨继业七狼八虎抗击辽兵一样打鬼子。”现任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就是杨森的侄子，一家子合伙打仗自然不会含糊。

二十三日，杨汉域的防御部署是：夏炯指挥的第一三三师针对日军第六师团，位于战场的左翼，防御鹿角、荣家湾、新桥、三港嘴（不含）一线，阻敌十天后向南面的智源洞、三江口转移；杨干才指挥的第一三四师针对日军第四十师团，位于战场的右翼，防守三港嘴、草鞋岭、方山洞一线阵地，阻敌十天后向南面的三江口、关王桥转移；孔荷宠指挥的暂编第五十四师，位于战场的东面，负责防御九岭、麦市、斗米山一线阵地和赛公桥、铁柱港、通城等前进据点，保障新墙河一线阵地的右侧背。

从日军的作战计划看，在进攻的第一阶段中，无论是第六师团还是第四十师团，其攻击重点都在中国军队第二十军所在方向，可见日军一开始就想把杨汉域的第二十军先吃掉。

即使第二十军全军奋力血战，薛岳要求其三个师抵挡住日军三个师团十天的进攻，着实有点蛮横。

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的右翼阵地突出于新墙河以北，因此日军第四十师团必须把这部中国军队赶走，才能靠近新墙河的渡河出发地。二十三日凌晨，日军第四十师团步兵第二三四、第二三五联队，向新墙河北岸的中国守军第一三四师四〇〇团发动了攻击，四〇〇团抵抗一天后退守新墙河南岸。

二十四日，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全部进入新墙河北岸阵地。凌晨，乌云密布，雨雪飘洒，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随着日军火炮的猛烈轰击，右翼的第四十师团率先向新墙河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击。日军在徒涉新墙河时遭到第一三四师的猛烈阻击，战至下午二时，日军突破了第一三四师的一线防御阵地。杨森命令集结在战场东侧的新编第十一师从黄崖市向杨林街推进，自东向西攻击，协助第二十军的作战；同时命令第七挺进纵队负责防御大云山、方山洞和八百市一线，第一三四师在方山洞的部队迅速向主力靠近，以便构成新的阻击线。晚上，雨雪下得更大了。日军第六师团向新墙河南岸中国守军第一三三师阵地发动了攻击，然后冒着中国守军的猛烈射击在黑暗中强渡新墙河。午夜，日军突破了第一三三师的阻击阵地，第一三三师主力向南撤退。二十五日清晨，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二十九旅团所属部队，在旅团长石川忠夫的指挥下，跟在第六师团的后面渡过新墙河，从战场的左翼方向沿着粤汉铁路两侧迅速南下。

中国守军的新墙河一线阵地，仅守了一天便被日军全线突破。

此时，日军三路并进追击撤退中的第二十军：东侧的第四十师团攻击第一三四师的二线阵地；中间的第六师团第二十三、第四十五联队攻击第一三三师三九八团阵地；西侧的第三师团攻击第一三三师三九九团阵地。混战持续到天黑，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与各师的联络都中断了，仅知道部队在混战中伤亡惨重。第一三三师同时受到日军两个师团的联合攻击，部队被打乱，形成了官兵各自为战的据点守卫战。守卫傅家冲和洪桥据点的三九八团二营和三营官兵，坚守阵地，誓死不退，击退日军的数次冲锋，给日军以大量杀伤，但终因兵力悬殊，守洪桥的三营副营长吕海群阵亡，守傅家冲的二营营长王超奎和官兵数十人全部战死。杨汉域军长登高观察战场，他格外关注第一三三师的战况：“十里纵横据点，敌我混战，枪炮声及轰炸声历历可闻。据报该师伤亡虽重，士气极旺。敌军因与我混战肉搏，死伤确较我惨重。”

在中国官兵死战之时，日军主力从各阵地间的缝隙迅速向南突击，在大荆街附近日军受到第一三三师三九七团三营的伏击。与此同时，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也与中国军队第一三四师在观德冲、十步桥等地展开了激战。特别是在对第二十军指挥部所在地关王桥的进攻中，日军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龟川联队在步、炮、工的协助下，攻击陈家桥东一公里的斗南尖高地，第二中队虽攻进其一角，但屡遭逆袭，其夜虽进行了数次夜袭，但均未成功。重庆军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户田联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冒着风雪，从关王桥径直南

下，插入重庆军的大部队里，所到之处，在短兵肉搏中竭力前进”。

应该说，在战场第一线阻击的第二十军已经拼尽了全力。

由于部队伤亡过大，杨汉域决定逐步撤出战场，按照原定计划转移。但是，二十六日天一亮，日军再次发起强攻，继续向第二十军压来。第六师团攻击第一三三师的羊角岭、三江口阵地；第四十师团在关王桥附近与第一三四师激战。下午，羊角岭和关王桥阵地丢失，日军继续向南冲击。为遏制日军的南下速度，杨森命令第五十八军的两个师迂回到两侧夹击日军。黄昏时分，关王桥以南的陈家桥等阵地被日军突破。此时，战场上雨雪交加，天寒地冻，气温降到此地罕见的零下五摄氏度。由于道路泥泞不堪，日军的机械化装备行进艰难，部队在彻骨的寒冷中苦苦前行。夜幕降临之后，黑暗加剧了寒冷和恐惧。但是，在南下日军的身后，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三九八、三九九团官兵仍在死追。午夜，杨森命令他们立即突围归队。两个团的残存官兵绕道而出，最终追上了主力。但防守黄沙街阵地的三九九团的一个连，在受到日军第三师团的火炮打击和步兵围攻后，全连官兵全部阵亡。

至此，中国军队第二十军在新墙河两岸与日军打了三天。尽管距离薛岳要求的阻击十天的限定相差还远，但这支川军部队作战不屈不挠，应该视为完成了预定任务。

二十六日晚，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前锋推进至汨罗江北岸附近，第四十师团前锋也突至汨罗江北岸渡口长乐街。

这时候，传来了日军占领香港的消息。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之所以批准第十一军的此次作战，只是为了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南下增援香港。现在香港已被攻占，第十一军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阿南惟几不这么想。他不但没有停止进攻，且于二十六日命令部队继续南进，把攻击矛头指向了防御汨罗江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

一、敌第三十七军，以第六十师、第九十五师在瓮江、桃花（瓮江西北五公里）、桐子山（长乐南十二公里）、湖源山（桐子山西南五公里）、磨石山一线；又以第一四〇师从花门楼到周家湾（金井西南八公里）一线，各自占领阵地，企图长期战。

二、军准备对占领阳水左岸高地阵地的敌第三十七军，在二十九日

天明前，发起攻势。

三、第三师团应在二十九日天明前，把位置向前移动到汨水左岸地区，对归义南方高地之敌，准备攻击。

四、第六师团应在二十七日以后，把位置向前移动到新市附近的汨水左岸，二十九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攻击。

五、第四十师团，应适时以主力向长乐东南地区前进，以一部向浯口对岸附近移动，二十九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发起攻击。

发源于幕阜山南麓的汨水，在归义附近与罗水汇合称汨罗江，江水西流注入湘江。每年冬季为枯水期，一般情况下人马车辆可以徒涉。但是今年入冬后，连日雨雪，江水暴涨，水深平均在两米左右。在这个方向上，汨罗江有三个主要渡口，其中的长乐街渡口和新市渡口位于岳阳至长沙的公路上；西侧的归义渡口在粤汉铁路桥旁边。这三个渡口控制着岳阳至长沙间的三条平行道路，因此是日军向南攻击的重点。

第九战区防守汨罗江沿线的部队，是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和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的两个师。沿着汨罗江南岸从左至右：第九十九军的第九十九师防守湘阴至营田以东一线；第九十二师防守归义两侧，当面的日军是第三师团；第三十七军的第九十五师防守新市、伍公市附近；第六十师防守长乐街至浯口、张家渡一线，第一四〇师控制在金井附近为军预备队，当面日军是第六、第四十师团。

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算不上是有名的部队，阿南惟几之所以用两个师团的兵力瞄准该军，原因是该军参加了前两次的长沙作战，至少在这个方向上是日军的老冤家。与防守新墙河的川军第二十军不一样，第三十七军是一支湖南本土部队。抗战爆发后，该军参加了长江一带的数次会战，每一次都因伤亡惨重不得不重新补充。南昌会战后，关麟征被免去军长职务，陈沛继任，现任的三名师长分别为：第六十师师长董煜、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和第一四〇师师长李棠。

二十七日上午八时，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向汨罗江边的中国军队第九十五师阵地发动攻击，被二八三团击退。下午三时，日军第四十师团先头部队向第六十师防守的长乐街一线发起攻击，被一七九团击退。但是，在日军第三师团的进攻方向上，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师的阵地被突破，中午十二时左右日军开始强渡汨罗江——“汨水数日来由于风雪，河

水不断上涨，浊流湍急，无法测量水深。”尽管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但担任前锋的日军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和鬼头三良少佐对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师的顽强抵抗印象深刻：

横田大队边以速射炮、重火器摧毁北岸敌人的星状据点，边在敌手榴弹的爆炸下，利用死角强行冲入敌阵，逐次摧毁北岸的敌阵地。另一方面，鬼头大队进入铁路桥的东侧，在重火器支持下第三中队于十三时三十分冒着飞雪强行渡过水深没胸的汨水河，冲入南岸的敌阵地。接着横田大队开始渡河，凭据掩蔽阵地之敌，虽一齐进行射击，但终于排除抵抗，渡河成功。登岸后未及晾干湿透的衣服，就继续扩大战果。第一线中队于十五时左右，推进到河南约二公里的地方，后续的驮马部队在将要渡河时，突然遭到巧妙隐蔽在铁桥桥脚附近的敌机枪从背后猛射，部队为了扑灭机枪又费了一些时间……担任警备驮马的一个小队，在从后方追赶中，连续受到三次袭击，几乎全部被歼。

二十八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部渡过汨罗江，继续迅速南下，但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师边撤边打，仍在不断杀伤日军：“伊藤步兵大队安全通过后，骑兵第三联队先头以军旗为前导，前进到距汨水七百至八百米附近时，突然遭到来自道路两侧据点的猛烈射击，联队副官当即负伤，军马六十四匹相继中弹倒毙。”晚上，双方对峙于粤汉铁路东侧的落马桥、大娘桥、神鼎山一线。

日军第六师团发起的攻击被中国守军击退后，下午，在火炮和战机的支援下，第六师团从兰市河再次发动攻势，与中国守军激战到天黑，日军突破兰市河附近的防御阵地后开始强渡汨罗江，但此时江岸的其他渡河点依旧在中国军队第九十五师手中。日军第四十师团清晨开始强渡，并猛烈攻击长乐街，中国守军第六十师防守长乐街的一个连的官兵全部战死，长乐街失守。入夜，双方对峙于李家河、刘家塘一线。

鉴于日军第三师团已经渡江深入，战场的左翼形势严峻，薛岳命令第三十七军预备队第一四〇师向铁路方向增援，暂归第九十九军指挥；命令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的指挥所向前推进，就近指挥第九十五师和第六十师的作战；命令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对日军实施夹击，牵制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的南进。

也是鉴于第三师团全部渡江，阿南惟几命令第三师团暂不向南推进，而是沿着汨罗江南岸向东，朝着第三十七军的后方福临铺前进，目的是将第三十七军包围歼灭。

二十九日，大雪，汨罗江两岸一片苍茫。

迂回的日军第三师团连夜兼程，凌晨时分进抵新开市附近，与退守该地的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遭遇。此时，增援而来的第一四〇师正在向第九十九师靠近。但是，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面对着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的攻击，压力巨大。第六师团从凌晨开始猛攻第九十五师的阵地，中国官兵凭借着险峻的山地阵地令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重庆军的抵抗极其顽强，从左右两方包围了联队本部，幸而飞行队的密切协助和第一线的反复冲锋，直到傍晚才完全将其击溃”。

三十日，天晴了。

但是，遍地积雪，寒风刺骨。

日军在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持下，对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发动了全线围攻。双方激战至中午进入胶着状态。下午，日军以第六师团一部继续围攻第三十七军，主力则从第九十五师阵地之间的空隙通过，迅猛向南穿插；同时，第四十师团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六十师的阵地。鉴于日军已经南下，第三十七军的阻击任务基本完成，如果再顶下去就有被围歼的危险，军长陈沛命令第九十五、第六十师向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的山地转移，部队变成对日军主力呈侧击态势。同时，陈沛也试图把日军主力吸引过来，为战区展开后续的作战部署赢得时间。

三十日深夜，与日军第三师团纠缠的第九十九军，按照薛岳的命令也开始脱离战场，向西撤退到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在粤汉铁路右侧的山地里隐蔽起来，与第三十七军形成从东西两面夹击日军的形状。

尽管日军早就冲了过去，但滞留在日军身后的杨汉域的第二十军一部，还在新墙河以南顽强作战。三十日晚，第二十军官兵在新墙河附近一个名叫长胡镇的地方，突然袭击了日军辎重部队第四十联队。联队长森川敬宇率部正在一座寺院里休息，中国官兵猛然冲进来，日军官兵惊惶四散，森川敬宇联队长被打死在寺院外的雪地里。

此时，日军的三个师团都已突破汨罗江，前面就是捞刀河以及隔河的那座久经战火的长沙城。

难题再次摆在了阿南惟几的面前：是否继续攻击？

对攻占长沙持反对意见的作战参谋主任岛村矩康和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向司令官提出了谨慎从事的意见。这令阿南惟几非常气愤，认为军官们“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他特地召开了军官会议以阐述他的观点。

二十七日，阿南惟几日记：

一、夜来风雪未停，温度降到零下四点五度，有薄冰。

二、参谋长和岛村参谋，从全面判断，大致似已认识到进攻长沙的必要性。余举其有利之处：

一、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

二、把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袭扰之感。

三、表明皇军尚有余力。

四、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足依靠。

五、予第六战区以威胁。

阿南惟几认为，只有用强大的武力表明日军在中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才能使他对整个战局的惶惑紧张稍感释然。

阿南惟几向中国派遣军发出了要求攻占长沙的电报。

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的回电并没有批准攻占长沙的请求，只是命令第十一军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阿南惟几大失所望。

二十九日十七时，日军的飞机侦察报告说，中国军队正大规模地向长沙退却。虽然中国派遣军的指示仍没抵达，但阿南惟几已经等不得了——“乃独断决定命第三师团向长沙方面追击，同时向总司令官提出独断请罪。”

二十九日傍晚，阿南惟几下达了攻击长沙的作战命令。

晚上，负责后勤的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接到参谋长木下勇的电话，告诉他司令官已决定进攻长沙，命令他立即前来岳阳商议作战。

二见秋三郎极其不满，认为司令官完全在意气用事，根本不顾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补给困难。由于原定作战计划中没有攻占长沙的行动，因此一线官兵仅有紧急出动时每人随身携带的一百二十发步枪子弹，经过激战估计已经所剩无几了。弹药向前运输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军民把从新墙河南下长沙的所有大小道路都破坏了，加上河流涨水，桥梁或被冲断或被淹没，汽车根本无法通行。战斗开始以来，工兵部队顶风冒雪抢修道路，但中国军民将道路摧毁得十分彻底，根本无法修补，只能开辟新路。工兵们依据简陋的中国地图，在起伏的丘陵地带摸索，试图筑出一条可供车马行进的道路，但“与其说这是在修筑道路，不如说始终在砍伐树木开拓前进，因为在丘陵地开拓道路，道路都是用原木铺就的，遇到障碍就得迂回前进，遇到水田就得耗费很多时间，用束柴铺垫筑路。由于道路的迂回曲折，大大延长了筑路作业的距离……对于军工兵队来说，到达汨水，不眠不休地干了五天，在二十九日十七时，好不容易用原木铺设的兵站路才从新墙到达了大荆街”。更重要的是部队的士气。此时日本陆军的作战意志已与战争爆发初期截然不同。主力部队大多到太平洋战场去了，临时征召预备役兵组成了二等、三等师团，不但官兵作战经验不足，且士气普遍低落。日本战史明确地记载了第十一军全线突破汨罗江后的官兵心态：

自到达汨水河畔，在第一线官兵之间，都流传着“这次作战是为了牵制香港，到三十一日止，可能反转”等消息。然而现在进至汨罗左岸，并有南下的态势，官兵们关于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

二见秋三郎说得更为露骨：“此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阿南惟几的决定正中薛岳的下怀。

毫无疑问，如果日军就此后撤，中国军队予以追击，事后也可以称之为“大捷”。但是，薛岳知道，与前两次长沙会战不一样，日军在攻击中已经显露出作战能力的下降；如果日军继续南下攻击长沙城，只要中国军队调动合理、部署周密、移动迅速、相互协同，不但完全可以在布置好的“天炉”里与日军拼一下，甚至使自己的军事生涯再辉煌一次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十日，薛岳向蒋介石报告了第九战区将与进攻长沙的日军决战的部署。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他提醒薛岳不要让日军在攻击长沙前就与围歼部队接触，也不要过早地使用战区的预备部队，一定要让日军先攻长沙，等攻不下来受到严重消耗后，再命令围歼部队出击。薛岳回电提出了由蒋介石亲自下达督促将领忠于职守的文件——大战将临，薛岳怕部队指挥官不上前线和不负责任等老毛病复发：

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

二、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

三、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薛岳规定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夜为总攻开始时间，限定各集团军在攻击发起后到达第一攻击线的最后限期为四日。

“天炉”就要点火熔炼了。

就在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按照作战部署开始移动的时候，日军进攻了——“第三师团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接到盼望已久的进攻长沙的命令，停止左迂回，立即在当日二十时命令各部队‘迅速由捷径，向长沙追击敌人’后，第一线各部队在‘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的口号下，开始踊跃前进。”如果说此时谁还有“踊跃”的情绪，恐怕指的是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因为只有他是坚决主张攻占长沙的师团将领。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接到攻击长沙的命令时，他的部队还在与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纠缠。神田正种虽然认为攻打长沙是不适宜的，但他绝不想让第三师团抢了头功，而阿南惟几命令他给第三师团作掩护就是对第六师团的侮辱。

日军第三师团开始急促地向南突进。

丰岛房太郎很快就会尝到“争功”的恶果。

冬日晴好，积雪融化，长沙城清晰可见。

就薛岳的“天炉”计划而言，第十军是否能够守住长沙，是关键所在。如果在合围部队抵达预定位置前，长沙作为“炉底”先漏了，薛岳的计划将全盘泡汤。

第十军进入长沙前，军长李玉堂已拟定了防御计划：朱岳的第一九〇师固守长沙正北，周庆祥的第三师衔接第一九〇师阵地向东，负责浏阳门和城外大十字路一线的阵地；方先觉的预备第十师衔接在第三师的右翼，负责防守长沙东南经南门外修械所到湘江边一线阵地。

三十日，李玉堂军长发布保卫长沙的作战命令：

一、预备第十师：占领半边山、左家塘、林子冲、黄土岭、金盆岭、猴子石、水陆州之线，主力控制于黄土岭附近，拒止南犯之敌；并派便衣队于东山附近，预行潜伏，阻击敌人。

二、第一九〇师：占领新河正街、复兴寺、湖蹟渡、杨家山之线，主力控制于猴子山、湖蹟渡附近，拒止南犯之敌；并派便衣队（约一连）在枫林港附近，预行潜伏，阻击敌人。

三、第三师：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一个团控制于城东南地区，拒止南犯之敌；并派便衣队（约一连）于安沙、沙坪附近，预行潜伏，阻击敌人。

四、炮兵第一团第二营（附炮兵第一团之第一营第二连及炮兵第四团第二营第四连），占领岳麓山经水陆洲亘长沙市区之既设阵地，以主力协力预备第十师及第三师，一部协力第一九〇师之战斗。

五、各级之通信联络，须周密准备。务使在战斗最惨烈，或被敌军破坏时，仍能保持通信灵活，并限三十日午前完成之。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新年的第一天日朗风清。

日军第三师团以为不需要什么战斗，他们就能在长沙城里过新年了。“由于在上次作战（九月份）中，其他兵团，曾有过不经战斗而入城的先例，如今前方又没有发现敌情，友军飞机又投下占领长沙的标志‘日之丸’（太阳旗）的国旗，官兵们以兴奋的心情相互致意，今夜要在长沙为元旦举杯。”炮兵第三联队联队长宫永盖世大佐，甚至向步兵第十八联队联队长石井信大佐提前表示祝贺了——“途中以水筒里的酒，举杯庆祝，并互相商议放一发炮弹来祝贺。”

上午十一时左右，日军第三师团与中国守军预备第十师的战斗正式开始。预备第十师的中国官兵与有飞机和火炮支援的日军激战到十六时，阿弥岭阵地被摧毁，守军大半阵亡，预备第十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线阵地继续抵抗。十七时，日军扑向左家塘阵地，中国守军二十九团一营包括营长曹建业在内伤亡殆尽，阵地再次丢失。日军第三师团一部趁机从预备第十师和第一九〇师阵地的接合部穿插而入，绕到了预备第十师阵地的左侧后。师长方先觉迅速缩短阵地，将阵地左侧放弃，转而据守金盆岭、黄土岭一线阵地。十八时，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三师的警戒阵地，渗透到白沙岭的民房里，企图夺取天心阁制高点。在军长李玉堂的严令下，第一九〇师对左家塘实施反击，收复了这个据点后，派出部队围攻白沙岭民房里的日军。

日军的冲击轮番不止，防守长沙南门外阵地的三十团团长葛先才，拒绝了方先觉让他的团撤到城墙上的命令，他认为以攻代守定可挫敌锐气，即使死了也值得。葛团长对师长说的一番话令人热血沸腾：

绝对不可后撤。后撤只有南城门一条通道，撤入城内时，在官兵争先恐后的情况下，部队一定会自乱，而且敌我咫尺之隔，我一后撤，敌必尾随跟进，那才是真正危险。我都考虑过了，也准备好了，军人应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不计后果决心出击。我再不向你请示，也不要你增援，你只当三十团死光了。请你报告军长，说我不习惯挨打，发了蛮性，非出击不可，破釜沉舟与敌一拼，一切责任自负。师长即刻将南门关闭堵死，城墙上多准备手榴弹，如敌抢攻城门，手榴弹可以歼灭之。只要敌人不能由南门攻入，我预备十师就没有责任。万一三十团攻击顿挫，官兵也不会白死，定能得到其牺牲代价。不是敌死，就是我到黄泉，决计与敌偕亡。

葛先才的三十团官兵在凄厉的军号声中向当面日军猛扑过去，连临时上阵地送饭的五名炊事兵也跟随部队一起冲锋。长沙南门外的日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在岳麓山指挥所里的薛岳，听闻葛先才团的勇猛出击，大加赞赏。当晚，第九战区得到蒋介石的命令：葛先才团长晋升少将，师长方先觉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此时，日军第十一军的情报部门又一次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并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电报令阿南惟几万分焦灼，他必须在中国军队的合围尚未形成之前把长沙拿下来。阿南惟几急令第三师团加紧对长沙的攻击。从二日凌晨开始，交战双方在长沙东门和南门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和肉搏战，中国守军的阵地数次被日军攻占，但

大部分又被反击收复。战斗中，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附陈新喜中校、曾友文少校先后阵亡。二十八团向渗透到白沙岭民房里的日军加藤大队持续攻击，素以夜战闻名的加藤大队陷入绝望之中。凌晨二时，加藤大队长被子弹击穿腹部；紧接着，副官桥本光义和军曹川口定秀也被打死。中国官兵放火焚烧日军聚集的民房，百余名日军被烧死在火海中。第三师团命令一定要把加藤的尸体夺回来，于是日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都没有奏效。——日军坚持夺回加藤尸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身上有一份第三师团出动以来的作战计划和命令，这份文件上还记载有第三师团出发时所携带的弹药数字，这一数字将表明目前的第三师团已严重弹药不足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份文件已落在薛岳手中。

“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二日天亮之后，日军第三师团向金盆岭、黄土岭继续猛攻，在金盆岭防守的中国军队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二营与指挥部的联络中断，师长方先觉不得不集中起全师的火炮向金盆岭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二营残存的官兵在炮火中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下午，日军在南门受挫后，把攻击重点移到了东门附近，猛攻第一九〇师防守的四方塘、南元宫等阵地。阵地在残酷的手榴弹战和白刃战中反复易手，但日军始终没能实现完全突破。天黑了，蒋介石给死守长沙的第十军将领打来电报：

限两小时到。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密。我第十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分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中正手启。

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注定要一战成名。

奉命坚守长沙后，薛岳曾问方师长能守几天，方先觉说他的第一线能守两天，第二线能守三天，第三线再守两天，保证一个星期内不让日军攻入长沙。预备第十师的军官们听了师长的保证都很吃惊，说能守上三天就不错了。方师长从衣兜里拿出一封信，派人立即送到后方他的家

眷那里去。

这是一封遗书：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方先觉的遗书次日被刊登在《长沙日报》上。

长沙市民有读后大哭不止者。

方师长颁布了严格的军令：连重伤员在内，谁也不准后退，执法队可对擅自脱离战场者立即开枪；军官更是不得离开阵地，擅自离开者就地枪决。方师长执行军令绝对不含糊：二十八团有名营长在战斗激烈时出现在了师部，说是来向师长请示作战的，方先觉看了他一眼让他到门外等着，然后命令副师长将这名营长推到城墙下枪毙了。

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第三师团精疲力竭，伤亡惨重，由于后方交通被切断，补充困难，弹药即将告罄。

此时，中国军队第四军已经到达株洲。

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在赣北方向与日军对峙。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一部与武宁方向的日军对峙，一部控制在修水附近。

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在岳阳以南与日军对峙，其在新墙河前沿的部队是杨汉域的第二十军和孙渡的第五十八军。

战区直属的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担任汨罗江至洞庭湖东南岸一线的防御；陈沛的第三十七军担任汨罗江两岸长乐街至新市一线的防御，主力控制在汨罗江与捞刀河之间的蒲塘和栗山港附近；李玉堂的第十军负责守备长沙；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为战区预备队。

十八日，新墙河北岸的日军炮兵向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了数次试射；第六、第四十师团的小股部队也对中国守军的阵地进行了试探性

攻击。一切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在即。

二十日，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欧震的第四军从广东返回湖南，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由广西向湖南移动。

同日，薛岳下达了第九战区行动部署：

罗卓英率领第十九集团军战斗指挥所，二十一日晨由上高进驻浏阳，指挥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以及暂编第九军郭礼伯的第一九四师。第七十九军由衡阳乘火车运送株洲，限二十三日抵达；第一九四师向醴陵开进，限二十七日抵达；第二十六军负责浏阳河阵地的防御作战。

王陵基率领第三十集团军战斗指挥所，二十一日晨由修水进驻平江，新编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师全部开至平江附近。

杨森指挥第二十七集团军准备作战，其第二十军在新墙河南岸逐次抵抗日军，必须坚持十天以上，然后向侧面阵地转移；第五十八军在日军强渡新墙河时，由东向西侧击日军，协助第二十军作战，然后向侧面阵地转移。

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南岸防守，必须坚持十五天以上，然后向侧面的山地转移。

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确保现有阵地和洞庭湖南岸湖防，然后待命自西向东夹击日军。

李玉堂的第十军固守长沙，第一九〇师守外围，第三师守城内核心阵地，预备第十师守岳麓山。

十二月十四日，日军第十一军开始向岳阳附近集结。

二十三日，阿南惟几下达作战命令：

一、飞行第四十四战队，协助我军攻击。

二、军企图以第六、第四十师团，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开始攻击，在新墙东南地区击溃新墙河左岸地区之敌后，再击溃汨水左岸地区之敌。

三、第六师团应于二十四日夜发起攻击，在新墙西方地区突破敌线，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三江口（关王桥西南五公里）附近。

四、第四十师团应于二十四日夜发起攻击，在潼溪街东方地区突破敌线后，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关王桥附近。

五、第三师团应于二十日拂晓，以一部炮击潼溪街附近的敌阵地，协助第四十师团的攻击。主力转到第六师团的右侧，在新墙河渡河，捕捉所在之敌，进入归义附近。

薛岳的“天炉”已经在等着阿南惟几了。

中国第九战区位于新墙河最前沿的部队，是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二十军。薛岳把杨森的川军放在第一线颇有用意。杨森的部队出川抗战后，无论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还是长沙会战，川军在中国军队里算得上是打得不错的。更重要的是，川军有家族军队的传统，第二十军的主要军官都是杨森的子侄，他常对军官们说的话是：“龟儿子们，不要给杨家丢脸，要像杨继业七狼八虎抗击辽兵一样打鬼子。”现任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就是杨森的侄子，一家子合伙打仗自然不会含糊。

二十三日，杨汉域的防御部署是：夏炯指挥的第一三三师针对日军第六师团，位于战场的左翼，防御鹿角、荣家湾、新桥、三港嘴（不含）一线，阻敌十天后向南面的智源洞、三江口转移；杨干才指挥的第一三四师针对日军第四十师团，位于战场的右翼，防守三港嘴、草鞋岭、方山洞一线阵地，阻敌十天后向南面的三江口、关王桥转移；孔荷宠指挥的暂编第五十四师，位于战场的东面，负责防御九岭、麦市、斗米山一线阵地和赛公桥、铁柱港、通城等前进据点，保障新墙河一线阵地的右侧背。

从日军的作战计划看，在进攻的第一阶段中，无论是第六师团还是第四十师团，其攻击重点都在中国军队第二十军所在方向，可见日军一开始就想把杨汉域的第二十军先吃掉。

即使第二十军全军奋力血战，薛岳要求其三个师抵挡住日军三个师团十天的进攻，着实有点蛮横。

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的右翼阵地突出于新墙河以北，因此日军第四十师团必须把这部中国军队赶走，才能靠近新墙河的渡河出发地。二十三日凌晨，日军第四十师团步兵第二三四、第二三五联队，向新墙河北

岸的中国守军第一三四师四〇〇团发动了攻击，四〇〇团抵抗一天后退守新墙河南岸。

二十四日，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全部进入新墙河北岸阵地。凌晨，乌云密布，雨雪飘洒，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随着日军火炮的猛烈轰击，右翼的第四十师团率先向新墙河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击。日军在徒涉新墙河时遭到第一三四师的猛烈阻击，战至下午二时，日军突破了第一三四师的一线防御阵地。杨森命令集结在战场东侧的新编第十一师从黄崖市向杨林街推进，自东向西攻击，协助第二十军的作战；同时命令第七挺进纵队负责防御大云山、方山洞和八百市一线，第一三四师在方山洞的部队迅速向主力靠近，以便构成新的阻击线。晚上，雨雪下得更大了。日军第六师团向新墙河南岸中国守军第一三三师阵地发动了攻击，然后冒着中国守军的猛烈射击在黑暗中强渡新墙河。午夜，日军突破了第一三三师的阻击阵地，第一三三师主力向南撤退。二十五日清晨，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二十九旅团所属部队，在旅团长石川忠夫的指挥下，跟在第六师团的后面渡过新墙河，从战场的左翼方向沿着粤汉铁路两侧迅速南下。

中国守军的新墙河一线阵地，仅守了一天便被日军全线突破。

此时，日军三路并进追击撤退中的第二十军：东侧的第四十师团攻击第一三四师的二线阵地；中间的第六师团第二十三、第四十五联队攻击第一三三师三九八团阵地；西侧的第三师团攻击第一三三师三九九团阵地。混战持续到天黑，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与各师的联络都中断了，仅知道部队在混战中伤亡惨重。第一三三师同时受到日军两个师团的联合攻击，部队被打乱，形成了官兵各自为战的据点守卫战。守卫傅家冲和洪桥据点的三九八团二营和三营官兵，坚守阵地，誓死不退，击退日军的数次冲锋，给日军以大量杀伤，但终因兵力悬殊，守洪桥的三营副营长吕海群阵亡，守傅家冲的二营营长王超奎和官兵数十人全部战死。杨汉域军长登高观察战场，他格外关注第一三三师的战况：“十里纵横据点，敌我混战，枪炮声及轰炸声历历可闻。据报该师伤亡虽重，士气极旺。敌军因与我混战肉搏，死伤确较我惨重。”

在中国官兵死战之时，日军主力从各阵地间的缝隙迅速向南突击，在大荆街附近日军受到第一三三师三九七团三营的伏击。与此同时，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也与中国军队第一三四师在观德冲、十步桥等地展开了激战。特别是在对第二十军指挥部所在地关王桥的进攻中，日军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龟川联队在步、炮、工的协助下，攻击陈家桥东

一公里的斗南尖高地，第二中队虽攻进其一角，但屡遭逆袭，其夜虽进行了数次夜袭，但均未成功。重庆军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户田联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冒着风雪，从关王桥径直南下，插入重庆军的大部队里，所到之处，在短兵肉搏中竭力前进”。

应该说，在战场第一线阻击的第二十军已经拼尽了全力。

由于部队伤亡过大，杨汉域决定逐步撤出战场，按照原定计划转移。但是，二十六日天一亮，日军再次发起强攻，继续向第二十军压来。第六师团攻击第一三三师的羊角岭、三江口阵地；第四十师团在关王桥附近与第一三四师激战。下午，羊角岭和关王桥阵地丢失，日军继续向南冲击。为遏制日军的南下速度，杨森命令第五十八军的两个师迂回到两侧夹击日军。黄昏时分，关王桥以南的陈家桥等阵地被日军突破。此时，战场上雨雪交加，天寒地冻，气温降到此地罕见的零下五摄氏度。由于道路泥泞不堪，日军的机械化装备行进艰难，部队在彻骨的寒冷中苦苦前行。夜幕降临之后，黑暗加剧了寒冷和恐惧。但是，在南下日军的身后，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三九八、三九九团官兵仍在死追。午夜，杨森命令他们立即突围归队。两个团的残存官兵绕道而出，最终追上了主力。但防守黄沙街阵地的三九九团的一个连，在受到日军第三师团的火炮打击和步兵围攻后，全连官兵全部阵亡。

至此，中国军队第二十军在新墙河两岸与日军打了三天。尽管距离薛岳要求的阻击十天的限定相差还远，但这支川军部队作战不屈不挠，应该视为完成了预定任务。

二十六日晚，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前锋推进至汨罗江北岸附近，第四十师团前锋也突至汨罗江北岸渡口长乐街。

这时候，传来了日军占领香港的消息。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之所以批准第十一军的此次作战，只是为了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南下增援香港。现在香港已被攻占，第十一军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阿南惟几不这么想。他不但没有停止进攻，且于二十六日命令部队继续南进，把攻击矛头指向了防御汨罗江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

一、敌第三十七军，以第六十师、第九十五师在瓮江、桃花（瓮江西北五公里）、桐子山（长乐南十二公里）、湖源山（桐子山西南五公

里）、磨石山一线；又以第一四〇师从花门楼到周家湾（金井西南八公里）一线，各自占领阵地，企图长期战。

二、军准备对占领阳水左岸高地阵地的敌第三十七军，在二十九日天明前，发起攻势。

三、第三师团应在二十九日天明前，把位置向前移动到汨水左岸地区，对归义南方高地之敌，准备攻击。

四、第六师团应在二十七日以后，把位置向前移动到新市附近的汨水左岸，二十九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攻击。

五、第四十师团，应适时以主力向长乐东南地区前进，以一部向浯口对岸附近移动，二十九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发起攻击。

发源于幕阜山南麓的汨水，在归义附近与罗水汇合称汨罗江，江水西流注入湘江。每年冬季为枯水期，一般情况下人马车辆可以徒涉。但是今年入冬后，连日雨雪，江水暴涨，水深平均在两米左右。在这个方向上，汨罗江有三个主要渡口，其中的长乐街渡口和新市渡口位于岳阳至长沙的公路上；西侧的归义渡口在粤汉铁路桥旁边。这三个渡口控制着岳阳至长沙间的三条平行道路，因此是日军向南攻击的重点。

第九战区防守汨罗江沿线的部队，是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和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的两个师。沿着汨罗江南岸从左至右：第九十九军的第九十九师防守湘阴至营田以东一线；第九十二师防守归义两侧，当面的日军是第三师团；第三十七军的第九十五师防守新市、伍公市附近；第六十师防守长乐街至浯口、张家渡一线，第一四〇师控制在金井附近为军预备队，当面日军是第六、第四十师团。

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算不上是有名的部队，阿南惟几之所以用两个师团的兵力瞄准该军，原因是该军参加了前两次的长沙作战，至少在这个方向上是日军的老冤家。与防守新墙河的川军第二十军不一样，第三十七军是一支湖南本土部队。抗战爆发后，该军参加了长江一带的数次会战，每一次都因伤亡惨重不得不重新补充。南昌会战后，关麟征被免去军长职务，陈沛继任，现任的三名师长分别为：第六十师师长董煜、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和第一四〇师师长李棠。

二十七日上午八时，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向汨罗江边的中国军队第九十五师阵地发动攻击，被二八三团击退。下午三时，日军第四十师

团先头部队向第六十师防守的长乐街一线发起攻击，被一七九团击退。但是，在日军第三师团的进攻方向上，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师的阵地被突破，中午十二时左右日军开始强渡汨罗江——“汨水数日来由于风雪，河水不断上涨，浊流湍急，无法测量水深。”尽管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但担任前锋的日军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和鬼头三良少佐对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师的顽强抵抗印象深刻：

横田大队边以速射炮、重火器摧毁北岸敌人的星状据点，边在敌手榴弹的爆炸下，利用死角强行冲入敌阵，逐次摧毁北岸的敌阵地。另一方面，鬼头大队进入铁路桥的东侧，在重火器支持下第三中队于十三时三十分冒着飞雪强行渡过水深没胸的汨水河，冲入南岸的敌阵地。接着横田大队开始渡河，凭据掩蔽阵地之敌，虽一齐进行射击，但终于排除抵抗，渡河成功。登岸后未及晾干湿透的衣服，就继续扩大战果。第一线中队于十五时左右，推进到河南约二公里的地方，后续的驮马部队在将要渡河时，突然遭到巧妙隐蔽在铁桥桥脚附近的敌机枪从背后猛射，部队为了扑灭机枪又费了一些时间……担任警备驮马的一个小队，在从后方追赶中，连续受到三次袭击，几乎全部被歼。

二十八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部渡过汨罗江，继续迅速南下，但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师边撤边打，仍在不断杀伤日军：“伊藤步兵大队安全通过后，骑兵第三联队先头以军旗为前导，前进到距汨水七百至八百米附近时，突然遭到来自道路两侧据点的猛烈射击，联队副官当即负伤，军马六十四匹相继中弹倒毙。”晚上，双方对峙于粤汉铁路东侧的落马桥、大娘桥、神鼎山一线。

日军第六师团发起的攻击被中国守军击退后，下午，在火炮和战机的支援下，第六师团从兰市河再次发动攻势，与中国守军激战到天黑，日军突破兰市河附近的防御阵地后开始强渡汨罗江，但此时江岸的其他渡河点依旧在中国军队第九十五师手中。日军第四十师团清晨开始强渡，并猛烈攻击长乐街，中国守军第六十师防守长乐街的一个连的官兵全部战死，长乐街失守。入夜，双方对峙于李家河、刘家塘一线。

鉴于日军第三师团已经渡江深入，战场的左翼形势严峻，薛岳命令第三十七军预备队第一四〇师向铁路方向增援，暂归第九十九军指挥；命令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的指挥所向前推进，就近指挥第九十五师和第六十师的作战；命令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对日军实施夹击，牵制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的南进。

也是鉴于第三师团全部渡江，阿南惟几命令第三师团暂不向南推进，而是沿着汨罗江南岸向东，朝着第三十七军的后方福临铺前进，目的是将第三十七军包围歼灭。

二十九日，大雪，汨罗江两岸一片苍茫。

迂回的日军第三师团连夜兼程，凌晨时分进抵新开市附近，与退守该地的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遭遇。此时，增援而来的第一四〇师正在向第九十九师靠近。但是，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面对着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的攻击，压力巨大。第六师团从凌晨开始猛攻第九十五师的阵地，中国官兵凭借着险峻的山地阵地令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重庆军的抵抗极其顽强，从左右两方包围了联队本部，幸而飞行队的密切协助和第一线的反复冲锋，直到傍晚才完全将其击溃”。

三十日，天晴了。

但是，遍地积雪，寒风刺骨。

日军在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持下，对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发动了全线围攻。双方激战至中午进入胶着状态。下午，日军以第六师团一部继续围攻第三十七军，主力则从第九十五师阵地之间的空隙通过，迅猛向南穿插；同时，第四十师团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六十师的阵地。鉴于日军已经南下，第三十七军的阻击任务基本完成，如果再顶下去就有被围歼的危险，军长陈沛命令第九十五、第六十师向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的山地转移，部队变成对日军主力呈侧击态势。同时，陈沛也试图把日军主力吸引过来，为战区展开后续的作战部署赢得时间。

三十日深夜，与日军第三师团纠缠的第九十九军，按照薛岳的命令也开始脱离战场，向西撤退到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在粤汉铁路右侧的山地里隐蔽起来，与第三十七军形成从东西两面夹击日军的形状。

尽管日军早就冲了过去，但滞留在日军身后的杨汉域的第二十军一部，还在新墙河以南顽强作战。三十日晚，第二十军官兵在新墙河附近一个名叫长胡镇的地方，突然袭击了日军辎重部队第四十联队。联队长森川敬宇率部正在一座寺院里休息，中国官兵猛然冲进来，日军官兵惊惶四散，森川敬宇联队长被打死在寺院外的雪地里。

此时，日军的三个师团都已突破汨罗江，前面就是捞刀河以及隔河的那座久经战火的长沙城。

难题再次摆在了阿南惟几的面前：是否继续攻击？

对攻占长沙持反对意见的作战参谋主任岛村矩康和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向司令官提出了谨慎从事的意见。这令阿南惟几非常气愤，认为军官们“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他特地召开了军官会议以阐述他的观点。

二十七日，阿南惟几日记：

一、夜来风雪未停，温度降到零下四点五度，有薄冰。

二、参谋长和岛村参谋，从全面判断，大致似已认识到进攻长沙的必要性。余举其有利之处：

一、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

二、把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袭扰之感。

三、表明皇军尚有余力。

四、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足依靠。

五、予第六战区以威胁。

阿南惟几认为，只有用强大的武力表明日军在中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才能使他对整个战局的惶惑紧张稍感释然。

阿南惟几向中国派遣军发出了要求攻占长沙的电报。

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的回电并没有批准攻占长沙的请求，只是命令第十一军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阿南惟几大失所望。

二十九日十七时，日军的飞机侦察报告说，中国军队正大规模地向长沙退却。虽然中国派遣军的指示仍没抵达，但阿南惟几已经等不得了

——“乃独断决定命第三师团向长沙方面追击，同时向总司令官提出独断请罪。”

二十九日傍晚，阿南惟几下达了攻击长沙的作战命令。

晚上，负责后勤的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接到参谋长木下勇的电话，告诉他司令官已决定进攻长沙，命令他立即前来岳阳商议作战。

二见秋三郎极其不满，认为司令官完全在意气用事，根本不顾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补给困难。由于原定作战计划中没有攻占长沙的行动，因此一线官兵仅有紧急出动时每人随身携带的一百二十发步枪子弹，经过激战估计已经所剩无几了。弹药向前运输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军民把从新墙河南下长沙的所有大小道路都破坏了，加上河流涨水，桥梁或被冲断或被淹没，汽车根本无法通行。战斗开始以来，工兵部队顶风冒雪抢修道路，但中国军民将道路摧毁得十分彻底，根本无法修补，只能开辟新路。工兵们依据简陋的中国地图，在起伏的丘陵地带摸索，试图筑出一条可供车马行进的道路，但“与其说这是在修筑道路，不如说始终在砍伐树木开拓前进，因为在丘陵地开拓道路，道路都是用原木铺就的，遇到障碍就得迂回前进，遇到水田就得耗费很多时间，用束柴铺垫筑路。由于道路的迂回曲折，大大延长了筑路作业的距离……对于军工兵队来说，到达汨水，不眠不休地干了五天，在二十九日十七时，好不容易用原木铺设的兵站路才从新墙到达了大荆街”。更重要的是部队的士气。此时日本陆军的作战意志已与战争爆发初期截然不同。主力部队大多到太平洋战场去了，临时征召预备役兵组成了二等、三等师团，不但官兵作战经验不足，且士气普遍低落。日本战史明确地记载了第十一军全线突破汨罗江后的官兵心态：

自到达汨水河畔，在第一线官兵之间，都流传着“这次作战是为了牵制香港，到三十一日止，可能反转”等消息。然而现在进至汨罗左岸，并有南下的态势，官兵们关于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

二见秋三郎说得更为露骨：“此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阿南惟几的决定正中薛岳的下怀。

毫无疑问，如果日军就此后撤，中国军队予以追击，事后也可以称之为“大捷”。但是，薛岳知道，与前两次长沙会战不一样，日军在攻击

中已经显露出作战能力的下降；如果日军继续南下攻击长沙城，只要中国军队调动合理、部署周密、移动迅速、相互协同，不但完全可以在布置好的“天炉”里与日军拼一下，甚至使自己的军事生涯再辉煌一次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十日，薛岳向蒋介石报告了第九战区将与进攻长沙的日军决战的部署。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他提醒薛岳不要让日军在攻击长沙前就与围歼部队接触，也不要过早地使用战区的预备部队，一定要让日军先攻长沙，等攻不下来受到严重消耗后，再命令围歼部队出击。薛岳回电提出了由蒋介石亲自下达督促将领忠于职守的文件——大战将临，薛岳怕部队指挥官不上前线和不负责任等老毛病复发：

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

二、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

三、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薛岳规定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夜为总攻开始时间，限定各集团军在攻击发起后到达第一攻击线的最后限期为四日。

“天炉”就要点火熔炼了。

就在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按照作战部署开始移动的时候，日军进攻了——“第三师团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接到盼望已久的进攻长沙的命令，停止左迂回，立即在当日二十时命令各部队‘迅速由捷径，向长沙追击敌人’后，第一线各部队在‘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的口号下，开始踊跃前进。”如果说此时谁还有“踊跃”的情绪，恐怕指的是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因为只有他是坚决主张攻占长沙的师团将领。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接到攻击长沙的命令时，他的部队还在与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纠缠。神田正种虽然认为攻打长沙是不适宜的，但他绝不想让第三师团抢了头功，而阿南惟几命令他给第三师团作掩护就是对第六师团的侮辱。

日军第三师团开始急促地向南突进。

丰岛房太郎很快就会尝到“争功”的恶果。

冬日晴好，积雪融化，长沙城清晰可见。

就薛岳的“天炉”计划而言，第十军是否能够守住长沙，是关键所在。如果在合围部队抵达预定位置前，长沙作为“炉底”先漏了，薛岳的计划将全盘泡汤。

第十军进入长沙前，军长李玉堂已拟定了防御计划：朱岳的第一九〇师固守长沙正北，周庆祥的第三师衔接第一九〇师阵地向东，负责浏阳门和城外大十字路一线的阵地；方先觉的预备第十师衔接在第三师的右翼，负责防守长沙东南经南门外修械所到湘江边一线阵地。

三十日，李玉堂军长发布保卫长沙的作战命令：

一、预备第十师：占领半边山、左家塘、林子冲、黄土岭、金盆岭、猴子石、水陆州之线，主力控制于黄土岭附近，拒止南犯之敌；并派便衣队于东山附近，预行潜伏，阻击敌人。

二、第一九〇师：占领新河正街、复兴寺、湖蹟渡、杨家山之线，主力控制于猴子山、湖蹟渡附近，拒止南犯之敌；并派便衣队（约一连）在枫林港附近，预行潜伏，阻击敌人。

三、第三师：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一个团控制于城东南地区，拒止南犯之敌；并派便衣队（约一连）于安沙、沙坪附近，预行潜伏，阻击敌人。

四、炮兵第一团第二营（附炮兵第一团之第一营第二连及炮兵第四团第二营第四连），占领岳麓山经水陆洲亘长沙市区之既设阵地，以主力协力预备第十师及第三师，一部协力第一九〇师之战斗。

五、各级之通信联络，须周密准备。务使在战斗最惨烈，或被敌军破坏时，仍能保持通信灵活，并限三十日午前完成之。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新年的第一天日朗风清。

日军第三师团以为不需要什么战斗，他们就能在长沙城里过新年了。“由于在上次作战（九月份）中，其他兵团，曾有过不经战斗而入城的先例，如今前方又没有发现敌情，友军飞机又投下占领长沙的标志‘日

之丸’（太阳旗）的国旗，官兵们以兴奋的心情相互致意，今夜要在长沙为元旦举杯。”炮兵第三联队联队长宫永盖世大佐，甚至向步兵第十八联队联队长石井信大佐提前表示祝贺了——“途中以水筒里的酒，举杯庆祝，并互相商议放一发炮弹来祝贺。”

上午十一时左右，日军第三师团与中国守军预备第十师的战斗正式开始。预备第十师的中国官兵与有飞机和火炮支援的日军激战到十六时，阿弥岭阵地被摧毁，守军大半阵亡，预备第十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线阵地继续抵抗。十七时，日军扑向左家塘阵地，中国守军二十九团一营包括营长曹建业在内伤亡殆尽，阵地再次丢失。日军第三师团一部趁机从预备第十师和第一九〇师阵地的接合部穿插而入，绕到了预备第十师阵地的左侧后。师长方先觉迅速缩短阵地，将阵地左侧放弃，转而据守金盆岭、黄土岭一线阵地。十八时，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三师的警戒阵地，渗透到白沙岭的民房里，企图夺取天心阁制高点。在军长李玉堂的严令下，第一九〇师对左家塘实施反击，收复了这个据点后，派出部队围攻白沙岭民房里的日军。

日军的冲击轮番不止，防守长沙南门外阵地的三十团团长葛先才，拒绝了方先觉让他的团撤到城墙上的命令，他认为以攻代守定可挫敌锐气，即使死了也值得。葛团长对师长说的一番话令人热血沸腾：

绝对不可后撤。后撤只有南城门一条通道，撤入城内时，在官兵争先恐后的情况下，部队一定会自乱，而且敌我咫尺之隔，我一后撤，敌必尾随跟进，那才是真正危险。我都考虑过了，也准备好了，军人应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不计后果决心出击。我再不向你请示，也不要你增援，你只当三十团死光了。请你报告军长，说我不习惯挨打，发了蛮性，非出击不可，破釜沉舟与敌一拼，一切责任自负。师长即刻将南门关闭堵死，城墙上多准备手榴弹，如敌抢攻城门，手榴弹可以歼灭之。只要敌人不能由南门攻入，我预备十师就没有责任。万一三十团攻击顿挫，官兵也不会白死，定能得到其牺牲代价。不是敌死，就是我到黄泉，决计与敌偕亡。

葛先才的三十团官兵在凄厉的军号声中向当面日军猛扑过去，连临时上阵地送饭的五名炊事兵也跟随部队一起冲锋。长沙南门外的日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在岳麓山指挥所里的薛岳，听闻葛先才团的勇猛出击，大加赞赏。当晚，第九战区得到蒋介石的命令：葛先才团长晋升少将，师长方先觉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此时，日军第十一军的情报部门又一次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并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电报令阿南惟几万分焦灼，他必须在中国军队的合围尚未形成之前把长沙拿下来。阿南惟几急令第三师团加紧对长沙的攻击。从二日凌晨开始，交战双方在长沙东门和南门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和肉搏战，中国守军的阵地数次被日军攻占，但大部分又被反击收复。战斗中，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附陈新喜中校、曾友文少校先后阵亡。二十八团向渗透到白沙岭民房里的日军加藤大队持续攻击，素以夜战闻名的加藤大队陷入绝望之中。凌晨二时，加藤大队长被子弹击穿腹部；紧接着，副官桥本光义和军曹川口定秀也被打死。中国官兵放火焚烧日军聚集的民房，百余名日军被烧死在火海中。第三师团命令一定要把加藤的尸体夺回来，于是日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都没有奏效。——日军坚持夺回加藤尸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身上有一份第三师团出动以来的作战计划和命令，这份文件上还记载有第三师团出发时所携带的弹药数字，这一数字将表明目前的第三师团已严重弹药不足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份文件已落在薛岳手中。

“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二日天亮之后，日军第三师团向金盆岭、黄土岭继续猛攻，在金盆岭防守的中国军队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二营与指挥部的联络中断，师长方先觉不得不集中起全师的火炮向金盆岭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二营残存的官兵在炮火中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下午，日军在南门受挫后，把攻击重点移到了东门附近，猛攻第一九〇师防守的四方塘、南元宫等阵地。阵地在残酷的手榴弹战和白刃战中反复易手，但日军始终没能实现完全突破。天黑了，蒋介石给死守长沙的第十军将领打来电报：

限两小时到。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密。我第十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分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中正手启。

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注定要一战成名。

奉命坚守长沙后，薛岳曾问方师长能守几天，方先觉说他的第一线能守两天，第二线能守三天，第三线再守两天，保证一个星期内不让日军攻入长沙。预备第十师的军官们听了师长的保证都很吃惊，说能守上三天就不错了。方师长从衣兜里拿出一封信，派人立即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去。

这是一封遗书：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方先觉的遗书次日被刊登在《长沙日报》上。

长沙市民有读后大哭不止者。

方师长颁布了严格的军令：连重伤员在内，谁也不准后退，执法队可对擅自脱离战场者立即开枪；军官更是不得离开阵地，擅自离开者就地枪决。方师长执行军令绝对不含糊：二十八团有名营长在战斗激烈时出现在了师部，说是来向师长请示作战的，方先觉看了他一眼让他到门外等着，然后命令副师长将这名营长推到城墙下枪毙了。

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第三师团精疲力竭，伤亡惨重，由于后方交通被切断，补充困难，弹药即将告罄。

此时，中国军队第四军已经到达株洲。

第十九、第二十七、第三十集团军按照薛岳的部署正向长沙合围而来。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里“充满了忧虑之色”。

傍晚时分，军司令部命令第六师团：“应以主力进入第三师团的右翼，攻击长沙东侧和北侧。”

在投入第六师团的同时，阿南惟几命令第四十师团推进到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一线，特别要向东部的山区警戒，以保障攻打长沙的两个师团的后方安全。

阿南惟几已经意识到此战可能结局不妙。

三日拂晓，日军第六师团在长沙北门至东门之间、第三师团在长沙东门至南门之间，同时发动了攻击。神田正种本来就对第三师团“抢功”心怀不满，现在第三师团的攻击受挫，这正是第六师团首先攻占长沙城的好机会。天还没亮，第六师团就向中国守军第一九〇师的杜家山、陈家山阵地发起了攻击，日军战机也飞临阵地上空狂轰滥炸，陈家山阵地上的工事全被摧毁，中国守军退守南华女校阵地。第三师团攻击预备第十师的红石嘴、陶家冲阵地，葛团长的三十团拼死抵抗，阵地四次失而复得。方先觉把师部直属的工兵营、特务营和骑兵连加强到三十团方向，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中午，日军空投的伞兵被中国军队第三师九团包围消灭。下午，日军第六师团向南华女校阵地的攻击被击退。傍晚，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向东瓜山阵地冲击时，遭到预备第十师密集手榴弹的打击，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以下数百官兵伤亡。为了预防万一，薛岳命令第七十三军的第七十七师渡过湘江进入长沙城内，归李玉堂的第十军指挥，作为预备队控制在南门附近。

三日晚上，中国军队主力已从各个方向围了上来：第四军的第一〇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分别前进到长沙南侧的大托铺和白田铺附近，并完成了攻击准备；第七十九军已开始向侯家冲、东山方向的日军发动攻击；第二十六军抵达了莲塘、永安一线；第七十八军正向春华山推进；第十七军推进至金井附近；第二十军推进到福临铺和古华山一线；第五十八军抵达了竹山铺。——围歼日军的中国部队都已位于第一攻击线，并按照薛岳的命令向第二攻击线前进。

“一月三日，我军主力正向长沙城奋力攻击时，在其背后出现了令人可怕的重庆军约三十个师，正在压缩包围圈。”对于日军来讲，更可怕的是：长沙打不下来的时候后路出现危机。负责掩护后路的第四十师团在金井附近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袭击，各个联队都已陷入苦战。龟川联队的第七中队突然发现了向他们攻击而来的中国军队，“正再要求支援射击时，突然遭到如万雷齐鸣般的集中炮击，真锅中尉等陆续伤亡，阵地终于失守。第二中队中队长明神祥典中尉，立即组织残余兵力进行逆袭，虽然一时夺回了阵地，但明神中尉也终于战死。联队又将预备队第五中队增援上去，最后虽然勉强保住一角阵地，但各种弹药消耗殆尽，次日重庆军又增加压力，继续陷入苦战”——更令日军官兵胆寒的是，攻击第四十师团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在日军阵地附近的砖墙上用日文写出了这样一句口号：“湖南是日本兵的坟墓！”

三日上午十一时，阿南惟几走进气氛沉闷的第十一军指挥所，在参谋室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下午五时，参谋长木下勇和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向阿南惟几提议四日晚开始撤退。阿南惟几拒绝了这一建议。拒绝的理由来自因为受到挫折而处于尴尬境地的丰岛房太郎师团长的一系列误导：丰岛房太郎先是送来一张亲笔字条，字条是飞行第四十四战队的高山实中尉冒着中国军队的猛烈射击，在长沙城墙边用飞机的取吊筒吊上来的。丰岛房太郎在字条上写着：“敌有四道防线，在街道上设有碉堡，同时又凭据房屋防御，极为顽强。目前在师团右翼方面，已展开巷战，不久，可以取得战果。”接着，他又给阿南惟几发来电报：“我第一线部队现已冲进长沙敌阵地，继续展开巷战中，现在只差一把劲，希望把反转时间再延期一日。”

但是，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所有参谋都认为，不但长沙已不可能攻占，如不迅速撤退就要落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中。参谋们知道，第三师团的弹药已经使用殆尽，部队基本上失去了攻击能力。晚上七时四十分，参谋们再次聚集在阿南惟几的身边，提出了必须立即撤退的意见。

“于此，阿南军司令官，至于不得已批准了反转。”

日军第十一军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日军把他们的“撤退”称为“反转”：

一、我军将敌军牵制在长沙方面，已达到策应华南我第二十三军的目的，并且扫荡了长沙市内大部地区。大坪、青木飞行战队，密切地配合了本次作战。

二、我军自今起停止扫荡长沙，于一月四日夜开始反转，应击溃残敌，先向汨水一线前进。

三、军主力应于朗木梨市附近渡浏阳河，在其北岸等待集结，经过下列路线撤退。

第二师团：麻林市一福临铺一伍公市（新市东六公里）道路。

第六师团：麻林市一栗桥一（福临铺西八公里）一新市道路。

作战地界如下，线上及其西方属于第六师团：朗木梨市一牌楼铺一

羊鹿嘴（枫林港东侧）一黄土坝（麻林市西侧）。第三、第六师团的反转开始时间为四日日落后。

四、第四十师团以一部留在金井附近，以掩护军的侧背，主力即时开始行动，向春华山前进，击溃其所在地之敌，以利于军主力的反转。

五、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向麻林市前进，以利于军主力反转。

六、外园支队，到达岳州后，应迅速向界头市附近前进，击溃从西方干扰军主力反转之敌。

包括阿南惟几在内，第十一军的所有军官都清楚，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大量的中国军队正等着他们呢。

为隐蔽撤退企图，日军再次向长沙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第十军面临着最后一搏。四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万人向长沙城南的陶家冲和修械所阵地猛攻，两个阵地先后被日军攻陷，第十军发动反击把修械所阵地又夺了回来。八时，日军战机向东瓜山、修械所等阵地猛烈轰炸，修械所阵地失而复得五次以上。东瓜山阵地被日军横田大队黑岩中尉的第八支队攻占后，中国守军发动了极其猛烈的反击——

“占领东瓜山高地的第八中队的迫近战斗极为激烈，黑岩中尉终于战死，因为我方的弹药已经用尽，眼看着自上海作战以来的勇敢的黑岩中尉的遗体不能收容。”城北的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人，自凌晨开始攻击南华女校等阵地，与中国守军激战至下午，进展不大。中国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把辎重营和卫生队都编入了战斗部队，所属各团也把后勤兵全部投入与日军的血战中。就在预备第十师伤亡殆尽的时候，四日黄昏，获悉日军将要撤退的薛岳下达了追击命令：

一、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兼总司令，指挥第七十三、第四、第二十六各军为南方追击军，于一月五日拂晓开始：以第二十六军由牌楼铺经枫林港、麻林市、麻峰咀、长乐街道，向伍公市、长乐街追击；第四军由左家塘，经东屯渡、青山市、福临铺、李家煅、新市道，向新市、兰市河追击；第七十三军由长沙经石子铺、马鞍铺、栗桥、骆公桥道，向归义、骆公桥追击.

二、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兼总司令，指挥第二十、第五十八军为北方堵击军，在象鼻桥、福临铺、栗桥，自北向南堵击。

三、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司令，指挥第三十七、第七十八军为东方截击军，在枫林港以北、长乐街以南地区，自东向西截击。

四、第九十九军傅仲芳军长，指挥第九十九军主力为西方截击军，在石子铺、新市以南地区，自西向东截击。

五、第一四〇师为挺进军，向黄沙街、新墙挺进，攻击敌人。

就在薛岳发出追击命令的同时，日军开始撤退了。

日军第六师团刚撤退时，由于长沙方向有第三师团在身后挡着，因此并没有受到剧烈的攻击。但是，师团的卫生队、野战医院、辎重部队和大量的伤员严重拖了撤退的后腿。特别是运载伤员的驮马队，在受到攻击时，哪怕是轻微的攻击，“原来不能行动的重伤员，刹那间就不知消失在何处了，有的呻吟有的叫渴叫饿，收拾战场找回伤员重新搭载、查点人员等又耽误了时间，以至于更孤立于敌中”。第六师团最重要的任务是抢占浏阳河渡口要点朗木梨市，并以此为据点接应孤悬其后撤退的第三师团。但是，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已经控制了东山渡口，第二十六军也抵达了朗木梨市附近，迫使第六师团在浏阳河边陷入了与中国军队的激战。

日军第三师团指挥所，于四日天黑后从长沙城东约一公里的周家湾撤退。五日凌晨，第三师团抵达浏阳河边，但渡桥已被中国军队炸毁，第三师团不但看到第六师团正在与中国军队激战，自己也受到了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的堵击。而在第三师团的身后，中国军队第四军正由长沙城追击而出。在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的夹击下，日军第三师团顿时陷入混乱，大量的辎重和伤员壅塞在泥泞的路上，负责掩护的作战部队拼命抵抗，但撤退的速度仍旧十分缓慢。第六十八联队的伤兵和勤务、山炮、驮马等部队，遭到重机枪的密集射击，情急之下竟然开始往回跑。联队指挥部刚撤退不久，道路前方突然有人用日语向他们打招呼，走在前面的毒气队田中象二中尉以为是前面的驮马部队，急忙回答说是自己人，话音未落机枪子弹就横扫了过来——“这些人是从株洲北进属于第四军第五十九师的约五百名重庆军，为了截击我军，从昨日起就在此占领阵地，严阵以待。”第六十八联队在中国官兵的呐喊声中乱成一团。危急时刻，联队长野宪三郎大佐拔出战刀，命令官兵拼死保护军旗小队，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风暴一样袭来一“投掷距离如果再延长十米，人和军旗就都被炸飞了。”

第三师团受到阻击后，混乱地沿着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涌去，企图从来时的渡河点渡河。但是，磨盘洲对岸已被中国军队占领，强行渡河时毙伤和溺水死者达数百人。第十八联队护送着师团部从磨盘洲下游渡河，刚把军旗安置在一间民房里，院子里就落下了迫击炮弹，瞬间就把护卫军旗的士兵上半身炸飞了，而当时丰岛房太郎师团长就在隔壁。第三师团在磨盘洲渡河不成，下午回头企图向位于槊梨市的第六师团靠近，移动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军队第四、第七十九军的追捕，损失甚重。五日半夜，第三师团大部终于退到了浏阳河北岸，与第六师团会合了。

在金井地区的日军第四十师团，接到了向春华山前进以掩护第三、第六师团撤退的命令。在与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苦战数天后，第四十师团几近弹尽粮绝，勉强移动中各部队都处在不知所措中，因为伤员和辎重队不能跟随行动，于是“与多数伤员一同被留下的龟川联队，笼罩着悲惨的气氛。特别是师团没有可以补给的军需品，留下的弹药只有当初的百分之二十，步枪子弹每人不过十至十五发，手榴弹每一分队只有一至二枚”。为了支撑第四十师团作战，第十一军试图给他们一些补给，然而最后空投下来的竟然只有十发山炮弹。

六日，蒋介石再次敦促第九战区部队全力合围日军：

特急。第九战区杨副长官、王副长官、五十八军孙军长、二十军杨军长、三十七军陈军长、七十八军夏军长。密。此次长沙会战，举世瞩目，现敌主力已被我击破，残部现由捞刀河纷纷向北溃退中，我军欲期获得完全胜利，与空前歼灭战果，全视各军能否施行果敢勇猛之包围与截击。仰严督所部，不惜任何牺牲，发扬最高度攻击精神，努力围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之战绩。倘有堵截不力，纵敌逃逸，定予严办。仰即知照并转饬遵照为要。渝。中。

七日，晴空万里。

日军第十一军调来的一个轰炸机中队，对追击中的中国军队进行持续轰炸。晴朗的天气使日军飞行员将地面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于是阿南惟几接到了空中侦察报告：在第三、第六师团两侧以及前后，大批中国军队正在急促靠近，特别是第六师团将要通过的正前方栗桥附近的隘路已被中国军队占领。这一报告令第十一军的参谋们认为：“各兵团在近期内摆脱敌人是困难的。”

八日，日军第三师团撤退到福临铺南侧，与福临铺北侧的第九混成

旅团对在该地阻截的中国军队第五十八军实施夹击，中国守军的阵地被突破，第三师团向新市方向退去。日军第四十师团从罗家冲向彭家坊方向撤退时，遭到中国军队第七十八军和第三十七军的截击，损失严重。在第六师团的撤退方向上，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已经追到栗桥附近并开始侧击。前面有中国军队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挡路，第四军和第二十六军已经追至麻林市，日军第六师团再次陷入重围。日军的一个支队企图从新市方向接应第六师团，遭到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军的阻击。第六师团又折向东面的杨家湾方向寻找突围机会，但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正向杨家湾截击而来。日军第六师团原定的撤退路线已经全被打乱，师团长神田正种不断收到军司令部要求他改变路线的命令，空中的飞行员也不断地报告中国军队合围他的位置。在寻找突围方向的过程中，第六师团被分成了三个相互隔离的部分。

“曳光弹像流星般纷飞，同时还夹杂着冲锋的喊杀声。”——日军第六联队由于负责护送担架队而境况悲惨，担任前卫的第十三联队也已陷入包围。在接近麻林市的时候，联队长友成敏大佐发现无路可走了，只能跑到路边的山上与包围而来的中国军队展开搏斗。中国官兵“连续不断成群蜂拥而至”，日军的炮手、机枪手相继战死，战场上充斥着喊杀声，“到处展开了手榴弹战”。不久，第十三联队的子弹和手榴弹消耗殆尽，只能用刺刀来维持局面。友成敏命令各大队突围，日军立即陷入混乱中，被中国军队切割成碎片，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到处受到追杀。跟随友成敏联队长突围的是军旗小队、士官候补小队、通信和工兵小队以及驮着行李的驮马队。当这支突围队伍行进到一个名叫梅薮桥的村庄时，“部队正好暴露在毫无遮蔽的水田小路上”，于是成为中国军队的“火力网中心，士兵接连被击毙”。中国军队已迫近距日军四十至五十米处，喊杀声四起，手榴弹如雨，“驮马部队像被捅了马蜂窝似的骚乱起来，通信班已经做好了烧掉文件的准备”。混乱中，友成敏拼死向北跑，跑到福林铺附近找到师团部时身边的官兵所剩无几。

第六师团的师团部也陷入危机。尽管负责保护师团部的直属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拼死抵抗，但依旧挡不住中国军队潮水般的攻击。中国官兵冲到了指挥所周围，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在四周爆炸。第六师团司令部全体指挥军官和通信队的士兵都进入战斗配置。躲在民房里的神田正种心神不宁——“敌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甚至以为指挥所坚固的土墙也会倒塌。”

此时，南下接应撤退部队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抵达珠影山下。旅团长池上贤吉决心攻克珠影山，把被包围的第六师团营救出来。为

此，他临时组成了一支由山崎茂大尉指挥的突击部队，携带手枪、战刀和轻机枪，于九日凌晨偷袭了珠影山上的中国守军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师的指挥所。珠影山制高点的丢失使得杨汉域的第二十军形势严峻：日军第三师团为解救第六师团，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已闯到了第二十军的阵地前，而山崎大队在珠影山上居高临下，三面受敌的第二十军侧后受到严重威胁。杨汉域当机立断，决定军直属的骑兵连、特务连、工兵连，加上第一三四师一部，向山崎大队发动进攻，把珠影山夺回来。天亮了，双方在山上混战，山崎大队渐渐不支——“十时左右，我弹药用尽，在到处的草丛中，可以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和自绝的手枪声，山崎大队长负伤，满身是血。”在派出一名军曹突围而出去向旅团报告情况后，“山崎大队长再度遭到迫击炮的轰击而死亡。接着士兵们就用刺刀互相刺杀或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

神田正种得知第三师团奉命派出部队前来解救他时，非常愤怒——“第六师团长的自尊心很强，对于派兵救援感到不快，情绪激愤，当即向军司令部报告称，因已脱离险境，救援已无必要，感谢好意。”但是，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认为，正是因为第六师团的“胆怯及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地配合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夹击当面的中国军队，才导致山崎大队的覆灭，深陷重围的神田正种的这番报告，完全是不顾官兵死活的个人失控行为。

十日，中国军队第七十三、第四、第二十六军继续对第六师团围追堵截。第六师团在付出巨大伤亡后，在大批战机的掩护下，艰难地退向麻峰咀方向。十一日，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三师团陆续冲出中国军队的合围，继续向北撤退。第四十师团也从春华山东侧北撤。中国军队第九十九军和第三十七军在麻石山、麻峰咀等地努力拦截，但日军相互掩护，边打边撤。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在新市附近遭到围攻，第一大队大队长森胁常市少佐被打死；担任全军后卫的友成联队“处于弹尽粮绝、不眠不休、继续进行殊死战斗的情况中”。十二日，日军大部退回到汨罗江以北地区，中国军队依然没有放弃追击，第七十八军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追击。十三日，感到已基本冲出重围的第六师团开始收容溃兵，但负责收容的平冈联队第六中队却在麻石山中迷了路，四周到处都是中国军队的堵截——“平原中队长在队伍的最尾部，指导战士撤离，终于中弹身亡。”

十五日，中国军队一面在汨罗江以南寻歼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的日军阵地发动攻击。

十六日，日军大部退至新墙河北岸的原阵地，中国军队的追击停止。双方基本上又回到了战前的对峙态势。

阿南惟几的第十一军战斗指挥所撤回了汉口。

十八日，第十一军在汉口设立灵堂追悼死者。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日方战后的发布是：日方战死一千五百九十一人，其中军官一百零八人；负伤四千四百一十二人，其中军官二百四十一人。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二万八千六百二十一具，被俘一千九百六十五人。

中方战后的发布是：日军死亡三万三千九百四十一人，其中联队长四人、大队长五人、中队长六人，其他校尉官三人；负伤二万三千零人，俘虏一百三十九人，其中中队长一人。中国军队阵亡军官二百七十九人，士兵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人；负伤军官七百八十三人，士兵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三人；失踪军官二十六人，士兵二千一百二十五人。

可以肯定地说，日方公布的伤亡数字大大打了折扣。

此次作战，日军一反不遗弃尸体的规定，在战场上遗留了大量尸体，战后由中国官兵加以掩埋。即使从日本战史的叙述上计算，日军实际伤亡数字也大于其公布数字。仅以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为例，该联队最后幸存官兵不足五百人，由此可见日军伤亡之惊人。

中方公布的日军伤亡数字，由于依据是薛岳报来的数字，显然也有夸大的成分——日军总参战人数不过十万左右，如果按照薛岳的报告，日军伤亡共计近六万之多，那岂不是日本第十一军的主力师团已被歼灭得所剩无几？

无论如何，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对侵华日军的一次严重打击，是中国抗战军队的一次空前的胜利。这既是薛岳部署的“天炉”所致，也是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所致：贸然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理由和目的都很勉强，补给准备严重不足——“我军在兵力上与上次长沙作战比较，步兵方面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特别是在日军抵达汨罗江畔后，阿南惟几擅自下令攻占长沙，“情报以及兵

站都没有充分准备”，部队是“完全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

毫无疑问，薛岳的“天炉”战法可圈可点。中国第九战区作战指导正确，广泛发动抗日民众，彻底破坏了战场道路，运用层层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手段，成功地把日军拖入了合围圈内。而防守长沙城的第十军死守不退，坚决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尽管伤亡巨大，但确保了“天炉”战法的顺利实施。毋庸讳言的是，此战还是暴露了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以及武器装备落后等弱点：尽管薛岳严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十天，第十七军守汨罗江十五天，可无论官兵如何拼死作战，在日军的强势火力和进攻面前也就能守两三天而已。另外，中国军队在合围和追击阶段再次暴露出固有的顽疾：协同不力，行动迟缓，指挥官控制要点的意识和彻底围歼敌人的决心不够，这些都影响了此次会战最终的歼敌效果。在日军刚刚从长沙撤退时，中国军队完全控制了浏阳河渡口，炸毁了日军架设的军用桥梁，此时又是日军战斗意志最为沮丧的时刻，但由于部队行动不够迅速等原因，中国军队没能再次形成大量歼敌的局面。在汨罗江北岸一带，中国军队多次将日军第六师团完全包围，但由于攻击手段和力度有限，最终还是让日军第六师团在其他部队的接应下突围而出。

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之际，正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战胜之时：一月二日，日军第十四军攻占了美军防御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十一日，日军第二十五军攻占了英军防御的马来亚首都吉隆坡，第十六军攻占了荷兰军队防御的东印度群岛婆罗洲。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可谓一枝独秀，不仅严重挫伤了日军的士气，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也给予惨败中的盟军一定的鼓舞。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伦敦《每日电讯报》这样报道了中国军队在长沙的作战。

《泰晤士报》也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电祝贺，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都说长沙之战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

长沙会战期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反法西斯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的抗战牵制着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

部队，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对太平洋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十二月三十一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提议建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表示同意。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正式宣告成立。

但是，同盟国的战略重点依旧是欧洲而不是亚洲，更不是中国。

蒋介石担任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只是个空头职务，因为当时的越南和泰国都已经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蒋介石指挥的盟军部队。

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还要自己坚持下去。

成为同盟国成员的中国必须要尽国际义务，尽管这对在持久的战争中已经穷困疲惫的中国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战区的军队就要远征了。缅甸方向的英军一溃再溃，中国军队必须前往增援。

对于中国而言，前门刚把日军打回去，后门却出现了危机。

第二十八章

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战

英国，一个靠最早对外扩张、掠夺海外殖民地而发家的岛国，近代以来在工业化、宪政制度和殖民政策的推动下积累起大量财富，是最先崛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曾被全世界称为大不列颠帝国。与伦敦浓雾笼罩的天气相匹配，英伦三岛上除了劳作的农民和疲惫的产业工人之外，上流社会黑色的礼帽、局促的燕尾服以及充满繁文缛节的社交舞会给近代世界塑造出一种阴郁刻板的“不列颠绅士”形象。

掌握大英帝国国家权力的“绅士”们是一群自私懦弱的人。

自晚清以来，英国始终以在华利益居于列强之首的姿态出现。因此，日本入侵中国后，日本人的每一个动作都与英国的在华利益发生着冲突。但是，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限于自身国力不再强悍，更限于欧洲形势的不断恶化，英国人在远东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列强之首的地位荡然无存，对日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忍让乃至取悦，如同一个强盗遇到了一个比自己更凶的强盗一样——强盗取悦强盗的方式只有一种：把自己抢来的东西“贡献”出来。

在中国，最令日本人垂涎的，是英国人拥有的大量金钱以及具有特权的租界。英国人在中国储存的金钱数量惊人，由英国人掌握的海关税收同样数量惊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把中国政府存放在天津和秦皇岛两处中央银行的海关税款，全部改存到日本人于天津开设的正金银行里。十一月，日军攻占上海后，日本人又要求英国按照天津之例，把存放在中央银行的上海海关税款存放在日本银行里。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海关税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英国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与日本人进行了半年的讨价还价，最终还把中国政府排斥在外，与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之协定》。根据此《协定》，英国同意把中国沦陷区各海关税款乃至现已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全部税款，改存在日本银行里。英国人声称此举对中国有利，并威胁中国方面不得反对。——中国国土上中国人的权益，竟然由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新生的军国主义国家一起支配，而中国人连说一个“不”字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懦弱的英国人不断地向以武力逞凶的日本低头，使大英帝国在远东蒙受了“第一次耻辱”，同时使中国的海关税收被拿去“供敌人

置办弹火之需”。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国土上遍布着列强的租界，其中以英国租界历史最久、权益最大。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的一座又一座城市，而城市里的租界却是日军无法有效实施统辖的“飞地”，因此也就成为沦陷区里中国抗日力量的聚集地。中国的爱国人士利用租界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主张，购买抗日物资，设立秘密电台和情报网络，实施惩办汉奸等活动。一九三九年二月，汪精卫南京伪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和亲日的财界要员李国杰在上海租界被暗杀，同时受到袭击的还有两名日军军官；五月，亲日的厦门商会会长洪立勋在鼓浪屿租界被暗杀，导致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鼓浪屿登陆搜查。当时的外国租界里依旧允许流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租界当局也与重庆保持着联系，甚至曾拒绝日方进入租界抓人。由此，日本不断地向英国施加压力，英国租界当局只有采取退让态度，宣布禁止在租界内进行抗日活动。

在日本人与列强就租界问题发生的冲突中，以日方突然宣布封锁天津英法租界而酿成的“天津事件”影响最大。

天津租界占地达六千多亩，列强在租界内开设了银行、洋行和数百家工厂，其中英国皇家四大银行“怡和”“太古”“仁记”和“新泰兴”都聚集其中，天津租界成为英国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一九三九年四月，伪联合储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兼海关监督、大汉奸程锡庚在租界里被抗日力量暗杀，英国租界当局逮捕了四名“嫌疑犯”，但又不愿意把这四个人引渡给日本人。日本人立即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包括封锁租界并对往来的英国人进行人身检查等等。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六月十九日，日本人在天津英租界四周拉起电网，并通上了电。中国北方一座城市里嗡嗡作响的电流声把遥远的英国内阁里的绅士们吓坏了——电网通电的当天，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英国没有力量对付远东的日本，必须与日本人达成妥协。英国派出的谈判代表是驻日大使克莱琪，日方的谈判代表是外相有田八郎。日本人设定的先决条件是：要求英国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既成事实。七月二十四日，双方分别在伦敦和东京公布达成的一份协议，这就是被称为另一个《慕尼黑协定》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人竟然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法的：“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正处于广泛发展着军事行动状态下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注意到在华日本军队为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控制地区的公共秩序应有特殊的需要，凡有妨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的行动或因素，日本军队均不得不予以镇压或消灭。英国政府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或措施，为保证自己的立

场，指示在华的英国当局和侨民应当拒绝此类行为和措施。”

《协定》引起国际舆论的大哗和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致电伦敦《新闻纪事报》指出，在日本侵略者称霸亚洲的野心暴露无遗之时，英国政府的懦弱“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

……即使撇开道义的立场，而专就利害而论，吾人亦不能想象像英国能真正与日本妥协。因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妨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如此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亦无异于帮助日本撕毁九国公约，英国何能背信蔑义，甘与侵略国相附而放弃其对华久远之友谊？……何况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日本军阀怀挟其所谓“神圣使命”之统治亚洲的狂想，既如此其深切，则英国欲为保护其在中国之利益，即使欲作暂时的让步，亦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即使英国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之利益，悉数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除非英国全部放弃其在远东一切之所有，换言之，即使放弃印度，放弃澳洲，放弃纽斯伦，乃至放弃其在红海以东一切的势力，或者可以获得十年至二十年的相安。何况照现在所发表如此空泛而不可捉摸的协议，而谓即能真正妥协，其谁信之？此次究为日本欺英国，或英国欺日本，徒使世界人类迷惑如入五里雾中而已……

英国人很快就会尝到对日本懦弱的后果。

日本人变本加厉起来：要求英国在其租界内禁止法币的流通而发行伪“联银券”，并把中国政府存在租界内的价值五千三百五十万元的银锭交出来。当时，中国的法币正在发生危机，一旦英国禁止法币在租界内流通，势必会令法币的信誉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导致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这对在中国拥有投资利益的英国来讲也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时，将中国政府暂时存放在租界中立银行里的白银交给日本人，势必会严重地伤害中国，自然也会严重地损害英国在世界上的商业信誉。一九四〇年六月，欧洲战局开始恶化，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英伦三岛危在旦夕，心惊胆战的英国人出于对德国盟友日本的惧怕，竟然全盘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不但在租界里开始流通伪“联银券”，且将中国政府存放的白银最终加上了日本人的盖印铅封。更有甚者，英国人在把中国的财富奉献出来之后，又答应了日本人的另一个要求：封锁滇缅公路。这一条，对于仍在独自抗战的中国几乎是致命的。因为随着日本占领法属越南北方，滇缅公路已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唯一的国际外援交通动脉。

中国的云南地处边陲，大江纵横，高山耸立，峡谷幽深。虽然云南向南至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从地理上看是中国内陆通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但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云南境内还没有一条通往省外的公路。一九二一年，云南当局开始修建昆明至下关的公路，但工程进度极其缓慢。“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可能的意外事件，云南成立了省公路总局，由省府主席龙云亲自任督办，以加紧公路的建设。一九三五年，滇西线的土路建成通车。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龙云向蒋介石建议修建滇缅公路，理由是东南沿海港口丢失后，滇缅公路可成为日军鞭长莫及的直通印度洋的可靠通道。在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滇缅公路建设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陆续开工。

无论从哪方面讲，滇缅公路都是世界上的险峻公路之一。公路要翻越横断山系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巨大山脉，还要横跨过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等深谷激流，高山对峙，江水怒号，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修建如此艰险的公路，国民政府的补贴和云南自筹的资金极其有限，最为严重的是缺乏必要的筑路设备，以至于滇缅公路几乎完全靠云南数十万各族民工以无偿的劳作和近乎原始的施工方式修筑完成。地处边陲的汉、彝、白、傣、回、苗、壮、景颇、阿昌、崩龙、傈僳等十多个民族的民工，自带干粮和简陋的工具，越过峡谷激流聚集在蜿蜒曲折的筑路工地上。冬天高山极寒，夏日谷地湿热，衣不裹身，食不饱肚，蓬头垢面，疾病流行，唯一的报酬是政府每天补给他们的两角钱。在与高山大河的搏斗中，民工们使用的仅是农耕的锄头、扁担和箩筐，还有一双勤于劳作的手。过劳、疾病、落崖、坠江、土石掩埋等等恶况，使得这条通往云南省外的八百余公里的普通公路，竟然夺走了三千多人的生命，平均每修建一公里就死亡三人以上，而伤残者竟达数万。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考察滇缅公路的修建时，作出过这样惊人的评价：这种精神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地处边陲的普通中国民众未必懂得什么是国际交通线，也未必懂得一条公路对于抗战中国之生死攸关，他们只知道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修建这条公路是为了国家最后的抵抗。——云南人为抗战中国流的血与泪，将永远印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

滇缅公路对中国的抗战至关重要。

一九三八年，从黑海港口敖德萨装运的六千吨援华军火从缅甸的仰光港卸货，然后用火车运输至腊戌，再经滇缅公路运至昆明，这是滇缅公路建成后运达中国的第一批外国援华物资。至一九四一年底，每天在

滇缅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有上千辆，月运量最高时有一万吨以上。尽管汽车运输的运量有限，囤积在腊戍的各种物资积压如山，但终究这条险峻的公路依旧在通行，成为支持中国抗战的一条输血管。

但是，血泪筑成的抗战中国的生命线，被英国人封闭了。

“缅甸这一地名给日本造成深刻印象，恐怕是从它作为援蒋路线之一，突然引起世人注目的时候开始的。”日本人十分清楚滇缅公路对中国的作用，因此在公路建成之初，就开始策划如何将其切断。而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轰炸昆明以及滇缅公路的空军基地。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军占领河内后，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调集百余架战机，对滇缅公路进行持续不断的破坏式轰炸，其主要目标是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为了迅速修复湍急江水上的桥梁，中国方面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滇缅公路始终没有被彻底炸断。

日本人转而对英国人进行威胁。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照会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要求英国采取措施以确保任何战略物资不得通过缅甸路线或香港通道运往中国内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陈兵香港边界。胆怯的英国人试图拉上盟友美国壮胆，要求美国和英国一起对抗日本，但美国人的答复是：“既不向日本作重大让步，也不采取任何反对他的行动”，以避免招惹日本人“发动战争”——“只要英国继续顶住德国，美国舰队留在太平洋，日本将继续‘蚕食它所能吃掉的东西’，而不致冒发动一场大战的风险。”——美国人所说的让日本继续“蚕食它所能吃掉的东西”，显然是指中国。于是，七月十七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签订了《英日关于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决定停止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输送武器、弹药、汽油、卡车和铁路器材。这一协定，于七月十八日由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上院对外宣布。丘吉尔的解释是：“英国在欧洲正从事一个生死存亡的战事，不能再在他处树立新的敌人。”

就在英国与日本签订协议的第二天，日本内阁发表了“大东亚新秩序”的国策声明，声明把英国人在远东的殖民地统统划入了日本人的“共荣圈”里。

英国人的懦弱甚至受到了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

谴责，他们纷纷敦促英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人重又开放了滇缅公路。英国人终于对日本说出了一个“不”字，真正原因是基于美国对日态度的变化。一九四一年，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各类军用物资在缅甸东北部的腊戍堆积如山，都等着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如果英国人仍旧封闭滇缅公路，就等于在与美国人作对。同时，罗斯福的一番话对丘吉尔的触动很大：“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这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苏联与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说到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日军会去“干什么”，丘吉尔自然要想到英国在远东的那些殖民地。

英国人的远东殖民地岌岌可危了。

日本人发动南方作战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美、英以及荷兰在东南亚的主要根据地，并占领和确保南方重要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俾斯麦群岛、荷属帝汶岛等。”就殖民地的面积来讲，上述占领范围尽管尚未把印度列入在内，但依旧还是英属殖民地面积最大。日军将占领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缅甸称为第一阶段的四大战役——英国由此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

英国人曾于一八二四年、一八五二年和一八八五年三次入侵缅甸，使其沦为英属殖民地，但英国在东南亚的最大殖民地还是印度。日本人在南方作战的第一阶段没有把印度列入其中的原因是，印度的国土面积很大，是英国人防御的重点；另外，印度人正持续不断地争取民族独立，这使日本人想对印度不战而得。要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必须占领缅甸——“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据点，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来说切断援蒋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使其脱离英国的重大政略意义。”

缅甸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陆地与中国、印度、泰国、老挝、孟加拉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扼守由马六甲海峡前往印度洋的要冲。全境狭长而多山，南北长约二千零九十公里，东西最宽处仅约九百二十五公里。除面临印度洋的沿海地区外，其东部、北部和西部都是山岳高原地带，国土总面积约为六十七万七千平方公里。就

纬度而言，缅甸北部已进入亚热带，而中南部则属于热带，全年分为雨季和旱季。每年五月到十月的雨季，雨水数月连绵，潮热的雾气中人畜极易感染疾病；而从十一月到第二年的四月为旱季，几乎无雨。缅甸的地形走势北高南低，主要分为东部的掸邦高原、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盆地以及西部的阿拉干山地，上游为中国澜沧江的湄公河、上游为中国怒江的萨尔温江以及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江自东向西纵贯全境。在缅甸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行政地理上形成了上、下缅甸两个部分：以中部的曼德勒城为界，南部为下缅甸，多为盆地小平原；北部为上缅甸，多为山地。下缅甸的中心城市是仰光，为缅甸首都；上缅甸的中心城市曼，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以及国土腹地的水陆交通枢纽。

缅甸的山脉和河流多是南北走向，沿着河谷修建的铁路和公路与河流一起，形成缅甸特殊的贯通南北的交通走廊。从军事上讲，这种南北进出容易而东西运动困难的地形，导致战事往往发生在南北走向的幽深山谷中或山间盆地里。因此，仰光和曼德勒，这两座城市的得失至关重要。一旦失去仰光，缅甸犹如南部大门洞开，大军可沿交通走廊向北突进。从仰光北上曼德勒，勃固、同古、彬文那等要镇扼守在交通道上；从曼德勒向东北至腊戍、向北至密支那，既是缅北铁路的终点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以上两个重镇与曼德勒东北方向的另一重镇八莫，均为中缅边界地带的战略要冲，任何一点被突破，大军便可沿公路或铁路通道直冲中国的滇西地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席卷了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同时，英国人在亚洲通往印度洋的门户新加坡也被日军占领。惊魂未定的英国人放眼远东，发现再也不能失去缅甸了，否则英国将失去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不但会严重危及印度的安全，且会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根基。可对日本人来讲，占领缅甸势在必得：其一，作为南方占领区的西侧屏障，占领缅甸能防止盟军从西侧反击，同时还能以缅甸为跳板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国陆军会师；其二，占领缅甸可取得对印度洋的制海权，不但能有效地支援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还可从海上威胁印度和中东；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占领缅甸北部后，滇缅公路将被彻底封闭，日军就可实现从西南包围中国的企图，以便向中国抗战大后方实施直接攻击。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苦于兵力不足，对于攻占缅甸，东京大本营的设想是：开始只攻占南部地区，占领空军基地，等情况允许后，再进行缅北作战。根据这一设想，大本营命令占领泰国的饭田祥二郎的第十五军进行攻占缅甸的准备。

日军第十五军的基干部队是第三十三师团和第五十五师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抵达泰国曼谷。他命令负责确保占领泰国的第二十五军近卫师团归建；第三十三师团经海运从曼谷登陆；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在曼谷以西的达府、麦索一带集结，其一部向北至泰缅边境处的北碧以西地区集结。

十四日，日军攻占缅甸最南端的维多利亚角，夺取英军机场，取得了空袭仰光的空军基地。同时，日军强征泰国百姓昼夜不停地修建入缅道路，并依据热带丛林作战特点把一线师团的车辆部队改成驮马部队。日军沿着泰缅边界部署了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对缅甸的仰光、中国的昆明以及滇缅公路展开了大规模轰炸。此时，中国空军已基本丧失战斗力，英国空军的战斗力低下，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是由美国人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十二月二十日，日军空袭昆明，美国志愿航空队升空迎敌。毫无防备的日军突然遭到迎头截击，急忙丢下炸弹返航，但受到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拦截。空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美国飞行员一共击落日军轰炸机九架，美国人的战机只有一架受伤迫降，飞行员被中国农民成功营救。这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在各个战场上频频得手的日军第一次受挫。当天晚上，昆明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中国人为勇敢的美国飞行员披红戴花，称赞他们是“空中飞虎”——“飞虎队”一战成名！

二十三日，飞虎队的十五架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的十架战斗机，迎战前来轰炸仰光的日军五十四架重型轰炸机和二十架战斗机。飞虎队击落日机二十五架，自身损失战机三架，两名美国飞行员阵亡，一名跳伞生还；英军击落七架日机，自身损失十一架，五名飞行员阵亡。二十五日，日军出动六十架轰炸机，在三十二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前来仰光上空复仇。空战再次持续一个多小时，美英战机几乎耗尽了油料和弹药，大部分战机在战斗中受损，但飞虎队还是击落了十九架日机。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后，立即把第五飞行集团调往泰国，以便加大空袭仰光的强度。在二十八日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共击落日机五十架，而飞虎队仅损失战机两架，英军战机被日军打下来十架。美国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抗战，队员们驻扎在昆明，这群彪悍的美国人在战机数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日军作战，尽管神勇无比，但终究是战机损失一架少一架。于是，蒋介石急切地要求飞虎队留在昆明，但丘吉尔却要求飞虎队留在仰光。英国皇家空军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丘吉尔知道，只要美国飞行员一走，英国人就完了。对于蒋介石和丘吉尔对飞虎

队的争夺，罗斯福的最后裁定是：飞虎队留在仰光帮助英国人。飞虎队的战绩令人难以置信：驻留仰光七十天，升空作战三十一次，每次战机从未超过二十架，最少时只有五架，但一共击落日机二百一十七架，自身仅损失十六架。战斗中，飞虎队的五名飞行员阵亡，其中包括建队时的三位中队长。跟在美国人后面的英国皇家空军，无论是飞行员还是作战飞机很快就损失殆尽了。而作战武力十分有限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既要保卫昆明，还要保卫滇缅公路，并没有持久的实力以及充足的理由为英国人确保其殖民地的制空权。在殖民地过惯了养尊处优日子的英国人，其在远东地区的溃败已是在所难免。

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决定：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旬发动攻势，首先攻陷仰光，占领缅甸南部，然后向缅北推进。其作战部署是："第五十五师团的步兵第一二〇联队之一部（冲支队）先于主力部队，从北碧方面向土瓦方面作战以牵制敌人；第五十五师团以主力突破麦索附近泰缅边境，占领毛淡棉附近；令第三十三师团继第五十五师团之后陆续挺进，向拔安方向进发。"

此时，饭田祥二郎指挥的部队为缺第一四四联队的第五十五师团和缺第二一三联队的第三十三师团，总兵力两万余人。与日军相比，英军兵力占据绝对优势：英缅军第一师一万五千人、英印军第十七师一万八千人，加上增援的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以及英军装甲第七旅，总兵力在四万人以上，且火炮和坦克的数量也占据优势。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日军第十五军先头部队从北碧附近越过泰缅边境向西攻击，"突破途中险阻的热带丛林"，于十九日占领缅甸南部战略要地土瓦，夺取了丹那沙林地区的三个主要机场，阻断了英军从印缅南下马来半岛的支援，驻守土瓦的英军从土瓦湾经海上仓皇撤走。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一部从达府一带出击，沿着泰缅边界的崎岖山路，向西突破了英军的防线，于二十二日占领泰缅边境缅甸一侧的要地高加力。英军低下的抵抗力令日本人更加狂妄，占领高加力的当天，日军大本营即对南方军下达了攻占缅甸全境的命令："缅甸作战的目的，在于击溃缅英军，占领和确保缅甸的重要地区，并加强对华封锁。为此，应以第十五军尽速打扫毛淡棉附近萨尔温江一线，做好作战准备后，以主力从毛淡棉至勃固的公路沿线地区出发，迅速占领中部缅甸的重要地区。"根据这一命令，三十一日，占领高加力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继续西进，向缅甸第二大海港城市毛淡棉发动攻势，英国守军惊慌失措，在宽阔的萨尔温江入海口的掩护下，才侥幸避免全体被俘的下场。二月四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攻占毛淡棉以北的拔安，英军逃到了萨尔温江的西岸。自八日

开始，日军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师团先后强渡萨尔温江，突破了仰光以东的第一道防线，英军向西逃到了米邻。

九日，日军南方军命令第十五军："须继续现在作战，尽量歼灭敌人，前进到仰光地区，且务必在其以北地区取得地盘，以准备对曼德勒和仁安羌附近的作战。"十七日，日军向萨尔温江西面的锡当河前进，开始对缅甸首都仰光实施包围。

此时，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从爪哇的美、英、澳联军总司令部飞抵仰光，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命令英印军第十七师师长史密斯负责毛淡棉至仰光一线的防御。没有任何作战意志的史密斯师长竭力主张撤到锡当河一线布防，韦维尔和胡敦都不同意，要求英军必须进行必要的阻滞作战，不然大英帝国会颜面扫地。结果是，毫无信心的抵抗令大英帝国更为难堪：二月十七日，日军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师团两路并进，英印军第十七师沿着毛淡棉至锡当河的公路一口气奔逃了一百六十多公里。史密斯曾试图在米邻河边组织一场挽回面子的阻击战，但他部署的防御线很快就遭到日军的包抄，英印军第十七师官兵只有继续奔逃，中途呼唤英国皇家空军掩护，结果英军飞行员误把炸弹全扔在了英印军第十七师的头上。二十二日，史密斯撤退到锡当河边，宽约五百米的河上只有一座桥梁。黎明时分史密斯和他的卫队过了桥，而日军的追击部队已赶至桥头附近，史密斯下令守卫桥头的廓尔喀旅指挥官炸桥。一声巨响过后，锡当河大桥被炸断，好容易逃到桥边的英印军第十七师官兵全被扔给了日军。结果，拥有一万八千人的英印军第十七师，渡过锡当河逃生的仅为三千三百余人。史密斯师长承认此次作战"糟糕透顶"，而消息传回英国，令军政高层到处弥漫着辛酸的情绪。

仰光危急之时，除了韦维尔从印度紧急调来的三个营外，英国人已经无兵可调——中国近在咫尺，但英国人从没有想过请求中国增援——丘吉尔甚至请求遥远的澳大利亚帮忙。他数次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发电，请他同意把从中东战场调回澳大利亚的两个师再派往缅甸保卫仰光："你的先遣师是唯一能够及时开到仰光的部队，他足以防止仰光的失守以及与中国联系的交通线被切断……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前后，该师便能在仰光登陆……全世界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填补这个缺口了。"不过，连丘吉尔也知道，英军在东南亚的溃败已令澳大利亚对英国失去信心，况且澳大利亚本土也受到了日军威胁。因此，柯廷总理的态度十分强硬，坚持让澳大利亚部队回到本土，他并不认为英国人的缅甸与澳大利亚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澳大利亚已经在新加坡损失了一个师，另一个师也与英军一起在希腊遭遇重创。极度失望的丘吉尔无奈之下，只能向缅

甸派来一位将领：陆军上将亚历山大出任英缅军总司令，原总司令胡敦改任参谋长。——此时，那个位于爪哇的所谓美、英、澳联军总司令部已经没用了，只能解散，韦维尔回到印度继续当他的印缅战区总司令，尽管名义上驻缅部队归韦维尔指挥，但他清楚地知道缅甸根本守不住。

丘吉尔派来的亚历山大可不是等闲之辈，之前他指挥了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据说为了稳定军心，他曾冒着德军猛烈的炮火，穿着闪亮的军靴和笔挺的马裤，旁若无人地坐在海滩上吃早餐，然后最后一个离开海滩撤退。而他的镇静极大地鼓舞了士兵，“士兵们都乐意紧紧地跟随他”。丘吉尔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他派到缅甸，是希望他能再创造一次敦刻尔克式的奇迹。

但是，亚历山大尚未抵达，三月三日，日军已经开始向仰光挺进。日军分成一支支小股部队，携带小口径武器使用的弹药，用自行车或耿马作为运输工具，靠背包里有限的食品充饥，脚穿胶底便鞋，轻装穿越缅甸的热带丛林，以惊人的机动性快速推进。四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击溃英军装甲第七旅，突破仰光以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勃固河。五日，亚历山大抵达仰光，这位传奇人物死守仰光的决心只维持了一天，第二天他便下令炸毁仰光的炼油厂和港口设施，销毁港口来不及运走的大量军用物资，其中包括美国人刚刚运来的九百二十七辆军用汽车和五千只轮胎。然后，他命令部队沿着仰光通往卑谬的公路向北撤退。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上午，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步兵第二一五联队未经战斗进入仰光。

日军在码头上发现了大批英国人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威士忌酒。消息传到了位于曼谷的南方军司令部，司令部立即驰电第三十三师团要求他们送一车洋酒来。第三十三师团的官兵尽情痛饮，醉酒不醒，导致军事行动停止了一天——正是有了这一天，亚历山大率领的英军才得以侥幸北逃——英国的威士忌挽救了英国人。

仰光的陷落，对于中国来讲犹如晴天霹雳。

中国即刻失去了囤积在仰光港的大批军用物资，接受西方援助的途径也从远端的港口被堵死了。更严重的是，缅甸南部大门洞开，日军可以顺着数条河谷向北直冲中缅边界，不但滇缅公路将被切断，日军还可直接冲进中国的云南，而云南在中国抗战中枢重庆的背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方面之所以对与云南交界的缅甸格外关注，除了保护滇缅

公路这条能够支撑中国得到外援的生命线以及防止日军从云南打进中国来抄重庆的后路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

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唯一支援中国的是苏联，但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蒋介石始终对苏联怀有戒心。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由于东南沿海对外通道已被日军封锁，蒋介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营滇缅公路方面，极力弱化苏联的援助而倒向美国。尤其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中国，保持从云南至印度洋的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云南不是蒋介石统辖的地盘，长期以来他与云南军阀龙云之间恩怨重重。云南的政治事务，蒋介石不能过问；经济上，直到一九四一年云南依旧流通着龙云发行的“滇币”；而在军事上滇军也自成体系，蒋介石的中央军未经许可不能入滇。但是，要保卫滇缅公路，中央军必须进入。一九四〇年九月间，蒋介石开始调动部队集结于云南四周：滇黔边境的第六军、滇川和滇康边境的第七十一军、滇桂边境的第五十四军以及待命川黔境内的第二、第六十六军等。直到一九四一年，出于对抗战大局的考虑，龙云终于同意中央军进入云南。

早在一九四〇年十月，英国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时，中英双方就开始酝酿建立军事同盟。一九四一年二月，英方邀请“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和马来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考察。考察团根据搜集的资料，制定了中国、英国和缅甸共同防御计划，编写出长达三十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报告书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日军如果切断滇缅公路，将不是在中国境内发生，而是日军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即全面侵占马来亚和缅甸，达到既占领英国殖民地又封锁中国的双重目的。

毫无疑问，考察团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是因为清楚地知道英军毫无抵抗力，因此报告书中对防御计划的拟订可谓含糊其辞。然而，英国人并不这样认为。在英国人看来，日本没有实力与大英帝国较量，如果日本人要截断滇缅公路，只能在中缅或中老边境方向发难，日本人是不敢深入缅甸境内的。那么，中国军队可以在中缅、中老边境陈兵防御，但不得进入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缅甸。

英国人自欺欺人的傲慢导致了军事上的严重误判，并由此贻误了中国军队入缅布防的最佳时机。

英国人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之际，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当日，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苏大使，建议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表示中国军队可以配合盟军作战。对于英国武官丹尼斯，蒋介石特别强调了中英两国共同保卫缅甸的重要性，同时询问英国到底需要多少中国军队入缅增援。丹尼斯说可能需要一个团或两个团。蒋介石说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的兵力，比如三个师或六个师。是日，丹尼斯正式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布防。

蒋介石对英国提供军事援助，立即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十二月十四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敦促中国不要派遣军队进入缅甸和泰国，理由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英美出卖。但是，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他完全清楚缅甸是中国和西方联系的唯一命脉。一旦缅甸失守，中国就只能全盘依赖苏联，而蒋介石担心这可能正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

十六日，中国驻缅军事代表团进入缅甸，在腊戌与英军驻缅总司令胡敦会谈，提出了英军主力和中国即将入缅的第五、第六军联合起来，在勃固、毛淡棉地区与日军进行决战的建议，但遭到胡敦的拒绝。虽然如此，为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为使抗战中国继续得到外援，蒋介石还是命令杜聿明的第五军开赴大理、保山地区集结，准备入缅作战，限一月十八日集结完毕；同时命令甘丽初的第六军向芒市地区集结后推进至中缅边境，限一月二十二日集结完毕。

二十三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前着重强调：“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中国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蒋介石意在提醒英国人，缅甸失守必会危及中国，一旦中国的抗战难以支撑，英国人的印度也难以自保。会议期间，中方特地向英方代表、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表示，中国可派出八万人的部队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但是，韦维尔一口拒绝了，说他的部队只需要物资和空军支援，其他一概不需要。

蒋介石大怒。

英国人根本顶不住日军的进攻。一旦英军垮了，滇缅公路危在旦夕，重庆也将面临危险。英国人傲慢的拒绝实在令人难以理喻。蒋介石立即命令准备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停止在边境线上。英国人不愿中国插手缅甸事务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一旦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作战，本来就反感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人就不会再让英国人返回缅甸了，而“大量的中国移民就会尾随而至”。同时，英国人更不愿中国由此在国际声望上压过英国。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英国对美国如此重视中国感到极度失落，丘吉

尔在写给韦维尔的信中表示："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他们认为同中国保持联系和使滇缅公路畅通，是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我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我这次在美国所学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一词。"——这对于大英帝国来讲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有舆论这样分析了英国人的阴暗心结：

丘吉尔可能认为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会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的亚洲不能再回到战前那种殖民地的状态。其他迹象也表明，在大战中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希望在大战结束时，中国仍然是虚弱的，好像一个"被营救的少女"。那样，中国就会对营救她的大国充满感激，而英国人也就能继续占有香港。

对于英国人拒绝中国军队入缅的另一种分析是：懦弱的英国人怕由此激怒日本人。面对日军陈兵泰缅边境，英国人始终认为日本不会冒险招惹大英帝国。如果日军只进攻中国云南，而不攻击英国殖民地，英国就保持中立；哪怕在日本人的刀锋之下，只要能把殖民地保住，中国是否亡国与大英帝国有什么关系？——近代以来，列强无不期望中国永远积贫积弱，这样他们才能进行肆意的侵占和掠夺。同时，只要不触及自身利益，他们可以放任任何对中国的欺辱，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卖中国的利益。

就在韦维尔拒绝中国军队入缅的那天，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建议组成中国战区，指挥中、泰、越地区的盟军作战，并推举蒋介石为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纽约时报》对此评论道："中国战场之重要，在一个月以前，殊难使多数美国人士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具有直接之关系；现则尽人皆知，中国之战事，即为我等之战事，中国对日本施用之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将军愈有战胜之机会……"一月二日，蒋介石复电表示同意，并建议由美国派出战区参谋长。蒋介石也知道，缅甸并不在划定的中国战区内，他没有在缅甸境内指挥盟军的权力，或者说是英国人不归中国人指挥。

一月四日，日军越过泰缅边境直接冲进了缅甸。

十九日，缅甸南部要地土瓦被日军占领后，胡敦请求中国军队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增援，这一请求被提交到韦维尔那里后，再次遭到拒绝。现在，连丘吉尔都觉得不可理解了：战局已经恶化到根本无暇顾及颜面

的地步，既抵挡不住日军进攻又拒绝中国增援的韦维尔到底想干什么？二十三日，丘吉尔致电韦维尔：“我对你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的理由，依然困惑不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接受了中国第四十九、第九十三两个师，但是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其余部分就在边界那一边驻扎着。缅甸似有遭受蹂躏的严重危险。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而武装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已经多久，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什么样的艰难日子，我就不能了解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韦维尔辩解说，只要从印度和澳大利亚调来英国军队，他就能够抵抗住日本人的进攻。

韦维尔话音未落，日军已开始抢渡萨尔温江了。

英印军第十七师的一路狂逃，令大英帝国举国失色。

二月三日，英方向中国方面请求增援。

十六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的第五军集结中缅边境畹町，然后由英方派汽车运输入缅。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蒋介石曾三次下令第五、第六军入缅，前两次都因英方的拒绝而停止。现在第三次发布入缅命令，从军事上讲已经战机全失，这使中国军队日后在缅甸境内的作战中遭遇了巨大的磨难。

中国入缅部队日夜兼程。第六军先遣部队第四十九师从云南保山出发，沿着滇缅公路经腊戍南下雷列姆，在孟畔地区接替了英军防务，该地区的英军向缅甸西部转移；第五军抵达畹町后，等不及第六军输送，其先遣部队第二〇〇师附骑兵团、工兵团一路向缅甸南部奔袭，于三月八日抵达仰光以北的战略要地同古。

至此，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在缅甸的对日作战中，有中国、英国、缅甸、印度等国的军队，究竟谁指挥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昆明明确指示：入缅第五、第六军归杜聿明军长统一指挥，而杜聿明军长接受胡敦的指挥。三月一日，飞抵缅甸境内腊戍视察的蒋介石，再度确定了中国入缅军队的指挥系统：中国入缅参谋团团长、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负责战术指挥，后勤部长兼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负责后方勤务；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司令长官，在卫立煌到任之前，由杜聿明统一指挥入缅部队。可

是，就在这时候，应蒋介石的邀请，美国政府派出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抵达腊戌。蒋介石又指示杜聿明：中国军队要听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这一点十分重要。——杜聿明被弄得有点糊涂了，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结果是，中国入缅作战的第五军和第六军，分别要听从中国的林蔚和杜聿明、英国的亚历山大和美国的史迪威三国四位将领的指挥——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怪异的指挥系统。

史迪威的到来，使一个专门与蒋介石对着干的美国将军出现在中国的抗战史中。

约瑟夫·W·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间，他受美国陆军部委派到中国北平学习汉语；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根据《辛丑条约》外国军队在华驻军条款，任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营长。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他任美国驻华武官，一九三九年五月卸任回国。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是总部设在加州蒙特利城的美国第三军团指挥官，军衔少将。毫无疑问，这位中国通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以美国武官的身份涉足各个战场，大量接触了中国军队的士兵和军官，与德国和苏联的军事顾问也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与日本人之间也有互通消息的通道，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相当的了解和极高的评价。史迪威被认为是美国陆军中最了解中国战区的权威。同时，他的弱点在美国陆军中也人人皆知：他写给陆军部的报告常因文笔和逻辑的差劲而受到训斥；他往往屈从于个人冲动的情绪而欠缺周密的思考；他多疑而傲慢，说话善于使用尖酸刻薄的词语，因此与同僚的关系一直紧张；他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缺乏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所指挥的部队最高级别不过一个二线的陆军军团。

史迪威之所以被美国政府选中，除了他有丰富的在华经验之外，他与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私人关系密切也是原因之一。史迪威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前，马歇尔给了他两条忠告：一是“团结不同派系，抓住兵权，让中国人努力干事”；二是“金钱不成问题”。马歇尔对史迪威赴任中国战区的奖赏是：“我们将任命你为陆军中将。”

有资料显示，史迪威上任前，对来中国战区任职有过规模宏大的设想。在他的设想中，西南太平洋将是美军与日军作战的主要区域。如果把战争导向日本本土，美国就必须在中国建立起巨大的进攻力量。于是，美国利用中国反击日本本土的基地建设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史迪威身上。他动身前往中国的时候给美国陆军部写了一份备忘录，除了要

求把他组建的部队命名为“美国在华特种部队”外，还要求美国给他提供足够装备三十个中国陆军师的装备，再有就是与装备美式武器的中国陆军师作战相配套的空军支持，等等。美国陆军部对史迪威提出的“长远目标”不感兴趣，但批准他可以称其部队为“美国在华特种部队”，同时承诺必要时可派遣运输机为他提供给养。

三月六日，史迪威到达重庆。

再次会见蒋介石时，他首先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当面叮嘱：“此去代予向蒋委员长夫妇致候，并告蒋委员长，目前战争为一世界战争，我等共同敌人，不问其在亚在欧，皆应一致施以攻击……故决继续以军用器材供给中国，非俟将日人逐出中国国境，中国完全恢复其失土不止也。”然后，史迪威阐述了自己前来中国的主要任务：一、奉命指挥中国、缅甸和印度的美国军队；二、奉命监督和管理美国对华援助物资的分配和使用；三、代表美国政府出席重庆的军事会议；四、担任中国与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之间的联络；五、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同时敦促英方改进缅甸境内的该公路；六、指挥在印度的美国空军。蒋介石顿感疑惑，因为史迪威没提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事。在蒋介石的追问下，史迪威才说：“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直接受钧座之指挥。”蒋介石还是有点困惑，进一步追问：“将军之确实地位，愿再详言之。”史迪威回答如下：

本人指挥在中国、缅甸、印度境内之美国军队，而印度只供我作根据地之用。英国已允我方应用其铁路及栈房等，此点，钧座可不再顾虑。我人对印度，除用为运输器材由美入华之过道外，别无其他企图，本人所得训令关于缅甸一节之原文如下：“在蒋委员长统率之下，指挥中国境内之美国部队以及拨交指挥之中国军队。此项部队如有开入缅甸参加联合作战之必要时，则应受ABOA区（今已沦陷）最高统帅之指挥，该统帅将指示美国代表所统率之部队与英国司令所统率之部队在缅甸境内如何合作之方案。”

显然，史迪威含糊不清的回答依旧令蒋介石摸不着头脑。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思路背道而驰：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急需美国人的军事指挥，美国将领绝对比中国将领的水平高。美国人严重忽视了近代以来一个受欺侮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按照常规来讲，多国联合作战时，出兵最多国家的将领理应担任最高指挥官，此次美国并没有出兵缅甸，却派来了一个指挥官。虽然史迪威是蒋介石邀请来的，但蒋介石邀

请的只是一位中国战区参谋长，也可以说是他的参谋长，可现在美国人却给了史迪威更多的权力。

八日，仰光陷落。

十日，蒋介石再次会见史迪威。史迪威表示他知道“缅甸对中国之重要甚于英国，英国可失缅甸而中国则否。盖英之欲守缅甸，目的只在保卫印度；中国如失缅甸，则与世界之交通路线将因而中断”。史迪威说，他深信亚历山大将军必能与他合作，“且能增强其部队的战斗意志”。蒋介石告诉史迪威：

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盖第五、第六两军为我国军队之精锐，苟遭挫败，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能。故此次出师之成就，绝不应视为二三个军战争之效果，其胜败之机不独足以决定全部军心之振颓，且足以影响全国人民之心理。

蒋介石拒绝了史迪威提出的立即向日军采取攻势的建议。蒋介石坚持必须弄清楚日军的动向之后再组织进攻，并主张把主力集结在曼德勒周围，诱敌深入加以击溃，然后反攻突破，一举收复仰光。蒋介石的这种战法，显然源于长沙作战胜利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面对战斗力很强的日军，或许这是较为合理的战法，但作为美国军人的史迪威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中国式的游击作战是怎么一回事。

蒋介石要求缅甸境内的英军必须归史迪威指挥，把那个无能且傲慢的总司令韦维尔抛到一边去。这让史迪威很满意：“我发现大元帅打算把缅甸的指挥权交给我，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必每天早晨惶恐不安地醒来，力图搞清楚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来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了。”蒋介石给罗斯福发电报，请求美国人出面说服丘吉尔将缅甸的英军指挥权交出来。罗斯福明白蒋介石是想利用美国遏制英国，可他不愿意得罪丘吉尔，因此婉转地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可是蒋介石态度强硬：入缅的中国军队绝对不能与无法信任的英军混合使用，如果英国人坚持两军混合使用，他宁可把入缅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来。——蒋介石严重忽视了一个现实：英国人是不愿中国军队深入其殖民地缅甸腹地的，他们也从没有期望和准许中国军队一直打到仰光去。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在各种矛盾交织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司令长官。远征军

共约十万人。其战斗序列是：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辖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辖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辖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

十八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史迪威。当时，盟军希望沿仰光至曼德勒、曼德勒至密支那的南北铁路大动脉，于缅甸中部地带建立起一条自东向西跨越铁路的防线，以阻止日军向北推进。而实际上，这样一条防线已在缅甸南部，即仰光以北约一百六十公里处形成了：西边的卑谬由英军防守，中间的同古由中国第二〇〇师防守，东面的泰缅交界处也由英军防守。日军占领仰光后，开始向北推进，逐渐逼近同古。史迪威要求中国远征军主力迅速南下，集结于同古以北的彬文那一线，在增援第二〇〇师的同时准备反攻作战。对此，蒋介石坚决反对，其理由是：中英对各自的作战区域负有独立责任。在中国军队支持英军作战之前，英国人必须拿出具体行动证明他们是在努力作战而不是一味地逃跑。如果英国人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中国军队就没有理由去填补由于英国人的溃逃而出现的战线缺口。实际上，蒋介石知道，如果中国军队集结反攻，有可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势，甚至有可能夺回仰光再度打开外援港口，但是成功的可能也同时意味着遭遇危险和损失的可能。特别重要的是，史迪威的计划成功，有赖于英军必须守住中国远征军的左翼卑谬，这对于逢战必逃的英军来讲可能吗？

第二天，蒋介石在又一次会见史迪威时作了一些让步：允许新编第二十二师向南推进增援第二〇〇师，同时在英国人失守卑谬时也可增援他们，但坚决不准远征军主力越过同古以北约百公里处的彬文那一线。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守住曼德勒，史迪威表示他无法作出承诺，只能尽力而为；如果坚持让他承诺，只能另派一个愿意承诺的人去。

在华多年的史迪威，对蒋介石政府积累了太多的反感。作为美国驻华武官，由于军衔很低，此前他在中国受到国民政府军政大员的太多冷落。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他申请去上海战场考察，结果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尽管后来多方求情终被批准，但当他赶到上海时会战已

经结束，为此他被美国国防部训斥了一顿。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那些中国人的记忆中，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他们踢来踢去的卑微的上校而已。他们眼中的我，是一个在泥泞中行军，与苦力们混在一起，还搭乘士兵车的人而已。”——现在，他不是“卑微的上校”而是美国陆军中将了，但他内心依旧对此充满怨恨。

史迪威对英国人也十分厌恶。进入缅甸后，他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了曼德勒北面的眉谬。这里是缅甸的避暑胜地，草坪上英国人的乡间别墅错落有致。尽管驻守缅甸的英军只剩下一万多人，但在总司令部里却有一名上将、一名中将、五名少将和十八名准将以及二百五十多名衣冠楚楚的参谋军官。史迪威发现，这里没有计划、没有侦察、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任何情报，且英国人根本无法按照约定保证入缅作战部队的补给。史迪威与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见面时，亚历山大对史迪威居然指挥中国军队茫然不解，因为英国人仅仅知道美国派来一位联络官而已，英国人并不欢迎半路上来个美国人插手缅甸事务。而史迪威严重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他对面前的这些傲慢无礼的英国佬充满厌恶，他对著名的亚历山大上将的描绘是：“谨小慎微。又长又尖的鼻子。极其鲁莽、冷漠。”实际上，亚历山大也是个摆设。美国陆军部通知史迪威：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授权缅甸盟军部队全部归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指挥。

为了争夺指挥权，亚历山大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结果是，四天前明确表示中国远征军将服从史迪威的指挥，现在却允诺入缅中国军队将听从亚历山大的指挥。

委座：对于缅甸军队之统一指挥问题，余与华盛顿及伦敦间已交换电讯。惟在此问题未得决定以前，全部缅甸战局，应仍由将军指挥之，史迪威部下之中国军队自亦包括在内。

亚历山大：在钧座与英美双方对统一指挥问题未得到最后决定以前，史迪威将军部下之中国军队亦应由本人指挥，钧座是否如此？

委座：然。

亚历山大：未识以此意电告史迪威将军否？

委座：史迪威将军在此时，予已面告之。惟曾嘱彼如涉及全局战略及部队之配置，必先得余之同意。将军与史迪威将军可讨论作战之任何

问题，惟若欲变更战略及部队之配置，应如今日讨论形势，事先得余之同意。缅甸为英国属地，英方自应多负责任。

亚历山大：我等自当如命负责。

谈话之后，蒋介石委托夫人宋美龄给史迪威送去一张便条，让史迪威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返回腊戍后，当着中国入缅参谋团团长林蔚的面宣布：他才是缅甸作战的最高指挥官，那个叫史迪威的美国人也归他指挥。结果，不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非常愤怒，就连中国入缅参谋团和远征军将领也认为英国人的做法实在过分，于是没有人再理会蒋介石的那张便条。

面对强敌，作战指挥问题盘根错节、相互掣肘，如何打仗？

后来的战事证明，英军除了为自己的逃跑而调动中国军队外，根本没有在对日作战上担负起任何指挥责任。

中国方面收到了一份由英军制订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部署：

一、第六军以暂编第五十五师位置于罗衣考（LOIKAW)地区（毛奇北方），四十九师位置于孟畔地区，九十三师位置于景东地区，任缅泰边境之守备（正面约三百余英里），军直属队位置于雷列姆，军部位置于棠吉。

二、第五军以一师位置于棠吉，为第六军预备队，一师位置于同古，一师位置于竿力宾（NYAUNGLEBIN，同古南方七十五英里），任缅第一师与印第十七师撤退时之掩护，军部与直属队位置于同古以北地区。

三、胡敦司令部拟即令第五军派兵两个团先至同古。

四、他希附近之梅克提拉（MEIKTILA)与飘背（PYAWBWE)两地，第五军不含，仍归英方驻防。

五、胡敦司令部同意派遣联络参谋分驻英师部或旅部，经再三交涉，只允在缅第一师派一员。

六、第六军与缅第一师之作战地境为同古——毛奇公路以北之线。第五军无地境.

这是英军对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部署，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利用中国军队掩护自己撤逃的部署：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的三个师，被分别配置在英国人长距离撤退的必经路线上，并且英国人唯恐路线不保，还把第五军调到战略要点棠吉（今东枝）作为第六军的预备队。于是，在英国逃跑路线的正面，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构成了两道阻击线，而英国人仅负责防守两个主要交通交会点。更有甚者，英军在中国远征军的各军和各师都派有联络参谋，却拒绝中国远征军派联络参谋到英军的师、旅指挥所去——英国人要尽可能地掌握中国军队的动向，却不准中国军队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懦弱者的自私深入骨髓。

“如果纯粹从理性观点看，蒋介石此时或许应该断然把中国军队撤回中国境内”。但是，蒋介石担心的不是英国人如何被日军追杀，而是自己国土后方的安全以及支持中国持久抗战的外援物资。因此，即使明白英国人居心叵测，中国远征军也要作战，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战。

三月四日，日军大本营发布缅甸中部作战命令。

七日，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向第十五军发出了作战指示：

一、应积极捕捉战机，以放胆果敢之作战，对曼德勒方面之敌，尤其对中国军，强迫其决战，力求于短期间内，将其击灭。本作战务须于五月末以前，概略完成。

二、为从事前项作战，随在仰光地方攻击准备之进展，不待增援兵团之集结，即发起行动，寻求曼德勒方面之敌，务于该地区附近或其以南地区，求敌决战而击灭之。

三、当追击之际，断然深入中缅国境，且扫荡缅甸之敌。

四、于右述作战期间，占领仁安羌（YENANGYAUNG)附近之油田地带及勃生（BASSEIN)；若情况许可时，更应一部迅速占领若开（阿恰布-AKYAB)机场。

日军开始分路向北实施作战。西路，第三十三师团由仰光出发，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进攻；中路第五十五师团由勃固出发，向同古进攻。而在仰光登陆的第五十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将集结于同古附近，第五十六师团为东路主力，经过东枝、雷列姆向北直插滇缅公路上的要

点腊戍，第十八师团则加入中路的攻击行列。

当日军开始向北进攻的时候，英军将缅甸境内的英缅军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和装甲第七旅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史林，归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指挥。史迪威的正式职务是中缅印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无论是缅甸还是印度此时都没有美军，所以史迪威能指挥的只有中国远征军。

面对日军的快速推进，英印军第十七师和装甲第七旅撤退到勃固河东岸的沙耶瓦底附近，除了一部仍与日军保持接触外，其他各旅再次准备向北撤逃。英缅军第一师也仅滞留少量部队与日军接触，大部队则沿着向北的公路经彬文那转而向西撤退。

中国远征军的第五军沿着曼德勒至仰光的铁路布防，其第二〇〇师指挥的骑兵团在最前方，位于同古以南的彪关附近，掩护英缅军第一师的撤退并担任同古前方警戒；第二〇〇师则在同古地区构筑工事准备迎敌，军直属工兵团和战车防御炮营在同古，第一、第二补充团在同古以北的飘背（今标贝），军部和直属队在飘背以北的杂泽。新编第二十二师与第九十六师在曼德勒以北集结待命。

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在第五军的东侧，其暂编第五十五师一团在萨尔温江至彬文那之间的垒固、保勒地区，主力在雷列姆以东的南桑地区为军预备队；第四十九师在萨尔温江与雷列姆之间的孟畔地区；第九十师在靠近中缅边境的景东（今景栋）地区，刘支队在景东以南的孟勇、芒林和大其力等地。

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是总预备队，其新编第三十八师位于腊戍，其余部队尚在云南保山。

总之，在日军即将攻击的正面，西面拥有一百多辆坦克等重武器的英军正在向北撤退；中间是只有八十二毫米迫击炮和少量战防炮的戴安澜的第二〇〇师；东面则是防御线宽达上千公里、平均每名士兵要守二百五十米的甘丽初的第六军，第六军不但要保证英军侧翼的安全，还要防止日军从战场的东面突进。

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是全军的前锋。

三月八日，第二〇〇师部队抵达同古接替英军防地。英缅军第一师看到中国军队到了，立即迫不及待地撤了，敌情、地形、民情、阵地位

置、作战计划、补给、交通通信设施以及道路和机场等情况都没有交代。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师长戴安澜立即组织侦察并初步拟订了作战方案：骑兵团附属一个连的步兵向南推进到普尤、佩岗和皎枝一带进行前敌搜索；师主力占领同古一线的阵地、外围阵地以及机场、锡当河大桥等要点，紧急构筑作战工事。戴安澜在火力配备上进行精心安排，根据自身火力弱的状况，特别强调了近战原则。第二〇〇师的工事构筑得结构坚固，交通通畅，伪装良好，防坦克设施完善，令到前线视察的史迪威大为惊讶。“中国军队是很好的部队，”他用不熟练的汉语说，“我要带你们去收复仰光，还要同你们一道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要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中国军人不但不亚于任何盟国军人，而且会胜过他们。那时我就死而无怨了。”

三月十日，从勃固出发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逼近同古。从仰光撤退的英军在日军的追击下一路逃到彪关附近，在皮尤河以南十二公里处遇上了远征军第二〇〇师的骑兵团。英军往后溃逃，中国官兵向前迎敌，英军跑远了，日军被击退了。中国官兵在河边迅速构筑了阻击工事。这天，日军四十余架战机分三批对同古实施了猛烈轰炸，同古全城终日大火，满城房屋尽成瓦烁。

十九日，日军以一个营的兵力进入了中国骑兵团的预设阵地。当日军的汽车行至皮尤河北端时，中国工兵以电线导火引发地雷爆炸，全长两百多米的大桥轰然倒塌，日军汽车纷纷坠河，后面的步兵猝不及防，在猛烈的射击中大部被击毙。中尉排长王若坤是全面抗战爆发的那年入伍的，算得上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了，连长命令他负责河北岸的警戒，但日军摸上来时他还在睡觉，被日军汽车的引擎声惊醒后，他立即组织弟兄们猛冲猛打。在抢日军的摩托车的过程中，王排长连续击毙了两名敌人，仔细一看竟然军衔都是少尉。他在被打死的那个名叫畿部一经的日军少尉身上搜出了地图、日记和机密文件，从而使得远征军代司令长官杜聿明不但知道了日军分三路进攻曼德勒的具体计划，还弄清了日军第十五军的主力是尚在增援途中的第十八师团，而发动进攻的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师团不过是日本陆军中的丙种师团。掌握了日军情报的杜聿明当即决定：集中兵力击破当面日军，然后协同英军一起收复仰光。杜聿明的计划得到了史迪威的认同。于是，杜聿明亲赴同古，督促第二〇〇师死守，掩护主力集结，然后实施同古会战。

史迪威和杜聿明收复仰光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赴重庆时对蒋介石的信誓旦旦：

蒋：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守目前阵线，此为至要。

亚：阵线稳定之后，我人当即准备反攻，以克复仰光为目标。

……

蒋：从印调缅之空军数量若干？何时可以到达？

亚：敢密告，由印调缅者，计有驱逐机九中队，轰炸机九中队，数星期后当可到达。每中队计有飞机十八架。

……

蒋：我方深知敌第五十五及三十三两师团战斗能力极劣，击败之，并非难事。

亚：我等立即发动反攻，攻复仰光，迟则恐敌方援军将及时赶至，届时将不易击退敌人矣。

英国人已经卑鄙到置增援他们的中国远征军安危于不顾而向蒋介石撒下弥天大谎。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仰光被日军占领后，英国人从来没有过反攻仰光的想法，英国人也从未打算从印度调来战机支援缅甸战场，亚历山大之所以作出如此承诺，完全是为欺瞒中国军队去打头阵以便他们顺利撤逃。

二十日，日军第一四三联队向位于彪关的中国骑兵团发起进攻，遂被击退。下午，日军集中全力再次猛攻，骑兵团伤亡过重，留下两个连继续阻击日军，主力逐次向北撤退。二十一日，日军被阻止在了同古前沿中国守军的鄂克春阵地前。——“师团自代库（今岱乌）北进以来，在屋墩敬爱十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而且从前线不断传来攻占敌阵地的误报，使指挥陷于混乱和苦战。”

蒋介石指示在腊戌的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要求派出一个师在盟军反攻仰光时充当英军的预备队，同时嘱咐远征军的将领们要绝对听从史迪威的指挥。

二十一日，史迪威下达作战命令：

一、由仰光北进之敌第三十三师团，截至三月十九日止，其先头在沙耶瓦底北侧地区与英军一部战斗中；由勃固北进之敌第五十五师团，

截至现在止，其先头已在彪关附近与我第五军骑兵团战斗中。我第六军方面泰国境内之敌，大部分为泰军，其先头部队在泰缅国境各要道与我第六军警戒部队对峙中，其主力似集结于清来（今清迈）、迄南邦之线。另有日军第十八师团，似集结于清来附近。

二、英军预定在卑谬南方地区拒止由仰光北进之敌，其在同古及毛奇方面之部队，将陆续转用于卑谬地区。

三、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勃固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其兵力部署如次：

（一）第二〇〇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的暂编第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六军暂编第五十五师之主力应即由现地向飘背附近输送，听候杜军长命令。

（二）第五军之新编第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东敦枝附近，归余直接指挥，准备支援卑谬方面英军之作战。

（三）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但对毛奇方面，仍应依照参谋团原定计划，派暂编第五十五师之一部接替缅英第一师第十三旅之防务，并在该方面确实占领要点，构筑工事，拒止来犯之敌，以掩护同古正面我军的左侧背。

（四）第九十六师为总预备队，即开曼德勒附近，归余直接指挥。

（五）余现在腊戍，今晚进驻眉谬。尔后一切报告均向眉谬及腊戍参谋团投递。

史迪威的命令还是建立在英军能够坚决作战以及决心反攻仰光的基础上。

但是，就在史迪威签发命令的同时，日军第五飞行集团以战斗机一百零二架、轰炸机七十七架，对英军的马圭空军基地实施了连续轰炸。没有了美国航空队的帮助，英军战机被日军击毁二十八架、击伤二十九架，致使这一地区的英国空军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而这就意味着，中国远征军必须在毫无空中支援的条件下与日军作战。

同古保卫战开始了。

二十二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第一一二、第一四三联队发起进攻，远征军第二〇〇师稳扎稳打，以数层屋脊形铁丝网掩盖的枪座以及高达二十米的砖墙环绕的复廓形阵地为支撑，连续击溃日军的六次攻击。在同古前沿的鄂克春阵地，数百日军被围困在一个长满灌木和茅草的村子里，中国官兵放火围攻，从火海中窜逃出来的日军大部被机枪和手榴弹击毙。

杜聿明致电蒋介石：

（一）同古敌约千余，山野炮六七门。连日以来。增加至二千余，并野、迫炮数门，飞机多架协助，继续向我第二〇〇师前进阵地鄂克春东西之线猛烈攻击。自拂晓至午，炮火之烈为数日以来所未有。敌我冲锋肉搏数次，双方伤亡惨重。至本日晚，战斗仍在激战中。（二）我方伤亡连长以下官长十余员，士兵二百余，敌方倍之。迄发电时，战场附近敌便衣队甚多，不时出扰。昨、今两日，各有敌伞兵一名于平满纳（今彬文那）附近降落，现仍在缉捕中。

晚上，戴安澜师长召集军官会议，他告诫各位，由于右面有锡当河阻隔，正面受挫的日军很可能要从左面迂回第二〇〇师身后的机场，要求全师官兵做好在日军重围下孤军作战的准备。自知随时可能殉职的戴安澜，给妻子和亲友写下了遗书。

写给妻子王荷馨的遗书全文：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又我去岁所经过之事，实在对不起你，望你原谅。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手此即。

颂

心安

安澜手启三、二十二

二十三日早上，日军集中了十二门重炮，在坦克、装甲车和二十多架战机的助战下再次发动进攻，远征军第二〇〇师的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正面用集束手榴弹、燃烧瓶与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搏斗，骑兵则不断迂回打击日军的侧背，战斗始终处于白热化状态。晚上，第二〇〇师的阵地被突破一角，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率领二营增援，血战之后堵上了缺口。第二天，日军一面在正面继续猛攻，一面调第一四三联队和个骑兵中队，在当地缅甸人的带领下，从同古的西面绕路向北，直接攻击了同古城北的克永冈机场。负责警卫机场的第五军军部工兵团正在破坏道路，在遭受突然袭击时猝不及防被迫后撤。杜聿明得知日军迂回同古后，立即命令部队从彬文那乘车火速增援，但由于道路坎坷，增援部队抵达时，克永冈机场已被日军占领。戴安澜师长的预料果然成真，机场的丢失使苦战中的第二〇〇师的后方被日军截断，戴安澜的部队陷入了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为了应付最恶劣的情况，戴安澜命令放弃鄂克春前沿阵地，集中兵力保卫同古城。他宣布：如他战死，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团长代之，全师与同古共存亡。

此时，中国远征军第二〇〇师远远地突出于缅甸南部的最前沿，身后漫长的后方空虚得可怕。自十九日在皮尤河边与日军接触后，第二〇〇师之所以拼死在同古外围守了一周，就是为给后续部队争取安全抵达战场的时间。但是，英军不但不见作战部队的踪影，且在兵力运输上根本不配合。至二十四日，除了新编第二十二师的先头团和第五军的一个补充团开到了同古北面之外，新编第二十二师的另外两个团还在曼德勒等待南下彬文那；而史迪威命令调往彬文那的第九十六师和配属给第二〇〇师的战防炮营，都还滞留在六百公里之外的腊戌；至于本应运至飘背的第六军之暂编第五十五师，根本还没开始输送。二十四日上午，英军的联络官突然有了消息，声称新编第二十二师的输送问题正在设法解决，但确实很困难，至于暂编第五十五师什么时候可以输送说不准。此时，英缅军第一师正从激战中的同古附近向西撤退，第十三旅也经过彬文那和东枝跟着向西逃跑。原定的所谓“反攻仰光”和“与敌决战”，是建立在中英部队齐心协力以及后续主力迅速抵达战场的基础上，现在两者已经皆无可能，中国远征军不但失去了按照预定计划向当面日军实施攻击的机会，且已伤亡数百人的第二〇〇师因深陷重围命运尚不可知。

二十五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全部出动，从三面围攻同古，日军的三十多架战机轮番轰炸同古守军的阵地。第二〇〇师官兵死守不退，他们把四周的森林点燃，试图用火墙阻敌，夜幕降临后又派出小分队袭击日军。激战持续到二十六日，日军利用坑道作业把同古城西北角的城墙

炸塌，同时开始释放糜烂性毒气。防守该处阵地的六〇〇团中毒者甚多，阵地随即被日军突破。为了给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腾地方，日军主动退后二百米，等轰击和轰炸后再冲上来，第二〇〇师官兵只有拼死阻击。如此往返数次，双方伤亡惨重。

此时，仍在重庆的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是这样向蒋介石表白的："深夜得缅甸来电称，敌军一团，绕山岭地带，至同古中国部队之后方，其地有飞机场，在叶达西之南八英里、同古之北三英里。本人接报告后，立即复电，命令缅军第一师之第十三步兵旅停止向卑谬前进，倘属可能，该旅即归驻同古第二〇〇师戴师长指挥；又令卑谬驻军向东南推进，侧击敌军，以解其向同古华军之压迫；复令英国空军立即出动，协助同古华军……"然而，直到中国远征军撤离同古，他们也没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影子。

二十六日，蒋介石发来电报，要求远征军在同古至彬文那之间准备一场会战，实在不行也要在曼德勒附近与日军决战一次："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同古、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在目前应以第五军之第二〇〇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及军直属部队，在同古、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六十六军全部及第九十六师与暂编第五十五师，集中于曼德勒、杂泽间地区，使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

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杜聿明于午夜发布命令，核心内容依旧是"反攻仰光军以击破当面敌人，收复仰光之目的，即以到达之部队，施行反包围攻击，将敌压迫于喀巴温河右岸而歼灭之。"具体部署是：第二〇〇师为固守兵团继续死守同古；新编第二十二师配备骑兵、炮兵、工兵和战防炮为攻击兵团于二十七日下午完成攻击准备，二十八日开始攻击；军直属补充第二团和第一团二营配属装甲车由同古右侧山地向前推进，攻击日军的侧背，并派出一部深入敌后断其退路；第九十六师和暂编第五十五师以及军直属部队为预备队；第九十六师抓紧火车输送；其余部队在杂泽、彬文那附近占领要点，并对卑谬方面实施警戒。

二十七日，苦战中的第二〇〇师终于得到了好消息：由廖耀湘率领的新编第二十二师抵达了同古北面的南洋车站附近，已经与日军发生了战斗。但是，日军的后续部队第五十六师团也抵达了同古的东面，并立即加入了第五十五师团对同古的攻击行列。

二十八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在南洋车站附近对日军的攻击进展缓

慢，运送第九十六师的火车竟然出轨了，以致部队被耽搁在半路上，而同古的防守进入了危急时刻。刚到战场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派出搜索队，黄昏时分从同古南面的瓦济涉过锡当河，径直向第二〇〇师的指挥部偷袭而来。当日军冲到距戴安澜师长的指挥部仅剩四十米时，特务连与日军展开混战，戴师长拔出手枪和士兵们一起抵抗，直到五九八团的两个连前来增援，危机才得到缓解。久攻不下的日军甚至化装成缅甸农民，穿着红黑衣裤赶着牛车，企图混入同古守军的阵地：

围攻同古之敌，自本晨来激增无已。十时后，敌飞机多架更番轰炸，掩护战车，纵横进出，炮兵则使用毒气弹，依其炽盛火力向戴师占地之正面及左翼不断强行攻击，战况之烈，战斗前所未有……敌每次向我阵地攻击，步兵多化妆英缅农民或土人，穿红黑衣裤，驱运牛车，车上载械弹，覆以农植物，企图混入我阵地后方捣乱……

二十九日，第二〇〇师在同古已经无法支撑了。新编第二十二师虽然攻入了南洋车站，但车站内有五栋坚固房屋，新编第二十二师只攻下了两栋，日军还占据着三栋；第九十六师由于火车出轨仍滞留在半路；补充第二团一度攻进克永冈机场，但仍未彻底击溃日军。更重要的是，同古守军第二〇〇师数天死战，伤亡巨大，弹尽粮绝。

声称协同中国远征军作战的英军，二十九日那天，在卑谬以南五十公里处的庞得被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追上了，结果五百多英军被打死，一百多人被俘，二十二辆坦克、三十辆装甲车、二十多门大炮以及一百六十多辆汽车被日军缴获。

中国远征军抵抗得越久英军越安全。

但是中国人不准备死拼了。

杜聿明认为，后续部队上不来，我军既不能集结主力与日军决战，也不能迅速解除同古之危机，而日军的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抵达战场，如果再延迟下去，第二〇〇师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杜聿明决定放弃同古。

杜聿明的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

史迪威不但坚决反对第二〇〇师撤退，还命令中国远征军必须全面进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史迪威的命令完全不符合战场实际。为

了制止中国远征军的撤退，史迪威甚至派来一位参谋到杜聿明的指挥部实施监督。但是，杜聿明已决定绝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他不顾一切地向第二〇〇师下达了二十九日晚突围的命令。

史迪威大怒，把杜聿明和廖耀湘形容为“卑怯的杂种”。

杜聿明越过史迪威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权衡再三，觉得如果把嫡系部队打光了，再多的美国援助也没用，于是同意第二〇〇师从同古撤退。

史迪威对中国将领的不听指挥极其不满：“如果我的建议或命令与他们所认为的他的（指蒋介石）意图相左，他们就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当我毫不客气地驳斥了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就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例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等到再想调动它时已为时太晚——或者干脆不下达命令；或者是下达命令，但在命令中加上许多‘如果’和‘以及’；或者是在受到敦促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下级军官不理不睬，不去执行；或者是假装采取行动，然后报告说敌人太强大……最终结果就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史迪威认为，这一切都是蒋介石干涉的结果：“他经常干涉和写信所造成的后果是使我微小的权力全然无效。我没有部队，没有警卫，没有权力枪毙任何人。军和师的司令部所最感兴趣的事是干他们认为想要干的事，他们何必服从我？”史迪威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臭骂一顿”之后，他对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威胁是：“我不能用美国空军来支援我所不信任的指挥官的部队。”——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于中国人，列强具有历久弥新的优越感。

二十九日晚，五九九团的一个营在锡当河大桥发动佯攻，掩护师主力涉水过河。戴安澜师长在河边指挥接应，并最后一个撤离。第二〇〇师的撤退井然有序，除了阵亡者以及炊事班的一个伙食担子一度迷路之外，全师官兵，包括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全部安全渡河，抵达叶达西（今耶达谢）。

第二〇〇师，中国陆军之精锐部队，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在没有友军协同和指挥系统混乱的情况下，深入异国陌生土地，与装备优势的日军苦战旬余，歼敌数千，缴获甚丰，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英国《泰晤士报》载文说，中国第二〇〇师以寡敌众的作战，是中国军队的光荣；美国战史则认为，中国第二〇〇师是缅甸作战中防御最久也是撤退最有序的一支优秀部队。同古之战给侵缅日军以极大震撼：“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二〇〇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

任撤退收容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

中国远征军官兵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作战意志当载入抗战史册。

同古的放弃，使中国远征军失去了对日军北上之路的控制。

同古战场自始至终未见英军的影子，中国远征军第二〇〇师的血战同时掩护着英军的逃跑。

懦弱自私的英国人使在异国他乡苦战的中国远征军一步步迈向了磨难的深渊。

第二十九章

祖国万岁

中国远征军撤离同古后，缅甸南部局势更趋危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声称，仰光的炼油设备已转至仁安羌，英军准备拼死保卫仁安羌油田，要求中国远征军配合作战。——在日军的攻击面前闻风丧胆的英国人，有作战能力却连缅甸首都仰光都没守一下，谁还相信他们会拼死保卫缅甸西部的一个油田？此前，为增援同古，中国远征军主力已将战车和重炮沿铁路南运，如果答应英国人的请求就得把装备往回调。尽管如此，中国方面还是答应了，一是因为史迪威的命令；二是中国人认为，既然处于同一战场，“友军”要决死一战，不配合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中国远征军制订了配合英军作战的彬文那会战计划。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

一、当面之敌，为第五十五师团主力，似有北进企图。军决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斯瓦河东西之线（斯瓦南侧）及其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区拒止敌人，以主力在彬文那占领阵地，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灭之。

二、新编第二十二师掩护第二〇〇师转移后，即以一部占领黎达誓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占领斯瓦东西之线拒止敌人。如过优越之敌压迫，应以广正面逐次抵抗，固守斯瓦河右（西）岸阵地，吸引敌于阵地前，以火力压倒敌人，予以歼灭之打击。如敌以一部包围袭击我侧后方时，正面应沉着应战，以战车、炮火协同控制之机动部队，夹击击灭之，但应以一部占领戴坳、前管段、孔伊、卡通那脱、美菲特之线，严密警戒。

三、右侧支队，位置于马吉裆附近及沙漠河以南之东西各道路搜索敌情。

四、第九十六师之第二八六团，候新编第二十二师占领阵地后，移至叶尼附近构筑工事，策应新编第二十二师作战，随战况之进展归建。同时为顾虑毛奇公路之开放，敌有进出东枝、威胁我侧背之虞，乃令暂

编第五十五师除调一团开杂泽外，主力应集结于黑河附近，策应毛奇方面之战斗，并迅速破坏毛奇公路之桥梁，将敌堵塞于隘路内而击灭之。

史迪威依旧在为杜聿明的不听指挥而怒火中烧。杜聿明曾经明确地告诉缅甸英国总督：“这位美国将军以为他在指挥，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参战唯一的方法，是在书面上让他们有几个指挥官。他们没什么事要做，负责做的是我们。”史迪威的怒气得到了蒋介石的回应。蒋介石让罗卓英取代林蔚出任参谋团团长，同时取代尚未到任的卫立煌出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蒋介石宽慰史迪威道：

予已决定派罗卓英秉承将军命令指挥在缅甸作战之第五第六两军以及其他部队，罗卓英较杜军长年事为高且多经验，将军如有命令，可随时告知罗将军，由彼转令杜军长以及其他军事长官执行之。此项办法有两种优点：第一、将军可不必与各军军长直接接触，俾得保持与彼等间之好感。第二、罗将军一方面可听从将军之命令，一方面可切实督责此项命令之执行。杜军长为人，少年气盛，办事能力固强，惟亦有过分固执之处。今罗将军与将军单独接触，随时彻底了解将军之意旨，然后转令各军，自较由将军个别与各军接触，可减少发生误会之机会……林蔚文在余左右时，指挥军事效率颇强，惟不在余侧时，彼恒不能当机立断。罗将军则为一饱经训练之军人，彼能为林将军所不能为者。倘将军能同意此项办法，余当令罗将军于最近数日中搭第一班飞机赴缅北准备……

史迪威“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四月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缅甸眉谬，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国远征军第五、第六军高级将领会议，要求集中主力在彬文那一线与日军决战，罗卓英未正式就任前，作战指挥依旧由杜聿明负责。六日，蒋介石与史迪威、亚历山大举行会谈，他特别要求英军必须固守卑谬以北的阿兰谬，以保证彬文那一线中国远征军左翼的安全。

但是，蒋介石话音未落，坏消息接踵而至：英国人于四月一日放弃了卑谬，七日放弃了阿兰谬。英军根本不顾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计划，反而要求中国远征军从彬文那向西接防沙斯瓦和马圭，以便把驻防在那里的英军替换下来让他们继续撤退——英国人的行径令所谓的彬文那会战尚未开始，中国远征军就已处于侧翼敞开的险境中。

就在英军放弃阿兰谬的那天，蒋介石和史迪威与远征军主要将领进行了谈话。蒋介石明确地告诉他们，要绝对服从史迪威的命令，“不得提出异议”；且史迪威“有权提升、罢免和处罚”远征军的任何人。但是很快，史迪威便因极度失望而越加愤怒了：给史迪威送来的中国式的、代表着权力的大印，上面刻的竟然是“同盟军参谋长”，而不是他所希望的“援缅军总司令'同时，中国方面也没给他送来任何赋予他赏罚之权的文件。史迪威终于明白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参谋长”的实际含义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

令史迪威和蒋介石同感愤怒的是英国人的不守信用：

史：余昨晚告亚历山大将军，英军必须挖掘深壕，建设强固工事，一如华军之所为者。

委座：英军如遇敌人对之作侧翼行动，即有随时后退之可能，吾人对此必须预有筹计。在敌来我退情形之下，小队敌军即可逼迫英军不发一弹向后撤退。倘英方能决心不退，准备作战到底，或至少如华军在同古作战之情形，对一地一阵，决心据守两三日，然后吾人方能筹拟计划。英方谓必尽最大力量，此言并不能作为确切肯定之保证。彼等据守一地，经一日即行撤退，亦可谓已尽最大力量。譬如在华军并未到达唐得文伊（东定吉）以前，英军即行撤退，则将奈何？是故英军必先立下决心，据守一线，然后吾人方能筹拟计划。假使英军仍有撤退之可能，则吾人必须假定此种情形之到来而拟就办法，以免临时受窘，左右为难。

史：余与亚历山大将军最近一次会谈中，彼声言英军将据守若干地区。然余对英方诺言亦已失去信心，亚历山大将军仍须注意英军不再撤退之问题，彼必须停止此种后退行动，否则有失体面。

委座：然若英军仍旧后退，则吾人将作何行动？

史：吾人必须据守曼德勒及答吉，而以棠吉及莱卡两地保卫曼德勒之外围阵地。

委座：若在曼德勒工事完成以前，而敌人进攻，则如何措置？

史：吾人应促英军至少对敌人做一次反攻，如此则可给吾人以时间，俾将曼德勒之工事赶成。

委座：不必说英军反攻，如英军能守住其选择之地点，余已感心满意足矣。

与史迪威进行了这番无可奈何的谈话后，蒋介石又得到了关于英国人的坏消息：曼德勒受到日军狂轰滥炸，民众死伤甚多，但英国人不许中国和美国的红十字救援人员前往救援——作为缅甸的殖民地主人，英国人绝对不能让缅甸人产生中国人和美国人比英国人好的念头，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不让缅甸人与中国人和美国人发生接触。

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赴曼德勒视察，一路见到“人兽尸体，朽腐狼藉，充塞街市，或有已烧房屋中，亦积尸累累”。蒋介石命令迅速收尸消毒，不能让这里的远征军官兵陷于瘟疫；宋美龄更是就此事问询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否认英方拒绝中国红十字医护人员进入曼德勒。

英国人已经近乎无赖了。

蒋介石致信罗斯福：“我一生戎马，从来没见过像缅甸战场上如此悲惨、全无准备、混乱和崩溃的情况。”

紧接着，史迪威也致信马歇尔，告知缅甸局势之恶劣完全出乎预料，因为英国人已经决定弃守缅甸，他们本来有许多部队，“如果有心守的话”，必定不会是一路狂逃的情景。——“英国人宁可牺牲缅甸，既不愿欠蒋介石任何人情，也不愿答应缅甸民族主义者战后可以改变地位。”

混乱的盟军并不知道日本人正制订着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

此时，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已从同古转至彬文那以北；第九十六师正在彬文那构筑工事；第六军暂编第五十五师主力向黑河、东枝方向移动，其中的一个营在同古至彬文那以西的毛奇至垒固地区接替了英军的阵地；第六十六军的先头部队新编第三十八师已抵达曼德勒。而英军在放弃卑谬和阿兰谬后，继续向北偏西撤逃。日军已经越过卑谬和马圭，朝着仁安羌方向迅速推进。

四月三日，日军第十五军制订了曼德勒会战计划——该计划中所说的“敌军”基本不指英军。日本人认为，缅甸境内的英国人连敌人都算不上，仅仅是一群溃逃的难民而已。日军准备击败中国远征军后，直接冲入中国云南境内：

本军以精锐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人的退路，以主力沿同古——曼德

勒公路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敌军主力的两翼，在曼德勒以西，伊洛瓦底江地区压倒并歼灭该敌；然后，在腊戌、八莫、杰沙一线以西捕捉、歼灭残敌。同时，不失时机地以精锐之一部向怒江一线追击。

为给彬文那会战赢得时间，新编第二十二师在彬文那以南的斯瓦河谷，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进行阻击以迟滞其推进。

新编第二十二师是在第二〇〇师撤离同古后，奉杜聿明之命开始行动的。三月三十一日，该师六十六团主力向南洋车站以南的日军实施佯攻，以掩护主力展开。其六十四团移至南洋以北的沙家崖占领阵地，六十五团则开赴斯瓦阵地。完成掩护任务后的六十六团，也移至斯瓦以南的叶达西占领了阵地。新编第二十二师沿着同古至彬文那的公路纵向部署，准备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阵地逐次抵抗。从斯瓦到北面的彬文那，之间是一条隘路，两侧是茂密的山地森林。中国官兵采取的战术是：梯次配备、交替掩护和两侧伏击相结合。他们在隘路上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和炸弹，只等着日军进入隘路地雷和炸弹被触发的同时，两侧的伏击火力猛烈倾泻，狙击手在密林的掩护下准确杀伤，再加上正面部队的反击，迫使日军在这条路上裹步不前。

四月一日至四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与新编第二十二师对峙在南洋车站与叶达西之间，双方仅有小部队的搜索战斗以及断断续续的炮战。五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的三个联队在飞机、重炮和坦克的助战下，向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的阵地猛扑过来，两军激战整整一天，日军攻击受挫，六十四团的伤亡也很大。晚上，师长廖耀湘率领六十四团绕过叶达西六十六团的正面，退到斯瓦的北面占领阵地。之后，廖师长又返回到处于前沿的六十六团阵地。

在斯瓦河谷，日军遇到了廖耀湘这个强硬的对手。

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出身于湖南的耕读之家，十九岁在陆军第三师第六旅教导总队学员队结业后，考入黄埔军校，一九三〇年被送到法国陆军大学留学。六年后，廖耀湘回国，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任职，亲身经历了南京的沦陷，藏身乱尸之中才得以逃脱。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第二〇〇师为基础，扩编机械化军，新编成第二十二师，邱清泉出任师长，廖耀湘出任副师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广西昆仑关战役，新编第二十二师与日军顽强作战，特别是师长邱清泉负伤后，廖耀湘代理师长指挥全师主攻昆仑关，破关之时正是一九四〇

年的上元之夜。因昆仑关之战功，廖耀湘升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时年三十六岁。

六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除了步兵之外，还出动了两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以及大量的战机。六十六团阵地终日处于苦战中，日军坦克被击毁四辆，六十六团阵亡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晚上，中国官兵发动夜袭，击毙日军近二百人，俘虏四十九人。七日，日军从三面围攻新编第二十二师，集中重炮猛烈轰击，并从侧翼迂回打击，新编第二十二师的叶达西阵地被突破，伤亡巨大的六十六团向斯瓦阵地转移。

八日，注视着战局的蒋介石开始心神不定。从日军进攻的西路、中路和东路看，三个方向兵力使用平均，每个方向都对应着一个师团，难以判断其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相对于中国远征军而言，英军所在的西路不能抱任何指望，但其负责驻守的仁安羌却是战略要点。同时，防守东路的第六军所在位置也属要害，因为那里距离滇缅公路上的要点腊戍最近。至于中路，蒋介石还不知日军到底要投入多大兵力。总而言之，中国远征军兵力太少，想在任何一路集咿优势兵力，都会牵扯到部队的横向调动，而彬文那会战取决于中路是否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九日，情报传来：中国军队俘虏了一名日军，从其口供中获悉，中路日军是第五十五师团全部，且加强了山炮、野炮、榴弹炮和其它重炮的支援，其中的一部分日军已开始向侧翼的战地渗透。接着，更重要的情报传来：日军第十八师团也上来了。这一情报的获得，得益于远征军第五军一位名叫马玉山的谍报人员。马玉山化装成缅甸人，混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司令部挑水打杂。一天，他在日军司令部里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幅标有部队番号和所在位置的地图，他寻找时机把地图藏在身上连夜潜回了彬文那。

杜聿明看过地图后得知，增援的日军是第十八师团的第六十五、第一四二两个联队以及山炮和重炮各一个营。

十一日，日军第十八师团抵达战场，加入了对新编第二十二师的攻击。新编第二十二师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战斗。晚上，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转移到二线阵地，日军紧追不舍，新编第二十二师一边阻击一边后撤，沿着莫拉、叶尼、沙瓦蒂、挨劳等阵地逐次抵抗。十六日，在第九十六师的掩护下，新编第二十二师退出战场向彬文那以西转移。

杜聿明致电蒋介石：

四月十日拂晓起，斯瓦方面敌五十五师团复开始以飞机多架、炮二十余门、战车二辆掩护，进攻廖师斯瓦阵地，猛烈合击，并每日不断以炽盛炮火及飞机更番轰炸。我官兵伤亡惨重，仍能英勇抵抗，坚强固守〇迄本月十六日止，已按照军预定计划，逐次抵抗，转移至平满纳（彬文那）西南侧山地新阵地。作战一周来，毙伤敌二千五百余，我伤亡营长以下官兵千余人。

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二十二师顽强阻击日军达十八天之久，单独抗击着拥有大炮和坦克的日军的猛烈攻击。由于采取的战术手段正确，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敌数千，且将日军主力吸引到了中国远征军预设的会战战场。中国官兵以其英勇顽强，创造了中国式的“逐次抵抗”的模范战例。

此时，参加彬文那会战的中国远征军各部队已按照预定计划到达指定位置。

但是，战局突然恶化了。

战场的东西两翼同时发生了危机。

西翼，英军紧急呼救，说他们在仁安羌以北被优势兵力的日军包围了，请求中国远征军解救。

沿西路追击英军的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四月十四日，该师团轻易击垮了英军的抵抗，相继夺取沙斯瓦和东敦枝等地，英军随即放弃了重要据点马圭而北退仁安羌。十七日，英军又放弃了他们声称要死守的仁安羌油田，再次溃退。英国人一再表示他们要坚守阵地，结果却连一触即溃都谈不上，几乎是还没看见日军的影子就开始狂逃，却让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坚守阵地。为此，蒋介石愤怒已极，认为英国人“无耻极矣”。

但是，友军毕竟不能见死不救。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令刚刚抵达曼德勒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急赴英军被围之地。

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原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淞沪会战后，于一九四一年改编为现番号，隶属于陆军第六十六军。加入远征军行列后，新编第三十八师从贵州兴义走了半个月

到达云南安宁，于三月二十七日入缅。四月七日，主力抵达曼德勒。正值曼德勒遭受轰炸后，全城遍地瓦砾和尸体，师长孙立人接到了蒋介石任命他为曼德勒卫戍司令的手令。随即，曼德勒全城贴满了孙司令的布告：

本司令奉命卫戍期间，保此土，安斯民，职责所在，兹特与全城民众公约四事：一、放火者杀无赦，二、杀人越货者杀无赦，三、充当敌人间谍侦探者杀无赦，四、造谣惑众扰乱治安者杀无赦。其余僧侣等生命财产均在本司令保护之列。

孙立人的任务是曼德勒的城防，他没想到要去管英国人的事。但是，当英军放弃仁安羌以南的马圭后，孙立人奉命派一一二、一一三团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开赴仁安羌以北的皎勃东布防，一方面策应英军，一方面也为保护曼德勒以西侧翼的安全——这已经超出一个城防卫戍司令的职责了。然而，当一一三团抵达皎勃东时，英缅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史林来到一一三团团部，给了团长刘放吾一纸由他签发的作战命令：

致一一三团团长刘上校：请贵团开至平墙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坦克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以北二公里处敌军。

刘放吾团长没有马上执行英国人的命令，他向孙立人师长报告了情况，孙立人又向罗卓英请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决定是：一一三团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前去解救英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主要任务还是卫戍曼德勒城。可是，部队几乎都调去救英国人了，自己还算是什么卫戍司令？孙立人不愿意坐守空城，他让副师长齐学启留守，自己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

十六日午夜，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从溃退的英军右侧超越，抢先抵达了仁安羌以东五公里处。此时，英印军第十七师等部队逃到了皎勃东，但英缅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尚未从马圭撤往仁安羌。日军第二一四联队随即向仁安羌东北急速推进，占领了公路交叉点附近的屯冈阵地，然后以一个大队突进到宾河以北，彻底截断了英军北撤的后路。连同占领了马圭的第二一三联队和山炮兵第三十三联队以及工兵第三十三联队一起，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把英军包围了。被宾河隔成两半的英军曾试图突围，但被日军阻挡。日军第二一五联队也正向仁安羌赶来。

被包围的英缅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不但兵力达七千人，且装备

精良，可他们除了向中国远征军求援外，别无他法。

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果然英勇。刘放吾团长接受任务后，立即命令副团长曾琪和英军的坦克队长一起在前面侦察开路，团主力则向宾河前进。十八日凌晨，一一三团二营在左、一营在右、三营为预备队，在英军的十二辆坦克和三门火炮的支援下，向日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激战到下午，日军被迫放弃阵地，涉水退至宾河以南。

一一三团与日军激战时，包围圈里的英军趁势突围，但苦战一天毫无进展。英缅军第一师师长史考特再次向军团长史林求援，说他的人马因缺乏饮水精疲力竭，如果再得不到饮水，官兵们就要虚脱了。因此请求放弃所有的重武器当天夜晚突围。——英国人放弃作战的理由很奇特，不是缺乏弹药，也不是伤亡过大，而是没有水喝了。

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赶到了前线。

日军被赶到宾河南岸后，英方催促中国远征军渡河攻击，但孙立人师长拒绝了，理由是：河南岸地势很高，地形暴露，日军居高临下，我军处于仰攻状态；如果攻击失败，日军就会发现我军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这样不但无法解救英军，一一三团也会陷于被围歼的险境。孙立人决定白天停止进攻，第二天凌晨时分发动突袭。但是，英缅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史林坚决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攻击，理由是包围圈里的史考特师长根本坚持不了一夜了。孙立人还是要求英军再坚持一下。正在争论时，史考特师长再次打来求援电话，称他的部队已到了最后关头。孙立人表示，史考特的部队已经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要再忍耐一天，中国远征军会在明天下午二时前把他们救出来。史考特师长对此将信将疑，孙立人师长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这句话令史林将军大为感动，他与孙立人郑重地握了握手，“认为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在此之前，英国人从来没对中国人信守过什么。

在中国军队中，孙立人师长是少有的所受教育程度很高、东西文化兼备的强硬派将领。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学的都是土木工程；后又入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一九二七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后，从国民革命军的一名下士干起，开始了其漫长的军旅生涯。他之所以被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选中到税警总团任职，与他所受西方教育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在税警总团任团长期间，他创造了一

套与其他中国军队完全不同的训练教程，被称为“孙氏操典”，此教程令他的官兵无论文化水准还是军事素质，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都高出一筹。淞沪会战中，他率部作战时险些阵亡，全身负伤达十三处之多。武汉会战中，他荣立战功两次，在中国军队中战绩佼佼。当他的部队被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后，他当之无愧地出任了师长，时年四十一岁。

十八日晚上，孙立人和史林一起研究第二天的攻击部署。孙立人主张从左翼攻击，因为右翼不但地形暴露，还侧背临河；但史林坚持从右翼进攻，说如果从左冀进攻，包围圈里的英军容易受到炮火打击。最后，孙立人服从了史林的主张，于当晚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当面之敌情无变化，仍坚守宾河左（南）岸高地一带阵地，英军第一师仍在仁安羌东北地区被敌包围，已弹尽粮绝，危急万分。

二、师以击溃当面敌人、救出英军之目的，于明（十九日）拂晓五时三十分继续攻击。

三、第一一三团于明五时三十分即向油田区之敌攻击，重点指向敌之左翼。

四、英军炮兵队（火炮三门）以一部火力协助第一一三团之左第一线，攻击宾河左岸之敌，以主火力支援其右第一线主力之进攻。

五、英军战车队以全力沿公路进攻，协同我主力之进攻。

十九日凌晨四时三十分，一一三团悄然渡过宾河，于五时三十分准时发动了进攻。在没有任何空军助战，只有英军三门火炮的支援下，中国远征军官兵奋勇冲锋，迅速攻占当面日军阵地。日军拼死反扑，阵地三失三得，双方反复冲杀，战况极其惨烈。孙立人的攻击可谓惊险万分：他指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千人左右，而日军的兵力至少比他多出数倍。日军自始至终都没搞清楚中国军队来了多少人，他们按照以往的作战经验，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中国军队没有数倍以上的兵力是不敢发动这样的攻势的。但是这一次例外，这是孙立人的部队。日军逐渐退了，枪炮声渐远，当中国远征军官兵攻占日军主要据点五〇一高地后，看见了包围圈里惊恐万状的英军。中国官兵首先把被日军俘虏的五百多名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和英军俘虏释放出来，然后安抚了几乎崩溃的七千名英军官兵。中国官兵把缴获的一百多辆汽车和一千多匹军马交还给他们，然后护送他们从左翼撤到宾河北岸。

孙立人指挥的一一三团共有官兵一千一百二十一人，在此次解救英军的作战中阵亡二百零四人，负伤三百一十八人。

“仁安羌大捷”不但轰动全国，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战后，英王乔治六世给孙立人师长颁发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但是，勋章无法补偿数百名中国青年官兵的生命。

英国人幸免于难，可对于彬文那会战来讲，英军负责的西线侧翼已经完全垮了。

接着，东线侧翼也传来危急的消息。

日军第十五军命令从东路向北进攻的第五十六师团，须于四月十日前推进到垒固，然后从垒固出发沿莱卡至腊戍的大道突进。据此，第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计划是：“首先捕捉前出到垒固以南的暂编第五十五师，然后超越此地北进。接着尽力从东方包围和榜、东枝的敌人，要将敌击退到其退路以外，再进行攻击，继而向腊戍疾进。”

中国远征军第六军自入缅以来，担任着正面极其宽大的东部防御。在第五军于同古作战时，为掩护战场侧翼的安全，第六军将暂编第五十五师一团推进到同古以东的毛奇和垒固地区。但是，随着同古陷落，由该地经毛奇、垒固、东枝、雷列姆直至滇缅公路上最主要的结点腊戍的通道，等于向日军打开了。

为了在二十日前抵达垒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于六日开始向毛奇发动攻击，远征军的一个连进行顽强抵抗后退守克马俾阵地。为确保彬文那会战的东部侧翼安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令暂编第五十五师二团推进到垒固，三团在塔泽和东枝构筑工事；第九十三师的二九七团调往东枝以东的和榜，沿着公路部署纵深防御。同时命令第九十三师和第四十九师分别对当面日军实施牵制性攻击。

四月九日，日军增加兵力后，向克马俾阵地猛攻，中国守军抵抗阻击。战斗到十一日，阵地被日军摧毁，中国官兵退守到土冲河以北。十二日，为了加强垒固防御，暂编第五十五师把三团增援给了二团。但是，部队尚未完成布防，日军就冲到了土冲河边，分成左右两路向中国守军阵地实施围攻。暂编第五十五师一团拼死防守，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增援了一个联队后，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再次后撤。日军以坦克

和汽车组成快速队向垒固推进，并与正在构筑工事的二团和三团发生激战。日军在正面强攻的同时，抽出一个联队由左翼超越中国守军阵地，直接攻击了距垒固仅十公里的恩奎当。暂编第五十五师开始腹背受敌，与第六军指挥部也失去了联系。二十日，军长甘丽初鉴于局势难以挽回，命令破坏垒固至和榜的公路，然后率军司令部和军直属部队撤往和榜。垒固陷落。

此时的全局是：英军已退至彬文那右后方约二百公里处，战场的西侧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东侧的日军突进迅速，正从垒固向北急进；中路的日军抵近了彬文那，负责正面阻击的第九十六师陷于苦战。——尽管彬文那会战的部署基本完成，但远征军却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中，特别位于中路的第五军很有可能被东西两路日军包抄。

所谓彬文那会战，断难再按计划实施。

为此，林蔚提出两种意见：一是继续贯彻彬文那会战，努力击破日军的一路，破解远征军的危局；二是迅速跳出日军的包围，退到曼德勒东北地区，增加兵力后重新部署作战。史迪威和罗卓英接受了第二种意见，随即发出放弃彬文那会战的命令：

一、不足一师之敌刻沿伊洛瓦底江北进，其先头已越过宾河向乔克巴党方面前进中。东敦枝尚仍在英军手中。乔克巴党及其西北地区有我新编第三十八师之一团迟滞敌人，此方面之英军已无战斗力。

二、第五军主力应先向密铁拉（梅克提拉）、飘背间逐渐集结，并留一部于彬文那附近地区，行持久抵抗，掩护军主力之作战。

三、第六十六军应守备曼德勒，并派出一营至敏建警戒，其新编第三十八师派出之两个团，应逐渐向乔克巴党合力迟滞敌人。

从这一命令可以看出，史迪威和罗卓英将远征军第五、第六十六军分散配置在长达三百多公里的彬文那至曼德勒的公路上，既不是攻的阵势，也不是守的部署，于是遭到杜聿明的坚决反对。杜聿明认为，要么在彬文那打下去，要么全面退守东枝和眉谬，绝对不能将兵力分散而被日军各个击破。杜聿明在电话里与罗卓英争吵激烈，最后罗卓英强硬命令杜聿明必须执行。杜聿明勉强向部队下达命令后，亲自赶到飘背面见罗卓英，再次强调：如果放弃彬文那会战，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即东枝和眉谬，而不应该再计划曼德勒会战。罗卓英不置可

否。

此时，西面的英国人又开始大喊大叫了，声称他们所在的乔克巴党发现了三千多日军，请求中国远征军派部队前来消灭。史迪威和罗卓英相信了英国人的话，当即命令第二〇〇师开往仁安羌以北的乔克巴党。但杜聿明派出的搜索队报告：仁安羌方向有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乔克巴党附近没有发现敌情。可史迪威和罗卓英还是认为英国人的情报准确。杜聿明认为，即便仁安羌方向有情况，东枝的安危也比英国人重要，如果这样作战出了问题他不负责任。罗卓英表情尴尬。史迪威突然冒出一句话：“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杜聿明怒火中烧：“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英国饭！”指挥部里顿时气氛紧张。杜聿明坚持派骑兵再度前往乔克巴党，结果得到的报告是：在乔克巴党，只有大批英军正在新编第三十八师的掩护下撤退，根本没有见到英国人所说的三千多日军。这下，杜聿明决定亲自去眉谬，向中国入缅参谋团陈述，走到半路，消息传来：史迪威和罗卓英改变命令，让第二〇〇师去东枝方向了。

无论怎样表白要和中国人并肩作战，自私懦弱的英国人撤离缅甸退守印度已成定势。早在英国人请求中国远征军解救被围的英缅军第一师时，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就给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写信，要求他“与中国军队保持密切接触”，以保证英军撤往印度的道路畅通。亚历山大随即撤消了英军配合中国远征军进行曼德勒会战的计划。然后，他试图说服史迪威和罗卓英，将中国远征军调往英军所在的乔克巴党方向。对于英国人驱使中国远征军掩护其撤逃的部署，连日本人都看得十分清楚：“亚历山大上将将他的部队关在伊洛瓦底江的弯曲地带，根本未考虑使之背水布阵，只是按曼德勒地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交通上的隘路和必须防卫钦敦江河谷及瑞波的两条道路而考虑。他在训令中明确了缅甸军团在伊洛瓦底江南岸，不使之直接参加曼德勒地区的防卫。”

英国人的所有承诺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就在远征军指挥部为英国人是否可靠而争吵时，一直在中路彬文那的正面阻击日军的第九十六师，在第二〇〇师和新编第二十二师的配合下与日军死缠硬磨。当面日军为了攻占第九十六师的阵地，用尽各种办法，包括和缅甸德钦党人混编成便衣队，潜入第九十六师的两翼，造成中国官兵的很大伤亡。可是，当戴安澜和廖耀湘的部队都进入了阵地，“军炮兵团及战车防御炮营、粮弹交付所、野战医院等都推进就绪，各部官兵均抱有必胜信念，摩拳擦掌准备将敌人主力吸引于彬文那正面，予以沉重打击后，即向敌人东西两面出击，一举歼灭敌军”时，第九

十六师接到了第二〇〇师和新编第二十二师要走的消息：

……现我右翼英军、左翼第六军战况紧急，我第二〇〇师、新编第二十二师须先援马格威，转赴棠吉救援。第九十六师应争取时间阻敌，不必作坚决的决战……

两翼部队被抽调走后，日军趁机占领了两翼，正面的攻击更为凶猛，且缅甸德钦党人也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远征军官兵饱尝了土著游击队的古怪战术：

入夜后，德钦党十余人偷至二八六团阵地，破坏铁丝网，被我预设警铃察觉，立被击退。旋又化装难民，乘牛车四辆，企图混入我阵地，亦被悉数擒获。又有一部爬至二八七团第一营阵地边缘，装鬼叫，声如哑獐。适该营营长林狮巡查至此，大声喊道："那是日本鬼子，快打，快打！"守兵一开枪，即闻一阵沙沙之声，滚向乱草坡下去了。遗尸三具，均为缅人。

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打电话给杜聿明，报告部队已经三面受敌。杜聿明同意第九十六师立即撤退，但须将军部存在彬文那的炮弹同时撤回。第九十六师撤退时，日军的步兵和骑兵紧追不舍，官兵们必须不断地停下来阻击，因此一路下来伤亡很大。

与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一样气闷的，还有解救了英军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按照孙师长的计划，待一一二团和一一四团抵达后，他要率领全师向当面日军发动攻击，努力把战场西面的战局稳定住。但是，他接到了英军送来的命令，大意是：中国第五军部队已从彬文那撤退，这严重影响了英军右翼的安全。鉴于中国军队给英军造成的困难，新编第三十八师要继续掩护英军转移。更令孙立人愤怒的是，由于英军的不战而逃，经过血战一场攻占的仁安羌竟被日军再次占领，且现在他还要根据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作为英军的后卫掩护他们继续向西北方向撤逃。

日军得到第十八师团的加强后，制订了全面围捕中国远征军的部署。四月二十日，日军第十五军下达作战命令：

一、决定以一个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同时以主力部队沿央米丁——曼德勒公路及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突进，包围敌主力之两翼，压向伊洛瓦底江歼灭之。

二、第五十六师团应沿乐可（垒固）——莱卡——腊戍道路地区向腊戍方面突进，切断敌军退路。预定独立第五十六步兵团沿央米丁——敏丹——南曲依道路前进，回归师团长的指挥。

三、第十八师团应在进入央米丁东侧地区后向曼德勒方面突进，切断敌主力的退路，并捕歼之。

四、第五十五师团应在进入央米丁西侧地区后，向曼德勒西南地区突进，将敌军主力压向伊洛瓦底江歼灭之。

五、第三十三师团应经敏建附近向曼德勒方面突进，捕歼敌主力。

另外，应以一部急进八莫，切断八莫及杰沙附近敌之退路。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转折点：这一天英军丢弃整个西部战线向印度撤逃，而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从战场东部的泰缅边界方向斜插而入，攻击矛头直指腊戍。

日军第十八师团是战斗力极强的甲种师团。作为侵华日军的主力部队，登陆杭州湾参加淞沪会战，登陆大亚湾占领广州，登陆钦州湾直扑南宁，登陆闽江口攻占福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十八师团从马来半岛登陆，占领新加坡，迫使英军全部投降。第十八师团插入战场的方向，是中国远征军第六军防御的宽大正面，因为兵力配置被极大地稀释，这里成为远征军防御最薄弱的方向，无法设想中国第六军如何才能同时抵抗日军两个师团的联合攻击，而这个方向恰是距离中国边境和滇缅公路重要中转站腊戍最近的地方。如果这个方向崩溃了，不仅中国远征军满盘皆输，滇缅公路和中国云南也将处于日军的刀锋之下。

可是，就在东部战线的崩溃近在眼前之时，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们——无论是美国人史迪威还是中国人罗卓英——依旧热衷于策划没有任何前景的曼德勒会战。

占领了垒固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先头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和榜以东向雷列姆，一路由和榜向西经东枝，两路并进，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沿着公路向北急促推进。

东枝，也称棠吉，是整个战线的重点枢纽，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和第六军的接合部。日军一旦攻占东枝，向西可以攻击第五军的侧背，向北可以击溃第六军直取腊戍。显然，中国远征军必须立即集中兵力确

保东枝。为了应付危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决定分兵两路在东面阻击日军：一路由第六军参谋长林森木指挥和榜附近的部队，对日军实施阻击，而军长甘丽初率领部队在雷列姆附近构筑防御工事；另一路由第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率部由密铁拉东进，增援并固守东枝。

但是，第六军的防线很快就垮了。

第六军参谋长林森木指挥的兵力不足一个团。二十一日上午十时，日军先头部队击溃中国守军的一个步兵连，攻占和榜，双方在和榜东侧阵地展开了拉锯战。二十二日，和榜中国守军阵地被日军的炮火摧毁，官兵连夜后撤至孟邦阵地。二十三日中午，日军一面攻击孟邦阵地，一面从阵地的两翼迂回。二十四日，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对孟邦发起了全力攻击，中国守军支撑不住，参谋长林森木带领残部突围向北退至猛昆。军长甘丽初指挥的军部和直属部队防守的雷列姆也同时陷落。占领了雷列姆的日军以十辆坦克和四百多辆汽车分路迅速北上。甘丽初军长原有在公路上阻击日军的计划，但是日军攻势凶猛，第六军部队只有一路向北退到孟囊（今孟瑙），在孟囊还没有站住脚，迫于日军的追击再向孟休方向撤退。自此之后，甘军长带领的这批人马开始在泰缅边境附近游弋。参谋长林森木带领的残部得知孟囊陷落后，继续向北撤退寻找退回云南的道路，他们在日军的后方东躲西藏，走了一个多月才得以脱险。

在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方向，戴安澜师长命令骑兵团打头阵，一个营的榴弹炮和部分装甲车随主力向东枝进发。此时的东枝已经混乱不堪，当地的部分缅甸人在日军的煽动下到处纵火，劫掠华侨，破坏交通和通信设施。二十三日，骑兵团赶至距东枝尚有六公里处，获悉东枝已经被日军占领。第二〇〇师迅速制订了收复东枝的作战方案：六〇〇团在火力支援下正面攻击；五九八团在左、五九九团在右实施两翼包抄。二十四日拂晓攻击开始，激战到中午，第二〇〇师先后攻克了东枝的西、南、北三面高地，一个营的中国官兵甚至冲进东枝街市与日军展开了巷战。

就在东枝收复有望的时刻，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再次发生混乱：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电令戴安澜，二十五日必须攻克东枝，然后迅速返回曼德勒参加会战；位于腊戍的入缅参谋团也发来电报，命令第二〇〇师攻克东枝后，向雷列姆的日军实施攻击，截断日军的退路，解救腊戍的危机。

两个命令方向上相互矛盾，戴师长到底该听谁的？

无论如何，必须首先攻克东枝。

二十五日拂晓，第二〇〇师发动猛烈攻势，主力冲进东枝街市，把日军赶到城南的一座小山上。日军曾在重炮支援下数次反击，但都被第二〇〇师击退——东枝附近的日军基本被第二〇〇师肃清。

显然，远征军第五军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一面固守东枝，一面向雷列姆全力攻击，威胁向腊戍推进的日军的后路，以确保战略要点腊戍的安全因为保卫腊戍就是保卫滇缅公路和中国云南边境，这是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根本目的所在。关于这一原则，蒋介石在二十四日的来电中阐述得很清楚：

腊戍。林团长：极机密训令。顷下达史迪威参谋长、罗长官之训令如下：一、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尤以对棠吉、雷列姆北进之敌，须极力拒止其继续前进。二、新二十八师主力可速运腊戍与雷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歼灭之。三、第五军在平满纳方面，应以逐次迟滞敌之前进为目的，施行持久抵抗，但亦不可过久胶着于一地战斗，致招过甚之损失。四、为应将来状况之演进，第六军应准备以景东车（里）佛（海）方面，第五及第六十六两军主力，以密支那与八莫方面，为后方补给联络线。右四项除分令外，仰即知照为要。蒋中正手启。

蒋介石强调的原则是：一、无论英国人逃向哪里，只要出了缅甸境就不管了，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范围只在缅甸；二、腊戍的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三、中国远征军不要轻易地与日军打阵地攻守式决战，要机动灵活，以避免中国军队伤亡过大；四、一旦腊戍丢失后，应该把八莫、密支那一线确定为远征军的后方。

但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最新命令是：第五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北返曼德勒参加会战，第二〇〇师单独向东攻击雷列姆。——这并不符合蒋介石制订的原则，但是，位于腊戍的参谋团却表示遵令。

史迪威和罗卓英为什么要在根本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坚持曼德勒会战？有史料分析说，组织曼德勒会战的出发点就有掩护英军安全的嫌疑。可此时亚历山大已经下令英军向印度撤退，英国人准备抢在日军追

上来之前渡过伊洛瓦底江。那么，即使是为了英国人，此刻曼德勒会战计划也应该改变了，可史迪威和罗卓英还是坚持置东枝于不顾，命令第五军北返曼德勒，似乎是专门为掩护英国人的安全而在部署作战。——如果真是如此，中国远征军入缅，其任务岂不仅仅是接应英国人逃出日军的追杀而已？

杜聿明遵照命令将部队西移之后，四月二十六日，第二〇〇师官兵血战收复的东枝再次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下令停止所有军需运输，各部队的给养就地解决，以便集中起各联队的四百多辆卡车，利用缴获的七百多桶汽油，以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兵分两路对腊戍实施夹击。渡边正夫希望在四月二十九日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攻占腊戍。当天，日军先头部队抵达曼卡特，与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二团一营发生了战斗。该营把曼卡特吊桥破坏后，退守西保和南伦，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八十四团奉命火速增援。下午，在飞机的猛烈轰炸下，日军先头部队逼近西保和南伦，八十四团拼死抵抗，击溃日军装甲车一辆，暂时守住了阵地。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命令新编第二十八师主力死守，同时命令军直属部队特务营、搜索营、工兵营和战防炮营占领腊戍外围阵地。

此时，远征军第五军军部、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还在向曼德勒集结。执意要进行所谓曼德勒会战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仍没有认清形势而迅速调动部队保卫腊戍，致使腊戍城内的中国守军只有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四个步兵营。

日军于战场东部的凶猛突入，令远征军部队的调动陷入混乱。中国陆军第六十六军是刚组建不久的部队，辖由别动队改编的刘伯龙的新编第二十八师、由第十九补充兵训练处改编的马维骥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和由税警团改编的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远征军准备彬文那会战期间，新编第二十八、新编第三十八师奉命入缅车运曼德勒。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去仁安羌方向解救英军后，归属杜聿明直接指挥，刘伯龙的新编第二十八师接替担任曼德勒城防。二十四日那天，罗卓英命令新编第二十八师留下一个团，其余部队全部调回腊戍。军长张轸当时就火了：新编第三十八师不归他指挥，新编第二十九师还在云南境内，再把新编第二十八师主力调走，留下他和军部幕僚以及一个团的部队，如何防守曼德勒？他请示了参谋团的军令部次长林蔚，林蔚却要他跟随部队回到腊戍指挥防御。张军长立即回到了腊戍，罗卓英知道后大发雷霆指责张轸擅离职守。

二十七日，南伦和西保相继失守。

从曼德勒返回腊戌的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两个半营被日军包围。

中国官兵苦战五个小时，损失过半，残余官兵在特务营的解救下才得以突围。

这一天，罗卓英下达了曼德勒会战命令。

二十八日，由西保出发的日军沿着铁路线折向曼德勒，由南伦向北突击的日军抵近了腊戌外围。在抵抗日军的战斗中，第六十六军直属部队伤亡惨重，特务营连长任作舟、排长董朝翔，参谋科长张致广以及搜索营营长崔照陆相继阵亡。

腊戌即将遭到攻击。

曼德勒的南面和西面也面临日军的威胁。

昨天刚刚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的罗卓英，仅隔一天又下达了规定各部队如何撤退的命令。虽然对曼德勒会战闭口不提了，但是这个撤退命令依旧不符合实际：

一、本路军先以第六军与第六十六军主力及二〇〇师，击破突入之敌，第五军主力联系英军，由正面迟滞敌人。

二、第五军（欠第二〇〇师，附新编第三十八师）之部署大要应如此：

（一）第九十六师即渡伊洛瓦底江，乘火车至密支那整训，并负责警备该地之责。

（二）新编第二十二师及新编第二十八师之一团，防守曼德勒以南之泥翟河右岸，予敌以打击后，逐次向后撤退。新编第二十二师撤至曼德勒北约四十里之新喀（辛古），然后渡过伊洛瓦底江右（西）岸，负责拒止该方面北进之敌。新编第二十八师之一团，即向眉谬方向撤退，归还该师建制，并掩护师之侧背。

（三）新编第三十八师，除以一团于伊洛瓦底江左（东）岸曼德勒以北之马打牙（马德亚）附近，掩护新编第二十二师之撤退及渡江外，师主力即在伊洛瓦底江右岸，协同英军布防，迟滞敌人，不得已时，逐

次沿密（支那）瓦（曼德勒）路线后撤。其在伊洛瓦底江左岸之一团，则在新编第二十二师之后，渡过伊洛瓦底江右岸。

三、第六军及第六十六军主力（欠新编第三十八师）与第二〇〇师，任向腊戌方面之敌之攻击，并以一部固守腊戌。

四、第五军以密支那，第六十六军以八莫、畹町，第六军以车里、佛海，为后方基地。

命令的内容确实有些荒诞：西面的英国人早已撤往印度，何谈与英军一起在“正面迟滞敌人”？东面的第六军已渡过萨尔温江撤离了战场，腊戌方向目前只有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和军直属部队在勉强支撑，新编第二十九师还在从国内增援腊戌的路上，第五军之第二〇〇师遵照命令还在雷列姆方向，那么到底应该指望哪支部队“向腊戌方面之敌攻击”并固守腊戌呢？下达如此命令只能有一种解释：无论史迪威还是罗卓英，根本不知道战场上正在发生着什么。

至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策划的同古、彬文那和曼德勒的三场会战，相继泡汤了。

二十八日这天，鉴于腊戌危急，蒋介石紧急指示：宁可放弃曼德勒也要保住腊戌。

但是，位于腊戌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参谋团已开始撤离——这些军政大员以每天二百多公里的惊人速度，连续不断地跑了五天，一直跑到距腊戌一千多公里的云南保山才停住脚——奔逃之中的他们根本顾不上其他事情了，由此导致远征军所有部队都没能及时收到蒋介石的这条至关重要的指令。

腊戌，已经暴露在日军面前。

日军连续突破中国远征军毫无章法的防线，以每天近百公里的速度强行推进六百多公里，直逼滇缅公路上堆放着数量惊人的进口战略物资的核心中转站以及保卫中缅边境的重要前沿阵地腊戌。

四月二十九日拂晓，日军出动步兵一个联队，在十门火炮、十架战机和三十余辆坦克的支援下，向腊戌实施强攻。此时的腊戌基本是座空城，中国远征军各军主力都距腊戌甚远，原来留守此地的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八师，除了一个团还在曼德勒之外，余部在腊戌外围战斗中已

经损失殆尽。

第二十九师师部和直属队的驻地在云南大理，所辖八十五、八十六和八十七团分散驻防在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沿线。该师四月二十五日才接到增援的命令，要求他们须在二十八日前抵达腊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命令：该师各团驻地距腊戍少则七八百公里，多则上千公里，以当时的电讯、交通等条件，仅传达命令、准备行军和征集汽车，都不是一两天内可以完成的；更不要说这道命令并没有提供给该师任何路况信息和敌情通报，只是要求他们迅速抵达腊戍。

明知不可为，又不敢不为。师长马维骥仓促地制订了入缅计划。他认为，二十八日那天，哪怕只有一个连抵达，也算执行了命令；至于抵达后如何作战，眼下无论如何都预测不了。因此，他给各团下达的命令里只说限期抵达，没有任何作战预案。

二十六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从东枝附近开始向北面不足二百公里的腊戍突进的那天，在云南大理城西门外，七十多辆汽车排成一列，新编第二十九师直属部队和八十六团一部乘车向千里之外的腊戍进发了。由于一时无法征集大量汽车，其他各团只能临时就地寻找，找到一辆出发一辆。

从大理到畹町的公路是中国西南部最为险峻的地段。

此时这条公路上拥挤而混乱：

当时的滇缅路，路面狭窄，除惠通桥（保山怒江）一带是柏油路外，其余都是碎石路。沿途所遇到的撤退车辆，络绎不绝，争相抢道，无法快速行车。到达保山时，天已黑尽，仍需继续前进，连夜开车。沿途除稍停打尖外，车不停轮。可是交通堵塞情况越来越严重，抛锚的车子又特别多，其中还有汉奸捣鬼。通过怒江上的惠通桥（铁索桥）时，只能一辆一辆地过，因为车多，往往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到达怒江对面山上的腊猛街时，已经是二十七日清晨。司机熬夜开车，疲惫不堪，加之陡坡弯急，路窄车挤，车速越来越慢，车队已经七零八落，失去了统驭。下午才到遮放坝子。过遮放西面大山时，已是深夜。细雨蒙蒙，路滑难行，而撤退的车辆依然灯光相接，绵延不断，并且两三路纵队争先恐后地迎面而来，道路为之堵塞，谁也不能顺利前进，不得已，只好以武力维持秩序，尽量不让败兵退车自相倾轧。

二十八日，新编第二十九师终于有一个营抵达了腊戍。但是，这个营还没来得及部署，日军就冲到了面前。被连续几天的颠簸路途弄得昏头昏脑的官兵们，既没有工事可以利用，也没有反坦克武器，拼死抵抗了一阵，很快就被日军冲垮了。

二十九日，后续的两个团陆续抵达，新编第二十九师沿着腊戍河构筑临时防御工事，而日军的战机在头上盘旋轰炸，数十辆坦克在河对岸一字排开猛烈轰击，中国官兵用机枪和迫击炮还击毫无效果。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把五门战防炮加强给了马维骥师长，同时命令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指挥该师残部建立二线阵地以掩护一线阵地的侧后。接着，日军步兵在战机、坦克和重炮的支援下，开始不顾一切地在腊戍河上架桥强渡。新编第二十九师主要由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组成，战斗刚一开始就“士兵找不到军官，下级找不到上级”，在日军潮水般的攻击面前，一线部队一触即溃，死伤累累，“后续部队仍继续零星地开往前线，由于失去了指挥系统，到一车被消灭一车”。上午十时，新编第二十九师的两个营、第六十六军的工兵营和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一个营伤亡惨重，一线阵地被日军全面突破。日军随即以坦克第十四联队和一个步兵大队组成了快速突击队，猛烈地扩大突破口，第五十六师团主力随后跟进。第六十六军的特务营、搜索营和战防炮连奉命扼守腊戍北面的桥梁，以掩护从一线阵地撤退下来的残部，但尚未部署完毕日军的坦克就冲到了眼前。二十九日中午时分，腊戍市区被日军占领。

缅北重镇腊戍的失守，使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囤积在该地的数量庞大的战略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更重要的是，此时分散在东、中、西线的中国远征军主力，在腊戍以南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已无法立足，总溃败的局面已经显现。

四月三十日，日军第十五军接到东京大本营的电报：

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第十五军的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国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的兵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越附近怒江一线追击。

命令传达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认为，沿着滇缅公路抵抗的中国第六十六军的新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师已失去战斗力，不会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用不着动用师团主力去追击，仅以第一四八联队加上坦克第十四联队的配合向怒江突击足以制胜。而师团主力则须沿着腊戍、新维（今兴威）、木姐、南坎、八莫道路，向密支那方向迅

速突进，以切断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主要退路。第十五军军司令部对渡边正夫的决心非常赞赏：“对自曼德勒方面向北退却之敌，军决定以第五十五师团及第三十三师团向密支那、塔曼提（密支那西方约二百四十公里钦敦江畔）一线追击，以期与贵师团之切断退路相配合捕歼敌人。”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三十日从腊戍出发，沿着滇缅公路向北面的中国边境猛烈突击。沿路防守的第六十六军的两个师虽然进行了抵抗，但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五月一日，第六十六军在新维的阵地被突破，军长张轸以新编第二十九师的一个营和军直属战防炮营增援二线阵地，中国官兵击退日军四次进攻，击毁日军三辆坦克。日军派出预备队全力猛攻，尽管张轸军长又把特务营和搜索营增援上去，但未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战防炮营和搜索营官兵全部阵亡。五月二日，日军以一百多辆汽车运载着二千多名步兵，在百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数十门火炮的支援下，继续向贵街攻击。下午，贵街一线阵地被日军突破，军长张轸带着特务营赶到贵街附近仓促布防，但部队很快就被日军的坦克冲散。当天晚上，日军前锋便抵达缅甸边境的木姐镇，这里与中国的畹町镇仅隔一条边境线。

畹町本是中缅边境上的一个小镇，因滇缅公路的修通而逐渐热闹起来。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大部沦陷后，畹町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国际物资进出口口岸。小镇上的行政机构仅有一个警察局和一个中央宪兵连，更多的是与进出口相关的检查机构和贸易机构。

进入一九四二年后，经过畹町的汽车川流不息，成百上千的中国民间和官方的商人涌到这里，他们先从外国购买大量汽车，运到缅甸的仰光后再抢购大量各种物资，然后由汽车沿着滇缅公路向国内运输。由于战争的需要，军用物资的采购和运输大多由官商垄断，国民政府在仰光和腊戍都设有办事处，西南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战争时期，国内物价飞涨，与进口物资的差价极大，从事进出口生意的官员大发国难财是人人皆知之事。这也导致了一些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将领参与其中。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回忆：

入缅部队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就以大量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币卢比）购买布匹、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一车一车地装运到昆明出售，获利十倍到二十倍……抗战到了第三年，物价就开始急剧上涨。到一九四二年，许多东西涨了几百倍，大家都叫苦，军队中绝大部分官兵的生活尤为艰苦。

但蒋介石那时却拿出大批的外汇发给入缅部队。部队原来就有许多空缺，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之时，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越多，对他们就越有利，无数士兵的鲜血和人民的血汗填满了他们的私囊。

日军在缅甸长驱直入，缅甸境内的华侨纷纷回国，再加上逃兵和溃兵，畹町顿时一片混乱，汽车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军事委员会后勤部部长俞飞鹏亲自来到畹町，决定把囤积在这里的大批物资抢运至保山。但是时间紧迫，物资堆积如山，仓库早已满了，大批物资被堆放在路边。在只能抢运贵重物资的情况下，准备出口换取武器的八万桶桐油只能就地销毁，方法是雇人用斧头把油桶砍裂，让桐油自行流出。国境线那边炮声一响，官员和商人们更是纷纷逃命，大量的物资扔在畹町成了无主货物，其中以棉花、棉纱、汽车、汽油、轮胎和兵工器材最多。于是就放火焚烧，日军尚未侵入，畹町已是一片火海。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奉命在畹町布防，可他已经没有作战部队了，交给他指挥的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第六军第九十三师的补充团和第五军装甲团的一个营。“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约一个中队二百余人，分乘装甲汽车，进入我国境内畹町。”时任畹町警察局局长的李志正说，日军“未受任何阻挡长驱侵入”。实际上，那二百多人只是日军的先头部队，后面跟着的是日军第一四八联队主力和坦克第十四联队。张轸军长奉命指挥的第九十三师补充团全是刚刚入伍的新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见了日军就跑；而第五军装甲团的那个营接到团长的命令让他们立即撤退。结果，张轸军长能做的事是：把第五军装甲团的五辆坦克毁掉，停在公路上充当阻挡物企图把日军堵住。

冲进畹町大火中的日军依旧缴获汽油一千五百七十桶，机油一千桶，大米五百袋，盐八百九十六公斤。

日军绕过横在公路上的那几辆破坦克，越过畹町北面的高地，根本不顾溃退中的中国官兵，沿着滇缅公路直接向怒江冲去。

滇缅公路畹町至昆明的路段上一片混乱：

入缅军各种车辆器材及伤病员等纷纷向国内转运，而原在滇缅路线

上的腊戍、畹町、遮放、芒市、龙陵等地所存储的物资亦争先向后方抢运。除武装部队外，还有缅甸侨胞逃回祖国的，还有一些到缅甸经商运带货物回国的，或乘车，或步行，同一个目的，就是拼命向后方逃跑。于是滇缅路上，人车拥挤，途为之塞，车辆头尾相接，进退两难。沿途步行的人强制搭车，车辆每次前进，最多一二公里就被堵住，只好停下来等候再走；可是刚行车一小段又得停下来。这样一段一段地磨，车子不是交通利器，反而变成堵塞道路的障碍物了……芒市前后有十多公里走不通，龙陵前后有二十多公里走不通，满满都是车子。

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奉命率领一部前往芒市阻敌，部队在拥塞的车流中行进缓慢，还未抵达日军就已冲入了芒市。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坂口支队，在芒市和龙陵一带击溃分散布防的中国守军，于五月四日占领芒市，当晚占领了龙陵。

芒市沦陷的当天，日军二十七架战机飞临保山上空，对这座山城实施了猛烈轰炸——“被炸伤、炸死的人，东歪西倒，哀号呻吟。尤其是正阳南路吴家牌坊附近，尸体堆积如山；南门街上水河的小河中，尽是血水，惨不忍睹。”更令保山百姓惊恐的是，天上日军的飞机在轰炸，地上龙云的部队在抢劫。当时负责保山防御的是滇军第六旅，旅长龙奎垣声称日本兵快到了，命令手下先在街市上纵火，然后纵容弟兄们劫掠——“首先是银行，其他商号富户无一幸免，小户人家也不放过。放火和抢劫后，就撤出了保山，逃到永平、下关一带。事后被保山人民告发，中央军也提出了意见，龙云不得已才撤去了龙奎垣的旅长职务。”

攻占了芒市和龙陵的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直逼怒江，一路向云南腾冲进发。腾冲是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始终是纵贯川滇、西出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日军逼近的消息传来，加上从缅北和滇西方向退下来的溃兵和难民的涌入，腾冲城内人心惶惶。当地官员召集士绅们开会商讨办法，大部分士绅主张守土有责，但官员们却很快逃亡了。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带领残部到达这里时，百姓们又看到了希望，谁知刘师长当即宣布：本部只有收容溃兵之责，没有抵抗日军的命令。之后，新编第二十八师也开走了。日军很快冲进了腾冲，当地官府门户洞开，百姓逃散一空，城内的公私财物悉归日军所有，包括腾冲商会仓库里堆积的三千多驮大米和商店里堆积的大量的盐巴、棉纱、布匹以及各种杂货。

五月五日，日军先头部队抵达怒江。

怒江，一条嵌入中国西南部横断山脉幽深峡谷中的巨大激流，它把中缅边境至云南省府昆明之间的交通切割成两半。激流上有一座名叫惠通桥的钢索桥，可谓天堑上的唯一通道。

日本人清楚：突破了怒江天堑，便可直接攻占保山，然后冲向昆明，把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变成前线。

五月四日，陈纳德向蒋介石报告说，他的飞行员侦察得知，滇缅公路上的中国军队溃不成军，对日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再不设法挽救，按照日军的推进速度，十天左右便可冲进昆明。蒋介石立即致电已退到保山的军令部次长林蔚：

参谋团林次长。新维至畹町间应一面破路，一面装埋地雷，如无地雷，则埋手榴弹于路中，亦可阻止战车前进；所有桥梁，应尽量破坏，马崇六处长现在何处？应令其全力破路与构筑工事为要。中正。

深夜，蒋介石给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打电话，向他讲述了滇缅公路的危机，命令宋希濂迅速调集部队前往怒江迎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日军越过怒江天堑。

宋希濂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辖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一军和预备第二师。第六十六军加入远征军序列，不归他指挥，且正处于混乱的撤退中不知所终；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正在从四川泸州、叙永一带紧急入滇途中；预备第二师目前驻扎在云南安宁附近；暂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的新编第三十九师在云南东面的曲靖整编。眼下，宋希濂所能指挥的距离怒江最近的部队，只有第七十一军的第三十六师，该师已从四川西昌开到了云南楚雄以西、大理以东的祥云附近。除了兵力十分有限，更令宋希濂担心的是，从怒江到昆明的滇缅公路上，现在除了少量的滇军部队和一个负责维持交通的宪兵团、一个防守澜沧江大桥的工兵团和一个化学兵团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一支强有力的作战部队能够参加怒江防御战。而且，由于国民政府战略判断上的失误，滇缅公路沿线从来没有构筑过任何国防工事。

可能挡住日军的，只有怒江这道天然屏障了。

宋希濂当即到滇缅公路运输总局洽商征集汽车，他要求把所有的商运和军运车辆全部停止，征集所有能征集到的汽车运送他的部队。运输总局经过计算，答应于五日至七日间提供五百五十辆卡车交付给第十一

集团军。宋希濂计算了一下，这些车辆可以让他三天内运走两个师的兵力。于是，他连夜给驻扎在祥云的第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打电话，要求他的部队整装待运，且命令李师长本人带少数人马立刻出发，去追正在赶往怒江的该师一〇六团。接着，蒋介石再来电话，命令第十一集团军把昆明防务交给第九集团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第十一集团军马上开赴怒江。宋希濂动身前往保山。

五日上午九时，日军攻占怒江西岸松山山麓的腊勐。

怒江惠通桥下的江面宽约六百米至七百米，两岸悬崖陡立，滇缅公路于两岸盘山蜿蜒，无论从东到西，还是从西到东，从山上下到桥边，曲折的公路上下盘绕要转数十个弯。从日军占领的松山山麓的腊勐到江对岸的农田，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但汽车沿着公路上下盘旋却要耗费半天左右的时间。

抵达怒江岸边的日军向惠通桥发起冲击。

此时，无论是在惠通桥上，还是桥两岸的蜿蜒公路上，仍旧挤满了各种车辆。日军从怒江西岸向东岸炮击，逃亡的华侨、本地的难民以及中国军队的残兵，纷纷弃车躲进公路两侧的密林中。

眼看着日军上了惠通桥向东岸冲来，千钧一发之际，在惠通桥头监视日军的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下达了炸桥命令。

炸药是远征军的工兵早已埋好的。

一声巨响，惠通桥断裂。

桥上的车辆和难民，连同冲上桥的日军，随着断桥一起坠入怒江的激流中。

桥梁残余的钢索在激流之上的峡谷疾风中摇晃。

惠通桥被炸断之后，日军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被阻止在了怒江西岸。但是，向内地撤退的大批华侨、当地难民以及装载着大批物资的车辆，连同那些尚未逃过怒江的中国军队的官兵，全被封堵在了江对岸，成为日军抢掠追杀的对象。

日军的坦克和汽车无法过江，随即派出一个大队的步兵乘坐橡皮艇

冒死抢渡怒江，数百名日军居然从湍急的江水中爬上了怒江东岸。

中国军队第七十一军的先头部队第三十六师一〇六团的两个连几乎和日军同时抵达东岸，双方即刻发生激战。随着一〇六团主力陆续抵达，日军遭到大量杀伤。傍晚时分，一〇六团先头部队占领了怒江东岸公路两侧的高峰，初步控制了局面，但仍有五百多日军在西岸重炮的支援下顽强抵抗。第二天，第三十六师的一〇七、一〇八两个团陆续抵达投入战斗，中国官兵消灭了二百多日军，但残余日军依旧坚持不退。

七日，宋希濂冒着日军战机的轰炸，赶到位于惠通桥东岸的第三十六师指挥部，与师长李志鹏制订了攻击部署。

八日上午，第三十六师集中了所有的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部队向残余日军发动冲锋。怒江边的喊杀声和白刃格斗声混杂在一起，被打死的日军尸横江滩，被逼进江水的卷入激流，仅有数十名日军乘橡皮艇逃回西岸。

在第三十六师反击怒江东岸日军的时候，空中飞来了支援他们作战的陈纳德的飞虎队。飞虎队的前沿机场在滇缅公路上的雷允，随着日军的长驱直入，他们决定在撤退前给日军一次打击。四月二十八日，飞虎队起飞十五架战机，袭击了日军由二十七架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击落日机二十二架，飞虎队无一伤亡。三十日，飞虎队忍痛把雷允机场上等待修理的二十二架P-40战斗机烧毁，转移到保山机场。五月四日，日机轰炸保山时，飞虎队起飞迎战，以阵亡一名飞行员的代价，击落日机两架。五日再次升空迎战，又击落日机九架。当得知日军抢渡怒江的消息后，飞虎队出动四架可装弹三百公斤的新型P-40战斗机和装有六挺机枪的四架老式P-40B战斗机前往惠通桥助战，猛烈地轰炸了怒江西岸滇缅公路上的日军。飞虎队队员们以惊人的胆力，驾驶战机在狭窄的怒江峡谷中穿梭俯冲，机枪子弹和航空炸弹严重杀伤了日军步兵，摧毁了日军大量的坦克、汽车以及准备架设浮桥的设备，不但为赶往惠通桥的中国军队争取了宝贵时间，而且给日军以极大的心理震慑。

历史应该记住中国军队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官兵以及美国志愿航空队队员们的英勇无畏。如果不是他们的勇敢作战，日军攻占惠通桥后，其机械化部队便可突过怒江天堑直取昆明。有确凿史料显示，日军逼近怒江时，蒋介石曾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怒江一旦不保，四川西昌再失，重庆将无任何退路，届时只能把抗战中国的临时首都迁往甘肃兰州。——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抗战历史将如何书写？

从此，中日两军隔着怒江重兵对峙。

在中国抗战进行到一九四二年的时候，西南大后方被日军从境外方向侵入了一角，这一角如同一块撕裂的伤口，整整煎熬了苦战中的中国两年之久。

日军向怒江推进的同时，西线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开始向钦敦江突击，东线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占领腊戍后开始向八莫进击。日军的目的有二：一是追歼向印度撤退的英缅军，二是把还在曼德勒一带的中国远征军主力的退路堵死。

腊戍陷落的消息传来后，向印度逃跑的英军大惊失色，在英军的后卫英印军第十七师和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通过阿瓦铁路桥后，英军立即炸毁了伊洛瓦底江上这座最大的桥梁。关键是，“英国人早在二月就做好了炸桥的准备”，那时日军刚刚从泰国越境攻入缅甸。——“一声巨响，这座桥在四月三十日二十三时五十分被炸掉，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也是一个信号，我们丢掉了缅甸。”

英军计划的逃跑路线是：沿着梦内瓦（今蒙育瓦）一耶乌一加里瓦一线，渡过钦敦江，前往印度的阿萨姆邦。但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先遣队却以每天五十公里的速度，沿着伊洛瓦底江西岸猛烈追击。四月三十日，日军占领梦内瓦，堵住了英军的退路。亚历山大命令英缅军第一师夺回梦内瓦，英印军第十七师寻找近路前往耶乌。五月二日，士气低落的英缅军第一师在日军的反击下丢盔卸甲，不但被击毁两辆坦克，还丢失了六门火炮、一百五十八辆汽车和三挺重机枪，被俘的英军官兵四百多人。四日，配备了十余辆坦克和七百多名官兵的英军在梦内瓦以北二十五公里处再次被击溃，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先遣部队和第五十五师团部队会合，兵分四路，向英军展开了全面追歼。沿着弯弯曲曲的钦敦江向西北方向逃跑的英军，被跟随着他们的数十万难民、狭窄山路上抛锚的汽车以及不断飞临头顶的日军战机弄得行进缓慢，慌乱不堪，异常疲惫。十日，日军追击部队突破英军的后卫，突入加里瓦山谷。英军遗弃了两千多辆汽车、一百一十辆战车、四十余门火炮和一千二百多具尸体，山林小路上溃不成军的逃亡队伍竟然长达一百四十五公里。

十六日，英军先头部队终于抵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达武镇。

在从缅甸一路逃亡印度的途中，共有一万三千余名英国、印度、缅甸和廓尔喀士兵丧命。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一定

要夺回属于大英帝国一部分的缅甸。但是，自打从那个悲惨的加里瓦山谷逃出来后，这个靠不断地骗取中国人掩护而侥幸逃生的英国人，此生再也没回过缅甸。

英国人跑了。

密支那方向原本是中国远征军从曼德勒沿着密支那大道向北撤往滇西的回国路线，但从腊戍分兵一路的日军攻占八莫后，正向密支那急进，中国远征军主力不但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而且前方的回撤道路已经被彻底封堵。

中国远征军主力开始了大逃亡。

腊戍陷落后，罗卓英电令杜聿明的第五军迅速向北撤退，蒋介石也来电催促尽快把重武器和伤兵运到畹町。杜聿明立即部署部队相互掩护撤退，然后率领军部和直属部队由曼德勒向北转移。此时，史迪威和罗卓英率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乘车移至英多，与远征军第五军和第六十六军主力完全分离。五月二日，撤退到伊洛瓦底江以西和以北地区的远征军第五军的两翼受到北进日军的威胁。三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快速部队在坦克的助战下，与新编第二十二师发生战斗，该师主力沿伊洛瓦底江东岸逐次抵抗以迟滞日军，第九十六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迅速后撤。但是，四日，日军快速部队突到了甘巴罗和车冈附近，远征军第五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六日，杜聿明在由车冈向北撤退途中，突然接到罗卓英于凌晨一时和早晨七时连续发来的两封急电，电报的中心意思是：日军五日占领八莫，已从畹町突入国境，第五军从密支那撤回国内不可能了，应改变计划全军向印度境内转移。杜聿明当即给罗卓英回电并同时向蒋介石报告，表达了不同意撤往印度的立场："我军战败入印，将为印人所不齿，拟仍向密支那转移，与由畹町犯密之敌决一死战，胜可保存缅北一隅，败则退守腾冲。"——此时，日军正从八莫向密支那急促推进，如果第五军行动迅速，赶在日军攻占密支那之前占领阵地，杜聿明军长的决定可谓上策。七日，罗卓英复电同意杜聿明的意见，认为如果能够冲过密支那回国，不但能够脱险，还能解龙陵和保山之危。蒋介石更是一日之内连发急电，命令第五军迅速从密支那方向撤退回国：

杜军长：转史参谋长、罗长官。我军应即向密支那、片马、沪水、云龙转进，再勿犹豫停顿。中正手启。

杜副长官：希即率我缅北各部，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误。中正手启。

蒋介石之所以急电杜聿明，是因为获悉史迪威和罗卓英让第五军撤往印度，他向杜聿明特别强调中国军队如果撤退必须退回中国境内。

史迪威的行踪突然有了消息，但不是他直接向蒋介石报告的，而是托人转交给蒋夫人一张便条，便条上说他已启程前往印度了。

蒋介石怒不可遏：

史迪威对我在缅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也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

后来的诸多史料，大多把美国人史迪威撤往印度的经历说成一个传奇。但无论如何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他远远地脱离了他的部队，与少量的非战斗人员单独跑了。作为身负重托的十万大军的战场指挥官，无论用什么样的理由辩解，他也无法证明他履行了本该承担的责任，并遵循了一个职业军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从史迪威逃跑的形式与路线上看，这位美国将军对如何逃离战场具有精明的谋划。他不带任何战斗人员，不走任何与军队或难民相同的道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我们冲到人潮的前端了。杜聿明的人员和他们两吨半的卡车还落在后面，谢天谢地”。“我们脱离了难民们走的大路，我们赶在中国人群的前面。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脱险”。——脱离大部队和难民是避免拖累的好办法：可以缩小目标，避开日军的追击，还可以节省粮食。

史迪威的逃亡队伍包括二十六名美国人、十三名英国人和十六名中国人，还有几个军医院里的缅甸护士、几个印度厨师和机械师。五月十三日，他们赶在日军之前渡过了钦敦江，然后向印度的英帕尔徒步前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史迪威自己的描述，他的逃亡仅类似于一次较为艰苦的远足：他们从来没有缺过粮食，也没遇到一名日本兵，沿途在村庄留宿时有水洗澡，还可以喝茶，甚至有闲心欣赏风景。一路上无论是乘车、步行，还是乘坐竹筏子，行李都由挑夫和骡马负责。他们不断地受到当地土豪的设宴款待，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

五点四十五分动身。约十点之前，一路轻松而令人愉快。然后是一座该死的山峰。四个半小时不断地向上爬，不是昨天爬的那种小山丘。

十二点四十五分越过山顶。到达查穆。受到身裹鲜艳红毯子、手中拿着米酒的头人的欢迎。饮了茶，吃了饼干。最后一个村子的头人送给我一头羊，我赠给他雪茄作为报答。

只是，现实并不全像史迪威描述的这般愉快，毕竟年近六旬，他身体消瘦，双手不停地颤抖，因为染上了黄疸病，皮肤呈黄色，眼窝深陷。他盯着每一个人的行囊不许超重，检查每一个人的食量不许多吃，为了赶在雨季之前走出缅甸的山岳丛林，还要以自己的手表为准掐算每个人每分钟必须走出多少步。他不停地咒骂、咆哮、斥责，当他向手下人走过来时，“看上去好像上帝在发怒，像个恶魔似的嘴里骂个不停”。唯一值得称赞的是，史迪威把跟随他的一百一十四个人全部带出了缅甸，无一死亡。五月二十日，史迪威一行安全抵达印度的英帕尔。

二十四日，史迪威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的一番话后来成为有关缅甸战役的一段名言：“我要说我们挨了一顿狠揍。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

美国人史迪威不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他后来实现了他的承诺。

虽然脱离了险境的史迪威声称要打回缅甸去，但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他甚至不知道被他远远丢在缅甸境内的远征军官兵现在在哪里以及正在经历什么。

五月六日，基于中国远征军主力仍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的判断，日军第十五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军决定以主力捕捉曼德勒以北密支那到塔曼提一带之敌。

二、五十五师团及第三十三师团进行的扫灭作战，捕歼当地之敌。

三、第五十五师团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同时应扫灭蒙米特（曼德勒东北约一百五十公里）方面沿伊洛瓦底江地区到八莫一带之敌。

四、第三十三师团解除执行原任务，主要应捕歼曼德勒——密支那铁路沿线地区之敌。

日军决心把第三十三、第五十六和第五十五师团可以投入的兵力全

部向密支那方向集中，企图将中国远征军主力一网打尽。

日军快速突进，八日攻占密支那。

密支那是缅甸铁路最北端的终点站，也是滇缅边境处的交通要道。从密支那向东人中国国境，可以经过腾冲抵达保山。日军占领密支那后，第五军的撤退之路已被封堵，但杜聿明依旧率领部队按计划向密支那方向撤退，远征军官兵在日军的轰炸和追堵中艰难前进。但是，第五军的处境很快就恶化了，掩护侧翼的新编第十八师一一三团没有能够抵挡住日军的攻击，曼德勒以北、密支那以南的要地杰沙失守。日军在这里截断了从曼德勒北上密支那的铁路和公路交通。

九日，杜聿明以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召集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和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开会，研究突围办法。杜聿明希望三个师一起向北翻越野人山进入云南，而孙立人主张按照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就近向西退入印度。两人各执己见，最终不欢而散——新编第三十八师在中国陆军的序列中不属于杜聿明的第五军而隶属于张轸的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在曼德勒至密支那中间一个名叫英多的地方与第五军部队分道扬镳。

远征军主力第五军分成三个部分开始了各自的突围。

杜聿明率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官兵、第五军直属部队一部以及新编第二十二师由曼西向北后，转向缅甸最北面的大洛方向，自此脱离任何道路，徒步进入野人山中的原始森林。缅甸的雨季已经到来，部队在密林蔽空的山岭中艰难穿行，仅靠指北针辨别方向，行动极为缓慢。为了加快速度，官兵们忍痛丢弃了大炮和车辆。一路上荒无人烟，给养极度困难，加上雨林中蚊虫叮咬毒蛇出没，官兵因饥病交加倒毙者甚多。为了营救中国陆军之精锐部队第五军，蒋介石下令滇西守军必须出动到滇缅边境寻找接应，又命令空军出动通过空中侦察寻找第五军的踪迹。所幸电报仍可往来，蒋介石告诉困境中的杜聿明，“弟部行动不必太急，应从容设计分路绕道进行，务以避开密支那为稳妥”。“现正设法以空中运输接济粮弹”，“一俟陆空联络确实即可开始实施”。这时候，先头侦察部队报告说，密支那的西北地区也发现了日军。杜聿明决定再次改道，正面避开密支那方向，沿着缅甸西北面的乌尤河前行，这里已经很靠近印度了。三十一日，杜聿明的第五军终于抵达清加林卡姆特，在这里接到蒋介石的来电，命令他们可以向印度境内退却——始终不愿意进入印度的杜聿明，于绝境中不得不改变初衷。六月十四日，经过半个月的徒步

行军，杜聿明一行抵达大洛以南的河边。此时，大雨倾盆，道路被淹，粮药两缺，第五军官兵已无法行走。

杜聿明致电蒋介石：

特急。渝。委员长蒋。阅密。职辰三十由康地出发，原定五日到达大洛，中途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到处被阻，沿途皆无人烟，官兵绝粮八日，草根罗掘皆空，饥病交加，死亡甚重，经十五日始到达，购十日粮秣及将疾病落伍官兵收容后，即向指定地点前进，谨闻。职杜聿明叩。

自此，第五军进入了更加险恶的原始森林：

……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成了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大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

七月七日，美军飞机找到了他们，空投下大米和药品，第五军官兵才得以拼尽最后的力气前行，终在二十五日抵达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雷多附近。

杜聿明带领的这部分官兵，在纵深达数百公里的野人山中历尽艰辛，损失惨重。仅新编第二十二师，入缅时全师九千多人，战斗中伤亡二千多人，但在撤退中竟然伤亡四千多人，比战斗减员多了一倍以上，抵达印度时全师仅剩下三千余人。第九十六师五月十八日抵达孟关后，从那里进入野人山。他们同样遭遇了粮药两缺和疫病流行的困苦，沿途失踪八百多人。六月二十四日，该师抵达葡萄，但后卫部队遭到日军伏击，副师长胡义宾在战斗中阵亡。在葡萄等待数天后，蒋介石命令他们向维西转进回国，于是该师翻越了高黎贡山，经过维西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剑川。第九十六师入缅时全师九千余人，在彬文那阻击日军两个师团的战斗中伤亡二千二百人，撤退中伤亡三千八百人，最后全师仅剩下三千余人。

与杜聿明在英多分道扬镳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因作战导致部队未能完整集结，其一一三团作为前卫抵达杰沙，而后卫一一二团仍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温佐，并与追击的日军交了火。师长孙立人当机立断，指挥一一四团的两个营回马杀向温佐，日军措手不及，被歼四百多人，但新编第三十八师也伤亡二百余人。日军大量增援后，新编第三十八师孤悬敌后，通往八莫的公路也被切断，只有入印一条路可走。孙立人毅然决定折向西北山地，摆脱日军的追击，向印度方向前进。在密林中，为防止官兵迷路走散，孙立人命令用绑腿和背包带前后牵拉，让士兵爬上大树根据太阳测定方向。抵达钦敦江边时，孙立人指挥部队扎制木筏分多路渡江，直到后卫部队脱险他才最后渡江。日军依旧紧追不舍，后卫部队与日军发生战斗，不但打垮了日军的追击，歼敌二百多人，还救出了被日军俘虏的三十多名英军。彻底摆脱日军的追击后，除了一一三团失去联络外，其余官兵于五月二十七日抵达印度东北边境的普拉，此地距离英帕尔仅二十九公里。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一一三团本是全师的前卫，在杰沙附近阻击了从八莫西进的日军后撤退到山地，又与日军周旋了二十多天，利用险恶地形摆脱日军后渡过钦敦江，六月八日在英帕尔归建。

但是，奉孙立人之命前往第五军军部联系汽车事宜的副师长齐学启却没能回来。得知部队要转移后，他立即带领在第五军野战医院治疗的本师伤病员追赶部队。但是，他们已与部队相隔数百里，道路也被日军全部封锁。五月十九日，齐副师长一行在钦敦江东岸附近遭到日军骑兵的袭击。齐学启身负重伤被俘，被押解到仰光关押。在日军的百般折磨利诱面前他宁死不屈，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汪伪汉奸再次以伪军长职务劝降，被齐学启严词拒绝，终被刺杀于狱中。一个月后，盟军收复仰光，将其遗体隆重运回中国，厚葬于长沙岳麓山。

新编第三十八师孤军摆脱了日军的围捕，抵达印度英帕尔时全师尚有七千多人，是远征军中唯一经过艰苦跋涉尚保持完整建制的部队。

在远征军第五军的序列中，第二〇〇师是入缅作战最突前的一个师，这导致了撤退时他们距离中缅边境最远。腊戍陷落之时，他们还在雷列姆附近阻击日军北上，远征军战线全线崩溃后，罗卓英命令该师归第六军军长甘丽初指挥。已经深陷于敌后的第二〇〇师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东渡过萨尔温江，向中缅老泰四国交界处的景东方向撤退，这样只需跨过一条江和一条公路，而且沿途相对安全；另外一条是北上去与第五军主力会合，跟随杜聿明军长一起回国，这条路不但路途遥远，还要横跨两条大河、三条公路以及日军的层层封锁。师长戴安澜选择了第二条路，原因很简单：他要把他的官兵全部带回祖国去。

第二〇〇师避开交通干道，在密林中走小路，寻找日军的缝隙向北穿行，不但沿途会合了第五军游击司令黄翔率领的军补充第一、第二团，还收容了第六军的两个营以及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八师一部。

但是，当第二〇〇师在朗科地区通过西保至摩谷的公路时，突然遭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两个大队的伏击。猝不及防中，第二〇〇师官兵拼死抵抗，除士兵大量伤亡外，师参谋主任董干，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六〇〇团团长刘吉汉相继阵亡。更为严重的是，戴安澜师长倒在了路边的草丛中，他的胸部和腹部都中了机枪子弹，血流如注。仓促包扎后，戴师长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朝着军主力所在方向日夜兼程。

当时，日军突入中国国境，畹町、芒市、龙陵和腾冲等地相继失陷，但第二〇〇师官兵依旧顽强地朝着中缅边境走去。他们用担架抬着戴安澜师长，在瓢泼大雨中踩着密林中的泥泞艰难跋涉。没有粮食，没有药品，戴安澜伤口溃烂，浑身泥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而只要他偶尔从昏迷中醒来，总是问离国境还有多远。

五月二十三日，第二〇〇师官兵终于突过日军在南坎与八莫之间的空隙，开始朝着云南腾冲方向前行。二十六日，官兵们抵达了中缅边境的茅邦村。戴安澜师长最后一次醒来，要求给他换上干净一点的军装，嘴里喃喃地说着：祖国万岁！——在抗日战场上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戴安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未满三十八岁。

“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这是戴安澜师长在同古战场上写下的遗言。

中国陆军第二〇〇师和他的师长戴安澜终于回国了。

在边境线上，一位老华侨闻知戴师长殉国，把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楠木棺材献了出来。

戴安澜灵柩运回昆明时，沿途百姓设灵祭奠。昆明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在戴安澜的妻子和子女以及第二〇〇师官兵代表的护送下，灵柩经贵州的安顺和贵阳、广西的柳州和桂林等地，运抵第二〇〇师的发祥地广西全州。日军入侵广西后，灵柩被转运至贵阳花溪。直至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八年，戴安澜师长才终于得以回到故乡，被安葬在与其故乡无为县一江之隔的安徽芜湖小赭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挽诗：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损命，壮志也无违。

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追晋戴安澜为陆军中将。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戴安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中国远征军主力第五军，入缅时三个师加军直属部队共四万二千余人，战斗中伤亡七千三百余人，撤退中伤亡一万四千七百余人，撤离缅甸进入印度时全军仅剩两万余人。

中国远征军将士面对侵略者的不屈不桡当永载史册。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的入缅作战配合了盟军的太平洋作战，支援了国内抗日战场，其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赢得了国际声誉。

但是，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结局却是失败的。

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新德里经昆明飞抵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与史迪威进行了长谈。史迪威赞扬了中国士兵和少数下级军官，然后激烈地指责了大多数中国将领："此次在缅观察，余深觉中国士兵之良好，伤兵绝无怨言，然缺乏优秀将领。一般连长甚佳。营团长优劣不一。惟高级将领殊令人失望。师长及较高之将领或缺能力或少胆略。其中最恶劣者为五十五师陈（勉吾）师长，彼曾驻马克溪之东。闻日军一营前来进攻，陈未得上级训令，即令部队后退四十五英里，仅留一连掩护。遂致失去可守之地，而退至难守之处。另有甘（丽初）将军者，虽驻洛开，甚至不知该地有伤兵医院。高级军官对此种重要之事竟亦不加问讯。"当蒋介石询问史迪威缅甸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时，他的回答却相当简陋：

失利原因在于缺乏空军，我人盲目作战者先后凡两个月，而敌人则有适量之空军，且处主动地位。至于士气、训练、配备、人数、交通、供应、组织均优于我方。即以人数而论，棠吉（东枝）战役之后，第二〇〇师仅余五千六百人。第五军军额应有四万七千人，而实仅二万人。此外我方陆地侦察效率欠佳。每到一地竟不知该处有无道路可通。我军将领往往谓，照地图看来并无道路。当余要求派人探索，则所派者恒为少数人员，难得圆满结果。

史迪威入缅指挥作战前，蒋介石曾对他说“中国入缅军只能胜，不能败”。史迪威表示他现在仍还“记得此言”。蒋介石阴沉沉地回复史迪威道：“此次吾人已学得好教训，值得所付之代价。”

蒋介石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军在缅北如此重大牺牲，其责任在于彼之指挥无方，而彼毫不自承其过，反诋毁我国高级将领之不力。甚至造谣罗卓英之潜逃。其实彼于失败之处，手足无措，只管向印度逃命，而置军队于不顾。以致第五军至今尚流离播迁而无法收容，彼则毫不知耻也。”

蒋介石由此不再对盟国特别是英国抱有任何幻想。

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也由此逐渐恶化，以至后来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尽管蒋介石的愤怒不无道理，但入缅作战的失败绝不仅仅应由史迪威一人负责。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指挥系统，自始至终都处在关系不明、矛盾剧烈的混乱状态中。在作战指导上，三次所谓的会战计划，每一次都存在主观臆断的成分，特别是当两翼受到威胁、全线面临崩溃之际，依旧毫无道理地坚持发动所谓曼德勒会战，最终导致危机来临无法应付，陷入慌乱的溃败。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将领的指责有部分合理成分，尽管入缅远征军多是装备精良的中央嫡系部队，但将领们的整体素质仍旧不尽如人意。战后，宋希濂曾开过战役检讨会，他管不了别的部队，只能拿自己的第十一集团军说事。宋希濂对第三十六师在惠通桥的阻击大加赞赏，对第六十六军在滇缅公路上的溃败严加斥责。由此，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指责军长张轸，手里掌握着新编第二十九师，但不抵抗日军先行逃命，导致他的部队从曼德勒一撤下来便两面受敌。张轸则指责刘伯龙不听指挥，并说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是擅自撤退。宋希濂

在会后的决定是：报请蒋介石撤销第六十六军和新编第二十九师的番号，惩办张轸、刘伯龙和马维骥。——“但是，这些人都在缅甸发了大财，回到重庆乃大肆送礼，与各方面拉关系。不久，蒋介石任命张轸为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刘伯龙被派去训练新兵，马维骥因得到黄埔同学向蒋介石求情，也被释放了出来。”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缅甸战场的特殊性。缅甸是英国殖民地，美国和英国在如何对待这块远东殖民地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存在着矛盾。基于美国和英国都把战略重点放在了欧洲，因此缅甸作战时美国并没有出动地面部队，只是希望中国远征军能在缅甸把日本人顶住，这样才有利于美国人在太平洋的作战。但是，英国人的最大愿望是维持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因此不但压制缅甸的独立运动，也把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增援当成对其殖民地的威胁。而美国人早已看出英国的殖民地已经支持不住，缅甸人的独立运动迟早要发生，因此不但宣布美国不准备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战，而且对缅甸和印度等国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表示了同情，这就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度不满，认为是对英国事务的粗暴干涉。于是，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从一开始就蒙上了英美矛盾的阴影而处在左右两难中。——可以认定的是：自英国人决定抛弃缅甸固守印度并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掩护其撤退时起，缅甸战场的命运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剩下的仅仅是中国远征军将士要流多少血的问题。

蒋介石对入缅作战失败原因的主要概述是：“缅甸战事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此明知其为不可，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也。”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挽救中国要靠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他国身上，不但人格和尊严无法得到保证，而且所有的挽救努力都将是一场梦幻，哪怕无数的中国人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代价。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还证明，中国人要真切地明白这一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中国苦难的过去，一直延续到今日，尚不能说国人已经完全警醒。

第三十章

剥开表皮露出红瓤

当远征军在缅甸热带丛林中跋涉的时候，在中国北方河北省的东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带领一个视察团从唐山出发向北抵达了迁安。原田熊吉外出视察原因有二：一是他刚由第三十五师团调任第二十七师团，需要尽快熟悉部队；二是第二十七师团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执行对东起滦河、西至潮白河、南迄北宁铁路、北达长城的八路军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任务，目前已经把冀东抗日根据地四面包围，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他有必要上前线安抚一下他的士兵。

视察团成员除了他的随从参谋福间之外，还有步兵团长铃木少将和他的随员炭江副官，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少将，第一联队联队长田浦大佐和他的随员田岛大尉，随军顾问鹰羽大佐等。护卫部队由一个步兵中队、一个重机枪分队和一个火炮分队以及伪军一个营组成。

自迁安向南，沿着野鸡坨到沙河驿的土路已被破坏得无法行车。视察团的汽车开进路边栽满低矮桑苗的田地里试图继续前行时，突然，前方一百米处升起两颗信号弹，步兵团团长铃木少将立即跳下车，准备上前查看情况。就在这时，数百名八路军官兵已经冲到眼前，护卫部队的前卫和后卫都发生了激战。铃木的副官炭江带着几名士兵跑向桑苗林一侧的小土包，手榴弹随之下雨一样地飞来，他们被夹在了对射的弹雨中。往回爬的时候，一颗手榴弹砸在炭江的肩上，但手榴弹没有爆炸。伪军们开始逃跑，田岛大尉前去制止，可没有任何效果。八路军官兵一度冲到原田熊吉的跟前，福间参谋拔出战刀拼死护卫他的长官。桑苗地四周回响着喊杀声、白刃战的咒骂声以及受伤人员的呻吟声。为了尽力阻止护卫队的士兵后退，军官们四处奔跑大喊大叫，因此成为八路军攻击的主要目标。随军顾问鹰羽大佐、护卫中队的冢田湲中尉、山本庄五郎曹长、今井升兵长、田中广吉伍长和机枪中队的铃木正一伍长等都被打死了。战斗持续到下午，发动攻击的八路军突然撤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视察团的汽车终于开出了地狱般的桑苗地，抵达沙河驿时已经夕阳西下。——“暗红色的云层笼罩着西方天际的山岭。视察团受到第三联队长小野大佐的迎接，并在该地宿营。当晚将战死者尸体火化。次日清晨，视察团携带骨灰返回唐山。”原田熊吉的参谋们判断，攻击他们的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李运昌的部队。

一九四二年，处于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众武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自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军开始在敌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后，经过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和“梳篦清剿”，抗日根据地遭受巨大打击，八路军官兵伤亡严重，抗日民众被大量屠杀，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财政供给空前困难。到一九四二年初，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面积比前一年缩小了六分之一以上。在华北，八路军控制的人口仅占四分之，约二千二百多万人；而日军占领区内的人口多达六千余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八路军虽然占据着乡村一半以上的区域，但在华北的四百三十七座县城中，八路军占据的不足十座。且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贫穷地区，相对而言日军占领区内物产富足、人口稠密。一九四二年初，华北日军总兵力约为三十二万五千人，伪军约十一万七千人，八路军总兵力约为二十六万五千人，双方兵力对比悬殊，且八路军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战斗力的外在对比依旧敌强我弱。

从中国抗战的全局上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能够把数十万日军拖在其占领区并不断地消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敌后抗日武装的存在和作战，不但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极大地牵制着日军的兵力，更主要的是，八路军官兵的决死作战不但向日本而且向全世界证明：日本侵略者可以用武力占据中国的部分国土，但是他们从来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占领，他们占据的每一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都犹如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愤怒的复仇火焰随时可能猛烈地喷发，日本侵略者彻底征服中国的企图只是一厢情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防止部分兵力调走导致中国军队发动反击，特别是为防止八路军趁机扩大作战区域并壮大抗日力量，决定先发制人。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内容，其要点是出动相当规模的兵力，首先把八路军的平原根据地冀东和冀中彻底铲平，然后向八路军的核心根据地太行山北部发动全面进攻。——“在本年度内，务期将河北省大部、山东和山西各省以及蒙疆的主要地域都变成治安区。”

根据这一计划，从四月开始，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从河北东部、第十二军和第一一〇师团一部从河北南部、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主力从河北西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以上的“扫荡”是更大规模作战前的一系列牵制作战，日军的最终目标是五月开始的对冀东和冀中作战以及对晋冀豫边区作战。

日军想重复中条山作战的前例。在中条山作战中，日军基本肃清了

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军主力。但是，连日军也明白，接下来的作战会异常艰难，因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是中国抗日军队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太行山绝不是中条山。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连续发出反“扫荡”指示，对八路军官兵提出了克服“三种情绪”的要求：不要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产生麻痹轻敌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不要因为日军的残酷烧杀和亲人的不幸遇难而产生拼命蛮干的情绪；不要因为敌情的严重和根据地遭受损失而产生悲观失望和惊慌失措的情绪。面对残酷的斗争，领导机关须尽量精干，干部要适当分散到基层和前线去指导对敌斗争。反对部队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等“扫荡”之后再作善后处理的消极现象以及依据狭隘的经验钻固定的沟渠和窑洞的现象。要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组织民兵力量，加强军民团结。总之，发扬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保证党的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战斗力——“必须使一切党及政府群众团体的机构在战争环境中仍能工作，仍能更紧张的进行工作”。

“更紧张的进行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敌后顽强战斗下去，直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河北东部的那片桑苗地里遭遇八路军的伏击后，受到惊吓的原田熊吉立即命令在这一带进行紧急“讨伐”。但是，日军寻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八路军的任何踪迹——“估计是跑到长城北面去了”。于是，命令部队返回驻地。就在返回的途中，第一、第七中队的七十多名日军和队伪军走到干河草庄附近时，路边的高粱地里突然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开始时，治安军（伪军）护卫队曾积极射击，但很快就纷纷向白云山逃去。第一小队长中泽见习士官在小队展开时脸部中弹，无法指挥。小川第七中队指望数百名治安军迎战，当即冲进干河草庄村，占据了有利地形，但因治安军逃跑，以致部队完全陷入约两千名敌人的包围中。激战数小时，终于耗尽了全部子弹。在这次战斗中，第七中队的小川平少尉、永井正雄准尉、田利胜伍长等四十六人，第二机枪中队的秋山武之助见习士官、根岸文治军曹等十二人战死。护卫卡车的一个分队摆脱敌人的攻击，随卡车一起回到了沙河驿。第二机枪中队的昭和上等兵等二人，不顾受伤，把枪埋在土中，于次日清晨挣扎走到榛子镇第七中队本部，报告了小川第七中队覆灭的消息。传令兵新井周治一等兵经过殊死的努力，背负中泽小队长直到深夜才挣扎走到沙河驿。”

尽管根据地受到日军的多次“扫荡”，八路军冀东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依旧努力作战。为了严防八路军的突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开始修筑

大量的碉堡和岗楼，强迫自然村中的中国百姓迁移，建立起“无人区”和“隔离区”，企图把八路军与抗日民众分割开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统计是：“构筑了隔断壕二百四十五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七十四公里，共计三百一十九公里；棚舍一百三十二个、碉堡三个、城寨十八个、关卡二个，共计一百五十五个。此项工事共用五十二天，作业人员达到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人次。并新架电话线二百五十八公里，维修一百五十三公里，共计四百一十一公里；新建汽车公路八十三公里，修补三百九十二公里，共计四百七十五公里。长城无人区包括七十六个村、一千二百三十五户、六千四百五十四人；暂时无人村二十八个、二千三百四十二户、一万二千零三十六人。”

但是，八路军仍然没有被消灭的迹象。

日军中国驻屯军第三联队第二大队获悉，迁安以东的东牛山附近出现了八路军部队。第二大队主力立即出发，同时命令浅叶中尉指挥一个步兵小队、三枝少尉指挥一个机枪分队先行出发。第二大队主力走了一夜，拂晓时分听见前方传来激烈的枪声，大队主力立即跑步前进。但是，转眼间，“最初响起的激烈枪声”又听不到了。第二大队担心走在前面的浅叶小队遭遇不幸，开始了不顾一切的紧急奔袭，“并努力与浅叶小队取得联系”，但是“为时已晚”。——“在高地北侧斜坡下流过的小河河滩一带，发现小队长以下全体官兵已战死，突击的痕迹历历在目。大队长等第二大队官兵悲愤交加，泣不成声。第八中队的浅叶少尉等三十六人、第二机枪中队的三枝少尉等十二人战死。”

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对共产党武装十分无奈，他认为日军对占领区的所有作为只能造成一种表皮似的假象，而八路军才是潜藏在这种表皮下的真正的“红瓤”：

铁厂镇周围地形复杂，故搜索敌人颇为困难。而且共军斗志旺盛，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后卫部队，以至战斗到全体战死为止，或者巧妙地利用洞窟（在鲁家峪附近经过改造的燧石采掘场旧址，可隐藏很多人）进行抵抗。由于我军进行讨伐，到五月底治安状况曾一度平稳下来；但至六月底前后，又出现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及埋设地雷等情况。中共方面的地下组织扎根于行政机关、学校和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谓“剥开表皮露出红瓤”的情况。

日军不顾一切地要把“红瓤”挖出来，将“表皮”下的一切危险因素彻底消除。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汉、津浦、北宁、德石四条铁路的中间，拥有安国、任丘、河间、雄县等三十多个县。这里是华北大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以盛产粮食著称，有北方粮仓之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策动下，一九三八年五月，由人民自卫军和冀中河北游击军合编，组建了第十八集团军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王平，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对应的是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以及独立第一支队。第三纵队带领冀中抗日军民以极强的战斗力直接威胁着日军占领的北平和天津等大城市的安全。到了一九四二年初，随着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共下辖五个军分区、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教导团。日军曾多次使用残酷手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令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根据地内只剩下三千多个村庄，约二百八十万人口。除了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和束鹿等中心地区外，日军在其余各县的主要村镇都修筑了据点，还在主要交通线上修筑起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隔断壕，隔断壕沿线的碉堡工事达到一千多座。为了割断冀中根据地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日军在平汉路以西的太行山下还修筑起一道高两米、厚一米的石头墙，配合碉堡，形成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冈村宁次上任华北后，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的威胁和诱骗下，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投敌变节，致使傀儡政权组建起伪军和自卫团等汉奸武装为虎作伥，冀中抗日军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

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和副参谋长有末精三，首先破译了八路军的电报密码，然后经过周密的实地侦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制订出一个庞大详尽的作战计划——为对付八路军的一个局部军区，日军准备出动三个师团以及大量的特种部队，其规模不小于正面战场上发动的一场全面攻势:

一、方针

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产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二、参加作战部队与配合作战部队

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

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的主力（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的步兵约两个大队，第一一〇师团白泷部队（第一一〇步兵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步兵第四大队为基干），配属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骑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二十九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

配合作战部队：

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饭沼守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河北省特务机关（设在保定，机关长铃木繁二少将），石门特务机关（机关长石田丰藏大佐）。

……

三、作战指导要点

作战第一期（自五月一日开始约十天）

白泷部队在滹沱河北岸地区，小川部队在河间、肃宁地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石德路南侧地区进行扫荡战，要估计到大规模作战会有困难，同时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区逃出。在此期间，第四十一师团利用铁路运输从山西向邯郸、顺德地区进行佯动，然后在石德路沿线地区展开。

作战第二期（自五月十一日开始约五天）

第四十一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石德路沿线向北挺进，白泷部队从滹沱河北岸地区向南进发，小州部队则从河间、肃宁向饶阳推进，分别发起突然袭击，将敌人包围在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作战第三期（自五月十六日前后开始约二十五天）前一阶段（约十天）划出作战地区，分赴进行扫荡，以消灭敌人及其根据地设施。

后一阶段（约十五天）继续剿灭敌人残余势力，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第四十一师团则转入新作战地区的警备态势，进而正式开展治安肃正工作。

在制订一九四一年度作战计划时，日军曾就作战目标应是共产党八路军还是重庆军的国民党军发生过争论；而在制订一九四二年度作战计划时，“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就战争全局来讲，中国的正面战场处于沉闷的对峙状态，无论从战场现状还是情报显示上看，国民党军没有主动发动攻势的企图，也没有打破对峙局面的意愿，只要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压力，正面战场上便会无仗可打。而真正对日军形成威胁的，是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展开军事攻势的角度看，，保持中国境内占领区的稳定，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日军发动大规模作战的目标只能是八路军。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多个抗日根据地，攻击其中的哪一个为最为迫切呢？——日军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横山幸雄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多成效。”——日军选定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军即将发动的攻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总结了之前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指出：“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冀中军区决定，在日军大兵力合围而来时，大量精减党政军机关人员，将这些人员分散到群众中去，和抗日民众以及留下来的部分官兵一起与日军纠缠，牵制并吸引日军的主力，而冀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则突围转移到外线、山区和敌人的后方。同时调擅长坚守阵地的第七军分区十七团归吕正操直接指挥，负责掩护军区、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人员转移。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避免过大损失的转移作战计划。

尽管如此，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损失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想。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冈村宁次召开华北方面军高级将领会议，下达了“五一大扫荡”作战命令。此前，为了达到一举剿灭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冈村宁次分别在平汉路、津浦路和德石路方向，对杨成武的八路军第一军分区和宋任穷的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动了佯攻突袭，以隐蔽对冀中军区的作战意图，并分散八路军的作战力量。

五月一日，日军的“扫荡”作战开始。

日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采取反复“扫荡”、建立据点、逐步推进的方式，企图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施合围。其中的五万多日军是封锁部

队，力求形成所谓的“铁环阵”；剩下的日军是“扫荡”部队，在战机和坦克等优势武器的支援下，在河北大平原上进行逐村“清剿”，哪里响起枪声就向哪里快速合围。一日，日军在冀中根据地外围的各个方向发起攻势，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作战之际，冀中根据地的核心部位深县、饶阳和束鹿等地却异常平静。这种平静是冈村宁次有意所为，目的是通过周边的多处战事，将冀中八路军主力引诱到他预定的围歼地域里。果然，发起攻势的各路日军稍作战斗后，便迅速奔赴指定的“扫荡”地域：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联队和第一一〇师团白泷旅团分别推进到沙河、潴龙河以南以及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带；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小川部队抵达肃宁以及滹沱河北岸的饶阳、献县地区，并在滏阳河上筑起水坝以抬高水位封锁滏阳河北段；驻守衡水的山崎部队的骑兵第十三联队沿着滏阳河北进，企图控制滏阳河中段。至此，四路日军形成了合围态势，企图把冀中军区连机关带部队压缩在滹沱河以南、滏阳河和德石路以北的三角地带加以歼灭。

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冀中军区在驻地饶阳县张保村召开纪念大会，会场设在一片枣树林里。吕正操司令员在大会上发表了节日讲话。晚上是庆祝晚会，军区文工团演出的剧目是曹禺的《日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汽灯通明，来自贫苦乡村的八路军战士饶有兴味地观看着剧目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尽管他们并不十分理解剧中发生在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繁华都市里的爱恨情仇。话剧半夜才散场，汽灯一灭，吕正操的转移命令同时下达：各部队立即分头突围。吕正操和冀中军区党政机关两千多人，在第七军分区十七团的掩护下，于二日下午离开饶阳县张保村，向西行军三十里后突然南下，快速穿越沧石公路封锁线，又以急行军走出一百三十里，四日抵达深县、武强和武邑交界处的朱家庄。六日，队伍继续转移，一直走到了日军包围圈的东南边缘。

日军扑空了。

五月四日，冈村宁次抵达石家庄亲自指挥作战。至于八路军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到底上哪去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判断是：他们跑到子牙河、任丘与河间一带了。因此建议把清水规矩的第四十一师团用火车运至天津，由北向南张开大网捕捉冀中的八路军。但是，老谋深算的冈村宁次认定，安平、深县和饶阳是冀中根据地的核心地带，也是晋察冀边区的补给基地，八路军在此努力经营多年，地下战斗工事修建完整，且当地的百姓都愿和八路军生死与共，所以八路军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地区，即使走也不会走出去多远。于是决定坚持原定作战方案，只作出局部修订：第二十七师团增援小川部队，扼守滹沱河和

滏阳河的各个渡口；骑兵第十三联队集结在束鹿，控制滏阳河一线；第四十一师团从石家庄开赴邯郸并展开。为了指挥的统一，冈村宁次命令所有参战部队暂归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指挥。同时，为了把包围圈收得更紧，冈村宁次还要求第一一〇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对平汉、津浦和北宁铁路线实行严密封锁。

身负重任的清水规矩精心拟订了在华北大平原上对付八路军的战术:

一、撒网战法：师团在山地剿共战和对重庆军战斗方面，过去已有丰富经验。但是，在大平原上对共军作战，尚无此等经验。因此，研究了以“撒网”方式作为接触敌人的基本队形，并进行了训练。

这种方式的队形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五百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二、部队的机动力：每个大队均编有二十名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必要时也可将这些小队分属于中队，用以指挥联络、搜索敌情及切断敌军的后路（方面军从天津征用自行车，然后分配给各兵团，马匹主要是利用各部队缴获的马）。

三、特务工作队：此种工作队是从山西时期为了进行民众工作，特别在联队中设置的。在冀中地区，则在当地各兵团中配备了与宪兵队和中国方面紧密联系的政治工作班。

尽管冈村宁次的判断基本正确，但各路日军出动后还是没有捕捉到冀中军区的首脑机关。在吕正操的带领下，冀中党政军机关与日军在根据地里推磨一样地周旋，不断地在日军合围的缝隙处来回穿梭。六月一日夜，冀中党政军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然后向西南急行军七十里，绕到枣强县西南靠近冀县边界的侯琢村。第二天夜晚，向西移动，进入冀县东南的辛庄。三日夜晚，又返回向东南移动，潜入枣强县的柳庄。四日夜晚，队伍从柳庄出发，向南移动，进入枣强县东南边界处的张秀屯村。六日傍晚，张秀屯村的东面突然响起枪声，侦察后才得知是伪军出动抢粮呢。深夜，吕正操率领队伍离开张秀屯村，向北走出五十里，进入冀县东北边界处的赵祥屯。由于赵祥屯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七日夜，队伍顺着冀县北部边界一路向西北方向而去，跨过平

大公路，进入冀县西北边的窑洼村。八日晚，队伍再次出发，西渡滏阳河，到了冀县与束鹿交界处的东西堤北村。九日夜晚，突然“转弯南下四十里”，转移到冀县与新河县交界处的南顾城村。十日下午，负责掩护的十七团发现了日军的踪影，吕正操率队紧急南渡滏阳河，再次越过平大公路，进入冀县南部的吴吕村。——吕正操后来回忆说：“至此，我们整整围绕着冀县东、北、西、南四面转了二三百里的大圈子。”

就在吕正操带领冀中军区机关与敌人周旋时，同村宁次的第三期作战开始了。这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拉网般的残酷“清剿”，日伪军所到之处，搜捕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残忍地杀害抗日民众，对根据地里的每一个村庄都进行了彻底破坏。

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史：

……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精密扫荡”，除了努力搜捕和歼灭便装分散潜伏的或游动的敌武装力量外，并摧毁敌军军事设施，搜查隐藏的武器，严格甄别匪民，检举、逮捕敌军指挥官和党的干部，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沙河、木道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都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中共方面似乎预料到日军要进行此次作战。在作战开始之前，我方即已破译过吕正操司令部命令警戒的电报。另外，于四月二十六日午夜，共军约二千余人趁我军准备冀西作战警备兵力减少之机，向高阳东南渡河点蠡县、博野、安国各县城进行了袭击。此外，在此次作战开始之后，驻冀西的聂荣臻即命令所属各部队进行反击，第一分区（杨成武）在易县西南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军事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第一一〇师团除加强了对冀中和冀西的封锁外，同时在情报和补给方面协助进行作战。

坚持在根据地内的八路军部队和当地抗日民众一起，与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华北大平原的抗日村落，利用地道战、地雷战和伏击战，给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伪军以杀伤。为掩护党政军机关突围和群众安全转移，八路军官兵往往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作战，残酷的阻击战每每以持续的肉搏战结束。五月三十日，八路军的部分官兵以及抗日民兵数十人，被日伪军包围在深县白庄村，在副营长张子明的带领下，八路军和民兵利用村庄里的地道和街巷进行顽强灵活的防御战，毙伤日军联队长晋藤以下四百余人，自己仅伤亡二十多人。六

月九日，日军坂本部队包围了深泽县宋庄，日军认为他们这次捕捉到了八路军主力，而实际上宋庄里只有在突围行动中临时组成的一支八路军小部队，由第七军分区二十二团从无极县突围而出的两个连、团长左叶带领的一个连以及两个民兵游击小队等官兵组成，由左团长统一指挥。早晨七时，日军开始攻击宋庄，立即遭到猛烈的火力还击，日军暂时退了下去。很快，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兵力在两千人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八路军和民兵利用村庄的围墙和房屋构成临时防御工事，沉着作战，日军直到下午才突进村庄的南部，八路军和民兵转移到村庄北面。此时，八路军和民兵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喝水了，弹药也所剩无几，还有不少伤员在呻吟。左团长决定坚持到天黑才能转移。日军向宋庄发起了总攻，双方很快形成了残酷的巷战，每一个院落都进行着白刃战。天快黑的时候，战斗白热化了：

敌人的主攻方向在一连。我第一、第二道工事经敌人的猛烈炮火轰击，大都坍塌，便转移到第三道工事，继续坚守。敌人接受了多次冲击失败的教训，不敢再端着刺刀、呼喊着挺身直冲，而改变成了匍匐前进。但敌人的连续三次进攻都被我们打垮了。敌人在连连遭到惨败后，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手段：第四次进攻前，先打出了毒气弹，毒气弥漫之处，人们眼里流着泪水，嗓子热辣辣地发痒，并不住地打着喷嚏。敌人利用毒气弹的效力，又匍匐爬行到了墙根，有的已经爬上了墙头。战士们看到这种情况，强忍着眼睛、嗓子的极度难受，从工事里跃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敌人猛刺，只听得敌人惨叫着，掉了下去。一个日军士兵从围墙的缺口处跳过来，直向我七班长身边扑去。七班长手疾眼快，一刀刺进了敌人的胸膛。那个日军士兵惨叫一声，不动了……十七时许，一股敌人冲进了东街口，眼看敌人就要占据房子。在这紧急关头，一连吴连长带着预备队向敌人冲击，他们用机枪扫射，手榴弹轰击，一鼓作气把敌人打了回去……敌军除了又在街头丢下一批尸体外，别的什么也没得到，此时，已经是十八点左右了。

天黑了，八路军和民兵开始突围。他们疾速而勇猛地直冲日军包围圈的一侧，手榴弹密集地投掷，刺刀在夜色中发出寒光，决死的呐喊中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个口子。突然，天降大雨。八路军和民兵在雷鸣电闪的暗夜里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亮之后，日军再次从炮击开始，然后步兵发起攻击。他们认为昨夜突围出去的只是八路军的少数官兵。但是，当日军冲进宋庄后才发现，整个村里空空荡荡的。

宋庄一战持续十六个小时，八路军和民兵以伤亡七十三人的代价突围而出。而日军最后投入的兵力达三千五百人以上，尽管使用了火炮和毒气，伤亡仍高达四百多人。按照正面战场上中日两军作战的经验，他们无法想象与他们作战的八路军加上民兵总数不足三百人。

冀中军区直属骑兵二团团长马仁兴，河南上蔡人，自幼家贫，被迫从军。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在晋南制造摩擦向八路军进攻，时为第九十七军直属骑兵二十八团团长的马仁兴，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毅然率部起义加入了八路军。军长朱怀冰曾以高官劝诱他，不成后又把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扣押起来，马仁兴不但没有动摇，还让他在兰州上学的儿子马乘风也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骑兵团在马团长的率领下，在反“扫荡”中担负着掩护部队转移的重任。五月二十日，他的儿子马乘风在与日军作战中不幸阵亡。为了减少伤亡，骑兵团决定分散开来，以便更加灵活机动地与日军周旋：马仁兴团长带领一连、特务连和侦察连；政委汪乃荣带领二连；副团长宋辅廷带领三连；参谋长卜云龙和政治处主任杨经国带领四连。在随后的作战中，政委汪乃荣和党总支书记高尚勇相继牺牲，不久又传来了政治处主任杨经国阵亡的消息。杨经国是抗战初期中共北方局派到根据地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阵亡时年仅二十多岁。八年以后，作家孙犁在冀中大平原上听到老百姓还在讲骑兵团和杨经国的故事，根据老百姓的讲述他创作了小说《小胜儿》：“在五月麦黄的日子，冀中平原上，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树木脱枝落叶，道沟里鲜血滴滴。杨主任在这一仗牺牲了，炮弹炸翻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

冀中第八军分区虽然在日军的“扫荡”中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灵活的战术，但兵力强大的日军的合围突击还是让八路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突围过程中，三十团团政委汪威指挥警卫连与日军激战，为掩护大部队全连伤亡殆尽，汪威负伤后为避免被俘自杀。副团长肖治国和总支书记沈笑天也在转战中阵亡。二十三团团长谭斌和他带领的三营的干部在突围中全部阵亡，最终仅团政委姚国民带领少数官兵成功突围。二十三团一营被围，官兵与三千多日军苦战一天，杀敌五百余人，副团长赵振亚和团政治部主任孟庆武阵亡。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带领的二十三团二营在突围中被优势日军包围，营长邱福和和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干部相继阵亡。常德善司令员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亲自操机枪掩护官兵撤退，最后被日军乱弹击中牺牲；政委王远音身负重伤，为了不被日军俘虏，以手枪自杀殉国。战后，当地群众在埋葬常德善司令员时，发现他身中二十七弹，其中的三弹都打在了太阳穴。常

德善是山东人，家庭贫苦，两岁时父母双亡。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给著名的红军将领关向应当警卫员，后因在战斗中十分勇敢而在警卫团当排长、连长和团长。贺龙曾说，红二军团在湘鄂西转战时，身中三弹的常德善竟然在战火中先把他背出来，然后又把余秋里也扛了出来——“没有常德善，就没有余秋里和我贺龙。”

日方对冀中军区“大扫荡”的战果统计是：双方交战二百八十六次，交战兵力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八路军伤亡九千零九十八人，被俘五千一百七十七人。

八路军方面的统计是：作战二百七十二次，击毙日伪军联队长以下官兵三千九百八十一名，击伤日伪军七千五百二十一名，我伤亡指战员四千六百七十一名。抗日根据地内的民兵和百姓损失更严重，“区县游击队损失五千三百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十六万人，使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

冈村宁次在对冀中根据地发起攻击前，首先对冀南根据地进行了“扫荡”，指定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负责作战，其主要参战部队是：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吉田峰太郎指挥的五个步兵大队；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铃木贞次指挥的三个步兵大队；第三十二师团的惠藤第四郎指挥的步兵第二一二联队以及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重田德松直接指挥的北川、佐久间两个旅团。由于“扫荡”发动的时间选在日本天皇生日的那天，因此被称为“四二九大扫荡”。八路军冀南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一个旅、六个新编旅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第二纵队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此前，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过反复围攻，根据地的面积已被压缩得非常狭窄。年初，新编第八旅二十二团遭遇两千日军的合围，副团长徐国夫被俘，两个连的官兵在掩护团主力突围中伤亡殆尽。三月，到邱县接收新兵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两个连被日军包围，与装备了重炮和坦克的日军战斗五个小时后，八路军官兵全部阵亡。四月二十九日拂晓，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攻势，目标直指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临清。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新编第七旅二十一团以及军区特务团、骑兵团等部队，合力抗击日军独立混成第七、第八两个旅团的进攻。战至下午，党政军机关大部分撤离，小部分机关人员和部队官兵被日军骑兵冲散。与此同时，驻扎在邱县的第四军分区和新编第四旅遭到铃木旅团的包围，新编第四旅主力七七一团在旅长徐深吉的指挥下与日军拼力死战，掩护大部分官兵突出重围，但第四军分区在突围中遭遇日军伏击，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等在指挥作战中相继阵亡。日军随后对冀

南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抉剔清剿”，抓捕和杀害抗日民众，强迫地主组织维持会，冀南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八路军正规军由两万余人锐减到一万余人，地方抗日游击队损失百分之八十以上，根据地内的半数以上党组织遭到破坏，党政军干部损失了近五千人，党员由四万余人减少到两万一千人。

在日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冀南抗日根据地里还驻有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部队。该部在日军的猛烈追歼下，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二人，被俘二千三百五十人，受伤官兵多达九千人，高树勋率领残部退往安徽。从此，在中国敌后战场上，陇海铁路以北地区再无国民党军队。

由于日军第十二军部分主力部队调往长江以南，日军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八路军第二纵队的进攻推迟到了九月。当时，冀鲁豫军区仍坚持在根据地里对日伪军发动秋季攻势和反蚕食作战。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将参战部队编成三个突击方向：以第三十二师团的步兵五个大队和装甲车一个中队，编成由步兵团团长石田保忠少将指挥的石田支队，集结在巨野和郓城地区；以骑兵第四旅团的两个中队、装甲车一个中队和骑兵炮兵混成的一个中队，编成由骑兵第二十五联队联队长高原孝大佐指挥的高原支队，集结于濮阳地区；以第五十九师团的五个步兵大队和装甲车一个中队，编成由步兵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大熊真雄少将指挥的大熊支队，集结于聊城、莘县地区。部队集结完毕后，九月二十七日，三个支队的日军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再加上当地的伪军，五万余兵力分成八路，同时向冀鲁豫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实施“铁壁合围”。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军区主力部队迅速转移到外线，党政军领导机关也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但抗日军政大学校部、陆军中学、《挺进报》社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少量部队，被日军围在方圆不足三十里的范县甘草堌堆附近。在日军的不断压缩和飞机轰炸下，附近的老百姓也纷纷向内靠拢，而被包围的人员中军事指挥员仅有教导第三旅政治委员曾思玉和八团参谋长王晓波。在曾思玉和王晓波的指挥下，战斗部队官兵拼死冲击打开缺口，掩护机关人员和民众冲出包围圈。尽管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大部突围而出，但地方武装和部分机关人员还是遭受巨大损失。日方的统计是：掩埋共产党抗日军民尸体一千二百五十二具，俘虏一千二百五十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间，日军对八路军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始了最大规模的“扫荡”，目标是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第一二九师等八路军军政首脑机关。

作战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不幸阵亡。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太岳根据地，始终是冈村宁次图谋彻底摧毁的目标。正值日军席卷太平洋战场之际，准备进一步冒险的日军大本营急需巩固战略后方，同时还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补充，而对其后方威胁最大的八路军，自战争爆发以来不但没能剿灭，且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从战略上讲，只有把八路军的首脑部位彻底清除，才可能达到稳定后方的目的。因此，自一九四二年二月起，日军对八路军太行、太岳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扫荡”，企图把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的核心枢纽一网打尽。

二月三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四、第一旅团等部队，共一万两千多兵力，分别向晋东南的长治、襄垣、武乡、辽县等地出动，奔袭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二、第三、第四分区驻地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同时，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和第三十六师团一部，也分别从驻地出发配合作战。由于八路军主力及时转移，日军的合围未能成功，于是便在根据地内进行“辗转清剿”，抓捕抗日民众，抢劫粮食牲畜。在此期间，日军不断地受到八路军和抗日民兵的袭击，日军三次合围八路军总部，五次合围八路军主力，均未得逞。八路军太行、太岳部队转移到了日军侧后，袭击日军据点，炸毁桥梁，切断铁路，使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被迫停止军事行动。经过暂时的休整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再次出动，但立即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其先头部队百余人被八路军新编第一旅二团歼灭。三月二日，毫无所获的日军在撤退时再次遭到八路军的伏击，伤亡达四百多人。八路军官兵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了长治、潞城和壶关之间的敌占区，捣毁了日伪据点和汉奸维持会，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春季“扫荡”。

日军原计划对八路军太行、太岳根据地实行两个月的“扫荡”，但只进行到第三十一天便草草收兵。

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认为，二月的进攻之所以失败，是用兵过于分散，没有突出重点。经过研究，冈村宁次决定采取全新的战法:以小部队的秘密行动为轴心，大部队进行局部配合，以求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实施严密合围；然后在飞机侦察和轰炸的配合下，地面部队逐渐向心压缩，做到对每一寸土地的彻底“清剿”。

岩松义雄的“小部队”，实际上是两支担负特殊任务的突击队：从第三十六师团的两个联队中分别挑选出百名士兵，组成两支精干的突击队，分别由益子重雄中尉和大川桃吉中尉担任队长，自带干粮雨衣行囊，执行任务中不许生火做饭，不得住宿村庄，一律穿便衣或八路军军装，不许穿日军军服，在完成任务前绝对不许暴露身份。这两支突击队被命名为“挺进特别杀人队”，对外称“挺身队”，其任务是：对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挥机关实行“捕捉奇袭”。具体分工是：益子重雄负责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八路军首长；大川桃吉负责袭击第一二九师师部，捕杀刘伯承和邓小平。

五月中旬，岩松义雄从太原抵达长治，在设立指挥部的同时，大量印制了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照片，发给各部队指挥官、“挺进特别杀人队”队员以及随队特工。

自日军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扫荡”以来，八路军总部战事繁忙，昼夜处在高速运转中。从各根据地传来的敌情消息非常复杂，有的明显是日军在造声势，故意用部队的佯动来混淆视听。至于日军是否会再次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攻势，八路军总部颇费思量。副总参谋长左权担心的不是日军的进攻，而是根据地内军民的警惕松懈和盲目乐观。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地的指战员普遍出现乐观情绪，对敌后战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认为日军的兵力已十分有限，不可能在几个地区同时作战，且日军已在“扫荡”太行山根据地时受到了打击，即使真的再次来攻，充其量也是为配合冀中、冀南和冀鲁豫地区作战的一种佯动。

五月十四日，传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和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共七千多兵力，向太岳军区南部地区发动攻击的消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军区机关及时转移到了外线，其第三八六旅十六团和七七二团一部坚持在内线与日军周旋。然而，这是日军在声东击西。

十八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悄然撤回，其中一部于十九日夜秘密开往辽县，另一部开往潞城和襄垣等处；毛利末广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则乘汽车从太原赶至和顺及辽县一带。同时，津田美武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和吉田峰太郎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分别由正太线和平汉线的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据点出动，企图合击测鱼镇和黄北坪。二十一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沿武安至涉县的公路西进，进犯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西线的第三十六师团一部也由潞城和襄垣等据点出动，向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进犯。

二十二日，左权得到警卫团的报告：在桐略西北的山林里发现一支来路不明、身穿便服、携带电台的武装队伍，很快就又去向不明了。通过审问当地的一名伪村长才得知，这是专门负责捕捉八路军总部的“益子挺身队”。日军的特工队竟然到了八路军总部的眼皮底下！左权当即命令警卫团提高警惕，并迅速向彭德怀作了报告。彭德怀眼睛瞪得很大，说那老子就等着他们。左权知道，不到最后一刻，彭德怀是不会转移的。

接着，各方情报又到了：北线的日军会合后迅速南下，合击了将军墓和浆水镇，有占领太行制高点的企图；从长治出动的日军三千余人也急促推进，企图与襄垣方向的日军合击东田，在此驻扎的第三八五旅主力已提前跳出了合围圈。日军大规模进攻的态势已经明了。彭德怀和左权意识到，日军此次进攻的规模和手段虽然有些出乎预料，但日军的补给线很长，太行山区地形复杂，根据地里群众基础好，八路军完全有能力粉碎日军的进攻。彭德怀和左权当即制订了作战计划：第三八五旅主力在漳河两岸阻击日军；刘伯承率第二九师师部转移到邯郸至长治公路以南，指挥新编第一旅和太行军区第四、第五军分区部队作战；彭德怀和左权率领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直属队在太北地区回旋。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

八路军主力部队大多已在外线，八路军总部机关庞大，战斗人员很少，就目前态势看，北方局机关、八路军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和北方局党校等单位，已经处在了日军大的合围圈中。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策，第二天一早就带领机关向东转移。左权对机关转移需要准备和注意的问题一一作了督促和检查，并要求总部警卫部队掩护机关的转移，总部特务团主动出击迎敌，绝不能让日军打到家门口。

万籁寂静中，意识到一场殊死战斗即将到来的左权毫无睡意。桌子上放着他和妻子刘志兰新婚后不久拍的一张照片。百团大战前夕，刘志兰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左太北去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夫妻一别已经二十一个月。此时此刻，左权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安之便，再带给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很快可以

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经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正常，唯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裸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得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生活在一块的话，真是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说了，祝你好！

叔仁

五月二十二日晚

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开始紧急打点行装。左权接到第一二九师电报:第三八五旅十四团在转移途中，由于不明敌情，在王家峪附近停留了两小时，再度出发后遭到日军伏击，部队损失严重。电报同时催促总部赶快转移。接着，特务团报告说，他们和“益子挺身队”接了火，但日军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因此没能把这股日军完全歼灭，“益子挺身队”正向

麻田方向流窜。

这之前，北方局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等，已经分路向麻田以东带转移了，准备当日军接近预定合围圈时，从其缝隙处分散突围而出。彭德怀说，这是八路军于敌后成功脱险的经验，关键在于掌握“利害转换线”——“即掌握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突围行动过早，转不到敌后；突围迟了，敌空隙小，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证，则在于八路军情报的及时准确，指挥员的沉着决断，和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然而，这一次，日军伪装成八路军，作战命令不准见诸电报或文字，一律通过口头传达，导致八路军在根据地内外广泛的群众耳目“一时失灵”。

八路军总部机关必须马上走了。

晚上，彭德怀和左权率领总部机关人员三百余人，牵着四十多头骡马，撤离了驻地武军寺村。

彻夜行军至第二天清晨，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一直跟踪八路军总部电台信号的“益子挺身队”，突然袭击了正在转移的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军工部、新华日报社和参谋处第三科等单位，第三科科长海凤阁牺牲。接着，侦察情报显示：日军已经尾随彭德怀和左权一行追了上来。左权立即留下来指挥警卫连进行阻击，掩护彭德怀和总部机关人员迅速撤离。彭德怀一行由于目标太大，被日军飞机发现并受到袭击，所幸伤亡不大。但是，当左权率领警卫连追上队伍时，彭德怀和左权发现他们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了。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彭德怀和左权面临的情势是：各路日军已在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形成合围，只在合围圈东面的拐儿镇与偏城之间还有大约三五公里左右的间隙。彭德怀和左权决定，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冀西突围。但是，偏城以东地势较高，地形复杂，而青塔、黑龙洞以东是难以通过的险峻山路，必须先向北经过南艾铺，再绕道窑门口，才有可能前往冀西。问题是，这条路他们都很陌生，派出去的侦察参谋既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事不宜迟，左权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先行探路。山路狭窄，路线陌生，半路上又遇到其他突围部队，队伍因为庞大行动十分迟缓，一夜只走出二十多里，抵达南艾铺时已经天亮。

南艾铺村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此前反“扫荡”期间八路军总部曾多次驻扎。村边有一条大山沟，直通山西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十

字岭。尽管八路军一部提前到达这里并开辟了阻击阵地，但二十五日拂晓，这个小山村里却一下子挤进来包括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等各路转移队伍，这些大多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队伍多达二千余人，还有八百多头骡马和两百多副担子。相对于庞大的机关来讲，身边的战斗部队除了七六九团的一个营外，仅有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的三个警卫连，且后勤部警卫连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作战而是看守重要资金和物资。至于八路军总部为什么没有部队保护，这与共产党人自创建武装力量以来的传统有关。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共产党中央和军事首脑机关从来没有使用过多的兵力进行警卫，共产党领导人和军事将领们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下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中枢机关自身的战斗化很强。但是，聚集在南艾铺村的八路军总部各单位的非战斗队伍，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合围面前还是显得战斗力太弱了。

果然，五月二十五日，最危急的局面发生了。

八路总部机关的转移情况，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掌握得十分清楚，因为在八路军转移队伍的头顶上，日军的侦察飞机飞得很低，而岩松义雄派出的作战参谋就在飞机上直接指挥合围作战。在日军飞行员的引导下，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沿着清漳河和武涉公路形成的大合围圈逐渐压缩。为防止八路军突围，外围的日军也正在快速合拢，形成了两层严密的堵截线。

二十五日清晨，转移队伍出发没多久，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轰炸。由于队伍过于庞大，又没有防空武器，只好停下来等待黄昏。但是，传来的情报显示，日军的合围圈正越来越紧。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和杨立三等人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立即分散突围。具体方案是：总司令部、北方局由左权率领，沿着清漳河东侧向北突围；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南方向突围；后勤部由杨立三率领向东北方向突围。在命令阻击部队必须顶住敌人后，各路突围开始了。

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的突围队伍，很快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追击轰炸和俯冲扫射。缺乏战斗经验的机关人员跑来跑去地躲避，大量的骡马被炸倒，物资被丢弃得漫山遍野。下午二时，日军“益子挺身队”穿着八路军的军装，突然横着插过来。左权立即命令总部警卫连抢占山头，然后命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和两个参谋与彭德怀先行突围，由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负责掩护。彭德怀坚持要和机关一起突围，左权表情十分严肃：你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员，你的安全就是胜利，你必须安全出去！

这里由我指挥阻击！彭德怀上马后回头望了左权一眼——他并不知道，此刻竟是二人的诀别。

十字岭是向北突围的必经之路。山坡上，八路军总部的转移队伍在日军的轰炸和扫射下散成小股失去了控制。左权冷静地指挥阻击作战，同时照顾着几名年仅十几岁的女译电员和体弱的干部，一面又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去寻找带有机密文件的挑夫。他对坚守十字岭阻击阵地的七九六团一营教导员说：很多人还在山下，如果这个山头丢了，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名同志没出来，就不许撤退！

此时，十字岭西北的山垭口变成了一条生死线：只要冲过垭口，就能跳出日军的火力封锁，进入北艾铺的山沟。但是，这些由年轻的译电员、党校的学员和教员组成的队伍行进缓慢。左权似乎看出了大家的顾虑，他大声喊道：不要害怕！冲过去，翻过山梁就没事了！

一架日军的战机突然俯冲扫射，几名年轻的译电员忙往核桃树下跑，左权又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要冲过山口！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

时年三十七岁的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一九〇五年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在叔父的资助下入学读书。十九岁那年，他和几位同乡赴广州，考取了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左权被编为黄埔第一期第六队。在第三队同学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了两次北伐军的东征战役。一九二五年，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九三〇年，他和刘伯承等人一同回国，中央派他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他给家人写信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之一。在他亲自策动的宁都起义成功后，出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在率部进行反"围剿"作战中屡立奇功。红军长征前，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他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作为长征的前驱部队，始终战斗在最前线，直到长征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显示出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他受到八路军官兵的敬重。在八路军发动的一系列对敌作战中，由于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身在重庆，左权在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可谓殚精竭虑。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道：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我认识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风度的军人，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影响他的。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调……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

北方局党校学员李锡周目睹了左权牺牲的那一刻：

……轰、轰、轰几发炮弹呼啸着飞来，在山梁上爆炸，一股股黑烟恶魔一样升起。随着硝烟散去，左权将军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消逝……我和党校同班同学山西新军决死队四纵队团参谋长李克林被惊呆了，在我周围的几名同志也呆呆地望着山梁停止了脚步。我们意识到将会发生不幸，便不顾一切地奔向山岗……

头部中弹的左权躺在山路边，鲜血染红了身边的荒草。他的右手还在腰间的手枪上——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的战利品。

这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

突围人员把左权的挂包、手枪、怀表、钢笔等遗物交给作战科负责人，然后把他的遗体移到十字岭东坡的一个隐蔽处用树枝覆盖起来。

随后，警卫连官兵在附近乡村买了一口棺材，再返回到左权牺牲处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

晚上，彭德怀抵达距十字岭十五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他得到了左权牺牲的消息。很久以后，彭德怀对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发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

左权牺牲的消息震惊全国。延安和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八路军总部长期所在地辽县被命名为左权县，一首当地百姓写的歌自此流传开来：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

他为国家他为民族费尽心血。

狼吃日本五月扫荡咱路东，

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

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

咱们辽县老百姓为他报仇恨。

一心要为八路军报仇的百姓很快送来一个消息：日军的“益子挺身队”准备在祁县县城里大摆庆功宴。得到消息后，彭德怀命令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三十一名官兵，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带领，化装成各色人等，每个人都身藏匕首，混进了庆功宴所在的大德兴饭庄。当鬼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一声暗号，匕首纷飞，“益子挺身队”队员当场全被刺死，头颅被——砍下来装满了一口袋。第二天，日军占领下的祁县、长治和太原城内，到处挂起了这些日本人的人头。

在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大规模进攻时，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在日军调动兵力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时，正面战场发动配合作战，哪怕是在某个局部战场发动攻势，也势必造成侵华日军的极大被动。理由很充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华日军总兵力已捉襟见肘，而共产党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几乎遍布敌占区，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不但牵制的日军兵力数量惊人，而且令日本侵略者在他们所谓的占领区内度日如年，如坐针毡。

但是，这也只能是设想。

在华中地区，重新组建的新四军迅速恢复根据地，兵力也达到了近十万之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宣告：“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又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指战员牺牲，但今天我们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因此，日军在华中的二十六万余总兵力中，用于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至少在十一万左右，而华中的十五万伪军则被全部用于与共

产党抗日武装作战。

一九四一年二月，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领六个纵队约一万兵力投敌，立即被汪精卫任命为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是华中敌后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表示为顺应民心、坚持抗战，任命粟裕为讨逆指挥部总指挥、叶飞为讨逆指挥部副总指挥，对李长江部进行坚决的打击。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从海安以西出动，沿着海安至泰州的公路向西横扫而去，相继攻克姜堰、泰州城，俘虏李长江部官兵五千人，并争取了两个支队战场反正。

盐城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日军出动了第十五师团、第十七师团各一部，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全部以及伪军第一、第二集团军，试图对盐城形成包围之势。新四军以第三师第七、第八旅和第一师第二旅组成反“扫荡”部队，用部分兵力以“阻击、袭击、伏击等手段与敌周旋”，而主力则迅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移动至“敌之侧后”对其发起突然打击。为了打破日伪军对盐城地区的“扫荡”，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在苏中地区发动佯攻，攻克蒋垛、古溪、孤山等多个据点，并收复黄桥。当新四军官兵对姜堰和泰兴发起攻击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生怕自己的巢穴被端，立即从盐城方向撤兵回援泰兴。之后，日军将“扫荡”盐城的兵力南调苏中，对新四军苏中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围剿”。在师长粟裕的指挥下，新四军第一师以少量兵力展开分散游击，主力不断地跳到外线适机歼敌。就在日军集中苏中之际，新四军第师和第一师第二旅乘机发动反击，收复阜宁，逼近盐城外围地区。这使得日军被迫结束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命令部队北返盐城地区。

新四军第一师扼守的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长江下游的北侧，隔江与南京、上海相望，是日军企守的重要地区之一。而新四军军部赋予第一师的任务是：“坚决粉碎日伪顽（顽固派）的联合进攻，占据广大乡村，始终坚持苏中根据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强大的地方武装。”为了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分割和封锁，第一师派出部队深入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开始在苏中加紧修筑公路，以减少据点守兵，增强作战与增援的机动能力。第一师遂发动民兵对敌人的公路进行破坏，主力则采取突袭的动作“猛扑一路或攻其一点”，仅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第一师作战一百六十余次，攻克日军据点二十余处。

一九四二年，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存在，标志着中国依然葆有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在日本侵略者残忍的屠杀面前，这种存在需要极强的爱国勇气和坚韧的战斗意志支撑，这种支撑比具体的歼敌数字更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不应讳言的是，虽然敌后抗日军民以凛然的牺牲昭示着民族的不屈风骨，但又确有国人在此抗战的艰苦时期向侵略者妥协乃至投降。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鲁西行署主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在鲁西南的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十三旅和特务旅共二万五千余人投敌。与他一起投敌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处长孙玉田等。投敌队伍被汪精卫一并编为“和平建国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为总司令。

更无法想象的是，在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和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分兵南北夹击八路军第八六旅时，在日军的进攻行列中竟然有一支国民党军的部队在配合作战——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出他的精锐部队梁培璜的第六十一军的四个团，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配合日军联合攻击了八路军的四十里岭阵地。虽然阎锡山的部队遭到顽强阻击后撤退，但此事的发生还是令人匪夷所思。阎锡山和日本人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签订了相互妥协的《汾阳协定》后，为了让日方早日履行给钱给枪的承诺，阎锡山的代表多次与日军进行了拉锯式的讨价还价。日方的条件是阎锡山必须先发表脱离重庆政府的“独立通电”，阎锡山则坚持日方按照《汾阳协定》的承诺给钱给枪后再说其他。阎锡山的盘算是：贸然发表通电后，别说华北，连山西他也保不住，他对付不了蒋介石的掣肘，更对付不了八路军的进攻。而日本人要的所谓“独立通电”，说白了就是让他公开宣布投敌。作为国民政府的要员和抗战中国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阎锡山很清楚一旦发表这份通电，对他的政治前途来讲将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必须审慎地权衡做这笔买卖是否合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一直与阎锡山联系的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他的位置由日本贵族出身的花谷正少将接任。花谷坚持要求阎锡山首先宣布脱离重庆政府，然后才可在年内提供给他枪支六万支、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且承诺以后每月给八百万元，花谷强调这是日方的最后立场。但阎锡山还是坚持日方先给钱给枪再说。

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与阎锡山“合作”心情迫切，他主动会见阎锡山的代表，表示阎锡山是辛亥革命期间的“华北第一人物”，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敦促阎锡山不要失去与日本合作的时机，因为这对阎锡山有大大的好处。

为了给政治谈判施加军事压力，日军开始向阎锡山进攻，在阎锡山所在地的黄河渡口修建浮桥并派飞机轰炸。当日军逼近的时候，阎锡山万分恐惧，向共产党人发出救援呼吁，毛泽东于三月二十四日指示彭德怀：“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之抗战。”

其实，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阎锡山，都怕“合作”就此中断，于是双方加紧了讨价还价。花谷正的态度十分强硬，认为阎锡山多年来就是靠对中国人和日本人行骗活着的，因此坚决要与阎锡山当面谈判。他对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说：“你能代表阎锡山吗？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阎锡山与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兼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在一个名叫安平的小山村见面了。这是双方约定的一个微妙的地点：阎锡山不敢也不便去太原或汾阳，让日本人到他所在的吉县来也不合适，于是选定了距离双方对峙防线各十五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小山村原名为“南坪”，阎锡山认为与日军会面十分危险，“南”和“难”谐音不吉利，于是临时给小山村取了“安平”这个村名——有了“安平”的村名，加上村庄在吉县境内，阎锡山认为就可“吉庆平安”了。双方的会见阵容强大：阎锡山带着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以及秘书长等幕僚，岩松义雄带着他的参谋长花谷正、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日军驻临汾师团长清水中将以及大量的参谋人员。

这是一个怪异的时刻：中国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和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司令官竟然握手言欢了。而就在此时，日军已经开始了对八路军总部的合围“扫荡”行动。作为同在一个战区的抗日友军，阎锡山非但没有去援助八路军，反而与日军将领欢宴一堂。

会谈正式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他长篇大论的核心主题是“中日相互需要”，“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举日本当‘盟主’”，他本人“也拥护日本人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盟主’”。至于什么是“亚洲人愿意做的事情”，阎锡山含糊不清，岩松义雄更是一头雾水。阎锡山的发言很长，加上翻译的时

间，弄得日本人不胜其烦。岩松义雄打断了他，抢过来发言，他直截了当地让阎锡山认清日本的“大东亚圣战”的必胜前景，要求阎锡山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到“大东亚共荣圈”里。而如果阎锡山答应这一条件，他马上就可以付现款三百万元以及一万支步枪。阎锡山还是那句话：先给钱给枪再说。理由是只有先装备起来，才能应付共产武装。花谷正显得极不耐烦，说日本人都把美国打垮了，蒋介石和共产党更不在话下，阎锡山的观望没什么好处。花谷正最后要求阎锡山和他们一起回太原，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宣言”强迫阎锡山签字。

阎锡山心惊肉跳，认为这是日本人要把他拘禁起来。这时，有人悄悄向他报告说，在日本人来的路上发现了很多骡马，很可能是日军的炮兵上来了。阎锡山的警卫队长也提醒他赶快走，说房子后面有一条小道可以迅速撤离。阎锡山借口会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在警卫和侍从们的护卫下跑了。等到岩松义雄发现阎锡山不知所终后，大怒，说阎锡山只知“贪物质之大欲”，日本人一定要惩罚他。

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与日军的妥协会谈，虽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阎锡山设立在太原、汾阳和临汾日军占领区内的办事处仍旧存在，并继续与日方保持着联系，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伴随着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伴随着国内日益猖獗的妥协投敌势力对抗日力量的消损，在苦难的一九四二年里，中国华北地区还遭遇了罕见的大旱。自一九四一年夏秋始，本应是雨水丰沛的季节，中国北方却雨水稀少，河南境内甚至一滴雨也没下。骄阳下土地龟裂，农田里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民的灾难降临了。为了不挨饿，农民们变卖掉所有的家产，包括牲畜和农具；吃掉了能吃到的所有东西，包括树叶和草根。当树皮和草根也被吃光的时候，灾民们开始贫血、浮肿、衰弱，接着就是疟疾、回归热、夜盲症等疾病的大面积流行。报刊上出现了灾区发生人吃人现象的报道，刚开始还是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报道出现了。

在灾荒最严重的时候，美国记者白修德抵达了河南：

……出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见第一具躺在雪地里的女尸，死了才一两天，脑袋上的皮肤已经皱缩，她一定很年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面，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去掩埋她，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骨头了事。沿途有不少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我们边走，边可以看到人们在用小刀、镰刀和菜刀剥树皮。他

们从爱好种树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上剥下树皮，因为榆树皮磨成粉可以充饥。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那时人们就会把它们砍下来当柴烧，也许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树木砍伐殆尽的……我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也从未尝过人肉的味道。但是人吃人似乎确有其事。通常都有人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我在这方面报道的每一件事都免不了这种辩解。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母亲正在煮食她两岁孩子的肉吃；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父亲被控为了吃自己两个孩子的肉而把他们勒死。他辩解说，这两个孩子已经死了。另一个村子里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案件：军队硬要农民收容弃儿，他们把一个八岁的男孩交给一户农民，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过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问题仅仅是，那个孩子究竟是死后被吃掉的，还是活活地被杀死吃掉的？

数量惊人的饥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骇人的饥民潮。

这股潮水以河南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饥民的尸体遍布在每一条乡间道路、公路和铁路线上。

战争是灾荒的助推剂。

日军入侵中国后，中原是其疯狂掠夺和杀戮的主要地区之一。一九三八年的花园口决堤御敌，使得长达四百多公里的良田变成了无法耕种的沙滩河汊，仅存的耕地即使种上庄稼也会被往复不断的战火毁坏。军队打仗需要兵员和粮食，中国军队沿用数千年的传统，军事补给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官兵的口粮和军马的消耗，全部就地征用，这使中原地区的税赋达到了令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这个政府正在同日本打仗，为了战争，它横征暴敛。

可是它又不相信自己的货币，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收粮食和实物来维持给养。一个军官对我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军队在河南干的勾当就是大量征收军粮，数额超过了土地的产量……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相当于全年的收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要高些——只要所征收的军粮高于收成，农民就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以现款去补差额……此外，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每个地方官员，无论其家庭人口多少，每天得到四磅半粮食的配给赡养全家。部队士兵按规定应当每天有两磅粮食。在兵员不足的部队，军库里囤满余粮，军官们用以倒卖中饱私

囊，而传教士和好心肠的地方官员又把这些粮食从黑市上买回来，给挨饿的灾民吃。

战争向民间的索取，使得民间抵抗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中外记者的大量报道下，国民政府终于对中原的灾荒有所认识，决定豁免河南省当年的粮食赋税。但不知重庆方面是否故意为之，因为此时的河南省府已将一九四二年的秋季粮税征收完毕。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对日战争是他的第一使命，而他对河南一带从没抱过什么幻想，认为那是一片最易被日军占领的国土。因此，对于河南省，只能在那里索取，不能向那里救济，因为救济无异于资敌。国民政府对灾区的新闻报道实行了严格审查，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一系列灾情报道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白修德甚至还直接见到蒋介石当面陈情。不得已，重庆开始了对灾民的救济工作。只是，数量远远不够的赈灾款项和粮食，被地方官吏层层贪污后所剩无几。即便如此，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仍从河南全省征收军粮三亿四千多万斤，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河南人民深明大义，倾其所有，贡献国家”的消息。问题是，在生死线挣扎的饥民心里什么是“国家”？——有资料统计，在一九四二年中国北方的大灾荒中，饿死的百姓多达三百多万。

灾荒暴露了社会的严重贫富不公。“在洛阳街头，街旁的沟中，到处躺着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与此同时饭店仍然开展营业，如果你有钱的话仍然能够尽情吃喝。由于粮食的缺乏和昂贵，许多贫穷的市民开始像农民一样挨饿，但国民党的官员和职员却在整个饥荒时期享受政府充分的小麦供应。许多腐败的官员甚至利用政府的小麦大发其财……和传统的情况一样，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他们利用获得的暴利低价购买土地、儿童和那些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

灾荒暴露出的社会不公也体现在正面战场的军队中。“当一些受国民党中央歧视的地方军队口粮短缺时，嫡系的中央部队——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却总是吃得饱饱的以‘维持社会秩序’”。随着战争进程的持久，中国军队的数量逐渐庞大，不少部队，特别是地方部队军粮匮乏，官兵饿着肚子打仗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尚未听说中央军嫡系部队饿肚子的。相反，不少中央军嫡系部队竟还存在着浪费的现象。由此，尽管这个国家的北方遍野饥馑，位于重庆的蒋介石仍需指出“现在军队里面最大的毛病就是浪费”：

现在一个士兵每天发二十六两面粉，大家还说吃不饱，这个话我想实在说不过去。现在无论哪一个军队的食粮，都没有达到这个分量，所以不在于粮食够不够，而在我们团长连长经理得法不得法！从前我在敌国日本联队实习的时候，每天所吃的不但没有二十四两米，恐怕连二十两米都不足，像今天中午聚餐所用的饭碗，规定每人每餐只须吃一碗，一片咸萝卜或一块咸鱼而已……我们中国人患病，多半是由于饮食没有节制，吃得太饱的缘故，外国人吃饭，都是说要吃够，没有听说要吃饱。

抗战初起，国民政府按照八路军四万五千人的兵员数，每月发给生活费三十万元、战务费二十万元、补助费五万元、医疗费一万元、米津贴补助费和兵站补助费七万元，总计六十三万元。以后虽然做过调整，但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万元。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物价飞涨，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创建，八路军兵员激增到了四十多万，尽管敌后作战异常残酷，但国民政府给与八路军的军饷却从未增加。一九三八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了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小米一斤半，每月每人肉、油、盐各三两。从总司令朱德开始到师旅级干部每月津贴费为五元，团营级四元、连级三元、排级二元、士兵一元。后来，随着供给的严重不足，津贴费改成了从总司令到士兵每人每月均一元。即便如此，国民政府自一九四〇年起停发了八路军数量极其有限的军饷；在强烈的质询下勉强又发了四个月，但很快就永远地停发了。

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政治、军事和生活的三重严峻考验。毛泽东不由得向全党全军提出了一个诘问：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然后他自问自答道：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自一九四一年起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大生产运动”，这是共产党人最壮观的集体行为之一：“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体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在与日本入侵者艰苦作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以及根据地的全体百姓，一起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劳作。在陕甘宁边区，一九三九年开荒近三万亩；一九四〇年开荒二十万亩；到了一九四二年，整个边区开荒近四十万亩，可增产粮食七万余石。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里，军民们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开设了大量的手工、半

手工的工厂，凡是关乎吃穿用的所有东西都由自己生产。受聘执教北平燕京大学的英国人林迈可，曾于一九四四年春到达延安，他被请到王家坪与朱德共进午餐，同桌的还有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饭后他参观了朱德开垦的菜园——“延安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每个人都试图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听说毛泽东学会了纺线，而朱德是一位优秀的种菜者。叶将军告诉我，朱将军在延安种的莴苣是最好的，甚至比边区政府试验农场的还好。”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不仅仅是生存问题，还是关乎中国命运的政治问题。

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责任田。一九四二年六月，斯大林派飞机给毛泽东送来了一些物资和食品，毛泽东回赠的礼物是一小袋红辣椒，那是他自己开荒种的。美国记者去延安，问给他们端上来的可口的鲜奶是从哪里来的，朱德总司令说他自己养了几只奶羊。在抗日根据地里，彻夜响着纺车的嗡嗡声，因为冬天到来之前必须把厚实的棉衣缝制完毕。田地里，官兵像农民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对土地和庄稼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但集合的号声一响，他们拿起枪就去与日军作战，同样是打仗的行家里手。

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群特殊的人和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坚信，只要精神不垮，人世间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希望在前、光明在前、重任在前。

在艰苦的一九四二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用不怕牺牲和绝不屈服的精神，向全中国人民证明毛泽东所说的那片“光明”已在历史的最黑暗处闪烁。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在广泛的敌后战场上，只要共产党人存在，永远便是“剥开表皮露出红瓤”——日军可以在占领区换上他们的旗帜，但是他们改变不了脚下这片土地的颜色——这是中国的土地，永远有着中国的颜色。

第三十一章

杜利特尔轰炸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一个突发事件使得无论是中国的抗战还是太平洋战争的亚洲战场情形更加扑朔迷离：美军轰炸机飞临日本本土，向日本首都东京扔下了炸弹。

这条瞬间便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头条的新闻，看上去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从军事常识上讲，美军在太平洋上并没有一个能够用来袭击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即使动用美军最大的远程轰炸机，其续航能力也无法从夏威夷直抵日本本土。如果用舰载飞机执行轰炸任务，由于作战半径太小，美军的航母必须驶近日本海岸才行，不然轰炸机执行任务后就飞不回来了。那么，不要说日本人不可能让美军接近其本土，即使是美军强行闯入，由于处在日军陆上战机的作战半径内，美军的航母很快就会被蜂拥而至的日军攻击机炸成一堆烂铁——美国已经在太平洋上损失了不少舰船，剩下的航母可谓美国海军的作战支柱，美国人绝不会冒着失去整个太平洋战场的风险去丢下几颗泄愤的炸弹。但是，空袭真的发生了，炸弹确实落在了日本人头上。

那么，美军的轰炸机是从哪里来的，又飞回到了哪里呢？

有记者就此事提问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神秘地说这是来自“香格里拉”的空袭。

“香格里拉”源自英国作家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一处虚构的世外桃源。

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源于美国人超凡的想象力。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一直想对日本进行一次报复。罗斯福总统一再敦促军方尽早制订出轰炸日本本土的方案，以打击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嚣张气焰。就在美军将领们陷入空袭的技术困境时，一个名叫弗兰西斯·劳的海军上校提出了一个既可以空袭日本本土，又可以使航母尽量保持在日本陆上战机的作战半径之外的方案：海军的航母载上陆军的中远程轰炸机，尽可能地靠近日本海岸，待轰炸机从舰上起飞后，航空母舰迅速返航。而陆军的轰炸机完成任务后，可以降落在中国东南

沿海的某个仍在中国军队手中的机场上。美军的高级将领们一开始觉得，这个把海、陆军混在一起的大杂烩方案有点异想天开，但是犹豫了几天后，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决定冒一次险。

首先要做的是选一个领头人，鉴于这件事实在有点超越军事常规，因此要求这个人必须有超人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飞行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斗精神。很快，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身边的一名中校参谋被选中了。

参谋名叫詹姆斯·杜利特尔。

四十六岁的杜利特尔中校，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市一位木匠的儿子。由于身高不到一米七，在美国陆军学习飞行的时候，从机舱的一侧向外观察都很困难，可他还是迅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二十六岁那年，他驾驶着一架DH-4B型飞机，用了二十一个小时零十九分，从美国东海岸不间断地飞到西海岸，创下了一天之内飞越美国本土的记录。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学习了航空理论，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放弃任职壳牌公司的优厚待遇，重新加入陆军服役，目前正指挥着一支B-26中型轰炸机部队。

杜利特尔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训练队伍和改装飞机。面对必须在五百英尺的短距离内起飞、起飞跑道宽度不超过七十五英尺、载弹两千镑以及连续飞行两千英里的苛刻要求，他选择的机型是B-25。这是一种中型轰炸机，全长十六点四八米，翼展两点零六米，总重量为十三吨，时速五百零七公里，续航能力约为两千一百七十公里——如果精密地计算好油量，它将从航母上起飞直抵日本本土，扔下炸弹后勉强地飞回中国机场。

杜利特尔挑选了十六名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不但都飞过B-25，且个个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极佳。但是，当飞行员们抵达训练基地时，还是对杜利特尔改装后的B-25十分惊讶：不但机舱里装满了炸弹，连副油箱里也塞满了炸弹，而飞机腹部的炮塔被改装成了副油箱，机身上还装着很多防止在寒冷天气中结冰的除冰器。飞机上的防卫武器只剩下两挺机枪，其中一挺还是单管的，其余的全都被卸了下去。杜利特尔对十六名飞行员说，这将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很大可能是有去无还。参加行动完全自愿，不敢去的现在可以退出，没有人笑话你。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提出退出。飞行员们开始了类似“特技”表演式的训练：在一块平地上划出航母上起飞跑道的宽度和长度，然后驾驶着满载炸弹的轰炸机一

次次地起飞和降落。很快，十六人就都能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自由起降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在重巡洋舰“维森斯”号和轻巡洋舰“纳希维尔”号的护卫下，驶离美国的旧金山港前往太平洋。航行中，舰长米切尔将军打开写有“绝密”字样的信封，然后宣布：舰队驶向日本本土，轰炸机将在东京上空投弹。顿时，全舰欢声雷动：美国人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位于夏威夷的航空母舰“企业”号奉命护航。“企业”号上的水手们不知道“大黄蜂”号要去执行什么任务，看见它的甲板上那些只有陆军才有的体形臃肿的陆基轰炸机感到茫然不解：这种轰炸机既不能在航母上起飞，也不能在航母上降落。那么，陆军的轰炸机跑到大海上来干什么？唯一的可能是给陆上基地去送飞机，但太平洋上哪里还有美国陆军的基地？

负责此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是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哈尔西中将。哈尔西的打算是：在他的航母编队被日本人发现前悄然抵达预定海域，然后将陆军的轰炸机放出去，航母编队掉头就跑。但是，他很快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日本海军的电报，竟然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命令海空军立即迎战哈尔西——四月十八日，在东京以东海面警戒执勤的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发现了正向日本本土驶来的美国舰队。被日本人如此之早地发现，令哈尔西沮丧地面临着两难。如果舰队继续朝预定海域前进，势必遭到日本海军和从日本本土起飞的陆基攻击机的围攻。他的舰队现在代表着美国海军百分之五十的作战力量，他无权用美国海军的一半家当作赌注。而如果在距离预定海域还有一百五十海里的地方让杜利特尔的轰炸群起飞，虽然航母编队能够立即返回脱离危险，但这意味着非常严酷的现实：因为航程加长，飞行员们生还的可能性进一步变小；因为失去了突然性，需要被迫在白天实施轰炸，飞行员们飞抵日本本土的途中或是在东京上空，被防空火力击落的可能性剧增；更为危险的是，因为油料有限，他们飞回中国东南沿海机场的机会将十分渺茫。

哈尔西征求杜利特尔的意见后，下达了起飞命令。

哈尔西对杜利特尔说“祝你们好运”。

飞行员们在甲板上列队完毕。杜利特尔说：咱们要提前起飞了。现

在有替补队员，愿意出一百美元，替换不敢去的家伙。

飞行员们沉默了一下，然后乱七八糟地喊：“中校，咱们一块去揍那些无赖吧！”

八时十五分，“大黄蜂”号在太平洋的狂涛中起伏，杜利特尔驾驶的第一架载着两吨炸弹的B-25，在舰首被海浪托起的瞬间摇摇晃晃地起飞了。九时二十分，十六架轰炸机全部升空，编队朝着日本本土方向飞去。包括杜利特尔在内，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许丢下炸弹的同时他们将与这个世界永别。

这些美国军人知道，太平洋上的麦克阿瑟已经把他的座机改名为“巴丹”号，为的是记住美国陆军弟兄们遭受的苦难。十天前，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一万两千多名美国陆军和六万五千多名菲律宾人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投降，然后统统被日本人押解到一百一十公里之外的奥德内尔集中营。在行进途中，战俘们受到非人的虐待。炎炎烈日，道路泥泞，蚊虫飞舞，疾病流行。走得慢的、掉队的、跌倒的，甚至因听不懂日语回应缓慢的，都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死或用战刀砍下了脑袋。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密林小路上布满了数万具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尸体。

只要能让那些侥幸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存活下来的弟兄尽早听到美国炸弹落在东京的消息，此次行动就值得去干！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美国特混舰队上，他无法想象竟然有美国陆军的轰炸机不但从航母上起飞了且正向日本本土飞来。当杜利特尔的机群低空飞抵日本海岸时，海上的日本渔民甚至向他们招手致意——渔民们错把美国陆军老式徽章上的红球看成了日军飞机的标志。就在杜利特尔的机群快要抵达东京上空时，迎头飞来一架日本飞机——事后查明，这居然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座机，东条英机正在视察航空学校的途中——双方一掠而过，一枪未发。不过，东条首相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迎面飞来的机群样子怪怪的，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清楚地看到了飞行员的面孔：这是美军的飞机！

但是，已经晚了。

杜利特尔的机群飞到了东京上空，一枚枚五百磅的炸弹呼啸着落下，那些炸弹上写着：“我们不想燃烧世界，只想燃烧东京。”

东京的发电站、造船厂、钢铁厂等目标一片硝烟和火光。

日本方面基于常识，认为敌方除了使用续航能力很小的舰载飞机实施空袭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办法威胁日本本土，因此毫无准备。——“敌B-25轰炸机从十八日下午一时前后开始，在五十分钟之内经房总方向相继飞来，轰炸了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之后，就像过路妖魔似的飞走了。警报器在炸弹开始落下后才发出报警，起飞的截击战斗机正在提升高度的时候，超低空的敌机已从容不迫地轰炸了目标。”

这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空袭。

被反复告知自己的国家是“一片美丽幽静的开满鲜花的土地”的日本民众惊慌万分，日本军方也十分尴尬，认为这是美国对大日本帝国的一次巨大的羞辱。虽然轰炸造成的损失不算大，但对日本军心民心的打击不可估量，因为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做到想做的任何事情，敢于挑战美国尊严的日本人不但会被轰炸，而且最终会输掉整个战争。

为了安抚民心，日军大本营马上发表公告，声称美国空袭日本“成效甚微”，证据之一是指挥这次行动的美军指挥官杜利特尔（Doolittle）的名字，与英文“成效甚微”（do little）的发音完全相同。

杜利特尔中校从没想到过他的名字如此不合时宜。

杜利特尔率领的十六架B-25轰炸机机组，加上领航员、机械师和投弹手等，共有八十人。执行完轰炸任务后，一架飞机迫降到苏联的海参崴，机上的五名机组人员被苏联政府扣留，一年后释放；另一架飞机上一人跳伞时牺牲，二人失踪，八人随机迫降后被日军俘虏，其中三人被日军枪决，一人死于狱中，四人战后生还。其余的六十四名机组人员，驾驶飞机勉强飞到了中国浙江衢州机场上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安全降落——为了保密，美国人预定十九日午夜十二时左右通知中国方面，让衢州机场打开通讯系统和跑道灯。但是，杜利特尔的机群十点钟就抵达中国浙江省上空了，此时中国军队掌控的衢州机场勤务人员并不知道要有美国飞机在这里降落——筋疲力尽的美军飞行员在陌生的空域转来转去，直到油料彻底耗尽后纷纷掉了下来，飞行员们在浙江西部的大山上空跳伞逃生。

杜利特尔跳伞后，只找到了四名还活着的同伴，他心情凄凉地对他

们说，十六架飞机全毁了，多数飞行员不知下落，他很可能要被遣送回国，然后送到以军法严酷闻名的利文沃思军营去服苦役。

但是，杜利特尔中校回国后，得到的是一枚国会勋章和被破格提升为准将的任命。不久，他出任驻英国第八航空队司令，军衔升为中将。

“杜利特尔”绝不是“成效甚微”。

杜利特尔的此次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成为二战历史进程中阶段转折的一个标志。

一九四二年五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处于艰苦的拉锯阶段。

美国轰炸东京不久后，美日两国航母编队在南太平洋上进行了一场海空战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大战，双方的水面舰只一炮未发，只有各自的舰载机往来拼杀。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向的一片海域，因珊瑚结构发达被称为“珊瑚海”，这里是日军攻占澳大利亚的必经之路。尽管日本海军和陆军对是否攻占澳大利亚分歧很大，但在切断美军与澳大利亚的交通联络上意见一致。东京遭到美军空袭使计划中的珊瑚海作战被提到日程上，特别是在日军攻占南太平洋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后，夺取美军在新几内亚岛上的莫尔兹比港军事基地以及孤立澳大利亚成为当务之急。日本方面派出由日本海军井上成美中将指挥的第四舰队为主战舰队，另派高木武雄海军中将率领第五航母战队和第五巡洋舰战队前往助战，参战部队共有航空母舰三艘，轻、重巡洋舰十三艘，舰载机一百四十六架^美国派出了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舰和十三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舰载机一百四十三架，以对日本海军实施拦截和打击。五月四日，美国“约克城”号航母上的舰载机对日本海军舰队发动袭击，击沉驱逐舰一艘。七日，日本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上的舰载机，击沉了美国的油船和驱逐舰各一艘，日本的轻型航母“祥凤”号被击沉。八日上午，双方再次交战，美国航母“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约克城”号被击伤，日军航母“翔鹤”号被击伤。此战，美军舰船的损失较日军大，特别是美国水兵珍爱的“列克星敦”号沉入了大海，“约克城”号的甲板也被重磅炸弹打穿引起大火。不过，美军在舰载机格斗上占据了上风，以损失约七十架战机的代价击落了日军战机八十多架。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的首次受挫，令其夺取莫尔兹比港的计划被迫推迟。

美日海空大战进行的同时，苏军与德军在顿河与北顿涅茨河之间的

哈尔科夫附近爆发了大战。苏联西南方面军奉命向德军发起攻击，苏军突破了德军防线，向哈尔科夫以北推进了十八至二十五公里，向南推进了二十五至五十公里。但是，苏军没能及时投入快速兵团扩大战果，参战兵团筋疲力尽后无力继续向前推进。而德军在苏军迟疑之际建立起强大的突击集团，总兵力比当面苏军第九集团军多了一半，炮兵多了一倍，坦克多了近六倍。在德军随后发动的反击中，苏军被德军优势兵力包围，后路被切断，最后突围而出的苏军仅两万余人。哈尔科夫战役，苏军的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遭到重大损失，丧失了北顿涅茨河的重要战役登陆场，苏德战场上的僵持局面依旧在持续。

在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自北方进行了中条山会战，长江流域进行了两次长沙会战后，中日之间再也没有大的交战，战场处于沉闷的对峙僵持中。这种僵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由于人力和物力的局限，只能尽量保持中国正面战场的现状；二是担任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自战争爆发以来，除了为配合长沙作战发动对宜昌的围攻外，再也没有发动过任何一次主动攻势，所有大的作战都是日军发动攻势后的被动应对，这是国民政府所秉承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所致。

但是，尽管轰炸东京的美军飞机在中国大陆上摔得支离破碎，但无疑还是给沉闷的中国战场带来了一丝兴奋。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从这次行动中意识到：美军在太平洋上进行的对日作战，由于地理关系，绝对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的支撑。美军作战飞机必须依靠中国机场，这个现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战场已经成为盟军在亚洲战场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中国和美国结成的军事同盟关系，在美国炸弹落在东京之后进一步密切起来。

中国空军在美国的援助下逐渐恢复战力。一九四二年初，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已有七个大队，还有两个大队和一个中队在训练中，共有各种飞机三百六十四架。从三月开始，中国空军作战人员在美国或印度受训后，接收国民政府从美国购买的新型战机并陆续飞抵国内战场。一九四二年，中国一共接收了美国制造的B-29轰炸机十九架、P-40驱逐机二十七架、P-43驱逐机四十一架，以及P-66驱逐机八十二架。中国战场上的作战飞机，平均为二百七十架，最多的时候曾达到三百七十架。美国人陈纳德组建的志愿航空队，也被美军纳入现役，改称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这使得中、美两国空军能够并肩作战。尽管中国战机数量上仍远远少于日军，但已能够与日军进行相当规模的空战。特别是，中、美空军曾两次飞赴越南轰炸日军机场，开启了从中国大陆起飞直接参与太

平洋作战的先例。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损耗，日本的空中力量不断被削弱，而中、美空军联合开辟的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不但使中国有了一条从西方获得战略物资的空战通道，也使得中国空军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中国人，对美、英等国的历史敌意已经浸透在民族血液里。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充满了刻骨的不信任。英国人以前向中国出售鸦片，把近代中国弄得积贫积弱，而在中国与日本作战时，竟然和日本人站在一起封闭滇缅公路，这让中国人感到愤怒已极。而美国人在日本入侵中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在向日本出售武器，日军在上海、武汉和重庆等地扔下的炸弹，弹片上的“USA”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噩梦。因此，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当日军在南太平洋把美军和英军打得狼狈不堪时，普通的中国人要不就是漠不关心，要不就是聚集在一起亢奋地议论，这使得在华的外国人明显地感觉出，中国人为如此糟糕的事情终于落在了曾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洋人身上颇有点幸灾乐祸。美国记者在长途汽车上遇到两位国民党军的空军军官——“这两位空军军官似乎是在跑买卖，因为他们带着几箱女士们用的衣物，这些衣物都是上海制造的，上面贴有日本人的印花税。”美国记者听见中国空军军官在聊天中谈到了美国人，说美国人根本不能打仗，世界上能打仗的只有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美国人只有金钱没有勇气，只会跳舞、喝酒和赚钱，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享乐。中国空军军官还谈到了美国人在菲律宾的战败，他们分析的原因是：日本人把当地的奶牛都炸死了，而美国大兵只要有一天吃不上冰淇淋就拒绝作战。至于为什么美国不派军队到中国参加抗战，中国空军军官认为：“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士兵留在家里，而雇用我们——勇敢的中国人——去替他们打仗和受罪。”

在重庆，生活的窘迫、日军的轰炸，还有难民——最近又来了南洋、香港和缅甸的难民——的大量涌入困扰着这座城市里的市民。重庆市民对美国人很不客气，出租给他们的房屋不但租金很高而且必须预付，房主说他们不希望租房子的美国人在尚未付清房租的情况下被炸死。这种情况到了一九四二年的某一天，突然得到了改变。——那天，重庆市民目睹了美国空军在重庆上空与日军的作战。机头上画着露着牙

齿的大鲨鱼图案的美军飞机，在把日军战机击落和赶跑后，还在城市上空表演似的上下翻飞了好几分钟，以接受站满屋顶观战的重庆市民的狂热欢呼。于是，重庆市民开始对美国人尊重起来。一九四二年的重庆，受到中国富人追捧的美国汽车成为纷乱市景的一部分：

在那些没有被新建房屋挡住的断墙残壁上，涂满了五光十色的广告，内容有香烟、影剧、占卜、当铺、化妆品和专治花柳病的特效药等。在这些广告的掩盖下，隐约可见抗战初期的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战士为国捐躯，国民毁家纾难"等等。新的娱乐场所不断开放，电影院、大鼓书院、茶园、咖啡馆、冷饮店、旱冰场等等。市区也出现了更多的乞丐，因为官员们在城郊修建了许多私人防空洞，原来在那里栖身的乞丐无处容身，只得流浪到市区中来。但总的来说，拥挤的街道给人一种富裕而又无忧无虑的印象。暴发户和官僚垄断者们坐着崭新的美国轿车——其中有些是刚从仰光进口的美国最新型号的——身穿西服和上海式旗袍，到处驱车游乐。

国民政府与美国人的关系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政府的大员们认为，在中国遭受日本入侵后，列强一直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列强始终冷眼旁观。中国的抗战迄今为止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让贫弱的中国为抗击日本的侵略付出了惨重代价。鉴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蒋介石对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支援存有巨大戒心。他指望的是美国，但美国人的绥靖政策令他愤怒却又无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理应立即改变对华态度，全力支援中国抗战。尽管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租借法案》，可是在国民政府看来，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远远不够。以美国向反法西斯同盟国输出的飞机数量为例：从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国得到的美国飞机分配总数为三百九十二架，其中二百六十六架为战斗机，其余均是教练机，且这些飞机还有一部分被扣留在印度没能运往中国。相比之下，其他盟国接受的美国飞机数量是：英国两千二百零三架、苏联一千二百零二架、加拿大一千零二十七架，连地处非洲大陆的埃及都得到了八百五十七架。这使得美、英、苏三国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间维持在一线作战的飞机达到一万架以上，甚至可以一次出动一千架战机空袭德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那么，饱受日军战机轰炸的中国难道不是盟军的战场？中国难道不是同盟国中的重要一员？

这一年六月的一天，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决定把原先配备

给中国、现在停在印度的重型轰炸机和其他运输机，统统调往埃及。也就是说，不但飞机不给了，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其他物资也会相应减少。蒋介石的心情极其恶劣：隆美尔冲到了亚历山大港，英国人在埃及的处境危险了，可为什么不从其本土数以千计的飞机中调出一些应付地中海战局，却非要减少中国屈指可数的飞机配额呢？

……蒋介石要求美国立即派遣三个师到缅甸前线，向他提供五百架飞机及零配件，自八月份起美国保持每月经驼峰航线向他提供五千吨物资。这一最后通牒连同中国退出同盟国的威吓一起送交了美国方面。在一九四二年这个令人悲哀的夏天，美国把美军作战供给中能够抽出来的物资都送给了在开罗设防的英国人和在斯大林格勒鏖战的苏联人。空运三个美国师是不可能的。飞机生产还未走上正轨，适合于在驼峰可怕的高度飞行的运输机尚未设计出来，破旧不堪的C-47运输机每月勉勉强强向中国运送一百吨的物资。美国政府迫不得已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精干的特使从华盛顿飞到中国，对蒋介石加以安抚，但美国政府却没有能向中国战区提供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中印缅战区的优先权排列在加勒比地区之后。

除了飞机以外的其他物资也是如此。美国提供给苏联的军事援助，在三月份达到一千零二十五万吨，总价值十八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每月只有几千吨，其中还要被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拿走一大半。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美国军火分配委员会正在考虑，从七月份起，将每月的援华物资从三千五百吨降至四百吨以下，美国军方甚至打算停止对中国的武器援助，理由是很多分配给中国战区的物资堆积在印度的仓库里无法运出——美国人由此认为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军援真正用在对日作战上。

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政府发出不满的信号：同盟国到底想不想维持中国战区？美国人是不是想与日本单独媾和而出卖中国？或者，美国人是不是想逼迫中国向日本妥协屈服？

美国再次将总统远东事务助理柯里派往中国以消除误会。蒋介石强烈地抱怨同盟国将中国排挤在太平洋军事会议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外，而且中国从《租借法案》所得到的物资远少于其他盟国。柯里终于说出了美国人的理由：美国对运到中国来的援助物资所产生的效能感到失望，“中国的浪费、低效率和贪渎之程度惊人”，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中国能对赢得战争作出重要贡献，他们认为蒋介石的政府“只想从美国取得足够的作战物资来保住自己的权位”，或者是用来对付共产党武装。关于

最后一点，确是中国抗战战场上无法回避的事实：蒋介石数量惊人的中央军被部署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用以围困共产党中枢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面对美国人的指责，蒋介石说他的军队之所以驻扎西北，是为了防止日本人进攻西安继而威胁重庆；说这样的谣言应该是共产党方面散布的，因为只有共产党才希望中央军离开西北。他对柯里信誓旦旦地表示："美方所传中国将领囤积军备、保全实力等种种传言，深愿阁下能亲自调查，证其虚实。予敢断言，此皆谰言，为阴谋家故意造作流播以破坏中国者。"柯里并没有去中国的西北调查，因为事实人人皆知——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胡宗南那些装备着美式精良武器的部队，长期驻扎在共产党中枢延安的四周，除了初期在淞沪战场上以及之后在潼关战场上曾与日军一战外，无论中国的其他地域发生何等规模何等程度的战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都不曾被调动过。

柯里在重庆十二天，回国后向美国政府写出四十三页的调查报告。他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根源在于"两国先前皆存在对另一方的幻觉"：中国幻想美国认识到中国战场之于整个亚洲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从而倾尽全力支援中国乃至直接派兵参战；而美国幻想在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及战略物资后，蒋介石的政府和军队能够支撑起拖住日军主力乃至不断地消耗、歼灭他们的重任。至于对蒋介石本人，柯里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忠告是："和委员长打交道时，应该非常小心，不要伤害他的骄傲……中国的老派作风于他真的很重要。我们在远东若要建议任何动作，先和他咨商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另外，柯里格外提到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认为这是他在重庆期间"必须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假如说天底下有哪两个人最不宜在一起工作，恐怕非蒋介石和史迪威莫属。其实，两个人相似之处不少。从体格上来讲，都是瘦子，都很机灵，都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从脾气上来讲，都暴躁易怒，气量狭窄。两人都信服高尚但很累人的行为准则，不能容忍偏差，也不太向现实退让。换句话说，这是要求两个意识形态不能兼容的大顽固派一起合作。"柯里最终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该尽早地撤换史迪威。

蒋介石认为，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处境如同在与一帮恶霸相处：

近日与柯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轻视我中华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如其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之。美国所谓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实则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为。不过期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

无论如何，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美两国还是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在这份协定中，关于美国对华援助，只有“美国应以大量军用品供给中国”这样一句空泛的表述，以及附件中规定的美国将提供中国空、海军换装与培训战斗人员，并逐渐增加从印度运往中国的物资空运吨位。而协定正文的八条条款，都是美国人开列的各种条件和限制。

不过，当重庆街头出现了美军之后，中美关系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改善——或许这是美国陆军介入中国抗战的一个先兆。美军军官和士兵对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奇，特别是中国的食物。军医曾警告他们在中国的饭馆里吃东西很可能致命，但是在重庆，美军军官和士兵吃了饭馆里的食物，不但没有死，反而认为这些煮熟的落着苍蝇的中国食物还不错。他们对中国的观感是：

在我们到这里之前，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被封锁的中国人如何可怜，如何穷得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发现是怎么一回事呢？噢，这里的商店里首饰、打字机、剃刀、冰箱、丝袜等等应有尽有，这些东西现在你在美国都买不到。你只要有现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求得到那么多枪？为什么他们不把已经有的那些用起来？为什么他们不自己造枪？看看这城里到处都是逛来逛去的便衣，他们佩戴着最好的德国造和捷克造的左轮手枪……你再看看商店里出售的黄铜水烟筒，这些水烟筒真是手艺高超的金属制品，任何能做出这样精巧活计的家伙都能制造步枪，他们为什么不制造枪呢？

美援虽然依旧不多但确实加强了。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美国需要中国大陆为美军提供作战基地，没有这块基地，美军要彻底把东京炸烂或者将来攻占日本本土，就连出发的地方都没有了。

“杜利特尔轰炸”使得日本人彻底看清了美国利用中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企图。于是，日军很快就在中国的浙江省发动了一场攻势作战，作战目标直接是可以为美军提供飞机起降的机场。

这场作战史称“浙赣会战”。

侵华日军原本策划的作战目标，是对南京以南地区实施“清剿”，作战开始时间定在四月二十五日。当一切准备完毕的时候——东京受到轰炸的第三天——大本营突然命令中止原定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畑俊六向参谋本部提出请求：作战准备完毕，令其中止困难，希望能按照计划实施。但是，此请求遭到参谋总长杉山元断然拒绝：“根据全面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十三军的十九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的作战。”

二十四日，东京被轰炸后的第六天，东京大本营派出参谋本部第二课对华作战负责人高山信武，携带着大本营拟订的浙江作战计划抵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京。这份作战计划的基本内容是：以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三军主力和从华北方面军以及第十一军抽调的部分部队，组成大约四十个步兵大队的骨干作战集团，击溃绍兴、诸暨、金华、兰溪方面以及杭州、富阳方面的中国军队，占领金华、玉山和丽水，彻底破坏衢州、丽水和玉山的飞行基地。如有必要，进一步向西攻克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上饶。——“攻克上述地区后，在必要的期间内（约定约一个月），予以固守。如形势允许，可将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及主要交通线彻底破坏，然后再恢复原有态势。”

派遣军的将领们对大本营如此匆忙且没有回旋余地的指定作战感到十分突兀，而派来传达作战计划的参谋不仅是个中佐，且还咄咄逼人——畑俊六认为，这是东京大本营对他的侮辱：

参谋本部高山中佐为研究浙江省敌飞行基地歼灭作战来宁，并带来颇为详细的方案，诚属对我等之轻侮。此次中央对此项作战之所以卖劲，是由于总长平时一向向天皇夸耀国土防卫万无一失，而如今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得不设法采取措施的缘故，实在是件麻烦事情。

尽管认为“是件麻烦事情”，畑俊六还是迅速根据大本营的意图制订了作战计划，但他的计划与大本营的不太一样。大本营的意图很简单，就是把位于中国浙江省内的几个机场完全摧毁，以杜绝美军利用这些机场威胁日本本土的行为。而畑俊六认为，兴师动众地出击，仅为了这一简单的目的，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要打就打个大仗——畑俊六和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都认为，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实在有些低级：击溃了中国军队，破坏了机场，“然后再恢复原有态势”，难道中国人和美国人就不会修复那些机场吗？畑俊六最后决定：增加兵力以扩大作战规模，破坏机场是次要的或者是附带的，主要目的是歼灭中国第三战区的有生力量。第十三军从杭州方向动用五十八个步兵大队，向中国第三战区发起攻击；南昌方向的第十一军出动二十七个步兵大队，同时对中国第三战区实施东西对攻。日军准备投入多达八十多个步兵大队，共约十四万兵力，这比大本营规定的要多出一倍。而且，作战区域不仅限于浙江省，

还要包括江西省，因此作战名称不能叫作大本营所称的“浙江作战”，必须改名为“浙赣作战”。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初，曾从侵华日军中调走了大量部队，使得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能力明显下降，这让包括畑俊六在内的侵华日军将领耿耿于怀。但是，由于诱逼蒋介石妥协的一系列谋略相继失败，特别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遭受很大的损失，东京大本营终于意识到必须在中国战场上保持相当的兵力才行。因此，日军在完成了南进第一阶段任务后，从南方军抽调了第三飞行集团加强给侵华日军，并为中国战场组建了七个新的师团，即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八、第七十和第七十一师团。尽管这些新组建的师团，是以原来在中国战场上的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再加上从国内征来的三个新兵大队组成，每个师团为两个旅团编制，旅团下属部队仅有四个独立步兵大队，没有联队一级的作战单位，其战斗力与老牌师团不能同日而语，但终究是兵力得到了加强。

四月三十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六二一号”，作战指示还是强调了对机场的破坏，但同时也默许了畑俊六的主张：

一、预定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主要航空基地，主要有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敌机场群及其各种设施，对于其他机场群，则根据我空军部队等情况，及时进行控制或破坏。

二、攻占上述丽水、衙州、玉山附近的敌机场群后，在一定时期予以确保。在形势不允许继续确保时，可将机场及其他各种军事设施和主要交通线等予以彻底破坏后，返回原驻地。

畑俊六决定动用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联合出击，其作战部队庞大到令大本营十分吃惊：第十三军指挥的第十五、第二十二、第三十二、第七十和第一一六师团，再加上河野毅、小薗江邦雄和原田次郎指挥的三个混成旅团，还有奈良正彦指挥的由第四十一师团的两个步兵大队组成的支队以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铁道部队、第一飞行团等部队，集结于奉化、绍兴、萧山、余杭一线，进攻方向是浙赣铁路的东段；第十一军指挥的第三、第三十四师团，再加上由竹原三郎、今井龟次郎、平野仪一、井手笃太郎指挥的四个支队，还有独立工兵、独立飞行等部队，集结于南昌附近赣江的右岸，进攻方向是浙赣铁路的西段。

五月十一日，日军第十三军发布“第六十二号”作战命令：

一、我军决定于五月×日对正面之敌开始发起进攻，首先为了捕捉并歼灭安华街、义乌和长乐附近之敌，约在×＋三日傍晚向诸暨、嵊县西南方地区前进。

二、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必须在五月×＋一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向建德、诸暨南方地区和陈蔡市北方地区前进。

三、第二十二师团必须于五月×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主要通过沿曹娥江地区向长乐北方地区前进。

四、第七十师团必须于五月×-—日日落后开始行动，从奉化方面向新昌南方地区前进。

五、第三十二师团必须于五月×＋一日以后，以部分兵力通过富春江右岸地区，主力则通过左岸地区，基本上沿第一一六师团的后方前进。

第二天，日军第十三军明确，“×”日，为五月十五日。

日军第十三军各师团遵照命令，截至十三日，第七十师团在宁波、奉化，第二十二师团在上虞、绍兴，河野旅团在绍兴，第十五师团在萧山，第十六师团在余杭，从华北方面军调来的第三十二师团在杭州——攻击部队在余杭至奉化间约一百五十公里的正面全部展开，准备发起攻势作战。

在沉寂已久的抗战正面战场上，中国第三战区部队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场大战。

顾祝同指挥的中国的第三战区，辖苏南、皖南、浙东和浙闽，处于长江南岸、浙闽沿海的重要战略区域。但是，自一九三七年冬京沪失守后，中日两军的交战重点转向华中，第三战区实际上已处于日军的后方，几年之内与日军没有大的交锋，顾祝同部的战斗力已显疲软。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利用东南沿海口岸大肆走私中饱私囊，导致军心涣散，戒备松懈。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指挥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在第三战区辖区内曾发动过一次浙东战役，结果除了个别部队稍事抵抗外，其他守军无不望风而逃，使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宁波、台州、温州、福州等口岸。虽然后来日军从温州等地撤退，只继续占据着宁波和福州，但中国东南海岸基本被日军封

锁，大量的战略物资遭到野蛮掠夺。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扣押了第一〇〇军军长陈琪，枪决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宁绍行政专员邢震南，令东南沿海的走私之风稍有收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东南沿海无论对于中国军队还是美军，其战略位置凸现重要。国民政府着眼于长远，也为防止日军夺取浙赣铁路和沿海口岸，除了严厉整饬第三战区的军纪外，还特地增调部队加强了第三战区的军力。

在日军发动浙赣作战前，第三战区的部署概要如下：

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指挥配属的何绍周的第八十八军，担任钱塘江南岸诸暨、萧山、绍兴等地的警备，重点面向杭州的日军；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驻防浙东武义、永康、丽水一带，针对浙东和浙南的日军。

浙江保安处处长兼金兰警备司令宣铁吾，指挥浙江保安团队，负责曹娥江南岸、宁波、温州等处的江防和海防。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和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之第七十九师、刘广济的第一〇〇军之第六十三师，控制在金华、兰溪和富春江南岸一带。

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和陶广的第二十八军，警备苏南宁芜铁路和浙西地区。

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指挥刘雨卿的第二十一军和范子英的第五十军，担任皖南和赣东长江南岸防务。

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之第十六、第六十七师，驻守在衢州和龙游地区。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控制在龙游以南至遂昌一带。

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控制在浙赣交界处的江山、玉山一带。

刘广济的第一〇〇军的两个师和预备第五师，担任抚河东岸和临川的防务，面向驻扎在南昌的日军。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江西上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三战区的总任务是：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赣间的诸机场，诱使日军在该战区投入主力，以减轻确保四川安全的湖南、陕西等省的军事压力。

总的来说，蒋介石并没有让第三战区积极进攻的意图。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的战略是层层抵抗，节节退守。他已经成功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至少从目前来讲，他并没有让中国军队求胜的计划。蒋介石对胜利的定义，就是在不妥协不屈服的前提下生存下去。这一策略建立在美国必定要被卷入战争的判断上。美国一旦被卷入战争，牵制着百万日军的中国军队只要在持久力上与日军消耗时间，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卷入战争骤然成真，蒋介石更愿坐观事态的发展，之前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极少主动向日军发起攻势作战，现在就更没有必要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第三战区的作战能力令人担忧。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深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获悉轰炸东京的美军轰炸机将在浙江降落，他立即命令各部队全力搜寻跳伞的美军飞行员。紧接着，第三战区发现当面日军开始了频繁调动。顾祝同在命令各部队做好作战准备的同时，迅速制订出一个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方案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先把日军引进来，然后在金华地区实施侧击与合围。

蒋介石致电顾祝同，认为他的部署存在“颇多缺点”：

……对于阵地内守备兵力太多，而据点工事以外策应活用之兵力太少，殊为不安，总须阵地工事之内兵力节省至最少限度，尽量抽出兵力控制于阵地附近之相当距离处，设法隐蔽，以备相机策应阵地战之出击敌军侧背之用，若不能抽出每守备部队三分二之兵力，亦必须抽二分一之兵力，控制于其外翼，以备策应。如此万一阵地守兵薄弱，被敌攻陷几处已无甚紧要，惟衢州阵地守备队，须特别强固，预定八十六军之两师不必再抽应，衢州预备决战之总预备队甚多，不必再由其各部抽调策应部队也。务希将第四十九第二十六第七十四之三个军，皆调集于衢州附近以备决战，总须敌军到衢州兵力有三个师团以上之预计，故我军非有精强之三个军，不足以应战也。

军事委员会不同意第三战区将中央军主力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置于金华地区与日军决战，认

为在衢州以东的所有部队须逐次抵抗，消耗、迟滞日军，将日军引入位于千里岗与仙霞岭之间的衢州地区后，才能动用精锐部队与之决战。

急，顾长官：务将王铁汉、王耀武、丁治磐军三个军皆集结于衢县附近，切勿控置于金兰一带，被敌逐次消耗，我军方针决在衢县决战.不得变更此作战方针。希即照此部署。勿延。中正手启。

第三战区重新制订了保卫衢州的作战方案。方案具体分配了各集团军的作战地域和任务，将整个会战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逐次消耗日军，诱敌深入阶段；二是在金华、兰溪附近严重打击日军阶段；三是在衢州的决战阶段；四是追击作战阶段。方案制订的会战方针是：

战区为击灭进犯敌人，确保衢州，以利尔后总反攻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长乐、安华、桐庐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极力迟滞、消耗敌人，坚守金、兰及切断敌后，猛烈围击敌寇，严重打击敌人。尔后再诱致敌人于衢州要点前，配合伏击、截击、尾击部队，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敌如逃窜时，应勇猛追击，压迫敌于金华江南岸而聚歼之，一举恢复钱（钱塘江）南失地。

顾祝同所制订的具体战法，完全照搬了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的整个流程。中国军队的统帅部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长沙会战的战法是被实战成功检验过的，日本人面对这种战法毫无办法，因此只要把衢州城复制成长沙城就可以了。

但是，衢州不是长沙，顾祝同也不是薛岳。

五月十四日，日军第十三军三路并行向西推进，目标直指金华。

左翼部队由内田孝行指挥的第七十师团和大城户三治指挥的第二十二师团组成。第七十师团十四日夜从奉化出发，沿着大堰河谷推进，突破当面中国守军的抵抗，十六日下午在大堰镇附近接受了加强给该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然后翻越天台山，于十七日抵达大市聚；第二十二师团十五日清晨出发，沿着曹娥江与第七十师团并行推进。两个师团的日军企图在嵊县和新昌地区围歼中国军队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暂编第九军稍作抵抗后快速撤退，使得日军的围歼态势没能形成。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继续西进，在长乐附近突破暂编第九军的阵地后，十九日推进到金华以东的东阳附近。日军第七十师团则在第二十二师团的外侧，力图寻

找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并切断其退路。但是，因为进入了险峻的山区，下雨路滑，道路崎岖，驮马和步兵行动迟缓，虽然中国军队的阻击并不猛烈，第二十二师团仍然没能捕捉到暂编第九军，反而被陌生的大山折磨得痛苦不堪——“在这一段时间里，与其说是和敌人战斗，还莫如说是同地形战斗。”

中路部队由酒井直次指挥的第十五师团、小薗江邦雄指挥的第二十六旅团以及河野毅指挥的第十七旅团组成，十五日夜分别从萧山和绍兴出发，沿途没有遭遇大的阻击，于十七日晚进入诸暨附近。接着，第十五师团突破安华街附近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军的阻击，十九日推进到义乌附近。河野旅团也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暂编第二十二师的阻击，进入到东阳西南地区。

右翼部队由武内俊二郎指挥的第一一六师团、井出铁藏指挥的第十二师团以及原田次郎指挥的第四十旅团组成，五月十六日起从富阳地区出动，沿着富春江右岸推进。两个师团在天目山崇山峻岭中的狭窄河谷内挤成一团，仅有的一条小路上车马只能单线行进，导致首尾衔接长达数公里。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第二十八军的不断侧击，直到十八日晚才推进到桐庐附近。

在中国南方的梅雨季节中被淋得浑身湿透的日军官兵突然得知了个令他们十分吃惊的消息：第十三军司令部先遣队乘坐的大型舟艇，在距离义桥不远的浦阳江下游触雷沉没了。——中国海军虽然没有水面舰艇能与日军对阵，但在江南水网河道中大量布设水雷的工作从未停止过。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成员被当场炸死十一人，其余的人不同程度地负伤——大战尚未开始，泽田茂的司令部就残缺了。

泽田茂本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没有跟随先遣队的参谋们起出发，而是滞留在杭州接待大本营派来的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泽田茂对田边盛武的话感到有些意外：“在此次作战中，中央最为期待的物资是萤石和铁路器材。”

萤石，一种可提炼冶金助熔剂的矿石。

此次作战地区内有远东储量最丰富、品质最优良的萤石矿。

至于铁路器材，只有全面控制了浙赣铁路全线才能获取。

更令泽田茂感到意外的是，大本营的作战初衷是破坏机场，而田边

盛武次长对此却一个字也没提。

泽田茂很难把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与一种矿石联系在一起，但既然作战已经发动他还是必须赶往前线。二十一日，他从杭州赶到了诸暨，在那里看到了因触雷死亡的军司令部人员名单，心情顿时黯然——“这是由于我急于前进而带来的后果。”令泽田茂心情不佳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沿海方向传来的消息：为配合金华方向的攻势，日本海军出动了二十多艘舰船和百余名陆战队队员，在汪精卫的伪军部队协助下，于闽江口的川石岛和平潭海面实施登陆作战，可非但没有成功，还死伤了不少陆战队队员，看来别指望海军能帮上什么忙了。

抵达诸暨前线的泽田茂对于各师团的进展很不满意，认为河野旅团的推进“缺乏生气”，第一一六师团的前进“仍然迟缓”。十八日黄昏时分，泽田茂调整部署，旨在尽快对金华形成包围：

一、第十五、第七十师团及河野旅团迅速进入金华东方地区。

二、第二十二师团进至武义东北方，切断从南方逃往金华附近的敌军退路。

三、第一一六师团尽可能多的兵力迅速进至建德西方。

对于第一一六师团的缓慢，泽田茂的幕僚们也不满意。军参谋长唐川安夫一再建议，让第一一六师团靠边，把拥挤不堪的富春江公路让给第三十二师团，以便迅速突破建德附近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对于这个建议，泽田茂有点犹豫。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但第一一六师团无路可走，等于把他们丢给了中国军队于不顾，而且会严重损害师团长武内俊二郎的个人名誉及师团全体官兵的士气。况且，即使让第三十二师团上去，快速推进也非易事。最后决定，还是让第三十二师团继续跟在第一一六师团的后面，同时督促第一一六师团加紧进攻。

在富春江边阻击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中国军队是预备第五师，师长曾戛初。

浙赣会战开始前，预备第五师奉命在富春江北岸构筑工事，阵地的一边与陶广的第二十八军阵地衔接，另一边就是富春江江面。日军开始进攻后，这一线的其他中国军队逐渐后撤，预备第五师被留下来单独作战，任务是阻击日军并掩护附近各县人力物力、仓库粮弹、伤病官兵撤离。第三战区给曾戛初师长的命令是：死守阵地三天。

预备第五师的兵力部署是：师工兵营配属给十四团，防守建德城和外围防线；十团阵地在乌龙山和通城大道上；十五团阵地在大坞，十团为预备队。阵地刚刚部署完毕，前沿的地雷就被进攻的日军踏响了。日军在战机和火炮的支援下，向中国守军阵地猛攻不止。这时顾祝同发来电报，重申预备第五师必须死守三天，并说现在战区司令长官部在转移中，三天之内无法联络，预备第五师须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觉作战。曾戛初师长颁布了擅自撤退杀无赦的军令后，日军的攻击又开始了。日军采取的战法是坦克开路、飞机掩护、步兵跟进，一波被击退第二波接着冲上来，轮番往复，整日未停，预备第五师各团阵地都发生了惨烈战斗。十四团团长吴幼元对这场江边阻击战记忆犹新：

敌机和大炮疯狂地向我阵地倾泻炸弹、炮弹，阵地成为一片焦土，被炸倒的树木枝丫到处都是，官兵伤亡增多。九时许，一个中队的敌人冲到山腰边阵地，情况十分紧急，我命团附指挥战斗，自己亲率特务排和预备一营的一个连从侧面出击，与二营配合，形成钳形攻势，将山腰之敌击退。三营正面之敌，企图夺取通山道口，猛烈进攻，我团当即将全团十二门迫击炮集中，向该敌射击，计击毁敌战车两辆，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进入我阵地前沿之敌被全部歼灭。敌见正面进攻失败，乃调集汽艇十余艘，拖带木船，满载部队，沿富春江逆水而上，从乌龙山背后围攻建德城。我守建德城的工兵营，俟敌汽艇进入我火力圈后，枪声齐发，顿时将汽艇、木船打翻、打沉，没有被打死的敌人，齐向江对岸奔逃。

预备第五师坚持到第三天，顾祝同发来电报让他们放弃建德城后撤。但是，阵地上的战斗已经处于白热化，大量的日军正冲向十五团的阵地。日军施放毒气弹，导致中国守军中毒。曾师长与十五团联系中断，紧急命令预备队十三团抽出两个营前往阻截，自己也亲率两个营向日军实施逆袭。中国官兵决死冲杀，打死打伤日军百余人，还捉了十三名俘虏，最终把日军再次赶下阵地。

晚上，预备第五师在夜色中撤出战场。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吃尽苦头后重新向前推进。

蒋介石知道日军针对的是衢州等地的机场，因此认为有必要再次提醒一下美国人：如果继续漠视中国战场，导致中国的抗战力量被削弱，美国人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他给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发电报，让其把电报内容尽快转告给美国人：

敌军最近集中六个师团以上兵力，加以二百架以上空军协助进攻我衢州、丽水、玉山各飞机场所在地，其志在必得，我军虽有准备，但空军绝无，重武器缺乏，其势甚危，自缅战失败以来，全国心理有鉴于同盟国对远东战局毫不在意，对中国战场尤甚漠视，故军心民心皆形动摇，势甚危急。此不得不实告美国军部。如果中国抗战根本动摇，窃恐将来虽欲挽救，以击溃日本，当更非易矣。

无论美国人是何反应，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二十二日，日军各师团分别抵达金华、兰溪外围，对金华地区形成了三面包围。为避免遭到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都已后退转移。尽管第三战区命令新编第三十师和暂编第三十五师分别侧击和尾击靠近金华的日军，但是为时已晚。

二十四日，还是大雨。

包围金华的日军听到金华西面响起巨大的爆炸声，然后金华城内燃起了大火。日军的估计是：中国军队正在炸毁铁路桥，他们根本没有死守金华的意图，而设在金华的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应该早已撤离了。泽田茂决定分兵三路，两路分别攻击金华和兰溪，一路绕过金华向衢州方向追击：

一、综合各种情报，金华附近之敌有退却之迹象。

二、军决定立即向衢县方向追击。

三、第三十二师团一面随时击溃敌军，一面向衢县西方地区追击。

四、第一一六师团一面随时击溃敌军，一面向衢县西北地区追击。

五、第十五师团应迅速开始行动，派部分兵力监视兰溪之敌，主力向衢县西侧地区追击。

六、第七十师团应立即攻克金华和兰溪，然后在该地附近集结兵力。

七、河野旅团立即开始行动，向衢县追击。

八、第二十二师团立即开始行动，向衢县南方地区追击。

至此，顾祝同作战计划中的“逐次在长乐、安华、桐庐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极力迟滞、消耗敌人，坚守金、兰及切断敌后，猛烈围击敌寇，严重打击敌人”的设想似乎都没有实施。——与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相比，这时第三战区应通过层层阻击把日军消耗得筋疲力尽了。可事实是，日军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且已兵临金华城下。

中国军队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判断日军将分兵绕过金华靠近衢州，当即命令暂编第九军在东阳、永康、金华公路两侧牵制日军；命令第四十师迅速开往龙游、湖镇一线归暂编第十三师指挥，在汤溪、龙游一带占领阵地；第八十八军派出部队立即占领金华江北岸，掩护金华和兰溪的后方防线。此时，第七十九、第六十三两师已归第八十八军指挥，军长何绍周抵达金华北山指挥所，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也移至龙游的三叠岩。

但是，第十集团军的部署还是有些迟了。

二十六日，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逼近汤溪，与中国守军第四十师和暂编第十三师展开激战；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攻占寿昌后，与第三十二师团并列向西推进，其先头部队抵达了衢江北岸的航埠附近；而跟进的小薗江邦雄旅团则插到了金华南面的武义。在日军的猛烈攻击面前，龙游一线中国守军第四十师和暂编第十三师虽奋力苦战，但龙游还是很快陷落了。龙游位于金华以西、衢州以东，龙游的失守，令金华和兰溪的中国守军退往衢州的后路被日军封堵。

后路断绝的中国守军只能与攻城的日军拼死抗争。

主攻金华的日军第七十师团，与守卫金华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师在瓢泼大雨中来回拉锯，双方官兵的血混在雨水中到处流淌。二十五日，第七十师团得到第二十二师团以及河野旅团各一部的支援后，向金华外围阵地发起猛攻，并以一部迂回到中国守军的侧背。第七十九师不可能指望有增援部队抵达，因为他们知道后路都已没有了，此时的金华犹如一座孤城，只是他们仍然不愿放弃。二十六日，交战两军全天激战，数十架日军的战机轮番轰炸第七十九师的阵地，日军步兵在攻击中又一次使用了毒气弹。黄昏时分，金华外围阵地全部失守，第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和挺进第一纵队官兵被迫向金华西北阵地转移。二十七日，战况更加激烈，日军疯狂地轰炸金华城，中国守军的核心城防工事全被摧毁。即便如此，第七十九师竟然还能组织起官兵对日军实施反击。二十八日，

日军终于突进金华城，与中国守军展开了巷战。巷战持续四个小时，第七十九师伤亡惨重。天黑以后，部分幸存官兵突围而出，金华城陷落。日军进攻金华的部队多达一个师团，而金华中国守军仅有个师，在没有援军、战机和火炮的情况下，连日军都没想到这支中国军队能与他们血拼三天。——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四月间从原来隶属的第八十六军改隶第八十八军序列，始终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该师的装备在中央军中不算上乘，但官兵的作战精神堪称顽强。

就在第七十九师于金华血战的同时，兰溪城内的中国守军第六十三师也在苦战中。五月十八日，蒋介石致电师长赵锡田，严令他死守城池：

兰溪得失，党国存亡之所系。弟部守卫兰城，责任重大，必须重申连坐法，督励所部上下一致，誓与兰城共存亡，决心牺牲以报党国。守城准备，昼夜增强，不厌其详，城内外两方部队通信设备与各种辅助通信方法，更应预备切实，务使确实勿忽。实现主义，是所为盼。

二十四日，日军第十五师团接近兰溪后，根本没有把兰溪中国守军放在眼里，攻击之前竟然在距中国守军阵地咫尺之遥的村庄里杀猪宰牛大吃大喝。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二营营长韩正礼，命令迫击炮连把八门迫击炮推到阵地前沿，给每门炮配发了二百发炮弹，炮手精确瞄准后突然开炮，吃喝中的日军顿时被淹没在密集的弹雨里。炮击停止后，日军在战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前来收尸，据村庄里的百姓说，村里的草席和门板都被用尽，被拉走的日军尸体有几百具之多。

兰溪外围战开始后，一八八团仍处在第一线。激战中，一营的大坞阵地出现危机，一连连长陈锁才和机枪连连长均负重伤，在三营偷袭日军后方后，大坞阵地危机才得以缓和。二营石廓山阵地前沿的鹿砦、机枪掩蔽部和营指挥所均被日军战机摧毁，日军的火炮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然后步兵从破损的鹿砦间冲进来，但却被阻挡在第二道鹿砦前，受到二营机枪火力的杀伤。日军转而把攻击重点放在了一八七团的阵地方向。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攻占了大云山制高点和山麓的一所中学，居高临下地向兰溪城内射击。兰溪守军伤亡很大，核心阵地岌岌可危。第六十三师的预备队是一八九团，该团在团长陶绍唐的指挥下，夜袭大云山中学得手；又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收复了大云山制高点。

屡次进攻受挫后，日军被彻底激怒了。大量的战机和火炮集中火力将小小的兰溪城轰成一片废墟。日军步兵再次施放毒气弹后，分成数路

向中国守军阵地猛扑，他们对地雷、鹿砦和铁丝网完全不顾，如同疯魔一般冲上阵地上展开肉搏。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一半以上，日军出现的严重伤亡也前所未有。造成日军伤亡的原因，除了中国守军的拼死作战外，还有一点是连日军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中国守军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地雷不是什么现代武器，中国军队可以大量制造。日军战史记载道："对付地雷也曾煞费苦心。敌军在金华、兰溪附近的阵地及阵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埋设了无数地雷，以阻止我军行动，我军因此受到严重损失。"

在兰溪城下，令日军第十五师团官兵万分惊恐的是，他们的战场最高指挥官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竟然也被中国军队埋下的地雷炸死了。

兰溪中国守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二营官兵，在金华火车站受到日机轰炸的时候，发现阵地边的金兰铁路支线上开来一列躲避轰炸的火车，火车上满载着上千枚地雷。本来，二营的石廓山阵地前已经埋设了大量的地雷，但二营官兵认为还是多多益善。二营的连排长中有几人是军校工兵科毕业生，对地雷的使用很是内行，经过交涉，这批地雷就归了二营。这批地雷为四号甲雷，这是一种伏击雷，有轻压即爆、重压引爆、绳索拉爆和电发引爆四种引爆方式。二营官兵把这四种引爆方式全都用上了，在阵地前的路上、山上、树上和房屋里到处埋设了地雷。

五月二十八日——兰溪城攻防战最残酷的时候——由于前方不断传来步兵被地雷炸死的消息，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命令工兵小队长率队前去清除地雷，并亲自率部跟进到前线视察。一行人抵达石廓山下时，被二营前一晚派出的潜伏班战士发现了。潜伏班的战士认为这是日军探路的前哨，于是突然开了火。酒井直次一行有人被当场打死，其余的惊慌之中四散躲避。酒井直次本人在幕僚的簇拥下躲避时，进入了中国守军预设的地雷区——当酒井直次走进郑姓墓地里的一根华表石柱下时，脚下的地雷突然爆炸了。

同在现场的第十五师团参谋长川久保镇马有如下回忆：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师团战斗司令部命令工兵小队长指挥一个分队，搜索并清除去兰溪途中的地雷。乘马前进的顺序是卫兵骑兵、步兵尖兵、间潮参谋、古谷金次郎参谋（总司令部第四课参谋，此时作为联系参谋同行）、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十时四十五分，行至兰溪北方一千五百米的三叉路口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沙石俱下，地雷爆炸了。师团长从马上坠落，马被血染红，倒在地下。我立即跳下马，赶

至阁下身边，阁下坐在地上，腿伸着，左腿皮肉已被炸掉，脚心粉碎。立即命人止血，并派人去找军医。但军医都分散在野战医院的各包扎所，迟迟不来。过了半晌，军医部长细谷大佐才赶到，进行了急救。当我向军医部长了解阁下的伤情时，据说就目前情况看，心脏无明显变化，生命可能无危险，我才稍稍安下心来。阁下命令："参谋长，你代我指挥师团。"并说："给大家添麻烦了，对不起。"脸色虽然苍白，但精神尚好。暂用担架移至前方约二百米处的一栋房屋里，又命人将马掩埋，然后动身前进。霎时，后面又有地雷爆炸。宫下兵器部长、佐野兽医部长、兽医部员佐山中尉负伤。两位部长是轻伤，佐山中尉伤势较重（后阵亡），命人处理，继续前进，进入上述房屋内。我正在屋外审阅吉村参谋起草的追击命令时，阁下的传令兵跑来，我预感伤情有变，急忙赶至阁下身边，虽大声呼唤，也毫无反应，军医部长注射数针，并做人工呼吸，也毫无效果。虽有输血设备，也未及进行……阁下静静地长眠了。军医部长默默地将军用水壶递给我。在进入兰溪县城后，经军医部长同意，将遗体火化。

"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

酒井直次，日本东京人，一九——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一九二〇年进入陆军大学第三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任日本通讯兵学校教育部部长和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四联队联队长。一九三八年晋升为陆军少将，任第十九旅团旅团长。一九四一年晋升为陆军中将，任第十五师团师团长。作为侵华日军主力师团的指挥官，上任伊始便指挥部队对华东地区进行了手段残酷的"扫荡"作战，曾在溧阳地区合围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导致该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等二百七十多名官兵牺牲。虽然是侵华日军中的强硬派，但不久前他在给天皇的一份奏折中，陈述了中国军民顽强的抗战意志，认为日本绝不可忽视中国人的"国魂"，要谨慎地对待目前仍在进行的对中国的战争。

酒井直次死亡的当天，兰溪城陷落。

二十九日，日军第七十师团留守金华和兰溪，第十三军其他各师团分别推进至龙游一线，准备进攻衢州。

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军指挥的第七十九、第六十三、新编第二十一师和挺进第一纵队都撤退到了预定地点，准备继续伏击和侧击日军，策应衢州方向的决战。中国第三战区各部队也按照决战部署移动完毕。

蒋介石让熊式辉转告美国人不应漠视中国战场的电报，至今不见回音。现在，衢州决战在即，蒋介石以日军在进攻中使用毒气为说辞给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发电，令其再次转告美国人：

敌军此次进攻浙东之建德与金华西北，皆施用毒瓦斯炮弹，在建德上空且施用飞机投掷毒弹，以致我军中毒伤亡者甚多。又自去年十月间敌军在宜昌施用糜烂性毒瓦斯，中外医师皆在我伤兵身上证明甚确，此次又在浙东施用毒气，若不由国际严斥声援，恐其以后更放肆无忌，请与美政府切商声援于斥责之道，例如上次英国首相对德之斥责，若德对俄施用毒气，则英亦必还报之意，且辞句亦十分严正为盼。

显然，蒋介石的意图是再次提醒美国人，此次日军进攻浙江是美国人轰炸东京引发的，中国机场是支持太平洋战场的重要基地，如果美国人再没有任何声援举动就不可理喻了。

美国方面终于有了回音。罗斯福套用了丘吉尔的那句话：如果日本人继续在中国扔毒气弹，美国就将把毒气弹扔在日本人头上。——至于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为了美军使用的机场在浙江作战，罗斯福一字未提。

预定的衢州决战已近在眼前。

就在第八十八军等部在金华和兰溪一带顽强阻击日军的时候，第三战区各主力部队按照由一个军固守衢州、四个军在衢州外围对日军实施南北夹击的决战计划，进行着位置调整：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与归其指挥的方日英第四十师固守衢州城及以南的大洲镇；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位于衢州东南面的溪口、湖山、湖南地区；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位于衢州西面的招贤、航埠地区；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位于衢州西北面的峡口、芳村地区，？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位于衢州北面的大同、上方地区。以上各部队在五月底前均已抵达预定作战位置。

日军发现衢州附近的中国军队摆开了决战架势，也调整了部署：第十五师团转至衢州南面，保持重点在左翼，于衢州两侧地区分别突破和分割中国军队的合围阵形；将小薗江邦雄旅团原定进攻丽水的时间推迟，命该旅团移至龙游附近专门对付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第七十四军；第七十师团担任攻占衢州部队的后方警备。根据以上调动，五月三十日，泽田茂下达了“甲字第一〇三号”作战命令：

第三十二师团应于六月一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上源（衢州以北十四公里）、泰山埠（上源东南四公里）一线，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攻击当面的敌阵地，尤应以一部沿大源岭（衢州西北二十二公里）、芳村市（大源岭西南十二公里）地区，向常山方向前进，以断敌军退路。

第一一六师团应于六月一日黄昏前进入天震岗（衢州北九公里）、大慷（衢州东北五公里）一线，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向正面敌军阵地发起攻击。

河野旅团应于六月一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下山溪左岸高地，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向正面之敌军阵地发起攻击。因第十五师团转进，须在五月三十一日十二时以后，将龙游连接曹家（龙游以南三公里）一线（包括线上）以东的道路打开。

第十五师团应速向龙游南方地区转进，六月一日由雨井、树底附近出发，黄昏以前进入下山溪左岸高地，自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向正面阵地发起攻击。

第二十二师团应于六月一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灰山（大洲镇东北四公里）、白西坑（大洲镇以东五公里）一线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对正面敌阵地发起攻击。

小薗江旅团于六月三日十二时前，派步兵一个大队赴汤溪，其余主力在龙游集结，特别对遂昌、宣平方向应加强警戒。

我现在金华。六月一日清晨从当地出发，当日傍晚抵达龙游。

第二天，还在下雨。

泽田茂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第二十二师团于龙游附近发现了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一名副官的尸体，尸体上有一份详细标注目前中国军队各部队位置的文件，这使得泽田茂确切地掌握了当面中国军队的具体部署；坏消息是，先于司令部出发的第十三军通信队半路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伤亡很大。

六月一日早晨，泽田茂率领军指挥所的幕僚们从金华出发向龙游移动。天依旧阴着，泽田茂担心恶劣的天气会影响作战：

敌梦想再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场面，妄图死守衢州，从南北两侧向

我军发动侧击。但我有小薗江旅团位于第二线，无须担心。针对敌军的上述意图，首要的是出色地突破衢州。我根据这一原则采取行动，两侧不必担心。唯一担心的是天气，尤其是位于我主攻方向的乌溪江，水深流急，一旦涨水，则无法徒涉，或许有可能被迫将原定三日发起攻击的时间推迟。我暗自祈祷上天，但愿一二日两天，天气晴朗。

六月三日，日军第三十二、第一一六师团在衢江以北，河野旅团和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在衢江以南，以南北对攻的态势向衢州城发起了全面攻击。奉命死守衢州城的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属中央军嫡系部队，是中国第三战区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其营以上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该军下辖第十六、第六十七、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六军向衢州调动时，顾祝同曾在上饶战区司令长官部宴请该军师长以上将领，格外强调了守备衢州的重要性："衢州是扼守浙、赣、闽、皖四省交通要枢，居战略上极为重要地位。委员长决定在衢州扩建一个为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使用的飞机场，供美国空军任何型号飞机的降落和起飞。"此时，第八十六军的兵力部署是：第六十七师配属第十六师四十六团、独立炮兵团和高射炮连，防守衢州城东南的樟树潭、西伯陇飞机场等阵地；第十六师主力配属一个山炮营，防守衢州城西北的茂坞、九里山一线阵地；第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营防守城防核心阵地；第八十六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位于衢州城内。

衢州外围战斗在五月二十七日打响，占领龙游的日军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向第十六师阵地发动了猛攻。激战至二十九日晚上，第十六师的阵地多数被日军攻占，师长曹振铎、副师长顾宏扬和参谋长朱恺仁带着少数随从退守衢州城内。然而，日军对第十六师的攻击仅仅是试探而已，可在城外指挥所里的第八十六军副军长兼第六十七师师长陈颐鼎却接到了军长莫与硕从城里打来的电话，莫军长说他要出城去收容第十六师被打散的官兵。——这就意味着，在守城作战还没开始的时候，莫军长就离开了衢州城。"莫与硕一走，军部直属部队相继离去，给人造成衢州不守的错觉。"城里的炮兵慌乱地准备车马，各种车辆争夺通向城门的道路，守城部队为了尽快逃走在街道上挤成一团，这种混乱的局面直到陈副军长从城外指挥所赶到现场后才被控制住。

这是大战来临前一个令人不解的事件：作为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堂堂一名军长，胆子再小也终究打过不少仗，应该不至于明目张胆地临阵脱逃，可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莫与硕逃离衢州的消息，直到第二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才知道，顾祝同与莫与硕取得了联系，严令他立即返回衢州。但由于第十六师外围阵地的丢失，不但回城的路不通了，且日军

利用突破口加紧了对衢州城的压缩作战。防守樟树潭和西伯陇阵地的第六十七师苦战不休，官兵伤亡巨大，衢州城外已经布满了日军，莫与硕就是想回也回不去了。蒋介石闻之大怒，不但把作战不力的第十六师师长曹振铎撤了职，还特别下令把军长莫与硕和军参谋长胡炎押解到重庆军法审判，最终两人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六月二日，日军各部队全面逼近衢州城。

三日晚，中国第三战区认为，虽然守衢州的第八十六军士气受到严重影响，但衢州仍在我军手中，原定的衢州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达了决战命令：

第二十五集团军，除原有任务外，暂三十二师即日开始行动，切断东阳江的水道并牵制敌人；暂九军主力应努力向汤溪、龙游敌后挺进，切断龙游以东敌水陆交通。

第十集团军，应严令第八十八军切断敌后方联络，督饬衢州守军死守阵地，并即推进第七十四军，预定以衢州阵地为轴，由大洲镇及其以西地区转移攻势，压迫敌于衢江南岸歼灭之。为策衢州阵地南翼之安全，应以第四十九军的第二十六师主力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而后迅以第七十四军派队接替，使该师归还为战区预备队。

第三十二集团军，应严令富春江左岸各部队努力切断敌后联络，巩固淳安、寿昌要点，并确实掌握石梁市。以第二十六军分由石梁市、外宅村、杜泽、峡口市、叶村市、后徐镇等处出击，置重点于石梁市一带地区，攻击敌侧背，压迫敌于衢江北岸而歼灭之。由杜泽以东进出之部队，应先期出击，使重点方面之决战容易奏功。

第四十九军（欠暂十三师）除第一〇五师之一个团应固守常山港北岸、柘溪村之石梁市（不含）之线外，该师主力迅速进入常山港，集结航埠以北地区；第二十六师主力暂归第十集团军指挥，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俟交防第七十四军后，仍归还该军，控置后溪街及江山港以北地区，保持机动。又，该军对江山港、常山港与衢江合流处以西地区应负责警戒，保障衢州阵地西侧之安全。

尽管第三战区决心对日军发动全面决战攻势的勇气可嘉，但不知顾祝同或蒋介石是否意识到，包围衢州的日军与长沙会战时兵临长沙城下的疲惫不堪、大量伤亡且补给困难的日军完全不同，此时战场上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在西面的南昌方向，日军第十一军于五月三十一日晚渡过抚河，向第三战区位于战场西侧的第一〇〇军阵地发动了进攻。六月三日，日军第十一军攻击部队占领进贤并逼近临川。——显然，日军第十一军不单是为了策应第十三军的衢州作战，而是要沿着浙赣铁路与第十三军东西对进，形成夹击中国军队的态势。

六月四日，天降暴雨。

在衢江以南，由于乌溪江水猛涨，日军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被阻于江边不得过，部分官兵冒险徒涉，或乘坐橡皮艇强渡，在中国守军第六十七师的顽强阻击下大部被歼。衢江以北的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傍晚时分才进至衢州西南九公里处的东镇，第一一六师团尚在衢江北岸附近缓慢地移动。

中国第三战区各部队按照命令已开始对日军实施全面包围。

就在这一时刻，突然，蒋介石发来一道命令：放弃衢州决战。

蒋介石的理由是：为了保存实力和机动打击敌人。

这道命令让箭已离弦的第三战区有点猝不及防。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在向北推进途中，与南下的日军第十五师团发生了激战，接到“避免决战”的命令后，撤向黄坛口以南的山地；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也在日军的攻击下撤到了江山港北岸；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的第一〇五师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刚刚接战便撤到了常山港南岸的招贤。

电闪雷鸣，乌云压顶。

雨雾弥漫的战场上顿时显得诡秘异常。

衢州决战开始之际，蒋介石为何突然放弃决战，史家对此众说纷纭。

国民党方面的一般解释是：军事委员会判定日军旨在破坏机场，为了避免我主力部队作不必要的损耗，决定停止决战行动，以便积蓄力量，待捕捉合适战机再行重创敌人。——这一解释无论如何有些勉强：日军破坏机场的作战目的，中国方面早有明确判断，第三战区的作战计

划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作出的。中国官兵根据预定作战计划和命令，在诱使日军进入决战战场的作战中节节阻击，付出了巨大牺牲，无不是为了给决战造成有利态势；如果知道日后并非需要决战，那么仗就应该是另一个打法，血流了之后再说为避免不必要的损耗，令人无语。

还有分析说，此时的蒋介石认为，日军已经从缅甸攻进了云南，那里的局面比浙江机场周围更为严重，而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是无法调来浙江参战的。综合考虑之下，金华和衢州的得失并不关联整个抗日战局的胜败，那么中国军队就不值得拖入中央军多个主力军去与日军拼杀。——这一说法也值得斟酌：缅甸战局的失败于四月中旬，而日军发动的浙江作战是在五月中旬，把缅甸作战的失败当成放弃衢州决战的理由，依旧令人无语。

还是蒋介石放弃决战命令中的那句表述更真实：为了保存实力。

保存什么实力？

中国军队与日军长期周旋下去的实力。

进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九四二年以来，日军大本营对于中国战场所秉承的最基本的战争原则，就是在太平洋战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掣肘下，尽量保持在华占领区的现状，没有特殊需要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日军对浙江的进攻，是美军轰炸东京引起的，日军必须摧毁美军可以利用的机场，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实际上等于在为美国人承担后果。为美国人承担后果的目的，必是要更多地获得美国的援助，使得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盟军中的一员。顾祝同战前向第八十六军将领传达的蒋介石计划要在衢州为美国人扩建机场的话，前提是坚信美国人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为了浙江机场打起来的时候，将会改变态度转而全力支援中国的抗战。但是，无论重庆方面怎样提醒，浙江作战从开始到结束，美国人漠视中国战场的态度依旧。那么，凭什么要为美国人使用的几个机场而去大量消耗中国陆军的主力？重庆方面的战争原则是与日本人耗时间，主力损失殆尽后拿什么资本与日本人继续耗下去？再说，中国空军没有多少飞行员，也没有足够支持长期作战的飞机数量，大后方的机场虽然有限，但装下中国空军的飞机绰绰有余，东南沿海几个机场的得失与中国军队的大局利益有什么重大关系？

思来想去，还是不打了。

不打了不等于全面溃退，衢州城还是要守一下的。

六月五日，雨停了。

日军围城部队发起猛攻，在炮火轰击和战机轰炸的同时，步兵突破了中国守军的外围阵地，逼近衢州机场。负责守城的第八十六军第十六师奉命留下四十六团守城，其他部队二千多人向城外突围。突围部队遭到日军袭击，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千余人。

六月六日，大雨又至。

日军攻占了机场和衢州的各个城门，由于少量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日军未能突进城里。七日，守军伤亡巨大，弹药告罄。一名勇敢的百姓潜入城中，带来了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命令四十六团设法突围的命令。四十六团决定由二营掩护，忍痛丢弃重伤员、重武器以及骡马车辆，利用雨夜突出重围。在二营官兵的决死阻击下，日军始终没能突进城内，也没能阻止守军的突围行动。此时的衢州城周围一片汪洋，连日大雨使得各条河流洪水泛滥，凶猛的洪水甚至把衢州机场上的几架飞机都冲走了。一片汪洋中，七日拂晓，四十六团的大部官兵突围成功，但二营营长宋汉武在战斗中阵亡，该营残部百余人在团长谢士炎的率领下，从东门杀开了一条血路。

衢州陷落。

战局急转直下。

日军第十五师团攻城的同时，第三十二、第二十二师团超越衢州，

沿着浙赣铁路向西，朝着江山、常山方向攻击前进。六月九日常山陷落，十一日江山陷落，玉山机场被日军占领。在上饶以东的广丰附近，中国守军暂编第十三师阻敌数日，歼灭日军一个联队，但该师伤亡惨重，前沿的一个营仅活下来七个人。十五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上饶落入日军之手。

此时，从南昌向东进攻的日军第十一军虽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但仍旧沿着浙赣铁路逐步突破向东推进，十六日攻占鹰潭、贵溪，七月一日在横峰与从上饶向西出击的第十三军部队会师，自此浙赣铁路被日军完全打通。

就在第十三军主力全力向西攻击的时候，小薗江邦雄旅团分左、右两路由龙游出发，向东南方向的丽水推进。右路部队受到险要山路的影响进展缓慢，但受到的抵抗十分微弱，于二十四日占领丽水。左路部队一段时间里消息全无，旅团指挥部以为他们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后来才知该路官兵半路进入一个小镇时，发现了大批的鸡、鸭和油，于是大吃炸鸡，结果炸鸡的油是桐油，吃后全体中毒，失去了行动能力，三十六个小时后才勉强恢复知觉。在旅团派出部队的接应下，二十五日抵达丽水与旅团主力会合。小薗江邦雄旅团占领丽水后，奉命向温州前进，目的是摧毁美国潜艇的辅助设施，并破坏囤积在那里的军用物资。该旅团沿着瓯江迅速推进，九日占领青田，十一日占领温州。日本海军陆战队同时在温州湾登陆，十三日占领瑞安。

至此，日军攻占和破坏浙江的衢州、玉山、丽水等机场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照原定计划，应在七月中旬撤军以恢复战前态势。但是，基于大本营赋予的掠夺萤石和铁路器材的任务，第十三军决定延期撤退，开始大肆掠夺物资，并利用浙赣铁路加紧转运。

中国军队开始了局部反击，并相继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各个要点。在与中国军队反复争夺要点的过程中，鉴于占领地区太大，日军深感兵力不足。七月二十八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停止浙赣作战，开始收缩部队，但要求必须固守金华附近。——固守这个地区，一方面可以就近监视各机场，如果发现机场被修复，可即刻再次实施攻击；另一方面，这一地区萤石矿储量达三百五十万吨以上，仅金华附近武义一地的储量就占百分之九十。八月十二日，日军正式下达了撤退命令。

日军在撤退前实施了大规模反击，成功地隐蔽了其撤退企图。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西移动。直到八月十九日晚中国方面才发现日军的撤退迹象，下达追击的命令。可是，第三战区部队并未采取积极行动，仅派出小部队与日军保持接触，致使日军顺利撤回到原来的防线上。

二十九日，日军第十三军主力抵达金华附近，第十一军部队也陆续返回了南昌。

中国第三战区判断日军第十三军要完全撤回原防，于是命令部队向金华、兰溪、诸暨、萧山和绍兴方向攻击前进。攻击前进的部队发现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留在金华附近不走了，重庆的军事委员会遂下令停止攻击行动。

浙赣会战到此结束。

日军认为，此次会战中国军队“十分消极”，已经丧失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顽强反攻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出现了三大问题：

一、随着作战的长期化和进攻的深度、广度的发展扩大，消耗以至丧失了士气和战斗力。

二、由于人力、物力的消耗，以及战略态势的混乱，造成统帅方面的破绽。

三、由于浙赣要地失守，民众逃亡，屋子流失损耗，从而导致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抗战体制的混乱和破坏，其中尤其是秘密运输线和生产机构更遭到了致命打击。

会战中，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一名师团长被击毙。据日方统计，浙赣会战战死一千二百八十四人，负伤两千七百六十七人，生病减员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人。但日军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目的。

中国第三战区不但没有实现在衢州附近与日军决战的目的，也没有像长沙会战时那样给予日军重创，反而在人员和物资方面损失巨大。作战区域里的中国村镇十室九空，日军所至，残酷屠杀，肆意抢掠，百姓死亡人数竟然高达二十万人。日军为了弥补国内资源与物资的严重匮乏，什么都抢，特别是车辆、粮食、石油、木材，以及重工业需要的铜、铝和萤石等战略物资，遭到了毁灭性的掠夺。

此次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尤为惨重，官兵阵亡四万以上，被俘者也在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出现的作战意志衰退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上的失落。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原以为中国抗战的苦难终于熬到头了，中国军队可以不再孤军奋战，中国将成为盟军全力投入的重要战场，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从蒋介石到普通士兵，失望、悲观和愤怒的情绪与中国人特有的敏感的民族情绪混杂在一起，笼罩在一九四二年沉闷的中国战场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世界列强之所以不愿把中国军队纳入盟军的范围之内，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尚不具备与盟军比肩的基本素质。

浙赣会战中，中国军队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士兵的逃亡——或许这才是被日军俘虏了上万人的主要原因。

浙赣会战前后，蒋介石发表过一系列讲话，再次强调如何提高军队素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致命弱点，除了军事装备、战略战术、指挥艺术、训练水准和战场协同诸方面的明显落后外，依旧是积习难改的旧军队的习气。他列举的这些习气是：赌博、走私、吸食和贩运鸦片、扰民、军队经营商业、军队加入黑帮、谎报军情、贪污腐化、虐待士兵等等。在诸多问题中，逃兵问题尤为突出，往往战斗尚未开始，部队已经缺额了。有人说这是国民政府的兵役法有缺陷，蒋介石则认为“即使诸葛亮复生于今日，也无法要求他来解决今日前方逃兵问题”，而逃兵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责任在于前方将领。

士兵为什么要逃跑？

蒋介石列举了八种原因：

一、冒名顶替，冀图渔利，故要逃跑。

二、新兵想念家庭，不惯军营孤寂，故要逃跑。

三、军队官长虐待士兵，动辄打骂，致新兵对官长对军队发生厌恶，故要逃跑。

四、新兵入营，生活痛苦，食衣住行，形同乞丐，吃不饱穿不暖，住处潮湿黑暗，污秽肮脏，整天操课束缚，干燥无味，更兼官长老兵任意欺凌，视同路人，甚至视同囚犯一样的将他捆绑起来，实为迫使新兵逃跑最大的原因。

五、新兵胆小怕死，故要逃跑。

六、部队官长擅自拿捕，以致各邻接部队发生对流作用，故有逃兵。

七、兵贩子充当新兵，出入军队，并引诱士兵逃跑，此为逃兵问题中最严重的现象。

八、自由补兵。不仅团长营长如此，连长亦是如此，因可自由补兵，就任意强拉起附近壮丁民众，甚至沿途拦劫公差夫役或正式部队告

假回家的士兵，败坏军纪，莫此为甚。

一九四二年的中国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国家。

就在中国军队在浙江战场流血牺牲的时候，世界大战终于到了转折的关口。

六月三日——日军对衢州发起攻击的当日——日军和美军在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展开了激战。珊瑚海交战后，为了歼灭美军的太平洋舰队，日军联合舰队策划了夺取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作战。为此，日本统帅部几乎动用了海军的全部兵力，在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统一指挥下，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重型航母四艘、战列舰二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十二艘，组成航母突击编队；由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率领轻型航母一艘、水上飞机母舰二艘、战列舰二艘、巡洋舰十艘、驱逐舰二十一艘以及载有五千登陆部队的运输船十五艘，组成登陆编队，联合担任主攻。同时，由细萱戊子郎海军中将率领轻型航母二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十二艘、潜艇六艘以及载有二千四百五十名登陆兵的运输船四艘，组成北方编队，作为副攻，负责夺取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美军方面则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的统一指挥下，由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重型航母三艘、重巡洋舰八艘和驱逐舰十四艘，组成两个特混舰队迎战。从兵力上看，美国的水面大型舰船不如日军多，但是，岛屿攻防战中大型舰船不起主要作用。美军不但有舰载飞机二百三十三架，更重要的是中途岛上的一百二十架陆基作战飞机已经准备完毕，中途岛海岸和附近水域布设了大量的水雷，岛上的高射炮和野战炮也火力强大。

六月三日，日军向阿留申群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突击。在日军助攻方向的基斯卡岛和阿图岛，日军登陆顺利，分别登岛一千二百五十人和一千二百人。但是，日军在中途岛的作战却严重不利。海空对攻战中，美军航空兵逐渐占据优势。从航空母舰和岛上基地起飞的美军飞行员，在日本海军舰队上空轮番俯冲投弹，日军战机在空战中无论飞机性能还是数量都处于劣势，结果日军损失惨重，被迫在五日那天取消了中途岛登陆作战计划，命令所有的舰队撤退。中途岛海战，日军被击伤战列舰一艘、重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和运输船一艘；被击沉重型航空母舰四艘、重巡洋舰一艘；战机被击落四十二架，还有二百八十架战机随着航母一起沉入了大海。美军损失重型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一艘、战机一百五十架。

中途岛海战表明航空兵在海战中作用重大。

此次海战初步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日美兵力对比——日本海军只剩下重型航母一艘和轻型航母四艘，而美国的重型航母还有三艘。

中途岛一战成为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接着，七月，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了大规模会战。为了夺取斯大林格勒，希特勒专门派出保卢斯上将指挥的第六集团军负责主攻。该集团军最初为战役准备了十三个步兵师约二十七万兵力，各种火炮三千门、坦克五百辆以及作战飞机一千二百架。苏联统帅部则组建起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五百二十公里宽的正面上试图阻止德军的推进。会战七月十七日开始后，双方立即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在互有攻防的激战中，双方不断地增加兵力和火力。至九月，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兵力已经达到了八十多个步兵师。但是，会战持续到了十一月，德军死伤官兵已达七十多万人，损失火炮两千余门、坦克一千多辆、战机一千四百架。希特勒终于发现，不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无法实现，而且有情报显示，苏军在顿河岸边和萨尔帕群湖地带集结了大量的突击部队，斯大林似乎做好了大规模反攻的准备。——入侵苏联的德军一往无前的态势终于结束了。

与此同时，英美联军在北非成功登陆，盟军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从大西洋向印度洋进行海上战略运输，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战场被沟通。接着，十月间，蒙哥马利击败了隆美尔，取得了北非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这场胜利使得德军狼狈地撤出了埃及，自战争开始就不断撤退和溃败的英军终于扬眉吐气了。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军方面已经渡过了艰难的时期，开始转守为攻了。

相对于盟军具有转折意义的作战来讲，同期发生在中国战场的浙赣会战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扭转战局的迹象。

作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仍处在战争的艰难时刻。

正是鉴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战斗力的衰退，浙赣会战刚刚结束不久，日军的一个更为庞大的作战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进攻中国四川。

“除了督战巴丹进攻，干涉‘杜利特尔飞机’案之外，天皇还与缅甸和中国进行的作战行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仍然相信这些地方将成为主

要战线。一九四二年中，二月九日、三月十九日和五月二十九日，裕仁至少三次敦促杉山研究对重庆进行最终攻击的可能性——‘你不能想个什么方法了结支那事变吗？’”

日本人面临的局面显而易见：如果再在中国战场上拖下去，在太平洋战争中将会更加被动。以往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都没有令中国国民政府屈服，现在只能采取最后的毅然决然的办法：“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

日军大本营将从西安和武汉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四川的作战命名为“五号作战”。

这是个孤注一掷的巨大规模的作战。且不说日军要跨越秦岭、大巴山等巨大的山脉，一路突破“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仅就必须投入的兵力而言，大本营简单地估算了一下就将参谋本部吓了一跳：

当时地面兵员有二百一十八万人，但为了实施五号作战，兵力增至二百二十七万。此外，还有航空兵兵力十万人，船舶四万人，共达二百四十一万人。

一、满洲从目前的七十万人减至四十九万人，其中，十八万人调至中国，三万人调回日本国内。

二、中国从目前的六十一万人增至九十七万人。从日本内抽调十二万人，从南方抽调六万人，从满洲和朝鲜抽调十八万人。

三、日本国内从目前的三十四万人减至二十八万人。

四、南方从目前的三十四万人减至二十八万人。

五、在总兵力二百四十一万人中，士兵为一百九十五万人。

这些数字意味着，日军如果进攻四川，至少要投入十五个师团。

无法想象，如果日军真的发动此次作战，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将会是怎样的。所能设想的可能是：一、日军胜利，中国国民政府迁至西昌或云南，甚至是宁夏或青海；二、日军失利且损失巨大，中国军队乘势反击，抗战大后方得以完全巩固，甚至还可以收复部分失地。

只是，无论哪一种结局，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日本企图使用巨大武力令中国屈服的目的仍然不可能达到。坚决抗战的中国，无论战争的进程如何艰难困苦，无论官兵如何血流成河，无论百姓如何饱受战争的蹂躏，决不会向日本侵略者低头。

一九四二年底，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第十七军及第二师团发动的针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反攻终以失败告终。——“统帅部完全被一片阴暗的气氛所笼罩。”

日军大本营终于意识到，以巨大规模进攻四川“是不可能的”。

参谋总长杉山元最终上奏天皇：

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发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的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的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昭和十八年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

日本人还是无法从中国战场上脱身。

杉山元无法明确告知天皇的是，日军仍然没有方法“了结支那事变”。

历史在这一刻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盟军阵营内中国被严重地边缘化，但中国的抗日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经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离开同盟国的全面胜利，中国不可能单独胜利；中国尚未胜利之时，同盟国的胜利也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有理由相信，从下一个年度——一九四三年——开始，中国战场或许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让战局出现转折的可能。

第三十二章

把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岩石上

一九四三年一开年，便发生了一件怪事：汪精卫宣布他的“国民政府”向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宣战。

自此，重庆和南京，一真一伪的两个国民政府，分别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轴心国对立阵营的行列。

且不说一个投降于侵略者的傀儡政权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宣战”是多么的荒谬，仅就汪精卫在他的日本主子已显露出颓势之际突然跳出来向世界叫嚣的这一举动，便着实有些怪异。而日本人同意汪精卫“宣战”的目的很明确，即通过伪国民政府在中国掠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支撑战场遍及整个南太平洋的大规模战争——“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当然不可能要求汪精卫“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战力的培养，则长期的武力将发生困难，这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后，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连续召开三次联席会议，紧急磋商对策。日本人的估计是：美英将密切合作，加强对日攻势作战，这种攻势作战将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达到高潮。鉴于同盟国在战场态势上逐渐好转，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将更“确信美、英会获得最后胜利”，因此决不会“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时，由于得到同盟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战力量会进一步加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将更加困难。

如何从“永无尽期”的中国战场上解脱出来，这是一个仍未解决却愈发迫切的老问题。东京大本营想到了“民心”二字——争取中国民心的支持以达到中日两国“通力合作”的目的——对于这一想法，侵华日军的将领们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对占领区实情和国民政府实体全然没有认识的空谈泛论”。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重光葵的看法是，日本在中国根本无从谈论民心问题：“日本怎么能一方面把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当作殖民地对待，一方面却号召结束殖民主义？”于是，东京的联席会议把“中国的民心”圈定出一个范围，那就是“当今的国民政府”，即汪精卫伪政府的“民心”——“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地依存于美英，决心进行

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落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联席会议决定：进步扶持汪精卫政权。具体措施是：加强汪精卫政权的财政权，让其自行筹措更多的战争物资；调整汪精卫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消除他们之间的摩擦，对省府以下人事安排不再更多地干涉；将日方“管理”的各地租界以及北京使馆区交还汪精卫，撤销治外法权并对中国的“敌产”尽量做“友好处置”。——日本人的意图是：中国不是天天要求日本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吗？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做不到，汪精卫的南京政权做到了，这样一来汪精卫不就赢得了民心吗？汪精卫政权不就更像个“政府”了吗？

汪精卫对日本人终于重视他十分感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等幕僚以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的名义抵达东京。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进行会谈并觐见了日本天皇。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汪精卫表示：“日华合作，目标一致，为完成战争而携手并进。”汪精卫的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说得更为直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国民政府决心本着同甘共苦之精神与友邦协力前进，誓以同生共死。”

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汪精卫就希望日本人允许他的“国民政府”对美英宣战，可日本人为了不激化中国战场上的冲突从而影响日本的南进战略，没有答应汪精卫的要求。现在，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敌对还是没有化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局面不断恶化，因此可以让汪精卫公开“宣战”以壮声势了，至于效果如何且顾不及。而汪精卫何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周佛海的解释是：绝对不能以为不宣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有余地。不成功便成仁，如果日本战败，我们没有任何颜面乞求苟全。汪精卫也认为，宣战可以标榜他的“政府”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让他的“政府”步入世界舞台，争得一定的国际地位。——在人人都能判断出日本在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为零的时候，汪精卫对日本方面再下一笔大赌注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唯一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傀儡政府，他已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作最后的孤注一掷。

汪精卫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在日本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上，日本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

第一、方针

一、帝国以国民政府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向前迈进。

二、注视世界战局之演变，要在美英方面反攻最高潮到来之前，基于前项方针，力图使对华各项政策获得成功。

第二、要领

一、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

甲、帝国对国民政府尽力避免干涉，极力促其自发活动。

乙、尽力调整占领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

丙、对于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及其他各种特殊事态，要本着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的精神力图尽快撤销乃至调整。关于九龙租借地的处理，与香港一并另行规定之。

丁、应使国民政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在各方面讲究自强之策，博取民心，尤其为完成战争要力图确实实现增加必要的生产，普及官民对战争目的的认识，加强维持治安，无保留地协助战争。

戊、帝国根据将来国民政府的充实加强及其对日合作的具体实现，考虑在适当时机对《日华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

二、经济政策。

甲、当前对华经济政策主要着眼于进一步获取为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此要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并要积极获取敌方物资。

乙、在实行经济政策时要尽可能防止日本方面垄断，要灵活地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及其创造性，使其切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

三、对重庆政策。

甲、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任何和平工作。由于形势变化需要进行和平工作时，另行决定之。

乙、要使国民政府顺应帝国上述态度。

四、战略方案。

帝国对华战略方策按既定方针实行。

如果把这一“根本方案”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有了巨大转变，而这种转变便是日本走向颓势的明证。

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认为：“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地孤注一掷。这一点我已早有预见。”

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和汪精卫的伪政府都要孤注一掷了。

就在这时候，从令日本人万分头疼的中国战场上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在前往南京开会的途中，座机飞经中国安徽西部太湖县上空时，被驻守在大别山南部的中国军队击落，冢田攻以及第十一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十一人身亡。

击落冢田攻座机的，是中国军队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的高射炮营。

这是继被地雷炸死的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后，又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丧命中国战场。

日军第十一军立即派出部队，紧急进入大别山进行搜索，找到十一具尸骸后，对大别山区进行了报复性“扫荡”。

日本人认为，这件事意味着开年不利。

一九四二年的春节将近了。

中国百姓尽管日子很苦，仍在竭尽全力准备年夜饭，无论这顿饭是多么的简陋。

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是横山勇中将，继任高级参谋是岛贯武治，他们两人对部队现状颇有同感，认为士气已经低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横山勇决定无论如何要打上一仗，不然在中国南方阴冷的冬云下龟缩在军营

里无所事事，那些盼着回家的士兵定会精神崩溃。

既然是为了振作士气，仗就必须要打胜。

于是须找一个有宿怨的对手，痛痛快快地出口恶气。

日军第十一军选中了中国军队第一二八师。

中国陆军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

王劲哉在中国抗日军队中，是个极具个性的传奇人物。他从小性格暴烈，从军后成为西北军的一名桿将，在军阀混战中作战凶猛，素有“王老虎”之称。一九三五年，他作为杨虎城的旅长，曾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拼死作战；但他又是“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之一，始终与蒋介石离心离德。他的部队曾被编进汤恩伯的中央军系列，可他不但把蒋介石安插在他手下的军官杀了，连友邻部队派来的联络参谋也被他活埋了，他说自己宁可投靠李宗仁也不愿依附蒋介石。只是，作为中国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在抗日立场上他从没有含糊过，惩处汉奸心狠手硬，与日寇作战异常顽强，率部在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会战等战役中不断血拼，弄得与他隔阂甚深的蒋介石不得不给他颁发勋章。

此刻，王劲哉的第一二八师驻扎在洪湖与东荆河之间的水网中。长江与汉水间的沔阳、潜江、监利和洪湖四个县，处于武汉、岳州（今岳阳）、沙市中间的三角地带。这是一片平坦肥沃、湖泊密布、盛产稻米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一带有中国军队存在，日军占领宜昌后，武汉至宜昌的长江水道从来就没有通航过，日军军用物资的运输始终受阻，这令驻守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非常不舒服。

令日军更不舒服的是，孤零零地驻扎在距武汉不远处的王劲哉，自从率部进入这一地区后大肆扩张实力，用火并的方式吞并了这里的游击别动军和其他武装，建立起类似独立政权的系统，不但私自征收税赋和征兵，还开设了自己的兵工厂，占据着好几个县，兵力扩展到两万多人，以至于他的第一二八师在江汉平原上犹如一座坚固的大碉堡。日军多次想拔掉这个钉子，但在与第一二八师的几次小规模作战中，都没做到彻底消除这一心腹之患，甚至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间的沔阳作战中还被第一二八师打败了——虽然日军声称是因浙赣会战在即而主动停止了进攻，可王劲哉说这是他杀鬼子的一次大捷，闹得全中国都知道王师长把鬼子杀了个血流成河——日军第十一军的参谋们认为，不把王劲哉灭了

不足以平息愤怒。

岛贯武治认为："要充分集结兵力，采取牛刀杀鸡的方式，使部队体验一下必胜的作战实践，以此来振奋目前业已消沉下去的士气。"

果然是"牛刀杀鸡"。

为了对付中国军队的一个师，日军第十一军动用了四个师团，决定利用中国春节战备松懈之机，采取突然袭击、穿插分割以及彻底包围的战术，先把第一二八师附近零星的中国军队打跑，然后将第一二八师包围起来彻底消灭，生擒王劲哉。之前，日军费尽心机地派出第五十八师团的一名参谋和随军翻译，"经中国军前少将刘某的介绍，一月初与早就对王师长不满的该师属下一个旅长成功地进行了间接性接触"。这位准备叛离王劲哉的旅长，与日军秘密接触后达成密约："一、向师团详细报告第一二八师的兵力、配置、行动等情况；二、迅速提供王师长的照片及体貌特征；三、提供日军作战时该旅出动的方向、集结地点和时机等行动概要。有关细节在师团作战行动开始后在张家沟（仙桃镇西南十五公里）战斗司令部进行联系；四、对协定事项严守秘密，决不泄漏。"

日军拿到王劲哉的照片后复制了一千多张，连同对王劲哉体貌特征的说明文字一起，分发给了参战部队中队长以上的军官。

王劲哉师长凶多吉少。

日军把其作战分成三个阶段：第十三、第四十师团担任主攻，分别从长江南北两岸对进，首先捕捉和歼灭长江南岸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一三八师和挺进纵队，为下一步的进攻打开通道；由第三十四师团担任长沙方向的佯攻，以牵制中国军队可能的增援；然后加入第五十八师团，全力攻击王劲哉部，将其彻底歼灭后，抽调一部分兵力占领江南要地，巩固战果并为将来的作战进行准备。

日军士兵得知要朝着令他们垂涎的中国年夜饭出动时十分兴奋。——长江与汉江间水网地带的中国百姓过年有制作年糕的习俗，由此，日军士兵把这次出击叫作"吃年糕作战"。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中国的正月初九——日军第四十师团分成两路北渡长江：右纵队以师团司令部、步兵第四联队、山炮兵第四十联队为基干，从临湘渡江；左纵队以步兵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师团骑兵队为基干，从道人矶渡江。军司令

部的要求是：午夜时分必须全部渡江完毕——想必刚刚上岸的日军士兵定会闻到中国浓郁的年糕的香气——正月初十凌晨，第四十师团左纵队突袭了聂家河一带的村镇，这一带中国百姓的年糕让日军士兵吃得很满意，他们捎带把在这一带过年的中国第六战区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四四五团打跑了。第二天，日军未经战斗占领监利。右纵队的日军渡江后，受到中国军队挺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抵抗，整整打了一天也没进展，直到晚上发现当面中国军队放弃了阵地，才得以推进。与此同时，北面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由沙市以南开始了进攻：由步兵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山炮兵一个大队组成的一路，向郝穴、新厂进攻；由师团司令部、步兵第一〇四联队、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两个中队和山炮兵一个大队组成的一路，向普济观进攻。而在战场的西面，第十三师团的藤仓大队开始向沙岗进攻。

二月十七日，日军第四十、第十三师团从南北两面向新厂做向心突击。中国军队第一一八师和挺进军部队两面阻击，激战数小时后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第一一八师和挺进军部队渡江西退。

日军的两个师团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峰口方向攻击前进。

王劲哉的第一二八师就在洪湖以北的峰口附近。

为了不让王劲哉跑掉，日军第四十师团从东面和南面、第十三师团从西面包围而来，而第五十八师团负责封堵北面。此前中日两军交战，日军向来是根据一个师团对阵中国军队十个师的比例实施作战，这次竟然动用了三个师团攻打中国军队的一个师。从二十一日开始，各路日军逐渐压缩包围圈，而包围圈里那个准备反叛的旅长也与日军特工人员开始了里应外合。

第一二八师官兵死顶着日军，其在水网地带修筑的大碉堡更令日军头疼。这些碉堡步兵火力无法穿透，日军只能强攻上去，往碉堡的射击孔里塞手榴弹或者点燃的稻草，这导致强攻的日军伤亡很大。

大队于二十二日早晨遇到罗家桥敌人狙击，第一中队长大井义隆中尉以下四人战死。随后大队于十点左右攻击易家集堡垒。这个堡垒没有覆盖席子，最初由第一中队担任攻击，见习士兵官以下七人战死，攻击未成功。接着从各中队选拔士兵，从十五点开始攻击，持续一个小时也不成功。

由于第一二八师的顽强抵抗，还由于在迷宫般的水网中常常失去方向，日军三个师团压缩包围圈的行动持续了整整四个昼夜。二十五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终于占领了峰口镇，却发现第一二八师的人马已经不见了。在浓重的湖沼雾气中继续搜索时，日军搜索队与第一二八师一部接战，残酷的白刃战平息后，日军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根手杖，上面刻有王劲哉的名字。

第四十师团命令骑兵队立即追击。骑兵队追上了第一二八师的另一部，双方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中国官兵血流干、人殆尽后，日军在遍地的遗体中发现了一具穿着军官斗篷的尸体，由于脸部已经被打烂无法辨认身份，仔细查看时发现这具尸体的嘴里没有金牙，最终认定不是王劲哉。日军捉住了两名当地百姓，在地上用树枝写了一个大大的“王”字，然后比比画画地审问。在百姓惊恐而零碎的话语中，骑兵队队长安艺武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立即沿着村落前面沿河的那条路一溜烟似的追去。跑了三四百米时，果真那样，在朦朦胧胧中发现前面百米左右有一个黑东西在蠕动。我快步追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当地居民普通便服的男人，全身都被水浸湿了，正在拼命地往前爬。我端着刺刀抢上前去，觉得这个男人的服装及颜面不对，不像行动开始前骑兵队全体成员传阅的王师长的照片。我大喝一声：“是王劲哉吗？”这个男人笑了一笑，连说：“我的王师长，我的王师长。”笑的时候，口里露出了金牙。我心里忽地一下，骤然间感到全身极度紧张。等平静下来时，想起在传阅的照片背面还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右手腕有北伐时被枪弹打穿的伤疤。”掰过来一看，明显地有那样的伤疤，在他那头发斑白的头部，还有军人特有的一条晒黑的痕迹。因此，和小队长商量的结果，都认为也许错不了，于是飞速向部队长报告：“安藤小队捕获一个人，像是敌将王劲哉。”我警戒着据说有二十来个敌人把守的据点，想要尽快把敌将押解到部队本部。当拉他的手时，他“哎哟，哎哟”地直叫，一直喊痛。一看是右脚脖子被枪弹打穿。可是事不容迟，不得已只好把他扛在右肩向前飞跑。右肩上的敌将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动很厉害，他连连地说：“谢谢！谢谢！”

如果王劲哉没有负伤，日军根本捉不到这个打鬼子的老手。王师长被日军关押在汉口，在日军的威逼利诱面前誓死不降。一九四四年他又被押解到南京，一直被关押到日本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后，王劲哉回到陕西老家，曾被胡宗南扣押，但他越狱而出抵达延安，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任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员。一九四八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他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任陕西省政协第二、

第三届常委和省参事室参事。一九六八年春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此战，出动大批兵力的日军第十一军，除了把中国百姓过年的年糕吃了，并把中国军队的一个师打散了之外，没有其他的战果。

尽管侵华日军还能在局部投入大兵力，但从战争全局上看其在中国的兵力日显单薄。日军被迫放弃进攻四川的作战后，由于太平洋战场急需增兵挽回颓势，而日本国内无法征召到更多步兵，大本营只好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当时大本营认为，东南方面战线战局一旦恶化，除了从中国派遣军抽出兵力和资材，别无他路。”大本营召集由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和南方军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经过协商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五个甲种野战步兵师团，即第十五、第二十七、第十七、第十六和第三十二师团。除了第二十七师团被编入关东军序列之外，其余的四个师团全部投入到太平洋战场。

鉴于兵力十分紧缺，二月二十七日，东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七五七号”，明确了在中国战场必须保持的占领区——尽管已经尽力压缩，但似乎哪里都舍不得丢，需要占领的区域仍很广阔——同时明确：在确保占领区的同时，尽量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一、大本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以确立帝国在大东亚自强必胜态势并尽速解决中国事变为宗旨。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按下列要求努力粉碎敌人继续抗战企图，并扼制敌驻华空军活动。

、确保警备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以及金华、宁波附近要地，特别是要首先力争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北部各要地，以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迅速安定。

、要努力确保岳州以下的长江交通，粉碎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基地的敌之抗战力量。

、确保警备广东附近、汕头附近、海南岛北部及雷州半岛各要地，力图安定之，并且对广州湾法国租借地的防卫予以协助。广东附近的作战地区大致在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

、当确保警备上述地区并使之安定时，特别要促进中国方面自发活

动。

、要严格监视敌在华之航空势力，并适时将其击溃，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

、越过上述地区的地面作战，要依据另外下达的命令。

、努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培养我军战力。

、努力实行对敌封锁。

、在上述各项作战中，有关沿海及水域作战，航空作战，必要时要与南方军总司令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协同。

、为促进抗日势力衰亡，要开展对华谋略工作。

、在作战需要的情况下，可派遣一部分部队临时进入接近满华国境的热河省内地区，部分航空部队可进入印度支那北部。

三、参谋总长可以将其隶属下的船舶部队中必要的部分,临时划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

四、有关细则，由参谋总长指示之。

日军变得小心翼翼了，其战争企图已降低到只求维持现有的占领区，而且还要格外提防从中国起飞的战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可是，令东京大本营沮丧之事还是接踵而至：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死了。

毫无疑问，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受挫与补给艰难，对海军的士气影响极大。一九四三年二月，为了解救三万多“处在濒于饿死状态”下的日军，为了避免这些已如死尸般的士兵被美澳联军歼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指挥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撤退——“不得不实行对日军来说从未有过的海上退却”。之后，他把自己的旗舰移到了设备更先进的战列舰“武藏”号上。山本五十六与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横山勇一样，也认为必须用一场作战的胜利来重振士气。他决定向南太平洋的美军发动一次猛烈反击，计划动用第三舰队的舰载飞机和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岸基飞机，以三百多架战机的规模打击自所罗门群岛至新几内亚岛一带的美军舰队以及航空基地。为此，他决定到拉包尔前线亲自指挥

——山本五十六本不情愿到拉包尔去，他认为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核心力量摆放到美军面前是不恰当的，可是，为了重振士气，他只能如此。

因为知道跑到美军眼皮底下的危险，动身前山本五十六给情人河合千代子写了一封信。他说他的血压正常，手指麻木的症状也得到了改善。随信件寄去的还有他的一束头发。

抵达拉包尔的第二天，是山本五十六五十九岁生日。

在随后的战斗中，日美双方展开了激烈空战，作战范围超过二百五十海里。日军战机起飞的时候，山本五十六在机场上为飞行员送行；战机返航的时候，他依旧站在跑道边向飞行员挥动他的军帽。连续四天的大规模袭击，飞行员不断地向他报告各种“战果”，总的说来已将美军的战舰和舰载机基本上全歼了——山本五十六并不知道，战斗中美军的舰只损失微小，而日军战机的损失却是美军的一倍以上——或许日军飞行员明白，他们的司令官所关心的只是士气问题。

袭击作战的最后一天，受到鼓舞的山本五十六决定：到靠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前沿岛屿基地去视察，以重振那里官兵们的士气。特别是，他要亲自向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经历苦战而幸存下来的官兵表示感激。

山本五十六要去的是所罗门群岛。

从位于所罗门群岛与新几内亚岛之间的拉包尔起飞，向西南航行三百公里是布干维尔岛，岛的南端是日军的布因基地。从布因基地再向南飞行几分钟，就能抵达肖特兰岛了，越过该岛东面小小的巴拉尔岛，便是美军占据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几乎所有的幕僚都反对山本五十六前往——那片空域在美军的严密监视下，美军的战机随时可能铺天盖地而来。

但是，山本五十六坚持要去。

四月十三日，山本五十六下令，把他的视察行程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各海军基地、航空部队以及岛屿守备队。

驻守肖特兰岛的第十一航空队司令城岛高次接到电报后十分吃惊，认为将司令官的详细行程用电报拍发是一件愚蠢的事，因为这很可能泄

密。——“司令长官简直发疯了。这哪里是电报，分明是发给敌人的一份请柬。”城岛高次亲自飞到拉包尔，当面劝说山本五十六放弃这次视察，被山本五十六拒绝了。

山本五十六视察行程的电报，由他的副官渡边中佐拟定，电报内容涉及什么时间启程、乘坐什么飞机、飞往什么地方、将于几时几分降落。谨慎的渡边副官曾要求派人地面送达，但通讯军官坚持要用无线电拍发，理由是现在使用的密码是四月一日新启用的，而且是极难破译的五位乱码，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破译。

美军设在阿留申群岛荷兰港的监听站截获了这封电报，电报被立即送往夏威夷海军基地的太平洋舰队无线分队。美军的破译专家在地下室干了一个通宵，十四日凌晨，他们把密码电报全文译成了明码：

GF长官将于四月十八日前往视察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如下：：乘中型轰炸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出发，：到达巴拉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抵达肖特兰；：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返回拉包尔。若遇天气不好，本次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天。

电报被送到海军上将尼米兹手里，尼米兹决定把这个日本海军大将扔到海里去喂鲨鱼。“他是他们的人中出类拔萃的，”美国海军情报官莱顿中校对尼米兹说，“山本是日本少壮派军官以及士兵崇拜的偶像。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你是清楚的，这将使整个日本大吃一惊。”

当尼米兹请示华盛顿时，罗斯福犹豫了一下。尽管在世界战争中对敌方首脑或将领的暗杀行动层出不穷，但美国人还是认为暗杀交战国军队统帅“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行动”。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提醒罗斯福，山本五十六要去的地方是前线，是作战区域，所以这不能算是暗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也认为，干掉日本海军难以对付的核心将领，将可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损失。于是，在空中劫杀山本五十六的计划被罗斯福批准了。

任务由所罗门群岛航空部队司令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负责。他选择了各种性能都比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优越、被称为“双身恶魔”的P-38“闪电”式战斗机，并挑选了由约翰·米歇尔少校指挥的十八名优秀的飞行员。攻击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实施：米歇尔指挥十二人为掩护组，在高空牵制日军的护航战斗机；由托马斯·兰菲尔少尉率领六人组成攻击组，从低空

不惜一切代价攻击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南太平洋上晴空万里。

为了延长航程，十八架P-38加装了副油箱，载弹量也装到了极限，由于起飞重量太大，两架飞机发生故障没飞起来，其余的战机顺利起飞后，为躲避日军的雷达，编队贴着海面以仅十米的高度低空飞行，并保持着无线电沉默。

早晨，拉包尔基地上一切准备完毕，山本五十六和幕僚们分乘两架三菱陆基双发轰炸机起飞了，与山本五十六同乘编号为一号机的人员是：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海军少将、秘书福崎升海军中佐和航空参谋樋端久利雄海军中佐，驾驶员是王牌飞行员小谷武男曹长和他的机组。山本五十六戴着白手套，身穿草绿色陆军大将制服——他听从了幕僚们的最后劝说，为躲开美军谍报部门的耳目临时换下了显眼的白色海军上将军服。登机前，山本五十六交给拉包尔基地海军司令草鹿任一中将两个卷轴，里面是他精心书写的明治天皇的诗。

山本五十六一行在六架零式战斗机的簇拥下向南飞去。

一个半小时后，当小谷武男已经看见了布干维尔岛上碧绿的热带森林时，突然发现一架担任护航任务的零式战机猛地脱离了航线并剧烈地摆动机翼。沿着那架战机飞行员手指的方向，小谷武男惊讶地看见在右侧后五百米高处，八架美军的战机正朝他扑过来。护航的六架零式战机迅速爬升，对高处的美军机群展开了拦截。就在这时，兰菲尔小组径直朝着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冲来。小谷武男迅速降低高度，试图以超低空飞行摆脱攻击；高处的零式战机也发现上了当，迅速向山本五十六的座机靠近，但为时已晚。

宇垣缠参谋长在他乘坐的二号机里看见了可怕的一幕：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变成一团火球，坠入布干维尔岛的茂密丛林中，接着丛林深处升起一股浓重的黑烟。就在这股黑烟向着高空翻滚之际，二号机也被击中了，机尾和机翼都被打断，一头栽进了大海。

仅仅三分钟，日军的两架三菱重型轰炸机全部被击落。

美军战机迅速返航。

除了身负重伤的宇垣缠等三人获救外，其余人员全部丧生。

经过长时间的搜索，日方最终在丛林深处找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残骸。

山本五十六，一八八四年生于日本长冈市，自一九〇一年起先后进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海军大学学习。期间曾以见习少尉官的身份参加日俄战争。一九一九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出任海军大学教官。一九二五年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一九二八年归国后出任巡洋舰舰长、航空母舰舰长、第一航空队司令官、航空本部部长等职，一手打造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强大战力。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一职后，策划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并指挥了日本海军在南太平洋上的一系列两栖登陆作战以及著名的大海战。

山本五十六被击毙，给日本朝野和军队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

天皇悲痛地对参谋总长杉山元说：“将来，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的把握才能发起行动。”

此刻对于日本来说，已经不存在将来了。

就在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之际，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到处演讲，以争取美国加大对华援助。宋美龄以优雅的风度、流利的英语和充满激情的言辞，赞美了美国参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同时她还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与侵略者作战的意志和决心，中国不缺人，缺的是钱和军火，美国不应对中国正在遭受的战争苦难和中国人民正在承担的残酷战斗袖手旁观，中美两国需要携手并肩让世界正义获得胜利，并为重建战后的国际和平尽到大国的责任。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已无法回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鉴于日本政府为扶持汪精卫政权而宣布放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和权益，美英两国也迅速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废除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的“新约”。在美英两国的带动下，在华享有特权的挪威、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国纷纷效仿，也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约”，以废除曾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的心头之痛。为了庆祝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重庆宣布工厂放假一天，学校放假三天。共产党人的陕甘宁边区也

举行了庆祝活动，毛泽东和朱德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庆祝大会。边区政府宣布机关民众团体放假一周，学校放假半个月。

从某种意义上讲，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在中国土上的种种特权被废除，比一场战争的胜利更具历史意义。而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和持久抗战，没有中国以坚决、持久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的重要地位，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一九四三年初夏，宋美龄回国了。她带回美国政府的大批军援项目以及美国人民为中国抗战捐献的数以千万计的美元。

而就在这时，侵华日军又发动了攻势作战。

日方把这次作战称为“江南作战”，中方则称为“鄂西会战”。

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直指中国第六战区的宜昌方向。

在太平洋上开始举步维艰的日本人，难道非要把国民政府赶出重庆而后快吗？

中国的四川省地理奇特，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都要越过险峻的山脉和湍急的大河。因此，从军事上讲，要想进入“天府之国”，必须投入巨大的兵力并拥有雄厚的补给支援能力。就日本目前的国力、军力和财力看，似乎已不具备实施如此大规模作战的条件。尽管这次日军是朝着宜昌而来，但确实没有攻占重庆的企图，其作战的主要目的竟然是去宜昌抢东西——日本人想抢的东西是船。

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敌方潜艇的破坏，船舶损失累累增多，而且随着太平洋方面战势激化，输送兵员、军需品以及为国内生产军需品运输原料的船舶需求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给中国战场方面的船舶似乎已经不多，特别是供中国内河航运需要的船舶在逐年减少，并且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补充。可是另一方面，在宜昌附近扬子江水面上却有十一艘内河航运轮船停泊在那里，总共有一万数千吨（最大的船有二千吨或三千吨）。由于宜昌到岳州一段扬子江右岸（西南）地区大部分为敌人所占据，所以不能向下游通航。派遣军很早就想到，要使上述船舶下航，用于军事运输，则是弥补眼下船舶不足的最佳手段。为此，必须歼灭宜昌至岳州间扬子江右岸的敌军野战部队，以打通扬子江航道。

中国的长江流域河网纵横，没有充足的船舶，日军的补给运输无法得到保证。原来日军拥有的有限的内河船舶，在长久的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布下的水雷炸沉了不少，而大本营连太平洋作战的船舶都供应不及，哪里顾得上给侵华日军补充内河船舶？日军侦察机拍回来的航空照片显示，中国方面有意挑衅般在宜昌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停泊着十几艘大船。日本人看着眼馋，但要把船弄到手，除了拼死去抢别无他法。同时，长江航道始终被中国军队切断，占领宜昌的日军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宽阔的长江水路无法利用，陆路运输艰难而危险，那么，在抢船的同时把长江航道打通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但是，依旧很难设想，日军会不顾付出生命代价深入中国第六战区重兵把守的纵深地域，仅仅为了去抢几艘船。东京大本营不是明确规定尽量不再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了吗？日军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对此阐释道：

第十一军真正的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江南地区的敌军野战部队。但是，由于大本营对于进攻作战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而第十一军意识到仅仅以歼灭敌军野战部队为作战目的，很难获得总司令乃至大本营的批准。所以表面上说，目的在于获取船舶，同时歼灭敌野战军。

第十一军的作战请求获得了大本营的批准。

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东京的大本营来说，有一个不便明言的严重不安：随着太平洋战争进程的演变，日本方面的航空力量逐渐削弱；而在中国战场上，由于中美联合空军作战能力的加强，侵华日军占据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也有丧失的危险。为了维持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特别是防止中美联合空军空袭日本本土，在战机数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本营将关东军的一个飞行团抽调到了关内。既然制空权有丧失的危险，那么打通和保持水路畅通成为当务之急。就水路而言，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航道都不能打通，纵然占据着武汉和宜昌又有什么意义？——不能不打，不得不打，无论是大本营还是第十一军，在中国发动攻势作战的心境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日军第十一军计划动用的兵力多达十万，但却是一盘大杂烩：

第三师团，代号“幸”，司令部设在湖北应山，由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指挥，辖步兵第六（缺第二大队）、第三十四（缺第三大队）、第六十八（缺第三大队）联队，骑兵第三联队，野炮兵第三联队、工兵第三

联队，辎重兵第三联队，并配属从第六十八师团抽调的独立步兵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大队，以及工兵中队一个、辎重兵中队一个。

第十三师团，代号“镜”，司令部设在湖北沙市，由师团长赤鹿理中将指挥，辖步兵第六十五、第一〇四（缺第三大队）、第一一六（缺第一大队）联队，师团骑兵队，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工兵第十三联队，辎重兵第十三联队。

第三十九师团，代号“藤”，司令部设在湖北当阳，由师团长澄田赉四郎中将指挥，辖步兵第二三二、第二三三联队，工兵第三十九联队。

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代号“峰”，司令部设在湖南岳州，由旅团长高品彪少将指挥，辖独立步兵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和第九十一大队，旅团炮兵、工兵和通讯队。

野沟支队，从第五师团抽调，代号“广”，司令部设在湖北应城，由支队长、步兵第五十一旅团旅团长野沟式彦少将指挥，辖独立步兵第九十四、第一〇八大队。

野地支队，由支队长、第三十九步兵团团长野地嘉平指挥，辖步兵第六十八（缺第三大队）、第二三一联队；

长野部队，代号“椿”，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由部队长、步兵第二一七联队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指挥，辖步兵第二一七（缺第二、第三大队）联队、第二一八联队的一个大队、山炮兵一个大队和独立步兵第九十六大队。

小柴支队，从第四十师团抽调，代号“鲸”，司令部设在湖北咸宁，由支队长、步兵第二三六联队联队长小柴俊男大佐指挥，辖步兵第二三六（缺第一、第三大队）联队、第二三四联队的第三大队、独立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工兵第四十（缺第三中队）联队。

户田支队，从第四十师团抽调，由支队长、步兵第二三四联队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指挥，辖步兵第二三四联队（缺第三大队）、工兵中队一个。

针谷支队，从第三十四师团抽调，由支队长、步兵第二一八联队联队长针谷逸郎指挥，辖步兵第二一八联队、第二一六联队第三大队和工

兵中队一个。

军直辖和配属部队，从第六十八师团抽调的独立步兵第六十三、第一一五大队，野战重炮兵榴弹炮第十四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加农炮第十五联队。

与以往的作战不同的是，日军决定采取逐次蚕食的战术，分别对安乡、公安、枝江和宜昌以西的三个地区实施四期作战，作战的基本步骤是从长江北岸渡江，沿江逐渐向宜昌方向推进：第一期从南县地区下手；第二期南北夹击公安至枝江间的中国军队；第三期在宜昌以西作战；第四期留一部分兵力维持长江航道的通畅，主力部队撤回后恢复战前态势。

四月十六日日军各参战部队开始集结。

五月三日，日军第十一军战斗司令部推进到沙市。

此时的中国第六战区，辖第二十九、第十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加上长江上游江防军和其他警备部队，共有十一个军（三十个师）、三个挺进纵队和两个独立旅。由重庆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第三十二军也在战区范围内。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鄂西南的恩施，司令长官陈诚三月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被调到第六战区代行司令长官职务。

日军自“吃年糕作战”后，占据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江南滩头阵地。由此，遵照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第六战区重新调整了部署：东起洞庭湖西面的万林河口，沿着长江南岸一直向西北，延伸到宜昌以北的石牌要塞附近，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由南津关、横店至宜城附近的冯水，依托洞庭湖和汉水间的大片湖沼地带，依托长江天险和荆山山系的险峻地形，以石牌要塞为顶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V字形防御线，与日军第十一军对峙。

关于第六战区的兵力如何配备，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颇有争论。不少人认为，鄂西山地崎岖难行，三峡天险又在其中，还有石牌和庙河两个要塞，日军沿着长江向西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日军要进攻，也只能从战区的两翼推进。因此，主张保持兵力重点于两翼，不必重兵把守江防。陈诚则不这样认为，理由是：日军在太平洋作战中越是失利，在中国战场上越有可能铤而走险，攻击重庆便是日军孤注一掷的目标。如

果江防守军兵力薄弱，日军一旦发起进攻便能长驱直入。中国持久抗战多年重庆都没丢，到这个时候再把重庆丢了，岂不前功尽弃？因此，必须以确保重庆为防御核心，重兵配置在以石牌要塞为轴心的江防方向。退一步讲，即使日军从两翼攻击，我军尚有补救的余地，不至于导致重庆陷落而动摇国本。

日军第十一军正是要沿着长江向西攻打宜昌。

这也是“吃年糕作战”后，日军顽强地保持着江南滩头阵地而不退回原防地的重要原因。

陈诚的预测是准确的。

中国第六战区防守长江南岸的部队第二十九、第十集团军以及长江上游江防军，三支部队沿着长江一线排开：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守万林河口到茅草街一线，第十集团军防守茅草街经公安、松滋、枝江到宜都线，长江上游江防军防守宜都以西到石牌要塞一线。

日军开始集结，其江南滩头阵地的兵力显著增加，中国方面已对日军的攻击企图有了大致判断，但对日军要不顾一切地攻击宜昌认识不足，以为日军渡江后很可能要进攻湖南的澧县和常德，因为那里盛产大米——中国方面想到了日军缺大米却没想到日军缺船——第六战区制订了相应部署：

一、第二十九集团军应着第一线守备部队固守现阵地；其后方控置兵团，除以一部固守津市、澧县外，其余应适时进出澧水南岸，联系第十集团军部队，击灭窜入该方面之敌。

二、第十集团军对松滋、宜都间之敌，应以有力之一部，依江岸既设阵地拒止外，尽量抽调兵力适时向澧水以北地区进出，联系第二十九集团军，对窜入该方面之敌击灭之。

三、江防军应抽出一部，适时向聂家河（宜都西南）方面进出，实施机动作战。

四、第二十六集团军以主力向龙泉铺（宜昌东北约七公里）、双莲寺（当阳西南约六公里），第三十三集团军以四个师之兵力向当阳攻击，以策应江南方面主力之作战。

尽管对日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存在误差，但中国方面沿长江的整体防御部署还是缜密的。

五月五日凌晨，日军第一期作战开始。第三师团在石首附近渡过长江，向中国守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的百弓嘴阵地发起攻击；与第三师团并行攻击的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由藕池口向中国守军第十五师的茅草街阵地发起攻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当面中国守军暂编第五师的三汊河阵地发起攻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中国守军第十五师的团山寺阵地发起攻击；针谷支队也从湖南方向进入洞庭湖向西航行，准备实施登陆作战。各路日军的进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尽管前沿阵地先后被日军突破，但中国官兵让日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第二天，中国军队组织反击，与日军在梅田湖、芝麻坪、黄石嘴和八股头一线展开激战，双方反复争夺阵地，中国守军第十五师四十五团团长陈涉藩和营长李亚安殉国，第十五师和协同反击的第七十七师伤亡过半，各路日军逼近了安乡和南县。

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按照预定计划，命令第二十九、第十集团军坚守阵地并继续阻击，命令江防军抽调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以及第十八军的两个团策应作战。就在中国军队调动增援部队准备再次反击的时候，六日晚上九时左右，蒋介石的电报到达："一、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二、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三、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米区。四、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蒋介石的电令等于让中国军队放弃南县和安乡地区，这违背了战前拟订的将日军的攻势瓦解在长江沿岸的计划。孙连仲只得急电江防军，撤销他的原有命令。

洞庭湖以西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只能在没有其他部队的策应和增援的情况下独自与日军苦战了。不仅如此，孙连仲还要落实蒋介石的"掩护产米区"的指示，他不得不从有限的部队中分兵去安乡和南县一带抢运大米。日军主力趁势齐头并进，中国守军拼死阻击作战，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步兵第九十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在攻击黄石嘴的战斗中被击毙，而"在梅田湖及荷花市的战斗过程中，步兵第四联队第三大队（坂田大队）所属的各中队长，全部战死或负伤"。

七日晚，日军第三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攻占安乡，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部队与集团军和战区都失去了联系。第六战区试图组织

第二十九、第十集团军反击，反击部署尚未到位，日军便向南县猛扑过来。中国守军暂编第五师在多路日军的夹击下苦战一天，伤亡极大，八日晚向沅江方向突围，九日南县陷落。日军继续向南面的三仙湖进攻，中国军队全面退守洞庭湖南岸。

日军第一期作战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一万三千零六十七具”，被俘“一千二百八十四人”。日军“战死一百六十八人，其中军官十三人；负伤六百三十八人，其中军官三十二人”。

南县和安乡地区地势平坦，便于机械化部队机动，对中国守军的防御作战不利。日军采取集中主力多路突击的合围战术，攻击意识极强，推进速度极快，而中国军队在指挥上朝令夕改，部队作战意图含糊，兵力调动消极保守，虽然兵力数量占据着优势，但没能在任何一点对日军构成实质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官兵的拼死作战，在日军的凌厉攻势面前，不能粉碎或迟滞日军的攻势，只能是徒增伤亡。日军仅用三天便攻占了盛产大米的南县和安乡地区，实现了其第一期作战企图。

第一期作战结束后，日军在安乡和南县地区留下一部分兵力，并向澧县和常德方向实施佯攻，牵制中国第二十九集团军不能向北运动，同时命令主力集结准备第二期作战，其攻击目标是松滋和枝江地区的中国军队第八十七军和第九十四军。

九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第三师团十二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主力从东港出发向新河市发起攻击，另派一部从牛浪湖西侧向公安方向出击；第十三师团十二日晚上开始行动，在董市西南渡过长江，沿着枝江到西斋的公路突击，切断松滋河西岸中国军队的退路，然后迅速推进到闸口附近，策应第三师团的作战；野沟支队和第十三师团一起渡江，然后向新河市方向前进，策应第三师团作战；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留一部兵力警戒津市方向，主力则于十三日向北面的公安方向推进；针谷支队十三日后也向公安方向推进；户田支队和小柴支队在三仙湖和安乡地区继续“扫荡”；原来由第十一军直辖的松本幸次郎指挥的松本支队从弥陀寺向公安推进，划归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指挥。

十二日，日军第三师团按照作战计划，在东港附近发动了攻击。同时，第十三师团和野沟支队开始横渡长江，长江天险竟然没有中国军队防守，整整一夜，日军第十三师团和野沟支队主力顺利渡江。十三日，日军第三师团突破当面中国守军阵地，推进到杉木铺至孟溪寺一线，主力猛烈围攻了中国军队的右翼第八十七军，导致该军伤亡惨重，尤其是

第一一八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日军第十三师团和野沟支队渡江后，兵分多路向观音寺方向猛烈突进，中国军队左翼的第九十四军支撑不住向后退却。十四日，第八十七军第四十三师放弃了公安。十五日，中国守军各部撤退到了刘家场和茶园寺以西地区。十八日拂晓，松滋落入日军第三师团之手。

日军的第二期作战用了六天时间。在此期间，中国军队除了逐次抵抗外没有别的作为，而其败退速度之快却令日军追赶不及，日军由此对第二期作战战果很不满意。日方的作战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三千四百二十六具”；被俘“一千一百三十八人”。日军“战死八十一人，其中军官五人；负伤二百七十九人，其中军官十七人”。——“第二期作战与第一期作战相比，战果虽小，但俘敌数二者相等，这都是西斋附近的包围歼灭战的结果。”

日军从南向北逐次攻击，已经沿着长江接近了宜昌地区。

一旦日军突破宜昌防线，重庆将处于日军的刀锋之下。

就在这时候，陈诚回来了。

已经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诚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暂时返回第六战区指挥作战。在与蒋介石交换意见后，两人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让日军突破宜昌防线，沿着长江向西中国军队无险可守。长江上游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是石牌要塞，要汲取一九三八年马当要塞失守的教训，必须死拼死守，决不能让日军突破宜昌。

十九日，陈诚抵达湖北恩施战区司令长官部。

中国第六战区下达的作战命令是：第十集团军现地作战，确保聂家河、仁和坪、子良坪一线，坚决阻击日军第三师团北上，重点保持在左翼；江防军的左翼与第十集团军连接，确保石牌要塞；为加强江防军的兵力，第六十七师脱离第十集团军指挥，回归江防军第八十六军原建制；第七十九军和第七十四军增援常德，确保战场侧翼的安全。

陈诚抵达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当天，日军第十一军也确定了作战部署：二十一日凌晨第三师团从茶园寺附近发起攻击，经聂家河和磨市进入长阳地区，然后继续北进；第十三师团进入全福冲和渔阳关后继续北；野沟支队二十二日凌晨从四得桥附近开始攻击，进入宜都西侧地区；第三十九师团二十一日夜从云池附近渡过长江，攻击长阳方向并北

进。

十九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兵分两路从暖水街和刘家场出发，向皮家冲和三溪口的中国守军第四十三师和第一二一师阵地发动攻击，迅速突破后，二十日进至子良坪和仁和坪一线；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从公安出发，突破王家厂中国守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的阵地后，向常德方向发起佯攻，掩护进攻部队的侧翼。二十一日，日军第三师团向当面中国守军暂编第三十五师、第一二一师和第一一八师阵地发动攻击，双方激战至二十二日晚，日军渡过渔洋河占领聂家河、磨市一线。茶园寺方向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与第五十八师团一部一起，夹击中国江防军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晚上，日军在聂家河附近强渡渔洋河，第六十七师官兵奋力阻击，但阵地最终被突破。日军野沟支队在汪精卫的伪第二十九师的协同下攻占宜都。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渡过长江，进至汪家棚地区。日军另一部在宜都附近的红花套强渡时，受到中国军队第十三师的猛烈拦截，深入受阻。二十二日，渔洋关失守。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向中国守军第十三师阵地猛攻，激战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双方伤亡惨重，长岭岗的中国守军誓死不退，直至打完最后的子弹全部阵亡。晚上，中国军队第八十六军部队退守枇杷树、磨市、仙人桥一线，遭遇日军发生激战后，又退守到马鞍山、板桥铺一线，但左翼的乌龟山阵地未动。

二十二日中午，蒋介石的电令到达：命令江防军以第一线的两个师坚守现阵地，如果日军再突破深入，增加一个师在长阳一线，必须做到持久抵抗，最后的死守线是资丘、木桥溪、曹家畈和石牌要塞；命令第十集团军在清江以南继续持久抵抗，如果阵地再被日军突破，部队主力留在渔洋关附近打游击；石牌要塞要指定一个师拼死据守。

二十三日，除了野沟支队和伪军第二十九师原地未动外，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集中主力，向中国军队第十集团军和江防军的正面阵地发起全面攻势。日军的各路攻击都须横渡数条河流，因为船只短缺导致攻击屡屡受阻。同时，这一带山路崎岖，行进困难，运输给养的驮马队跟不上步兵推进的速度，导致“粮秣短缺，官兵一边啃食生甘薯一边前进”。中国守军在日军大兵力联合突击下，尽管利用险峻地形进行着顽强阻击，但最终无法击退日军的攻势。刘家棚附近的日军向花桥、罗家坪、纱帽山中国守军阵地猛攻，第六十七师的野战工事被炮火完全摧毁，官兵伤亡过半，师长也已负伤，不得已向后转移。日军紧追不舍，第六十七师将所剩无几的兵力投入反击，在中国官兵决死的阻击下日军攻势受挫。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根据战况调整了部署：命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守备沿清江北岸的资丘、马连、都镇湾一线，同时派出部队向龙潭坪、松杨坪方向警戒，并与第九十四、第八十六军密切联系；命令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一部在原地继续阻敌，主力脱离敌人向都镇湾以南地区集结，然后开到汪家棚，与第十三师右翼和第一三九师联系，控制长阳，阻敌渡江，左翼与第十八军密切联系；命令第十八军固守长岭岗到小平善坝一线。

二十四日，日军各部队抵达了清江南北两岸地区，控制在宜昌地区的野地支队也由宜昌长江南岸的桥头堡开始向西进攻，试图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此时，日军已全面逼近石牌要塞，尽管第六战区调集的第七十九军抵达了常德，第七十四军抵达了桃源，第三十军的先头部队抵达了榔树店，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战场的作战中心聚集在清江和石牌地区，成为作战焦点的中国江防军承受着巨大压力。

这一天，吴奇伟得到的战况是：宜昌以西，日军第三十四、第三十九师团联合向江防军阵地猛攻不止；宜昌以南，位于渔洋关和聂家河的日军主力正在全力北上，日军首先攻击的是由第十三师防守的偏岩；上午，日军向驻守清江南岸的第一三九师发起两面对攻，晚上该师撤退到清江北岸；日军正在清江各个渡口做强渡准备，并从南岸制高点向北岸猛烈炮击；一部日军与第六十七师的后卫部队发生激战，该师主力北渡清江到达天坑坪附近；下午，第十三师阵地失守，日军攻占长阳；在弹子垭附近，日军攻击受挫；在五龙口、石榴河方向，日军第三十四、第三十九师团开始联合攻击第十八师的阵地，该师右翼阵地守军伤亡殆尽，日军已经全面迫近石牌要塞核心阵地。

位于长江三峡口右岸的石牌要塞，是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要塞属于宜昌、巴东要塞区第一总台管辖，第一总台总部设在石牌西北的柳林沱。第一炮台设防于石牌，第二炮台设防于庙河。在石牌炮台上，还设有烟幕队、鱼雷队、观察所和无线电台。炮台配备了六门大炮，用以封锁长江航道。一九四〇年宜昌失守后，距离宜昌不到二十公里的石牌要塞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前沿。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蒋介石曾派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亲赴石牌要塞部署兵力。一九四一年，日军向宜昌西部发动攻势时，中国守军利用石牌要塞坚决阻击，海军在长江航道上布设了大量水雷，日军虽然攻占了宜昌至石牌间的平善坝，但石牌要塞扼守着长江航道，日军仍是无法利用长江航运，或者是沿长江向西威胁重庆。之后，日军派出战机轰炸石牌要塞炮台，但因这一带地形险峻，轰炸效果不佳。

这次，日方决定用地面进攻的方式，拔除石牌要塞。

尽管没有继续向西攻击重庆的计划，但只要占领了石牌要塞，无疑是威胁重庆的一个重要筹码。

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不能失去石牌要塞。

石牌要塞的战场位置，相当于武汉会战时的马当要塞，而马当要塞的失守是导致武汉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奇伟的长江上游江防军，是为了固守宜昌附近的长江防线而单独列编的部队，要务即为拱卫重庆。这样一支重要的部队，其组成却十分复杂：池峰城的第三十军是由西北军发展而来，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的前身是晋军商震部，方日英的第八十六军是以湘军为基础的半嫡系部队，只有方天的第十八军属于中央军系统。无疑，江防军中最具实力的部队是第十八军。第十八军下辖罗广文的第十八师、吴啸亚的暂编第三十四师和胡琏的第十一师。吴奇伟知道，江防军即将面对六万日军的进攻，如果守不住石牌附近的外围阵地而导致要塞失守，不但他的脑袋绝对保不住，即便死了也要身背历史罪名。

但是，前线的危机很快就出现了：在宜昌的西南方向，中国守军第十三师与日军激战多日，伤亡惨重，于二十五日上午向偏岩撤退。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吴奇伟，命令第十三师不能再退，必须死守偏岩。可此时的第十三师弹药殆尽，伤员累累，部队完全失去了控制。吴奇伟急令第三十二军第五师师长刘云瀚迅速上前补缺。第五师和暂编第三十四师把继续突进的日军迎面拦住，在偏岩、雨台山、月亮岩一线陷入了苦战。在炮兵还没上来的情况下，发起强攻的日军死伤严重——“在攻击雨台山一带阵地过程中，有服部少尉以下数人战死，十几人负伤。”由于中国守军持续作战能力不强，阵地最终还是被日军相继突破，日军从一线阵地出现的缺口蜂拥而入，而第五师和暂编第三十四师的两翼部队不但不增援反而后撤了，招致刘云瀚师长大骂不止，说这些胆小鬼不被日本人打死也要被委员长砍了脑壳。

二十六日，吴奇伟命令第五师、第十八师和第十一师守备馒头嘴、峡当口和石牌一线。日军从偏岩向馒头嘴和峡当口突进时，必须沿着一条小河进入一片狭长的开阔地，第五师占领了开阔地两侧的阵地后，等于张开了一个口袋，吴奇伟命令第十八师与第五师一起，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实施截击。江防军部队刚刚部署完毕，日军便毫无顾忌地冲了过

来，由于兵力过于密集，狭长的开阔地里满是日军的钢盔。当日军接近中国守军的阵地后，突然遭到两侧火力的猛烈打击，顿时死伤狼藉。进退两难的日军为了摆脱危机，调集战机对中国守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甚至空投了伞兵，但伞兵刚一落地就被第五师官兵歼灭殆尽。

横山勇亲临前线，下达了在石牌、木桥溪一带围歼中国江防军的作战指令：第三师团经牵牛岭西麓，向抱桐树附近追击；第十三师团向木桥溪方向追击；第三十九师团并指挥野地支队向大朱家坪附近追击。同时，所有部队在宜昌附近抢到船舶后立即开走。

同一天，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下达了“拱卫陪都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国军以拒止敌人之目的，始终确保三峡为作战枢轴，凭依三峡南北连山地带，并用正面抵抗及节节侧背尾击，遮断敌人补给线，歼灭进犯之敌于三峡南北连山地带。预期在常德、石门、五峰、资丘、木桥溪、曹家畈、石牌、远安、宜城之线以东山地，必要时则依托三峡要塞，在常德、石门、青岩沟、庙河、雾渡河、南漳、襄樊之线，与敌决战，求主决战于清江两岸亘长江间地区。

而陈诚认为，目前决战的条件没有成熟，只能采取不断纠缠的战法，把日军逐渐引进山岳纵深，待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池峰城的第三十军抵达中心战场后，才能对日军实施反击决战：“战区决心确保石牌要塞，俟第三十、第七十四军到达后，即以第三十军、第七十四军各军主力及第七十九军全部，在清江两岸对向我江防军攻击之敌，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决战时间“预定为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间”。陈诚命令胡琏的第十一师“死守石牌要塞，并预做孤军作战准备”；命令江防军“以石牌为轴，固守三斗坪、石牌之线”；命令第十集团军各部于日军北进的正面“逐次抵抗，迟滞敌军前进”。

实现上述计划的关键，在于守住石牌要塞。

陈诚寄希望于中央军嫡系部队第十八军，他命令罗广文的第十八师负责外围掩护，而把固守石牌核心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他认为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胡琏的第十一师。

石牌要塞的防守已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因为这关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安全。

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注定要因此战成为新闻人物。

陈诚亲自打电话询问胡琏是否有把握守住石牌，深知没有任何退路的胡琏回答得很干脆：“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逼近石牌要塞的各路日军开始了全面进攻。

二十七日，日军一部由津洋口向两河口攻击，另一部向中国守军第五师阵地猛攻，遭到第五师的迎头痛击。日军在增加兵力后，向长儿坪、杨花子坡阵地继续攻击，同时向土地垭、刘家坝方向迂回，试图攻击第五师的侧背。晚上，日军由鸡冠岩、赵家莲向防守沙坦丘、胡家店、鲁家坝、柳林子的第十八军阵地攻击，两军短兵相接，随即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日军的攻击进展受阻。

与此同时，日军在宜昌附近抢到了大小船舶五十三艘，在一个名叫里见金二的海军大佐的带领下，船队向长江下游开去。里见金二大佐很有成就感，因为这天是日本海军的纪念日。船队当天航行到沙市，第二天继续下航开到了汉口。——如此庞大的侵华日军，竟然兴师动众地抢了几十条内河船只，这一行为多少有些怪异。

二十八日，日军逼近高昌堰。高昌堰控制着三斗坪、宜昌、津洋口、渔洋关、贺家坪进出的狭长咽喉要道，是拱卫石牌要塞的要地，日军与中国守军在此激战到天黑，战场呈现胶着态势。而在战场的西侧，沿着曹家畈至宜昌大道进攻的日军，与中国守军第十八师激烈交战后，逼近了石牌要塞。

石牌要塞外围的中国军队发起反击，二十九日第八十七军部队夺回渔洋关，断绝了日军的后退之路。

日军几乎可以看见石牌要塞了。

石牌要塞里原有不少军马，打仗派不上用场，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派兽医官崔焕之把这些军马护送到湖北秭归。胡琏顺便交给崔焕之几封遗书，托其代为寄出。遗书共有五封，分别写给其父、其兄、其妻和好友，内容大致相同，就是此次作战成仁的可能性很大，而为国效忠是军人的本分；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荣耀所在。崔焕之捧着遗书大哭不止。崔焕之走后，胡琏率师部人员进行了祭天仪式，愿苍天护佑将士们守住国土。

胡琏，一九〇七年出生于陕西华县的贫寒农家。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随即投入北伐战场，开始了职业军人生涯。他最早投靠南京警卫二团团长关麟征，在其手下当连长，关麟征部并入陈诚的第十一师后，他成为陈诚手下的干将。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为第十一师六十六团团长，在淞沪会战中死守罗店立下战功，随即被提升为第六十七师第一九九旅旅长。之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一九四一年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第十一师拼命的时候到了。

十八日黎明，日军在战机和火炮的助战下，向第十一师阵地发动进攻。该师三十一团在团长尹钟岳的指挥下，各营沉着应战，在要塞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击退日军的多次攻势。天黑后，三十一团侧后的彭家坡阵地被日军突破，致使该团腹背受敌，阵地的一角陷落。深夜，陈诚打来电话，胡琏嗓音沙哑地表示，第十一师士气旺盛，日军要突破石牌进入西陵峡口，必须踩着第十一师全体官兵的尸体通过，否则他们绝对见不到巫峰。

十九日，第五师仍旧与日军苦战于香花岭附近，该师利用沿河阵地的险要地形顽强阻击，致使这路日军拥挤在狭窄的通道里无法前进。而在第十八师方向，由于官兵伤亡过大，八斗冲阵地丢失，石牌要塞面临着最危急的时刻。

从天亮开始，成群的日军战机将密集的炸弹倾泻在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上，地面上的步兵潮水般地涌上来，把外围三十一团的阵地分割成几块。胡琏命令尹钟岳组织反击，尹团长毫不犹豫，立即下达了命令。冲锋号凄厉地响起，官兵们跃出掩体向日军迎头冲去。没有防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溃退下去。就在三十一团官兵乘胜追击时，黄烟弥漫，日军施放了毒气。双方僵持到天黑，三十一团转移到核心阵地。十二团和三十三团阵地也竟日血战，负责南面要隘的三十三团游国桢营长身负重伤，他裹伤指挥，鼓励士兵决死作战，最终死在阵地上。

三十一团刚刚退守核心阵地，防守侧翼阵地的数百溃兵涌了过来，后面紧跟着大批日军。紧急之下，胡琏命令三十二团副团长李树兰率部把日军压下去。李树兰迅速带领部队冲过去，并把友军的溃兵也组织起来，向日军发动了突然反击，日军的攻击被遏制。

军长方天打来电话，转达蒋介石的指示：石牌要塞乃国运所托，离

此一步便无死所。胡琏把师部移到了石牌要塞四面都是岩石的最高点，然后和各团长官通话，希望各位尽其职守，战斗到最后一人，把敌人的枯骨和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日军的攻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三十日，第六战区的增援部队陆续抵达战场。日军虽仍集中主力向石牌要塞和曹家畈一线猛攻，并试图从天柱山向木桥溪方向迂回，但防御石牌的第十一师阵地岿然不动。日军突破曹家畈阵地右翼后，受到中国守军的夹击，迂回木桥溪的部队也被死死地阻击在那里。

此时的战局开始对日军不利：石牌要塞攻占无望，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已在石门集结完毕，第七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也已进入战场，第十集团军开始向渔洋关和天柱山方向迂回——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决战的条件趋于成熟。

横山勇显然认识到了危险，认为第十一军打击中国军队以及抢船并打通长江航道的作战目的都已达到，如不及时撤离战场很可能陷于被动，于是决定全线撤退。

三十日晚，在石牌外围苦战多日的第五师副师长邱行湘陪同师长刘云瀚在夜色中观察日军动态。他们登高远望，只见长江沿岸山坡上的灯火连绵不绝：

这时我们与江防军总部、第十八军和第十一师通讯网已断。午夜十二时，十三团前哨步队和师侦察队忽报我当面之敌有撤退模样，我和刘师长立即令十三团准备出击，并令侦察部队一分钟也不能脱离与敌接触。拂晓前敌人发起佯攻，我们判断，敌人是在掩护退却。稍顷，我搜索部队报告，敌主力已狼狈回窜。师立命十三团跟踪追击。至此，敌人妄图占领木桥溪以后，西犯贺家坪、东窜三斗坪、席卷我石牌要塞的迷梦彻底破灭……我们祝捷的同时，江防军的通讯网恢复了，首先是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打电话给我，向第五师官兵殷切慰问，并祝贺我们的胜利。

石牌保卫战，第五师在外围苦战一周，阵亡营长以下官兵五百零八人，负伤官兵三百余人。

这一天是防守石牌要塞核心阵地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难忘的日子。战斗进行到极端残酷之时，他曾给军参谋长赵秀昆发出一封电报，以“十

一师为辞公（陈诚）根基，这样牺牲了可惜”为借口，希望把第十一师调出石牌核心阵地。但是，电报发出后不久，胡琏突然发现当面日军不但停止了攻势，而且好像在战场上迅速消失了。——只是，这并没有影响国内报刊在宣扬胜利时把胡琏称为“中国的崔可夫”。

至少在宜昌上游石牌要塞方向上，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日军没能再向西深入中土一寸。

日军对第三期作战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九千零一十七具”，被俘“一千二百二十四人”。

中国第六战区发现日军撤退后，立即部署追击。日军久战疲惫，加上以往中国军队转入追击后动作迟缓，因此在撤退之初疏于警戒。待发现中国军队全面扑来后，后卫部队顿陷混乱。

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四联队、第一一六联队各一个大队以及第六十五联队一部，共三千多人，受到中国军队新编第二十三师、第五十五师的追击，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师和第一师各一部超越日军实施包抄，将这股日军包围在磨市附近；日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和主力部队以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一部，也被中国军队第一二一、第十一、第一九四师和第九十八师主力围困在宜都城郊的狭窄区域内。由于船只被炸毁，日军无法渡江，遭遇围困后受到猛烈打击，负责收容溃兵的第二大队大队长皆家义昌被击毙。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第六十八联队，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六、第二一七工兵联队等部队以及汪精卫的伪军第二十四师和伪九江保安队，分别在红花套至宜昌之间渡江撤退。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先后收复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日军第四十师团千余人和伪军第十一师三千余人，分别向石首、藕池口、公安方向撤逃。

横山勇得知第十三师团等部队被围后，决定立即停止撤退全力反击，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奉命从公安出发反击追击而来的中国军队，第十三师团已经渡过长江的部队也被全部调回向磨市方向攻击前进。被包围在宜都和磨市附近的日军，因为没有渡江船只，只得冒险从中国军队第一九四师和第九十八师的正面突围，以求另寻渡江地点。第一九四师因后续部队尚未抵达，寡不敌众，阵地被日军突破。松滋附近的日军也回头攻击中国军队第一一八师的侧背，该师退守余家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在攻击途中遭遇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致使该旅团受到重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第八十七大队大队长浅沼

吉太郎先后被击毙。

七日，日军施放毒气后，被围部队突击而出，在聂家河与接应的部队会合。两路日军继续向东撤退，但是，当晚，第十三师团师团部遭到中国军队暂编第六师的夜袭——“师团长赤鹿理失踪”。

至六月十二日，日军各部队先后回到原来的出发地，中国第六战区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双方重又恢复到战前态势。

鄂西会战结束。

历时月余的鄂西会战，中国第六战区以十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五个师团的进攻，凭借长江和山地的有利地形，守住了最后的石牌要塞阵地，并在转为追击时给予日军一定的打击。

就日军的作战企图而言，虽然没有达到歼灭中国第六战区主力的目的，但还是对这一地区的多支中国军队造成重创，并实现了打通宜昌附近长江河道的目的。整个会战行动都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日军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此可以说基本上达成了预想目标。

日军战后的统计为：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三万零七百六十六具”，被俘“四千二百七十九人”；日军“战死七百七十一人，负伤两千七百四十六人”。

中国第六战区陈诚的报告则称：“是役敌伤亡约三万，死尸累累可数，我官兵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四万余人，但我战线各县人民生命物资遭敌兵之烧杀损失，则不可计数。”在中国军队损失的统计上，双方大致不差，但陈诚对日军的损失却有夸大之嫌。陈诚虽然夸大了歼敌数字，但他坚持说这一战果是有“死尸累累可数”的，理由竟然是：以往友邦和友军看不起中国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军队的将领每战都虚报战功，这一次他要用有“真确之凭据”的战果，让世界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一个“真确之估计”。

我屡次胜利如台儿庄、长沙等役，每次宣传过甚，反使友邦怀疑。现在第六战区战事，美军部及史迪威等根本不信敌有进攻陪都之企图，以为敌决不致远道轻入深山狭谷，冒第五、第九两战区夹击之险，违反兵法原则，且中国士兵营养不足，军械窳陋，决无歼灭多数敌人之可能性。基于以上情形，我方为增高信誉起见，此次作战应有切实真确之凭据，供给总统及其左右之友华派，俾彼等对我作战能力，有真确之估

计。

蒋介石确实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中国军队在“鄂西大捷”中的战果，但之后并未看到中国军队的声誉因此有了“增高”，更未见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真确之估计”。

数十年后，国民党当局才修正了鄂西会战的统计数字：“第六战区战死两万三千五百五十人，负伤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五人，失踪七千二百七十人；日军死伤三千五百余人。”并且说“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

尽管中国军队奋力作战，石牌保卫战也可圈可点，但把鄂西会战称为一次“大捷”着实勉强。

在战后的总结中，蒋介石列举了此次作战中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固守精神，轻弃阵地。

二、缺乏横的联系，不能协同一致，互助增援。

三、不知利用地形，减少伤亡。

四、浪费兵力，不能控制最后预备队。

五、虚报伤亡，不能掌握部队。

六、不知施行袭击与逆袭，达成防守战的任务。

七、特技部队训练不够，故不能因地制宜，克敌制胜。

八、通讯联络不确实。

九、下级官兵缺乏独立作战的精神与能力。

十、高级将领不能切实负责，维持纪律。

十一、官兵不能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以上讲评显然避重就轻。

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国民政府统帅部以及军队高级将领战

争指导思想的消极被动。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所秉承的“持久消耗战略”是符合国情的，但这并不等于坐等日军自行消耗。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出大量兵力，留在中国战场的部队作战意志严重减退。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依旧采取只要日军不进攻就保持原状的策略，作战基本上是日军大规模进攻后撤退时实施追击的单一战法。仅就鄂西会战而言，日军在此前的“吃年糕作战”中占领了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明显是为下一步进攻宜昌方向的作战开辟出发地，但中国第六战区竟然容忍了日军开辟桥头堡的行为，导致鄂西会战一开始中国军队便处于被动。鄂西会战开始后，日军改变了战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突击，而中国方面依旧行动迟缓，作战呈一再退守状态，防御阵地被日军各个击破。

尽管如此，鄂西会战的结局还是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美英两国的通讯社都发表了评论，认为“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而美英舆论的评论重点则在于“华军获得空军配合作战，可谓以此第一次”，“日军之败退，中美空军亦有一部分功绩”。

如果说鄂西会战使日军产生了挫败感，那也更多地源于空中而不是地面。

鄂西会战期间，中美联合空军以前所未有的攻击令日军大为吃惊。

五月十九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之间的中国守军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出动八架P-40E、四架P-43型战机、猛烈轰炸了长江中的日军军舰；二十五日，中国空军由四川巴县起飞的十五架P-40E战机，分两批轰炸和扫射了长阳、宜昌一带的日军阵地。在日军与中国江防军激战时，中国空军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持续攻击了日军的交通线和后方补给线。二十九日，中美联合空军轰炸了日军占领的宜昌。三十日，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飞临岳州至沙市之间的长江上空，轰炸和扫射了日军的舰只，同时炸毁了停在沙市的日军的一列火车。傍晚，中美联合空军再次飞临宜昌，猛烈轰炸了日军的卡车车队，把宜昌附近日军的三个大储油罐炸毁，还在宜昌南部日军的重炮阵地上扔下了二十四枚五百公斤的炸弹，令日军的重炮阵地基本瘫痪。三十一日，中美联合空军轰炸了日军位于荆州和宜昌的机场，击落日机二十三架，击伤八架。六月一日，中国空军第一大队的三架SB-3型战机、第二大队的五架A-29型战机，轰炸了日军的梁山机场。同日，美国空军的十架P-40型战机飞赴前线，轰炸了铁路干线以及日军的火车和仓库。二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长阳至宜都

之间寻找撤退的日军，击沉了日军渡江用的木船、汽艇和小火轮，扫射了正在行军中的日军。同时，美军飞机在宜都上空数次与日军的零式战机进行空战，日军战机被击落数架，美军损失轻微。三日，美军战机在长阳东部发现正在撤退的日军，随即俯冲轰炸扫射，日军损失惨重。两小时后，中国空军的战机飞来，日军的撤退队伍再次大乱。六日，中国空军的十三架战机由第四大队大队长李向阳带领，向聂家河附近的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重创后返航，降落加油时十余架日机偷袭而来，第四大队中队长周志开刚刚加完油，在尚未安装保险伞的情况下果断起飞迎敌，连续击落三架日军轰炸机，创造了抗战期间中国空军个人一次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

至鄂西会战正式结束的六月十二日，中美联合空军先后出动战斗机三百二十六架次、轰炸机八十架次，击落日机四十一架，炸毁敌机六架，破坏机场五处，摧毁日军阵地六处，炸毁日军舰船二十三艘。鄂西战场上日军步兵的头顶上每时都有中美战机的轰鸣声，尽管日军的零式战机有时前来格斗，但日军步兵眼看着自己的战机纷纷坠落，悲惨的场景令他们目瞪口呆。

中国空军已经恢复了元气。

在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援助下，中国飞行员已初步具备与日军飞行员长空决斗的能力。

接着，又一名日军高级将领的座机在中国上空被击落：指挥对中国各大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的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中薗盛孝，从台北飞往广州的途中，受到美国空军四架P-38战机的拦截，座机中弹后栽落在广东的流溪河岸，中薗盛孝连同他的随从一起当场毙命。

日本方面发现，中国战场上的“空中优势或许可以说在作战末期开始出现了我与敌之间易位的征兆”。

鄂西会战刚刚结束，传来欧洲战局发生骤变的消息：作为德意日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在盟军的打击和国内危机的迫使下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扣押，意大利宣布向盟军投降。

此时正是日本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的时刻。汪精卫发表长篇声明，说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并再次对重庆方面实施诱降。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无暇听汪精卫说什么了。他已经接到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正式邀请，而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盟国如何联合对日作战。

在中国战场上，初步感受到了空中优势发生“易位”的日本人，此时或许也能隐约意识到，中国战场上最重要的“易位”，是中国的对日作战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日本的战争对手不仅仅是中国了。

意大利投降后，只剩下日本和德国在与整个世界抗衡。

一九四三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抗战的重要历史时刻来临了。

第三十三章

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继续打下去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见胜利的曙光。

在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令苏联人渡过了战争最黑暗的阶段。德军的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第四集团军以及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被苏军歼灭殆尽。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总兵力减少到五百二十余万，而苏军的总兵力增加到六百四十余万，飞机和坦克的数量也超过了德军。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场态势，希特勒策划了代号为“堡垒”的战役，准备投入一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两千七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两千零五十架作战飞机以及将近九十万的陆军兵力。其中五十个最有战斗力的师配属许多独立的作战部队担任主攻，组成由克卢格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和由曼施坦因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另外还有二十个师在战场侧翼配合攻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局部防御后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投入的部队是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中央方面军、瓦图京上将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大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波波夫上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科涅夫上将指挥的大本营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共计一百三十余万兵力，同时投入两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三千四百四十四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两千一百七十二架作战飞机。

七月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库尔斯克会战——骤然爆发。会战开始后的第一天，德军就投入了全部基本兵力，但在苏军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中伤亡惨重。双方随即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坦克、步兵以及战机的混战。战斗到第七天，苏军在尚未动用战略预备队的情况下，基本上扼制住了德军的攻势，德军付出巨大伤亡后仅楔入苏军防御阵地十至十二公里。为了拿下库尔斯克，德军集中兵力突击一点，苏军也在这一点上集中兵力反击。十二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坦克遭遇战爆发，交战双方的两千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参加了战斗，然而德军第一天就损失了四百多辆坦克，一万余名官兵被击毙。接着，苏军开始了全面反攻，各集团军群迅猛突击，在斯摩棱斯克、顿巴斯、基辅和克烈缅楚格方向，沿着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战线对德军实施猛烈攻击。经过奥廖尔战役、顿巴斯战役、第聂伯河战役等一系列大战后，苏军重创德国陆军一百二十八个作战师，相当于德军在苏德战场上陆军总兵力的一半，把战线向西推进了三百至六百公里，收复了第聂伯

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和北高加索，并开始向第聂伯河右岸和白俄罗斯地区挺进——德军被赶出苏联国土的日子不远了。

在地中海战场，盟军占领北非之后，意大利完全暴露在攻击之下。七月十日，盟军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进攻战役，该岛上驻有意大利军队九个师以及德军的两个师。而盟军第十五集团军，辖蒙哥马利上将指挥的英军第八集团军和巴顿上将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共十三个师近五十万兵力，作战飞机四千余架，舰艇三千二百余艘。战役发起后，盟军顶着狂风巨浪登陆西西里岛海岸，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土崩瓦解，德意军死伤三万三千人，被俘十三万二千人，还有十万人逃回意大利本土。八月十八日盟军攻占西西里全岛，从此掌握了地中海控制权。

接着，英军第八集团军强渡墨西拿海峡向意大利本土突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意大利内部发生混乱，墨索里尼被扣押。九月二十九日，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投降书》上签字，意大利宣布从此倒向盟军一方。

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起，盟军先后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对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已经初步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盟军，采取越岛作战的方式，向后方日军防守薄弱的岛屿连续攻击，使得前方岛屿上的日军逐渐失去支撑，战争的主动权随之完全落在盟军手中。八月，日军不得不撤离阿留申群岛，将北太平洋防线收缩至千岛群岛。在南太平洋上，日军企图坚守的所罗门群岛、新乔治亚群岛以及新几内亚岛的东南部相继被盟军攻克，日军仅在所罗门群岛战役和新几内亚战役中，就损失了十三万官兵、七十多艘舰船以及八千多架作战飞机。在西南太平洋上，新不列颠岛上日军的主要战略支撑点拉包尔，已完全处于盟军海空军的控制下。中太平洋上日军的战略要地特鲁克群岛也失去了屏障。——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攻菲律宾的通道已经打开。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形势”以及“战略方策”：

在战略上，美国在太平洋方面反攻的速度和规模，远比我方预料的迅速而且强大得多。因此，我方企图扩大初期作战战果的各个战役——中途岛作战、瓜岛作战以及东南太平洋方面的岛屿作战等——均归失败，并且严重地消耗了准备用于对英国施加压力的日军力量。另一方面，在政略上，以德意军由北非撤退为转折点，导致意大利脱离三国轴

心的不利局面，以至日德意三国协同作战的基本设想也宣告崩溃。

二十五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召开联席会议，最终拟订出《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并于意大利宣布投降后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提交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予以确定。《指导大纲》决定：日本须从东南太平洋的“激烈消耗战中撤出来”，“抓紧时间”建立起一个“绝对国防圈”，并以此为最后的防线，其间“迅速充实以航空兵为中心的陆海军战斗力”，“坚决以独自的力量”与英美决一死战。

方针

一、帝国以在今年内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攻势企图，迅速确立必胜之战略态势，急速增强决胜战力，尤其航空战力，主动遂行对美英决战。

二、帝国密切与德国合作，向完成共同战争迈进，并进而谋求对苏关系好转。

三、迅速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并加强大东亚团结。

要领

一、排除万难，以一九四四年中期为目标，确立战略态势，应付美英进攻，随时摧毁敌军反攻。在帝国战争遂行上，于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所应绝对确保之要域，兹定为包括千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西部新几内亚、巽他海峡以及缅甸等在内之圈域（绝对国防圈）。

在战争之始终期内，确保圈内之海上交通。

二、对于苏联，极力防止惹起日苏战争，进而改善日苏邦交并相机斡旋德苏和平。

三、对于中国，继续实施压迫，尤须抑制自中国大陆对帝国本土之空袭及海上交通之妨害，相机迅谋解决中国问题。

四、对于德国，须用尽手段，图谋紧密合作，但不得因之惹起对苏战争。

五、对于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须把握民心，确保对帝国协力战争加以指导。

六、统帅与国务的联系，须更加紧密。战争指导，须更加灵活。

七、为迅速集结发挥国内总战力，须断行决战施策，增大决战战力，尤其航空战力，并发挥举国赴难之高昂士气。

八、在一贯方针之下，加强对敌之宣传谋略，其重点为：宣传轴心国之道义，彻底施行大东亚政策，使主敌美国丧失战意，离间美、英、中、苏，以及促进印度独立等等。

从军事上讲，日本人的战略企图已经无法实现。

在东南太平洋上，日军付出巨大死伤代价保持下来的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北部和新几内亚的东部，都已濒于崩溃。面对盟军在海空战力上远胜于日军的战场态势，日军即使再投入兵力也难有把握长期确保这些占领地。因此，不得不将“绝对国防圈”收缩至从新几内亚的马当，越过俾斯麦海，直到拉包尔、布干维尔岛一线。日本人决心死守该线。——可是“这样一来，今后东南方面的作战性质将转变为全面的持久战，以拉包尔为中心的该方面的我三十多万占领部队，不得不逐步陷于孤立的状态”。

日本的军力开始捉襟见肘。受到重创的海军和海军航空兵已失去与盟军抗衡的能力，陆军也因国内预备兵源的枯竭而无法得到补充。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陆军约七十个师团中，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以及东南亚占领区的扩大，只有五个师团被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南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的散落岛屿上。由于海空军力量被削弱，岛屿部队补给困难，装备短缺，岛上的日军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刻依旧严重地依赖白刃作战的武器——刺刀。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也面临困境。日本政府颁布了《军需企业法》，将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行业公司强行列为军需企业。尽管暂时刺激了军火生产，但很快就因本土资源的严重匮乏难以为继。加之受到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影响，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掠夺的工业原料遽然减少。维持战争的成本不断暴涨，令日本平民陷入巨大的痛苦中：农村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导致粮食连年减产，每人每天配给的三两多大米变成了带稻壳的糙米；民用棉织品生产供应量也严重萎缩，平民按照配给每年买到的棉布，连做一件婴儿的衣服都不够。日本政府开始动员民众增产粮食，衣着简化，同时确定了“战时动员学生体制纲要”，即动员学生参军服役。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军火工业所达到的举世罕见的生产能力令德国人和日本人目瞪口呆。具有强大工业制造能力、技术能力和资本能力的美国，其军火生产一旦开闸，生产线犹如钢铁洪流一般席卷而来，美国制造的飞机、舰船、坦克、火炮，源源不断地被运往盟军的各个战场，金元帝国迅速变成世界上最壮观的军火工厂，美国所迸发的巨大的国家能力成为德意日法西斯的一场世纪噩梦。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美国国内所有与军工生产相关的企业，无不在开足马力进行军火生产。通用汽车公司在接到生产坦克的指令后，不到一个月便把装备着V8发动机的坦克开下了生产线；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数千架四引擎B-24轰炸机、数万台飞机发动机、数十万辆坦克迅速出现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自这一年的二月交付了第一架D-1型战机后，以空前绝后的生产能力两年之内交付给美国军方的战机高达三万架。一九四二年，美国坦克产量达到三万辆，远远超过了德国和苏联，因此英国人在北非战场上根本无需考虑坦克的损失，只需与德军拼死作战就可以了。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军损失坦克五百多辆，德军损失四百多辆，损失几乎相等，但是德国人的坦克拼光了，英军手里还有六百多辆崭新的美国坦克尚未启用。一九四二年底，美国生产各类飞机四万七千多架，而德国生产了一万五千多架，日本生产了八千多架。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生产飞机二十多万架，日本仅生产了七万多架。——日军与盟军空中优势的易位，首先是战机数量的易位。更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是美国的舰船生产能力。在美国本土的工厂中，平均每个月就有三艘航母下水，一九四一年以后，美国总共下水了航空母舰一百三十一艘、战列舰十艘、巡洋舰四十八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八百多艘、潜艇二百多艘。同期日本仅仅制造了航空母舰十七艘、战列舰二十二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六十三艘和潜艇一百多艘。——日本的水面舰船数量只是美国的零头，太平洋上的战争胜负早已没有悬念。

巨大的军工生产能力造就了强大的美国军队。此时美军的兵力总数已过千万，单位火力密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在盟军为反攻欧洲大陆实施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时，盟军的上万架飞机几乎遮盖了诺曼底海岸的天空，而德军的迎战飞机只有四百架。在太平洋战场上，在美军铺天盖地的航空炸弹的打击下，无论日本陆军和海军如何顽强也只能是集体“玉碎”——日本所剩无几的海军舰船和飞机，最终都龟缩到日本本土附近保卫天皇去了。

军火生产高昂的利润强烈刺激了美国经济发展。自一九四一年起，美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二，工业生产比值和外贸出口成倍

地增加，这使得掌握着全世界三分之二黄金储备的美国，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强国。

不知在这种情景下日本人坚持把美国定为“主敌”，决心将美国打得“失去战意”，是不是精神已经错乱了。

尽管盟军的作战重点依旧在欧洲，但中国战场对于盟军，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愈发重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只要看一眼亚洲地图，就会意识到太平洋岸边的中国大陆对于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而言，将是一个怎样广袤的陆基基地。且不说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大部分的军事力量，仅就太平洋战场的侧翼而言，一旦失去了中国的巨大依托，美国再强大也难以奢谈打到日本本土去。——美国人什么都不吝惜，就怕美国人死得太多。

美国前所未有地和中国亲密了起来。

此时，在中国战场上的美军，除了军事顾问团成员、援助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军事教官外，作战部队主要是第十四航空队，这支部队驻扎在中国广西的桂林。

奇峰碧水环绕下的桂林城，自古便是中国的山水胜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城呈现出五色纷杂的奇异情趣：这里是中国各方抗战力量的聚集地，国民党党政机构、共产党的办事处、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总部比邻而设；这里也是战时中国言论最为自由的地区，各类宣传抗战的文艺队伍五花八门，编辑印刷的各类出版物风行全国。这里混杂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官吏、富商、伤兵、逃兵、难民以及流浪文人，他们大多为躲避战火而来。在难民中，香港难民最为显眼，他们开设取名为“蓝鸟”或者“绿蒂”的咖啡馆，寄卖出售他们从香港带出来的电烤箱、英式台灯、咖啡壶、网球拍等。这些有钱的香港人根本不像难民：

每当傍晚时分，这些人常常穿着他们那“仅此一套”的漂亮衣服，拥塞在城内那条南北走向的主要大街上，闲逛聊天，调情说笑，传播流言蜚语，或对其他人评头论足。姑娘们穿戴入时，她们有的穿着中式服装，有的穿着西式服装，偶尔穿着裙子或懒散衣，小伙子们一派西式打扮，穿着带披肩的热带服装或色彩鲜艳的运动衣。战时的内地，只有桂林这个城市不顾“新生活运动”禁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命令。在电影院、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中，收音机和留声机高声播放着刺耳的中国戏曲、上海爵士音乐，甚至美国的旧情歌。在古老中国的心脏地带，竟然看到这样

的场面，听到这样的音乐，不免使人产生一种稀奇古怪的感觉。

但是，桂林最奇异的风景，是随处可见的美军。这里的空军基地驻扎着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存不少美军经过这里周转行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桂林附近奇形怪状的葱郁小山惊呆了，美军官兵认为：可以把这些小山装上轮子，待日军飞机袭击的时候，就把这些小山推来推去当作屏障。美国人把桂林称为“东方的巴黎”，“他们都决心享乐一番：有的一本正经地选购纪念品，有的把囊中钱财吃喝一空，有的像孩子似的在街道上大放鞭炮，有的在小巷中追逐咯咯发笑的女郎”。桂林当地产的一种中国酒香醇可口，许多美国人嗜此如命，“致使酒价猛涨而酒味猛跌”。

但是，美军终究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要打仗。

美国空军以桂林为基地四面出击。滇缅作战时，他们飞越沉睡的中国村庄，轰炸了缅甸萨尔温江岸边的日军；他们从空中轰炸突击中国军队阵地的日军，炸毁日军的仓库、车队和船舶，同日军的零式战机疯狂地格斗。一九四三年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去轰炸台湾的日军机场，指挥官说只要完成任务，返航后罐头火鸡、蔓越橘和上好的威士忌可以尽情吃喝。二十多岁的指挥官文森特上校提出抗议，要求起飞前提前开宴。吃了火鸡、喝了威士忌的飞行员升空了，他们都知道携带的油料仅够扔完炸弹后勉强飞回桂林，只要稍有意外就回不来了。他们飞越中国沿海的山脉，然后贴着海面低飞，螺旋桨把带着咸味的浪花吸进了机舱。在台湾新竹机场上空，他们一声呼啸发动了突然攻击，日军的战机四分五裂，燃起冲天大火。在炸毁了五十多架日机后，他们向他们喜爱的“东方的巴黎”方向返航。尽管牧师自他们起飞就站在跑道边真诚地祷告，但仍旧有美国青年没能活着回来。

“这种精神是难以描述的，”美国记者白瑞德说，“因为任何一个美国军人都不会大声地承认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那是政客们干的事情。”他们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糟糕的军营伙食、苛刻的军士长，嘲讽陈纳德、史迪威以及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但是，当罗斯福逝世的时候，他们却“像孩子一样哭泣”。美军没有豪言壮语的军歌，他们唱的都是流行歌曲，一九四二年唱的是《你是我唯一的阳光》，一九四三年唱的是《皮斯特尔·帕金妈妈》，来到桂林后歌就唱杂了，包括德国人的《莉莉·玛琳》、英国人的《一艘部队运输船就要离开孟买》以及澳洲人的《翩翩起舞的马蒂·尔达》。——美军的战斗精神“产生于过去一百年的情感素质，悄悄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

令美军飞行员付出巨大牺牲的航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飞越野人山、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这些山脉平均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最高的可达七千六百米；雪山峡谷之间，萨尔温江、湄公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穿流而过。自一九四二年起，美军飞行员迎着厚厚的喜马拉雅云层，以飞行高度的极限飞越险峻的山口。在这条人类飞行史中最危险的航线上，哪怕风向稍有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为了爬升得更高一些，他们甚至使用了尚未经过试飞的新出厂的C-46型运输机。他们在凭借肉眼观察划出的航线上，一次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自“驼峰航线”开辟以来，美国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来。最初运到中国的物资每月几百吨，后来增加到上千吨，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竟达七万多吨。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九四五年，经“驼峰航线”运往中国的抗战物资累计达六十五万吨，运送战斗人员累计达三万多人。在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巨大的空中运输中，美军于“驼峰航线”的飞行中共损失飞机一千五百架以上，还有三千多名美军官兵付出了生命代价。——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美国人民付出的鲜血和生命令中国永远铭记。

当然，美国人的牺牲必须是为了美国利益。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艰难时刻后，美国觉得有必要向全世界表明，盟军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符合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美国人决定把蒋介石从中国请出来，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与美、英首脑会晤，并让这次会晤成为世界舆论的头条。

美国人把召开英、美、中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通报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要求长期住在美国盯着盟军军备配额的宋子文转告蒋介石。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让他和仍在美国的宋美龄商量后回复罗斯福：

对于罗总统拟丘（丘吉尔）、史（斯大林）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提议，甚所感纫。惟余觉在苏联与日本尚未公开决裂以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若果有此顾虑，而目前为商讨战略，英、美、苏有提先会谈之必要时，似不可因待四人会谈而延迟。故余意或请美、英、苏三国领袖可先行会谈。至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惟如罗总统以为此次会谈余有参加之必要，而无如以上所述之顾虑，则中亦不敢坚辞。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宋美龄），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

除了对苏联始终存在的戒心之外，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事先与罗斯福单独会面——蒋介石想在首脑会议前，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不然无法确定在首脑会议上他将处于何种位置。七月四日，罗斯福回电，称单独会面十分重要，建议在重庆或华盛顿间选个地点。蒋介石八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

罗斯福于七月中旬再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二十一日，依旧对苏联心存戒备的蒋介石回电，认为如果在阿拉斯加开会，他就必须经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到了苏联国土上而不与斯大林见面不合适，因此建议改个地方。至于中美首脑单独见面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到华盛顿来。但这一建议被宋子文以“钧座军政羁身，似难以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拒绝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将在埃及海岸的某个地方举行。罗斯福说，现在还没有得到斯大林是否出席会议的答复，但无论怎样，他和丘吉尔都将在埃及与蒋介石会面，届时罗斯福将率领美国最高级别的陆海空军官前往，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将得到圆满的解决。十一月一日和九日，罗斯福又两度来电，承诺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可以与蒋介石单独会晤。蒋介石回电罗斯福，表示他将准时参加会议：

余当如最后尊电之所约，届时前来与阁下及丘吉尔相晤，此间一切当严守秘密。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与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

会议最后确定的地点是埃及的开罗。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开罗会议。

为了准备三国首脑会议，国民政府各部门立即陷入忙乱之中。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提案和草案，在这个几乎包罗所有可能涉及中国前途的应对方案中，最主要的是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接受原则和条件、战后处置的重要问题以及应对英美可能提出的问题。尽管这一准备潦草而残缺，但在要求日本必须归还近代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个问题上，立场十分坚定。因为涉及中国将要面对的战后利益问题，因此值得在此抄录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

（一）对日反攻战略设备及讨论关于远东各问题之机构（由军事当局准备提案）。

（二）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

关于此问题似应询问意国已接受或应接受之政治、经济及财政条款（军事条款业经公布），以及莫斯科会议商议德国投降时所应接受之条款。日前签呈关于日本之条款共二十五条，兹将其主要原则开列于左，以备酌量提出商讨：

关于军事者：

一、日本一切军舰与商船、飞机、军器以及作战物质应即听候联合国处置，其中一部分应交与中国。

二、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其全部陆、海、空军部队在未撤退以前，日本应负责保存其占领区内一切公私财产（包括交通运输制度在内），并不得加以毁坏。

三、联合国指定日本若干地点派兵驻扎，以保证本文件及和约各条款之切实施行。

四、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

关于政治者：

五、日本应依照联合国指定之名单，将其战事犯及各地伪组织官吏交付联合国听候审判。

六、日本应将以下所列归还中国：

甲、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

乙、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

丙、台湾及澎湖列岛（两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

丁、琉球群岛（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

七、承认朝鲜独立。

八、日本应解散其国内一切从事侵略之团体，并取缔一切侵略主义之思想与教育。

关于经济及其他者：

九、日本应将其文武人员，或私人所运走之一切金银货钞、有价证券、重要书籍、公文及其他有历史性之物品，分别归还联合国。

十、日本应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

十一、联合国应设立一监督委员会，以保证日本切实履行本文件所列各条款。

（三）战后重要问题：

一、维持世界和平：战事结束后现有之联合国团体仍应继续存在，而以中、美、英、苏为主席团，担负维持世界和平之责，至普遍集体安全制度成立时为止。

二、国际经济合作：在原则上可予赞同，并表示欢迎外资。

美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关于二万万美圆黄金运用之办法（由财政当局准备简明答案

二、关于我国战时经济状况，例如物价、通货、预算等问题（由财政当局及其他有关机构准备简明答案）。

三、中共问题：似可将中国共产党之妨害抗战及政府一贯宽大政策略为说明。

英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西藏问题：本年八月间，宋部长与英外相艾登曾在伦敦谈及此问题，双方意见相去甚远，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

二、九龙、香港问题：九龙为租借地，归还中国固属毫无疑义，惟在英方视之，九龙与香港属一问题，而香港为割让地，其法律上地位与

九龙不同，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

英、美双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国际金融平准基金问题；

二、国际银行问题；

三、国际民用空航问题。

以上三问题在原则上可予赞同，惟详细办法似应保留从长计议。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经印度飞往开罗。临行前，蒋介石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中国人好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历史证明，无论中国人如何遵从“以礼待人”的传统处理外交事务，非但从来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知”和“敬”，吃亏和受辱的却总是中国人。——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抗战中国终于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一行抵达开罗。

中国代表团基本阵容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蔡文治、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黄仁霖、侍从室组长陈希曾、侍从武官陈平阶、侍从秘书俞国华、随从医生左维明以及宋美龄英文秘书陈纯廉等。

英、美、苏代表团成员都是政治、经济、军事专家，因为会议期间需要就讨论的各种问题进行随时磋商，于是有外国记者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非常不专业，他们注意到连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都没有参加——“规模很小的中国代表团主要由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组成，”记者评论说，“有些对于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这个古老而独特的东方国度。

或许只有带着大批侍从赴会的蒋介石心里明白，战争进行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大战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而他主政的中国仍是个混乱不堪的国度。

依据东京大本营制订的一九四三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占领区，并继续增派部队用于太平洋战场。可是，鄂西会战后，侵华日军总数依旧有二十四个师团、十二个独立混成旅团和十三个航空中队，总兵力约六十万。身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深知，诱降重庆并隔断其与英美的关系，除了诉诸武力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局面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已经越来越迫切。畑俊六虽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坚持认为："杀出一条血路是能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重要方策。"

所谓的"血路"，就是攻入重庆国民政府所在地四川。

为此，鄂西会战一结束，他就派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去东京，直接向大本营请求批准他彻底"消灭重庆政权"的作战计划。天野正一向大本营提出的建议是："总司令官已胸有成竹，仅仅指望以政略的成果来解决中国方面问题是困难的。希望能决心在本年十一月后至来年月进攻四川。"

东京大本营否决了畑俊六的建议。

理由是："不能对派遣军增派兵力，新组建部队更为困难。"

作战计划被否决的当天，畑俊六写下日记："如此只能一直成为美英反攻对象，终将处于守势。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打算，重庆屈服的时机是不会到来的，实乃可叹！"

八月二十八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订了《昭和十八年秋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大纲》依旧体现出畑俊六强烈的进攻意识：

作战方针

派遣军努力确保和平定现有占领区。特别是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有组织地歼灭共产党为目标。同时在本年秋季以第十一军及第十三军主

力分别进行常德作战和广德作战。来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十一军进行打通京汉线作战。

另外，除在全面加强防空并以第三飞行师团配合地面作战之外，尚须迅速恢复和提高战力，以灵活的战术粉碎敌航空能力。

作战指导要领

一、华北扫共作战

华北方面军在本年秋季须进行长期作战，有组织地摧毁共产党军根据地。

二、常德作战

进攻常德附近，搜索并歼灭中央军，摧毁第六战区根据地，以削弱敌继续抗战的企图，同时为派遣军在减少兵力之后能顺利完成任务创造条件，并且牵制可能调往云南的重庆军机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畑俊六知道蒋介石的军队不会主动发动攻势。尽管双方的对峙线很宽大，但日军仍有能力实施短促突击，打击以中央军为首的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长期的作战令畑俊六对蒋介石的军队了如指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拥有的军队兵力多达五百三十多万，遍及九个战区以及昆明行营、远征军部队。但是，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区域却越来越小，财政极度困难，物资供应紧张，政府无法遏制内部的腐败，军政官吏与商人勾结起来囤积居奇，再加上军官普遍克扣军饷，导致士兵逃亡现象严重，几乎每支部队都缺额，单位战斗力迅速下降。如果说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军队对付日军常设师团的一个联队要动用一个师的话，现在几乎要动用一个军了。畑俊六对中国战场的最大忧患是，战争到了一九四三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越来越强大了。

日本人认为：“中国问题的重点有三，即粮食、物价、共产党。”蒋介石同样以共产党的壮大为患。出发去开罗之前，他精心策划了一件大事：要求国民政府统辖区域内的所有人，必须“切实研讨”一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此书是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代笔，再以蒋介石的名义由重庆中正书局公开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刚一出版，就被中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的动员令和宣言书。

在日本明显大势已去的时刻，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真正做到了党政军大权独自在握。特别是美英为了确保中国抗战，宣布中国是世界四强之后，与美、英、苏等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感觉令蒋介石更加自信。有了美英的支持，日本人已不在话下，沦为亡国奴的话题没有意义了，而另一种“亡党亡国”的担忧开始令蒋介石坐卧不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为消灭共产党做强大的舆论准备了。

《中国之命运》全书二百一十三页，论及抗战的篇幅只有十二页半，其主要内容是系统地讲述蒋氏风格的专制独裁主义，同时猛烈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体系。

蒋介石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样式；封建时代以血统和家族为纽带形成的家族、保甲、乡社制度，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是立国的基础。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属于违反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帝国主义立场”范畴——就在社会舆论普遍对蒋氏家族的政权独裁颇有微词的时候，蒋介石公然吹捧封建宗法家族式的政治统治结构，其毫不遮掩令人惊讶。

《中国之命运》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大肆捧颂蒋氏“三民主义”的至高无上。蒋介石否定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指责共产党人挑拨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对立，并把全面抗战以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成是共产党人搞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可以视为政见不同所致，但把共产党人的敌后抗战说成是封建军阀行为，以此要求共产党人放弃“武力割据”——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和“扫荡”，无不是为了铲除共产党人的“武力割据”——“铲除”之语出自被称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之口，着实匪夷所思。基于这样的理论，蒋介石宣称：“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武力讨伐了。

至于讨伐的时间，蒋介石认为“不出这二年中”。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宣布解散，这一消息令国民党人兴奋异常，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命运尽头。军统头目戴笠制订出一个“对中共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把敌后根据地政权和军权交出来；取

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和军队干部到共产党区域去接管工作；派中央通讯社到延安去开拓消息的采集渠道——“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

仅凭戴笠策划的这个“方案”，便可见国民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依旧十分肤浅。早在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与第三国际失去了联系，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试图摆脱苏共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有独立思考能力且决心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拯救中国的政治精英，哪里会因为早已过气的第三国际的解散而土崩瓦解？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国共产党将解除对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目前“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

果然，第三国际的解散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任何影响

一九四三年秋，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聚在了陕西的一个县城里，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商定进攻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会后，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各路部队从各个方向向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地带压缩；动用第八战区的部队，加上特地调来的部队，共五个集团军近五十万兵力，分成九路闪击延安，一举荡平共产党中枢。

日军尚在国土上横行，哪有自己打自己的道理？

针对《中国之命运》一书，延安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对胡宗南即将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战。毛泽东写出《质问国民党》一文，指出在

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于西北的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集团军，其中的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集团军用于防守宜川至潼关的黄河沿岸。这一事实，全国皆知。近日防守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开到了彬县、淳化、洛川一带，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而置黄河河防空虚于不顾。那么，国民党人叫嚣共产党人“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毛泽东质问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按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国民党是如何的“民族至上”，而共产党则是如何的“破坏抗战”，那么“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七月六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国民党人：

万万火急。重庆蒋委员长、参谋部何总长、军令部徐部长（徐永昌）钧鉴：自五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职部进迫，职部均一再退避，所有经过情形，均经呈报，并电胡副长官宗南制止在案。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慨自抗战以来，职军奉命改编，驰赴战场作战，六年于兹，虽毫无补给，而未尝稍懈。味甘宁边区为职军唯一之后方，少数留守部队，亦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讵意近日形势突变，南线友军已作发动内战之积极准备……河防阵地调动增加之兵力不下六七个师，声言大举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边区军民闻此意外事变，莫不奔走相告，骇异莫名。窃思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

胡宗南的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的消息，遭到了全国舆论的激烈抨击。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盟军方面对此也反应激烈，美国人明确表示绝对不允许因为发生内战而削弱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力度。

在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七月十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并回电朱德声称胡宗南部“无进攻意”。十二日，胡宗南命令围攻陕甘宁边区最前沿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退回黄河河防。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奉命对共产党军队的现有编制、兵员、枪支和火炮数量进行详细的调查统计，得出

的统计数字或许可以令即将前往开罗的蒋介石感到些许安慰：那些关于共产党武装兵力已达百万以上的传说似乎不那么靠谱。

百团大战后，经过日军长达两年的残酷“扫荡”，华北大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丧失殆尽，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的面积也严重缩小。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日军的“围剿”下伤亡巨大，兵力曾一度下降到三十万左右，加上位于江南的新四军，总兵力尚不足四十万人，还不及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要求国民政府颁给五个军的番号始终不允，苏联和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也没有给共产党武装一枪一弹。由此，军令部第二厅的报表显示，一九四三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仍不足四十万，枪支数量是兵力总数的一半，除了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有几门迫击炮外，各军区部队和地方纵队在火炮拥有数量一栏上全都是空白。

为数不多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作战的严酷环境中频频出击，伤亡巨大，武器简陋，补给困难，根本没有扩大军队规模的条件。

要说拥有百万之众，应该指的是遍布在广大乡村中的民兵，是那些具有抗战热情和勇敢精神并认同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同盟者。或许，正是敌后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共产党武装一起与日本占领军顽强作战的浩大声势，才使得国民党人产生了到处都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错觉。

造成国民党人错觉的另一个因素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过两年多“治安强化运动”的日军承认他们在华北已经“一蹶不振”，而在华中的“清乡工作”也“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逐渐转入了主动进攻的阶段。

八路军晋绥军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次数，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占到了作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九月，晋绥八路军已经把日军挤到了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新任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指挥第五十九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等部队，再次对晋绥根据地发动“扫荡”，企图一举围歼八路军晋绥军区机关。二十七日，日军虽然攻占了兴县县城，但晋绥军区机关已安全转移。鉴于日军孤军深入，交通断绝，加之新兵很多，战斗力大不如前，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士第率领的指挥部决定，集中十七、二十一、二十六、三十六和二十九团主力以及特务团和警卫营等部队，采用沿途伏击和分段围歼的战法，集中主力吃掉日军一部。十月五日拂晓，日军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遭到袭击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八路军包围了。尽管日军迅速派来战机助战，但八

路军各团已如铁桶一般将其围困。附近山头上民兵和民众的喊杀声此起彼伏，日军无论朝哪个方向突围，都会踩响八路军和民兵在山路上埋设的地雷。战斗持续到十日，日军的数次突围都被击垮，伤亡惨重，逐渐缩小的包围圈里只剩下三百多人还能坚持作战。十日下午，日军开始焚烧尸体，由于已不可能将伤员运走，只好将尉官以下的伤员一起焚烧，伤员的哀嚎之声和焚烧尸体的臭味数里之外都可听闻。黄昏时分，八路军发动了最后的围歼战，残剩的日军官兵在黑暗中仓皇四逃，八路军和民兵如同围猎一样到处搜捕，战斗在十一日凌晨基本结束，七百多具日军的尸体横陈在秋风瑟瑟的山林中。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气急败坏，调集第一军主力两万多人出动寻找八路军主力。日军采取了一种每天前进二十公里后再后退五公里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企图不断地挤压八路军，使之在黄河岸边背水决战。东京大本营对冈村宁次的这次作战寄予厚望，专门派来了一百二十人的“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此时，正是胡宗南企图闪击延安之际，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一个主力团已奉命调回延安，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八六旅十六团主动出击打击来犯的日军。十六团是一支以红军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满员二千五百余人，团长程悦长、政委常祥考、参谋长林克夫。在第三八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的率领下，该团不断地辗转迂回，跳出冈村宁次的包围圈后，秘密插到了日军的侧后，进入临汾至屯留公路边一个名叫韩略村的村庄。然后在当地民兵和民众的帮助下，在村南的一条山沟附近开设了伏击阵地。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八时，日军来了，卡车车队进入伏击圈后，十六团一声号令，六连先下手，击毁最后面的卡车，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从陡壁上猛扑下来。九连在车队的最前面死顶，与日军混战成一团。发现被包围的日军疯狂地向公路两边突围，双方瞬间进入肉搏战状态。八路军战士发现日本士兵试图保护一群身挎指挥刀的军官，于是奋不顾身地集中朝那里冲击，五连指导员郑光南在冲锋中牺牲。随着日军一名指挥官剖腹自杀，日军士兵大乱，残兵跑进公路边的土窑洞中顽抗。在劝降未果后，赶来参战的民兵在窑洞口点燃了柴草，然后八路军的手榴弹雨点般扔进窑洞，很快窑洞里便无声无息了。战斗接近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派来六架战机低空盘旋寻找被围部队的踪迹，但除了烟火和黄尘在秋风中漫卷之外，日军飞行员没有发现一个还活着的日军官兵——连同那个“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的所有成员在内，被伏击的日军只漏网三人，其余全部葬身于韩略村南的那道土沟里。

除了与日军作战之外，八路军还要对付伪军。

一九四三年五月间，华北出现了最大的一股伪军，即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四万余人叛国投敌。。

第二十四集团军，辖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孙殿英的新编第五军、刘进的第二十七军和侯如墉、杜淑等游杂部队，总兵力近八万人，是中条山会战国民党军在黄河以北留下的唯一部队。

日军早就盯上了这支国民党军队。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出动三万余兵力，向太行山麓实施进攻。与日军事先约好的孙殿英在河南林县宣布投降。而刘进的第二十七军被日军截断退路后，一名师长率部逃亡，另一名师长率部投降——这个师后来成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孙殿英陪同日本人与刘进军长商谈投降条件，刘进要价太高日方没有答应，刘军长本人趁乱跑了。马法五的第四十军，除了被他带走千余人外，其余全部被日军缴械。藏在林县彭城镇附近山洞里的庞炳勋，因为实在耐不住鸦片烟瘾，让他的副官扮成老百姓出来买烟土和食品，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庞炳勋立即宣布投降，通电表示脱离重庆政府，拥护汪精卫“和平反共建国”。他到了南京，被汪精卫委任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庞炳勋率部投敌后，着手部署围困八路军的作战。不打击投敌者，不足以警示世人，八路军决心彻底收拾庞炳勋部。八路军总部以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发起卫南战役，七月三十日毙伤伪军二百多人，俘虏伪团长以下八百余人；三十一日袭击了伪军第四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全歼守敌；八月二日再袭伪军一个旅，毙伤六十余人，俘虏千余人，活捉伪军旅长；十九日，向伪军杜淑部发起攻击，歼灭伪军五千五百六十余人，并在伪军盘踞的卫南、滨河、滑县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八路军又以太行、冀南两军区主力协同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南战役。八月十八日，李达、黄镇指挥的六个主力团开始了猛烈的穿插分割，攻入林县县城，庞炳勋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官刘月亭只身逃脱，其余伪军全部被歼。同时，陈再道、宋任穷指挥的冀南军区六个主力团，将伪新五军的暂编第四师师部、十团以及独立旅全歼。日军出安阳城试图救援，但被八路军打了回去。林南战役，八路军歼灭伪军七千余人，拔除伪军据点八十余处，林南和辉北地区全部为八路军所控制。九月，太行军区在太南组建了第七、第八军分区。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八千平方公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作战的绝对主力。一九四三年，抗战中国的敌后战场抵抗的日伪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日军华北方面军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在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人们被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弄得人心惶惶，陪都重庆的百姓确实产生了某些不祥的预感：与共产党在某地发生武装摩擦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警察在《新华日报》报馆四周拉起了警戒线，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突然离开了……令民心更不安的是大后方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如果中美联合空军决定要去轰炸日军的某个机场，飞机还没起飞，中美飞行员就能在耳机里听到日本人向他们问候早安并祝他们今天好运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的间谍活动，竟然得到了某些国民党政府高官的帮助：

日本人精心策划的这种间谍活动的成功，说明这种活动得到了非常有权势的人——国民党官员或军官的帮助……如果不是来自国民党官方或军方的无线电系统，那就是来自国民党的银行和垄断企业系统……所有审查日本代理人或嫌疑犯的美国人都发现，顺着案件的线索摸过去，必定通向最高层的圈子。这时他们不得不中断调查，以免使盟友难堪。例如，当破获日本人在遂川的无线电导向台时，就发现江西省省长的侄子卷了进去。

混乱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百姓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见怪不怪。春节的时候，昆明城里举行了舞龙表演，表演队伍由中国官兵组成。两支舞龙队伍——一支是中央军官兵，另一支是云南地方军官兵——碰到了一起，巨龙疯狂地舞动，“就像插上了翅膀的蜥蜴，要从这个城市飞快地腾升到星光闪耀的夜空中去”。疯狂的结果是互不相让，然后就开枪了：

舞龙头的人都企图使自己的龙头压在对方上面，杆子不够长，他们

就叫自己的伙伴搭成人塔，他们爬到人塔上来斗对方的龙头。双方其他人则破门而入，冲入街旁的饭馆，把里面的桌椅板凳拖出来搭成塔状。本来这场斗争可能以一方摔倒而大家哄堂大笑结束，但这时附近云南地方部队驻地的一些高级军官闻声赶来，为自己的士兵撑腰。他们拔出手枪对着国民党的龙，命令它退回去。一个国民党军官也拔出了手枪，并开火射击。两条龙立刻被扔在街面上，双方士兵奔进街旁的门洞，开始了一场枪战。

中国民众对政府官吏的贪污丑闻、军队将领的胡作非为以及物价飞涨和黑市猖獗十分不满。不法商人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甚至把投机倒把和操纵物价的把戏闹到了美军头上，使得美军在华采购人员怨声载道：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有无限的财富，而美军后勤部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种观点。因为对于他的任务来说，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机场必须迅速建成，花多少钱都没关系……美国人进入中国，就好像一个健康血旺的人被扔进了一间久无人住的房子里，而房子里到处都是饥饿的蚊子、水蛭和吸血的蝙蝠。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庆最高层的人物把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安排给官方机构……官方的兑换率完全是虚假的……美军后勤部队不得不超额多付四倍的资金，这些钱全都被国民党银行榨取……政府既然采取这种态度，私商们也就无所顾忌地谋取暴利……一家公司已经和美军供应处签订合同，向美军出售四十个汽车蓄电池，每个四百五十美元，五天内交货，但两个星期后，这家公司说，电池已经出售给一家银行了。后来这些蓄电池以每个七百五十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军供应处……一家一直以合理价格向美军后勤部队出售汽车零件的公司，突然把它的价格提高了三倍，这样美国人不得不准备和另一家公司打交道，那家公司仍然以合理价格出售这些零件。但是，几天之后，这第二家公司通知美军供应处，由于“当地的压力”迫使他从市场上撤回了他的存货……我们曾要求政府帮助我们购买某些东西，但结果这些杂种们却利用我们提供的信息反过来敲诈我们。在中国最大的骗子就是孔祥熙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的中国银行……

更讳莫如深的话题，当属曾是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这是让重庆国民党人最难堪的。好像故意与蒋介石对抗，在蒋介石飞往开罗的同时，汪精卫飞往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召集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会后，汪精卫发表讲话宣称，要和日本人齐心合力，赢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他向日本人作出了“肃正思想”“确保治安”和“增加生产”三项保证，决心和日本人“同甘共苦，同生共死”。

此时的中国是一个被战争的残酷折磨得痛苦不安的国家。

就在东京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召开之际，侵华日军派出代表前往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祭奠了蒋家祖坟——日本人做梦都想让蒋介石替代汪精卫成为“共荣圈”里的一员。

但这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了。

此刻，蒋介石已入住开罗西南十五公里处尼罗河西岸的米纳饭店号别墅。

英国驻埃及大使前来通报，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抵达开罗，并准备前来拜访蒋介石。本来是准备与罗斯福先见面的，但罗斯福尚未抵达，丘吉尔却先来了，经过考虑之后，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里，蒋介石和丘吉尔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丘吉尔说，他之所以能够由地中海乘坐英国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换成飞机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控制权的结果，而在几个月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在简短的寒暄之后，丘吉尔涉及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远东战场的对日作战，蒋介石的回答十分干脆：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各方代表就太平洋作战、缅甸对日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代表提及美国为什么不向中国战场派遣陆军的问题，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解释是：派遣美国陆军到中国对日作战，本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近来美国运输舰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损失很大，加上苏联战场急需大规模的军火供应，土耳其也即将参战，因此也存在船舶运输问题。目前，连急需增援的麦克阿瑟将军也只得到了几个美国陆军师，他现在主要依靠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部队维持作战。马歇尔的言下之意是：相比而言，中国自身有那么多的军队，应该不必叫苦。不过，如果中国要的不是人，而是别的东西的话，比如飞机，要多少美国就给多少，“惟希望中国加强机场等设备”。

这天，丘吉尔登门回访了蒋介石。当蒋介石表示中英两国要充分合作，有必要坐下来就各种问题认真商谈时，丘吉尔回答说，他带来的各种专家足有四百多人，无论谈什么都可以。丘吉尔告诉蒋介石，他的意愿是，战后须有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总机构，总机构下再有欧洲分机构、远东分机构等等，以让世界各国都可以参加进来。

接着传来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到了。

罗斯福根据事先商定的程序，把与蒋介石的会谈放在了与丘吉尔会谈之前。在短暂的会谈中，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应作为四大国成员之一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战后国际组织，并保证在这一点上美国将坚定地支持国民政府的中国。

二十三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开始就会议宣言展开进一步磋商。对于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日本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关于这一点，在中、美、英三方工作人员共同草拟宣言的时候，曾发生了措辞上的争执。还是英国人对中国发难。英方代表提出，在宣言草案里，其他被占领地区都没有说明必须归还何国，唯独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明确写上“归还中国”，这样的表述将会引起英国国会议员的质问，建议把“当然应归还中国”这句话，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国人的质疑立即遭到中国代表王宠惠的激烈反对：日本放弃侵占中国的领土后，那些土地到底归属哪里？如果不明确写明，中国艰苦进行的持久抗战是为了什么？这样含糊不清的言辞出现在宣言里，不但中国人民会困惑，整个世界也会不理解，会议宣言将变得价值全失。美国代表明确支持中国代表的意见，认为言辞含糊的后果将使世界对盟国阵营严重地不信任。

于是，原草案叙述得以维持。

这天上午十一时，中、美、英三国首脑以及宋美龄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由于政治问题私下里已经商讨，会议主要就军事问题展开讨论。涉及中国的讨论重点是向缅甸实施反攻的军事计划。

晚上，罗斯福举行晚宴。

宴会后，蒋介石与罗斯福进行的会谈持续到午夜。蒋介石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政治主张，包括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过渡时期的国际安全问题、德国投降问题以及远东安全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蒋介石按照事先草拟的原则与罗斯福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就诸项政治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而罗斯福向蒋介石询问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战败后，日本的天皇制是否应该废除？显然，罗斯福以为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会坚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认同永久性地废除天皇制度。蒋介石的表态令罗斯福有些意外：

此次日本战争的祸首，为其若干军阀。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让其预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它的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大战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

罗斯福总统又问：“此一问题明日会议应否提出讨论？”

蒋介石的回答是：“最好不作正式讨论。”

“罗斯福总统深以为然。”

“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这是否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三国首脑会议一直持续到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下午，在拜会了埃及国王和王后后，蒋介石飞返中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带着会议宣言一起飞到德黑兰，与从苏联飞来的斯大林会商，斯大林对宣言草稿表示完全赞同。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完毕。特发表宣言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军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的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的评价是："开罗会议虽仅仅四天，但将中国自甲午以后被日本侵据的领土主权，一举收复。"

《开罗宣言》为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法律依据。

罗斯福总统谈及《开罗宣言》时说：

丘吉尔首相及余与蒋委员长在开罗共处四日。余得机会与蒋委员长当面讨论复杂之远东问题，尚属首次。吾人不仅解决具体军事计划，且曾商讨影响远大之原则。此等原则皆甚简单而基本，其中包括被劫财产归还应得之主人；承认远东亿万人民有树立其本身的政府方式之权利；承认日本永远不得成为侵略之潜在势力，乃太平洋及世界其他部分和平与安全之必要条件。

罗斯福在赴开罗之前曾公开表示："远东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罗斯福的出发点很明确：在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需要中国战场的支撑和协助；而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让中国成为具有和英、苏、美三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有利于美国在未来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制衡英国特别是制衡苏联，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维护其在亚洲的权益。

就尚未结束的太平洋战争而言，正在与日本人苦战的美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住中国的抗日战场。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说得很明确："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战场支撑不住了，或者国民政府向日本屈服了——当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形成时，美国人是否能在亚洲站住脚就很难说了。美国人、英国人乃至苏联人都知道，如果不给予一个令中国人朝思暮想的巨大利益，中国必须和盟国生死攸关地捆绑在一起的理由就不那么扎实。而这个巨大的利益只能是：让日本把过去侵吞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交还中国，并把日本人再次抢劫中国的可能性完全杜绝。

尽管《开罗宣言》的行文确实简单得略显简陋，但是，把被日本人抢劫的财产"归还应得之主人"以及让"日本永远不得成为侵略之潜在势力"的基本原则，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且这个意义一直延续到今日。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

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能力继续打下去？

美国记者在昆明的大街上看到了一名流浪的中国军队士兵，这名二十几岁的士兵看上去已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只乞讨的碗，身上破烂的军装几乎无法遮蔽身体了——“身体肮脏，瘦骨嶙峋，甚至能看见腿骨和骨盆，他的生殖器萎缩得像一段黑绳打的小结。”

这名士兵被军官乘坐的小汽车撞到了沟里——

我走下沟，想问问他的情况。但他不愿意说话，也许是已经不能说话了，随着费力的呼吸，他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口水从嘴角淌了出来，目光茫然地向上凝视，显出死亡的预兆。我看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帮助他逃脱死亡，就按照美国的民间传统在他手里放了些钱，然后继续赶我的路。两个小时以后，当我从机场回来时，他已经完全死了，手里的钱已被人拿走。他的两眼无神地瞪着蓝色的天空，天空中美军飞机在轰鸣着。

美国记者在与美军官兵们聊天时，谈到了回国时要从中国带点纪念品回去，一位美国军官竟然说，他要弄一个“穿红裤子的中国农村小姑娘——我要把她全身洗干净，放在一个笼子里带回佛罗里达”。这位美国军官的解释是，他的几位军中伙伴凑齐了五十美元，从一位父亲那里买了一个中国小女孩，“他们把她关在村外地里的一间小房子里。他们告诉我，在一段时间的忧伤以后，她就开始学习她应该干的事了”。——这是一件等同于买卖人口的事，那些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军官兵听后缄默不语，但是很快他们就知道了“中国人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

不要说这样的中国能否“打下去”，开罗会议的召开也并不证明中国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盟友——在中国漫长的外交史上，尚没有过真正“盟友”的出现，能不能“打下去”，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

尚在归国的飞机上，蒋介石已经“寸衷惟有忧惧”了：如果中国不发奋图强，继续衰败下去，《开罗宣言》很可能是一纸空文——

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在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皆在国民革命之主要目标与期望，而今竟能发表于开罗宣言之中，实在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将来和平会议中，关于我国最艰难之问题，最主要之目的，皆于开罗会议数日中，一举而解决矣……以罗斯福总统此次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确有协助我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今后我国若不能发奋图强，则一纸空文，仍不足以为凭。故必须

国人共同努力奋勉，方能确保外交胜利之成果。

就中国的命运而言，不需要美国人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也必须打下去。

只有打下去，中国人才可能摆脱与那个倒卧在路边的枯瘦士兵和那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穿红裤子的小姑娘一样的命运；只有打下去并且在苦斗中强大起来，民族的自尊、领土的完整以及民众的安康幸福才可能真正获得。

中国人正在打下去。

就在开罗会议进行的时候，抗战中国正进行着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血战发生地在湖南省一个名叫常德的小城四周。

常德，中国腹地著名的鱼米之乡。

第三十四章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就国力与军力遭到严重消耗以及太平洋战局的严重危机而言，日军基本失去了在某一区域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的能力，包括在中国战场上。这也是日军大本营明确规定“中国派遣军不得进行任何攻势作战”的根本缘由。刚刚结束的鄂西会战，也印证了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守势局面已不可逆转。于是，开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侵华日军不顾兵力不足、物资匮乏之现状，于中国正面战场再次发动被日方称为“常德歼灭战”、被中方称为“常德会战”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其动机和目的都令人费解。

侵华日军第十一军为常德作战开列了若干理由：

首先，可以用一场空前的“胜利”，削弱中国在开罗会议上的地位和声誉，败坏会议气氛，当然最好能破坏中、美、英、苏的结盟。——且不说大规模的进攻能否取得胜利，即便全胜又怎么可能通过一场局部作战扭转世界大战已可预期的胜负结局，特别是开罗会议的主旨恰恰是要以坚韧而长期的战争获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其次，为了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战意志。——关于这一点，自战争爆发起，每一次作战前日军都必提及，现在恐怕连大本营都难以确信这一作战目标能够达成。打击中国军队并给予相当的消耗，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作战也势必造成自己的伤亡消耗。日军国内兵源枯竭，死一个少一个。尽管中国军队在一次次作战中损失严重，可兵力还是越打越多，现在仅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军队已达五百万，即便都是手持汉阳造的部队，如此庞大的数量也足以与日军继续对峙下去。——日本人早已明白一个现实：中国从来不缺人。

再次，攻占常德和常德以西地区可以直接威胁重庆。——这是日军“杀出一条血路”以“解决中国事变”的立场的延续。把对峙前沿推向重庆，甚至直接打进四川，是侵华日军一直以来的梦想。——“常德是湖南省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我军若将该地区占领，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但是，从一九四二年起，大本营就不再允许侵华日军扩大占领区，侵华日军的数次作战都是打了

之后即返回原出发地，这说明日军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没有能力侵占新的地区了。况且，在第十一军呈送给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上，明确写着“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来态势”。所以，这条理由也不成立。

但是，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军大本营还是批准了第十一军发动“常德歼灭战”的请求。原因是第十一军提出的另外一个理由：此次作战可以牵制中国军队主力向缅甸方向投入，以配合南方军。基于盟军与日军在缅甸方向的最后决战已进入一触即发的状态，日军大本营确实担心中国军队会从云南方向大规模地突入缅甸。只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们认为，这一理由实在勉强，动用几个师团发动一次攻势作战，并不能遏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的企图，能够造成中国军队向缅甸的调动有些迟疑就不错了，何况前提是日军必须能够打到常德以西，并且长期占领该地区，从那里以强大的攻击态势向重庆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明知道占领常德地区不可能，肯定还是打了就要回来，所谓的“牵制”能有几分效力？——“大本营方面只希望这种牵制能做到使昆明的重庆军可动兵力不至于用到缅甸方面，哪怕是暂时限制一下也好”。如果“连仅有的一次对常德的进攻作战都不答应，那将给部队士气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又有牵制敌人从缅甸反攻这一正当理由，也就无妨同意了”。

如果探究日军第十一军的作战目的，日军战史中这样的叙述可能有些道理：“第十一军是在受到敌人一百多个师严重包围，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自存自卫自活，并且为了完成包括四川作战在内的各项任务而进行作战的，作战意图就是尽可能地歼灭周围之敌。”——“自存自卫自活”，这是侵华日军的真实境况。

最有效的防御手段就是主动进攻。

拼死作战总比就地等死强。

要想活下去就要主动寻求作战。

说到底，侵华日军策划的常德作战，还是一次战场地域有限的、打完就撤回来的局部攻势。

大本营批准作战的第二天，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十一军司令官于十一月上旬发起此次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敌人的战力。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来态势。关于其时机，另行

下令。

第三飞行师团长有侦察部队主力配合前项作战。

一、作战方针

进攻敌人政略、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人向缅甸方面调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二、作战要领

（一）第十一军主力（加上由其他方面转用来的部队共三十五个步兵大队）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占常德附近。

（二）继而追索常德方面猬集反攻之敌，予以歼灭。

（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

接到命令，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立刻拟订了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计划动用澄田赉四郎中将指挥的第三十九师团、赤鹿理中将指挥的第十三师团、山本三男中将指挥的第三师团、岩永汪中将指挥的第一一六师团以及佐久间为人中将指挥的第六十八师团，共五个师团；再加上由第三十四师团调来的佐佐木支队、由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调来的宫胁支队和由第六十五师团调来的柄田支队，总计约十万兵力，分成数路实施三期作战，以常德为轴心进行同步突击：

第一期

（一）第六十八师团（包括配属的户田部队）从鲇鱼须附近九都大河一线发起攻击，消灭南县、安乡、三仙湖市附近之敌。

（二）第十三师团从沙市西南地区发起攻击，先歼灭暖水街附近之敌，继之扫荡该地以西之敌。

（三）第三师团从公安以东地区发起攻击，先歼灭王家厂附近之敌，接着扫荡该地区西南地区之敌。

（四）第六师团从杨林市附近地区发起攻击，歼灭红庙（津市东南

七公里）附近之敌。最初以一部兵力保障第六十八师团顺利向安乡突进。

（五）佐佐木支队从公安东北地区继第三师团之后发起攻击，大致在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中间地带向前推进，进入王家厂西南地区。

（六）为保密计，禁止地面部队向澧水南岸地区行动。

第二期

（一）第六十八师团从鱼口附近渡过洞庭湖，攻占汉寿（龙阳），继之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战斗斯间，师团在常德南方地区歼灭南逃之敌，或歼灭来自长沙方面增援之敌军部队。

（二）第十三师团在新门寺附近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经慈利附近进入黄石市附近；以后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战斗期间，追索漆家河周边地区之敌，予以歼灭，掩护军主力右（西）侧背。

（三）第三师团从王家厂南方地区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经新安、石门附近进入漆家河、田家河附近，以后，再经桃源附近进入常德南方地区，追索南逃之敌或南方来援之敌，捕捉歼灭之。

（四）第一一六师团，在澧县附近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并且经临澧附近进入陬市、河洑附近，继而攻占常德。

（五）佐佐木支队（在王家厂附近配属给宫胁支队一个大队）经慈利附近进入龙潭河附近，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作战时，掩护其右侧。

第三期

根据另项命令行之。大致从常德、漆家河之间地区开始返还，经石门、澧县之间地区，恢复原态势。

在作战全过程中：

（一）第三十九师团（配属古贺支队）确保宜都西南地区要线，宫胁支队确保暖水街附近要线，以掩护军主力的右侧背，并保障军主力顺利返还。

（二）关于柄田支队，根据其到达战场时机，再另行决定。

兵站：主要道路已经全部破坏。鉴于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即使设立了兵站，由于需要修补道路，也不能适应作战发展需要。加之本次作战地区是产粮区，易于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由于这些理由，可以不设立兵站。惟弹药一项须在澧水一线及常德补充。

军战斗指挥所于十月末推进至观音寺（沙市南十公里处）。

汪精卫的伪军第五、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师也加入了日军的攻击行列。

横山勇拟定的作战发起时间是十一月一日。

鄂西会战后，交战双方在这一地域再次形成对峙：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对峙的日军是第四十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三十四师团，与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对峙的日军是第五十八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与中国第六战区部队对峙的日军是第三十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一部。

日军策划的常德作战，主要位于中国第六战区防区内。

中国第六战区共有十二个军、三十五个步兵师，总兵力在二十万以上。至一九四三年十月末，该战区的防御配置是：

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负责防御转斗湾至大水岭一线阵地，司令部设在南漳。下辖：刘振三的第五十九军，以暂编第五十三师和第三十八师配备在防御第一线，军司令部设在李塬城；何基沣的第七十七军，以第一七九师和第三十七师配备在防御第一线，军司令部设在南漳以南。第五十九军的第一八〇师和第七十七军的第一三二师为二线部队，集结于安家集、报信坡等地。炮兵团在李家冈整训待命。

周碧的第二十六集团军负责防御鄂西江北阵地，司令部设在水田坝。下辖：柳际明的第七十五军，以第六师和预备第四师在大水岭至柏水坪一线与日军对峙，第十六师在水田坝附近整训，军司令部设在马良坪；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以第一四一师、暂编第三十四师和第一三九师分别驻扎在铁佛寺、牌界垭、贺家湾附近，军司令部设在牌界垭。

吴奇伟的长江上游江防军负责防御长江正面，司令部设在秭归。下辖：池峰城的第三十军，以第三十一师守卫石牌要塞，第三十师守卫宜都至石牌一线阵地，与日军隔江对峙，第二十七师驻扎在龙凤山；军司

令部设在黄陵庙；罗广文的第十八军，以第十八师、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五师，分别驻扎在陈家沱、荣家店、玉山附近整训，军司令部设在太平溪；朱鼎卿的第八十六军，以第六十七师、暂编第三十二师和第十三师分别在头湾和窑湾溪附近整训。

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负责防守鄂西江南阵地，司令部设在太平街。下辖：方靖的第六十六军，以第一八五师在宜都至松滋一线阵地与日军隔江对峙；第一九九师主力在刘家场，一个团守备渔阳关；军司令部设在三溪口。王甲本的第七十九军，以暂编第六师和第九十八师在新江口、申津渡、甘家场一线与日军对峙，第一九四师在王家厂附近整训，军司令部设在边山河。

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负责防御湘西方向，司令部设在桃源。下辖：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以第一五〇师和第一六二师在甘家场、官垱、梅田湖至南县一线与日军对峙，第一六一师守备津市、澧县和澧水南岸，军司令部设在红庙；汪之斌的第七十三军，以暂编第五师、第七十七师和第十五师驻守新关、新安、慈利附近，军司令部设在石门。

战区直辖部队，李士林的第四十三师、盛逢尧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和王严的第一一八师，控制在秀山、黔江、彭水和来凤地区；李则芬的第五师、戴之奇的第一二一师和劳冠英的暂编第三十五师，在建始附近整训。

由重庆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归第六战区暂时指挥，所辖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在常德和桃源地区整训待命。

由重庆军事委员会直辖的施中诚的第一〇〇军，为第六战区预备兵团，所辖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九师驻扎浏阳。

中国第六战区的布防，自湘鄂交界处的监利附近起，向西北方向延伸至宜昌北面的石牌，然后再向东折往汉水，呈巨大的V字形。面对正面宽约二百七十公里的防御线，战区兵力显得十分薄弱。特别是由于鄂西会战时没能收复长江边上的华容和石首等地，令日军不但占据着良好的西进桥头阵地，也使防守长江南岸的部队失去了对长江天险的利用机会，只能靠松滋河以东由南向北的一系列河汊建立起防御阵地。另外，作为一个战区，仅有一个军的预备兵团，显然无法应付复杂局面；而中央军精锐部队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名义上归战区指挥，实际上的指挥

权仍在蒋介石手里。

从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开始，中国第六战区当面日军频繁调动的情报纷至沓来，调动涉及的番号几乎囊括了当面日军所有的师团。情报还显示，在长江监利至沙市间的江面上，聚集了日军各类船舶三十多艘，滨湖河汊聚集的日军汽艇和征集来的民船也有上千艘，沙洋至当阳、宜昌间的公路上停靠着日军四百多辆汽车。——所有的征兆都显示，日军即将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重庆军事委员会对敌情的判断是：日军将向长江与洞庭湖之间的角地带实施攻击，目的是消耗中国军队兵力，同时掠夺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其步骤是先压迫中国守军于暖水街以西山地，然后向左旋转，向澧水岸边的石门和澧县推进，如战况顺利，则南渡澧水攻击常德。基于这一判断，重庆军事委员会拟订的作战计划是：使用一线防御部队节节阻击，不断地消耗日军，待日军突击到暖水街向左旋转时，力求在石门、澧县之间配合预备兵团将其歼灭。如果石门一线失守，日军南下攻击常德，就在常德附近与日军决战。

十月二十八日，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五、第六和第九战区：

一、第六战区以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十集团军之各一部，于滨湖地带阻止敌人，各集团军主力，利用澧水及暖水街之山地，侧击进攻之敌。

二、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军主力（第五十一与第五十八两师）位置于太浮山附近，做机动准备。

三、第一〇〇军为预备兵团（原驻浏阳），逐步推进至益阳。

四、策应兵团

甲、第六战区之第二十六与第三十三两集团军，各以二至三个师兵力，向其当面敌之弱点深入攻击。

乙、第九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岳州以东地区敌之弱点深入攻击。

丙、第五战区以二个师兵力，向京山、皂市攻击。

丁、各策应兵团，应于十一月四日以前移于第一线附近，待命开始

攻击。

戊、中美空军即向监利、华容、石首、沙市之敌及岳州、沙市间敌机轰炸。

在即将发生大战的地域内，长江、清江、澧水、沅江等数条河流横贯其中，湖泊星罗棋布，水道交错，港汊密布，特别是松滋、澧县和常德以东的洞庭湖湖滨地区，湖沼错落，水田如织，除了湖岸田埂上的茅草之外，树木十分稀少，不但机械化部队在湖沼中运动困难，大部队行动由于没有隐蔽物也容易暴露。在这片战场区域内，还有数座险峻的大山，巫山、荆山、武陵山、雪峰山等山脉，层峦叠嶂，崎岖陡峭，成为遮蔽四川的天然屏障。

常德位于湖南西北部的沅江下游。其东面是洞庭湖，西面是武陵山脉，南面是雪峰山脉，北面是矗立着太阳山和太浮山的澧水平原。作为湖南著名的水陆交通要地，湘黔公路于常德东通长沙，西通川贵，北通荆州；从常德放射出去的水路更是四通八达，逆沅江而上可抵桃源，木船可达贵州的铜仁，顺江而下的大小船舶入洞庭湖出长江均可重载远航。常德还是中国著名的鱼米谷仓，是抗战中国军粮的主要供应地。

按照重庆军事委员会的设想，决战区域最好限定在常德以北的澧水两岸，这样中国军队可以利用连绵的山地和横贯的河流与日军周旋，打不赢就往山里退。至于常德城的攻防战，除非万不得已而为之。——重庆方面称之为“在常德附近决战”。从军事学的基本常识看，如果日军突破中国守军自东往西、自北往南的一道道防线直趋常德城下，所称的“决战”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中国军队围绕着一座城池在狭窄的战场上大军云集，这正是日军所期望的；在以往的历次作战中，最令日军头疼的事，莫过于还没形成围歼局面中国军队主力早就跑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战局很快就演变成对常德城的攻防血战。

日军各参战师团十月中旬开始向出发地集结。第三师团先头部队十四日出动，二十四日抵达郝穴附近，并对周边进行了“扫荡”；师团主力则昼伏夜出，经过秘密的铁路运输和徒步行军，三十一日清晨分别抵达朱家嘴、吴达河和周家场附近的出击地。第十三师团二十七日出动，在船舶部队的协助下，于太平口附近南渡长江，在弥陀寺附近集结完毕。第三十九师团二十七日出动，由于不断遇到游击队的袭扰，只好边“扫荡”边前进，在限定日期三十一日的最后时刻，终于推进到指定地域涴市

附近。第六十八师团从九江乘船到武昌，换乘火车到达岳州，然后徒步行进，于三十一日抵达监利附近集结。第一一六师团从安庆出发，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抵达汉口后，一部分官兵乘船去岳州，主力则徒步行军三百多公里，经汉川、仙桃、峰口和监利抵达新口附近，然后渡过长江，在杨林子周围集结。其余各支队也分别按照限定时间抵达了攻击出发地。

十一月二日，沿着长江从北向南，日军以第三十九、第十三、第三、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的顺序一线排开，自涴市、弥陀寺、黄金口、闸口、藕池口、石首和华容同时西进，向中国一线守军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御的新江口、米积台、蒲田嘴、章田市、百弓嘴、梅田湖，一直延伸到洞庭湖西北岸的滥泥沟一线，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国守军第一八五师、暂编第六师、第九十八师、第一五〇师和第一六二师官兵依托既设阵地开始阻敌。

三日早晨，第一八五师当面日军逼近松滋河，暂编第六师和第九十八师当面日军推进到张家台、公安和甘家厂一线。同时，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分别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一五〇师和第一六二师的阵地，两师被迫先退肖家嘴、哑巴渡一线，再退虎渡东河一线。第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在虎渡河边观察了日军的动向后，决定搞一次伏击。当日军的一个小队乘坐汽艇渡河探路时，第一五〇师官兵突然开火，日军十一人被当场打死，三十多人负伤仓皇后撤，汽艇连同三挺机枪被中国官兵缴获。在缴获的物品中，还有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图上明确标示着日军的主攻方向是常德，助攻方向是桃源。这张地图被立即送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

三日晚，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向重庆发电，请求把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明确划归战区指挥，并要求第七十四军主力立即向太浮山西南的桃源、漆家河、鹿田坪、羊毛滩之间集结，而该军的第五十七师进入常德准备守城。

孙连仲向战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一、第二十九与第十集团军之第一线兵团，应依既设阵地逐次坚强抵抗，予敌以重大打击，尽可能确保安乡，主力退守大鲸口、东港、张家厂、街河市、斯家场、洋溪之线坚强抵抗。

二、第二十九集团军应指定第四十四军以第一六一师固守津市、澧

县；第七十三军以一个师固守石门，主力在石门西北新关、永盛桥间集结。

三、江防军应固守江防及沿江要塞，第二十六、第三十三两集团军应即准备策应江防军之作战。

重庆军事委员会同时电令第五、第九战区发动牵制性进攻，策应第六战区作战。

但是，属于第九战区指挥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此时已经把洞庭湖东岸的一线阵地丢了，致使当面日军一鼓作气攻占了与常德隔洞庭湖湖沼咫尺相望的南县。

在日军开始攻击的两天内，中国守军的一线阵地全被突破。四日，在第十集团军防御方向，日军突破松滋河继续向西攻击，紧随第三师团的佐佐木支队也加入了作战，当天日军攻占公安。六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茶园寺和佘家桥，然后继续向肖家岩、高桥和朱羊桥推进，其古贺支队抵近安子岭，中国守军节节抵抗，但仍扭转不了溃败的局面，安子岭守军由于伤亡过大放弃了阵地。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面猛攻中国守军暂编第六师的阵地，一面派部队迂回前进，当晚突进到暖水街的东端，中国守军退向暖水街西南，日军紧追不舍，在如注的大雨中攻势丝毫未减，暂编第六师陷入彻夜的激战。为保住暖水街主阵地，第七十九、第六十六军部队七日拂晓发动逆袭，但未见成效。第九十八师从游家山、第一九四师从方石坪向红土坡、古源头的日军发起逆袭时，虽然日军出现了较大伤亡，但仍不顾一切地推进，第九十八师的一个连孤军奋战，坚守张家厂阵地整整四天，给攻击该阵地的日军佐佐木支队很大的杀伤。暂编第六师的彻夜激战一直打到七日上午，日军抵近红土坡附近，坚守阵地的中国守军一个营伤亡惨重，只剩下六十多名官兵，被迫退守佑圣宫阵地。

在暖水街以南，中国守军和日军的阵地交错在一起，持续的混战令中国军队各部队之间联络中断，日军第十三师团也与其第六十五联队失去了联系。日军第十三师团派出一名参谋骑马去找部队，不久就发现这个名叫樱井的参谋不见了踪影：

十一月七日当师团战斗司令部进入暖水街的时候，为与估计已经进入闸口的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伊藤部队）建立联系，樱井参谋带着两名传令骑兵向该地行进。另外，与海福部队同行从暖水街向西南前进的古

桥参谋，由于中途折返师团战斗司令部，向火岭铺方向东进，发现了樱井参谋的坐骑，随即将它带回司令部。我立即感觉到樱井参谋遭遇到了不幸，情况太严重了！这不仅因为樱井参谋业已身亡，而且还由于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大图囊，里面装着满满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当时预定本师团调往马里亚纳群岛的有关机密文件。樱井参谋是一位很认真的人，即使作战期间也研究马里亚纳群岛方面的情况，因而随身携带着它。于是立即派人搜寻，结果在杨家坪（火岭铺西南一公里）附近发现了三具尸体，幸好樱井参谋携带的文件原封未动，因而也就放心了。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突破百弓嘴中国守军的防线后，在三汉垴附近南渡澧水时，遭到第四十四军部队的顽强阻击。中国官兵在河对岸十公里的正面设置了一系列火力点，又将民船全部毁坏，只把两个门桥和两条船留在了火力点下。于是，为了渡河，日军“除了夺取这些船只外没有别的办法”。

……联队迫不得已，把所有的配置山炮和迫击炮等武器，布置在两公里的正面，以有组织的火力一举压制了敌人。在这些炮火的掩护下，联队副官铃木义雄中尉以下十九名游泳能手泅水夺舟成功。日落时部队强行渡河，击退了敌人。十九名泅水者，有八人战死。另外，七日午后在于家台（三汉垴西南四公里）附近，军旗乘舟渡河时遭到敌机袭击，在躲避中翻船，旗手砂押磊少尉及一名护旗兵没有浮上来，牺牲了。过一会儿，只有军旗在其翻倒后漂浮上来。

鉴于日军的长驱直入，中国第六战区命令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在正面抗击日军；而在战场的侧背，命令江防军抽调兵力在洋津口附近集结，以策应第十集团军作战；命令第十八军推进到木桥溪、高昌堰和白果坪一带集结，以形成外线的攻击态势。

七日下午，孙连仲打电报给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查暖水街、马踏溪、干溪滩三角地带为战区战略要地，得失关系重大，该军如能在该地固守三日，着重奖赏。”王敬久当即命令暂编第六师固守暖水街西南现有阵地，不得后退；第九十八师确保暖水街西侧的干溪滩、马踏溪一线；第一九四师主力控置在暖水街西北方向的马踏溪附近，以备机动。限八日拂晓前部队调整完毕。

八日拂晓，当日军第十三师团绕过暖水街，猛攻马踏溪和干溪滩时，第九十八师没能守住阵地，下午退守蒋家坪，晚上再退芭蕉坪；而第一九四师仅留一个团坚守古源头，主力放弃暖水街以南的闸口和王家

厂主阵地，西退到河口一带。

暖水街被日军孤立了。

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不得再退，必须实施反击。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孙连仲下令战区所属部队向日军发动全面反击：

一、战区遵奉蒋委员长七日酉时电令，即转移攻势。

二、第二十九集团军即以第四十四军之一个加强师攻击青泥潭、大堰垭之敌，相机进出张家厂、石齐之线；第七十三军以第七十七师进出七里岗（大堰裆西南方），第十五师击破王家厂、方石坪之敌，进出敖家咀、笔架山之线。

三、第十集团军固守暖水街部队，务坚守至最后一人，其在闸口、马踏溪间部队，应各向敌侧背竭力击破之，另以两个团由刘家境以南地区出击，并挺进至阿弥桥、分水岭截击敌后方。

四、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十集团军之作战地境为和尚洞迄笔架山之线。线上属右。

五、攻击开始时间为九日五时。

显然，日军向西发起全线攻击后，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的第三道防线，即暖水街南北一线。按照日军第十一军的作战计划，其各师团将在此左旋，直接南下澧水，进攻常德。因此，这是中国军队利用澧水两岸的有利地形发动反击的最后时机。但是，中国军队行动迟缓，反击尚未发动之际，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向中国守军第一八五师的和尚岩、邓家畈、王家畈阵地猛攻；古贺支队则突破了第一九九师位于暖水街以北的两河口阵地，突进到三王坡、关王坡和十三条岭一线；第十三师团继续从暖水街侧后的马踏溪、干溪滩向西突进。中国军队第一九四师主力在河口移动时，与突进的日军遭遇，日军在攻击中施放了毒气，中国守军伤亡严重。特别是该师滞留在古源头担任掩护任务的一个团，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只得拼死突围。此时，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不但无法遵照命令发动反

击，且除了暂编第六师主力还在暖水街西北与日军苦战外，其余部队都已西退到了子良坪、河口、陵坡和马溪沟一线。为了避免暂编第六师被围歼，九日夜，第十集团军命令该师向子良坪方向突围。该师在突围中遭到日军层层截击，损失巨大，残部刚刚转移到子良坪附近，又遭遇从暖水街南面西进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攻击，暂编第六师残部只有向南撤退至扁担湾。此时，第七十九军司令部也撤到了扁担湾。

十日，中美联合空军先后出动战机五十四架次，分别从重庆和恩施机场起飞，轰炸了慈利、石门、澧县、津市、华容、石首、暖水街、江陵等地的日军，击沉了日军大小船舶百余艘。空战中，中美联合空军的一架战机被击落，另有两架负伤迫降在湘潭附近。十一日，中美联合空军再次出动战机百余架次，对战场上日军的重要地点实施了轰炸。十二日，中美联合空军出动战机八十余架次，对突进到暖水街西北方向子良坪附近的日军实施了轰炸。

日军不顾空中打击，继续猛攻子良坪，中国守军各部都处于分头突围的状态。吴奇伟的江防军和第三十三、第二十六集团军以及第九战区的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虽然都在战场外围向日军发动了牵制性进攻，但对缓解澧水以北战场的危局没起多大作用。

十二日——日军发动攻势作战的第十一天——日军的作战意图已经明确：尽可能歼灭澧水以北的中国守军，将其残部压缩到战场西侧的子良坪附近的山地，同时滞留一部在暖水街一带继续牵制中国军队第十集团军，并掩护攻击常德部队的后方安全；然后，集中第十三、第三师团以及佐佐木支队等主力，迅速向南旋转，突破澧水北岸中国军队的防线，南渡澧水后直逼常德城。

日军第十一军第二期作战的主要内容是：

一、第十三师团

十一月十三日从新门寺附近出发，攻占慈利，进入黄石市附近，追索常德西方地区之敌，予以歼灭之。

二、第三师团

十一月十三日从元岭附近出发，首先在澧水以北地区急袭，并歼灭进入新安、石门附近以北的敌七十三军主力；其次，经漆家河、田家河附近进入常德西南方地区，寻敌歼灭之。

三、佐佐木支队。

十一月十三日从新堰附近出发，抽出一个大队配属给第师团。同时以主力与第三师团共同歼灭石门北方地区敌人；接着经慈利附近到达龙潭河（黄石市西八公里），确保该地附近要点，掩护军主力右侧.

四、第一一六师团

十一月十五日师团主力从澧县北方地区出发，一部兵力从合丸台附近出发，经临澧附近向陬市附近突进，歼灭该地附近之敌，准备攻击常德。

五、第六十八师团

一月十六日黄昏后，师团主力从鱼口附近出发，渡过洞庭湖，歼灭汉寿（龙阳）附近之敌，然后进入常德东南方地区，追索并歼灭南逃或增援之敌。

六、柄田支队（十一月上旬末到达战场）

确保新安附近要线，掩护军之右侧背。

对于日军主力向南旋转，企图攻击澧水北岸的石门，围歼汪之斌的第七十三军部队，然后南下攻取常德的计划，中国方面基本掌握。重庆军事委员会认为，石门位于湘西山地的边缘，不但是控制洞庭湖西侧盆地的要点，更是西进四川的必经之地，因此，石门将是本次会战两军争夺的战略要点。一旦石门被日军突破，南面的常德将危如累卵。可是，目前石门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经过鄂西会战后战斗力尚未恢复，而现在就把战场上的精锐部队第七十四军投入石门作战，又显得过于早了，更重要的是第七十四军已经布防在常德附近乃至常德城内。——游移不定之中，重庆军事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令人困惑不解：

一、石门为战略要地，可藉以打破敌之若干攻击力量，故不可放弃，又如敌在石门附近攻击顿挫时，彼或将转用兵力于他处，即或不然，亦可迟滞敌之行动，以待常德方面增援兵团到达。

二、石门以东第四十四军兵力单薄，正面广大，似不易沿澧水固守其阵地，则常德因之可虑。

三、第七十四军除以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外，仅有两师兵力，如加入石门附近之战斗，则亦不能达成决战之成果。

四、如以第七十四军在常德、慈利间，待第一〇〇军之到达，则可得四师之精锐兵力，举全力在常德附近与敌决战，较为适宜。因此，决先以第七十三军于石门附近占领阵地，拒止敌人，而后再以第七十四军与第一〇〇军于常德、慈利间与敌决战。

这个决定的内容相互矛盾。首先认为石门的战略位置重要，不但直接关系到常德的安危，且守住石门防线还可迫使日军就此撤退，以结束会战。同时又意识到第二十九集团军前期作战伤亡严重，其第四十四军兵力单薄，防线正面太大；特别是防守石门要地的第七十三军，鄂西会战后还没恢复就又投入到此次会战，以致石门和澧水防线漏洞明显。基于这两点，中国方面本应调集主力，死守石门和澧水一线。可最终的决定却是，将精锐主力部队第七十四军放在石门以南，让残破的第七十三军去面对优势日军，这无异于提前放弃了石门和澧水防线。——在日军从北向南逼近常德的时候，只有澧水是可以利用的天险；一旦日军突破澧水南下常德，便再无险要地形可以利用了，指望已经与日军苦战数天的几个师，在澧水一线把数量庞大的日军顶住，如何可能？

果然，已趁夜色悄然南下的日军第三师团主力，于罗家坪、燕子坪之间，协同由天门圩南下的第十三师团主力，于十三日拂晓向中国守军第七十七师和第十五师阵地发动了猛攻。石门位于澧水北岸，对于日军来讲没有前进的河流障碍，但对于第七十三军的官兵来讲，前面是日军猛烈的炮火和大兵团攻击，身后则是没有退路的澧水。日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将第七十三军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分割包围，然后派出小部队突过澧水，从南面封堵了第七十三军的退路。日军的攻击一开始，第七十三军便陷入混乱。日军第十三师团左翼部队突破了第十五师的阵地，第十五师官兵被迫向后转移；而第七十七师的阵地在日军第三师团和佐佐木支队的猛攻下，迅速陷落，第七十七师官兵向南撤退。

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十三日这天，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出动了十架中型轰炸机和二十四架战斗机，在日军后方的补给基地和运输线上投下了一万二千磅的航空炸弹；下午美军飞行员再次出动，投下了八千多磅的炸弹，给日军后方造成很大的混乱。

鉴于一线部队在日军的攻击面前很快就垮了，十四日，中国第六战区下令石门一线的守军向澧水南岸转移，以确保常德以北的太浮山防御

线。同时命令第十集团军全线出击，扰乱日军的侧后；命令江防军向宜昌西岸的日军实施攻击，以策应澧水战场。

但是，第六战区的调整令到达部队时，日军已攻占石门以东的新安，并从那里强渡澧水，向石门的侧后迂回，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陷入激战。十四日晚，日军突入石门。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命令第七十三军留下暂编第五师掩护，军主力向西突围。突围中，第七十三军遭到日军的尾随追击和超越攻击，第十五师官兵奋力苦战掩护军主力，连排长几乎都在带伤作战，部队伤亡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在石门附近掩护主力突围的暂编第五师，在师长彭士量的率领下，独自坚守阵地死战不退。一天一夜之后，除少量官兵南渡澧水侥幸突围外，全师其余官兵全部阵亡，包括师长彭士量。

彭士量，号秋湖，湖南浏阳人，黄埔第四期毕业后，在陆军第十师服役，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会战，包括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晋升为预备第四师副师长。武汉会战中，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军，得到宋庆龄赠予的一床毛毯、一架德制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一九四二年升任暂编第五师师长，率部转战在华容一带。两天前，接到固守石门阵地的任务时，彭士量自知凶多吉少，留下两封遗书，希望全师官兵在他阵亡后服从副师长的指挥，奋勇歼灭倭寇保我神圣国土；而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自己多年来廉洁自守，未置家产，希望妻子刻苦自持，节俭生活，侍奉老人，抚育儿女，希望儿女长大努力报效国家。

彭师长阵亡时年仅三十九岁。

十六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再次出动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石门上空对南渡澧水的日军骑兵和步兵进行轰炸和扫射，还对石门至津市之间澧水水面上的日军船只实施了攻击，击沉日军船只五十多艘，其中包括一艘乘坐着百名日军士兵的平底船。

石门附近的日军冒着美军战机的轰炸和扫射突破了澧水。

而在石门战场的东南面，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攻陷位于松滋河岸边的安乡后，大肆抢夺民船准备横渡洞庭湖。十六日晚，日军开始横渡时，狂风大作，船只翻覆，恰好这时后方运送粮食和弹药的大型汽艇抵达，于是第六十八师团利用这些汽艇再次尝试横渡。而中国守军“麻痹大意，

以为恶劣天气日军不能够渡湖进攻”，以致日军“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登陆成功”。——渡过洞庭湖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从东面逼近了常德城。

在石门战场的东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企图由津市和澧县渡过澧水。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在澧县、石龟山等地与日军展开阵地战，部队伤亡很大。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命令担任澧水河防的第一五〇师派出两个营，坚守津市和澧县；第一六一师留少量部队掩护主力撤守太阳山；第一六二师留下一个营作掩护，主力撤向太阳山西北。被留在澧水北岸的部队与日军血战整整七天，最终寡不敌众，津市和澧县相继丢失。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扫清津市和澧县的中国守军后，改变攻击路线，向西转至合口附近强渡澧水，然后直扑常德以北的临澧。

常德已有被围之势。

蒋介石声称要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十六日，已经抵达常德战场的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发出电报，恳求蒋介石不必费神前来：

渝。军委会机要室毛主任庆祥兄，请呈委员长蒋：缄密。

（一）钧座国家元首，日理万机，恳乞仍坐镇陪都，如认为有加强指挥机构之必要时，恳以总长何到恩施，孙代长官到桃源为宜，未审当否。

（二）我军捡获敌之文件、日记本与其地图标示，敌有进攻常德企图。

（三）无论友军努力与否，职当谨遵钧座向日（十三日）训示，鼓励士气，痛歼顽敌。

（四）已严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其余除派出搜索警戒部队外，约铣（十六日）晚均可到达慈利东南白鹤山、燕子桥、黄石市间地区。

实际上，再过一天，蒋介石就要飞赴埃及了。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抵达慈利以南的羊角山、落马城、白鹤山一线，并派出一部兵力进至慈利以北的赤松山占领前哨阵地。十七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连同佐佐木支队，分三路向慈利发动攻击，防守前哨阵地

的第五十八师的一个营坚守不退，顶了日军整整一天，入夜后该营官兵全部阵亡。日军接近第七十四军的主阵地后，在第五十八师的东岳观、猫儿峪阵地，第五十一师的夏家港、观国山阵地，双方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一角冲入慈利城，第五十八师的防御线岌岌可危。战至十八日上午，慈利城陷落。——慈利是澧水上除了石门和澧县之外，第三个最为重要的渡河点，也是掩护常德左侧背的战略要点。慈利一丢，从这个方向直下常德沿途无险可守。无论王耀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如何信誓旦旦，慈利的轻易丢失令战局迅速恶化。

十八日，飞赴开罗途中的蒋介石对常德战局深感不安，他知道此战发生在他将以一个大国首脑身份出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刻，胜败关乎声誉，其焦虑之情流露在连续发出的电报中。

十八日电：

即刻到。恩施孙代长官、桃源王总司令缵绪、慈利王副总司令耀武：密。（一）该区当面渡犯之敌，将因补给困难，攻势挫减。王副总司令耀武，指挥第七十四、第一〇〇两军，务于太浮山、慈利一带，将敌击破，期收决战之胜利。（二）对一〇〇军之使用，务俟该军全力到达战场后，选定有利时机，向最痛苦方面予以有效之打击。（三）第四十四军，除以一部于澧、津以南地区与敌周旋外，务集中主力，协力第七十四军太浮山以北地区之作战为要。

十九日再电：

限即到。恩施孙代长官、桃源王总司令缵绪、慈利王副总司令耀武、常德盘龙王军长泽波、常德五十七师余师长、速转一〇〇军施军长中诚：密。（一）当面敌人补给困难日增。（二）我第十集团军正向敌之右侧背奋力压迫中。（三）我第七十四军、第四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功过赏罚，绝不姑息。希饬属奋勉为要。

实际上，此时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不但因为前期作战伤亡巨大而战力减弱，且该军发动的策应反击即刻就被留守侧后的日军所压制，部队已经被远远地隔离于常德战场之外；而向常德推进的日军也没有因为补给困难而减弱攻势，各路日军正在对当面的中国守军猛攻不止。

十九日，归王耀武指挥的第一〇〇军先头部队第十九师抵达慈利以

南、常德以西的漆家河，主力开始向常德西南方向的桃源推进。王耀武命令第十九师占领漆家河、五峰山等阵地，掩护主力部队移动；命令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留守德山，归第五十七师指挥，掩护常德城的西南方向。但此时日军佐佐木支队已经越过慈利，第三师团也已抵达慈利与常德之间的太浮山一线。夏家港中国守军第五十一师被日军紧紧包围，一部日军分兵越过夏家港，直接攻击了第一六一师守卫的羊毛滩阵地。

本来指望第七十三军等部队在澧水一线迟滞日军的重庆军事委员会，当日军全线逼近常德时才发现常德附近守军兵力太弱，于是紧急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立即由衡山向常德以南推进，并命令何绍周的第八军向澧县和津市发起攻击，以威胁南下日军的后方。但是，日军不顾一切地猛烈分割中国守军，第一六一师血战一夜突围而出，退到漆家河东北方向的黄龙观附近，但全师突出来的部队仅有四个营，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二十一日，日军十六架战机轰炸桃源后，空投了六十多名伞兵，伞兵绕过南下的第三师团一部，直扑常德西面的陬市和桃源。桃源中国守军不足一个营，城池即刻被日军攻陷。当时，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部在陬市，师长许国璋身边只有收容的两个步兵连和师直属部队一一四九九团抢占太浮山去了，四八八团和四五〇团也避开日军的攻击正在向太浮山附近集结——许师长决定利用现有阵地阻击日军。他明知仅凭身边的这点部队，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第三师团的进攻，但他对官兵们说了这样一番话，表明他不愿意再退，决定死在这里了：

我们为国家尽力的时候到了，守陬市等于协同常德守军作战，我们多打死一个日本兵，就等于给常德守军增加了一份力量，尽到了军人的天职。我们已三面被围，背后是深不可测的沅水，既无渡船，天气又冷，与其当俘虏或落水淹死，不如战死光荣得多。为了保卫国家民族，每个人都要勇敢杀敌，与敌决一死战，不愧做中国的军人。

许国璋，字宪廷，四川成都人，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时，许弃文从戎入川军第二师服役。他勇猛过人，屡建战功，不断晋升，一九三八年川军出川抗日时，他任第六十七军第一六一师第四八三旅旅长。武汉会战中率部顽强阻击日军西进，武汉失守后又率部扼守大洪山。一九四二年升任第一五〇师师长。常德会战开始后，第一五〇师是最先接战的部队，在澧水两岸抵抗日军已达半个月。

日军向陬市中国守军的阻击阵地蜂拥而上。战斗中，许师长亲赴前沿，手持步枪与官兵一起作战，不幸中弹负伤，陷入昏迷。官兵们误认为师长阵亡，准备将其运到沅江南岸去。这时许师长醒来，得知日军已经占领陬市，他拒绝被抬走，表示军人应该死在战场上，抬他过江等于是害了他。他从阵亡在他身边的卫士腰间摸到手枪，然后举枪自戕，时年四十五岁。

陬市和桃源失守后，常德城的西南面已经敞开。

在常德的西北方向，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指挥着周志道的第五十一师和张灵甫的第五十八师，顽强阻击着日军第十三师团，羊角山和落马城阵地一度失守，但又被第七十四军重新夺回。日军第十三师团的先头部队伊藤联队，不顾伤亡彻夜冲锋，终在二十日凌晨五时突到了燕子桥，但继续攻击时再次遇到顽强阻击。第十三师团赤鹿理师团长亲自来到该联队指挥所，严令天黑之前必须突破中国守军的阻击向前推进。伊藤联队与第七十四军的苦战，成为日军官兵的一场噩梦：

敌人占据着标高三百余米的高地，斜面险峻，处处是断崖峭壁。第一线部队甚为艰苦，从十四日夜以来，连日通宵不眠。然而为军之全局着想，不得不挥泪激励部下继续攻击。十八点再次攻击。敌防备坚固，我仅仅占领敌阵一角。联队本部继第三大队之后突进。预备队为了掩护山炮及马匹留在后方，准备于明日天亮后掩护山炮及马匹追及大队。此时夜幕漆黑，联队长在前进中只能借着无线报话机了解各大队状况。但由于山岳地带一场混战，二十一点联队本部便与各部队失掉了联系。联队本部孤军前进，夜半时分行至余儿垭北侧高地，受到敌军包围，敌众我寡我军顽强奋战。二十一日，敌人的攻击逐渐加剧，此时本部依然没有与部队恢复联系。十三点三十分，敌人一枚手榴弹在军旗下爆炸，联队长和旗手（立元义则少尉）负伤，卫兵三人死亡。右腿被弹片炸伤的联队长，无畏地亲自护持着军旗，激励周围的士兵，指挥战斗。然而死伤者递增，危机迫在眉睫。幸好在十六点左右第三大队（大队长，大场新平少佐）一部赶到，联队本部才摆脱了危机，十八点进入二方坪。

虽然正面阵地没有被日军突破，但右翼受到迂回而来的日军佐佐木支队第二一六联队的威胁。为了避免陷入包围，王耀武命令部队向常德以西的漆家河西南方向撤退。

中美联合空军二十日再次出动战机三十六架次，协助澧水两岸地区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二十一日，日军出动战机三十九架次，轰炸了中

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恩施，中国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机四架，中国空军也损失了四架战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随即起飞战机二十八架次，在安乡、澧县和常德以北地区轰炸和扫射南下的日军。只是，由于这一带地面多为山地，中美空军对山地作战的协助效果不甚明显。

二十一日，当蒋介石在开罗机场走下飞机时，常德北面除了太阳山和太浮山两个要点尚在中国军队第一六二、第一五〇师手中之外，其余各要点均被日军控制。

二十二日，中国军队第六十六军，在澧水以北向王家厂、仁和坪地区的日军发动攻击，以牵制南下常德的日军；第七十九军由石门渡过澧水，向慈利方向攻击日军的侧背。而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在常德西北与慈利以南间，与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激战不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以及古贺支队、宫胁支队主力留在石门以北地区，负责阻击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七十九军等部队对常德的增援。

常德已经被日军三面包围。

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日军实施三面反包围，在常德城下与进攻的日军展开决战：调集第六战区主力和第九战区一部，以第十、第一〇〇、第七十四、第七十三、第九十九、第四十四、第七十九军为一线兵团，以第十八军为二线兵团，在沅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三面向日军实施包围反击。同时命令中国第九、第五战区在更广阔的外围地域向日军发起进攻，以策应常德决战。而常德城内的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接到的命令是：“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

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师死守的常德小城，后来被中国国内舆论普遍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实事求是地说，常德守城战在战役规模上远不能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比，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守住了而常德没守住。但是，常德守城战又是淞沪会战以来中国军队最为顽强的一次城池防御战，奉命守城的第五十七师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其不屈的精神与惨烈的牺牲令日军肝胆俱寒。

第五十七师隶属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作战素质，第七十四军在中国陆军中堪为首屈一指。第五十七师与中央军嫡系出身的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八师不同，该师原来隶属于第六十九军，是

由皖军改编而来的部队，第六十九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严重，难以补充恢复，遂被蒋介石撤销番号，而其第五十七师则被划归为第七十四军建制。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军分五路扑向常德外围的德山、牛鼻滩、新民桥、七里桥、黄土山和河袱山，第五十七师的外围阵地开始接敌。

早上七时，在常德的西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步兵和骑兵二千余人，在十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向防守河袱山的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阵地发起猛攻，激烈的交战中阵地易手十余次。下午，日军增加兵力，阵地又是易手七次，一个营的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天黑时残部放弃前沿阵地退守核心阵地。在常德的北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一部向防守黄土山的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一七〇团阵地发起进攻，残酷的拉锯战持续到黄昏，一七〇团官兵向南撤退到杨家桥、竹根潭阵地。在常德的东南方向，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在新民桥和黄木关方向猛攻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阵地，激战整日，阵地依然在一六九团手中。

正当第五十七师浴血苦战的时刻，负责防守常德外围重要据点德山的第一〇〇军一八八团团长邓光锋，在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二三四联队进攻到阵地前时，竟然携带家眷跑了，导致全团官兵跟着他仓皇撤退。国民党军战史对这一严重临阵脱逃行为的叙述讳莫如深，仅说“通讯中断，而后该团情况不明”。中国陆军第一〇〇军，前身是地方军阀万选才、孙殿英、万殿遵各一部，可谓杂牌中的杂牌。——德山，位于常德东南方向，俯瞰沅水，主峰高耸。常德在沅江的环绕下如在囊中，而德山正处于囊口。尽管那位临阵脱逃的邓团长很快被抓住，并押往第六战区驻黔江的军法部执行枪决，但是，德山就这样轻易丢失了，令从桃源北上的日军第三师团很快便通过这一缺口强渡沅水，闯入常德城南的码头附近。

二十三日，西面，守卫河袱山的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的阵地再次受到日军的猛攻。日军的炮火把中国守军阵地轰成一片焦土，二营官兵与日军肉搏十余次，最后全营仅剩下七十多人，奉命向东收缩至南湖铺、黑家挡一线。东面，在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方向，日军攻击兵力增加到四千以上，在向黄木关阵地进攻时，日军施放了大量的毒气弹。日军突入阵地时，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亲率一个连向日军发动逆袭，在阵地前往复拼杀，双方完全陷入混战之中。晚上，日军推进到七星桥、新堤一线。北面，在第五十七师一七〇团守卫的竹根潭一线，日军第六师

团第一〇九联队推进艰难。中国守军异常顽强，在炮火将阵地工事全部摧毁、官兵死伤惨烈的情况下，尽管寡不敌众，依然拼死抵抗。黄昏时分，日军联队长布上照一召集大队长开会，要求一个小时后突破当面中国军队的阵地。然而，话音未落，在众目睽睽下，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了联队长的乘马”。——日军在收拾布上照一联队长的尸体时，第一大队大队长铃木兼雄宣布，由他接替指挥第一〇九联队作战。

日军在常德城外围的受挫，完全出乎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的预料。当得知常德守军只有中国军队一个师时，原以为仅仅靠第一一六师团就可完成攻城任务。谁知，包括担任主攻的第一〇九联队联队长的死亡在内，第一一六师团伤亡严重，横山勇由此判断常德中国守军极其顽强。于是，第十一军改变计划，将第三、第六十八师团也加入到攻击常德的序列里。二十三日晚，横山勇命令：“第一一六师团从北、西方攻击，第三师团以一个联队由南方攻击，第六十八师团以一个大队由东方攻击。常德城之攻击开始，预定二十五日夜。”

二十四日拂晓，日军开始对常德实施狂轰滥炸，城门街市房屋多被炸毁，北门外更是烈焰冲天，浓烟滚滚，一架日军轰炸机被中国守军地面炮火击落，残骸坠落到城外的小湖中。接着，围城日军从三面发起猛攻，日军集中了所有的火炮助战，在炮火集中的落路口、卓安桥、七里桥等处，日军步兵以密集的队形反复冲锋，中国军队一七〇团数次反击，活捉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三三联队的上等兵松江三郎和石川正一，并在日军的尸体中发现了被打死的大队长中村中雄。一部日军在城垣的东南角水星楼附近强行登城，直接突入城内的沅清街附近。一七一团团长杜鼎指挥反击，营长张照普率领手榴弹班与日军拼死巷战，终于把突入的这股日军赶了出去，并活捉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一等兵铃木秀夫、藏木富治、村尾义一以及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三三联队的军曹山本正一。

常德炮火连天之际，正是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时刻，能够想象急于靠一场完胜支撑门面的蒋介石，心情该是如何的忐忑不安。他在万里之外发来训令，直接指挥常德作战，强调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常德都要坚决地守下去：

限二小时到。恩施孙代长官、长沙薛长官：密。训令：（一）进犯常德之敌，三旬以来，经我迭次痛击，伤亡惨重，疲惫已极。其补给断绝，后方空虚，必将溃退。（二）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以第六、第九战区协力包围敌人于沅江江畔而歼灭之。（三）第九战区：（甲）

第十军（即改隶第九战区）、第九十九军、暂五十四师，归李副总司令玉堂指挥，速进攻洞庭湖南岸亘沅江右岸之敌。特须以重点指向德山方面，支援常德第五十七师之作战。（乙）杨森、王陵基两集团，应加强出击兵力，积极攻袭敌人。（四）第六战区：（甲）王耀武挥一〇〇军、第七十四军，以一部扫荡桃源之敌以主力进出陬市，攻击犯常德敌之右侧背。但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乙）王敬久集团并指挥第十八军及一八五师，以一部扫荡子良坪、仁和坪一带残敌，另一部进出公安、津市、澧县，确实遮断敌后方，以主力渡过澧水，向羊毛滩、临澧方向，求敌侧背而攻击之。（丙）王缵绪集团之第四十四军，应仍在太浮山、太阳山一带攻袭犯常德敌之后方，七十三军速夺回慈利。（五）各线指挥官应掌握主力，迅速求敌而攻击之。切忌脱离掌握，或以广大一线专守防御，逸失战机，贻误全局。（六）第九、第六战区之作战地境，改为沅江之线，各集团军作战地境，由战区规定之。（七）中美空军继续轰炸湖内敌船，并任常德制空。（八）仰速将部署具报。

应该说，常德战局发展到这时，尽管日军已推进到常德城下，但双方战力相差不大，也都显出疲惫状态，特别是日军受到中美联合空军的持续轰炸，距常德战场最近的洞庭湖运输线几乎被炸断，支撑日军庞大兵力的弹药补给将很快发生危机。如果第五十七师能够坚守城池，外围的第六、第九战区各部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积极进取，攻城受阻的日军将会被中国军队反包围，中国军队不是没有在常德城下打一场战果可观的歼灭战的可能。

在日军准备全面攻城的时候，守城的第五十七师也迅速调整了部署：一六九团为右地区队，占领岩凸、牌路边、新堤、七里桥、夏家港（不含）之线阵地；一七〇团（欠第三营）为左地区队，占领夏家港、沙港、半铺市、白马庙、长安桥、落路口之线阵地；一七一团（欠第三营）为城垣守备队；一七〇团三营为师预备队，位于城内。——第五十七师兵力明显不足：原在河袱山阻击日军的一七一团的一个营，阵地丢失后已转移至南湖铺、黑家挡附近，官兵所剩无几；而原来指望能够助第五十七师臂之力的第一〇〇军的一八八团，放弃德山后已远远地跑到了桃源西南约三十公里处的泥窝潭。

二十四日晚八时，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接到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报：“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发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努力战斗为要。”余师长当即回电：“职师四面血战已达七昼夜，虽伤亡惨重，但士气尚旺，我全体官兵谨遵钧座意旨，咸抱与常德城共存亡之决心。现八二迫炮弹、七六二山炮弹告罄，并饬外线

友军挺进。”

余程万师长知道，常德城是守不住的。

在外围作战的几天里，第五十七师官兵虽然顽强血战，但依旧无法抵挡日军的疯狂围攻。此刻，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八师，仍在更大的外围圈内与日军纠缠，根本腾不出兵力支援他的第五十七师。至于整个战场上的其他友军，余程万心里清楚：指望他们舍命靠近常德来增援自己，国民党军就没有这个传统！

时年四十一岁的余程万是广东台山人，先后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广东铁路专门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中山大学政治系以及陆军大学研究院，学历之高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十分少见。基本上算是知识分子的他，早年在军内从事政治工作，一九四〇年才出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师长，但其从军资历比军长王耀武还要老。战前，他带领第五十七师驻扎常德半年，当地百姓对他的印象不错：第五十七师官兵没有强买强卖的，也没有滋扰生事的，帮助百姓收稻谷时还自带干粮。战前动员常德百姓疏散，官兵们主动帮助老幼病残转移财物，不取报酬。余师长本人也不像其他军官一样耀武扬威，他对下级从不摆架子，总是和和气气的。常德的百姓认为，余师长是“国民党军将领中比较好的一个”。

以前没有经历过真正血战的余师长和他的第五十七师官兵，很快就要尝到孤军苦战的滋味了。

中国陆军第五十七师主要军官如下：师长余程万，副师长李琰、邱维达，参谋长陈嘘云；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一七〇团团长孙进贤，一七一团团长杜鼎；步兵指挥官周义重，炮兵营营长孔溢虞，工兵营营长高玉琢，辎重营营长杜少兰；特务连连长杨筠，骑兵连连长薛家富，通讯连连长刘扩襄，输送连连长曹宝贵。

配属该师的部队：第七十四军炮兵团，团长金定洲（指挥山炮一营）；军直属炮兵三营，营长何曾佩；战炮营，营长蓝健民；高射炮连，副连长瞿国桢；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团长邓光锋（已逃遁）。

二十五日拂晓，日军在二十多架战机的支援下全面围攻常德。在卓安桥、渔父中学、兴隆桥、船码头、七里桥、三里港、岩凸等阵地前，日军倾尽全力以数路密集队形连续猛冲，与中国守军多次进入白刃格斗

状态，第五十七师一七O团的邓鸿钧营长和一六九团的郭嘉章营长在战斗中阵亡。中美联合空军先后出动二十多架战机飞临常德上空，对攻城的日军实施猛烈的轰炸和扫射，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中畑护一被炸死。然而，该联队依旧强渡沅水，第三大队第十中队作为先头突击队，遭到中国守军炮火的拦截，日军救护队拼死往返渡江抢运伤员。强渡后，这股日军接近常德城墙，城墙外的民房被中国守军浇上汽油点燃，烈火熊熊，加上机枪的猛烈射击，日军在彻夜攻击中再次出现大量伤亡，第十中队中队长武藤被打死。——“直到二十六日黎明，东门附近的城墙上才接连出现了三面日本旗。”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绕过黑家垱中国守军阵地，迂回到长安桥附近；在夏家港受阻的第一〇九联队，也迂回到城东，进抵三里港和北门的外街。鉴于日军全面逼近城垣，余程万师长决定缩小正面，把主力移动到核心阵地上，命令一六九团由东门和北门入城，负责防守东门城垣；一七〇团由北门和小西门入城，防守南门；一七一团负责防守北门至大西门城垣；一六九团三营作为师预备队，控制在师指挥所附近的文昌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电告余师长，增援部队第十军最晚可于明天抵达常德。这一消息大大鼓舞了第五十七师的士气，余师长给各位团长打电话，要求全体官兵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光大本军之辉煌，奋勇杀敌，固守城池，直至援军到来。

但是，余师长不知道，所谓的增援部队距离他还很远。在日军动用半数兵力阻挠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第七十九、第六十六、第十八军尚在澧水以北；第七十军的另外两个师以及第一〇〇军被日军阻挡在岩泊渡、龙潜河、盘龙山以西；而孙连仲声称明天即可抵达常德的第十军，目前尚在百公里之外的资水以南。

二十六日，城西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趁中国守军一七〇团退入城内之机逼近城垣。日军集中起十余门火炮，在十二架战机的协助下，首先施放毒气，，然后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激战到下午，日军从渔父中学侧攻一七〇团阵地。渔父中学阵地上的守军伤亡巨大，最后仅剩一名排长和数名士兵，几个人坚守不退，直至弹尽之时全部阵亡。

城北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联队攻击北门外的贾家巷阵地，中国守军一七一团的一个排冒着炮火顽强死守。战至下午，贾家巷阵地全被摧毁，排长殷惠仁和仅剩的几名士兵，在最后时刻用手榴弹与蜂拥而上的日军同归于尽。日军第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战死。天黑之后，日军不顾守军迫击炮的杀伤，试图攀登城墙，连续数次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守

军“毫无动摇之意，猛烈喷射火力”，令攀城的日军“死伤严重”。

在城东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部队和第一一六师团第一〇九联队数次攻城无效，从第四十师团借调来的护田义直的第二三四联队奉命增援。第二三四联队从德山方向靠近常德，渡沅江时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且中国军队在沿途埋设了大量地雷，道路两边的民房上也有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因此行进缓慢。抵达东门附近后，他们的面前不但有块开阔地，城门附近还有坚固的碉堡，日军反复发动进攻都没有成功。在阻击日军的战斗中，一六九团一营营附董庆霞阵亡，士兵伤亡严重，但阵地依旧在一六九团之手。

余程万师长不断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发电，诉说常德守军弹药告罄，伤亡惨重，恳请援军务必按照计划在二十六日晚抵达，否则他的第五十七师将难以支撑。孙连仲回电说，常德以北的援军已经过了盘龙桥和潘家河，常德以南的援军二十七日可以抵达城南。

二十七日，围攻常德的日军又增加了七千多兵力，战机和火炮对城垣的轰击更加猛烈，步兵在毒气弹的配合下轮番攻城，各个城门处都发生了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出现严重伤亡——“第三大队大队长葛野旷大尉壮烈战死。该大队所属中队军官至此全部战死或负伤。”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也伤亡巨大，余程万不得不把所有的运输兵和担架兵编为战斗部队，把三百多名炮兵编入步兵作战行列，师部军官们也都被补充到了第一线。

黄昏，增援的第十军依旧没有抵达。第十军在常德南面的德山附近被日军阻击；而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师以及第一〇〇军的第十九师，还在常德以西从陬市和河袱山向常德靠近。

这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乘专机离开开罗回国。

二十八日拂晓，日军新一轮的攻城开始后，常德东门首先出现危机。日军集中了百余门火炮轰击东门附近的城垣，一股日军从城垣缺口冲到了城内的海月庵附近。中国守军一六九团团附高子白率领四十多名非战斗人员以手榴弹和刺刀反击日军，尽管官兵牺牲殆尽也没能阻挡住日军的深入。余师长命令一六九团退守永安商会、万花街街巷继续抵抗。在北门，城门和城垣工事全部坍塌，余师长命令一七一团退守敬惜堂、玛瑙巷和体育场一带的街巷，巷战中日军第一三三联队代理大队长

饭代英太郎、第四中队中队长北田一男以下官兵多人被击毙。东门出现危机后，南门的中国守军被迫两面作战。尽管中美联合空军向城内空投了两万发子弹和炮弹，但是第五十七师的战斗人员消耗殆尽，各级指挥官伤亡达百分之九十五，重武器损失达百分之九十，所剩无几的官兵非伤即病。余师长再次把所有非战斗人员，包括杂役、政工人员和师部所有的勤杂士兵，连同滞留在城内的一个监护班和常德县警察队的四十多名警察集中起来，编成一支战斗部队投入作战，官兵们奋力修筑工事，坚守常德城的东南角。

余师长不断地发出求援电报，呼吁外围部队迅速向常德靠拢。

回国途中的蒋介石，致电第六、第九战区以及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和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常德如失陷，应由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九军负完全责任。"

而此时的余程万师长，根本无暇顾及常德城失守该由谁负责任，他和他的残余官兵完全陷入了惨烈的混战中。

二十九日，日军向常德城内施放了大量的毒气弹和燃烧弹，并分成小股突击部队四处放火。东门附近孙祖庙、三板桥、局北街和后街的巷战一直持续到天黑，所有的房屋全部成为灰烬，第五十七师官兵退到大庆街和高山巷一带抵抗。南门的日军猛轰水星楼，然后反复攀登，一七〇团的彭幼成营长率部在此拼死抵抗，死伤惨重。西门，一七一团官兵与冲锋的日军混战不止，杜鼎团长坚持在城垣上指挥作战，一直到晚上城垣阵地仍在，但团附卢孔文阵亡。这天，中国空军表现英勇。上午，第四大队在日军头上投下了六千三百发炸弹后，又在常德城上空与二十三架日军战机展开空战，击落了四架，第四大队没有伤亡。下午，第四大队再次飞临常德上空轰炸和扫射日军，并空投下大量的药品、食品以及中国民众为血战孤城的第五十七师官兵捐赠的各种慰劳品。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下令烧毁常德城。

各路日军大肆纵火，常德城的所有街巷一片火海。

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主力在常德以北、以西地区，把试图增援常德的各路中国军队挡在了距离常德很远的地方。此时，只有第四十四军的第一六二师离常德北门稍近，第一〇〇军的第十九师和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一师已经推进到了河洑，而第十军和阻击他们的日军仍僵持在常

德以南的牛鼻滩、德山和苏家渡附近。

各路日军把位于中央银行的第五十七师指挥部包围了。

师长余程万重新部署了各团防守的街区后，发出了一封情绪悲壮的电报：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领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七十四军万岁，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三十日，日军的攻击重点放在了大西门和小西门，因为第五十七师指挥部所在的中央银行，距离大西门只有二百五十米，距离小西门仅有二百米。日军疯狂地向中央银行实施炮击，并施放毒气，大批日军轮番向银行四周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冲锋。一七一团的一个营，仅剩下的三十多名官兵死守不退，守卫小西门的一个排全部阵亡。日军攻破距离中央银行仅一百米的文昌庙后，第五十七师师部集中起所有的勤杂人等拼命堵击，各团尚未阵亡的团长和营长都参加了搏斗，余师长本人率领特务连的一个排也上了前沿。接近午夜，日军攻势稍缓。

几个小时之后，十二月一日拂晓，日军开始在中央银行四周的墙壁凿洞，逐屋进攻，第五十七师师部官兵凭借残壁死撑。日军调来大量的平射炮，对着银行四周的碉堡和民房逐次轰击，在警察局、关帝庙、后街、法院街等阵地固守的第五十七师官兵全部被炮火埋葬。上午十一时，余师长似乎看到了些许希望，因为军长王耀武来电称：战区严令第七十九军的一个师必须三十日抵达常德；第六十三师于三十日晚上攻占了常德西南方向的桃源；第五十一师的一个加强团已经抵达长岭岗附近；第十军正在常德东南对日军实施攻击。余师长立刻派副师长陈嘘云带领几名士兵冒死出城，到长岭岗和第五十一师取得联络。但是，直到晚上，各路援军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也未见第五十一师到来。只是，第十军第三师的一名参谋，带着师长周庆祥的一封信出现在了余师长面前，信中说第三师已经攻到德山，要求赶快通报常德城里的情况。余师长又派步兵指挥官周义重带领几名士兵冒死出城，到德山方向去接应第三师。

但是，第三师七团好不容易进抵距常德南站仅三公里处，遭到日军阻击后又退回德山了。

十二月二日拂晓，第五十七师师部的最后阵地已被压缩在不到三百米的狭窄范围内。此时，第五十七师伤亡殆尽，每个团所剩部队不到二三个班，全师能够作战的官兵不足三百人，可以射击的步枪仅剩四十多支。

上午，第五十一师敢死队的便衣摸进了城，他们向余师长报告说，第五十一师仍在长岭岗被日军所阻，据悉第十军今晚也无法进城。

余师长彻底绝望了。

自己所在的第七十四军的两个师，尚且解救不了同属一个军的第五十七师，还能指望第九战区薛岳麾下的第十军吗？

其实，为突进常德城，第十军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中国陆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辖孙明瑾的预备第十师、周庆祥的第三师和朱岳的第一九〇师，是第九战区的机动部队，归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直接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十军奉命在衡山整训，各师兵力不足六千人，加上军直属队，全军不到两万人马。接到驰援常德的命令后，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十军从衡山附近出发，紧急行军三百多公里，在常德城内的第五十七师处于最后时刻的十二月二日，抵达德山附近。方先觉认为，如果让前来阻击的日军抢占德山高地，第十军就无法突击到常德城下，于是决定：第三师为右翼，立即抢占德山；预备第十师则向德山以及常德南站前进；第一九〇师为军预备队。

第三师立即前往德山，发现德山已被日军占领。为了夺回德山，第三师与日军展开激战，虽然突破了日军的阵地一角，但部队伤亡很大。同时，预备第十师也被日军阻击，陷于苦战。方先觉军长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一九〇师增援，但朱岳师长说，他已经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令，让他协助右侧的暂编第四十五师作战，因此他无法执行军长的命令。方先觉因为朱师长不听指挥而破口大骂，同时也埋怨薛岳不应直接指挥他的部队。没有增援的第三师先头部队攻到常德南站附近，就再也无法向前推进了。更严重的是，预备第十师遭遇了不测。作为第十军的左翼，师长孙明瑾得知常德城岌岌可危，于是比原定计划提前了数小时，于三日凌晨三时向德山发起突击，进攻序列是：二十八团为先头部队；师部和直属部队在二十八团之后；二十九团在二十八团的左侧；三十团在师部的后侧。师部选择的行军路线是道路狭窄的丛林地带，警戒和搜索都很困难，天亮时突遇日军的伏击——事后得知，日军根据侦察

机的报告，得知了中国军队的行踪，随即派出一支部队进入丛林，任务就是伏击预备第十师的首脑机关——预备第十师师部和直属部队顿时大乱，狭窄的丛林小路上无法展开部队，在日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下官兵非死即伤，参谋长何竹本负伤被俘，参谋处长陈飞龙阵亡。日军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具中国高级军官的尸体：

从服装上看可能是敌人高级军官。尸体一半泡在水里。让俘虏会计大尉（已负伤，曾予以治疗）骑马跟随去验尸。当尸体捞上来进行查验时，该大尉最初说不是师长，但是在这其间突然哇的一声抚摸尸体痛哭起来，确认是师长。据该大尉说，该师长为人廉洁，为部下所敬慕。我方为师长竖立木牌，郑重安葬。

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江苏宿迁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毕业，一九四〇年入预备第十师任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该师在行军时遭到日军伏击，损失惨重。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该师死守长沙城，顽强抵抗，迫使日军撤退，战后孙明瑾升任预备第十师师长。孙师长性格谦和沉稳，简朴自守，酷爱文学和外语，阵亡时年仅三十八岁。

师部遭到伏击时，先头部队二十八团也与日军遭遇，激战数小时后团长葛先才负重伤，部队被冲散。左翼的二十九团遭到日军侧击，没能及时展开的部队发生混乱。跟在师部后面的三十团，得知师长阵亡后随即撤退。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严令下，常德城外围各个方向上的中国军队不敢违抗军令，都在尽力作战以求向常德靠拢。第七十九军强渡澧水攻占羊毛滩等阵地；第七十三军攻入慈利，给日军的侧后造成威胁；第十八军在汉洋河附近与日军苦战不止，令日军的后方线出现危机；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二师从太阳山阵地南下，攻占了黄土山等阵地；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突入石门与日军展开了巷战；第六十六军第一九九师和第八十六军第十三师，合力包围了仁和坪附近的日军；第三十军第三十师攻占了宜都；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在河袱以北与日军激战；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攻到了漆家河，第五十八师对黄石市的攻击取得局部成功。

但是，所有的外围行动始终无法获得实质性的突进。

远距离的策应根本无法减轻常德城内守军的巨大压力，更何况最远的策应作战居然发生在距常德三百公里外的宜都。

中国军队的各路援军都不可能冲入常德城了。

三日凌晨二时，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决定突围。

余师长把残余官兵留给了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命令其在城内牵制日军，自己则带着其余官兵，换上便衣，越过城南城垣，乘小船渡过沅水，突出重围。

留在城内的第五十七师残余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肉搏，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包括奉命掩护师长突围的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

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团长无数，而这个最后时刻依旧与官兵一起搏杀的柴意新团长，当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柴团长比师长余程万大四岁，黄埔军校三期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七十四军任职。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鄂西会战。一九四三年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团长。常德会战开始后，他率领千余官兵在常德城外城内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不休，不顾生死，身先士卒，始终是官兵坚守阵地的主心骨。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常德失守了。

为了攻取常德城，日军先后投入三万兵力，而守城的中国军队只有一个师，兵力不足万人。攻城作战令日军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联队长死了两名，大队长死了四名，大量下级官佐和士兵死于常德城内外。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师坚守常德半月有余，付出的代价是战后全师仅存数十人。

刚刚返回国内的蒋介石，与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联系不上了，但他在常德附近与日军决战的计划仍未改变：

即到。长沙薛长官、恩施孙代长官：密。训令：（一）犯常德之敌，大部已退却，常德余师本日状况不明。（二）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依既定计划围攻敌人。（三）第九战区，速肃清玩江南岸之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进出沅江北岸，策应第六战区之作战。（四）第六战区之第七十四、第七十九军，应以必要一部，肃清各当面之敌，以主力围攻常德附近之敌。以上各军，暂由王副总司令耀武指挥。第十八军应继续南下截击敌人。（五）其余由战区另行部署，并具报。

此时，常德城周围中国军队的位置是：第十集团军因损耗过大，主力退守在湘鄂交界处的仁和坪以西；第十八军在澧水以北；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在澧水岸边的石门以北；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在临澧以西，军主力在五通市以西；第二十九集团军的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一师在兴化港，第一六二、第一五〇师残部仍在常德以北的太阳山和太浮山；第七十三军在热水坑以西；第七十四军主力在漆家河、河袱山以西；第一〇〇军在桃源。

中国军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从十二月五日开始加紧对常德附近的日军发起进攻。双方混战数日，各有进退。第十军第三师在德山与日军的战斗格外惨烈，在日军的猛攻下，第三师九团的阵地全被摧毁，营长周志清和全营官兵阵亡，团长张惠民率领特务排、防毒排、卫生队和团部士兵冲上去接着搏斗，也全部阵亡。六日德山被日军攻占。

为了加强常德附近中国军队的兵力，第九战区临时调集第五十八军和第七十二军各三个团以及暂编第二军的暂编第七师，组成了欧震兵团，向常德以南推进，在德山丢失的当天，与第十军左翼部队配合又收复了德山。

九日，欧震兵团发现日军开始向北撤退，立即向常德靠近。当他们进抵已成一片废墟的常德城时，城门四面大开，城内空空如也，日军踪影全无。

日军第十一军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攻占常德后立即撤退，恢复了战前的对峙状态。

在“我军收复常德”的胜利消息传来的同时，中国方面发现，按照一般规律，阵前撤离应该迅速而果断，但是撤离常德的日军似乎走得迟疑不定。——日军第十一军攻占常德后，东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突然命令第十一军长期占领常德，这让军司令官横山勇感到很意外。计划的突然改变，源自十一月二十五日驻华美军对台湾新竹日军机场的轰炸。大本营认为，对新竹机场的轰炸，表明美国已具有利用中国机场对日作战的能力，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不仅是一种宣传，已经进入了实际性的实施阶段。受到这一严酷现实的打击，加上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船舶损失严重，大本营认为必须摧毁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同时为构成大陆走廊，必须从北向南打通中国的铁路交通线，以维持日军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战场的作战能力。因此，需要第十一军抽调部队占领常德，理由是：一旦进行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作战，最强大的对

手将是部署在粤汉铁路线上的中国第九战区，而位于洞庭湖西侧的第六战区部队，会对打击第九战区的作战构成严重的威胁或牵制。而如果日军能够保持住对常德的占领，未来在这一地域作战时，常德将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出发地。为了说服横山勇占领常德，东京大本营甚至表示，如果第十一军需要，就把原准备调往南方军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留下来。

但是，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即使把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留下来，他的兵力还是不够，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第十一军没有能力长期占领常德，希望批准按照原计划从常德撤退。

鉴于横山勇的态度，畑俊六不得不决定放弃常德，命令第十一军按时撤退。

九日，横山勇下达撤退命令，要求各部队十二日前撤至石门、合口和澧水南岸附近。常德附近的日军的撤退路线是：第三师团由马头山、河袱附近撤向新安、合口；第一一六师团由太阳山南麓的石板滩、渣口市附近撤向澧县；第十三师团由五通市、热水坑、羊毛滩一线撤向石门、新安；第六十八师团由缸市附近撤向津市附近的澧水南岸。

就在日军开始撤退的十二月九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六、第九战区部队对撤退中的日军实施追击围捕作战。

中国两战区部队虽然执行了命令，但行动迟缓，日军在没有受到猛烈追击的情况下，于十二日抵达了各自的撤退线。

眼看就要渡过澧水回到原来的出发地，结束这场残酷的作战了，日军第十一军突然接到了大本营和派遣军的命令，让他们立即返回重新攻占常德。

横山勇火了，并由此爆发了日本陆军史上少有的抗命不遵的激烈冲突。

由于全面战局的不利，焦躁不安的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和第十一军的将领们，都处于心情恶劣的时刻。畑俊六在勉强同意第十一军撤退的同时，依旧在制订打通南北铁路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并把详细作战方案用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东京大本营。令畑俊六没有想到的是，他随即受到了大本营的训斥，说打通中国南北交通的作战影响巨大，如此简单的作战计划以及用电报的形式报告过于草率。畑俊六回电大本营，表示接受

训斥。第二天，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四十五分，畑俊六向大本营报告了第十一军撤退的情况。晚上八时二十分，他接到了大本营必须确保常德的命令——显然，东京大本营发电时，尚未收到第十一军已开始撤退的报告——“经过研究认为”，将来进行作战时，“确保常德附近对我方是有利的”。

撤退中的日军第十一军停在了澧水一线。

重庆军事委员会鉴于各部队追击迟缓，再次下达了追击命令。中国军队向停在澧水附近的日军发起攻击，但由于攻击力度不大，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在日军短促的抗击和反击下，双方很快形成了对峙。

横山勇的恼火，不仅因为上司的反复无常，随意改变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线指挥官他深感作战的艰难和凶险。目前，第十一军正按照原定计划撤退，沿途所有的补给兵站都已提前撤走，各部队在这次作战中损伤严重，如果重新部署作战，不但要花费时间把补给系统再次建立起来，而且官兵疲惫不堪，战斗力如何很难预料。更何况，重新回头再攻常德，对伤亡累累的部队又该怎样解释？

横山勇拒不执行重新攻占常德的命令，这让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强烈地意识到：第十一军已不具备作战积极性了。——明确表示不愿再战，对于日军而言，这是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焦灼万分的大本营派出第一部（作战部）部长贞田禳一郎前往中国。贞田禳一郎当天就飞到了南京。在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幕僚们交谈时，幕僚们的意见都倾向于第十一军，而且话说得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大本营关于确保常德的命令，完全没有顾及战场实际。第十军在攻占常德的作战中死伤五千多人，一线部队装备和粮弹的携带量严重不足，补给线又不能得到保障，如果无视第十一军的意见而坚持重新攻占常德，是很不妥当的。

为了不使派遣军与第十一军的关系恶化，畑俊六又派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亲自前往位于汉口观音寺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以求当面听取横山勇的意见。第十一军的意见是：

一、各部队尽管没有人发怨言，但战力已经显著下降，包括部队护送患者、接受新兵等，减员达百分之十八，急需整顿。

二、即使有可能确保澧水附近以北要地，但为此至少需要三个师

团，并且要在正面不断地和敌人发生小规模战斗，恢复战力并非轻而易举，特别是现在不能利用水路的情况下，由于新设陆路兵站，筹集弹药粮秣和越冬准备等庞大的后方业务，积极的作战准备还将往后延迟。

三、此外，澧水以北一线，作为将来攻势的据点并不认为有多大的价值。而为了从常德附近开始攻占长沙附近，感到这个包围圈过大过长，而且为了出于敌之所料，这样做也未必适当。

当松井太久郎提醒，这样是不是对大本营或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种反抗”时，没等横山勇回答，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们表示：“对于命令，即使全军覆没也在所不辞，一定勇敢执行，只是详细报告了现状。”

十八日，松井太久郎返回南京，向畑俊六报告了第十一军的现状，畑俊六终于决定让第十一军全面撤退。

显然，畑俊六的心情十分不佳，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经过前往观音寺第十一军战斗司令所的松井总参谋长归任后的汇报，此次常德作战敌防备坚固，我方损失甚多。参战总兵力五万余众，而因伤亡、患病、接收新兵等，减员一万，需要恢复战力。而且前后方补给线也只不过一条，凡属一切计划均以十二月末之前恢复旧态势为前提制订的。其状况令人同情。该军也充分理解总军的立场，并不存在所谓厌恶返还的气氛。从该军之实际情况出发，同时通过目前与第一部长的联络明确了中央意图，故命令该军按既定计划恢复原态势。

十八日，常德以北直至澧水附近大雪纷飞。

十九日夜，停留在澧水附近的日军再次开始全面撤退。

中国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各部队在苦寒中跟踪追击，与日军第十一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发生局部战斗。

在作战受到重大伤亡后，又在冻饿以及中国军队的追击中饱受困苦的日军，把邪恶之气发泄在沿途遇到的中国百姓身上。追击日军第三师团的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第十八师五十三团三营营长马千毅，目睹了日军一路奸杀抢掠造成的惨状：

澧县西山区的一个小镇合口，镇上只有七八个老太婆未逃走，都被日军轮奸致死，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幼女也未幸免。敌从龙凤埡溃逃时，

在一农妇家牵出一条黄牛，用刀在后大腿割下一大块肉煮食。牛痛极狂叫，农妇见状不忍，欲用刀将牛放血速死，敌人不准。农妇骂，敌人发怒，取刀在农妇腿部割下一块肉，听着人叫牛叫，狂笑鼓掌。当晚我军收复龙凤垭时，农妇还活着。新安江上有死尸从上游漂来，大多为赤裸妇女。青泥潭附近路边大树上，倒挂着数具尸体。村中人诉说，日军扬言，如有一个日军被打死，将杀十个中国人抵命。这是发生在十一月的事。日军进村后，叫喊："花姑娘有的？"适有一家妻子病重，未能躲藏，丈夫只得陪侍。一日军见病妇欲行奸污，丈夫见状愤怒已极，拿柴刀将敌砍死。另两名日军来寻同伙，见到尸体，便将丈夫倒挂，活活吊死。病妇拼命抵抗，咬伤日兵脸部，日本兵凶相毕露，将病妇拖出，全身捆绑，用军刀砍断路旁一小松树，留出地面一尺多，上端削尖，从病妇下部插入肚腹至死。日本兵仍不肯罢休，另觅几个老百姓，用粗铁丝穿透脚踝，倒挂树上吊死。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一军部队全部撤到战前地域。

常德会战至此结束。

客观地说，中国第六战区根据拱卫陪都重庆的任务，战前制订的逐步消耗敌人，并在坚守常德的同时，于澧水和沅江之间调集主力与敌决战的计划，是符合实际的。如果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能够与长沙会战一样，把澧水附近变成"天炉"，日军第十一军的损失将会更大。固守常德的第五十七师，尽到了誓死血战的职责，一个师死守孤城达十多天，尽可能地吸引了日军主力于常德城内外，官兵用命，可歌可泣。因此，无论常德会战是否可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会战的整个过程表明，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能力在不断提升，而日军正走向不可逆转的颓势。

但是，尽管第五十七师拼死固守，同一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日军长驱而入，虽然损失了近万人，但达到预定作战目的后又扬长而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有三名师长、三名团长和团附、二十八名营长阵亡，普通军官和士兵伤亡高达四万人以上。中国方面的决战计划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的原因，不外乎被一系列固有的老毛病掣肘：高级军官没有现代指挥理念，作战时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大多数都违反了"师长距第一线三至五公里，军长八至九公里，总司令十二至二十公里"的严格规定，远远地躲在后方，无法确保及时掌控一线战情，无法保证会战指导的落实。会战开始时，澧水北岸的作战部队一触即溃，没有达到预期的大量消耗日军的效果，日军仅用五

天时间就突破了澧水防线。待常德城攻防战开始后，滞留在澧水北岸的中国军队主力不少，也都接到了断绝日军后方补给线的任务，但整个作战期间，日军仅有的一条后方补给线始终畅通无阻。同时，第五、第九战区的策应作战也不甚积极主动，对日军围攻常德的作战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由于第五十七师的苦守，中国方面曾出现过围歼日军的钳形态势，但各部队协同不力，动作缓慢，未能在局部形成优势打击力量，反而被日军各个击破，等第九十九军和欧震兵团抵达战场的时候，会战已经接近尾声，决战局面早已丧失。

战后，蒋介石曾对常德会战进行了一次讲评。他称常德会战是一次值得全体军人荣光的战斗，是已死将士用血肉换来的胜利。在详细计算了各增援部队每天推进的速度和距离的同时，蒋介石愤怒地指责了梁汉明的第九十九军、施中诚的第一〇〇军、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等部队。蒋介石的愤怒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军纪败坏和擅自脱逃。

……这一次常德会战，我们根据各地绅耆民众的报告，一半部队的军风纪都不很好。据报：第十军的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见到前方战况不利，他就潜伏在益阳三塘街逗留不前，并命令一般团长营长等，回到桃花江一带去打游击。以致当时附属该师的炮兵第一团第四连，因为没有步兵的掩护，损失了卜福式山炮二门……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就火焚民房，这件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一定要彻底查究，切实呈报处治勿忽。这次第十军的军风纪，为什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呢？实在痛惜之至！尤其德山方面，此次遗弃伤兵二百余人，后来都遭敌人杀害，此其责任究竟何在？亦要查明究办。还有军部卫生第十三大队，此次转运伤兵，沿途遗弃甚多，已经抢救下来的伤兵，亦往往两三天不替他们换药，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在说到擅自脱逃的痼疾时，蒋介石没再提因弃阵逃走而被枪毙的第一〇〇军一八八团团长邓光锋，反而对死守常德城的余程万师长痛加训斥：

第五十七师在常德作战的经过大家都知道：一般中下级官兵——尤其是已经牺牲了的将士——可以说已经尽到了他们守土卫国的责任，无愧为总理的信徒。不过后来到了最后五分钟，余程万师长竟敢不奉命令，悄然退却，以致全师的战绩与荣誉完全为之丧失……余程万此次率领全师，守卫常德，抗战十余昼夜，使国军的荣誉为之声价十倍。这种战绩当然值得记取。但他在守城时候的表现有二点最不好的地方，第一

是他在守常德的时间，几乎天天叫慌，总是说弹尽粮绝，要求赶快增援。不仅打无线电报给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甚至连番不断地打电报给各方面。须知这种无线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敌人偷译了这种电报，知道我们守城主官这种慌乱的情形，就可以断定你决不能死守到底，所以他们毫无忌惮地更要积极地进攻，不肯罢手了……以后任何部队，如果奉命守城，就要立定决心，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本身，援军如果能够适时赶到，这只能算是意外之事！须知天下绝没有上官坐视部下危亡不去救援的道理。事实上，援军能来，就一定会来，根本用不着你向上官求救……第二，这次第五十七师守卫常德，阵亡官兵已经证明有五千多人。我们一师人守城半月之久，一般官兵为了师长的精神和他的人格所感召，因为要贯彻师长的命令，达成师长所授予他们的任务，所以不惜牺牲一切，亦不怕伤亡如此惨重。而到了最后，我们作师长的，竟不能实践其与阵地共存亡的教训，卒致决心动摇，单独潜逃，这已经不对了，何况后来新十一师进城的时候，在城内还发现我们伤兵三百余人？这是被敌人入城以后残杀所余的数目，可知当时遗留在城内的伤兵之数必多过几倍是可断言。你看师长为了他个人的生命，不顾他所弃留的几百几千的呻吟待救的部下，我认为这是最不道德的一个军官……总之，这次余程万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和遗弃伤病单独潜逃，是我们革命军人精神上最大的污点，丧失了我们革命军人的人格，是我们这次常德会战最痛心的事……

在蒋介石“余程万师长必交军法审判”的严令下，余师长被判处死刑，后经军长王耀武求情得免，改判两年，坐牢十个月后获释复出，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抗战后的一九四八年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攻入云南时，他既不愿和卢汉一起宣布起义，也深知跑到台湾依附蒋介石没有好日子过，于是逃到香港隐居起来，不久就在乱世中于种菜养鸡时遭匪徒抢劫身亡。

如今，常德城外矗立着纪念碑，永久地纪念那些在一九四三年血肉横飞的冬日里死战不退的中国将士。

常德废墟上的余烟未尽，一九四四年到来了。

这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七个年头。

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场空前的大混战又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开始了。

第三十五章

挫师失地，罪戾难辞

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国第一战区从未打过一场好仗。

爆发于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的豫中会战，是抗战期间中原战场上规模最大、交战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会战。

这场作战，深刻地暴露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正在全面恶化——国民政府麾下的党政部门的大员、地方各级官吏以及隶属于不同派系的军队将领，抗战初期的爱国热情和作战意志都已被漫长而残酷的战争、内部复杂的私利角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贪污腐败消磨殆尽。而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军队，其一战即溃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战场上呈现出的一种全局乱象。包括国民党内部高层人物在内，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性：领导全面抗战的重庆国民党政权，很可能在日本人尚未被赶出中国时自己首先崩溃，这种崩溃不是来自于日本侵略的军事压力，而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自我销蚀与自我毁灭。

“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然而追怀过去，冀策将来，此一段血的教训，深足警觉，确有坦白地检讨之价值”。第一战区在战后检讨报告里这样写道。

这场被称为“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的会战是从黄河岸边开始的。

第一战区的防区，北抵北平附近的大清河，西至陕西门户潼关，东到津浦铁路，南至平汉路上的许昌以南，是抗战中国防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战区，区域内平原千里，黄河横贯，中条山、太行山、伏牛山耸立其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于平汉线战败，黄河以北国土尽失；翌年徐州会战再败，掘开黄河大堤后乃保住半壁中原。卫立煌主持战区时，国共团结抗战，华北敌后战场活跃，但中条山守军疏于防范，与日军交战中损失惨重，中条山遂被日军攻占，加之庞炳勋等将领先后投敌，除了共产党敌后武装仍在这一地区与日军艰苦周旋外，国民政府统辖的军队从此全部退到黄河以南。第一战区的西面，是负责封锁共产党中枢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的第八战区，东面与鲁苏战区连接，南面则是担任湘西地区防务的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三个战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与

日军对峙的广阔而漫长的中原对峙线。

第一战区划分为由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分别指挥的两个部分。

司令长官蒋鼎文的长官部设在洛阳，指挥的部队是：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其第十七师，师长申及智；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其第一七七师，师长李振西；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以上两个军都是由西北军杨虎城的旧部改编而来。第四集团军防区右接汤恩伯部阵地，担任着枣树沟、汜水、巩县、偃师、孟津一带的黄河河防。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实际所辖部队只有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其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明；第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该军为川军，担任孟津以西新安、渑池一线的黄河河防。另外，在该集团军的序列表上，还有张际鹏的第十四军，其第八十三师，师长沈向奎；第八十五师，师长王连庆；第九十四师，师长张士光。第十四军为中央军嫡系部队，实际上由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接指挥，驻扎在洛阳吕家庙附近。

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实际所辖部队只有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其新编第六师，师长马润昌；暂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尹瀛洲。该军由河北民军改编而成，因此还指挥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约一个师。该军的防区西面与胡宗南的第八战区接壤，负责渑池、观音堂一线的黄河河防。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实际所辖部队只有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其第六十四师，师长刘献捷；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该军前身为豫西地区的镇嵩军，驻扎在洛阳附近。

刘戡兵团，总司令刘戡。下辖：第九军，军长韩锡侯，其第五十四师，师长史松泉；新编第二十四师，师长宋子英。该军基本部队由浙军和奉军混编而成。暂编第四军，军长谢辅三，其第四十七师，师长杨蔚；暂编第四师，师长马雄飞。该军在战前由第九军第四十七师扩编而来。兵团部驻扎在洛阳附近。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司令长官部设在叶

县，指挥的部队是：

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下辖：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其第二十三师，师长张文心；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预备第十一师，师长赵琳。该军为中央嫡系部队，担任郑州以北花园口至广武的黄河河防。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其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该军由河北抗日义勇军改编而成，担任花园口、中牟一线的黄河河防。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其新编第一师，师长黄永瓒；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该军前身为西北军宋哲元部，驻扎在密县和新郑一带。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下辖：第十二军，军长贺粹之，其第二十二师，师长谭乃大；第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守正。该军前身是西北军韩复榘旧部。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其第四师，师长蔡剑鸣；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第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该军为中央嫡系部队。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其第九十一师，师长全英；第一九三师，师长郭文烁；暂编第十六师，师长吴求剑。该军是一九四一年由新编第二军改编而成。第三十一集团军部队驻扎在临汝、登封、叶县、郏县和襄城地区。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下辖：骑兵第二军，军长廖运泽，其骑兵第三师，师长徐长熙；暂编第十四师，师长李鸿慈；骑兵第八师，师长马步康。第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其新编第四十二师，师长彭赍良；新编第四十三师，师长黄国书；新编第四十四师，师长姚秉勋。还有陈又新的泛东挺进军，驻扎在沈丘一带。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下辖暂编第九军，军长霍守义，其第一一一师，师长孙焕彩；第一一二师，师长王秉钺；暂编第三十师，师长洪显成。该军以东北军部队为主，一九四三年底由暂编第八军番号改编而来，驻扎在安徽阜阳一带。

以上八个集团军，十七个军，共四十多万人，部署在汜水、广武、郑州、中牟、尉氏一线的黄河河防，许昌至遂平之间的平汉铁路沿线以及密县、临汝、襄城和洛阳的纵深地带。

自一九四一年中条山会战溃败，第一战区部队基本上没再打仗。国民党方面普遍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作战。因此，蒋鼎文和汤恩伯自一九四二年主持第一战区后，两个人很清

楚蒋介石赋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绝对不要主动对当面日军发动攻击，在求得长期对峙局面的同时，寻机与共产党抗日武装发生冲突，以遏制共产党敌后武装的壮大趋势。

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时年四十九岁，是国民党军将领中与蒋介石关系甚为密切的人。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十六岁的他加入学生军，后入绍兴大通陆军中学堂和浙江讲武学堂，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部中校副官。他是黄埔军校的首批学员，为学员队的区队长，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在东征战役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升任团长，成为北伐军中干将。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高度一致，曾率部镇压了第十九路军于福建的倒戈。使他声名大噪并与蒋介石关系更为牢固的，是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事变中，他和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押，为营救蒋介石，他充当了西安与南京之间斡旋的中间人，是促成蒋介石安全脱身的核心人物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他被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对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实施围困。在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任上，他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生活极其糜烂，在黄河北岸一带到处可见日本人张贴的他一手抱着美人、一手提着钞票的宣传画。一九四一年底，他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开始和蒋介石的另一个心腹汤恩伯共事。

一九四〇年冬，汤恩伯率部进入河南，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初豫南会战结束后，汤恩伯就再没向日军发射过一炮一弹。除了奉蒋介石之令对付共产党抗日武装外，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横征暴敛和扩充实力上。他以他的基本部队为核心，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势力达到最高峰时竟拥有四十多万人马。他之所以把司令长官部设在叶县，是因为叶县是汉武帝的发祥地，也是曹操设在中原的巢穴，为此他自称“中原王”。为了靠近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他用暴敛来的金钱财富大肆行贿，蒋介石身边的大小权贵几乎都收到过他的重贿；他还把用大价钱从日战区搞到的贵重物资，动用专车专船辗转千里运往重庆。他的金钱财富全部来自对百姓的残酷盘剥。中原大旱，蝗灾又起，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十室九空，兵匪喧嚣，流民盈野，河南百姓从此有“水”“旱”“蝗”“汤”四灾并重之说。

蒋鼎文与汤恩伯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蒋鼎文在汤恩伯面前摆老资格，汤恩伯不但不以为然，且有意与蒋鼎文分庭抗礼。蒋鼎文为了制服乃至孤立汤恩伯，拉拢北方部队和川军头目，但汤恩伯针锋相对，在叶

县延揽招待各色人等，馈赠厚礼，巩固自己权位的同时，还把蒋鼎文身边的不少人拉到了他的集团中。两人在同一战区分任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本应在一个指挥部里同心协力，但他们各自统帅着自己的部队，盘踞在相互分割的区域里，闹矛盾的时候相互拆台，暂时平静的时候便井水不犯河水。难以想象，如此一个战区内，一旦发生大战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所幸这里长期未战。

日军之所以在这一地域长时间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除了日本国力军力财力的衰退、太平洋作战导致兵力不够等原因外，最为重要的是日军认为，与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的战斗才是这一地域日本占领军的主要作战内容。

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

中国东部的重要部分，已落入日军手中，重庆军被迫撤到黄河以南的山岳地带，只能苟延残喘。与此相反，中共军却乘日军抽调部队、兵力减少之机，在华北、华中的广阔地带，建成牢固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日军还发现，这一地域的国民党政权显露出不稳定的倾向：

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及其一派（国民党）现在很孤立。各民主党派是所谓不满分子，很有可能使国民党陷入孤立。此外，南京现政权和华北政权所掌握的与日本合作的新军，由于中共军的活动而发生动摇，其战斗力颇有被粉碎、吸收之虞。

日本方面认为，共产党之所以是大敌，是因为它与国民党的区别极大：

如不了解中共军的传统和特性，尤其是忽视了其基干部队人人都是优秀战士的特点，而谈论中共军，就等于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他们的领导人员，由于多年来一直在逆境之中，排除万难，冲破艰险，因而其坚强意志和狡诈智谋，决非一般人所能比。

作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自上任起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与共产党抗日武装的作战上，但无论“治安作战”“剔除作战”，或是“大扫荡”，结局却是共产党抗日武装越来越强盛。后方不稳便无法在

正面战场上作战，越“扫荡”共产党抗日武装越活跃，于是更不敢在正面战线上发动攻势了。——日军的这种两难使得中国第一战区内三年来一片平静。

只是，这种平静就要被打破了。

中原战场上将发生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

促使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的起因，还是常德会战期间美军战机从中国基地起飞对台湾新竹日军机场的轰炸，这次轰炸令日本方面再次强烈意识到本土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同时，进入一九四四年二月以来，太平洋战局越发对日本不利了：美军突破日军的马绍尔防线，已经压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美军随即对特鲁克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同时用强大的舰炮火力轰击岛上的日军。接着，美军在布拉翁环礁成功登陆，直冲马里亚纳群岛。在东南海域，二月底，日军连续丢失了重要岛屿上的支撑点，战略前沿拉包尔陷于孤立，美军突破了丹皮尔海峡，威胁到新几内亚岛的北岸。——日军在太平洋上连续的失败，导致了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下台。被天皇任命兼任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的首相东条英机认为，在欧洲战场上，美英会很快开辟第二战场，盟军将向欧洲大陆纵深挺进；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已经渡过了危机，战场优势将继续扩大；而在亚洲战场上，美军将在太平洋上继续与日军拼死争夺诸岛，以逐渐向日本本土压缩；英军也将从印度洋方向，试图夺回缅甸南部、安达曼群岛以及苏门答腊北部。从全局上看，日本只有全面采取守势，而这种守势能否保持相对的主动，将取决于对中国战场的控制程度。——“因为在太平洋受到美军的压制，所以无论如何也必须确保西面的中国大陆和南方的联络。在海上正面万一发生问题，对南方的五十万军队不能坐视不救。”

所谓的“确保西面的中国大陆和南方的联络”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尽管中日全面开战已经第七年，但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交通平汉线、粤汉线和湘桂线，日军依旧没能完全控制。日军虽然占据了中国东南部的大片国土，可仅就交通线而言，南北交通大动脉却被中国军队阻断了。在平汉线上，中国第一战区部队卡在许昌附近；而粤汉铁路线在长沙附近被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占据着；湘桂铁路也处于被切断的状态。也就是说，从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往南，进入华北平原、中原地带、两湖地区，直到广东和广西，再到日军占领的中南半岛上的缅甸，陆地上的南北交通是不通的。此时，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几乎被美军摧毁殆尽，孤悬于印尼和新马地区的数十万日本陆军，一旦危机降临，除了往中国

境内撤退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逃生之路。因此，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必须打通。

日军大本营认为，日本与美英盟军、与中国军队决战的那一天迟早要到来，估计这一时刻应该在一九四六年。为了最后的决战，现在就应该准备，即在太平洋各个岛屿上尽力阻击美军的同时，还要打通并保持住中国大陆从南到北的交通，以保证未来的进退能够有机动的空间。——“打通华北、华中、华南分割的中国战线，并连接法属印度支那，虽是极大的作战，但考虑到该地区存在美空军基地的现状，无论如何必须在一九四四年内实现以上措施。”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本营上奏天皇，对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阐述了理由：

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各飞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其第一目的。打通大陆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经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这样，估计今后大战的形势将会好转。同时，作为附带的收获，可以取得攻占地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

天皇批准了这次作战。

大本营当天便下达了作战纲要，并把此次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

这是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作战计划。其要领是：首先在平汉路南部，动用第十二军以及第一、第十一、第十三军各一部，约六个师团的兵力，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动攻势；然后，动用第十一军以及第二十三、第十三军各一部，约十三个师团，对湖南境内的长沙和衡阳、广西境内的桂林和柳州以及湘粤赣边区，发动三个阶段的攻势作战；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初攻占南宁，与南方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第二十一师团会师于越南的谅山。日本方面的设想是：完全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将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贯通，以便让从“满洲国”始发的列车，南下数千公里，开到越南境内，一路没有任何阻拦，从而把中国战场与南方战场完全连接起来。

为了完成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作战，日军大本营再次进行了国内动员，征集新兵，相继编组了十四个独立步兵旅团，并即刻派往中国战场；又成立了八个野战补充队跟随作战，以作为伤亡补充。同时，把原

准备调往南方作战的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二师团仍留在中国战场上。为了加强空战力量，把第三飞行师团扩编为第五航空军，并从关东军调来七个飞行战队。——尽管东京大本营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可是与中美联合空军相比，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空中力量依旧处于劣势。

日军在平汉路南部的作战发动于河南境内：

方针

一、于四月下旬，以华北方面军由黄河岸京汉沿线地区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尤其是第一战区的部队，将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占领并确保之。

二、命第十一军及第十三军各一部分，策应支援华北方面军的作战。

三、主要作战期限预定约一个半月。

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团如下：

华北方面军

第十二军（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骑兵第四旅团）。

第一军一部分。

第十一军（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之主力）。

第十三军（第六十五师团长指挥之第六十五、第六十四师团各四个大队）。

第五航空军一部分。

指挥要领

一、华北方面军大致应于上旬以前，进行新建部队的组织及警备交替，命作战所需兵团在驻地附近集结，进行训练。

二、华北方面军应在四月上旬以前，修复霸王城附近黄河铁桥。

三、华北方面军大致应在四月中旬，命第十二军主力集中于新乡南方地区，一部分集中于开封西面黄河左岸地区，完成作战准备。第十二军向前方开动时，命第五十九师团长一并指挥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一、第四旅团等部，由方面军直辖，负责山东省警备任务。

四、第十二军大致应于四月下旬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后，进入郾城附近，做好向洛阳方面作战的准备，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信阳方面，配合第十一军的部队打通通往武汉地区之陆路联络线。

五、第十二军主力，以后应迅速由郾城附近向右迂回，突入洛阳方面，击溃敌第一战区部队。

六、华北方面军在发动本次作战前，命第一军向西方佯动，并于作战开始后，命第一军一部及时由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支援第十二军主力作战。

七、第十一军大致于五月上旬，以一部兵力，由信阳附近向确山附近采取攻势，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

八、第十三军于四月底前后，以一部兵力在阜阳附近作战，牵制敌人，使华北方面军作战顺利进行。

九、由关东军调用的第二十七师团，先在黄河左岸待命，随着本作战的进展，经陆路向武汉地区推进。

十、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应即派遣第三十七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的各约半数，经陆路开往武汉地区，划归第十一军指挥。

十一、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大致将洛阳、临汝、舞阳及泌阳东方一线，作为对敌第一线，确保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

十二、用于确保新占领区的兵力，预定大致如下：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缺少一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

十三、华北方面军随着作战的进展，应抓住时机在郑州、洛阳、郾城附近建设飞机场，同时迅速修复京汉铁路南段。

但是，“按照一号作战的提议，虽然在华北打通京汉线作战势在必行，但方面军以黄河的险阻为理由，对之不感兴趣”。冈村宁次的解释

是，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应为中共抗日武装。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幕僚们经过研究，商定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牺牲我占区的治安，从而可在属下各军最大限度地抽出兵力”，以执行大本营赋予的作战任务。冈村宁次对此次作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目标为汤恩伯军。作战时如果猛攻密县，汤军主力当来应战，应考虑对其进行大举包围以歼灭之；二、本作战期间绝对杜绝三恶（不烧、不抢、不杀）。”

担任主攻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下辖三个师团又六个旅团，其中的三个旅团还是刚组建的部队。为了加强其力量，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第十二军新的战斗序列，使得其兵力大大得到了扩充。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下辖长野祐一郎的第三十七师团、本乡义夫的第六十二师团、林芳太郎的第一一〇师团、竹下义晴的第二十七师团、野副昌德的第六十三师团、山路秀南的坦克第三师团，以及多贺哲四郎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岭喜一的独立步兵第九旅团、藤田茂的骑兵第四旅团。军直属部队：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独立野战炮兵第十一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一大队、野战高炮兵第七十四大队，以及独立工兵第三十八、第四十联队和第五十九、第六十大队以上参战部队，加上策应第十二军的部队，日军总兵力至少在十六万人以上。

但第十二军的军官们还是不放心，对峙线两边多年不战，令他们无法彻底掌握中国第一战区的底细。因此，他们对派遣军总司令部让他们从正面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十分不满，认为黄河铁桥和霸王城以南的中国守军必定力量强大、布防严密，正面攻击会带来很大的伤亡。经过研究，他们认为可从郑州东面的中牟地区渡过黄河，进攻郑州、新郑和密县，直接威胁黄河铁桥附近中国守军的侧后，形成前后夹击的局面，这样一来中国守军的防线必定全面崩溃。根据这一设想，第十二军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一 方针

军于四月二十日左右，以主力自黄河河畔平汉路沿线地区，以一部自开封西南方正面发动攻击，击溃第一战区为主的敌人后，占领平汉路南段沿线之要地。

二 指导要领

一、军以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集结于开封及其东方地区；第一一〇、第六十二师团，集结于黄河郑州铁桥北岸两侧地区；

独立步兵第九旅团集结于汲县附近；为欺骗敌人，第二十七师团集结于新乡以西之博爱、沁阳地区；坦克第三师团在汲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骑兵第四旅团在商丘现警备地区进行战备。

二、作战开始前，第二十七师团在黄河以北之孟津，骑兵第四旅团主力在霸王城与开封间之黄河北岸，分别进行牵制性佯动，并适时推进军主力，准备对霸王城及中牟正面敌阵地实施攻击。

三、第三十七师团指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于四月十八日拂晓，在中牟正面渡过新黄河，向郑州及其以南地区突进；军主力第六十二、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突破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迅速向以南之郑州、汜水、密县、郭店、新郑等要地推进，将敌军捕歼于郑州平原。为使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能在作战一开始时就遭到沉重打击及被突破，坦克第三师团应以一部协同。军主力预定四月二十日拂晓开始进攻。进攻开始前先占领鸿沟以西汉王城附近高地。

四、军主力到达郑州附近时，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即应迅速向黄河以南开进；军主力继续击溃所在地区之敌，直趋郾城，准备向西回旋，同时以一部迅速向信阳方向推进，与第十一军之部队会合，打通平汉路。而后随平汉路之打通，将预定使用于湘桂作战之第二十七师团向武汉地区前进。

五、军主力到郾城后，应以极迅速之突然行动向右回旋，向洛阳地区突进，以寻歼第一战区主力部队。

六、第五航空军除以一部支援此次作战外，必要时应以有力之战斗、轰炸部队进行直接支援。

七、作战开始后，第一军将于山西之蒲州、第十三军将于安徽之阜阳地区进行牵制。

八、此次主要作战结束之时间，大致在五月下旬。

内山英太郎制订的计划，是一个三路闪击的计划：先由左翼的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由中牟附近南渡黄河，强占新郑，然后接应中央一路的部队夺取郑州和密县；右翼的第二十七师团在黄河北岸摆出攻击洛阳的态势，牵制蒋鼎文的四个集团军，使之不能增援汤恩伯的防区；中央一路部队由第六十二、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坦克第三师团组成，从黄河铁桥渡河后，攻击霸王城

要塞，夺取荥阳和广武，把中国军队第三十一集团军压缩到密县以西。然后第十二军主力沿着平汉路南下，寻歼中国军队第二十八集团军，夺取许昌、禹县和襄城等要地，预定在郾城或许昌附近突然向西回旋，包围汤恩伯部主力于登封地区，予以歼灭后直逼洛阳城下。从日军的作战计划看，其作战规模、作战决心和作战目的坚定而明确，中国第一战区在养尊处优三年之久后，即将面临一场吉凶未卜的恶战。

最早判断出日军要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作战的是美国人。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便向蒋介石提出报告，认为日军鉴于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必定要以确保其通往南洋各地的交通线为目的，在中国的南北铁路大动脉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为了避免中国军队被日军各个击破，史迪威建议中国北方部队主动向日军发动攻势，以瓦解日军的作战企图。史迪威甚至提出了各路中国军队同时行动的具体进攻计划：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沿着平绥铁路东进，孤立包头的日军；邓宝珊指挥第二十二军配合傅作义，在包头至归化之间打击日军；阎锡山的部队全线袭击同蒲路；汤恩伯部主力向东移动，渡过黄河威胁开封和新乡；朱德指挥第十八集团军进入五台地区，袭击平汉路。但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的装备太差，进行如此规模的反攻作战，美国必须给中国装备十五个美械军才行，史迪威的建议就此被搁置了。

进入一九四四年，来自第一战区的情报显示，日军已经开始修复黄河铁桥，并有兵力频繁调动的迹象。重庆方面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日军南下的前奏，于是对第一战区的兵力配置和防御阵地进行了重新部署，并于三月四日下达了较为详细的以全面防守、局部出击为原则的作战指导要领。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指导要领，第一战区于十天后下达了一个在嵩山附近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扶沟、汜水间河泛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犯及突围。

二、如敌渡犯突围成功时，河泛防部队应凭藉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敌人。

三、同时汤兵团及第四集团军应以其控制部队，于登（登封）、密（密县）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如敌向我守势地带进犯时，守势地带之部队，应坚强抵抗；攻势地带之部队，应向左旋回，侧击敌人。如敌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守势地

带之部队，即转移攻势，向右旋回，侧击敌人。

四、汤兵团以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七十八军、新一师、第二十师，隐密配置于登封、临汝、禹县、襄城、叶县攻势地带，并抽集一个师固守许昌。临泉附近部队，应有西移参加平汉路以西作战之准备。

五、第四集团军除固守原河防外，应以一个军固守老饭沟迄金沟主阵地，并以一部占领张庄、铁山、高山寨前进阵地，并确保虎牢关据点。

三月十六日，重庆军事委员会连续两次致电第一战区修改作战计划，特别强调了对许昌等重要据点的固守，并认为汤恩伯上报的作战计划并不符合军事委员会的意图。第一战区于三十一日重新修改了计划并再次上报，把决战地域改在了襄城、禹县和许昌附近地区。

汤恩伯上报的作战计划，不但把日军将要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称为“突围”——仿佛他多年来一直在包围着日军似的——而且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要与企图“突围”的日军进行“决战”。有史料表明，汤恩伯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一个主动进攻的建议，说他要在中原麦收季节里“先发制人”，命令暂编第十五军袭击开封和中牟，第十三军袭击新乡，第八十五军夺取霸王城，第二十九军作为预备队。——明知蒋介石不会同意所谓的“主动攻势”，汤恩伯兴师动众的表态除了冒充勇猛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他提出“主动进攻”的时间，是在军事委员会下达作战指导之后，如果他真的想要“主动进攻”，不要说他的部队与日军沉闷地对峙了三年，就是按照史迪威的建议于几个月前积极动作，也不会致使日军发动攻势后第一战区一败涂地。

最能体现汤恩伯在军事上不作为的，莫过于对黄河岸边霸王城附近的邙山据点的丢弃。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了策应第十一军作战，曾以第三十五师团强渡黄河，第一战区由十二万大军构成的黄河河防当日便被日军突破，郑州城在两天之内丢失。日军华北方面军完成策应作战回撤时，除了留下一部兵力驻守中牟县城之外，还在第一战区一线阵地的要点霸王城修筑起桥头堡阵地。这个阵地孤悬于黄河南岸，日军驻守兵力仅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而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第一战区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对一个嵌入自己前沿的至关重要的据点尚且不管不问，凭什么还能说出自己要“主动进攻”？

仅从第一战区最后确定的防御部署上看，也无法理解蒋鼎文和汤恩伯在军事上何以如此低能——中条山会战失利后，黄河沿线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第一线，日军随时可能强渡黄河发动攻势，而就在日军进攻企图已经相当明了的时刻，第一战区的部队依旧是一线排开、散乱不堪的态势：陈大庆的第十九集团军在皖西和豫南，主要任务是应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何柱国的第十五集团军在汜东和淮北，主要任务是应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灵宝至垣曲之间担任河防任务的，是在华北地区与共产党抗日武装摩擦失败的杂牌军高树勋部；李家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新安；刘戡实际指挥的兵力仅有三个师，散布在伊阳和伊川一带；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在汜水与偃师之间。第一线本来就漏洞百出，而作为战区主力的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和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却被散布在郑州、荥阳一直到许昌平汉路沿线以及黄泛区以西地带。——第一战区的整个防线，既没有梯次配备，也没有控制主力于后方，完全是被动挨打的部署，一旦前沿的任何一点被日军突破，整个防线便再也没有一个位置可以支撑反击。——中国第一战区官兵，在这样两位长官的指挥下，面对即将降临的空前规模进攻在劫难逃。

会战是从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于中牟附近偷渡黄河开始的。

四月十七日黄昏，长野祐一郎召集第三十七师团各部队军官，在中牟县城的警备队里下达了攻击命令。此时，第三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中牟一带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掠过河面的风轻轻吹动河边的草。右翼队利用黄昏，占领了重庆军阵地前面五百米的沙丘要地。左右两翼队于二十三时分别由准备进攻的位置出发。右翼队由中牟西南方，左翼队从中牟东方和南方，在军旗下肃静地向重庆军阵地逼近。零时过后，右翼队正面的重庆军可能发觉我军的进攻，突然向我军猛烈射击，立即枪声四起，整个中牟正面乱成一片。我第一线部队保持沉默，继续匍匐前进，逼近重庆军阵地。阵地前方杂草丛生，音响很大，已难隐蔽，于是满怀强烈斗志发起了猛攻。

黄河中牟一带的河防阵地，是刘昌义的暂编第十五军的防区。

暂编第十五军是一支刚组建的部队，本来只下辖一个师，即萧劲的暂编第二十七师。进驻中牟河防阵地后，吕公良的新编第二十九师被划归该军指挥。军长刘昌义，河北人，行伍出身，性格耿直暴烈，但他接纳的大都是有军校毕业文凭的军官。因此，尽管全军新兵很多，战斗力

很弱，可军官们个个来历不含糊：副军长李强是黄埔一期的老资格，参谋长赵蕴奇进过陆军大学干训班，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是赴德留学生，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毕业于黄埔六期。两个师的团长们，无一不是黄埔或陆大的，最低也是讲武堂出来的。至于营连级军官也都个个有学历，排级军官里的军校生占到了三分之一。

四月初，第二十八集团军调整部署时，把暂编第十五军的两个师拆开，其部署相隔很远：暂编第二十七师负责中牟河防，新编第二十九师防守许昌城。关于这样的部署，不少人议论纷纷，认为把武器最差、战斗力最弱的暂编第二十七师放在了最前沿，而把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新编第二十九师放在了后方许昌，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是，刘军长还是认真执行了这个部署。他把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七十九团和八十团部署在黄河岸边的一线阵地上，八十一团留在师部所在地滹沱张庄附近当预备队，他的军部设在距离前沿不远的新郑西南的大高庄，军直属部队离他两公里，他住的大房子里只有一名副官、一名侍从参谋和八名卫士。

十八日凌晨二时，前沿一线阵地发生战斗的消息传到军部，刘军长立即决定副军长、参谋长留在军部，他带着侍从参谋由特务连跟随出发上前线。侍从参谋提醒他是否带着军官队，说这些军官尽管打起仗来很难说有什么用处，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传令兵吧。刘军长表示，如果带部队，就从新郑附近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八十六团调一个营来。

上前沿的刘军长走出不远，就碰上了暂编第二十七师运送伤病员和军官家眷的三十多辆大车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后撤退。刘军长对伤病员们说，路上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扰民，否则统统枪毙。

下午，刘军长在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见到萧劲师长，他立即意识到了局面的严重。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正在暂编第二十七师正面阵地前强渡。日军在中牟县城东面的邢庄、荣庄、傅庄以及县城西面的三王庄，开辟了四个强渡突击点。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和多点突击，仅凭暂编第二十七师阻击显然十分单薄——在与日军对峙的黄河天险第一线，中国军队的河防薄弱得令人吃惊——暂编第二十七师只有几门迫击炮，三个团加起来才有五挺机枪，官兵们只能用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战斗。在付出很大伤亡代价后，河防全线都处在边打边撤的状态。天亮时分，日军扩大了渡河面，后续部队不断地涌上南岸，守军的小李庄、小辛庄、桃村庄、大潘庄和洞上村等阵地均被日军突破。后退中的暂编

第二十七师官兵，利用村落、沟渠、树林和沙丘节节抗击，很大程度上迟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该敌利用原有和新筑阵地对我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斗志也很旺盛。阵地似有斜射、侧射的设备标识，效果也颇可观”。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下级官兵，基本上都来自河北抗日义勇军，是有抗日热情的河北农民，他们没有经过正规军的军事训练，打起仗来也不懂那么多的战术，凭借的只是一股死拼到底的精神——回顾整个豫中会战，首先接战的暂编第二十七师虽然最终没能守住阵地，但官兵们的战斗精神令人刮目相看。

到了十八日晚上，中牟一线的河防阵地已全部丢失，日军打到了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滹沱张庄附近。师部给刘军长准备了晚饭，可刘军长却举箸难咽。萧劲师长认为，连预备队都派上去了，各团还是不断地后退，黄河天险和坚固的阵地工事尚且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已经突入纵深，我军再想依靠沙丘平地把日军打回去，基本上没有可能。但刘军长固执地命令必须组织部队实施反攻，并表示他要亲自率领他带来的那个作战营和特务连，再加上戴眼镜的军官队参加反击，非要把日本鬼子赶回黄河以北去。

十九日凌晨二时，刘军长率队出击了——在国民党军部队中，军长带着部队打冲锋的情景极其罕见，或许这就是行伍出身的刘昌义的血性所在——在黑夜中迎着日军向北搜索时，作战营的先头连在黑牛张村附近被日军发现，当即展开了战斗。刘军长命令另外两个连左右迂回，命令特务连和军官队跟在先头连后面正面强攻。各路官兵杀声震天地冲进了黑牛张村，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后向北退去，战斗中刘军长的突击队伤亡五十多人。与此同时，暂编第二十七师的八十一团和七十九团也分别发动反击，收复了两个村庄。天亮之后，刘军长的突击队和暂编第二十七师部队把当面的日军向北逼退到刘巧村附近。——形势似乎有了好转的趋向，如果此时中国军队的后续部队上来的话。

但是，暂编第二十七师的周围没有任何增援部队。

十九日天亮之后，日军骑兵在炮火的助战下，向中国守军发动冲锋，暂编第二十七师抵挡不住，一直撤到昨天反击开始的位置，全师已经伤亡上千人，双方胶着在树头村附近的沙丘地带。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祐一郎有些不安，赶到前沿亲自督战，他看到中国守军虽然已没有固定阵地，但“利用附近村庄的围墙、树木等为掩体，抵抗相当顽强”。他们投出“很多手榴弹，爆炸声在树林中猛烈回响”。几门简陋的迫击炮尽管对冲锋的日军没有很大威胁，可还是对日军“后方集结部队造成

若干损失”。

刘昌义直接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作战，令师长萧劲认为军长的越级指挥扰乱了他的作战计划，两人之间产生了冲突。更令刘军长烦闷的是，昨晚他亲自指挥的反击取得了成效，而现在的反胜为败却让他很难接受。——刘军长不知道，就在他闷闷不乐时，日军的一支突击部队已绕到了他的身后。

就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突破暂编第二十七师河防阵地的同时，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佐藤正混，率领“先遣挺进队”的三百名官兵偷偷渡过了黄河。这三百日军一律轻装，没有马匹和行李，除了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外，全队只携带着四挺机枪。为了行动更加隐蔽，三百人的脚下全穿着日本人称为“足袋”的布袜子。“先遣挺进队”的任务是不顾一切直扑郑州城。他们十八日晚上八时出发，遇到中国守军以及可能惊动狗吠的村庄便绕过去，走过田野，蹚过河流，置体力不支者于不顾，始终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猛跑。他们利用通往郑州的被废弃的铁路路基作为直线行军的路标，一些士兵累倒掉队，没倒下的边跑边往嘴里塞饭团，竟然于十九日凌晨跑到了郑州火车站的城墙附近，而一路上中国守军没有丝毫察觉。在城墙下，佐藤正混命令第一中队立即攀城。日军利用黎明前的暗夜和晨雾，用绳索爬上了城墙，然后在微明的天色中摇晃太阳旗——“由于出其不意，敌人毫无斗志，从城墙上开始后退，中队即以两个小队向北门猛扑。城里到处是被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吓得惊慌的老百姓。冲进一处像是司令部的房屋里，重庆军刚刚逃跑的迹象历历在目。”

位于中国第一战区纵深、城防坚固的郑州城，竟在会战开始的第二天便被日军攻占了城池一角，而突袭郑州城的日军仅为缺少一个中队的大队，实施攻城的日军仅仅是一个中队，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于中牟附近发起攻击的同时，第二十七师团也开始向洛阳方向实施佯攻。在黄河边，日军工兵架设浮桥，调动船只，步兵在河岸边侦察边测量——“伪装成和真的渡河一样。”趁着中国守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中牟方向和洛阳一线黄河对面的时候，中央一路的日军悄悄经过黄河铁桥，潜伏到黄河南岸那个被日军占据已久的邙山头桥头堡附近——在长达三年的对峙期间，中国守军竟然看着日军在眼皮底下对黄河铁桥进行修复。修复黄河铁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说实施步兵攻击，就是用炮火干扰也定会迫使日军停止修复。但是，日军竟然把桥修好了，现在又堂而皇之地从桥上过来了，这也是咄咄怪事。——

十九日晨，太阳刚刚升起，日军向中国守军第八十五军预备第十一师的阵地开始了猛烈炮击。与此同时，在洛阳以东，日军第四十四、第十六飞行战队起飞战机二百多架次，轮番向中国守军黄河前沿阵地狂轰滥炸。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六三联队第二大队向邙山头高地发动了冲锋。预备第十一师的一个营在营长王鑫昌的率领下奋力抵抗，激战到中午时分，王营长和全营三百多名官兵全部阵亡。接着，在邙山头阵地以西，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九联队第三中队，在中队长涩谷幸雄的带领下，向黄河前沿阵地摩旗岭发动攻击。日军集中重炮、野炮和山炮一起轰击，第一三九联队也集中了所有的重武器支援作战，中国守军利用工事障碍顽强阻击，但阻击阵地很快就在日军的炮火中被毁，日落时分摩旗岭主阵地丢失。第八十五军当即命令预备第十一师动用预备队三十三团对日军实施反击，军工兵营和特务营也紧急增援前沿。但日军已经从中国守军的防御线上撕开了口子，后续部队从缺口处蜂拥而至，三十三团多次冲击未果，团长佘子培身负重伤。霸王城东西两侧的邙山头和摩旗岭高地相继失守后，日军消除了黄河河防正面最前沿的障碍，中国守军的炮兵也由于失去了前沿观察点而无法准确射击。二十日，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全线向塔山、万山地区撤退。

日军第六十二师团渡过黄河后，向荥阳县城猛扑过去。中国守军第八十五军的数百名官兵依城防守，二十日傍晚时分城墙被日军攻破，荥阳失守。

从霸王城撤退的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潮水般地向南面的郑州涌去，与抢先占据郑州城墙一角的日军“先遣挺进队”撞到了一起，第八十五军立即对这股突进到纵深的日军小分队展开了围攻。混战中，中国官兵缴获山炮一门，日军“先遣挺进队”伤亡惨重，被打死十六人，十五人身负重伤。就在这支日军小分队几乎绝望之时，第六十二师团的第六十三旅团赶到了郑州城下。第六十三旅团是第六十二师团的左翼，任务就是攻击郑州城。该军一路南下郑州时，不断地向撤退中的第八十五军部队实施追击，追上的基本上都是行李大车队，因为不需要停下来作战，所以推进的速度很快，二十日下午二时其先头部队第十二大队就看到了郑州的城墙。大队长贺谷当即决定与那支惊魂未定的“先遣挺进队”联合攻击郑州城。日军第十二大队从已被占据的城墙一角向城内突击，中国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很快溃退，郑州全城随即陷落。

郑州失守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汤恩伯把第一战区部队编成了南北两个集团，进行了紧急调整部署：南集团由李仙洲为司令，统一指挥贺粹之的第十二军的三个师、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的三个师、赖汝雄的

第七十八军的三个师、刘昌义的暂编第十五军的两个师以及陈又新的泛东挺进军的两个旅，在平汉路及其以西的临颍、许昌、禹县、郏县、宝丰、叶县和襄城等地，阻击消耗南下的日军；北集团由第十三军和第八十五军组成，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为指挥，集结在南集团西面的登封、临汝一带的山区里养精蓄锐，等沿着平汉路南下的日军与沿途节节阻击的中国军队拼得精疲力竭，开始向黄河以北撤退时，汤恩伯将亲自督率藏在山区里的那两个军，快速出击拦截，围歼日军。

以上部署完全是汤恩伯的一厢情愿：让精锐的中央军部队躲在山区里不与日军接触，把至关重要的平汉路沿线防御，全都交给只掺进一支中央军的众多杂牌军，在明知道如此部署平汉路必丢无疑的情况下，却煞有介事地说要等日军力竭向北撤退时出击围歼。——日军发动此次攻势作战，就为占领平汉路且巩固之，根本没有打完就撤的计划，汤恩伯对日军将会精疲力竭以至北撤的判断凭据何在？自台儿庄作战起，徐州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及至这次豫中会战，日军每一次的作战目标都有寻歼汤恩伯部主力之意，而汤恩伯硬是每一次都能令日军根本见不到他的主力。他那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总是早早地、远远地躲到核心战场以外，理由永远都是待机出动。汤恩伯就这样为蒋介石保全着精锐部队，而让台儿庄战场上的池峰城、枣宜战场上的张自忠孤军抗敌。

部署完毕之后，汤恩伯致电蒋介石："军决以有力之钳形态势，包围由中牟及邙山头方面进犯之敌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之间地区而歼灭之。"

二十日下午，日军第十二军发布作战命令，其要点是：攻占密县附近一带，摧毁中国军队的支撑要点，主力向新郑推进，准备围歼汤恩伯部主力。

按照作战命令，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除派遣一支小部队向密县方向突击外，主力部队沿着平汉铁路迅速南下直趋新郑。平汉铁路两边的道路已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艰难推进。下午，日军与中国军队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二师以及从中牟撤下来的暂编第二十七师遭遇。中国守军凭借既有阵地工事、地堡和壕沟展开猛烈的阻击，但在日军的强大攻击下，新编第四十二师伤亡惨烈，两名营长和六位连长阵亡，士兵死伤过半。当身后的新郑县城已被日军攻占的消息传来时，中国守军只有继续撤退。一一二十一日凌晨三时，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突击到了新编第四十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七师身后的新郑城下，拂晓时分向城垣发动攻

击，守城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和新编第四十二师的两个团，不敌日军的猛烈攻势，纷纷溃退。上午八时，平汉路上的重要据点新郑城落入日军之手。

在新郑城以北阻击日军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从中牟一路退下来却心有不甘。二十一日，他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官兵阻击了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整整一天，日落后，阵地侧翼一个名叫绪张村的阵地丢失，导致师部失去了掩护屏障。师长萧劲认为没有再阻击的必要了，建议继续后退，但刘军长坚持死守不退。两人僵持不下，萧师长带着暂编第二十七师甩下军长走了。性格倔强的刘军长带着特务连、作战营还有军官队集中在绪张村西面几百米外的小树林里。此时，特务连加上军官队仅剩下一百三十多名官兵，作战营加上配属该营的迫击炮排也仅剩下四百余人。刘军长说，郑州和新郑都已陷落，我们是在敌后孤军作战，但汤长官命令我们在此阻敌，我们哪怕牵制住一部分日军，也能给相邻友军减少一点压力，因此必须与当面日军拼上一场。侍从参谋陈正风把这五百来人分成两支冲锋队，一支由陈参谋带领，从绪张村的西口往里冲；一支由八十六团二营营长胡光耀带领，从村北往里冲；军官队同时在村南佯攻，军长带着特务连当预备队。但是，刘军长坚持要亲自带领部队冲锋，并要求军官队带头冲锋，一方面给士兵做出榜样，一方面让当面日军认为冲锋的是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主力。

晚上九时，冲锋队出发的时候，迫击炮排开炮掩护，但只听见五声炮响就再没了声息，原来没有炮弹了。绪张村里的一百多名日军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垮了，不可能回过头来打仗，加上行军疲惫正在睡觉，刘军长率领官兵冲进来时，村子里顿时一片混乱。这是一场惨烈的白刃战，百余名日军不是被手榴弹炸死，就是被刺刀捅死。战斗刚刚结束，村庄的四周突然升起了无数日军发射的信号弹，刘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向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所在地八岗村转移。但是，等他们跑到八岗村，却发现暂编第二十七师已经走了，师部里空无一人。刘军长命令特务连去找，结果在村东街口和一股日军撞上了。这是包围而来的大股日军，刘军长的数百人被围困在村庄狭窄的街道上无处躲藏，当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突围而出的时候，很多弟兄没能跟上来，那些不得不遗弃在八岗村里的重伤员全部被日军杀戮。

刘军长带着残部向许昌方向撤退，官兵们一路看见的都是悲惨的景象：

黎明时分，部队从东门进入薛店。此时的薛店较之四天前我们经过

时已是面目全非，一片凄凉。镇内镇外看不到一个行人，绝大多数老百姓为躲避战火已远走他乡，少数未来得及逃走的全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所有的院门、屋门都被推倒或砸坏，粮食、财物和家禽家畜被洗劫一空。我随刘军长走进一座小院，看见一位老汉倒在血泊中，屋内的床上躺着一具披头散发的裸体女尸。我们又来到大街上，见路当中有几十堆麦秸，周围布满了洋马蹄印和许多炮车留下的车辙。

日军发起会战五天后，郑州、新郑、尉氏、洧川、荥阳、广武、汜水、塔山、万山都已接连失守。二十二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第二二五联队，分别从东面和北面联合攻击密县。中国守军蔡剑鸣的第四师和廖运周的第一一〇师对日军展开了阻击战，张文心的第二十三师适时对日军实施了反击。此时天降大雨，战场上一片泥泞，战壕里的雨水齐腰深。二十三日，日军第二二五联队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攻入密县。同时，第一一〇师团绕过密县，向撤退的中国军队展开猛烈追击。第一三九联队的第十中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向密县北面中国守军的高地发起攻击，日军官兵的作战状态几近疯狂——“中队全体成员不顾疲劳和饥饿，敬诵五条圣谕（明治天皇发布的五条规范），欣然冲破黑夜，蹚着暴雨后没膝的泥水向前挺进。中队长中岛献夫中尉虽身负重伤，仍坚持不下反复发起冲锋，终于占领五二八高地的一角。然而中岛中尉于二十三日在五二八高地东侧常家附近战死。”

密县丢失后，日军对廖运周的第一一〇师紧追不舍，已丧失战斗能力的第一一〇师遭到毁灭性打击：

登封附近为高山道路，两旁地形十分险峻。联队当夜将广田中尉指挥的一个小队派到卢店附近。该小队搜索到溃败的敌军，以刺刀刺杀约一百五十人。挺进队命第一大队占领孙家店东西一线阵地，截击南逃的敌军，命三大队占领卢店阵地，切断向西南溃逃的重庆军七百人的退路，歼灭其中三百人，少将代理师长被俘。

二十四日，中国第一战区第四集团军部队全部退守到荥阳以西的虎牢关、马驹岭一线。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认为，他已经把黄河河防一线的中国守军打残，令其退守到密县以西的山地中，至少在这个方向上中国军队短期内无法发动反攻作战。于是，他留下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固守虎牢关一线，命令第三十七、第六十二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

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在坦克第三师团的配合下，沿着平汉路线继续南下，发起对许昌和禹县的作战，完成打通平汉路的作战目标。

此时，李仙洲指挥的南集团部队，在连续丢失各个要点后，为了确保重镇许昌和禹县，急忙部署阻击作战：新编第二十九师等部固守许昌；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第八十一师守卫郏县；第二十二师守叶县，其中一个团守襄城；暂编第五十五师守宝丰。

此时，豫中战局处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对于日军而言，各师团连续攻击数日，加之中原连降大雨，官兵疲惫，战力下降。二线兵团第二十七师团奉命紧急南下，然而因为暴雨，部队行军艰苦，这个从关东军调来的师团，竟然因为天气阴寒，数十人被冻死，两千多人被迫滞留在后方医院治疗。由此可见日军已出现大纵深作战的困难。为了弥补战力的不足和下降，坦克第三师团的加入至关重要，而此刻坦克第三师团尚在向南运动途中。对于中国方面来讲，尽管连续丢城失地，但沿着平汉路南下的日军过于深入，且人困马乏，如果在日军坦克第三师团抵达作战区域前，除了在许昌以北的正面顽强阻击，甚至适时发动反击作战之外，密县以西的汤恩伯部主力如能迅猛出击，侧击进犯密县之敌，甚至直逼郑州，势必会令日军忙于应对南北两端，不但南攻许昌的计划将受到干扰，也将被迫辗转于郑州以南的狭窄战场中，虽然是否能够扭转战局尚未可知，但至少可以令战场局面大为改观。

可是，汤恩伯部迟迟未动，“良好战机稍纵即逝”。

第一战区曾给汤恩伯下过“以第二十九军全部以第十三军两师击灭密县之敌”的命令，汤恩伯也曾命令第十三军暂编第十六师由禹县向密县实施反击，但是，汤恩伯的敷衍仅仅使日军第一一〇师团采取了守势而已，于日军第十二军对许昌的围攻作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二十三日晚，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突然袭击了和尚桥，二十四日凌晨攻占新郑与许昌之间的长葛县城。

二十六日，日军第十二军召开将领会议，认为第一阶段作战已达到目标：突破了黄河防线，占领了战略要点，各部队已推进到预定地域，伤亡也不算大，仅仅阵亡一百四十一人，负伤三十八人，却打死重庆军二千四百七十七人、俘虏五百零三人。从整体上看，作战进展顺利。但是，内山英太郎提醒他的将领们，不要认为中国军队总是一触即溃，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军队的优缺点，以利今后作战：

一、敌军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易崩溃。

二、高级指挥官的部署极为迅速，各部队的行动大致能按命令执行，部队彼此之间也能保持良好的联系，但初期受到我军突然袭击，似乎发生了混乱。

三、敌军撤退，特别是将重武器逐渐后撤阻止我军追击的方法，均极巧妙，在撤退时一定要进行反攻或炮击。

四、大量使用手榴弹，使用地雷则较预料为少。

会议决定了攻击许昌的作战方案：以第三十七师团担任许昌的正面攻击；第六十二师团在许昌西北的颍桥附近，负责阻击从禹县增援许昌的中国军队；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在许昌至临汝的公路以东，负责阻击从襄城方向增援的中国军队；骑兵第四旅团推进到许昌以南，负责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并准备转向西北方向进至宝丰和临汝；第二十七师团在许昌东面，与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一起，防止许昌守城部队向东面和东南面突围而出，并须在攻占许昌后沿着平汉线继续南下，与第十一军北上部队会合，彻底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归属第十一军序列；坦克第三师团负责突击许昌南门。预定攻击时间为三十日清晨。

二十九日夜，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首先行动，任务是攻占颍河两岸，以掩护其他攻城部队进入攻击位置。

在颍河指挥阻击作战的，还是刘昌义军长。

刘军长指挥的暂编第十五军，于中牟县的黄河边首先接敌，部队一路向南边打边撤，现在又奉命固守许昌。他的暂编第二十七师基本上打完了，守城任务由新编第二十九师承担。刘军长虽曾决心将日军赶回黄河北岸，但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渡过黄河的日军已占领九座县城，其中的八座在第二十八集团军的防区内。现在的许昌成为平汉路上最北端的阵地，也是暂编第十五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根据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许昌附近乃第一战区与日军的决战地域，可汤恩伯只让新编第二十九师一个师守许昌，着实有点令人费解。可是，既然领受了任务，只能与许昌城共存亡。二十九日，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命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守许昌，命令刘昌义同时指挥第七十八军的新编第四十二师和

第八十九军的第二十师即刻开赴许昌外围颍桥阵地，阻击日军向许昌靠近。刘军长有点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在与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告别后，才带队出城。——刘昌义军长不知道，这是他与吕公良师长的永别。

刘军长带着几百人在漆黑的夜里去寻找新编第四十二师。他本来以为新编第四十二师在灵井镇，到了那里才发现，在这个许昌外围的重要据点上竟然没有任何中国守军，新编第四十二师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三十日凌晨时分，刘军长才遇到了新编第四十二师的补充团。在向颍桥方向行军时，突然听见猛烈的枪炮声，刘军长判断这是从灵井镇方向南下的日军，是去攻击许昌城的。刘军长立即率部迎敌，在颍桥附近，他终于见到了归他指挥的第二十师的五十八团，该团是从叶县向颍河开来的。刘军长来到五十八团团部，七十九团的一名下级军官跑进来报告，说该团在颍桥以北的余张村阻击日军，团长刘耀军阵亡，全团现在只剩下几十个人了。此时汤恩伯打来电话，命令刘军长撤退，倔强的刘军长说他要与日军在颍桥拼一下，否则就是没有尽到军人的天职。

刘昌义指挥第二十师的五十八团和六十团在颍桥一线的阻击，算得上是整个豫中会战中少有的像样的作战。迎面而来的是日军第六十三、第六十四两个步兵旅团。颍桥是一个古老的镇子，许昌到南阳的公路穿镇而过，镇子四周有很高的寨墙，寨墙外颍河环绕，河水虽不深但两岸是数米高的土崖，地形有利于防守。下午二时，日军开始炮击，中国守军都上了寨墙，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日军。刘军长所在的指挥部被炮火炸塌了半边，他向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请求增援，李仙洲说已命令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火速赶往颍桥。这一消息令刘军长信心大增。黄昏时分，逐渐接近寨墙的日军开始冲锋，集中兵力向西寨门涌来，中国守军在日军冲到寨墙下时，数百枚手榴弹雨点般地砸下去。日军几次进攻未果后，集中炮火反复轰击寨墙，导致寨墙多处坍塌，中国守军冒着炮火用麻袋堵塞缺口。天黑后，日军攻占了东南面的营庄，颍河东岸的日军也强渡成功，颍桥镇已处在四面受敌的状态。夜里十一时，颍桥镇东南寨墙首先被攻破，刘军长带来的暂编第十五军的特务连与突入的日军展开肉搏战。至五月一日凌晨，颍桥镇已被日军攻占了大半。退守一角的刘军长不甘心，因为李仙洲说过增援部队已经派出。可是，随着阵地被逐渐压缩，官兵们相继倒下，援军仍旧不见踪影。最后时刻，刘军长下令五十八团向寨西、他带着特务连向寨东分别突围。

这个名叫颍桥的小镇，恐怕是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南下以来遇到的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田村大队当日伤亡四十一人，金木队伤亡六人。

田村大队派战斗救护班，在开店设立了包扎所，直到二十四时许，才将伤员收容包扎完毕。战死者有：第二中队中队长杉山岩中尉、第四中队中队长崛武中尉、步兵炮小队小队长泷泽彦作少尉；负伤的有机枪中队中队长横江义一中尉、步兵炮小队长笠井英雄少尉。”

冲出颍桥镇，刘军长一行人跑在漆黑的田野上，最前面的特务连突然接了火，打了一会儿才知道，是李仙洲派来的第二十师的部队。不甘心的刘军长立即组织反击，日军第六十三旅团正在集结准备攻击许昌，结果被打得措手不及：

旅团长中岛少将命令福井部队和旅团直辖各队迎击。工兵队以及卫兵、传令、防疫、供水、宣传各班也均投入了战斗。工兵队和卫兵在敌我相距不足五十米处展开手榴弹战。重庆军一面连续增加兵力，一面向陈庄方面推进。工兵队自六时四十分许逼近陈庄以北攻击敌军，因队长金木大尉负伤，攻击一度受挫。

随着第六十二师团后续部队的加入，刘军长的队伍除了赶快撤退外别无他路。

行伍出身的刘昌义和他带领的官兵，虽然武器简陋，训练不足，但自中牟前沿的河防作战开始，在日军的凶猛打击和追击下，他们虽然在不断后退，但绝不是望风而逃，且只要一有机会便主动歼敌。——战后，刘昌义军长得到奖励是：一枚三等云麾勋章和一尊蒋介石的半身塑像。

颍桥一线失守后，日军直抵许昌城下。

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祐一郎，下达了三十日拂晓开始攻城的命令。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汤恩伯表示他将率部与日军在禹县附近决战，以牵制攻击许昌的日军。

五月二日，汤恩伯下达了作战部署：李仙洲南集团的第十二军在郏县和宝丰集结，第七十八军推进到襄城，第八十九军在漯河和郾城集结，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在颍桥附近阻击日军，暂编第十五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固守许昌；王仲廉的北集团第十三军一部守临汝，一部监视密县，主力在白沙附近集结，第八十五军在登封集结。这还是一个散点式的防御部署，既没有防御重点也没有战场协同，

无法得知汤恩伯部署的依据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这一部署并没有显露出他向蒋介石保证的要与日军决战的态势。汤恩伯的命令刚刚下达，五月二日，许昌外围颍桥一线的守军便撤了，更为离奇的是紧接着许昌陷落了。

许昌城的陷落没有悬念。

只是城池陷落得太快，中国守军付出的代价太大。

三十日拂晓，日军的攻城战开始。第十一炮兵联队的几十门野炮以及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步兵炮一起，猛烈轰击许昌城垣和各个城门，大批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对城内投下了大量的航空炸弹。许昌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大多被摧毁，城内到处燃起大火。接着，日军从四面向中国守军发起了冲锋。

新编第二十九师，原为第三十一集团军直辖部队，一九四三年整编时改隶暂编第十五军，属于中央军半嫡系部队。主要军官的姓名是：师长吕公良，浙江人；八十五团团长杨尚武，湖南人；八十六团团长姚俊明，陕西人；八十七团团长李培芹，山东人；辎重团团长傅中枢，江苏人。

此时的许昌城孤悬于平汉路上。

在许昌以南、以西的中国军队，均被日军阻击不得前进，新编第二十九师只有与孤城共毁灭之唯一一途。

三十日整日激战，双方死伤严重。黄昏时分，南门先破。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冒着弹雨，数次攻击，最终将镶嵌在城墙中的南城门撞开。大批的坦克随之涌入城内，搭乘的步兵跳下坦克与中国守军展开白刃战。与此同时，十二架日军战机再次飞临许昌上空，配合地面炮兵集中火力轰炸和轰击西门，之后，大批的日军步兵对西门阵地发起决死冲锋——“小川决死队二十七人毅然冒着炮火，跳进河沟，游过了六十米宽的水面，利用炮弹、炸弹的硝烟掩护，逼近城下。随即赤身进行冲锋，打退了在城墙上三间房屋中据守的重庆军，并将其占领。十七时三十分，踏上了攻占许昌的第一步。”接着，在北门因为地雷太多而推进缓慢的日军，也于午夜冲入城内。天亮的时候，新编第二十九师已经伤亡数千官兵，师长吕公良率领残部从城东北角突围，在城外被日军布置的封锁线阻挡，战斗中吕公良师长和随行的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

许昌被攻占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一日许昌城内的作战于上午结束。今晨攻占东北角后，由该处逃出的部分部队，六时二十分许在于庄附近被工兵第二十七联队小野部队围歼。由缴获名片中，得悉该部为包括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中将在内的司令部。因战时匆忙，未能郑重掩埋敌将遗体，并竖立标志，身为武士，不胜惭愧。

吕公良师长，黄埔六期毕业，从陆军第八十九师当见习排长开始其戎马生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部参加过百灵庙战役、居庸关战役、台儿庄战役、赣北战役、随枣战役等。一九三九年任第十三军参谋长，一九四一年任第三十一集团军高级参谋，其后还担任过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安徽界首警备司令和河南因江警备司令，一九四三年春始任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阵亡时年仅四十一岁。

日军攻占许昌后，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的第二二七联队，在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竹下义晴中将的指挥下，由许昌沿着平汉铁路迅速南下，攻击平汉路上的郾城时，遭遇中国军队第八十九军新编第一师的阻击，日军第二二七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建部正中尉被打死。攻击漯河时，中国守军于正面阵地顽强固守，日军打了一天一夜才攻进漯河。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超越第二二七联队，向漯河以南攻击占领了遂平和确山。与此同时，占据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派出第十一旅团由信阳出发，沿着平汉铁路一路北上，防守确山的中国第五战区第六十八军部队不战而退，致使南下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和北上的日军第十一旅团在确山会合。自此，平汉铁路南段被日军打通。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发生了极大的混乱。这个混乱不是源自中国军队的阻击，而是因为豫中地区的狂风暴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前身为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是挑起卢沟桥事变的部队。扩编为第二十七师团后，归属第十一军序列，参战武汉会战，也是针对八路军发动“冀东大扫荡”的主力部队。一九四三年，该师团调归关东军序列，开赴锦州地区。当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作战时，才又将其调入关内，任务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打通铁路线后回归第十一军作战序列。第二十七师团一路走到黄河边时，因为连降阴雨冻伤了二千多人。从许昌继续南下后，又因为天气骤然炎热而令官兵大量生病。从确山继续往南前往信阳的途中，部队先是因为渡河秩序发生混乱，接着天又下雨了，刚刚还为炎热痛苦的官兵立刻又被风寒袭倒：

日落前后，阴云密布，劲风吹来，白天的闷热突然变成了冷雨，气温约为摄氏十度，风速约达十米。霎时间天昏地暗，大雨倾盆，田野间的汽车路立即被水淹没，道路两旁的沟渠变成激流，中途有两处桥梁被冲断，马车不能通行。行军部队只得在黑暗中伫立，雨越下越大，部队不能点灯，只靠同前后的人取得联系。为了抵住寒气，用大声呼喊，等待前进。至二十三时许，各队终于决定放弃迟迟不前的行军，设法避雨。各队长开始分头寻找避雨的村庄和房屋，但因夜间黑暗，雨水又大，看不清道路，未能找到避雨的村庄。纵然发现村庄，道路也极难走，人掉在沟里，马陷于泥中，尤其是车辆部队，虽然有的返回原宿营地，但大部分留在途中，其困难极为严重。至后半夜，发现有的士兵倚在炮车上昏迷过去；有的在辎重车下避雨，竟然爬不起来了……派遣军使该师团不丧失战斗力到达武汉地区的设想未能实现，尽管方面军做了周密的安排和指导，仍然遭受重大损失方到达信阳……于是，不得不使一千五百名伤病员留在信阳、汉口、武昌的医院。师团长竹下中将的病症疑为伤寒，于五月二十六日住进了武昌陆军医院。

多年转战中国战场的日军师团，如今变成这等弱不禁风，这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印证了侵华日军的衰落。

日军攻占许昌之后，认为新的战机随之到来。

在日军看来，中国第一战区的核心兵团，即是汤恩伯的第十三军，而中国军队的一大特点是，一旦核心兵团垮了，全盘就会迅速崩溃。因此，打垮汤恩伯部势在必行。此时，中国军队第十三军正在密县附近反击第一一〇师团。于是，内山英太郎认为，这正是围歼汤恩伯部的好时机。冈村宁次随后也发来电报，命令第十二军立即咬住汤恩伯部。

由此，日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后，主力部队开始猛烈地左旋，以求对平汉路西侧的汤恩伯部展开捕捉和围歼：长野祐一郎的第三十七师团、本乡义夫的第六十二师团、滕田茂的骑兵第四旅团以及多贺哲四郎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以坦克第三师团为先导，主力分别沿着许昌一襄城一临汝和禹县一郏县一临汝两条路线，向临汝平原实施向心突击；另有一部日军超越主力向伊河河谷开进，以断绝汤恩伯部第十三军的退路。而在密县和虎牢关一带的林芳太郎的第一一〇师团，则向密县以西的登封攻击前进；另有一部向登封北面的山地迂回，以夺取郭店，切断汤恩伯部向洛阳方向的退路。

信誓旦旦地声称要与日军决战，却躲在平汉路以西看着其他部队与

日军血战的汤恩伯，这下灾难降临到他自己头上了。

“第十二军消灭汤恩伯军的努力，是从第六十二师团企图消灭禹县附近的重庆军开始的。”禹县附近的中国守军，是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尽管第二十九军接敌后进行了阻击，但禹县外围阵地还是一夜之间全垮了。五月三日，日军开始攻城，当天禹县陷落。禹县的丢失，令位于平汉路以西的汤恩伯部，彻底失去了向西进日军发动反攻的支撑点。与此同时，日军坦克第三师团抵达了郏县城外，用坦克撞开城门后，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步兵未受到激烈抵抗就占领了该城。在北面的密县方向，第一一〇师团向登封实施攻击时，中国守军还在部署之中，没等部署完毕，日军就突进到登封西北十六公里处，切断了登封与偃师之间的交通，令蒋鼎文指挥的中国军队第四集团军在巩县以东的阵地侧背完全暴露。三日，中美联合空军对日军实施了猛烈轰炸，从密县出发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司令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师团长林芳太郎仅因提前离开司令部三十分钟而幸免。

四日，奉汤恩伯之命增援临汝的第八十五军，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拂晓时分临汝失守，第八十五军往南退去。日军坦克第三师团继续西进，当晚在伊川附近西渡伊河，切断了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后方联络线，中国军队第九军与第十三军被日军分割。五日，第九军在突围中遭到日军的层层截击，损失巨大，残部退往嵩县东北地区；第十三军在白沙附近试图摆脱日军的攻击，但在日军坦克的冲击下伤亡惨重。由于第九军和第十三军的溃败，导致第四集团军的阵地侧翼全失，第四集团军部队随即向洛阳西北地区撤退。

此时，在战场的北面，汜水、登封一线已落入日军之手；在战场的南面，宝丰、鲁山也相继陷落。更为惊人的是，跟随坦克第三师团一起推进的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在坦克第十三联队一部的配合下，竟然出现在洛阳南面的龙门附近，封锁了伊河渡口。——从日军主力自许昌附近出发，短短的五天之内，日军在汤恩伯的防区内迅猛推进了五百余里。号称中央军嫡系精锐的汤恩伯部主力部队，不但作战意志和作战能力与平汉路上的杂牌军相差甚远，简直就如同一群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要不是日军步兵跟不上坦克的推进速度，让汤恩伯部得以丢盔卸甲地逃进了豫陕边界处的山区，该部在日军精心布置的包围圈内被歼灭几乎没有悬念。

汤恩伯部在日军的追击下一路溃撤，保卫豫西的任务就落在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头上。而日军如此迅速地突破了汤恩伯部四个集

团军的防守，一路向西打到了他的面前，这对蒋鼎文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

日军主力突然转向豫西，有攻占洛阳进而逼近潼关的态势，这令蒋介石万分焦灼。他分别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以及所有副师长以上的将领发电，令其必须固守阵地不得后退，否则中原的战局将不堪收拾。

五日电：

兄部阵地为此次中原战场之轴心，关系全盘作战之成败与国家之存亡，务希督饬全体忠勇将士，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发挥我国民革命军之战斗精神，奋勇歼敌，达成使命，庶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与本党之战士。此次作战，兄部能遵令屹立不移，指挥若定，至用慰念，至系激励所部，始终保持阵地，完成任务，是所厚望。

六日电：

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正我全体官兵杀敌报国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职责，用慰我国父及阵亡先烈在天之灵。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重申连坐法，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望我各级官长尤应身先士卒，严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我军荣辱，主义成败，国家存亡，民族盛衰，全在此一举，希共奋勉，争取胜利，勿使长沙与常德战绩独美于前也。

然而，蒋介石电报发出的时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已于五日拂晓率长官部离开洛阳，撤向了陕西方向。

日军大本营认为，一旦攻占洛阳，不但可以防止中国军队向平汉路反击以保障平汉路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战局正在急剧恶化，攻占洛阳或许是一针振作士气的强心剂：“近来，我对英美的整个战局非常恶化，情况紧迫，极为凄惨。五月六日发表古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殉职的消息（山本五十六死后，出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古贺峰一大将，一九四四年三月底在飞往棉兰老岛途中，飞机遇难身亡）。美军在新几内亚登陆。九日下令由确保新几内亚西部的重要战线后退。另方面，在缅甸自本月上旬以来，英帕尔战线的苦战更加困难。在欧洲意大

利战线失利，传说卡西诺已撤退，据报道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线的登陆也迫在眉睫。”为此，冈村宁次急切地敦促第十二军：“东条首相鉴于形势需要，希望迅速攻克洛阳。第十二军准备何时攻占洛阳？”

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内山英太郎对上一阶段围歼汤恩伯部的作战耿耿于怀，认为由于坦克第三师团过于快速的急袭，反而致使汤恩伯部即刻丧失了决战意志，而中国军队的特点是一旦撤退，瞬间就能从战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当前第十二军的主要任务应是继续猛烈追击向西逃跑的汤恩伯部，攻击洛阳周围的蒋鼎文部是次要任务。他向冈村宁次建议：对洛阳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留下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各一部，对洛阳保持围攻态势；同时集中第十二军主力，趁汤恩伯和蒋鼎文两军阵势混乱之际，沿着洛河河谷以及嵩县通往卢氏的山路穷追不舍，务必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彻底丧失作战能力。然后再折返与包围洛阳的部队合力拿下洛阳。最后，在豫陕交界处的灵宝附近，与中国第八战区中央军精锐部队胡宗南的援军决战。——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人仍旧认为，在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中，死硬抗战的都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部队，只要把这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一打垮，中国战场上的战事就能迅速了结。在日本人看来，汤恩伯部和胡宗南部，都是中央军绝对的嫡系主力部队。

因为寻歼汤恩伯部也一直是冈村宁次的愿望，因此他立即同意了内山英太郎的建议。为策应第十二军的追击作战，日军再次向中原战场增派了兵力：第一军派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三浦忠次郎，率领第五十九旅团的五个步兵大队以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三个大队，九日夜由垣曲南渡黄河攻击渑池，以阻断中国第八战区胡宗南部向东增援的企图，并和第十二军沿着洛河河谷并肩追击；由警备北平的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率领第六十七旅团以及三个独立步兵大队赴郑州，并指挥独立步兵第九旅团以及第一野战补充队，突破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在洛阳以东布设的阵地，抵达洛阳并围困该城。待第十二军主力完成追击作战后，加入到联合进攻洛阳的作战序列。

五月十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发布作战指导大纲：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及从第十四军中加强给第十五军的张士光的第九十四师，固守洛阳城；第四集团军部队和刘戡兵团的第九军，迅速向伊川以西的宜阳方向增援汤恩伯部；汤恩伯兵团以主力固守汝阳、宜阳和洛宁一线，待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增援部队抵达后转入攻势；刘戡兵团集结在洛阳西南约

十七公里的磁涧，侧击由渑池向洛宁或洛阳进攻的日军，策应李家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作战；第三十六集团军以一部守河防，主力攻击渑池方向的日军；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阻击南渡增援的日军。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战区必须控制汝阳、宜阳、洛宁和嵩县各据点，然后实施反攻。鉴于蒋鼎文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撤离洛阳，军事委员会同意其转移到洛宁附近，向刘茂恩的第十四集团军总部靠拢。

尽管上述作战指导仍属于纯粹的防御计划，但如果得以落实执行，至少可以遏制日军的攻势。可是，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下达的当日就已如同一张废纸。日军第十二军主力绕过洛阳向西的猛烈追击，令汤恩伯部和蒋鼎文部同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五月十二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二二五联队，击溃了中国守军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后占领嵩县。天降大雨，追击的日军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进，有的士兵因为极度疲劳而累死在雨中，沿途到处可见掉队的官兵，以致行军队伍长达二十公里。即便如此，中国军队仍是没能组织起真正的阻击作战，只顾一路向西狂撤。已经与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的汤恩伯，不断地向重庆发出捏造的战报，说他的主力兵团已抵达攻击前线。导致蒋介石十三日向蒋鼎文通报说，汤恩伯兵团已经抵达宜阳和韩城，命令蒋鼎文指挥的刘戡兵团和张耀明的第三十八军，配合汤恩伯部向进击洛阳的日军实施反攻。而实际上，汤恩伯部抵达韩城附近以及洛河对岸沙坡头的第十三军部队，只有四个营。结果，刘戡遵照命令向洛阳外围发起了反攻，遭到日军坦克第三师团的猛烈打击；而汤恩伯的“兵团主力”，那四个营，早已被追击而至的日军击溃。十四日，据守宜阳的中国守军第一〇六师的两个团，遭到日军第六十二师团的攻击。宜阳城不但有涨满雨水的护城河，还有高达十米的城墙，但在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的攻击下，仅仅两小时城墙防御阵地就被突破。大雨中的巷战又持续了两小时，下午五时宜阳失守。

鉴于战局的危急，蒋鼎文紧急命令第三十八军占领韩城附近阵地，第九十六军占领温村附近阵地，努力阻击迅速推进的日军，掩护刘戡兵团以及第三十六、第三十九两个集团军部队向西撤退。但是，当第三十八军抵达韩城附近时，由于宜阳已经丢失，数千日军步兵在坦克的配合下已冲到了洛河岸边，第三十八军还没来得及部署就被日军冲散了。此时，刘戡兵团撤到了洛宁附近的程村，蒋鼎文命令他们占领长水镇以西的高地，力争把阵地与第三十六、第三十九集团军的阵地连接起来，形成一道防线以稳住阵脚。可面对潮水般追上来的日军，中国军队新的防线根本无法形成。蒋鼎文随即又命令部队后退到长水镇至观音堂线，建

立起阻击日军的阵地，掩护第四集团军部队在长水镇西北地区集结。但是，刘戡兵团立足未稳，日军已越过三乡和洛宁逼近了长水镇。守卫长水镇的预备第八师无心抵抗，一触即溃。日军突破长水镇后，其前锋部队于十七日抵进中山镇。中国军队各部队为避免被日军追上，纷纷离开公路跑进了洛宁西北的山地，指挥部与部队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导致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向西直逼豫陕交界处的卢氏。

十八日，蒋鼎文终于与汤恩伯联系上了。汤恩伯言辞肯定地表示，他已经命令第二十九军第九十一师开往卢氏，部队可以归蒋鼎文直接指挥。蒋鼎文立即命令第九十一师和预备第八师一起，在通往卢氏的十八盘隘路阻击日军。但是，蒋鼎文很快便接到了预备第八师师长林伟宏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十八盘阵地根本没见到第九十一师的影子。——后来才得知，第九十一师并没有向十八盘开进。卢氏是中国军队退往陕南的唯一通路，狭窄的山路上到处可见丢弃的武器和装备——“村庄的入口、出口或岔路上，写有很多重庆军的师、团等撤退地址，可见其撤退情况何等混乱。”预备第八师抵挡不住日军的冲击，十八盘阵地很快被突破，日军的一支特遣队冲进了卢氏县城。

卢氏的陷落，令蒋鼎文部队的退路被截断，各部队只有进入崤山山区，通过狭窄的山路拐向潼关，去与第八战区胡宗南的部队会合。但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已经占领了长水镇的隘路，导致在长水镇以西的刘戡兵团以及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李家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部队，受到北面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和第六十九师团的截击，东面和南面又有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的围攻。结果部队各自为战，陷入困境，濒临崩溃。

日军在向豫西追击中国军队期间，除了恶劣的天气带来的困难外，最大的威胁依旧是中美联合空军对他们的打击。美方空军记录：“第七、第八两中队开始此四日毫不怜悯之役，实起自五月十八日上午，合并总数十三架之机起飞掩护第四大队P-40十二架，俯冲轰炸长水镇敌部队及车辆。此任务起始不佳，俯冲轰炸机各机仅炸中目标区二处，担任掩护之十三架乃低飞扫射自长水镇至洛宁道路。据第七中队估计，此一任务中毁坏彼等卡车十辆，创损卡车及装甲车辆二十余辆，击毙敌骑兵约三百名。第八中队自鸣得意：‘吾等深感自傲’，算来‘至少占了五十辆的光，损坏坦克八辆，毙马二十匹及敌兵七十五名。’此实该两中队之过低估计，事后华方报告敌骑兵整个一团实际被歼，中国人不胜欢腾。”

但是，即使有空军的大力支持，第一战区部队的颓势已无法挽回。

在相邻部队不断溃散的时候，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指挥的部队，仅剩下第四十七军的四个步兵团。在渑池以南与追击而至的日军苦战多时后，部队伤亡巨大，李家钰决定突围。五月二十一日，部队刚刚撤至陕县，数千日军骑兵分三路包围上来，当日军逼近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姚店时，李家钰亲率特务营反击试图突围，他身穿黄呢军服，脚蹬长筒马靴，在突围的队伍里很是醒目。在日军机枪的射击下，李家钰身中数弹当即阵亡。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和特务营营长指挥官兵拼死上前，终于抢回了李家钰的遗体——“李满身都是枪眼，但形态面貌可辨。随同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长萧某、上校副官周鼎铭等均牺牲……我部因李家钰阵亡，停火后立即做通宵转移。军长李宗昉在前，李家钰的尸首用麻袋装着跟后，杨显明师长（第一〇四师）护后。”

李家钰是四川蒲江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一五年跟随护国军开始了从军生涯。因战功卓著，他从见习官一路升任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川军第一师师长。抗战初起，川军出川抗日，在山西长治一战中，率第一〇四师抗击日军第十八师团的进攻，表现英勇，战后升任第四十七军军长。一九三九年，因在山西南部指挥部队不断打退进犯的日军，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他有一颗爱国之心，与共产党将领朱德和刘伯承交往甚密，配合八路军打了不少胜仗。当豫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陷入混乱之际，他曾召集各部队将领开过一次会。他对将领们说，别人害怕逃跑，我不怕，我愿意殿后。咱们吃了河南百姓四年的饭，见了日本鬼子就跑对不起百姓。

决心对得起老百姓供养的李家钰，是阵亡于豫中会战中级别最高的中国军队将领，死时五十二岁。

那些同样吃着百姓饭的第一战区部队，连同他们的司令长官蒋鼎文一起逃到了豫陕边界处，而汤恩伯的部队逃进了伏牛山。

为了挽回局面，中国第五、第十战区部队曾发动反击，一度收复遂平、鲁山和嵩县，并逼近宝丰，迫使日军不敢再向西追击，放弃卢氏而退守洛宁，但是战场大局已无法转变。

此时的洛阳城，已是暴露在日军围攻下的一座孤城。

洛阳东有虎牢、崤函之险，北有黄河、南有洛河和伊河之阻，地势极为险要。作为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多年来中国军队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城防工事，形成了看似难以攻破的城市要塞。

守卫洛阳的主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和从第十四军加强给第十五军的第九十四师。中国陆军第十五军是一支性质特别的地方部队，由辛亥革命期间嵩山绿林组成的强悍民间武装改编而成。全军的主要军官大都为豫西本地人，个人财产以及父老家眷都在洛阳地区，因此他们与日军血拼起来万分勇猛。

围困洛阳的日军发动攻城作战后，曾三次攻入洛阳城关，但都被守城部队击退。日军曾委托白马寺的和尚向城内送过劝降书，但城内守军不为所动。五月二十三日，守城部队全部退入城垣后，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完成追击任务后折返至洛阳城下。这天一大早，日军的高音喇叭便抵近城垣，广播了内山英太郎致武庭麟的劝降书：

武庭麟将军：皇军自入中国以来，所向无敌，攻城没有超过一周而不下者。今将军守洛阳，十有余日，尽到了守土之责，也显示了你的军事才能。现在洛阳外围，百里内外，已无中国军队，援军无望，坐以待毙，实属不智。为将军计，以停战归顺为上策。如果从命，自将军以下各级官佐一律不动，薪饷照发，今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如不从命，皇军已准备就绪，攻城旦夕可破，到那时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洛阳城内中国守军没有答复。

二十四日拂晓，日军第十二军集中重炮向洛阳城内猛烈轰击，坦克第三师团配合步兵从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同时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借助城垣、城壕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首先登上城垣的是步兵鹈川中队：

天田小队和配属的工兵一起战斗在中队的最前面。天田准尉的过壕腹案，原拟将工兵的铁梯子扔下壕去，将绳子绑在坦克上，士兵顺着绳子下到壕内，然后将铁梯子搭在对岸，再杀奔城墙。但是，坦克遭到敌军的猛烈射击，地形也不适宜。不得已，改由士兵互相拉着绳子滑到壕底去，但这时开始出现伤亡。滑到壕底的工兵虽将铁梯子搭上对岸，不料壕太深，只能到达半腰，然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天田准尉命令冲进，亲自率领以相原军曹等五人的尖刀班冲了上去。天田准尉在壕底遭到机枪扫射，被子弹打穿了右肘关节造成骨折，登上铁梯子时又被手榴弹片炸进左大腿，但仍想尽了办法靠近城墙。相原军曹也想靠近城墙，一颗手榴弹在头上爆炸而战死。天田准尉率领井上兵长等四名士兵，一起登上城墙，冲进了重庆军阵地，时间是十三时十分。

随着洛阳城西北角和西关的失守，数小时后，城东北角和东关也相

继被日军突破。黄昏时分，日军的各路坦克部队和步兵全部涌入城内，与中国守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二十五日午夜，率部抵抗到最后时刻的武庭麟军长，下令所剩官兵从城的东南角突围。中国守军突围时，受到日军布设在外围的骑兵第四旅团的伏击，伤亡惨重。

直到二十七日，洛阳城内的抵抗才彻底结束。

洛阳，这座中国的历史名城，落入日军之手。

按照日军的预定计划，攻占洛阳后会战结束。但是，二十七日这天，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了夺回失地大举反攻的命令。此时，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已经向南延伸，内山英太郎奉命抽调第十二军部队准备南下。面对中国第八战区的突然反击，冈村宁次决定在南下之前先打击胡宗南的部队，巩固豫中占领区。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也为保护自己的陕西地盘，胡宗南拿出了他的主力部队四个军，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东出潼关向日军发动攻势。李延年一开始的攻击，令日军有点措手不及。在日军抢占的险山庙阵地，李延年部经过数天的反复肉搏，攻占了数处外围据点，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战场上最终打成僵持。奉命配合李延年的刘戡兵团，被日军阻击不得前进。到了六月四日，李延年部攻势减弱，而日军重炮第六联队的五十多门大口径火炮上来了，坦克第三师团的数百辆坦克也冲来了，李延年部被迫后撤——胡宗南的反攻很快就演变成了防止日军攻入陕西的阻击战。

李延年部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顽强阻击日军西进达数天。为了尽快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绕过秦岭，攻击潼关中国守军的侧背，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阻击日军的是李家钰阵亡前指挥的那支川军，总司令的死令官兵们很是痛苦，此时的川军官兵头缠白布，赤膊上阵，发誓要为他们的总司令报仇。川军顽强地与日军血拼数日，日军第五十九旅团木村千代太旅团长被地雷炸死，第六十九师团部被围困在断密涧一带。天气闷热，粮弹匮乏，被困在山岭重叠涧谷纵横的绝地之中，日军疾病流行，军心开始动摇。

这又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尽管日军坦克部队攻势顺利，增援部队也逐渐抵达，但鉴于地形的险要以及时间的不允许，日军还是下达了撤退

的命令。如果此时中国第一、第五和第八战区部队能联合一致，一鼓作气地持续保持攻击态势，已经作战一个多月的日军第十二军未必能够抵挡得住。——在战场的东部再次截断平汉路，甚至收复郑州；在战场的西侧把日军推回到洛阳，甚至收复洛阳城，都存在着可能的战机。但是，胡宗南的部队也同时撤退了。

撤退是从位于灵宝前线的第一军开始的。十日上午，当灵宝外围阵地被日军突破后，第一军提出了撤退请求。第一军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灵宝前线要垮的消息一经传开，引起后方的一片混乱。陕西省政府强行扣押了陇海线上的火车以及通往宝鸡的汽车，要把官员们的家眷和财物紧急运往汉中，甚至宣布陕西省政府也要迁往汉中。结果，西安的军政要员和富商们纷纷向重庆、成都和兰州搬家，导致西安火车站内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蒋介石听闻后下令查询是谁命令省政府迁移的，但是查无结果，没人知道消息到底是从哪里传出的。蒋介石还严令灵宝前线的部队不准撤退，可胡宗南的第一军还是潮水般地溃退了。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致使胡宗南部如此仓皇西撤——已有明确情报表明，日军已开始东撤，准备结束在河南的会战了，根本没有进攻西安的意图——蒋介石命令中美联合空军前去查看并在空中拍照，看看到底是哪支部队在哪个将领的带领下在逃离战场。结果，美军飞行员看到，在没有任何敌情的情况下，胡宗南的部队正沿着公路混乱地滚滚向西。美军飞行员愤怒异常，驾驶飞机俯冲扫射，试图阻止地面部队的溃退，但是这却加剧了中国军队的相互推搡，任凭枪弹横飞，他们根本没有停住脚的迹象。

事后，蒋介石根据空中照片斥责胡宗南，说美军飞行员报告灵宝一带守军撤退时，是整师整军沿着公路混乱后撤的，并不是由于伤亡惨重不能固守阵地而撤退，应据实查明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的将领，予以严惩。胡宗南在回复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他的基本部队第一军，而是说擅自撤退的是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第一六七师四九九团团长贺一迟、第一〇九师三二五团团长刘明等人。蒋介石随即下令统统枪毙。

枪毙傅维藩师长，是由第八战区执行的：

上峰打来电话，说胡宗南传见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急忙赶到西安小雁塔胡宗南的副长官司令部。当即被软禁在一间小屋里，一连等了好几天，胡宗南也没有传见他。一天，傅维藩在陆大同学、当时任副长官部参谋长的罗泽闿请傅吃饭。进餐时，罗问傅：“你对妻子有什么话要说吗？”傅不解其意，随口答道：“没有。”饭后，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罗让傅上汽车去躲空袭。汽车开到武家坡附近停下，车上的卫兵说：“到了。”傅一下车，几个警卫就架住了他。一名执刑军官宣读了胡宗南处决傅维藩的命令。事出意外，傅维藩当即抗议说：“没有经过军法审判就要杀我，不行！我要见副长官，有话说。”可是不由他抗辩，枪就响了。

社会舆论对傅师长被枪决颇有争议。

豫中会战，日军达到了作战目的。

战后，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关于第一战区失败的原因，除了部队布防不合理、会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战场没有任何协同以及战斗能力和作战意志低下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令人诧异，那就是：在日军进攻的同时，战区内的河南百姓居然趁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也许就是汤恩伯在河南数年横征暴敛的结果。

会战后，在国民参议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一百多名参议员联名提出了一个《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严办丧师辱国的汤恩伯。汤恩伯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之一是：这次豫中会战失败，“不是败于日军，而是败于河南民众”，因为河南民众被共产党利用起来反对他，使他“不能按预定计划同日军作战”。——汤恩伯很清楚，无论什么事，只要把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蒋介石就会相信。果然，蒋介石声称，要惩办汤恩伯就先惩办他。——汤恩伯的这条理由，荒诞到了连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相信的程度。谁都知道，在日军发动豫中会战期间，共产党抗日武装也在拼死作战，只是汤恩伯受到河南百姓的攻击倒有真凭实据。第一战区的战后检讨中对此开列了一系列事实，说河南百姓袭击国军，坚壁清野，给国军造成的损失比与日军作战损失还大，但战区的检讨并没有说这与共产党有关，倒是承认这是国民党的“政治”出了问题：

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

进时，时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又敌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潰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以上不过举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

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在西安召集军事将领会议，分析豫中会战失败的原因。陈诚发现的问题有：一、军队内部的腐败。战区司令长官部内竟然有一个“抢购委员会”，用军车到黄河北岸的日军占领区抢购物资用以买卖走私。结果，打仗的时候部队需要补给，兵站的运输车辆竟然没有了。同时，部队征用民间很多交通工具，多数是为军官运输私人货物或走私物品。战区的各仓库，平时把作战用的军粮用高利贷的形式放贷给当地民众，坐收利息，甚至还有盗卖军粮的事情发生，以致部队没有粮食吃，士兵只能自己弄来小麦自己磨面，有的部队直接去民间找饭吃，军民关系极度恶化。二、部队战斗意志衰退，在日军少量突击部队的攻击面前，不战自溃。当日军占领大片地域后，防务空虚，往往一个主战场周围多达六七个军的部队，却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三、蒋鼎文与汤恩伯勾心斗角，一个战区内两个长官部，两边的部队互不往来，各自行动，一旦崩溃，不可收拾。尤其是汤恩伯排斥异己，使得战区内的杂牌军与中央军离心离德。四、战区长官部在会战中几乎瘫痪，日军一旦发动进攻，长官部首先仓皇撤退，二十多名电报员全跑了，连电报密码本都丢了，导致无线电台与各部队的波长和呼号都发生了错乱，根本无法进行作战指挥。五、战区上上下下都在经商赚钱。蒋鼎文的长官部在洛阳开设了面粉厂，并利用陇海线运煤图利；汤恩伯的买卖更多，开有卷烟厂、酒精厂、造纸厂、纺织厂和煤矿。长官如此，下级军官纷纷效尤，部队中的军官都成了腰缠万贯、穷奢极欲的不法商人。部队军官普遍吃空饷，把吃空饷得来的军粮拿到市场上贩卖以饱私囊，洛阳城内出售的粮食一半都是由部队军官出售的。六、军纪废弛。河南民间有“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之说，第一战区部队对百姓的残酷盘剥，导致第八十五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军惨遭民众洗劫，连军司令部都被百姓抢得“鸡犬不留”。七、军队的政治工作有名无实。各部队的政治部，平时不能宣传鼓动，战时望风而逃，只热衷于干涉地方行政，假名营私。——“由检讨而知的缺失尚不止此，此不过其荦荦大者而已。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

蒋介石也在重庆官邸召开了以整军为主题的会议，要求与会将领们把会议开成一个“彻底反省，雪耻图强”的会议。蒋介石首先说到了现在国民党军队在中国社会舆论乃至世界舆论中的地位问题：

你们要知道，现在外国人对我们中国军人的心理，要知道他们对于我们中国军人的地位、人格是一种什么看法？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长此下去，眼前就要亡国！长此因循下去，再不力求振作，不要说我们的力量不能消灭日本，就是日本失败而灭亡了，也绝不是我们的胜利。

蒋介石认为，豫中会战就是令世界各国看不起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例证：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撤下来，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样的军队，当然只得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而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能做人？

陈诚专门提到了郭沫若轰动一时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把一九四四年和三百年前的一六四四年相比，认为明朝败亡的现象已经复见于今日。陈诚认为，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虽然“别有用心”，但其“对时局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在陈诚看来，当前最可怕的莫过于“国民精神”的崩溃以及人人都不肯和不敢讲真话：

最可怕的现象，就是一般国民精神的崩溃，悲观、消极、怨愤的气氛到处弥漫。反映在生活方面，就是可以享乐的人，无不尽情享乐，以“今朝有酒今朝醉”为准则；而无力享乐的人，则以怨天尤人的方式，过“活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毫无自力更生的打算。这种人人觉得没前途的心情和行动，表现在部队上的，就是士气更消沉，纪律更败坏，战志更低落。豫中会战就是这一背景产生出来的标准范例……还有人认为国家最大的危机，是没有人能讲有用的话。其所以如此者，一因有官做的人不必讲真话；二因想做官的人不敢讲真话；三因知道不能讲且讲了无

用的人不肯讲话，于是人人缄口不言，伪装一种天下太平景象。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到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地步，到了人人都不愿讲真话也不敢讲真话的地步，这是极度危险的。

“就是日本失败而灭亡了，也绝不是我们的胜利。”蒋介石的这句话出自肺腑。

在日本侵略者尚未被赶出国土之时，国民党政权就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样的政权领导之下的军队是无法彻底战胜侵略者的，哪天日本真的战败了，也绝不是被国民党军队彻底打败的。——历史证明，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果然很快就垮台了。

但是，对于正处在战争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就算蒋介石认识到了国民党的政治危机，实际上他既无法顾及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危机，因为此刻日军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作战正在迅猛地向南延伸。

日军遇到的下一个对手，既不是胡宗南，也不是蒋鼎文，更不是汤恩伯，而是中国的抗日悍将薛岳。

第三十六章

血腥之月

一九四四年六月，注定是一个血腥之月。

豫中会战结束后，日军立即向湖南方向集结，其兵力之庞大令人震惊。

侵占华中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结束常德作战进入对峙状态后，便再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计划，原因是常德会战期间他已接到命令，他的部队将被调出中国战场：第三师团去澳大利亚北部改隶第二军；第十三师团调往西太平洋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划归海军第四舰队作战序列。两个师团派出的先遣设营小组已经从汉口出发了。同时，第三十九师团也将调出，作为日军大本营的战略预备队。为弥补兵力的巨大缺口，第十一军从其余各部队抽调人马，在当地编成了独立步兵第五、第七旅团，分别接替荆州和南昌方向被调走师团的防区。就横山勇而言，他有限的兵力能守住现有防区就不错了。但是，转入一九四四年，大本营决定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后，第十一军奉命承担粤汉铁路沿线的作战任务。

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目的，日军在发动豫中会战前就已明确，只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一规模庞大的作战变得更加急不可待了。就日本方面来说，沿着中国南北交通线发动的作战，已不仅涉及未来东南亚兵败之后数十万陆军如何转退的问题，更是出于对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向日本本土实施攻击的日益加剧的恐惧："鉴于目前战局的形势，来自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必将对帝国本土进行轰炸。因此，制止驻华美空军的频繁活动，实为当务之急，希望坚决以摧毁敌空军基地作为重点。""桂林是摧毁敌机场的最重要的目标，必须下决心一举攻下长沙、衡阳、桂林。"

在日军大本营的作战策划中，竟然还有一个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纵贯大东亚铁路的计划："从釜山（朝鲜南半岛南端）出发，经奉天、北京、汉口、衡阳、进入桂湘铁路，复经桂林、柳州、谅山（越南北部），从法属印度支那抵达泰国曼谷，纵贯马来半岛，直至新加坡，长达七千九百四十四公里（如绕行泰国、柬埔寨的金边时，为九千一百六十四公里）。在这约达八千公里的长距离之中，设想需要新铺设的地段为京汉线南段（黄河南岸——长台关间为二百九十八点七公里）、南宁

——谅山间（约二百公里）、安义省东部——公博哇丕间（约四百公里），总计约九百公里。”——很难说日本当权者的思维还是正常的，这一疯狂的臆想只能出于肆无忌惮的狂妄。

眼下，仅仅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日军就必须在河南作战后立即开始沿粤汉路、湘桂路的作战。在这个被称为“一号作战”的预案上，日军所动用的兵力数量令人难以置信：调集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四十、第五十八、第一一六共计九个师团，再加上半个坦克师团、五个独立炮兵联队、两个独立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一个独立骑兵联队，共同担任进攻任务；另以第三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五、第七、第十一、第十二旅团，再加上第一、第二、第五、第九、第十野战补充队，用来补充伤亡并警备后方。以上兵力共计三十六万二千余人，并配有六万七千匹战马、九千四百五十辆汽车、一千二百八十二门火炮以及二百八十架作战飞机。如果加上豫中会战时已经使用的兵力，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投入总兵力高达五十一万人，马匹约十万，炮一千五百门，汽车一万五千辆。——“这对于日本陆军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派遣军自中国事变爆发以来，虽然在华北进攻作战、徐州会战、攻占武汉等大规模野战中取得不少经验，但也不能和‘一号作战’相比。其规模和兵力相当于一九四二年只有计划而未实现的‘五号作战’（重庆攻略战）。”而日军大本营之所以还能调集如此众多的部队，与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苏日中立协定》有关。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关东军，长期屯兵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线。《苏日中立协定》签订后，近八十万的关东军可以调入关内了。

日军大本营在其战争颓势已无法逆转之日，不惜动用除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以外的众多兵力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这一癫狂之举至今仍令史家不解：在国力和军力都已捉襟见肘的境况下，孤注一掷地投入如此大的财力、物力和兵力，于整个战争来讲军事战略上的可靠依据是什么？即使此次贯穿作战全盘胜利，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打通了，甚至那条长达九千公里的铁路线也通车了，难道就能将日本从战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况且，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结束以后，日军将要投入多少兵力和物力才能守住这条交通大动脉？在沿途全部是敌对力量的环境中，日军怎样才能确保如此漫长的交通线的任何一处不被截断或是不被破坏？

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实达一千五百公里。如细分一下作战距离：黄河、信阳间约为四百公里，岳州、衡山间约为四百公里，衡阳、广东间约为六百公里。在这中间，要击败超我数倍的蒋介石所属全部野战军的

半数，进行贯穿作战。同时，还要克服在敌方制空权下的许多艰难。而且这一作战，又是为了日本整个战局的要求断然进行的，不要说增加兵力，就连重要装备的补充，都必须大大压缩。此外，随着太平洋及西南方面战况的进展，过去熟悉对华作战的优秀士兵，大部分相继被抽调出去，不得不增添许多训练期短、缺乏实战经验而又装备不良的新编兵团参加这一作战。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永久占领区，如果在盟军的打击下失去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未来日军与盟军决战的战场决不是在日本本土而是在中国。可实际上，关于在中国大陆与日军决战这一点，精明务实的美国人认为是非常不合算的，因为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的意图，也没有在中国获取权益的打算。美国人的最终目的是把日本打败，然后在太平洋地区独享其长久权益。因此，从海上直接攻击四面都是大海的日本本土岂不是最合理的途径？日本人把中国当成日本的一部分，这种感觉经过了七年的战争，在败局已经日渐明显的时刻依旧如此，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实在令人费解。只是，也有尚存冷静的日本人："这是一场具有消极目的的作战。"——"消极"二字，指的是被动的、被迫的、缺乏积极目的的状态。那么，倾巢出动进行一场目的消极的作战，这只能意味着日军知道末日已近，只不过希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进入六月，日本海军和陆军的悲惨呼号，飘荡在硝烟弥漫的太平洋海面上以及烈焰熊熊的岛屿丛林上空。美军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指挥下，对小泽治三郎指挥的日本海军第一机动舰队和角田觉治指挥的第一航空舰队以及驻扎在太平洋诸岛上由小畑英良指挥的陆军第三十一军，发动了名为"征粮者"的毫不留情的凶猛攻势。美军要彻底歼灭日本驻守在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硫磺岛上的陆军，重创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舰队以及航空兵集团。

"征粮者"战役集结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众多兵力。第五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指挥由海军中将米切尔率领的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共拥有航母十五艘、舰载机九百零一架、战列舰七艘、巡洋舰二十一艘、驱逐舰六十九艘。登陆部队则由两栖作战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特纳指挥，分成南北两个登陆集团。北集团拥有战列舰七艘、航母护卫舰十一艘、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六十九艘和辅助舰船二百八十二艘，载有准备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登陆的步兵七万一千人；南集团拥有战列舰三艘、航母护卫舰六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艘和辅助舰船二百六十七艘，载有准备在关岛登陆的步兵五万五千人。同时参战的还有二十八

艘潜艇、太平洋中部的预备兵团以及海军和陆军航空兵的八百七十多架战机。日军除了第一航空舰队的一千六百四十四架战机外，第一机动舰队拥有航母九艘、舰载机四百四十架、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十三艘、驱逐舰三十四艘。而在大洋中守备各个岛屿的日本陆军是第三十一军的五万五千人，其中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驻守塞班岛，四千余人驻守提尼安岛。

六月初，美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先后对加罗林群岛、硫磺岛和关岛列岛上的日军基地实施了连续轰炸，令日军第一航空舰队的基本兵力一周之内损失大半。接着，美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首战，血腥惨烈的塞班岛登陆战开始了。——“马里亚纳基地对于日本本土来说，等于是太平洋上的一道防波堤。”十五日，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十艘航母、七艘战列舰、十四艘巡洋舰、四十六艘驱逐舰和四百七十多艘两栖登陆船，在两千架作战飞机的支援下，配合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以及一个步兵师，向塞班岛发起了猛烈突击，塞班岛登陆战自这一刻起成为人间地狱。日军密集的海岸封锁火力，令滩头上美军伤兵的呻吟声与炮弹引发的浓烟烈焰裹杂在一起，美军要想不被全歼在海滩上，只有不顾一切地保持进攻。午后，美军突破日军的防线，占据了一个宽约四公里、纵深为数百米的桥头堡。美军的一支突击队进至塞班岛南部，于十七日晚占领了阿斯利特机场。日军开始利用岛上密布的雨林和洞穴进行顽固抵抗，几乎每一棵树下和每一个洞穴里都发生过殊死搏斗，那些宁可战死也不放下武器的日军赤身裸体，没有食物后嚼食草根树皮，打光子弹后用自己的牙齿与美军肉搏。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二十多天，直到七月九日，美军才宣布塞班岛上的日军没有一个人还活着。此战，三千四百名美军官兵阵亡在这座大洋中的小岛上，负伤官兵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一万三千人。就在美军即将攻占全岛之际，塞班岛上的日本海军中部太平洋方面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中将以及第四十三师团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自杀身亡，其理由是“以此来为最后冲锋的将士壮行”。——日本军人信守的武士道令美国人精神恍惚，难道太平洋上每一个被日军盘踞的岛屿都将是美军官兵血流成河之地？

塞班岛上的血战正在进行时，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菲律宾海以东的海面上，日军的九艘航母、五艘战列舰、十三艘巡洋舰、二十八艘驱逐舰以及一百七十三架战机，与美军的十五艘航母、七艘战列舰、二十一艘巡洋舰、六十九艘驱逐舰、二十八艘潜艇以及九百五十六架战机，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海战。十九日晨，日军三百余架舰载机首先对美军舰队实施远距离突击，但立刻遭到美军强大舰载机群的拦截。日军

飞行员回忆道："在冲破美军的堵截中经历了空前的苦战。"与此同时，日军旗舰"大凤"号航空母舰遭到美军潜艇的鱼雷攻击，六个小时后弹药库发生大爆炸沉没；继"大凤"之后，"翔鹤"号航空母舰同样被美军潜艇的鱼雷击中，六百多名官兵在熊熊烈火中随舰沉没。此战，美军损失舰载机一百三十架，只有四艘军舰受到轻伤；而日军损失了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三艘，还有两艘航空母舰遭遇重创，三百六十架舰载机仅保全下来二十五架。海战结束后，菲律宾海面上漂浮着绵延数十海里的油污、战舰和战机的残片以及人的尸体。——"实际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估计，这次海战将是日本海军的航空和水面部队全力以赴的最后决战。决战开始时曾以'皇国兴废在此一战'训谕全军。可是，尽管联合舰队下了如此的决心……日军终被美军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所压倒，吃了败仗。"

六月六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登陆战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海岸开始了。盟军方面动用了隶属远征军第二十一军群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英军第二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共三十二个师、十二个独立旅，还有一万一千架作战飞机、六千九百三十九艘各类战舰、运输船以及登陆舰，加上第二波次的登陆部队，投入总兵力为二百八十七万六千人，其中美军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人。五日，在空军强大机群的掩护下，盟军在卡朗坦以北空降了两个美国师，在卡昂东北空降了一个英国师；同时，庞大的登陆舰群冒着肆虐的风雨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由于盟军战前成功地进行了战略佯动，部署在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海岸的两个德军集团军群的大部分兵力，被配置在了法国最北端的加莱海岸，而在盟军真正的登陆地诺曼底沿岸仅有三个德军师。但是，当盟军的登陆部队抵达法国海岸后，虽有强大的舰炮和战机连续突击，登陆部队还是遇到了猛烈抵抗，并随之出现巨大伤亡。盟军官兵只有前赴后继，顽强地爬上海滩，在登陆开始后充满死亡气息的十七个小时内，涌上法国海岸的美军已达十三万，而英军在海岸上卸下了六千件各种兵器、九百辆坦克、六百门火炮以及四千三百吨的装备和弹药。情报的错误使得德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一线部队遭到毁灭性歼灭。法国海岸上的流血持续一周后，盟军的胜利已经没有悬念。诺曼底登陆的第二十九天，冲入法国境内的盟军已达百万，德军统帅部仓促投入了包括四个坦克师在内的十二个师，可除了充当盟军的追杀目标外没有其他用途。诺曼底登陆战为盟军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随着盟军向法国国土纵深的迅猛推进，战火将很快烧到德国边境，德国法西斯的末日已近在眼前。

在苏德战场上，进入一九四四年六月以来，苏军连续发动的大规模

攻势作战令德国人惊慌失措：二十三日，发动维捷布斯克-奥尔沙战役，苏军攻入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进而攻入波兰境内，并逼近普鲁士边境，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完全崩溃；二十四日发动博布鲁伊斯克战役，全歼德军六个师，为彻底解放苏联全境奠定了基础；二十九日发动明斯克战役和波洛茨克战役，全歼德军第四、第九集团军群十万余人，夺回波洛茨克市，把前线向前推进了数百公里。——一九四四年六月间，苏军完全掌握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德军庞大的精锐部队土崩瓦解，斯大林已经把德国本土确定为攻击目标，开始着手制订进攻柏林的最后决战方案。

德国和日本的最后崩溃，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间已成定局。

这便是日本执意要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空前规模的攻势作战令人困惑的原因。

日军大本营承认，此次作战有一个“不公开的原因”，即“鉴于战局的现状，切望籍此鼓舞国内外的士气，大本营极端期待此次将成为今年最出色的作战”。

“敌积愤数年，耻深三败，且以世界局势威逼，不能不倾国力以图苟延，屡进屡退，长围血污。”——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如是说。

以不断的死伤提升士气，此时的日本人已经无法理喻。

薛岳的慨叹是：“侵略者伤死固不足惜，而我以一军之众，力御数倍强寇，搏战十余昼夜，竟使我忠烈将士与名城俱殉，可哀也。”

日本人所称的“湘桂会战”，在湖南境内的作战被中国方面称为“长衡会战”，由日军第十一军实施攻击，第十三军、第二十三军以及第五航空军策应作战。第十一军计划以五个师团为一线攻击兵团，分三路于湘江两岸南下，进攻长沙和衡阳：中路兵力为两个师团，沿岳州至衡阳的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南进；东路为两个师团，沿平江、浏阳、萍乡、茶陵山区进行左翼迂回；西路为一个师团，由湘北的南县渡过洞庭湖，沿湘江以西的沅江、益阳、湘乡南进，进行右翼迂回。一线攻击部队抵达长沙、浏阳、宁乡一线后，二线的两个师团投入战场。

其作战计划的要点是：

一、最初将兵团分成二线。第一线五个师团并列在华容、岳州南

部、崇阳一线。在湘江以西以一个师团（第四十师团），湘江以东以四个师团（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第十三师团），分别展开（预料重庆军将集中兵力向我进攻，故在外侧部署优秀兵团第二线师团中，以两个师团部署在监利（第五十八师团）及蒲圻西南方附近（第三十四师团），另一个师团（第二十七师团）正在集中途中，调到崇阳附近。

二、第十一军于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开始发动攻势，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汨水间的重庆军。为了对付第六战区，以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五旅团的各一部及步兵第一〇九联队（第一一六师团），掩护第十一军右侧。为此，进占松滋河一线以牵制重庆军。第二线师团除用于决战外，并负责扫荡背后残兵及修补道路。

三、如攻破汨水附近的重庆军，即可向捞刀河一线追击，并准备进攻重庆军主要防线的宁乡、长沙、浏阳。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第十四师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第五十八师团）相互策应。预料重庆军将从浏阳方面进行侧击，对此，以第三师团从西北方、第十三师团从东南方予以围歼。又，在湘江西岸攻取益阳、宁乡，尤须设法切断由第六战区前来增援的重庆军。

四、如将浏阳河一线的重庆军击溃，即以部分兵团急袭突进占领衡阳。此时，第十一军主力则搜索围歼从东方、西方和南方汇集而来的重庆军。攻取衡阳时，须特别重视作战速度。根据需要命炮兵、坦克、铁道部队等急速推进，以配合进攻时的急袭或强攻。

此时，同样是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中国军队主力大部已开往印缅战场。薛岳的第九战区因久战疲惫，每个军都有一个师在后方整训，因此整个战区兵力部署十分薄弱。

赣北方面：卢汉第一集团军的江西保安第九团、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十二师、第一八三师以及第一挺进纵队附属江西保安第四团，担任梁家渡、市汊街跨赣江至松湖街、高安、奉新、靖安之线防守；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师和江西保安第三团驻扎在樟树和清江；新编第十一师在分宜整训。鄂南方面：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的第七十二军第三十四师、江西警察第十四大队、第三挺进纵队一部以及新编第十三师，担任大港、武宁、九宫山、塘口、通城、麦市、九岭、保定关之线的防守，新编第十五师在修水附近整训。湘北方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四挺进纵队、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一个团以及新编第二十师，担任黄岸市、杨林

街、新墙、八仙渡、鹿角一线的防守，第一三三师在长乐街附近整训。湘西方面：梁汉明的第九十九军担任营田、湘阴、芦林潭、沅江、南咀、小港、汉寿一线的防守。战区直辖部队：罗奇的第三十七军一部担任汨罗江防守，主力集结于瓮江铺、浯口地区整训；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担任长沙守备；沈发藻的暂编第二军在株洲、渌口整训；方先觉的第十军在衡山、衡阳之间整训。

重庆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在河南境内打通平汉线后，必会向粤汉铁路沿线发动攻势，因此不断要求第九战区准备作战。

五月二十八日电：

一、战区以现有兵力（六战区抽调一师增于益阳），准备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

二、第四十四军守浏阳，第四军固守长沙及岳麓山。

三、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三集团军（欠第四军），在现阵地迟滞消耗敌人后，以主力向平江、浏阳附近地区转移。

四、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沿岸迟滞消耗敌人后，向浏阳、永安市地区转移。

五、孙渡兵团（欠第五十八军）应以持久战掩护战区之右翼，以五十八军即向浏阳以南地区转进。

六、第六战区应于第二十四集团军抽一师，即开益阳，归第九十九军梁军长指挥，拒止渡湖来犯之敌，掩护岳麓侧背。

五月二十九日电：

第十军（附暂编五十四师主力）固守衡阳，但以一师主力开易俗河，掩护湘潭、衡阳交通线。暂编第二军以主力在渌口、朱亭间，掩护湘江右岸通衡阳之交通线，以一团位置于醴陵，掩护醴陵至攸县之交通线，均归薛长官指挥。但无命令，不得参加长沙决战。

无论幕僚们如何提醒，薛岳认为日军不会一次次地反复进攻长沙，因为从军事上讲这等于在做无用功却要平添伤亡和损耗。薛岳的轻敌令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很是担心。第九战区原参谋长是吴逸志。一九四三年

秋，吴逸志私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去一份关于盟军应加强亚洲战场作战的报告，报告得到了美国军方的重视。吴逸志把这件事电告蒋介石期望得到嘉许，谁知蒋介石回了个“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的电报。随后，在薛岳的举荐下，参谋处长赵子立接任战区参谋长一职。尽管得到了晋升，赵子立和薛岳之间因为作战观点相左，矛盾时有发生。此刻，薛岳固执地认为日军已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攻势作战，无奈的赵子立只能托人直接向蒋介石陈述第九战区即将面临大战的态势。——当日军频繁调动的情报得到证实，战区必须制订作战方案的时候，中国军队内部再次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

作战的第一个预案，是白崇禧受蒋介石指派到达桂林行营后制订的。桂林行营主任为李济深，白崇禧的职责是在那里统一指导第四、第六、第七、第九战区作战。这首先就让薛岳很不以为然，蒋介石莫名其妙的指挥已经很令人厌烦了，现在战区上面又多了一个白崇禧。果然，白崇禧不主张在长沙附近决战，建议将决战地域放在广西境内。薛岳一听就火了：“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把决战地域放在湘桂边境或是广西境内，可以使日军的战线拉得很长，一定会造成日军的严重消耗和补给困难，所以说白崇禧的预案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对攻者来说，像橡皮带子一样，拉得越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它就要绷断。”但是，薛岳因为对白崇禧心怀不满而坚决反对。

作战的第二个预案是薛岳提出的，即根据前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在长沙城下再次复制“天炉”战法。薛岳的方案，受到包括赵子立在内的战区幕僚们的反对，理由是日军再次上当的可能性很小。赵子立认为：敌人在江南江北到处抓夫，水陆运输极其繁忙，其形势与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显然不同。日军兵力很大，仍在长沙照老样子决战，到时候敌人有打内线的，有打外线的，还有预备的，我们难以取胜。可薛岳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调日军东拼西凑凑不来多大的兵力，在长沙城下复制以往的胜利是完全可行的。

作战的第三个预案是赵子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针对日军兵力强大的特点，把他们放进更远的纵深地带，在衡阳附近与之决战相对合理。因为从日军发动攻势的起点新墙河算起，一路南进至衡阳约五百里，日军深入至此补给线必定拉长，便于我军予以切断；同时日军的攻势受到我军节节阻击，抵近衡阳的时间大约需要一个月，这就给我军调集部队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衡阳是交通中心，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的直辖部队，都便于集中至此，衡阳周边

的地形也有利于决战。——从纯军事的角度看，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的方案合理性最大。

但是，蒋介石最后同意的却是薛岳的方案，这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给第九战区下达的作战指导中便可窥见一斑——无论是重庆方面还是薛岳，所确定的作战计划完全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翻版：在湘江东岸的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渌水之间，以及湘江西岸的资水、沩水、涟水之间，节节阻击，消耗日军，待日军兵临长沙城下，钻入中国军队布置的“口袋”里时，部署在浏阳、平江、江西铜鼓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以长沙为轴向左旋转发起自东向西的侧击，将日军压迫在湘江东岸加以围歼，并在日军撤退时全力追击，最后把日军赶回出发地。

薛岳信心满满。

为了实施这一方案，除了从赣北调来鲁道源的第五十八军和傅翼的第七十二军外，薛岳还呈请军事委员会从第三战区调来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从第六战区调来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施中诚的第七十四军、王甲本的第七十九军和李天霞的第一〇〇军，从第四战区调来黎行恕的第四十六军，从第七战区调来黄涛的第六十二军。手里有了这么多的部队，薛岳认为横山勇必在长沙城下重蹈其前任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的覆辙。

薛岳忽视了两个前提：一是日军的兵力不同以往，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中国军队阻击的各个方向，都会出现日军的主力师团；二是他低估了对手的智商，横山勇绝不会愚蠢到按部就班地重复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的失败。恰恰相反，横山勇吸取了孤军深入坚城之下、大军遭受侧翼围攻的教训，部署了强大的作战兵团于主攻方向，务使长沙城在巨大的冲击下无法成为久攻不下之地；同时还专门部署了第十一军中最强悍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于左翼，担负击溃从湘江以东发起侧击的中国军队的任务。另外，横山勇还制订了牵制中国各战区增援部队的详尽的作战方案。——日军于战前不但已经看见了薛岳部署的“口袋”在哪里，而且还看到了这个“口袋”的底部和边缘布满了漏洞。

长衡之战，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

五月二十三日，横山勇和幕僚们从汉口乘火车南下，前往设在蒲圻的战斗指挥所。——“水稻刚插过秧，幼苗约十五厘米尚未扎根，在掠过水面的微风里，软弱无力地摇摆着。”“第十一军战斗司令所以作战室为

中心，分散设在山谷间坡道上间隔五十到一百米的农民家里”。“此处十分寂静，只有双方搜索和联络用的单引擎飞机不太强烈的轰鸣声，会打破初夏芳香的空气”。

横山勇的战斗指挥所向战场推进时，各路日军蜿蜒在湘赣、湘鄂交界处河湖密布的水网地带。二十五日，日军全部抵达攻击出发地：一线部队的西路，第四十师团抵达石首与华容间，步兵第一〇九联队抵达石首以北的藕池口，由独立步兵第五旅团为基干组成的野地支队抵达弥陀寺与闸口之间，由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组成的峰支队抵达藕池口以北的杨林市附近；一线部队的中路，第一一六师团抵达岳州东南的新开塘地区，第六十八师团抵达岳州东北的临湘地区，步兵第二一八联队抵达岳州东北十公里处的城陵矶；一线部队的东路，第三师团抵达崇阳地区，第十三师团抵达崇阳东北的白霓桥地区。二线部队，第五十八师团抵达石首东北的监利与沙市东南的郝穴之间；第三十四师团抵达蒲圻西南的白石铺地区；第二十七师团在武汉集结完毕后改编为驮马装备，将于二十六日车运至蒲圻东北的咸宁地区。

二十六日，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上奏天皇，除了报告前一阶段河南作战的战果外，对即将发动的湖南作战进行了特别阐述：

随着我军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对岳州、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试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现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作出准确判断。

此外，可以判断：本作战与正在进行的缅甸方面的决战是密切相关的，依靠本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加以缅甸北部作战挫败敌方开辟印度支那联络线的企图，从而得以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以保卫皇国疆土的安全。另一方面，对敌方，特别是对重庆政权和美国将使之大为动摇和焦虑。总之，中国派遣军于翌二十七日发动的湘桂作战，虽然预料将是历时很久的作战，其间将有许多变化，但确信在我皇威之下，必能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

五月二十七日五时，东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向中国守军第七十二军的阵地发起进攻；晚上八时，第二一八联队搭乘海军船艇由岳州南入洞庭湖；一个小时后，中路日军第六师团（欠第一〇九联队）和第六十八师团强渡新墙河，向中国守军第二十军阵地发起进攻；三个小

时后，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第一〇九联队、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的两个步兵大队以及独立步兵第五旅团的野地支队，向松滋河东岸的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阵地发起攻击。

面对日军大规模的兵力投入，中国一线守军纷纷告急。

西路日军突破第九十二师的阻击，于三十一日抵近天心湖，然后乘汽艇在大通湖登陆，与从赤山岛北侧登陆的日军会合后攻占赤山岛。战斗中第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团长邹鹏奇因负伤被俘。当日军逼近第九十九军军部所在地益阳时，军直属部队抵挡不住，向东南面的沧水铺、箐华铺、宁乡方向撤退，军部与在湘江东岸担任营田和湘阴防御的第九十九师失去了联系。

中路日军强渡新墙河时，中国守军第二十军在新墙河两岸的姑姑桥、铜鼓岭、七里山和三江口等防御阵地进行了顽强抵抗，一部退守黄岸市、杨林街、龙凤桥一线后继续阻敌，主力则奉命增援东路阻击日军。日军连续突破第二十军的防御阵地，三十日抵近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大荆街、黄谷市一线，负责防守汨罗江的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与日军接战。由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一部乘坐汽艇沿湘江迂回至青泥湾，当晚攻占位于汨罗江南岸的归义，汨罗江中国守军的防线被日军撕开。第十七军留下一部与日军纠缠，主力南撤至上杉市。而第二十军也从新墙河一路退至汨罗江南岸。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在战斗中出现了伤亡，第一三三联队是该师团最强的部队，由联队长黑濑大佐指挥，在攻击汨罗江北岸中国守军阵地时，第三中队中队长塚本助夫等数人战死。在接下来强渡汨罗江的战斗中，日军遇到的阻击更加顽强，第七中队中队长吉川五郎等四名军官、七名下士和三名士兵被打死。六月二日，第一三三联队等炮兵上来后继续强渡，但中国守军是军官学校的学生队，“抵抗极为顽强，尤其是迫击炮射击技术巧妙，战况因此无进展”。其间，联队的几名中队长非死即伤：“第九中队长福原贞行少尉等二十二人战死，第十中队长长谷川勇次中尉等多人负伤。截止本日的战斗，结果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各中队的小队长职务均早由下士官代理。从三十一日以来，在连续两天的激战中，联队虽已突破汨水河畔重庆军的主要阵地，但从开始作战以来不到十天，竟然损失这样多的官兵，联队长黑濑大佐感到异常痛心。”

东路日军突破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三、新编第十五师的防线，二十八日抵近通城外围，六月一日抵近团山铺和长寿街。在日军连续攻占通城、麦市、龙门驿和平江后，新编第十三师绕过日军的攻击线，向北退

至幕阜山区，第二十军部队则撤至平江以南的祖师岩一带。第九战区命令第五十八军和新编第三军第一八三师，火速开赴醴陵一带布防以阻截日军。六月一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进入长寿街，司令部参谋在战地日记中记述道："该地为汨水河谷的要冲，市街正在划区整顿，沿路看不到村民的影子，抗日意识极为强烈。"

二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命令：第四十师团攻占沅江后，以一部向南突击乔口、靖港、白沙洲一线，切断湘江以东中国守军向西的退路，主力于五日开始攻击益阳、宁乡；第一一六师团四日拂晓突破长乐街以南中国守军的防线，向捞刀河以南的黄花市攻击前进；第六十八师团四日拂晓从瓮江附近出发，一部向南攻击金井，然后经上杉市推进到长沙东北方向的春华山附近；第十三师团限七日晚抵达浏阳东北的永和市和蒋埠市，准备向浏阳东南攻击前进；第二线部队第三十四、第五十八师团立即投入作战：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八联队负责歼灭中国军队渡江部队以及湘江两侧的部队；第五十八师团须于七日突击到金井西南的福临铺东西之线。

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部队必须固守长沙、浏阳和衡阳要地：

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

根据蒋介石的电令，薛岳报呈了第九战区准备固守的四个要点：第九十二师固守沅江，第九十九师固守湘阴，第七十七师固守益阳，第一六二师固守三姐桥。——薛岳把防御重点移向了战场的西面，重庆军事委员会随即命令第六战区第二十四集团军全部归第九战区指挥。

但是，湘江东面的浏阳方向首先告急了。

此时，在浏阳以北，守卫汨罗江一线的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在进行了轻微抵抗后已撤至浏阳以东的山区，导致湘江东面的战场上已没有能够阻挡日军推进的中国军队了。尽管西面的第九十九军仍在日军侧后方的青山、乔口、湘阴、营田等阵地顽强抵抗，可对于日军兵力庞大的多路攻势来讲无法形成任何牵制作用。薛岳命令新编第三军第一八三师六日前抵达浏阳东南三十公里处的桐木，命令从第三战区调来的第二十六军星夜兼程赶往萍乡。八日，东路日军逼近浏阳。中路日军突破汨罗江防线后，抵近捞刀河北岸以及春华山地区，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师撤入

三姐桥附近的山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破新开市阵地，抵达捞刀河北岸的桥头；第五十八师团主力推进到汨罗江以南的栗山港，其步兵第五十二旅团攻占湘阴。西路日军攻占沅江后，再占茈湖口，逼近白马寺，中国守军撤守宁乡以南的沩水南岸。

连日倾盆大雨，战场道路泥泞，日军的步兵和车辆在浑浊的积水中行动艰难。特别是负责战场供应的车队为泥水所困，作战物资的接济只能依靠湘江水运。但海军的舰船开辟湘江水道同样艰难，因为中国军队在航道上布设了大量的水雷，海军告诉陆军要将水雷完全清除至少还要十五天。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中美联合空军的空袭，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后方野战医院和辎重部队在轰炸中几乎损失殆尽，而在水路航道上日军投入了一百二十艘护卫船，到八日那天只剩下三十多艘了。

尽管如此，长沙已经近在咫尺。

横山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攻占宁乡和浏阳再进攻长沙。

鉴于前三次的作战失利，横山勇对攻击长沙十分谨慎。他选定的攻城部队是第五十八师团，其官兵大多来自日本九州南部，以性格强悍著称于日本陆军；而他选定攻击岳麓山的部队是第三十四师团，该师团战前特别进行了各兵种协同的山地作战训练。为了粉碎薛岳的“天炉”阵型，他命令西路的第四十师团攻占宁乡，命令东路的第三、第十三师团攻占浏阳。——浏阳和宁乡，于东西两边夹长沙而立，一旦长沙的两翼被日军占领，薛岳的“天炉”就等于失去了炉壁。而中路的第一一六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将避开中国守军的正面阵地向浏阳河畔攻击推进，为攻城的第五十八师团扫清侧翼障碍。这样一来，薛岳的“天炉”就只剩下一个单薄的“炉底”——长沙城了。

被蒋介石放在战场西面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是王耀武指挥的机动精锐部队，蒋介石原指望能在长沙城的西部保持住中国军队主力进出的通道。第二十四集团军九日开赴战场，日军第四十师团正在围攻益阳，王耀武急令第一〇〇军驰援。十二日，当第一〇〇军抵达益阳附近时，守军第七十七师因伤亡过大连夜突围。第一〇〇军官兵在不知守军撤退的情况下开始攻击益阳外围的日军，因日军主力都已南下宁乡，第一〇〇军一鼓作气收复了益阳。在把城防交还给第七十七师后，第一〇〇军开始尾随日军主力南下。

宁乡守军是配属第七十三军的第五十八师。日军十五日突入宁乡城

内，第五十八师抵抗之顽强出乎了日军的预料，激烈的巷战持续四天四夜后，第五十八师仅剩下二百多人，而日军仍旧不能完全控制该城。十九日凌晨，日军主力绕过宁乡继续南下湘乡，尾随日军的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官兵乘机突入城垣，与第五十八师所剩不多的官兵会合了。——在长沙城的西面，尽管宁乡始终没被日军攻占，但日军第四十师团长驱直入，基本掌握了湘江以西战场上的主动。

在长沙的东面，日军第三师团由西面和北面、第十三师团从东面开始进攻浏阳，其中一部日军甚至悄悄绕到了浏阳城南。薛岳命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统一指挥第二十军一部、第一六二师、第九十五师和第一八三师，向日军第十三师团实施反击，两军在浏阳至萍乡之间展开了混战。日军第十三师团不断出现伤亡：第六十五联队第三大队队长永井博大尉被击毙，师团工兵队在中美联合空军的袭击中被炸死二十多人、炸伤三十多人。在强渡蒋埠江时，伊藤联队第二大队遭到中国守军的猛烈袭击，出现严重伤亡后被迫停止强渡，直到第三大队迂回到中国守军的侧背，第二大队官兵才再次跳入蒋埠江内。可中国军队的机枪子弹依旧密集地射来，被击中的日军在因暴雨而猛涨的河水中沉没。中国军队的伤亡也很大，第五十八军派往第一八三师的督战官张天举阵亡，第一八三师师长余建勋负伤。中国官兵苦战到十四日，固守浏阳的第一六二师被迫突围，浏阳城随之陷落。

中路日军的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在春华山附近强渡捞刀河，中国守军暂编第七师因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退守渌水南岸。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则渡过湘江抵近岳麓山的东面和北面；第五十八师团在向长沙以东推进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军队迫击炮的袭击，师团长毛利末广被弹片击中负伤。这时候，在长沙城背后的湘潭，突然出现了一支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黑濑联队，竟然单枪匹马向长沙以南秘密突击。而携带着火炮的这支日军，竟然在中国守军的眼皮底下渡过了湘江。抵达湘潭附近后，发现这里的中国守军已经撤退，黑濑联队未经流血占领湘潭城，甚至还修复了湘潭机场。更不可思议的是，黑濑联队继续向前，占领了石潭城。石潭城濒临涟水，水面上密集地排列着从长沙和湘潭开来的满载着难民和物资的船只，对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日军，难民们目瞪口呆。而黑濑大佐听见北面响起了隆隆炮声，他判断第十一军主力已经开始进攻长沙城了，于是很为自己的行动感到飘飘然：“联想到联队冲进石潭市的重要意义，甚为高兴；同时对湘潭附近的三个师（中国守军）轻易退却，竟放弃长沙背后的防守，致使我抬着火炮步履艰难的联队，一举冲入距易家湾五十公里的石潭市，此实令人不解。”

长沙已被日军四面围城。

薛岳照搬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样式而设计的那个“天炉”，早已破败不堪。——以长沙为核心，日军在东西两面都部署着重兵，阵形散乱的中国军队于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可能发动侧击或夹击，长沙成了铁桶般重围之下的孤城。

或许，此时萦绕在日本人脑海中的，已不再是薛岳津津乐道的“天炉”，而是发生在日军南下作战期间的一件事：美国空军六十八架B-29和B-24轰炸机，从距离八幡市三千二百英里的中国成都机场起飞，于五月十五日深夜猛烈轰炸了日本九州八幡炼钢厂。东京大本营电告日军中国派遣军：“美第二十空军部队（以B-29为主的轰炸部队，司令沃尔福中将驻在中国）是在联合军参谋总部管辖下，由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直接指挥作战的。它不仅对一方面的战场，而且由于续航能力增强，更可广泛用于各方面的战略目标的攻击。这次空袭北九州，是为了全面破坏我工业资源的战略性轰炸的开端。”既然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的目的之一，便是摧毁中国大陆上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美国人此举就如同在催促日本人作战一样。——得知本土落下了美国炸弹的日军第十一军，其攻占长沙的急切已经无法抑制了。

守卫长沙城的中国军队，是隶属第九战区的第四军。该军前身是粤军第一师，一九二〇年由孙中山亲手创建，中国军队中的粤系将领大多出自该部，因此这支部队有“粤军之母”之称。一九二五年，广州国民政府改编军队时，粤军第一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首任军长李济深。该军在北伐战争中参加攻克武昌之役，因战功卓著被国民誉为“铁军”。目前，第四军下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〇二师。因为是粤系将领薛岳的嫡系部队，因此团长以上人选均由薛岳亲自任命。在三个步兵师中，第五十九师和第九十师是粤军的老底子，第一〇二师则是由黔军第二十五军演化来的，论战斗力第五十九师最强，其次是第九十师和第一〇二师。每个师配置三个步兵团，加上配属的炮兵第三旅以及军直属的特务、工兵、炮兵、通信和辎重营，全军共约三万余人。时任军长张德能，副军长柏辉章，军参谋长罗涛溪，第五十九师师长林贤。二师师长陈伟光。

对于薛岳来讲，他并不情愿让自己的老部队第四军固守长沙城。但是，第四军一直驻守在长沙和湘潭一线，日军兵临城下之际让第四军撤下去换上别的部队，薛岳实在说不出口。于是用“第四军善于攻不善于守”为由，启发参谋长赵子立把撤换第四军的话说出来，可赵参谋长就是

不开口。赵子立的用意是：长沙城眼看着要面临苦战，这时候把第四军换下去，薛岳保存实力的做法过于明显，将严重影响战区部队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当初制订作战计划时，自己主张在衡阳与日军决战的建议被薛岳否决，现在如果让第四军坚守长沙，一旦危急时刻来临，再向薛岳提出放弃长沙改在衡阳决战，薛岳为了保全自己的基本部队定会立即同意。

薛岳已经意识到了，这次作战与前三次长沙会战完全不同，至少当面日军的师团和旅团番号就有八九个之多，他并不确信第四军能够守住长沙，更何况长沙的东西两翼都已失去遮蔽。薛岳产生了让战区指挥部撤离长沙的念头，但在撤往哪里的问题上他与赵参谋长再次产生矛盾。赵子立认为将来的战事将向西南发展，战区指挥部应该移动到湘西去；可薛岳坚持要去湘东，理由是“我不去给重庆守大门”！——薛岳因为白崇禧之故，表示“不去给广西看大门”；现在又因为蒋介石之故，表示“不去给重庆守大门”。那么，作为抗战中国的一个战区司令长官，他到底要给谁守大门？

粤系将领薛岳很明白，无论他打多少大仗胜仗，他都不是蒋委员长的黄埔嫡系。

薛岳走了，去了耒阳。

留下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在长沙岳麓山指挥所。

赵参谋长很快就发现，他根本没有指挥权。

第四军的部署是：两个师在城里，一个师在岳麓山。赵子立认为，岳麓山守不住，长沙自然就守不住，因为岳麓山可以俯瞰整个长沙城，所以主张将第四军的主力调到岳麓山来。可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说，薛岳走时有交代，第四军仍归他直接指挥，参谋长要想改变部署，得先经过司令长官的同意。赵子立立即给薛岳打电话，问自己是否可以指挥第四军，薛岳明确表示“你不要指挥它”。赵子立立马火了，问那留他这个参谋长在前线有什么用，薛岳的回答是“你在那里联络”。

既然司令长官已经无心守长沙，赵子立索性只留下一个通信班、一个警卫排以及少量随从，命令其他与打仗无关的人全撤到耒阳去。高级参谋马良骥不愿意走，因为他与赵参谋长是陆军大学第十四期的同学，上校参谋陈驭远也不愿意这个时候离开，还有司令长官部的陈副官，结

果他们和赵子立一起留在了岳麓山指挥所。

大战未始，军心惶惶。

更严重的是，关于长沙的防御部署仍在争吵不休。

五月十七日，为协调防御部署，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和炮兵指挥部三方开了个紧急会议。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次日军兵力强大，主攻长沙的就有两个师团，日军必会吸取前几次失利的教训，把攻击重点放在岳麓山。岳麓山与长沙城隔着湘江两岸对望，但岳麓山的地势高于长沙城，如果守住岳麓山，纵使日军攻进城里，也不算占领了长沙，因为我军火力依旧可以隔江覆盖城内日军；而一旦岳麓山先失守，日军便可居高临下实施攻击，那时的长沙城也就无险可守了。但是，张德能军长坚持他只听薛岳的：“长官叫我以主力守长沙，我只好以主力守长沙。”争论的结果是：步兵依照张军长的意见把两个师放在城里，炮兵依照赵参谋长的意见把重炮集中部署在岳麓山。

长沙守城战最后形成的防御部署是：第一〇二师守长沙北半部，第五十九师守长沙南半部，两个师的防御分界线自小吴门起向西延伸到湘江边，线上属于第五十九师的防御范围，张德能的军部在第五十九师的防区内。岳麓山由第九十师防御，二六八团守岳麓山，二七〇团守船形山，二六九团为预备队配置在两山之间的山口。第九十师师部在湖南大学里，指挥所设在岳麓山山顶。由此，长沙城中国守军的指挥机构分成了两个部分：赵子立参谋长和炮兵指挥部在岳麓山，张德能军长留在长沙城里，两个指挥部中间隔着一条湘江，一开始便是各顾各的局面。

薛岳没有给第四军下达必须死守多少天的指令。

但是，谁也没想到长沙城竟然丢失得如此之快。

就在赵参谋长和张军长还在争执的时候，日军对长沙城的攻击已经开始了。

由于等待海军扫雷部队扫清湘江航道，以便把野战重炮第十四联队运上来，还要等待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扫清长沙外围，所以直到十六日傍晚，横山勇才命令第三十四师团对岳麓山、第五十八师团对长沙城发起进攻。当夜，在飞机和重炮的支援下，第五十八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师的一线防御，第五十九师撤守妙高峰和天心阁核心阵地。而第三十四师团攻占了岳麓山东西两侧的虎形山和牛形山。十七日

清晨，日军新一轮的攻击开始。第五十八师团猛攻天心阁桃花山阵地，天上是成群的战机助战，地面上毒气弥漫，第五十九师拼死抵抗，部队伤亡严重。同时，攻击岳麓山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得到第六十八师团第五十八旅团的增援，中国守军第九十师的阵地遭到左右迂回包抄，守卫燕子山阵地的二六八团官兵死伤过半，岳麓山岌岌可危。

部署在岳麓山上的中国军队重炮群，自战斗一开始就昼夜不停地发射，给攻城日军造成极大的杀伤。日军的重炮部队在向长沙移动途中，不但受到湘江航道里水雷的困扰，更在中美联合空军的空袭中损失巨大，其独立野战重炮第一联队奉命对岳麓山上的中国重炮实施压制，但其炮兵阵地受到十几架美军战机波浪式的轰炸，炮兵死伤惨重，四门大口径加农炮被炸毁，刚刚运上来的堆积如山的炮弹被击中，爆炸声传及数里。日军的重炮部队不顾伤亡，重新开辟阵地后，继续向岳麓山上的中国重炮群开火，双方的炮战令岳麓山陷入一片火海中。

张德能军长这时候才看出来，如果岳麓山丢了长沙城也就完了，于是决定守城的第一〇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各留一个团继续坚守城内阵地，其余主力全部渡过湘江去增援岳麓山。——且不论张军长的醒悟是否已经太晚了，在日军开始向城内涌入的时刻，部队离开现有作战工事进行大规模移动，谈何容易？

中国长沙守军第四军的混乱始于十七日夜晚。

岳麓山上的赵参谋长知道这种移动的危险，紧急命令长沙城两侧的中国军队侧击攻城日军，以缓解城内日军的攻击力度，但此时长沙城两侧的中国军队根本无力攻击。于是，在日军一波接一波的攻击中，第四军的军官们跑到湘江边临时征集船只，在混乱的江边只找到两艘小火轮和十几条满载货物的民船。夜色中，大批中国官兵已涌到江边，人多船少，互相争抢，头顶上是日军战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不少官兵失足落水，船只更是因为严重超载而倾覆——“当时情况危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

就在湘江这边一片混乱时，岳麓山上的第九十师已经支撑不住了。十八日凌晨，日军突破岳麓山船形山的山口阵地，攻上岳麓山山顶。第九十师师长陈侃带着几名卫兵进入密林中，全师剩余官兵则潮水般地向湘乡方向退却，退却中遭遇日军堵截，部队伤亡极重，部分官兵被俘。

渡江而来的第四军主力看见岳麓山已经丢失，便开始自寻出路。第一〇二师在下游找到一些船，除了三〇四团团附张克俭率领的掩护部队未能冲出日军的包围圈外，大部分官兵跑到了湘江西岸。第五十九师一七五团渡过湘江的官兵只有一千余人；一七六团向浏阳方向突围，最后归队的官兵不足一千；一七七团的残部突围至长沙南面的黑石铺，也仅剩下千余人。

午夜二时，军长张德能带领几名卫兵乘一艘小船渡过湘江，到湖南大学的时候已是四时。他疲劳至极，倒头便睡，天明后被人叫醒，报告说部队已经溃退了。——“张闻讯大怒，匆忙跑出湖南大学转弯的公路上，大叫：‘统统回来，不回来，我枪毙你们！’”但是，已经没有人听他指挥、听他叫喊了。

赵子立与岳麓山指挥所的人一起从城南突围而出。

至于被滞留在城里的少量部队，因无法抵挡蜂拥而入的日军，纷纷四处突围逃生。

这是十八日清晨，距日军发动攻城战仅一天两夜。

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文件对长沙城这一刻的记述是：“十八日晨，增援部队始得渡江，斯时敌已突破竹山，冲至岳麓山，袭击我炮兵阵地。未及布置，桃花山亦告失守。适于战斗指挥所，尚未预备，增援部队渡河未毕之际，岳麓山核心阵地已失，四面受敌包围，无法支持战斗，乃被迫退出岳麓山。其后复被尾击，队伍星散，无人掌握，直溃退至邵阳，始得收容位数不及四千。而残留长沙之四个团，于是有一部分千余，由北门冲出东山，沿途与敌战斗，退至茶陵归二十七集团军欧副总部收容、指挥。”

长沙城沦陷了。

日军从开始攻城直至全部占领仅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第四军在守城期间伤亡三千余官兵，渡江时淹死一千多官兵，残留在城里的部队最后突围而出的仅千余人。岳麓山上中国守军的重炮四十余门、野战炮九门、美式山炮十二门全部损失。全军步枪损失了百分之七十，轻机枪损失了百分之八十，重机枪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所有的迫击炮、通信、防毒和工兵器材全部损失。

有“粤军之母”和“铁军”之称的第四军几乎全军覆灭。

二十日，日军第十一军对长沙作战的战果进行了初步统计：中国军队战死三万五千四百人，被俘多达十一万一千三百人。日军战死一千五百零三人，其中军官一百零一人；负伤三千六百六十二人，其中军官二百二十五人。

第四军战后总结的“失败主因和责任问题”如下：

一、教育方面：

A军自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驻防长沙以来，因修筑工事，部队教育无暇顾及。

B平时教练偏重基本教练，战斗动作生疏。

C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不精。

D师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

二、军纪方面：

A平时管教疏忽，虚图表面，实则官兵骄傲任情，对上级阳奉阴违。

B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致使部队精神不能团结。

三、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B军部副官处负责控制船只，该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五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

C城防团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与警备部官兵，以强迫疏散为名，大肆发洋财。

D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

四、战术方面：

A兵力薄弱，并无控置预备队。阵地、据点被敌突破后，无兵增援，重点无法形成。

B固守防御，并无逆袭计划。当敌由竹山口突入，冲上云麓宫时，无法歼灭，致使敌得以少数兵力，直捣我司令部核心，击破我指挥所。

C步、炮协同不良，以致炮弹时落我第一线阵地中。

D无空军助战，一任敌昼夜摧毁我炮兵阵地。

五、责任问题：

A军参谋长罗涛溪，未能辅助主官（张军长决心渡河时，并未拟定渡河计划，即饬迥日拂晓进袭），战斗间未派员视察阵地，获得紧急情况，又不指示部下办理。

B九十师长陈侃，十时许失守岳麓山阵地，部队溃散。

C军部副官处长潘孔昭，派赴交涉船舶失职、舞弊，以致是夜渡河困难、迟滞。

以上报告显然避重就轻。

且不说严重轻敌、部署不当、协同混乱、战力薄弱、斗志销蚀，仅就一支军队而言，军官忙于“营商应酬”，部队只顾“虚图表面”，危急时刻甚至能够勒索百姓“以饱私囊”，官兵皆无心作战却“骄傲任情，对上级阳奉阴违”，这样的状态和境况怎么可能不打败仗？！

可是，白崇禧还是亲自向蒋介石为张德能军长说情：“窃查张军长在四军服务多年，向以勇敢著称，过去北伐……此次抗日，无役不从；尤以第三次长沙会战，协同友军侧击攻城之敌，因而获得胜利，厥功尤伟。此次守备长沙，因有种种原因，未能尽持久防御之责，恳请钧座体念前劳，从轻议处，无任感祷。”

但是，蒋介石还是把张德能军长枪决了。

同时被枪决的第四军军官还有：第五十九师一七七团团长杨继震、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军军务处处长刘瑞卿、军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所长夏德达。

关于第四军的三个师长，薛岳呈报的意见是：“九十师师长陈侃于岳麓山作战不力，指挥无方，遗弃部队，个人逃生，拟请先行撤职，发交军法处执行监部讯办。又五十九师师长林贤察、一〇二师师长陈伟光，于长沙渡河至岳麓山时，均未掌握部队，致不能战斗，拟请各记大过两次。”蒋介石的批复是：“此三师长皆应革职交军法审判，以重军纪为要。”于是，第四军的三个师长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长沙城失守后，按照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先例，日军应该向北回撤，恢复原来的对峙状态。此时中国第九战区主力，大多位于长沙两侧的山区里，按照薛岳的战前计划，当日军回撤时中国军队应对撤退中的日军发动侧击或尾击，以恢复原来的阵地。但是，攻占长沙的日军不但没有转身回返，还在保持占领地的同时大举南下了。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衡阳。

攻占衡阳是战前日军第十一军的预定目标，因此在第三十四师团和第五十八师团攻击长沙城时，横山勇已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向衡阳突进：中路的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渡浏阳河南下，抵达株洲及其以东的清江铺地区，然后沿湘江两岸快速推进直趋衡阳；东路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占领浏阳后，经过醴陵大距离地南下，向衡阳以东、以南的攸县、安仁、耒阳方向推进；西路的第四十师团攻占宁乡后南下湘乡，向衡阳以北、以西的永丰、渣江方向推进。横山勇认为，衡阳一战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击退中国第三、第六战区的援军。他知道在攻占长沙的作战中，薛岳的野战部队并未被完全歼灭，目前大部还在湘赣边界的山区里，显然在等援军抵达后再次对日军发起攻击。为此，横山勇特别强调必须保持东西两翼的攻击力度。

二十日下午四时，横山勇下达命令：

第一一六师团应以主力经易俗河、白果市、两路口（衡阳西北二十九公里）附近，向衡阳西南地区挺进，就地歼灭敌军，占领衡阳。

第六十八师团应继续执行以前任务，歼灭所在之敌，迅速占领粤汉铁路及衡阳机场，攻取衡阳。

第二一八联队应溯航湘江，协同第六十八师团，力谋完整占领涞水、耒水及衡阳东侧铁道桥，并应协助第六十八师团渡河。

第十三师团应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以主力围歼萍乡附近之敌，另

以一支有力部队向攸县方面挺进，根据情况，再以主力向攸县方面挺进。

第四十师团一经占领湘乡附近，即行扫荡附近残敌，并做好在益阳及永丰方面作战的准备。在长白湖南侧地区及朱良桥附近部署部分兵力，以加强湘江的运输。

第三十四师团应以主力迅速渡过湘江，扫荡湘江以东的翎坑一永安市以北和永安市一金井一爱江市以西一带残敌，并摧毁达摩山周围敌军据点。

第五十八师团应迅速协助在长沙及湘潭附近设立机场。此外，应直接掩护从渌口到湘江下游的运输，并应确保长沙岳麓山及湘潭附近一带。

第三师团应以主力经上栗市附近，搜索并围歼萍乡以南地区之敌，随后在萍乡南部地区集结，以部分兵力仍留驻浏阳附近，与第二十七师团的先遣队相策应，围歼浏阳北侧地区之敌。第二十七师团应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以松井大佐指挥的部队与第三师团的一部相策应，围歼浏阳北侧地区之敌。

同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向第九战区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

二、王副长官（王陵基）指挥七十二军、五十八军、二十六军，速击破醴陵东北地区之敌，攻击敌主力之左侧背。

三、杨副长官（杨森）指挥二十军、四十四军，先击破醴陵以北地区之敌，而后转移于王副长官所部之左翼，协力向西攻击敌人。

四、欧副总司令（欧震）指挥三十七军、暂编第二军及第三师，在渌口、衡山间坚强持久抵抗，阻敌之深入。

五、王总司令耀武指挥七十三军、七十九军、九十九军、一〇〇军及第四军之残部，向湘江左岸之敌攻击，但以一部守备湘乡。

六、李副总司令玉堂指挥十军、暂编五十四师，固守衡阳。

七、第七战区开来之六十二军，仍归本会直辖，控置于衡阳西南地区待机。

中国方面采取的是当面阻击、东西夹击的战法。

横山勇结合空中和地面传来的情报，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图作出了正确判断，随即令东西两路日军迅速推进，加强醴陵和宁乡的两面作战，以掩护中路日军向衡阳逼近。

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二十日攻占醴陵后，一部分兵力继续南下，主力则向东攻击准备实施夹击的中国军队，并迫使第五十八军和第七十二军向东退却。二十二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占领萍乡。第三师团渡过浏阳河后，在刘公庙附近重创中国守军第二十六军，并在萍乡以西击溃中国守军第五十八军。第十三师团参谋部判断的战果是：对萍乡周围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第五十八军的打击，“都达到了歼灭的程度”。十九日，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攻占宁乡后，击退中国守军第七十三、第七十四军的阻击，于二十二日占领湘乡。中路日军主力第一一六师团十九日由株洲附近渡过湘江，然后兵分两路，沿着湘江西岸以及易俗河向衡阳急进；第六十八师团在第一一六师团的东侧渡过渌水，突破中国守军暂编第二军的防御阵地，沿着湘江东岸扑向衡阳。

此时，沿湘江东西两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均被击溃或陷于被动，重庆军事委员会试图两面夹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已无法实现。

日军逼近了衡阳。

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衡阳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

你第十军常德之役，伤亡过半，装备兵员迄未补充，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战之重任。此战，关系我抗战大局至巨，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再次国难当前，人人奋发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个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我规定密码二字，若战至力不从心时，将密码发出，我四十八小时解你衡阳之围，你是否有此信心？

方先觉向蒋介石表示，第十军将“不惜任何牺牲”，一直战斗到死而后已，誓与攻城日军决一死战。

二十三日凌晨，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抵近衡阳市郊。

按照第十军的预定计划，军工兵营营长陆伯皋按下了炸桥的电钮一花费巨资修建而成，位于衡阳市郊的湘江大桥，事先已被中国工兵安放了价值上百万元的炸药。一声巨响之后，大桥断成数截。

中国抗战史上异常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自此开始了。

第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一营负责据守耒水的新码头据点。当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南渡耒水时，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日军，按照预定防御方案，一营本可稍作抵抗后退至身后暂编第五十四师的阵地上，但营长杨济和认为，初次接敌不战而退，会灭自己的威风长敌人的士气，决心强硬地打一下。微明的天色下，日军的数十艘木船和橡皮艇满载着步兵开始强渡。一营官兵在日军半渡之时突然开火，六门战防炮和二十多挺轻重机枪打得日军猝不及防，人仰船翻，未死伤的日军狼狈不堪地退了回去。整整一上午，日军多次发起强渡，但均被击退。战斗中，包括战防炮连副连长王惠民在内，一营军官伤亡七人，士兵伤亡五十余人，但日军的伤亡远大于此。下午，日军开始实施左右迂回，一营因腹背受敌被迫后撤。

十四日，日军战机疯狂轰炸了衡阳机场和市区。拂晓，渡过耒水的日军开始攻击外围的五马归槽阵地，第一九〇师五七〇团奉命紧急增援。五马归槽阵地被日军的炮火覆盖，城内的中国守军炮兵开炮还击，炮弹在湘江江面上密集交错，呼啸声、爆炸声震耳欲聋。双方在五马归槽阵地上反复冲杀，五七〇团团长贺光耀身负重伤，团附冯正之接替指挥。鏖战至二十五日正午时分，中国守军转移到范家坪、橡皮塘、莲花塘和冯家冲阵地。日军一部由东阳附近渡江西进，五六八团的阵地被突破，日军遂攻入衡阳机场。第十军搜索营一连组成机动部队，出城渡过湘江增援机场，晚上该连对当面日军发动攻击，恢复了一个小高地。不料午夜时分，日军前来偷袭，砍伤了站岗的两名中国士兵。排长杜有才大怒，认为日军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很不地道，他跑到山脚下的民房里，找来数支湖南山民用来打野猪的标枪，带上五名精壮的士兵，手持标枪，腰插手榴弹，决心摸上日军的阵地实施报复。——“约一小时后，忽听敌阵一阵大乱，呐喊声、大叫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凝成一团，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约三十分钟后，杜排长及随行士兵均安然返回，每人军服湿透，满身泥浆。杜排长兴奋地将标枪插在地上，枪杆摇摆不停，他开始向我报告说：‘报告连长，我们赚啦，鬼子摸哨砍伤了我们兄弟两名，我们连刺带炸，最少也杀死了他五六名。’”

二十六日，日军炮兵在衡阳城的西面和南面开设了阵地，然后向城内中国守军阵地实施猛烈轰击，步兵同时向城垣附近的警戒阵地发起冲锋。日军把攻击重点放在了预备第十师据守的丘陵地带，三十团据守的江西会馆、五桂岭以及二十九团据守的虎形巢阵地战斗最为激烈。日军数次突至阵地前沿的障碍物附近，均被中国守军的火力击退。三十团枫树山和张家山阵地南侧的停兵山和高岭据点，是整个阵地的战略支撑，团长陈德坒专门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七连据守。七连连长张德山率主力守停兵山，排长李建功率一排守高岭。两个据点四周环绕着地雷、铁丝网和深壕，据点内还囤积着大量的手榴弹。日军贸然突入被击退后，又连续数次强攻，并传唤战机和炮火支援，但激战到黄昏中国守军阵地仍在。七连虽然伤亡过半，但日军横陈在据点前的尸体也有百具以上。湘江东岸的第一九〇师五六九团，对突入衡阳机场的日军实施了反击，双方均伤亡很大，但中国官兵最终未能夺回机场。

此时，湘江两岸的外围主阵地都处在日军的猛攻下。军长方先觉对战况进行了判断：湘江东岸的第一九〇师和临时归第十军指挥的暂编第五十四师的一个营，加起来兵力已不足两千，隔着湘江陷于日军的轮番围攻，有被全歼的危险；而沿着整个衡阳以东城郊，与日军苦战的部队不足五个团，防区过于宽大，不易集中兵力。方先觉决定将湘江以东的部队全部撤回衡阳城内。

二十七日，李建功排长防守的高岭阵地上枪声停止，一排官兵已经全部阵亡。三十团在江西会馆、五桂岭、一四一高地和枫树山阵地上依旧苦战不休。双方战机飞临阵地上空助战，一架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被日军地面炮火击中，迫降在高岭与停兵山之间的水田里。停兵山上的七连连长张德山派排长王三禄带领六名士兵冒死冲下山去营救飞行员。冲击的过程中，王排长和三名士兵被日军拦截的子弹射中阵亡，但迫降负伤的中国飞行员陈祥荣最终被另三名士兵抢了回来。——预备第十师三十团于衡阳城外围苦战不休，无惧生死，重庆军事委员会当日宣布颁发陈德坒团长忠勇勋章一枚。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已从三面包围了衡阳城。两个师团所属部队的攻击位置是：第六十八师团独立步兵第六十四、第一一六大队位于湘江以东的衡阳机场附近；第五十八旅团位于湘江以西的衡阳南郊；第一〇九、第一二〇联队以及炮兵第一二二联队位于衡阳城西南；第五十七旅团位于衡阳西北的小西门、体育场和蒸水桥。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西岸，既能倚靠湘江水路，又为粤汉铁路和湘桂

铁路的交会点，是中国第九战区的战略基地之一。抗战爆发后，从上海和汉口等地迁移至此的工厂，围绕着城区于湘江岸边密集林立。由于这里是通往西南数省的通道，一旦丢失，日军便可继续向广西南宁推进，切断黔桂铁路和公路，封堵通往川、滇、黔的通道，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将面临物资供应的枯竭。

日军逼近衡阳时，城内居民已被命令出城避战，如今偌大的城区内只有方先觉的第十军官兵。中国陆军第十军组建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参加了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在常德会战中伤亡惨重，长衡会战爆发前仍处在整补中。此时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〇师和预备第十师，主要军官是：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方先觉的守城部署是：第三师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守衡阳西郊，第一九〇师守衡阳南郊，临时归属第十军指挥的暂编第五十四师守衡阳北郊。

相比守卫长沙城的第四军，第十军的兵力少了一半：第一九〇师是后调入的部队，全师仅五七〇团是完整的，其余两个团仅有军官没有士兵；第三师的一个团尚在衡山附近；临时配属的暂编第五十四师也只有个团。炮兵更是由第四十八师的一个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一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一个野炮连临时拼凑而成，全军加起来兵力约两万左右。

军直属炮兵营营长张作祥是条血性汉子。战前他奉命率领全营去昆明领取新装备的美式山炮并接受训练，训练结束后带着六门新式火炮往衡阳赶，谁知走到桂林时被炮兵第一旅截留了，全营都被编入该旅序列。参战心切的张营长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下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终于获得立即归队参战的批准。在距衡阳还有三十多里时，张营长碰上了第十军的老军长、现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的李玉堂，因为此时的衡阳已面临日军重兵压境，李玉堂怕在入城过程中新式火炮被日军抢了去，于是令他们留下来归他指挥。张营长不愿意，非要冒险进城，要与自己的部队生死在一起。为了说服副总司令，张营长把三位连长召集来说明他的主张，三位连长当即指天发誓，同样愿与全军官兵共存亡，人存炮存人亡炮毁，决不反悔。李玉堂无奈只有批准。炮兵营官兵冒死往衡阳城里冲，三十多里的路途遇到多次遭遇战，最后竟连人带炮全部冲进了衡阳城里。——明知九死一生而固执如此，第十军的军心和意志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对衡阳城的总攻开始。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同样是动用两个师团联合发起攻击，而守城的中国军队依旧是一个军，且从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讲，衡阳城内方先觉的第十军远不如长沙城内张德能的第四军，因此攻城过程必如长沙一样绝不会超过两天。

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大大出乎了横山勇的预料。

衡阳不是长沙。

衡阳之战将以血流成河般的惨烈载入中国抗战史。

日军的攻击一开始，便有一举拿下衡阳城的气势，各路部队对中国守军实施无休止的轮番冲锋，衡阳城三面都陷入了昏天黑地的搏杀中。日军采取的是先战机轰炸和火炮轰击，然后施放毒气，等中国守军阵地呈现出半瘫痪的状态时，步兵便发起潮水般攻击的方式。而中国守军则在日军轰炸和炮击时蛰伏在散兵坑或掩体中，忍受着爆炸的地动山摇以及毒气在阵地上弥漫飘散，等日军的炮火延伸时他们才纷纷爬出来，向涌上来的日军猛烈开火，在阵地前沿与日军展开刺刀战和肉搏战，然后高举着成捆的手榴弹实施反击。这样的反复，一轮接一轮，昼夜不停，直杀得所有的阵地上尸横累累。

第三师七团据守的城西阵地地形平坦，日军的平射炮可直接瞄准守军的地堡，加之日军战机的轰炸，地堡内的守军已伤亡过半。二十九日，日军突入庙前街，一营营长许学启率队反击，与日军展开巷战，许营长战死后，营附穆鸿才接任指挥。七月一日晚，日军突破三营据守的瓦子坪阵地，团长方人杰指挥二营数度发起反击未能收复。师长周庆祥大怒，当即将三营营长李桂禄就地枪决，将团长方人杰撤职查办。三营仅剩的一百三十名官兵集合在一起，表情悲愤，要求仍用三营的番号在新任营长王金鼎的带领下与日军决死一拼。

第三师九团一营的阵地依托蒸水，不利于日军攻击，二连的辖神渡据点遂成为日军选择的突破口。二连在日军攻击的当天拼命阻击，令日军遗尸百具未能得逞。二十九日午夜，二连连长苏毓刚阵亡，排长黄宗周指挥仅剩的二十余名官兵，一直血战到七月二日全部殉国。在蒸水岸边的来雁塔和望城坳据点坚守的是三营，官兵背水而战，誓死不退，给当面日军极大的杀伤。二十八日正午，九连连长许健和两名排长先后阵亡，望城坳阵地被日军突破，营长孙虎斌和七连连长周炳生率队反击，反击中周连长阵亡，排长张志贞接替指挥。同日，八连据守的来雁塔阵

地也被日军突破，团长萧圭田严令孙营长反击，孙营长派工兵冒着日军的弹雨炸毁了蒸水水面上的石桥，日军的冲锋受阻。

二十八团为预备第十师预备队，团长曾京，一营营长赵国民，二营营长余龙，三营营长李若栋。日军全面攻城开始后，二十八团官兵向师长葛先才要求上前沿，理由是：“我二十八团在此役中应该死些人，这样才心安理得。”二十八团上去了！在江西会馆外新街与五桂岭南段阵地，三营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据守阵地整整两天，阵地一角被日军突入后，李若栋营长率队逆袭，至少把二百多名日军打死在阵地前。李营长左腿负伤后送，二营营附翟玉岗接任。三十日，日军再次对据守五桂岭的七连阵地发起进攻。翟营长用电话与七连联系，无人应答，随即派预备队冲上阵地，阵地上的情景令人心惊：七连除了当时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三名炊事兵外，全连包括连长朱中平在内的八十余名官兵全部中毒身亡。——日军罔顾国际法，屡屡在作战中使用毒气，中国军队虽有防范，但数量不多的防毒面具不敷分配。军长方先觉把所有的防毒面具集中起来送往一线，但也仅可供机枪手和作战班长使用，大部分士兵在毒气袭来时只能用浸湿的毛巾掩住口鼻，但这一方法在浓度极高的毒气面前没有效果。那些中毒者往往浑身水疱大如银元，四肢麻痹，不能直立，陷入昏迷后很快死于窒息。

日军要为他们的疯狂和残忍付出代价！

二十八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在望远镜中发现正南方八百米处，有一群日军军官正在指指点点，当即命令全连的八门迫击炮集中射击。第一波射击命中目标，敌群大乱；接下来的两波射击，日军军官全部被炮火覆盖。——事后查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正在召集部队长开会，在二十八团的炮火下，佐久间为人师团长、原田贞三郎参谋长、松浦觉参谋以及数名部队长均被炸倒在地。——在总攻衡阳的第一天，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指挥系统就瘫痪了，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命令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统一指挥攻城部队。

二十九团阵地前有丘陵断崖，易守难攻。三营的范家庄阵地前是片开阔的水田，侧面有峭壁，日军在水田中跃进的时候，因受到猛烈的火力打击而伤亡惨重，好不容易蹿到峭壁下，头顶上又落下雨点般的手榴弹，范家庄阵地数日内无恙。但是，在同样地形的虎形巢阵地前，日军却不顾一切地昼夜猛攻不止。虎形巢阵地是一座孤立的山包，正面的水田约有二百多米宽，阵地前设置了大量的障碍物，峭壁下则是手榴弹的投掷区。这里的守军是一营三连，连长梁耀辉。由于是打开突破口的必

经之地，日军连续数日进攻失败后，一度因伤亡严重而停顿，但很快就在增强了炮火打击力度后再次发起连续不断的冲击。日军每次冲击均是百人以上的规模，三连官兵打红了眼一样就是不让日军前进一步，虎形巢阵地峭壁下尸首重叠。三十日夜，天降暴雨，一股日军于障碍区缺口处潜入并跳进外壕，搭人梯攀登峭壁，突入中国守军阵地一角，占据了三座碉堡。梁连长立即率领官兵反击，双方在雨夜里混战成一团。在日军后续部队冲上来之际，营长劳耀民率部赶到，他一面阻击日军的后续部队，一面派出战斗小组对突入的日军进行清剿。闯入阵地的日军大部被击毙，仅剩的日军死守两座碉堡顽抗。梁耀辉连长率领官兵发起最后的突击，梁连长中弹阵亡后，一营的官兵轮番向两座碉堡攻击，将碉堡里的日军全部打死。天亮后，日军发动报复性攻击，兵力达到数日以来的最大规模。一营官兵在硝烟火海中苦战竟日，伤亡过半，弹药不济，入夜后阵地大部被日军攻占，但营长劳耀民依旧指挥部队坚持在阵地的东北角。凌晨三时许，二营营长李振武率部增援，由东向西对日军实施反击，黎明时将阵地大部分收复，日军留下数百具尸体溃退，而此时一营幸存兵官不足百人。

就预备第十师的防区而言，三十团的阵地受到的攻击最烈。该团防守阵地位于湘桂铁路修械厂附近，枫树山和张家山是两个最坚固的据点。特别是张家山，由于部位突出成为整个防御线的支撑点，日军不攻占张家山便无法接近预备第十师的核心阵地。二十八日，日军攻击张家山阵地的前沿支撑点停兵山。自张德山连长指挥七连防守以来，该阵地始终处于日军的连续攻击下，多层障碍物被摧毁，工事坍塌，弹药告罄。当日军再次攻上来时，七连只剩下包括张连长在内的四人。最后时刻，师长葛先才命令他撤回主阵地，张连长在电话里向师长报告了战况，然后表示自己要与日军拼到死。葛师长再次命令他后撤，张连长的一番话令葛师长热泪滚滚：

师长！不必了！我之死，一则以报国，一则以报师长这些年来爱护栽培之恩。自认如此结束此生，公私咸宜。我母早故，老父有二胞弟赡养，我应去阴曹地府侍奉母亲。再则，只因敌人太多，我弹无虚发，杀个痛快。我宁愿被敌人刺刀插入胸膛，而不愿意在撤回途中被敌弹由背后射入。就算能撤回主阵地，还是要与敌拼个偕亡。两个方式一个结果，那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师长！本连官兵之死不会无代价的，敌人必须付出数倍于我之死亡。刻下，我只有一个愿望，我这支木壳枪还有六十发子弹，希望能全数射出而后死！哦！师长！敌人快冲上来了，官兵枪支已上好刺刀，正在投掷手榴弹，我要去参加战斗！师长保重！

电话中断后不久，停兵山阵地上的枪声停止。

中国军中的一条好汉，让敌人横尸在他的面前后，到另一个世界侍奉母亲去了。

张家山阵地由三个小高地组成，东南面是二二七点七高地，西北面是二一一高地。两个高地分别被日军称为“X”高地和“三三”高地。张家山主阵地在中央后方一百五十米处。日军在总攻开始后，向张家山阵地发动了数十次进攻，伤亡很大却未能攻占。为了拿下张家山，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投入了最强悍的第一三三联队——黑濑联队。在停兵山阵地丢失后，防守张家山的二营伤亡已达百分之七十，营长徐声先阵亡，团附甘握接替营长指挥作战。三十日夜，日军再次猛扑上来，两军在暗夜中混战，陈德垫团长亲率一营预备队和团直属队赶来增援，最终把日军赶了下去。黑濑联队夜袭失败后，七月一日凌晨，把全联队的二十四挺机枪和数十门火炮集中起来，对张家山阵地实施猛烈轰击和扫射，之后联队的步兵倾巢而出：

第一大队在火力支援下，奋力进击。右第一线的第四中队（中队长米井高雄中尉于拂晓准备进攻时战死，现有小队长田中清准尉等三十余名）和左第一线的第三中队（小山长四郎中尉等约三十名），各带竹梯，在阵地展开肉搏……然而，第四中队预先接到从阵地右面突出角附近冲入的指示，可能是为了避开来自突出角以东高地方面的侧射，而迫近阵地中央凹角（突出角西北）的崖下，竟遭到从该凹角堡垒背后和右后方的灌木丛中集中投来的手榴弹攻击，瞬间中队完全被硝烟所笼罩。从硝烟的间隙，可以看到上边灌木丛中连续投弹的重庆兵。由于双方过于接近，不能进行炮击……左面的第三中队也在悬崖山上架起梯子，小山中尉正要登上梯子的一刹那间，又遭到从上边阵地集中投来的手榴弹攻击，整个中队立刻被白烟所包围。转瞬间，这两个离眼前最近的中队，从联队长的视野中消失了。至此已无计可施，联队长和炮兵队长只有默祷部下的平安。稍时，爆炸停止，白烟渐渐扩散。第四中队全体伏卧不动，想是全部战死了……第一次的冲锋因重庆军手榴弹兵的攻击而受到挫折，深感痛心……这时大陆正值盛夏，火般的太阳冉冉上升。联队长看到敌前附近焦土上倒卧的死伤士兵，心如刀绞。

天黑后，黑濑联队发动夜袭，岂料失败得更惨：“参加夜袭的干部，屡经战斗，差不多全部战死，幸存者一大部负伤。”仅阵亡的军官就有第一大队队长大须贺大尉、第五中队小队长山下芳信少尉、第二机枪中队小队长鹫野升少尉；而负伤的有第二大队队长足立大尉、第五中队代理

队长石松三男少尉、第七中队代理队长高山成雄少尉和第一大队代理副官安藤旭准尉。

七月二日上午，日军向张家山中国守军阵地施放了毒气，然后黑濑联队向张家山前面的两个高地进行最后突击。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的指挥所距离第一线前沿不足七百米，距离三十团团部不足三百米。葛师长知道陈德坒团长手里的预备队所剩无几，因此他指派工兵连和搜索连向张家山增援，自己则率领参谋人员向三十团团部靠近。两个高地上中毒昏迷的中国官兵，在日军冲上来时做了最后的搏斗：一营营长萧维、营附赵毓松负伤，二连连长刘铎铮、三连连长应志成阵亡，全营排长仅活下来一人。增援的工兵连连长黄仁化负伤后，拉响手榴弹和日军同归于尽；搜索连排长王振亚与日军滚在一起肉搏时阵亡。

就在中路日军猛攻衡阳时，东路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连续攻占攸县、安仁，进抵耒阳；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攻占了衡阳西北三十五公里的渣江。衡阳城的四面都已被日军围死。

只是，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衡阳的总攻已经进行整整五天，除攻占了张家山前面的两个小高地外，各部队仅仅向前推进了不足千米，却付出了伤亡数千人的代价，且弹药已近消耗殆尽。烈日之下，战场上尸臭冲天，不得不每隔两天焚烧一次，战况的惨烈和胶着令横山勇不知所措。看来，必须要重新审视眼前的这座中国城市以及守城的这支中国军队了。

七月二日，横山勇下令暂停进攻。

横山勇向东京大本营强调了由于他的部队推进过快从而导致补给跟不上等客观原因，对于攻击衡阳城失利的具体原因他列举了以下三点：一、地形（各处有无数池沼）和坚固阵地（侧射火力猛烈、敌军抵抗顽强）；二、缺乏弹药；三、敌空军处于优势。——“在此情况下，如再继续进攻，损失恐将更大。”

横山勇将再次发起攻击的时间，定为九天后的七月十一日。

在张德能的第四军仓皇丢掉长沙后，方先觉的第十军在日军同样的重兵围攻下，不但守住了衡阳城，且给日军以极大杀伤，全国舆论不禁惊喜若狂。蒋介石发表通电，嘉勉第十军的作战精神并奖励有功人员。重庆的《大公报》特刊登消息：

据军事委员会七月七日发表战讯：在保卫衡阳恶劣战斗中，我某师师长葛先才将军亲率所部，亲冒毒气，恢复张家山阵地有功，政府特颁给青天白日勋章，并记大功一次。其关于参加该役作战之各连长、各排长、各班长亦各颁忠勇勋章一枚，并各记功一次；并对守城之忠勇奋斗卓著勋劳全体官兵，亦奖励有加。

这份《大公报》被空投到衡阳城内。

无法得知历经五天五夜残酷血战的第十军官兵看后心情如何。

蒋介石接下来的电令是：第十军“务必再奋神勇，固守两星期，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以完成歼灭敌人，造成空前湘中大胜利”。

战前，蒋介石赋予第十军的任务就是固守两个星期，为此第十军准备了半个月的粮弹。从六月二十三日衡阳外围战开始，直到日军第一次攻城战暂停的七月十日，战斗已经进行了半个月以上，第十军的步枪子弹消耗了百分之六十，手榴弹消耗了三分之二，迫击炮弹消耗了百分之八十，山炮弹已消耗殆尽。然而在这半个月期间，不见外围有任何解围动作，更不见任何一支援军到达，第十军孤军伴孤城如何能再“固守两星期”？更严重的是，由于日军连续的轰炸，衡阳城在燃烧的大火中已成一片废墟，第十军的给养极为匮乏，只能用米仓里烧焦的大米充饥。虽然曾经得到过空投，但市区和城郊阵地面积狭窄，大多数空投物品不是飘到了日军阵地上就是落到了湘江里，且空投的物资除刊登嘉奖令的报纸外，大多是毛巾、肥皂、香烟和万金油之类的东西，没有急需的弹药、药品和食物。城内一个酱菜园里的酱菜，已成为第十军官兵唯一的佐餐食品，但大酱缸在日军的轰炸中破裂，酱菜满地，群蝇乱舞，蛆虫蠕动，食之腹泻不止，不少官兵因此身亡。更为悲惨的是遍地的伤兵，日机轰炸时无法隐蔽，眼看着炸弹落下来后血肉横飞，仅第十军野战医院里被炸死的伤兵已达七百多人。还有更多来不及转运医院的伤兵，在残垣断壁下、在炸弹坑中、在少量的防空洞和临时构筑的隐蔽部里呼号呻吟。没有药品也没有卫生材料，医护人员只能每日用盐水为伤兵擦洗伤口。在江南夏季的酷热天气里，伤口往往迅速溃烂化脓，伤兵们除了等死别无出路。

对于日军第十一军来讲，最大的困难也是弹药的接济。通往衡阳前线所有的大路都已被中国军队破坏，连日的大雨使得残破的土路难以通行，况且各个方向上都有中国军队在骚扰，依靠陆路补给希望渺茫。湘江航道虽然被打开，可水道上中国军队布置的水雷不计其数，触雷的情

况频繁发生，加上中美联合空军持续不断的轰炸，水运的速度也极其缓慢。根据这一现实，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向横山勇提议，在等待弹药补给、整理部队、增加兵力期间，可以制造日军要从衡阳撤退的假象，这样一举两得：一是不要让中国方面破罐子破摔放弃衡阳，给他们点守住衡阳并收复失地的希望，从而把中国军队主力吸引在衡阳附近，以便将其围歼后向桂林挺进，完成整体作战计划；二是当衡阳城里的第十军误以为日军已经撤退时，必会向城外出击，日军便能一举歼灭之。

实际上，衡阳城里的第十军已无力向城外出击，方先觉军长自然没有上当。但事后证明，重庆方面却被日军停止进攻的假象所迷惑。从军事常识上讲，日军在攻击衡阳失利后，粮弹匮乏，伤亡累累，士气动摇，这本是中国军队主力大举反击的最佳时机，但重庆方面却寄希望于等待日军撤退时再实施追击，因此丧失了解围衡阳并重创日军的战机。——至此可以看出，重庆方面对日军策划的庞大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尚不甚明了。

七月十日，后方运来的火炮和弹药抵达衡阳前线。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新任师团长堤三树男到任。

日军航空部队准备完毕。

十一日，日军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攻击开始。

在城西，第三师七团一营据守庙前街，二营据守青山街和县立中学，中国守军的阵地连日遭到日军猛烈的轰炸和炮击，日军地面部队再次施放大量的毒气，二营营长谢英阵亡，该团团附侯树德接任。接着，二连连长储壁畲阵亡，继任连长戴楚威率领部队反击。日军战机投下大量的燃烧弹，戴连长和众多士兵极端痛苦地阵亡于熊熊燃烧的烈焰中。

日军终于攻占了张家山，但张家山一线主阵地有很长的纵深，日军突破的仅仅是防线的一角而已。因此，第二次攻击开始后，日军把进攻重点由城南正面向西稍移，仍旧主攻预备第十师的防御阵地。在二十八团方向，日军彻夜猛攻后，九连据守江西会馆的一个排的官兵全部阵亡，九连主力与据守五桂岭南段的八连陷于苦战。当五桂岭阵地上弥漫起毒气的时候，八连连长林可贤阵亡，全连官兵伤亡惨重。情势危急之时，第三师八团四连前来增援，于十六日天明后巩固了阵地。在一四高

地防守的一营，击退了日军的多次攻击，营长赵国民和一连连长李炳山先后负伤，得到搜索二连的增援后阵地转危为安。二营据守的枫树山阵地由于峭壁地形，日军多次攻击受挫，随即从一四一高地西侧迂，竟然潜入了二十八团的指挥部，混战中二营营长余龙负伤，四连连长李浚阵亡，葛先才师长亲率特务连和搜索三连前来增援，团长曾京指挥直属队配合反击，最终把突入的日军赶尽杀绝。十五日，日军突入外新街南端，守军官兵伤亡殆尽，只剩下一名班长和两名士兵坚守着西北角的一座碉堡。营长翟玉岗率部和军部搜索一连一起发动反击。军部搜索一连是支剽悍的部队，他们甚至在战斗最残酷时夜渡湘江，袭击了日军的炮兵阵地，给攻城日军以极大的震撼。外新街一带民房都为木造，盛夏烈日，气候干燥，连长臧肖侠决定用火攻。他命令四班班长王嘉祥挑选五名精壮士兵，携带煤油、酒精和棉花，冒死冲进外新街引火焚屋。在日军阻击的弹雨中，王班长和他带领的五名士兵先后中弹倒下，但外新街上的大火已经点燃，日军被烈焰所阻后退，中国守军反击部队奋力追击。一排杜排长是河南南阳人，行伍出身，战斗凶猛，为人讲义气重情义，颇受官兵的爱戴。此刻他身先士卒，连续刺杀数名日军士兵，自己全身也多处被刺刀刺伤，最后在与一名日军肉搏时被手榴弹炸倒。官兵们把他抬下来，遍体鳞伤的杜排长已不能说话，手却依旧指向日军的方向。杜排长的阵亡令官兵们大为悲痛，呐喊着冲向当面日军，日军死伤狼藉，遗尸累累，而搜索一连也伤亡过半，清点人数后仅余五十多名官兵。

二十九团方向争夺的重点依旧是虎形巢。日军事先进行了长时间的炮击，工兵也抵近阵地前沿实施爆破作业，随后日军以百人梯队的阵形轮番进攻。二营营长李振武率部奋勇阻击，战斗中日军第一二〇联队联队长被击毙。但是，日军不顾生死猛攻不止，二营伤亡超过三分之二，阵地一角被日军突破，李振武营长在激战中阵亡。团长朱光基命令一营营长劳耀民率部实施反击，一营经过连日苦战，全营残存官兵不足百人，再次彻夜激战，以伤亡过半的代价巩固了阵地。为了加强一营的兵力，团部直属人员拼凑了七十多人归劳营长指挥。但是，日军在毒气弹的掩护下再次冲锋，劳营长率领的百余人中毒昏迷，蜂拥而上的日军甚至爬到了营指挥所的地堡顶上。苏醒过来的劳营长带着两名士兵冲出去，用手榴弹把地堡顶上的日军赶了下去。在手榴弹即将告罄之际，朱光基团长指挥第三师九团三营营长孙虎斌率领八连和九连加入反击，双方再次陷入混战，战壕被尸体塞满，惨烈的叫喊声不绝于耳。三营营长孙虎斌、战炮连连长陈以居以及八連、九连的连长先后阵亡，劳耀民营长负伤。与此同时，防守范家庄的二十九团三营阵地也出现了危机。三

营官兵发动两次反击，阵亡了两名连长、五名排长和百名士兵，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排长章振宏带领数名士兵坚守着三座碉堡。由于虎形巢和范家庄阵地突出前沿，守军伤亡过大，军长方先觉命令二十九团退守西禅寺二线阵地。

十二日夜，日军渗透到三十团防守的张家山阵地前。在阵地的西侧高地之间，三营营长周国相率领全营拼死阻击。十三日，日军的攻击更加凶猛，几进几退后，日军冲入中国守军阵地，在双方展开的近距离争夺战中，三营营长周国相、九连连长王云卿、机枪三连连长何振洪相继阵亡。在张家山阵地的正面，日军百人为一梯队，在战机和火炮的掩护下，一波接一波地向前凸的两个小高地发起冲锋。十一日午夜时分，张家山阵地丢失。二营组织起一百三十名官兵拼死反击，天亮时将阵地夺回。可十二日午夜阵地再次失守，预备第十师的防毒连和三十团直属队联合反击，阵地再次收复。十四日天黑后，阵地又一次丢失。军工兵营营长陆伯皋指挥两个连发起反击，暗夜里阵地上伸手不见五指，双方的扭打常常被脚下的尸体绊倒，中国官兵用手摸对方的军装，棉衣者为自己人，卡其布者为日军，刺刀的相撞声和双方的咒骂声此起彼伏。天明后中国官兵刚收复阵地，日军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张家山前面的小高地就这样数次易手，致使伤亡枕藉，伏尸没胫，阵地上已无可插足之地。

进攻张家山的日军主攻部队，依旧是那支黑濑联队。在记述该联队进攻作战的日方战史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和悲伤感。十五日拂晓的冲锋中，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奥山“正要冲入‘三三’阵地的一刹间，身受重伤倒下，小队长松谷夏生少尉也阵亡”。第五中队在冲锋时遭到中国守军机枪子弹的猛烈拦截，“立即有数人伤亡，负伤人员倒在灼热的土地上，稍微一动，即引来射击，掀起烟尘”。“由于奥山中尉重伤和板谷少尉战死，使第五以至第八中队里再无一名军官，各中队由下士官负责指挥”。“十四时，接到大队长足立初男大尉战死的消息，联队长深感沮丧”。第三大队“除大队长迫八郎大尉和第十中队长加藤英一中尉均负重伤（伤后身死）外，十六日拂晓，第九中队代理队长池崎觉少尉也负重伤，第十中队小队长佐藤晃雄少尉（加藤中尉负伤后代理中队长）战死。此外，还有下士官三名、士兵三十三人战死，多人负伤”。

战至十六日，中国守军的一线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

只是，日军由于连日攻击，伤亡极大，每个大队所余兵力都不足百人，且弹药再度消耗殆尽，因此攻势逐渐减弱。十九日，横山勇再次下

令暂停进攻。

为缩小防御阵地的宽度，方先觉军长决定将残破的第一线阵地全部放弃，以第三师和预备第十师的残剩兵力合力防守二线阵地。

至七月二十日止，日军的初步统计为：战死三千八百六十人，负伤八千三百二十七人，因天气炎热和后勤供应困难而患病七千零九十九人，总计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人，其中军官七百九十八人。

就在横山勇再次下令暂停进攻的十九日，蒋介石命令衡阳守军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向友军增援的方向出击，否则会让日军认为守城部队已无力作战，那样日军便不会自动撤退。——且不说日军根本就没有撤退的打算，就算有，筋疲力尽的第十军哪还有力量出击？而衡阳城外的增援友军又在哪里？

早在衡阳第一次受到攻击时，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王陵基指挥第第五十八、第二十六军，杨森指挥第二十、第四十四军，欧震指挥第三十七军和暂编第二军，王耀武指挥第七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九和第一〇〇军，分路夹击日军。之后，又数次命令以上各部队速解衡阳之围。各部队奉命与东、西两路的日军展开激战，双方都伤亡很大。日军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联队长大桥彦四郎大佐，被中国军队第二十军击毙；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佐治直影大佐，也被中国江防军部队打死。但是，尽管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努力作战，却始终未能进一步靠近衡阳城，甚至连现有阵地都难以保持，总体趋势仍是不断地向后退。特别是衡阳以东的中国军队，均散落在日军的侧后，距离衡阳城还很远。

由于湘江以西的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较为靠近衡阳，蒋介石电令两军无论如何也要向东突击，争取与方先觉的第十军取得联系，并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进驻第六十二军军部直接督促作战。但是，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日军情报部门截获，横山勇当即将中国军队的动向通报给各师团，并命令第四十师团占领衡阳西南、正西和西北约十至十五公里处的各要点，对自西向东增援衡阳的中国军队实施截击。

中国军队第六十二军努力向衡阳靠近，一度突进到衡阳火车西站附近。日军第四十师团第二三四联队拼死阻击，双方鏖战两昼夜，第六十二军官兵反复冲击都没能冲入衡阳城，最终因伤亡惨重无力攻击被迫后撤。

就在第六十二军奋力作战时，衡阳城内的第十军曾与第六十二军取得电台联系，方先觉军长随即命令军特务营选出一百五十名精壮官兵，编成五个突击排，由营长曹华亭率领，趁暗夜冲出衡阳，去寻找第六十二军。“天明以前，突击部队抵达西南部的五里亭，不意友军踪影已渺。历尽险阻，竟未能相会，遂于二十一日夜失望而回。”——区区一百五十名官兵，不但能从日军的重围中冲出去，还能接着返回城内来，尽管伤亡过半，但也证明日军的围城并不十分严密。而第六十二军一个军的努力竟未达目的，不免令人扼腕。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七十九、第七十四军主力以及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皆因受到日军的猛烈阻击不得前进。

此刻，衡阳城里的第十军面对的境况是：预备第十师的三个团及直属部队，伤亡达百分之九十；第三师的三个团伤亡达百分之七十，第一九〇师全师仅剩下不足四百人；军直属部队除辎重团尚存官兵五百人之外，其余的搜索、工兵、通信、特务和炮兵营兵力都已不足三分之一。其中步兵团所有干部非伤即亡，战斗中连续晋升军官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最高纪录产生于五桂岭阵地，半天之内先后晋升了五位营长，而这五名新晋营长也很快相继阵亡。第十军的弹药也已枯竭，手榴弹消耗了百分之八十多，步枪子弹所剩无几，官兵伤亡后大多人枪俱毁无法补充，多数官兵使用的是缴获的日式三八步枪，以至于三八步枪特有的射击声从中国阵地上传出时，日军官兵很是错愕。除了把最后几发炮弹埋在地下，做最后时刻的决死之用外，炮弹基本告罄。第十军的伤员数量已达六千人以上，在没有药品的情况下，伤员在烈日下的废墟中辗转悲号，绿色的苍蝇漫天飞舞，白色的蛆虫布满伤口，有因极度绝望而投湘江者。到处是腐烂的尸体、沾满脓血的绷带和纱布，城内瘟疫流行，因患病而奄奄一息者比比皆是。

守城的第十军官兵已不把生命当回事了。城西，交战双方士兵隔着一个大鱼塘对峙。几名中国士兵赤裸身体朝日军喊话，说想弄点鱼吃吃，不带武器，让他们不要射击，要打约定时间再打，然后就奔向鱼塘下水摸鱼。日军果然没有开枪，中国士兵渔获颇丰。但第二天准备了渔具拟再干一场时，日军开枪了。中国士兵火了，跑回来拿起几枚手榴弹，胆大的后面跟着，端着刺刀来了个集体冲锋，竟以负伤三人的代价把日军前沿的这个观察哨全窝端了。第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三连官兵发现与日军对峙的草地上有三头牛在吃草，一位班长思肉太甚，忍无可忍，无视日军的机枪封锁，翻下陡坡，越过百十米的开阔地，居然牵回来一头，不但全连大吃一顿，还给军长方先觉送去一条牛腿。更有甚者，第

三师九团的几名士兵，请求越过日军防线离开衡阳城，到附近山里的一个小镇上去看一眼。按照战场纪律，任何人都不得脱离战场，一旦违反枪决无疑，但连长的态度是“你们敢去我就敢批准”。几名士兵每人携带三枚手榴弹、三个充气的汽车轮胎和一大笔钱，悄悄渡河，到了距衡阳城三十多里的集镇上。百姓听说他们是守衡阳城的第十军，纷纷拿出慰问品却分文不要。两天一夜后，几名士兵竟然每人背着数十斤的食品安全回来了。——当该连把部分食品送到军部的时候，军部要追究其脱离战场的责任，可全连的官兵们不服：他们身携巨款，如果想当逃兵的话，还回到这必死无疑的衡阳城里干什么？更何况他们出去的时候，为全连寄出了几十封家书，此刻还有什么比向父老妻儿通报自己还活着更重要的事？几名不要命的兄弟重情重义，忠勇可嘉，应该给他们颁发勋章才是。

七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亲自致电第十军军长方先觉：

方军长：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此时只有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必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弟可体会此意。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被敌军偷译，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接济勿念。中正手启。

但是，方军长回电还是诉说了第十军面临的极端困苦：

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筑工事，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浸中，与敌奋战，均能视死如归，恪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

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偌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任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

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昨日三十日辰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第二天，蒋介石回电，语气里有了一抹悲怆：

我守衡官兵之牺牲与艰难，以及如何迅速增援，早日解危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瘁，虽梦寐之间不敢或忽。唯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验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定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之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唯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以一死报国之决心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第二次各路增援部队，今晨皆已如期到达二塘、柘里渡、水口山、张家山、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也。

蒋介石发电之日，第六十二军和第一〇〇军抵达三塘、两母山地区，第七十四军抵达佘田桥、新桥，第七十九军抵达望城坳附近，但各路增援部队都未能突破日军的阻击线。

日军在衡阳上空投下香烟、钞票、劝降的“归来证”以及传单：

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空军。

焦灼的横山勇亲抵衡阳前线。

飞机刚刚降落在衡阳机场，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就飞了过来，炸死了他身边的二名卫兵，炸伤了随从军官。

为了最后攻占衡阳城，横山勇把第十三师团、第五十八师团和第四十师团全部投入到攻城作战中——方先觉残破的第十军，竟然要抵挡五个日军师团——横山勇不得不孤注一掷了。

即便如此，日军也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各部队实际能够参战的官兵数量大幅减少。黑濑联队把残余兵力集中起来，编成了三支突击队，人数最少的一支只有七十六人，最多的不过八十人，且三分之一是伤员，军官只有五人。第六十八师团的第五十八旅团，联队一级的军官已全部伤亡，残余部队也只能编成四支突击队，由幸存的两名大队长指挥。持续的苦战令日军官兵接近疯癫，饥肠辘辘的他们发现水田里的稻谷快要成熟了，就用钢盔捣米煮饭，阵地附近可以吃的绿叶也已被他们

全部吃光。由于长期蹲守在前沿战壕里，那些被浮土掩埋的尸体逐渐腐烂，以致整个战场上臭气熏天，阵地踩上去扑哧扑哧地响——他们宁愿冲出去战死，也不愿在这如同地狱般的战壕里再忍受下去。

八月四日，横山勇下达了第三次攻击命令。

日军展开了最后的近乎自杀式的疯狂冲锋。

这是方先觉的第十军的最后时刻。

日军的火炮从各个方向向衡阳城内倾泻。据守城防阵地的第十军官兵不眠不食，与日军展开昼夜相接的搏斗，双方在反复的冲锋和反冲锋中浴血死战。

第三师八团的五桂岭阵地大半沦入敌手，三营营长蒋国柱负伤。张金祥团长命令二营营长苏琢率领仅存的六十余名官兵发动反击，午夜时分中国官兵闯入敌阵，苏营长阵亡。

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的阵地全在炮火中毁坏，官兵伤亡巨大，渐渐不支。团长曾京率部逆袭，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也命令师工兵连加入逆袭行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十次，三营营长翟玉岗和二营营长余龙均负伤。

第三师九团据守的天马山、西禅寺阵地以及一四一高地，被日军列于阵前百米之外的炮火直接瞄准轰击，守军无炮弹还击，只能在日军步兵冲上来时用手榴弹抗击。据守一四一高地的六连官兵全部阵亡，阵地失守，但西禅寺和天马山阵地依旧还在。

八月五日，日军继续猛攻，最前沿的第三师预备队只有一个营，官兵们奔跑在各个阵地上四处逆袭，但无法阻挡潮水般的日军。七团团长鞠震寰、九团团长萧圭田先后负伤。五桂岭阵地再度被日军突破。第一九〇师五七〇团拼凑起九十余名官兵发动反击，把日军赶下阵地。但二十八团阵地又被日军攻占了一角。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亲率一个班的卫士以及司令部的勤杂人员三十余人前往增援，二十八团的残剩官兵看到师长上来了，大声呐喊，最终把阵地夺了回来。可是，二十八团全团只剩下官兵七十多人，夺回的阵地岌岌可危。

六日凌晨，第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五连的阵地被突破，连长罗夫和阵地上二十多名官兵全部阵亡。接着，三营的阵地也出现危机，反击中团

附李适和二连连长井启第阵亡。下午，烟尘笼罩的西禅寺阵地上，二十九团二连只剩下了一名士兵。这名士兵平时不善言辞，久而久之他的姓名被人忘却，大家都叫他傻子。傻子人缘好，有吃亏不计较的品性。他打枪不行，却是个投弹好手，他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投出的手榴弹下雨一般。增援的二十多名士兵上来了，傻子大骂不止，说他们怕死，鬼子一上来都跑了。上来的排长告诉他，他的排，谁都没跑，人都阵亡了。傻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士兵们让他下去，他不肯，当日军再次冲锋时，他朝那位排长喊："我什么也不要了！我战死后，若有可能，请排长把我的尸体和我们排阵亡的人埋在一起。如果不能抢回我的尸体，就让红头苍蝇子子孙孙吃掉吧！"说完，举着手榴弹向前冲，手榴弹在日军冲锋的人群中爆炸了。士兵们没有找回傻子的尸体。——"火线上，无论敌我，双方的战死者，皆无法抢回尸体，否则只有增加伤亡。日积月累，故尸积如丘。"

傻子不傻，他知荣辱，但愿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七日，军长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冲入城内的日军逐渐向第十军军部逼近，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人来掩护军长突围，被方军长拒绝。他让大家各自去寻生路，然后夺过卫士的手枪企图自杀，被卫士阻止。

就在这一时刻，战局突然发生陡转。

先是传来了一个消息：白马山九团残存官兵停止抵抗，并在阵地上竖起了一面白旗。

更令人错愕的是，方军长随即召集师长们开会，会议最后作出这样一个选择：放下武器，与日方取得联系。

晚上十时，方先觉的第十军与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接上了头。

日方指定方先觉军长八日拂晓出城，到五桂岭面谈，守军的全部武器集中到南门外马路两旁。

历史的档案残缺不全。

历史的真相模糊不清。

无法确切地知晓，刚刚给蒋介石发出“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的方军长，何以紧接着作出了放下武器的决定。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第十军的将领们是如何商议的？方军长的心灵深处又是怎样抉择的？

事实是：八日上午，方先觉一行抵达五桂岭，在一所学校里与日军进行谈判，谈判后方先觉在谈判书上签字画押。

中国衡阳守军第十军官兵阵亡万余人，最后放下武器的为一万三千余人，其中一万人左右为伤员。

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历时四十七天的衡阳血战结束。

方先觉签字画押之时，中国军队外围部队仍在试图靠近衡阳，而从第四战区调来的第四十六军已经抵近距衡阳仅八公里的二塘。

日军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对这一天的记述令人无语：

上午八时攻克衡阳。力攻四十天，虽说时机已经成熟，却是一场竭尽全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的五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英帕尔”的结局。

后人对方先觉此时的行为记述多使用“投降”二字。

从一般认知上讲，我们只能如此揣摩方先觉最后这一举动的真正因由：或许是城已破，人伤弹尽，再打下去只能是任日军杀戮；或许是满城皆是伤员痛苦的呼号，如果再打下去，等于断绝了他们生还的最后一点希望；或许是苦盼援军不至，心已绝望，最后时刻的责任已不再是去死，而是最大限度地保全残存官兵的生命。——如果说方先觉和他的第十军官兵贪生怕死，那么数十天的血战与牺牲又该作何解释？

日军第十一军发给东京大本营的电报说：“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军参谋长、第三师师长、预备第十师师长以及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均已投降。”而日军第十一军的战地记录是：“敌军第十军军长和参谋长，第三

师师长、第一九〇师师长和参谋长、预备第十师师长、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已全部由我军收容。”

方先觉本人对“投降”一说做了坚决否定。三十多年后，他向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回叙道：当时有一位自称是日军第十一军军使的名叫竹内的参谋前来接洽停战，他当即表示第十军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生存官兵的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是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竹内在对第十军的顽强作战表示钦佩之后，答应了这两个条件。——“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说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一个月后，方先觉在敌军的监视下，一行十余人，穿着日本军官制服，佩着日本指挥刀来到东洲，召集所有被俘官兵讲了一次话。大概的意思是：‘大家辛苦了。今后可以安下心来。现在我们已经改编为‘先和军’第一军了。今后的粮饷，都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供给。南京国民政府是‘和平阵营’的领袖，正在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我们不久就可以开到南京去，大家安心吧。”

可是，突然，方先觉和第十军的几名师长先后出现在了重庆——他们趁日军监视松懈逃了出来。蒋介石接见了方先觉，方军长和几名师长都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和慰劳金，并被任命了新的军内职务。

往事如烟，百口百言。

根据日方的保守统计，从长沙之战到衡阳之战，日军伤亡高达五万人——“到下旬（八月）则约六万，扣除运送期间发生事故部分，也有四至五万人”。

尽管中国第九战区在战后检讨中陈述了中国军队不能协同、缺乏机动性、纪律废弛以及装备低劣、部队严重缺额等痼疾，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军队的衡阳血战足以令侵华日军胆寒。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铺展在地域广阔的中国战场上，当这条战线的中段衡阳血肉横飞之时，战线的末端缅甸战场则让日军陷入了岛贯武治所说的那个“英帕尔”的结局，处于纵贯作战中的日军其溃败之势在这一结局中暴露无遗。

第三十七章

我们是否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黄河济源西南面的渡口夜雾弥漫。

夜色朦胧中，八路军豫西抗日支队三团三连的官兵正在黄水滚滚的岸边找船。日伪军早已把黄河岸边的船只全部破坏，四条木船是黄河船工偷偷藏在河湾泥沙下的，现在他们把船挖了出来。八路军乘船向防守对岸渡口的日伪军发动攻击，日伪军凌乱的炮击把一条船炸坏，另外三条船在船工们的努力下终于靠上了岸。——日伪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带经过前一段日军的重兵“扫荡”，连国民党正规军都跑得没了踪影，八路军居然敢渡过黄河向他们进攻。当最后一船官兵渡过黄河后，指挥员皮定均发现，黄河岸边竟然站着一排恭恭敬敬地迎候他的伪军和地方士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皮定均对各位说，“这个地方我们要常来常往，今天先订个协定，落上我的名字！”

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会战中，日军第十二军在一个月内击溃了中国第一战区的四十万人马，除了靠近陕西边界和豫东黄泛区的几个县外，日军占领了河南地域内的大部。之后，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南下参加长衡会战，而在中原占领区内仅留下一个师团。——日军如此忽视自己的后方，原因至少有二：一是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规模异常庞大，必须抽调大量部队，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在利用少量部队和部分伪军维持占领区的安全上心存侥幸；二是中国第一战区部队在数年沿黄河与日军的对峙中，其主要精力都用来与共产党抗日武装闹摩擦，而日军数年来也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以至于自一九四二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了空前困难的处境，日军由此认为共产党抗日力量已被严重削弱，再也无力发动如同百团大战那样攻势的作战了。但是，就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开始向南延伸之际，共产党抗日武装立即从各个方向攻入日军兵力空虚的占领区，在日军作战的后方燃起了抵抗的熊熊火焰。

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的进攻称为“对日反攻作战”。

十七日，中共中央作出向中原进军的决定：由北方局从太行、太岳军区抽调部队，尽快向豫西地区发动攻击，冀鲁豫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

一部积极策应作战；并且，同意华中局的建议，以新四军第四师一部进入宿县、萧县、夏邑和永城一带配合作战，力争打通东、西两个方向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并相机占领新黄河以东地区。

北方局抽调八路军太行军区三团、三十五团和豫西地方工作队，共同组成“豫西抗日支队”，以皮定均为司令员、徐子荣为政治委员，九月初自林县出发，二十一日抵达济源西南的黄河渡口，成功突破黄河天险后向南，由新安以西兼程向嵩山、箕山地区急进。沿途的日伪军对突然袭来的八路军进行拦截和阻击，在伊川东杨岭遭到八路军的伏击，伤亡数十人的日伪军被迫撤退。伊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对八路军的出现欣喜若狂。但是，这一带的百姓连年受到日军、伪军、国民党军和土匪的蹂躏，对任何一支军队都充满着不信任，村村有寨墙，庄庄有堡垒，组织起来持枪保卫自己。——这便是豫中会战时，日军追击汤恩伯的部队，老百姓也袭击汤恩伯的部队的原因。现在八路军来了，百姓的寨门照样紧闭，无论如何喊话，说八路军是来打鬼子的，吃饭付给现大洋，还是无人应答。八路军官兵忍饥挨饿，坚决不动百姓的庄稼，缩在村边抱着枪睡觉。上年纪的老人把食物装在筐里从寨墙上吊下来，官兵们拿了食物把现大洋放进筐里吊回去。部队出发前，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曾对官兵们说，河南过去是汤恩伯的天下，结果鬼子来了，四十万大军溃不成军，三十七天丢了三十八座县城，原因之一就是汤恩伯的部队欺负百姓，百姓没有一个帮助国民党军的，所以，你们要好好考虑过河之后怎么打的问题——“仗也是要打的，但一定要打得巧。仗不在大，打则必胜。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是瞧不起的。”

中秋节的前两天，三团决定袭击日军正在建造的登封机场。这个机场一旦修成，将对正面战场上中美联合空军的作战十分不利。而眼下被日军抓去修建机场的中国苦工就有一万多人。团长钟廷生率领连、九连、机炮连和团部猛攻机场，六连袭击登封县城西关，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三团的枪声刚在夜色中响起，守备机场的日伪军顿时乱成一团。八路军官兵朝修机场的苦工们大喊：我们是从黄河北面过来的八路军！你们快跑回家去过八月十五吧！苦工们从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处涌出，兴奋地大叫“八路军给咱们收工了”！八路军官兵猛攻日伪军的哨楼和碉堡，点燃了炸药库和器材库，还没建成的登封机场成为一片废墟。八路军端了鬼子机场的事，在豫西百姓中开始流传，各村纷纷为八路军打开了寨门。在日军占领的洛阳城附近的黑石关，八路军星夜奔袭摧毁了日伪军的数个据点，不但把被日军抓去修铁路的数千中国苦工救了出来，

还让陇海铁路交通中断了十几天。在登封至密县的公路上，有一个名叫曹村岭的地方，八路军在这里伏击了二百多名日军和五百多名伪军，残酷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日伪军大部被歼。三十五团袭击一个日军据点时，日军的一个大队增援而来，八路军官兵只有与日军血拼，最终杀敌百余，但自身伤亡也很大。天冷了，倒在战场上的八路军官兵一身单衣，脚上是已经磨烂的草鞋，个个面容黝黑消瘦。

豫西抗日支队通过不断的作战，逐渐消除了日伪军的据点，创建起偃师、巩县、伊川、登封、荥阳、临汝等地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五年春，豫西抗日支队被编为第一支队。为了加强豫西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再派部队南下，不断地团结民众壮大抗日力量，创建扩展更多的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由韩钧任司令员、刘聚奎任政治委员的第二支队，从新安北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十一月底，由陕甘宁边区部队组成的第三、第四支队也从林县渡过黄河，抵达宜阳西南地区，而后分兵进入登封以东，并与活动在伊川附近的第一支队部队会合。一九四五年一月底，以太行军区部队为主组成的第六支队，由刘昌毅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治委员，由涉县南下渡过黄河，跨越陇海铁路，进入豫西渑池地区，与第二支队部队会合。一九四五年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河南军区，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整个豫西地区的抗日斗争。

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认为，豫西根据地的开辟，让八路军能够依托伏牛山，控制陇海、平汉线，牵制洛阳、郑州、许昌之敌，使华北的太行、太岳以及豫东、鄂豫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这样既能令日军难以向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又能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在晋冀鲁豫八路军挺进中原的同时，位于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也开始了反攻出击。由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及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华中地区的侵华日军数量已由一九四三年底的十四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约二十一万人，减少到一九四四年的五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五个独立步兵旅团、五个野战补充队以及两个支队约十七万人。为了弥补兵力的严重不足，日军大力扶持汪伪政权的部队，使得华中地区的伪军数量从一九四三年的二十万人猛增到三十五万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抗日民众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到一九四四年已经拥有近十四万的兵力，所能调动的民兵武装多达五十五万人——久经磨难的新四军反攻的时机到了。

苏中军区连续在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如皋等地攻克日

伪军的数十个据点。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粟裕率领第一师向淮安和宝应间一个名叫车桥的大镇发起攻击。车桥是日伪军控制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位于淮安东南方向，集镇坐落于涧河两岸，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一公里。粟裕认为，攻取车桥有三利：一是可扩大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二是车桥地区为“日军驻扬州的第六十四师团和驻徐州的第六十五师团结合部”，而接合部往往是作战协同配合的薄弱之处，新四军可充分利用这一点打胜仗；三是车桥得手后，日军会因为这里是防区的边沿而不会集中兵力前来“扫荡”，这样新四军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区”。午夜一时，新四军官兵分成南北两路，绕过日伪军的外围据点，仅用二十五分钟就攻上了围墙碉堡，然后直插车桥镇内，分割包围了日伪军的各个营地。经过激烈的巷战，歼灭伪军四百八十三人，日军大佐以下官兵四百六十五人。而在车桥镇的西北方向，新四军第一师官兵在芦家滩和韩庄开始阻击增援而来的日军。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先是遭遇密集的地雷阵，接着就被新四军官兵分割成数段。激烈的白刃战后，日军大部被歼，剩余的逃回了据点。在第一师作战的同时，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抗日民兵和民众破坏公路七百多公里，炸毁桥梁五十多座，配合新四军作战的人次达五万之众，令华中日军惶惶不可终日。苏中军区部队在日军进行长衡会战时，连续攻克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石庄港、新生港、张横港以及永安洲，使得日军的长江航运被迫中断。

新四军苏北军区第三师，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起高杨战役。高沟和杨口是两个大集镇，被伪军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二旅盘踞，而这里是淮海、盐阜两区之间的战略联络点。十九日，战斗打响，新四军官兵先打高沟，后打杨口，同时击退日伪军先后八次的增援。经过十六天的血战，攻克据点十四处，歼灭伪军一个旅又一个大队共两千余人，毙伤增援而来的日军百余人，令淮海、盐阜两区连成了一片。随着日军的不断调出，苏北军区的新四军连续出击，攻克连云港南面的重要港口陈家港以及陇海铁路南侧要地高流镇，甚至一度攻克了日军掠夺苏北盐棉资源的基地合德镇。淮海军区部队还袭击了运河边的林公渡，打通了苏北、淮北两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的新四军第二、第四师，从一九四四年三月起，先后肃清了泗阳、灵璧、睢宁之间五十余处日伪军据点，攻占被日军占领六年之久的主要据点张楼。张楼分前楼和后楼，位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周围有四米多高的圩墙，沿墙有二十多座地堡，墙外还有十米宽、四米深的外壕，长期驻扎着伪军保安第六总队约四百人。

六月，新四军第四师集中了四个团的兵力，加上泗宿总队的官兵，先一一拔除了张楼外围的日伪军据点，七月五日开始对张楼发起总攻。日伪军急调保安第二总队前来增援，新四军官兵经过七天的战斗，歼灭日伪军二百九十余人，俘虏伪军五百三十余人、日军五人。张楼的攻克，令整个泗北地区全部回到新四军的控制下。随着第四师挥师西进的数次作战，新四军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起陇海铁路、南至涡河岸边的广大地区，从日伪军盘踞地区解放人口达二百五十万，基本上恢复了原来豫皖苏边区的规模。

新四军第七师和浙东部队的反攻作战范围一直延伸到南京附近，控制了长达三百五十公里的长江江防，并形成对安庆和芜湖等大城市的包围态势。新四军第六师在苏浙边境的宜兴、长兴一带长达三十公里的战线上发动攻势，重创伪军一个团，迫使日伪军放弃了太湖边以及长兴西南的十二个据点，完全控制了太湖西岸。与此同时，第六师由王必成率领的第十六旅，歼灭伪军第七师的一个营，攻克南京市郊的六郎桥。接着，奉新四军军部“向东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第十六旅在溧阳西南发动周城战役，攻入溧水、溧阳两城，连克南渡、周城、社渚等据点，歼灭伪军七百余人，控制了溧阳以南的整个地区。位于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处在日伪军的夹击之中。在日军发动打通交通线的南下作战后，第五师在豫南地区连续攻克平汉路上的遂平、汝南等县，又在湘鄂交界对嘉鱼、岳州、华容和公安发起攻击，给正在南进的日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

就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猛烈出击的同时，各根据地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也在发动反攻作战。

晋冀鲁豫八路军经过艰苦的努力，兵力已恢复到百团大战前的水平。从一九四四年三月开始，由李达、黄镇指挥的太行部队连续征战，四月夺林县，五月占左权，七月入阳城，八月收和顺，十一月打进了元氏。在豫北发动的三次攻势中，拔除日伪军据点三十六处，收复国土五千平方公里，解放日军占领区百姓十余万人。由谢富治、王新亭指挥的太岳部队，二月攻入太谷，四月攻占沁水，控制了垣曲和济源地区。冀鲁豫八路军部队在杨得志、杨勇的指挥下发动濮阳战役，沉重打击了率部投降日军的孙良诚部，毙敌数百，俘敌三千有余，迫使孙良诚放弃防区向开封附近的日军靠拢，这样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地带的濮阳、濮县、范县和观城等地，与八路军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连成了一片。

冀南地区是驻邯郸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防区，因为打通大陆

交通线作战的庞大兵力需求，日军不得不从冀南的清丰县城撤走，改由伪军驻守。而日军刚一离开，清丰县的伪县长就弃城逃跑了，县城遂被八路军县大队占领。清丰地处河南濮阳东北，交通畅达，盛产小麦。占据邯郸的日军联络部长加藤次郎不甘心失去清丰，组织起一支近五千人的“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日伪军突击而来重占清丰县城。加藤认为，收复清丰是“维持治安”的典型范例，于是通知附近十三个县的伪县长、伪警察所长和日军联络官前来清丰，参加推广“剿共经验”大会。同时决定，五月二十九日，在县城大摆筵席，搭台唱戏，举行“庆祝光复清丰县城盛典”。然而，就在“盛典”举行的那天，八路军突然打了回来。发动这次进攻的八路军，不仅仅是一个县大队了，而是众多兵力的四面围城。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治委员段君毅，集结了第八军分区七团以及军分区直属的特务连和炮连，再加上清丰、南乐、卫河、观城、昆吾、尚和等县大队，决定对清丰县城实施联合进攻。二十九日晚，二营五连突击队在营长项立志的带领下，首先攻占了城墙东北角；接着，一营在营长李广前的带领下从东南角登城，之后直打到城西门，横扫了西大街两侧的敌人。清丰伪县政府的围寨，四周有数米高的砖墙，四角有碉堡和炮楼，围寨内龟缩着伪县长、伪警察所长以及日军顾问。八路军官兵开炮了，九二步兵炮和八二迫击炮一起向围寨内轰击，五连的十八名战士组成了一支突击队，由排长朱怀泉率领对围寨实施突击。五班班长段玉生和战士张金祥率先抵近炮楼，踏着被打死的伪军尸体占领了炮楼底层，战士李宽和王金保接着登上了寨墙。寨墙内的伪军猛烈阻击，突击队队员江得华、李宽和王金保阵亡。四班长齐鸿臣随后跟进，冒着弹雨登上炮楼顶部，向炮楼里投进去成捆的手榴弹。激战中，突击队阵亡九人，负伤七人。围寨内的伪军在日军顾问的督战下数次发动反击，都被五连官兵打了回去。与此同时，在副连长陈景玉的指挥下，八路军官兵猛挖东屋的后墙，三排从挖开的墙洞冲进去，把东屋里的二十多名日伪军全部歼灭，随即攻占了南屋，日伪军退到西屋顽抗。混乱中，围寨里的残敌挖墙而出，八路军官兵从四面围歼，俘敌数百，逃出围歼的百余名日伪军也被包围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内全歼。此战，八路军击毙日伪军两千多人，俘虏伪军一千三百余人，俘虏日军旅团参事官以及肥乡县、成安县的日军顾问等三十多人。听说八路军收复了清丰县城，百姓们扛着镢头铁锨涌来拆城墙和碉堡，再用黄牛把缴获的日伪军汽车拉走。此战，被日军战史记述为一幕“悲剧”：

五月二十九日，爆发了清丰事件。这是日军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当天夜里，全体人员逐渐就寝，突然遭到共军袭击。保安队在城墙上布防时，县城已全被包围，立即全面展开了激战。夜三时，共军突

破东关拥入城内。顿时，由各县抽调来的保安队东奔西窜，混乱不堪，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名取大尉命令全体突围，但是突破两三重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

山东境内八路军的反攻作战，是从打伪军吴化文部开始的。驻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部队被调出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后，山东境内只留下了由独立混成第十旅团扩编的第五十九师团以及第五、第六两个编制不足的步兵旅团。而此时山东境内的伪军数量庞大，除了在卢沟桥事变后跟随日军进入山东的刘桂堂、赵保原、齐燮元的伪军部队外，多数是投降日军的原国民党军部队，其中吴化文、荣子恒、张步云等部有一定的战斗力。

吴化文的新编第四师兼山东保安第一师，于一九四三年一月投降日军，被扩编为“和平救国山东方面军”，一直盘踞在鲁中地区，配合日军对山东境内的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日军部队被抽调走后，吴化文部因防区大，战线分散，成为八路军打击的首选目标。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从鲁中和滨海军区抽调出七个主力团，在驻防胶济铁路西段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南调、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延伸兵力尚未完成接防之际，于三月二十五日突然对吴化文部发动了围攻。吴化文部没有日军的支持，防线被割裂成数段，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一个月内损失七千多兵力，不久便撤出了山东境内。八路军接连攻克了四十个据点和十二处山寨，解放了一千多个村镇的三十万百姓，控制了鲁中山区大部，扩大了八路军部队的机动回旋区域。

重创吴化文部后，八路军连续作战，六月十一日又攻克朐南地区数个日伪军据点，切断了临朐到沂水的公路。接着转战蒙阴和费县，消灭伪军第三方面军的一个教导旅，打破了日伪军环绕蒙山布设的封锁线。随后攻击沂水城南，切断了沂水至临沂的公路，从北、南、西三面对沂水形成围攻之势。沂水是沂蒙山腹地重镇，这里连接着沂水—青州、沂水—临沂、沂水—博山、沂水—蒙阴、沂水—莒县的公路，东抵黄海之滨，西通沂蒙山崮，南达鲁南要地临沂，北连胶济铁路。一九三九年日军占领沂水后，在此修建起机场以及坚固的城防工事，日军的军事指挥机关和特务机关都驻扎在城内，这里是日军向鲁中抗日武装进行“扫荡”的根据地。为了攻下沂水，八路军鲁中军区调集了四个主力团、军区特务营和数支民兵武装：四团的一营和二营负责主攻炮楼和据点；三营负责歼灭城内的敌人；二团一部在蒙阴城外负责打援；特务营负责攻击城南；地方武装围攻城外的各个据点。

沂水城墙高而厚，八路军奇缺攻城必需的炸药。在日军控制的煤矿挖煤的工友们，冒死从矿井里为八路军向外偷送。他们把炸药藏在饭盒里或者身上，出井口时不少工友因被日伪军查出来而被残酷杀害，但他们宁死也要把这件事做到底，最后积少成多竟为八路军偷出了上千公斤炸药。炸药被分扎成数公斤的炸药包分配给爆破手后，抱着炸药包的八路军官兵表情肃穆，如同怀抱着工友们的魂灵。

八月十五日，四团攻击东南炮楼的爆炸声成为总攻的信号，各路八路军官兵向沂水城猛扑上去。四团一营突击组被炮楼前的壕沟阻挡，连一班在班长张克友的率领下架桥冲锋，爆破手李希增冒着弹雨把炸药包送了上去，一声巨响之后炮楼倒塌，一个中队的日军被全部炸死。负责攻击西南炮楼的二连班长彭长庚，在送炸药包的时候对身边的战士说，如果我牺牲了，你们接着上！在机枪的掩护下，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硝烟中。接着，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日军的残肢连同碎石腾空而起。在东北炮楼，日军施放了大量毒气，三十多名八路军官兵中毒昏迷。营长刘振江异常愤怒，率领四连官兵冒着毒气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在炮楼内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被歼灭后，中毒的战士被解救出来，而刘营长已在白刃战中阵亡。

城墙四角的炮楼基本肃清后，八路军官兵从各个城门冲入城内，经过激烈的巷战，城北日伪军大部被歼灭，残敌退守到一个坚固的小围子里。被俘的伪军在小围子外轮番喊话，劝里面的伪军投降，不久便有枪支扔了出来。午夜，沂水城内只剩下日军顽抗的中心炮楼了。八路军的突击队数次爆破都没成功，指挥攻击的连长范均庚负伤，排长梁兰清牺牲。关键时刻，副排长万保全挺身而出。他把五十公斤重的炸药包捆在长杆上，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一寸寸地接近炮楼，当他在炮楼下拉响炸药包的时候，他已无法规避，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勇敢的万保全和炮楼里的日军同归于尽。

十七日傍晚，持续了一天两夜的沂水攻城战结束，八路军毙伤日军八十三人，伪军八百余人。

鲁南最大的一股伪军，是“和平救国第十军”荣子恒部。荣子恒是伪河北省省长荣臻的儿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原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第四旅旅长，于一九四三年六月投敌。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远程奔袭，首先歼灭了荣子恒的伪第三师刘桂堂部，随后对盘踞在圜山的荣子恒本部进行打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灭荣子恒的第二师全部和另一个团，击毙荣子恒和第二师师长刘国桢，基本上控

制了鲁南地区。

山东八路军的大规模反攻作战，令日伪军惊恐万分，只有纠集部队试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在“扫荡”滨海地区未果后，回撤的日伪军分成了两路：一路是伪军吴化文的第四十七师和一个独立旅，一路是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第四十三大队和伪警备队。吴化文部在八路军的伏击中伤亡大半，部队四处溃散，伪旅长陈三坎被击毙，最后逃回莒县城里的仅二百多人。日军的一路更为悲惨，被伏击时部队拥塞在公路上进退不得，在随后展开的肉搏战中，五十多名日军士兵被八路军刺死，其中包括第四十三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岗田健。日军第四十三大队大队长草野清，带着数百名日军东杀西拼，最后躲进一座娘娘庙里负隅顽抗。这座娘娘庙从前是附近百姓赶集的地方，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后，娘娘庙就成了日军的杀人场，每逢赶集的日子日军就在庙会上公开杀害抗日军民。因此，得知鬼子在娘娘庙被八路军围了之后，附近的数千百姓挑着绿豆稀饭和白面煎饼前来慰问八路军。日军大队长草野清率队突围时，刚跑到沂河岸边，喊杀声突然四面响起，头顶是下雨般的手榴弹，眼前是一片明晃晃的刺刀，霎时间日军尸横遍野。侥幸逃出罗网钻进青纱帐的日军士兵，受到举着锄头的中国农民的来回搜捕，大多被砍死或被俘。草野清带着仅剩的几十名士兵爬上了一座孤立的山崮据守，绝望之际终于看到了由旅团长亲自率领、天上有十三架战机掩护的两千人的解救部队，心惊胆战的草野清由此侥幸活命。此战，三百多名日军被打死，三十一人被俘；伪军被击毙千人以上，被俘四百有余。八路军官兵和百姓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包袱，都以为是日军抢来的金银细软，打开一看，竟然全是手指！——这是战争后期日军处理战死者的无奈办法：仓皇中割下其手指，以便送回国交还其亲属。

在八路军、新四军于敌后战场大举反攻时，处于敌后日军占领区内、立场游移不定的少量国民党军的心态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豫中会战后，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三九联队第三大队驻守豫西伊川一个名叫寨子街的地方，在八路军突然反攻豫西引起日军惊慌之时，当地的一群中国百姓找到日军要求成立“人民自卫团”——理由当然是对付八路军。日军立即同意并表示支持。八月二十五日，“人民自卫团”设宴庆贺正式成立，特邀日军头目参加。参加宴会的日军军官有：第一三九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大内义弘大尉，第十一中队中队长榊亲志中尉，机枪中队中队长甲斐治郎中尉，大队副官村濑信三少尉，军医和久嘉夫少尉，主计军官宇高兴三郎少尉，情报军官金泽宪一曹长等。菜上数道，酒过三巡，洽欢之际，端着菜走进来的人突然把菜盆向日军军官头上扣去，猛

烈的枪声同时响起，几秒钟之内所有的日军军官全部倒在血泊中。——这场骗局的策划者，竟是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的副官处处长郭绍绪。王军长是伊川人，老母写信要求接她去四川避战，王军长便派同是河南人的郭副官偷偷潜回家乡办这件事。郭副官看见残暴的日军心生仇恨，暗地串通了地方军队的军官，自编自演了这场“鸿门宴”。

接替第三大队大队长职务的平野林作大尉在日记中记述道：

自卫队本部位于寨子街东头，距离日本军的兵营只五百米左右，加之被招待者多达八人，而且是白昼，对方又是与日军协力的自卫团，当时的敌情又很平静，所以赴宴者没有带卫兵。午后三时，自卫队长洪绍致及其同事离席走出室外。感到奇怪的榊中尉，怕有情况而走出室外，但已完全被自卫团包围而当场被击毙。这时候，饭后送水果西瓜留在室内的仆人，用暗藏在身上的手枪从背后向谈笑中各个人一阵打枪，室内顿时变成地狱。待日本军跑来时，大队长等已完全死亡，有的人的头被砍掉，看样子主要是用手枪和棍棒杀死的。按主计宇高少尉的说法，估计酒宴时已经下了毒药。

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等离奇事，日方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中原地区乃“古时建都之地，戏剧、歌曲盛行，且有任侠之风”；二是“中共军像‘尾随的狼’一般在背后扩大着自己的势力”。

尽管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数量尚不足国民党军队的十分之一，但根据一九四四年中期的初步统计，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规军兵力已经达到了空前规模的五十余万人，根据地的抗日民兵已将近百万。

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大举反攻，令日伪军惶恐不安，也令国民政府十分吃惊。日军在总结河南作战时才发现似乎大错已经铸成：“本作战虽然打击了在华北的重庆军，却因减少了确保占领区的兵力，削弱了日军对共产军的压力，因而影响了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对此，看来有必要从更深远的观点出发去进行探讨。”——此时的日本人应该是想到了未来。无论是出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还是出于对长久占领中国前景的担忧，日本人的这番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共产党抗日武装公开声称要“对日反击”，且共产党抗日武装对日作战的战报每天都雪片般地飞来，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共产党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已经非同小可，因为没有相当的实力岂敢主动向日军发动进攻？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但还是没有把共产党的家底查清楚——这次的情报说共产党军队已经有四十多万人了，下次的情报又说共产党已经拥有了二百万的大军。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都在为一个现实发愁：共产党人和中国的百姓几乎融合成了一体，要精确地计算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那么根据地的民兵算不算？拥护共产党的那些百姓——他们只要拿起枪瞬间就能是八路军——算不算？

突然，一件事令蒋介石的心情更加恶劣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派美军观察团去延安。——美国人抛开其坚定的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的产生与正在进行的战争，与未来世界的政治格局紧密相关。

从军事上讲，随着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以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逐步推进，美国人意识到：攻击日本本土将成为结束战争的最后步骤，而中国大陆将是美军攻击日本本土的重要军事基地。可是，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后，战场上呈现出的状况加剧了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素质低劣的担忧。然而，与国民党军一再溃退不同的是，共产党抗日武装对日作战频频取胜，其战斗意志和作战能力令美国人刮目相看。美国人有这样一个作战计划：美军将于适当时机在中国沿海登陆，以切断日军的侧翼，进一步孤立日本本土；同时在将来攻击日本本土时，以中国大陆作为美国陆军的出击地。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均被日军所控制，美军一旦发动登陆作战，必然需要中国方面的接应，如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需要法国抵抗组织接应一样，而美国人认为，作战能力低下的国民党军队不能担负此任，善于敌后作战且战力顽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完全有可能在那个历史时刻成为美军的盟友。另外，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也希望获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如果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更好的武器，战斗力将能达到何等水平？又能产生什么样的作战前景？——在缅甸方面作战的美军军官并不在意政见分歧或是意识形态差异，只要美国能够彻底战胜日本，只要在这一过程中将美军的死伤降至最低。他们认为，如果共产党军队真的比国民党军队能打仗，美军将很乐意与他们一起分享美式野战干粮、咖啡罐头以及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

从政治上讲，美国人已经开始设想战后的亚洲格局。鉴于对苏联的警惕，美国人不希望苏联成为控制未来亚洲以及中国的主宰，而遏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美国人热望战后能够

将延安和重庆都控制在手。——对于重庆的控制似乎已不成问题，但控制中国共产党人则需要美国人的主动和努力。现在，中国的全面抗战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密切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美国人也许能够从中获得长远利益。美国人的设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国民党舆论所宣称的一群游荡在边缘地带的“匪”，而是一个由信仰坚定、组织严密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以及无数意志超常坚忍的战斗员组合起来的强大的政治集团。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必将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就延安来说，加强与美国的联系，让美国人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九四三年六月，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将他准备的一份备忘录递交史迪威，并把副本送达美国国务院。在备忘录中，戴维斯阐述了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团的理由，但是到了年底此事仍然没有回音。一九四四年一月，戴维斯又写了一份备忘录，再次强调派观察团去延安的理由，其中竟然有“可以遏制蒋企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一条。这份备忘录被转交到罗斯福那里，戴维斯认为只有总统才能促成这件事：

我们需要在尚受欢迎时，立即派遣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团去共产党中国以搜集敌人情报，帮助并准备从这个区域采取某些有限的军事行动，获得对共产党军队实力的准确估计，报告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行动，如果俄国进攻日本的话，并估计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中国国家的可能性——或者甚至于成为俄国的卫星国。蒋对于共产党的封锁和随之而来的隔绝迫使他们倾向于俄国。美国观察团将打破隔绝，减少依赖俄国的倾向，并同时可以遏制蒋企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大元帅（蒋介石）自会反对派遣美国观察团去共产党中国，不能通过寻常的外交和军事途径来获得他的许可。应由总统直接作出请求，他能运用我们充足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来克服任何初期的拒绝。

罗斯福总统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立即指示马歇尔督办此事。二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他“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加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来源”，并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与合作。蒋介石在复电中表示，会尽量使美国人的愿望得以实现。但他附加的条件是：美国观察团的巡回路线，只能在重庆政府控制的区域，或是有重庆军队驻扎的地区中选择。蒋介石把延安排除在外的心理美国人很清楚，即极力阻止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中枢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三月九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说美国将在短时间内派出观察团，

并通报说筹备观察团事宜的美国军官是戴维·包瑞德上校，行动代号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是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反叛各州的统称。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像猜谜似的猜来猜去，最后认为，美国人这一行动代号的真实含义是暗指延安。

蒋介石要求把“观察团”降格为“观察组”。

美国人才不在乎是“团”还是“组”。

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赋予延安观察组的任务是搜集如下情报：

日军陆军和空军的战斗序列；

汪精卫伪军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组织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和战斗力；

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领区中情报工作能力的利用和发展；

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

日军在中国北部机场、空防力量、情报目标、轰炸损失情况；

中国北部的气候、经济情况；

共产党军队和敌军的作战行动；

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的估价；

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情况（附带地图加以说明）；

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

海军情报；

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价。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延安迎来了第一批美军观察员：

—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小城延安的上空盘旋……在这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这里降落，这个中国共产党中枢所在的偏僻小城没有可以称得上机场的设施。那个被称作“机场”的地方只能算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轮子刚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左轮猛地撞上了一个看似松软但实际上很坚硬的黄土堆，飞机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了一团带着尖利叫声的巨大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几乎竖立起来，左侧的机舱裂开了个大窟窿。显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的驾驶和乘坐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飞机里爬了出来，他们立即感受到耀眼的阳光和浓烈的黄土气味……

这些美国人是：戴维·D·包瑞德上校，美军观察组组长；约翰·S·谢伟思，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梅尔文·A·卡斯伯格少校，军医；雷·克罗姆林少校，美军航空兵；约翰·C·卡特尔上尉，美军航空兵；查尔斯·G·斯特尔上尉，美军信号兵；亨利·S·惠特尔西上尉，美军步兵；安东·H·雷米尼赫军士，美国空军参谋。

延安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名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不但称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社论标题上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朱德总司令用延安自产的面包款待了这些美国人。周恩来表示，这架美国军机是负伤的英雄，没有受伤的观察组成员也是英雄。晚上，延安军民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鸭子一般走路的美国流浪汉，在落魄的流浪汉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异常遥远的国度里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第二批美军观察员抵达后，美国人便开始了工作。

他们聆听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报告《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报告《新四军在华中七年的作战状况》，叶剑英关于敌后作战以及共产党抗日军队编制和装备的报告，聂荣臻和林彪向他们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美国人还在南泥湾观看了八路军训练和军事演习，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专门为日军战俘开设的工农学校。他们对共产党情报工作的缜密和完备感到吃惊，更令他们有些意外的是，他们可以共享来自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所有有价值的情报。美军观察组成员还分成若干小组，奔赴共产党人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了解情况，艰苦的行程长达数月之久。他们在危险的日占区之间穿行，前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小组曾与日军遭遇，观察组成员惠特尔西上尉阵亡

于中国山西的一个偏僻村庄附近。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总的印象也许会使人感到某种兴趣，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党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而且毫无疑问，美国将来应付中国局势时是必须把这个党考虑在内的……所有这些人都有着明明白白的强烈的信念，比较软弱的人早已离开了他们，那些留下来的人都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值得的东西而奋斗。他们的真诚、忠贞和决心是显而易见的……与所有这些品质有关的，既然没有更恰当的词，就可描述为坚忍不拔。你会了解到，他们是有耐心的（他们在这方面经受了长期的、艰苦的磨炼）；他们会进行妥协，如果这是最符合党的长远利益的话；而在有需要时，他们将进行战斗；如有必要，他们会是强硬的、毫不留情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总的印象是：他们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们是朝气蓬勃的、成熟的、讲求实际的，他们无私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具有胜任领导工作的巨大才能和坚强品质。这种印象——我想还有他们既往的经历——把他们置于高于当代中国别的任何群体的地位。

——约翰·S·谢伟思

此次旅行中搜集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事实之一是军民的团结一致。越接近前线，这种团结越是牢固。每一次当我看到士兵和农民接触时，不论是个别的接触，还是许多人在一起，他们间的真诚的友谊都是显而易见的……村民们在供给士兵所需的物资时十分慷慨大方，而所有食品都是按价付钱的。清晨，战士们离开村子前清扫垃圾，把用作床铺的门板放好，把东西摆得井井有条……地雷战成了民兵的有效武器，以致在许多地区日本人不敢冒险远离他们的碉堡，而在他们远离碉堡时，他们不得不离开道路走河床……当我在敌后八路军的一个下属地区时，我们这组人中的军人每天都能告诉我，我们周围敌人活动的准确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民兵组织那里得到的……当八路军攻打一个碉堡时，不仅知道碉堡内火器的确切数目和型号，日军和伪军的确切数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知道这些士兵的姓名……许多仗是在夜间打的，战场的地形又坎坷不平，因此有土生土长熟悉当地每一寸土地的人作向导使八路军战士大受其益……

——梅尔文·A·卡斯伯格

向延安派遣观察组一事，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改变其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当时大多数住在重庆的美国人对国民党极端厌恶，他们

认为国民党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于是，“在美军联络飞机开始飞往延安之后，所有能找到一个官方借口的人都希望去延安一次，这种旅行变得非常时髦。神秘和新奇使得刚刚被重新发现的共产党人变得很有魅力”。一时间，“共产党人的纸币、邮票、土布、地毯和挂毯，都成了热门货”。美国人开始“一厢情愿地假定共产党人都是些出色的好人”。

“出色的好人”这句话，出自一名美军飞行员之口。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不久，一位名叫吉姆的美军飞行员在空战中被击中，他跳伞逃生落在距日军据点不远处的农田里。共产党人的抗日游击队与据点里的日军拼死对抗，于混战中把他救起并藏了起来。护送吉姆去延安的路程，用了整整三个多月，其间多次从日军的碉堡旁穿过，他得到了八路军战士的精心照顾和保护。在延安养好伤后，吉姆又被送往重庆。重庆方面认为，这个美国大兵被共产党洗了脑，不让他接触任何人，但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共产党不再是忌讳的话题，于是吉姆便成记者们争相采访的对象。这个普通的美国青年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着装古怪：身上穿的是薪新的美军制服，脚下却是一双中国土布鞋，头上是一顶灰色的土布棉帽子，他说鞋子和帽子是救他命的那位游击队员送给他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吉姆表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认为共产主义是胡说八道”；可是“共产党看来确实为农民做好事”，而他在中国见到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与他之前所受到的关于共产党的宣传，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群人。离开延安的时候，他告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虽然你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你们“确实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像是一个出色的好人”。

从延安回到重庆的美军观察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共已经深深地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使共产党不可能被消灭掉；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将来的中国，中共必将占有一定的、重要的地位……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这样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此证明，它有能力竞争领导人民的地位（国民党中至今没有一个人显示愿意或者有能力这样做的迹象），几年之内，中共将成为中国的支配性力量。”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枢的焦灼日见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军在前方连续不断的作战失利，共产党抗日武装于敌后战场的连连得手以及共产党人国际声誉的骤然提升，更多不安来自重庆政府控制区内发生的种种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令战争中的苦难中国更加动荡不安。

抗战初期从内地迁往大后方的工业曾蓬勃发展，但此时大后方私营的民族工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资本却只占全部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不

足百分之十的官僚买办资本竟然占据了百分之四十。在官办企业统治市场的情况下，资源和运输等行业受到严重垄断，民族企业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势力单薄，难以为继。私营民族企业倒闭的主因是赋税太重。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八百七十一家工厂中，停工和减产的达二百七十家；广西的多数矿山也倒闭了，原因是政府强行采购的价格只有成本的三分之一。

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本是为了首先确保战争的需求，但这一体制很快便成为官僚资本中饱私囊的机遇。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家族聚集，由蒋介石的姐夫、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控制的银行，战争期间存款增加了六倍，其中外币和黄金占百分之四十。而且，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商业而不是工业，因为商业投机的利率极高且能迅速获利，这又使得愿意投资地方工业的民间私人银行被一一挤出市场。当时中国的报纸上直截了当地说，把经济危机归罪于私营商人是不公平的，官员们才是最大的罪犯。

大后方的农业生产也迅速萎缩，粮食产量锐减。土地高度集中和地主的残酷盘剥，使得大批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加上战争和灾荒，一九四四年鄂北的灾民数量达到二百万，陕西和河南三百万，而在陪都所在的四川，灾民和难民人数竟然高达三千万之巨。遍地流民的悲惨景象被各国记者传播出去，令世界为之震惊。

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支撑财政的美元汇率首先崩溃了。抗战开始时，法币和美元的汇率是三比一，一九四一年为二十比一，一九四四年变成了二百比一。但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坚决否认中国存在通货膨胀，他说中国人出大价钱买东西与通货膨胀无关，那是他们自愿的。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飞赴重庆，飞机经停昆明时他看见机场上堆着无数的纸，不解地问随行人员：

“那是什么玩意儿？”

下属说：“报告将军，那是中国的钱。”

“你们要怎么处理它们？”

“我们要用飞机把它们运到重庆去。”

“有多少？”

“不清楚，总有两三百万或者四百万吧。”

“有谁需要签字吗？”

“没有，将军。”

然后，下属告诉阿诺德，如果这些钱是一包香烟或是一辆汽车，早就不翼而飞了。

重庆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一件小事：一家为战争服务的兵工厂因为物价上涨买不起钢材和铜料，心急如焚地找到了他，孔祥熙的建议是——改为生产香烟吧，因为香烟的市场需求很旺盛。

有资料统计，截止到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官僚权贵在美国的私人存款已高达三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和巴西等地的存款，合计高达五亿美元。按照当时的货币价值，这笔款项足可以装备三百个机械化陆军师。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其弱点不仅是武器装备低劣，还有普通士兵生活困苦。国民党军队将领和军官的贪污，已是几乎泛滥到每一支部队的痼疾。兵役敲诈，克扣军饷，走私贩私，官长腰缠万贯和士兵挨饿受冻，仿佛天经地义一般。——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国民党军士兵会在战场上抢掠百姓。

参与到中国对日作战中的美军深受其害。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要扩建一个机场，中国军方的承包商以二千二百万法币的价格承包了该项工程。美国人以为，招投标之后就可以开工了。结果，这位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又转包给第三个人，最终这份扩建机场的工程被转手了六个人，转到最后一个人手里时只剩下六百万法币的建设款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得知此事后，把六个承包商都关进了监狱，同时宣布这是一项爱国工程，无论是谁都要无偿参加劳动，并命令当地军官和官吏们带头。军官和官吏们很快就花钱雇到了替身，最后干活的都是被保甲长驱赶来的贫苦农民。——愤怒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拖了美国的后腿：

一九四四年夏，美国领导人欢欣鼓舞地注视着地图上标明的美国装甲师越过法国向德国进军、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菲律宾进行调动、美国海军袭击日本沿岸海域、B-29轰炸机开始突袭日本城市等等的蓝色箭头，唯独地图上有关中国的部分令人沮丧：日本人渡过了黄河，又从长江向

南推进，夺取了衡阳，并正在出动兵力，企图无情地摧毁华东地区那些花费了好几亿美元和很大精力才建成的美国空军基地。蒋介石要求经由喜马拉雅山，为他和陈纳德的飞虎队空运大批物资，这占去了美军很大一部分空运力量，以致当时在欧洲没有足够的空运能力去解决巴顿和蒙哥马利的争执；假如有充分的空运力量为他们双方提供军用物资，那么，他们或许就能在一九四四年秋结束对德战争。美国在支持蒋介石方面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然而蒋却不断地说：他正在受骗，华东的沦陷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由于美国的吝啬和史迪威的阴谋诡计。

重庆国民政府对社会言论的控制极其严密，理由是“避免人民紧张不安”。为此，“他没有坦率及时地报道河南大溃败，反而虚构了一些我方反攻敌人伤亡惨重的消息，来冲淡溃败的消息。他把日本人这次攻势贬低为‘防御性的进攻’，并保证要进行全国性反攻。他把河南的溃败归罪于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没有在敌人后方打击日本人；也归罪于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援。他并未警告中国南方民众，使他们认清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危险；也没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疏散和抵抗。他甚至连日本人业已占领北方全部的铁路线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事实，也不肯承认”。

然而，一九四四年春，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对其的公开抨击了。国内舆论的不满，主要针对执政集团集体性的腐败。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黑市泛滥，各级官吏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无论是中国的平民还是知识分子，生活都陷入空前困顿之中。一九四四年，民众生活的极端困顿被报纸发表的一篇报道强化了：孔祥熙大女儿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婚礼所用的刺绣品全在重庆的“妇女工作部”里完成，一切严格保密，但向美国运送孔小姐嫁妆的飞机失事摔了下来，此事被暴露。报纸上刊登出一篇名为《在美国举行婚礼的花费》的文章：

自从×小姐从重庆启程之后，我们的财物专家计算了飞往美国和举行婚礼所需的费用。他估计即使租用一架飞机，其运输费用也足以使河南和广西成千上万的灾民吃饱肚子。妇女工作部为×小姐的嫁妆付出的劳动，足以缝制一团人的军装，或者为几个军医院中的伤兵提供绷带和床单。整个婚礼的费用足以办起一所大学。当然，我们知道，比起×小姐的高贵地位来，她的花费仍然太少。但是，现在正值民族存亡关头，难道不应该一切从简吗？

“大多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他们根本不值得为保卫这种生活而战，”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人们谈到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他

们所能忍受的最后的极限状态，如果政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将不能幸存下去。”

即使是参政会的议员们，对政府批评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当其冲。许多发言者描述了被征入伍士兵的悲惨处境。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是被抨击的目标，发言者们向会议详述了他贪污腐败的情况——大到诈骗几百万美元，小到珍妮特·孔（孔祥熙的女儿）一贯把她的美国唇膏和卫生纸都作为官方花费记在中国银行的账上……发言者讲到了在新近遭到日军入侵的省份中，由于政府弃难民于不顾，这些难民的遭遇极为悲惨……另外一些发言者指责说，当城市受到日军威胁时，跑得最快最远的正是那些官员们。政府所管理的铁路系统完全瘫痪，铁路沿线储备的煤炭被铁路官员们在黑市上出售。由于这种情况，在南方造成大批难民被日军俘虏。

社会各阶层的抨击，对国民政府似乎没起什么作用，这使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有学识的人、诚实的人和正派的人不可能为国民政府服务，不然他们个人就得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或者沦于使他们感到厌恶的自我腐化。他们寻找和选择服务的对象——而唯一可供选择的对象就是共产党人。”

中外记者们都想到共产党那里去看看。

中外记者们去延安的申请，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始终没有得到批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很是不满：“过去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里去，我们几次递交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的拒绝。我们中间的一个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九四三年年底，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福尔曼再一次当面提出申请，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口头上表示可以，后来就再无下文了。一九四四年二月，又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国民党发言人否认胡宗南的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时，记者们趁机以“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理由再次提出申请。在中外记者的一再坚持之下，蒋介石终于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国民党中宣部对参观团的外国记者人选无法控制，但严格选定了参加的中国记者，还指定了专门陪同人员，以便把中统和军统的人安插进去。最后确定的参观团成员为二十一人，其中九名中国记者分别来自

《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商务日报》和中央社，六名外国记者来自世界主要通讯社和报纸：美联社、《曼彻斯特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以及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科马克·夏南汉神父。

参观团一行五月十七日乘坐一架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宝鸡，然后换乘火车当天抵达西安。从西安一直向北有大道直通延安，但在西安滞留了几天后，记者们被带出西安城向东，先到临潼，再到潼关，然后渡过黄河进入了阎锡山的地盘山西——让记者们先到山西，是国民党中宣部的精心策划：一是避开胡宗南设在西安至延安的军事封锁线，以免让记者们发现那条对共产党的军事封锁线确实存在；二是从山西进入陕北要走一条陕甘宁腹地的偏僻路线，那里是中国有名的贫穷落后之地，延安的共产党人因为鞭长莫及必定来不及粉饰；三是用山西之行冲淡记者们的兴奋，先不说阎锡山那三寸不烂之舌和稀奇古怪的理论能把记者们搞得晕头转向，就是山西西北大山里的长途跋涉也能把记者们弄得筋疲力尽，兴致全无。

五月三十一日，记者们终于离开了阎锡山所在的吉县，在马背上颠簸一整天后再渡黄河，进入了陕北的凉水崖。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兼延安警备区司令王震已经率部在这里等候他们，并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欢迎茶话会。尽管路途劳顿，但进入共产党区域的记者们还是很兴奋。《中央日报》和中央社的记者到处乱转时，很快就发现山沟里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苗。国民党中宣部多年说共产党在陕北种植鸦片，当他们追问当地农民这是什么苗时，不愿意搭理他们的农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两位记者认定是罂粟，拔了几棵回来让大家拍照，结果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连外国记者都一眼看出这是几棵普通的青菜幼苗。又骑了几天骡子，参观团抵达南泥湾。记者们参观了八路军自力更生的劳动成果，参观了八路军在前方缴获的日军武器展览。在参观八路军医院时，记者们对共产党军队缺少医药的状况很是吃惊，继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对日作战精神可嘉，当即给重庆国民政府打电报让他们把药品运过来。

六月九日，记者们终于抵达延安。他们在重庆看到的几乎全都是延安破衣烂衫的报道，可眼下仅在早餐他们就吃到了稀饭、馒头、鸡蛋、

牛奶和面包。十日下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王家坪大礼堂为他们设宴，参加宴会的不但有延安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还有文化界人士以及劳动模范。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后，爱泼斯坦代表记者们发表讲话，他说在同盟国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被关闭起来，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让作为世界眼睛的新闻记者进入。现在，延安的大门打开了，打开了就关不上了。记者们先后参观了边区政府、新华社、《解放日报》社、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光华农场、被服厂、造纸厂、皮革厂等等，与国统区对共产党的宣传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中国的西北竟然存在这样一个恍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对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单独采访，在临行前被明令禁止。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都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记者们发现，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更像和蔼可亲的学者与智者。

所有的人都露出一副愉快的笑容，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这是装出来的。以朱德为例，他五十八岁，鼻子扁平，身体强壮……有一天我在他的司令部里谈了两个小时，他坚持要我留下吃午饭。我们就座时，他的参谋长叶剑英恰好来到，他刚结束了跟戴维斯的谈话，于是我们就一起共进午餐。我们就像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那样自由自在，我们走到阳光普照的花园里做文字游戏，看谁能在一个句子里把"所谓"这个词用得最多。譬如说，"所谓蒋总统领导下的所谓重庆政府，正在设法从所谓前线救出所谓国民党军队"。我们谈笑风生，吃着冰凉的梨，休闲地喝着茶。

毛泽东向记者们明确表示，为了打倒日本军阀和一切法西斯，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现在，赢得对日战争胜利的目的还缺一个，那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也是建设新中国必需的前提。叶剑英向记者们作了军事报告，全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在华北、华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

共产党对一九四四年发生的事件了若指掌。他们对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困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清楚。国民党军队正在瓦解，日本人鲸吞了好几个省份；共产党人则在日本人向前推进以后组织反攻。他们认为，落入日本人手里的任何东西，他们都可以加以破坏和改组，而且组织工作进行得比共产党人所预期的还要快。蒋介石在六个月里丧失了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力却每周都在成倍地增加。他们已经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起至少十六个区域性的政治——军事根据地，这

些根据地都被叫做“解放区”。他们控制的某些解放区，方圆一二百英里，日本人和国民党都不敢进去，那里只有他们成立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政治问题是怎样把所有这些解放区组织成一个“人民政府”，从而成为一个能控制他们所保护的九千万人民的真正的政府。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美国记者谈到，共产党武装力量完全有能力配合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行动：“假如美国人要在上海和山东半岛之间的任何地点登陆，并于事前及早通知，我们就能向你们保证立即提供一百万正规军队。”在美军登陆时，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系统，更是八路军和民兵的拿手好戏——一九四〇年的百团大战曾彻底破坏了侵华日军在华北的铁路交通，日本人用了三到六个月才将其修复，现在八路军完全能再次切断黄河以北的铁路交通——“要求拆掉多长铁路，就能拆多长。”

不少记者要求去前线看看八路军如何打仗。参观团的领队国民党外事局和新闻局的官员坚决不同意，结果中国记者一个也没去，外国记者中除了那位坚决反共的神父之外全部去了晋南根据地。他们见到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说八路军官兵可以在距敌五六百米的距离有效地使用来复枪，但他们宁愿与敌人进行近战。一个月前，七百人的日军特遣队进入了八路军的防区，八路军一路观察他们，直到他们“走上一条山谷”，而八路军早在山谷两侧部署了兵力。八路军的来复枪和机枪开火了，日军用炮火回击，但他们看不见隐藏在山上的八路军。战斗持续一天，日军丢下九十具尸体撤退了，而八路军无一伤亡。刘伯承还得意地告诉记者，在河北西部的临城，妇女们通常穿颜色鲜艳的衣裤。几个游击队员就穿上这样的女装从村里向县城走去。结果有十几个鬼子开始追他们，“他们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河谷”，而那里的灌木丛中埋伏着八路军，等鬼子过来时，“他们所追赶的就不再是妇女了”。记者们对八路军的作战充满了好奇，一致要求亲眼看看，他们在距离汾阳城仅五公里的山头上，观看了八路军晋绥第八分区官兵袭击日军大营盘、火车站和飞机场的战斗，惊心动魄的实战搏斗令记者们热血沸腾。在观看八路军攻打日军的一个大据点时，记者们真切感受到了共产党军队和老百姓生死相依的关系：午夜时分，信号弹升上夜空，日军大据点的大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原来据点里做杂役的老百姓冒死与八路军里应外合。八路军官兵勇敢地冲进去，据点里的日伪军猝不及防，激烈的肉搏战后，八路军和民兵在日出时分押着大批日军俘虏回来了。乡亲们把八路军伤员抬进自己家里安顿妥当，妇女、孩子和老人则带着吃的和喝的把八路军官兵围住问长问短。记者们每个人都得到了礼物：除一支

缴获的手枪外，还有日军的太阳旗、军服、肩章、护身符、子弹盒、饭包和烟酒罐头。《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为他额外获得了一把日军指挥刀而喜出望外："到延安之前，我们听到西安某高级长官说，共产党已六年不抗战了。今天，这些话已被事实揭穿。我看到八路军在英勇作战，抓了一批日军俘虏，人民是真正热爱八路军的。"

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战争的磨难中成长壮大，这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一九四四年，无论是战争形势还是国内政治，中国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在中国执政——"我对蒋的政府性质表示不满"，"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至于为什么正在战争中的美国人对国民党执政下的中国政治制度是否符合"现代的民主"如此热心，甚至偏离了美国人一贯秉承的反共政治立场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呼吁，其动机令人疑惑。可以解释得通的，似乎也只有必须赢得对日战争最后胜利这条理由。——美国人越来越感到决战时刻的迫近，而中国盟友蒋介石政权的现状令美国人对决战前景感到了不安。史迪威一直坚持的主张具有某种代表性：指望腐败政治下的国民党军队来支撑中国战场不那么靠得住，为了打垮日本人，就必须把共产党的抗日军队彻底纳入战争的序列中来。

实际上，蒋介石在罗斯福提出这个建议前，曾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政治谈判，正是"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军队趁机向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施加军事压力的时候。蒋介石的邀请没有得到共产党方面的任何回应。进入一九四四年后，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对日进行反攻，共产党方面决定和国民党就谈判问题取得联系，并很快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响应。

国民党内定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的基本原则是：中共军队要绝对服从重庆的军令；人事要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法规办理；军事参谋和政工人员应该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该遵照中央颁发的教育大纲执行；八路军可以增为两个军的编制，但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或其他名目的部队；陕甘宁边区改名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改名为陕北行政行署，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行署主任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如果按照这些条件执行，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力量就等于被解散

了。

五月二日，共产党谈判代表林伯渠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共产党方面提出了五点要求：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上述第一点即遭到国民党代表的拒绝。于是双方避开这一问题，先就军事和边区问题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为了达成协定，共产党方面作出巨大让步。关于八路军的编制问题，林伯渠说，现在共产党的正规军已达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至少要编成四十七个师，但目前只要求先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关于边区问题，必须保持边区的辖区和民主制度不变。经过数次谈判，最后将历次会谈的不同意见整理成一个会谈记录，准备双方签字后，送达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

会谈记录整理了四大项共十七条：

甲、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者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人家属。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销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于抗战的原则去解决。

但是，共产党一方在文件上签字后，国民党一方突然反悔不肯签字了。

谈判移到重庆继续进行，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无论共产党一方如何让步，国民党一方的立场始终没有松动的迹象。

关于国民党方面的企图，周恩来后来总结说：“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

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死结。

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政治僵局感到万分焦灼。

美国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曾问到有没有希望“解开这个结”，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结没有办法解开”。毛泽东认为，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因为“国民党希望美国人打败日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回师消灭这个共产党”。但是，毛泽东仍然表示，现在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决不会提出推翻国民政府的口号，也决不会去进攻国民党军队；如果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是要抵抗一下的。至于美国人向国民党军队提供的现代化武器，毛泽东认为，这些美国武器将会被用于对付共产党。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对国共双方都不供应军需物资。——“如果美国一定要那样做，他就要求美国以国共双方对日抗战的贡献为比例，把军需物资分配给两方。”

住在陕北窑洞中的毛泽东，此刻对是否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八路军和新四军最终能获得多少编制，重庆方面把陕甘宁这块地方称呼为什么，以及是否能够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地参与执政，仿佛并没有特别地在意或计较。在国共两党的代表争吵不休的时候，毛泽东给各根据地的领导人发去一封很长的电报，电报中开列了十个问题，要求各根据地领导人予以详细回答。这些问题并没有涉及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甚至没有涉及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在进行的反攻作战：

一、党内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是否产生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的现象是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些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即由于敌人挑拨所造成的根据地与沦陷区、接敌区群众之间的对立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致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做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进行这种转变？

总之，毛泽东最想知道的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的各项工作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共产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以及怎样才能得到这种真心拥护？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殚精竭虑地求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但是，依据共产党人的政治信念，能够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即是否得到了本国最广大的人民的拥戴与支持。

人民的命运，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或许，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分歧所在。

这也是美国人尚未意识到或许永远也不会意识到的。

到敌人后方去！

把敌人赶出境！

此刻，在遥远的国境线以外，中国军人正在与美国军人联合作战，战场上频频得胜的捷报不断传来。

共产党军队于敌后战场的大举反攻，国民党远征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大举反攻，一北一南遥相呼应，使得一九四四年的纷乱世事中终于闪现出一道曙光。这道弥足珍贵的曙光五彩斑斓地光耀在国人的心头，令历尽战争苦难和沧桑的中国为之一振。

第三十八章

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一九四二年缅甸失守后，尽管滇缅公路被切断了，抗战中国的国际援助只能依靠运量有限的“驼峰航线”支撑，但英国人还是认为他们的损失最大。日军占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着印度东部，而印度是大英帝国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也是其在亚洲的核心军事基地。丘吉尔担心如果中国战场崩溃，日军至少能够腾出十五至二十个师团进攻印度；一旦印度失守，日军便可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军的海上运输线，在军事上与德国相互呼应。到那时，英国人的末日也就来了。

对美国而言，缅甸的失守也干扰了美国“先欧后亚”的整体战略。在与日本争夺太平洋控制权的同时，美国人希望通往中国的运输补给线畅通无阻，以保持住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同时确保中国大陆未来作为攻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

因此，反攻缅甸的计划始终在酝酿之中。

中、美、英三国对于反攻缅甸没有分歧，但在如何反攻以及何时反攻等具体问题上，虽经反复磋商，始终争执不休，以致反攻缅甸的计划被拖延了将近两年。拖延的根本原因，还是各国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并持有不同的战略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结束，中国人对利用盟国的军事力量在亚洲结束战争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发现美英秉承的“先欧后亚”的战略无法改变，对日作战始终被美英置于次要地位，中国战场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那里只是一个泄洪区——利用中国牵制并拖住日军，把日军这股浑浊的洪水拦蓄在中国战场上——因此，美英对中国的所有援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让这个“泄洪区”的大坝垮了。对此，蒋介石的基本立场是：如果反攻缅甸，中、美、英须一起作战。中国军队在一九四二年第一次入缅时已有血的教训，决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美国人虽然对反攻缅甸态度积极，但基于“先欧后亚”的战略必须首先顾及欧洲战场，不可能派出足够的部队，特别是陆军主力参加缅甸作战，也不可能单独承担缅甸作战期间所需全部军事物资的供应。目前，

美国人能做的是，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同时督促英国人赶快行动。

英国人在“先欧后亚”的战略上与美国人一致，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有自己的小九九。英国人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英国本土是战争的枢纽，确保本土安全最为重要，即使马来亚、印度，乃至亚洲所有的殖民地全部丢失，只要保住本土，战争就可以坚持下去。因此，虽然他们为缅甸失守感到痛心，为日军有可能攻击印度感到担忧，但仍秉持这样一种应对方略：只要日本不主动进攻印度，英国就不用急于反攻缅甸。等到美国对日本实施大反攻，甚至等到美国兵踏上日本本土的那一刻，日本人自然也没有力量守卫缅甸了，英国便可坐享其成地收复缅甸。所以，没什么理由让英军马上就与日军在缅甸拼命。同时，英国人始终不赞成把中国大陆当成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认为盟军完全可以从海上给予日本毁灭性的打击。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心知肚明，英国人最大的心结他们无法明确说出口，那就是防止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即使目的是为英属缅甸驱逐日本人。英国人的担心是：中国和缅甸是邻国，历史上往来密切，现在缅甸正在兴起反对殖民的独立运动，一旦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境内，很可能和缅甸人一起不仅打日本人也打英国人，那时候中国就可以取代英国成为缅甸殖民地的主人了。——英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有句俗语叫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由于第一次指挥入缅作战失败，史迪威重新夺回缅甸的决心钢铁一般坚定。他的反攻设想是：利用美国运至印度的装备，训练中国陆军的两个军，指挥他们由印度攻入缅甸；与此同时，保持在云南西部的中国军队大举入缅策应，东西两路夹击，一举打通中印公路。然后挥师向南打到仰光，把日本人赶下印度洋，收复缅甸全境。——“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史迪威致电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要求至少给他派一个陆军师来，“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地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史迪威的全盘计划，被盟军方面称为“安纳吉姆计划”。计划之雄心勃勃令人吃惊，其作战目的甚至包括一举收复越南、泰国、中国的海南岛和广州城——此时的史迪威并不认为他仅是美国陆军部派到中国战场的一位普通军事将领，他自觉至少是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的盟军方统帅。第一步，英国出三个师，美国出一个师，中国出两个师，由印度的阿萨姆向东入缅，分别经过加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同时，中国再出十二个师由滇西向西攻击，占领缅甸东北部的腊

戍和八莫后，与从印度入缅的中、美、英联军在曼德勒会师。第二步，入缅大军呈扇形展开南下，直趋缅甸南部和首都仰光，向印度洋海岸驱赶日军；而英国海军和空军借陆军进攻之机，重新确立孟加拉湾制海权，收复安达曼群岛，并派出强有力的部队从仰光登陆，南北夹击，水陆并用，一鼓作气，拿下仰光。第三步，在收复缅甸后，集结中、美、英联军主力挥师向东，收复泰国和越南，直达中国北部湾沿海；而此时中国军队再出动九个师，从滇越边境向越南出击，攻占河内和海防港，最终夺回海南岛、香港和广州。在这一反攻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将分成两路，向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发动全面攻击，阻断日军的增援，彻底摧毁日军在台湾和菲律宾的海军能力。结局是：不仅在缅甸，包括整个东南亚以及南中国，日本人将被歼灭殆尽，盟军的旗帜高高飘扬。

……日本人在缅甸得手后不久，美国就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空中航线，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冒着风险开始向中国西部空运物资。但驼峰航线仅仅是一项应急措施。众所周知，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开辟一条突破日本封锁的道路，使足够装备全军的物资从陆路或水上得以发运。缅甸看起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起始点，因此在史迪威的参谋部里，收复缅甸成为一个使人着迷的话题，一个发自内心又令人向往的目标。

“安纳吉姆计划”正是中国人所期望的。

除了不能将兵力派往缅甸外，美国人没提出反对意见。

而英国人却被这一庞大的计划吓坏了。

史迪威就这一计划，与英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反复磋商。韦维尔表示，英国的海空军能否调来缅甸南部他说了不算，即使调来，能否控制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也不可预知。虽然现在让英军收复仰光是难以做到的，但他坚决拒绝中国军队南下仰光，要求中国军队推进到缅北的胡康河谷（又译胡冈河谷）一带就必须止步。——“他们不想要中国人参与收复缅甸，韦维尔说得很明白，不欢迎中国人。没有地方，没有运输工具，没有供应，或其他东西。”史迪威据理力争的结果是：由他指挥中国驻印军攻占缅北的密支那和八莫，以便利用密支那机场，与从云南边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

英国人的不合作，给了史迪威沉重打击。在向蒋介石汇报时，他不

得不缩小“安纳吉姆计划”：使用印缅军六个师以及英军的一个师夺取密支那；中国滇西部队若干师同时出击夺取曼德勒。蒋介石表示，中国可以出动十个师的兵力，前提是英国人必须调来足够的海空军，夺取并掌握孟加拉湾以及缅甸全境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英国人还要负责阻击日军可能从新加坡等处对仰光的增援。蒋介石认为，如果英国人做得到，此战稳操胜券；如果英国人做不到，此战注定失败。而“中国军队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

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如同一个大楔子向南插在西边的英属印度和东面的中国之间。要想将日军赶出缅甸的丛林地带，并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这就需要英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合作。史迪威的任务就是力劝、请求、威吓以至乞求中英双方——他对两者并没有真正的指挥权——组织战斗，立即收复缅甸北部，以打破日本的封锁……从理论上讲，中英双方都肯定实施缅甸战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双方又都不愿提供作战所需要的部队。

史迪威缩小了的作战计划，经过中、美、英三国讨价还价，最终似乎取得了一致：一九四三年春天发动攻势，从印度的阿萨姆方向打开一条通道，与滇缅公路连接起来，以打通进入中国的外援补给线。中国的驻印军和滇西部队按计划实施作战，英军则负责从战场西部进攻策应作战。——这一磋商的结果，将作战限定在了缅北的狭窄区域内。至于英国人在仰光的两栖登陆，各方都回避了这一话题，既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彻底否定。

可是，没过多久，这一方案被英国人否定了。

韦维尔通知史迪威：英军将用三个师组成一条防线以保卫印度，对于反攻缅甸的作战不能给出任何承诺。

史迪威对英国人的愤怒无以复加。

他不知道英国人给他造成的磨难还在后面。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高级军事幕僚，在北非摩洛哥举行讨论今后战争总体战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由于欧洲战场局面大好，对日作战便被列入会议议程，而反攻缅甸是需要讨论的重要事项。可是，讨论亚洲地区的对日作战问题，竟然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虽然话题总是围绕着中国。此时，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得艰苦，与日军进行的残酷岛屿争夺战令美军伤亡严重。所以，美国人认为，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来对付日本是最有效的办法，中国战场的前景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前景是无法分割的。美国人坚决要求尽快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说：“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方面来看，俄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对付德国；在太平洋，中国和日本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的基本政策应是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装备，使他们能够作战”。而反攻缅甸，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线，正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更是强调，英军必须与中国军队联合进攻以牵制日军。如果英国人不这样做，不但是太平洋战场的灾难，也会断送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他认为，反攻缅甸并打通进入中国的通道，便于日后集结空中力量打击日本本土，因为“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的一系列岛屿来进攻日本，远比从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困难得多”。美国人敦促英国人发动缅甸战役的最终理由是：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不打谁来打？

英国人以无法提供在缅甸南部进行两栖作战的舰船以及怀疑同盟国能否提供足够的补给和医疗保障为由，拒绝任何承诺。甚至提出，如果必须由英军登陆仰光，就要减少英国在欧洲战场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任务。

面对英国人的讹诈，美国人发出了这样的威胁：除非英军实施反攻缅甸的作战，否则“美国不得不遗憾地取消对欧洲战场所承担的义务”。

没有美国人，英国人恐怕连本土都难以保住。

英国决定实施缩小了的“安纳吉姆计划”，预定的战役发动时间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

美国人接着给了英国人一个台阶：“美国将帮助补足登陆舰艇和海军方面的缺乏，舰艇和海军将从太平洋抽调。”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派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率领特别代表团飞赴中国，向蒋介石通报会议情况。代表团途经印度时，阿诺德和韦维尔、史迪威一起，就反攻缅甸计划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这份作战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的条件是：每个月经喜马拉雅航线运输一万吨的补给，至本年度十一月底支援中国五百架作战飞机。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美、英三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中方与会代表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会议达成的最终作战计划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为作战期；英军三个师由加里瓦出击；中国驻印军向胡康河谷出击；滇西中国远征军向腊戍方向出击；英国海军封锁仰光海岸，并攻占缅甸西海岸的实兑和兰里岛，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前占领仰光。

这是“安纳吉姆计划”的最后定案。

可是，仅仅一个月后，英国人又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仍然是没有足够的舰船：目前北非战场几乎占用了英军的全部舰船，根本不可能在缅甸对仰光实施两栖登陆作战。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高级军事幕僚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这一次，不但邀请了中国代表宋子文出席，还特别邀请了韦维尔、史迪威和陈纳德列席。会议在讨论“安纳吉姆计划”时再次爆发激烈的争执：丘吉尔声称，让日本人在缅甸待着吧，盟军完全可以绕过缅甸，先“攻占苏门答腊的北端，作为进攻新加坡的第一步”；而中国方面态度强硬，表示如果英国人不但不出兵，还限制中国军队必须停止在曼德勒附近，反攻缅甸不但对中国战场没有任何帮助，还要让中国官兵付出巨大的牺牲，中国绝对不干。

至少美国人对丘吉尔如此固执的原因明白无误：“英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战争结束时，取得日本曾经拥有的那种强大地位。如果中国居于强大的地位，英国的旗帜就不能长期在香港上空飘扬了。”——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列强对待中国的一个原则始终如一，那就是决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因为中国一旦强大，列强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权益就将受到质疑或者发生动摇。这一原则演变至今，便是列强世界流行的一个理论体系，叫作“中国威胁论”。

面对中国和英国的各不相让，美国人提出了一个以收复缅北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计划，即“茶碟计划”。这一计划将本已缩小的“安纳吉姆计划”再次缩小——主要是缩小了英国人在反攻缅甸作战中承担的义务，但却大大加重了中国军队的负担，使得在收复缅甸的作战中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成为主攻，英军只是助攻：“配合从云南出发的中国军队的进攻，采取强大的、进攻性的陆空军事行动，从阿萨姆经过利多和英帕尔向缅甸挺进，以期达到下列目的：尽可能牵制最多的日本部队，掩护去中国的空中路线以及作为打通滇缅公路的重要步骤。”——“茶碟计划”中

没有攻占仰光的内容，这就意味着，从仰光港北上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在一九四四年仍旧不通。

为了安抚恼怒的蒋介石，罗斯福给蒋介石颁发了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最高荣誉军团勋章由华盛顿设立，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蒋介石在勉强同意“茶碟计划”的同时依旧强调：尽管中国确实有优厚的人力资源，但中国人的命也是命，缅甸作战绝不是中国一家的事，美国应派遣强大的地面部队参战，而英军必须控制孟加拉湾以及缅甸全境的制空权。

“茶碟”在桌子上一放又是三个月。

一九四三年夏，美英首脑和高级军事幕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议，中国没有被邀请。会议在达成“打败德国后十二个月内必须打败日本”以及“美国向太平洋吉尔伯特岛和马绍尔群岛进攻”的两项决定后，再次讨论了反攻缅甸问题。美国人敦促英国在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同时，与中美两国军队联合对日作战，以尽早收复缅甸。英国人在中国不在场的情况下对美国人实话实说了：中国并非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战后的强大很可能是大英帝国远东厄运的开始。印度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可印度人独立的愿望比缅甸人还强烈，如果让英军从印度反攻缅甸，参战的印军是否真心为英国打仗很难说。所以，如果非要实施反攻缅甸作战，英国人所能做的仅是为支持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冒险助攻一下而已。

美英首脑最终达成了妥协：以夺取密支那、实兑和兰里岛为作战目标，成立一个东南亚战区盟军统帅部，统帅部总司令是英国驻印度总督、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副总司令是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打仗以中国人为主，指挥权却被美英瓜分了。

为了说服蒋介石，蒙巴顿来到中国当面向蒋介石解释。蒋介石再次强调：反攻作战的胜败不仅仅在陆地，必须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行，英国应该派遣强大的舰队控制缅甸南部海面，阻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总之，反攻缅甸只有南北夹击才有胜算。另外，要绝对保证对中国的空运始终维持在每月一万吨的水平。蒙巴顿承诺，英国海军的增援舰船不久就可抵达，盟军每月为中国空运一万吨的军用物资不成问题。可是，会见结束后，蒋介石私下嘱咐参谋总长何应钦，中国军队的出击要谨慎从事，英美不控制孟加拉湾，不从缅甸南部配合夹击，中国军队绝不出兵。

转眼又过了半年。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上，蒙巴顿报告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这位勋爵把他的计划取名为“锦标保持人”。“锦标保持人”含糊不清，仅规定了占领缅甸北部的孟拱、密支那和八莫，没有明确攻占上述三地后的行动，也没有提及英军在缅甸南部的两栖作战和水陆夹击，甚至连攻占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的行动都没有。蒋介石认为，这一计划满足不了中国打通滇缅公路的战略需求。美军的参谋长们对蒋介石表示了高度支持，由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决心支持中国。他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可以向英国提供登陆必需的舰船，督促英军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配合中国远征军对缅甸境内的日军实施南北夹击。为了鼓舞蒋介石的斗志，罗斯福还答应着手制订装备中国九十个陆军师以及向中国贷款十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开罗会议结束，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去德黑兰会见斯大林时，丘吉尔得到了苏联在打败希特勒后发动对日作战的承诺，于是更加坚定了反对缅甸作战的理由。丘吉尔认为，只要苏联出兵，日本必定崩溃，那时候缅甸不战便可回到英国人手里。因此，无论美国准备提供多少登陆舰船，英国人不但自己不参加缅甸作战，更不准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南部。

斯大林对日作战的承诺，也改变了罗斯福的态度。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由于欧洲将有一场大战，美国不能供应足够的登陆舰船到孟加拉湾，反攻缅甸作战要么按照“茶碟计划”去打，要么推迟到一九四五年底再说。——罗斯福也知道，如果斯大林说话算话，到了一九四五年底，日本在苏联的打击下早就垮了，那时候也就没有缅甸作战这回事了。

可是，美国的军人们——包括史迪威在内——完全是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关心的不是政客们的勾心斗角，而是如何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时为进攻日本本土进行富有成效的准备。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认为：“只要我们的空军力量打击了日本，日本就会向我们反扑，那时保护机场的任务就得依靠中国军队”，因此美国必须支持中国战场，而目前支持中国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这是要考虑的最严肃的问题”。即使“未来增强空军对日本的出击”，也“需要中国地面部队配合”，中国战场无论如何不能垮。如果不打通滇缅公路，仅仅依靠“驼峰航线”，很难说中国战场能撑到一九四五年底。出于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利益的考虑，罗斯福的态度悄然发生了改变。他私下向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缅甸反攻随时可以开始，届时不管英国人的态度如何，美国当鼎力相助，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

在长达两年的争执中，蒋介石虽然态度强硬，但他明白在列强为自身利益争斗的夹缝中，中国除了隐忍负重之外别无选择。滇西和缅北之战早晚要实施，只有把滇西和缅北的日军打垮，才能确保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畅通，抗战中国的后方才能稳固，大量的美援才能源源不断地运至重庆。更何况，美国人为了未来的对日决战，也有维持中国战场地位的愿望。最低限度，可将缅北的密支那机场夺回来，这样美国运输机就能避开危险的“驼峰航线”，更多的美国飞行员会因此活到战争结束。所以，无论在反攻缅甸的问题上如何争执，中国方面一直在进行着作战准备。

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撤退时分成了两部分：远征军主力撤回到云南西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六百余人以及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四千余人撤退到印缅交界处的英帕尔，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军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四千五百余人撤退到印度东北部的迪布鲁加尔（今迪布鲁格尔）。由于日军从缅北突入中国云南边境，重庆军事委员会急调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填补云南边防。宋希濂的部队炸断怒江上的惠通桥后，中日两军隔着怒江天堑形成重兵对峙。这时候，蒋介石立即开始大规模地整编部队：撤回来的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九师番号被撤销，保留新编第二十八师番号，编入第七十一军序列，同时把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归第十一集团军直接指挥。撤回来的第六军，取消其暂编第五十五师番号，余部编入第九十三师，在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国境线；第五十四军由昆明向边境开进，归宋希濂指挥。到一九四三年，在滇西方向，中国军队共计有第十一集团军的八个师和第二十集团军的四个师。

一九四三年二月，陈诚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以昆明为基地，开始了对集结在云南境内的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培训，计划参加培训的部队共计三十二个师，预计训练完成后编成二十四个新式攻击师、两个旧式攻击师和六个调整师，总兵力达四十一万。为提高军官的作战素质并掌握美式装备，蒋介石在昆明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并亲任团长，训练团先后举办了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和战术等训练班，训练对象主要是部队团以下的各级军官。至一九四四年，先后有一万多名军官接受了训练。而团以上军官，则被分批空运到印度，接受美式军事训练。

十月，陈诚因病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此时滇西地区的中国军队经过整训，面貌一新。每个军辖

二至三个师，每个师编制为一万三千余人，尽管仍然缺额，但基本各师都保持着八千兵力。军直属部队有炮兵团或炮兵营，还有辎重营、工兵营、通信营、战防炮营、特务营和搜索营。最为重要的是，美式武器使得作战火力明显加强：每个军拥有一个榴弹炮营，每个师拥有一个山炮营，每个步兵团拥有一个战防炮连，每个营拥有一个火箭筒排。士兵使用的单兵武器也全是美式步枪或卡宾枪，威力强劲但外形小巧的美式手雷得到了中国士兵的普遍喜爱。

真正全面接受美式军事训练的中国军队当属驻印军。

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部队退入印度后，史迪威向蒋介石呈送了一份《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史迪威表示，通往中国的运输线路已被日军切断，今后美国的武器装备很难运进中国，建议精选十万中国官兵分批空运到印度，让他们在那里接受美军教官的训练。训练规模应该能够组成两个军六个师，再加上一个步兵师和六个伞兵营的预备队以及若干的炮兵和坦克部队。在印度，还可以轮训空运来的中国军队军官，这些军官回国后将作为教官训练国内更多的士兵。史迪威的训练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介石指示先空运五万官兵去印度接受训练，并任命史迪威和罗卓英为中国驻印军的正、副总指挥。

史迪威的计划显然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原本计划让撤退到印度的远征军部队经西藏返回国内，但如果能在印度接受训练并装备美式武器，显然比费时费力地回国要合算得多。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还承诺，在训练和装备驻印军的同时，另以美式武器全面装备国民党军的第二、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七十一、第七十、第七十四、第七十九、第八十五、第九十四共计十三个军。在蒋介石看来，这不但能全面提升素质低下、武器简陋的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能力，而且一旦哪天需要与共产党一决胜负的时候，手中拥有十多个美械军一定会胜券在握。

史迪威的建议也符合美国陆军部“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的初衷。美国不缺钱也不缺武器，就是缺人。因此，美国陆军部很快批准了史迪威的计划，表示中国军队的质量提升符合美国利益，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取得战果将是美国继续支持中国的唯一保证，美国愿意为中国军队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派出最好的军事教官。

中国驻印军在印度的存在以及即将进行的反攻缅甸作战，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在为英国的殖民地作战，因此英国人必须做点什么。经过反

复磋商，英国人终于同意把可以容纳数万官兵的兰姆伽兵营腾出来，供中国驻印军使用；同时为中国驻印军支付所有的生活费用，包括膳食费和官兵的薪金。

兰姆伽兵营的军事训练一开始，中国方面以每次数百人的规模向印度空运中国官兵。由于每个人都要经过美国军医的体检，而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导致按照美国的标准几乎都不合格，降低标准之后还是有不少人被淘汰，最终被空运至印度的中国官兵不足四万。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开始了特殊的生命历程。美军教官的训练方式与中国军队完全不同。美国人把训练场当工厂，把士兵当原料，分工细致，要求严格，用最简单的、最实用的方式将每个士兵迅速地加工成合格产品。队列、操枪等形式上的动作适可而止；长官检阅和升国旗时身体站直就可以了；因为有强大的炮兵、工兵和航空兵，美军不重视挖战壕、修掩体等土工作业，更不搞中国军队热衷的夜战，因为美国人晚上基本不打仗。美军教官只是在战术、武器使用和技术性很强的专业上进行强化教学。由于语言障碍，美军的教学基本上靠示范，而中国人善于模仿的天赋令美国人惊讶不已："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乡下农民，一个星期就学会了使用手榴弹和机枪，并且兴致勃勃地学习操作战地电话和电台。后来的作战中，一些个人受到嘉奖，这是中国士兵第一次受到嘉奖。"

驻印军官兵的生活待遇是国内无法想象的。军装由英国供给由美军转发，除了全套的夏装之外，还外加呢夹克和毛衣。主食以大米和面包为主，肉类、蛋奶和蔬菜供应充足。由于战时运输紧张，罐头食品占据很大比例，吃久了容易腻烦，但高质量、高热量的食品给中国官兵注入了充沛的体力。士兵每天都要服用预防疟疾的药品并配发防蚊油，以美军军医为主的野战医院设备先进，负伤或患病都有美军的小型飞机接送。令驻印军官兵感到与国内最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腐败军官克扣他们的军饷和伙食。为了严防国民党军克扣军饷的恶习在驻印军中重演，美国人取消了将军饷交给长官发放的惯例，以公开点名的方式将每一份军饷发放给每一名士兵。美军"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追送补给制"，杜绝了国民党军队陈腐落后的供给漏洞。这里也没有国内普遍存在的逃兵现象。官兵们远离祖国，归家心切，但爱国热情始终高涨，"打回祖国去"是大家共同的口号。

毫无疑问，美军秉承的建军理念，在文化上对中国官兵影响极大。自觉守纪，遵守时间，讲求效率，忠于职守，热爱荣誉，爱护战友，勇于牺牲和渴望胜利等品质，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中国官兵的基本素质。但

是，也正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对中国人惯有的歧视，渐渐引发了双方的矛盾冲突。兵是中国兵，统帅却是美国人，史迪威在中国官兵心中是“皇上”派来的严酷的“监军”，而中国官兵憎恶的“皇上”就是总在中国人面前摆出“施主”姿态的美国人。

史迪威多年前曾任美国驻华武官，他对中国政府官员、中国军队将领以及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既了如指掌又深恶痛绝。在他的心目中，蒋介石政权对中国百姓的苦难无动于衷，充斥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是腐败、无能和失职；而中国军队的多数将领为了一己私利随时可以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作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们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

“花生米”是史迪威私下给蒋介石起的绰号。

在政治上，史迪威无疑是美国的代言人，他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同时负责监督数额巨大的美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防止用美国纳税人的钱采购的物资和装备被中国军政权力阶层中饱私囊。一九四二年入缅作战的失败，令他决心用美国的装备和中国的人力打回去。他对掌握中国反攻缅甸军队的指挥权抱有极大的渴望，而这一点恰是把权力当成第一要务的蒋介石、视兵权为命根子的中国军队将领不能容忍的。——史迪威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间的矛盾，无不起源于他对中国人固有的看法、他倔强而固执的性格、他不顾一切反攻缅甸的强硬意志。

在史迪威看来，中国人将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的习性，导致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次次军事失利。比如侧翼部队每一次都不会竭尽全力援助正面受敌的友军。但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士兵吃苦耐劳，能够接受并忍受长时间的奔袭、作战以及饥饿、伤病，只要有好的将领，他们完全可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抗衡。所以，史迪威坚决要求驻印军“只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高级将领”，主张营以上军官全

部由美军担任。为此，专门从美国调来了三百多名军官。史迪威的这一主张，立即受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抵制。蒋介石虽然大为光火，但为了缓和关系，同意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出任总指挥。可这还不能令史迪威满足，他把调来的三百多名美军军官全部安排在驻印军各级指挥部里，名义上是联络员，实际上控制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只要美军联络员认为某个中国军官不好，不经过任何人就可以把这名军官撤职，直到这名军官上了回国的飞机，中国军队的将领们才会知道。史迪威的参谋长波德诺将军也是个中国通，还是个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相当严重的人。他坚持中国驻印军按照美军的惯例由参谋长直接指挥部队，中国的将领们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军队的惯例。由此，史迪威认为所有的中国将领无不碍手碍脚。他千方百计地压缩驻印军军级指挥部编制，以达到削弱军长职权的目的。按照他的规定，军部没有任何直属部队，能做的事仅是管理军容风纪。部队的指挥、训练、人事、财物等权力，全部集中在总指挥部。他还认为在他身边的中国军队将领无不心怀叵测，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鸣剑给国内军政部发了一封电报，因为电文没有经过史迪威审查，史迪威竟然不和重庆打招呼解除了温鸣剑的职务，然后指派兰姆伽兵营行政指挥官博金接替了副参谋长一职。此事在中国驻印军中引起大哗，严重激化了史迪威与中国军方的矛盾。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郑洞国致电重庆：

限本晚到。重庆。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何总长，商主任：六八二密。史迪威将军本日突然下令，调副参谋长温鸣剑为高参，委美人博金为副参谋长。查温自到职以来，努力整顿，遇事力持大体，成绩斐然，竟为宵小所陷，全军愤慨。假使必须更换，亦应报明中央明令处理，并仍以华人接替，方符中美合作之旨。自罗长官（罗卓英）奉调回国后，经半年之努力，中美关系已渐好转，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职虽极端忍耐，实无法维系军心，更何以言战斗。谨电鉴核，伏候钧裁，职郑洞国。

罗卓英在史迪威的一再要求下已被调回国内军政部。

蒋介石将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二十二师合编为新一军，由郑洞国出任军长，但部队可以归史迪威直接指挥。

第一次入缅作战结束后，史迪威去重庆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曾询问

罗卓英是否应留在印度，史迪威的回答是：“我两人合作无间，余甚喜其为人。”根据杜聿明的说法，那时的罗卓英唯史迪威之命是从。而当罗卓英成为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后，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将他调离的理由是：他想染指兰姆伽训练营地的指挥权；他要求把四十五万卢比的津贴交给他分发；当空运中国官兵的运输机只能挤进三十五到四十个人且绝不能有一个胖子时，罗卓英的指令是：“把五十个人光着身子塞进一架飞机”，因为他们也就“挤三个小时嘛”。

这位中国指挥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这些士兵定能领到新军服，让他们把旧军服穿走就是愚蠢，是浪费。部队分成小队从昆明乘飞机，都穿着短裤，唯一的行李就是防止呕吐用的纸袋。好几个人被冻死了。兰姆伽的接应人员要求在飞机上放上棉衣，供每趟乘坐飞机的中国兵御寒，但是中国当局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人们到了印度下了飞机之后感到寒冷和晕机，但是坐在阳光下晒个把钟头，大都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史迪威执拗地试图由他来完成对中国军队的改造，他不明白的是，“从根本上说，谁也不能违反统治者的意志来改造他的军队。不首先改造社会，就无法改造属于其产物的军队”。

一九四四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曙光初现，中国西南边境线内外的对日作战必须实施了。然而，单靠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把日军赶出西南国境，也无法重新控制缅甸北部使国际交通线畅通。所以，中国人必须和美国人联合在一起，无论中国人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列强存有怎样的复杂心绪。

中国和美国在那段历史中的关系微妙而奇特。

只要下决心干的事，美国人的求真务实与坚持不懈令中国人十分惊讶。无论英国人为缅北作战设置多少障碍，史迪威反攻缅甸的决心始终毫不动摇。美国军方对史迪威提出的各种要求——除了不能派遣陆军部队参战外——几乎都是有求必应。史迪威认为，如果中国驻印军要从利多攻入缅甸，就必须修筑一条从印度边境穿越缅北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以及纵横交错的湍急河流直通密支那和八莫的公路，并同时铺设一条可供机械化装备使用的输油管线。英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修出一条公路，其难度犹如架着梯子登天，史迪威不是异想天开就是精神错乱了。但美国陆军部认为，史迪威非常高瞻远瞩，这样一条公路对中、缅、印战场乃至整个东南亚战场只有好处。于是，立

即派遣安鲁逊准将和皮克准将率领美国航空工程团和机械化工兵团，带着大批的施工机械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印度。史迪威把这六千多美军工兵与中国驻印军的工兵团合编成一支中美联合工兵部队，由中缅印战区美军后勤供应总司令惠勒少将统一指挥。美国人的雷厉风行让英国人十分尴尬，英国人不得不出钱为中美联合工兵部队招募了一些印度和尼泊尔劳工。

中美联合工兵部队进入野人山区，在闷热的丛林峡谷中砍伐树木，开凿山岭，不顾毒蛇猛兽和蚂蟥蚊虫的袭击，风雨无阻地艰苦作业。山体塌方和洪水暴发曾让工程数次返工，但工兵作业依旧保持着每天推进一英里的高速，甚至还在这条公路上修建起数座可以通行中型坦克的坚固桥梁。美军的筑路部队和油管铺设部队，官兵大多数是黑人，他们身强力壮，吃苦耐劳，一丝不苟，日夜劳作，毫无怨言，其极端的尽职尽责是中国官兵前所未见的，其作业能力超强的机械化程度同样令中国官兵大开眼界。美军黑人士兵操纵着重型筑路机械，在丛林峡谷中披荆斩棘，所到之处无难不克，无坚不摧。一九四三年二月，这条起始于印度利多的公路，总长已铺设了四十三英里，到达印度东北部边境，即将进入缅甸北部。筑路部队官兵在这里竖起一块路标，上面写着："欢迎来缅甸，此路通向东京！"——中美联合工兵部队为反攻缅甸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筑路奇迹。

史迪威策划的缅北作战，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能否取胜还是令人生疑：面对缅甸境内多达数个师团的日军，英军虽然号称有六个师，可没有主动作战的欲望，能参战的只有一支归史迪威指挥的特种部队；中国驻印军虽然士气高涨，可目前仅有两个师，按照每师满员一万二千人计，与英军加起来总兵力不过四万。史迪威原指望马歇尔给他派来两到三个陆军师，可马歇尔只给他派来一支番号为"美国陆军第五三〇七团"的小部队。即使是这支小部队，也不是美军的正规军，而是由三千多名志愿者组成的民间武装。美国兵厌恶地说，这个团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洛杉矶街道上的一个通讯处！这群志愿者将自己部队的战场代号定为"抢劫者"，从代号就能看出他们不过是一群追求人生冒险的狂热分子。史迪威一直期望有一支能够"解决问题"的美军，而"第五三〇七团"的三个营中，居然有大量驻扎在特立明达的第三十三师的步兵——第三十三师被认为是美国陆军中的垃圾场，专门放置种种不合格和智力低下的人。正如他们的一位军官所说，他们来参加'抢劫者'突击队，只是从如下意义上说是志愿者，即'这些人只要能离开特立明达，什么事都愿意干。'"更令史迪威恼怒的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马歇

尔还应英国人的请求，把它交给了指挥着由英军和山民共同组成的“钦迪克远程突击队”的英军准将温格特。

为了掌握反攻缅甸的指挥权，史迪威怂恿蒋介石派出一支“中国远程突击队”，他希望把中国远程突击队与英军特种部队合编成“中英联合突击兵团”，由他亲自指挥。为此，中、美、英三方又开始了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史迪威如果指挥“中英联合突击兵团”，就必须接受英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斯利姆的统一指挥，而美国“抢劫者”部队的指挥权还属于温格特——阴郁多疑的英国人就喜欢这种互相矛盾错综复杂的指挥关系，如同他们喜欢伦敦令所有事物都影影绰绰的浓雾一样——史迪威无奈地表示：只要英国人参加反攻缅甸，他就可以在名义上隶属斯利姆。为了给史迪威一个台阶下，马歇尔同意“抢劫者”部队可以不参加英军每天例行的《天佑吾王》合唱，但在英军唱歌的时候这些美国人还是应该起立。但是，同时，马歇尔致信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如果透过表面现象，你将会发现，他（史迪威）希望的只不过是办事毫不拖延……他对任何进攻建议和作战方案都会拿出极大的精力、勇气、智谋和无限的才能与想象力。他的头脑比我们所有的将领机敏得多，他所经受的锻炼和理解能力达到了一种不平常的高度。他的缺点是对保守和行动迟缓有急躁情绪——但是在这次非常任务中是个好样的。”

更令反攻缅甸前景莫测的是，史迪威将反攻路线选在了印度东部重镇——英军军事基地英帕尔，因为从这里通向缅甸的地势相对平缓，有利于重型装备的开进。史迪威认为，中、美、英联军合力在这个方向东渡钦敦江，不但能迅速攻取孟拱和八莫等战略要点，还可以切断密支那铁路，断绝缅北日军的交通线，也有利于自身的后方补给和空中支援。如果作战进展顺利，驻印军在曼德勒附近与从中国云南西部出击的远征军会师后，就可直捣缅甸南部；如果这时英国人兑现在仰光登陆的承诺，收复缅甸全境应该胜券在握。但是，英国人坚决反对从英帕尔出击，理由还是那一条：中国军队不得涉足缅甸南部。——英国人把史迪威逼进了一条死胡同：中国驻印军只能从印度东北端的利多出发，进入被英国人称为“无法通过的谷地”的野人山中——胡康河谷，然后向南折往密支那，再从密支那以南的八莫附近打到滇缅公路上去。这条路易守难攻，将令日军处在“一人守隘，千人难过”的有利态势下。如果选择这条路线出击，对于中国驻印军来讲无异于背靠绝地而攻天险。

史迪威决心就从这条路打回缅甸去。

我们不得不通过一个耗子洞，还要一边前进一边继续打洞。这个耗

子洞就是三个河谷地带：胡康谷地，其重点是叫做坚布本（坚布山）的山脊；第二条是通往南北铁路干线的孟拱谷地；第三条就是位于铁路另一侧、是缅甸中央走廊的开阔的伊洛瓦底江谷地。日军在最北面的重要驻军和空军基地密支那，就位于孟拱谷地以南四十英里，在铁路线和河流的一侧；从密支那有一条公路向南，连接着通往中国境内的旧滇缅公路。指定北部战区司令部所属各部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茂密的丛林小路，长满枝藤，有的时候一小时只能前进一英里。这条路的两边是连绵的山脉，由于大雨的冲刷，山坡方向多变，这里是世界上最难作战的地方。

一九四三年十月，随着中美联合工兵部队即将向日军据守的新平洋推进，急需更大的掩护兵力。重庆军事委员会和盟军联合参谋部緩商后，决定中国驻印军于年底向缅甸发动反攻。

中国驻印军的反攻计划是：

第一，方针

（一）军以协同友军歼灭敌人之目的，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旬先向缅北进攻，夺取孟拱、密支那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前进，将敌压迫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而歼灭之。

第二，指导要领

（二）军应于攻势开始前集中于利多附近地区，俟利新（利多至新平洋）公路完成后，即向新平洋附近跃进。

（三）军集中时，应派有力部队占领新平洋以北各山路口，掩护集中及筑路。跃进时应增强掩护队兵力，推进至孟关东西之线，担任掩护及搜索敌情。

（四）军集中后，应分遣有力一部至葡萄附近，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附近之敌，并与滇西兵团联络。

（五）军应先发动攻势，将敌兵力吸引于缅北方面，使友军由缅南登陆容易。

（六）军攻势作战应分期实施，第一目标位于孟拱、密支那之线，第二目标为卡萨、八莫之线，第三目标为曼德勒。

（七）军攻击前进时应与友军密切联系，并对通敌各溪流小径严防敌之渗入及扰乱，确保军侧背之安全。

（八）敌如以重兵来犯，军应利用地形极力拒止而抑留之，俟友军攻势得手再勇猛前进，期与友军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九）敌如以少数兵力拒止我军或企图脱离战场时，军应迅速南下，做参加曼德勒会战之准备。

（十）要请美空军对缅北各要点尽量以轰炸摧毁，并配属有力空军协助本军作战。

（十一）军作战地域内之游击队应不断扰乱敌之后方，策应军之攻击。

第三，搜索及防空防毒

（十二）军航空队应搜索孟拱、密支那及卡萨、八莫方面之敌情，并妨害其行动。

（十三）高射炮营应沿东京路（由利多经新平洋至孟拱）逐次跃进，占领阵地，担任防空。

（十四）掩护队应努力搜索当面之敌情，并妨害其行动。

（十五）各部队前进间之防空自行处理，兵站及飞机场之防空由航空队长负责。

（十六）森林及隘路内之防毒由重迫击炮团（即化学兵团）担任之。

第四，兵团部署

（十七）左侧支队兵力约步兵两团、山炮兵一营，由利多

空运至葡萄，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之敌后，即向密支那前进。

（十八）右纵队以步兵一团、山炮兵一营为基干，由打洛经隆京向孟拱西侧地区前进，并酌派一部掩护右侧背之安全。

（十九）左纵队（军主力）沿东京路由新平洋向孟拱前进。

（二十）军直属部队随左纵队前进。

第五，通讯

（二十一）交通以东京路为主干，其道路、桥梁之修缮由工兵团担任之。

（二十二）军与各部队间之通信以有线电为主，无线电及飞机补助之。

（二十三）军与最高统帅部及友军间通信联络以无线电为主，有线电及飞机补助之。

（二十四）军与航空队间之通信由航空队通信队任之。

第六，补给卫生

（二十五）利多为兵站主地，应储备粮株三个月份、弹药三十基数及必要卫生材料。

（二十六）东京路为主要兵站线，除在沿线设置仓库补给站及空运投掷场外，并须准备能逐渐向孟拱、卡萨方面推进。

（二十七）各部队补给除利用汽车、驮马及人力输送外，并用飞机投掷。

（二十八）东京路沿线，应利用森林、房屋，设置医院及医疗所收容伤病官兵。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前进到野人山中，接替了一一四团掩护筑路的任务。十月二十四日，根据既定作战计划，奉中国驻印军参谋长兼缅北前线指挥官波德诺将军的命令，作为驻印军反攻缅甸前锋的一一二团，从野人山中的唐家卡等地出发，向新平洋（今欣贝延）、大龙河和塔奈河一线攻击前进。

包括史迪威在内，美军指挥官们没有想到，他们一开始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他们对当面日军的动向并未掌握。史迪威和波德诺都认为，缅北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依旧在中国云南境内

的腾冲、龙陵一带，一一二团当面的日军防御松散且兵力薄弱。而实际情况是：日军第十八师团已从中国云南境内调回缅甸，且几乎在驻印军反攻命令下达的同时，接到了攻击中国驻印军的作战命令——酝酿甚久的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作战，竟然在两军迎头对进的态势中拉开了序幕。

日军占领缅甸后，由于在太平洋岛屿作战中接连失利，其东南亚战略也随之由进攻转入防御。实际上，从一九四三年起，日军就一直在进行应对盟军反攻缅甸的准备。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保缅北占领区，继续阻断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其次是防止缅甸南部被盟军攻占；再其次是伺机攻击印度。为此，日军大本营专门成立了缅甸方面军，任命河边正三中将为方面军司令官，下辖第十五军、第五十五师团和方面军直属部队。第五十五师团负责缅甸西南沿海的防御，缅甸境内的防御则由第十五军承担。

日军第十五军的战斗序列是：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所辖田中新一中将指挥的第十八师团，担任缅甸北部的作战任务；柳田元三中将指挥的第三十三师团，担任缅甸中部的作战任务；松山祐三中将指挥的第五十六师团，担任中国境内云南西部占领区的防御任务。日军大本营十分清楚，仅凭第十五军的三个师团，要想抵挡盟军的反攻可谓势单力薄。为加强第十五军的兵力，日军在泰国曼谷临时编组了由佐藤幸德中将指挥的第三十一师团，命其尽快抵达缅甸北部，加入第十五军的作战序列；同时命令驻扎在中国南京的由山内正文中将指挥的第十五师团立即开赴缅甸，划归第十五军指挥。

日军缅甸作战计划的要点是：

作战指导方针

一、确保并稳定西南要地，迅速加强战备，主动地随时随地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企图，借以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二、如果整个形势允许，抓住良机，对印度东北方面实施地面进攻作战

三、将作战及防卫重点放在缅甸方面与重要资源要地，把治安的重点放在菲律宾。

作战指导要领

一、确保西南方面现在占领地区。但缅甸方面需要确保要地，定为怒江以西、密支那、甘马因、加里瓦、甘高、若开一线

二、对下列地区的战备，尤须优先尽快加强之。

甲、补给线位于受敌机威胁的海面方面，如缅甸和班达（安达曼）海方面。

乙、巴邻旁及庞卡兰布兰丹地区。

三、预定：缅甸方面进行的主要作战及作战要领，大致确定如下。

甲、若开附近反击作战

（一）令以第五十五师团为基干的部队尽速击败进攻若开正面之敌，大致进到布齐敦、孟都一线。

（二）为便于确保若开，迅速修建陆上补给线道路；加强海上补给与掩护，增强城堡工事，整修航空基地。

乙、对敌人主要攻势的反击作战

以一部分精锐兵力确保国境线方面要线，主力大体集结于曼德勒——东吁（同古）公路周围，随时迅速对所需方面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英印军和重庆军，尤其主要力求与英印军决战，将其歼灭在阿拉干山隘路口附近。为此，要注意整备和确保交通、城堡设施。此次作战的时间预计在本年雨季结束（十月）以后，可用于缅甸的总兵力预定为六至七个师团。

牟田口廉也的防区从中国境内的怒江向西，经过缅北的密支那、甘马因（今加迈），直到缅甸中部的加里瓦和甘高，宽达一千多公里，在划归他指挥的第三十一、第十五师团尚未抵达时，现有的三个师团的兵力根本不够用。牟田口廉也曾是攻占新加坡时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该师团在日本陆军中虽有善战之名，但进入缅甸以来备尝艰辛困苦：“太平洋战局的不利，印度政治形势的发展等，加上中将敢作敢为的性格，使他的作战思想有了进一步的飞跃发展。”——牟田口廉也的“飞跃发展”，与其说是“敢作敢为”，不如说是破釜沉舟。他决定在盟军反攻前抢先动手，而这一设想迎合了日军高层因战局全面恶化而急需摆脱焦灼的心理需求：“这种积极主张，引起了缅甸方面军司令部和南方军司令

部的关心，并引起了大本营的注意，于是又唤起了进攻印度东部的潜在的心愿。”

日军大本营、南方军、缅甸方面军和第三航空集团军的高级幕僚们，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仰光缅甸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一次图上模拟推演。推演结果是：为完成缅甸北部和中部的防御任务，必须急袭和摧毁盟军的反攻基地英帕尔，至少要把防线推到英帕尔以西的山区，但前提是确保怒江以西和缅甸北部的战线稳定。于是，日军制订了“乌号作战”计划，即在盟军不从海上攻击仰光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三年缅甸雨季过后进攻英帕尔。

此时的牟田口廉也并没有把中国驻印军放在眼里，他认为由几个美国人指挥的一群中国人对他的第十五军无法构成严重威胁，仅用一个师团的兵力足以把他们封堵在野人山里。

牟田口廉也将为他的判断失误付出代价。

根据“乌号作战”计划，日军第十五军第五十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一部，将首先在中国境内的怒江边向中国远征军前哨部队发动进攻，在占领前进据点后，第十八师团主力立即返回缅北的密支那和孟拱地区，而后向西北方向的胡康河谷推进，对掩护盟军筑路部队的中国驻印军发起攻击。

中国驻印军从印度东北部向缅甸实施反攻的路线，则是沿着野人山中的胡康河谷一直向东南方向打下去，攻占沿途日军占领的新平洋、于邦、打洛（今德罗）和孟关等一系列坚固据点，然后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直捣接近中国云南西部边境的重镇密支那。

胡康河谷——日军称之为“富昆溪谷”——位于那加山之南，坚布山之北，库芒山之西，三盘山之东，是缅甸北部东与中国、西与印度的接壤地带，也是印度通往缅北密支那乃至中国云南省的必经之地。胡康河谷由高山密林以及镶嵌茌密林峡谷中的打洛和新平洋两个小盆地组成，其间大龙河、塔宛河、塔奈河、打洛河以及无数条溪流纵横交错，树木遮天蔽日，地面泥泞潮湿，谷间瘴气弥漫，林中毒虫遍布。河谷的北端隘口，是印缅边境处缅甸一侧的克钦族小镇新平洋，大龙河从小镇东面的宁边、下老和于邦流过，然后与东南方向的塔奈河交汇。由此向北，是通往印度利多的一条蜿蜒于那加山悬崖峭壁之上的小径。——出击的中国驻印军，将沿着这条小径前行，向南穿过坚布山溢口和孟拱河谷，

抵达甘马因以及位于滇缅公路上的重镇孟拱。

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欠迫击炮、战防炮、汽车、骡马部队）作为反攻缅甸的前锋，以占领打洛至大龙河与塔奈河的交汇点，掩护后续部队进入野人山为任务，分成三路向指定目标前进：三营为右纵队，目标拉家苏髙地；团部和一营为中纵队，直趋新平洋；二营为左纵队，目标是新平洋以东的下老和宁边。与此同时，日军第十八师团搜索部队和第五十六联队也从新平洋附近出发，在同一条小径上向北推进。两军在雨季刚刚结束后的湿漉漉的缅北密林中撞上了。

左纵队二营行至于邦附近的一个小高地时，突然发现密林里有一块长六百多米、宽一百多米的林间空地，营长顿生警觉，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同时命令五连向前搜索。

五连进入密林后枪声骤起。

原来日军早已埋伏在这里。

五连当即与日军短兵相接，厮杀持续一个小时后，日军全部横尸于密林中，五连连长江晓垣、排长刘治阵亡，活下来的士兵仅是几名重伤者。——两军首次交战，便是同归于尽。尽管伤亡了一个连，二营依旧果敢地向前推进，一直抵近距日军主阵地仅五十米的位置。当面日军的炮兵阵地设置在大龙河南岸，昼夜不停地向二营猛烈炮击以掩护步兵冲锋，机枪连连长吴瑾阵亡，但二营坚守的小高地岿然不动。

右纵队的三营经过一昼夜的猛攻，占领拉家苏高地后，立即派出小分队向打洛方向搜索和袭击，努力保持着与日军接触的战斗态势。中路的团部和一营攻克新平洋，继续南下接近于邦。

此时是中国驻印军扩大战果的绝佳时机，因为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尚未完全推进至此。史迪威的原定计划是在缅甸下一个雨季到来之前，把当面日军包围在胡康河谷内予以歼灭，然后迅速南下夺取孟拱和密支那。那么，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攻占新平洋后，如果中国驻印军迅速调集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新编第二十二师全部以及炮兵、坦克等特种部队，尽快对大龙河、塔奈河沿岸的日军实施猛烈突击，攻占大龙河与塔奈河的交汇地孟关，把日军压缩在胡康河谷南端予以围歼，便极有可能一举夺取孟拱和密支那。——这是史迪威制敌的预先设想，如果得

到实施则胜算极大。

但是，此刻史迪威远在中国重庆，前线指挥权在驻印军参谋长波德诺手里。这个傲慢的美国人，战前认为胡康河谷地带没有日军主力，在前锋部队已经与日军接战的情况下，仍然轻信美军联络员的电报，认为大龙河和塔奈河沿岸不过分布着一些日军的据点，每个据点里只有一两个日军指挥着几十个缅甸兵以及当地土著。无论前线如何向他报告说“当面都是地道的日本人”，他就是不相信，坚决拒绝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主力和炮兵向前增援的请求，而在遥远的后方异想天开地下达了一一二团保持现阵地等待调整的命令。——中国驻印军向日军实施攻击的大好战机，就这样耽误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使得日军第十八师团有时间向胡康河谷大举增援，山炮兵第十八联队和独立重炮兵第二十一大队先后赶到，师团主力在大龙河附近全面展开后强渡大龙河，切断了中国驻印军一一二团的退路。——这时的一一二团反而被数倍于己的日军包围了。

三营营长陈耐寒指挥官兵奋力作战，拉家苏阵地前横陈着上百具日军的尸体，但陈营长和连长赵振华也先后阵亡。在临干方面，日军的一个大队向三营的一个连猛攻七昼夜，该连官兵火力凶猛，意志顽强，重机枪手叶先贵和余元亨把机枪掩体筑在被炮弹炸倒的大树边，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猛烈的机枪火力一次次把冲进鹿砦的日军打得掉头跑。战斗中，日军大队长田中胜、中队长原良和吉五先后被打死，日军付出近四百名士兵的生命后，仍旧没有攻陷该连守卫的阵地。

一一二团团部被包围时，负责护卫的只有一个特务排。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团长陈鸣人几经拼杀突围而出，但驻团部的美军中校联络员由于躲在掩体里不敢突围被日军俘虏。与团部一起行动的一营与日军激战多时，营长李克己率领的二连、机枪一连一部和迫击炮连的一个排，被日军包围在丛林中一个长七百多米、宽二百多米的狭窄范围内。不足一个营的中国官兵，身处险境却显示出惊人的沉着，他们利用从美国教官那里学到的热带丛林作战技能，迅速修筑了八个具有典型美军风格的野战据点：每个据点派一个班防守，各据点之间可以用火力相互支援，阵地周围设置了六道鹿砦，鹿砦边埋设了大量的触发式手榴弹，形成一个环形防御体系。主阵地北面有一棵直径足有三米多的巨树，粗壮的枝条覆盖了数十平方米的地面，官兵们在树上和树下都架起机枪，交叉火力可以控制三百六十度的方向，而四周伸展的枝条上则挂满了手榴弹。同时，哨兵在这棵巨树上观察敌情，日军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因为天

气恶劣和地形限制，虽有空投但数量有限，中国官兵砍树藤解决饮水和做饭问题，还研究出一套节省弹药的办法：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躲在掩体里不出来，连警戒哨兵都不开枪，因为在热带丛林中超过五十米开枪就会被浓密的树枝阻挡而徒然浪费弹药。他们要等到日军冲到二三十米的距离触响鹿砦前的手榴弹时，树上树下的轻重武器才一起开火，手榴弹也投掷得相当准确，日军伤亡惨重，数次进攻都被击溃。营长李克己率领一营官兵，竟然在这个被日军围困的阵地上生存和战斗了近一个月。这块虽然狭窄却始终固若金汤的林中阵地，后来被称为“李家寨”——这一地名颇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占山为王的豪气。

日军战史记载道：

敌军细心地研究了我惯用的战术，预先在阵地前布置了大量的障碍物，当我军刚一接近突破该线时，猛然间重火器，特别是迫击炮一齐集中射击，使我军的每次突击都被粉碎。其迫击炮中更包括有多数八十六毫米的重迫击炮。热带森林内的战斗，原本是我军的特长，但在障碍物和猛烈的迫击炮火面前，则无法发挥威力。无论在哪一战场，都是由于敌人逐次渗透到侧背而被迫撤退。特别是敌机独占战场上空，发挥强大威力，冰雹般的枪炮弹的低空射击，经常出现战况扭转。

十二月，史迪威回来了。

史迪威立即部署主力部队向前推进。

二十一日，史迪威和孙立人率领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行军抵达前线，一一二团的危局得以结束。史迪威当即命令一一四团三营为右翼，从康道附近强渡大龙河，沿着塔奈河左岸向于邦以南的太白家攻击；一一二团二营（欠第五连）为左翼，把下老的防御交给一一三团三营后，秘密渡过大龙河，沿着河左岸的密林向太白家靠近；一一四团主力则在于邦的正面实施攻击。史迪威决心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围歼位于于邦的日军。

二十四日，孙立人师长亲自指挥一一四团对于邦发起攻击。一个营从正面进攻，其余部队从左右两翼强渡大龙河，包抄日军的退路。火炮在怒号，新编第三十八师官兵跟随炮火的延伸连续冲锋，一波未成再上一波，直至冲进日军阵地上的堑壕内开始肉搏战。彭克立营长首先阵亡，接着连长许炳新也倒下了。连长湛茂棠带领一排攻击日军的一座地堡时，因官兵伤亡严重受挫，跟上去的二排也伤亡殆尽，湛连长带领三

排最终将地堡攻占，但他自己却中弹倒下。一一四团攻击时，一一二团一营从“李家寨”冲出，切断了于邦两侧的日军交通，封锁了渡口，然后死死地把企图增援的日军挡在大龙河南岸。最后时刻，美军的飞机猛烈轰炸，新编第三十八师的火炮同时轰击，日军的核心阵地如同被挖掘机铲过一般崩塌，残存的日军无处躲藏，在密林和山谷里四处逃命时受到埋伏在外围的中国官兵的捕杀。

于邦一战，中国驻印军伤亡百余人，打死日军二百余人，俘虏十三人，日军第五十六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和大队长管尾少佐被击毙。

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控制了大龙河一线。

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也推进到新平洋。

于邦之战，不过是不足一师兵力的中国军队发动的一场局部阵地攻坚战，但这毕竟是中国驻印军主力在反攻缅甸后与日军强悍的第十八师团进行的第一次较量，中国官兵显示出的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作战能力令日军十分“愕然”：

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三十八师一支劲旅，和第十八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一个营消灭中国军一个师乃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这个在九州编成的师团，在中国战场久经战斗，纵横驰骋，同中国军交战最有自信。然而，此次在富昆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五十六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敌军虽已遭到了将近九百名的损失，却仍顽强抵抗，坚守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日军已经判断出，中美部队从缅甸北部发起的反攻，意在收复缅甸全境，可他们依旧把进攻印度东部的英帕尔，当成缅甸作战的主要任务，为此再次向缅甸境内调入第二、第五十三师团以厚兵力，且把第十八师团在缅北的防御任务仅仅规定为“保持持久态势”。——日军并不认为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能够制造多大的麻烦，理由很简单，中国驻印军充其量只有两个师，尽管这两个师的作战能力一反常态地令人“愕然”。

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于邦后，史迪威下达八号作战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附工兵一个营为右纵队，向打洛方向攻击前进；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纵队，向太白家方向攻击前进。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工兵营强渡塔奈河，在塔奈河左岸密林覆盖的崎岖山路上不断击溃日军小股部队的阻击，前卫一营于十四日推进到百贼河北岸，发现日军第五十五联队正在南岸集结。为了迅速攻占打洛，六十五团决定先把该敌包围歼灭。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六十五团在炮火支持下发动了攻击。数小时后，当面日军支持不住，退守核心阵地。六十五团从三面强攻，逐渐缩小包围圈，以惊人的勇敢抵近日军进行近距离拼杀。战至二十五日，日军伤亡惨重，少数幸存者向南溃逃，第五十五联队冈田大队的四百余名官兵全部横尸在百贼河边，无一生还。接着，六十五团乘胜前进，一路扫清残敌，于三十一日上午攻占打洛，日军沿着塔奈河右岸河谷仓皇败走。

新编第三十八师兵分三路向南推进：一一三团为左，一一四为右，一一二团为预备队并沿着大龙河牵制当面日军。一一四团为四团一月十二日渡过塔奈河，向日军纵深实施迅猛穿插，连续拔除了日军的一系列防御据点。为把日军主力吸引住，一一四团官兵在孟阳河附近借助层层工事拼死防守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主力和第五十六联队一部，数日苦战中击毙日军大队长室禧大尉、中队长大森文一中尉等官兵三百余名，但一一四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近百分之六十的尉官伤亡。一一四团的纵深穿插和顽强作战，为一一三团迅速南下创造了有利战机。一月十一日，一一三团在宁边附近成功偷渡大龙河，攻克数个日军的据点后向太白家逼近。三营沿着塔奈河东进，迂回至太白家左侧；一营则沿着茂密的森林小径边扫雷边前行，迂回至太白家右侧。三十日，一一三团部队均抵达指定位置后，向太白家日军守军第五十六联队第二大队发起攻击。日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复杂地形顽强抵抗，但最终无法抵挡中国官兵的冲击，太白家的日军被悉数全歼。在一一三团攻击太白家期间，中路的一一二团二营配属炮兵一个连，在密林中穿行至日军的背后，出其不意地重创了第五十六联队第三大队，于十六日攻占甘卡。

至此，在胡康河谷心脏部位孟关地区，中国驻印军部队全面控制了其外围重要据点，对孟关形成了合围态势。

孟关是从北向南通往缅甸内地的枢纽，从新平洋往南的大道经过孟关才能抵达孟拱或密支那，因此这里也是日军第十八师团阻止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战略重点。师团长田中新一集中了七个步兵大队，并把师

团司令部推进至此亲自指挥作战。在孟关的核心区域，日军依据险要地形修筑了大量工事，且配备了强大的防御火力体系，仅炮兵就有两个山炮大队、一个重炮大队和一个战防炮大队。

史迪威把驻印军司令部前推到刚刚攻占的太白家，他决定不等云南境内的中国远征军发起策应作战，也不指望英军从英帕尔方向出击以支援驻印军的许诺，他单独指挥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以及那个由美国志愿者组成的“第五三〇七团”，采取正面牵制、两翼迂回的战术，以钳形攻势拿下孟关，力争在雨季到来之前进攻到孟拱、密支那和八莫。史迪威下达了第九号作战命令：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纵队，向孟关以南实施远距离迂回，攻击孟关南面的瓦鲁班地区，切断日军溃逃的退路；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纵队，向孟关以东远距离迂回，攻击孟关东南面的秦诺地区。

廖耀湘受命后，率领新编第二十二师由康道附近渡江，六十四团向东南直取拉征卡，六十五团攀登高达数千米的悬崖绝壁横越托克山，与六十六团会合后攻占了位于拉征卡西南方向的腰班卡。二十三日，中国官兵先后击溃驻守腰班卡的日军第五十六联队主力以及驻守拉征卡的第二大队，完全占领了这一地域。

孙立人率领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以一一二团在左，一一三团在右，开始向日军纵深迂回前进，中国官兵长驱直入九十多公里，一路上遇到日军据点就发起猛烈攻击，几乎每天都打下一个据点，被攻克的日军第五十五联队的据点竟有三十多个。三月四日，一一三团抵进至孟关南侧的瓦鲁班附近，孙立人亲率一一二团同时攻占孟关东南面的于卡，逼近了瓦鲁班以南的秦诺。

至此，孟关外围已全被中国驻印军占领，日军第十八师团各部退守孟关核心据点。

二月二十一日，史迪威下达第十号作战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由腰班卡、拉征卡沿公路南下，从正面攻击孟关；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渡过塔宛河，从孟关的侧背协助攻击；坦克一营和新编第二十二师的一个步兵营攻击孟关东侧并占领大班，防止日军逃跑；美军“第五三〇七团”在新编第二十二师左翼前进，伺机攻击秦诺北面的瓦鲁班。

廖耀湘根据史迪威的命令对部队作了调整：六十六团附工兵一个排，在公路的西侧穿过森林迂回到敌后；六十四团主力沿公路一直向南

对孟关进行压迫；六十五团附工兵和炮兵各一个连，自腰班卡向东南方向攻击，夺取般尼并切断该地通往孟关的道路。

三月一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各团开始行动。

担任正面攻击的六十四团，其先头部队二营遭到日军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的三面围攻，形势数度危急，但该营官兵顽强作战，不但顶住了日军的攻击，且令当面日军渐感不支，遗留七十多具尸体后向南溃逃。战斗中六连连长高世钦阵亡。二日，六十六团切断了孟关至般尼的公路，把增援孟关的日军包围在孟关以南。这股日军拼死突围，向二营阻击阵地发射了大量燃烧弹。二营官兵一边灭火，一边组织火力对日军实施拦截，将冲锋的日军大部歼灭在阵地前。日军遗留下一百三十多具尸体后，残部逃入密林。进入原始森林中迂回前进的六十五团曾一度迷路，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抵达般尼以北地区，协助六十六团围歼增援孟关的残敌。

至三月四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已从三面包围孟关，般尼的日军因被牵制无法增援。

五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对孟关发起攻击。

在炮火的掩护下，六十四团二营首先突入孟关北关，与日军展开巷战。接着，六十六团三营也在孟关的西南与日军展开了肉搏，并且最终突入西关，与六十四团二营在城内会合。晚上，守城日军丢下八百多具尸体弃城南逃，胡康河谷的核心据点孟关被中国驻印军攻克。

在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击孟关的同时，新编第三十八师向塔奈河、南比河右岸的日军发动了凌厉攻势，于三月二日攻占拉曼渣卡和瓦卡道一线，把塔宛河以北的日军全部肃清，有力支援了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击孟关的作战。

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已于中国驻印军攻入孟关的前一天晚上带领师团指挥部、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各一部，向孟关以南、秦诺以北的瓦鲁班撤退，而此时据守瓦鲁班的是美军“第五三〇七团”。这群美国志愿者不但没能对日军实施阻击，反而在日军的攻击下丢弃装备，仓皇溃退，结果被日军包围了。史迪威闻讯后，急令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火速派兵解救。孙立人派出的是一九四二年曾在仁安羌解救过英军的一一三团。一一三团急行军后抵达战场，一举击溃了日

军，把那群惊慌失措的“美军”解救出来并转移到安全地带。

攻克孟关后，新编第二十二师南下追击残敌，坦克一营的坦克也沿着公路全速追击。三月七日，中国驻印军各部队对瓦鲁班形成合围之势。而此时，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二营已攻占秦诺，瓦鲁班日军退路断绝。

中国驻印军的坦克部队表现神勇。此刻，他们在一个步兵营的协同下，穿越原始森林，高速度实施超越攻击，先占领了日军一个来不及转移的补给基地，缴获一百多箱炮弹和大批子弹，以及可以供应新编第二十二师全师食用三天的粮食。然后，坦克轰隆隆地开到瓦鲁班西北侧，步兵们急忙在南比河上架设了简易桥梁，坦克过河后发现一群日军逃进路边的密林里。坦克营营长赵振宇当即命令全营攻击。日军官兵没料到中国驻印军的坦克能够通过崎岖的山路、茂密的森林和大片的沼泽，如此之快地追到这里，在猝不及防中顿时大乱。中国驻印军的坦克对着惊慌失措的日军横冲直撞，顷刻间，日军第十八师团作战课课长石川中佐、经理部部长木村大佐、第五十六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第七中队中队长原良大尉等四百五十多名日军在钢铁履带和机枪火力之下丧命。中国驻印军的坦克还冲入了日军第十八师团指挥部，缴获司令部印章一枚、装甲车两辆和指挥车一辆，还有大量的重要文件。

瓦鲁班日军残敌土崩瓦解，遗尸七百七十五具后溃散。

师团长置司令部于南比河渡河点南岸附近，指挥战斗；但于五日晨受到在飞机掩护下的优势坦克攻击。坦克逐步侵入师团司令部和长久联队中间。师团长抓住敌人行动的瞬息间隙，勇敢突破，好不容易到达瓦鲁班。但敌坦克群似在尾追师团司令部，不久也出现在瓦鲁班，与长久联队一部及独立速射炮大队之间展开激战……敌逐渐缩小包围圈。我师团主力在南比河与瓦鲁班之间狭小地带内失去行动自由，各地陷入混战。师团长以长久部队压住敌人，企图在此时间内，将相田部队及其师团直辖部队转移到瓦鲁班南方，顺着大道向南方突破，但敌封锁了大道，未能成功。

孟关和瓦鲁班之战，中国驻印军以仅两师兵力，击伤日军四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仅装满炮弹的仓库就有五个。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在史迪威的陪同下，从印度飞抵孟关和瓦鲁班视察，在遍地被打坏的日军坦克、火炮、汽车以及堆积如山的战利品面前，蒙巴顿同样对中国官兵的作战能力感到“愕然”。

日军第十八师团损失巨大，每个步兵中队减员至不足六十人，且残部疲惫不堪，惊魂未定。自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开战以来，盟军方面发挥了高度机动作战的优势，不惧艰险，大胆穿插，日军的侧背常常受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加之制空权完全被盟军掌握，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日军只能盲目抵抗，处于极其被动的态势中，毫无还手之力。在瓦鲁班侥幸逃脱的师团长田中新一，退守坚布山后紧急收容残兵，并调来第四联队以及第二师团一部，集中起三十余门火炮，企图依靠坚布山天险阻滞中国驻印军的攻击，争取时间，等待增援。

坚布山是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的分水岭。位于胡康河谷最南端的山中隘口全长十六公里，北起丁高沙坎，南至沙杜渣，隘路两侧悬崖陡，森林密布，易守难攻。史迪威决定一鼓作气拿下坚布山，把日军彻底赶出胡康河谷，然后冲入孟拱直捣密支那。

此时的英国人也在“助战”。

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开始后，为策应缅北作战，英军出动第十五军，在“喷火式”战斗机的支援下，沿着阿拉干海岸发起了一次攻击。

但是，英国人刚一出手，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立即实施了代号为“哈号作战”的反击，把英军第七师的三个旅和第五师的一个旅共计三千多人以及一百多辆坦克和一千多辆汽车包围了。英军以优势坦克和火炮组成环形防御圈，并得到优势空军的不间断补给，没有制空权的日军补给困难，火炮也很少，加上英军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官斯利姆急调三个步兵师增援，日军反又处在了英军包围中。最后日军弹药耗尽，伤亡增加，不得不把部队分成小股，在茂密的丛林中且战且退。

这是英军在亚洲战场上对日作战的首次胜利。

接着，英军远程突击队第七十七旅和第一一一旅，由美军的二百五十架运输机和滑翔机运载，突然出现在卡萨上空。突击队员乘坐的滑翔机首先在林间降落，随即开辟小型机场跑道以供运输机降落。此后的数天之内，英军和美军联合运抵了七千五百人的部队以及火炮、吉普车和一千三百多匹骡马。随后，这支远程突击队依靠空投补充给养，穿越四百公里的山地和丛林向缅北秘密推进。英军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接到相关情报时还不相信，严重低估了美国和英国现代化装备实力的日本人认为，在缅甸的密林中实施如此大规模空降是不可能的事，这只不过是英国人的那种“打了就跑”的

游击战术。于是，牟田口廉也派出了一支小部队去捉拿英军空降人员，并派出飞机轰炸英军的空降场。结果空降场上空空如也，英国人早就没影了，日军的轰炸机却遭到英军战斗机的拦截。两天之内，牟田口廉也损失了六十一架战机。等到英军空降的情报得到确证后，日军缅甸方面军才紧急调集部队前往清剿。

英军在缅北日军后方的空降，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和效应，但确实扰乱了日军的后方，对中国驻印军的反攻作战起到了协同作用。

中国驻印军的南进以及英军的远程空降，令日军醒悟到在缅甸战场上面对盟军的优势攻势，单纯防御无济于事。于是，断然开始了预先策划的“乌号作战”，预定发动攻势的时间在二月十一日——据说这是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之日——攻击目标是英帕尔附近的英军主力。

英国人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日军不但开始进攻英军，且有攻入印度的态势。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到达甘马因，会见了从前线赶来的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在了解了第十八师团的战况和处境后，河边正三叮嘱田中新一：第一，“太平洋战争全面战况不容乐观，将来令人感到悲运重重”；第二，第十五军的英帕尔作战已得到大本营认可，此战的利害得失还“不能立即作出判断”，只有尽全力争取一个好的战果；第三，由于第十五军主力将致力于英帕尔作战，与“第十八师团的作战地带已被隔绝”，因此缅北方向的作战只能是交给第十八师团了。

一月十九日，日军发动了对英帕尔的进攻。第三十三师团突击部队很快将英军第十七师包围。英军第二十三师奋力增援，被包围的英军部队才得以突围。但是，日军第三十一师团渡过钦敦江后直趋科希马，并向英帕尔的北部和东部迅速迂回。科希马是距英帕尔八十公里的一个小镇，英军第十四集团军主力负责守卫英帕尔，防守科希马的只有三个营。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切断科希马通往英帕尔的公路后，向科希马发起攻击，三个营的英军且战且退逃进了山里，并呼叫飞机尽快给他们空投给养。

科希马的丢失，使距科希马二十多公里的迪马普尔受到严重威胁。

迪马普尔是阿萨姆铁路的终点，不但是盟军在印度东北部的重要后

勤补给基地，那里还储存着准备经过“驼峰航线”运向中国的大批军用物资。英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斯利姆不得不紧急调集援军：第二师动用铁路运输，第五师和第七师使用空运手段。总之，要争分夺秒地赶在日军冲进迪马普尔前，到达预设阵地。补给少了英国人就无法打仗，为给援军补充物资，英军从美军的“驼峰”空运队调来二十多架运输机，并向国内提出了再调七十架运输机的请求。丘吉尔只有亲自出马，把东南亚战区原准备调往地中海的七十九架运输机全部留下来支援英帕尔作战。只要陷入困境，英国人就会想到中国人。此刻，英国人将他们始终坚持的中国军队不得深入缅甸的原则忘得一干二净，迫切要求中国驻印军迅速夺取孟拱和密支那以威胁日军后方；同时希望集结在中国云南西部的远征军尽快入缅参战，从滇西方面打过来，以减轻英帕尔战场上英军的压力。

英军的危局对史迪威来讲是灾难性的。

如果数万英军垮了，导致日军攻进印度，不但通往中国唯一的运输通道“驼峰航线”很难确保，且中国驻印军也会因为后勤补给线被截断而陷于孤立。到那时，缅北反攻将功亏一篑，或许还要重蹈一九四二年缅甸作战失败的覆辙。

史迪威请求蒋介石尽快命令中国远征军出兵入缅。

英国人和史迪威的请求，得到了罗斯福和马歇尔的高度重视。

三月二十日，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赫恩将军把罗斯福以备忘录形式发来的电报转给蒋介石。备忘录除了赞扬中国驻印军的作战之外，特地把美军和英军发动胡康河谷作战的作用描述了一番，然后强调中国远征军如不出兵后果非常严重：

委员长钧鉴：谨转 罗斯福总统来电，呈候 钧鉴

缅北情况已达紧张阶段，此诚吾辈千载一时之机会，吾如不把握此良机，则或将陷于不利之逆境。贵国军队在利多路线重创日军，使敌之兵员阵地及声威均蒙重大损失，诚属伟大之成就，史迪威指挥美军有方；同时运用重大压力，加于敌第十八师团，使其趋于崩溃，可称一重要之胜利。英国军队在阿拉坎海岸，曾对企图切断英军交通线之敌军，予以重大之打击，其中最重要之作战，系以曾经特别训练而有组织之美国空军，输送受高度训练之英国远程挺进队，与美国工兵队，深入敌后

约一百六七十英里之卡道（卡萨印道）附近着陆，并获得充分给养及大量高射炮、无线电侦察飞行器、交通工具、驱逐机队及轰炸机队之援助，故得稳固阵地，该飞行队在一日之内，曾击毁缅境敌机约百分之二十。该挺进队之出现，对于利多路线敌军（第十八师团）之补给线，予以意外之奇袭，并威胁云南方面敌军之补给线。

显而易见者，我奇袭敌之交通线，可使敌军感到不安。苟敌军前进，威胁伊姆法尔，及中、印空运之地面交通线，则形势颇严重，因此奇袭之结果，照目前之状况而言，可能使敌军就歼。史迪威将军报称中国在利多作战之军队，已进至坚布山，在最近数日内，可进至沙杜渣，并云，贵国军队富于战斗意志，在过去三个星期中，环境虽然困难，但仍能达成任务，被以为贵国在滇西境之军队，若能推进至腾冲或龙陵，则利多方面之军队，可乘机推进至密支那。

虽然史迪威将军深入丛林，并聚精会神于作战，对于目前良机认识之程度，不无可疑，但据余所得之情报，除非敌之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则第十八师团之残敌，定为我军所歼灭。敌之增援部队，可能将现在云南方面之第六十五师团中抽出一团赴援，盖因有力之部队，突现于卡道附近，使敌军不敢抽调对利多方面之任何后备队也。在阿拉坎及伊姆法尔两线之剧烈战斗，暨挺进队之向曼德勒及密支那间敌之交通线前进，可使敌军陷于纷乱之状态，并迫其退却，同时予我军以有利之机会。但我军如不采取攻势，则敌军势必死灰复燃。

兹将拙见详述电达阁下，望即令云南方面之指挥官，协力同心，共赴此良好机会为幸。

顺颂

勋祺

罗斯福

赫恩代呈

为了督促中国方面出兵，史迪威飞赴重庆面见蒋介石。

他得到了蒋介石给他增援一个师的承诺，但蒋介石对从滇西出兵反应冷淡。

蒋介石早就预料到这一局面肯定会发生。

在过去两年反复商讨反攻缅甸的过程中，蒋介石曾多次警告罗斯福、丘吉尔和史迪威：反攻缅甸的作战，中国军趴必须和英美主力部队联合，特别是英国应派出有力部队在缅甸南部实施两栖登陆作战。不然的话，只要日军发动反击，缅甸战局将立即恶化。果然，尽管美国人在空军支援上很出力，但地面部队只派来了那个“抢劫者”；而英军根本没有发动两栖作战，英军于这一期间发动的攻击，与其说是在协助反攻缅甸，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补给线。所谓的反攻缅甸，实际上仍是中国军队在独立作战。现在，英国人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解救其危机，说好听了是请求中国方面帮助，实际上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胁迫。

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阐述了中国远征军不能立即出兵的理由，其中一条竟然是国民政府要防备“布尔什维克”：

……七年的抗战，消耗了中国的物质和军事力量到了如此程度，如果坚持要她做超过她能力的事，势将招致灾难，其后果将不仅严重影响云南、四川，并且也将严重影响中国战区的整个局势。倘若此事发生，日军将侵入云南及四川，新疆的叛乱及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将出现新局面以推进他们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国家的计划，因而我们的政府在全球战争中将处于不能尽其本分的地位，而盟国在远东将会失去对抗日本的作战基地。由于这些原因，并念念不忘我们对盟国的义务及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防御线没有适当地加强，我们的主要兵力不可能从云南发动攻势。

马歇尔回复的口气相当强硬：如果中国不从滇西出兵进入缅甸，美国将停止向中国输送租借法案物资，同时取消中国航空公司的空运租借法案合同，中国滇西部队每个月经由“驼峰航线”运送的七百三十四吨物资也将停止供应。

罗斯福给蒋介石的回电更是强硬：如果中国不出兵缅甸，将再也得不到美国的武器支援。

我不能想象你的获得美国装备的“X”部队（盟军方面把史迪威指挥的驻印军称之为“X”部队），不能前进以抗击现时实力已空虚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我看来，你的第七十一军的一部分不再延迟立即进军占领腾冲一龙陵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萨尔温江上与你对峙的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师。你向西进军必然成功。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过去一

年，我们曾经装备并训练你的“Y”部队（盟军方面把中国滇西远征军称之为“Y”部队）。如果不使用它们于共同事业，我们空运装备并提供教练人员的最勤奋最广泛的努力就没有道理了。

蒋介石对美国人的威胁十分恼怒，说中国无法接受这样口气的电报。但是，有史料表明，尽管蒋介石态度强硬，可他早有一个预定计划，即只要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向密支那推进，他就立即命令位于滇西的远征军出击。而蒋介石之所以强硬地对待英、美的胁迫，与中国人无法接受列强傲慢指使和强词侮辱的心结有关。

中国驻印军对坚布山发起了攻击。

瓦鲁班作战结束后，史迪威下达了进攻坚布山的第十一号作战命令，要求中国驻印军冲进坚布山隘路，夺取两翼高地，以攻占坚布山隐口南端的沙杜渣。部署是：新编第二十二师配属坦克一营担任正面攻击；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配属炮兵连和工兵连，与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部配合，向坚布山日军阵地侧后迂回，截断其退路；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则沿着塔奈河向纵深穿插。这一次，英军出动了一个旅，在中国驻印军右翼协同搜索前进。

三月十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带着一个炮兵营，一路上与阻击他们的日军连续发生战斗，但日军是从瓦鲁班退下来的残部，毫无斗志，六十四团很快就突进到丁高沙坎（今丁高瑟坎）。同时，六十六团也扫荡了丛林里的日军残兵，推进到丁高沙坎西侧。十五日，六十四团向丁高沙坎攻击，一经接战日军就仓皇撤退，六十四团占领了坚布山隘口的北端。接着，六十四团在隘路以东陡峭的山崖密林中开路前进，奋力向日军的侧背迂回；六十六团在炮兵营和坦克营的配合下，沿着隘路发动正面攻击。守卫隘路的日军至少有两个步兵大队，在山炮、重炮和速射炮的支持下，凭借险峻地形顽强抵抗。但复杂的地形令双方火力都得不到有效发挥，只能在隘路两侧的丛林里短兵相接。混战一直持续到十九日，当面日军开始动摇，而六十四团的迂回成功令日军的作战意志最后崩溃，残部开始向后溃逃。六十六团抓住战机猛烈追击，一举攻占整个坚布山隙路。此战，新编第二十二师伤亡一百九十一人，击毙日军七百人以上，仅在隘路上就清点出日军遗体四百多具。

负责迂回敌后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翻越高山峻岭，抵达西同附近，截断了日军后方的公路。该团在迂回的沿途数次击溃日军的阻截，锐不可当，仅缴获的日军各种单兵武器就有千余件、子弹近万发。

他们还攻占了日军的一座仓库，打进去才发规里面存放着大量日军喜欢的味精、酱油、干菜和海带。一一二团截断的公路是日军补给的生命线，日军因此调集兵力向西同发动了轮番攻击，兵力从中队到大队，最后甚至出动了整个联队，循环往复夜以继日地实施攻击。残酷的敌后截击战令一一二团出现严重伤亡，连长和排长大多数或阵亡或负伤。但一一二团自开战以来就没丢过阵地，这次也不例外。上士班长陈应明独自守一块阵地。陈班长已经负伤，血流不止，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可他一个人用两挺重机枪顽强阻敌，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直到增援部队赶上来。由于伤势严重，陈班长最终死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台上。

由于公路被中国官兵封堵，溃败下来的日军逃不出去，白天便藏在密林里，晚上三五成群地抱着木头从旁边的河里漂流逃命。中国官兵彻夜不眠地死盯着河面，只要发现河面上有漂浮物，就用轻重机枪扫射。连续数天，每天清晨都会发现河面漂着日军的尸体。

向敌后迂回的另一支部队，是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以及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他们以一营为前锋，团部和二、三营随后，一路保持无线电联络，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在峭壁密林中跋涉十四天，迂回一百多公里，三月二十八日秘密渡过南高江，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坚布山隘口南端重镇沙杜渣附近，并开始迂回攻击距沙杜渣以南仅六公里的拉班。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获悉后，大惊失色，急忙抽调部队反击，企图打开退路。在日军的反击面前，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营支持不住向后撤退，中国驻印军一团以三营增援美军，一营固守拉班，二营则不顾一切地直接攻击沙杜渣。此时，北面的新编第二十二师正向沙杜渣推进，与新编第三十八师形成南北夹击态势。日军两面受敌，后路已断，军心大乱，丢弃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向南溃逃，坚布山天险遂被中国驻印军突破。

坚布山的占领，标志着胡康河谷作战结束。

通往孟拱河谷的大门已经敞开。

中国驻印军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进攻胡康河谷，半年内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从缅北新平洋向南推进了近二百公里，官兵们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取得了辉煌战果。此战令日军第十八师团伤亡高达一万二千多人，其中被击毙士兵四千一百余人，军官六十余人。日军第十八师团自卢沟桥事变入侵中国后，登陆杭州湾、攻占广州、进攻南宁。一九四〇年特意在越南进行丛林作战训练，随后参加了南太平洋各岛屿以

及马来亚和缅甸作战，在缅甸战场上打棠吉、破腊戌，一直攻击到中国云南境内的惠通桥，在日本陆军中有“常胜师团”称号。而这一次，这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遭到歼灭性打击。此战，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战死一千零三十三人，负伤二千九百五十八人；新编第三十八师战死八百七十六人，负伤一千五百五十六人；坦克一营战死二十四人，负伤五十人。

中国驻印军的迅猛推进，令缅甸日军的后方危机四伏，在英帕尔围攻英军的日军第三十一师团也逐渐显露出颓势：出发时携带的粮食和弹药消耗殆尽，制空权丧失后无法得到空中补给，地面运输中跟随师团推进的骡马已大部分死掉，长时间的丛林行军作战令官兵病饿交加。本来准备在雨季之前解决战斗，但是雨季就要来临，英军不但没有溃散的迹象，而且还发动了反击。四月，英军反攻科希马，日军死伤四千多人。五月，英军的增援部队已达一万五千人，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四个师突破包围圈，与增援部队一起对日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大英帝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尽显威力，大批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源源不断地抵达战场，日军被紧紧压缩在狭窄的山谷里，晒一件衣服就可能招致重炮轰击或飞机轰炸。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孤注一掷发动反击，结果苦战一个月也未能向英帕尔前进一步，反而战死了不少联队长和大队长，各部队的战斗力都下降到无法维持的地步。六月，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请求南方军司令部增援，可南方军此时正在太平洋上苦战，根本无暇顾及缅甸战场。粮食和弹药完全断绝的日军前线部队反复请求撤退，而牟田口廉也命令他们最后时刻用牙齿和灵魂作战。第三十一师团师团长佐藤幸德忍无可忍，擅自下令部队一直撤退到能得给养的地方为止。牟田口廉也闻讯大发雷霆，不但当即将佐藤幸德撤职，还连带把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山内正文和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柳田元三的职务也一并撤了。——在一次战役中撤换所有的师团长，这在日本陆军史上尚属首次。由于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撤退，英军乘机全面突破日军的防线，上千辆坦克、数百门重炮和大批军用汽车沿着打开的公路涌入英帕尔战场，迫使牟田口廉也不得不宣布终止“乌号作战”，命令他的部队全面撤退。撤退中的日军溃不成军，许多人因伤病饥饿而倒毙或自杀。拥有十万余兵力的日军第十五军，此战一共损失五万多人，剩下的五万人一半以上是伤病员，且几乎将所有的武器都丢弃了。

日军用攻占英帕尔来挽救缅甸危局的企图破灭了。

此时传来了中国远征军即将出征的消息。

听说这个消息后，史迪威立即从坚布山前线飞往新德里会晤蒙巴顿，并从蒙巴顿的口中得到了英军无需中国驻印军的援助也能在英帕尔取胜的承诺。回到沙杜渣前线指挥部后，史迪威果断作出了“奇袭密支那，向甘马因、孟拱全速前进”的决策：新编第二十二师附坦克营和重炮团为右兵团，沿着公路向甘马因攻击前进；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兵团，沿着南高江东岸、库芒山西麓，向甘马因和孟拱以南迂回，切断日军的退路；同时梅里尔准将率领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以及刚刚加强到前线的中国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第五十师一五〇团联合组成一支中美突击队，秘密穿越库芒山，远程奇袭密支那。

孟拱河谷是一个狭长的山间盆地，北起坚布山的出口沙杜渣，南至孟拱城，南北长约一百二十公里，东西宽仅十六公里，孟拱河纵贯其间蜿蜒注入伊洛瓦底江，顺流可直下八莫。雨季时，盆地里河水泛滥，一片汪洋，到处是没膝的泥泞。孟拱城位于河谷水陆交通中心，与东面的密支那和西面的甘马因互成犄角，乃军事战略要地，依据孟拱河屏障易守难攻。

被中国驻印军从胡康河谷赶出来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残部面临的最大困境依旧是补给：“从去年十月末以来，接连五月连日同优势敌军殊死搏斗的第十八师团官兵的疲劳和损失简直惨极了。步兵中队的兵力只剩下了五十名左右。”即使那些还活着的官兵，也是“上衣破烂，衬衣撕碎，露出脊背，裤子已不成形，大腿膝盖露在外面，拖着透底的皮鞋，满脚长着一层‘丛林疮’”。“本来计划尽量使伤病员留在战场上医治，早日恢复，但战场上缺乏卫生材料，连替代患者破旧军服的大衣、毛毯都不够，往后方输送的大卡车更不能指望。第一线中队的官兵，包括中队长在内，一般不足三十人，甚至只有军曹以下十数人者。即使这些人，几乎也都是半病员状态，可以说全都患有疟疾和脚气病”。

为了让第十八师团支撑下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多次向该师团调兵补充。除了从滇西调来的第六师团第一四六联队和从缅甸西南调来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外，还把方面军预备部队第五十三师团以及原来驻守缅甸南部的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也调到了缅北地区。并于四月八日成立了以本多政材中将为司令官的第三十三军，统辖第十八、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团，全面负责缅北作战。

日军防御孟拱河谷的部署是：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联队和第一一四联队第三大队，在孟拱河西岸沿公路进行纵深配置，以英开塘为主要据点阻击中国驻印军的正面攻击；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第五十六师

团第一四六联队和第一一四联队一部，在江东防御，以马诺塘、高利、瓦兰为主要据点；河谷中心地带的甘马因同时部署着重兵。

根据史迪威下达的第十二号作战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将沿孟拱河西岸顺公路南下，向甘马因推进；新编第三十八师从甘马因以东的山地南下，向甘马因以南进行远程迂回，然后两师合力对甘马因实施夹击。

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欠一营）配属六十四团三营和六十六团一营，在坦克一营和美军航空队的支援下，于三月三十日开始沿着公路向前攻击。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攻击东、西丁克林，一一四团越过丁克林向南迂回，一一二团在左翼掩护。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配属部队扫清沿途日军小股部队的阻击，于四月四日开始对日军主要据点瓦康实施攻击。瓦康日军据险防守，但抵挡不住中国驻印军猛烈的炮火轰击，纷纷溃退。瓦康一战，中国驻印军击毙日军三百九十四名，新编第二十二师付出了伤亡七百余名官兵的代价。左翼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于四月三日攻占巴杜阳，然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连续攻克了丁克林一线日军的据点，沿公路防御的日军第五十六联队一部退守瓦拉渣，主力退守英开塘和沙逊山。孟拱河东岸的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一部退守丁克林东南山地，主力则位于高利、瓦兰等地。日军的两个联队企图利用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阻击中国驻印军，并伺机反击。

中国驻印军调整了部署：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配属六十六团三营继续沿公路向前攻击，六十四团在公路以西向沙逊山前进，策应正面作战。四月二十日，六十五团二营越过瓦拉河，与六十六团三营的一个连一起，跟随坦克一营向南推进。二十五日，攻击部队击溃日军的层层阻击，推进到英开塘以北地带时，遭到日军的猛烈反扑，两军进行了近距离的手榴弹战和白刃战后形成对峙。二十七日，新编第二十二师的两个团联合再次向当面日军实施攻击，但进展缓慢。六十六团三营从各连抽出三十名精壮士兵编成突击队，由排长姜有霖带领，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强行冲锋，当面日军仍旧坚守不退。二十九日，六十五团二营五连和坦克营一起冲锋，天气阴沉，中美联合空军无法起飞助战，五连在日军的火力拦截下伤亡惨重，五连连长李纪元阵亡，攻击再度受挫。五月二日，六十五团在北、六十四团在西南、六十六团三营在东北，中国驻印军官兵向日军发起三面攻击，但仍旧久攻不下。

史迪威心情恶劣。

“另一个阴天。我们坐着，感到消沉。第二十二师有五十七个连级军

官阵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逼着第二十二师前进，也不能帮助他们。真是苦境。”史迪威怀疑廖耀湘和孙立人之所以攻击不力，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让他们消极进攻的暗示，“孙和廖对军事行动的指挥只能以大元帅（指蒋介石）要他们放慢步伐的秘密命令来解释。”史迪威的猜疑，来自攻击孟拱河谷前蒋介石给他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孟拱河谷“便于攻，也便于守”，似乎在暗示不要不惜一切地进攻，至少要谨慎些为好。史迪威向马歇尔告状，说中国驻印军已拔除了日军的核心据点，最重要的是已把日军的士气打垮，目前只要稍微努力作战，便可以迅速拿下甘马因。史迪威把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找来，问他是否接到了蒋介石消极进攻的命令。廖耀湘表示蒋介石确实与他直接通过电报，但蒋介石要求他对史迪威要绝对服从，“即使史迪威是错误的”。史迪威还是不放心，通过副总指挥赫恩将军向宋美龄询问蒋介石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直接给史迪威回了一封电报，其含糊其辞的措辞令史迪威的心情更加恶劣：“虽然我对现时缅甸战役的联合行动不负责任，我希望我们不至于引起我们朋友和部队的意外损失和失败。这是为什么我对萨尔温地区总的局势十分关心的原因。”

无论如何，必须抓紧攻击，因为中美联合突击队已接近密支那了。

关系缅北反攻胜负的最后战机将稍纵即逝。

五月三日，天气终于晴朗，史迪威立即下令对英开塘的日军展开陆空联合进攻——只要空军的战机能起飞，日军的灾难就降临了——美军的三十六架轰炸机飞抵英开塘上空，轮番向日军阵地实施俯冲轰炸。日军缺少对空武器，更没有战机前来拦截，美军飞行员随意上下翻飞投下大量的重磅炸弹，或者超低空掠过日军官兵的头顶，机枪子弹骤雨般倾泻而下。地面上，中国驻印军的火炮集中向日军阵地前沿轰击，炮火延伸后，坦克一营的五十七辆坦克集团冲锋，步兵簇拥着坦克杀声震天。坦克和步兵突入日军阵地后，日军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孤注一掷地发动反冲锋，敌我犬牙交错，一片混战。但是，天上是美军的飞机来回俯冲，地上驻印军的大炮不停地轰击，中国官兵胆力倍增，越战越勇。

黄昏时刻，日军渐渐不支，开始趁着昏暗天色向南溃退。中国官兵猛烈追击，几乎将日军全歼。四日正午时分，中国驻印军完全控制了英开塘。

英开塘一战，中国陆军和美国空军首次实施了一次空地联合攻击作战，显示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也令日军为之魂飞魄散。

只是，新编第二十二师又伤亡了七百余名官兵。

甘马因，孟拱河谷中的第二大城镇。日军第十八师团在此建立了庞大的后勤基地，修筑了坚固的大纵深防御工事。日军知道，甘马因一旦丢失，密支那必定不保。为此，除了集中第十八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加强防卫外，还从孟拱调来了第二师团的第四联队以及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二八联队、第一五一联队各一部前来增援。

四月十一日，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开始了远程迂回。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行军，沿途全是深山密林和悬崖绝壁，配属的山炮连和运输给养的骡马因无法通行返回了，全团携带的粮食很快用尽，官兵们只能以野菜和芭蕉根充饥。二十日，一一二团抵达瓦兰西北地区后，三营向曼平推进，切断了由甘马因和曼平两地至瓦兰的交通线。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第一大队发起反击，三营苦战数天，击毙日军二百余人，阵地寸土未失。

突然，战场上传来向纵深穿插的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二营被日军包围的消息，率领该部的梅里尔准将紧急派联络参谋乘小型联络飞机赶到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部求救。孙立人师长立即派一一二团一营星夜驰援。一营官兵再次翻越绝壁密林，当他们突然出现在美国人面前时，被解救的美国人惊讶不已。梅里尔准将给孙师长发电说，增援的中国部队竟能通过地图上都没有标出的绝壁神速赶到，足见士气旺盛，精力超人，训练有素。他本人异常钦佩，能够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令他感到荣耀。

一一二团远程迂回解救美军的同时，一一四团三营越过一一三团阵地，向孟拱河谷东岸日军的一线抵抗阵地推进，于十七日与日军遭遇。三营以九连正面攻击，七连和八连两翼迂回。日军在炮火支援下猛烈反攻，双方混战在一起。二十三日，一一二团将二营投入战场，连续攻克了日军数个地势险要的据点，二营四连渗透到日军阵地侧后，日军残部仓皇逃窜。与此同时，一营则在密林中秘密奔袭，攻克拉吉和大龙阳，与奔袭至曼平附近的一一二团迂回部队取得了联络。

中国驻印军官兵决心不顾雨季恶劣的气候，继续分道南下向甘马因前进。

担任沿公路正面进攻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在英开塘以南的马拉高附近与日军陷入苦战。日军阵地前地形开阔，机枪火力极其凶猛。二营六连攻占日军阵地大部后，日军退守阵地一角顽强抵抗。一营

在坦克的配合下加入了战斗，但无进展。三营上来接替一营，一营从山地向日军阵地侧后迂回，在悬崖上攀爬了两天，才抵达敌后的一个高地，并开始从侧后实施攻击，但即刻遭到日军的围攻。而此时正面进攻仍旧胶着，双方都伤亡惨重。

第二十二师自出战以来，伤亡严重且久战疲惫。师长廖耀湘增调刚刚抵达战场的第五十师一四九团前往助战，并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术再次发动猛攻，于五月二十日包围了马拉高地区的日军主力。在新编第二十二师坚持不懈的攻击下，日军阵地不断被压缩，终于在一个大雨倾盆之夜，日军意志崩溃，在放弃阵地逃窜时受到中国官兵的追击围歼。

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为挽救危局，开始向甘马因大量调集部队，企图再次与中国驻印军决一死战。

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仔细分析了当前战局：甘马因日军在外围作战中伤亡极大，其兵力都调到了第一线，后方肯定十分空虚；中美联合突击队已接近密支那近郊，急需配合作战；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仍在马拉高地区与日军激战。此时，如果能趁日军增援甘马因的部队尚未完全抵达，一举拿下甘马因并南下孟拱，将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为此，孙师长主动请缨：由他率领新编第三十八师向甘马因敌后穿插，切断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协同正面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对甘马因实施夹击。

史迪威立即批准了孙立人的作战计划。

先遣队还是那个总是在翻山越岭的一一二团。全团官兵每人携带四天的干粮和一个基数的弹药，不带炮兵和骡马，开始了又一次艰苦的远程迂回。他们翻过大山，穿过密林，在没有任何渡河器材的情况下于泛滥的洪水中强渡孟拱河，五月二十七日突然对西同的日军第十二辎重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和守护仓库的两个步兵中队发起了攻击。这里处于战线后方，正在用早餐的日军没有任何防备，枪声响起时还以为盟军要在这里空降，慌乱间竟然拉响了防空警报，但很快就发现攻击来自地面而不是天上。混战之后，七百多名日军被打死打伤。而缴获之丰厚令中国驻印军官兵感到惊喜：大口径榴弹炮四门、步枪四百余支、卡车四十五辆、小汽车两辆、马车一百多辆。中国驻印军官兵还占领了一座汽车修理所，以及十一座粮弹仓库。一一二团官兵沿着公路继续攻击前进，二十八日攻占公路上的制高点，切断了甘马因日军唯一的后援补给线。

侧背出现中国军队且后勤基地被毁，日军急忙派第二师团第四联队和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二八、第一五一联队各一部，携带重炮四门、山炮十六门和坦克五辆，前来对二团进行围剿。—一二团转为死守阵地，数日之内击退日军多次轮番进攻。六月二日，日军的进攻达到十四次，阵地北端的一营三连官兵与蜂拥而上的日军混战在一起，连长周有良阵亡，一排官兵和日军肉搏五小时后全部殉国，但一一二团的阵地岿然不动。

一一二团大胆迂回作战的意义在于：孟拱河谷里的日军从此再也得不到一粒米、一颗子弹的补充。日军溃败的命运已成定局。

在一一二团于敌后给日军造成极大恐慌的同时，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四团披荆斩棘，经过大班等杳无人烟的地区，不分昼夜地潜行，于六月一日出其不意地攻占了拉芒卡道，席卷了东、西瓦拉日军各据点，切断了卡南、纳昌康以北日军的交通线。然后沿着丹邦河继续向南追击逃敌，五日占丹邦卡，六日占大高和卡当，十五日前锋一营前出到孟拱与密支那之间的交通要冲。一一三团扫清了当面残敌向前推进，攻克纳昌康，八日晚直抵孟拱河边与甘马因一水之隔的日军重要据点支遵，毙敌二百余人后将其占领。甘马因近在眼前，一一三团官兵急不可耐，试图用竹筏强渡泛滥的孟拱河，河水凶猛，数次强渡均未成功。

此时，新编第二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都上来了，甘马因的日军已被紧紧包围。

六月十六日，中国驻印军对甘马因的总攻开始。一一三团领到了紧急运到的橡皮艇和山炮烟幕弹，三营在炮火和烟幕弹的掩护下强行渡河成功，随即攻占了可以俯瞰甘马因的六三七高地。日军已经完全乱了方寸，纷纷往城内撤退，三营紧追不舍，跟着撤退的日军冲进西南城区。到下午时分，中国官兵完全控制了甘马因，伤亡惨重的日军仓皇出逃，纷纷抱着原木跳进孟拱河，除了溺水而亡者外均被击毙。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率领少部分官兵向南落荒而逃。

甘马因一战，仅新编第二十二师就毙伤日军五千人以上，清点出的日军尸体达一千六百多具，同时还活捉了七十多名日军官兵——屡经补充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经过此战已基本被中国驻印军全歼。

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致电蒋介石报告甘马因战果，说两年前被日军赶进野人山遭受的苦难今天得以雪耻：

特急。重庆委员长蒋、总长何：甘马因（加迈）会战自六月一日突破马拉关敌坚固阵地，九号包围敌十八师团于湖沼地带，歼其主力。十六晚进克甘马因。赖友军协力，再将敌残部包围于卡马南以南山地及孟拱河间，其虽作困兽之斗，终因我官兵士气旺盛、用命所致，于二十九日完成扫荡，田中新一率领残卒约一千五百余，钻隙辟路，攀援雪邦山崖壁，向南逃窜。我俘大炮共四十门（内一五〇及一〇五重炮十二门、野炮六门、山炮两门、新式四七战防炮七门、三七平射炮七门、七〇榴弹炮两门、中迫击炮四门），高射机枪一挺，载重汽车一百六十七辆，田中新一以下乘车十二辆，轻重步枪、掷弹筒一千六百余支，仓库三十余所。生俘敌原藤大尉以下七十余名，重要文件、装具弹药等甚多，尚难统计。查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大，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就在中国驻印军攻击甘马因之际，英国人又出了麻烦：英军第七十七旅参谋迪克少校突然出现在新编第三十八师指挥部，说他们被日军包围后伤亡惨重，现在仅剩下不足五百人，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英军第七十七旅即是在缅北空降的部队，他们认为甘马因受到中国驻印军的围攻，日军必定顾不上孟拱城，于是乘虚向孟拱城发动了进攻，谁知遇到从密支那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一二八联队，英军第七十七旅被包围在距孟拱城仅三公里处。

守卫孟拱城的日军是个大杂烩：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二八联队主力、第一五一联队一部、第五十四师团第十四联队一部、第二师团第四联队一部、第五十三炮兵联队以及逃到此地的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残部。

孙立人的部队还在攻击甘马因，但迪克少校声称，如果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得不到解救，就只能放弃对孟拱城的攻击而撤退到山里。孙立人师长认为，如果攻击孟拱城的英军溃败，将危及孟拱城前线整体战局。于是命令一一四团强渡孟拱河，向孟拱城急行军，一部解救英军，主力攻占孟拱城南的日军据点，切断铁路和公路后围攻孟拱，既不能让英军散了伙，更不能让日军跑了。

大雨如注，天地迷蒙，河水汹涌，道路泥泞。一一四团官兵一夜强行军来到孟拱河边，冒险乘坐橡皮艇渡过湍急的浊流，当夜便把包围英军的日军赶跑，然后开始攻击孟拱城外的日军阵地。孟拱城的日军没想到中国军队的行动如此迅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一一四团连续攻占孟

拱城外的数个据点后，迫使日军全部退守孟拱城内。

六月二十四日，炮兵上来了，一一四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对孟拱城发动总攻。激战六小时攻入城区开始巷战，到黄昏时分已占领了大半个城区。入夜，残存的日军疯狂反击，双方在残垣断壁间用手榴弹和刺刀拼死搏斗。天亮了，仍有部分日军在城西北角顽抗。二十五日上午，残存日军坚持不住，纷纷跑出城外跳河逃生，大部溺水而亡或被击毙在河边。

孟拱之战击毙日军第五十三师团炮兵联队联队长高见量太郎大佐和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二八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钉本昌利少佐等以下官兵三千四百余人，俘虏日军官兵四百三十人。

孟拱城的攻占，标志着孟拱河谷作战结束。

中国驻印军自进入孟拱河谷以来，殊死作战四个月有余，由坚布山口南端的沙杜猹向南推进了百余公里，基本上全歼了日军第十八师团，重创日军第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此战后，甘马因、孟拱至密支那的公路和铁路畅通无阻，缅北反攻作战彻底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

在缴获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一份文件中，中国驻印军官兵看到这样一句话："支那军归家心切，锐不可当。"这句话令他们泪水湿润眼眶。身处异国他乡两年多，即使冲锋陷阵的时候，打回祖国去与妻儿老小团聚的梦想依旧萦绕心头。祖国越来越近，他们是那样焦灼地盼望着走进家门拥抱白发满头的母亲和喜泪涟涟的妻子的那一刻，如果在这一刻成为现实之前他们还活着的话。

中国驻印军官兵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的顽强不屈，他们英勇无畏的牺牲以鲜血和生命铸造了中国人的光荣。美国《皇冠》杂志刊登战地记者的评述："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缅北之战"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而感受最深的，则是那些被史迪威安插在中国驻印军中的美军联络员。这些美国军官刚刚与身材瘦小的中国官兵接触时，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他们自认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上等人。但是，缅北残酷的战斗让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官兵肃然起敬。

美军上校布朗这样说道：

中国人是我看到的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缅甸的雨季来了。

在没完没了的苦雨的浇淋中，史迪威和中国驻印军官兵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振奋的消息：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出击了。

中国远征军的反击炮声在一条大江的岸边隆隆响起。

那条大江的名字叫怒江。

第三十九章

山河震眩，声折江河

一九四四年五月，雨季中的怒江峡谷陡立在滇西的崇山之中。

中国远征军的便衣侦察队，在当地山民的引导下一直在秘密偷渡。——远征军官兵攀爬于江边陡坡考察地形，数千木匠和船工昼夜打造大型船筏，四千多名经过美军训练的中国工兵开辟出数个渡口，美军工兵带来的几百条橡皮艇已经运达，远征军各部队在澜沧江上的强渡训练业已完成。

中国抗战进行到第七年的时候，为保住大后方的国际援助通道，中国方面超乎寻常地将重兵倾斜于国土一隅，在云南西部集结了四十万之众的陆军主力，且这些部队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作战能力都居抗战中国各战区之首。

与此相比，深入中国滇西境内的日军就显得势单力薄了：负责云南西部防御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九四二年四月攻到怒江边后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师团满编时兵力为两万多人。虽然之后日军陆续调来第十八、第二、第五十三师团部队，但一般都是联队的规模，以致在滇西防御的日军总兵力加起来只有六万八千余人。

历史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日军侵入中国国土时那种肆无忌惮的长驱直入已经不再，中国军队终于看到了日军陷于绝境的情景。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决定：以远征军一部进攻怒江以西的日军，策应正在反攻缅北的驻印军。

十七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发布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 方针

一、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

二、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怒江左（东）岸防守之责；另以该集团军之新编第三十九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

各派一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之作战。

三、攻击准备限四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开始时机，另命之。

第二 指导要领

甲、攻击准备

一、渡河攻击军准备如次：

（一）第一线兵团：依守备部队之掩护，径行展开于栗柴坝、勐古渡、双虹桥间地区，准备渡河攻击。

（二）第二线兵团：集结于漕涧地区，准备随第一线兵团之进展，参加作战。

（三）炮兵部队：抽调三个山炮营及重迫击炮一个团（欠一营），先在攻击渡河地区进入阵地，准备掩护强渡。

（工兵、侦察、通信、交通、粮秣、弹药、兵站输力、兵站卫生等略）

乙、攻击实施

一、防守部队第一线师之游击营，最先开始渡河；其次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在惠仁桥开始强渡；再次第二军之加强团，向滚弄进攻；然后攻击军之第一线兵团，在预定之攻击正面，突然开始强渡。

二、第二军之加强团，于攻略滚弄我岸之敌桥头堡后，即行停止，但仍作佯渡以欺骗敌军。新编第三十九师之加强团，于惠仁桥强渡后，向橄榄寨挺进，以吸引腾冲附近之敌军。特别游击区之部队，于攻略拖角后，一部向西警戒，主力向茶山河（明光北方）、明光南进，威胁腾北敌军侧背，协助攻击军之攻击。

三、攻击军第一线兵团，于开始渡河前，务积力秘匿行动，以主力于栗柴坝、双虹桥间各渡口，实施强渡，并于占领桥头堡后，立即架设军桥，向马面关、江苴街之线攻击前进。另以一小部，由西郎渡（栗柴坝北方）附近渡河，驱逐当面之敌，迂回桥头堡之侧背。攻击军于第一线兵团攻略桥头街、江苴街各据点后，再以第二线兵团加入扩张战果，以一部向明光前进，以主力作旋回，向固东街、江苴街之线前进。此时

须保持重点于左翼，占领固东街、江苴街后，整顿态势，准备进攻腾冲。

四、炮兵部队，于步兵部队强渡成功后，第六军山炮营归还建制，留置怒江我岸，其余随攻击军渡河前进。

（工兵、通讯、兵站等行动计划略）

八、敌如集中主力迎击我攻击军时，我攻击军应即与敌决战。此时防守军部队，第七十一军之预备队，第八十八师及第六军之新编第三十九师主力，应以全力加入，该师加强团由惠仁桥附近渡河，径向腾冲攻击前进，以包围歼灭敌人于腾北地区。敌如以主力由惠通桥、三江口或滚弄方面渡河攻击时，我防守部队应极力拒止，并牵制抑留之，使攻击军之作战容易。

九、攻击军渡河成功后，战术方式须多用渗透战术，并须先扫荡其据点外敌之野战部队，然后再对敌各个据点分别攻击。

（军队区分、兵团任务等略）

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中国远征军即将大举反攻，日军立即意识到这将是关乎滇西乃至缅北日军生死的一场恶战。担任怒江前线防御任务的第五十六师团，自北向南加固了瓦甸、腾冲、松山、平戛等一系列防御支撑点的工事，使其达到可承受中等口径火炮直接命中的坚固程度，并在每一个据点内储存了至少能维持三个月战斗和生活的物资。为确保滇缅公路，日军在沿途主要渡河点预先架设起备用桥墩，储备了可供架设整座桥的材料。日军还扩展了龙陵一腾冲一瓦甸一线的公路，并对怒江各渡口以及高黎贡山麓的地形进行了详细侦察测量，使手中的作战地图得到补充和修订。

日军的防御部署是：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部驻芒市，第一一三联队附属炮兵一部分别据守腊勐、松山、大坝子、黄草坝一线，第一四八联队分别据守腾冲、桥头、马面关、瓦甸、江苴一线，师团搜索联队防守缅甸境内的滚弄，师团工兵联队据守龙陵及附近地区，第一四六联队第一大队防御平戛、象达一线，联队主力为师团反击预备兵力；第十八师团第一四联队第一大队据守片马、拖角、明光、固东一线；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第二大队和第五十三师团搜索联队等部队警戒遮放、畹町至缅甸境内腊戍之间的公路，同时充当师团机动预备队。

怒江从西藏进入云南后，流经海拔三千米的高原，于崇山之中穿开条深邃的江谷，江水自北向南湍急流淌。远征军官兵要想反攻滇西日军，必须先下到深谷，渡过奔腾的怒江后，攀登耸立在江岸的陡坡山崖，进入连绵起伏的高黎贡山，而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精锐部队正扼守着各个山顶据点。

五月十一日上午，集结在怒江东岸的两万多远征军官兵，沿着怒江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十二个渡口开始了大规模强渡。北面，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五九四团，首先在栗柴坝、孙足渡渡口利用船筏冲过激流，登上怒江西岸高黎贡山麓陡峭的岩坡，在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预备第二师游击营的配合下，迅速攻占邦瓦寨，并向北斋公房方向警戒。接着，沿着怒江自北向南，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主力在勐古渡、水井渡，第三十六师并配属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由康郎渡、勐濑渡、缅戛渡、大沙坝渡、龙潭渡强渡怒江。由于准备周密，行动隐蔽，至十二日拂晓，远征军第一线兵团各部队均强渡成功。为策应第二十集团军的作战，第十一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在惠仁渡渡江后，迅速攻占红木树；第八十八师加强团于打黑渡、第七十六师和第九师联合加强团于罕拐渡强渡后，合力攻击平戛街。由于行动机密，攻击果断，日军仅留少量兵力固守平戛，大部收缩至西北方向的芒市。而在怒江下游接近缅甸边境附近，新编第三十三师加强团顺利渡江后，已开始向缅甸境内的滚弄攻击前进。——中国远征军部队分成多个“能在数日内独立自给战斗的战斗群”，运用高度的机动性，向分布于怒江以西，北起片马、南至滚弄的广阔地域里的日军防线进行着迅猛的纵深穿插。

五月十三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

闻近日尊体康复，无任欣慰。中国远征军已于昨日强渡萨尔温江（在此指中国云南境内的怒江，怒江流出国境进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完毕，现在向敌军猛烈进攻中，中国甚愿竭尽绵薄，能策应盟军在印缅之作战有所补益，以副阁下之殷望。惟中国本为贫弱之国，加以今日七年之抗战，其艰难困苦，甚于其他之盟邦，必为阁下所深悉。而且中国战场，一方面在其战场中心河南平原作战，正在大规模发展之时；而一方面又欲在萨尔温江作战同时进行，以中国疲弱之身，而当此两面作战之重任，其危艰之状，更倍于往昔，尚望阁下体谅此苦情是荷。蒋中正。

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渡江后，连续攻克大寨和茶房，之后挡在官兵们面前的便是高黎贡山上的险要据点北斋公房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

四八联队第二大队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防守，第一九八师攻击受挫。该师滞留少量部队监视正面，主力则绕过北斋公房，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于十六日攻占北斋公房侧后的马面关和桥头，切断了北斋公房日军守军的退路。二十一日后，第一九八师多次对北斋公房发起攻击，由于屡攻不克，双方形成僵持之势。

第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和配属该师的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渡过怒江后，向大尖山、唐习山、鸡心山方向的日军发动攻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第三大队拼死防守，第三十六师官兵一度攻入大尖山，但又被日军反击回来。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时，第二十集团军命令第五十三军主力渡江接替攻击任务。

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是东北军旧部。该军兵强马壮时曾拥有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兵力达六万之众。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的番号下只剩下两个师。全面抗战爆发，第五十三军曾参加平汉路作战、武汉会战，并策应了薛岳指挥的两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三年，全军编入远征军序列。现任军长为周福成，下辖赵镇藩的第一一六师和张玉廷的第一三〇师。

第五十三军渡过怒江后，第一一六师攻占唐习山、大坪子高地。第一三〇师攻击大塘子和马蹄山时，日军凭借险要山势以猛烈火力抵抗，第一三〇师官兵不断伤亡，攻击持续数天后却仍无进展。师长张玉廷增派三八九团加入攻击，于五月二十四日终于占领南面的马蹄山，但北面的大塘子仍处于苦战中。为策应第一三〇师的作战，第一一六师三四七团的一个营插入到日军的侧背。二十六日，第一三〇师终于攻下大塘子。

大塘子南面的南斋公房，是日军在高黎贡山主峰附近的险要据点，海拔四千多米。阴雨连绵，第五十三军从大塘子和唐习山向南斋公房推进，一路上都是险峻的陡坡，有的地段坡度达八十度以上。山势的陡峭使得粮秣弹药的补给成了问题。美军联络官想当然地认为，依靠强大的空投能力完全能够解决，但是高黎贡山上风雨交加，云雾缭绕，飞行员根本找不到在崖壁间攀爬的部队在哪里；即使看见了，空投下去的物资也大多坠入了深渊。而依靠当地马帮的有限运输根本无法满足部队的需求。

第五十三军以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为右翼，攻击南斋公房；以第一三〇师为左翼，攻击南斋公房以西的江苴街。在陡峭的山路上，三四六

团无法展开火力，官兵们不断地发起仰攻，每次都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后退。就在正面部队一次次进攻的同时，三四六团的一支敢死队在绝壁间攀爬了两天，终于迂回到南斋公房的背后发起突袭。南斋公房的日军猝不及防，仓皇撤退。六月十一日，南斋公房被远征军官兵攻占。

此时，第一三〇师官兵已抵达南斋公房以西的江苴附近。这是一个很大的山寨，盘踞两年的日军把工事修筑得极为坚固。第一三〇师指挥官面对日军的严阵以待，不但怕打不下来，更怕日军一旦增援将会导致全师陷入绝境，加之在翻越高黎贡山时，很多官兵因冻饿交加而病倒，于是犹豫再三后决定撤退。周福成军长得知后，当即撤了张玉廷的师长职务，命令副师长王理寰接任师长指挥权，率领第一三〇师立即对江苴发起攻击，并派第一一六师前来增援。

第五十三军的两个师，第一一六师和第一三〇师，官兵随身携带的给养已消耗殆尽，高黎贡山间云雾迷漫，与企图空投的飞机联络不上，大山深处方圆百里杳无人迹，只能依靠采挖野菜和竹根为食。高黎贡山是中国西南垂直落差最大的山脉之一，山下怒江两岸夏季闷热，而山顶的气温却仅有几度，入夜甚至会降至零摄氏度。森林密布，冷雨飘摇，穿着单薄军服的官兵腹内空空，虽然每个人都发了美式雨衣，但冻饿还是会让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更何况，头顶上是居高临下的日军火力阻击，脚下是湿滑陡峭的崖壁山路，部队每推进一步都要凭借极大的勇气和意志。日军第一四八联队主力从北向南，第一一三联队从南向北，夹击进攻江苴的第五十三军。第五十三军的两个师苦战至六月二十一日，终于攻下江亘。

在北斋公房方向，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依旧久攻不克。六月九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前来增援，马面关和桥头再次被日军占领。第五十四军命令第三十六师主力攻击桥头，协助第一九八师对北斋公房的再次进攻，第六军预备第二师也奉命前来增援。从怒江岸边陡立而上的峭壁间，山路两侧布满了日军的碉堡，远征军攻击部队一面艰苦地攀援，一面持续不断地消灭碉堡，官兵们装备的美式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发挥了作用，在火箭弹的轰击和火焰喷射器的烈焰中，日军被赶出地堡，在森林中四处逃命。接近位于山顶的北斋公房据点时，远征军官兵接到指令：撤离一千米，等着航空兵来收拾日军。官兵们撤到北斋公房北侧的丛林里，燃起篝火烤衣做饭，然后就听到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机呼啸而来：九架侦察机先在怒江上空盘旋，随之向北斋公房俯冲扫射，同时发射了指示目标的彩色曳光弹，接着轰炸机就来了，成吨的航空炸弹倾泻在日军盘踞的地堡上，剧烈的爆炸声震撼山峦，地堡的残片

和日军的残肢高高地腾起，地面上的远征军官兵欢呼雀跃。

从据点逃出来的日军，只能利用山林树木和地堡废墟顽抗，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处境。他们从遥远的日本被征召而来，从没想到会命丧中国西南部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罕至的高山之上。高山之上的景象令他们不寒而栗：云雾之中的高黎贡山峦，到处可见中国怒族、傈僳族、苗族、独龙族的妇女孩童为远征军官兵带路、运送物资和伤员；青年们则手持打猎的枪支、弩箭和铁叉，与手持美式武器的远征军官兵一起，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追杀。追杀持续了三天，中国军民清除了崎岖山路两侧所有地堡里的残敌——“留下的是遍地敌尸、死马，那人血、马血混合的血浆与大雨后山间小道上的泥土拌合着，结成一种臭不可闻的殷黑色的泥巴”。

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展开全面攻击后，重庆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驻印军已经开始攻击密支那，缅北的日军难以调兵增援滇西，随即决定将远征军全部兵力投入滇西反攻。并于五月二十一日下达了远征军主力乘机渡江，猛烈扩张战果，向腾冲、龙陵和芒市全线攻击的命令。

二十二日，由防守军转为攻击军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发布作战计划：

第一 方针

集团军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各攻击部队，务于三十日以前，分别向攀枝花渡、军寨渡、葛蒲厂及平戛东侧（七道河）各附近地区集结完毕，准备攻击。

二、攻击开始时，先以有力之一部，协同惠通桥我岸炮兵，攻击腊勐、松山，吸引敌之注意力于该方面，然后以主力直趋龙陵、芒市，依飞机、炮兵之协力，包围而攻略之。

三、攻击奏效后，即以一部向畹町、九谷（以上两地均在芒市西南）挺进；主力暂集结于龙陵、芒市整顿待命。

第三 兵团区分及任务行动

一、第七十一军（欠搜索营）配属第五军之山炮营，为右翼攻击军。其现在平戛附近之第八十八师主力，俟第二军到达，将第二军地区内阵地交代后，即向大雪厂附近集结。军其余部队，俟将江防任务移交第八十二师及新编第三十九师之一一七团后，军主力即向攀枝花渡、军寨渡各渡口附近，一部向葛蒲厂附近地区集结，限五月三十日以前集结完毕（但应先派一部，在各渡口左（西）岸占领掩护阵地）。待渡江攻击命令颁发后，应即以一加强步兵团，依惠通桥我岸炮兵之协力，先攻击腊勐、松山，随即以主力直攻龙陵，但特须注意右侧之警戒，向右梯次配置。

二、第二军（欠新编第三十三师及第九师之一团）为左翼攻击军，应先派一部（接替第八十八师之加强团）协同现在平戛附近之第七十六师加强团，迅速扫荡平戛残敌，确实占领之。军主力应哿日（二十日）由现在集结地区出发，限五月三十日以前，到达平戛东南地区集结，待攻击命令颁发后，即向芒市攻击前进。但须注意破坏芒市、遮放间之交通，阻止敌之增援。

三、两攻击军之作战地境：为打黑渡、大雪厂、大水河、七河边、竹坝、放马桥、大定白相连之线，线上属右。

四、新编第三十九师（欠——七团）应在现阵地略加整顿，续向红木树之敌攻击，俟占领红木树后，再相机向腾冲攻击。新编第三十九师之一一七团，及配属之第七十一军搜索营，第六军山炮营之一连，即接替新编第二十八师，自来贡渡（含），经惠仁桥迄抛石渡以南无名河（不含）之一带江防，限定五月二十六日以前接替完毕。以上统归第六军黄杰军长指挥，该军军部应即移至蒲缥附近。

五、原卡瓦山游击支队张振武部，即改编为本部别动队，限五月三十日前，向于浩附近集结，待命渡江，由新城以南地区，向镇安街、腊勐、松山攻击。

六、新编第三十三师及第九师之一团，配属第二军山炮兵之一部，除以一部佯攻滚弄外，主力调整配备，固守既设阵地，特须置重点于四方井附近地区。

七、炮兵第十团（两营）及炮兵第七团之混合营，均归炮兵第十团胡团长指挥，即于惠通桥我岸，选定阵地准备对松山：腊勐各要点射击，限于五月三十日以前，进入阵地，准备完毕，待第七十一军所部之

部队（第二十八师主力）向腊勐、松山攻击时，即向各要点射击，支援该部队之战斗。

八、集团军指挥所，定于五月二十九日由保山推进至白旺（白肚）。

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当面日军，是以龙陵为防御核心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在通往龙陵的沿途有两大据点：北为滇缅公路上的松山，南为康芒公路上的平戛，其中以松山据点最为坚固。在松山与龙陵之间防御的日军第一四六联队主力，自一九四二年占领松山以后，驱使大量当地劳工，在第五十六师团工兵部队的支持下，围绕松山核心阵地修筑了一系列永久性防御工事，大型地堡均由粗木和重型钢板构成，上面覆盖的泥土厚达三米以上，可以抵御重炮的轰击和航空炸弹的轰炸。

按照第十一集团军的计划，自五月二十九日开始，第七十一军主力附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自北向南，分别由惠通桥、攀枝花、军寨渡、火石地、打黑渡、七道河等渡口大规模强渡怒江。至六月二日，所有部队均顺利登上怒江西岸。集团军司令部得知日军后方空虚，决定以一部攻击腊勐和松山，主力直指龙陵和芒市。

从第十一集团军的作战计划上看，宋希濂试图先以两个军的兵力攻占平戛、象达和镇安街，进而攻克龙陵和芒市。如果得手，北面的松山日军会因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撤退。因此，他在攻击松山的方向上，只投入了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八十二、八十三团，而把该师的八十四团划归第八十八师打龙陵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对龙陵还是松山的敌情判断，中国远征军都作了过低的估计。

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两个团渡江时，两个美式榴弹炮团和一个山炮营的上百门火炮向江对岸猛烈轰击，天上还有九架美军的轰炸机助战，因此渡江时没有遇到日军的任何抵抗。过了江即是人马难行的陡峭山路，所幸在远征军猛烈炮火的打击下，一个中队的日军守军难以支撑，已从前沿竹子坡阵地撤退到腊勐，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二团官兵得以不战登上竹子坡。一上来他们便看见了矗立在眼前的阴登山，山上日军防御工事外的铁丝网在日落时分闪闪发光。

阴登山是一座形状如钟的小山，山顶处有一个约三十度左右的斜面，接下来便是六十度以上的陡坡。斜坡上的树木已被日军砍光，陡坡上依旧林木茂密。日军在山顶修筑的大量地堡，尽管数天来受到重炮的

持续轰击和战机的猛烈轰炸，但看上去损坏得并不严重。

阴登山是松山日军的屏障。

松山附近几座山上的日军可从不同方向对阴登山进行火力支持。

六月四日，八十二团和八十三团在竹子坡修筑起临时工事，军直属山炮营也赶上来开设了阵地，准备第二天向阴登山发动进攻。可是，半夜时出了情况：大约二十三时左右，八十二团七连的李排长带队沿着前沿草丛中的小路巡逻，突然草丛里跃出一个黑影，刺刀瞬间便戳进了一名中国士兵的胸口。那名士兵大叫一声倒地的瞬间，李排长下意识地想把他扶起来，但感觉到一把刺刀正朝他刺来，他猛地一闪同时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对方的枪先响了，他一只手的两个手指被打断。李排长把冲锋枪的枪口直接戳向对方的胸膛，打出一串连发，然后指挥巡逻队一起开火。激烈的枪战后，日军丢下六具尸体消失在黑暗中。李排长专门查看了刺死中国士兵的那名日军的尸体，从肩章上辨认出是一名军曹。

这一情况令中国官兵意识到，天亮后的进攻必是一场血战。

五日，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两个团，在重炮和轰炸机的助战下，分别向阴登山和山脚下的腊勐发起进攻。八十三团经过激战冲进腊勐街，日军后撤。八十三团击溃日军的数次反击，切断了通往大坝的公路。之后，八十二团在攻击阴登山时，遭遇日军猛烈的火力抵抗。先头部队三营冲到山脚下开始攀爬陡坡，陡坡上的密林中到处都是日军暗藏的射手，三营只有以全方位的密集扫射开路，不顾伤亡地前仆后继向上推进。推进到陡坡与缓坡交界处时，由于缓坡上的树木乃至茅草都被日军清除，光秃秃的山顶上日军的主阵地清晰可见。远征军的炮火轰击开始延伸，三营的两个连在机枪掩护下发起第一次冲锋，可士兵们刚刚跃出棱线，就遭到来自南、北、西三面交叉火网的拦截。缓坡上没有任何隐蔽物，几十名士兵瞬间便倒在光溜溜的坡面上。只是，日军的拦截暴露了中国军队事先没有发现的暗火力点，炮兵立即校正射击。除了山炮营之外，怒江对岸的榴弹炮群也加入了对阴登山的轰击，日军的阵地上一时间硝烟弥漫。炮火打击后，八十二团连续组织三次冲锋，包括机枪连连长在内伤亡了百余人，直到天黑攻击仍没取得进展。官兵们只能在距山顶很近的棱线上挖掘战壕，准备天亮后再战。

午夜里又出了情况：二十四时左右，日军潜行到八十二团棱线战壕的后方，刺死了两名中国哨兵，然后摸到机枪三连的阵地上。机枪三连

班长聂正容正在给自己的机枪装填子弹，被日军从背后一刀刺死。他的惨叫声惊动了排长王保成，王排长正试图查看情况，富有战斗经验的副连长吴俊臣的枪响了。日军哇哇地叫喊着冲上来，机枪三连的六挺重机枪迅速扫射，密集的机枪子弹令日军无法招架。山顶上的日军冲下来企图接应，遭到中国官兵的火力拦截。待棱线上终于平静下来时，中国官兵立即抢救伤员，同时在战壕边清点出三十多具日军的尸体。

六日，八十二团使用了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数十挺轻重机枪掩护着步兵轮番冲锋。中国官兵曾一度冲上山顶，但很快就在日军的反击下再次退回到棱线上。这一天八十二团官兵伤亡数十人。

七日，八十二团再次以两个营的兵力对阴登山实施攻击，摧毁了日军的几个地堡后又一次冲上山顶，没想到再次被日军反击下来。如此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日军只要还有一口气便不放下武器，最后时刻用手榴弹与冲杀过来的中国士兵同归于尽，那些身边没有手榴弹的则用刺刀戳进自己的腹部自杀。向山顶冲击的远征军官兵还遇到一个令他们不知所措的情景：当一个地堡里的日军伤亡殆尽时，最后从地堡里冲出来的竟然是一群披头散发的女人——远征军官兵曾听说过日军阵地上有营妓——这些女人号叫着朝他们投掷手榴弹。中国官兵还吃惊地发现，日军修筑的地堡如此坚固，即使被大口径榴弹炮直接命中也可以毫发无损——一个地堡被轰炸机投掷的重磅炸弹将顶部炸开，露出里面被数条铁轨支撑着的直径达一米多的原木和厚达两厘米的钢板，地堡内部因此损毁不大，且生活设备齐全。

阴登山山顶阵地上有一段四五十米的交通壕，是日军躲避猛烈炮击时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也是中国官兵与日军肉搏最为集中的地方。这里已经躺着上百具两军官兵的尸体，交通壕内已被污血染成黑色。由于日军不断地反击，没有时间处理尸体，且尸体每天都在增加，天气炎热，尸体腐烂，交战两军只能站在尸体上和血潭中进行着没完没了的冲锋和反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半个月，直到阴登山阵地上的日军在如此的消耗中被歼灭。

新编第二十八师在阴登山血战的同时，王凌云的第二军攻占了平夏和象达；钟彬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配属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四团开始向龙陵推进。八十四团越过象达，插到龙陵与芒市之间的华达岭，击溃日军两个中队的阻击，占领龙陵至芒市公路上的要点放马桥；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于六月十日抵近龙陵近郊后，对外围的日军阵地发起猛攻，其前锋逐渐逼近龙陵城下。

龙陵日军城垣之坚固、作战意志之顽强、储备物资之充足，皆出乎中国远征军的预料。龙陵城外那些尚未被攻克的据点，虽已孤立无援仍各自为战，死拼死打，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官兵反复攻击均未奏效。细雨绵绵，阴云密布，粮秣弹药消耗巨大而空投补充杯水车薪，从怒江边的渡口沿着狭窄山路的补给运输因异常艰难，所运物资难以支撑数万官兵的需求。由此，第七十一军对龙陵的攻击力度逐渐减弱。

为了确保滇缅公路上的要冲龙陵，日军从腾冲方向派出一千五百名官兵，沿着腾冲至龙陵的公路南下增援，其前锋已经越过龙川江。第八十七师奉命前往迎敌，两军激战后双方的伤亡都很严重。十五日，增援日军调集重炮再次向第八十七师的阻击阵地突击，二〇五团据守的二五五高地被突破。亲自督率作战的张绍勋师长，眼看着战局不断恶化，“诚恐无法挽回，乃愤自杀，弹由左乳左肋下出”。张师长被送往后方由美军医生治疗，第八十七师副师长黄炎代理师长职务。与此同时，从芒市出发的六百余日军也向龙陵增援而来，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四团在龙陵以南的放马桥对其实施阻击，尽管八十四团的阻击阵地始终未丢，仍是让一部分日军突进了龙陵城。

集结在龙陵附近的日军，除了第五十六师团的第一一三、第一四六联队外，还得到了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一九联队和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的增援。日军开始向第七十一军发动反击。尽管得到第二军一个团的增援，第七十一军的作战形势依然严峻，既要扫除龙陵的外围据点，还要阻击增援而来的日军，结果导致战斗持续数日后不但没能对龙陵城发起攻击，反而在日军的冲击下节节后退。危急时刻，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动用了预备队第八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迅速推进，加入第七十军的作战，中日两军在龙陵城外围再次形成对峙。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认为，龙陵战事胶着的原因之一，即是腾冲方面的日军不断增援，而驻守腾冲的日军第一四八联队，由于兵力薄弱正在收缩防御线。于是，卫立煌决定先打腾冲。六月二十二日，卫立煌命令位于滇西战场北面的第二十集团军主力，迅速向西推进到固东至江苴一线，然后南下对腾冲实施攻击。

第二十集团军部署：

一、第五十四军（欠第一九八师），附预备第二师，及重迫击炮一营，于二日前到达顺江街及其以东地区，再沿顺江街、腾冲道，逐次驱

逐敌之警戒部队，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同第五十三军，对腾冲实施包围攻击。在攻击前进时特应对西警戒，并与第五十三军切取联系。

二、第五十三军附重迫击炮一营，须立即派兵一部，占领杭猛山，向酒店以南一带高地进出；其余各部队，应于二十六日以前，在干榨山、打豆山、龙川江右岸地区发起攻击，沿打豆街、观音寺，向蜚凤山攻击；再以一个团，沿龙川江左岸南下，渡过龙川江后，随军主力之进展，向飞凤山攻击，攻略各该处据点后，再协同第五十四军，包围腾冲，攻击而占领之。攻击前进时特应对左侧注意警戒，右与第五十四军切取联络。

三、第一九八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先在瓦店集结，俟第五十三军挺进后，再进至江苴街待命。

腾冲，旧名腾越，位于高黎贡山西麓，东为龙川江，可通保山、大理，西为大盈江，可通密支那、八莫，北连片马、泸水，南临龙陵、芒市，锁钥滇缅，四通八达，是贯穿川滇、西出印缅的交通重镇。始建于明代的城墙，下部是巨石、上部是巨砖，高八米、厚四米，方圆周长四千米，屹立五百年仍坚固无比。城池坐落于狭长的盆地中，飞凤山于城东，来凤山于城南，宝凤山于城西，高良山于城北，为天然环城屏障，诸山中以能俯瞰全城的来凤山最为险要。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日军进占腾冲。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城外高地地堡密布，城垣和街市处处设防，腾冲已变为一座具有纵深防御空间的坚固堡垒，而且是滇西日军最大最坚固的据点。守城的日军大部为从江苴、明光等处南撤下来的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主力，另外加之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残部，总兵力约二千余人，由第一四八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拂晓，雨雾弥漫，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的两个军五个师，向腾冲外围日军据点发起进攻。左翼第五十三军先后攻克飞凤山和五八三〇高地，右翼第五十四军攻占蜚凤山和五一三八高地。战至七日，腾冲城外日军的据点基本被攻克，只有预备第二师攻击的来凤山仍处于两军激战中。

来凤山是高黎贡山余脉，由五座山峰相连呈笔架形，中间的山峰高出腾冲城墙一百多米。山峰由坚硬的岩石构成，陡坡直上直下，光秃秃

的无林木。日军在五座山峰上都筑有坚固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山腰的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这里是日军外围防御的重点，若要攻下腾冲必先攻占此山。

预备第二师四团由团长吴心庄指挥，攻击西南面的两山；五团由团长李颐指挥，攻击西北面的两山；六团由团长方诚指挥为预备队，只待左右两团攻击成功后，一举拿下中间的主峰。攻击开始后，左右两山的日军火力凶猛，陡峭的山岩上没有任何遮蔽物可利用，主峰上的日军火力可向两翼支援射击，同时日军利用四通八达的堑壕不断实施短促出击，预备第二师的攻击屡屡受挫。

十六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召集军长和师长们开会，决定加大对来凤山的攻击力度，命令预备第二师和第三十六师，配属山炮和重迫击炮各一个营，继续对来凤山实施攻击；另派第一一六师和第一三〇师的两个团，配属山炮和重迫击炮各一个连，肃清来凤山东南部日军据点。连日大雨，美军的战机无法配合作战，远征军加强兵力后的攻击依旧没有进展。

二十六日，天晴了。

中午时分，美军的三十架轰炸机、二十七架战斗机，对来凤山和腾冲城实施了猛烈轰炸。第二十集团军也集中其一百多门火炮猛轰来凤山日军阵地，一天之内发射的炮弹多达五千余发。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来凤山上日军的堡垒一片火海。预备第二师官兵随即发起总攻，奋力向山上攀登，用冲锋枪、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扫荡残破工事里的日军。六团团长方诚亲率特务排冲到日军堡垒的射击死角，首先攻占了那条通往腾冲城内的隧道，然后把炸药包、爆破筒、火箭弹和手榴弹一股脑地塞进了主峰上的日军地堡里，六团官兵在随即响起的震天的爆炸声中蜂拥而上。主峰上日军的侧射火力威胁解除后，左右山峰的攻击部队连续肃清日军多个地堡，残余的日军开始向腾冲城收缩，来凤山被远征军官兵攻占。

腾冲已是一座孤城。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给腾冲守军指挥官藏重康美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到最后一个人。

二十七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达攻击命令：第五十四军

附重迫击炮一营，攻击腾冲城南门、西门和北门，预备第二师负责固守城南面的来凤山；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附迫击炮一营和军直属山炮营，攻击东门，第一三〇师担任外围警戒。

八月二日，远征军对腾冲城的攻击开始。

清晨，远征军的各种火炮向城内发射了三千多发炮弹，美军的六十多架战机同时对城垣实施了轮番轰炸。中午，第三十六师和第一九八师从南北两面同时发动冲击，官兵们先用炸药包破坏城墙，用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扫清城垣上的日军火力点，然后扛着竹梯强行登城。日军的火力极其凶猛，拼死封堵城垣突破口，首先登城的第三十六师一〇七团二营二连，因后续部队上不来而陷于苦战，连长刘恩宪阵亡。第一九八师在城垣东北角的攻击，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很难接近城垣，只能冲到距城垣二百米处构筑工事。第一一六师在东门的攻击也不顺利，连续攻克城垣边的四座地堡后，攻入东门外的帮办衙门。三四八团官兵利用美军战机在东南角炸开的一道十米宽的缺口冲上去，日军在反扑时施放了毒气弹，双方在狭窄的缺口处混战一夜，日军不断向缺口反击，三四八团誓死不退，同时用炸药再次扩大缺口，四日天亮时缺口已被扩大到五十米。

四日，美军战机的轰炸更加猛烈，把西南城垣也炸开一个缺口，第三十六师和第一九八师官兵乘势突入。一〇七团二营的数十名官兵组成敢死队与反击的日军死战，后续的两个连拼死增援，终于占据了缺口处日军的两处地堡，但日军的侧射火力十分猛烈，缺口处的中国官兵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

腾冲城垣之坚固，日军防御体系之完备，令远征军官兵激战两天终是没能攻破腾冲城垣。日军在城垣上构建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修筑一个碉堡或机枪掩体，城墙的中部和底部也开凿了无数射击孔。腾冲城垣的东、西、北三面地势开阔，攻击部队接近城垣十分困难。——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军长方天的电报："连日经数次肉搏攻击，大量伤亡，并未奏效，希空军配合攻击，将城墙炸出突破口以便突入。"同时，方军长还要求空运两万枚手榴弹来。

来自天空的炸弹和地面的手榴弹是日军最怕的。

果然，八月五日晨，美军战机又一次飞临腾冲上空。十五架B-25轰炸机专门向城墙俯冲投弹，轰炸持续了整整一天，把腾冲城墙炸出十个

大小不等的缺口。但是，向缺口冲锋的中国官兵在日军严密火力网的阻击下依旧伤亡惨重。

六日，美军一下子来了三十二架战机，继续对腾冲城垣实施不间断轰炸，这一次把南城楼炸塌了。第三十六师官兵不顾侧射火力带来的伤亡强行攻击，一〇七团一部在南城楼缺口处登城，一〇六团在西南缺口处登城，日军一次次地反击，最后骑兵连加入了战斗，终于巩固了突破口。

伤亡惨重的第三十六师被预备第二师替换下来。

腾冲城内的日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日军缅甸方面军从曼德勒机场起飞了四架运输机，在四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试图给腾冲城内守军空投弹药和食品，但无论是缅北还是滇西，制空权已不在日军手里。日军的八架战机刚刚飞临腾冲上空，便遭到美军战机的拦截，两架战斗机首先被击中栽到来凤山上起火燃烧，运输机急忙把物资扔下来想逃走，结果不但大部分物资未能投在城里，四架运输机连同剩下的两架战斗机全部被美军击落。

至此，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对腾冲城的攻击已持续一月有余。

日军区区两千人，火炮和机枪数量有限，且粮弹供给中断，面对的是中国军队装备精良的两个军和美军航空兵的全力作战，无论从哪方面讲，腾冲日军覆灭的下场已定。但是，谁也没想到，在城垣已经残破，中国官兵占据着多处城垣缺口的情况下，从八月十日起，腾冲城内残存的日军竟仍固守城池达一个月。

十一日，城外的中国官兵开始向城内挖掘地道。

美军的运输机不断地运来弹药和给养。

十三日，腾冲城内的日军大祸临头了：二十四架美军战机对城内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数枚重磅航空炸弹直接命中了位于城东门的日军指挥部，指挥官藏重康美大佐等三十二人被当场炸死。

得知城里的日守军没有了指挥官，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令再次总攻。

但是，直到十八日，中国官兵的攻击还是没有进展。

接替藏重康美指挥的是太田正人大尉。

十九日，第二十集团军发起第三次总攻：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第三十六师、预备第二师和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分别肃清城外残敌，同时从四面进攻城垣。当晚，第一九八师五九四团在南门外秘密设置了重机枪掩体，百余名官兵潜伏在事先埋好炸药的城垣下。攻击开始后，五九四团的二十挺重机枪一起开火，城垣下的官兵引爆了炸药，腾冲城南门附近被炸开了两个缺口，后续部队立即向缺口处冲锋。下午，第一九八师和预备第二师之间的城垣被攻占。二十日拂晓，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在城东门成功登城。预备第二师一部从城西城垣突入市区，先后攻占东岳庙、电报局和督办公署。接着，第一九八师五九三团和五九四团以及第三十六师也突入市区。接下来的巷战进行得异常残酷，日军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屋顶和每一处拐角都设置了交叉火力，中国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生命代价。

美军的战机已能从腾冲机场起降。

而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三次攻击中，美军的战机已对腾冲城共计投下了一万五千枚炸弹。

第一一六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斌回忆：

我们和一九八师打进南门街，共同围攻秀峰山日军据点。这时满街全是正在着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还会“嗞嗞”作响。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地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

腾冲日军进行的是决死之战，那些只剩一只眼、一只手、一只脚的伤兵仍心甘情愿地在战场上作战。太田正人向师团发去战报说，腾冲守军已经无所顾忌，唯独“渴望得到手榴弹”。

巷战进行了半个多月后，腾冲依旧还有半个市区在日军手里。而一个消息令人格外焦灼：日军第三十三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反扑。

蒋介石发来电报称：国军名誉沉浮即在今日。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三十日下令：“饬即迅速攻克腾城，兹特规定自明（三十一）日起，限五天内将各该军攻击区域内之敌肃清，并将每日进展情形具报。如有观望不前，或借故推诿，不能如限肃清，致使外敌增援，影响整个计划者，各该军长、师长应负贻误之责。”

三十一日，巷战中的日军被逐步压缩。

但是，十天之后，城内的残留日军依旧在抵抗。

九月九日，蒋介石的电报又到了：“腾冲必须在九月十八日国耻日之前夺回。”

十日，十架日军战机冒险飞来企图挽救危局，当即被美军战机击落了四架，其余仓皇而逃。

腾冲城内由太田正人指挥的日军只剩下七十人，收缩在东城一角面临着末日。——“市区的惨状远非野战，逐次被追到城内东北角的守备兵，在瓦砾中忍耐着城墙倒塌声和火焰喷射器的火焰，仍以超人的毅力继续死斗。”

下午四时，第五十三军第一三〇师攻占东门城楼，推进到东门大街，第一一六师主力推进到东城垣内的文家巷和李家巷；第五十四军预备第二师攻克李家巷北面的龙王庙和南面的李家塘，第一九八师推进到距东城垣不足百余米处。

十一日，几十个日军由东城垣缺口处跑出，向城东的饮马河附近逃窜，当即被中国官兵阻截，未被打死的残敌又跑回城内。

十二晚，太田正人认为，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向军司令官和师团长发出了诀别电报：“我等辜负军、师团长官期待，深感歉憾，现已焚毁军旗，准备全体一齐冲入敌阵。”

第二天，太田正人大尉带领残部进行自杀式反扑，全部战死。

边陲名城腾冲，一九四二年被日军占领，两年后已成一片废墟。

而中国远征军对一座小城的收复战，竟然伤亡了上万名士兵和上千名军官。

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战后报告：

……于马（二十一日）晨开始向城内之敌攻击，我预二师、一九八师、三十六师、一一六师各主力奋勇直前，由南面城墙下城，突入市区，激烈巷战于马展关。惟城内人烟稠密，房屋连椽，大都坚实难破。且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嗣以各部损失惨重，而各级预备队既早用罄，又无援兵以济急难，不得已将原任南甸、腾龙桥阻敌增援之一三〇师调入腾城，聊增实力。苦战二十余昼夜，所赖将士忠勇，克敌致果，业于九月十四日将困守腾城之敌全部歼灭。青白之旗乃复飘扬边陲重镇，万民鼓舞，同声庆幸。综合自渡江起，至克服腾冲止，所历大小战役四十余次，共生俘敌军官四员，士兵六十余名，营妓十八名。毙敌少将指挥官及藏重康美大佐联队长以下军官一百余员，士兵六千余名。卤获野山炮七门，步兵炮六门，迫击炮十门，重机枪十九挺，轻机枪四十七挺，步、骑枪千余支，汽车十余辆，有、无线电机二十五部，及其它军用品无算，我亦伤亡官佐一千三百三十四员，士兵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五名。

腾冲之战结束后，军民于城西南一公里处的来凤山北麓修建了一座国殇墓园，将战死在这片边陲之地的近万名将士遗骸安葬在这里。

年年岁岁，国殇墓园内花树繁茂。

一九四四年春，在缅甸北部，中国驻印军官兵也在争夺着一座小城，这就是缅北重镇密支那。

密支那是缅北日军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这座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的小城，是贯穿缅甸南北铁路干线的终点，自此放射出去的公路四通八达，这里还是缅北重要的行政中心、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小城四周被山地包裹，中间是一个灌木丛生的小平原，伊洛瓦底江环绕流经城东和城南，城西和城北各有一个小型机场。

密支那对于盟军来讲万分重要：如果将其占领，不但可以打通中印陆路交通，“驼峰航线”也能得以拓宽，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可降低飞行高度，从而增加安全系数。密支那也是缅北日军的生死之地：一旦丢失，入侵中国云南境内的第五十六师团将陷于孤立，伸向缅甸南部的主要交通线将暴露在盟军面前，日军在整个缅北和滇西将失去立足支撑点。

四月中旬，根据史迪威的命令，由中国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第五十师一五〇团和美军“第五三〇七团”组成的中美混合突击队，已经开始秘密南下。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支中美联合作战部队：第一纵队，代号K纵队，由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新编第二十二师山炮四连和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三营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上校肯利生；第二纵队，代号H纵队，由第五十师一五〇团、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营和山炮一个排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上校亨利；第三纵队，代号M纵队，由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部和三百多名缅甸克钦人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上校马基。——美军“第五三〇七团”初到缅甸时有三千多人，经过不断的作战消耗，现实际兵力只有一千四百人左右，所以，所谓中美混合突击队，作战主力还是中国驻印军官兵。

中美混合突击队从塔奈河以东出发，在克钦人的带领下，穿越悬崖陡立、森林密布的库芒山，官兵们常常要在连羊肠小路都没有的绝壁上攀登，每天只能艰难地向南推进几公里。五月六日，K纵队抵达密支那日军前哨据点雷邦隘口，并对据守在这里的日军一加强中队发动进攻。隘口狭窄，日军居高临下，中美官兵采取两翼迂回的战术，激战三天将雷邦攻下。十二日，K纵队进抵丁克路高附近，美军一营与日军第一四联队第二大队遭遇，结果被日军包围。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赶到后，向包围美军的日军猛攻，十三日下午美军解困。留下八十八团三营在丁克路高掩护后，K纵队主力继续向密支那前行。十四日，H纵队抵达密支那外围的升尼；第五十师一五〇团一营切断孟拱至密支那的公路后，团主力于十六日零时全部抵达密支那西面的机场附近；K纵队也同时抵达了密支那以北十公里处的遮巴德。

十六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决定：H纵队向机场攻击；K纵队继续向密支那抵近；美军战机将开始轰炸密支那外围以及城区，美军的C-49运输机将在十七日为突击队空运来增援部队以及高射炮。十七日上午，H纵队在美军战机的支援下，向密支那西面机场发动袭击。防守机场的日军只有百余人，H纵队行动隐秘迅速，一五〇团的两个营攻到机场边日军才发觉，但为时已晚。三营和一营从日军的两翼夹击，营官兵率先攻入机场，日军向密支那城内溃退，三营一直追到伊洛瓦底江边。H纵队的指挥官亨利上校立即以约定暗语“威尼斯商人”向总指挥部发出占领机场的电报。没过多久，大批美军的C-49运输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降落，运输机运来的增援部队是新编第三十师八十九团的两个营。

中美混合突击队H纵队攻占密支那机场的消息，令史迪威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反攻缅甸作战成功的好兆头，但是这一消息令英国人很尴

尬。丘吉尔来电问询蒙巴顿勋爵这是否是真的，要求蒙巴顿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当初，英国人坚决反对缅北作战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蒙巴顿曾向丘吉尔报告说，要占领孟拱和密支那至少需要五个步兵师、一个伞兵师，再加上一个突击旅，而且即使有这些部队，在一九四四年底之前发起反攻作战也十分困难。英国人的尴尬是：蒙巴顿不同意史迪威反攻密支那的计划，而史迪威根本没有理会名义上是他的上级的这位英国勋爵的反对，坚持向密支那方向派出了人数不多的中美突击部队。如果这支突击队被日军消灭，史迪威要承担擅自行动的责任；可现在突击队不但开始攻击密支那，而且还把机场抢先占领了，这让大英帝国的颜面往哪里放？丘吉尔向史迪威发出了一封祝贺电报，称夺取密支那机场是“将载入史册的功绩”，同时声称此次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英军在密支那以南切断了日军交通线所致。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在军事历史上大吹大擂。无论是撤退还是前进，赢还是输，胆小还是勇敢，极端愚蠢还是顽强不屈，统统都说得很体面，描绘得很光荣。每一次交战都是勇敢的，每一仗都是决定性的行动。最高一级中从来没有退缩的人，因而每一次战役都有人升为将军，或显示出将才被誉为战争中最杰出的人。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因而士兵是坚强的，指挥官是冷静的，战斗是漂亮的，无论败得多么惨重始终是沉着冷静的。错误、失败、愚蠢或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其他原因都神秘地消失了……其他国家也是想自尊的，但从未达到英国这样的程度。英国达到的这种程度的自尊不是凭借其威力，是依赖于英国百年以来左右世界的那种自我想象力。

可能被轻易得手的胜利冲昏了头，中国驻印军指挥部负责空运的美军军官，竟然把留在丁克路高掩护主力前进的八十八团三营忘记了，连续十几天没给该营空投给养，导致五百多名官兵只能吃野菜和芭蕉根度日。而等他们被想起来的时候，接到的命令是向密支那攻击前进。

密支那城不像旷野中的机场那样可以轻易夺取。

密支那城日军总兵力不足千人，指挥官为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但是，如同滇西的腾冲城，日军在长达两年的占领期内，在密支那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弹药。城郊阵地均构建在丛林、沟壑和岩穴中，火力点隐蔽而密集。市区防御体系依托伊洛瓦底江为侧背屏障，利用城内建筑物修筑了密集的碉堡掩体，在每一处十字路口和房屋拐角处都配置了重武器，射界相互交叉，形成覆盖严密的火力网。由于能够得到八莫方面的增援和补给，丸山房

安大佐自信最少可以守三个月以上，不得已时还可退守伊洛瓦底江对岸继续抵抗。然而，西郊机场的丢失，让丸山房安有些紧张。他一面请求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火速增援密支那，同时把所有的后勤人员甚至是伤员都调到了防御阵地上。

中美混合突击队虽然占领了机场，但无论是中国官兵还是美军官兵，经过连续的行军和作战都已筋疲力尽。由于长途奔袭不能携带重武器，官兵们不可能对坚固的密支那城防发起攻击，而所有的补给全靠空投和空运，后方负责这项工作的美军军官没把急需的重炮和食品空运过来，运来的竟是一个高射炮连——制空权在盟军手中，弄来高射炮去打谁？更重要的是梅里尔准将的指挥有点问题：面对日军不断向密支那增援，当务之急应是集中兵力，趁密支那日军兵力未厚之际，实施猛烈突击，一举拿下市区，然后迅速调动后续部队扩大战果。可梅里尔准将部署迟缓且分散使用兵力，结果在日军的顽强抵抗和不断增援面前战局逐渐胶着，令中美混合突击队对密支那的攻击从远程奔袭的突击战演变成了缅北反攻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向密支那外围日军据点的攻击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惨烈。五月十九日，H纵队的一五〇团打到南面的车站附近，在向日军坚固工事发动攻击时，三营营长郭文干阵亡，官兵们经过苦战才攻占车站。但日军发动持续反击，集中炮火猛烈轰击，一五〇团与指挥部的联络中断，驻团的美军联络官也不见了，结果部队无法得到战机和火炮的支援，车站得而复失。被困在车站附近狭窄地域里的一五〇团得不到补给，最终只能撤出来，日军趁机把丢失的前沿阵地全部夺了回去。

负责空运的美军军官这下清醒了，把中国军队第十四师四十二团空运到密支那。

五月二十三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参谋长波德诺以及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郑洞国、新编第三十师师长胡素、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等将领飞抵密支那前线商讨战事。史迪威决定解散中美混合突击队，各部队回到原编制序列中，中美两军将领分别指挥各自的部队，再由波德诺将军替换梅里尔准将统一指挥。同时下达作战命令：二十五日日拂晓，新编第三十师攻击密支那西郊之敌；第五十师一五〇团和第十四师四十二团三营在机场以南的跑马场一带构筑工事，固守阵地并负责牵制日军。

密支那的雨季来临了，战场变成了一片沼泽。

二十五日，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和八十九团整整攻击一天，仅仅向前推进了不到三百米。二十七日，负责攻击北郊机场的八十八团得到美军两个营的增援，攻击仍然艰难。——“密支那战事像拉锯似的进行着。我军在长约十五公里的正面防线上成了一个弓形，伊洛瓦底江恰像弓弦，把密支那的敌军夹在大江和中美军弧形包围之间。战斗起初是自距城十里左右的小山头和村庄里进行，我军逐步推进，每天跟敌军争夺三十码、五十码的阵地，这样敌我都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二十几天后，敌人被迫放弃村落，改守距城六里的丛林山地。”大雨倾盆，遍地泥浆，攻击中浑身泥水的驻印军官兵在日军的侧射火力和藏在树上的狙击手的射击中伤亡很大，攻击因此被迫停滞。几天后，第十四师四十二团加入战斗，又增加了美军的两个营，但因为没有足够的重型武器，日军的坚固堡垒还是难以突破。

此时，攻击密支那前沿阵地的中美部队，在兵力上远远大于日军。密支那守军被压缩在伊洛瓦底江与周边仅几公里的狭长地域内，但显示出的强硬作战意志令人心惊。

连日大雨，日军不断地向密支那增援。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命令第五十三师团部队向密支那推进；命令第五十六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军藏少将带领部队进入密支那，并担任密支那作战总指挥。密支那的日军得到了四门山炮、两门野战炮以及近两千兵力的增援。

大雨中，美军战机不顾恶劣天气，不断地向密支那前线运送炮兵并补充粮食弹药。前沿官兵也在努力向日军的防御阵地压缩，但每一次就为争夺几十米的空间也要付出沉重代价。到六月九日，驻印军仅从密支那战场撤出去的伤亡官兵已达一千八百六十七人。中国官兵开始在泥水中挖掘通向日军阵地的坑道，试图利用这些坑道拔除日军的据点，但坑道挖掘的速度非常缓慢。

战事胶着之际史迪威再次来到前线，他把前线指挥权从波德诺手中交给了一直跟随他训练中国驻印军的韦瑟尔斯准将。

战事又持续了一个月，战场上每一座民房、每一簇栗树林都能成为日军抵抗的据点，中国驻印军官兵面对的攻击形势险恶而残酷，交战双方在密支那周边仍进行着艰苦的拉锯战。新一军军长郑洞国认为，密支那战事长期僵持，对缅北战局十分不利。经过与将领们磋商，决定在七

月七日——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对密支那发动全面进攻，力争一举拿下密支那。

七月七日十三时，中美围城部队在战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开始了全面攻击。激战到黄昏，右翼部队第五十师一五〇团只向前推进了一百三十多米；第十四师四十二团占领密支那西南面的火车修理厂，该团三营越过团主力迫近市区的八角亭据点；左翼部队与日军接战后，残酷的肉搏持续竟日，也仅向前推进了不足两百米。——即使这短短的距离，也是中美官兵一次次击退日军的逆袭用生命换来的。

为减少伤亡，各部队轮流抽出一个营，到前沿的后方进行短期攻击演练。同时，美军空运来了装备着一百五十五毫米榴弹炮的重炮连。十三日，中美联合部队在三十九架B-29轰炸机、大量的战斗机以及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再次发动攻击，连续激战三天，除攻占了外围的几个据点外，对密支那城的攻击再度受挫。——指挥部责怪部队进展缓慢，部队责怪指挥部指挥不力，部队上下皆急躁不安。

密支那的日军处境并不乐观。近两个月里，盟军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和炮弹不分昼夜地落在头顶上，防御工事虽然覆盖有钢板，但大部分还是被摧毁了，为避免在炸塌的掩体里被埋窒息，每名士兵都需携带以供维持呼吸的竹筒。直到七月中旬，密支那日军战死七百九十人，负伤一千一百八十人，“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了最低限度”。

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正在制订一个在中国云南西部采取攻势，以巩固中缅交界处的战略要地八莫与南坎的作战计划。为此，必须尽一切可能坚守密支那，以阻止从胡康河谷南下的美中军与云南方面的远征军会合。由于密支那的门户孟拱已经失守，第三十三军司令部向密支那守军指挥官水上军藏发出了如下作战命令：

一、军企图向靠近龙陵方面之敌发起攻势，仍需要继续防卫八莫、南坎地区。

二、水上少将要死守密支那。

第三十三军参谋野口省己少佐回忆：“这项命令是迁政信参谋起草的，迁参谋一边簌簌落泪一边起草，然后默默无言地把草稿放在我们这些参谋面前。”在场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电文中没说“水上部队”，说的是“水上少将”。水上军藏接到电报后的回复是：“谨领军命令。守军将誓

死确保密支那。”——“接受这项命令的水上少将，当时恐怕比谁都强烈感受到命令的异常性。而且大概已经觉察到这项任务的含意：在最后时刻，以断送自己的性命，换取守军残兵得以逃生。”

密支那城内能作战的日军只剩下不足一千五百人了。由于弹药已接近消耗殆尽，水上军藏不得不作出每门炮每天只能发射六发炮弹和每名士兵只能配发两颗手榴弹的限制。而伤员们则被提前放在木筏上用绳索固定，然后放入伊洛瓦底江中任其顺流而下。水上军藏企望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被下游八莫的日军捞上来。——所谓的竹筏，多为两个汽油桶捆绑在一起，上面再放上一块木板，虽有浮力但不能操控，木筏顺水而去，每到转弯处便会自然地接近江岸，于是木筏上的日军多被中国官兵击毙。

密支那的日军已别无出路。

二十日，中美联军经过艰苦作战，终于接近密支那市区的核心阵地。美军战机的轰炸更为猛烈，日军的防御工事已无一处完整，作战人员均因毫无掩护而暴露在炮火下。中美联军的援军不断抵达：第十四师四十一团、新编第三十师九十团、第五十师一四九团陆续被美军大型运输机运来了。从二十五日开始，中美联军再次展开全面攻击，各部队随着炮火的延伸相继攻入市区，然后展开逐街逐屋的清剿。战至三十一日，密支那大部分市区已在联军之手。

八月一日，水上军藏决定撤退。

晚上，司令部、护送军旗的官兵和尚可步行的轻伤员首先渡江。看着撤退的官兵和伤员远去，水上军藏给本多政材师团长发出了诀别电报：

一、卑职指挥无能，未能坚守密支那，形势已临最后关头，深深歉憾。

二、伤病员已排除万难登上木筏，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请在八莫附近予以营救。

完成以上安排后，水上军藏独自走进岸旁密林，自尽。

二日，第五十师组成百人敢死队，潜入顽固守城的日军后方，切断了所有的通讯设施，然后向日军最后的指挥所发起攻击。密支那日军残

余官兵在丸山房安大佐的带领下渡江逃跑。渡江时，浅井广中中尉指挥六十多名士兵用最后的几发炮弹掩护，之后这六十多人用手榴弹集体自杀。丸山房安渡江逃离战场后，在伊洛瓦底江东岸收容的残兵约八百余名。

八月六日，密支那市区被盟军控制。

从中美混合突击队出发，到最后攻占密支那城，整整用了一百天。以中国驻印军为主力的中美联军，先后投入三个师、七个团以上的兵力，击毙日军二千余人，俘虏六十九人，密支那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主力、工兵第十二联队，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主力以及机场守备队等后勤部队，基本被全歼。

为支援密支那作战，美军阵亡二百七十二人，负伤九百五十五人；盟军在密支那机场降落飞机达一万四千架次，运来各种器材和物资超过四万吨。而中国驻印军第十四师、新编第三十师和第五十师，伤亡达六千六百五十五人，其中阵亡二千四百一十四人，负伤四千二百四十一人。

滇西和缅北日军的后方因失去密支那而崩溃。日本人自己的评述是："密支那失守，在云南和胡康谷地我军的西侧背，将被打进楔子，进而导致缅北一带的防御破产。"

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机终于可以避开险峻的雪山，向南选择宽阔、低平的航线。密支那战役结束后，运往中国的国际援助物资从五月的一万三千多吨、六月的一万八千多吨，增至七月的二万五千多吨。

史迪威在获悉密支那被攻克的那一刻感叹道："谢天谢地，今天上午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蒋介石给史迪威发出贺电：

史迪威将军勋鉴：欣悉密支那城完全克复，敌军虽顽强抵抗，终于全部就歼，不胜欣慰。我盟军获此重大之成就，皆由麾下指挥有方，谋略悉当，我美英中盟军将士协同一致，忠勇效命，用能克服气候与地理之困难，歼灭敌人，造成此次光荣之战绩，中正对我部队能达成任务，同所嘉慰，特电驰贺阁下之成功与盟军之胜利，并请转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各将领暨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及全体官兵代达余嘉勉之意为盼。蒋中正。

腾冲城和密支那都被攻克了，但滇西战场上松山和龙陵的攻坚战依旧屡屡受挫。

位于怒江西岸的松山，与东南方向的龙陵以及西北方向的腾冲互为犄角之势，是从滇缅公路至滇西重镇保山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于日军有着双重战略意义：对南面的缅北而言，为掩护侧背的重要据点；对北面的怒江正面而言，是抗击中国远征军的前沿支撑点。松山主峰海拔五千三百米，远眺可以俯瞰百里，主峰东南为阴登山，西北为黄土坡，后面是小松山，群山深谷层层叠叠犹如怒涛起伏，滇缅公路蜿蜒其间则如丝如带。

日军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侵入滇西后，两年间以松山主峰为核心，在滚龙坡、大垭口、小松山、黄土坡等处修筑了四十多个坚固的堡垒群。每个堡垒群都由一个主堡和若干个子堡构成，无论是主堡还是子堡均以粗大原木和加厚钢板建成主体，上面覆盖着数米厚的泥土；堡垒里粮食库、弹药库、被服库和材料库一应俱全，至少可供半年使用；甚至还有发电、抽水和卫生设备。各堡垒群之间，都有坑道或战壕相连，既能相互支援也可独立作战，彼此之间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山上的炮兵阵地射界宽而深，可覆盖怒江两岸七十公里以上的范围。——松山已经成为一座中空的山体，里面遍布着各式永久性军事工事，整个山体犹如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军事堡垒。

松山日军守军以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联队为主，加上炮兵、工兵、辎重、通信、卫生和防疫等部队，总兵力约为一千五百余人。第一一三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带兵增援龙陵后，松山日军指挥官为野炮第五十六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

战前，中国远征军对松山日军的防御部署知之甚少，渡江后在攻击阴登山的过程中才发现松山之敌不可轻视。

由于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八十二团和八十三团在攻占阴登山的战斗中伤亡过大，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亲率八十四团主力加入松山作战，并得到何绍周的第八军荣誉第一师二团三营的增援。但是，直到六月底，参战部队都已伤亡过半，对松山的攻击却没有显著进展。往往是一个营上去，在日军交叉火力的覆盖下，十几分钟后便伤亡殆尽。究其严重失利的原因，除日军的工事异常坚固、防守异常顽强外，中国远征军从将领到士兵谁都没有攻坚如此堡垒群的作战经验。为此，美军提供了似工艺流程般精细的作战方案：

一、于攻击前一日下午，用重炮猛射二小时，除予敌以损失外，并造成多数弹坑，夜间仍继续射击，使敌神经紧张不能休息，次日晨二时三十分停射。

二、于攻击前一日下午，以战防炮接近敌堡垒至六百码，用穿甲弹及爆炸弹，对准敌射孔，如能穿入敌射孔，当可杀伤垒内之敌兵，否则亦可将射孔打坏，入夜后即停止射击。

三、晨前三时，每一攻击分队之第一小队，即开始剪断敌之铁丝网，而第二、三、四、五小队，即匍匐跟进，特需利用弹坑跃进。此时堡垒内之敌，必用机枪向我扫射，须俟其停射始能前进。若敌不断扫射阻我前进，我第二小组即投掷一个爆炸瓶，命中敌射孔固好，如不能命中，但因该瓶燃烧而生火光照明敌射孔，我第三小队即用火箭瞄准敌射孔射击。假定进行顺利，则晨前三时第一小队开始剪铁丝网，四时可剪通。此时天尚未明，第四小队可迫近敌射孔，将爆炸竿之绑有黄色炸药及爆炸瓶之一部，伸入敌射孔，但是后须立即将竿端横撇于敌射孔内，使敌不能推出，又在伸入之瞬间，应立即点火，其方法即前持竿者将竿伸入射孔时，即喊后面点火人之名字，如此则不致与其他分队中之第四小队相混，可免发生错误。

四、经上述之攻击，堡垒内之敌人当已或死或伤，但因堡垒之下尚有地道，该地道内之敌人，必又进入堡垒，故我每一攻击分队之第五小队，必须乘堡查内敌人死伤之瞬间，用冲锋枪对准敌射孔内连续射击，并依状况以手榴弹投入而杀伤之。但堡垒仍未破坏，此时第四小队管理爆炸竿点火兵已无事，应将原已准备之大包黄色药迅速提起前进，而置敌堡垒之裂缝中，或埋于堡垒之下，并安置电气点火索，及导火索牵至后方（其距离以爆炸时，我兵不受损失为度）。

五、上述各项完成后，约为晨五时前，天已渐明，攻击队长应命令各小队齐后退至安全距离，由后面轻重机枪及战防炮监视敌人，使不能由堡垒内爬出，截断我炸药引线，我即点火炸毁全垒。

六、又敌每一堡垒群，除各小堡与大堡间有地道联络外，尚有一或二个出口，我仍细密侦察，预先将机枪排列出口之外，敌如开启铁门，我即向之射击。

以上实施，可免于我步兵直接攻击，减少伤亡，并可将敌人全部葬身于堡垒之内。

美国人要求中国远征军攻击部队针对日军的每一堡垒群组成一个特攻队，然后再视堡垒群内的堡垒个数，在特攻队之下组成若干攻击分队，每个分队下再组小队。因日军的堡垒群多系一个大堡垒外环绕五个小堡垒，所以每一个特攻队共需六个分队。——美国人大工业流水线式的攻击样式，在日军坚固的堡垒与密集的火网面前有如儿戏。尽管美军的目的是减少远征军官兵的伤亡，但特攻队的百余名中国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于松山的雾气之中。

六月二十五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蒋介石：

查松山、大垭口横亘惠通桥彼岸，我军能否早日攻下，对腾龙作战之关系甚大，刻虽业已分别攻至其核心阵地并包围之，但敌工事极为坚固，据钟军长报称，我军此次攻击前后已伤亡一千六百余人，虽重炮连续命中，而敌垒屹然不动。据我前线及美工作军官视察报告，松山敌垒之构成，系钢骨水泥及山洞工事并加钢板防护，凡一个大堡垄，盖以五个小堡垄编成，火网由地道彼此联系，有侧防，四周自外有屋顶形铁丝网三层，竹刺一层，屋顶有铁丝片两层（各高约三尺），共六层。大垭口敌核心堡垒，其坚固程度亦与此相同。据悉此一带工事系敌以一个工作团构筑八个月而成。刻敌守兵虽已残余不多，但我攻击仍极为困难，其最难解决者，实为技术问题，而非战术问题。我组工兵作业队一百二十人，用黄色炸药包及莫洛托夫炸药瓶近迫向炸，梗（二十三）敬（二十四）两日共死一百余人，仍无效果。刻拟集中火力轰击，如再无效，则惟有实施坑道作业或对壕作业……

远征军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自渡江以来，共毙伤日军五百多人，但付出了伤亡近两千人的代价，其中士兵阵亡八百余人，负伤七百余人，各级军官阵亡五十人，负伤一百零八人。

新编第二十八师被换下去，第八军上来了。

第八军本是远征军的战略预备队，辖荣誉第一师、第八十二师和第一〇三师，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全军总兵力约五万。第一〇三师曾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一师，出征抗战以来战绩不俗，一九三九年奉命驻扎滇南，两个月前调赴滇西，现任师长熊绶春。第八十二师由贵州地方武装编成，战斗力稍弱，现任师长王伯勋。荣誉第一师十分特殊，全部由伤愈官兵组成，原师长杜聿明，曾在昆仑关战役中有上佳表现，现任师长汪波。第八军是美械装备的部队，军部驻有美军联络组，官兵均接受过美式训练。为加强第八军的攻坚能力，除军

直属炮兵外，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还把炮兵七团、十团的各一个营以及第五军炮兵营、第七十一军炮兵二营都配属过来，军指挥部抵近前沿设在阴登山上，大有一举拿下松山的决心。

七月五日，第八军开始对松山实施第一次攻击。炮击之后，荣誉第一师三团由阴登山向松山主峰和北侧高地发起冲击，两小时后三团官兵就冲上了主峰。但是他们根本无法立足，日军各个方向的交叉火力十分凶猛，山顶上无以遮蔽，后续部队一再增援，只是令伤亡不断增加。最后，三团退到距主峰一百多米处构筑工事隐蔽，而那些因为负伤已经退不下来的士兵，只有躺在松山主峰上等着血流尽气断绝。

松山在当时就像一座血肉磨坊，纵然我方有美军飞机的帮助，也有比日军强劲很多的火炮支援，但因为敌人的工事全部是修建在山腹以内，因此，这些重火力的轰炸都成了无用功，反而使日军在工事里就能轻易射杀攻山的中国军队。

七日，在吸收了攻击失利的教训后，第八军决定先攻击主峰两侧的滚龙坡和黄土坡。担任攻击滚龙坡任务的是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炮兵集中火力轰击滚龙坡后，二四六团先后攻占了两个小高地。接近滚龙坡顶时，由于已靠近核心地堡，日军的交叉火力全部指向攻击部队，并不时地发起小规模反击，二四六团坚持了一个晚上，终于支撑不住退下来，其先头营除五名伤员外，其余官兵全部阵亡。十二日，第八军发起第三次攻击，主攻部队换上了第一〇三师三〇七团，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和二四五团三营以及荣誉第一师三团策应。炮火整整轰击了两个小时，炮火延伸后，三〇七团主力向滚龙坡发动冲锋。官兵们在抵近日军主阵地约五十米时，突然受到日军侧射火力的袭击。天降骤雨，雨水混合着血水横流。面对日军的坚固堡垒，三〇七团爆破手只能抱着炸药包拼死向主碉堡接近，但一个接一个的爆破手都阵亡在日军的弹雨里。日军接连三次发动反击，三〇七团用光了弹药，部队伤亡过半。与此同时，策应作战的二四六团对滚龙坡北面的大垭口的攻击也严重受挫；而荣誉第一师三团在试图接近松山主峰时，遭遇凶狠的火力拦截，高地上遍布着中国官兵的尸体。主攻的三〇七团终于退下来，两名连长、四名排长以及一百五十多名士兵伤亡。

连续攻击三次，虽占据了周围的数个小高地，但对松山主峰的攻击依旧失利。第八军决定将炮兵阵地前移，对日军各高地上的据点以及侧射火力点逐个清除，而一线步兵则挖掘战壕准备冲击出发地。第八军决定于二十日开始炮击，二十二日发动第四次攻击。军长何绍周命令组织

一个尖兵团，由师长任团长，团长任营长，各级军官都向下降一级，全部充实到前沿第一线。

二十日，第八军的炮击开始。

二十二日，阴雨连绵，雾气弥漫，攻击时间只好推迟。

二十三日，虽有湿雾，但是雨停了，第八军的第四次攻击开始。

中国军队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对于远征军官兵来讲，美军提供的火焰喷射器很新鲜。化学品和汽油混合液被压缩在钢瓶里，喷射时液体自枪口射出，遇到空气后剧烈燃烧，形成一条凶猛的火龙。如果喷射准确，便能引起堡垒内物体燃烧或爆炸，人员或窒息而死或烧死烧伤，堡垒内瞬间的高温也可阻挡救援部队进入。

火焰喷射器发挥了效力，日军的堡垒一个个被摧毁。

尽管如此，步兵的冲锋还是未获显著进展。右翼部队荣誉第一师二团三营受到主峰上日军火力的阻击；中央一路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攻占一个小高地后，日军连续发动了四次反击；左翼滚龙坡方向的第一〇三师三〇七团，官兵们在炮火延伸后攻占了丙、丁两个高地，随即继续向北面的乙和戊两高地攻击，受到日军堡垒的火力拦截以及两侧机枪的猛烈封锁，冲上己高地的官兵全部阵亡。自下午开始，日军不断地发动反击，滚龙坡各小高地上都发生了肉搏战。晚上，丁高地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最终丙、丁两高地被二〇七团占领。

第八军已对松山发起四次攻击，各攻击部队都已伤亡过半。何绍周军长认为，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火炮无法彻底摧毁日军的坚固堡垒。于是，命令重炮尽可能地向前推进，集中炮火直接轰击堡垒，以求彻底将其摧毁。同时命令步兵挖掘交通壕，一寸寸地向前推进。连日大雨，第八军官兵近乎疯狂地在雨中挖壕，炮兵的抵近射击始终未停，各部队组织的小规模袭击也在持续。三十日，第一〇三师三〇八团将戊、乙高地的大部拿下，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的战壕也挖到了距日军碉堡仅六十米处。

松山日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给师团长发电：

一、感谢今天的空投。全体官兵对手榴弹合掌致意，在奋战中誓保每发必中。伤员约五百名（七月下旬），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人

也都在火线上奋战。

二、昨晚，由步炮各部队派出十组侦察兵潜入敌阵，炸毁敌炮四门、迫击炮三门，卤获重机枪两挺，七个组平安返回。

三、我军飞机进行勇敢的低空飞行，竟为敌炮火所伤，守军深感痛心，务请今后不必过于冒险。

八月二日，第八军的第五次攻击开始。滚龙坡前雨水和血水使坡面泥泞不堪，双方官兵历经数天的残酷作战，都已进入一种无所谓生死的状态。在己高地上，残余日军拼死防守，二四六团官兵向炮兵呼喊不要管是否误伤只管猛烈开炮。最终，高地上的残余日军全部死于炮火下。第一〇三师一部突击甲高地，在距高地顶端二十米处，官兵们将火焰喷射器集中在一起向堡垒大门喷射，数十名日军冲出熊熊燃烧的火焰，大部死于机枪的扫射中，残存者被压缩在高地的一角。很快，骤雨般的炮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甲高地上的日军大部被倒塌的堡垄活埋，或被火焰喷射器烧死，堡垒四周遍布着六十多具残缺不全的日军尸体。

滚龙坡被攻占后，北面就是松山主峰。

松山主峰四周是甲、乙、辛、未、辰、巳、午、卯、子、丑、寅等高地。第八军的第六次攻击开始了。整整三天，炮兵持续轰击日军据守的各个高地。这似乎是松山的最后一战，可谁也没想到中国官兵的伤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惨重。七日晨，左翼三〇八团攻占辛高地，三〇七团也在中午攻占了壬高地，但荣誉第一师二团三营突入巳高地时陷入肉搏战，厮杀进行了两小时，双方官兵的尸体填满了山顶战壕。最后，双方所剩无几的官兵相距仅十米对峙着，遍身血污的士兵们虽怒目对视但都已无搏斗的气力。伤亡最惨烈的当属二四六团，该团一营冲到距午高地顶端百米处，在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下，营长谢梦熊中弹身亡，黄昏撤下来时全营只剩下八人；二营突上了未高地，与不断反击的日军苦战三小时，终因增援部队没能及时赶到而不得不撤下来，这时候二营活着的官兵仅剩下十人；三营攻击受挫后也于黄昏时后撤，清点人数后全营只剩下二十多人。——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伤亡殆尽了。

第八军六次攻击松山，基本扫清了主峰四周的各个小高地，但参加攻击的五个团的残余官兵，集合在一起人数已不足一个团。

久攻不下的松山卡在滇缅公路的咽喉部位。

蒋介石严令：限第八军九月上旬必须拿下松山，逾期不克，军长、师长和团长均以贻误戎机论处。

军长何绍周把副军长李弥，参谋长梁筱斋，荣誉第一师师长汪波，第八十二师师长王伯勋、副师长王景渊，第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副师长郭惠苍等将领召集在一起，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各位将领会商后决定：用坑道作业的手段对松山主峰实施爆破，第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为左翼攻击指挥官，指挥本师和荣誉第一师三团攻击大垭口和长冈岭一线；第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为右翼攻击指挥官，指挥军部工兵营和第八十二师经过补充后的二四六团攻击松山主峰。

松山日军的主峰堡垒巨大而坚固。自远征军的攻击开始以来，主峰堡垒每天都承受着轰炸和攻击，但始终未被完全摧毁，且还能在阻击中发挥火力中心的作用。——这座地面上无法摧毁的堡垒开始受到来自于地下的威胁。

八月三日，在二四六团的掩护下，第八军工兵营由松山主峰下距主堡垒一百五十米处开始挖掘作业。同时挖掘的四条壕沟深一米八、宽一米，相互横向贯通，挖好的壕沟上加着遮盖物以防止日军向下投掷手榴弹。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工兵们轮班作业，昼夜不停，每条壕沟竟然可以每天向前推进十米。越接近主峰堡垒，日军越是疯狂地射击并不断发动反击，二四六团官兵拼死阻击，美军的战机和远征军的火炮进行着持续打击，第八军的其他部队也适时在四周实施攻击以保持对松山主峰的压力。工兵们在弹雨中不顾生死，拼命挖掘，挖到最后由于需要木粧支撑而速度稍缓，但依旧每昼夜向前推进五米。经过第八军美军顾问的测算，已经挖到主峰堡垒下方的时候，工兵们开始挖掘左右两个炸药室，然后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在右室内安放了炸药七十箱，在左室内安放了五十箱，每箱炸药二十五公斤，都是美军运来的高爆炸药——松山主峰日军堡垒下的炸药总计多达三吨。

十九日，爆破作业全部完成。

二十日拂晓，松山主峰一片寂静。

突然，荣誉第一师三团对主峰发起攻击，目的是吸引四周据点上的日军向主峰增援——远征军官兵盼望聚集在那三吨炸药上的日军越多越好。

九时，攻击部队回撤到安全地带。

九时十五分，沉闷的爆炸声仿佛自松山山体的深处传来，然后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宛如山崩地裂。

松山主峰三分之二的山顶消失了。

原主峰处变成了两个深约十五米的漏斗状巨坑：其中一个直径四十多米，另一个直径三十多米，两个巨坑相距十米。

盘踞在主峰上的日军，除了四名奄奄一息外，其余全部死亡。

松山主峰终于被攻克。

但是，驻防松山附近小高地的日军仍在顽抗。

残存的日军虽然人数极少，竟仍能向松山主峰实施夜袭。荣誉第一师三团三营自营长以下官兵，在与反击日军的混战中伤亡殆尽，三团其余官兵在主峰的反斜面上与日军展开肉搏，待第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带领增援部队赶到时，斜面上散落着六十二具日军的尸体，每一具尸体都与一同战死的中国士兵缠在一起。在一个掩体内，有十二名中国官兵还活着，他们四周堆积着二十多具日军的尸体。

二四五团攻击已高地和辰高地，被已高地反斜面以及午高地和未高地之间无名高地上的日军火力所阻，二四五团伤亡极大。三〇八团猛攻未高地并将其攻占，但残余日军躲藏在下层工事里，不断地用冷枪射杀中国官兵，经过几天的搜索，中国官兵才将其肃清，最后发现在下层工事里始终抵抗的日军只有五人，五人因数天没吃没喝，都已是骨瘦如柴。

为彻底肃清松山残敌，第八军各部队投入了所有兵力，而残剩在小据点里的日军拒不投降，对每一个小据点的肃清都会让中国官兵付出生命代价。在寅高地和五号高地的肃清战斗中，三〇九团三营包栝营长黄人伟在内伤亡二百余人，日军战死八十余人，双方官兵的伤亡均是肉搏战的刀伤所致。

最后的残敌集中在松山一系列据点以北的黄土坡附近。三〇九团在攻击的过程中，团长陈永思和代团长王光炜先后负伤，全团官兵最后只剩下数十人。荣誉第一师三团攻击一号和二号小高地，苦战数小时，待

一号小高地被攻占时官兵只剩下十八人，而二号小高地被攻占时官兵只剩下六人。

松山日军残部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已把文件和徽章埋入地下，把军旗缠在了腰间。他命令炮兵队队长木下昌已中尉突出重围，去向军司令部报告战况。然后，给松山祐三师团长和本多政材军司令官发出了诀别电报：

一、自五月十日以来死守阵地已达一百二十余天，卒因卑职指挥不力，弹药罄尽，将士死伤殆尽，未能作到支撑全军的攻势，已达到最后时刻。为此焚烧军旗和密码，准备全体靖国。

二、承蒙军司令官、师团长阁下长期特别关怀，全体不胜感激，今后尚乞对阵亡官兵家属多加照顾。我们将在九泉之下，遥祝我军胜利。

松山日军残部最后八十余人，全部死在中国西南边陲那座已经没有了山顶的大山上。

松山战役从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六月四日发动第一次攻击，到第八军九月七日全歼松山之敌，历时百余天，远征军参战部队达四个师以上，投入总兵力六万余人。

松山日军三千余人被全歼。

远征军伤亡七千余人，其中第八军伤亡高达五千零三十二人，军官阵亡一百零七人，负伤一百二十八人，士兵阵亡三千零三十八人，负伤一千七百四十一人——战死者人数远远超过负伤者。

此刻，被远征军包围的龙陵城还没有打下来。

龙陵攻坚战，从一开始就一波三折。

第七十一军自六月五日发起攻击后，第八十七师在龙陵以北、第八十八师在龙陵以东和以南，官兵冒着大雨连续强攻，迫使日军逐次放弃大部主阵地，“退至龙陵城外侧的复廓阵地”。在基本扫清日军的外围据点后，第七十一军已将龙陵城包围。但是，第十一集团军从防守军转为攻击军后，严重缺乏运输工具和能力，后方补给线从怒江渡口直到龙陵前线都是崎岖的山路，连日大雨无法空投，运上来的粮食和弹药难以满足部队需要。到了六月十三日，第七十一军前线各部队只剩下数十发炮

弹，官兵的伙食先是由干饭改成稀饭，后来只能自己漫山遍野地挖山芋和芭蕉根。十四日，运输队终于抵达，运来了八百发山炮弹，依旧是一粒粮食也没有。

突然间，传来了龙陵已被攻克的消息。

这是一个传令兵向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熊新民报告的。很快，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电话追过来了，问是否真的攻占了龙陵。熊副师长说，他刚吃了传令兵从龙陵带来的日本牛肉罐头，看来是占领了。——“攻克龙陵的消息连夜震动了国内，也传到了国外，但听说日本天皇却一口否认，说龙陵还在日军手中。”熊副师长带着部队向龙陵赶去，“刚开到城边，，就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果然，龙陵城还在日军手里。——“这是我一生在战斗中所发生的一大错误。前方没有一个连营长向我报告过占领龙陵的情况，只听传令兵说，便轻率地说是占领了，错误更大。”——或许，这是中国军队久攻不下的焦灼所致？

距离怒江惠通桥七十七公里的龙陵，是坐落在一个小盆地里的交通重镇。这里是从云南保山到缅甸八莫和腊戌的必经之地。与腾冲一样，日军在占领期间修筑了坚固的外围阵地和城防工事。日军守军是第五十六师团工兵联队、第二炮兵大队、第一一三联队一部、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第二大队等，总兵力约为千人，由工兵联队联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统一指挥。

此时，无论是松山还是腾冲都尚在苦战中，但日军还是从这两个地方都对龙陵派出了增援部队。其中最大的一股，是日军第一一三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带来的——他把危如累卵的松山交给了金光惠次郎少佐，自己带着一千五百余人前来增援龙陵。六月十四日，增援松山的日军受到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军直属搜索营、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等部队的阻击。这也正是第七十一军再次向龙陵城发动攻击的时刻，远征军官兵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步兵尽量避免过早地发起冲锋，而是依靠持续猛烈的炮火消耗日军。六月十五日，远征军的火炮和美军的轰炸机从天空和地上持续打击，日军“连野战医院里的军医和野战仓库的军属都用手榴弹参加了战斗”，最终大部分复廓阵地还是被第七十一军官兵攻占。

在美军战机的轰炸下，整个龙陵城已成一片废墟，日军在据点被炸坏后，只能连夜从街市上搬运烧剩的木材，以图在拂晓前将阵地修复完毕。第七十一军攻城部队冒雨冲锋，最后时刻几乎将龙陵全部占领，城

内的日军据点只剩下几处，残敌也不足五百人。但是，松井秀治很快就突破了第八十七师二六〇团的阻击，于六月十六日抵近龙陵城。接着，从芒市方向增援来的七百余名日军也抵达龙陵城下。攻城部队拼死作战，想在增援日军进击城垣前拿下全城，可突破阻击的增援日军兵分两路突入城内，立刻与残余守城部队一起对第七十一军攻城部队展开凶猛反击，第七十一军部队苦战三天后被迫撤退。结果，不但攻城战功亏篑，且聚集在龙陵地区的日军增至近五千人。

龙陵战局转瞬间处在了极端不利的态势中。

第七十一军从龙陵撤出的消息，在盟军方面引起轩然大波。美军联络员问中国将领为什么撤退，得到的是令美国人一头雾水的“窘笑”：

尽管得到许多报告说（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正在集合增援部队准备反攻，第七十一军并未加强和集中其可供动用的部队……龙陵城内的日军猛烈反攻，六月十六日结束时，第八十七师从龙陵被迫后退三里……第二天，宋希濂将军下令，第八十八师放弃龙陵附近阵地，向东北撤退八里到第八十七师的阵线上。美国第七十一军的联络员一再试图弄清楚日军一支小守备队怎能击退中国的一个集团军，所得到的只是中国官员的窘笑……第十一集团军没有派遣增援部队以迎击日军的反攻。六月十四日第十一集团军在龙陵后方的二十一个营只有九个营参加战斗。日军因此能以一千五百人的进攻击退一万名精兵。

包括史迪威在内，盟军方面怀疑蒋介石是在保存实力，撤退的命令似乎是他下达的。蒋介石听闻后，严厉质问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到底是谁下的撤退命令，卫立煌没作解释，只把宋希濂打给他的电报给蒋介石转了过去：

职部自巳阳（七日）围攻龙陵，各官兵连日浴血苦战，逐渐将包围圈缩小，先后攻克猛林坡、广林坡、老东坡、南东坡、封家坡、桅杆坡、文壁坡脚、文营营、赵家祠堂各据点，之敌不过二百人，仅凭西山坡、黄土坡、观音寺三据点负隅顽抗。龙陵收复，本已指顾可期，惟敌工事坚固，决非步兵兵器所能摧毁，乃因连日天雨，飞机既未能输送弹药，又不能协力轰炸。兵站输力薄弱，亦不能及时追送粮弹，以致迁延数日，未能将敌防御核心迅速扫荡。又因第二十集团军方面进展稍缓，未能同时进出腾冲附近，致腾敌抽出兵力二千余附大野山炮，用汽车输送南下增援。虽经我八十七师主力删日（十五日）在邦乃以南高地占领阵地，激战两日，我已伤亡甚大，铣日（十六日）黄昏被敌突破阵地左

翼，冲入龙陵。各官兵目睹功败垂成，各个嘘声叹气。现腾敌主力已南移龙陵，难免不豕突狼奔，企图向我第七十一军先行击破。为谋整顿态势，先事站稳脚步，即令第七十一军除以一部固守现有阵地外，主力暂转移镇安街以西坌田坝、赵家寨、五四五〇高地及红木树之线；第二军除以一部联系我第七十一军左翼，固守邦武山、象达各阵地外，主力暂位置于小黑山、大硝河各高地之线，一面向松山、平戛之敌严行肃清，然后再以第二十集团军协力围攻龙陵。惟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应饬先行进出龙陵以北地区，俾使敌不敢继续东犯，并恳加派得力部队及大批飞机，协攻松山，期将该敌迅速肃清，俾而后补给圆满，后顾无忧。

如果这封电报属实，确是宋希濂决定暂时停止围攻龙陵。他的理由是：由于松山和腾冲方面作战不力，导致龙陵承受的压力过大。第十一集团军已筋疲力尽，如要拿下龙陵，须等腾冲和松山方面都打完了，再与第二十集团军部队一起攻打龙陵。同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给第十一集团军提供“圆满”的补给。

实际上，即使没能得到充足的补给，第十一集团军也没有停止作战，因为增援龙陵的日军对第七十一军的反击越来越猛。六月二十一日，日军沿着滇缅公路，在坦克的助战下，向第八十七师二五九团阵地发起猛攻，傍晚深沟阵地被日军突破，长岭岗阵地也岌岌可危。宋希濂命令第二军第七十六师二二七团增援第八十七师，日军也向长岭岗阵日军再次发动全线猛攻，第七十一军主力开始后撤。日军紧追，位于勐冒街附近的集团军总部指挥所遭到日军的炮击。宋希濂决心一拼，命令投入第七十一军的全部预备队，再从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将二二六团调来。双方在黄草坝、周家寨、空树坡、香菰岭一线激战——阵地犬牙交错，战局极其险恶。最后时刻，宋希濂把刚配置给他的第八军荣誉第一师投入了作战，同时命令第二军主力猛攻日军的后方交通线。至二十七日，战局稍缓。二十八日，宋希濂亲抵第一线督战，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第二军的第七十六师，第八军的荣誉第一师分别在龙陵外围转入攻势，官兵们昼夜轮番抢攻以扭转战局。战至三十日，自增援龙陵一个月以来，日军已伤亡千人以上，武器弹药消耗很大，已经呈现出衰势。第十一集团军抓住时机顽强推进，终于再次逼近龙陵城区，恢复了包围态势。

此时，松山还没攻克，滇缅公路尚未通车，第十一集团军的补给依旧十分困难。后勤部门似乎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运输物资的路线在险峻山峦中绕行，仅驮马就在崎岖的山路和连日大雨中倒毙了三千多匹，运上来的无论是食品还是弹药均不能满足作战的基本需求。

七月二十四日，天气出现好转迹象，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决定再对龙陵发动攻击。

这次攻击有了不小的进展，龙陵城外日军的数个据点被攻克，远征军大大压缩了对龙陵的包围圈。而在西北方向，随着松山战局的发展，日军已不能控制滇缅公路，运输物资的汽车可沿公路抵达腊勐，把物资卸下来后，人背马驮绕道二十公里，抵达滇缅公路的八百零一公里处，再从那里用汽车将物资运至黄草坝前线。第十一集团军官兵的供给因此得到极大改善，到了八月上旬，宋希濂认为补给已经绝对“圆满”，于是决定对龙陵发起第三次攻击。

八月十四日，炮兵对龙陵开始猛烈轰击，美军的十四架战斗机和二十四架轰炸机也前来助战。老东坡是龙陵外围日军最重要的堡垒群，坚固堡垒多达十九个，新编第二十八师在第八十八师一部的协助下苦战一周，终于把十九个堡垒全部攻占，毙敌四百余名，但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主攻团伤亡惨重，全团千余官兵仅剩二百余名。二十四日，攻击部队突入龙陵市区，市区内的残余日军不足四百人，龟缩在西山坡、红土坡、伏龙寺等几个孤立据点内顽抗。

龙陵日军不可能支持太久了。

但是，眼看就可攻陷全城之际，战局再次发生逆转。

为挽救缅北和滇西危局，日军第三十军制订了代号为“断”的作战计划，其目的是：“军要将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在龙陵方面击灭云南远征军主力之后，前出到怒江一线，在援救腊勐（指松山）、滕越（指腾冲）守备部队的同时，并切断中印联络线。”为此，第三十三军所有兵力开始向芒市集中：第五十六师团得到了从国内补充的二千多兵力，在芒市附近赶修据点式防御工事，并大量储备物资；由今冈宗四郎大佐指挥的第一四六联队也从缅北撤往芒市；第二师团由师团长冈崎清三郎亲率第十六联队全部、第四联队和第二十九联队各一部也转移到芒市附近；再加上芒市原来的守军，日军在芒市及其周边集结的兵力达到了万人以上。本多政材的军战斗指挥所也从缅北撤到了芒市。

从中国远征军攻入龙陵市区的八月二十四日开始，集结在芒市附近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和第二师团的七千多兵力，沿着芒市到龙陵的公路急速向北推进，企图以强大的攻击态势迫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退出龙陵。二十五日，日军先头部队在龙陵以南与第七十一军搜索营遭

遇，一部日军直接冲进了岌岌可危的龙陵城。接着，日军在龙陵城下与新编第三十九师、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九师等部队展开大规模激战，日军孤注一掷的进攻令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二团的阵地三次得而复失。新编第三十九师与日军反复争夺南天门、张金山和双坡等阵地，最后全师竟然仅剩下百余官兵，师长洪行单人乘吉普车突围，中途翻车身亡。

战局极度危急之时，由昆明驰援而来的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中国陆军中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于九月六日抵达龙陵前线。接着，九月七日和十四日，中国远征军攻占松山和腾冲的消息传来——“断”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解救松山、腾冲和龙陵，松山和腾冲的失守导致“断”作战立即失去了意义。同时，日军第三十三军集结在滇西和缅北的总兵力约为两万一千人，但目前“病、伤、亡的人数已达七千二百名”。中国远征军攻占松山后，炮兵十团和七团立即赶到龙陵附近支援第十一集团军作战，第十一集团军部队乘势反击日军后续增援部队，日军因无心恋战掉头向芒市回撤收缩——撤退中被击毙者甚多，仅运进芒市的“重伤员就有一千二百多名”。

“断”作战停止了。

已是九月中旬，尽管龙陵城里的日军不多，但中国远征军依旧未将其攻占。

此时蒋介石与美国方面的矛盾再次加剧，导火索是中国境内的日军发动了新的攻势，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把部队从龙陵撤到怒江以东以保卫昆明。

九月十五日，史迪威被蒋介石召到重庆。蒋介石的谈话令史迪威对他的反感达到了顶点——“一个半小时的废话和胡说八道。他想从龙陵撤退，这个疯狂的小杂种。”史迪威立即给马歇尔发去电报，说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决定：“我们是为通向中国的一条公路而作战，只要龙陵在我们手中，我们就能整个控制这条公路。”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国国内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连续溃败——“他害怕如果我们在龙陵打了败仗，日军就要进军昆明。”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在攻坚龙陵的最后时刻提出终止作战，由于档案资料匮乏，一时难以窥其真相。仅从表面上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作战时，广西方向的对日作战局面正在极度恶化，日军大有冲进云南乃至四川的态势。

十九日，由于史迪威以及马歇尔的作用，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几乎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且他要求这封电报须由史迪威面交蒋介石，以避免中国外交部对电文进行使其变得温和的修饰：

读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最近报告之后，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我都深信，你于最近的将来将面临我所担心的灾难。你的Y（指中国远征军）部队渡过萨尔温江，奋勇作战，对缅北战役作出了有价值的支援。但我们认为，除非他们获得增援和你的全力支持，你就不能指望从他们的牺牲中有所收获，除非他们对打通滇缅公路继续作出协助，他们的牺牲就将毫无价值。再者，你中止渡过萨尔温江的进攻，或提议撤退部队，正是日军所企求的，他们之所以在华东发动攻势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知道，如果你继续进攻以配合蒙巴顿即将发动的攻势，通向中国的陆路交通线就会在一九四五年初期打通，中国的继续抵抗和你的控制权的保持就将得到保证。反之，如果你不对你在缅北的师提供人力，如果你不向萨尔温江部队派遣增援，并撤退这些部队，我们就将失去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的一切机会，并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自己必须准备接受其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最近几个月来，我曾再三敦促你采取果断行动，以抵御愈来愈迫近中国和你的灾难。现在你仍然没有任命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的一切军队，我们将面临失去华东重要地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日军占领桂林将使昆明空运终点站处于不断遭受袭击的威胁中，减少“驼峰”吨位，并可能切断这条航线。虽然我们正在世界各处迫使敌人败退，这在相当时期内对中国的局势也无所裨益。我们的部队通过太平洋迅速前进，但除非你现在采取有力行动，这个前进对中国来说也为时过晚了。只有你方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才能保全你多年来奋斗的成果以及我们为了支持你而作出的努力。否则，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都将因军事上的惨败而落空。

首相（指丘吉尔）和我在魁北克刚刚决定全力加紧军事行动以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线，这一决定是假定你将坚持不懈地从萨尔温江方面发动进攻而作出的。我确信你当前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即增援你方在萨尔温江的部队并发动攻势；同时，让史迪威将军能够毫无约束地指挥你方的全部军队。我要求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有利于实现我们的上述决定，而且也可以使得美国建议继续维持和增加对你方的援助所做的努力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是在欧洲和横渡太平洋进行另外两个战役的时候这样做的。由于你的远见，在这次战争中你领导并鼓舞了你的人民，我相信你将意识到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这

封信中，我十分坦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再事拖延，你和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史迪威日记记载："我把这包辣椒面递给了他，然后叹了一口气坐下来。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但他没有脸色发青，丧失说话的能力，他的眼睛眨都没眨。"——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了句："我知道了。"然后坐在那里，"轻轻地摇着一只脚"。

史迪威回到他在重庆的住所，看到长江岸边的山城"灯火齐明"。

而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帝使我耻辱与痛苦，何一至于此！"

罗斯福的这封电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超出了外交文件应有的礼仪底线以及国与国之间应有的关系准则。更令蒋介石愤怒的是，他注意到罗斯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九月十八日，这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国耻日，尽管不能断定罗斯福是有意要在中国人的伤口上撒盐，但蒋介石的苦闷无以复加。

蒋介石命令位于龙陵的第十一集团军就地休整补充。

此时，从保山到龙陵的公路畅通无阻，前线部队给养充足。龙陵城内的残余日军不足千人，芒市方面的日军因损失过大已没有增援和反击的能力，中国远征军攻占龙陵只需最后一击。但是，在龙陵周边，第十一集团军的休整补充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蒋介石决心面对与美国决裂的最坏局面。

蒋介石与史迪威由来已久的面和心不和注定要公开化了。

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了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告诉罗斯福，中国战场与同盟国其他战场有着"不同之特性"，在这一战区内作战的只有中国的军队和人民，战场本身也皆为"中国本国之土地"，因此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保持中国战场"独立自主之主权"。那么，战争期间的人事应由中国政府进行抉择，否则即会损害同盟国一贯主张的"尊重各国主权之精神"。具体到史迪威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他已多次拒绝执行自己的命令，

这严重妨碍了中美两国“军事互助之宗旨”，要求美国另派能与中国合作的指挥官，且最重要的是“能诚意接受”作为中国战场统帅的他的命令。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中国抗战期间中美外交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所折射出来的军事、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远远超出中美两国对一位军事将领在任命和使用上的矛盾。一般说来，矛盾可大致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兵权问题。史迪威有着坚定不移的指挥要求，在与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进行了明争暗斗后，如今由美国总统直截了当地提出让史迪威指挥中国的一切军队，这让蒋介石忍无可忍。兵权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阀的命根子，不要说中国军队的兵权绝不能也没有任何道理交给一个外国人，从蒋介石维持其统治权的角度上讲，他也绝不会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出去。对史迪威而言，他的雄心是全面指挥中国抗日军队与日军作战，他坚信只要把那些腐败无能的军事将领剔除干净，最为吃苦耐劳的中国军队一定能打胜仗。为此，他运用代表美国监督对中国援助的权力不断向蒋介石施压。不愿意放弃哪怕局部兵权的蒋介石，一方面必须获得美援，一方面又要保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两难之中对史迪威的积怨逐渐堆积，已逼近爆发的临界点。

二是包括史迪威在内，抗战时期到达中国的美国人，无论是军事将领、新闻记者、政府顾问，乃至散布在中国军队里的教官和联络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美国的政治观念出发，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与美式民主理念完全相反的政权。曾在中国任驻华武官的史迪威的看法更为透彻，而由于性格所致，他对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本人的抨击露骨而尖锐：“蒋介石是一党政府的头头”，“他现时组织了十万人的特务系统”；“他不会努力认真打仗。他想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获得大量供应物资，从而使得他的体制可以永久存在”；“他对战争的重大损害应负责。南京、兰封。长沙和衡阳。桂林和柳州。对共产党人的封锁”。几位美国记者对史迪威进行采访后，有过如下记述：他要我们知道，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起，“这个狗娘养的无耻之徒就从来不想打日本”——“这场战争中每次犯下的大错，都可以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找到根子”：蒋介石随意撤销史迪威发布的作战命令；蒋介石“以电话命令前方部队在他一无所知的边远地区进攻或撤退”；“蒋介石说谎，盗窃和囤积军用物资”以为“在未来的内战中打共产党”。

三是共产党问题，这或许是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最深症结。史迪威主张应该同时武装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提出把美国援华武器拨出

一部分武装敌后战场；认为蒋介石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二十万精锐部队，对于正在对日作战的中国来说“是巨大的人力浪费”。——“中国所有政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说，这样一种由对共同敌人进行的共同战争所决定的团结，将会使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走向和平，使她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面对和驱逐一切外来敌人”。而且，一旦美军为进攻日本本土在中国华北登陆，“共产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史迪威写信给马歇尔：“如果允许蒋介石及其一伙控制（租借法案）供应物资，你知道谁将得到供应，你也知道谁得不到供应。我们总得想办法将武器交给共产党，他们是要打仗的。”史迪威说他仅凭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在目前阶段只要对日作战就是美国的盟友。——将选择的天平向共产党倾斜，无论是出于朴素的看法还是出于政治胁迫，都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史迪威代表着美国政府。

二十五日，蒋介石复信罗斯福，口气揶揄且强硬，表示他和史迪威都可以单独指挥中国军队，但两个人实在无法共同指挥。既然他现在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首脑，那么美国人史迪威就必须离开。——“我看得很清楚，史迪威将军无意同我合作，而实际上是认为他在奉命指挥我。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我相信你会理解，日后史迪威将军将完全不听从我的指挥。我必须严肃地声明，我将根本不能企望史迪威将军会遵从我的指挥。假如不顾理智和经验，我竟然决定任命史迪威将军为最高司令官，我就会明知故犯地招致不可避免的灾难。”

最后令罗斯福改变态度的是总统特使赫尔利。

赫尔利来华的重要使命有二：一是调和国共两党的关系，说服两党领袖能相互让步，以建立一个带有美国民主样式的联合政府；二是调和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并说服蒋介石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但是，赫尔利的两个基本立场意味着他无法完成使命，即一切为了美国利益以及坚决反共。

赫尔利认为战争时期，要维持抗战中国的战场，就必须维护蒋介石的政权。来华之前，他特地绕道苏联，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后，来往于重庆与延安之间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他，显然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关于史迪威的问题，蒋介石似乎早有准备，他把撤换史迪威的理由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都讲述得淋漓尽致，令赫尔利意识到事情已无任何斡旋的可能。蒋介石决意在三方面决不让步：一是中国信仰的三民主义，美国人别把美国式的民主和中国扯上关系；二是国家主权，美国人不要试图控制中国，包括军事指挥权；三是个人尊

严，美国人必须为蛮横无理付出代价。宋子文明确地告诉赫尔利，为了上述三项原则，中国将不惜任何牺牲，否则，中国留在同盟国内赢得战争，还不如没有同盟国输掉战争。

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表示，既然美国的目的是为防止中国战场的崩溃，那么除了蒋介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与美国有现在这种程度的合作。总统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作出选择——“您和蒋介石之间其实没有其他的歧见。蒋介石已经答应了每一个您的要求和建议，唯一的例外是史迪威的任命问题”——那么，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撤换史迪威：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假如我们让中国崩溃的话，假如我们无法使中国军队继续抗日的话，尽管上天所有的天使都认为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它也不能改变历史的定案，美国将在中国遭遇失败……因此，我恭请您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另派一名美国将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空军部队。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要给史迪威颁发一枚青天白日特级大勋章。

史迪威没有接受。

二十一日，史迪威飞离重庆。他佩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一柄日本人的武士刀。阴雨中，宋子文前来送行，接着何应钦也赶来了，史迪威并没跟他寒暄，直接登上了飞机。

史迪威先飞昆明，在他战斗过的地方短暂停留——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保山、密支那——然后飞抵印度的新德里等地。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看见中缅印战区，因为这一战区自他离任时起，已被分割成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和由索尔登指挥的缅印战区。史迪威于十一月二日飞回美国本土，在机场迎接的只有他的妻子。

撤换史迪威，被认为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开端。在以后的历史中，史迪威事件始终被当成一个政治事件，他被描绘成一个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人，说共产党人试图利用他搞垮蒋介石。但是，只要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抗战史的人，对此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种说法简直把事实歪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它把封建中国崩溃的责任强加在几个美国人头上，简直好像是宣称一所房子的倒塌是由于邻居打了一个喷嚏。其实这所房子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腐朽倾塌，而房子的主人还不断地挖自己房子的墙脚，这样房子难道不会倒塌吗？

史迪威则说：“蒋介石这个人想要用武力同一种思想作斗争。他不懂得那种思想，也不懂如何使用武力。”

史迪威不是一名政客，只是一位军事将领而已。从军事上讲，他严格按照西点军校的准则行事，渴望打胜仗并获得军人的荣耀，为此既执着又强硬。从政治上讲，他幻想着即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也能按照美国的样式有所建树。史迪威赋予自己的职责，是训练出一支能够作战的中国军队，配备美式装备后反攻缅甸，重新打通抗战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然后带领这支经过作战洗礼的部队，参加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总攻。虽然这一职责是纯军事的，可自始至终无不关涉政治，甚至是中美两国的政治。史迪威没有明白的是，“战争在最高一级是受政治支配的”。——“一百年来无数的西方传教士、顾问、牧师始终想改造中国，其结果只是把这个国家弄得动荡不安，而史迪威可视为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史迪威参加了在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五天以后，作为美军第十集团军司令，他主持了琉球群岛日军投降仪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全部胜利后，史迪威提出想到胜利后的中国去看看，马歇尔没同意，蒋介石也不同意。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史迪威因胃癌在美国去世。

史迪威黯然离开中国的第四天——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耽搁一个多月的龙陵总攻令终于下达。

二十九日，第二〇〇师六〇〇团率先从右翼出击。接着，第八十七师和第三十六师从左翼出击，荣誉第一师直接攻城。十一月一日上午，荣誉第一师一团攻占城内海关和观音寺，三团攻占段家祠堂和段家公馆。晚上，龙陵日军残敌分成小股突围，中国官兵分路围追堵截。芒市方向的日军多次试图增援，因远征军部队切断了公路，炮兵在芒市以东制高点上开设了阵地，芒市已完全被置于火力打击下。十一月六日上

午，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在龙陵城内举行了升旗仪式，宣告收复龙陵。

从六月五日第一次攻击龙陵开始到彻底结束战斗，历时五个月的龙陵城攻坚战其进程缓慢而蹉跎。参加攻坚战的中国远征军各部共伤亡和失踪二万八千三百八十四人，其中士兵阵亡九千六百三十三人，负伤一万四千六百零二人，失踪二千四百六十二人；军官阵亡五百二十五人，负伤一千一百零九人，失踪五十三人。龙陵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作战中毙敌最多的一战，共毙伤日军一万零三百六十四人，俘虏二百六十六人。

得知腾冲和龙陵守军均被歼灭，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黯然感叹道："活到现在还没有尝到过如此悲痛的滋味。"

中国远征军拿下龙陵后，滇西战事的胜利已无悬念。

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乘胜全线进攻，十一月二十日攻克芒市，十二月一日攻克遮放。遮放战线崩溃后，日军在中缅边境组成新的防线：五十六师团约九千人在畹町附近；第四十九师团第一六八联队约一千二百人在新维附近；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约一千二百人和第二师团第四联队约一千人在南帕卡附近；第三十三军直属部队约三千人防守腊戍附近。

蒋介石督促卫立煌立即攻击中缅边境处的重镇畹町。

卫立煌因兵力不足和准备不够而要求推迟，但蒋介石认为中国驻印军已经攻占八莫，正向中缅边境的南坎推近，这是中国远征军彻底将日军赶出云南国境，与驻印军会师的大好时机，于是一再急电催促。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卫立煌下达了攻击畹町作战命令：第五十三军在右翼，推进到日岗、景坎和遮勒一线，阻击勐卯附近的日军增援畹町，然后转进畹町以南截断滇缅公路；第六军为中央军，第二军为左翼军，分别在帕赖至拱撒、谢连至猛古街之线向畹町实施猛攻，把日军包围在畹町盆地中加以歼灭；第七十一军为攻击总预备队。为了尽快攻克畹町，卫立煌还把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配属给了第二军。

十七日，攻击开始。

此时的日军已经无力反击。

畹町周围第五十六师团的阵地，按正面方圆十公里构筑，敌人兵力超过我守备部队兵力十余倍。由于敌人从阵地的间隙到处均能侵入，炮兵阵地终于受到攻击而陷入混战……敌我战线，自畹町至南坎纵深达三十公里，师团无一名预备兵力，为处置与日俱增的伤亡者，以及积聚在战线内，特别是在南坎的军需品，尤其是弹药的后送而苦恼……敌我兵力之比恰好是十五比一，与龙陵会战当时比较，虽无大的差别，但敌人现在已把全部兵力集中到一个战场，且占有东西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相反，我方全部兵力，因大范围地分散展开，已经没有采取任何计策之余地。预测军的命运也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鉴于日军随时可能撤退，第十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黄杰命令加速攻击（此时宋希濂奉军令部之命去陆军大学受训）。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第七十一军主攻畹町，畹町周边的日军据点相继被攻占，日军守军残部向西南方向溃败。与此同时，为堵住日军的后路，第五十三军在畹町以南截断了滇缅公路。

密支那战役结束后，奉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国驻印军所属各师进行重新编组：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下辖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三十师；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下辖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五十、第十四师。一九四四年十月，新编第一军沿着密支那至腊戍的公路进攻八莫；新编第六军则在密支那至曼德勒铁路线以东进攻瑞古，以在八莫以西切断日军的退路。战至十二月十五日，新一军攻占缅北水陆交通要地八莫。之后，大军急速南下，向缅北最东端靠近中缅边境的南坎发起攻击。驻印军指挥部向南坎战场配属了大量的战车和火炮。新编第三十师的两个团，在一个浓雾缭绕的早晨，一个团从背后一个团从侧面发起攻击。一月十五日，新编第三十师官兵攻占南坎——“战壕中到处都是被击毙的敌人的尸体和被毁的武器。”因为英国人不允许中国军队向南深入缅甸，于是中国驻印军转头向北，即向着国境线的畹町方向急速前进。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克滇缅公路上的日军残余据点，与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二四八团取得了联系。二十三日，新编第三十八师与第五十三军部队同时推进到畹町以南位于缅甸境内的芒友东南地区。二十七日，经过四天的激战，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克芒友。至此，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

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完全打通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芒友举行盛大的会师典礼。会场设在一座小山的下面，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政治部和工兵营的官兵，用丝质降落伞为主席台搭建起一个顶盖，还在台前铺设了一个巨大的表示胜利的红色英文字母“V”，并在通向祖国那边的路口悬挂起上书“欢迎驻印新一军凯旋回国”的横幅。上午九时，身穿黄色卡其布军装的中国驻印军官兵和身穿灰色军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从不同方向走进会场。中、美两军高级军事将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美国缅印军总司令索尔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走上主席台，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两国国旗冉冉升起，礼炮声在山谷中回荡。

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官兵们高呼着“打到东京去”的口号，不禁热泪横流。自一九四二年日军进攻缅甸直至中国滇西，迄今已经整整三年，驻印军官兵远离祖国，远征军官兵枕戈待旦，在之后发起的反攻缅北和滇西的作战中，他们吃尽人间苦楚，英勇无畏，顽强不屈，十三万官兵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其中数万忠骸长眠在缅北的崇山峻岭和密林河谷中。这些浸满鲜血的英灵，永远光耀着中国抗日战争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

同一天，中印公路通车典礼在滇缅交通要冲畹町举行。

中印公路，就是中国驻印军官兵在前面作战，中美工兵部队在后面修筑的那条公路。公路从印度东北边界处的利多起始，穿越缅北和滇西抵达昆明，主线全长一千五百多公里，其间跨越了十三座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以及无数条贯穿中缅两国国土的江河，还有缅北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地带渺无人烟的原始山林。与这条公路一起铺设完成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的输油管道。为了这条国际援助通道，无论是作战还是筑路，中美两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这条公路也被称为“华美路”。而盟军正是沿着这条路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的，所以这条公路还被称为“到东京之路”。

通车典礼会场设在中缅边境第三十七号界碑边，在公路上搭起来的巨大牌楼上，“ROAD TO TOKYO”（到东京之路）的标语十分醒目。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专程从重庆赶来主持典礼，美军第十航空队司令戴维斯、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和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以及美军缅印军的部分将领与官兵应邀参加。索尔登将军宣布“中印公路通车”之后，当他在致辞中说到“今天是同盟国最高兴的一天，是日本最不高兴的一天”时，几十架前来助兴的美军飞机从上空呼啸而过，典礼会

场欢声雷动。而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欢呼声中驶入了中国国境——沿着中印公路开往中国的第一支运输车队，在美军工程兵少将、中印公路指挥官皮克的率领下，中美各一百二十名官兵驾驶着一百二十辆满载各类军火的卡车、牵引着各种火炮的拖曳车、配备着医药救护物资以及食品的特种车，还有八辆军用吉普车，于一月十二日从印度的利多出发，翻越野人山、穿过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在典礼气氛到达高潮时驶过了中缅边境处那座公路上的小桥。进入中国国内的畹町后，皮克的车队在三架美军战斗机的护送下，一路向北经过龙陵、保山、下关、楚雄到达昆明。皮克少将把首次运达的物资清单，交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龙云回赠的礼物是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四个大字：胜利之路。

这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题为《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的广播演说："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封锁。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史迪威公路"自此蜚声全世界。而远在美国的史迪威也在美国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他赞扬了为修筑这条公路而战斗的所有人，步兵、工程兵、医务人员、空军人员、汽车人员、劳工——唯独没有提到他自己，好像他没有到过那里一样"。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后，掉头向南，与英印军第三十六师一起兵分三路直指腊戍。从二月底至三月初，东路的新一军官兵，翻越山岭，渡过南图河，一路猛战拿下日军的一百四十多个大小据点，最终力克腊戍以北的战略屏障新维；然后通过绵延的山地，渡过南育河，采取正面强攻、两翼包抄的战术，攻下缅甸东北部的战略要地、滇缅公路上的重要物资中转地腊戍。而位于战场西路的英印军第三十六师于伊洛瓦底江东岸不断清除日军的据点后向南推进，抵近曼德勒东北方向的乔梅（今皎梅）以北；位于战场中路归新一军指挥的第五十师攻占南渡后，沿着南渡通往曼德勒的公路清扫日军残敌，日军面临着最后的崩溃不守即退，第五十师官兵风卷残云一般一直打到曼德勒东北方向的乔梅，三月三十日与英印军三十六师会合。

至此，缅北的残余日军全部撤到缅甸南部去了。

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反攻作战结束。

日军缅甸方面军（陆军）共计出兵三十万三千五百零一人，战死十

八万五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余全部撤出战场。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对日作战的胜利近在眼前。

但是，中国西南一隅传来的捷报，反而加剧了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国人在审视战局时的恍惚：在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赢得反攻胜利的同时，在中国国土的南部日军长驱直入冲进了广西。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就会意识到：重庆的后门安全了，但前门却岌岌可危了。

第四十章

“一号作战”到此停止

缅北和滇西反攻作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日军向中国广西方向实施的大规模进攻如入无人之境，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日军向中国西南腹地推进七百多公里，而中国守军的不堪一击以及国土沦丧速度之快，不但令国内舆论大哗，也令盟军方面感到震惊。

日军进攻的是中国第四战区的防区。

第四战区已三年多无战事。

中国第四战区原辖广东和广西两省。一九四〇年初桂南会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一个战区不便在两个正面作战，于是把广东省单独划出成立了第七战区，任命余汉谋为司令长官。由此，第四战区内仅剩下广西省，司令长官为张发奎。

广西是白崇禧的地盘，守军主力是桂系部队，将领们都听白崇禧的命令，凡涉及广西事务无论大小白崇禧也都一手包办，所以粤系将领张发奎很明智地采取忍为上的策略，一切由着白崇禧或是蒋介石操心。加之一九四〇年日军撤离广西后，广西境内没有敌情，张发奎在第四战区的日子过得很悠然。

如果说第四战区还有防务的话，便是需要警惕驻扎在雷州半岛和越南方向的日军。张发奎把战区主要防御兵力配置在南宁至钦州、防城港的沿海一线以及中越边境地带，至于广西与广东、湖南交界的桂东和桂北方向，他认为既然接壤第七、第九战区，有什么问题也是余汉谋和薛岳的事，第四战区没有必要在那里部署兵力。一九四四年夏，长沙和衡阳相继陷落，张发奎以为薛岳会将第九战区主力转移到湘西，以贵州和广西为大后方，这样第四战区依旧处于第九战区的护卫之下，日军不会威胁到他管辖的广西。但是，薛岳退守的是湘东南而不是湘西。

张发奎猛然意识到，桂北和桂东已经大门洞开，日军随时可能从湖南或广东冲进广西，于是紧急调动部队布防。由于多时无战事，临战之际张发奎才发现，号称拥有九个军二十一个师的第四战区，实际上因为长沙和衡阳作战，部队已被重庆军事委员会调得七零八落：第九十三军

需要从四川綦江方向往回赶；参加长衡会战的第三十一军回撤后正在整训；第六十四军需要从广东往回抽调；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第十七军等部队，目前还在湖南南部与日军周旋；第四十六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七十九军，须从湘江边的祁阳及其西南地区进入桂北。以上部队大多经过长衡会战，官兵筋疲力尽，人员与装备急需整补，能够支撑作战的兵力加起来不足十万。至于对雷州半岛和越南方向的警戒，只能让保安团和地方民团承担了。

日军准备进攻广西的兵力庞大：湖南方向日军第十一军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四十、第五十八师团以及独立战车联队、第十四重炮队，广东方向日军第二十三军的第一〇四、第二十二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雷州半岛方向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以上共计十余万日军，将从东北、东、东南方向对广西分进合击，大有一举荡平中国第四战区的凶猛态势。

日军主力第十一军刚刚结束衡阳血战，便立即发动对广西的攻击，其连续作战的动机、决心与能力，用一般的军事常识已无法解释。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和七月，是日本和德国都遇到开战以来最大苦难的时刻。”

在欧洲战场，盟军于诺曼底成功登陆后，德军统帅部再次爆发内部危机，七月间发生的一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事件，目的就是要立即中止战争。与此同时，盟军突破德军的“大西洋壁垒”，八月解放巴黎。在苏德战场上，苏军赢得列宁格勒战役的胜利，其间先后实施十次以上的大规模闪击，歼灭德军两百万人，将入侵者全部赶出了苏联国土。之后，苏军迅猛追击，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其前锋直逼德国本土。

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大势已去。麦克阿瑟制订了“雷诺”作战计划，决定以美军第七、第二十四、第九十六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以及其他勤务部队共计二十万兵力，对日军第三十五军第十六、第十二师团仅三万人防守的莱特岛实施大规模登陆。为了挽救战局，日军大本营制订出“捷号作战”计划：由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上将负责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与美军进行地面决战；由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宗作中将负责菲律宾群岛中部和南部的防御；对地面作战实施空中掩护的是尚有千余架战机的第四航空军。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将集结起最后的全部力量，力求歼灭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日军的“捷号作战”计划，“带有决战的

性质”，是大本营为确保本土防御圈进行的最后一搏。

菲律宾群岛中的莱特岛，东面是萨马岛，西面是宿务岛，南面是棉兰老岛，盟军一旦夺取该岛，等于把菲律宾一分为二。麦克阿瑟率领的登陆舰队十分庞大：二十艘航空母舰、十二艘战列舰、一百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搭载着近二十万名官兵，在上千架战机的护航下，铺天盖地地向莱特岛扑去。十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几乎遮蔽了天空的舰载机首先轰炸滩头，接着美军第一骑兵师、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七步兵师依次排开，开始了太平洋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抢滩登陆。日军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下很快失去抵抗能力，美军登陆部队潮水般地席卷了莱特岛东海岸。下午二时三十分，麦克阿瑟乘坐登陆艇靠近莱特岛，然后在大批战地记者的簇拥下，他踩着海水重新踏上了菲律宾国土。——“我回来了！”麦克阿瑟说了这句他早已准备好并确信会刊登在世界各大报纸头条标题位置的话。

与登陆战同时进行的是莱特湾大海战。

西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岛屿失守后，日本如果再失去菲律宾和台湾，运送战争物资和补给的海上运输线将被斩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决心吃掉美军太平洋舰队以及莱特岛登陆部队。他策划的海上决战，充满了绝境中破釜沉舟的意味：由小泽治三郎指挥北方舰队的四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从日本海南下直扑菲律宾，引诱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北上并与之决战；由栗田健男指挥中央舰队的三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以及日本海军最后的王牌“武藏”号和“大和”号巨型战列舰，从文莱启程秘密驶入莱特湾，歼灭失去了海面舰队掩护的美军登陆部队；由西村祥治指挥南方舰队前卫分队的两艘战列舰、一艘重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加上由志摩清英指挥的后卫分队的两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从琉球群岛出发加入到对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合围中。

美军没有料到日本海军会倾巢而出。幸亏两艘执行巡逻任务的潜艇“海鲫”号和“鲦鱼”号在菲律宾群岛西面的巴拉望岛附近，从雷达屏幕上看见了可疑的回波，艇长麦克林托克中校和克拉杰特中校很快认定这不是雨云。靠近可疑目标并升起潜望镜，他们看到了不远处的海面上如高楼一般的巨舰——日本海军中央舰队的“武藏”号和“大和”号，是当时世界上吨位最大的战列舰，战舰全速前进时舰艏掀起的巨浪犹如小山。两位中校在向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报告敌情后，朝着日本海军中央舰队发射出六枚鱼雷。

这六枚鱼雷，开启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海战的序幕。

日本海军中央舰队旗舰“爱宕”号瞬间起火，之后沉没；接着，重巡洋舰“高雄”号受到重创，“摩耶”号被炸成两截沉没，“东方”号被鱼雷击中尾部。这是双方都陷入混乱的时刻：日军还没开始作战就已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本想隐蔽前进，现在因行踪暴露随时可能遭遇美军航母舰载机的打击；美军方面，哈尔西接到了栗田健男的舰队自西向东驶入锡布延海的报告，他立即命令第三舰队的航母战斗群前往攻击。颇具戏剧性的是：小泽治三郎的北方舰队本是作为诱饵，但其大张旗鼓地航行却没有被美军发现；而秘密前进的栗田健男的中央舰队反而提前暴露了。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美军舰载机升空了，直扑日本海军中央舰队的巨型战列舰“武藏”号。尽管为其护航的重巡洋舰“宫殿”号在猛烈的攻击中受到重创已退出战斗，但中了三枚鱼雷的“武藏”号只是摇晃了几下而已。直到七架美军舰载机利用云层掩护实施第五次攻击，两枚各重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弹，分别穿透“武藏”号的前后甲板在舱内爆炸了。随着“武藏”号的起火，美军的鱼雷机蜂拥而至，数十架轰炸机轮番投弹，半个小时之内“武藏”号先后被十一枚鱼雷和十七枚航空炸弹命中。黄昏时分，这艘花费五年时间建造的巨型战列舰终于支撑不住了，二百六十三米长的巨大舰体翻转过来，与已经死亡的一千多名日本海军官兵一起沉入大海。与此同时，栗田健男的重巡洋舰“妙高”号受到重伤，战列舰“大和”号、“长门”号因中弹导致航速下降，驱逐舰“滨风”号、“清霜”号也因受伤返航。栗田健男不得不命令他的舰队立即转向，以迅速逃出美军航母的攻击圈。

而哈尔西留在战场东面圣贝纳迪诺海峡的特混舰队，此时开始受到日本海军北方舰队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尽管美军舰队火炮强大，但令官兵们震惊的是，日军战机不但不躲避对空炮火，而且迎着炮火径直朝军舰的甲板俯冲而下。一架日机撞到“普林斯顿”号航母的甲板上，引燃弹药库，伴随着爆炸的巨响，钢铁的残片和肢体的碎块腾空而起。“普林斯顿”号摇摇欲坠，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旁边的轻巡洋舰“伯明翰”号靠过来企图营救，结果“普林斯顿”号的又一次爆炸使得“伯明翰”号燃起大火。哈尔西决定立即北上，迎战小泽治三郎的航母舰队。哈尔西第一次出动一百三十架舰载机，近一个小时的轮番攻击后，北方舰队的重型航母“瑞鹤”号严重倾斜，另外两艘战列舰受损。第二次，哈尔西出动一百七十架舰载机，击沉了“千岁”号航母和“秋月”号驱逐舰，重创了“瑞凤”号和“千代田”号航母以及“多摩”号轻巡洋舰。

晚上，日本海军南方舰队驶入莱特岛南面的苏里高海峡，布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对其发起了攻击。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列舰搏斗。美军舰炮的精准度以及火力强度都占据绝对优势，虽然夜间舰载机无法战斗，但美军已向这一水域派出了大规模的鱼雷艇。——日本海军战列舰“扶桑”号被鱼雷击中发生爆炸，舰体断裂沉没，“山城”号被鱼雷击中发生爆炸，舰桥崩塌沉没。重巡洋舰“最上”号燃起大火，最终被美军击沉。驱逐舰“山云”号被鱼雷击中发生爆炸沉没，“朝云”号中弹后舰艏断裂沉没，“满城”号和“时雨”号被鱼雷击中受伤……日本海军南方舰队一夜之间便不复存在了，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只损失了一艘鱼雷艇。

就在第七舰队进行夜战的时候，受到重创的日本海军中央舰队又回来了。栗田健男认为，美军舰队主力正被南方舰队牵制，他杀个回马枪将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只是，由于没有收到小泽治三郎的电报，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位于哈尔西的第三舰队的背后。二十五日拂晓，在莱特湾以北的萨马岛海域，中央舰队的观察哨报告：发现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实际上，日本人发现的是第七舰队的一支小部队——由斯普拉格少将指挥的只有六艘小型航母和四艘轻型驱逐舰的分遣舰队，其任务不是海战，而是对付潜艇以掩护陆军的登陆作战。——斯普拉格少将决心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把日本海军的中央舰队死死缠住。

一声巨响穿透清晨的雾气，从巨型战列舰“大和”号上发射的巨型炮弹朝着斯普拉格飞了过来。

巨弹未落之际，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紧急起飞了。

斯普拉格没有对付战列舰的大炮和穿甲弹，他只有鱼雷和普通炮弹。普通炮弹对日本海军的战列舰不起作用，但鱼雷却把栗田健男的重巡洋舰“熊野”号和“羽黑”号击伤了。战斗中，斯普拉格的轻型航母“甘比尔湾”号被日军舰炮击沉，旗舰“方肖湾”号航母受到重伤。接近中午的时候，斯普拉格支持不住了，栗田健男的中央舰队大有一举冲进莱特湾的态势。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也是太平洋战场上最莫名其妙的时刻：在栗田健男与麦克阿瑟之间，只有斯普拉格的这支小规模的分遣舰队。如果栗田健男冲入莱特湾，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只能任凭日本海军舰炮打击，美军也许会因为后路断绝而令莱特湾登陆战功亏一篑。但是，栗田健男突然命令舰队掉头向北，也就是说，中央舰队在有望攫取胜利之时突然撤出了战场。至今，仍有人为栗田健男的这一命令争论不休：或许是他得知哈尔西的主力舰队正在南下，准备与他决战；或许是他得知麦

克阿瑟已在莱特湾成功登陆，并在那里设下一个巨大的陷阱等着他去自投罗网。总之，日本海军最后的战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失了。

哈尔西的主力舰队确实正向南驶来，因为他接到了紧急增援斯普拉格的命令。只是，等到哈尔西的舰队赶到时，栗田健男的中央舰队已经向北远遁了。

莱特湾海战，日本海军被击沉航母四艘、战列舰三艘、重巡洋舰六艘、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十一艘、潜艇一艘，其余参战舰只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日本海军还损失了五百余架各种战机，一万多名海军官兵和舰载机飞行员死亡。

日军大本营终于意识到，战争可能到了最后时刻，并开始思及日本战败的后果："以作战挽回败局已经无望"，"今后将逐步陷入穷途末路。为尽快求得结束战争，不得不依靠政略来谋求战争的解决，此时的条件只有保持国体这一条"。

绝境中的日军使用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攻击方式：自杀式攻击。

日军自杀式攻击队被称为"神风特攻队"。

成立于一九四四年十月的"神风特攻队"，其倡导者是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大西泷治郎中将。面对全线溃败的危局，十月一日，大西泷治郎召集航空队的飞行员开会，决定组织"驾机撞舰"特别攻击队——驾驶载有一千公斤烈性炸药的飞机追踪目标并与之同归于尽。"神风特攻队"队员均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执行任务前可以与亲人或女人相处三个月。出击前写下绝命书，然后被关闭于机舱内；起飞时不带降落伞，起飞后供降落使用的起落架自行脱落——只要飞上天空，除了俯冲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可能。

日军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的自杀式攻击，极具象征意义，因为此时的大日本帝国除了"玉碎"之外，确实没有其他选择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势已去之时，尽管日军大本营以及中国占领军的将领们，谁都说不清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到底对行将崩溃的战局能够产生何种裨益，但日本人还是固执地要把这场大规模的野战继续进行下去。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绝对国防圈"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都已被美军突破；在中国战场上，远征军的反攻作战已将日军赶出滇西，共产党抗日武装正在华北发动反攻。为了防卫日本本土、西南诸岛、台湾、菲律宾

一线，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方面按预定计划推行湘桂作战，由大陆交通来弥补不安全的海上交通，并实行对美（以空战为主）作战的准备”。——日本人固执地认定，只要打通了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便可为保障日本本土安全建立起一条具有巨大回旋纵深的防线，让日本在战争危局中保有自如进退的通道和空间。

虽然从黄河岸边开始的作战已经打到湖南，而且还要接着向南打下去，但兵力补充以及物资供应的迟缓无法回避。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这条漫长战线的不断延伸，日军中国派遣军已无法切实指导即将深入中国西南腹地的湘桂作战。鉴于此，一九四四年八月，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战场成立第六方面军，统一指挥位于华中的第十一军、位于华南第二十三军以及位于武汉地区的第三十四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改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我被免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这种极其平常的人事变动，本无足怪。但其后仅隔三个月，又被转调他任，对于关系重大的方面军司令官职务变动如此频繁，使我感到诧异和不满。”冈村宁次在第六方面军仅仅待了三个月，就被调去南京任侵华日军（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大本营这种混乱的人事变动，显露出日军核心军事机构已经乱了方寸。冈村宁次不由得想起年初一位日本和尚给他算过的命：“本年截然不同于前两三年，命运将有极大变化。”——冈村宁次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否也就是日本的命运。

更令冈村宁次心情恶劣的，是他赴任路上的所见所闻。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部设在武汉，武汉会战期间他曾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而此时的武汉已经荒凉如废墟，全城“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到”。在专门招待日军飞行员的旅社里，“青年军官因频频出征，常有去而不回者”，招待员也是一脸凄凉的神态。由于日军完全丧失了制空权，以前“在汉口、九江之间，往来内地之大型运输船常达三四十只，如今连十吨左右的小汽船均被敌美空军炸光”。第六方面军的战斗指挥部设在湖南衡山，原本从武汉乘飞机到衡阳，然后再换汽车，半天便可抵达，现在至少需要三天，即使乘飞机也只能是小型侦察机，而且还须数架战斗机护送。而要想南下广州方向的第二十三军，则更是危险，必须绕飞台湾才可勉强抵达，不然冈村宁次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山本五十六。

由于此前在湖南境内的作战十分艰难，攻占衡阳的时间比“一号作战”计划规定的晚了一个多月，在九月中旬攻占广西的桂林和柳州已不现实，于是大本营对“一号作战”计划进行了修订：广东方向的第二十三军

于九月上旬自西江两岸发动攻势，向西挺进，攻占广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梧州附近地区，十月下旬前完成攻击柳州的准备；湖南方向的第十一军于九月下旬从衡阳附近发动攻势，向西南方向挺进，攻占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的全州，在十月前完成攻击桂林的准备。十一月，第二十三、第十一军发动包围攻势，捕捉中国第四战区主力，攻占桂林和柳州，视情况向贵州境内实施追击。而后，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攻占广东韶关，彻底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同时，第十一军攻占南宁，打通通往法属印度支那的国际交通线。

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战场，蒋介石既要面对日军从中原一直打到西南的贯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还要面对中国军队深入缅北和滇西打通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作战，东西两面危难的战局令重庆军事委员会处在了腹背皆需苦战的境地。

早在日军围攻衡阳时，白崇禧就曾提醒蒋介石，日军攻下衡阳后必向广西继续推进，以便在占领平汉路、长衡路控制粤汉铁路北段后，打通湘桂、粤桂二线控制粤汉铁路南段。白崇禧认为，桂林城石山环绕，有很多岩洞可以藏兵，以抵御日军的炮击或轰炸；且当年为防止长征中的红军进入广西，桂军在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修筑了不少坚固工事。所以，广西是可以守一下的。只是第四战区兵力不够，须第七、第九战区与之联合作战。蒋介石立即命令军事委员会拟订桂柳作战计划，同时命令第四战区迅速调动部队前往湘桂交界处的全州和黄沙河一线准备阻击日军。八月二十四日，桂柳作战计划颁布，至少从书面上看三个战区是联合行动的：

第一期（敌未突破衡阳以西我现设主阵地以前）

一、第九战区：

（一）湘江以东各军，就现态势续行攻夺要点，牵制消耗敌人，并相机击破之。

（二）湘江以西各军，调整如次：

.李玉堂（归王耀武指挥）指挥第三十七军（该军主力刻在湘江东岸）、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第四十六军之新编第十九师及彭璧生部，以有力一部，于现阵地占领前进阵地与敌接触；其主力于茅洞桥、新桥之线占领主阵地；并抽调一部于鸡笼街附近，积极整备，构筑预备

阵地。但第三十七军之主力，应暂控制于松柏西南地区，与主阵地之右翼联系。

.王耀武直辖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

（ ）第七十四军（欠第五十七师），以一部于现阵地占领前进阵地与敌接触，其主力于新桥以北蒸水西岸占领主阵地；并控置于金兰寺一带，积极整备，构筑预备阵地。第五十七师到达邵阳后，择要构筑工事，积极整补，准备作机动使用。

（ ）第一〇〇军，以一部攻击永丰东南之敌，其主力控置于界岭一带（永丰、邵阳间），积极整备，构筑预备阵地。

（ ）第七十三军，以原态势向敌攻击。

（三）第四十六军，先抽调控置部队一个师，集结于柳州，并担任柳州之防务，其余一个师（新编第十九师），仍在现地服行原任务，与敌保持接触。

（四）湖南作战各军，除服行原任务外，应以小部队为单位，附必要工兵及爆破器材，编成多数之游击队（每军抽调之兵力，不得超过二个团），采取避实击虚战法，轮番袭击敌之水陆交通，并与空军配合，使敌补给困难。

二、第四战区：

（一）第四十六军之一个师，调柳州后，将第三十一军（欠第一三五师）移至桂林，担任固守。

（二）第九十三军，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州。

（三）南宁以南各部队，防守现阵地，继续加强工事。

（四）发动地方武力，积极予以组训，并分别酌设机构，俾收统一指挥之效。

（五）南宁、郁林（玉林）以南各公路及敌可利用之交通线，应继续发动民众彻底破坏之，并切实疏散各交通线之壮丁及粮食、物资，加强坚壁清野。

（六）扩修独山机场，俾我空军始能发挥威力，由航空委员会另拟办法呈核。

三、第七战区：

（一）以现态势防阻敌人（即在粤汉路南段者，以主力利用南北各山险及既设阵地，持久作战），以六个团兵力（必须以一个建制师为骨干），固守曲江。

（二）依状况先抽调两个师，秘密开赴连山、梧州构筑工事，并固守之。

第二期（敌突破衡阳西侧我现阵地后大举侵桂时）

一、第九战区：

（一）李玉堂所率第三十七军，转移湘江西岸，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及彭璧生部，转移湘桂路以南地区，而王耀武直属各军，则在湘桂路以北地区，并以邵阳为根据地（须以有力一部固守之），积极夹击，侧击西犯之敌。

（二）其他第九战区各部队，亦应于公路西侧攻击敌人，予以牵制消耗。

（三）游击部队，继续袭扰困疲敌人，并断其后方补给交通。

二、第四战区：

（一）第九十三军之任务，以一部占领黄沙河，以主力死

（二）敌如钻隙深入桂林附近，则适时抽调第四十六军及第七战区转用之两个师，协力守军包围而歼灭之。

（三）南宁以南各部队，采机动战法，但如可能，仍依既设坚固工事，极力拒止敌人，俾能确实掩护柳州以西我后方交通。

（四）越北敌如犯河田路，则以桂绥独立第三团（主力在龙州，一部在靖西），向田东逐次转进，阻击敌人。

（五）利用地方武力，配合正规军，积极打击敌人。

三、第七战区：

（一）准备以一军长率领两个师，适时参加桂林决战。

（二）梧州仍留一个师固守之，并另以西江两侧之挺进部队及地方团队，准备攻击沿江西进之敌。

日军第十一军围攻衡阳时，蒋介石曾调集中国军队的五六个军驰援衡阳。衡阳之战结束后，日军为进一步攻击广西，其第三十七师团八月中旬从长沙向西南直扑邵阳；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则分别渡过湘江和舂陵水直扑常宁及其以西的白水；衡阳附近的第四十师团和第八师团则沿着湘桂铁路向西攻击——日军第十一军试图扫清聚集在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把攻击前锋推至广西边境。重庆军事委员会立即命令王耀武的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〇〇军，从湘江以西战场向湖南中西部的新化地区收缩，以守护川黔门户；命令湘江以西的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沿着湘桂铁路逐渐西退，节节阻止西进的日军，为第四战区的战备赢得时间。

九月八日，第七十九军退到湘南与桂东北交界处的东安、冷水滩一线，试图迟滞日军第十三师团的推进。日军一部装扮成中国官兵，与便衣队一起迂回到第七十九军军部附近，军长王甲本命令第九十八师奋力抗击，同时率领军部人员迅速转移。九日拂晓，第七十九军军部和手枪排行进到红炉寺与东安之间的山口村时，突与日军遭遇。王军长走在警卫营的前面，后面的部队距他还有二三百米，当他看见前面出现了日军时，由于日军身穿中国军队的军装，王军长误认为是友军，继续前行，距离日军数十米才发觉情况不对，随即拔枪射击，当面日军的机枪子弹密集地飞来，手枪排官兵在激战中全部阵亡，王军长和副官多处负伤——“旋有敌兵三名，用刺刀和大刀将军长王甲本砍死。随即我后续部队赶到，将敌击退。”

四十三岁的军长王甲本是云南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四期炮兵科，加入滇军部队参加过北伐诸战役，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任旅长、第九十八师任师长，其间毕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甲本率部抗敌，屡建战功，曾率第九十八师与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安徽宣城联合痛击日军。连续三次参加长沙会战，第二次会战中率部阻击日军两天三夜，战后被誉为“硬战将军王甲本”，不久晋升为第七十九军军长。

十三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四联队推进到湘桂交界处的黄沙河附近——“重庆军抵抗微弱，第一线中队轻而易举冲入敌阵地。然而，阵地主体为以混凝土构筑并有带掩盖的火力点，联队长当时说‘真是精心构筑’，但又多少有些不解，重庆军似乎预先完全不知我军前进，而配备也未完成，络绎不绝由我占领阵地的后方部队到来，不断出现茫然呆立不抵抗的士兵。”同一天，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野战炮兵第三联队，沿着潇水河岸和河岸以西的山地向南推进，虽然沿途遭到美军战机的反复轰炸，还是攻占了从湘南进入桂北的交通要冲——道县。

这一天，白崇禧对广西防御作出如下部署：第九十三军推进到湘桂交界处的全州布防，没有命令不得撤退；第六十二军和第七十九军继续在湘桂铁路沿线阻击日军；第二十、第二十六军速向道县前进，由南下日军的侧面止敌进犯，并准备参加桂柳决战；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集结在桂林以及附近地区，构筑工事，准备死守。同时，白崇禧要求广西全省动员，扬民风强悍之风，编出五万人的基干力量，并向蒋介石申请装备和军饷，为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各编出一个补充师，再另成立两个独立纵队。白崇禧的理由是：一旦增援部队不能如期抵达，“这些部队可以立即参加战斗”。鉴于广西岌岌可危的局面，蒋介石要求军事委员会按照白崇禧的要求如数交拨。

然而，白崇禧的部署尚未落实，就传来了全州失守的消息。

全州为防御桂林和柳州的前沿，陈牧农的第九十三军奉命利用国防工事固守三个月。但是，当日军第十三师团越过黄沙河后，第九十军的警戒部队稍事抵抗即行撤退。日军趁机向第九十三军防线的侧背迂回，陈牧农指挥部队打了一夜也后撤了。有史料显示，第九十三军的撤退令，是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达的，理由是全州的侧背与后方联络线均受到了威胁。第九十三军沿着湘桂铁路，撤往桂林以北的大溶江。日军第十三师团的前锋，是第一〇四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该中队向前进行武力搜索时，发现中国军队布设的防御阵地十分坚固，以洞穴碉堡为中心纵深竟达四公里，阵地前还有数道铁丝网和一些坦克。但是，阵地四周一片寂静。中队长宫本学大尉判断：中国军队很可能已经退却，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设有圈套。于是潜入全州县城——“城内并无重庆军，只在路上见到不久前像是敌军本部的地方，内有凌乱桌椅等物。宫本大尉证实敌已退却，立即以无线电报告联队，并扫荡了城内。”九月十四日，日军占领全州。

全州是进出湘桂两省的军事隘口和险要孔道，第九十三军的不战而

退致使广西面向湖南的门户洞开。

之前，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曾电呈重庆军事委员会，详细报告了他的部队在全州构筑工事、周密设防的情况：

（一）全州附近情形，刻黄沙河已构筑之工事，职已亲赴各实地视察完毕。

（二）以固守全州附近，遵构四个团之工事，已于二十六日开始构筑。

（三）工事配备，自全县车站北方之金背岭，亘东南地区经白竹塘、蛇公坝、龙眼塘……蒋家、西瓜坪、雷公岭之线，构筑闭锁式子母堡之主阵地。在主阵地带前方三公里内，扼要构筑警戒阵地；在主阵地带内方及车站附近，沿城西南各高地至雷公岭四周，构筑核心工事……

（四）兵力部署拟以新八师全部固守主阵地带及核心，以第十师之四个营附战防炮一排，守黄沙河。该师主力将控制于全州车站以西地区为预备队，准备由铁路两侧阵地前方出击。

（五）粮弹集积已开始准备中。

蒋介石立即批复："发给军临时费洋五十万元，准该军实报实销可也。"——事实是，第九十三军既没有严阵以待，更没有全力阻敌，陈牧农的报告随之成为一纸空文，国民政府拨出的经费也随即付诸东流。

蒋介石震怒，命令将陈牧农就地正法。

有人认为，陈牧农当时应向张发奎要一纸命令，以便事后证明第九十三军的撤退是奉命而为。可陈军长说，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怎么能对长官的命令索要证据呢？——陈牧农认为，张发奎必会出面向蒋介石解释，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必死无疑：

张发奎派一个军官带着宪兵乘坐吉普车向大溶江附近第九十三军军部驶去，说是要接陈牧农到柳州去开会。听说陈牧农的部下有人提醒他不要去，陈牧农认为他是按照长官的指示行动的，为什么怕去见长官呢？不去反而不好。可是吉普车并没有把他带去柳州见张发奎，而是到桂林后就送到桂林防守司令部交给韦云淞执行枪决。韦云淞叫总务处长韦士鸿去对陈牧农说明奉司令长官（张发奎）转委员长（蒋介石）的电

令，因为他“擅自撤退”，由桂林防守司令枪毙他。“以昭炯戒”！并问他对部队有什么话要交代，对家属有遗嘱没有。陈牧农说：“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他还能说什么呢？蒋介石不叫把陈牧农押解到重庆去交军法审判，张发奎也不把陈牧农带到柳州去交军法审判，而是交给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执行枪决，是因为交军法审判，蒋介石怕张发奎所玩弄的把戏就会被揭露出来。同时，杀一个陈牧农来警戒韦云淞及桂系防守桂林的部队，要桂系部队只能“死守”，不能逃跑。

桂柳会战刚刚开战，中国军队就死了两位军长。

杀了军长就能挽回部队消弭的战志吗？

全州失守，导致桂林暴露在日军面前。

十七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炸毁了桂林机场的跑道以及其他航空设施，从桂林撤往昆明。

从湖南、广东以及雷州半岛三个方向侵入广西的日军，一路不停，昼夜猛进：日军第十一军占领全州后，主力集结在全州、道县地区准备进攻桂林。同时，为消除侧翼的威胁，在湖南南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在第一一六师团一部的策应下，击退中国军队第一〇〇军的阻击，二十七日攻入邵阳；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击退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而从广东向广西推进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其第一〇四、第二十二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沿着西江两岸平南地区攻击前进，另以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攻取平南南面的丹竹机场。第四战区在这一方向上兵力薄弱，仅有第六十四军的两个师。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兵分三路合围梧州：沿西江北岸推进的第一六一联队攻占德庆；第一三七联队占领梧州，该联队的第三大队击退中国军队第一三五师的阻击，二十八日攻取丹竹机场沿西江南岸推进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二十四日攻占罗定，二十五日攻占郁从雷州半岛出发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二十二日攻占容县，二十八日攻占平南。——自此，广西东部所有的军事屏障全部失守，桂林和柳州均已处于日军的刀锋之下。

长期懈怠的中国第四战区，仍在忙于回防广西的军事调动：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的第二十军在道县附近与日军接触，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正向湘桂边境的龙虎关、恭城靠近；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指挥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负责桂林外围和城内固守；第九十三军移至义宁附近，暂归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

堂指挥，与第七十九军一起参加桂林保卫战；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指挥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集结在位于桂林东南、柳州东北的平乐附近，作为战区机动部队。——以上部队，大多刚从湖南进入广西，久战之后官兵疲惫，行动缓慢，士气不佳，因此均没能按时赶到预定位置，对日军向桂林和柳州的逼近没能起到阻挡作用。

十月九日，鉴于整个广西的危局，第四战区把能够指挥的部队编成四个兵团：桂林方面军，由夏威任总司令，指挥第四十六、第三十一、第九十三、第七十九军，其中一个军守桂林，两个军守桂林外围防线，一个军布防桂林以南；荔浦方面军，由杨森任总司令，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以及湘桂地区游击部队，以一部袭击南下日军的侧后，一部在荔浦以南经二塘至柳州一线担任警戒，主力配备在平乐、荔浦以及新圩地区；西江方面军，由邓龙光任总司令，指挥三个师、一个团和两个纵队，配置在桂东南的桂平、大湟江口地区；战区直辖兵团，由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军组成，控制在柳州以及柳州至荔浦以北地区。——面对日军的三面合围，第四战区除了分兵把守之外，没有任何作为。

冈村宁次的部队尽管推进顺利，但官兵们普遍心情不佳。一是天气变得恶劣起来，秋雨比往年来得都早，连绵阴雨“已经超过两旬”，道路泥泞，人马不堪其苦，饥病交加，部队“必须走遍从未经历过的极端难行的道路”。二是太平洋战局恶化的消息不断传来，大本营甚至向冈村宁次提出警告，千万“避免重蹈英帕尔覆辙”，一定要确保后方补给的畅通到位。而冈村宁次反倒因此更加坚定了寻找挽救败局突破口的决心。

十月十一日，冈村宁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第十一军应于十一月三日大致从道县、全州一线出发攻占桂林，然后与第二十三军互相呼应，攻占柳州。攻柳州时无需注意夺取城市，应以军主力从柳州北方地区深入柳州西部地区，向敌背后挺进，与第二十三军相配合，围歼敌主力。

二、第二十三军十一月三日以后，大致从三江圩（柳州东南偏南一百一十公里）、桂平（柳州东南偏南一百四十公里）一线出发，以一支兵力攻打柳州，以主力向柳州西北地区挺进，策应第十一军围歼该方面敌军主力。在此期间派一支兵力做好攻占南宁的准备。

冈村宁次下达作战命令的这天，从雷州半岛一路北进的日军独立混

成第二十三旅团强渡黔江，于十月十二日攻占桂平和蒙圩；从广东出发沿着西江一路西进的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一部，从丹竹机场出发逼近平南以西的大湟江口。——日军已经接近了桂柳战场的侧背。

面对日益紧迫的敌情，第四战区不得不改变策略，制订出一个反击计划，其核心是：集中主力歼灭从广东进犯的日军，以解除对柳州侧背的威胁，得手后再转进桂柳方向与日军决战：

一、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柳州空军基地之目的，决以有力兵团于荔浦、桂林各附近地区，拒止湘桂路及龙虎关方面之敌，以优势兵力集结于武宣东南附近地区，先击破进犯西江之敌，以利尔后作战。西江方面会战日期，预定十月二十日以后。

二、敌如以主力向西江方面进犯时，集结有力机动部队于武宣、来宾以南地区，乘敌进出浔江、郁江北岸，兵力分离与态势不利之际，即取攻势，一举而击破之。此时荔浦及桂林方面军，各拒止当面之敌，极力迟滞敌人，俾西江方面之作战顺利。但荔浦方面军应以有力一部，策应西江方面之作战。

三、敌如以主力向荔浦方面进犯时，应在平乐、荔浦、阳朔间地区，竭力拒止敌之进犯，并予迟滞消耗。不得已时，应确保修仁隘口。

四、敌如以主力向桂林方面进犯时，外围军应协力防守军，极力拒止敌之进犯。不得已时，以有力部队确保永福隘口。在敌采取上述二三项行动时，西江方面于集中完毕后，索敌而击破之。

五、如敌在西江、荔浦、桂林三方面同时进犯，并以有力一部由越南分向歡龙路进犯南宁及田靖路时，蒸浦及桂林两方面，极力拒止敌人之进犯，另集结并转用有力兵团，先击破西江方面之敌。靖西、南宁两指挥所，指挥地方团队，利用地形，极力拒止敌之进犯，依情况转用有力一部，击攘该方面之敌，确实掩护黔桂路，以策后方安全。

……

第四战区的御敌方案，犹如典型的中国式官样文章：在一系列“如果”之后，皆为笼统的以“有力一部”拒敌进犯。——虽然难以落到实处，好处却是无论胜败部署都没错。可对于中国军队而言，“有力一部”到底是谁？前出到哪里拒敌是最佳位置？采用正面强攻还是两翼包抄？主攻是谁协同是谁策应又是谁？此时，冈村宁次的部队在攻击方向上没有先

后主次之分，是明显的多路同步向心突击。即使如同第四战区的判断，广东方向的日军为突击先锋，那么把中国军队的主力集中于这一路，即使能打上一阵子，想必这边还在打的时候，那边的日军第十一军早已突到桂林城下了。第四战区的御敌方案等于什么也没说，只有“不得已时”，也就是无法拒敌进犯时，那些必须要守的“隘口”倒是说得很具体。所有的将领都很清楚，这实际上是在指示脱离战场时的路线或方向。

广西之战，是中日战争的一个典型缩影：中国方面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停留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简陋状态。只是，中国第四战区置湖南方向的日军第十一军于不顾，把局部反击对象选定为从雷州半岛过来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这既出乎了冈村宁次的预料，也令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有些措手不及。

位于广西东南部的桂平，处于黔江与郁江的合流处，是从南面屏障柳州的战略要地。该城的北、东、南三面环水，西面则是连绵的高地，而西南面的蒙圩则是卡在贵县（今贵港）到桂平公路上的交通要点。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占领桂平和蒙圩后，独立步兵第一二九大队（野野木大队）、第一二八大队（谷村大队）和第一三〇大队（竹之内大队）开始构筑阵地，准备参加北上攻击柳州的作战。他们没有预料到会遭遇攻击，因为根据情报显示，当面只有从桂平撤下来的中国军队第一三五师一部。

十月十九日，鉴于第六十四军主力已抵达反击战场，第四战区随即下达了作战命令：第六十四军和桂绥第一纵队附炮兵部队，反击桂平和蒙圩；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和桂绥第二纵队向平南和丹竹出击，迟滞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的推进；第四十六军（欠第一七〇师、新编第十九师和一个炮兵连）附第三十一军第一八八师向反击地域推进待命。

十九日，天刚蒙蒙亮，日军野野木大队的阵地正面突然落下密集的炸弹和炮弹，中美联合空军的多架战机以及第六十四军的火炮开始了火力突袭。蒙圩四周都是农田，日军依村庄修筑的据点“立即为猛烈的炮火硝烟所笼罩，一片农田瞬间化为黑色。在此之前，附近曾是一派翠绿的菜田。野野木大队虽在各个阵地奋力防御，但第一线当天即被突破”。掌握着战场制空权的中美联合空军，给与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以严重杀伤，旅团指挥部与上下级之间的通讯联络被炸断，野野木文雄大队长被炸成重伤。“二十日夜，旅团长下河边宪二少将指挥竹之内大队主力（步兵两个中队）向蒙圩前进，二十一日拂晓到达该地东北端，但因敌机猛烈轰炸未能进入蒙圩，在山脚下隐蔽了一天”。晚上，第六十四军

对蒙圩形成了包围态势，日军第一三〇大队大队长竹之内繁男组织反击，两军在桂平西侧的高地上混战一夜未分胜负。

二十二日，天色阴沉，第六十四军军长张弛决心不等空军助战，命令部队出击。在炮兵的掩护下，桂绥第一纵队攻占新德村一线，当面日军向后退守。第一五五师和第一五九师也击垮了当面日军。下午，天气转晴，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来了，但日军吸取教训把阵地设在隐蔽的山地中，致使来自空中的轰炸效果不佳。晚上，经过激战的双方形成对峙。

二十三日，第六十四军各部队逐渐向蒙圩压缩，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指挥部撤到数里之外，并开始动员勤杂官兵确保后方安全。第一三〇大队第一中队刚刚攻占桂平西南十公里处的新安山，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就来了，中国官兵急忙铺设对空标志，竹之内繁男立即命令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射烟幕弹，结果导致战机将炸弹扔在了中国官兵头上。一阵混乱后，中国官兵对新安山日军阵地发动了凶狠的袭击，第一三〇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被打死，全中队最后逃出阵地的官兵不足二十人。

因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对外联络的中断，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一无所知，第二十三军的后续部队还在按预定计划向前推进。中国军队第一八八师的一个团和第六十四军的一个师奉命前去阻击，以掩护反击战场的侧翼。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第八十五联队派出的先头部队，试图与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取得联络，但在桂平附近被中美联合空军发现，遭到轰炸后绕道前行，结果在蒙圩附近被卷入中国军队反击的旋涡。日军的这支先头部队没带任何工具，仓促中只能用饭盒挖掘掩体，但每隔半小时就有战机对其轰炸，日军很快坚持不住开始溃退。——第二十二师团这才知道，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正在遭受围攻。

从二十四日开始，中国军队继续对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实施压缩。被炸成重伤的野野木大队长被抬下战场，在一个山洞里继续指挥作战，但该大队的阵地还是相继失守，躺在担架上的野野木心情焦躁：旅团的对外联络中断，目前部队各自为战，官兵对中美战机的轰炸十分恐惧，当面中国军队重炮的射击精准度也令他们惊慌失措。二十六日，中国军队再次发动攻击，第六十四军一部冲入蒙圩，在残垣断壁中与残存的日军展开巷战。但是，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从第六十四军的右翼靠近了蒙圩，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也从黔江方向开始攻击中国军队第一五师和桂绥第二纵队。

二十八日，鉴于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的靠近，统一指挥反击作战的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决定停止攻击，命令第四十六军接替第六十四军继续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周旋，第六十四军则紧急向柳州以南、桂平以北的武宣方向移动以阻截日军。——战后资料表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最严重的是弹药告罄，迫使“旅团长以下，造竹枪准备突击，但中国军未能乘机予以歼灭”。

天气恶劣，山洪暴发，道路一片汪洋，当第六十四军官兵冒雨抵达武宣时发现为时已晚。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试图绕到中国军队的背后，但他们必须通过险要的大藤峡，中国官兵长途奔袭扼守要道令日军难以逾越。于是，第一〇四师团绕路大瑶山，穿越荒无人烟的山岭，沿途再次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日军“计战死者约八十名，负伤者约一百名。战死者中有第三大队大队长难波正六少佐。自本作战开始以来，该少佐在联队战斗中经常奋勇当先，积极作战，铃木师团长等对其战死甚为痛惜。此外，联队长上野源吉大佐、第一大队长高柳克已少佐亦负伤”。十一月四日，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终于绕过中国军队，攻占了桂平以北的重要支撑点武宣。

暴怒的白崇禧下令把负责据守武宣的团长曹震枪毙了——如果枪毙个军长，需要向蒋介石打招呼，枪毙个团长他还是能独断的。

就在白崇禧枪毙曹团长的时候，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在付出了战死两名大队长的代价后，攻占了武宣南面的贵县。

武宣位于桂平和蒙圩的西北方向，贵县位于桂平和蒙圩西南方向，两地的失守令中国反击部队的左右两面侧背都有了日军。

此时，在战场的北面，横山勇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第五十八、第四十、第三十四、第十三、第三、第三十七师团，沿着湘桂线一路南下，已全面逼近桂林。

中国第四战区随即决定：放弃桂平和蒙圩的反击作战，调集部队保卫桂林和柳州。

中国第四战区对桂平和蒙圩的反击，虽在付出极大伤亡代价后重创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但从战场全局上看，反击作战顾此失彼，导致了广西战局的急转直下。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六方面军下达命令，决定采取正面佯攻、侧翼迂回的战术向桂林发动全面进攻。

桂林盆地，居越城、九岭、苍梧诸山间，民国后为广西省府，人口十余万。全面抗战爆发，随着难民的涌入，人口增至六十余万。桂林城区地势平坦，道路纵横，湘桂铁路和公路经此直达柳州。桂林城外石山林立，岩洞幽深，桂军利用这些天然岩洞修筑的环城堡垒，可以抵御一百毫米加农炮弹和五百磅航空炸弹的攻击，其中漓江东岸的七星岩堡垒更是坚固且强大，岩洞里储备的粮秣弹药可供半年使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桂林视察时，白崇禧曾向华莱士夸口说，桂林是“东方的凡尔登”，守上半年绝对没问题。

白崇禧任命桂系宿将、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总司令。他之所以向蒋介石推荐韦云淞，是因为一九三〇年桂军和滇军打仗时，韦云淞率三千桂军死守南宁三个月，守军把城里的存粮吃光后用黑豆充饥，直到白崇禧在柳州训练的部队前来反攻，最终才挫败三万滇军保住桂系的地盘。桂军一直以死守南宁为荣耀，把韦云淞的部队在南宁开始吃黑豆的那天，称为“黑豆节”。——白崇禧要求韦云淞发扬桂系的“黑豆精神”，死守桂林。

只是，桂系的将领们发现，蒋介石命令桂系死守桂林，命令粤系死守柳州，而那些中央军的部队却在贵州境内整训，大家都明白这是蒋介石有意在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桂系将领们还认为，现在与从前不一样，对手是异常凶狠的日军，而且是日军的六个主力师团，无论是桂林还是柳州，守住的可能性很小。韦云淞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防守司令部，却发现没人愿意跟着他一起守桂林，最后还是桂系老将陈济桓自告奋勇愿意出任——当年他曾是韦云淞守南宁时的副手。可重庆军事委员会认为，陈济桓的资历不能担任防守副司令，因为防守司令部指挥的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的两位军长都是中将，他们不会接受同是中将的陈济桓的指挥。同时认为，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是少将级别，要求受过参谋教育且有学历，陈济桓不但已是中将，还没有什么学历，因此也不适合当参谋长。最后，韦云淞以桂林防守司令部的名义，向陈济桓颁发了一个“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

即使这样，韦云淞和陈济桓上任后，很快就感到又不对劲了。

第四战区原定的计划是：桂林城防任务由第三十一、第四十六、第九十三军担任，其中第三十一军守卫城区，第四十六、第九十三军配置

在桂林外围西北方向，面对从大小溶江而来的日军，利用与桂林城防相衔接的“袋形”阵地，以东西两翼的迂回包抄歼灭企图攻取桂林的日军。

接下来，令谁都没想到的是，战前讨论桂林防守计划时，白崇禧坚持要以外线作战为主，也就是说留下一部分部队守城，另外的部队则须调到外围去。他一再强调，保住桂林不在于城防战，而在于外围与日军的决战。几乎所有的桂系将领都明白，不要说内外结合，就凭现在这点兵力，全力守城都成问题，那么，白崇禧坚持这一主张，里面肯定有他的小九九。果然，白崇禧下令把第四十六军军部、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以及第三十一军第一八八师调出，留下的守城部队是：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以及第四十六军第一七〇师。如此乱七八糟拆散建制的调动，引起桂系内部的舆论大哗，但将领们立即明白了白崇禧的小九九是什么：首先，白崇禧一直想把桂系中这两个最强的师扩编为两个军，以壮大实力，为此他连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都置办好了，藏在蒙山附近的山洞里；二是，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而第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是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外甥，无论白崇禧还是夏威都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外甥死在桂林城里；三是，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为了能离开桂林，利用与海竞强拜把子的关系以及曾在白崇禧身边当过幕僚的经历，临战之际使自己化险为夷，而被留在城里的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虽为桂系将领，但他不是广西人而是江西人。

有人提醒张发奎，说如果放任白崇禧这么干，桂林一旦失守，他作为战区司令长官难逃罪责。张发奎无奈地说：“反正是广西的事，广西的人，我何必得罪他们，即令桂林失守，究竟谁负责任，自有公论。”

白崇禧把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第三十一军第一八八师以及第四十六军军部调走后，整个环绕桂林城的防御阵地，只能由两个师近两万人来防守了，而日军进犯桂林的兵力是三个师团。韦云淞不得不缩小防御圈，依据桂林的地形，东、南、北三面实在不能放弃，放弃就等于迎敌而入，于是只好把西面的主阵地向里收缩，修好的工事由于无兵防守统统炸毁。负责守城的第一七〇师和第一三一师，刚刚补充了大量新兵，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就连桂林防守司令部、第三十一军军部以及两个师的师部，所能控制的预备队也只有各自的一个营。这时候，连美国人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驻桂林防守司令部的美军陆空联络官坚持要离开桂林，他们的说法是：“死守在城里等敌人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韦云淞命令第一三一师防守桂林城北及其附近要点，命令第一七〇

师防守桂林城南及其附近要点。他还要求强迫疏散桂林全城居民，私自留在市内者以汉奸论处；他同时要求美军配合，将桂林以北的公路和桥梁悉数炸掉。然后，韦云淞苦心孤诣地制订出一个防御方案：

防守军以确保桂林之目的，以主力固守城北要点及杉湖、榕湖以北城区为核心阵地；以一部固守近郊各要点，掩护核心，采取持久防御，吸引胶着敌人于桂林近郊，俾与我外线兵团协力合击敌人而歼灭之……

敌无论从任何间隙突入，皆应以逆袭手段，消灭敌人于阵地内，非至万不得已绝不使敌达成缩小包围之目的。战况纵使惨烈至最高度，非但核心阵地内各要点，必须绝对固守；即近郊之独立支撑点，亦必以小部队固守不弃。于敌攻击准备或对峙期间，应相机派小部队出击敌人，以消耗敌之兵力，妨害敌准备，争取主动，但须讲求减少损害之法，勿使本身兵力做无益之消耗，期能持久。

若我外线兵团得手，除核心各要点留置必要之部队外，应以主力夹击敌人，以达成歼灭敌人，确保桂林之目的……

韦云淞的作战计划充满了悲壮气氛。

可无论当时还是战后看，这一“持久防御”计划等同于一纸空文：此刻，外围部队大多被抽到桂平和蒙圩反击作战方向，桂林已成一座孤城，在日军巨大兵力的围攻下，城市防御战很快就将以惨烈的方式演变为城破人亡。

二十九日，日军以近三个师团的兵力开始攻击桂林外围。

蒋介石接到的战报中充斥着“反复肉搏”“愈趋惨烈”的描述。三十日夏威电：“……高上田以西敌增至六千，高上田东南铁坑方面敌增至二千余，遂于铁坑、桃子隘、大岩岭、五里亭、长冈岭等要点，发生壮烈无比之争夺战。我九十八师二九四团步兵两连及铁坑之新十九师两连，全部殉国，其他各部自营长以下伤亡亦重。五里亭九十八师指挥所及长冈岭纵队指挥所附近，均激战。七十九军工兵营迄直属队，亦加入战斗反复肉搏，拼死抗拒。该两三日大雨不停，山雾弥漫，我空军不能到前线助战，敌攻击更猛。”

十一月一日张发奎电：“海洋圩附近四十四师当面之敌千五百余，炮六门，分向四六〇高地及亘字山一带阵地钳形猛攻，战斗愈趋惨烈。该线阵地曾数度失陷，经反复冲锋，终以夺回。是役我伤营长张秉乾，连

长张思三、杨连云，排长史关文、任子康、阎中山、张连荣、杨维贤等八员。阵亡排长彭源生一员，伤士兵六十九名，阵亡五十名。”

二日，抵达城北的日军已达万余人，伪军部队也出现在攻击前沿。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竟日轰炸扫射，但并没有令日军的攻击强度降低。晚上，桂林城垣四面都发生了激战，整座城市已被日军严密包围。由于桂林城的北面和西面均为山岭绝壁，日军数度猛攻没能得手。城南的斗鸡山以南虽为开阔地，但中国守军埋设了大量的地雷，日军只好驱赶着数百头耕牛踩踏雷区，然后跟在牛群后面发起集团冲锋。桂林东面的防线，孤悬在漓江对岸，成为日军的突破口。四日，日军发射了毒气弹，之后猛攻七星岩、星子岩阵地，“双方死亡枕藉”。而在象鼻山阵地前，日军使用的燃耗弹将守军堡垒燃成一片焦土。五日，桂林东面防线被日军突入。六日，大雨。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没能起飞，但日军的战机却飞来助战，向桂林城内投掷了大量炸弹。中国守军向星子岩反击失败，城东北的猫儿山守军被日军包围。在重炮的支援下，日军迂回到山后攀登至山顶，守军连长黄英波率部与日军肉搏，全连官兵阵亡，猫儿山陷落。日军趁势向七星岩一线猛扑，七星岩各岩洞里的中国守军凭险死守，日军用平射炮轰击岩洞口，再向岩洞里投掷手榴弹。七星岩守军试图从岩洞后面出口突围，被日军发现，大部阵亡在洞口处。最后，日军向岩洞内施放毒气，半个小时后岩洞内没了声息，死于洞内的中国官兵达八百余人。日军攻占七星岩后，连日以重炮轰击桂林市区，致使城内房屋“焚毁殆尽”。

七日上午九时，桂林城北，日军在重炮和坦克的支援下攻击城垣，平头山方向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城东屏风山守军伤亡惨重，黄昏时分阵地陷落；在屏风山以南，普陀山阵地陷入混战，天黑后守军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围城的数万日军全部聚集在桂林城下。

桂林陷落的结局已无法逆转。

更严重的是，日军第十一军一部竟然绕过桂林直奔柳州而去。

桂林城破在即，日军又向柳州杀来，中国第四战区紧急下达了“第三号作战命令”。——从内容上看，这一命令是在部署于桂林和柳州之间与日军决战，但实际上是迅速从桂林前线全面撤退的指令：

一、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黔桂路之目的，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桂、柳，主力沿红水河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吸引敌人于柳州近郊，

转移攻势而击灭之。

二、第三十五集团军，指挥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及第十六集团军之桂绥第二纵队为右兵团，以有力一部沿红水河北岸、柳江西岸守备要点；并以一部于红水河南岸地区掩护通宜山要道，主力在良塘乡、穿山附近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适时控置有力一部，准备策应各方面之作战。

三、第二十七集团军，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及第一八八师为中央兵团，以主力固守柳州，非有命令不得撤退；以有力一部于柳州以东地区联系右兵团，及以北地区联系左兵团，拒止进犯之敌；必须确保柳江西岸要地，以掩护黔桂路及宜山之安全。

四、第十六集团军，指挥防守桂林之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第一七〇师及第九十八师编并之一团）、第七十九军（欠第九十八师编并之一团）、第九十三军及新编第十九师为左兵团，以桂林防守军固守桂林，其余联系中央兵团在太平乡、三皇乡各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以一部掩护百寿通长安镇之要道。

五、各兵团战斗地境（略）

六、第四十六军（欠第一八八师），控置于三都附近，以策应各方面之作战。

七、各兵团应于十一月十日前完成部署。

上述命令下达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了柳州。

各部队接到命令尚未重新部署，便发现撤退的后路上已出现敌情：日军第十一军第三、第十三师团接近了柳州；第二十三军攻占象县（今象州）后，突破中国守军第六十二军的阵地占领来宾，现正向北推进逼近柳州。而柳州一线的中国军队，只有从桂林急行军赶来的第二十、第二十六军，以及经象县撤到柳州以南的第三十七军。

横山勇下达了对桂林实施总攻的命令。

日军的攻击从第四十师团强渡漓江开始。

一九日凌晨，日军第四十师团集中起所有的火炮，猛轰漓江对岸中

国守军的江边阵地，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第四十师团炮兵组要猛射桂林城东江边的全部正面，第十一军炮兵的一百毫米和一百五十毫米加农炮也一齐开了炮。一百毫米加农炮部队（十二门）首先一分钟两发集中射击了三分钟，一百五十毫米加农炮（十六门）则各射击二十发。城内瞬间化为火海；老人山背面浓烟冲天。师团长宫川清三中将回忆说：‘十分钟的野战重炮射击非常壮烈，好似万雷轰鸣不稍间断的猛烈射击。我出身于炮兵学校，也未曾见如此情景。但在这时，桂江（漓江）西岸的重庆军一枪不发，坚持沉默，当射击停止时，真像死一般的寂静，不管是谁都会怀疑重庆兵的存在。”

日军第二三六联队第一大队第十二中队乘坐三十艘登陆艇强渡到漓江对岸，刚刚发出登陆成功的信号弹——此时第十一中队乘坐的登陆艇正好渡到漓江中央——突然，对岸中国守军的炮火朝着登陆艇开始了猛烈轰击，“第十一中队虽然向大队呼叫要求掩护射击，但已无可能，该中队在江中好像是被抛弃的孤儿了。”中国守军乘机向登上西岸的日军大举反击，日军两个强渡中队的残存官兵编成临时战斗小组，但是“山本中队长在山脚下，全身被射进十多发机枪子弹而死。泷口曹长挥舞战刀鼓励第二小队与联络下士官一同向重庆军阵地冲锋，也战死。只剩下了坂本信男少尉代理中队长指挥”。天亮了，漓江岸边漂浮着日军官兵的尸体——“江水染红，说明昨夜凄惨的苦斗。”

日军第四十师不断向渡口增援，登上岸的官兵突破中国守军的防御阵地，冲入桂林市区。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在炮兵、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连续攻占城北面的虞山、凤凰山、扁崖山各据点。防守南城的中国守军第一七〇师动摇，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不幸与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遭遇，被俘千人，后面的部队又退回城内。与日军短兵相接的第一三一师，在城内核心阵地奋力苦战，但众寡悬殊，死伤累累，残部奉命突围。从外围撤入城内的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奉命防御湘桂铁路线西侧的西山据点，日军攻入桂林城后，西山据点上的二九四团依旧坚守阵地，最终被从城内向西突进的日军包围，两千多名官兵全部阵亡。

十日下午，桂林全城被日军占领。

桂林城破之际，韦云淞反复请示突围，张发奎先是不予明确答复，接着就说解救大军立刻便到。在向白崇禧和夏威发出请求突围的电报后，韦云淞没等回电便开始撤离。他用电话命令第三十一军军部以及第一七〇、第一三一师向南突围。在防守司令部里，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喝完一大杯酒后，说了句“来生再见”，参谋长陈济桓劝他不要这样

想。阚师长回到师部，向下属们交代说“要坚决与桂林共存亡，假如我死了，由副师长、参谋长指挥”。说时呜咽，语不成声。然后“他到电话机房内即开枪自杀了”。

接着传来了参谋长陈济桓自杀的消息。

韦云淞和幕僚们爬出桂林西面城墙，沿途遇见大量溃兵和伤兵。一行人不顾部队仓皇奔逃，在深夜的山路上跌跌撞撞，溃败中参谋长陈济桓因负伤不便行动，举枪自杀。——后来桂系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报请抚恤，因为陈济桓的参谋长一职是桂系任命的，重庆军事委员会只答复了八个字：本会无案，不予抚恤。

日军统计，桂林之战中国军队遗尸五千六百六十五具，被俘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一人。日军缴获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二门、一百毫米加农炮二门、野山炮十四门、高射炮二门、火箭炮二门、迫击炮八十六门、机关炮二十门、速射炮二十七门、自动炮三门、重机枪一百一十挺、轻机枪三百五十九挺、步枪二千七百三十七支、坦克一辆、炮弹三万发以上、步枪子弹一百万发。

中国方面有关战史对桂林之战的记载十分简约，只是说除了阚维雍师长和陈济桓参谋长之外，阵亡的还有第三十一军参谋长、第一七〇师副师长以及三九二团团长等人：

当日，守军之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将军，率部喋血苦战，至午后目睹将士伤亡殆尽，无法挽回颓势，乃本其与守土共存亡之决心，从容举枪自戕靖国。

本战斗除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率领一部幕僚脱险外，其余殉职者尚有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第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原基将军、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二团团长吴展上校等。日军亦伤亡甚重。

逃出来的韦云淞战后受到军法审判，但他没有被枪毙。

桂林丢失的当天传来了柳州失陷的消息。

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柳州的危机来得如此迅速。

当初，第四战区之所以策划桂平和蒙圩的反击作战，目的之一就是

确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柳州的安全。从地图上看，从湖南方向过来的日军第十一军，必先拿下桂林后才有可能靠近柳州；而对柳州构成直接威胁的，是从广东沿西江西进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以及从雷州半岛北上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在冈村宁次制订的作战计划中，确实明确了这一原则，即第十一军负责打桂林，第二十三军负责打柳州。但是，中国方面的反击作战，不经意间改变了战场态势，导致一个未曾预料的变数出现了：日军第十一军攻击桂林的同时，其最精锐的第三、第十三师团绕过桂林扑向了柳州。

十一月二日——日军第十一军已开始围攻桂林——在全州西南七公里处的军战斗指挥所里，横山勇的作战参谋井本雄男大佐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第十一军应该在攻击桂林的同时前去攻占柳州。理由是：情报显示当面中国军队的兵力非常薄弱，桂林城里顶多只有两个师甚至还不足两个师，而桂林外围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也只有残破的两个师。那么可以想见，无论是第五十八师团，还是第十三师团，其推进中遇到的抵抗可能微乎其微，在因地形限制也许会出现困难的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方向，当面的中国军队也没有什么积极动作。因此，井本雄男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重庆军果真如此薄弱，即无需以军的全力认真对待桂林外围阵地。在桂林纵有若干抵抗，只要组织一定程度的战斗力，可无多大问题。在完成军的任务方面，敌情已微不足道。”而在桂平和蒙圩方向，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的反击，由于通讯中断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第二十三军虽然只有两个师团，参加反击的中国军队多达几个师，但就战斗力来讲第二十三军完全可以对付。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后唯一出现的问题是：按照第六方面军原定作战计划，第十一军攻占桂林，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那时候第十一军将插到柳州西北地区截断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现在，第二十三军前进受阻，如果第十一军拿下桂林后，第二十三军无法按时进攻柳州，那么第十一军等还是不等？况且，情报显示，目前柳州城内只有中国军队的一两个师，对于日军来讲等同于一座空城。所以，“在此情况下，军继续攻占桂林自不待言，但应立即派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向柳州挺进，并将其占领”。显然,井本雄男也知道这是违反方面军预定计划的，但他给自己的大胆也找了个理由：“第十一军决定攻占柳州，既符合大本营摧毁美空军基地的期望，又可为在柳州外围捕捉击溃重庆野战军创造条件，虽与方面军要求直接围歼重庆军的意图有所不同，但在要地进行攻防战时，或可出现击溃重庆军的战机。”

晚上，井本雄男向横山勇和军参谋长中山贞武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参谋长要求让他和司令官考虑十五分钟再答复。十五分钟后，横山勇让参谋们立刻草拟第三、第十三师团向柳州挺进的命令。

横山勇知道这一决定可能引起的后果。他没有改变作战计划的权力，如果擅自行动，不但可能引起战场混乱，更是严重违反了军纪。但是，抢先攻占柳州的荣耀像烈焰一样在他心中熊熊燃烧——“军司令官横山中将自言自语地叨念：‘这时天皇陛下不知怎样考虑。’又说：‘明天是明治节啦。’表现出无限感慨的神情，但随即明确作出决定说：‘军如今下此决心，也许违背方面军的意图，为了完成作战目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采取最妥善的行动。自己既下定决心，只要不接到停止的命令，就坚决干下去！’”

横山勇下达了向柳州攻击前进的命令。

命令下达后，他试图向方面军请示报告，但因电话线路故障打不通，改为发电报，电报发出时已是第二天下午。

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接到命令后，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未出所料，正中下怀，官兵踊跃直取柳州。”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赤鹿理中将在日记里写道：“一举攻占柳州，堪称卓越统帅。”

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随即改变部署，向柳州扑去。

因接连不断的阴雨天气导致持续低烧的冈村宁次，正在为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的反击而苦恼。接到横山勇的电报后，他异常愤怒：“这是越权，不能容许第十一军的独断。”

横山勇收到了冈村宁次的训斥电报，但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表示第十一军无法执行等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时截断中国军队主力后路的任务，因为攻占柳州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出发的部队不可能改变路线。况且方面军并不了解柳州西北部山地的地貌，如果第十一军在第二十三军到达前攻占了柳州，那他的部队就不用去跋涉那些险峻的山岭了。冈村宁次再次提醒横山勇，中国军队势必要撤退到宜山（今宜州）去，作战要以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为主要目的，而不在于占领桂林或是柳州。冈村宁次再次要求横山勇遵守原定计划，并命令第十一军的部队抵达柳州外围后归第二十三军指挥。——“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冈村宁次给横山勇发去电报，特别强调了这句话。

让第十一军的部队归第二十三军指挥，这显然令横山勇极度不满。

什么叫“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至少目前横山勇无法理解，他决定一意孤行地干下去。

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很快接近了柳州，并与中国守军展开了外围作战。

柳州，四周群山耸立，柳江绕城而过，湘桂、黔桂两条铁路连接于此，乃广西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在张发奎看来，北面的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绕过桂林迅速南下，南面的日军第一〇四师团正从武宣迅速北上，柳州已经无法固守。他在战区司令长官部撤离前，紧急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以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死守柳州。杨森随即命令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以及第一八八师、炮兵十八团、第九十三军战防炮营、炮兵四十七团高射炮一连以急行军的方式抵达柳州。

杨森发布的防御部署命令是：

一、第三十七军（附象县自卫队、炮兵第十八团第八连）即以一部于象县以北，掩护第二十军在连江方面之渡河，主力联系穿山乡附近之第六十二军，积极阻敌进攻。

二、第二十六军（附柳州自卫队、炮兵第十八团第一营、战防炮一连、高射炮兵一排）固守柳州，非奉命令，不得撤退。

三、第一八八师（附柳城自卫队、山炮兵一连）即出长塘、东泉以东之线，阻敌西犯，以掩护柳州左侧背之安全，特须与第二十六军及左兵团切取联络。

四、第二十军（附战防炮一连、高射炮兵一排）迅速在柳州西火车站集结，连江西渡之部队即开新圩，准备柳城方面之作战。

张发奎指望蒋介石能派援军来，但请求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答复。杨森的守城部队号称有三个军，实际总兵力不足两万，且就这三个军，到了临战关头，依然在谁守城池的问题上互相推楼。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是杨森的侄子，该军又是杨森的基本部队，杨森当然不愿意该军受损失，于是把该军安排在柳州外围。罗奇的第三十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兵力根本不足以防卫柳州，且罗奇向来以中央军自居，不愿意接受川军将领杨森的指挥，此刻已擅自带领部队向桂西撤退了。于是，杨森

只能指望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了。但丁军长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口口声声说誓与柳州共存亡，暗中却把主力移动到城外，城内只留下了一些炮兵，而他交代给炮兵的任务是：在日军接近柳州时开始开炮，以示第二十六军还在城里战斗。

八日，中国守军第二十、第二十六军部队刚刚部署完毕，日军就冲到了眼前：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师团一部推进到柳州以北六公里处以及柳江东岸，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先头部队第一六一联队抵达柳州西南约十八公里的四方塘。杨森急令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在柳江西岸担任河防。九日，日军分别从柳州以北、以东和以南三个方向发动攻击：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在东面的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登上西岸；第十三师团的先头部队攻入柳州北部，中国守军第一八八师阵地丢失，官兵大部伤亡；南面的第一〇四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柳州机场附近。中国守军第二十六军在短促的外围战中伤亡惨重，尤其是防守柳江北岸的一二一团全部伤亡，军预备队也已使用殆尽。

十日，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和第一〇四师团第一六一联队联合攻占了柳州机场，第十三师团攻占了柳州西面的鹅山以及柳州北部。

下午三时，张发奎命令第二十六军放弃柳州。

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向西，取道宜山、河池，撤往贵州境内。

日军发起了总攻，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为前锋：

对面重庆军阵地的枪眼能看到的即在三十个以上，并已证实在马鞍山（柳州东南角）后方有一百毫米级以上的野战重炮。然而，九日重庆军似已企图放弃阵地，可以听见剧烈的爆炸声。从五时开始，各炮兵部队进行了三分钟的集中射击，停止五分钟后，又进行了三分钟的支援冲锋射击，步兵部队一齐开始冲锋。阵地前有螺旋状的蛇腹形铁丝网（美军制造），用绳将其拉倒。第八中队（中队长若竹秀三中尉）首先冲进，七时占领了蟠龙山顶。蟠龙山后侧的弹药库也爆炸了，据说当时在该山顶上曾望见从柳州南北车站开出被认为是最后撤走的重庆军列车。这样，联队由于第一、第三中队的奋战，完全占领了马鞍山（柳州市街南端），十三时第五、第七中队冲进了柳州市，第二中队占领了柳州南部西南三叉路的第四战区的司令部。

没有巷战。

奉命掩护撤退的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一团三营官兵全部阵亡。

柳州就这样落入了日军之手。

横山勇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他不会因擅自越权受到大本营指责：“至此，重庆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曾豪言宣称可以防守一年的大战略要点，由于我军多谋善战，总攻开始仅仅十天，即归我所有。因此，由华北到华南纵贯大陆的作战已经完成大半，不仅将美国空军更加赶向内地，而其空军基地一变而为我之基地范围。”

但是，冈村宁次依旧十分愤怒：虽然攻占了桂林和柳州，中国军队主力却向宜山方向迅速撤离了，一味地占领城镇而未令对手的作战力量受到重创或减损，这并不符合他的战略。他认为横山勇擅自攻占柳州的抢功行为，是导致中国军队主力逃出他的合围圈的主因。与中国军队作战多年的冈村宁次很清楚：中国军队什么都慢，就是在战场上能撤得飞快，致使日军每一次都难以对其进行大规模围歼。

冈村宁次下令对中国军队实施全面追击。

十三日，日军第十一军第四十师团向柳州西北方向的宜山急进；第十三师团突破中国军队布设于柳州以西三岔的阻击阵地，沿着铁路线直奔宜山；沿着公路前行的第三师团，先后攻取理苗和北山。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一〇四师团和第二十二师团，分别由南北两面追击中国军队，先后攻占思练、忻城和拉烈，一直追到宜山以南的红水河边。中国军队继续西撤，十五日宜山陷落。——至此，日军第四十师团返回道县，第一〇四师团返回广东，其余部队继续追击。

十六日，占领宜山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击怀远，由于第二十六军没能按时赶到阻击阵地，张发奎只好临时拼凑部队实施阻击，独立工兵八团、炮兵十四团八连等部队以及战防炮教导总队一营的学员们一起战斗，与日军隔着龙江苦战两天。十八日，第二十六军赶到，但丁治磐的部队很快就放弃了正面阻击阵地，使日军第十三师团得以分路向宜山以西的金城江推进。

中国军队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为防止日军长驱直入云南或贵州进而威胁重庆，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何应钦坐镇贵阳，命令汤恩伯部的六个师进入黔南，协同张发奎部阻击日军深入。

二十日，张发奎作出如下部署：

一、右兵团在现地极力拒敌进攻，必要时向果德、隆安附近转进，掩护南宁通百色间大道。

二、中央兵团除以第二十六军归还第二十七集团军建制外，即于二十日晚在平保圩以西地区占领阵地拒敌。

三、左兵团于二十日晚，占领思恩附近要地，以掩护黎明关之安全。

但是，日军第十三师团二十一日突入金城江，二十二日攻占河池，然后沿着黔桂路继续攻击前进；第三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的阻击攻占思恩后，经黎明关继续向贵州方向攻击前进。中国军队转战日久，兵力单薄，溃不成军，两路日军很快突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初，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独山，第三师团攻入荔波后，翻越人迹罕至的苗岭山区，连续攻占三合、八寨，十二月三日攻占黔南重镇都匀。

在日军的猛烈追击下，黔桂公路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难民。

由于军队的溃败，普通百姓承受的苦难令人无法想象：

中国南方战役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次大溃败，它真是现代的一场巨大灾难。在日本人入侵区域中的几百万城市居民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次溃退。在日本人到达独山之前，有五十万以上的中国人在通往独山的险峻的铁路和公路两侧挣扎逃命，其余的人则分散进入自己家乡附近的山区。由于饥饿、疲劳、疾病和事故，死亡人数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例如在桂林，一个惊慌失措的铁路员工开着一辆火车头通过难民群集的火车站，由于铁轨上到处是人，这个车头在几分钟内就轧死了几百人。我的一个中国朋友乘坐从柳城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他告诉我，仅在他乘坐的那节车厢中，一天之内就死了七个人。这是一节货车车厢，为了多装一些人，内部临时搭成了二层，车厢内的难民只能躬身挤作一团，尚有几百人挤在车厢顶上和车厢下面。这天过隧洞时，有三个人被从车顶上刮了下去。另外有两个挂在车厢下的人掉在了车轮之下。

逃避战火的难民想要搭上火车或汽车，还要遭受官吏和军官们的盘剥：

官员们和军官们使这一切变得更为残暴。铁路上给予国家财物的优先权，被转让给了非官方的个人，一些被军队征用的列车用来装运那些付了巨额车费的难民，但这列车从城市开到农村就停了下来，军队用枪

口逼迫那些逃难者下车，然后列车又折返城市去装另一批出了高价的难民。许多家庭就是这样逃亡到钱财全部花光，最后全家跳河或卧轨自杀。

逃到桂北的中国军民遭受苦难的时候，日军第二十三军从广西中部掉头向南，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二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占领南宁城。然后，第二十二师团沿着南宁通往越南的铁路线继续南下，十二月十日与从越南谅山一路北进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在南宁与镇南关之间的绥渌会师。

“日军所穿的夏服说明已经超出他的补给线的范围，第十一军究竟要打到哪里，任何人也无法断定”。为此，有消息说，由于重庆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昌——“在中国要人中间已有人就逃亡印度问题征求魏德迈的意见。”

但是，日军第十一军追到独山后便停止了。

独山，黔桂铁路线的终点。

十二月三日，横山勇命令第三、第十三师团放弃独山和都匀，撤回广西境内。

日军为什么止步于湘黔边界处，除了部队推进太快导致后勤补给线过长，独山四周以及独山的前面都是黔南最险峻的大山等原因外，此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攻势已全面迫近日本本土，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方针已不再是如何打到重庆去，而是挽救迫在眉睫的本土危机。——此次规模巨大，由日军大本营策划以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就此停止。

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投入兵力五十余万，作战历时八个月，击退了中国第一、第九和第四战区的军队，占领了河南、湖南和广西的大片中国国土，攻取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七个中美联合空军基地，打通了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然而，面对如此漫长的交通线，日军既无力修复，更无力守卫，于是也就无从利用。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日军想牢固地保持一线畅通是不可能实现的迷梦，仅共产党的敌后抗日力量便足以让这条交通线瞬间阻断乃至彻底瘫痪。日军大本营希图改变南方军交通阻隔的目的，并没有因为在中国战场上的攻城略地而有所改变。湖南和广西境内的中美联合空军基地虽然遭到破

坏，但四川等地的基地仍在使用，日本本土依旧在B-29轰炸机的飞行半径之内，日军大本营对本土受到攻击的恐惧依旧没有消除。而从根本上讲，侵华日军发动的大规模野战，使得已经处于战争颓势中的日军兵力更加窘迫、资源更加枯竭、战略态势更加被动。

日本军方对此的检讨是：

虽攻占了中国西南方面的桂、柳两个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连接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中国方面受到很大打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策划“一号作战”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

至于中国军队为什么一溃再溃，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可窥一二。电报以第二十六军不执行命令擅自撤退为例，说明中国军队“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而将领们“疆界太严，风气太坏”——后一条显然是在告桂系的状：

查此次桂柳会战，以职指挥无方，日蹙百里，实属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至各将领中忠勤尽职者，固不乏人，而昧于大势，规避战争者，亦不鲜其例，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试一检讨各军战绩，除确因转战过久，实力消耗无法达成任务者，尚堪原谅外，如四十六军则参战最晚，人员武器亦较他军优越数倍，最后宜山正面如再不使之坚强抵抗，不仅不以服苦战之袍泽，且无以对输械之盟友，及接触不及两日，损耗亦不严重，居然自相惊扰，避开正面，致宜山垂手陷贼。怀远、三江口防军未集，勉以工八团及本部特务团分别布置警戒，迟滞敌人，现敌已迫怀远，正隔河对峙中。二十六军虽已到，能否阻遏西犯，仍无把握。判断敌情，如我能在怀远坚强抵抗，桂柳会战或即至此而止。但一般战力消耗过巨，劲旅亦成疲师，倘敌因此扩张战果，迫近黔疆，亦非绝不可能。职戍桂五年，虽明知部队疆界太严，风气太坏，而仍委婉牵就，谓可终济时艰，不料诚信未孚，贻误滋大，深负钧座期许，亦职所不能已言者。现金城江重要物资山积，沿线难民死亡载途，目击疮痍，罪戾曷极，除遵谕竭尽智能，争取时间外，敬恳速定大计，指示机宜，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蒋介石的答复是：“以全权整饬军纪，凡不从命令擅自撤退之主官，

长官应就地正法为要，一切由中正名义行之可也。”

“一切由中正名义行之可也”——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几乎每仗下来都要亲令处决那些丧师失地的将领，现在，他已经把处决的权力下放给战区司令长官了，可是中国军队有多少将领够这样一次次枪毙的？

实际上，真正“风气太坏”的在军政上层。

在抵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溃败的速度和规模，特别是在作战指导和战略设计上仓促应对、保存实力和坐等观望的状态，令国内舆论和盟军方面颇感愤怒。仅就桂柳作战而言，第四战区无论在兵力还是态势上都处于劣势自不待言，但个中现象还是令人无法理解：日军从北向南长驱直入，战线之长、距离后方之远以及深入中国西南腹地之深，都超出了一般军事行动的范畴，以致日军在大举南下之际，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兵力极其薄弱且相当分散。中国战场上决非只有一个战区，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作战的时候，除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拼死出击外，其他的八个战区部队皆按兵不动——只要日军攻击的不是自己的防区，战事再危急也一概与己无关，犹如其他战区的军队不是中国军队，其他战区所处的战场不是中国战场一般。试想一下，如果日军全面南下时，其他战区的部队能够适时出击的话，日军何以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中国何以会再失如此大面积的国土？盟军何以会损失最为重要的空军基地？西南百姓何以会流离失所承受万般战争苦难？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在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正面战场损失兵力五十余万，损失的武器物资能装备四十个陆军师。仅在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中损失的弹药和武器，就超过了国民政府一个财政年度能够补充的数量。

一九四四年，在中国战场连续失利所导致的诸多损失中，有一个因为中国军队作战能力低下以及国民政府公信力和信誉度下降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被国人忽视了。这一后果很快将在一个关系中国命运的国际会议上显现——这就是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造成巨大屈辱的雅尔塔会议。

第四十一章

退后一步不是中国好男儿

克里木半岛南端的雅尔塔风光绮旎。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高级幕僚们，聚集在此讨论战后欧洲格局和对日作战问题。

尽管这个世界上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噩梦将在一九四五年最终结束，但主导着战争进程的政治家们已经判明一九四五年将是世界政治格局因为战争结束而发生重大改变的历史性年份。

德国和日本的覆灭近在眼前。

苏、美、英首脑聚集在一起，实际上是为战后利益的分配，进行一次讨价还价的事先约定。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一方，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开罗会议时，中国之所以被列入世界四大国之一，是因为那时需要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生命来支撑对日作战，现在赢得战争的胜利已无悬念，当讨论战后利益分配时中国就被排除在外了。在列强的眼里，中国除了忍受苦难、承担损失和付出牺牲，根本不具备划分世界利益的“大国”资格。

会议首先认同美、英、法、苏、中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确立了实质性问题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原则；会议决定战后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德国，不准许德国拥有军队，德国必须交付战争赔款；会议确定波兰东部边界大体以寇松线（即以布格河划分苏波边界）为准，同意波兰在东部和北部获得新的领土。美、英联合参谋部还确定了战争进程的最后时间表：打败德国的最早时间为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最晚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打败日本的时间，则在战胜德国后的第十八个月。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开始讨论太平洋战场问题。

由于日本在中国及其本土还拥有数量可观的陆军，而进攻日本本土是美国的既定目标，鉴于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低下，美国已不再指望中国军队能配合美军攻上日本本土。因此，马歇尔在罗斯福离开华盛顿前

往雅尔塔时明确表示，要征服日本陆军，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精锐的关东军，如果没有苏军的出兵，美国就要付出伤亡几十万人的代价。所以，美国必须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的阵营中。

英国人则认为，无论怎样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不能损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受到了美国人的掣肘。美国人认为："剥削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拿走那些国家的财富，但从不送还他们任何东西，例如教育、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最低限度的保健等等"，如此所作所为"否定了在和平开始以前为和平提供某种组织结构的价值"。罗斯福表示："殖民制度就意味着战争"，建议殖民地暂时由联合国托管。丘吉尔异常愤怒，说罗斯福是在瓦解大英帝国："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让四五十个国家胡闹地染指大英帝国的生存！只要我还当首相，我决不会把不列颠的世袭财产交出来，一丝一毫也不交！"同时，英国人又提醒美国人，要万分警惕苏联可能提出过分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不但会涉及苏联与日本之间关于若干岛屿的归属问题，更麻烦的是苏联很可能向中国的领土伸手——近代以来沙俄对中国领土的窥视与攫取举世共知——这样会引起中国的不满从而引发新的国际争端。

苏联人的态度简单明确：如果不能满足苏联对日本、外蒙古、朝鲜半岛以及中国的特殊权益，哪怕美国在最后解决日本的过程中血流成河，苏联也很难公开对日本宣战。苏联的人口数量并不庞大，在与德国的作战中已经死伤两千多万人，苏联与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纠纷，如果对日本开战，就必须有向苏联人民说得过去的理由。

罗斯福绕着圈子引出话题，说华盛顿的参谋们认为，如果用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实施密集轰炸，美军不必登上日本本土也有可能让日本屈服。斯大林马上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想让苏联对日本宣战不妨直说，但必须说明交换的条件是什么。

于是，罗斯福和斯大林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日本归还日俄战争中占领的土地——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以及中国的旅顺和大连港；苏联必须重新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同时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权益。

罗斯福表示，苏联要取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没有问题。至于想在远东地区保持一个不冻港，是否可以从中国人那里租借大连港，或者把中国的大连港变成一个国际自由港？斯大林对这一主意不置可否，但再

次强调必须拥有对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控制权。罗斯福认为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建议让中国把东北铁路的经营权租给苏联，或者成立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管理。

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上述交易是背着丘吉尔商讨的。

等英国人拿到协定草稿时，外交大臣艾登当即表示，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幕后交易是“会议的不体面的副产品”。只是，丘吉尔没有提出抗议。——英国并不打算参加对日本的最后血战。再说，斯大林要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的东西。

罗斯福表示，涉及中国问题还需要告知蒋介石，但同时暗示要是让中国人提前知道了肯定会出乱子。——“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麻烦之一是，不论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向全世界广播。”对此，斯大林的态度是：“暂时还没有必要同中国谈。”

“苏联人等于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一旦粉碎德国后，苏联进攻四面楚歌的日本根本不冒任何风险，也不用流多少血和花费多少物资。”——斯大林最后作出让步：中国的大连可以变成国际社会控制下的自由港，但旅顺必须在苏联一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苏联要将其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

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几个月，美国政府才通过赫尔利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中国方面。

雅尔塔协定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在雅尔塔（Yalta）举行会议。会中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条件，几经讨论，获得协定如次：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强的领袖已经获得如下协议，即在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后二或三个月内，苏联基于下列条件，站在盟国方面，参加对抗日本战争：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

二、过去曾为苏联所有，而因日本一九〇四年的诡谲攻击而受到侵

害的权益，应予恢复。此等权益如下：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的小岛，应归还苏联。

（二）大连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并仍许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

（三）以大连为出口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组的公司，合作经营。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中国仍应保有对东北的主权。

三、千岛列岛应由苏联接收。

以上有关外蒙古、各港口、各铁路的协定，应取得蒋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应由罗斯福总统采取行动，以获得蒋委员长的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等要求，于日本失败后无疑应予实现。

苏联方面，已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协助中国及其武装部队，使中国脱离日本的羁绊。

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

可实际上，《雅尔塔协定》已经签署，中国如若公开反对，将面临失去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及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的处境。

私下里，蒋介石愤怒不已：中国的独立统一、自由民主，竟然需要“友邦”劳心，“英俄同意”，殊为国家之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为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而苏联之所以提出强权要求，除了固有的称霸扩张逻辑之外，无法独立完成对日最后一击的美国必须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是最原始的初因。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中国和美国是盟国关系，但中国军队的战场表现令美国无法把中国军队视为能够并肩作战的盟军。——中国在经历了艰苦的抗战并将迎来胜利的时刻，不但无法保障乃至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利益，反而成为权益被侵占的对象，这无疑是令中国人难以容忍的耻辱。

一九四五年初，战争的前景在日本人看来已近绝望：

一、敌方今后将迅速地直接加重对日、满、华核心地区的军事压力，南方各地区及太平洋上残存的据点将完全陷于孤立。

二、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只能以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中期为限，此后作战方式及战争指导恐将不得不迅速转为游击战。国内形势只要仍按现状发展下去，必将暴露出战争指导上的各种缺陷。

三、从日本方面看来，估计德国能继续维持的时间，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大概也只能以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中期为限。但是，即使德国崩溃，敌方投入东亚的兵力，恐怕也不会很快有重大变化。

四、估计苏联肯定将废除日苏中立条约，但在对德作战结束（一九四五年中期左右）之前，绝不至于参加对日作战或向美国提供基地。

五、日本指望美、英、苏、重庆在目前的战争合作中发生裂痕，这在当前看来是不可能的。

六、为了保证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协助日本作战，终归将需要用武力加以控制。综合以上看法，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现在想用外交手段来扭转世界形势，已经非常困难了。

根据上述判断，日军大本营讨论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指导方案：一是继续进行决战，把中国战场要塞化，直到战争对手放弃战斗意志；二是放弃决战，固守中国战场，准备打长期的持久战。日本人的两种方案，实为一种策略，即在中国战场上达成持久战。——要知道，日本发动战争入侵中国时，持久战曾是中国人民的抵抗策略。

最后，日军大本营决定执行第一方案，即继续进行决战。

但是，雅尔塔会议的情报很快传到东京，对于日本人来讲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原指望苏联受制于《日苏中立条约》，不会在远东方向对日宣战，现在的事实证明，俄国人不会忘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不但要一雪前耻，还要把失去的权益全部夺回。那么，一旦苏联对日作战，日本将处于中、美、苏三方的夹击下，不要说已经枯竭的战争资源、损毁殆尽的武器装备、再也无法补充的兵员缺额，就是本土是否能保住都已是不敢回答的问题。

鉴于对日渐临近的绝境的想象，日军大本营陷入极度无措中：一九

四五年，美军将毫无顾忌地登陆日本本土；苏军的坦克群和骑兵群将冲入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中国在得到同盟国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后，必将向日军实施大规模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对我占领地区的活动将越来越加剧。”如此这般，日军将失去付出巨大代价占领的中国所有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那个“满洲国”，剩余的军事力量只有全部退回本土为保卫日本而战。那么，近代以来大日本帝国拓展疆土的梦想将化为乌有，日本还会和从前一样在狭窄的海岛上维持着紧张拥挤贫瘠的生存状态。

日军大本营重新制订了战争指导方案，其核心内容是本土决战：

方针

帝国陆、海军以粉碎主敌美军的进攻为重点，击溃敌军战斗力，确保战争进行中吃紧的重要地区，以此挫伤敌人战斗意志，以期达到战争的目的。

大纲

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战略态势，击退敌军的进攻，迅速确立自主的态势。所谓自主的态势，是指洞察今后作战的变化，首先迅速在国土以及对保卫国土至关紧要的大陆重要地区，确立坚定的迎击态势。

二、在菲律宾方面，对来犯途中之美军主力进行顽强的战斗，尽力牵制美军兵力。

三、重视东中国海周围的作战，在二三月份以前，完成作战准备。并加强包括硫磺岛在内的小笠原群岛的防务。还要考虑到美军直接来进攻本土的情况，并为此做好准备。

四、对来犯的美军，统一发挥陆海军，特别是航空兵的战斗力，击溃敌军战斗力，粉碎其进攻企图。对于来攻美军的作战要领，首先是以空军兵力尽力在海上消灭之；然后对登陆的美军，切断其供应线，同时以地面部队消灭之。

五、中国大陆上的作战改为以美军为主敌的作战。以上海、中国南部重要地区作为作战准备重点。

六、防空以对帝国首都和本土的重要生产部门、交通港湾设施的防

备为重点。

七、突破敌军封锁，运输南方燃料。确保大陆和本土之间的海上交通。

八、以奇袭、“特攻”的战法为主。

就中国战场而言，日本人最为担心的是美军的登陆。

然而，日军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与中国派遣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冈村宁次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一上任，就开始策划一个令大本营十分吃惊的作战计划：打进四川，攻占重庆。

冈村宁次认为，蒋介石对日屈服只差最后一击：重庆政府官吏腐败透顶，内部派系互相倾轧，经济金融濒于崩溃，与共产党的矛盾不可调和，共产党军政两手都很过硬，中国的中间派基本上都已向其倾斜，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显现出动摇之势。那么，日本应该就此给蒋介石“再紧上一扣”。正因为日本面临着战局危机，才更要在中国积极作战。——“大东亚战争取胜的途径，当今就在于青年人在太平洋方面的舍身精神和使重庆屈服。派遣军要排除万难坚决进行使重庆屈服的作战。”

东京方面不知冈村宁次的勇气从何而来。

截至一九四五年初，冈村宁次指挥的侵华日军主力为二十五个师团，其中八个甲种师团：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二、第二十七、第三十九、第四十七、第一〇四和第一一六师团；四个乙种师团：第三十四、第四十、第六十一和第一一〇师团。另外，九个丙种师团为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和第七十师团。还有四个丁种师团为第一一四、第一一五、第一一七和第一一八师团。丙、丁两种师团多由新兵组成，特别是丁种师团，武器装备低劣，没有配属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野战基本派不上用场。

冈村宁次为进攻四川向大本营进行了阐述：

一、即使美军要在中国大陆登陆，其目的也是夺取被日军占领的航

空基地，以为打击日本本土做准备，因此，其初期投入的兵力不会很大。面对中国战场上强大的日本陆军，美军的登陆必须依靠中国军队从内陆实施反攻来配合。所以，针对美军登陆的作战，主敌应该是中国军队而并非美军。如果在美军实施登陆前，迫使国民政府崩溃，就等于将美军的登陆计划粉碎了一半。

二、鉴于中国军队在日军的“一号作战”中损失巨大，虽然在美国的支援下其实力终会得到恢复，但短时间内实施大规模反攻的条件尚未成熟，配合美军登陆的作战，至少要到一九四五年中期才有可能发动。因此，这是日军在中国军队恢复元气前，彻底覆灭蒋介石政权和捣毁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良机——进攻四川越早对日军越有利。

三、蒋介石面临的各种政治难题，如今愈加尖锐化。蒋介石对美国是有抵触情绪的，对美国的歧视和胁迫心怀不满，同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也更加明显。那么，至少在对待美国和共产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立场与日本方面存在着某些一致。因此，结合进攻四川的军事打击，再加上政治上的谋略活动，进一步离间蒋介石与美国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使中国的内部政局更加混乱动荡，瓦解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是可能的，甚至有必要考虑在攻取重庆之后进攻昆明。

四、中国军队的总兵力并没有多大增加，如果大本营不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中国派遣军以现有的力量完全能够达成进攻重庆的军事目的。至于后方补给问题，如果中国派遣军的官兵都能像太平洋岛屿上的官兵一样，在没有强大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顽强作战，那么进攻四川的作战任务就可以完成。

冈村宁次还向大本营描绘了进攻四川后的“美好前景”：遏制了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企图，粉碎了中国军队趁机反攻的计划；彻底摧毁中美航空基地，以解除美军对日本本土的威胁；迫使缅甸方面的中美联军回防，缅甸的日军就能脱离绝境；重庆失去了人力、物力的最大根据地，其军队兵员、弹药和物资补给全都失去了来源；国民政府的崩溃，令中国各地地方政权开始与日军合作；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压力，将全部集中在共产党抗日武装身上，共产党会因无法承担的巨大压力而土崩瓦解。——“总之，当前是海洋正面已届终局，而在大陆日军面对美英中的联合战力，正要展开一场未曾经历过的内线作战。要正视大陆作战的形势，不可一味进行防守作战，而应捕捉住所剩无几的各个击破的良机，勇敢果断地对四川采取攻势，使之有助于全局的战争指导，确信这是当务之急。”

心急如焚的冈村宁次要求他的幕僚们在一九四五年的第一天，制订出第六方面军从贵州直接攻入四川的作战计划。

可是，东京大本营没有批准冈村宁次的计划。——“司令官关于进攻四川的作战设想虽不无道理，但鉴于帝国全盘战略态势及国力现状，在对付主敌美军关系上，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派遣军能专心为对美作战而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

其实，作为计划中进攻四川主力的第六方面军，对冈村宁次策划的作战也不认同，方面军作战参谋的言论极具代表性：

我认为向重庆进军，实在是毫无道理。前些日子走访第十一军时，看到了第十一军的战力表，它说明已不能与去年以前的师团相比。现在师团的战斗力，一线师团，只相当于一个联队的战斗力。与此相反，重庆军目前却正以美式装备不断地充实战斗力，在此基础上准备大的作战。对方面军来说，现在应该是可伸可缩的时刻了。不要说整个中国战局，仅就第六方面军正面而言，我战力已到最大限度，要应付预料中的激烈变化的形势是危险的。如果实施芷江作战，就必须放弃桂柳地区，而在湖南、湖北、广州固守，求得保存手下兵力。所谓打到重庆去，毫无道理。

仅就正面战场而言，侵华日军在中国辽阔国土上的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份，必须以众多的兵力保持与中国军队的对峙。仅从这一现实看，也很难理解一向老谋深算的冈村宁次，为什么固执地认为不必动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打进四川捣毁重庆；特别是在他发动对重庆的进攻时，还有多少兵力能够确保漫长的对峙线不会发生崩溃？冈村宁次自称深刻地了解中国，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基本准确的估计。但是，曾经长时间在华北指挥“剿共治安战”的他，难道此时没有把共产党已经拥有的上百万抗日力量估算在内？如果美军真的从中国沿海登陆，能够配合美军作战的很可能是共产党抗日武装。——早在一九四四年，美军方面已就此问题与延安多次沟通，并得到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坚定承诺。美国人压根儿没有特别指望重庆方面能对美军产生多大的作用。那么，在八路军活跃的山东沿海和新四军活跃的华中和东南沿海地区，冈村宁次又该如何应对战斗力顽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火力凶猛的美军的两面夹攻？进一步设想，一旦美军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不但共产党武装会全力配合，重庆方面的军队也必会从各个战区参与反攻，那时冈村宁次的部队将多方受袭，他设想如同打桂林和柳州一样一举攻占重庆甚至是昆明，

在军事上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大本营在其作战指导中，明确地把美军视为“主敌”，并没把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经过了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的上百个师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减员至少在五十万以上。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完整省份越来越少，到一九四五年初，内地省份仅剩下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所辖地域面积的缩小，导致兵源大大减少，加上国民党军队有吃空饷的陋习，很多作战师实际兵力甚至不足一个团。因此，尽管国民政府正规军编制表上开列着四十个集团军、一百一十多个军、三百一十多个师、二十多个骑兵师，再加上空海军部队以及各战区的直辖部队，总兵力也就维持在四百多万。

只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开通后，美国援助国民政府装备起十一支美械部队，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三、第十八、第五十三、第七十一、第七十四、第九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同时还为地方军装备起四个半的美械军，即第四十六、第五十二、第六十、第六十二军等。在中国军队的所有美械部队中，以新编第一、新编第六军和第五、第十八、第七十四军的装备最强，每个军除辖三个美械师外，还直辖榴弹炮团、骑兵团、工兵团、装甲团、汽车团、辎重团以及通信营、高射机枪营、战防炮营、平射炮营和特务营等，无论装备和编制都接近了美国陆军水平，是国民政府所掌握的绝对主力部队。

同时，桂柳会战后期，由于日军前锋已深入贵州境内，蒋介石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应号召的爱国知识青年从军后，迅速被编成九个青年师，以罗卓英为编训总监、蒋经国为政治部主任，青年师的人员和武器配备，甚至超过了一般的美械师，加之官兵普遍文化水平较高，这支嫡系中的嫡系部队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军为“一号作战”将其在华北和华中的大量部队调往豫、湘、桂战场时，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反攻。敌后战场的反攻，发展了游击战的规模，建立起众多新的抗日根据地，解放了位于敌后的大片国土。至一九四五年初，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其正规军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根据地内的总人口近一亿。由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军队的物资供应大大改善，尽管依旧无

法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但武器装备的质量有所提高，青年农民参军抗战的热情不断高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今非昔比，对侵华日军已经构成致命的威胁。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支持不了多久了。

热衷于继续进攻的冈村宁次，在策动打入四川被大本营否决后，立马盯上了中国的另一个方向。

冈村宁次发现，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还留下了一个小尾巴等待他来完成，即粤汉铁路南段还没有打通。

日军的原定计划是：打通湖南衡阳至广东广州间的粤汉铁路南段作战，由第十一、第二十三军于“九月中旬结束桂林柳州作战并做好必要准备后，十月从衡阳、零陵及广州以北地区开始进攻，消灭第七战区的军队及残余的敌军，占领并确保粤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但是，衡阳城的血战，严重耽误了时间，加上太平洋战局的恶化，大本营不得不将攻占粤汉铁路南段的时间后移。

由于湖南至广东的粤汉铁路南段被中国军队所控制，广东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与湖南的日军第十一军实际上是被隔断的，第二十三军等于孤悬于广东和东南沿海地区。同时，遂川、赣州、新城、南雄等地的中美联合空军的航空基地，也严重威胁着侵华日军甚至是日本本土。——为改善日军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摧毁中美联合空军的航空基地，特别是未来阻击美军可能实施的登陆作战，必须打通粤汉铁路南段。

桂柳会战结束后，日军第六方面军正要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时，司令官冈村宁次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继任者是冈部直三郎大将；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也被调回国内，继任者是从日本驻蒙军调来的上月良夫中将。等人事调整完毕，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方面通过陈纳德的帮助，从云南远征军中抽调部分部队空运到了内地；美军更加频繁地使用遂川等地的机场，支援中国军队作战；薛岳的第九战区部队也开始活跃起来，不断地袭击已前出到广西境内的日军的后方。

粤汉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的部署是：薛岳第九战区的主力集结在湖南东南部的桂东、汝城、永兴、郴县、桂阳、常宁、耒阳和茶陵一带，总兵力至少有四个军十二个师，其一线部队与日军对峙阵地的警戒线之间仅隔几公里；而广东方向余汉谋的第七战区，中国军队只有第六十、

第六十五军，即使该战区抽调其他部队来守粤汉铁路，能投入的兵力也不会超过三个军。于是，冈村宁次认为，就粤汉铁路沿线中国守军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不必过多顾虑。

日军第六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主持制订了打通粤汉铁路南段的作战计划：

方针

一、方面军决定于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以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三军奇袭占领粤汉铁路南部；并在确保该路的同时，以一有力兵团摧毁遂、赣地区美空军基地。

二、本作战之主要目的为使粤汉线主要技术设施不受破坏而占领之，其次才是歼灭敌野战军。

三、作战期限预定大概两个月。

指导要领

四、第二十军

（一）第四十师团向道县、零陵附近集结，有力的一部向耒阳附近集结，再以第二十七师团向攸县、茶陵附近集结，准备作战。

（二）一月中旬开始行动，奇袭占领韶关以北粤汉线，为此，要善于使用所训练的挺进队，争取不损坏重要技术设施而占领之。

（三）令第二十七师团向遂川、赣州地区前进，摧毁该地区的美空军基地。

（四）与第二十三军策应摧毁南雄地区的敌航空基地并扫荡当地之敌。

（五）作战结束后，要确保省境内附近以北的粤汉沿线地区。又，把第二十七师团、第四十师团调归第二十三军指挥。

五、第二十三军

（一）将一有力兵团置于清远附近准备作战。

（二）一月中旬开始作战，与第二十军相策应奇袭占领韶关以南的粤汉线。

（三）占领韶关后，摧毁南雄附近之航空基地，并扫灭周围之敌。

（四）作战终了后要修复省境以南的粤汉线。此外，为加强对美战备，将第二十七师团及第四十师团列入该军指挥下。

六、铁道部队

第二野战铁道队与第二十军协同负责占领铁路的技术设施和修复韶关以北的粤汉线，为占领铁道技术设施应给第二十军配备必要人员。

上述命令中，一个概念成为反复强调的重点："争取不损坏重要技术设施"。——粤汉铁路南段穿越南岭山脉，沿途桥梁和隧洞数量极多，一旦被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破坏，修复起来十分困难。

但是，日军想在中国军队破坏之前实施占领，谈何容易？

于是，进入一九四五年后，侵华日军的第一场作战竟然从集体化装开始了。这是冈村宁次在华北对付八路军敌后武装时常常使用的伎俩：日军官兵只要穿上中国百姓的衣服，外表上与中国百姓的区别并不大。

一月三日，日军第四十师团从道县开始行动。

第四十师团刚刚结束桂林作战，官兵疲惫，经过短暂的休整尚未恢复元气，但该师团依旧按照冈村宁次的指令，组织起甲、乙、丙、丁四支挺进队。挺进队的官兵一律化装成中国百姓，尽最大可能隐蔽行动意图，争取在中国军队发现他们并破坏铁路之前，攻占韶关以北的粤汉铁路沿线，占据被称为广东北大门的韶关。同时，为躲避中美联合空军的侦察和轰炸，挺进队的全部行动都在夜间进行。

穿着中国老百姓衣服的第四十师团甲挺进队，"沿着预定路四眼桥一插花坪一礤洞中洞一黄沙铺一黄竹铺道路地区，首先向东南前进而越过省境。接着，经大元--红庙脚一东源堡向坪石西南挺进。然后分头前进，以坪街北门的新岩下桥为重点，完整无损地占领白石渡以南的重要桥梁和隧道。挺进完全在夜间进行。敌军已命令住民躲开。官兵们不靠近村庄而在深山幽谷中穿行，山野跋涉，其劳苦可知。"

甲挺进队出发四天后，一月七日，丙、丁两支挺进队从道县出发，前进路线和甲挺进队相同，目的是支援和增强甲挺进队的战果。但是，十日的时候，日军的偷袭被中国军队发觉了：“道县的日本第四十师团月十一日潜至东南，开始扰乱。我新编第二十师、暂编第五十四师、突击第二纵队开始了阻击战，在插花坪、江华、猶洞之间展开激战。”

于是，十日才从零陵出发的乙挺进队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当面的中国军队警戒很严，日军绕来绕去，走了一个星期，还没走完预定路程的一半，并于十八日遭遇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指挥乙挺进队的大队长香月少佐，不得不命令官兵使用重机枪、迫击炮和掷弹筒进行回击，战事胶着之际，他索性打开原来一直保持静默的无线电向上级报告战况，并命令官兵脱去中国百姓的衣服开始正规作战。但是，香月少佐很快就发现，他们被中国军队包围了。

甲挺进队第七天进入广东境内。日军越接近粤汉铁路，隐蔽越困难，终于在第十五天的时候被中国军队发现，接火后日军才看见四面都是中国官兵。带队的铃木少佐强行突围，可围上来的中国官兵越来越多，铃木少佐命令脱去中国百姓的衣服边打边走。傍晚的时候，他们终于看见了一条铁路线和一个铁路隧道。铃木少佐查看了地图，确定这就是他们的偷袭目标：新岩下桥。

中国军队乘坐轨道车赶来。

双方激战后，铃木少佐用无线电向师团报告：“我偷袭成功了。”

位于衡阳的第二十军司令部内“欢呼不已”。

接着，其他挺进队的消息陆续传来：丁挺进队没有抵达指定地点，北江铁路桥已被中国军队炸毁。乙挺进队虽然突出重围，于二十一日抵达粤汉铁路线上的燕塘隧道，但郴县南面的铁路桥也被中国军队炸毁了。

日军第六方面军随即命令各师团主力出发：第四十师团主力大举向南推进占领粤汉铁路沿线；第二十七师团主力向赣州发动进攻，摧毁位于遂川、赣州、南雄的美军航空基地；第一〇四师团迅速北上攻占韶关和富国煤矿。

韶关是广东北部粤汉铁路线上的重镇。自全国抗战爆发以来，韶关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目前第七战区在这里设有战斗指挥部。日军第一

〇四师团前锋第一六一联队，几年前曾从广州北上作战，但只抵达了英德以北地区，未能占领韶关。十九日晚，第一六一联队抵达三坑墟后，第二大队奉命急速北上韶关。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在此前西进广西的作战中伤亡不小，现在的第二大队兵力不足三分之二。沿着粤汉铁路北上的时候，日军发现盘旋在山里的铁路线，每隔五米就有一段路基被挖断，拆下来的铁轨并排竖起来挡在路基上；货车也被拖进了隧道，隧道已经被水泥封堵。

二十四日凌晨，第二大队走到韶关以南大约四公里处的莲花岭时，突然遭到猛烈的火力阻击。——阻击日军的是中国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第一六〇师主力以及第六十五军教导团。

第二大队立刻出现死伤，不得不逐个清除铁路两侧的碉堡，苦战多时才得以向韶关南面的曲江大桥推进。大队长斋藤让一个小队的官兵换上中国百姓的衣服，对韶关火车站进行偷袭。哪知中国守军躲在车站内的建筑物里或是砖墙后面突然开火了，韶关城内的炮兵也向车站开炮支援守军作战。日军的正面攻击受阻，但穿着中国百姓衣服的那个小队却挖开车站的围墙潜入了站台，他们把日本国旗“挂在月台的旗杆上，表示确保了该地”。中国官兵不畏日军的火力拦截，“数次登上旗杆企图扯下太阳旗”，但均因日军的猛烈阻击而失败。

北上的日军进入韶关必须通过曲江大桥，因此这里成为中国守军火力最密集的地方。日军第二大队决定偷渡。偷渡的官兵每人携带两顿饭的主食、一百二十发子弹和两枚手榴弹，泅渡时竟然没被对岸的中国守军发现。日军很快攻占了对岸的碉堡，第二大队主力随后渡江。在江边到市区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日军看见了一座他们从未见过的体形巨大的碉堡，中国守军围绕着这个大碉堡构成了相互联系的严密火力网。日军组织起一个“肉攻班”，发起不顾一切的冲击，后方掩护的重机枪和火炮也一齐向大碉堡开火。当“肉攻班”伤亡殆尽后，跟在后面的日军冲进了大碉堡，这才发现这里是中国第七战区战斗指挥部——“其宽阔程度可容纳两个连”。

接近市区的路上，第二大队官兵不由得心惊胆战：道路两侧全是碉堡，路面架设了几层美式铁丝网，建筑物上也布满了火力点。日军试图破坏铁丝网时，立即招致中国守军的猛烈射击。由于奔袭、作战、泅渡，第二大队的疲劳程度已超出了极限，士兵不再冲锋，而是躺在距铁丝网不远的地方睡下了。

一月二十六日拂晓，炮兵上来了，第二大队发起强攻：

炮兵对铁丝网的破坏轰击，进行了将近三十分钟，然后对后方高层楼房进行破坏式轰击。有的被破坏有的倒塌。至此，对第一线的炮兵轰击停止。接着，两个中队一起开始了对攻击目标的突击。在五十米的距离中，虽然有的中途倒下来，后面的人接着冲上去。第八中队首先向白墙建筑群投进手榴弹，接着冲进去；随后，第五中队占领了碉堡；第七中队的一部也冲进了市区。时间是正午过后。

日军突入韶关市区，残酷的巷战开始了。

房屋在炮火中倒塌后，中国守军只能以一道道残垣断壁为掩护阻击日军，两军有时竟然“一壁之隔对峙着”。日军“先用十字镐破坏墙壁，然后投进手榴弹，反复冲杀前进”。而在那些有楼层的房子里，中国守军“从上层投下的手榴弹以及射出的狙击子弹犹如雨点般倾泻下来”。日军为避免被杀伤，只能分散成一个个地单兵作战——“有时占领一间屋子需要几个小时。”

午夜，中国守军阵地上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这是撤退的信号。

接着，架在浈水上的粤汉铁路桥被炸断，冲天的烈焰照亮了夜空。

日军想卡住韶关中国守军的退路，已经晚了。

二十七日，日军第一六一联队主力突入韶关，市内的道路上到处躺着中国官兵的尸体，大多死于刺刀或手榴弹，而第二大队也是伤员累累，由此可见“巷战的惨烈程度”。——粤汉铁路南段的战略要地韶关，实际上是由日军的一个大队攻取的。

至此，日军彻底打通了粤汉铁路。

第二大队攻击韶关的时候，日军第五十七旅团攻占郴县和三都；第二十七师团攻取莲花和遂川，进而攻占赣州；第四十师团攻取了南雄、南安和新城。

中国第九战区曾经发动反击作战。一月三十日，第六十师收复坪石东北二十公里的九峰，逼近粤汉铁路位于粤北的要地乐昌；二月二日新编第二十师收复良田，逼近粤汉铁路位于湘南的要地郴县；二月日，暂编第五十四师收复宜章，然后与第四军主力协同，一度夺回粤汉铁路位

于湘粤交界处的要点坪石。但是，日军随即反攻，良田、宜章和坪石再次陷落，粤汉铁路的控制权重回日军之手。

在第九战区发动的反击作战中，陷入中国军队包围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乙挺进队指挥官香月少佐，被击毙在坪石东北十五里处一个名叫塘村的村庄边的稻田里。

日军第六方面军对粤汉铁路南段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果，但对挽救整体战局并没有多大帮助。不要说日军已无力修复和确保粤汉铁路的畅通，即使这条铁路畅通，对日本也没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如果说粤汉铁路南段作战日军还有收获的话，那就是在铁路线附近地区抢掠了不少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同时摧毁了郴州、遂川、赣州、南雄、新城等数个美军航空基地。可是，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并没有减少，据情报显示，这些战机的起飞地点改在了湖北的老河口和湖南的芷江。

冈村宁次依旧渴望着进攻四川。

为了说服中国派遣军把精力放在应对美军的登陆上，并进一步消除中美联合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威胁，日军大本营派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宫崎周一中将亲赴中国当面劝说冈村宁次。

一月二十五日，宫崎周一飞抵南足。

他当天宣读了参谋本部的“大陆命第一二二八号”：

命令

一、大本营之企图，在于击败进攻之敌，特别要击败主敌美军，以确保皇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域，摧毁敌之战意。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击败向中国大陆进攻之主敌美军，粉碎其企图，在确保大陆要域的同时，谋求促使重庆势力衰亡。

为保证完成任务，应以下列纲要为准则：

一、要立即加强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击败来自东西正面进攻之敌（特别是美军），粉碎其企图，并确保以皇土为核心的大陆国防资源。为此，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特别是长江下游要域。

二、要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击败敌之战力，并结合政

治谋略措施促使其衰亡。又，要尽力封住敌人在华之航空势力。

三、为确立军的作战根据地，并使之易于获取重要国防资源，要迅速谋求占据地域（特别是华北及长江下游要域）的安定。

四、在向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山西省西南端至黄河、老河口、宜昌、秀山、黎明关、平马一线以西实施地上作战时，除以小部队进行挺进奇袭等作战外，须根据另外的命令行事。

五、当在台湾、西南群岛方面作战时，要尽可能对航空作战等加以协助。

六、要尽力保持与南方要域的联络，并要协助保护海上交通的海军。

七、为适应以前各号作战的需要，可与关东军总司令官、南方军司令官、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相协力，并可相互协商派遣一部部队到他军作战地域。至于指挥关系可按协商准则执行。

这份命令的要点是：再次明确大本营以保卫本土安全为核心的战略意图，特别强调当前日本的主要敌人已不是中国军队而是美军。同时明确地警告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派遣军能保持住现有占领区就不错了；如要越过大本营制定的华东战略线，向中国的西南方向大规模出击，没有取得大本营的同意绝对不得擅自行动。

但是，冈村宁次对这份命令的理解十分奇特：当然要击败可能在中国大陆登陆的美军，但大本营并没有说不能同时进攻重庆，因此还是可以依照派遣军的判断来行事的。况且，不管大本营的命令在文字上如何表述，实际上东京是支持派遣军进攻重庆的积极设想的。——“总的来说，大本营要求全力向东面对付美军登陆作战的意图，不但没有达到原意，反而形成承认总司令官所持的以西面作战为主体的作战指导。”

三天后，冈村宁次按照他对大本营意图的理解，命令日军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攻占湖北的老河口和湖南的芷江：

一、余企图覆灭敌前进航空基地。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一官应尽快攻占老河口一带。

三、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应尽快攻占芷江一带。又，应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的老河口作战。

四、第五航空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助第二、第三两项的作战。

“在大本营来说，已经指示了中国派遣军东西正面作战的态势，从表面看其重点是对付美军，是东主西从的；而总司令官的真正意思，却是以重庆为重点，是西主东从的。也就是说，他期望的是一面促进对美作战准备，一面依据已下达作战命令的芷江、老河口两战役的进展情况，继续扩大西面作战。”

冈村宁次的攻击路线是从湖南西部的芷江打入四川。

只是，这一次，他提供给大本营的作战理由，不再是进攻四川而是摧毁美军的航空基地。于是，大本营难以驳斥。——从日后的战争进程看，冈村宁次的判断没有失误，特别是美军并没从中国的东南沿海登陆。然而，冈村宁次绝对想不到，他所策划的老河口和芷江作战，不但没有成为日军捣毁重庆的序幕，反而成为侵华日军全军覆灭前的最后两场大规模作战了。

老河口，湖北西北部的一个小城，既是中美联合空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

主攻老河口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策应的是日军第六方面军第三十四军。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一九四四年完成京汉铁路沿线作战后，一直驻守在黄河南岸铁路沿线以及洛阳方向：第一一〇师团在洛阳附近，坦克第三师团在襄城附近，第一一五师团在郾城附近，第一一七师团在新乡附近，骑兵第四旅团在开封东南的归德附近，军司令部位于郑州。虽然与中国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对峙，但第一、第五战区部队仍处于“恢复因经受京汉线作战而损失之战力”的状态中，所以，第十二军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发动的反攻中，部队被八路军和抗日民兵的游击战术搞得焦头烂额。现在，突然让他们远距离奔袭，转为正规的大规模野战，竟还一时转不过弯来。

日军第十二军所掌握的有关情报是：

一、由于洛阳及平汉线南段失守，中国第一战区的作用转变为“防卫

西北和四川，过去企图据以控制华北乃至延安的价值明显降低”。而第一战区要恢复战力，没有胡宗南部队的协助是极为困难的。

二、汤恩伯的骨干部队似已“向内地后退进行整理”。

三、胡宗南军最精锐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东移，“以主力担任潼关以东的防务”。如此，其面对延安的兵力虽有所减少，但第三十七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六、第八十军“仍在执行封锁任务”。

四、胡宗南将素质较差的新编第七军（属第三十七集团军）配置在韩城，原有向北监视驻守吉县的阎锡山的意思，但从一九四四年二月阎锡山与胡宗南会谈后“阎的动向以及重庆方面改善对阎的补给等情况”看，也许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增加了信任，“对此不应等闲视之”。

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不仅与他的桂系军队“被京汉线隔离”，且当刘汝明的部队（第二集团军）奉命增援第一战区后，第五战区的防备力量被严重削弱了。“特别是第一战区的配备重点已转移到豫陕方面”，李宗仁的处境“极苦”。

根据以上判断，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认为，一旦日军实施攻击，当面中国第五战区的部队必会避战后退，很可能要退到以南阳为中心的地区在白河西岸进行抵抗，目的是等待第一战区部队北上增援。因此，必须首先隔断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联系，快速攻占第五战区的指挥中枢老河口。

日军第十二军作战计划：

一、令豫西地区队顺着洛阳一卢氏大道前进，在突破长水镇（洛阳西南偏西一百公里）西方地区当面之敌以后，除尽量多地牵制敌人以外，做出似乎要进攻西安的行动，使军主力的攻击能顺利进行。

二、第一一〇师团突破鲁山附近之敌，顺着鲁山一南召（鲁山西南三十二公里）大道向南阳西北方挺进，准备攻占南阳。

三、坦克第三师团突破当面之敌以后，经保安镇（南阳东北六十五公里）附近向西峡口一淅川一线突进。

四、第一一五师团以一部突破舞阳，以主力突破沙河店附近敌阵

地，然后向南阳南侧前进，准备攻占南阳。

五、骑兵第四旅团（配属一个步兵大队）先跟随第一一五师团前进，然后超越第一线奔向老河口，占领该地飞机场。

六、吉武支队随在坦克第三师团的后方前进，一面扫荡敌人，一面向安阳前进。

一九四四年五月，豫中会战结束后，重庆军事委员会将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九、第八十九以及暂编第十五军等部队，分别调至鄂西北、豫西南以及陕南地区整补，这使得中国第一战区的作战部队大大减少。一九四五年初，军事委员会又把第一、第五战区平汉路以东的辖区合并，成立第十战区，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为司令长官。为了使中国第一、第五战区能够协同作战，一月八日，军事委员会下达《协同作战要领》，要求第一、第五战区以固守战区、掩护机场和巩固川陕门户为目的，以主力固守函谷关、卢氏、南阳、老河口等地，作战由李宗仁统一指挥。同时，变更了两个战区的作战地区，把可能发生战事的区域，大多划在了第五战区里。一九四五年三月，为加强四川防务，军事委员会在汉中设置行营，任命李宗仁为行营主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副司令长官刘峙接任。

刘峙刚刚上任，就传来日军即将进攻老河口的情报。

此时，中国第一、第五、第六战区部队的位置是：第一战区第四十军驻守潼关以东的灵宝；第三十四集团军驻守豫、陕、晋三省交界处的潼关、华阴和韩城一带；第四集团军驻守灵宝东面的洛宁，其第三十八军驻守豫西嵩县；新编第八军等部驻守豫西南的南召；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十五军驻守豫西南的西峡口地区。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驻守豫南的方城、泌阳；第二十二集团军在鄂北大洪山，其第四十七军驻守豫南与鄂北交界处的邓县。第六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分别驻守鄂北宜城和鄂中远安，其中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驻守鄂北南漳附近。

第五战区一线部队的防区，从湖北中部的钟祥一路向北延伸，直到河南南部的舞阳，弯弯曲曲足有八百多公里；二线部队防守的鄂北襄河、唐河一线，三线部队防守的豫南白河一线，连起来宽度也足有五百多公里。如此宽大的防区，兵力必会因分散而薄弱。一旦日军投入骑兵师团和战车师团，一线防线一破就等于大堤决了口，二线和三线部队只

能是一退再退。于是，刘峙报给重庆军事委员会的防御计划是：大幅收缩防线，把日军放进来，待日军向老河口攻击时，在白河附近或襄河附近与之决战。——这种冠冕堂皇的“退后决战”套路，已一次次导致国土丧失和百姓流离，可这些似乎并不在将领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至于最后的“决战”能否真正得到实施，从战区到重庆谁都心知肚明。

刘峙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三月二十一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五战区部队先在泌阳、方城、南阳地区节节抵抗，然后向后转移到鄂北决战地域；同时命令第一战区尽力在豫西阻击日军南下；第十战区袭击平汉路策应第一战区作战；中美联合空军轰炸日军的后方交通线。

刘峙的计划被批准的前一天，日军的攻势作战已经开始。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日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九师团。

第三十九师团的任务是在第十二军发动攻势前，在鄂北地区沿襄河西岸北上，切断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从老河口西撤的通道。由于第三十九师团仍需同时执行原防务，即防守湖北宜昌至当阳一线，只能抽出三个步兵大队作战。冈村宁次只好临时从应城、沙市、咸宁、南昌、信阳等地各抽调一个大队，又从九江抽调来一个山炮大队，临时凑起来约五千兵力。

三月二十日夜，第三十九师团从湖北当阳出动，用奇袭的方式逼近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在荆门以西的前沿阵地。第二天一早，日军以六个大队兵分三路，向第一八〇师和暂编第五十三师防守的桐木关至盘池庙阵地猛扑。激战一天后，中国守军的阵地被突破。二十二日，日军继续向北攻击前进，中国守军边打边退，暂编第五十三师一团团长陈振凯阵亡，日军大队长北岛信秋大尉被打死。二十三日，鄂北重镇宜城陷落。

二十二日拂晓，豫西方向的日军第--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第一一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除第一一〇师团从洛阳出动外，其他部队沿平汉铁路线向当面中国守军发起攻势。二十三日，除了坦克第三师团因天降大雨，道路难行，仍滞留在郾城西南方向的保安镇外，右翼第一一〇师团突破中国守军新编第八军的阻击，占领伏牛山以南的李青店和南召；左翼第一一五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一四三师的阻击，先占象河关，继而攻占唐河以东的源潭。鉴于日军的全面攻势，按照预定计划，第五

战区除了留下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的第六、第九挺进纵队以及一个团，第二集团军所属的第一四三师以及第一、第七挺进纵队外，其余部队在日军抵近前全部向西，撤至豫西南与鄂西北交界处的湍河和丹江之间。同时，第一战区也只留下第一一〇师、暂编第六十六师和第四、第六挺进纵队在伏牛山区阻敌，其余部队全部向西撤到桑坪与淅水以西地区。

中国军队主力的西撤，令日军第十二军毫无阻碍地深入到豫西腹地。至二十四日，日军第一一〇和第一一五师团已分别渡过白河，骑兵第四旅团开始超越步兵部队向白河西南方向的老河口突进。

只有坦克第三师团依旧行动缓慢。除了大雨造成的道路泥泞之外，主要原因还是这支部队目标太大，成为中美联合空军的攻击对象，以致坦克第三师团白天不敢行动，但黑夜在泥泞的道路上机械化行军同样危险，而中美联合空军即使在夜里，也坚持不懈地搜寻着该师团的行踪：

在夜间进击中遭到敌战斗机扫射。集束弹命中暗号班的卡车，发生数名死伤。我方令车辆停在道路上，人员退离道路躲避，避免了损失。美军飞机只交叉着使用曳光弹进行扫射，如果混合使用照明弹，我方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必须看到，在对方制空下，即使在夜间，机械化部队行动起来也极为困难。

不仅坦克第三师团受到空袭，超越步兵部队向老河口方向突击的骑兵第四旅团拥有数千匹战马，目标也很明显，导致中美战机蜂拥而至：

旅团在奔向老河口时，为了不暴露企图，采取了避开南阳一老河口大道而稍向东方迂回的路线。旅团长藤田少将三月二十五日在三十里屯待机时，听到美军飞机对后方进行轰炸的爆炸声，知那是骑炮兵第四联队遭到了攻击。当时该联队的本部退避到了空地，而炸弹正落在空地内，本部部员（副官、观察方面的将校及主要干部）尽皆战死，在崖上的联队长东高安中佐左足也被炸断。

按照日军的原定计划，第一一〇、第一一五师团主力准备攻击南阳。至二十四日，第一一〇师团抵达南阳以北，第一一五师团抵达南阳以南。但是，坦克第三师团推进的速度太慢，而骑兵第四旅团的位置又过于超前；鄂北方向的第三十九师团正与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激战；中国第十战区部队也开始向平汉路进行骚扰；第五战区主力已经大部分撤到白河以西，不但主力没有严重受损，西峡口的防务还因此得到了加强；更重要的是，日军发现南阳中国守军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所以，

日军改变计划：把攻击南阳的任务交给二线部队，即被称为“吉武支队”的步兵第八十七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全部向内乡方向推进，以主力攻击西峡口和淅川；第一一五师团以主力增援骑兵第四旅团攻击老河口，另一部向老河口西北约四十五公里的李官桥穿插，以控制汉水的上游。——日军第十二军绕过南阳向西突击，是为了挽回坦克第三师团行动缓慢带来的时间上的损失。

二十七日凌晨，日军骑兵箪四旅团对老河口发动了攻击。

汉水东岸的老河口，是鄂北、豫西、陕南间的重要交通孔道。从老河口向东北，经邓县、南阳、许昌等地，可达豫东、皖北、苏北和鲁南的敌后地区，中国方面向敌后战场调拨的物资和兵力大都需要利用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从老河口向西北，经商南、蓝田等地可达西安；向西南，过汉水经十堰等地可达汉中；向东南，沿襄阳公路可达枣阳；加之汉水的船舶运输十分便利，因此成为抗战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枢纽。武汉会战结束后，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移至此，还在老河口城东建造了一个机场。

老河口是个镇子，属于光化县，光化县城就在老河口东北约两公里处。

日军攻击老河口，首先是冲着机场来的，因为从这里起飞的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其作战范围可以覆盖整个平汉路；同时，攻占老河口，也是为了摧毁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间的交通枢纽。

早在日军发动攻击前，刘峙已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从老河口向西转移，撤到了五十公里外武当山下的均县草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老河口驻扎时间久，眷属众多，还囤有大量的军用和生活物资，因此搬家的时候交通阻塞，混乱不堪。为了掩护司令长官部的撤离，刘峙命令第一二五师死守老河口，并调动部队侧击向老河口进攻的日军。

第一二五师接到的命令是：死守老河口三天。

老河口镇城墙不高，又是土筑的，内外都没有像样的工事。当时，第一二五师三七四团回四川接兵还没归队，该师只有两团兵力。司令长官部撤走之后，部队急忙修筑工事，老河口的居民也来帮助军队，试图把城墙垒得再高一点。第一二五师决定由师长汪匣锋指挥直属队、战防炮营和三七五团守城垣；副师长陈仕俊指挥三七三团在城外阻击日军。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攻击一开始显出了混乱：一会儿攻击老河口镇，一会儿攻击光化县城，既要与外围的中国军队作战，还企图迅速攻占机场，结果导致第二十五联队对光化县城的攻击屡屡受挫，伤亡不小进展不大。接着又掉头去攻击老河口镇，想在城垣的东北角偷袭进去，但即刻被中国守军打了出来。第二十六联队由于连日疾行，官兵马匹极度疲劳，正想找个对空隐蔽的树林休息一下，但旅团长命令他们再次攻击老河口机场。凌晨，第二十六联队紧急集合，然后“开始了悲怆的前进”。由于人困马乏，掉队的士兵很多，战马也不断出现死亡，更严重的是天亮时遭遇中国守军的炮火轰击，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也扔下了密集的炸弹，这个阵势把联队长山下大佐弄得十分紧张，以为他的部队就要陷入包围了。但是，轰炸持续了一个小时后，山下大佐惊奇地发现，中美联合空军的打击目标不是他们，而是老河口机场的航空设施以及弹药库。日军在向机场突击的路途中，一路不停地与中国守军激战，直到下午第二十六联队才冲进机场。这时候，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再次飞来，机场上的数百只汽油桶被击中，烈焰冲天而起。

二十七日晚上，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命令外围守军放弃阵地进城。汪师长决心依据城垣工事与日军死拼，无论如何要完成死守三天的任务。

二十七日这天，在老河口战场的北面，日军第一一五师团第八十五旅团击退中国守军第二十二师，攻占揣河西岸的邓县；第八十六旅团攻占邓县西北方向的文渠集、七里河；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三九联队和坦克第三师团第三联队攻占湍河上游的内乡；步兵第八十七旅团抵达南阳外围，准备攻城。

就在这时，刘峙却在鄂北战事上犯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正当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全力向北攻击的时候，刘峙突然命令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离开阻击正面，向老河口以西转移。刘峙此举意图不明。只是，当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移动后，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正面就只剩下了第一八〇师和第一七九师，结果导致日军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南漳，并随即突破欧家庙阵地逼近襄城。南漳失守后，刘峙似乎有所醒悟，命令第三十三集团军立即停止移动，命令暂编第五十三师和暂编第二十八师侧击向襄城推进的日军，命令第三十八师和第七十七军反击南漳。此时的南漳城内只有日军的一个独立大队，中国军队反击成功。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不顾一切地向北突击，攻占襄城后又占领樊城，从南面逼近了老河口。

几天来一直在老河口附近苦战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第二十六联队，

突然接到了第十二军司令部的一个令他们有些吃惊的命令：迅速组织起一支突击队，偷袭转移到均县草店的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如果能把司令长官刘峙上将捉到手最为理想。命令还附加了一个要求：突击队一律化装成中国军队的残兵。

尽管第二十六联队联队长山下大佐认为，这一命令执行起来有点不现实，但他还是挑选了三十名士兵组成突击队，队长为第二中队中队长樱井元彦大尉。这些日军官兵从里到外穿上了缴获的中国军服，把日本战刀换成了中国军队使用的大砍刀斜背在身后，连骑着的马都是缴获的中国马。樱井大尉甚至还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李光良。

突击队二十八日晚上出发，但在接近目的地的时候陷入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中，三十多名衣冠不整的日军被追得满山乱跑，最后在伪军张岚峰部的带路和掩护下才逃回来，指挥官樱井大尉脸部受了枪伤。

日军对老河口的攻击依旧受挫，但第一一〇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一部从内乡继续向西，突破了中国守军第六十八、第十五、第八十五军以及新编第八军的阻击，攻占淅川。

此时的南阳，外围要点已全被日军攻占，成为一座孤城。

日军步兵第八十七旅团，旅团长是吉武秀人少将。该部自入侵中国后，一直在华北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游击战，以正规战的方式攻击一座城池还是第一次。

本来是二线部队的第八十七旅团，接到攻击南阳城的任务后，得到了第一一五师团一个大队和坦克第三师团一个中队的加强。吉武秀人把指挥部推进到距南阳五公里的白龙庙，制订了攻城计划：独立步兵第二〇六大队攻击城西南角；独立步兵第六一七大队攻击城西北角；独立步兵第二〇四大队攻击城东北角；独立步兵第三九一大队攻击城东南角。炮兵大队在城北开设阵地，独立步兵第三八八大队为预备队。攻击开始时间为三十日拂晓。

南阳中国守军是第一四三师，师长黄樵松。

黄师长带领第一四三师驻扎南阳已有两年。南阳的《前锋报》上曾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抗日名将黄樵松》，详细介绍了黄师长在忻口会战中的娘子关、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以及武汉会战中的大别山北麓勇敢抗敌的经历，因此黄樵松之名在当地妇孺皆知。驻扎南阳后，黄师长

组织部队和当地民众，在城北的独山、城西北的靳岗、城西南的卧龙岗等处，修筑起十多个坚固的火力据点，并同时在城内囤积了大量物资，随时准备迎击日军的进犯。

实际上，这时候日军主力已前推至南阳以西，深陷敌后的南阳城没有固守的必要，且第一四三师四二七团的二营、三营以及团部，都被集团军司令部抽走以厚警卫兵力。可是，黄樵松师长还是决心在此拼一下。在与副师长韩世俊、阎尚元以及参谋长谷云明等人商量后，黄师长决定四二八团守城东和大盆窑、独山等据点，四二九团守城西和靳岗、卧龙岗等据点，四二七团一营为师预备队，炮兵部署在城内的各个方位上，高射机枪配置在西城墙上。黄师长命令城内的居民迅速疏散，并在城外埋设大量的地雷。他告诉第一四三师的官兵们：要把南阳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与日军血战到底。现在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中国军队就要向侵略者大举反攻，我们即使看不到那一天，“也会含笑瞑目于九泉之下”。然后，他把一口棺材放在师部防空洞的洞口，棺材前的牌上写有“黄樵松之墓”五个字。

二十七日，日军攻占老河口机场后，中国军队失去了空中支援，

当天，日军开始猛攻南阳城外围据点，靳岗、十里铺、大盆窑等阵地相继失陷。紧接着，卧龙岗据点支撑不住了。四二九团在这里阻击了一天，晚上奉命撤回城内。撤退的时候，一营二连赵芳新排奉命留下。赵芳新排长带领官兵在武侯祠里埋设了很多地雷，鼓楼上还架设着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第二天清晨，日军炮火轰击时，发现卧龙岗上没了动静，于是先派少量士兵进入武侯祠搜索，还是没有发现异常。而当一个联队的日军涌入武侯祠时，鼓楼上的机枪突然响了，密集的手榴弹也随即落下。由于入祠的大门被机枪封锁，涌进来的日军被全部打死。恼怒的日军包围武侯祠后，从四面发动围攻，四二九团留下的这个排，只有几个人突围而出，其余官兵子弹耗尽后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肉搏，最后连同赵芳新排长在内数十人全部阵亡。

二十九日，南阳百姓在县长赵芝廷的带领下，冒死向城外运送伤员。刘峙也发来电报奖励第一四三师特别守城费一百万元。

三十日，南阳城东关、西关和北关都被日军攻占，双方在城里开始了巷战。第一四三师伤亡很大，弹药告罄，天黑时黄师长率部向东南方向突围而出，南阳城随即陷落。

第一四三师坚守本可放弃的孤城南阳，给日军步兵第八十七旅团很大的杀伤，其战斗精神得到了第二集团军、第五战区和重庆军事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襄城和樊城后，一部掉头反击南漳，主力继续向老河口西进。四月三日，南漳又被日军攻占，中国守军伤亡很大，仅残部突围而出。只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孤军向北，一路打来，官兵已是万分疲惫，他们认为策应第十二军的任务基本完成，如果再往前走，很可能会落入此时已聚集在豫西地区的中国第一、第五战区部队的包围中，于是三日晚下达了停止前进向后撤退的命令。日军撤退的时候，沿襄城、樊城、南漳、宜城等地大肆劫掠财物，店铺里的布匹、白糖、纸烟、盐巴、大米、药品和各种杂货被一扫而空，这个已推进到距老河口南面十几公里处的日军部队，用汽车和船舶拉着抢来的东西跑回当阳和荆门去了。

攻占西峡口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情况不妙。

第一一〇师团从西峡口继续西进，企图攻占豫西与陕南交界处的西坪，然后突入陕西境内，但遭到中国军队第八十五军主力和第七十八军一部的顽强阻击。激战到七日，中国军队收复魅门关，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伤亡四百多人，被迫停止西进。

中国军队第一二五师还在坚守老河口，其顽强程度令日军很是意外。骑兵第四旅团发起攻击的时候，刘峙曾命令第一二七师前去增援，但该师因在外围受阻被迫撤退，导致第一二五师始终是在孤军守城。此时，刘峙规定的守城时间，已从三天变成了七天。三十一日，骑兵第四旅团第二十五联队突击队冲入城内，第一二五师官兵拼死反击，日军第二中队中队长夏目大尉以及炮兵中队中队长锻冶大尉被打死，而机枪小队的官兵全部死在了城垣上。被激怒的第二十五联队联队长古泽大佐下令烧毁电报密码本，准备决一死战。但是连续两次发起攻击，依旧以失败告终。第二十六联队接替进攻后，伤亡同样令联队长山下大佐颜面尽失，遂决定晚上进行最后的夜袭。可日军的夜袭行动还没开始，中国守军的曳光弹已把战场上照得通亮，山下大佐被迫放弃了袭击计划。

三十一日这天，第一二五师再次接到刘峙的命令：死守老河口两个星期。

刘峙已经是第二次更改命令，这引起第一二五师官兵的不满。

四月二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攻击最为猛烈。化成门外的日军集中起四十多门火炮，终于把城墙轰开了几个大缺口，日军主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城垣发动冲锋。在这里防守的第一二五师三七三团二营的两个连，官兵伤亡过半，冲进城的日军达到八百多人。第一二五师投入预备队，用三挺重机枪奋力封堵缺口，最终把这股日军关在了城内。城内的日军占据着三条街道，为防止日军里应外合，第一二五师把师部和团部的警卫排以及通信兵、运输兵和其他勤杂人员全部编成战斗队，对突入城里的日军实施围歼。中国官兵将日军全部压缩到一条街上，残存的日军龟缩在砖房内抵抗，中国官兵发射了燃烧弹，熊熊大火把三百多名日军全部烧死。

在这一天的巷战中，第一二五师伤亡五百多人。

晚上，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派出第一二三师三六八团的两个营，强渡襄河进入老河口镇。三六八团刚刚接防阵地，就在化成门到东关之间与企图突入的日军展开了厮杀，部队伤亡惨重。六日下午，孙震再派第一二七师三八〇团的两个营，渡河进入老河口镇。

战事如此胶着，令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很是不安。

内山英太郎命令第一一五师团把骑兵第四旅团替换下来。

第一一五师团立即从邓县向老河口靠近。在与中国守军第四十七军发生短促战斗后，攻占丹江东岸的李官桥，从李官桥南下便是老河口了。第一一五师团鉴于骑兵第四旅团的教训，不敢从老河口外围贸然发动进攻，在补充弹药的同时，等来了从南阳南下的重炮兵第六联队以及坦克第三师团，然后一齐对老河口开始了攻击。

四月七日黎明时分，日军的重炮集中向东北城垣轰击，坦克分成几路掩护步兵冲锋。但是，日军的炮兵和步兵没有事先协同好，炮火延伸打击的时候，步兵没有按时冲锋；等步兵冲锋的时候，炮火又变得缓慢而稀疏——“右第一线第一中队以中队长为先头，企图从破坏口突入城内，但因受到手榴弹攻击未能成功，中队长小岛中尉被弹片炸瞎了眼”；“左第一线第二中队试图用梯子攀登城墙，也未成功。”

八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因为野战重炮的炮弹就要打光了，所有的坦克都开上第一线抵近射击。化成门和东门间的城垣再次被炸塌，多路日军在坦克的开路下蜂拥而入。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日军第一一五师

团以伤亡四百余人的代价冲入老河口镇街区。

战局已无法挽回，中国守军第一二五师残部、第一二七师一部于傍晚向西突围，撤至郧县附近。

老河口陷落。

四月十二日，中国军队突然发动了反击——这或许就是刘峙所说的“决战”时刻，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各一部反击光化县和老河口，第五十五、第六十九军各一部反击邓县，第四十七军一部反击李官桥。但是，各路部队的反击作战成效不大。

二十八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再次从西峡口向西攻击，遭到中国军队第三十一集团军各部的阻击，该师团各旅团都陷入包围中，粮食弹药告罄，部队断炊且伤亡严重，被迫转入守势。

为了打开战场僵局，山西方面的日军第一军第六十九师团，于五月中旬由晋西南的陕县出动，分别向豫西的灵宝和官道口攻击前进，中国第一战区由此被卷入战事。第一战区第四集团军奉命堵截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日军一旦攻占官道口或灵宝，再往西就是潼关了，而潼关是镇守西安的门户，因此胡宗南要求第九十六军拼死也要挡住日军。

十八日晚，日军全力攻击，第九十六军阵地被突破多处，新编第十四师把师直属部队全部投入作战，才将当面日军击退。十九日，第一七七师从右翼迂回日军后路，新编第十四师从正面出击对日军实施反击。在攻击老虎山的时候，四十团官兵在团长殷义盛的指挥下勇敢肉搏，与日军反复拉锯，在四十二团和四十四团的助攻下，加上中美联合空军前来支援，向日军投下了大量的燃烧弹，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开始溃退。

第九十六军作战时，卢氏县县长杨子熙带领当地民众全力支援。特别是卢氏的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抬伤员送粮食。在中国军队的官兵与日军肉搏的时候，学生们稚嫩的喊声一直传到阵地上来：“将敌人消灭在官道口！退后一步的不是中国好男儿！”——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攻入卢氏，就在距此不远的河滩上，一群逃难中的学生被日军包围，男学生当即被刺刀刺死，女学生被轮奸后一一刺死，凝固在孩子们脸上的惊恐表情令后来的收尸者不忍目睹。

在青年学生的呼喊声中，中国官兵奋力追杀日军，仅新编第十四师就毙伤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日军遗留的尸体都被砍去了左手——日军已

经来不及抢走尸体，只能将死者的一只手带回去。此战，新编第十四师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三百多人，在肉搏战中身受刺刀伤的连长就有十二名；第一七七师毙伤日军千余人，伤亡营长以下官兵千余名，肉搏战中身受刺刀伤的连长十四人。

血战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地方。

在老河口方向，第二十二集团军一部一度反攻入城，但没能支持多久又撤退出来。从此，交战双方隔着襄河形成对峙，这种对峙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日军发动的老河口作战，虽然控制了老河口机场，但自身伤亡总数达到一万五千多人，这是在中国战场上日军首次在一次战役中伤亡超过中国军队。

侵华日军的败势已经不可逆转。

就在日军发动的老河口作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中国战场的另一个方向上日军第二十军也发动了攻势。

只是，那时候，谁也不曾预料到，日军第二十军发动的这次作战，将是抗战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

如果不是这一原因，地处中国湖南西部的这座小城，也许至今不会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所熟知。

这座湘西小城，名叫芷江。

第四十二章

漫山遍野杀鬼子

老河口作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向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突击。

为了应对美军可能从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别加强了山东半岛防务。但是，由于必须抽调部队进行老河口作战，同时还要抽调部队前往上海等地加强防务，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兵力捉襟见肘。为此，日军在山东济南拼凑零散兵力，组建了第四十三军，下辖第六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第九旅团以及独立步兵第一旅团，总兵力只有二十万，再加上五十万的伪军，日军在敌后战场不得不转入守势。

为了充分利用日军兵力薄弱的时机，毛泽东提出了一九四五年内“扩大解放区”的作战任务：“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对津浦路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攻势作战。二月一日晚，鲁南军区主力部队奇袭了津浦路沿线的泗水城，击毙伪军暂编第十军军长荣子恒以及伪军参谋长和日军顾问，全歼城内日伪军。同时，八路军还攻克了泗水城外围的故县、杨庄、杨公村等据点，击退日伪军的增援部队，歼敌两千多人。十一日，八路军胶东军区五个团又五个营以及五万民兵，在胶济铁路线以南袭击了伪军“剿共第七路军”赵保原部。战斗中八路军自己制造的牙山炮发挥出巨大威力，三百多发炮弹落入赵保原所在的万第城内，将伪军修筑的据点和碉堡全部轰塌。经过九天的激战，八路军毙伤伪军两千余人，俘虏七千余人。三月八日，八路军鲁中军区主力四个团与民兵部队一起，夜袭蒙阴城，全歼日伪守军一千三百余人。

日军对八路军的迅猛反击十分惊慌，特别是对伪军暂编第十军军长荣子恒被击毙很是震惊，日本《读卖报知》的报道是：“二月一日午夜，荣子恒中将在泗水县（津浦线兖州东北四十公里处）……发生的战斗中

阵亡。荣氏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鲁中山区毅然决然地率领部下二万人马投奔我和平阵营。尔后任国府（指汪伪政府）军暂编陆军第十军军长，配合我皇军参加山东地区的治安建设。”

一月二十一日夜，八路军太行军区发起道清战役，参战的除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外，还有冀鲁豫分局党校警卫团，共四个团加三个营。夜色中，八路军从九里山悄然南下，越过道清（道口至清化）铁路，攻击了铁路线以南、平汉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的日伪军，连续捣毁敌人的十八处重要据点。日军第一一七师团的一个大队，兵分三路企图合围八路军，但在樊庄附近遭遇伏击，因为损失严重不得不迅速回撤。二月二十日，八路军向道清铁路以北的日伪军发起攻击，先后攻克十余个据点，一度攻入辉县城关，令附近的伪军部队风声鹤唳。三月二十二日，第七军分区主力再度向南越过平汉路，挺进黄河北岸的原武和阳武地区；第八军分区主力则向西渡过沁河，挺进温县和孟县地区。道清战役于四月一日结束，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两千五百余人，解放沦陷区人口七十五万。自黄河以北、道清铁路以南，除了几个县城之外，其余地区全部为八路军所掌握。六月，八路军太行军区调集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军分区主力以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共九个团加上三万余民兵，攻势直指盘踞在豫北安阳附近的日伪军，在连续攻克伪军的两个指挥部后，八路军官兵将安阳以北、以西、以南的日伪军据点全部拔除。与此同时，八路军太岳军区广泛发动抗日民众，用绝水、绝粮、绝路的战法，令沁源县城里的日军身处绝境，度日如年，最后只得在援军的接应下主动撤出晋南重镇沁源。

一九四五年初，在冀鲁豫解放区附近，尚有日军七千人、伪军近十万人。四月二十四日，冀鲁豫军区统一指挥第三、第七、第八和第九军分区各一部，发起南乐战役。经过三个昼夜的激战，八路军官兵捣毁了日伪军修筑在县城外的全部据点，继而攻克位于冀鲁豫交界处的重要通道南乐，歼敌三千四百余人，使纵贯豫北的卫河以东地区成为解放区。五月十七日，冀鲁豫军区第一、第八、第十一军分区主力以及第九军分区骑兵团发起东平战役。八路军兵分三路，中路攻击东平县城，右路攻击金乡与济宁间地区，左路攻击东阿县城。当八路军官兵突入东平后，守城的千余伪军即刻溃逃，城内剩余的三十多名日军依靠据点死战不降。八路军官兵发起持续猛烈的围攻，据点里的日军支持不住最后集体自杀。攻克东平后，冀鲁豫军区部队渡过黄河攻克谷阳，邻近的馆陶、巨鹿等地的伪军闻风战栗，弃城而逃。自此，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自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起，连续发动了一系列作战：在任（丘）河（间）战役中，攻克任丘和河间县城，切断了北平至冀南大名的公路；在文（安）新（镇）战役中，攻克文安和新镇县城；在安（平）饶（阳）战役中，攻克饶阳、安平、武强三个县城，使得日伪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被动局面，迅猛地扩大了解放区。六月间，冀中军区部队向子牙河沿岸发动攻击，收复大城、献县；接着又实施大清河北战役，歼灭日伪军二千三百余人，收复交河县城。同时，八路军晋绥军区自二月开始，连续向当面日伪军展开攻击，至四月八日，蜿蜒于吕梁山西麓长达一百一十公里的离岚（离石至岚县）公路被八路军收复，晋绥军区所辖的第一、第三和第八军分区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华中地区的新四军，自一九四四年以来，始终处在与日伪军连续作战的状态中。进入一九四五年后，苏北军区的新四军将日伪军压缩在苏北直至苏东的沭阳、涟水、淮安、阜宁、盐城等县城以及新安镇等据点内。四月，新四军集中主力发动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守城的伪军军部南逃，结果逃进新四军事先布置好的伏击圈内。此战，新四军歼灭和俘虏伪军两千余人，收复盐阜公路，解放村镇五百六十余个。处于长江三角洲的苏中军区，于二月二日突袭了高邮、宝应、兴化和盐城之间的日伪军重要据点，把解放区扩大到两千四百多平方公里。接着，苏中军区调集主力，伏击了从宝应调防周庄的日伪军，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伪军一千余人、日军二百余人。淮北和淮南军区也频繁出击：四月十五日，淮北军区发动公路破袭战，攻击了永城和涡阳地区日伪军的重要据点，歼敌三千余人；五月，发起宿南战役，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歼伪第四方面军第十五师一千九百余人”，控制了“淝河和浍河间的大片地区”，开辟出宿南新解放区，“使淮北津浦路西根据地八个县连成一片”。

在国土的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日游击队也在积极出击。二月，珠江纵队挺进清远、四会和广宁地区，向湘桂边推进；东江纵队巩固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北上佛冈、英德、和翁源地区，向湘赣边推进。在雷州半岛上，共产党人组织雷州抗日起义，成立了雷州人民抗日武装。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也先后在琼山、文昌、澄迈、昌江、陵水、保亭、崖县、临高和儋县等地发动了全面攻势，迅猛地扩大着解放区。

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游击队，在进入一九四五年后发动的攻势中，歼灭日伪军约十六万人，攻克和收复县城六十一座，扩大解放

区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解放沦陷区人口约一千余万，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周围，有力地牵制了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岌岌可危。

当日军在中国受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双重挤压时，美军也在太平洋上对日军发动了一系列使其遭遇灭顶之灾的攻势作战。

硫磺岛之战是日军在太平洋彻底崩溃的开始。

从日本本土至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小笠原群岛，由一系列火山岛组成。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一六七三年一个名叫戈尔的英国人发现了这里，并把群岛中的一个核心岛购命名为硫横岛。一百多年后的一八〇五年，俄国人登上过该群岛，因其极为荒凉而没有宣布占领。又过了几十年的一八三〇年，两个英格兰人、一个热亚那人和二十五个夏威夷人登上这片群岛并居住下来，不久后美国人便打算将其变为海军船只和邮船的补给站。但是，日本人说，这片小岛早在一五九三年被一个名叫小笠原的日本人发现，所以这是日本领土——包括硫磺岛在内的小笠原群岛，作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归东京府管辖。

硫磺岛是小笠原群岛中唯一能建造机场的岛崎，该岛距离东京约一千二百公里，因此成为保卫日本本土的前沿。从战略上讲，如果硫磺岛落入美军之手，日本东部以及首都东京都将暴露在美军陆基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自发动“大东亚战争”以来，日本人从没考虑过本土安全问题，直到大本营开始图谋南进，硫磺岛的战略位置才得到关注。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在南面的摺钵山山麓修建了一条机场跑道，日本海军也开始在这里修建海岸炮台。一九四四年，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后，为了确保“绝对国防圈”的前沿，日本人在岛上修建了第二条机场跑道，同时大大加强了驻军兵力。至一九四五年初，硫磺岛上日本海军和陆军总兵力约两万三千人，指挥官是陆军中将栗林忠岛。

日军沿着硫磺岛海岸线建造了三条防御工事，每一条都密布着坚实的碉堡，每座碉堡外都有数米厚的沙袋防护。依托密林、岩缝和洞穴建造的火力据点，更像迷宫一样盘根错节，每一个据点都被纵横交错的坑道连接。海军的岸炮可以覆盖整个近海海面和海滩，陆军的炮兵阵地全部设在挖入地下的巨大坑道内，连坦克也被掩埋起来当作固定火炮使用。山腰上无数个射击阵地都隐藏在洞穴里，洞口甚至建造得能够抵御火焰喷射器的攻击。而在阵地后面天然或是挖掘出的岩洞中，储藏着至少能够维持两个多月的作战弹药和生活物资。岛上最大的洞穴，是栗林

忠岛的指挥部，可同时容纳两千多人，有十几个出入口。

为了进攻日本本土，美军必须拿下硫磺岛。

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军轰炸机，从一九四五年新年那天开始，每天例行公事一样飞临硫磺岛投弹，美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也不远不近地绕着硫磺岛持续开炮。无论是航空兵的轰炸，还是海军舰炮的轰击，都好像是一群耐心十足的狩猎者围着一头受伤的野兽——硫磺岛上的日军始终沉默，一弹不发。但是，有一天，一艘美军扫雷舰离海岸实在是太近了，这对岛上的日军炮台长产生了巨大诱惑，于是岸炮开火了，美军的扫雷舰身中六弹，死了十七人，伤了一百二十人。可令日军困惑的是，美军依旧日复一日不紧不慢地投弹和开炮——“美军的旁若无人态度及其实力展示，使日本人发生动摇。从海面上飘过来的流行音乐声好像一批人在郊游，可以看见脖子上围着毛巾的美国水兵像旅游者似的朝岛上眺望”。栗林忠岛忍不住了，命令海岸炮兵一齐开火，两架零式战斗机也奉命起飞，结果美军的舰队一哄而散。——栗林忠岛的这一举动，暴露了隐蔽在岛上的大炮位置及射击范围，使美军在攻击前的最后时刻修订了炮击坐标。

二月十五日，美军舰队开始向硫磺岛靠近。

十九日清晨六时四十分，伴随着突然响起的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以残酷著称的硫磺岛攻防战开始了。美军的七艘战列舰、四艘重巡洋舰和四艘轻巡洋舰齐射五分钟后，九艘炮艇抵近海滩向摺钵山炮击。八时零三分，所有的炮击戛然而止，一百二十架舰载机起飞，火箭、燃烧弹和炸弹密集轰炸了岛内的海滩、高地和机场。机群轰炸完毕后，舰炮轰击再次开始，这次加入了十艘驱逐舰的火力。炮火延伸时，舰载机再度临空，朝着火山灰铺就的黑色海滩实施了猛烈扫射。整个硫磺岛在美军的反复打击下，如同一个燃烧的大火球，连海面上的美军官兵都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认为在这种火力下“谁也活不成”。

岛上的日本兵不但活着，当美军的炮火逐渐延伸的时候，他们从各自的洞穴、工事和战壕里向海滩瞭望，看见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往海滩上爬。——第一批从水陆牵引车跳下来的美军士兵，很快就陷在柔软的黑色沙滩里。岛上日军的迫击炮、机枪和步枪有节奏地朝他们射击，海滩上到处是伤员的呻吟声和卫生员的呼喊声。接着，美军的第一批坦克登陆了，岛上日军的巨型岸炮并没开火，只是埋伏在附近的反坦克炮在沉稳地射击——栗林忠岛决定不在海滩上与美军死顶。

天黑了，登陆的美军已达三万多人。

万多人拥挤在狭窄的滩头阵地上，成为日军猎杀的靶子。这是个地狱般的夜晚，日军开始朝海滩上发射一种经过改装的巨型火箭弹，每次爆炸都伴随着残肢在夜空中飞舞。黑暗里，到处都闪现着身背无线电发射机的日军的身影，这些日本兵不但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和方位，还点燃了美军卸在海滩上的一个又一个弹药点。美国随军记者记述道："在太平洋的其他任何战场，都没见过这样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躯体四肢分开五十英尺。"

战斗到第三天，美军的前锋部队突破日军的第一道防线，自此开始向纵深发展。天不停地下雨，但硫磺岛上的摺钵山在美军的火力打击下始终在燃烧。美军用火焰喷射器逐个清除岩洞里的日军。一个星期后，栗林忠岛向东京报告，他的部队伤亡过半，大部分火炮被摧毁，机场已经丢失，美军正向他的指挥部靠近。——实际上，战斗依旧残酷，美军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牺牲。整整十天后美军才攻下日军的第二道防线，开始围攻栗林忠岛所在的核心洞穴。硫磺岛上的机场被修复了，一架刚刚轰炸完东京、油料即将耗尽的美军轰炸机安全着陆，这足以证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流血牺牲是值得的。

三月五日，栗林忠岛命令残存兵力集结在最后一块阵地上。日军为对付美军的喷火坦克，把炸药绑在身上躺在美军坦克的必经之路上，只是这种自杀式的抵抗终是无法扭转行将彻底崩溃的战局。十七日，残存不多的日军被压缩在硫磺岛东北端一个很深的山洞里。美军攻上来的最后时刻，栗林忠岛下令烧毁军旗，并向东京大本营发出了诀别电报：

敌军进攻以来，以其难以想象的物质优势，由空、海、陆向我军进攻；对此，我军不断进行拼死战斗，这是卑职聊堪自慰的，部下将士的奋战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在顽敌猛攻面前，将士相继战死，卒至辜负对我的期望，把这些重要地区被迫委诸敌手，实不胜惶恐之至，深致谢罪之忱。尤思不夺还本岛，则皇土永无宁日。为此，纵化为鬼魂，亦誓率皇军卷土重来。当此弹尽粮绝，生存的全部将士拟作最后的战斗时，痛感皇恩浩荡，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悔。兹告永别。

栗林忠岛带着约五百名日军冲出山洞，立即遭到美军猛烈的火力拦截。二十七日，已经负伤的栗林忠岛朝着日本的方向跪下，把战刀插进了自己的腹部。随身参谋中根兼次在他即将倒下时，朝他的脖子砍了一刀。掩埋了栗林忠岛的尸体后，中根兼次与参谋长高石正一起开枪自

杀。

面积只有美国“纽约曼哈顿三分之一”的硫磺岛，夺去了四千五百五十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生命，还有三百六十三名美国海军官兵阵亡。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负伤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人，海军官兵负伤八百九十一人。这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作战。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说，在参加硫磺岛作战的美军中，“罕见的勇敢成了常见的美德”。

而守岛的两万三千日军，活下来的约三千人。

美军终于可以从硫磺岛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了。

三月九日至十日，美军对东京实施了最大规模的燃烧弹空袭，三百三十四架B-29轰炸机投下的燃烧弹暴雨一样，令人口密集的东京燃起冲天大火，全城百分之四十的区域化为废墟，死亡人数高达八至十万——“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几天后，日本天皇视察了空袭后的东京城，天皇的侍从发现，站在废墟上的民众脸上都是怨恨的表情“他们目送着御车没有鞠躬”。

硫磺岛之战令美军更加靠近了日本本土。

四月一日，美军登陆日本琉球群岛的冲绳岛。

作为琉球群岛的核心岛屿，冲绳岛位于中国台湾岛、中国大陆与日本本土之间，自古就被称为“东方的交叉路口”。由于日军占领着台湾，因此，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冲绳岛上也只驻扎着六百多名日军。一九四四年中旬，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日军开始在冲绳部署重兵，到一九四五年初，岛上驻有由第三十二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指挥的约十万官兵。

就太平洋战场而言，冲绳是防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

美军还是提前一个月开始了对冲绳岛的轰炸，美国海军的蛙人同时在海岸边清除障碍和水雷。到了三月三十一日，落在冲绳岛上的炸弹和炮弹已达三万发以上，日军所有的地面防御工事全被摧毁。第二天就是复活节了，美军的轰炸和炮击止于夜半时分。但是，第二天黎明，海面上再次响起舰炮炮弹的出膛声，冲绳岛上的日军透过迷蒙的海雾看去，

顿时惊呆了：一千三百多艘美军的各种战舰如同一道钢铁围墙矗立于冲绳岛近海海面。

上午八时，满载美军攻击部队的登陆艇开始向海滩推进。登陆艇上驶出两栖装甲车和牵引车，然后美军士兵蹚着海水爬上了沙滩。没有抵抗。到了晚上，约六万名美军登上了滩头，他们中间有人甚至连鞋都没湿——冲绳岛上的日军沿用了硫磺岛的防御方式，不在滩头作战。

登陆的第二天晚上美军占领了机场。

第三天，美军已将冲绳岛分割成两半，依旧没遇到像样的抵抗美军分成两路向岛的南北推进。

情报显示的十万日军到底在哪里？。

陆战队十二团的布朗中校甚至向师里的军需官提出：尽快给弟兄们送来一具日军尸体吧，因为不少士兵从没见过日本人是啥样。

四月五日，日军发动了全面反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陆军第三十二军相互配合发动的反击，被命名为“菊水一号”作战——联合舰队此时只剩下残存的第二舰队，拥有巨型战舰“大和”号、巡洋舰“矢知”号以及八艘驱逐舰——残存的战舰编成海上特攻队，在伊藤整一中将的率领下，冲向美军在冲绳岛海域的舰队，岛上的第三十二军兵分四路同时对登陆的美军实施攻击。

七日晨，日军舰队被美军潜艇发现。瞬间，三百多架美军舰载机蜂拥而至。这支小小的日本海军舰队，既没有陆基空军的护航，也没有航母舰载机的助战，除了径直朝冲绳海面上的美军舰队撞去之外，没有任何还手的可能。很快，“矢知”号巡洋舰被炸弹和鱼雷击中开始下沉，接着“大和”号战列舰受到美军战机的密集围攻。排水量达六万四千吨的“大和”号，是日本海军最后的支撑。此时的“大和”号被数枚炸弹和鱼雷击中，虽仍在全速向冲绳方向前进，可舰体已经开始倾斜。美军的一百五十多架战机再次飞临，“大和”号又中两枚鱼雷和数发航空炸弹。下午二时左右，当鱼雷再次击中“大和”号的时候，这艘巨型战舰已经倾斜三十度以上。离舰的命令终于下达，但伊藤整一拒绝离开。从受到美军攻击时算起，“大和”号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挣扎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二时二十三分左右，整个战舰与三千多名日本水兵一起，连同伊藤整一在内，沉没在了日本九州西南海面约五十海里的大洋深处。——大日本帝国引

为荣耀的强大海军至此丧失殆尽。

美军开始对冲绳岛全岛进行扫荡式作战。

冲绳岛之战到了空前残酷的阶段。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四月十二日下午溘然逝世。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定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整个人类就将沉沦在屈辱和灾难之中。

而蒋介石对罗斯福逝世的反应被美国人认定为“不知感激”。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曾单独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谈，那时他对罗斯福评价甚高：“丘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及至获悉罗斯福逝世，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记述毫无感情色彩：“今晨六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已于四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罗斯福总统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和一定主张，并非徒恃强权之霸者。今后美政府恐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

蒋介石担忧罗斯福的去世会令正在走向胜利的太平洋战局发生变化；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也无从判断罗斯福的离世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就在这种茫然中，又一个消息传来：日军向湖南西部发动了全面进攻。

此时的南中国浸润在连绵的梅雨中。

当日军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向出击地集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攻势作战。

日军攻击的目标是中国湖南西部的芷江。

芷江是中美联合飞行五团所在地，拥有最新式的P-51战斗机，B-24、B-25轰炸机，C-43、C-47运输机以及其他类型的作战机群。巨大的机场有南北两条跑道，是对日军威胁最大的航空作战基地。

日军发动芷江作战，唯一的理由是摧毁芷江机场。但是，随着美军攻占硫磺岛，并在冲绳岛登陆，美军已不再只能利用中国大陆的航空基地来轰炸日本本土，这就令日军的攻击目的显得十分模糊。

四月十一日，中国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报告如下：

随着冲绳作战开始，华南方面不仅在防卫本土上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且预想敌人在华南方面的登陆企图，将只局限于英军夺取香港。为了不致给派遣军在战争指导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认为只留驻能够确保香港和广州的兵力即可，因此决定将海南岛、金门岛的兵力撤回广州地区，并从该地区调出第二十七、第四十、第一〇四三个师团，令其经由赣州、南昌转用于南京附近。

在中国战场上，放弃最南端的占领区，向重点部位收缩兵力，冈村宁次认为这已是不得已的建议了。可是大本营的命令很快抵达，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师团将全部调到华北地区，要求至迟在八月间完成。——把中国战场上最精锐的师团向北方移动，这就意味着日军必须放弃的不仅是海南岛了，如果不是战争已经到了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土的地步，来自东京的这一指令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那么，准备完毕的芷江作战，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摧毁美军航空基地的作战目标已失去意义，但在研读了大本营的指令后，另一个过硬的理由出现在冈村宁次面前：湘西历来是川黔门户，是护卫重庆安全的中国第六战区的右翼。在这一区域内，雪峰山和武陵山南北纵列，资江、沅江、澧水交错东流，洞庭湖滨的千里沃野为中国军队的第六、第九战区的近百万官兵提供着军粮。而位于广西和广东的日军撤向华北，只有经过湖南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如果不控制湖南西部重要的战略地区，特别是芷江目前依然存在中国军队主力以及美军的强大机群，那么日军北撤时必会受到中国军队的截击以及美军战机的轰炸，即使日军能够冲过去也将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

于是，“摧毁芷江空军基地”和“有助于第十一军的转进”，成为冈村宁次发动芷江作战的最后的理由。

冈村宁次命令第六方面军第二十军承担芷江作战任务。

日军第二十军是在湖南衡阳新组建的一个军，司令官为坂西一良中将。该军的任务是控制长沙、衡阳和邵阳地区，面对中国第六、第九战区作战。接到进攻芷江的任务后，由于该军在策应韶关作战时攻占了永新、遂川和赣州等地，所辖部队仅够维持占领区，要进攻芷江再也抽不出参战部队。坂西一良要求大本营抽调第四十七师团前来支援；还把军野战补充队临时改编为独立混成第八十一、第八十二旅团；再从第六十四、第一一六师团抽出一些老兵和军官，与刚从本土征来的十七岁左右的少年兵混编成第八十六、第八十七旅团，以接替湘潭、浏阳、醴陵、宝庆、郴州、长沙等地的警备任务，把作战部队腾出来。即便如此，原本拟定用于进攻的三个师团的兵力还是凑不齐——完全丧失了制空权的日军，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的兵员运输都已不能正常进行，奉命开赴中国战场的第四十七师团，除了第一三一联队抵达了湖南外，其主力还远在朝鲜半岛上。

坂西一良对日本行将崩溃全然不认同，依旧把芷江作战视为进攻四川的一部分。他认为只要自己的部队冲入芷江，冈村宁次便会指挥大军沿着他开辟的通道一路杀到重庆去。

由于急于作战，尽管没有足够的兵力，坂西一良还是发动了进攻：第一一六师团为主攻，第六十八师团第五十八旅团与第四十七师团第一三一联队为左右两翼。

进入一九四五年春，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了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和整训西南各战区部队：第一方面军卢汉部（驻云南开远）、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驻广西南宁）、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驻广西柳州）、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驻湖南辰溪）以及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等。其中位于湖南境内的第四方面军，其作战辖境北以澧水为界与第六战区相邻，南面与第三方面军辖区接壤，部队沿洞庭湖以西、以南一线与日军第二十军对峙。

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所辖第十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〇〇军都是美械装备；其中的第十八、第七十四军更是重庆军事委员会手中的绝对主力。

获悉日军将要攻击湘西，何应钦随即作出应对部署：

甲、（一）第四方面军应以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之线，与敌决战。（二）第三方面军应以一个军（九十四军），先集结通道、靖县地区，准备向武冈以东进出，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三）王总司令敬久，应率所部三个师及第十八军之一个师，准备由桃（桃源）、常（常德）向新化以东进出，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四）由上一、二、三项之部署，期于武冈、新化以东之地区击破来攻之敌。（五）新六军应准备一个师空运芷江，为第四方面军之总预备队。（六）为保障第四方面军之作战安全起见，第三方面军应确实拒止黔桂路及桂穗路之敌，使不得越过南丹、龙胜两要地。

乙、各兵团行动：（一）第四方面军主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〇〇军），应立即完成在武冈、新化一带地区之作战准备，其第十八军应立即抽出一个师，集结于马迹塘、安化附近地区，归王总司令敬久指挥，于本卯月（四月）哿日（二十日）集结完毕，准备向南之攻击行动。其余两个师，应就既设阵地，完成作战准备，拒止由长、岳方面来攻之敌。（二）九十四军应饬即由现在驻地出发，徒步向通道、靖县附近地区集结，并限于本卯月底集结完毕。其笨重器材，另饬后勤司令部派车运输。（三）王敬久集团之三个师，应即开始行动，向常德、桃源附近地区集结，限于卯月有日（二十五日）前集结完毕，并指挥第十八军之一个师，准备向南之攻击行动。（四）第三方面军应准备一个军（十三军）待命，向马场坪、栌山一带地区推进，准备机动。（五）第四方面军突击队应加强活动，侵入敌后，遮断其补给联络，并对进犯之敌后方予以扰乱、袭击及破坏。

丙、阵地设备：武冈、花园、洞口、赛市、新化、烟溪、马迹塘、桃源、常德间之既设阵地，应加强工事，并完成给养、给水、屯粮、屯弹，请设备。

丁、决战地带后方之设施：应在后方要点屯粮、屯弹，设备交通通信、空中投掷场等，并应择要尽先完成之。

面对即将来临的作战，王耀武和他的官兵们信心满满。

在此开列正面战场对日最后一战的中国军队团以上军官名单：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夏楚中、彭位仁，参谋长邱维达，副参谋长罗幸理。

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副军长石祖黄、戴之奇。辖第十一师师长杨

伯涛（三十一团团长尹钟岳、三十二团团长张涤瑕、三十三团团长李树兰），第十八师师长覃道善（五十二团团长沈熙文、五十三团团长尹俊、五十四团团长夏建勋），第一一八师师长戴朴（三五二团团长杨国杰、三五三团团长余坤、三五四团团长黄建三）。

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副军长陈为韩。辖第十五师师长梁祗六（四十三团团长黄玉豁、四十四团团长张伯侯，四十五团团长王一之），第七十七师师长唐生海（二二九团团长许秉焕、二三〇团团长柏柱臣、二三一团团长陈运武），第一九三师师长萧重光（五七七团团长傅佑任、五七八团团长车驷、五七九团团长王政治）。

第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副军长余程万、张灵甫。辖第五十一师师长周志道（一五一团团长王奎昌、一五二团团长谢恺棠、一五三团团长王梦庚），第五十七师师长李琰（一六九团团长宋子玉、一七〇团团长孙进贤、一七一团团长杜鼎），第五十八师师长蔡仁杰（一七二团团长明灿、一七三团团长蒋立先、一七四团团长李运良）。

第一〇〇军：军长李天霞，副军长赵锡田。辖第十九师师长杨荫（五十五团团长陶富业、五十六团团长刘光宇、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第六十三师师长徐志勖（一八七团团长赵尧、一八八团团长刘安泰、一八九团团长李灵运）。

暂编第六师师长赵季平（一团团长黄健、二团团长黄德涛、三团团长陈恭贤）。

第十三师师长靳力三（三十七团团长李竹泉、三十八团团长钱伯英、三十九团团长罗有径）。

挺进第六纵队司令陈光中。

如果加上其他战区的策应部队，芷江作战，中国军队参战官兵约二十余万，而日军加上策应部队只有七万左右。抗战初期，日军每战都用一比十的兵力对比，来拟订与中国军队的作战规模，在这一兵力比例下他们攻城略地，抢掠杀戮，恣意妄为。现在，虽然中日兵力对比为三比一，但双方的战力和素质已今非昔比：日军新兵多，士气低落，而中国第四战区部队均为精锐之师，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官兵士气高昂。——与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一样，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悲惨时刻顺势降临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夜，位于资水以东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分成三路纵队自东向西开始行动。右纵队以第一〇九联队为前锋——第一一六师团的设想是从北向南迂回，把王耀武部主力包围消灭在武冈以北、资水岸边的高沙一带。十五日夜，第一〇九联队渗透到白马山以东约五公里处，开始攻击中国守军的前沿阵地。在新化以南的马王坳、大桥边、巨口铺、龙溪铺等阵地，中国守军仅各有一个连，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官兵们奋力拒敌。马王坳阵地上，守军血战到底，最后与日军同归于尽。青岩据点守军，是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的周北辰连，中美联合空军不但投下了大量的粮食弹药，还对攻击的日军实施不间断的轰炸和扫射，周北辰连官兵斗志极盛，日军的攻击屡屡受挫。

十八日，日军第一〇九联队抵近隆回司，其前锋第一大队接近大黄沙附近。同时，中纵队第一三三联队和左纵队第一二〇联队，突破中国守军第一〇〇军设于岩口铺和桃花坪的阵地，向西抵近金龙砦。

在战场的北面，日军第一三一联队渡过资水，与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在新化以南接战；在战场的南面，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以及配属的第二一七联队也从东安向新宁推进，第六十四师团第六十九旅团则由沅江攻击益阳。

王耀武的意图是：在日军攻击的初期，于前沿实施逐步抵抗，把日军诱至新化与武冈间的雪峰山区，实施分割包围。为此，战前他特别命令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组成一个精干的勘察小组，对南北纵贯于绥宁、武同、洞口一带的雪峰山区进行了详细勘察，对这一地域内的要隘、通道、制高点以及特殊地形地物做了详细记录，尤其是对武冈境内的雪峰山与泡洞山之间长约二十公里的山谷进行了全面测量。

日军对此一无所知。

攻击初期逐渐深入的态势，增加了坂西一良的轻敌与狂妄：“判断全面形势的发展比预期还要有利，遂决定配合关根支队（第五十八旅团）的前进扩大饭岛挺进队（第一〇九联队第一大队）的成果，从北面进行大的迂回包围，把当面的重庆军主力消灭在高沙市一洞口一花园市一武冈西北地区。”

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军中纵队第一三三联队，在野炮第一二二联队的配合下，在白马山南侧突破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的阵地，二十一日晨抵近雪峰山东麓。左纵队第一二〇联队攻占高沙市。右

纵队第一〇九联队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陷入苦战。战场北面的第一三一联队，被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军阻止于新化以南。南面的第五十八旅团被中国第七十四军阻止于真良附近。实施牵制性攻击的第六十九旅团在占领桃江后，受到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的猛烈反击，该旅团被迫撤离桃江返回了益阳。——此刻，坂西一良发觉自己很可能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中纵队和左纵队当面的中国军队，似乎有意做轻微抵抗而后撤退，但右纵队第一〇九联队正面的中国军队抵抗出奇地顽强，北面的第一三一联队在中国军队的阻击下同样寸步难行——那么，从北向南迂回包围王耀武部主力的设想，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王耀武部的主力不在南面而在北面。

坂西一良随即改变作战计划，放弃从北面迂回包抄的决定，采取中央突击的方式，除第一〇九联队继续原地抵抗之外，其余部队向江口方向的纵深猛烈突击，争取把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龙潭司附近。

但是，坂西一良很快就发现又不对劲儿了："龙潭司方面之重庆军不仅逐次增加兵力进行顽强抵抗，而且其强大的部队更挺进到步兵第一〇九联队的背后，从东西两个正面进行反攻。"

此时的战场，已经不是任日军肆意妄为的战场了。

二十四日，鉴于益阳方向已无顾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决定将精锐的第十八军调入战场，准备与日军决战：

一、王敬久兵团（九十二军暂五十一师）迅以主力接替十八军常德、桃源、益阳、宁乡方面之防务，拒止当面之敌，限卯月底接替完毕。第十八师仍归还第十八军建制。

二、第四方面军主力七十四军、一〇〇军、七十三军，应于武冈、洞口、新化线，竭力阻止来攻之敌，使尔后之决战有利。其十八军主力，应照前令于卯月底前集结于沅陵，并依情况可不待集结完毕，即由沅陵、溆浦道南下，参加该方面军主力决战。第十八师应于交防后，沿安化、蓝田、邵阳方向挺进，以遮断敌后之交通，使主力军作战有利。

三、第十三师于到达辰溪后之行动，由王司令官自行规定。

四、九十四军（欠四十三师）应遵照卯梗（二十三日）忠整兴（昆明）电所示，限本卯月底前集结靖县、会同地区。尔后之任务及行动，另令饬遵。

五、新二十二师控置于龙江，保持机动。

六、第三、第四两方面军，对新宁、城步、绥宁方面之作战，应密切协同。

王耀武选择的决战地点，是沅江、资水的分水岭雪峰山地区。

在湖南的西南部，向西渡过资水，便可看见南北走向的雪峰山如一道屏障，这道屏障的西面就是沅江，而沅江以西便是日军攻击的目标芷江。雪峰山山势陡峭，山谷幽深，山路崎岖，中国守军从山麓到山顶利用险峻地形修筑了层层坚固阵地。由于重炮在山路上无法牵引前进，日军步兵只能以轻武器向上仰攻，而中国守军均装备着火力凶猛的美式武器。——王耀武有足够的信心将日军歼灭在这片山谷中。

桂柳会战时，日军的重要作战目标是桂林机场。当日军距离桂林还很远的时候，美军就从桂林航空基地撤离了，因为美军可以判断当面中国军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而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几个月——美军不但没从与日军前锋仅隔一座山和一条江的芷江机场撤退，且各种战机还每天从芷江机场起飞助战。由于近在咫尺，美军的战机几乎是刚一升空就能飞临日军的头顶，把炸弹和机枪子弹一股脑地倾泻下去后，掉头降落，如果再次起飞连燃油都可以不加。——美国人的判断是：无论在太平洋战场上，还是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人已经不行了。

二十五日，日军第五十八旅团遭到了前所未见的轰击——“尖兵占领的高地上，松树几乎全被摧倒，看去四面山地好像全都充满了敌人。第三大队长立即部署主力开始攻击北面高地，配属的山炮也首次拉开炮门支援了步兵。然而重庆军以发烟弹指示我军部队的位置，其迫击炮及轻重机枪如暴风骤雨一般向我阵地倾泻而来，其弹药之充足使人吃惊。由于连续集中射击，附近高地成了火海。重庆军反复对我进行勇敢的突击，斗志顽强，激烈的战斗使我继续出现伤亡。”很快，第五十八旅团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陷入重围，第三大队拼死攻击企图营救，终于与第十一中队会合时，发现中队长以下军官已全部倒下，“士兵大多死伤”。

在中国守军第一〇〇军方向，日军第二二四联队被第十九师阻击在山谷中。中国官兵逐渐压缩包围圈，激战终日，日军虽然不断高喊着试图突围，但终被密集的火力所阻不得脱身。天亮之后，中美联合空军对聚集在狭窄山谷中的日军实施了猛烈轰炸，日军四处奔逃躲避，完全失去了斗志。第十九师官兵乘势清剿山谷里的残余日军，查明日军的番号

是第二二四联队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等直属部队以及一个步兵大队。根据俘虏辨认，第二二四联队联队长和步兵大队队长已被击毙。日军第二二四联队另一个大队也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无食无援的日军在绝望中突围，深夜里窜到一个小山村企图寻找食物，中国军队第十九师五十六团的两个营悄悄包抄而来，营长刘汉雄亲率一百三十人的敢死队突进小山村，日军猝不及防，死伤累累，残余的二百余人逃入密林，但很快就被清剿殆尽。此战，中国官兵伤亡二百八十余人。

向芷江方向突击的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受到猛烈阻击：“各大队有不少将校伤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下降。而重庆军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反攻。”二十五日这天，第一〇九联队第一大队伤亡一百二十五人，第二大队伤亡二百四十六人，第三大队伤亡一百七十五人。——“鉴于以上情况，联队长担心若继续盲目攻击，不仅增加损耗使我战斗力愈发低下，而且将导致将来很难完成任务，于是决定在确保当时进入线的同时，暂时整理战线。”

二十六日，中国军队第七十四、第一〇〇、第七十三军相继向当面日军发动反击，双方终日厮杀。最令日军恐惧的还是来自空中的打击：“二十六日八时至十时反复扫射轰炸。由于美机投下燃烧弹和汽油罐，第一大队的圭洞东南侧阵地附近和第三大队的圭洞北侧阵地附近，树木、鹿砦被烧毁，美机的猖狂震撼山间，其势恰似南洋海上的急风骤雨。”

二十七日以后，中国军队开始转人更为主动的攻势作战。第七十三军在潭溪东南，与日军第一三一联队激战，付出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给予日军极大杀伤。在以往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极少俘虏日军，而此时被活捉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仅第七十三军上报俘虏的日军军官就有佐宁夫姑、板片民、青里公保、不吕野元、吴海连等；同时中国军队还首次发现俘虏中竟然有韩国人——显然这些韩国人是跟随第一三一联队从朝鲜半岛来的——第七十三军上报的被俘韩国人是李容相、刘光公、望安潭、黄义啸、姜士淑等。

日军第二十军的作战决心发生了动摇：“基于芷江作战的发展情况，对作战前途产生疑问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其关键性因素是得到了重庆方面把精锐部队空运到战场的情报。日本方面已经在缅甸作战期间，体验了经过美式训练并装备美式武器的中国军队可怕的战斗力。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和第六方面军的参谋们由此看出了问题的严

重性："今后若不慎重指导，恐将陷于危险"。经过与东京大本营紧急磋商，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作战，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芷江。"

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田一良，对战局竟然变成这样很是不甘。他坚决要求再给他增派二至三个师团，然后由他指挥给当面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这一次，冈村宁次拒绝了。冈村宁次的意见是：如果"采用第二十军的意见的话"，以目前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衡量，至少还"需要七个师团"，于七月上旬"从宝庆以西地区采取攻势"，在沅江以东地区捕捉消灭中国军队。但这样做时，"将会迫使派遣军进行预想不到的决战，并将给对美战备及大本营全面作战指导带来莫大障碍"。所以，"不宜采用第二十军的意见，而应中止芷江作战"。

五月四日，无奈的坂田一良下达了停止作战并全面撤退的命令：

一、军决定暂时避免和重庆军决战，将主力向山门、洞口、花园市一带后转，在确保该地周围要线以整理态势的同时，等待第四十七师团主力到来，以便消灭从雪峰山山里出来的重庆军。

二、第一一六师团应适时脱离战线，向山门、洞口一带后转集结，寻找和消灭在该地之敌。为此，应以一部占领和确保八七〇高地以北到赛市北面高地之间雪峰山山脉东缘要点，作为立足点。

三、关根支队（第五十八旅团）要适时脱离战线，向花园市附近后转集结，消灭当地之敌。为此，应以一部确保桥头以南、雪峰山山脉东缘的要点，作为立足点。

命令下达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内极度沉闷：

第二十军自四月十五日开始了芷江作战，而出乎预料的是敌人把美式装备的新编第六军空运到了芷江。中国派遣军方面，期待着在第二十军进入沅江一线后能很好地指导作战，为此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但由于敌空军的妨害，雪峰山的险阻，第四十七师团主力前进缓慢，敌人的战斗力及集中速度之大等原因，第二十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受挫。

中国军队下达了对日军进行全面包围的作战命令：

一、方面军决于五月八日拂晓，全面转移攻势，置主决战于两翼，协力右翼友军，压迫敌人于雪峰山东麓捕捉歼灭之。

二、七十四军（欠五十一师、五十七师，附一九三师、暂编第六师）除以一部于武冈、唐家坊、瓦屋塘各据点担任守备外，其余即由唐家坊、瓦屋塘、金屋塘之线，重点保持于右，攻击当面之敌。奏功后，进出于武冈、水浸坪、邓家铺、栗山铺之线。

三、新编第六军（欠十四师，附五十七师）推进至江口附近，就攻击准备位置，逐次攻击肝溪、平江、下查坪及洞口附近之敌。奏功后，进出于斜崔塘、夹水江、菱角田之线。

四、一〇〇军（附五十一师）迅速肃清放洞附近之敌，尔后协力新编第六军，重点保持于右，向上查坪、半江峰一带之敌攻击。奏功后，进出于天台界、拉水冲、月塘山菱角田之线。

五、十八军（欠十八师）即集结于小沙江、隆回司、黄泥井间地区，重点保持于右，攻击当面之敌。奏功后，进出于新屋冲、黄桥铺、易家桥之线。

六、七十三军（欠一九三师，附十八师）以主力迅速击灭洋溪之敌，以有力一部，即集结于大桥边附近，重点保持于右，向滩头、巨石铺等处之敌攻击。奏功后，进出于桃花坪、岩口铺、石马江之线，掩护方面军主力左侧背之安全，并派小部队向永丰、湘乡之敌佯攻。

七、各军之作战地境（略）

八、挺进第六纵队，仍以滩头附近为根据地，袭击邵阳、罗家庙、桃花坪、赛市、大桥边、巨石铺间之敌，截断敌联络线，使主力军作战容易。

九、十三师为方面军之预备队，仍位于牛路口以东古佛山、升平里之线，担任守备，并准备机动使用。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一刻。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在正面战场的数十次会战中，日军几乎都是一旦发动攻势便会在中国国土上长驱直入。每次战役结束，战场上往往遍布着中国官兵的尸体，而那些成百上千甚至上万被俘的官兵都会被日军虐杀。中国官兵使用着劣等武器，有时甚至需要使用自己的身躯来阻挡日军的攻城略地，日军并不认为中国军队是他们真正的战争对手。历史进入一九四五年之后，战势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颠倒：侵华日军

首次因为战况的不利以及伤亡的巨大而放弃作战仓皇撤退，中国军队却斗志旺盛地要对日军实施痛快淋漓的围歼。

雪峰山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开始了迅猛的动作。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三个联队和第五十八旅团很快被分割，其中突出在放洞附近的第一〇九联队，被中国军队第五十一、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合围在峡谷中，第一〇九联队拼死突围，但在中国军队的围攻下死伤惨重。坂田一良命令第一三三、第一二〇联队前去解救，但这两个联队很快就被中国军队第十一、第十八、第五十七、第一九三师包围，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菱田元四郎彻底绝望了，命令部队杀开一条血路各自突围。

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机枪二连官兵，在连长萧睁的率领下阻击试图突围的日军。当日军准备趁夜色实施第四次冲击时，全连官兵决心给日军一个突然的火力打击——“眼看敌人越来越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密集。等到距离我阵地一百五十米时，已超过了我们的伏击线，事实上我们对敌之右翼已形成了包围。箭在弦上，心情紧张极了。忽然，敌人发起冲锋，我一声令下，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猛烈向敌人扫射和投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我按原先出击计划，用手电光一长两短之信号，要求主阵地延伸射程。然后命令杨排长的轻机枪在原地掩护，全排所有冲锋枪出阵，步枪上刺刀。战士们迅速向敌人猛冲过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我正向营长报告战斗经过时，突然我机枪连三排一个叫车登崇的士兵气喘吁吁跑来：‘报告连长，杨排长身负重伤！’我急忙向三排阵地位置奔去，机关枪已经由上士排附姚兴鼓率领转移到预备阵地上去了。杨排长躺在战壕内，面色苍白，头部血流如注，为国捐躯了。我守在杨排长的遗体前，默默无言，心如刀割。杨排长是我军改为美式编制时调到我连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他人忠厚诚恳，寡言务实，爱兵如子，作战勇敢沉着，是个优秀的军官。我怀着悲痛的心情鼓励士兵们：‘化悲痛为力量，誓歼残敌，还我河山！’”

就在机枪连官兵为杨排长的死悲伤之际，突然，二营指导员跳出战壕向官兵们喊道：

弟兄们，刚才飞机报告，苏联红军于昨天全部占领柏林了，希特勒自杀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了！顿时，全营官兵欢腾了，议论纷纷：“意大利早垮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了，只剩下这个日本鬼子，看他还

能横行几时！”

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令中国官兵欣喜万分。

中国军队在湖南西部的大山里围歼日军之际，正是欧洲盟军摧枯拉朽之时：苏军越过奥得河自东向西发起全面攻势，美英军渡过莱茵河自西向东挺进德国腹地，两军的先头部队在易北河畔实现了历史性会师。四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被处以死刑，曝尸米兰；四月三十日，绝望中的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自杀身亡；五月二日，苏军攻占柏林；五月八日二十四时，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

欧战结束了！

欧战结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

中国人知道随之而来的将是日本侵略者的覆灭。

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这是一次酝酿甚久的会议，最早计划召开的时间是抗战进行一年后的一九三八年十月，由于战争进程的艰难与困苦，直到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才正式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对敌后战场的反击战果感到满意：“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这里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毛泽东预测：“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

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的前景以及中国的未来命运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对自身持有信仰的高度认同，也源于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经过艰苦的敌后作战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已开辟出面积极为广阔的解放区。在这一区域内，日本侵略者不断地受到袭扰打击，且大量的兵力被牵制并消耗在此。日军在中国敌后战场所承受的苦熬与失措，并不亚于正面战场。在不断连成片的解放区内，上亿的中国百姓完全摆脱了日军的野蛮劫掠与欺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政治上的民主建设、军事上的

全面皆兵以及经济上的恢复生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格局中，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敌后战场已经成为一种战争奇观，令包括美国人在内的盟国方面极为惊讶。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手持极其简陋的武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在日本占领军持续不断的近乎残忍的军事压力下，凭借着顽强坚韧和流血牺牲，在敌后战场不断地开辟并扩展解放区，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

日本人正在受到积极的抵抗，尽管日军经常对百姓作战，进行残酷的报复。日本人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在一个有限的地区内暂时摧毁这种抵抗，但他们不可能在现今共产党势力所及的广阔地区同时做到这一点。

尽管战争的最后结束还有待时日，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对国家的未来开始了种种设想，这些设想的核心内容是：成立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联合政府，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召开。——此前，“所有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都回到了延安，或者从地下工作区和抗战游击区陆续步行回到延安”。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了题为《“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要看着四万万人民，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总之，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全国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发言，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对于中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长期的对日战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程度，促进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因此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在抗战的有利形势下也存在着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国民党拒绝民主改革的独裁统治，如果这个独裁统治不能打破和改变，“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

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就是黑暗的前途。由此，大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即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大会的阐述是：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建立一个“民主联盟”性质的联合政府，是争取反侵略战争最后胜利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历了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值此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可以预见胜利之时，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光明未来充满自信。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演说便是这一信心的体现：

从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在这两个大会之间的十七年中，我们党经历了国际、国内、党内多次的重大事变，走过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锻炼成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了。

我们党现在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多党员，比起六大时候的党员，已经大了三十多倍。在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有了我们党的组织，有了党的报纸，有了广大群众的联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啊！

我们党现在领导了中国解放区的九十一万多正规部队，二百二十多万民兵，近千万的人民自卫队，而在六大的时候，我们才只有散在各地的数万农民游击队。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锻炼出一支永远打不败的人民的军队了。

我们党现在在敌后建立了十八个解放区，连陕甘宁边区共十九个，解放了九千五百五十多万人口，组织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九百一十五县^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极少数几个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县区政府。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在大块土地上，建立起永远推翻不了的人民的政权了。

……

就在中国共产党展望胜利前景的时候，同样预感到战争胜利即将到来的中国国民党，也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的“六大”，正式代表六百人，列席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前一届的中央执委、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四十九人也出席了大会。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出了大会的三项任务：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建国大业；三、增进入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会议期间，吴铁城作了党务报告，吴鼎昌作了政治报告，程潜和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潘公展作了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作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和湘西战役经过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等。大会最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以“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把原来党章中的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成行使总理职权。

实际上，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既不是致力于正在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也不是努力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是如何对付共产党。潘公展在其所作的特种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根本是无法妥协的斗争，目前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建立对共产党斗争的体系，创造斗争的环境和优势。——日本侵略军还在国土上横行，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要与共产党斗争什么？潘公展列举的主要斗争是：反驳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驳抗战中存在两条路线的言论，反驳共产党提出的建国纲领，反对解放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五月十七日，大会通过了公开发布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武装割据”这个词，是共产党创建苏区时曾经使用的，此时被国民党人用以指责共产党令人不免困惑：共产党人确实在坚持“武装割据”，而且不惜流血牺牲，但这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顽强地抵抗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没有一兵一卒“割据”到国统区去，而是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不断地“割据”着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如果按照国民党的逻辑，“中央之军令政令”是命令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放弃与日本占领军作战，那么如何解释作为抗战重要战场之一的敌后战场的存在？——国民党也知道这种逻辑的混乱，同时也惧怕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敢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公开反共，随即换了个说法，叫作“政治解决”：“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

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

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最惧怕的有两点：首先，共产党人提出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所谓“联合政府”，是指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多党联合执政的政体样式。毫无疑问，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敌后作战中广泛地发动民众，使自身的力量不断壮大，开辟出面积广阔的解放区。这也是蒋介石必须警惕的心头之患。鉴于此，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同了蒋介石的观点：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中国的内战已显露出不可避免的趋势。

就在国共两党同时召开全国性会议的时候，中国抗日军民仍在对日本侵略军穷追猛打。

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部队，粉碎了日军于五月为扫荡解放区发动的“秀岭一号”作战。五月中旬，鲁南军区和滨海军区先后发起临（沂）费（县）郯（城）马（头）等战役，歼敌七千余人，把日伪军赶出了邳县、郯城、费县等地，主力开始逼近津浦路和陇海路。六月五日，鲁中军区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抗日民众向胶济铁路两侧出击，拔除日伪军据点六十多处，歼敌七千三百多人，严重打击了伪军厉文礼部，解放了安丘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控制了胶济铁路东段的重要地区。六月中旬，八路军滨海军区发起蒲（台）滨（县）等战役，歼敌三千四百余人，连续收复蒲台、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六座县城，将该地区的日伪军彻底孤立。七月，滨海军区和鲁中军区一起，连续攻克几十个日伪军据点，歼敌五千余人，解放了诸城、高密和胶县之间两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把日军压缩在诸城据点内。接着，渤海军区和胶东军区一起，攻击寿光附近的日伪军据点，歼敌二千五百四十人，解放了寿光外围的大片国土，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的联系。

六月三十日，八路军太行军区发起安阳战役。安阳城里的日军是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两个中队，外围守军是伪军“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共七千多人。此战八路军集中起九个团的兵力，参战的民兵和自卫队更是达到三万人以上。抗日武装直插日伪军据守的纵深地带，袭击了日伪军的指挥中枢。八路军主力猛攻鹤壁城，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的日伪军据点全部摧毁。接着，八路军和民兵、自卫队大举

向平汉路支线观丰铁路出击，把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一一拔除，解放了一千平方公里的国土，残余的日军被迫向平汉路退缩。随后，八路军太岳军区发起同蒲路南段作战，连续攻克二十多个日伪军据点，在抗日民众的支持下，又乘胜攻克了晋南曲沃、绛县与翼城间的所有日伪军据点。

新四军自—九四四年春开始，连续发动攻势作战，不断地恢复和扩大华中解放区。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和地方抗日武装一起，在如皋歼灭日伪军五百多人，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十四人，随后乂攻击南坎，击毙大量口伪军，其中包括日军中队於以下二十二人。在新四军作战的同时，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五万多抗日民众，向日伪军盘踞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公路七百多公里，炸毁桥梁五十多座，有力配合了新四军主力的出击。七月，苏中军区军民再次将目标指向长江沿岸，占领了石庄、新生和张横等重要港口。六月下旬，苏北军区的新四军攻入日伪军的重要据点大兴镇和青龙港，还曾一度攻取日军掠夺苏北盐棉资源的集散地合德镇。接着，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发起睢宁战役，解放睢宁县城和大小市镇十八个，国土三百多平方公里。淮北军区六月上旬开始出击，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西进，拔除日伪军据点三十六个，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达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解放的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新四军第五师则分兵北上和南下，所向披靡，先后攻占豫南的信阳、确山、遂平、汝南等县城，在湘鄂边攻占了嘉鱼、岳州、华容、公安等地，收复国土五万多平方公里，解放民众一百五十万人。

突然，日军得到一个惊人的情报：从延安出发的一支八路军向南方杀了过来。——由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率领的十个连的步兵和六个连的干部，长途跋涉，正在向华南地区挺进。王震部队一路破城拔寨，七月初竟出现在了日军重兵驻扎的长沙和衡阳附近，令日本方面大为意外又极其震惊。日本《朝日新闻》刊登题为《延安军向华南渗透发起全面军事攻势》的报道：

据可靠情报，去年五月在皇军发起的河南作战中，重庆第一战区遭到毁灭性打击。贺龙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乘机统率约四千人的战斗部队及约二千人政工人员逐次渡过黄河，由潼关附近出发，穿过皇军与重庆军间隙巧妙南下。今年一月下旬，该部队等终于在京汉铁路西侧大悟山带与新四军会师。延安各报出版发行了题为《即将开创新局面》的套红号外，欢庆打通华北、华中……如此，延安军向中国西南及东南渗透工作以惊人速度展开。该军决心到达江西省瑞金老巢之意图

现已明显。而重庆方面的惊愕与狼狈却出乎预料。据说蒋介石甚至正向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下达“暂停抵抗日军，全力阻止共军南下”的指令。

就在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大举出击的同时，正面战场上日军第二十军的芷江作战也陷入了绝境。

得知日军决定从芷江前线撤退后，逐渐合围而来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总攻。

在战场的南线，集结于湘黔边的中国军队第九十四军第五、第一二一两师，自四月三十日开始进攻，迅速击溃瓦屋塘附近的日军第五十八旅团第一一五大队，于五月一日占领武阳。三日，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主力试图营救第一一五大队，但被第九十四军官兵击退，随后向罗家铺方向溃逃。第五师官兵随即猛追，日军把武器扔进池塘，在大山里盲目奔逃，其中数百人被举着大刀土枪的山民击毙。一直坚守武冈城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在师长蔡仁杰的率领下冲出武冈城参加追击作战。日军第五十八旅团残部越过雪峰山和麻子山之间的隘路，向花园市狂逃。日军战史记载了第五十八旅团的溃败：“五日凌晨，在敌军奇袭攻击下发生混乱，结果被优势之敌包围而成溃乱状态。六日，各队逐次逃向龙烟山方向，但到该地又被敌包围……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队到十日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九日，机关枪中队一部在高沙市以南被友军收容，另一部以后经过武冈、新宁附近回到东安。大队长小笠原大尉虽然逃到了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由于中国军队紧追不舍，日军第五十八旅团根本无法整顿部队，只有继续溃逃。但是，其第二一七联队主力在企图东渡资水时，遭到中国军队第九十四军的坚决阻击，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也加入了合围作战，而第五师官兵更是不顾一切地奔袭，切断了日军的退路。第五师前身是追随孙中山北伐的赣军，现任师长李则芬、副师长邱行湘，部队一直沿用着大革命时期的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该师装备精良，斗志旺盛，日军第五十八旅团又一次被打散，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步兵第二一七联队战死将校十四名，士兵三百余名；独立步兵第一一五大队几乎全部被歼；第一一七大队也有大量死亡。”

在战场的北线，中国军队向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发动的攻击晚于南线。五月九日，在美军战机的支援下，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第十八军等部队，采取正面强攻和纵深迂回的战术，猛烈攻击了山门附近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作战中，第六十三师一八九团二营，

在营长夏子实的带领下，击毙日军二百五十多人，令日军正面阵地发生动摇，而夏营长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十一日，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师猛攻放洞，日军一个大队增援而来，被第一七七师官兵击溃，日军丢弃武器开始溃退。第五十一师和第六十三师在与日军的激战中，仅连长就战死五名，他们是杨潄陂、杨洁、唐文友、马继俊和丁清山。在第七十三军方向，第十五师和第七十七师在洋溪附近歼敌数百，俘虏日军十人。——仓促间，中国的前线战报将这些被俘日军的名字翻译得有些古怪：亘本善男、滋松正懈、新谷方独、李容相丙、克雨望狄、欧镕后白，加圭旁相、植姜太烈、阎保敬礼德等。

十三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已处在被包围的状态。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给各部队发出电报："当前只有杀出一条血路，以完成撤退作战。"可是，"步兵第一〇九联队，当时处境危殆已极，据副官生沼逸郎大尉回忆，五月十四日弹尽粮绝，四周皆敌，联队已准备'玉碎'。十四日夜间曾经决心突破敌军的重围，一举进入山门，但仅仅一部分先头部队突围成功，天已大亮。联队本部以下的主力成了先头部队，在大尉庙沼泽地无法移动。"为了营救第一〇九联队，第一一六师团决定集中第一二〇和第一三三联队主力向山门方向靠拢，同时命令第一〇九联队连夜突破山门的狭窄隘口突围。可是，第一二〇、第一三三联队都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而第一〇九联队似乎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大队长饭岛大尉（第一大队）腹部受重伤，被加入到艰难行进的担架队列里，且整个大队都伤亡惨重；"杉田大队长（第二大队）向泷寺部队（第一〇九联队）长发出了告别电报，随即烧毁密码，做好全体牺牲的准备。由担架护送的一部分伤病员，为了减轻大队的负担纷纷自杀，情况至为悲惨"。尚未负伤的日军可以漫山遍野地躲藏，而行动缓慢的辎重队和担架队成了空中攻击目标。在美军战机的轮番俯冲下，密集的机枪子弹和炸弹如同骤雨，日军辎重兵和伤兵顿时血肉横飞，雪峰山狭窄的山路上如同人间地狱。

至六月初，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残部在独立混成第八十六旅团的接应下冲出重围逃回邵阳城，另一部残余日军也逃回了宁乡城。

攻击芷江的日军为什么没有全军覆灭，中国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记述是：五月十二日，第十八军杨伯涛的兔十一师"夺取山门以西隘路后"，已封堵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退路。本可集中施中诚的第七十四军、胡琏的第十八军、李天霞的第一〇〇军，动用"三个美械师的兵力，给以充裕时间歼灭"。但是，统一指挥作战的何应钦"急于回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四中全会作湘西大捷报告"，而如果雪峰山战场"拖延时日

解决战斗”，何应钦就无法宣布作战已经“大捷”。于是，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本着何应钦的意旨，命令胡琏在洞口放开一个口子”，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就这样逃脱“全军覆没的厄运”。

六月十五日，在王耀武的陪同下，何应钦和几位美军将领抵达芷江战场，在战斗最激烈的江口东南方青岩附近，大批国内外记者蜂拥而至，令荒凉的大山中一时间人声鼎沸。——“何接见了战功卓著的第十九师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团长杜鼎、营长李中亮、连长周北辰等，对周北辰固守青岩，与两倍之敌血战一周，阵地岿然不动，大加赞许。麦克鲁代表美军，当场授予周北辰一枚银质自由勋章。”会场布置在一个巨大的空房间里，大量的缴获品堆积如山，士兵们还押来了二百多名日军俘虏。何应钦在会上宣布，战斗至此已毙伤日军两万八千多人。何应钦此次在战地召开军事会议，军政部部长陈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联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陈良以及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到会。在中国湖南西部偏僻的大山里，竟然一下子集中了中国军队如此多的高官，显然所有人都希望在这个难得的胜利中占据一个荣耀的位置。军事会议在进行战斗总结时，把胜利的原因说得很全面：将士忠勇，作战协同，情报准确，补给到位。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军队固有的老毛病：征兵用抓壮丁和买卖壮丁的方式凑人数导致新兵素质差，一些地方官员仗打起来时不知去向，发动民众打扫战场和救护伤员的工作很差，运输弹药的卡车在山路上翻了不少，等等。重庆军委员会随即发来嘉奖电报，被表彰的部队有第五十一师、第十九师和第十一师等，被授予宝鼎、云麾勋章及晋升的军官共有三百二十多人。最荣耀的当属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他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增补新的中央委员选举时得票最多，国民政府还打破抗战八年停止办理将级晋升的惯例，晋升他和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以及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三人为陆军中将。

芷江作战的时候，前线指挥部每日向重庆发出的战况电报中，都列有当天阵亡的中国军成下级军官的名字，而跟在这长长名单后面的是无数捐躯疆场的士兵的英魂。这些阵亡的中国士兵，没人知道此战已是中国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战，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他们年轻的生命流尽了鲜血。他们不会想到世上有宝鼎、云麾勋章，甚至来不及想到家乡还有父母妻儿，他们只知道往日所有的仇恨和屈辱总要有个了结，他们终于可以在侵略者的悲惨呼号中痛快淋漓地杀敌而忘却生死。

被忽略的还有湘西百姓。

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副营长王沛年印象深刻："湘西群众，多有武器，且民风强悍，入侵之敌，除整体都被我军击溃外，逃窜之敌，多被群众杀俘。"

漫山遍野杀鬼子！

这是一九四五年初夏时节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奇观。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冲绳岛登陆的美军经过两周苦战，已令日本守军伤亡上万，冲绳岛北部战斗基本结束，残酷的歼灭战转向南部。在南部狭窄的区域内，六万日军藏在山洞里继续抵抗，美军官兵除了把他们一个个地炸出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美军发动的又一次总攻开始前，美国海军的六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向冲绳岛南部猛烈炮轰。接着，岛上美军二十七个炮兵营的三百二十四门大炮一齐开火，这次炮击创造了太平洋战争中的最高纪录，美军炮兵一共发射了一万九千发炮弹。在美军挖地三尺逐次猎杀山洞里的日军时，日军一次次地冲出山洞试图实施绝地反击，但除了在山洞口躺满尸体之外没有丝毫成效。进入五月，登陆冲绳岛的美军已达到十七万之众，成千上万辆各种汽车拥挤在美国工兵加宽的公路上，美军的后勤供应点也迅速建立起来，大批作战物资和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岛上。在战斗一线，美军的喷火坦克以及步兵使用的火焰喷射器，将炽热的烈焰持续不断地喷射进每一个日军藏身的山洞，洞里的日军如果没有窒息而死或者被烧成一截黑炭，就会赤身裸体地狂奔出来。美军士兵的子弹如同热带雨季里永远落不尽的雨点一样，几乎打穿了冲绳岛上的每一片树叶，密林和茅草中日军逐渐腐烂的尸体随处可见。

就在美军即将攻取冲绳全岛的时候，突然，冲绳岛周围所有的美军战舰一起连发三声炮响：德国投降了！

五月底，美国彻底攻占冲绳岛上的琉球古都首里。

进入六月，美军向冲绳岛南部的最后一座小山推进，日军海军少将太田实以及他的参谋人员在一个山洞里集体自杀，接着日军第七师团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金山均大佐烧毁军旗后切腹。冲绳岛日军总指挥官牛岛满转移到一个临海的山洞里，他拒绝了美军的劝降书并命令部下战斗到底。包围过来的美军士兵将手雷扔进山洞，自知大势已去的牛岛满向东京大本营发出诀别电报。六月二十三日，他和他的参谋长长勇并排跪下来，一名大尉举刀把长勇脑袋砍下来的同时，牛岛满也把战刀插进了

自己的腹部，其余的七名参谋用手枪集体自杀。

牛岛在切腹前按照古老的仪式哼唱了《辞世歌》：

未及秋风度，岛上青草枯；

皇国春天里，犹望再复苏。

弹尽弓矢绝，鲜血天地涂；

魂其归来兮，守护皇国土。

冲绳岛战役长达八十四天，日军被击毙达九万人之多，另有一万人被俘，美军战死或失踪达一万一千四百人，负伤多达三万八千人。

“日本输掉了在本土外打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战役。”

日本的南大门被打开了，其本土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攻击下。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也开始从广西、广东和湖南向北紧急收缩。其中，第三师团经汉口和郑州撤往徐州；第十三师团经京汉线开往北平；第三十四师团经南昌、南京开往天津；第二十七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经赣州和南昌撤往济南和南京。

日军的撤退，引起了中国国土上的一阵骚乱：南京的伪政权高官们不知去向，伪军部队躲在据点里寂静无声，投靠日军的地方官吏携带家眷开始逃亡；只有与日军对峙的中国军队异常激昂，日军每撤退一步他们就前进一步，偶尔出击打上一阵，但更主要是立即收复曾被日军侵占的国土。日军一路向北，沿途有中国百姓在田野里干着农活，偶尔他们会抬起头来对日军长长的撤退队伍瞄上一眼。撤退中的日军官兵发现，这些中国百姓不但不再躲避他们，而且看他们的眼神极其异样：“第二十军在湘西新的作战（芷江）中的狼狈不堪的情况，连这一带的老百姓都已尽人皆知，全州附近居民的那种眼色令人永远不能忘。”

“永远不能忘”的眼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

向北撤退的日军在中国百姓的注视下，走过了他们曾与中国军队苦战的湖南。——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湖南是唯一被以惨烈的方式反复争夺了四次的战场。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末日的日军同样心绪异样：

雨中，大队长竹下少佐再三下马，在战死者的地点合掌致哀。参加

过那次突破战的军官，除转属师团司令部的若竹中尉（第八中队长）以外，这次活着再次通过这个旧战场的，连同竹下少佐在内还不足十人。上次通过狭路时是漫山红叶，如今是不知名的山花、杏花和油菜籽在静静地摆动着。

日本人对外界细微变化的敏感程度在这个世界上当属第一。时光的流逝、四季的更迭、阴晴的交替以及生命的无常，都能引发这个岛国的国民莫名的忧郁和悲戚，对于前途，他们更是徘徊在永无穷尽的忧愁中。

无论是中国还是盟军，都认为日本顶多还能坚持一年。

这种预测的根据是，日本陆军、日本内阁临时组织的由小至十五岁、大至五十五岁的男人组成的国民义勇队，仍集中在日本本土并决心血战到底，其总数尚有数百万之多。

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美军的冲绳岛作战和中国的芷江作战结束后没多久——大日本帝国便彻底覆灭了。

战争最后的结局来得如此突然和迅速，出乎整个世界的预料。

第四十三章

中华民族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上午，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停靠在安特卫普港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走下来时，内心依旧忐忑不安。他不知道那个名叫原子弹的秘密武器能否最后实验成功，他也不知道那个没有使用传统炸药的古怪炸弹到底有多大威力。

杜鲁门从比利时换乘专机飞往波茨坦，参加代号为“终点站”的会议。

欧战结束了。在亚洲战场上，盟军二月底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五月初攻占缅甸首都仰光，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这时候，苏、美、英之间如何分享胜利成果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眼前。这一问题与战后欧洲利益分配性质相同：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使资本主义的英、美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了战时联盟，可即将到来的和平反而激化了东西方间的对立情绪，苏联和美、英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雅尔塔协定》的某些条款，并都认为对方在策划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即将召开的旨在调整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波茨坦会议能否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终点站”，与会各方都心存相当的疑问。

没有疑问的是，杜鲁门认为必须让苏联人知道，美国应该是战后分得亚洲最大利益的国家。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对日作战的亚洲战场上，是美国人在浴血奋战，苏联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如果不是基于在攻占日本本土时减少美军伤亡的考虑而希望苏联对日宣战，关于决定日本命运和亚洲未来的会议根本不需要斯大林参加。可是，眼下令杜鲁门心绪复杂的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小组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实验那种古怪的炸弹。根据实验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说，这种炸弹能一次杀死两万多人。尽管还没有实验成功的消息，但这句话令杜鲁门印象深刻：如果美国真的拥有了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也能迫使日本投降，那么还让苏联人掺和进来干什么？

杜鲁门在会前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包括研究一旦苏联人出兵对日作战，将对亚洲战后格局和利益分配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对日的最后宣言应该如何措辞以及是否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旦威力巨大的炸弹实验成功，是否投入使用到日本本土？为

此，杜鲁门专门召开了高级幕僚秘密会议，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让杜鲁门更加头痛了：有人认为，如此巨大的杀伤力会殃及日本平民，世界舆论将对美国不利；也有人认为，即使研制成功也不应该使用，因为会过早地向苏联亮出美国的杀手锏，降低战后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慑作用；还有人主张，可以先在地面打一下，不得已时再使用，这样美国在道义上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当然，还有人要求毫不犹豫地使用，认为只要能迅速结束战争，任何有效的制敌手段都必须使用。——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杜鲁门的基本思路是：不管那颗炸弹叫原子弹还是别的什么，都应视为一种纯粹的军事武器，如果美国拥有了，有什么理由不使用？

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德国柏林西南波茨坦市郊的一个小镇举行。这个名叫巴贝尔斯贝格的小镇，战前既是德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还是德国电影界的大本营。杜鲁门住在了一位电影制片人的小楼里，丘吉尔住在他的附近，而斯大林却住在距他们一英里以外。原定的开会时间是七月十六日，那是星期一，但因斯大林身体不适而推迟到第二天。这一无意的推迟，对于杜鲁门意义重大。十六日晚上，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发来电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按照密语，电报把“原子弹实验”叫作“动手术”，研制的科学家则被称为“医生”。——电报说，今天上午成功地动了手术，最后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看上去好得超出预料。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会议，又称“柏林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大致分成两个阶段：从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为第一阶段，开了九次会；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因为等待英国大选结果休会两天；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为第二阶段，开了四次会。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会下的磋商和交易远比会上激烈得多，苏、美、英三方各怀企图：苏联考虑的是确定德国赔款数额，苏联应该在亚洲获得的利益，迫使美、英承认东欧各国建立的亲苏政权乃至领土的变更；美国则关心自己在战后称霸世界的地位以及苏联人到底能在最后打败日本的作战上起多大作用；英国则极力与苏联争夺欧洲的战果，设法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在欧洲的扩张。但是，无论如何，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商议内容，而在这个尚存在悬念的问题上，三国首脑都作了某些让步。只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并没有把原子弹的事向斯大林透露——除了尚未被战争检验的原子弹的威力无法明确估量外，杜鲁门和丘吉尔一致认为这件事让斯大林知道得越晚越好。

会议期间，宴会酒会几乎每天举行，斯大林的热情出乎杜鲁门和丘

吉尔的预料。斯大林主动透露了日本人曾试图让苏联出面调停解决战事的机密情报；还肯定地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苏联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权，苏联一定会在本年的八月出兵对日作战。关于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秘密来往，美英情报部门早已掌握。于是，无论是杜鲁门还是丘吉尔，都微笑着不置可否。

就在三巨头频频举杯之际，杜鲁门又接到了史汀生的电报，电报说又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且这个新出生的“弟弟”比“哥哥”更为健壮，他在自己家的农场里都能听见这个小家伙响亮的哭声。这一次，杜鲁门就是否应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征求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认为如果告诉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之前不告诉。结果是，杜鲁门没有告诉斯大林。在又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把日本天皇辗转给他的要求和谈的密函拿了出来，看上去是征求杜鲁门意见的样子，杜鲁门还是保持着那副不置可否的微笑，说这事可以由斯大林看着办。

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等待的最后一封电报到了：准备在日本使用的原子弹已经装配完毕。

杜鲁门和丘吉尔认为：可以向日本作最后的摊牌了，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的时机也到了。

但是，当杜鲁门把美国拥有了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只平静地说了句“希望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这反而令杜鲁门和丘吉尔忐忑不安了。

实际上，斯大林的愤怒已到了压抑不住的地步。美、英并不知道，苏联不但掌握了美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情报，且苏联早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便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只不过研制进度缓慢尚未进入实质性的爆炸实验阶段。更令斯大林愤怒的是，苏联情报部门告诉他，美、英已经拟订了一个对日公告，而且很快就要公布于世。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神情沮丧的丘吉尔离开了波茨坦——在英国国内大选中，丘吉尔的保守党大败，工党获得了执政权力，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已经抵达波茨坦。在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分别代表苏、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柏林会议公报》和《柏林会议议定书》通过之后，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正式发表。

斯大林直到最后一刻才得到这份文件的副本。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的内容事先征求了中国的意见，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而苏联尚未对日宣战，不属于对日交战国，因此没有苏联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后来这份公告改成了以四国的名义，已是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

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此项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所有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是否仍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迟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远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秩序，势不可能。

（七）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时，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乃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这份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既没有说到原子弹，也没有提及战后日本是否可以保留天皇制度，只是明确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不无条件投降就彻底毁灭。

日本已经坚持不住了。

进入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对自身处境的估计十分悲观："为了应对紧迫的战局和薄弱的本土防卫态势问题，大本营陆、海军当局从年初起，连日反复讨论了新的作战方案。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初秋以前，必须在本土动员多达二百四十万的庞大陆、海军各种部队；还必须从大陆（中国）方面抽调大量的兵力和军需用品转用于本土，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做好准备。然而在当时空袭日趋激烈、海空实力已经丧失、国力也迅速衰微的情况下，要完成这项任务的确极为困难。"

经过连年的战争消耗，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经济陷于崩溃。战争初期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当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到了一九四五年初，军费开支竟然占到了当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

庞大军费开支的主要支撑是国内发行战争公债、增加税收以及从海外各个占领地掠夺。但是，随着制空权的丧失以及海军的覆灭，日本掠夺资源的运输通道已被完全封堵，国内出发的运输船队被迫停航，海外返回的运输船百分之八十都被击沉。由于日本本土几乎没有任何原料性资源，在钢材储备仅剩二十六万吨的情况下，舰船、飞机和武器等战争工业急剧萎缩。日本国内的石油储备也仅剩下四十万吨左右，汽车所用的汽油在六月即将用尽；到了七月，海、空军所拥有战机，连完成一次出击的燃油都不够了。日本政府只好强迫数百万民众上山挖掘松树根，说用松树老根可以炼出供飞机使用的油料。为支撑战争所发行的大量公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五年，日本国内物价已经飙升到一九三七年的三百五十倍以上。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民众每天的食物配给量，包括薯类代用品在内，不足二百五十克。政府下令“开辟和培植国内补充粮食的来源”，即在自然界里找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食物，最终命令日本小学生必须完成收集五百万担橡子的任务。

在满洲抽调兵力的同时，还计划将关东军保存的军需品约三分之一（航空挥发油二万千升，普通挥发油三万千升，弹药十三个师团会战份额）调来用于本土。可是，损耗船只不断增加，而且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危机，运回大陆的杂粮更是燃眉之急。正当这时，如何分配这两方面的运输船只，却成了统帅部和陆军省之间争论的重要问题。最后不得已双方让步，决定运回粮食二百一十五万吨；运回军需品则尽量靠运送军队时装在上面。

战争经济的破产加剧了政治危机。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军赢得马绍尔群岛以及塞班岛作战胜利后，日本国内一片倒阁呼声，东条英机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兼任的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之职。接替东条英机的，是曾经的陆军大将、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虽然是内阁总理，小矶国昭既插手不了陆军，也干涉不了海军。日本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覆灭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小矶国昭在出任首相不到一年后辞职。接任者是曾经的海军大将，时任枢密院议长的铃木贯太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天皇硬性指定为首相以收拾残局。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已发展到质疑日本现存体制和天皇皇威的地步，为此，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最近发生的对天皇的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一九四二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总计三百零八起，每月平均近二十五起。而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则总计六百零七起，平均每月五十一起，一直在急剧

地增加。”

突然，日本秘密警察部门接到一个更令他们惊恐的消息：被抓到日本国内的中国劳工暴动了。

战争使得青壮年乃至中年人大部被征召入伍，日本国内出现了劳动力极为短缺的现象。为此，政府内阁决定从中国抓劳工，到日本“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根据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的计划，国内需要的劳工数量为四十五万。从中国被押往日本的劳工，绝大部分是中国军队的青壮年俘虏，还有一些是被强行抓来的中国百姓。这些劳工在去往日本的途中因为受到残酷虐待，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二十。到达日本本土后，中国劳工或被押往修建发电厂、机场、铁路以及港口的工地，或被押往从事采煤、冶炼、挖矿等重体力劳作的现场。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刺刀下，中国劳工被围在一百五十伏特的电网内，每天只有一个糠窝窝，即使在极度严寒的日子里身上也只有稻草遮身。死去的劳工要么被大量掩埋，要么如同垃圾被扔在荒野上。被押往日本花冈矿山的二百九十九名中国劳工，都是从中国北平和石家庄的战俘收容所挑出来的，除了二十多名五十至六十岁的老人和五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外，全部都是青壮年。在花冈矿山昼夜不停地劳作以及不断地出现死亡后，中国劳工决定暴动。暴动于一九四五年初开始策划，策划者是原中国军队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连长耿谆。

耿谆的计划是：杀死看押他们的日本监工，夺取花冈附近的一座铜矿，解救出在那里的数百名中国劳工，然后袭击花冈警察署以夺取枪支，再袭击附近关押美军战俘的战俘营以夺取弹药，最后大家一起跑到大海边夺船回国。耿谆从捡到的一张日本火车路线图上，确定花冈属于日本秋田县，往北过了青森县，就与中国隔海相望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深夜，耿谆带领几十名领头暴动者，手持铁镐和铁锨集合在一起。接着，刘锡财冲进日本监工事务室，抡起铁镐便把电话机砸碎了，李秀深和李志国等人的铁镐也戳进了熟睡中的日本宪兵的肚子和脑袋。花冈矿山顿时一片混乱，中国劳工到处追逐惊恐奔逃的日本人，平时残酷折磨中国劳工的日本人个个被砸成了肉泥。天亮时，劳工们跟随着耿谆出发了，他们在陌生的山岭上听见了日本宪兵和警察的警笛声。在受到围攻的最后时刻，劳工们用石头奋勇抵抗，抵抗持续数天后，还活着的劳工全部再次被俘。

再次被俘的劳工被捆绑在一起，跪在铺满碎石的地上，日本人开始了残忍的刑讯。李担子被用水灌死，刘锡财被吊起来遭到疯狂毒打，耿

谆被单独带走审讯。整整三天三夜，劳工们一直跪着不准移动。不断有人因坚持不住倒下。三天后，铺满碎石的空地上布满了尸体。

战后，在花冈暴动中残杀中国劳工的日本罪犯，有三人被处以绞刑，多人被判处二十年以上监禁。

但是，那些倒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劳工只能魂归故里了。

我们当记住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的名字。他们是：李光荣，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刘智渠，八路军战士；刘虞卿，国民党军军需官；李克金，国民党军排长；刘玉林，国民党军军械官；刘当路，八路军游击队战士；张开化，共产党员；张旭，共产党员；刘锡财，八路军战士；贾毅民，共产党员；张肇国，国民党军排长。

被侮辱和被虐待的中国人，以决死的姿态向世人宣告：尽管苦难漫长，但是终有尽头，只要给予日本人最后的一击——这一击哪怕是抡起一把铁镐、泼下一片血污，乃至付出一条卑微的性命！

盟军的战机浓云一般覆盖了日本本土。

一九四五年二月，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对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等地区的工业设施，集中进行了高空精密轰炸。三月，B-29轰炸机改为低空投掷燃烧弹，对日本大中城市实施了地毯式轰炸。至七月底，美军在日本上空投下了十六万吨炸弹，致使日本的炼油生产下降百分之八十三，飞机引擎生产下降百分之七十五，电子装备生产下降百分之七十，遭到毁灭性摧毁的军工企业达到六百多家。

丧失了制空权的日本，地面高射炮也没有了，而美军似乎决心把东京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五月二十三日，五百六十二架B-29轰炸机再次对东京实施轰炸。美军飞行员事先得到命令，不要把炸弹扔到日本皇宫里，因为“天皇将来也许还有用”，但东京的工业区和港口附近地区完全被摧毁。两天后，又有五百一十二架B-29轰炸机飞临东京上空，向中心地区投下了三千二百六十二吨燃烧弹，整个东京城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外务省、海军省、首相官邸和大东亚省大楼被烧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连东京陆军监狱也被摧毁，关押在里面的六十二名盟军飞行员被烧死。烈火无法遏制地蔓延到皇宫，天皇和皇后躲进了地下防空洞，但皇太后、皇太子以及其他皇族的宅邸成为一片灰烬。

在多次轰炸中，美军的B-29轰炸机还撒下数百万张传单，内容包括预告下一步轰炸的具体目标、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指出日本军部正在逼迫整个国家集体自杀，还有就是发布《波茨坦公告》的条款。

我们今天不是为轰炸你们而来。投下的这张传单，是为了通知你们，美国政府代表美国、英国和中国以及苏维埃联邦政府对贵政府提出投降条件的答复。战争是否能马上停止取决于贵国政府。你们读了这两份正式通告，将会明白如何才能中止战争。

在东京的漫天大火中，铃木内阁举行了高级幕僚会。

会议讨论的已不是如何作战，而是如何“媾和”。

……情况的演变，实质上已形成一个转折点，即必须从根本上研究前一年八月十九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日本在战争指导上已经面临一个重要关头：是应当抓住机会媾和，还是继续坚持战斗到底？二者必择其一。但是，当时的大本营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就战争指导转移到媾和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想法是：在此阶段媾和，结局必然等于无条件投降，进而导致国体的变革……

有人提出可以请苏联出面，充当日本与美英之间的调停人，赞成此举者占多数。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以及首相铃木贯太郎一致认为，日本人对苏联是有情有义的，苏联之所以在对德战争中取胜，与日本对苏保持中立使其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在苏联对德作战的时候，日本人从苏联的背后插上一刀，那么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所有苏联城市，今天很可能都已在德国人的掌控下。同时，赢得对德作战胜利的苏联人，应该希望日本战后强大起来，因为只有强大的日本才是苏联与美国争夺亚洲利益的缓冲国。日本人经过对苏联人的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正当帝国倾赌国力，与美英战争期间，若苏联对帝国参战，将致帝国之死命！故不论帝国对美英战争之局势如何，帝国有努力防止苏联参战之必要。就帝国而言：不仅必须防止其参战，且应进而获得苏联善意的中立；更进而关于战争之结束，恳请苏联做有利于帝国之斡旋。兹决以此为目的，迅速开始日苏两国之协商。

帝国应使苏联了解：苏联此次所以赢得对德战争，实由帝国维持中

立所致。并应正告苏联：在将来苏美对抗关系上，若能使帝国保持相当的国际地位，亦有利于苏联；且应劝告苏联：日、苏、中三国有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之必要。兹决努力劝告苏联，以图达上述目的。唯自德苏战争终了之后，苏联自觉其地位业已提高，且判断帝国国力显已降低。凡此情形，不难想象，苏联要求的代价必高，次列诸项，当在意料：

一、返还南库页岛。

二、津轻海峡航行权。

三、取消渔业权。

四、转让北满洲各铁路。

五、扩大苏联在蒙古势力。

六、租借旅顺大连。

且视情形，苏联或将要求割让千岛列岛北部；但朝鲜必须由帝国保留。在南满洲可设定中立地带，唯应尽可能维持“满洲帝国”独立。帝国最希望者，为树立日、苏、中三国之共同体系。

穷途末路的日本人，至此依旧心存狂妄，以致在外交判断上完全脱离实际：日本预想的苏联开列的条件，固然都是苏联人想要的，但是如果把日本彻底打垮，苏联人岂不是能得到更多？

此时，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正在日本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箱根，仿佛置身在周遭这个血腥的世界之外。当日本内阁派出的幕僚找到他，亲热地向他转达日本政府对苏联赢得胜利的热烈祝贺，并说幸亏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与苏联没打起来，日本希望日、苏、中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时，老牌的外交官马立克立即警觉起来，他明确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对日本政府的这个愿望需要时间考虑。

日本人开始等待苏联人考虑的结果。

苏联人迟迟没有答复。

日本人又尝试请瑞典等国出面，但依旧没有成效。

无奈的日本人再次找到马立克，露骨地表示，如果日本海军和苏联陆军联合在一起，将成为统治世界的无敌力量。马立克立即回答说，日本海军都在太平洋海底呢。日本人又表示，愿意把“满洲国”让给苏联，可苏联人依旧不置可否。

就在日本人接近崩溃的时候，《波茨坦公告》对全世界发布了。

经过仔细研读，并且比照了《开罗宣言》中的某些措辞，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一个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其理由是：一、尽管可以确定苏联人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公告》并没有苏联人的签署，这说明苏联人现仍处于维持中立状态；二、“无条件投降”一词在《公告》中只出现了一次，《公告》全文主要开列了和平的若干条件，其措辞的审慎说明还存在斡旋的余地。因此，东乡茂德认为，日本不必急于对《波茨坦公告》表态，可等苏联的态度明朗后再作决定。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东乡茂德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得到了铃木贯太郎的支持，但受到军方的猛烈抨击。军方坚决主张发布最高命令，明确表示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款，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就是否在日本国内公布《波茨坦公告》的内容，阁员与军方再次发生冲突。最后，铃木贯太郎的决定是：经过删节后发布，报纸尽量用小字，最大限度淡化其影响。

但是，日本各大报纸很快相继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调子与军方一模一样，称《波茨坦公告》只能加强日本不屈不挠进行战争的决心。政府内阁认为，这是军方指使报界所为；而军方也不断指责政府的软弱无能。再三斟酌的铃木贯太郎终于亲自接见了记者，但是，他对《波茨坦公告》的表态措辞被各国文字翻译得五花八门，大致的意思是：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没有任何价值，只有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置之不理”这个词，是日本词语“默杀”的意译，大意是“沉默杀之”或“沉默不理睬”。由于英文中没有对应词语，美国人的理解便是“鄙视处之”。

三十日，美国《纽约时报》采用了这样的大标题：《日本正式拒绝盟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

此时此刻，无论是绝望的日本政客，还是狂妄的日本军人，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苏联人的表态上，他们都认为只要苏联人不参战日本就还有希望。但是，苏联人以“日本政府和天皇关于媾和的表述含糊不

清”为由继续拖延着时间。

日本人不得不准备在本土进行最后决战了。

东京大本营重新调整了战时组织体制，成立了专门担负本土作战的五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负责地区警备任务的军管区司令部，并再度大量征召平民人伍，还从关东军抽调回二十一个步兵师团、两个坦克师团，又新组建了四十二个步兵师团、四个高炮师团、七个坦克旅团和十七个独立混成旅团，使得聚集在日本本土的日军达到五十三个师团、二十五个旅团、两个坦克师团、七个坦克旅团以及四个高炮师团。陆军航空兵也拼凑起三个军，拥有作战特种飞机二千一百架，其他飞机一千一百架。另外，海军残余部队临时拼凑起驱逐舰十九艘、潜艇三十八艘，组成特种攻击突击队三十三支。海军还集中了各种战机五千二百架，其中大部分为自杀式攻击机。——聚集在日本本土的日军，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只有一半人手里有步枪，机枪和火炮也只有常规配备的百分之二十，但海陆空军的总兵力还是达到了三百七十万之众。

只是，日本人不知道，那颗装配完毕并取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马里亚纳群岛南端的提尼安岛上。“小男孩”长十英尺，直径二十八英寸，除了安置它的那间仓库配备了空气调节设备，它看上去与普通的炸弹没什么区别。

一支代号为“五〇九”的美军轰炸机大队，来到提尼安岛上的美军基地，飞行员们除了普通的投掷训练外，偶尔也会分批飞往日军的某个占领区上空扔下几枚炸弹。这支部队的无所事事，引发了岛上其他轰炸机官兵的讥笑。

没人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

由于日本军人顽固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已经近在日本国民眼前。

当初，罗斯福总统批准研制原子弹时，拨款六千美元。他不知道的是，希特勒拨给原子弹的研制费用高达一百万马克，相当于七十四万美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遇重创后，科学家们向罗斯福总统明确表示：制造一种可以用于战争的原子弹，无论理论上还是计划上都是可行的。美国研制原子弹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负责人是出生在纽约的犹太人罗伯特·奥本海默。据说这位毕业于德国哥根廷大

学的量子力学专家有着神奇的天赋，只要叼着烟斗就能够语速极快地发表高深的物理学演讲，还能在黑板上快速地写下一大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方程式，而他不借助任何工具的计算极少出错。

美国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代号被定名为“曼哈顿计划”。

美国、德国、日本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时间赛跑。

在抵达终点之前没人确定谁会赢。

换句话说，原子弹最后落在谁的头上——柏林、纽约，还是东京——没人能够作出预测。

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一波三折，主要原因是站在纳粹反面的德国人从中作梗，他们认为，希特勒一旦拥有了原子弹，整个地球就可能被毁灭。制造原子弹反应堆需要一种石墨减速剂，负责生产石墨的西门子公司高级工程师在生产工艺中做了手脚，致使生产出来的石墨总是导致实验失败。找不到原因的德国科学家，陷入了认为自己计算有误的误区。德国人发现重水也可以当减速剂，但是，德国的重水工厂立刻成为盟军的轰炸目标。德国人只好把国内的重水工厂秘密地转移到挪威境内，谁知这一举动立即被英国特工侦知，一支英军的特种部队袭击了这座重水工厂，使其成为一片废墟。最后，当德国人试图把仅剩的一千一百多公斤重水秘密运回国隐藏起来时，运输船的行踪又被盟军间谍盯上，很快船只被盟军炸沉。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最终被迫停顿。

一九四一年，日本开始研制原子弹的绝密工程，代号为“二号研究”。在时任首相东条英机的催促下，研制的速度十分惊人。但是，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瓶颈，那就是资源匮乏的本土上没有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日本人向德国人要，德国人答应给一点，可运输铀的潜艇在太平洋中被美军击沉。日本人又想到了中国，命令侵华日军成立专门机构在中国大陆寻找铀矿，可这种寻找和开采在战争时期十分艰难，最后在中国辽宁境内开采了一些并运回国内，数量远远不够。日本科学家希望依靠少量的铀原料把原子弹研制出来，可结果却是“二号研究”位于东京的研制中心在盟军的轰炸中被毁，所有关于原子弹的初步研制成果均化为灰烬。日本科学家把研制中心搬迁到京都后，发现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二号研究”小组终于向政府内阁报告：日本已经无力制造原子弹了。

美国人什么都不缺。

美国本土远离战争的威胁。

罗伯特·奥本海默可以专心致志地研制原子弹。

“曼哈顿计划”历时两年多，耗资高达二十五亿美元。在计划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多达六十多万人，其中核心部位的工作人员超过十万，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计划的内容只有包括核心部位的科学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在内的十二个人知道。——当副总统杜鲁门向史汀生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无可奉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搭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实验中心，这个中心的地址是：美国陆军邮政信箱一六六三号。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国造出三枚原子弹，其中一枚名叫“大男孩”的原子弹为实验用弹。爆炸实验日期定在《波茨坦公告》发布前的七月十六日。

七月十六日五时二十九分四十五秒，原子弹的点火器启动了。——一道炫目的闪光从荒原的地平线上升起，方圆几百公里的暗淡天际瞬间被照成一片炽白，其刺眼的光芒令地面上的一切都失去了影像。接着，闪光处传来旷古未闻的巨大的爆炸声，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放置“大男孩”的钢铁巨塔瞬间蒸发，周围所有的物体全部化为乌有，方圆七百米内的沙土变成了熔渣，猛烈的声波把三百公里外的玻璃震得粉碎，整个美国西部都能感受到大地的颤抖。然后，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巨型的蘑菇云转眼升上了万米高空。

有记者后来问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有什么感受，他说他对自己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

同一天，载有“小男孩”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驶往提尼安岛。

《波茨坦公告》已经向全世界发布。

美军的警告已经随着传单撒给日本人；不投降就面临毁灭。

没人知道“毁灭”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有那些目睹了原子弹爆炸的科学家们心知肚明。

美国高层对是否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曾展开讨论，以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为首的将领们认为，日本注定崩溃，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很可能会令美国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持这种观点的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内。而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及太平洋西南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则主张使用原子弹，他们的理由契合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复仇情绪：

……我们用它打击那些不宣战就在珍珠港袭击我们的人；打击那些使美国战俘挨饿、遭受殴打和枪杀的人；打击那些放弃了所有遵守战争国际法主张的人。我们使用它是为了缩短战争的极度痛苦，是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以及美国青年的生命。

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使用原子弹袭击日本的命令。拟定的投掷时间是八月三日以后，同时又要求一定要在苏联对日出兵之前。

美国人最终确定的两个投掷目标是广岛和长崎。

广岛，日本陆军最重要的军运港口，日本海军护航舰队的集结地，日本陆军司令部以及数万陆军部队的驻扎地。美军情报部门业已查明：除了已经疏散的居民外，尚有近二十五万人滞留在城内，但没有盟军战俘和战争法规中必须保护的第三国人员。

至于另一个城市，一开始选择的是京都。京都是日本主要工业城市，也是日本的古都之一。由于盟军始终没有轰炸这里，日本的很多工厂都搬迁至此。可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坚决反对，说毁掉这样一个著名古都，很可能引发日本人的长久仇恨，为战后遗留下难以排解的敌对情绪。否掉京都改在长崎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是日本九州岛西海岸的大港，城内拥有二十多万人口。

八月二日，提尼安岛上那支闲散的“五〇九”航空队终于接到出击的命令：出动七架B-29轰炸机轰炸广岛。其中一架装载“小男孩”，由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亲自驾驶；另外两架负责观测，三架负责气象侦察，一架作为预备机。还有其他大队的两架飞机同行，负责轰炸以后的效果检验；海空救援任务则由第二十航空队负责。

八月五日黄昏时分，五吨重的“小男孩”被从仓库运出，装进了蒂贝

茨上校将要驾驶的那架轰炸机的机舱内——这架轰炸机被取名为“埃诺拉·盖伊”号，这是蒂贝茨上校母亲的名字。陪伴着“小男孩”的，还有这架飞机的投弹手费雷比少校、机械师帕桑斯上校和电子技术军官杰普逊上尉。

八月六日，凌晨一时三十七分，三架气象飞机首先升空。二时三十分，蒂贝茨接到了起飞指令，“埃诺拉·盖伊”号在引擎发出的轰鸣声中开始滑行。“埃诺拉·盖伊”号实在是太重了，上面除了五吨重的“小男孩”外，还有近三万升航空燃油和十二名机组人员。眼看飞机就要滑到跑道尽头了，仍旧没有飞起来，现场的人不禁紧张起来，如果“小男孩”连同飞机在跑道尽头爆炸，整个提尼安岛瞬间就不复存在了。所幸的是，在距离跑道尽头几厘米的地方，蒂贝茨上校终于把“埃诺拉·盖伊”号拉了起来，那一刻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接着，另外两架飞机随即起飞，与“埃诺拉·盖伊”号组成空中编队。这两架飞机中的一架，被取名为“伟大艺师”号，里面坐着年仅二十四岁的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阿格纽，他将负责测试这次核爆炸的当量和范围。另一架飞机里坐的是物理学家约翰斯顿博士，他的任务是用十六毫米彩色胶卷记录下核爆炸的烟云、火球和破坏现场。

清晨六时零五分，飞机在硫磺岛加油，然后直飞日本本土。

“埃诺拉·盖伊”号从硫磺岛升空后，机械师帕桑斯爬进弹舱，完成了“小男孩”的最后装备；接着，电子技术军官杰普逊解除保险并接通电路——“小男孩”已经处于待爆状态了。

七时半，气象飞机报告：广岛上空云量极少。

尽管前几天美军的传单漫天飞舞，广岛的居民却没怎么当回事。从午夜开始，这座城市响起了防空警报，清晨响起的第三次警报声长达一分钟，居民们还是少有人进入防空洞。第四次警报，是一架出现在城市上空的美军气象飞机引起的——这架飞机上涂画着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日本兵在厕所里被冲下去——气象飞机转弯飞走后，“埃诺拉·盖伊”号沿着气象飞机的航线飞到了广岛上空。

八时零九分，蒂贝茨报告发现第一目标。

在“埃诺拉·盖伊”号的下方，白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裂隙，裂隙的下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蒂贝茨问帕桑斯这就是目标？

帕桑斯说是的这就是。

投弹手费雷比把眼睛贴在了瞄准镜上。

八时十五分十七秒，“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门自动打开，然后“小男孩”坠落下去，承载它的降落伞随后打开，“小男孩”开始在广岛上空飘荡——四十五秒后，它将起爆！

数吨重的“小男孩”突然离机，使得“埃诺拉·盖伊”号瞬间上升，在剧烈的颠簸中蒂贝茨大角度转弯并且加速。戴上了黑色镜片罩的机组人员好奇地向下俯瞰，“小男孩”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突然，天空中刺目的强光一闪。

这一刻，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八时十六分。

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广岛市中心——相生桥以西一百米上空六百米的高度，爆炸了。

事后活着的广岛人，在描述原子弹火球四射的强光时，说法不一：蓝色的、淡红色的、深红色的、暗棕色的、橘黄色的、紫色的——还有人说什么颜色也没有，眼前的世界一片惨白。在使人双目失明的强光闪过之后，伴随着轰天的巨响，火球爆出的烟柱上升到万米高空，炸裂成一个巨大的蘑菇云，与此同时三十万度以上的炽热气浪席卷广岛，全城的建筑物蒸发得无影无踪，人体仅在地面印下影子般的轮廓。在距离爆心较远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尸体被烧成焦炭；再远一点，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从废墟中爬出来，身上的衣服没有了，皮肤在一块块地剥落。大约十五分钟后，天上落下携带着放射性尘埃的黑色水珠，飘洒在尚未死去的赤裸的人身上。

广岛被夷为平地。

美军司令部发布的死亡人数是：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三人。

日本方面认为美军缩小了数字。

至少，美军没有把因受到核辐射而死去的人计算在内：几天、几周、几月、几年后，广岛大量死者血液中的白细胞几乎为零，所有的内

脏器官黏膜因为发炎呈黑色，于是医学界出现了“原子病”一词。为此，日本方面的统计是，死于原子弹的广岛市民达十五万以上。如果加上所有受到伤害的人，“小男孩”造成了近二十万人的苦难。

至少在那个时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少数科学家、军队高级将领和国家首脑之外，没有人知道从广岛上空掉下来的是什么。“小男孩”爆炸后，日本军部报告说，美国投掷了一枚破坏力前所未有的高性能炸弹。接着，日本人便收听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广播声明，声明中明确说在广岛投掷的是原子弹。但是，日本政客认为，这是美国方面的宣传，没有确定之前，仍须使用“高性能炸弹”的措辞。可是，当日本内阁派出的由科学家率领的调查人员抵达广岛后，他们立即给东京发去报告：这是颗铀弹。

外相东乡茂德和首相铃木贯太郎磋商后，决定立即奏报天皇，建议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面谕：“敌既已使用此种武器，战争继续更不可能，为图获得有利条件起见，不得遗失结束战争时机。”

与此同时，东乡茂德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发去电报，说明局势急转直下，要求他立即明确苏联的态度。

佐藤尚武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得到的回答是：会见时间为八月八日下午五时。

五时前的几分钟，佐藤尚武走进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的书房，他还没来得及用俄语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表示致意，莫洛托夫便抢先向他宣读了一份文件：

在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以后，只有日本是继续战争的唯一大国。美、英、中三国本年（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对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遭到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提案已完全失去了基础。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向苏联政府建议，要求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借以促进战争的结束，以资减少牺牲，迅速恢复全面和平。苏联政府遵照其对同盟国的义务，接受同盟国的建议，并参加同盟国本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和平、拯救各国人民免于更大的牺牲和苦难、使日本人得以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破坏的唯一手段。从上述观点出发，苏联政府宣布：从明日即八月九日起，苏联政府将与日本政府进入战争状态。

日本人的屈辱与愤慨难以言表："真是啼笑皆非，令人震惊。过去历时约两个月，拼死拼活进行的外交努力，结果不仅全成泡影，而且得到的是以铁锤代替了答复。"

波茨坦会议时，斯大林的态度是苏联八月下旬参战。可原子弹爆炸后，斯大林认为，日本必会急于投降，而如果苏联在日本投降前还没出兵，很可能被美英完全置于远东利益之外。

莫洛托夫向佐藤尚武宣读宣战书两个小时后，一百多万苏军从东西两面向中国东北境内大举开进。

面对广岛全部毁灭的照片，杜鲁门虽然感到了压力，但他没有召开高级会议讨论是否继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也没有和幕僚们一起判断"小男孩"爆炸后日本投降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参战能否加速日本投降的进程。他已经下达了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命令。

战争结束后，有人问杜鲁门他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杜鲁门决绝地回答：没有！就像珍珠港所有的死难者没有其他选择一样！

一份传单在日本上空投下：

美国要求你们立刻注意我们在这份传单上所说的话。我们已经掌握人类从未有过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新近发明的原子弹爆炸了，实际上等于两千架我们的巨型B-29轰炸机执行一次任务时所能携带的爆炸力。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值得你们思考的。我们庄严地向你们保证，投弹是极其准确的。我们在你们的本土使用这种炸弹还刚刚开始。如你们还有什么怀疑，请你们了解一下广岛挨了只不过一颗原子弹后的情况。

在利用这种炸弹摧毁军方拖延这场毫无用处的战争的一切资源之前，我们要求你们现在就向天皇请愿，结束战争。我们总统已为你们概述了体面的投降的十三条结果。我们敦促你们赶快接受这十三条，开始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爱好和平的新日本而努力。你们现在就要采取步骤，停止军事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他一切优越武器，立刻强行结束战争。

现在就从你们的城市中疏散开！

随着传单的飘落，代号"胖子"的一颗钚弹在长崎市上空爆炸了。

长崎，一个建在陡峭小山上的，有着二十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

“胖子”脱离机舱在长崎上空爆炸时，是九日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唯一被准许跟随飞机进行现场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在飞机剧烈的颠簸中努力向爆心看去，他认为他看到的那颗爆炸钚弹，很像一颗从大地上飞起来的彗星，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新种属的生物。这个怪物在亿万分之几秒内，就变成了巨型的图腾柱般的物体，图腾上雕刻着的许多狰狞的形象正朝着大地狞笑。

钚弹“胖子”无论尺寸、重量，还是破坏力，都大于“小男孩”。在闪光、热波的冲击下，爆心附近所有的生物瞬间死亡，建筑物在大火和气浪中被一扫而光，只有三菱钢铁厂坚固复杂的厂房骨架软糖般扭曲在地表上。长崎在几秒钟内成为一片焦土，遍地的瓦砾、灰烬和烧焦的尸体，然后还是带有强烈核辐射的黑色大雨。活着的人从废墟中爬出来，赤裸着烧烂的身体向天空呆望。有人从废墟中把被埋的人拉出，被拉出来的人皮肤如同脱手套一样脱落下来。

长崎伤亡者达十万以上。

就在日本的长崎地狱般死寂之时，苏军坦克的轰鸣声和巨炮的轰击声震撼着中国东北大地，令曾经是世界上最强悍陆军的日本关东军为之肝胆俱裂。此时，尽管关东军尚有两个方面军、六个集团军和两个航空军，共计约七十万兵力，分别部署在中国东北的东、南、西、北四个防御方向上，但由于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消耗，其精锐师团大多不复存在，充数的绝大多数是刚刚应召入伍的新兵。装备上仅有作战飞机一百五十架，坦克一百六十辆，各种火炮不足五千门，在刚刚打败德国的强大的苏军面前不堪一击。

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的远东苏军，辖三个方面军以及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三个航空兵集团军、三个防空集团军，共计七十一个陆军师、六个骑兵师、三个坦克师，火炮三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五百辆、作战飞机三千八百架；海军拥有各种舰船五百余艘、战机一千五百架，陆海空军总兵力达一百六十万。

九日零时，苏军步兵越过国境线，航空兵开始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沈阳，海军则驶入了日本海。

南线，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约五十八万人，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援下，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切断了关东军与朝鲜和日本的联系。而后，中央突击集团向牡丹江方向、左翼突击集团向延吉方向、右翼突击集团向密山方向同时推进，最后攻击哈尔滨和吉林。

西线，坦克第六集团军部队齐头并进，第一天推进一百五十公里，第二天又推进了一百公里。十二日，苏军的坦克部队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十一日占领鲁北，十二日攻占突泉。左翼第三十六集团军，十一日攻克满洲里的筑垒地带；右翼骑兵机械化集群分两路攻击前进，十四日占领多伦，十五日占领张北。

东线，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强渡乌苏里江，袭击了日军的边境筑垒地区，然后主力发起全面攻势。左翼第二十五集团军和右翼第三十五集团军，在东宁和虎头地区遭遇日军抵抗，主力被迫迂回。第五集团军十日攻克绥芬河，之后攻入牡丹江市区，主力则南下进击吉林。

北线，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约三十三万人，在黑龙江舰队的配合下，主力沿松花江向佳木斯和哈尔滨突击。其中一个集团军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八日午夜，苏联独立第五军强渡乌苏里江，十四日占领宝清。第十五集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了日军在富锦附近的筑垒地区，打通了前往佳木斯的通道。第二集团军十四日将爱辉附近的关东军包围，并对其实施了猛烈围歼。

苏军发动进攻的六天内，后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五百公里，前锋抵达东北平原；远东第一方面军前进二百公里，前锋抵达牡丹江平原；远东第二方面军前进十公里，已经逼近佳木斯；太平洋舰队占领了朝鲜的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本关东军海上的退路。尽管日军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对苏军进行全面作战，但关东军的防御部署在苏军的猛烈打击下被割裂，失去统一指挥的部队很快陷于全面溃败的状态，只有少数兵力在牡丹江、海拉尔、虎头等地凭借坚固堡垒继续抵抗。

陷入绝境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波茨坦公告》了。

从八月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始，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洞里举行。会议竟然持续了八个小时。内阁和军方争吵不休。首相铃木贯太郎表示，形势已到了必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地步，可陆军大臣阿

南惟几认为，盟国虽然提出保证皇室安全等条件，但日本决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现在美国人使用了原子弹，苏联人也背信弃义对日作战，为了大和民族的荣誉，继续战斗是唯一一条路，死里求生或许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则认为，继续战争日本没有取胜的任何希望，“必须放下那套誓不服输和一厢情愿，按照实际情况，光明正大地坚持需要坚持的意见，去进行谈判”。接下来，军需大臣丰田贞次郎、农商大臣石黑忠笃、运输通信大臣小日山直登，都对各自管辖领域的状况表示出极度悲观。特别地，他们说到从盟军战俘那里得到的情报是：美国已拥有一百颗原子弹，每个月可以造出三颗，下一个投掷目标将是东京。与会者突然沉默了。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

在长时间的目瞪口呆后，会议立即转为争论如何投降。

以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为首的军方坚持有条件投降，条件至少四项：一、保证维护国体；二、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三、自主地解除武装；四、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不可能，盟军只能在东京以外的少数范围内，用较少兵力和较短时间在日本实施占领。但是，外相东乡茂德则认为，在眼前这种形势下，日本方面附加任何条件，都可能导致谈判破裂。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连哀求的机会都没有了。

内阁会议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只有把天皇请出来。

十日零时，御前会议在皇宫内的防空地下室召开。

这是从一座小山的一侧挖进去的地下防空设施，铺着草席的阶梯很陡，里面有六间房间，最大的一间是会议室。陆续进来的与会者有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以及枢密院议长、内阁书记长官、陆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和内阁综合计划局局长等。走进来的人都保持着沉默，只有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随身佩带的军刀叮当作响。

午夜前十分钟，天皇进入了会议室。

内阁书记长官首先朗读了《波茨坦公告》，在场的人无不“悲感交集，内心痛苦，无以言宣”。然后，铃木首相宣读了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议案：“在上月二十六日的三国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谅解下，日本政府予以接受。”在接受天皇垂

询时，东乡茂德首先表示，无论《波茨坦公告》如何难以接受，日本都必须马上接受，因为实际上日本已没有谈判的可能。如果日本方面提出条件，也只能是维护皇室，其他条件提得越多被拒绝的可能性就越大——“只要皇室能够存在，日本民族就能隐忍持重，以图他日的复兴。”但是，这一主张还是受到军方的坚决反对。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表示，如果无条件投降便对不起阵亡者；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更是认为，现在还不能认定日本已经失败，日本士兵和国民都有“玉碎”的精神；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即使投降，也必须提出四项基本条件，如果盟国拒绝就誓死战斗到底。阿南惟几发言中的一句话关系到中国：“《开罗宣言》中包括取消‘满洲国’的存在，这就将使日本丧失作为道义国家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接受《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就等于日本承认占领中国东北是侵略。

铃木贯太郎首相恳请天皇“圣裁”。

凌晨二时三十分，天皇开了口：

陆、海军统帅部的计划常有错误，失掉时机。说是进行本土决战，九十九里浜的防御工事已经迟误，说是不到八月底不能完成。关于增编部队也说装备尚未齐备。似此情况，怎能迎击敌军！

空袭日益加剧，若使国民再进一步陷于涂炭之苦，文化遭到破坏，导致人类不幸，实非朕所心愿。

此时此际应忍受难以忍受者。解除忠诚的军队的武装，将昨天效忠于朕的人定为战犯，于情实有不忍；但为国家前途计，亦属事不得已……

天皇的态度很明确：日本无条件投降。

十日凌晨三时，日本内阁会议再次复会，最终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早晨七时十五分，日本外务省把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发给了日本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和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令他们立即转告美、英、苏、中四国，并期待尽快得到答复。

关于接受美、英、中三国共同公告的照会

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使天下生灵得免持续战争而陷于浩劫。日本政府遵从天皇旨意，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居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同诸敌对国恢复和平，而此促进和平之努力，不幸归于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恢复全面和平的意旨，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造成之惨祸，作出如下决定：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

帝国政府请求瑞典政府将上述情形转达给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政府，不胜荣幸。

十日十八时，美国华盛顿时间七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盟国收到了瑞士广播的日本乞降照会。美国受盟国委托，由国务卿贝尔纳斯起草复文，通过瑞士公使馆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照会提出的确保“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要求，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

自投降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最高统帅将行使认为适当的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在必要的投降条款上签字，俾波茨坦公告条款得以实施，并须命令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及他们控制下的所有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停止积极行动，交出武器，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实施投降条款所需的其他命令。投降后日本政府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安全地点，俾能迅速登上盟国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盟国武装部队将留驻日本，直到实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目的为止。

十三日晨，盟国的复文正式传到日本。

日本内阁对复文进行了讨论，十五位大臣中有十二人对内容“大致表示满足”，其他三人态度不明朗。

十三日下午，美国通过广播指责日本缺乏诚意。

十四日晨，御前会议再次召开。军方表示，盟国的复文对保持日本国体态度暧昧，须让盟国方面加以明确，不然就只有死战到底。这时

候，天皇作了最后的阐释：理解军方的心情，只是眼前“营救国民的生命”要紧。“如果再继续战争下去”，结果只能是日本“完全变成一片焦土”。虽然对同盟国的手段和做法“难以完全置信”，但“较之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还略胜一筹”。对于日本民族来讲，“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

会场一片哭泣之声。

及至天皇说完，“全体不禁放声痛哭”。

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无论是大举野蛮入侵中国，还是把珍珠港内的美军炸得尸沉大海，日本皇宫里曾经召开过无数次的御前会议，每一次无不是君臣一起畅想日本未来对亚洲的统治。

现在，日本人终于知道什么叫自身难保了。

天皇指令起草投降诏书。

晚上九时，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投降诏书。

晚上十一时，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向同盟国发出电报，表示日本天皇已授权保证签署执行《波茨坦公告》的相关条款，同时命令所有的日本武装力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其官邸内写下遗书：“以一死奉谢大罪。”然后穿上当年充任侍卫武官时天皇赐给他的衣服，面对皇宫的方向切腹自杀。根据武士的切腹礼，血溅到榻榻米上就意味着自己没有过错，因此阿南惟几把战刀插进腹部时向上和向下各扭转了一下，血流了出来。他的内弟竹下中佐闻声跑来，看见他正要把匕首再插进喉部。竹下问：“需要帮忙吗？”阿南惟几哼了一句：“没有必要。”竹下抢过匕首朝他的后背戳了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亮了。

日本天皇在广播里向全体日本国民宣读了《终战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残局，兹告尔等臣民：

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于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英勇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尚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能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相互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同日，日本发布停止进攻作战的命令：

大陆命第一三八一号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命令

一、大本营之企图在于贯彻八月十四日诏书之主旨。

二、各军于接到另行命令前应各自继续执行目前任务。

但应停止积极进攻作战。

又须严肃军纪，巩固团结，行动一致。且应于国内、朝鲜、桦太（库页岛）及台湾努力防止治安之动摇。

签署这份命令的是：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第二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航空军总司令官河边正三、第五方面军司令官樋口季一郎、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官安藤利吉、第三十一军司令官麦仓俊三郎、小笠原兵团长立花芳夫。

此时，日军在本土、远东、中国、东南亚、南太平洋各战场尚有作战部队三百万人。

日本投降了！

无论中国军政高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日本垮台的心理估计大多设置在一九四六年底。包括蒋介石在内，没人知道美国人手里竟然有一种令日本举国胆寒的致命武器。就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准以及民众文化程度而言，中国人无法想象一颗炸弹居然能够一次性毁灭一座城市并令数十万人伤亡。在惊诧的议论中，中国人认为，只要美国人继续扔原子弹，日本就很可能沉入海底了；更何况苏联人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正铺天盖地向关东军扑去。

十五日晚上，重庆市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瞬间响起了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还是分散零星的，然而仅仅一个小时后重庆就变成了一座狂欢的火山。

而在中国北方的另一座小城延安，欢呼声从各个角落爆发，人们互相拥抱在一起，互相抬起来抛向空中，然后就是满城的锣鼓和秧歌。这座被油灯照亮的城市，月明如洗，人们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蘸上灯油，扎成火把，高举着到处奔跑。街边的茶摊摆上了大碗茶，小贩把梨子扔向人们：吃胜利果！吃胜利果！

在对所有事物最为敏感的中国港口城市上海，国际饭店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国旗，欢庆胜利的人们组成一眼望不到边的游行队伍，蔓延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时曾被日军炸得血肉横飞的街道上。除了日本租界外，上海所有的建筑物都灯火辉煌，盛大的欢庆游行一直持续到天亮，人们听见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是美军的飞机。“飞机把一箱箱由降落伞吊着的食物和药品，扔进那片仍旧关押着消瘦的美国战俘和拘留民的集中营场地。当美机低飞的时候，街上的中国人拍手欢呼”。——美军开始充斥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这里成为胜利者的天堂：

苏格兰威士忌酒正在酌满酒杯，牛排有寸把厚，香槟酒和法国葡萄酒都有出售。四种货币同时流通——日元、军用美元、国民党货币、伪政府钞票。你用那些几乎每小时都有币价涨落的通货做买卖，多半可以发一笔财。如果你正确了解兑换率，你可以花二十美元买进全是德国制造的莱卡和罗赖弗莱克牌的照相机。绸缎和工艺品都很便宜。差不多没有一个中国商人同战胜的美国人讨价还价……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

一、我们“正义必胜过强权”的信念，经过八年奋斗今天才得实现。

二、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

三、确信世界永久和平，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

四、此次大战的最后目的，须待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才算完全实现。

蒋介石表示：“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它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韧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

接着，在蒋介石的讲话中，中国人听到了一个令他们有点不知所措的说法：“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对于侵华日军最高将领冈村宁次来说，这一时刻充满困惑。

冈村宁次自一九四一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一直到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没有回过国。对于国内各方面的境况，他认为自己知道的并不详尽。进入一九四五年八月以来，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三军、第二十三军、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总计约一百万日军，正按预定计划进行由南向北的收缩调动。为了统一作战思想，八月三日和四日，冈村宁次还在南京召集各部队作战参谋开会，主要是研究九月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对策。会议推断美军很可能在上海或山东等地登陆，苏联也很可能参加对日作战。因此，必须尽快将部队调往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向南京和徐州等地集结兵力。会议刚刚结束，就传来了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紧接着，八月九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东京大本营连续发来电报：命令所有的作战、兵站和交通部门参谋立即返回东京开会，命令中国派遣军立即向中国东北地区调动一个军的司令部以及六个师团、六个旅团，还有可供六个师团作战使用的弹药。但是，欧洲和重庆的广播中反复播放着日本就要投降的消息，国内也传来内阁试图在允许维持天皇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传闻。

侵华日军在一片迷惑中开始了增援关东军的调动。第十三军第一八师团向北出发，目标是张家口；第七十、第一六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以及第六十五师团的一半部队，也准备向北开拔。第六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司令部，从汉口出发北上；第五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八十八旅团从湖南境内向中国东北的南满地区开进。华北方面军决定撤出河南和山西南部，命令驻洛阳的第一一〇师团和驻临汾的第一一四师团开往北平，驻老河口的第一一五师团开往山东济南。——这是侵华日军入侵中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所不同的是，当初部队是由北向南进攻，现在是由南向北撤退。

十一日，冈村宁次接到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联合署名的电报，说内阁正在与苏、美、英交涉，基本立场是只要不变更天皇的权力，日本就无条件投降。由于是首次从军方正式传来的消息，对于闻村宁次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然而，紧接着，梅津美治郎单独署名的电报到了：“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冈村宁次立即向大本营发去电报，认为让他的部队向中国投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陆军几百万大军未经决战即行投降，如此奇耻大辱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很少见。派遣军整八年间连战连捷，即使一个小分队在全军牺牲之际，也要把武器完全毁掉，不使落入敌手。而今百万精锐健

在，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听命的。我国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尊严国体，全体国民应誓死维护，绝不能靠乞求敌国来达到目的。我坚信，屈服足以亡国，继续战斗，全体国民武装起来，团结一致，进行殊死战斗，必能死里求生。”

但是，十二日以后，进攻中国东北的苏军所向披靡，关东军狼狈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十四日，关东军司令部、伪满洲国皇室和“政府”以及大量的日本移民潮水般地向中朝边境逃窜。就在冈村宁次焦灼地督促北上的部队加紧行军时，国内突然传来“最坏事态，已成定局”的消息。——什么是“最坏事态”？冈村宁次和他的幕僚连夜讨论，认为中国派遣军的“最坏事态”，也许是把所有部队集结在山东半岛上，以烟台和青岛为根据地，建立一个独立占领区。——晚上，“圣裁”下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京大本营通知：收听十五日十二时天皇陛下的广播。

十五日正午，冈村宁次下达训令，要求全体官兵“谨遵圣意”。

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不得不想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阿南惟几自杀了，铃木贯太郎辞职了，冈村宁次想到他身负把上百万官兵和侨民撤回国内的责任，因此既不能辞职也不能自杀——“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

这是一种什么境地？

只有冈村宁次自己知道。

日军宣布投降时，在中国战场上（不包括关东军）的侵华日军总数，约为一百零五万人，其中，华北方面军三十万，第六方面军三十五万，第十三军三十万，第二十三军十万。

只是，尚在向北撤退的日军，由于消息不灵通，八月十五日那天还在战斗状态中行军，其中第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第四十师团正走在九江和南昌一带，第一三一师团正通过湖南岳州，第十三师团正通过湖南零陵。日军为了摆脱影子般跟在后面的中国军队，决定以撤退到湘桂交界处全州的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八十八旅团对中国军队实施伏击。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埋伏在全州以北的高地上，独立混成第八十八旅团主力在全州占领阵地后，以一部后撤并在全州城内放火，引诱中国军队进入埋伏圈。全州燃起大火后，以

为日军已撤退的中国军队冲入全州城，立即遭到日军的猛烈反击。中国军队向南撤退，日军重新占领了全州城。但是，日军立足未稳，突然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即刻遗弃重武器向北急速溃撤。

日军第四十师团从广州北撤，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七月开始从江西赣州出发向南京靠拢，其第二三六联队于八月十四日走到南昌附近。在一条河流的渡口，日军在大堤边的民房内宿营，第二天早上起来便感到不对劲。大堤上聚集着黑压压的中国百姓，鞭炮齐鸣，人声鼎沸。不知所措的日军官兵开了枪。一个手持白旗的国民党军军使跑过来，大声地宣布：日本投降了！——“向来认为我军的征战是战无不克的，这是怎么回事？真是晴天霹雳，但究竟不是做梦，士兵们一个个耷拉了脑袋，枪声停止了”。

十五日那天，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正从广西柳州向江西九江撤退，由于他们是后卫部队，没有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继续行军的时候，头顶上飞来美军的战机，但没有投弹扫射，这让日军很是奇怪。

休息发口粮时，才从负责守备公路的一支日军那里得知，大东亚战争已经失败，日本投降了。这一消息令联队长松山良政大佐和他的士兵们大惊失色，因为昨天他还向联队传达了战斗到底的训示。松山良政对士兵们说，本联队不懂什么叫投降，但他同时命令各大队烧毁文件，尽量不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严禁抢劫中国百姓的东西。然而，师团的电报随即到达，告知日本确实投降了，并命令他们烧毁军旗。松山良政没有马上执行烧毁军旗的命令，他认为这可能会令士气顿时低迷，但继续走了没多久，第六联队还是把军旗烧了——“避开了中国人的眼目，选择了僻静地点”。

奉命向南京靠拢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七联队，是在十九日那天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的，当时他们才走到九江，该联队在那里接到一个古怪的通知：“首都南京还没有驻进中国军队的大部队，而在南京北面十里，津浦线上的六合，中共军正在集结中，中国军队要我军火速出发保卫南京。”无法得知是“中国军队”的谁向日军提出的这一要求，最大可能是蒋介石本人，依据是：该联队“据此紧急情况，从九江出发乘坐民船下航，在浦口上陆，入列重庆军（新编第六军）的指挥下，担任津浦线的警备”。——除了蒋介石之外，谁能把一支日军部队直接编入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里？

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不知所措，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同样狼狈不堪。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日本政府派来洽降的军方代表，在日军副参谋总长河边虎四郎的带领下，走到了同盟国最高联合司令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麦克阿瑟语调冰冷地告知日本人，正式的投降仪式将于九月初在东京湾的军舰上举行，美军飞机将在八月二十三日在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降落。日本代表说厚木机场不安全，因为那里曾是神风特攻队的训练基地，现在还有不少神风队员住在那里。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人，在美军飞机着陆前撤走所有的武装人员，并把停在机场上的所有飞机的螺旋桨全部卸下来。在日本人的再三恳求下，麦克阿瑟才勉强同意美军进入日本本土的时间向后推迟几天。美方把草拟的将由天皇宣讲的投降诏书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日本代表听时，日本代表的脸色十分难堪，因为第一句就是“我，日本天皇裕仁”——天皇从来不用“我”字，而只用“朕”。美方代表说这句话是例行公事，日本方面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词语。——“不要有意贬低天皇，以免激怒疯狂的日本军人。”这是麦克阿瑟对部下的指示。麦克阿瑟知道，美军要顺利地占领日本，还得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膜拜。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美国海军第三舰队进入日本相模湾。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二十分至十一时，一百五十名美国陆军士兵乘坐飞机在厚木机场降落。三十日，美军第六、第八集团军，美国海军第三、第五舰队等部，总兵力约四十万人，先后在东京附近、横须贺、佐世保等地登陆，实施对日本本土的占领。美国曾要求同盟国派出占领部队，但是，英国直到第二年才派来少数部队进驻广岛附近，苏联人不愿意把苏军置于美国人的指挥下而没有派出部队，中国被指派进驻日本本土的占领部队是荣誉第二师，驻地是名古屋，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成行——无法得知中国连象征性占领的部队都没有派出的真正原因——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实际上成为美国的独自所为。

三十日下午二时零五分，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在厚木机场降落。麦克阿瑟显然有些兴奋，作为战后日本的统治者，他的宏大占领计划是：彻底摧毁日本的一切武装力量，建立一个代议制度的民主政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解放日本的农民，开展劳工自由运动，发展自由经济，废除警察镇压制，施行新闻自由，给予日本妇女选举权。麦克阿瑟的幕僚提醒他，最后一项可能会引起日本男人的不满，麦克阿瑟的态度是，他就是要让日本男人名誉扫地，因为战争是男人干的。

麦克阿瑟乘车前往横滨市区，短短十三公里的道路两旁，竟然站立

着三万多名日军士兵，这些士兵全部背朝着他的车队。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日本人警卫天皇的方式，而麦克阿瑟认为诡秘莫测的日本人实在是别有用心。麦克阿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三百多万日军尚未完全放下武器，日本人随时可能有过激的举动。麦克阿瑟认为，他的行为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冒险，因为他已进入敌人的国土，而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部队。晚上，当年率部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走进麦克阿瑟的房间，这位在日军设在中国沈阳的战俘营中已被关押了三年的将军，因饱受苦难而瘦骨嶙峋，步履艰难。麦克阿瑟拥抱了他。当温赖特将军哽咽着说他为放弃菲律宾感到羞愧时，麦克阿瑟说："只要你愿意，你原来的那个军仍归你指挥。"——麦克阿瑟在温赖特将军的热泪纵横中感受到胜利的荣耀。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舰上升起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那天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的国旗。麦克阿瑟率领的盟军代表团走上了甲板，接着以新任日本外相重光葵为首席代表的日本代表团也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重光葵的一条腿曾在中国上海被炸断，拖着假肢的他步履缓慢，他身后日本代表团的另外十个人只能缓慢地向前移动。

《星条旗永不落》响起来了。

麦克阿瑟首先致辞：

我们，各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今天聚集于此，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的愿望。这是我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投降书：

我等兹遵照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为

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国政府首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的公告条款。（上述四国以下简称同盟国）

我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和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以及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我等兹命令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日本国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保存一切船舶、飞机以及军用和非军用财产，防止损毁；日本国政府各机关接受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指示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的指挥官，对其指挥下的一切军队应立即发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

我等兹命令一切官厅、陆军和海军的职员要遵守并且实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为履行投降文件认为适当而自行发布的和根据其委任发布的一切布告、命令和指示；命令上述职员在经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委任尚未解除职务之前，各自留在其岗位，继续执行其非战斗性任务。

我等兹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任者约定：诚实地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并发布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和其他特定的同盟国代表为履行上述公告所要求的一切命令，并采取一切有关措施。

我等兹命令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释放正在日本国控制下的同盟国的一切俘虏和被拘留者，并就其保护、治疗、给养和及时运往指定地点，采取措施。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被置于为实现本投降条款采取适当措施的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

之后，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他一共用了五支笔，每支笔分别写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盟国最高联合司令”“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把其中的三支笔送给了美国国会档案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他的妻子琼妮，另外两支，他当场送给了站在他身后的温赖特将军以及当年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后被日军关押在战俘营中的英军司令阿瑟·珀西瓦尔将军。

麦克阿瑟签字后，海军上将尼米兹代表美国、陆军上将徐永昌代表中国、海军上将弗雷泽代表英国签字。然后是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以及新西兰的代表签字。

九时十八分，受降仪式结束。

这时候，四百架B-29轰炸机，在一千五百架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簇拥下，掠过“密苏里”号战舰的上空，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天地在剧烈震颤——“它们曾经毁损这片土地、它的帝国、它的海上通道；它们不仅炸开了它的城市，而且炸开了它的思想，”在场的美国记者记述道，“机群在东京湾上空炫示它们的辉煌成就，正如短剑在战场上逞威时凯撒的军团曾在罗马炫示他的辉煌成就一样。”

日本政府正式向同盟国投降的同时，在亚洲各个战场上也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十五日，蒋介石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急。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鉴：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度，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蒋介石给何应钦规定了接受日本投降的若干任务。在明确只有国民政府拥有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切权力外，还专门规定了这样两条：“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

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敌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

所谓“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显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中国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刚刚赢得胜利之际，蒋介石对于始终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其措辞之狠令人惊讶：如果哪一支中国共产党抗日部队接受日军的投降，就用武力将其消灭；如果哪一支日军向共产党抗日武装部队投降，不但要用武力消灭之，且何应钦还有权把这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当场处决。值此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国民党表示出明确敌对态度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消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本土（东北除外）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全部地区。

洽降地由于江西玉山机场跑道损坏，临时改在了正面战场最后一战的发生地湖南芷江。八月二十日，何应钦率领中国代表乘坐两架美军运输机抵达。第二天，侵华日军的乞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

武夫一行八人抵达。日军代表被带入机场附近的一间房屋，中国代表已端坐在屋内——日方代表对中国方面的阵容很是吃惊，因为日方除了今井武夫之外，跟随他的仅仅是一名中佐、一名少佐和一名翻译，其余的是驾驶飞机的机组人员；而中国方面除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外，还有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少将以及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郑洞国等一批高级将领。

双方商定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时，中国代表提出日军要保证南京的治安，今井武夫说南京没有不安现象；巴勒特准将说日军要善待美军战俘，不然美军就要实施严厉的报复，今井武夫说美军战俘都挺好的；中国代表表示，日军说由于国共两党争执，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的污蔑，今井武夫说至少中国派遣军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代表又说，日军中还有不肯投降的部队，日方应迅速制止这种挑衅行为，今井武夫反问，如果日军还心存挑衅，那自己为什么先设法到达玉山，然后又按照中方的要求转到这里？

从九月五日起，中国军队新编第六军官兵，乘坐数十架美军运输机飞抵南京。——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并屠城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南京城。八日，何应钦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在数十架战机的护卫下出现在南京上空，南京市民不禁拥向街头欣喜地仰望着。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南京的街头搭起了一座座五彩牌楼，通往受降会场的路上每隔十步就悬挂着一面同盟国旗，新编第六军官兵手持最新美式武器站立在旗下。大礼堂门口的牌楼上悬挂有“和平永奠”四个大字，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挂在礼堂中央。应邀参加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数百名中外记者。

八时五十二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五人步入会场，在受降席上就座。五分钟后，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官福田良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代表越南北部日军）三泽昌雄、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鱼贯入场。

冈村宁次解下佩刀，由小林浅三郎交给何应钦，然后他面对桌子上的投降书凝视了足有一分钟，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

一、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四、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陆海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缴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长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应予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七、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

八、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转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

九、投降之日，日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印）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印）

签字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发布中国战区十六个受降区以及受降长官名单：越南北部地区，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主持，受降地河内；广州地区，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主持，受降地广州；潮汕地区，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主持，受降地汕头；湖南地区，中国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主持，受降地长沙；江西地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受降地南昌；浙江地区，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主持，受降地杭州；湖北地区，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受降地汉口；安徽地区，中国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主持，受降地徐州；上海地区，中国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主持，受降地上海（其中南京附近的日军向进驻南京城的中国军队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投降）；山东地区，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主持，受降地郾城；济南青岛地区，中国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主持，受降地济南；山西地区，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主持，受降地太原；河南地区，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主持，受降地郑州；平津地区，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主持，受降地北平；绥远地区，中国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主持，受降地包头；台湾澎湖地区，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受降地台北，香港投降日军由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接受。

在这份受降名单中，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

军部队及其将领。

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日军共有一个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十个集团军、三十三个步兵师团、一个坦克师团、两个飞行师团、四十一个独立旅团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总计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人，还有步骑枪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七支、手枪六万零三百七十七支、轻重机枪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二挺、火炮一万二千四百四十六门、步机枪子弹一亿八千零九十九万四千余发、手枪子弹二百零三万五千余发、炮弹二百零七万余发、坦克三百八十三辆、装甲车一百五十一辆、卡车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辆、飞机一千零六十八架、航空燃油一万吨、炸弹六千吨、舰艇船舶一千四百余艘、马匹七万四千一百五十九匹等，全部被国民党军接收。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依旧在作战，因为在共产党武装控制区内的日军不肯投降。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抗日民众发出了战斗号召：在共产党人及其率领的抗日军民长期战斗的区域内，日军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如果不投降就坚决予以消灭。

对于国民党人来讲，这是一个难以言表的巨大痛苦：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正面战场的战线不断地后退，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敌后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坚持对日作战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共产党抗日武装已在敌后开辟出广阔的解放区。日本投降之后，对于主力部队主要集中在南中国的国民党军来讲，根本无法迅速开进到敌后沦陷区，更无法进入共产党武装创建的解放区，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

在中国沦陷区，日本人应当向谁投降？毛泽东在他一段通俗而精彩的比喻中用农民的手法描述了这个政治难题：谁收集落下的桃子呢？毛问道，如果地主已经逃避土匪，放弃了果园，而佃户却留下来照管桃树，给它们施肥，并当心看守——那么，在收获的时候，谁有权力收集那些掉下来的桃子呢？是逃亡地主还是照管果园的农民？他，毛和他的共产党人，已经占据了蒋介石放弃给日本人的中国沿海地带。目前，在毛的部队控制的地区，究竟谁应当收获胜利的果实呢？

八月十四日，为了这份不安和焦灼，国民政府与苏联达成了一份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协定的签订令中国人痛心疾首：以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尊重中国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新疆的内部事务，同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派去与苏

联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万般无奈，因为割让如此一大片领土必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而压倒国民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斯大林的一句提醒：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共产党武装就要进入“满洲”了，苏联支持他们进入该地区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中国东北地区，七十万日本关东军中，近九万人已被苏军击毙，六十多万人被俘虏，苏联人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军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致电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宣布日本关东军停止抵抗。直到二十六日，日本关东军部队全部解除武装，向进入中国东北境内的苏军投降。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列强是中国真正的同盟。

战争让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在南京投降，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长达十四年之久。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在其后三千多个浴血奋战的日夜里，中国军队进行重大作战二百多次，大小战斗近二十万次，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五万余人、伪军一百一十八万余人。整个战争结束时，在中国战场上投降的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伪军一百四十六万。根据日本有关战史统计，日本军民在“大东亚战争”中伤亡总人数“约达二百六十万人”，其中死亡和失踪二百五十余万，残废和患病者十余万。受到战争直接损害的日本民众“约达八百七十五万”，其中伤亡约六十六万，死亡的约三十万人中半数源于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和原子弹的攻击。日本在战争中的军事和资产损失，按照一九四五年投降时的价格计，高达一千零五十七亿日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战斗中使用的一般武器，不包括“难以调查的无形财产”。日本人认为：“可以设想，在战后日本贫弱的经济条件下，做到复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本为贪婪的扩张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扩张企图的彻底覆灭：“由于战败，日本的宗主权被局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包括对马群岛在内的周围一千个小岛。结果，战前约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减少了一半。在这块狭小的国土内，要收容约七百万海外归来的复员兵和回国者，还要加上每年自然增加的百万以上的人口。”

那些发动了战争并在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的侵略者，得到了应有的悲惨下场。日本宣布投降后，自知将要为战争承担责任的日军将领纷纷自杀。继阿南惟几自杀后，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前第十三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次郎中将、海军第五航空队司

令长官宇垣缠中将、第一一二师团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第五师团师团长山田清一中将、第十二师团师团长人见秀三中将也相继自杀。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日本战犯共三十九名。接着，日本前首相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七十多名战犯相继被逮捕。其中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于十二月十六日服毒自杀身亡。

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就在日本本土进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省部内，庭长室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审判从调查到判决历时两年半，最后的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三十一页，仅宣读这份判决书就用了整整七天。审判结果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等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被判处二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与此同时，同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等地，对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共五千四百二十三人，其中四千二百二十六人被判刑，被判处死刑者为九百四十一人。

在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下，中国设立了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在中国的保定、东北、南京、广州、济南、武汉、太原、上海和台湾组成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中国各地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二千四百三十五件，判决三百一十八件，判处徒刑的有二百零八件，其中被核定死刑的一百一十件，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各地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竟然有六百六十一件被判定不予起诉，宣布无罪的有二百八十三件。其中就有侵略中国时间最久、罪恶最大、曾在华北占领区残酷杀害抗日军民并实行“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如果连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都“无罪”，那么还有谁有罪？中国的抗战结束后，冈村宁次被蒋介石聘为秘密军事顾问，专门负责策划向共产党军队进攻。在全国愤怒舆论的压力下，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前夕——蒋介石才被迫下令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竟然是无罪释放。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或许，冈村宁次长期指挥日军在华北战场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作战，以及他在日本投降之际坚决命令中国战区所有的日军部

队必须向蒋介石投降，是他没有被国民政府列入战犯名单的根本原因。果然，一九五〇年，蒋介石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秘密协助训练国民党军，图谋私蓄“反攻大陆”的武力。

中国国民政府还对汪精卫伪政权以及著名的汉奸进行了审判，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梁鸿志、殷汝耕等被执行枪决。而汪精卫已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里，国民政府派工兵炸开了他在南京梅花山的坟墓，把他的棺材连同尸体运往清凉山烧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九年六月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长期以来被世界严重忽视，西方舆论宣称是美国和苏联联合打败了日本。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对中国实施武装入侵，是中国军民最早举起了抗击法西斯的旗帜，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美国人打了三年零九个月，苏联人只打了十几天，而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单独战斗长达十年之久，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没有中国军民在中国战场上持久坚韧地抗击着日军，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便无从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将会改变。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历史贡献同时意味着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

中国历来是个不注重档案统计的国家，战争结束时，连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仅是个估算数字。因此，对于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损失，众说纷纭。—般公认的基本统计数字是：按照一九三七年的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的战争消耗为四百多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来讲，已经超出了倾家荡产的程度，使得国家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军事消耗也许尚有较为完整的政府档案为统计支撑，而战争期间人民的损失则根本无法统计。按照一般的常识，这一损失至少是军事损失的数十倍以上。战争彻底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经济建设，日军对中国不设防城镇的轰炸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国多数的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广大的城镇成为一片焦土。穷凶极恶的日军，铁蹄所至肆意烧杀淫掠，其行为之野蛮残暴和灭绝人性，导致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战争蹂躏之悲惨酷烈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粗略统计显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五千亿美元以上。至于人员，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三千五百余

万人；而民间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六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八百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四千五百余万人。

以最坚韧的耐力和最顽强的不屈精神赢得胜利的中国，尽管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仍旧是一场抵御外来侵略的伟大的全民族之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战争。当入侵者肆无忌惮地横行于国土之上时，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赢得全民族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下，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以及社会各界，最广泛地投入到民族救亡的历史潮流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出命，显现出空前的全民族的觉醒。人民是支撑民族救亡战争的主体：自七七事变爆发，整整八年全面抗战，中国走上抗日战场的壮丁队伍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而那些留在田地上耕作的老幼妇孺，皆面朝黄土背朝天，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战争所必需的沉重的公粮税赋。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广大的产业工人，抛家舍业，跟随工业大转移到达大后方，然后冒着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坚持生产，用血与汗支撑着艰难的战争进程，维系着前线数百万军队的作战所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炮火中离开教室，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战奔走呼号。身处国外的一千多万爱国华侨，与处于战争苦难中的祖国生死与共，他们大量捐款和认购国债，把毕生劳作所积蓄的钱财全部寄回国内，大批回国参战的华侨儿女血洒疆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少数民族成立了无数支抗日游击队、自卫队，顽强地抵抗着入侵者，他们在这片国土的偏僻之地让侵略者感受到中国人的不屈。——中国国土广袤，她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

抗日战争是在正确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指导下的战争。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方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亡中国的梦想，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图谋，将日军拖入了不能自拔的战争泥潭。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战是在长达五千公里对峙线的正面战场和幅员一百三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同时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参战兵力，最多时军队达五百多万，民兵达二百多万；而日军投入的兵力最多时达二百余万，伪军一百多万，双方投入的总兵力高达上千万之众。事实证明，日军是在战略进攻势头逐渐衰减的趋势下，一步步走向失败的，而这种趋势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靠

的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驾齐驱的战争形态。在经济落后、军备低劣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地广人众的优势，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发挥出巨大威力，令日本入侵者顾此失彼，疲惫不堪。当正面战场上的日军气焰嚣张之际，其后方占领区却一直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以及群众性的抗日游击队，不但消耗着日军大量的战争资源，牵制着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力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创建出面积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使敌后亿万民众摆脱了日本占领军的蹂躏，培育出令入侵者胆寒的千百支正规兵团和游击兵团，创造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尽管在战争观念、战术方法等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每一次面对日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几十万官兵无不是在战役打响的那一刻便阻敌而战。他们绝大多数是这个国家贫苦农民的孩子，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战事将会多么残酷，牺牲将会多么巨大，战局又将如何演变，但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了打鬼子才扛枪的，是为了保卫国家才开赴阵地作战的。因为武器简陋，他们几乎是在用自己的身躯阻挡侵略者一步步向国土纵深推进。那成千上万倒在抗日战场上的年轻士兵无不是中华民族的好儿男！

中国抗日战争的最伟大意义在于：中国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第一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不但拥有自己的民族尊严，而且将誓死捍卫自己的国家权益。尽管国衰民穷，尽管军备简陋，但自入侵者踏入国土之日起，中国军民虽承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牺牲，却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直到入侵者投降。

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令古老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大风起兮，壮士出征。

赤胆忠心，肝脑涂地。

英雄儿女鲜血浸染田畴旷野，不死将士英灵守护山峦江河。

在此，特别重温中华民族最危险的那一刻，中国不屈的声音：

蒋介石："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

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让我们更加和睦地为着保卫华北实现抗战而更加努力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